

八九中國民運鎮壓迫害專輯

(期刊資料)



..... Articles on Su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

on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of China '89.....

On the occasion of 4th June 2006

Give the Chinese students their history back!

This document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at

<http://www.aidoh.dk/4june89>

It is a part of a comprehensiv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 Tiananmen massacre collected by the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

The Internet edition and the campaign for world distribution of the documents is 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HK Alliance and Danish sculptor Jens Galschiot who has put up an 8 metre high Pillar of Shame in Hong Kong to commemorate the Tiananmen massacre.

We call on everybody to support this initiative and to mail this appeal to institutions of education where there are Chinese students or others who might be interested in preserv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 we can make a common effort to give the Chinese students their history back!

For more information

The documents about Tiananmen: <http://www.aidoh.dk/4june89>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HK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http://www.aidoh.dk/China)

Inquiry phone number: 852-2782-6111, Fax number: 852-2770-6083

E-mail address: contact@alliance.org.hk

Website: <http://www.alliance.org.hk>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

<http://www.aidoh.dk/China>

Contact to Jens Galschiot:

E-mail: aidoh@aidoh.dk, Internet: <http://www.aidoh.dk>, tel. +45 6618 4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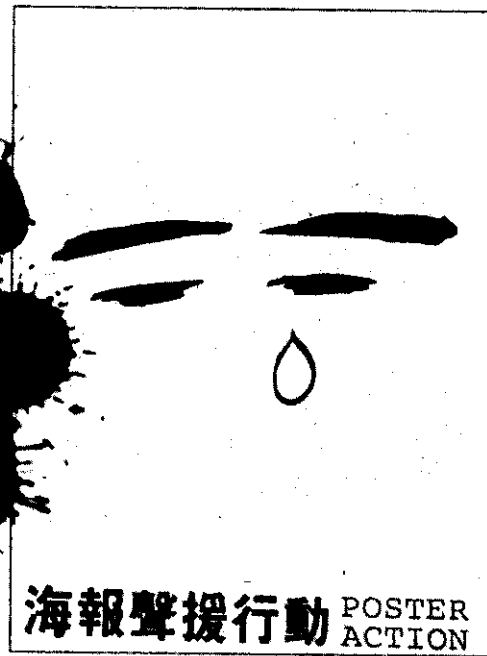
Banevaenget 22, DK-5270 Odense N, Denmark

照片由羅綺萍提供



六月三日下午，被軍人打傷的學生給抬去搶救

照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圖片由蔡丙姿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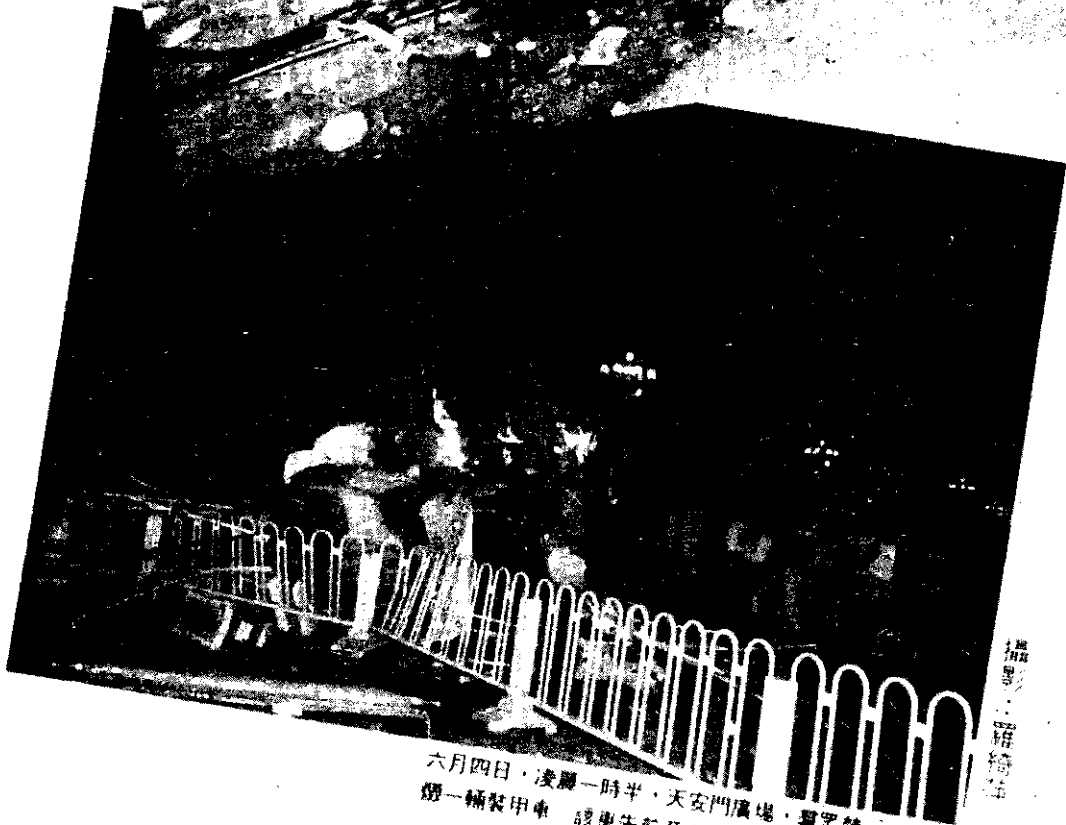
海報聲援行動 POSTER ACTION

古城寒夏

照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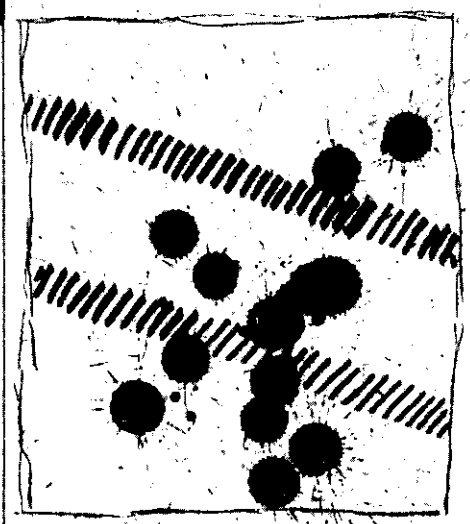


六月四日，凌晨一時許，長安街上，被路障所阻被迫停下的裝甲車，遭憤怒的羣眾焚燬



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半，天安門廣場，羣眾焚燬一輛裝甲車 該車先前至少撞死了六個人

血腥鎮壓 全球震怒



海報聲援行動 POSTER ACTION

圖片由蔡下姿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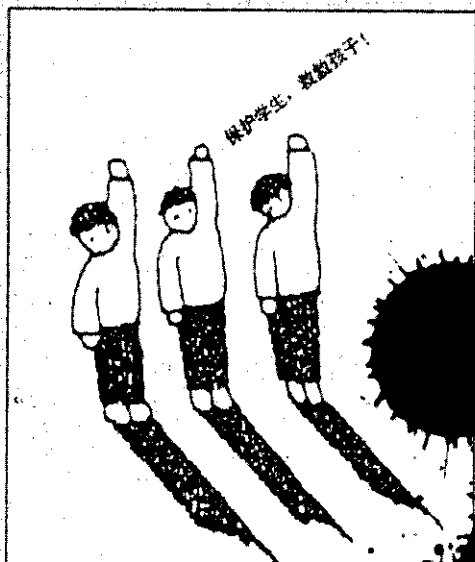
攝影：羅綺萍



六月三日下午，吾爾開希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五月二十九日，「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揭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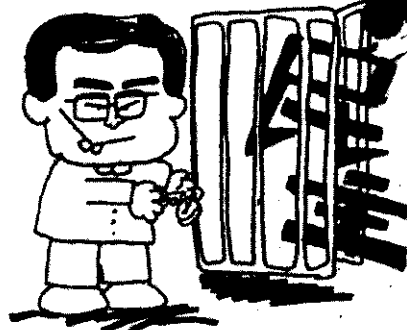


海報聲援行動

POSTER ACTION

圖片由蔡仍姿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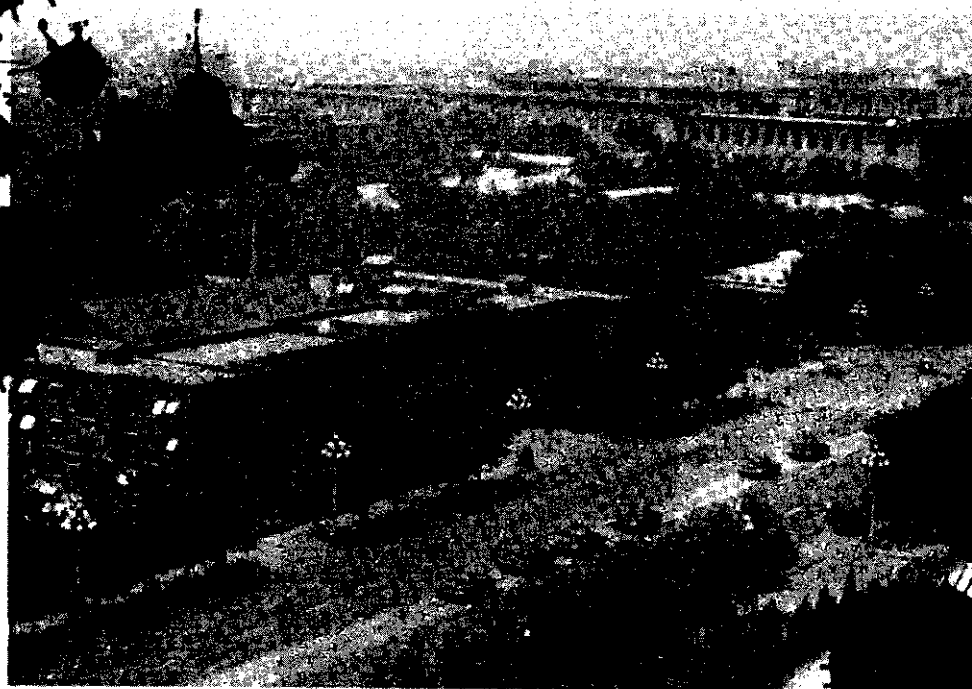
鎖得住嗎？



海報聲援行動

POSTER ACTION

圖片由蔡仍姿提供



六月五日，長安大街，少了行人，多了坦克。

攝影：羅綺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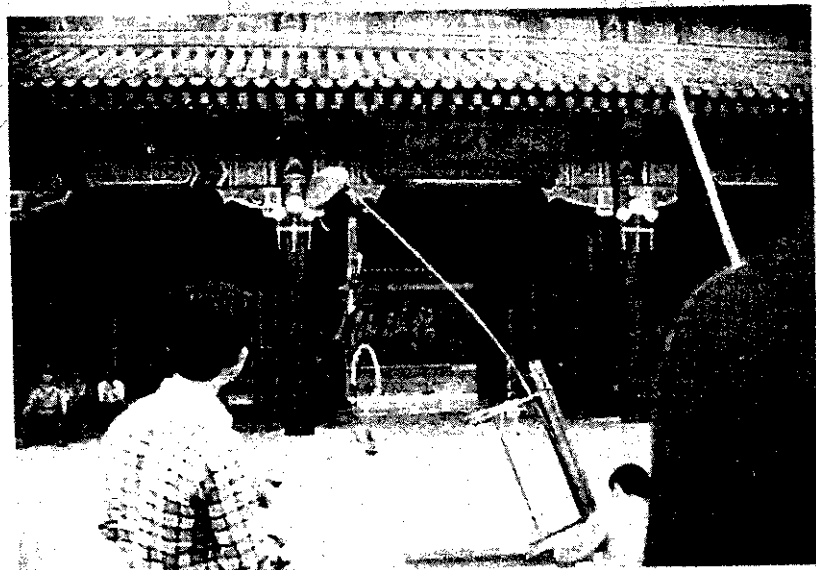
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大學帳篷外，掛出新華門警察打人的罪證。

照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六月三日下午，人民大會堂西面出口，學生被軍人打傷。之後，學生向黨軍和軍人展示一件血衣。

照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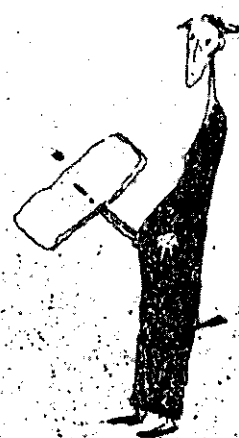
圖片由蔡仍姿提供

我們不要黑手！



海報聲援行動 POSTER ACTION

圖片由蔡仍姿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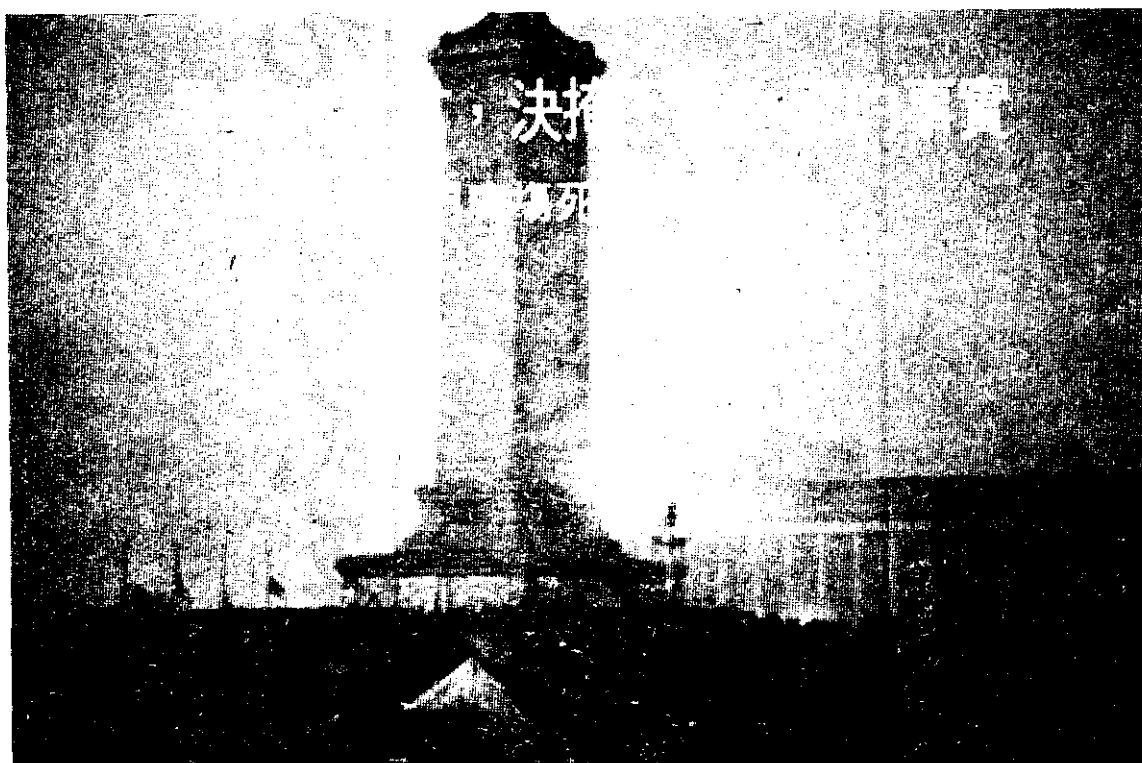
海報聲援行動 POSTER ACTION

八九中國民運

鎮壓迫害專輯

(期刊資料)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編輯：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出版

承印：永齡排字印務公司

日期：一九九〇年五月出版

（非賣品） C-3000

聯絡地址：香港筲箕灣郵箱44008號

序

中華民族的歷程是一篇辛酸的血淚史。我們身爲中華兒女，當然甘願承擔艱苦。但我們要積極建設自己的民族；對外族的侵略固然全力抵禦，對同胞的互相殘殺、迫害，更要站出來指正。

八九年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光輝奪目，激起全世界各地人民響應；其後政府的鎮壓和不斷的迫害，令人痛心疾首。這歷史的教訓打擊極重，付出的代價也確實太大，令不少人身心交瘁。

但人民不會忘記；而且人民更會再抬起頭向歷史挑戰，以和平、非暴力、理性的方式，逐步邁向自由民主。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夏其龍

麥海華

一九九〇年五月

編輯前言

中國官方堅稱八九年春夏發生在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隨之而來的是種種鎮壓措施：如逮捕速決民運人士，甚至全面清洗、整肅，並且制定許多新規定，堅決要把民主火種熄滅。這樣，中國勉強渡過了建國四十年的十、一國慶；勉強渡過了春節。如今呢？面對民運一周年將屆，中國又如何自處？

這一場「反革命暴亂」，僅僅是中國國內一件「風波」嗎？這「風波」竟震撼了全世界，而鎮壓下來的中國民運卻是東歐拉起鐵幕的契機。當東歐人民開始嘗到開放自由的滋味；當他們捨棄一黨專政的同時，苦難的中國人卻再一次沉默、無聲，天天學習黨的話，人人過關，自我檢查，說味良心話……

「八九中國民運鎮壓迫害專輯」取材自本港出版的十五份報導中國時事為主的中文期刊，蒐集自八九年五月至九〇年三月間有關中共對海內外民運人士鎮壓、迫害情況的文章共二百八十四篇。本書務求有文必錄，將傳媒的報導及評論，呈現讀者眼前，為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提供參考，讓讀者對官方言論與傳媒的廣泛報導作一比較。事實孰是孰非，則由讀者自行判斷。

為了配合版面要求，務使統一起見，轉載的文章曾經剪輯，附圖或須棄用。而部份文章亦因應主題而只作節錄。至於橫排字而頁數超過兩頁的文章，則仍保留排列方式，方便閱讀。

目 錄

一、鎮壓先兆	1
二、平暴？屠城？	41
三、劫後京城	134
四、逃亡・捕殺	192
五、清洗・整肅	233
—批鬥・清黨	244
—新聞界	285
—知識界	301
—文藝界	316
六、嚇唬港人	330
七、牽連海外	369
* * *	
索引	382

一、鎮壓先兆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為悼念此位被視為廉潔自守，具開明作風的領袖，要求中央恢復其名譽，特別是為他下台事件翻案。而實質上也是對黨內貪污、腐化、官倒的不滿，對政治透明度及改革開放的進一步要求。

期間政府與人民有長達個多月的拉鋸戰。政府以為下達戒嚴令，調動軍隊入城，便可解決事端。無奈卻引致北京全民投入，由學運演化而成驚天動地的愛國民主運動。其後，軍隊亦愈調愈多，是為鎮壓的先兆。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4	誰是學潮「黑手」？四月官場現形記	百	16/5/89	3
5	慌亂的中南海——掌握黑名單準備大逮捕（關業成）	爭	5/89	10
6	在人民共和國國徽下「四、廿」血案紀實（北京大學學生運動聯合會）	十	特5/89	12/13
7	法律何在？天理何在（中國政法大學全體同學）	十	特5/89	14
	四、二一遊行始末，六萬大學生和平請願（北京大學籌委會）	十	特5/89	14
8	學生運動與胡耀邦是代表正義旗幟——讀「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有感（王若望）	百	16/5/89	17/19
10	「四二七」：中共一手製造的學生運動（梁立）	明	6/89	9/12
12	真理對強權的挑戰——北京四、廿七大遊行側記（黃大衛）	解	5/89	16/18
14	悲壯的北京學運（辛迪）	鏡	6/89	30/33
16	震撼人心的八九學運（黎加路、張結鳳）	百	16/5/89	9/16
20	危城三日（林翠芬）	明	6/89	17/18
21	民不畏死，築成血肉長城（黎加路、張結鳳）	百	1/6/89	9/11
23	民運令中共醜態百出（馬臨川）	爭	6/89	56/58
24	戒嚴令下的北京城（江魏楨）	爭	6/89	14/15
25	古都驚雷——戒嚴令下的北京（方舟）	明	6/89	18/19
26	衝破新聞封鎖，澄清動亂真相（謝婉貞）	百	16/8/89	12/13
27	抖動了地球的日子（羅冰）	爭	6/89	10/12
28	我在天安門廣場上（艾思華）	爭	特6/89	15/17
29	痛心疾首話圍城（郭倩）	南	6/89	1b/1d
31	北京版——國會縱火案（吳天岱）	爭	7/89	55/57
33	北京出現城市游擊隊（簡錚）	解	6/89	10/11
34	5·13學生絕食求對話至中央戒嚴令出期間雙方拉鋸戰表	百	1/6/89	7/8
35	關於北京學潮情況的通報（李錫銘）	解	6/89	95/97
38	李鵬內部講話——透露高層鬥爭內幕	廣	6/89	24/25
38	喬石5月22日內部講話：不能再退讓了	廣	6/89	25
39	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楊尚昆的講話要點	明	6/89	117/119
40	彭真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明	6/89	120/121

誰是學潮「黑手」？四月官場現形記

本刊記者

八九學潮大規模爆發。官方一直在指這是「一小撮人所煽動的，有後台，要揪「黑手」。首都民衆對此嗤之以鼻，異口同聲地說：黑手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曾被毛澤東指為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現在又被羣衆指為八九學潮「黑手」，真是諷刺。羣衆無意攻擊他老人家，祇是大家都很清楚，學生如此視死如歸堅持上街，羣衆如此熱情支援學生遊行，除了久積的怨憤外，最直接的導火線就是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而這篇社論，就是根據鄧小平前一天講話的基調而寫成的。

究竟官方何以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追悼大會高潮過後，再來發出這一股氣騰騰的訊號？根據多方消息來源顯示，大致過程如下：

經過四月二十日和四月二十二日兩場風暴後，中央尚未有對學潮作出明確的處理指示。

二十四日上午，趙紫陽出訪北朝鮮。據知，臨行前趙留下處理學潮的三項意見：(一)先說服學生復課；(二)與學生進行對話；(三)對少數打、砸、搶分子以法律處理。可是趙並沒有親自主理此事。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向中央做了一個緊急報告，報告說，學生遊行是一次政治動亂，中央對學潮態度不夠明確，致令學生越鬧越凶，他希望中央授權北京市委遏止學潮。

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在會上分析學生運動的矛頭是指向黨中央，要黨中央集體辭職。

北京市長陳希同及李錫銘並點了方勵之、嚴家其、于浩成的名。陳、李分析說學運有人作後台，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利用悼念活動，是蓄謀已久，經過長期準備的行動。並直指學運背後一幫是胡耀邦保住的自由化分子。

二十四日下午，政治局召開會議，接納李錫銘的意見，確定學運是「政治動亂」，需用強硬手段對付。

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半，李錫銘拉了楊尚昆一起面見鄧小平，作了上述匯報，結果鄧小平大發雷霆，立即下達強硬指示。

各界人士急電中央進言

鄧的講話中，認為此次學運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次學生政治動亂，有後台，「黑手」，他要快刀了結這次學運，不要怕流血，不怕國際輿論反應，他並提出要「治理政治環境」。

據了解：鄧以蘇聯格魯吉亞騷亂為例，表示要對學生鎮壓，他說：「中國國家那麼大，不能天天有事情」。

他在論及胡耀邦時，認為胡有功也有錯，錯的是一反精神污染，只反了二十天，反自由化不徹底，致又引起此次學運。鄧甚至認為胡耀邦當年提出兩個百分點的增长率，引致通貨膨脹。

他評論輿論不應推波助瀾，鄧說：「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每日可以換一個記者，一年便可換三百六十五個。」

他強調不惜流血地壓下這場政治「動亂」，必須強硬對付，若不動用軍隊，要他這個軍委主席何用。

鄧並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四兩次會上的決定，成立以喬石、胡啓立、李鐵映、王芳為首的處理學運動亂小組，由胡啓立、根據鄧的講話，起草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

二十五日下午胡啓立即召見各報界頭頭，傳達指示：二十五日晚上田紀雲召見各部委，提出二十四小時之內將講話傳達至全民。

這番講話在官民當中引起極大震動。鄧小平不合邏輯的思路、不理性的言論，無法令人信服。很多參加過學運的老人、民主黨派，紛紛致電中央進言。

據悉：前胡耀邦左右手，一中顧委會委員致電喬石「不要成為千古罪人」，並著他「日後不要事事請示匯報鄧，有些自己決定就算了」。

大概真的是沒有人敢承擔歷史罪人的責任。據悉，四月二十六日晚上，中央再開會，便決定不動手。大家都不願擔負流血的後果。

不過，也有另一種傳說，就是當時議決若遊行人數不夠五萬人便動手，天安門佈防的軍警已帶上了催淚彈，各大醫院亦早有準備，接待被催淚彈、警棍弄傷的學生。

黑手是李錫銘還是鄧小平？

不管是那一種說法，都反映出民間的力量成功地遏止了官方所準備的暴力行動。

「四·二七」和平地過去後，國務院立即擺出對話的姿態，袁木即召開兩次學生座談會。

承接此戲劇性的轉變的是，自趙紫陽於四月三十日自北朝鮮返京後，接手處理學潮。

在五月三日慶祝五四的講話中，仍殘留人民日報舊句「旗幟鮮明地反動亂」，因為這篇講話代表著中央政治局開會的集體意見；到五月四日他對亞細亞代表，發表他個人對局勢的判斷，便公開預告將與「工人、學者、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各界對話」，打破了不對話的僵局。

據趙紫陽五月四日的講話，他反駁了較早前，部份領導分析學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說法。

「黑手」鄧小平呢？據說他指示完畢之後即到了青島度假，五月初返京，一看學生大獲全勝，氣得暴跳如雷。

有人認為鄧小平接收了錯誤情報，作出錯誤判斷，真正「黑手」是李錫銘。不過，據知鄧小平本來對學潮就是很有意見的。自胡耀邦逝世，學生馬上大規模悼念，鄧從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一直悶悶不樂，甚麼人都不願見，因此直到最後仍無人知曉他是否出席胡的追悼會。而據說胡耀邦夫人李昭曾致信鄧小平，以請他保重身體為由，不必出席追悼會。這位內心孤獨的老人，對學生的悼胡鬧事，又焉能不憤恨？

最大贏家是趙紫陽。他遲遲不召開政治局會議，不對處理學潮作正式決定，在最關鍵時刻離開北京，讓其他人接手這隻手山芋。搞糟了，他纔回來收拾殘局，一番漂亮談話贏得學生的掌聲。

鄧從地道入大會堂觀看示威

慌亂的中南海

掌握黑名單準備大逮捕

本刊特約記者 關業成

全部武警和公安取消休假

胡耀邦之死，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動蕩，特別使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核心集團異常慌亂。中南海面臨文革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

在胡耀邦去世的當天晚上（十五日），北大校園出現悼胡大小字報，字裏行間透露出對現狀的不滿。武警和公安局全部取消休假。為了不發生意外事件，中共中央強調絕對不能亂抓人，對利用悼念活動進行打砸搶的反革命分子則另行處理。人民大會堂一名幹部透露，人民大會堂已經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原來預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一般會議，暫時全部取消。預防有人利用悼念活動衝擊人民大會堂。

中共中央急發指示

四月十六日上午，北京市委召開了緊急會議，傳達了中央有關精神。出席會議除了各大專院校主要領導之外，還有市屬各新聞單位的主要領導以及其它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

會上傳達了中央強調對胡耀邦充分肯定之外，還強調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胡耀邦之死鬧事。此其一。第二，對羣衆自發的悼念活動，特別是對大學生搞的悼念活動，學校原則上不要過多干預，但要加以引導。第三，首都各新聞單位，要加強新聞紀律，遇事多請示。

從十五日起，北京市委領導專門設立值班室。

決定施用文武兩手

從十六日到今天（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學學生的示威運動一直沒有停止。他們在悼胡之外，強烈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改革政治體制。

據說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政法學院都接到了外地大學發來的電報。胡耀邦過去觀察過的地方，如甘肅大學等，已向省委提出，派學生來北京參加悼念胡耀邦活動，但是中共中央不允許。

在北京車站、飛機場、警察、便衣比平時大大增加。

軍警全面進入戒備狀態

為了對付學運，中央已作好準備，如事態擴大，形成第二個「四·五」事件，即採取鎮壓手段。北京衛戍區、市武警總隊、駐京部隊四月十八日已全面進入戒備狀態。北京市委指示公安局和武警要密切注意學生和社會上的動向，對學生的單純悼念活動不要輕易干涉，但兩個加強營全副武裝在北京西部五棵松總後勤部大院待命。市委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首都各報

對目前自發的悼念活動一律不許報道，但各報社要派出大量記者，注意天安門廣場情況。人民大會堂是從十六日晚上起，由中央軍委辦公廳下令，佈置了二個全體武裝的加強連，未經允許，決不可以走出大會堂半步。

鄧小平在大會堂召開緊急保安會議

四月十八日晚上，大約十點多鐘，鄧小平在楊尚昆、趙紫陽等幾名主要領導陪同下，從中南海的隧道，來到人民大會堂，透過人民大會堂大門的玻璃，觀望了沸騰的天安門廣場。據人民大會堂青年保衛幹部私下向我的一位朋友透露，一名軍人遞給了鄧小平一架望遠鏡，鄧小平不時使用這個望遠鏡，一共觀看了十多分鐘。當時他一聲不吭，什麼也沒有講。

十五分鐘之後，政治局常委五個人和公安部、衛戍區武警部隊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等人，陸續來到人民大會堂江西廳，由鄧小平主持開了會。會議長達一個半小時。會議期間，不斷有人出進進進，灑報各地情況。

人大會堂變成「內戰」指揮部

會議大約召開四十分鐘之後，陳希同和公安部長分別對外打了電話。陳希同聲音很大地說：絕對不允許學生衝擊中南海，衝擊政府機關，如果他們不聽勸阻，後果由學生自己負責！陳希同還對對方說：不要怕，我們有對付騷亂的辦法，等等。公安部長也嚴厲地沖着電話裏吼：黨中央命令我們，一定要把騷亂控制住！……人大會堂的幹部把當時的氣氛，形容為內戰時期的前線指揮部。

五棵松開來的軍隊參加鎮壓

不過學生聚眾在禁令和軍警林立之下，四月十九日晚上，還是衝擊了中南海的新華門。他們高呼民主萬歲和反官僚口號。包括從五棵松開來的軍警出動血腥鎮壓，打傷三百多學生，還毆打了香港《快報》一位記者。

中共以為用「武」的一手可以嚇倒學生。但適得其反。學生們的怒火更猛烈地燃燒起來了。

官方一再向學生們警告，又是這個「不得」，那個「不許」，特別是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開追悼會時不許任何人進入天安門廣場。但是學生聚眾堅持示威，二十一日徹夜在天安門廣場靜坐，二十二日衝破禁令，大會堂內追悼會，大會堂外仍示威。天津南開大學來的五千人參加了示威活動。



左圖：鄧小平；下圖天安門廣場對峙的軍警與學生。



防暴隊裝甲車坦克晝夜候命

中共高層最緊張的時刻是二十一日晚上至二十二日上午。因為如果這十多個小時發生動亂，固然影響追悼會，更重要的是可能發生想不到的變化。因此，從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凌晨，軍警調動頻繁，中共準備向學生聚眾作一定程度的讓步，妥協的同時，還準備必要時採取武力鎮壓的血腥手段。中共中央指示有關部門要做最壞準備，命令北京市各級領導不分晝夜，堅守崗位。古城的緊張空氣幾乎要爆炸了。

二十日凌晨，中央警衛團（多年前用「八三四一部隊」番號，由汪東興指揮）奉命進入北京城中心地帶。

二十日晚上，經過嚴格訓練的防暴隊、裝甲車、防暴車在天安門廣場附近「佈防」和候命。

第三十七坦克師，在五棵松一帶待命開往市中心。

更大的高潮還在後頭

不過，由於中共的克制（要保證悼胡大會如時舉行），也由於學生聚眾講究策略，這幾十個小時在既緊張又和平的氣氛度過了。

但是，可以肯定，這不過是民主運動的新起點，這個運動是長期的，一波接一波的，更大的高潮還在後面。

據公安部門傳出的消息，全國各大學的學生領袖的黑名單已經掌握在公安手上。他們準備在適當時機，上面一呼，便大舉鎮壓和捕人。黨報已放出殺氣騰騰的訊號，難道中共要掀起石頭打自己腳？

在人民共和國國徽下

“四·二〇”血案紀實

我們不會忘記1976年“4·5”天安門事件，今天驚人相似的一幕卻又重新發生在人民共和國的心臟中南海莊嚴的國徽下，我們當然也不會忘記，這已是公元1989年4月20日，一個政府的國家機器對一些參加和平悼念活動，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進行了法西斯的鎮壓。

連續幾天來，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羣衆在天安門廣場自發地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4月19日晚，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人民英雄紀念碑爲人海花園所淹沒。大約來自十餘所高校的學生和全國各地羣衆二十餘萬人，在廣場進行各種形式悼念活動。當晚十時許，部份高校學生和羣衆，高舉花園和“耀邦千古”的輓聯，一齊前往新華門請願。晚上十二時許，首都各高校學生開始在新華門前靜坐，並集體向政府提出七點建議，希望政府官員與學生對話。七點建議如下：一、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二、要新聞立法，開放報界。三、公佈領導層與子女的家產及收入。四、否定反精神污染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次運動，爲在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五、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份子待遇。六、修改北京市關於進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保障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力。七、正確評價學生和市民的這次自發的悼念請願活動，並要求新聞媒介予以公正報道。——此時新華門前的警察已將大部分學生羣衆驅趕至新華門兩側長安街上。同時，政府遲遲對要求不予理睬，留下的同學不得不耐心等待。其間，國歌和國際歌響徹雲霄，“共和國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的口號此起彼伏。同學們重振隊伍，手拉手，秩序井然地靜坐，並無過激行動。

凌晨三時，血案發生了，警察分三個步驟採取行動

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在新華門東西兩側和長安街實施。大批軍警突然出現，衝向手無寸鐵、毫無準備的靜坐請願羣衆，高喊“打死他們”、“往死裡打”。銅頭腰帶是他們的武器，大頭皮鞋是他們濫施淫威的刑具，對和平羣衆進行血腥毒打，來不及散開的羣衆被絆倒、圍毆。

場面一：七、八個警察將一來自武漢的大學生圍堵

在大會堂牆下，將其絆倒，用皮帶狠抽，用皮鞋猛踢，此人當即無法行動癱倒在地，含淚哀求道：“叔叔、叔叔……”

場面二：在中國銀行內街，十幾個軍警圍追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年，將其雙腿打至血肉模糊。

場面三：一羣警察追上一對騎車的男女同學，圍住其中的女同學欲施暴行。這時男同學高喊：“要打就打我吧”，於是再沒看見這位男同學起來……

場面四：一個賣煎餅的個體戶小攤被圍，七個軍警對其圍攻，腰部狠踢二十多腳，此人無法站立。

血腥的暴力大面積進行西至六部口，東至北京站口，南至和平門，四處暴行，血灑長安街。警察過處，許多遭毒打的羣衆躺倒在地，無人救助，至五時尚有許多羣衆倒在地上呻吟。

第三步：警察開始圍攻新華門前學生，人數達五、六百。

場面五：一名香港記者相機中的膠卷被強行搶走。

場面六：一羣警察對秩序井然的學生拳打腳踢，揪頭髮、掐脖子。三、四個警察拖着一個同學扔進一輛公共汽車，毒打不已。十多個勇敢地參加靜坐的女同學遭獸性大發的軍警慘無人道的毒打，鞋被打飛，頭髮被揪下，衣服被撕破。好幾個女同學都被打哭了，有幾個被拳打腳踢後又被拖進車裏的同學，因爲對這種獸行抗議了幾句，又被從車上拖下而遭到又一次毒打。

場面七：一個五十多歲的秘密警察頭目一直在場內指揮着這場毆打，臉上洋溢着愜意的得意。

新華門上的國徽依然閃爍着，在一片野獸般嚎叫聲中和受害者慘叫聲中閃爍着，多麼莊嚴的偉大！

和平被野獸踐踏，知識被野蠻摧毀，又是多麼莊嚴的“偉大”！

我們腦海裏迴響起了一個飄渺蒼勁、悲涼回音：“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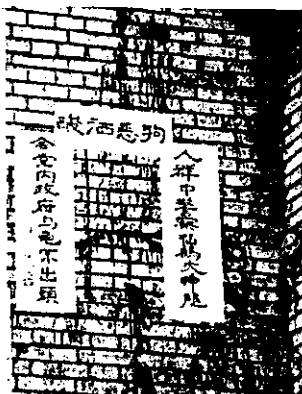
——一羣血案經歷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

提議：北京所有高校聯合罷課！抗議暴行！嚴懲元兇！

通電全國，不達目的，絕不復課。

北京大學學生運動聯合會



「四·二〇」血案紀實

四月十九日，幾百名悼念耀邦的大學生秩序井然地靜坐於新華門前，他們高呼「要求對話」、「民主萬歲」等口號，進行和平請願活動。學生們滿腔熱情的請求政府領導人與他們對話，傾聽他們的要求推進民主進程和改革大業的「七條主張」。但廣大學生的愛國請求被置之不理。至二十日晨二時左右，新華門

前突然出現大批公安幹警，於是馬上出現了這樣一場「勸說疏導」學生的場面：首先，警察強硬停放在路邊的自行車，頓時，人群大亂，警察趁勢沖擊，將周圍的學生和羣衆驅趕至長安街東邊。新華門前只剩幾百名學生在靜坐。此時，被趕到長安街東邊的學生又有秩序地坐下，繼續進行和平請願活動。這時，又一批公安幹警趕到，他們揮動皮帶和電筒「疏導」手無寸鐵的學生。頓時就有不少人頭破血流，呻吟倒地；不停地哀求「叔叔、叔叔」。更爲惡劣的是，部份公安幹警專挑女學生打，被圍毆的學生竭力奔逃，但還是有不少人在大會堂邊、在前門地鐵邊，被追上的警察毒打，政法大學、師範大學的幾名學生被打成重傷。對此，我們的新聞報導是如何表述學生這場愛國運動的呢？《北京日報》、《人民日報》都煞有介事地宣稱「一小撮人」在擾亂社會治安並捏造學生毆打警察的假象，以挑起警察與學生的對立。但是稍微有頭腦的人都明白：難道學生與警察有什麼仇恨嗎？沒有！我們知道警察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們在「命令」下似乎只能這樣做。但是，人民警察和大學生都是熱愛共和國的公民，都希望國家更加民主、更加富強，因此，我們要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爲推進改革進程而奮鬥。

法律何在？天理何在？

——「四·二〇」慘案中政法大學學生王志勇被打真相

四月十九日晚，我校友志勇等三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動，二十日凌晨四時許，他們為乘地鐵，走在大會堂南側街道上，剛走一半，迎面來了兩排警察，二十多人，帶隊警官一聲令下：「什麼人？打！」幾十名武警迅速分散包抄上來，幾名警察不問青紅皂白，蜂湧而上，專用帶鐵扣皮帶抽打王的頭部，並輔以拳打腳踢，致使王志勇頭顱破裂，縫三針，多處淤血，兩眼發烏，左眼無法睜開，當時無法作任何醫學鑑定。慘不忍睹。王被打後，拼命奔跑，昏迷在地鐵口，被兩名魯迅文學院學生送到醫院。

據悉，凌晨時其他學校的一批學生也遭到不幸毆打

，連女同學也未被放過。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使這些武警喪失起碼的道德和人性，難道是共和國法律允許他們幹的，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兄弟姐妹？難道這是黨紀，軍紀允許的嗎？

我校友體師生對此事的發生無不憤慨萬分，校會、研究生會及各系學生會聯合決定於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實行罷課，抗議警察暴行。堅決要求懲辦兇手，有關方面公開道歉，新聞媒介披露該事件的全部真相！司法機關依法嚴懲兇手！（王志勇為國際經濟法系學生）

中國政法大學 全體同學

四·二一遊行始末

——十萬學生和平請願

四月二十一日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十九所北京高校，還有南開大學赴京請願團，匯成十萬人的隊伍，走向天安門廣場和平為民請願，此行的目的，在於悼念胡耀邦同志，加速中國的民主進程，並抗議新華門「4·20 血案」，警方的法西斯罪行，要求嚴懲元兇。

各校組織了學生糾察隊，4公里的遊行隊伍秩序井然，他們高喊「耀邦千古」、「教育救國」、「愛國無罪」、「反對暴力」、「民主萬歲」等口號，市民為此浩大的正義之師感動了，高聲喊：「人民理解你們，人民支持你們」，更有送來開水和麵包的。

凌晨二時，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此時天寒風緊，學生、群眾坐在廣場，學生代表向常委會提出三條要求：保證學生的安全，及有秩序地悼念耀邦，並要求報紙為其不公正的報導公開賠理道歉。又重申「七條」，可是當局不予理睬，同學們群情激憤，用國歌和國際歌聲援，口號聲響成一片，各校的橫幅標語列成一排，移動示威，其中「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新聞要說真話」，「民主萬歲」，「反暴力」最為醒目，至十時，當局答應了「三條」，*並同意李鵬同學見面對話，隨後追悼會舉行了，同學們靜穆地肅立著，深深地悲痛。

追悼會結束後，代表們紛紛出來，他們依然對示威的學生視而不見，同學們高喊「七條——對話」、「李鵬——對話」，回答的只是對峙的警察，不久大批警察「護送」靈車飛速瘋狂離去，不顧繞行天安門一周的常規——我們被欺騙了。

午時三刻，三位同學代表忍辱長跪台階下，手舉請願書，半小時竟無人理睬，只有一位參加追悼會的賓客抱住他慟哭流涕。

李鵬終於沒出來，十萬學生，百萬市民的期望付之東流，下午二時許長達18小時靜望的飢困交加的學生有秩序地離開廣場，學生痛哭，市民流涕，悲壯之極！

大會堂前請願，十萬學生上書，政府不理，罷課遊行！新華門前警察施暴，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視台顛倒黑白！

市民的表現極為感人，送上食品飲料表示支持，下午六時飢餓疲憊的學生返回學校，首都高校聯合罷課，並設法電告全國尋求支持，我們的鬥爭在繼續，有人民的支持，勝利終屬於人民！

北京大學籌委會

1989·4·23

*後經核實，只答應了一條，只要學生保證在警戒線以內，就不予追究責任，後兩條並未得到明確承諾。

七點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 盡快公佈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確認新聞自由。
4. 要求國家領導人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財產收入情況，查處官倒，公佈詳情。
5. 要求有關國家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追究責任者。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師待遇。
6.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其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7. 強烈要求公正如實地報道這次民主愛國運動。

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

1989年4月21日

北京各高校及各界人士

為悼念胡耀邦同志提出民主進程，為抗議「四·二〇」血案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學生紛紛組織起來，組成數萬人的遊行隊伍，進發天安門和平請願。我們的行動受到了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北京市市民們！我們感謝你們！全國人民感謝你們！

如以上七條，政府置若罔聞，我們號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個體工商、服務行業的工作人員、政府機關公務員聲援我們，罷課！為民主奮戰到底！

人民必勝！民主必勝！

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

1989年4月21日

最高綱領：

全面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證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

最低綱領：

請求和政府進行對話，澄清四·二〇事實真相，向學生道歉，如實報道學生運動。

——北京市學生臨時聯合會

4月23日

十月評論 89/5(特)

學生運動與胡耀邦是代表

正義旗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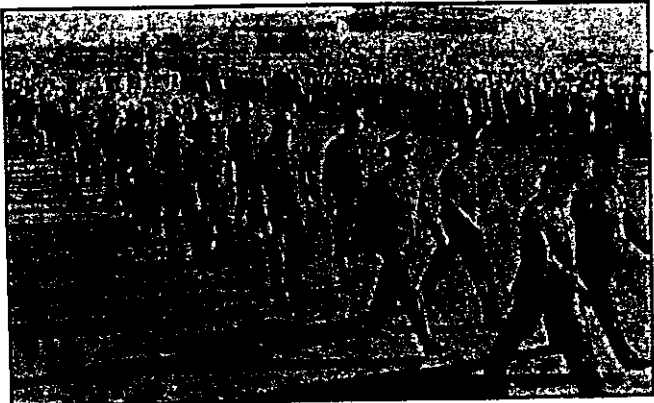
讀《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有感

王若望

「民逼官倒」是正義的

捧讀《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不勝驚詫，義憤填胸，不知怎麼的激起了一股牛勁，乃拍案而起，當即致書鄧小平軍委主席，對這篇社論批判了幾句，覺得言猶未盡，再駁它的幾個荒唐的論點如下：

社論中說：「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按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對羣衆性的暴動和戰爭，一般是區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種鮮明對立的分類，即以「官逼民反」而論，我國的歷史書都說它是正義



警察準備阻止學生進入天安門遊行。

的，而官方軍警鎮壓的一方則是非正義的：「民逼官倒」同樣是正義的，如日本近日竹下登首相宣佈下台，就屬於民逼官倒，我國公衆舉報貪官污吏的「官倒爺」，也是正義的，不是因爲官逼民反的隊伍中混入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就改變它的進步的正義的性質呢？

既然是千百萬人自發參加的羣衆運動，總不免有三十、五十，甚至千二八百的別有用心的人在內（或說他們是投機分子也可），所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即指此。不可能給每個參加者查清其政治動機和出身成份。這種歷史的常規現象，不因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性而有什麼例外。我們不妨舉清末義和拳反帝抗爭爲例：它的後面確實有別有用心

的黑後台撐腰（那拉氏和她的軍機大臣等）。我國的所有馬列主義歷史學家，並沒有因此把它定性爲非正義的暴亂。再舉家喻戶曉的水泊梁山爲例，所有一百零八將都跟山寨頭領政治上保持一致，協力同心，真可謂純而又純矣。只有一位馬克思主義革命導師毛澤東，忽然從這些人中間揪出了一個投降派來，此人恰恰是梁山的領袖領袖及時雨宋江。憑他這個別有用心裁的發現，全盤否定了官逼民反的正義性。我在一九八〇年的一篇社論中曾評之曰：「據說宋江是投降派，不過，這件事用『以人廢言』四個字還不能概括它，應該叫做『一個人廢了一百零八將』（一九八〇年四期《新觀察》）。

「別有用心的人」何所指？

毛的這種奇談怪論，在他死後我們才能評論他的悖謬，他老人家大概因揪鬥老幹部知識分子殆盡而感無聊，忽發異想，去找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精

神領袖，給他扣頂大帽子解解氣。這屬於人到晚年的虐待狂變態心理的一種病態。他的接班人怎麼能把他胡言亂語當作最高指示奉爲圭臬呢？毛澤東思想中有些片言隻語對我們還是有用的，他就說過：「誰要鎮壓羣衆運動，都沒有好下場。」這應作爲毛澤東思想中的精華，他給宋江打棍子扣帽子的話，則屬於缺乏文化素養的糟粕。

既然「社論」的標題叫做「必須旗幟鮮明」，我看「別有用心的人」的概

念就模糊而籠統得很，在最關鍵之處偏偏極不明確。這句確定打擊對象的專用名詞，如果含義含混，那就會導致打擊一大片，爲誣枉好人，放肆地侵犯人權，製造冤錯假案大開方便之門。這一類

，為什麼一句不登，偏偏聽見這句反動口號呢？人們的不信任正是報刊只作爲黨的喉舌，才引起讀者的逆反與懷疑，連我都變成「別有用心」了，我的反動豈非官方壟斷新聞的反動引起的嗎？

姑妄言之立此存照

會記得當年有位人民大學的老教師，對黨做了許多貢獻的葛佩琪，同樣是《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報道了他曾公開發言「要用刀子殺共產黨」，此人便劃爲極右派，做了階下囚十多年，在改正右派時才查明了：他壓根兒沒講過這句話，是徹頭徹尾的誣陷。那時鄧小平領導的反右辦公室管轄下的人民大學黨委原是為了製造輿論，便於激發工農兵對右派的深仇大恨，才把這句捏造的假話強加在葛佩琪的頭上的。年老人喜歡回憶對比，我不免由此及彼，由過去對照現在，故生出了這條猜疑，對北京這次學生遊行中是否真有人喊了這樣的口號，我無憑無證，而社論裏所說的「甚至有人還公開喊……」似乎也拿不出真

反社會主義分子，最後連劉少奇、彭德懷等等也未能幸免，民間不但把當年的「美談」變成了詛咒，而且只有在緊閉門窗裡才敢向共產黨出氣。我黨的聲望也相應地跌落下去，言念及此，悲不自勝。

在我黨領導爲什麼總是聽不進一點批評，一點不中聽的話？其病根是由一個黨獨攬權形成的唯我獨尊，唯我獨尊，養成了驕橫不可一世的氣派；這就產生了種種顛倒：就如顧客有求於店員，買緊俏商品還得向店員參拜送禮一樣，主人公成了奴隸，爲公僕者當然神氣活現，可以利用其手中的權力爲所欲爲了。這篇社論也是如此，好容易找了個藉口，說有人喊了反對共產黨，指名道姓在大字報上攻擊國家領導人，似乎有了理由去彈壓所有上街遊行的人了。殊不知實行了平等的真正民主的多黨制，那麼，有人喊打倒共產黨，在共產黨人的心中，也不會引起尖銳對立，驚呼：「反動的學生要搞動亂了！」之類的話。

一黨專權唯我獨尊

《人民日報》那篇磨刀霍霍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學生們靜坐，警察手拉手封鎖住去路。

是中共領導層向自取滅亡的病危通知書，它一點嚇不倒人，反而暴露了「途窮」首見的氣急敗壞的凶殘，又回到毛時代用政治大帽子和無產階級專政手段來迫害公民和知識分子的老路，可說是「滿紙荒唐言」，這篇「精心製作」的妙文將給光榮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帶來奇耻大辱！

這標題真令人驚心！「旗幟鮮明」，似曾相識，這種盛氣凌人迷信自己有無上權威的口吻，在一九八七年初我們早就領教了，那時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樣見於《人民日報》）。

這兩次高舉的「旗幟鮮明」，究竟是什麼貨色呢？細細查一查它們的色彩，不對了，原來這兩次「旗幟」是在同一個指導思想下發動的，是號召全黨向青年學生開刀的旗幟，是向站在改革前列的知識分子開刀的旗幟，頭一回「旗幟鮮明」把代表民主、開放的旗幟胡耀邦擰下台，第二次是威脅青年一代不得高舉胡耀邦的旗幟！

迷信「旗幟」之失敗

從語源上考證，《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如此偏愛這個動詞呢？實因中國人過去的時代大多是文盲，頭腦簡單愚昧，「龍旗」代表皇權，就向龍旗三跪九叩首，換了共和五色旗，不久又換上青天白日，國人一律行禮如儀；換上了毛澤東旗幟，不僅五體投地山呼萬歲，還要唱：「你是我們的大救星！」因國人有這個「望旗生畏」，「望旗臣服」的傳統，似乎一旦不舉而獨家的旗幟，八億人就如蜂蟻一窩失去蜂王似的，惶惶不可終日了。深諳帝王術者，如華國鋒同志，因自感政治資本不足，在他做接班人的「短命內閣」時期，就「必須旗幟鮮明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復出，他也必須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不過他比華國鋒高明之處，就是他與陳雲、耀邦、葉劍英等開始批評毛澤東，雖然批了一點皮毛，但他們已覺得毛澤東的這面旗幟，在人民心目中已黯然失色，鄧乃用修補補的辦法，以集體創作了一「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去補綴毛的破旗，以維持其不倒。生怕公眾不服，還把他的這個發明載入「憲法」的總綱中，成為四項原則之一。

以上簡略地回顧了「旗幟變幻大王」——（魯迅詩）的歷史。從這中間可以看出：自毛的旗幟成為扶不起的劉阿斗，中國同胞不再以有一面高高在上的旗幟為滿足，他們不再是色盲、文盲，現在他們要首先看清旗幟的色彩為何，再定行止。這是思想解放的大啓蒙，是超過五四時期的大覺醒。這時我們的執政黨領袖，還停留在對「旗幟」的迷信上，既看不到人民的大啓蒙，又不知道「旗幟」的魅力和號召力不在於「大王旗」，而在於它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內容。兩次《人民日報》的社論，皆以「旗幟鮮明地……」打頭，就是上述這個脫離了時代，又脫離了羣衆的心態的反映。

胡耀邦才是鮮明旗幟

一九八七年初的反資產運動與迫使耀邦總書記下台的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倒行逆施與改革的大倒退等等，又等於給全國人民上了一堂啓蒙課，所謂「旗幟」，有順應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廉潔、文明的一種；還有一種是專制腐敗，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一種；這兩面旗幟水火不相容，確乎是非常鮮明的！而胡耀邦正是代表前一種共產黨領導人的旗幟，他被突然砍倒在地，既不讓他聲辯，又不通過中央全會討論，這種毛時代的惡劣做法重新出現，說明打倒他的一方不在理，要不是代表後一種的專制腐敗的旗幟，幹嗎要砍倒代表民主、進步、廉潔文明的旗幟呢？兩年半的實踐又告訴國人，胡耀邦的旗幟一倒，果然貪污賄賂風行，物價與混亂同步上升，知識分子的處境越來越糟；這是不是另一面號稱鮮明得恨的旗幟佔了上風所致呢？

正是《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為題的社論，觸發了全國人民進行旗幟鮮明的思考和選擇，人民，特別是大學學生和知識分子，都選中了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旗幟，而堅決唾棄代表保守、專制、倒退、虛偽的旗幟，這是歷史的選擇，這是全國人民的民意！我們的黨國領導者，在自己走頭無路的關鍵時刻，依然乞靈於一九八七年初高舉的那個「必須旗幟鮮明地……」的破旗，指望匆匆忙忙起個稻草人，嚇退洶湧而來的千軍萬馬，這不是火上加油，更加激起羣衆的憤怒浪潮嗎？

是誰挑起動亂？

「社論」中的這段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果稍稍懂得一點辯證法的因果關係，便會知道：挑起這場動亂的並不是社論中所指的「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上海發的《公告》中稱「一小撮壞人」），意思是一樣的，因「一小撮」是毛慣用的大開殺戒的政治術語，北京方面避免用它，這說明黨中央的水平高於上海。不過從旗幟鮮明度來說，上海比北京鮮明得多，因「別有用心」也者，連測謊器也難以測出誰的心裏是否有唱反調的一閃念。而是以下三個原因：一個錯誤地砍倒了胡耀邦的旗幟，而黨中央在他死後不肯承認這一點；二是兩年來報刊充斥著假話、大話、空話，對照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與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權的行徑，壓抑著一肚皮的憤懣；三是黨對學生採取種種防範壓抑的措施，恐嚇威脅、穿小鞋、分化、利誘等等做法無所不用其極，使他們對執政黨失去信心，近兩年中形成出動潮就是對當局的嚴重警告，又是無聲的抗議！

僅這三點，是誰挑起這次學生運動的怒潮呢？時至今日，現在還不進行自我反省，拒絕思想改造和自我批評，又學著毛時代的用盡了扣大帽子威脅公民的語詞，將矛盾轉移到所謂：「一小撮壞人」或「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用當年階級鬥爭的口頭語為動用武力作輿論準備，實事求是地說，這篇社論也就構成挑起更嚴重的動亂的「陽謀」。（使用「動亂」來替代「鬧事」，不僅將學生運動上綱到犯罪，而且與「四人幫」的十年動亂混同起來，以便激起人民的反感。）「社論」中這樣的措辭是路人皆知的倒因為果，嫁禍於人的手法，這裏無須多說。

執政黨的實用主義

另一方面，旗幟應該鮮明之處却模糊兩可和稀泥，例如：客觀上存在專事阻撓改革破壞改革的人和言行，却不敢去批判和碰它，甚至不讓提保守派字樣；一九八六年以前還提出批左，那以後就連這個也不提了，而改成「思想僵化」。是老年人的思想僵化，還是為個人

利益而思想僵化，誰都弄不清。這是概念上愈來愈不鮮明的過程，也是領導部門保守派（包括極左派）勢力日漸膨脹的反映。再如：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何謂精神污染，連穿小褲管、牛仔褲、蓄長髮、跳交際舞、港台錄音帶、封面用美女像、小說裏描寫婦女進廟燒香、或男女擁抱，無一不是精神污染，這個旗幟太不鮮明，後來胡耀邦竭力制止這個瘋狂的政治運動，才未釀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樣擴展至全國，幸而在短期內宣告結束。世人都說發動清污是一場發昏章的打擊改革開放的逆流，但黨內黨外都不得批判這件事使「國無寧日」的荒唐事，這又是一樁是非不明旗幟不鮮明的例子。用上述兩例與兩篇「社論」作對比研究，又讓中國同胞學了一點乖，即大喊「旗幟鮮明」的時候，就是準備向「階級敵人」（虛幻的捏造的）動手的信號彈；需要掩飾自己的錯誤，或是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就用不着「必須旗幟鮮明」了，甚至越模糊越好。可見，「旗幟鮮明」與否，不過是執政黨的實用主義，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有時亮分，有時又扣住的手中所玩的一副牌。

我敢預言，「必須旗幟鮮明地……」今後還會在報上出現若干次，誰也保證不了十億人中沒有「別有用心」的人和「策劃大陰謀」，如果使用的多了，就會失去其威懾的作用。這一個預言也會應驗的。

四月廿九日於上海



■天安門前學生抬着花圈遊行，悼念胡耀邦去世，爭取民主自由。



「四二七」：中共一手製造的學生運動

梁立

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悼胡運動」，在胡的追悼會後，演變成一場名副其實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意義是難以估量的。它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和不畏專制強暴，也標誌著中國「老年政治」傳統的終結。

這場運動是「歷史永遠不會忘記」的「四二七」學生民主運動。

「四二七」力量的凝結

胡耀邦的辭職，可以說是中國近年來政治鬥爭史上的懸案。由於中共內部傾軋不休，但卻不揚家醜，以致胡耀邦成為權力妥協遊戲的犧牲品。「老年政治」的代表人物鄧小平，用胡這個法碼，使其操縱的各派政治力量得到平衡，從而完成了中共權力的再分配。由此，胡的「蓋棺論定」便是極其敏感的話題。

學生們懷念胡，固然因為他虛懷若谷、廉潔正直，待人誠懇，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中國改革的希望所在。由於他的當政，中國大批知識分子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科學文化教育受到重視，「兩個凡是」的理論禁區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衝破，全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運動局面。因此，當得知胡去世的消息時，中國著名的激進分子戈揚說：「從胡下台之日起，中國的改革就死了。」言外之意是，胡的下台比其逝世更令人惋惜。

然而，在胡去世後，中共中央沒有按慣例成立治喪委員會，而由中央治喪辦公室主理其事，在對胡的評價中，不承認他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中共對已故領導人的最高評價），在悼辭中也沒有提到八六至八七年時對胡的不公正待遇。

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走上街頭，於二十一日（胡追悼會後一日）晚步行到天安門靜坐，要求參加胡的追悼會和追悼會。更為重要的是，學生們試圖利用這機會推動政府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推動大陸民主化進程。

然而政府使學生們失望了。據悉，有識之士曾建議中央在胡追悼會前三天（十九、二十、二十一日）組織全市各界舉哀瞻仰胡的遺容。政治局四人小組（喬石、胡啓立、宋平、溫家寶）也已下令毛主席紀念堂準備水晶棺，但十八日晚上，卻宣布取消這措施，這「泄洪」措施遂告流產。

另一方面，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正在準備材料，

將學生遊行和悼念活動說成一無是處，虛報軍情。由曾建徽控制的北京各傳媒一直沉默。新華社的一條消息又被曾無中生有地加上挑釁性的辭句，擺出一副氣憤騰騰的姿態。

北京市完全不顧學生們參加胡悼念活動的要求，煞有介事地登出了「公安局公告」，宣布胡祭日天安門清場。學生們只好自發地組織起來，於前一天深夜步行來到天安門廣場。

第二天上午，當大會堂內四千人正在舉行胡的追悼會時，廣場上十數萬大學生和市民也在自發地悼念胡耀邦。後者秩序井然，莊嚴肅穆。尤其是胡的遺體沿長安街送八寶山火化時，沿途百萬羣衆爭相目送，場面極其壯觀，只有十三年前周恩來的逝世可與之媲美。

廣場上，數十萬學生與成千組成人牆的警察對峙。追悼大會進行時，學生們自動靜下來，默立著傾聽廣播喇叭中傳出的追悼會實況。學生們面對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他們自己用心血製作的花圈、輓聯，用一種憤懣了許久就要爆發的特殊方式悼念他們的「良友」。廣場上的追悼會在一聲「國際歌」聲中結束。

追悼會後，學生們久久佇立，希望看靈柩中的胡耀邦最後一眼，再送他一段。但他們哪裏知道，官方已通過專門秘密地將胡的遺體送到長安街上。在首都人民長長的送葬隊伍中，大學生們表現突出。他們有的背著「懷念耀邦」的標語，大多數學生騎自行車隨隊送胡遺體到十里外的八寶山革命公墓。數千名學生和市民在公墓外佇立了一個下午，直到胡的骨灰被取出送回胡宅。

這天官方將精銳的三十八軍從保定調至北京。整個北京成了軍人的世界。一輛輛軍車將整個哀傷的氣氛推到了恐怖的地步。

對學生們來說，追悼會上的哀悼僅僅是他們運動的一部分。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對胡的充分肯定，進而肯定民主、自由的精神。在各高校，大字報和標語仍然鋪天蓋地。一方面是要求肯定胡的功績，一方面是強烈要求對話。

山雨欲來風滿樓

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學學生宣布罷課，抗議「四二〇」毆打學生事件，抗議新聞媒介隱瞞事實。追悼會後，他們通過新成立的學生聯委會，每天

印發傳單，公布「四二〇」真相，除大量散發外，還貼到大街小巷的電線桿上。同時，他們制定聯委會綱領和目標，組成「民主演講團」到工廠、學校及街頭演講，對廣大市民進行啓蒙宣傳。

清華大學與北大商定，由清華學生組成的演講團到國貨北上，對北方高校及社會各界進行啓蒙宣傳和校際聯絡，而北大則負責南方。

學生的這些行動，播下了民主的種子，為後來運動發展的民主運動作了充分的準備。

由於學生無任何經濟來源，只好走上街頭募捐。甚至出於他們自己的預料，他們籌到了許多錢，既有個人捐款，亦有團體、企業的捐贈。這些捐款成為後來運動的主要經費來源。

學生們較以往更加成熟：他們知道了組織、紀律和理論反思的重要性。他們成立自己的組織「學生自治會」，宣布不承認官方的學生會；為了維護學生運動的純潔性，或出於對紀律的需要，他們自己成立糾察隊。這一切，使其行動更有規範，更有凝聚力和一致性。

四月二十四日，北大作為高校試點，正式召開高校學生大會，宣布他們的聯委會正式成立並開展工作。會上曾因意見不一致發生激烈爭執，但同學們原諒了他們。一位法律系博士生說：「既然大家都在學習民主，就應容許失誤。聯委會成員有勇氣站出來，已經很不容易了，大家要顧全大局，維護他們的尊嚴和權力。」

就從這天起，北京三十九所高校學生宣布無限期罷課。復課條件是政府盡快與學生直接對話，其次是答應學生的七項要求（即「七條」）。

一位學生寫道：

學生運動的意義不光在於當局宣布接受所提條件，而在於這件事的本身。不論學生運動的價值如何受貶（從表面看，他們所提的每一項要求都被野蠻地拒絕了），但從四年來的事實看，中國民主進程的每一步都是學生運動的結果，客觀上我們的主張正在逐步得到實現。沒有任何理由退讓。其實，只要當局者明白，他們所統治的人中還有人在思考，他們就不得不有所收斂，不致太放肆。僅此一點，我們的運動也是很值得的。

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能使我們的個人價值得到真正的實現。試想，我們畢業分配後，一

個小小的科長、股長都可以把我們制服，而我們團結在一起，可以使最大官僚們震驚、害怕、睡不好覺、得意不起來。我們的力量要讓全國的人都看到，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都在注目我們。我們已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政局，難道我們的價值不正是在激進勇進中得到實現嗎？

學生們的反思加快了民主進程的速度。他們決定下一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五四」七十年之日舉行，他們清醒地看到爭取民主的時機已經到來：國家官僚林立，「官倒」控制了中國商業命脈，經濟改革由於價格改革失敗而失敗，並導致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貪污腐化成風，黨風敗壞，教育凋敝，知識分子待遇低，人才外流嚴重，社會治安每下愈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贏得社會的同情和理解。而且不久前的三十三位作家、記者簽名運動，也表明他們將幫助學生，因為「解放思想禁網」是雙方追求的共同目標。

官方的「陽謀」

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研究了北京學生運動的局勢，認為「形勢很嚴峻」，「多數人是在悼念胡耀邦，但有不少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個機會，利用羣衆和學生對黨內不正之風、物價上漲，以及當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擴大事態，看來是有長期認真準備的。」

北京市委還認為，這次學運是試圖「煽動全國，實質上搞亂整個國家的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也是國內外敵對勢力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是國內長期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結果」。

北京市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這場鬥爭矛頭是指向黨中央，矛頭已指向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採用的是文革的手法，罷課罷教，搶佔電台，散發傳單，串聯，組織非法組織，還有地方有打砸搶燒等行為，最終目標是對黨、對中央、對共產黨的領導。」

北京市委因此決定：一、市委正式向全市市民表明態度，不支持這場運動。二、利用輿論工具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三、發動廣大羣衆，利用各種形式團結羣衆中的大多數，包括參與鬧事的人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別有用心之徒。四、建議中央對當前的動亂提出對策，制定相應措施。

二十四日晚，李鵬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委的匯報。會上，不少人表現出罕有的激動，不僅把學生完全推到他們的對立面，甚至有人氣憤騰騰地提出要用軍隊鎮壓。常委會的決議甚至用文革語言說，這次學生運

這次動亂一出現，就是全國性的，不能低估。

月二十五日上午，李鵬和楊尚昆向鄧小平匯
京市委及中央常委的決議。鄧小平發表如下

事，蘇聯政府讓步，但是也沒有解決問題，是要抓一些人。北京市的意見是對的，中央給予支持，北京市才好辦事。

將學生們原定的「五四」遊行活動提前了。學生領袖們毅然決定二十七日舉辦大遊行。

啓立受命起草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於四月二十五日晚由國家電台播出後，引起

然決定二十七日舉辦大遊行。

[illegible]

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

足學生要求的做法，而是繼續採取拒絕對話的態度。二十五日，官方通過官辦學聯邀請清華學生對話，事情很突然，清華學生認為他們無法代表全市高校學生，因此拒赴對話會。

二十六日下午，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別召開萬人黨員大會，兩市黨政主要負責人均出席。會上強調要依照社論，旗幟鮮明反對動亂。上海市長江澤民還宣布解除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向該報派駐市委的工作組，進行整頓。這一火上澆油的行動再給中共埋下「禍根」。

是晚，北京市公安局發表公告，次日天安門實行交通及行人管制。大有蕭瑟肅段的氣氛。

歷史不會忘記的「四·二七」

二十七日早上八時許，北京五十多所學校學生分三路出發會集到復興門立交橋。一路上，他們高唱國際歌，高呼「共產黨萬歲」、「打倒官僚」等口號，巧妙地繞過警察設立的關卡，手拉手前進。到了復興門，學生人流達數十萬。他們排成五

十七日早上八時許，北京五十多所學校學生出發會集到復興門立交橋。路上，他們高

路縱隊，外國學生佩帶着糾察隊的「杠袖章」。整個學生隊伍被一片標語、橫幅和校旗所掩蓋。

圍觀羣衆沿途爲學生隊伍助威。並主動爲學生開闢警察封鎖線。學生隊伍浩浩蕩蕩地通過了長安街。可惜的是學生與警察並未發生衝突。一路上，羣衆爲學生送水送麵包，還有一些企業爲學生送來了水果、餅乾等食品。十幾位身穿袈裟的和尙手捧木箱替學生化緣募捐，有位市民將二百元人民幣投入箱內。

學生們，路上對軍警極爲友好。他們高呼「人民警察愛人民」，還將羣衆捐的冰棍送給警察。

學生們的遊行規模是空前的，在廣大市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他們舉出的標語，最受歡迎的是：「以法治國，反對特權」，「忍痛罷課，平等對話」，「爲民請願絕非動亂」，「與青年對話無異與未來對話」，「反對近親繁殖」，「青倒不倒，人民不餓」，「老的不退出，新的進不去」等。有的人扛着的人牌子，還攜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遊行、出版、結社自由的條文或鄧小平語錄。

聰明的學生並未强行進入天安門廣場，而是穿過長安街在建國門立交橋轉向二環，使天安門廣場和前門一帶集結的大批軍警虛驚一場。一學生領袖說：「我們今天祇是抗議示威，說明我們是有力量的，並非靜坐。」

當學生們於半夜回到學校時，受到師長們的夾道歡迎。食堂專爲他們準備了熱菜湯飯，一文不取。校園裏像在歡迎英雄凱旋一般，一直鬧到深夜。

在北京大學校園，一條醒目的白色標語寫着：

「歷史永遠不會忘記：八九——四·二七。」

「四·二七」的勝利給中國民主運動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著名哲學家李澤厚說：「這是學生們理性的勝利，這標誌着學生的成熟。」

「四·二七」是中國一九八九年歷史上「新五四」和「五·一七」運動的前奏和序曲，預示了中

◎ 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實力。

真理對強權的挑戰

北京四·廿七大遊行側記

黃大衛

「歷史永遠不會忘記：八九、四、廿七」——這是在震撼人心的「四廿七」北京學生大遊行之後的次日，懸垂於北京大學一座教工樓上的巨大標語。

中國共產黨作為大陸上四十年來的統治者，這一天首次在人民面前作出讓步，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第一次在學生和民衆面前顯示了他們的虛弱。這一天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的民主進程，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

殺氣騰騰的社論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五日晚七點，北京中央視台在新聞中以頭條地位播出了「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全文顯示了官方鎮壓的決心和事態的嚴重性。

四月廿四日星期一，剛剛組建的「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自治會」成功地發動了北京三十多間主要大學的無限期罷課。各校校園中學生們情緒高昂，要求中共高層接受對話和公佈「四廿一」事件真相，嚴懲兇手。為了令官方接受要求和顯示自己的力量，學聯自治會又與各校學生領袖磋商，決定在四月廿七日舉行全市大遊行，表明態度。

面對自十八日以來大學學生們的各種活動，中共高層既恨又怕，深恐事態的發展危及自己的統治。因而，廿五日上午中央政治局緊急召開會議，研討對策。據說會議的爭論較大，主張溫和處理和主張嚴厲鎮壓的兩派各執一詞，而鄧小平則是厲派的代表。也許是剛好在此前發生的長沙和西安的騷亂給了厲派以事實的依據，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以鄧小平意見為基調的決議，力主「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接著，胡啟立秉承鄧小平的意思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其標題「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為鄧小平在會上講話中的原句。

接下來，廿六日全日，中共的所有中央機關和北京市政府上下忙碌了一天。「人民日報」社論、鄧小平的講話，許多市民在廿六日之內逐級火速傳達。事後，許多市民在談話中表示，真應該感謝官方的通知，否則，絕大多數市民並不知道明天會有這樣一次史無前例的行動。廿七日百萬市民湧上街頭響應學生們的行動，給了中共一個意想不到的回答。

血肉之軀衝破封鎖

當「人民日報」的社論播出後，許多人便預感到了一種不祥的徵兆。

更嚴重的是，駐河北的三十八軍已在廿二日凌晨奉調入京，目擊者看到半夜兩三點的時候，一輛輛滿載士兵的卡車駛進市區，甚至有消息傳出，北京地區的軍隊醫院，正在加速空出病床，加強醫務力量，以備在暴力衝突中負傷的軍警使用。而防暴警察和裝甲車也早已隱避在大會堂兩側的一個工地上。

但是，面對著強大的官方壓力，學生們並未退縮而後退。他們不顧報章上的威脅，連夜製作標語小旗，準備次日的遊行。聽學生們說，有些同學甚至連夜寫好遺書，留給自己的父母，他們估計到形勢的險惡，準備在中共鎮壓時為民主獻身。此情此景，至為感人。

四月廿七日，朝陽冉冉升起，初夏的陽光透過密密的白楊樹，灑在海淀路的馬路上。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學生隊伍，高舉著校旗與橫幅，行進在陽光斑駁的路上。在中關村，隊伍遇到了軍警的第一道防線，年輕的大學生們雙臂互挽，展開了民主與專制的第一次正面衝突。

突破了第一道防線，大學生們的信心增強了，緊接著又匯入了人民大學這一支強有力的隊伍，繼續南征。在友誼賓館前，剛剛趕到的兩連軍隊拉開了陣勢，公安局的廣播車不厭其煩地播放著當局禁止遊行的通知。學生們向南挺進，對這一切都不理睬，路邊數以萬計的羣衆緊張地觀望著，不知道會有什麼情況發生。突然，軍隊和警察向兩旁退去，讓出馬路給學生隊伍通過。學生們興奮地高呼「人民警察愛人民」和「理解萬歲」，順利地通過了第二道封鎖。記者見到，緊貼著學生隊伍的海淀分局警察，亦無表情地望著學生們通過。記者試著向一名年約五十歲的警官提問：「請問你們今天出動的目的是什麼？」他謹慎地回答說：「對不起，我沒有權力回答。」我知道這是實話。

在白石橋，執行封鎖任務的軍官也許是個傑出的指揮官，他很認真地執行上級的命令，以至於學生隊伍與軍隊相互進退了幾個回合。羣衆開始憤怒了，他們高呼著「人民軍隊愛人民！」，攔向警棍橫亘於馬路上的軍人。終於，在羣衆的強大衝擊下，軍人的封鎖線被切

斷，空出了馬路的中間給學生隊伍通過。指揮官看到大勢已去，下令軍隊退守到首都體育館的一邊。民衆為學生的勝利而歡呼，為軍隊的撤退而鼓掌，人心向背，昭然若見。

愛憎傾向在長安街上流露得更为明顯。中南海新華門兩側，官方派出了數千名軍警，組成最強大的封鎖線。但是，在學生隊伍尚未到達之前，警察的前鋒隊伍就受到羣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那些年輕的圍觀者蜂擁而上，喊著口號，迫使警察的防線節節後退。一名高級警官走過來，面對羣衆說道：「咱們各吃一碗飯，都不容易，請大家往後退一下，幫幫忙吧！」從來沒有聽到一個警察會用如此柔和的口吻對百姓說話。

在大會堂北門外，設立著官方的最後一道封鎖線。但是熱情的老百姓從這道機關槍的防線，站到了他們的背後歡呼。兩面的羣衆隔著十層以上的軍警，互相打出「V」字致意，歡呼聲此起彼落，軍警們已陷在人民羣衆的汪洋大海之中，腹背受敵。當軍警整個遊行的人大校旗在人群中出現的時候，軍警們已接到命令，一路跑步退回到大會堂兩側的軍車中去。

人心向背大勢所趨

學生們勝利到達了天安門，中共當局設下的十幾道防線，數萬名軍人警察的武力阻截，沒有能夠阻擋住這滾滾的民主洪流。大學生們知道，遊行的成功，除了他們自身的堅定決心及嚴密組織外，民衆的強有力支持是一個絕對重要的因素。

四月廿七日，與官方的願望相反，北京市民傾城出動，分佈在從海澱至天安門幾十公里長的馬路上，上百萬的羣衆給學生們吶喊助威。學生隊伍所到之處，鼓掌聲，歡呼聲，「學生萬歲」的口號響成一片，令學生們受到極大的鼓舞。

記者用一組短鏡頭來試圖概括一下這些感人的場景。

在海澱路北口醫院門前，醫生和護士們站在路邊歡迎遊行隊伍。當北醫的隊伍來到時，一部分身穿白色長衫的醫護人員即興加入了遊行隊伍，人羣中爆發出一陣歡呼。

在魏公村，一隊中學生高舉「哥哥姐姐們辛苦了」的橫幅，列隊向遊行隊伍致敬。在白石橋，一批年輕的民衆合力攔向軍警，衝開他們的防線，打開一個缺口令學生隊伍順利通過。當軍隊又反撲過來時，成千上萬名羣衆齊聲高呼「不許打人」以保護學生。在車公莊路，一名年輕的高高站在大貨車

上帶頭高呼口號「學生萬歲」，周圍的羣衆隨之高呼，並向學生鼓掌致敬。

在阜成門立交橋下，學生設立的募捐箱已裝滿了羣衆的捐款，但橋上仍有一張張人民幣扔下來，甚至有十元和五十元的鈔票。

遊行隊伍所經之處，老百姓買了麵包、餅乾、生果、汽水來送給學生吃，更有許多個體戶老闆，用三輪車將食品送來慰勞學生。

在大會堂兩門外，三十八軍的兵車幾十輛一字排開，大兵們站在車上待命。許多羣衆圍著他們觀看，一位幹部模樣的人在對士兵演講，指他們是由人民養活的，不可用武力來對付老百姓和學生。有人並高呼要三十八軍離開北京。

在西單路口，一位青年大罵守候的警察：「吃他媽哪碗飯不好，非吃這碗飯人家當狗使！」

其實，羣衆這種對軍警的成見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一次却真的是冤枉了多數軍警。整體來看，軍隊和警察與學生並非是真正對立。他們軍令在身，執行任務，逼不得已，對學生抱著理解與同情。

這表現在他們攔截學生時都沒有太過積極主動，反而是命令後撤時倒十分迅速。有些年青軍警甚至私下對熱人表示，若他們不是穿了這套軍服，也會與學生一樣去參加遊行。在正義路口，記者見到路邊許多年輕的警員在對著眼前遊行的學生們微笑，看得出這股清流露出的真誠和支持。

當夜，學生們拖著疲倦的腳步在二環路上行進時，有大客車悄悄駛來，表示可以送體弱者及女同學回校。這些大客車的司機們把自己的車牌摘下，以免給人知道日後找麻煩。

「秋後算賬」的資料在搜集中

對於學生的遊行，中共本來沒有予以太多的重視，以為用社論的強硬口吻嚇唬住，並沒有估計到自己會遭到全盤皆輸的慘敗。當它發現自己的虛弱以後，便開始改變態度，企圖以軟的手段來達到目的。

中共使用了阻撓的手段。把學生宿舍樓中唯一的電話收走，冀以切斷學生與外界聯絡。下令把校園商店及周圍地區店舖中的咪和音響設備收拾起來，不再出售，以防學生搞宣傳。天津市的李瑞環甚至下令天津火車站不得向學生售北京車票，以防天津學生來京搞「串連」。

另一方面，又採用限制的手段，極力縮小學生造成的影響。它下令經行海澱的大學集中

地區的公共汽車，如三三二路、三零二路、三二〇路等線，不得接載學生。又通知全市各出租汽車公司，命令司機對要求去往各大學和天安門廣場的乘客拒載。不過由於人心所向，這兩條命令都未能真正執行，有的出租汽車司機不但駛往大學，而且對於「窮學生」們乘車一律不收錢。

五月四日，北京高校學生再次上街遊行，打出了「下跪只有一次！」的橫幅，顯示了大學生們進一步的清醒與成熟。天安門廣場上滿地是打碎的汽水瓶玻璃，據說那是在砸碎「小平」。對照幾年前大學生們打出的「小平你好」的橫幅，令人看到中國民主的艱難。

歷經半個月之久的八九年大陸學生運動暫時平靜了，但是不為人知的許多事情仍在進行。北京市的主要幹道是裝有攝像器的，東西長安街的燈柱，以及新華門樓上的窗戶內，隨時都有工作著的攝像裝置。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位低級官員誇口說，官方的錄影設備足找到每一個想找的人。他說這項工作由喬石領導，以後會「秋後算賬」。我們希望這話只是說說而已，當然，中國的民主潮流完全可能再次落入低谷，但是浩蕩的春水向東流去，却是任何頑固勢力都不可能阻擋的。

圖

解放月刊 89/5



悲壯的北京學運

辛迪

是次學運造成今天這種（李鵬掌權，趙紫陽下台）的局面，是最高決策層和學生、民眾都未料到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背景。

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猝然病逝。這位清正廉潔，力倡民主、改革，並被公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知音的領導人的去世，在民眾中引起極大震動。尤其是在高等院校中，以悼念胡耀邦，要求清除腐敗，推進民主進程為內容的各種活動不斷出現，並進而發展為遊行示威。

對遊行示威活動，各校原有的學生會表示反對。於是一些學生紛紛成立了自治會。他們佔領學校廣播室，通過廣播和大小字報，抨擊中共黨內的腐敗現象，要求爭取民主。中國當局則認為，學生自治會是非法組織，承認他們勢必引起學生之間的對立。一些居心不良者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並四處串聯以製造更大事端。而長沙、西安已發生打砸搶事件。由此判斷：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於是《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發表社論《必須嚴厲鮮明地反對動亂》。

「四二七」雙方皆理智

這篇社論一發表，立即在高校學生中產生極大進行對話。

五月四日，值「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來自北京及外地的四十餘所高校的數萬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第二次大規模集會、遊行。

在天安門廣場的集會上，有人宣讀了一個《新五四宣言》，宣稱要把「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發揚光大，以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同時還宣佈，北京高校學生將從五日起全部復課。在集會結束前，組織者說，已經成立了一個「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保留必要時仍採取統一行動的權利。

儘管是日天安門廣場實行交通管制，警方在遊行隊伍的幾個必經路口組成了人牆，如同四月二十七日一樣，政府對學生的行動仍然採取了克制的態度，沒有發生暴力衝突事件。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亞細年會上的講話。趙說，遊行隊伍中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是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這也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中國不會出現大動亂。現在最需要

反響。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北京近四十所大學中的數萬名學生舉行了他們所聲稱的和平請願。雖然警方在各主要路口築起厚厚的人牆，但請願隊伍仍然衝過警方的阻攔，到達天安門前，並高舉橫幅繼續向東行進。在這次請願活動中，學生和警方都表現出理智和克制，沒有發生衝突。

在四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政府部門負責人與北京高校學生的首次對話中，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人民日報》社論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的問題，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同學的。廣大同學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希望推動民主化進程，深化改革，懲治貪污，克服腐敗，這些希望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袁木還說，政府與學生之間不是對手之間的談判，而是相互交談，溝通思想，增進理解，不應該有什麼先決條件。

這次對話會通過電視台轉播後，高校學生對此諸多不滿。一些學生認為，這不是對話，而是訓話，政府根本沒有誠意在平等、真誠的基礎上與學生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人們發現，趙的講話隻字未提制止動亂，同一「四二六」社論調子有所不同。

一些學生認為，趙的講話對這次學生遊行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他們真誠地希望黨和政府切實加強透明度。北京大學一名積極參與遊行的學生說，我們歡迎這種處理問題的態度，但關鍵是看下一步如何對話，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但是也有一些高校師生對趙紫陽講話的某些內容持保留態度。

參加罷課遊行的北京大學學生認為，這次學潮最後中心的目的就是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它將在事實上促進中國民主制度的建設。既然政府已經對學生表示理解，對學生的意見表示尊重，現在復課不失為明智之舉。他們希望通過平等對話表達意見，盡快看到政府採取措施和行動，整頓黨風，消除腐敗，深化改革。

對話不成轉為絕食

五月六日，四名學生代表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遞交一份署有二十四所高校名稱的「請願書」，要求「就當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兩天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答覆說，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務院和北京市的有關領導人已和部分學生對話，效果是比較好的。今後將廣泛地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黨外人士接觸並進行對話。

五月八日，以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孫爾開為首，在悼念胡耀邦期間組成的北京高校自發組織臨時學生聯合會宣佈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並再次向中共中央遞交一份要求對話的請願書。然而他們於三天後得到的電話答覆是，中共中央理解學生要求對話的焦慮心情，很重視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正在加緊研究。

由各高校學生自行推選產生的五十幾名代表，組對話代表團，積極準備與上層領導機構進行對話。早在五月三日，袁木便說，政府與學生的對話應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誠懇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學生的對話要求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表現了青年學生相當程度上的一種幼稚的衝動。學生們則認為，政府對他們這兩次遞交的對話請願書一拖再拖，並且幾次答覆均無具體結果，令他們深感失望。於是，經一些學生提議，決定採取集體「絕食」方式抗議政府對他們的漠視。

正如北京理工大學飛行器專業二年級學生李今朝所說，我們是在遊行不解決問題後才選擇了罷課，罷課不解決問題，才選擇絕食。學生們的「絕食宣言」中這樣說：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不真實的報導。

五月十三日，由學生自願參加的第一批絕食請願團一千人在北京師大集結宣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國家的繁榮，我自願絕食，堅

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些參加絕食的學生皆寫下了遺書。一名學生在給父母的信中說：「我絕食了，假如我因此死去的話，請不要悲哀。我是一個中國人，我願為自由、民主而奮鬥到底。」下午二時三十分，絕食團由北京師大出發前往天安門廣場。他們提出的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之後學運複雜

學生選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時進行絕食，無疑使學運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學生們打出擁護戈氏支持改革的橫幅以及戈氏的畫像。也許是因為這次學運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使得中共高層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顧及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以及他們提出的要求。不可否認的是，學生的絕食請願也影響到這一重大的國事活動，歡迎儀式，戈氏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雙方的會談等，不得不因而改換地點或取消。

就在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的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鵬，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與首都部分高校學生對話，再次肯定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推進民主進程的合理要求，但同時提醒學生，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善良願望為轉移，希望學生以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為時三個小時的座談對話中，李鵬、閻明復等反覆勸說學生停止絕食請願活動，但未能奏效。

五月十四日，戴晴、于浩成、嚴家其、蘇曉康、劉再復、李澤厚等十二名知識分子在聯名發出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中聲稱：第一、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肯定這次學運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絕不以任何形式對學生「秋後算帳」；第二、承認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第三、不能以任何藉口，任



參加絕食的學生視死如歸

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學者、作家們希望學生們作出自己的明智判斷，發揚這次學運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

圍繞是否停止絕食、撤離天安門廣場這個問題，絕食請願團及北京高校學生亦各自存在分歧：一部分主張撤離的學生說，要用行動表明他們不是動亂，實際上他們的愛國民主運動已經得到全國人民的肯定。而另一部分學生則提出，政府不答應我們的要求，不承認學運是愛國的民主運動，就不撤離天安門廣場。甚至有十一名學生提出自焚以示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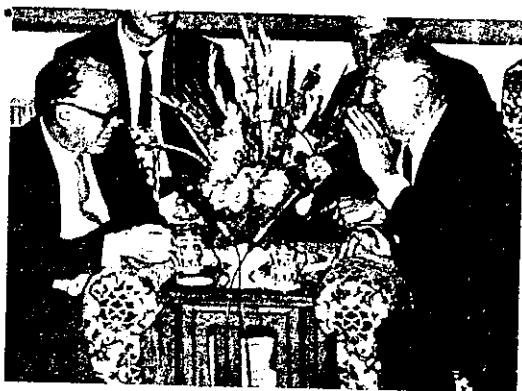
事實上，學生絕食以後，社會各界紛紛走上街頭，舉行聲援遊行。一些人張貼標語、傳單、漫畫，矛頭主要對準軍委和政府主要領導人。遊行隊伍中甚至喊出要求「下台」的口號。連續幾日的絕食，以及氣候反覆無常，致使許多學生暈倒被送往醫院搶救治療。

趙露秘密目的何在

五月十六日下午，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中共十三大時曾通過決議，在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上，仍需要小平掌舵。分析家們說：趙此舉無異於把無力解決學運的責任推給鄧小平。幾乎是同時，聞明復為促使學生結束絕食請願行動，隻身來到絕食隊伍中，苦口婆心規勸學生們以大局為重，給中共最高領導層以時間和機會，不要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請求學生們保持理智，盡快結束絕食。聞明復離開廣場後，學生代表召開緊急會議，由於多數學生反對，遂堅持繼續絕食。

在學生絕食過程中，中共當局派出醫務人員全力搶救絕食學生。十七日，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肯定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絕不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絕食。但是絕食學生則認為趙的講話並非中央決定，而且沒有否定關於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因而表示要繼續絕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生王超華說，如果僅僅說是愛國熱情，那麼在這種熱情下，什麼事也會做出來。她代表廣大絕食學生希望中央明確承認這是愛國民主運動。

十八日凌晨，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等前往北京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因絕食病倒的學生。當天上午，李鵬又在人民大會堂與絕食請願學生代表會面。學生代表再次重申他們的要求：一、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是所謂的動亂。二、盡快對話，並進行現場電視直播。如果



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透露了中共十三大的秘密決議

政府能盡快則滿答覆，那麼他們可以去動員學生撤離廣場。李鵬表示，政府及黨中央從未說過廣大同學在搞動亂，我們一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但事態的發展不以學生的善良願望和愛國熱情為轉移。他說：不管我們中間還有多少不同點，救人是第一位的，在這方面政府責無旁貸。

由於這次會面不歡而散，雙方仍處於僵持局面。據統計，已有三千多人次學生被送往醫院，許多學生在醫院剛一蘇醒，馬上又趕回絕食現場，最多的達五次。醫務專家呼籲，盡快停止絕食，保障學生生命健康，並防止流行性感冒和瘟疫的蔓延。

「五一九」一天的劇變

十九日凌晨，趙紫陽、李鵬等首次來到絕食現場與學生見面。趙紫陽說：「我們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要活著看到四化實現。」趙的講話令學生感動，也迷惑不解，於是廣場上很快傳出局勢對趙有利的消息，更有人傳言當局將血洗廣場。

鑒於這種嚴重局勢，十九日下午六時，北京高教聯合會、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和外地進京高校聯合會發表聲明，暫時將絕食改為靜坐，呼籲政府公正評價這次學生運動。發表這項聲明的北京航大學生聲援團總指揮鄧良平說，他們是在對時局的詳細分析、對中央決策情況的分析以及對中國發展趨勢的估計後作出這種決定的。他認為，整個局勢是不以學生運動意志為轉移的，雖然它起到推動作用，中央不可能立即對這次學生運動作出公開、公正的評價，但是絕食學生已取得「巨大勝利」。

十九日晚九時一刻，絕食團以五十二票贊成、十四票反對、一票棄權作出決定，從九時三十分開始，暫時停止絕食。參加絕食和聲援活動的女大學生、全部撤出天安門廣場。中央戲劇學院十二名絕食又絕水的學生，已接受治療，被送往醫院。是夜的天安門廣場籠罩著極其緊張的氣氛。學生們請求首都工人聯合會及圍觀的羣眾不要離開天安門廣場，以保護學生的生命健康。當時，中央電視台播放了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措詞嚴厲的講話，強調必須立即制止動亂。楊尚昆宣佈調動軍隊進京維護首都正常秩序。楊說，軍隊絕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

如此局面始料未及

二十日晨，六架直升飛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盤旋，在學生和市民中引起騷動不安。十時，李鵬簽署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靜坐示威的學生們在北大學生王丹的帶領下，一遍遍地宣誓：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丟。

從外地調來北京的二十七軍等部隊，在六里橋、豐台、呼家樓等進入城區的路口，遭到民衆用公共汽車、垃圾桶等設置的路障阻攔，天安門廣場的人數有所減少，紛紛加入堵截部隊入城的活動。除了二十二日晚豐台區被阻攔的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在轉移時與一些圍觀的人發生衝突外，其他部隊與學生、市民之間的氣氛頗為輕鬆、融洽，甚至舉行聯歡活動，再唱軍民魚水情。北京城的交通和市場供應漸次恢復正常，人們的緊張心理也趨於和緩，天安門廣場上，來自外地和北京市的大學生仍有數千人在靜坐。

連日來，全國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各軍區黨政領導機關致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表示擁護李、楊講話和中央決策。但不少民衆尚有種種疑慮。李鵬二十五日會見三位外國使節時稱，羣衆瞭解事情真相之後，他們與黨和政府的差距就會縮小。從悼念胡耀邦活動而引發的是次學運，已歷時一個多月。所以造成今天此種局面，是最高決策層和學生、民衆都未料到的。它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背景。事態仍在發展，相信不久便會真相大白。

一九八九五月廿六日

震撼人心的八九學運

黎加路 張結鳳

於無聲處聽驚雷

歷史將會記住今日這批中國大學生。

持續三個星期的羣衆行動，使這次規模堪稱史無前例的學運，開出了一條民主運動的新方向。縱使學運平靜了，縱使學生回復沉默了，可是，由學運而造就出目前的政治空氣，足以使嚮往民主自由的鬥士，得到舒展的空間。

千千萬萬的年輕學子，將成為無名英雄。他們開出的這條路，是充滿險阻的，讓我們記下他們這一段勇往直前的歷程吧！

以下突出四次大行動的前後過程：

「四·二〇」：發生歷史上首次的街新華門事件，當日清晨的警察打人，激起學生的憤慨。在這一晚學生的演說與吶喊，充份體現出學生對時局的不滿之處，解釋了他們何以要示威遊行。

「四·二二」：十萬大學生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前，通宵在廣場靜坐，首次突破了官方禁令——讓廣場於清晨開始戒嚴的可笑規條，成了為羣衆所遺棄的垃圾。學生跪地請願不遂，更積下不信任官方的陰影。

「四·二七」：這是一場民意大爆發，民怨總爆發。學生們不顧官方血腥鎮壓的威脅，二十萬人湧出校門，獲得首都民衆的熱烈支持與歡迎，在強大、團結的民意之前，官方的專政手段被迫收回了，學運獲得勝利！

「五·四」：隨著學運的聲勢，被壓制的民間力量開始抬頭了。首都新聞工作者、會合學生進行的行列，使首都人民欣喜若狂。「五·四」大遊行成了真正慶祝「五·四」七十周年的歡樂節目。至此大規模羣衆運動告一段落；一步一步爭取民主的路等在前頭。

七十年後

「五四」再出發

慶祝「五·四」民主精神再出發

與四月二十七日的緊張空氣成鮮明對比，五月四日清晨，準備出發參加遊行的大學生，都顯得無比輕鬆，有些還吸了上次大遊行的經驗，帶備了乾糧和水壺。雖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從早上七點鐘，便在新聞節目內連續不斷地播出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於前一天的發言，說甚麼政府不能與非法組織對話，又說不希望學生上街云云，可是他那軟弱無力的「詞鋒」，除了惹來學生的嘲笑之外，一點沒有阻嚇力量。

學生們不是要上街，完全視乎個人認為這樣做有沒有用，無關政府的威嚇。經「四·二七」一役，學生認定了武裝防線，不過是銀樣蠟槍頭。中國人民大學在校門外，仍然遇到攔阻的軍警，但完全不必衝鋒陷陣，一下子便越過人牆。北京師範大學仍是緊閉大門，學生們亦照樣從側門魚貫穿出。北京大

學學生在三角地聚會，旌旗飄揚，從正門出發，一片喜氣洋洋。到了中關村路口，並無遇上攔截，軍警公安的戒備顯然比上次鬆懈，怪不得學生與圍觀者都那麼心情舒暢。

這是一次真正的慶祝「五·四」大遊行。慶祝七十年後，「五·四」發揚民主的精神再臨；慶祝學運在「四·二七」來了一次大突破；慶祝除了學生之外，再有後來者會走上街頭——那是勇敢的新聞工作者。

慶祝「五·四」大遊行在一份新「五·四宣言」宣讀後結束。「五·四宣言」總結了這次四、五月學運的目標：「我們促請政府加快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採取切實措施，保障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能得到保障。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剷除「官倒」，加強廉政建設，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科學立國。」

不間斷的掌聲：為新聞界歡呼

不過，「五·四」高潮並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十萬大學生圈子內。在北京高校學生聯會代表告辭開會，希冀讀新「五四宣言」之時，五百名首都新聞工作者，正環繞天安門廣場遊行一周，不斷高呼要求新聞自由的掌聲，叫好聲來表達。



學生們排成人牆前進。

口號，羣衆簇擁着這支隊伍緩緩前行，在一個小時的「繞場式」當中，熱烈的掌聲無一刻間斷。

首都新聞界在這次學潮的前一階段，警足了氣，既苦於無法暢所欲言，又受到學生的責罵，早已醞釀要上街示威一次，吐吐鳥氣。在五月三日的聲援《世界經濟導報》討論會上正式敲定了五四遊行活動；五月四日正午，齊集於新華社門前準備會合學生的隊伍。開始時人數並不理想，祇有數十人集會，新華社亦採取措施，關上大門，既不讓進，又不讓出，阻止新華社自己的記者上街。可是，急切於要表達意願的年輕記者，還是千方百計跑了出來，到了十二點一刻，已齊集了二百之眾，大隊打着「首都新聞工作者」的醒目旗幟，拉起「新聞界的呼號：我們的筆不能寫自己要寫的文章，我們的嘴不能說自己要說的話」的標語，出發到西長安街的民族宮前，等待着大學生的西路大軍，然後排在西路軍的最末端。

「不要逼我們造謠」

「五·四」學生遊行採取與上次不同的方式，各校各自出發到天安門廣場集合，途中分三股會師：東路、中路和西路。東路由於路程最近，十二時左右已進場；以北京師範大學、政法大學人數最多的中路軍，亦於一時多開始魚貫進場；中國人民大學領頭，緊隨北大的西路軍，最後進入天安門廣場。因此，一直在廣場等着的圍觀羣衆，直到下午二時多，纔忽然看到最後的一支隊伍——首都新聞界，那種驚愕和欣喜，祇能用持續不斷的掌聲，叫好聲來表達。

當所有大學生從廣場西北角進場靜坐之後，首都新聞界並不進場，繼續往東行至歷史博物館向南行至前門，繞到毛主席紀念堂後面而向西至人民大會堂，再向北行，整整繞場一周。沿途召集了早已在場採訪的國內新聞界，人數增至五百人。

領頭一名《科技日報》的年輕記者，聲嘶力竭地領叫口號：「不要逼我們造謠！」「我們想講真話！」「逼我們也不造謠！」「我們要新聞自由！」「聲援《導報》！」激昂中隱隱着那被長久壓迫的辛酸。博得在旁羣衆的高呼：「記者萬歲！」

隊伍所過之處，令原本已搞得水洩不通的廣場，引起陣陣騷動，有些羣衆驚叫：「記者也來了！」有些人大叫：「你們真了不起！」有些提出疑問：「你們今天的遊行，明天能見報嗎？」

首都新聞界進行了一場如此石破天驚的行動，果然突破了新聞報道的界線，翌日不少報紙都刊載了遊行消息（編按：詳見本專題另文）。

可能為了避免與大學生「串連」，記者們並不圍繞紀念碑靜坐，繞場一周之後，再遊行返回新華社，在門前抗議一番後散隊。

對話或遊行？遊行早確定

表面上看，「五·四」遊行是「北高聯」要求與政府對話不遂而逼出來的，可是從種種跡象看，「五·四」遊行早在計劃之中，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自從「四·二七」遊行成功之後，政府已迅速通過過全國學聯邀請數十名學生，進行了兩次「對話」。事後各校國內出現不少大字報否定這兩次對話的意義，認為是政府的欺騙手段，北高聯亦表示不承認這兩場「對話」是「對話」，因而在五月二日，來了一次通信請願行動，提出了與政府對話的十二項基礎，要求於五月三日中午前答覆，否則保留在「五·四」遊行的權利。

「北高聯」的對話條件開價甚高，包括與政府平等地位；官方代表團成員應包括一位國務院副總理或以上級別的官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人大副委員長；對話過程中，應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道，中央電視台更在官方並不承認「北高聯」的合法地位。果然，袁木早於答覆期限之前，已向中外記者表明了拒絕態度；到了五月三日正午，學生們得到回絕的答覆。

五月三日下午，「北高聯」在師大開會，會上投票議決是否於五月四日遊行，結果四十七所院校的出席代表中，四十所贊成，遂通過遊行決議。

「北高聯」原準備若官方答應對話條件，便於五月四日上午在北大本校內進行第一次對話。不過，來自天津、湖南、瀋陽、吉林、武漢、深圳、南京、上海、甚至香港的大學生，早已於「五·四」前兩天，「進京支援」。不遊行，這批來自四方八面的大軍幹甚麼呢？早已審時待變的新聞界又如何得以參與呢？「五·四」大遊行，既是紀念五四七十年，也是為了這次學運來一次光輝的結束，無論如何也是要舉行的。

歷史將永遠不忘

「四·二七」

揭開一頁悲壯史詩

「四·二七」學運將是載入史冊的一次學生運動。遊行隊伍的壯大，學生冒死衝出校門的決心，羣衆開道、軍警讓路的戲劇性，使得這一次十五小時、六十公里的北京市內「長征」，恰如一首悲壯的史詩。

遊行隊伍的壯美雄姿，早已通過中國以外的傳媒，向全世界詳盡地顯示。學生組織的高明遊行策略：打出「擁護共產黨」旗號以示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學生糾察重重圍封隊伍以防壞人混入；遊行隊伍不靜坐結果不入天安門廣場，等等，亦早已得到各界評論的一致讚揚。

學生是經過了多番掙扎，纔匯合成廣大的力量。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出籠，加上正在火速傳遞的鄧小平談話，北京一下子籠罩着殺氣，學生們對於是否仍要上街，當然也是猶豫的，一方面是怕鎮壓，另一方面是憤怒，為了抗議，明知有危險也得去。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下，「北高聯」開會決定了「四·二七」仍是要上街遊行。可是到了深夜，當時的「北高聯」主席周勇軍却跑到各大學內，宣佈取消翌日的遊行。

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作為學生領袖確是一個左右為難角色。勇往直前，成功了固然是英雄，但假若釀成流血傷亡，那他是不是對蒙受不幸的學生負有責任？不管學生領袖還是一般學生，都渡過這難受煎熬的一夜。

內心交戰 誰願赴黃泉？

由「四·二六」夜裏開始，北京大學校園裏便傳出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八六年底所制定），並勸喻學生，要為家人着想，不要參加遊行。在恐怖空氣籠罩下，漆黑夜裏，不少北大學子騎着自行車出了校園。



警察與學生發生衝突。

「四·二七」早上，北大校園相當沉寂，沒有學生聚集，沒有準備出發的樣子。有些學生却在宿舍內做了生死訣別的準備，有人往宿舍窗外吊下布條，寫上「我走了！」一屋子的人按着年齡大小次序排列布條。

氣氛詭秘。究竟去還是不去？校園內究竟翻騰着甚麼暗潮？

直到早上八時，忽然有學生在校門打開大字樣的橫幅：「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接着，學生四面八方如潮湧出，迅速開拔隊伍。遊行真的開始了！

早一夜已騎着自行車出校門的北大學子，原來是提前出校門，其後陸續趕來歸隊，在沒有警師、沒有聚集的情況下，北大拖出了一支數千人的巨大隊伍。

此刻在人民大學校園內的學生，正進行激烈的內心交戰。從大清早開始，學生已在校園內集合靜坐，等待踏上征途。學生心內本就不安，大學的廣播更增添威懾，廣播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其他學校都已決定取消遊行了，今天沒有北京市高校遊行活動。

靜坐待斃的學生，在被棄的孤獨中，正待作出去或不去的抉擇。

視死如歸誓師出發

「出去！」不知是人大學生具有那種衝鋒陷陣的精神，還是得到風聲，知道校園廣播的是假消息，祇要有人領頭，學生還是衝出校門了。

與北大校園的寧靜，人大的喧嚷相比，北京師範大學的氣氛是緊張熱烈的。似乎北師大是堅決出發的，一些來自較小的學院的學生，早到了師大校園集會，連同北師大自己的學生，一起在三八廣場集合。可是早上七時多，廣播內却傳出叫各系代表去開緊急會議，校方則廣播提醒學生不要出外遊行，如有生命危險，校方不負責。

緊急會議一直開到八時多，吾爾開希手拿擴音器，匆匆而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吾爾開希神情肅穆地表示：我很害怕，但是不能辜負同學。大家知道，在衆多視死如歸、寫下遺書的學生中，他就是其中一個。

接着便在廣場上誓師出發。誓師時，學生領袖提出了不要與警察衝突，又表示形勢危險，要求男學生衝出去，女學生留下。女學生却表示不怕，堅持一起衝出校門。

這時校方已鎖上大門，學生隊伍無法衝出，一早已聚集在校門外的羣衆，大叫「開門！開門！」從八時多一直撲撲至十時多，學生幾衝開大門旁一扇小門，遊行出校外。

各路學生衝過一道又一道的警戒線，學生的決心與勇氣，更重要的是百萬羣衆的支持，粉碎了任何意欲鎮壓學運的圖謀。

赤心牽動萬家愁

廣大北京市民一直為學生捏一把汗。有些單位在四

月二十六日聽傳遲時，非常憤怒，決定翌日要跟學生一起上街，為學生開路。社科院文學所幾位年輕學者剛好在四月二十七日開會，有人跑來告知，天安門廣場武裝警戒，開會的人馬上緊張起來，當時還商定了，假如學生流血，他們就要上街遊行！雖然幾個人不常用，但是還是得表示一點意見。

「四·二七」當天，民主黨派開座談會，與知識份子討論五四精神。可是在當天那樣的氣氛下，根本開不成會，有些老老甚至抱頭痛哭。過去凡是中央有甚麼重大政策，各社會團體、民主黨派都去表態，可是這一次鄧小平講話傳達之後，八個民主黨派都不表態，祇有全國工商聯在「四·二七」當天開了會表示支持。

一名文藝理論工作者事後表示，「四·二七」當天，他一直在想，魯迅在一九二六年之際，還可以為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遇害學生，寫一篇《紀念劉和珍君》，他若要寫篇悼念學生流血的文章，却拿到那裡發表？幸好，北洋軍閥向請願羣衆開槍的歷史沒有在今日重演；今天的學生領袖，沒有成為另一位劉和珍（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

突破禁令的

「四·二二」廣場追悼

四月二十一日

廿時三十分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華燈初放，從西到東到處是騎車和步行到天安門的人羣。

一隊送花圈的人順着自行車道從六部口走向天安門廣場。

一些騎自行車逆行向西的人被警察攔阻。警察說：凡是騎車逆行的人都要把自行車扣留。（這是平常沒有的）。與四二二相比，今天晚上出動的警察的態度，要嚴厲得多。

廿時四十分新華門前沒有太多停留的學生。警察要求步行的人走順行的人行道（這是很罕見的要求）。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聚集了好幾萬人。喊聲震天。學生今天似乎改變了對策。

廿時四十五分一些人在紀念碑基上放花圈，豎標語。許多人在紀念碑唱國際歌。圍觀人相當多。

口號：遊行自由！集會自由！

有人在紀念碑前演講：要求為在反自由化運動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羣衆喊：好！）

有人要求公佈國家領導人的財產，得到圍觀人的贊同。

清華同學打着橫幅「還我羅邦」跟在後頭。二十三時五十三分，由北京科大隊伍為先導，看到各高校十多萬人游行來到新華門。

清華大學學生打着團旗，上書「反暴力」率先到達。四月二十二日

新華門傳來口號聲。第一個橫幅：「民主萬歲，打倒暴力」。

學生手挽手組成糾察隊，請市民讓步。

圍觀羣衆熱烈鼓掌，紛紛拍照。遊行隊伍傳來國歌聲。

零時二十分，科大隊伍進到大會堂北側。

天津南開大學中午來了五十多個同學，南開橫幅：聲援北京及全國學生的正義行動。

北京理工大學橫幅：浴血民主。

口號：歡迎南開戰友。

進入廣場時，羣衆呼喊：好！鼓掌聲不絕。

零時三十分，遊行隊伍起初找不到進入廣場的路口，後經中央戲劇學院學生隊伍指路入場。人民大會堂調來大批警察到東門外廣場。

零時四十五分，學生在紀念碑的旗杆上升起幾塊白色塑料紙板組成的橫幅標語：告慰雄魂。

政法大學學生被民警毆打真相

凌晨一點北京理工大學學生先靜坐，唱國際歌。紀念碑上學生靜坐。

一時二十五分，已進入的學生在圍繞着天安門廣場華燈區設了靜坐區。

北醫進入隔離區。接着各大學隊伍打着旗幟，喊着口號進入廣場。

有學生說：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王智勇被打事實真相。四月十九日晚，我校友王智勇等三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二十日凌晨四時許，他們為趕地獄，走到人民大會堂南側街道上，剛到，迎面就來了兩排警察，帶隊警官一聲令下「什麼人？打！」就有數十個武警衝上來，用皮帶抽打王的頭部，並拳打腳踢，將王打得頭部縫三針，皮下瘀血，左眼無睜，當場有醫生鑑定。王被打後，拼命奔跑，被兩名學生送到醫院。

其他學生也遭到毆打，女學生也沒有被放過，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這些武警缺乏起碼的守法和人性。難道是法律允許他們幹的嗎？

我校友全體師生，對此事無不憤慨萬分，學生會及各系學生會、聯會決定，於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罷課，抗議警方暴力，並要嚴懲兇兇。有關方面，公開道歉，輿論媒介，全部公佈真相，依法嚴懲兇手。王智勇是國際經濟法系學生——中國政法大學全體師生。

據政法大學學生表示：他們來了一千多人，王智勇現在學校，不能來。他的頭縫了三針，校方領導楊友林書記看了他。學生會，楊友林書記、江平校長都到北京市政府交涉，可是現在還沒有回答。

四時十五分一輛公安局的廣播車駛進天安門東門外廣場。在天安門的地下通道中，燈火通明，許多人在這裏席地而坐、睡覺、打盹，其中許多是學生。廣播車被人圍住。

一位佩帶白色武裝帶的交通警在廣場西側被人圍住。他本來是要找學生代表，來談維持交通秩序的問題，但遭到羣衆攔阻，一名法制日報記者在場，看見形勢危急，強充「中間人」，幫忙找學生代表，及當了一小時半的聯繫人和目擊證人。

四時四十分記者把多位自稱姓劉的警察送到警成線（人大會堂前，解放軍戰士組成的警戒線），一位自稱姓張的治喪辦人員委託該名記者去找學生代表。

記者首先找到人民大學的陳勇同學。

人大同學去聯繫各高校代表，學生本要採取中立位置，認為最好不要進去。有學生表示首先要向同學們公佈代表的名單，否則就羣龍無首，其次要各校派代表通報議程。請同學保持冷靜，千萬不要亂。

四時五十分，各高校代表陸續到場，圍在人大同學組織的隔離線內。大約近二十名代表。

記者向他們申明情況，並以個人名譽保證送他們進去，送他們出來。並建議帶五個同學進去，其他同學在外等待。進去的同學可另派幾個聯絡員，及時把情況傳出來。最後同學決定讓三名代表進去。

五時記者手拉手把幾名學生代表帶進人大會堂的東門外廣場，東面的花壇下坐下。

經一番爭論後，同學同意向治喪辦提三條要求，由政法大學于宏同學執筆：

- 一、要求絕對保證參加這次活動的同學們的安全
- 二、要求瞻仰羅邦同志遺容
- 三、公佈四二零事件真相，向被打學生道歉

談判也是一種鬥爭方式

據在場國內記者採訪，學生代表北師大吾爾開希形容「同意談判也是一種鬥爭方式」。

吾爾開希說：「我們是來做鬥爭的，有權選擇多種多樣的鬥爭方式。如在開追悼會的時候，高喊口號。如果不答應我們的條件，我們就有可能這麼做。」

其次，我們也許會使政府官員難堪，比方說，我們走時舉行演講，把四二零事件向人民說清楚，或者我們抽出部份代表，向瞻仰遺容的人說四二零事件的經過。總之，我們學生不是沒有辦法，希望他們知道我們學生的份量。

第一、我們這麼多學校，來了這麼多人，第二、我們還沒有採取什麼行動。我們現在不動，但是不是永遠不動。

如果條件不被落實，進我們自己也保證不了，我們回去就要行動，什麼行動，現在沒有必要說清楚……我們不會在交通上跟他們過不去。但請願的內容，我們絕不含糊。」

這時，聯絡員來問消息，學生代表討論，記者請他



北京大學學生衝出校門到天安門遊行。

們轉告「請同學耐心等待」。

學生代表著負責傳話的人民大學同學，叫同學們不要亂。

據一名人民大學學生代表表示，六名學生代表站在警戒線內，與治喪辦約定上午五時四十分至六時答覆。後竟限至七時。七時正，法制日報記者繼續工作，向兩方面告別出來。

七時正，治喪辦兩名代表從人大會堂出來，他們表示不同意第一個條件，第二、三條不在他們職權範圍，並表示用高音喇叭現場廣播胡耀邦追悼會實況。學生代表商定，談判既已破裂，就把隊伍經過馬路。但北大表示堅持靜坐示威。

人民大學、北師大、法大、科大都所學校的隊伍擁過來。

治喪辦讓步，讓隊伍到了馬路兩側。同學就地而坐，等待追悼會正式開始。

八時二十五分中國政法大學在校旗引導下，舉着胡耀邦巨像和擎着憲法三十五條、三十七條的橫幅，在靜坐區裏走了一圈，並兩次把巨像、標語牌對向人大會堂。（掌聲）

八時三十分人民大會堂的幾十個交通警走下台階，似乎要清場了。

人民大會堂正門打開了。政法大學標語衝向大會堂，歡呼聲，「新聞要說真話」的標語往前行。面朝大會堂，圍觀羣衆鼓掌。

手持白色標語，參加追悼會的人開始進入大會堂，他們自東西兩側上來。許多人駐足凝望廣場的學生。警方不知何時，在廣場實行戒嚴，只有通宵等候在廣場裏的人，特別是記者才能留下來。

廣場上估計有十多萬學生，另有五十多萬羣衆圍觀，紀念碑的基座上到處是人。

許多羣衆起哄，有人說看到李鵬，但太遠根本無法判斷。

社科院新聞系標語「新聞要說真話」往前湧進，傳聞風起，背景是嘈雜的叫聲，人們的精神快要瘋了。

八時五十七分大批治安警察排列隊，來到天安門東門外的行人道上，學生唱唱「便衣警察」主題歌。

大排羣衆湧向廣場與警察對峙。警察站住了。已沒有干預在場記者。

九時十五分政法大學又開始向人大會堂門前挪過去。早上九時半，各高校臨時籌委會再召開會議，商討對策。人大八條和北大七條，未及匯總，追悼會開始。

全場肅立，默哀三分鐘。默哀畢，學生中的《國際歌》聲起。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只有靠我們自己！的聲言在天安門上空迴盪，似在追索逝去的靈魂。

追悼大會開始，楊尚昆主持，楊錦坤奏國歌說成奏國歌，不滿的噓聲四起。趙紫陽致悼詞，所有學生肅立靜聽，解放軍武裝脫帽。

十時十八分開始向遺體告別。

十時二十五分廣場很安靜，北大學生往前走。

許多學生和羣衆向北跑，看轎車，有的看離開的領導人的車輛，警察加強在大會堂北側的警戒線，部份學生爭論回去還是不回。向北走的羣衆學生形成一道線。

學生齊喊「對話！對話！」

口號：「李鵬！對話！」

有人猜測大會堂台階上有李鵬，李鵬實在沒有。口號：「李鵬！對話！」

十時五十分一名從大會堂出來的海軍軍官，向靜坐的學生敬禮。

學生們爭論是否撤離，部份同學已經坐不住了。代表們決定：一切條件不提，只請李鵬總理站在警戒線內與同學公開對話。此時已接近十二時。

北大兩名學生和師大一名學生高舉着上書七條要求的請願信，一步步走上象徵權力、榮譽的人民大會堂台階。

赤日炎炎，三個面有菜色的學生，在飢渴交迫中，向國徽下跪了。

人羣靜了，躁動了，掉下眼淚。一個清華學生咬破了手指，寫下「總理出來」四個血字。

一個女同學疲憊交加，加上情緒激動，拼命向警察衝去，高喊著「打死我吧！」

這時，大會堂出來一個人，給下跪的學生拿來了果汁，士兵說是胡耀邦的孫子。

學生向警察線衝擊，許多帶唱的代表滯留在台階上看學生們。

人民大學代表和其他代表說：「不對話！我們絕不走。」

口號：「不對話，絕不走！」「對話！對話！」

十二時零六分廣場解除戒嚴，大批羣衆開始湧向廣場。在花圈的先導下，學生向警戒線第一次衝擊。

十二時十五分學生的第一個花圈准許進入大會堂東門外廣場。但學生並不獲准進入唱大廳。

十二時四十分羣衆湧來，紀念碑和廣場黑壓壓的堆

滿上百萬人。

學生又一次開始湧，部份學生要求大家往後退，繼續坐下，羣衆站在廣場的欄杆上，附近房頂上站滿人。代表仍在交涉，沒有答應，人羣憤怒了，有些男生把上衣掛起，蒙住頭。

十二時四十六分在羣衆的簇擁下呼喊著向前衝，解放軍增援，羣衆爲學生鼓掌，衝得很猛烈，解放軍第一道防線向後退了出來。

校官戴戰士頂住。第一道防線中間頂不住了，個別學生沖了進來。有人向學生扔塑膠瓶子包裝的汽水，許多學生哭着向前沖。

此時，他們的代表帶着花圈進去送請願書，在大會堂台階上已經跪了半個小時。

學生對久候無消息，表現悲憤失望。問：這是一個怎樣的政府？

剛參加完追悼會出來的一些知識分子，看見正在下跪的學生，悲憤交集，一下子便跪下來，擁抱着學生。

《新觀察》主編戈揚老太太，指着守在門口的警衛大罵：你們怎能這樣對待學生？

但沒有用。沒有人出來接請願信。

一時，解放軍組成的第一道警戒線撤離，與此同時，數千名武警組成的第二道警戒線向後撤了十多米。突然又跑步沖向人羣。像潮水一樣，既壯觀，又可怕。隨時都可能踩死人，那麼多人，太危險了。

下午一時二十五分，一批警察撤出，學生坐下了。羣衆向學生送冰棍、汽水、募捐。

北大隊伍一個學生代表宣佈：「談判破裂了，他們（指當局）不出來！」

一個學生含淚呼喊：「通電全國，全市、全國總罷課。」

一個學生告訴同學：「我們先回去，鬥爭是長期性的。」

下午一時半，由北京大學學生隊伍爲先導，學生撤離廣場，唱「國際歌」。

下午兩點一刻，遊行隊伍全部走過新華門，圍觀羣衆開始湧向新華門，新華門前人山人海，廣場黑壓壓的堆滿了人，望不見盡頭。

背景：四一八，人民大學等數間高校學生在新華門前請願，提出六條要求。四一九清晨才離開。
四月十九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由首都高校大學生和各界羣衆自發而起的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進入了第四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終日萬頭攢動。紀念碑的基頂上，堆滿了花圈、輓聯和輓幛。
與天安門毛澤東主席相片遙遙相對的，是由中央美術學院師生繪製的胡耀邦的巨幅遺像。
長安街華燈初上，眩目的燈光刺破了北京上空終日不散的陰霾。

越來越多的新華門學生和羣衆，或騎自行車或步行，湧向天安門廣場。
晚上八時多，警方在長安街六部口設立了隔離線，機動車開始繞行，行人不得橫穿廣場。

一些大學生和圍觀羣衆開始滯留在中南海新華門對面的人行道上，數百名佩帶白色武裝帶的交通警，費力勸導人們離開。
到晚上九時半，聚集在紀念碑周圍的羣衆估計五六萬人。

人羣被一種敏感的氣氛籠罩着，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會引起人們如潮般圍觀。
十一時，滯留在新華門前的數千人開始湧向新華門了。

一些扛着橫幅標語和花圈的高校學生要求中央領導人與他們對話，學生的口號夾雜着圍觀者粗野的叫喊。
十一時二十分，近萬人羣你推我擁地向新華門衝擊。約二百個解放軍警衛戰士手挽手組成人牆，拼命擋住人羣的衝擊。

部份大學生自動挽起手臂，組成「糾察線」，拉住企圖衝向中南海的人，但在狂怒的人羣面前，他們的努力無濟於事。

人羣中有人喊：「不許錄相」，此時拍照的既有外國、香港記者，又有便衣警察。

上萬人擠在一塊，大汗淋漓，解放軍手挽手退到新華門台階上，後面有警察，門庭裏擠滿更多解放軍。

此時，中外記者、公安人員拍錄相片，有人喊：「把錄相關了，不關就砸，不關就砸，不許照相。」

「砸了！砸了！」人羣附聲。

「打倒獨裁！」鼓掌聲。

「李鵬，出來！」（笑聲）

「工人萬歲！」（笑聲）
人羣喊着口號，往新華門衝。
人羣有人喊：「奴才，奴才！」這很快傳開，迅速變成「奴才滾開」的口號，針對解放軍而發。
「奴才滾開！」響了數十聲。
外國記者開了攝影燈，人羣一片歡呼。

學生要李鵬出來對話

晚上十一時四十分，警衛戰士開始後撤，由數百名治安警察組成的新的第一道警戒線出現在新華門前。與此同時，數百名治安警察和武裝警察封鎖了新華門兩側，封鎖線緩慢地向東西兩側推移，使新華門逐漸形成了一個隔離區。

警察把羣衆和學生隔離，把羣衆趕至兩側，到凌晨時分，只餘約三百學生圍坐在新華門前。

人羣發現警察在新華門階梯上組成第一道警戒線，本來是解放軍把守。

有人喊：李鵬不出來，我們決不退下。

學生：坐下，同志們……

據在場目擊者表示，晚上十一時二十分至十一時四十分期間最為危急，人羣中有人鼓動學生衝新華門，部份學生如清華的張銘，曾攜學生而不果。

且看這一場新華門前的羣衆集會的激昂情緒。廿三點五十分，學生：「李鵬，出來！」「李鵬，出來！」

羣衆附和，叫喊十數次。

有人叫外國記者「開燈」。

有人說：別搞外國記者，我們國內記者發表不了，讓他們拍！

人羣：李鵬出來。

學生：同學們坐下。

人羣：我們是工人。

學生：第一排先坐下！先坐下！大家別擠了。

人羣只要對話！（連聲喊。）

人羣對警察：你們是有負人民的！

（警察組成的警戒線開始向前移動，西側警察隔離。）



中南海新華門前警察抓獲一名學生。

有人：戒嚴啦！

學生們：坐下，不要亂啊！

人羣：還我民主。我們要民主。

零時十分，學生們開始睡下來。齊喊「一二，坐下」。

北京市公安局十三處（治安處）處長韓明學組織隔離。

他說：「誰要留下就留下，不留下的往東，往西退」。

隔離線形成，學生領袖叫學生（約三百多名）回過

來坐下，靜坐形成。新華門前警衛約二百多個，外圍兩

側約二千個。

零時廿分，學生唱國際歌、國歌。有警察與學生衝突，雙方持槍爭吵。

學生：我們有的同學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我們今天坐在這裏，就是給他們施加一種漸進壓力。

衆：要堅持三天。

十二時〇五分，新華門前解放軍士兵換崗，北京交通大學建築系帶來「一代英雄」巨幅標語。

十二時十五分，北大某青年校工演講：「我沒家沒業，什麼也不怕。我提倡大家不要喊過於激烈的口號。有的人喊過激口號，這樣不好。」

學生：對！

在學生領呼下，齊喊順口溜：毛主席的兒子上即機

，周總理沒兒子拚命幹，鄧小平的兒子搞募捐，趙紫陽

的兒子倒彩電！

學生們贊成三權分立

除了口號，學生亦展開了政治性演說。

學生：在政治上，我們的組織，我們的專政，把我們引向了一條什麼樣的歧途啊！今天，我們再不要這樣的悲劇重新上演。我們要民主，我們要大選，我們要三權分立。

衆：贊成三權分立。

學生：在人權上，我們要自由，我們要平等。我們的自由絕不是：躺在商店櫃檯裏的麪包，我們要言論自由，我們要遊行自由。（掌聲）

學生領呼下，喊順口溜：「陳雲不說話，萬里說錯話，趙紫陽重複話，鄧小平一句話，知識分子白說話，教育說空話！」（喊聲震天）

學生喊「鄧小平跟着感覺走」的順口溜，衆人跟着

喊。

學生：「這是描述領導人關係的——」李鵬是拉車的，趙紫陽是駕車的，鄧小平是坐車的。李鵬問紫陽怎麼走，紫陽問鄧小平怎麼走，鄧小平說（領頭的人笑得

噙不下）——

衆人：跟着感覺走！（掌聲，笑聲）

學生喊「幹部」順口溜，衆跟着喊：「毛主席的幹

部兩袖清風！華國鋒的幹部無影無踪！鄧小平的幹部百

萬富翁！」（噱……）（掌聲）

學生：我再給大家噱一段啊！（衆笑，掌聲）

學生：「四川的趙子（指矮子）河南的蛋（指王八蛋），把中國搞了個稀巴爛！」（鄧小平和趙紫陽老家

分別在四川及河南）（衆笑）

學生：不能搞人身攻擊。

學生：我們要文明。

學生：大家不要說罵人的話。

學生：我們到這裏來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集體，同學要注意！

學生演講：儘管中央一直強調要控制小轎車的購買，但還是花了數萬元的錢去購買小轎車。

學生：打倒腐敗。

學生：靠新聞自由！

學生：新聞自由不對，要講思想自由！（學生激烈爭論）

學生：堅持真理！

口號：要求對話。

學生：欲悲鬧鬼叫，我笑豺狼笑，揮淚祭英傑，揚眉劍出鞘！——七六年四五著名詩

靜坐現場有些騷動，學生喊「坐下，坐下」。

警方宣佈要驅散學生公告

廿二時四十分，警方在新華門東側內宣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並開始命令人們在二十分鐘內離開現場，靜坐學生羣情激昂，並挽手圍坐一起。

公共汽車在附近停下，車上載有警察。

警方廣播：今天晚上，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他們呼喊反革命口號，擊傷執勤的民警，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希望廣大圍觀羣衆，提高警惕，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迅速離開現場。我們警告製造事端的人，如果你們一意孤行，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國內記者：我等一夜就盼這句話，否則就沒有意義了。

二時五十四分，靜坐學生唱《國際歌》。一些外國記者被警察驅離現場。學生們喊：新聞自由。

口號：「反對暴力」，「新聞自由」，「自由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華人民解放軍萬歲」，「團結起來」，「人民萬歲」……

三時，靜坐學生越坐越緊，約二百名警察開始在新華門前對學生形成了一個半圓形的包圍圈。另有千多名警察在新華門兩側的人行道上備勤。

警察開始勸導圍觀學生的羣衆離開現場。

約一百名警察從東側趕來增援。

三時〇三分大批警察散開，辨別圍觀人士的身份，態度冷漠地勸他們離開。外國記者被禮貌地勸離現場。

一個外國記者不願離開，韓明學處長親來勸說：「你累了，讓他們攆你走。」這樣，兩個便衣和另外一位軍裝警察將外國記者勸走。

三時半至四時左右，警察驅逐外國記者時，分別與三名香港記者發生磨擦，快報攝影記者何運被警察毆打，奪去膠卷及簽署悔過書；經濟日報記者羅綺萍遭到警察抓頭髮，吃了兩推，申辯無效，卒也交出膠卷及簽署悔過書。

新晚報記者司徒元和亞洲電視記者戚香蓮及其攝影記者，在另一角落，也遭到沒收膠卷及勒令簽署悔過書的

霄遁。

三時廿五分，交通大學的轎車來接人。

新華門前約一百名警察撤離，新華門西側有人在喊口號。一百名警察又在靜坐人員周圍加了一道包圍圈。

三時卅五分，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韓明學處長站到靜坐學生前，準備講話。

學生對他喊口號：「民主萬歲！打倒專制！人民共和國萬歲！人民警察愛人民！」

怨氣和意見一下子爆發

三時卅六分，韓明學處長：今天，大家都是抱着一個沉重的心情來悼念胡耀邦。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何悼念活動呢？形式是多樣的。但這是新華門前，是中央辦公的地方，大家在這個地方，搞這樣的活動，是不太適當的。市政府的公告剛才已公布了。我相信同學們都是中國的未來，我也聽到了你們在這裏講的很多要求，這些要求都會向上級傳達。而且你們這些要求……（學生吵嚷）

韓對各校方人員：有沒有你們的學生，請勸告他們走。

某校方人員：辦不清楚。

學生：我們的警察在這裏等了這麼久了，他們也是執行上邊的命令，我們是否可以做一下讓步……（部份學生說：不行！）

學生：自從胡耀邦同志逝世以後，我們壓在心裏的怨氣和其他意見，一下爆發出來。我們聚志成城，在這裏，在天安門廣場，一就是好幾個晚上，成千上萬的人去天安門廣場。我們回去，可以向同學、其他青年，講清我們在這裏的活動，然後……

部份學生：打倒……（旁聲：讓他講完）

某學生：然後，爭取他們的廣泛支持和援助。

某學生：我建議我們在這裏看國旗升起，然後我們再去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同志。

某學生：好！（鼓掌）

某學生：我們不想破壞秩序，天亮以後有交通，我們不想影響交通秩序，不想堵塞交通。

某學生：對！

某學生：五點一刻！

女大學生：我們是文明大學生。

韓處長同意五點離開，接着於四點〇八分下令包圍學生的兩百名警察，撤到新華門兩側行人街道上，學生掌聲不斷。

四時二十分，部份清華代表提出要到底，改變了五點離開的作法。有學生說：「不行，那樣就發生衝突。」

警方用武力強迫驅散學生

市委當局是於二時四十分正式宣布公告，要求學生在二十分鐘內離開新華門前。

四時廿五分，靜坐學生突然站起來，結束靜坐。態度緩和的擁擠到新華門口。

四時廿六分，兩輛大轎車拉來約二百名治安警察，學生又重新退回新華門前坐下。

四時卅六分，警方調來一輛十七路公共汽車，停在新華門口的旗杆下，三個車門大開。在場記者分析，學生將被強行拉上車帶走。

四時卅八分，校方代表聯合向學生發表動說，沒有結果。

此時，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在沒有公開身份的情況下，警告學生快些上車離開，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學生唱國際歌。

四時四十分，近千名警察開始在新華門東側整隊，三排橫隊。全部治安警察，沒有帶武裝和械具。圍觀的人，趕緊跑掉。很多人在六部口騎自行車飛跑。

四時四十二分，便衣警察清理現場，便衣開動攝影機、錄相機，一些學生互相攔阻，男學生照顧女同學，學生約剩兩百多人，校方人員呼喚自己的學生離開。學生唱國際歌。

四時四十五分，韓處長在歌聲中第四次動說，警察在新華門東南側聚集，逐步壓向學生。

韓：現在馬上就要恢復新華門前的秩序，因為交通馬上要恢復。

學生：吵嚷，聽不清……

韓：我代表……（警察沖了上來）

韓：唉！等等……警察不要動……

還沒有等韓處長下達命令，警察開始動手，他們紛紛上前，把手拉手圍坐在地下的學生扯開，拽着，架着推進汽車，新華門前一片吵鬧聲。

學生：不許打人！警察打人！

某警察邊拽邊說：你們多麼頑固！嘿！

學生：流氓！土匪！

有的警察用腳踢被架起來掙扎的學生。據國內記者說，一個女學生此時喊：打倒共產黨。

幾十個警察扯打一個學生，幾乎全部學生都被塞進了汽車，學生在車上喊：「流氓，土匪！」女學生哭叫，男學生哭喊：「不許打人！」

學生砸碎了車上的一塊玻璃，二一八零號公共汽車幾名學生壓在司機身上，司機無法開車。某學生喊：「通電全國，罷課遊行！」

幾個警察一邊用腳踢，一邊衝上抓人。一個警察抓住一個男生的頭髮往下甩，幾個男生抱住該名男生，不讓警察抓他下去。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負責人，要警察下來。有的學生鼻子被打流血。有的警察罵說：你們折騰幾天了，你們折騰的還不夠苦啊！

學生：上街遊行……

四時五十七分，警察開始整隊。警衛戰士在清掃新華門前路障的花圈，汽水瓶子碎片……一片狼藉。

危城三日

五月二十日

五月二十日凌晨，我來到天安門廣場上。當局的高音喇叭不斷重覆播放李鵬在北京黨代會上的講話，而絕食團體指揮車正繞場一周，車上同學透過擴音器嘶力竭地宣佈他們的決定：

我們以七七之夜血汗和生命換來的，卻是李鵬和楊尚昆把我們的愛國運動說成動亂，調動軍隊暴力鎮壓。我們以悲壯心情向全世界宣布，二十萬大學生立即全部絕食。

指揮車上，一位靠窗而坐的女學生神情凄楚地向車外揮動毛巾，好像在和同學訣別，並不斷打V字手號。但這個出於一時憤激的絕食決定，不久便告取消。門上沒有充足的體力，鬥爭怎能繼續？

「人民萬歲」、「自由萬歲」、「中華民族萬歲」、「堅持到底，寧死不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中國屬於我們」、「李鵬滾下台，必須滾下台」、「中國民主運動萬歲」等口號，混雜國際歌聲響徹雲霄。

凌晨三時，學生廣播台宣布六里橋告急，請馬上增援。北高聯建議立即發動部分同學舉傘往首都各單位召來聲援隊伍。

幸而稍後後援的多是好消息：各路軍車被憤慨陳詞的市民和學生攔阻了，還有個別軍人和公安幹警來到廣場，加入支持學生的行列。

人羣以血肉之軀築成人牆，阻擋軍車保護學生。有些老婦寧願不顧身軀擋在前頭。一件件小小的事情，構成一幅幅感人的場面。

同時，學生廣播台也播出羣衆的寄語，有些動他們恢復進食，因為「目前的政府不值得我們為他們犧牲」。

凌晨五時半左右，朝陽在天際升起，場內響起學生欣慰的喝采聲和掌聲，因為白天已屆，軍隊硬闖入城的威脅又暫告解除。天安門廣場上，可曾有過這樣一個欣喜的黎明！

早上睡了一兩個小時，赫然聽聞北京在上午十時起戒嚴——李鵬簽署了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的命令，北京市長陳希同隨後宣佈了三個北京市人民政令，其中第三號是：「一、嚴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宣傳報道；二、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記者不得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相等活動；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

在電視廣播中看到上述宣布，心情豈是「沉重」二字可以形容？同行們相約：大家出外不要獨自行動，必須三五成羣互相照應。

（明報記者）林翠芬

當晚長安街上羣情洶湧，支援的羣衆隊伍來回不斷，更有數百個個體戶摩托車和上千的自行車列隊遊行，呼籲市民保護學生，教人心情略寬。

五月廿一日

五月廿一日日間又傳來消息，說軍隊會在翌日拂曉鎮壓學生。雖然電視即晚播出兩位軍方老帥嚴榮臻與徐向前否認，但記者們仍作最壞的心理準備。

五月廿二日

我們集體行動，凌晨一時在我們下榻的北京飯店大堂集合，出發到天安門廣場，女記者們都無懼。香港記者和廣場上的學生風雨同舟。

凌晨三時，指揮台廣播傳出學生領袖肖爾開希嘶啞的聲音。他說形勢緊急，舉運動動，呼籲大家撤離。但其他同學隨即紛紛陳言，強調絕不能撤。在撤與不撤的辯論中，擴音器傳出香港百萬遊行聲援的消息。全場大為振奮。

凌晨四時，指揮台廣播器廣播：市高聯宣布決不撤退。全場響起熱烈掌聲。擴音器中又傳出一名解放軍指揮員的聲音，說只要廣場保持秩序，軍隊不會進入廣場。但廣場外，人民大會堂前的學生羣衆則齊喊：「不許進城，不許進城！」

這時，指揮台播出一絕不撤退，我們二十萬人共存亡的呼喚，掌聲四起，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幾位同學舉起一面黃色黑字的旗：「媽媽，我去了，你別哭。」

凌晨五時許，一片國歌聲過後，學生領袖王丹隨後以市高聯負責人身份再鄭重宣布誓書：「為了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民族命運，我們獻出鮮血和生命，絕不撤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堅持到底，與市民共存亡。」

凌晨五時二十分，天色微露曙光，又是黎明將至。

天亮離開廣場回飯店途中，在長安街上見到來自外地的學生聲援隊伍。其中一羣是來自西藏的。這一天，北京知識界繼「五·一五」後第二次大遊行，高呼「李鵬下台」、「反對戒嚴軍管」、「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

中國人自抗日戰爭後，何曾如此齊心？而「齊心」正是國家民族命運所繫的因素吧！中國可愛的青年學生在這次運動中成熟了，中華民族在這次運動中覺醒了。

五月廿三日下午二時半舉旗於北京

民不畏死 築成血肉長城

兵臨城下 一周未能入京

■黎加路 ■張結鳳

北京市擱置軍車成功，戒嚴令頒佈一星期仍無法實施，民眾驕傲地在遊行口號中說：「北京市仍在人民手裡。」

果真是人民團結的力量，連軍隊都能阻攔嗎？固然，當民眾向士兵進行耐心的宣傳教育後，不少軍人垂首不語，或私底下表示絕不鎮壓學生、絕不向任何市民開槍，似乎是為民眾所說服了。可是別忘了，儘管士兵們不願意施用武力，但若上級指令一定要開進城內，他們還是不得不顧一切地進城。有些解放軍指揮員指出：是我們自己不進城，要是這點兒路障也足以攔阻去路，咱們解放軍還有價值嗎？

於是人們又疑惑了，是解放軍被說服至軍心動搖而決定不進行進京？還是軍方高層產生分歧，正在爭持不下？抑或，解放軍原來就不一定要進入市區，他們來的目的，祇是為了要製造「兵臨城下」的威脅？

據可靠消息，軍車在遭到市民攔阻後，是中央軍委下令暫時原地待命的。而且，解放軍在調動來京之時，曾接到指示：不許開槍。

經過三天僵持後，所有軍隊全部奉命後退，進行整頓，紛紛入住北京衛戍區的營地。而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則形容軍隊正在進行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的學習云云。部隊雖然擺出和平姿態，可是它沒有撤走，它在城郊虎視眈眈。

軍隊雖然不入城，可是從各地趕入京的兵力卻越來越多，已由最初的傳說十萬、到十八萬、二十萬。越來越令人懷疑，哪裡用得着這許多軍力來執行戒嚴？特別是首都都在半月來的社會秩序、治安、交通都比較良好，事故遠遠低於平時。

他們聲稱軍隊不是用來對付學生的，可能真是真的了。甚麼重大事故要調動如許兵力？據分析，調動一個軍，行軍費用就高達一億元，調動不僅勞民，更是傷財。專制獨裁者為了個人權力、派系相鬥，不計後果地莽動，已到了瘋狂的地步，在現代文明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老百姓不懂宮廷內鬥，他們祇是懷着满腔熱血，要保衛首都、保衛共和國。他們以血肉之軀攔住軍車，不管這是否軍隊不入城的主要因素，北京人民數天的截擊行動，一幕一幕可歌可泣的事蹟，肯定將載入史冊。

大軍壓境 百姓圍堵

「還有軍車嗎？」
「軍隊會進城嗎？」

北京老百姓的五月下旬就是在這種交頭接耳、惶惑不安的氣氛下渡過的。

自從五月十九日黃昏外地駐軍出現在北京城郊，幾乎從未遭逢戰事、從未見過軍隊的北京市民，馬上熱血沸騰起來了。軍隊開進北京幹啥？人們很直接地想到，是要驅散正在天安門飽食和靜坐的大學生。政府不理睬手無寸鐵的學生，已經是毫不顧人道了，竟還要出動軍兵來對付已被折磨得虛弱不堪的學生？普通同情學生的

市民，憤憤地衝向軍車，並呼喚鄰眾，圍攔住軍車，阻擋其前進。

最早被市民發現的，是西路進城的軍車。約於十九日下午六時，一卡一卡滿載士兵的軍車，從北京市西南進入城區，車到翠微路，碰上一個騎自行車的女學生，她一下子看到是軍隊，緊張起來了，立刻呼喚附近的民眾攔住。這一路軍車不下二百輛之眾，走在前頭的，已走到軍事博物館，接着在公主墳、萬壽路、五顯松都斷續地排著軍車。

乍見大軍壓境的老百姓，對大兵也有點情緒。他們一看見記者來到，重重人擁馬上讓出一條道路，俾記者通過，並協助記者照相，大有「暴露這夥人」的心情。



北京市民、學生圍堵軍隊進城。圖為五月廿一日，停於朝陽區（城東）軍車駛離該地，圍堵人羣拍手歡呼。

後來聚集的人羣越來越多，老百姓既不怕、也不恨士兵了，經過長時期交談之後，他們了解到原來士兵也不知道自己來北京幹甚麼，於是，老百姓寬心了，他們開始給士兵介紹北京形勢、介紹學生絕食的原因，進行思想教育。

其實，老百姓也不知道軍車何以進京，他們只是怕鎮壓學生。

另一方面，當天晚上十時，在一個沒有趙紫陽出席的黨軍幹部大會上，李鵬宣佈了學生運動是「動亂」，而楊尚昆則透露了要調軍進京，恢復北京混亂的社會秩序。

戒嚴令之後市民仍出動堵軍車

五月二十日凌晨，李鵬和楊尚昆的講話，通過強力的廣播聲在天安門廣場上空迴盪，有一顆光閃閃的流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空徐徐降落，羣眾騷動。

城區中心的市民也知道解放軍將進城了，紛紛串連動員到各主要路口堵車，情緒波動，沒有被不停強力廣播的嚴厲語音所壓倒。

天津師範大學的同學喊「生死與共」。報訊來說首都鋼鐵廠的夜班工人，都停工趕往長辛店方向，保證一定攔住往南進的卡口。

沒法以筆墨形容北京市民愛護學生、痛恨軍管的情緒。

戒嚴之後形勢嚴峻

天安門西側人行地下道的入口處，張貼了「建國四十年，鐵腕人物，換了幾遍，那次是人選，哪回人民說了算，都是政治局內亂。」

滿載學生糾察隊的汽車呼嘯經過，學生大喊：「堵車去」，路人高呼「學生萬歲」。

上萬輛摩托車、出租汽車，開著大燈，打著「援護學生」的旗幟，在長安街來回示威助陣。背景聲音仍是動人心魄的救護車「嗚嗚」笛聲。

全市居民奔忙一夜之後，五月二十日清晨，電視廣播了從即日起生效的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令。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於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簽署發佈首都四十年首次戒嚴令，劃出北京市八個主地區，禁遊行、罷課、請願、演講、散發傳單、港、澳、台及外國記者不准上街採訪拍照錄像。

在和平狀態下實施戒嚴，已是驚人，調動大軍進京來執行戒嚴令，更是視人民為作戰敵人了。

至於何以是「一部分地區」戒嚴？這大概是李鵬一伙，匆匆作此極端行動，為了不致過於違背憲法而想出的計策。因為根據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國務院可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份地區的戒嚴；若是全市，則需由人大常委會決定。至於李鵬有沒有召開國務院會議來商議決策，這又是戒嚴令是否合法的另問題了。

緒。他們以極大熱情，從安樂窩起來走上街頭，以血肉築成人牆，攔住軍車。從五月十九日晚上至二十日凌晨，軍隊奉命兵分六路，從呼家樓、東直門、德勝門、西直門、八角村、六里橋等東南西北各方向朝北京市區進逼。住在城郊的北京市民，就這樣聞聲而至，通宵達旦地守住軍車，既有曉以大義，亦有動之以情，他們在軍車前設置了路障，這些路障包括大型汽車、石頭磚塊、商店的櫃檯、平板車等等，甚至一些老人乾脆坐在軍車輪前面。在八角村，市民們將香煙、雪糕硬塞到衝鋒槍的戰士手中，懇請他們千萬不要打學生，還有人拿來報紙、傳單，說明這次學運的情況。據車上的軍人說，他們接到的是進行演習和訓練的命令，這之前，戰士們已多日未看到報紙和電視，一些人自備的小收音機也被收了上去，他們並不知道北京發生什麼事情。停在呼家樓路口的數十輛軍車，被學生和京棉工廠的工人和市民堵住。其中包括高壓水車、運載由中國本土製造的「AK47」式步槍、催淚瓦斯發射器等軍車。市民手挽手，不讓外人進入軍車範圍，喊著「人民的軍隊愛人民」的口號。

市民學生聞訊趕往城西的公主墳，有兩三萬人攔著公路，不少人索性橫躺在路上，攔住軍車去路。南三環有多輛首領的卡車攔著公路。東三環的呼家樓有成千上萬人截住數十輛軍車。北三環學生把路堵死了。

「公主墳被堵了」、「呼家樓堵住了」消息傳到長安街、天安門廣場，羣眾都歡呼，路上聚滿一堆堆的人羣，議論紛紛。

五月二十日，戒嚴令頒佈第一天，整個京城都陷入悲壯的國殤韻律中，李鵬於早上十時正式宣佈戒嚴，部份外國及港澳記者都遲疑沒有往外跑。

正式宣佈戒嚴不久，多架軍用直升飛機開至，在天安門上空盤旋，這是自北京建國四十年來罕見現象。

天安門廣場白天圍觀的人稀少，新華門前的絕食學生未散。直升機出現時，廣場會一度騷動，非常緊張，學生準備了大量水、口罩、布、應付催淚粉和催淚瓦斯藥物。

新華門前，掛著橫幅，上書「政府自絕於人民，工農兵學商團結起來鬥爭到底」。

可是北京市民雖然知道了軍隊要進城執行戒嚴令，他們仍然以頑固的熱情堅守著，不讓軍車寸進。

二十萬學生不是一小撮

南西的三環路、北邊的學院路、東邊的呼家樓、西邊的公主墳，全堵滿上萬市民。

學生對軍隊說：「二十萬大學生和幾百萬市民一道向政府請願，算是一小撮嗎？」

另一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屬於人民，不屬於一小撮人。」

首領領導說：「只要解放軍向北京市民開一鎗，他們就號召全廠罷工。」

市民說：「如你們（軍隊）進行開進去，就執我們身上過去。」

大學生則顯得十分理智和克制，他們主要向軍人作宣傳工作，並把羣衆送給他們的汽水、麪飽分送給風餐露宿十分辛苦的戰士。在軍事博物館的後院，一位女同學向那些年紀與其相仿的戰士宣讀了十三日大學生開始絕食時的誓言，在場的羣衆同她一起流著淚，當她提議向在絕食中犧牲的伙伴默哀一分鐘時（據未經官方證實的消息說，在這場歷時七天，共有五千餘人參加的絕食中，有二名學生死亡，另有幾人因昏迷過久成為植物人，還有幾人癱瘓，不少學生患病，一些仍未脫離危險），解放軍戰士也都低下了頭。部隊一再表示，他們是奉命而來，人民的軍隊是保護人民的，不會鎮壓羣衆和學生。

經不住市民和學生的勸阻，二十日上午已有部份軍隊後撤了，東部呼家樓與北部的軍車都開走，有些大兵在臨走前偷偷伸出手指作「V」字狀，表示支持大學生。市民都樂了，鼓掌、歡呼聲，不絕於耳。

可是既有後撤，亦有新來的軍隊。北京市最大地區豐台區，佈滿了數百輛軍車，他們多來自瀋陽、濟南、北京三大軍區。

其中包括北京軍區三十八長勝軍，這支軍隊會跟隨林彪打「抗美援朝」一役，是現代化的集團軍。該集團紀律嚴明，並不像其他軍隊，經市民「教育」後，也願意看報及進食市民送來的食品。

軍隊來自六個軍區



五月廿一日，六里橋（城南）小孩冰棍送軍人。

豐台路口的三十八軍，車牌是V字，市民把「小平快回家去打牌」掛在軍車車頭。當記者拍照時，軍官喝止，附近羣衆相勸，不要刺激軍隊情緒，市民說該批軍隊已開入兩天，被市民攔截後，不眠不吃不喝，甚為頑強，經市民不斷勸說，漸見反應。這時市民已不是抗拒士兵，而是有點憐憫他們了。

五月二十一日，更出現鐵路運來的士兵。在北京火車站，二十卡部隊於早上抵達，市民製淚俱下力陳事件真相，並反覆質問軍兵「會否向學生開鎗？」

軍隊在市民的逼問下，本已點頭示意，後終為所動，說「不會」。

被囚於北京站六號站台的軍隊來自山東，站台上佈滿了前來堵軍車的大學生和市民，市民舉著標語牌「四九年解放軍進京，我們夾道歡迎；八九年解放軍進京，讓你寸步難行。」鐵道工人支持學生，凡手持學生證，均可無畏進入六號站台進行堵截。民心所向顯示無遺。不少解放軍表示：已有一星期沒有看報、電視，不知北京動向，除團部級以上，其他士兵只知來京演習，或救災。

據了解：奉調入京的部隊，分別來自六個軍區，不同的師，以便易於控制，及防止軍隊串連。

另一方面，瀋陽橋東西兩面，都有軍隊屯駐。在槐樹嶺，有二十多部裝甲車停在樹林旁，軍士則不知去向。

據當地居民表示：裝甲車是經瀋陽瀋陽橋開至，自抗日戰爭後，為保存古物，瀋陽瀋陽橋一不准車行。

二十二日凌晨時分，熙來攘往的西單，即七九年民主牆肇生地，人羣又在巨幅廣告牌上，貼滿警告標語，如「白貓黑貓，有奶是娘，腐敗勝比，惡魔墮落……」白天長安街很平靜，上街遊行的人少了，路面騰出了位置，自行車、汽車也可走了。天安門廣場白天曝曬

下，人羣少了，可能都回家睡覺，靜待黑夜來臨。每晚入夜，市民便聚在大小路口，連老太太都拉把矮凳，陪著守候。

市民死守軍隊寸步難行

自從戒嚴後，京城內的警衛和交響突然都銷聲匿跡，學生在十字路口指揮交通，設置路障，檢查車輛，外地來聲援的學生經過，羣衆都舉起手，報以「V」字手勢，並喊口號「歡迎」。彷彿執行戒嚴令的是學生。

新華門前，政法大學師生仍在絕食，幾十個解放軍盤膝列坐，擋住出路。一名回民老太太厲聲罵道：「睜開你的狗眼，看看是不是動亂。」

新華門外燈柱掛著標語牌——「國正民心」，戒嚴進入第三天，每晚都傳說軍隊入城行動，市民和學生都處於神經緊張的狀態，全市不怕死的守候，迎向荷槍實彈的部隊。

天安門廣場的地鐵站，如前門的鼓樓站，羣衆和學生同心協力把公共車推向堵住地鐵正門，並把兩旁的窗戶也堵住。因部隊都屯在地鐵內，候命出發。

二十二日凌晨，西單，人羣情緒非常不穩定，不時傳來軍隊邁進，軍民衝突消息，有人分析是當局瓦解民心的消耗戰。

數天的守候，市民疲倦了。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時半，已經缺了三天的古城區軍車，開始緩緩後撤。有些市民呼一口氣，可以回家安睡了。有的則說：戒嚴令沒撤，睡不安穩嗎？有些則充滿自豪感：看見軍隊就怕，就不是咱北京人了。

二十三日凌晨四時，六里橋的軍車也已後撤，這是最後一股接近市區的軍車。接著數天，軍隊都屯在北京郊外，市民看不到的地方。直到五月二十六日，軍隊都未曾進京。

可是，大家都知道軍隊還沒有離開，祇是暫時不進城而已。何時進城？這是全北京市民每夜都神經緊張的一個問題。

這次足以與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媲美的民主運動的爆發及其迅猛發展，是中共當局始料不及的。面對着這次如此壯闊的民主運動，中共當局手足無措，進退失據，苦無良策！與其說是中共「採取正確態度和做法加以對待」，倒不如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重大勝利！學生民主運動將被日後的史家載入史冊。從中共當局的窘態之中看到了民主運動的偉大力量。

中共建政四十年来最大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而引發之後，波瀾壯闊，洶湧澎湃，高潮迭起。這個足以與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媲美的民主運動的爆發及其迅猛發展，是中共當局始料不及的。不難看出，面對着這個中共執政後從未遭遇的如此壯闊的民主運動，中共當局是怎樣的手足無措，進退失據，苦無良策！

這種困境和窘境，隨處可見。尤其是在如何看待學運、如何給學運定性以及如何對付學運等問題上，當局或則封鎖消息，或則歪曲真相，或則恐嚇，或則懷柔；或則強詞奪理，或則自相矛盾；或則舉棋不定，或則前後不一……實在令人忍俊不禁。

由封鎖新聞到歪曲報道

迄至目前爲止，學生民主運動可大致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至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大會。這一階段中，大

學生除以各種形式悼念胡耀邦之外，重點是向當局請願，要求重新評價八七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對胡耀邦的下台作公開的交代和結論。第二階段，由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四日，大學生以罷課和遊行的方式，紀念第三，進一步爭取民主和自由，反對官僚腐化。第三階段由五月五日至五月十八日，以集體絕食的方式爭取與當局的真正對話。第四階段，由五月十九日至今，運動由學生發展至全民性的對抗李鵬在北京實施戒嚴，反對對學生實施血腥鎮壓，「李鵬下台」之聲響徹全國。

在這四個階段中，當局的態度是不得人心的。第一階段，當局無視學生民主運動，不但對學生的要求置若罔聞，而且封鎖消息，新聞媒介隻字不提學生運動，「天低雲楚，眼空無物」。直至四月二十日，北京各大官方報紙才突然出現北京學生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的新聞，而且是學生嚴打武官的歪曲新聞。當局所以如此，就是企圖否定民主運動的存在和否定運動的正義要求，並且在尋求着如何鎮壓的對策。

當局首次給這次民主運動定性，是在胡耀邦追悼會後的第四天——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措辭極為尖銳和強硬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給民主運動定性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這之前的四月二十日，當局透過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也僅僅是稱爲「一些值得注意的不正常情況」，現在，善於上網上線的中共突然拿出看家本領，將民主運動提升到嚇人的「高度」，既反映了當初置若罔聞、不予正視態度的失敗，也暴露正在醞釀着一場血腥的鎮壓。

馬臨川

「定性」引發更大鬥爭

但是，熱血青年不爲所動。他們冒着流血犧牲的極大風險，以實際行動回答當局對運動性質的歪曲，終於在威嚇性社論發表的第二天，爆發了足堪載入史冊的威鎮中外的「四·二七」百萬人大遊行大示威。

當局對「四·二七」未敢以「動亂」、「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和「嚴重的政治鬥爭」爲由責施鎮壓，說明了它的理虧。與其說是中共「採取正確的態度和做法加以對待」，倒不如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重大勝利！

事實正是如此。四月二十九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出面與學生「座談」，不得不一開始就「向首都高校廣大的同學先捐幾句話」，稱「李鵬同志讓我特別要告訴大家」，「人民日報社論的『定性』」是針對着極少數人的非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的同學」，並承認了學生「滿腔的愛國熱情」和推進民主化、深化改革、懲治貪污、克服腐敗的正確願望。

民日報社論，明顯是針對連日來的學生運動而發的，怎能說「不是針對廣大的同學」呢？如果真的是針對「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而不是整個學生運動，又何須小題大作地視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一次動亂」和「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呢！以中共政政的本性，居然害怕「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說得過去嗎？

但是，不管怎樣，當局最終還是不得不婉轉地修正其對學運的錯誤定性。最權威的表態就是趙紫陽在五月四日對亞銀成員代表團團長的一番談話。趙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這就委婉地否定了「動亂」說。趙紫陽也不再提「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轉而肯定「絕大多數」：「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的基本態度」是「又滿意，又不滿意」。

「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

最令人齒冷的是李鵬作為政府總理的出爾反爾。五月十八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總食學生代表時還大言不慚地說，黨和政府從來沒有說學生是搞動亂，但一天之後，他便馬上發表講話，稱北京有動亂，要求迅速制止動亂，並隨即宣布在北京實施戒嚴，企圖血腥鎮壓學生。李鵬的政治流氓嘴臉暴露無遺！

「黑手」故伎的破產

在一「黑手」問題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也攔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巴掌。

五月四日，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聳人聽聞地、言之鑿鑿地聲稱：「種種迹象表明，最近在北京高等院校發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學生的罷課、示威遊行，有大量的事實表明，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出謀劃策。」袁木故弄玄虛地點出了遠在美國的「中國民聯」的「一些成員」扮演了這樣的角色」。這當然是海外奇談。「中國民聯」既早被定為「反動組織」，有可能派員回到北京，「在那裏出謀劃策」嗎？袁木還借記者提到的方勵之話題，旁敲側擊地企圖把方勵之與學生運動扯在一塊——方勵之是「黑手」呼之欲出。這簡直就視學生為「阿斗」。國務院的袁木這種拙劣

引起學生強烈不滿的《人民日報》社論

落实治理整顿措施 各重点区段治

本報訊 今年以來，部分地、市、縣黨委書記、縣長都有病、停職或因病辭職等現象，有的、被開除黨籍等處分。據統計，去年以來，全國已有 100 多名地、市、縣黨委書記、縣長因病辭職，有的因病死亡。去年以來，全國已有 100 多名地、市、縣黨委書記、縣長因病辭職，有的因病死亡。去年以來，全國已有 100 多名地、市、縣黨委書記、縣長因病辭職，有的因病死亡。

反对动乱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illegible]

戒嚴令下的北京城

江魏楨

的手法，完全是繼承了過去極左的一套——五十年代，世界上不管發生什麼事，中共例必「寒一個「死貓」給美國，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策劃的」；國內不管發生什麼，例必稱是「一小撮階級敵人」挑起的。想不到袁木今天又故伎重施！

就在同一天，趙紫陽對亞銀的客人說：「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請注意袁木和趙紫陽在這問題上的分野——袁木是斷言運動是由「極少數人」挑起的，即所謂「有大量的事實表明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出謀劃策」。而趙紫陽則只稱「有人」，「希望看到」動亂，「會利用」學生的行動而已，因此「值得警惕」。而且，趙紫陽還是從「中國這麼大」的範圍內估計「總有人會利用」。這種分野，相信讀者會悟出個中的真諦。

袁木睜着眼睛說瞎話

面對如此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長期間不敢出面表態，他只是派出作為發言人的袁木出來打官腔。就是這個袁木，其談話也是語無倫次、自相矛盾的。舉例說——

在四月二十九日與學生的座談中，袁木一再聲稱，對話「不提先決條件」，對話可以有「各種層次，各種渠道」。在五月三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袁木又說：「政府願意在不同層次不同範圍內通過不同渠道與各種不同觀點的同學對話。」這是說，他主張沒有先決條件的對話。這當然是針對學生對話所提的各項要求而說的，意在否定學生的合理要求。但是，袁木却又一再視「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為「非法組織」，只

答允與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和各高校的學生會和研究會這些「官方組織」對話，拒絕與「高校自治聯合會」對話，這不也是一個「條件」的對話？難道「高校自治聯合會」不是一個「範圍」、一個「層次」、一個「渠道」嗎？這種不準別人有先決條件而只准自己設置條件的做法，如果不是袁木的低能，就是說明當局對話並無誠意。

再看袁木關於新聞檢查問題的談話，簡直可以納入新笑林廣記之中。袁木說：「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我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實行的是報刊編輯負責制。」袁木的話如果是在民主運動之前輕描淡寫地說一說，人們可一笑置之，但他偏在學潮爭取新聞自由的當兒，偏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整頓、老總欽本立被撤職的時候大言不慚地這麼說，就簡直是無賴、簡直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光天化日之下拉屎了！如果沒有新聞檢查，又焉知《導報》將刊登當局所害怕的文章，從而禁止該報的出版？

在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要求當局就廣泛的問題盡快實行實質性的對話。這當然不是無理取鬧。當局既然早在「四·二七」之後就答應與學生對話，但為什麼又遲遲不予兌現？值得玩味的是，五月十三日趙紫陽主動與北京工人座談，十四日李鵬又跑到首鋼與工人座談。他們對工人，不請自來，對學生，請也不來，拖得就拖，賴得就賴。當局與學生對話的「誠意」，暴露無遺！他們壓根兒就不把學生放在眼內！

但是，人民大眾却會高度評價這次民主運動，學生民主運動將被日後的史家載入史冊。我們從中共當局的窘態之中也看到了學生民主運動的偉大力量。

「軍機下來！下來！」

北京戒嚴令第一天，即五月二十日，全城非常緊張，許多學生、市民、機關幹部準備與開入城內的解放軍決一死戰。上午，五架軍用直升機在天安門上空盤旋，學生在廣場用人排成了一「下」來，並高呼：「軍機下來！下來！」他們還留了一大塊空地讓飛機降落。下午，五架飛機剩下三架，後來只有一架。

六十五軍開進石景山附近，首鋼工人給送飯，軍方說就要退。工人問是否退了又繞彎進來？戰士說不來了。二十七軍的軍長給報社打電話，表示部隊正在開進，但和其他部隊一樣，被羣衆堵截住了。

兵臨城下 衆志成城

由於戒嚴，整個北京城，好像到了「紅了眼的」的拼博狀態。但市民之間沒有隔閡了，和陸相處，守望相助的道德一下子進入生活。即使大家不小心相撞一下，都禮貌地說：「非常時期，請原諒。」二十日晚兵臨城下，夜四點，學生只要一喊某處危急，一批人就乘車或跑步飛到那裏，有時候幾十輛個個體的摩托車飛馳到現場，圍堵軍車，氣勢非凡。在各個地鐵口，市民和學生除了用汽車之外，還用大水管（要三四個人才能抱過）堵住地鐵口，怕部隊從地鐵鑽出來。當學生們累了，市民回到家煮了雞蛋麵條，熱乎乎地送到學生手中，此情此景十分使人感動，但又不禁悲從中來。往日深受老百姓歡迎的子弟兵，今天成了和老百姓對峙的人。過去送衣送鞋送食品給解放軍打敵人，今天人民軍隊受一些權貴們支配，與百姓學生為敵。雖然說戰士不可能開槍打

老百姓，但軍令如山，有的士兵就說，若果一定要開槍，我們也可能開的。

新華社職工大喊「反對軍管」

二十日下午，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社、文藝報、共青團等單位，部分工作人員不怕戒嚴令，紛紛上街，到廣場和學生一起行動，高呼：「中國人！起來！」「中國人！不要怕！」「愛護學生！今晚再來！」「人民日報記者們喊：『人民日報，屬於人民。』還有的人打着『還我紫陽』的橫幅。晚上，有自行車隊、摩托車隊約五百多輛，從天安門示威而過，受到羣衆熱烈拍手歡呼。人們都說，這是中國人從未有過的團結景象。許多市民說，「我們豁出去了，我們玩命了！」「若這一次老百姓沉默，捱不過的話就永遠不會有翻身之日，永遠不用說話了！」有的市民一邊走一邊罵現在的偽政府，是缺德的政府，他們什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有些人還公開說：「人民的軍隊，就讓那幾個人搬來搬去，這算啥啦！」二十二日晚，化裝為平民的軍人，身穿便服，有的還穿牛仔褲，半夜偷偷進入新華社，在新華社大禮堂集合。第二天，被羣衆發覺，新華社一批人在大堂周圍大喊：「反對軍管！打倒李鵬！軍隊滾出去！」直到二十四日早晨，這批人還沒改穿軍裝。

我曾和廣場維持交通秩序的同学交談。一位學生知道我是香港出生和長大的，非常激動，因為他們知道香港百萬人大遊行。那學生哭著對我說：「香港人要為我們向全世界人民宣傳，我們要為民主、自由鬥爭到底，直到勝利的那一天。」兩個清華大學學生拉著我的手，久久不放。我看到他們消瘦的臉龐，疲倦的神情，乾裂的嘴唇，嘶啞的聲音，不禁和他們一起哭了起來。

學鳴月刊 1989/6



古都驚雷

戒嚴令下的北京

方舟

五月廿一日，北京實施戒嚴令的第二天，三小時的飛行把我從香港帶到北京——這個全世界中國人都關心的地方。局勢的急劇變化，是我始料不及的。本打算來玩玩的我，却被上天安排做了一個歷史的見證人。

北京機場 一片平靜

飛機本應是坐得滿滿的，却有四排座位空了，想是戒嚴令把人嚇怕了。北京機場一片平靜，海關並無特別刁難入境旅客。據說昨天機場全無交通工貝進城，使我擔心不已，幸而今天民航已有巴士接載旅客入城。雖然有些人不敢到北京，但仍有旅行團到來，日本和香港的遊客似乎沒有被戒嚴的形勢嚇倒。

從市郊入城，沿路所見的汽車甚少，一般人都以自行車代步。只偶爾見到一、二羣民眾聚集。此外，就平靜得很。

漸近傍晚 風雲待變

天色漸暗，城市也開始變色。街上人羣愈來愈多，一輛輛自行車穿梭往來，雖然給橫過馬路的人添了不少麻煩，但在學生糾察的指揮下，尚不失秩序。街上的人有些聚在一起聽學生演說，有些聚在街頭議論紛紛。市民關心局勢，走來走去希望得到一些最新消息。「凌晨五時軍隊入城」便是在此時傳開去的。市面上沒有公共汽車，交通全靠自行車及自己的兩條腿。巴士靠在一旁成為屏障，或成為學生的演講台。大眾人合力把一輛電車推到路邊，權充學生、市民的圍牆。

記者集體行動 公告天下

這是個令人不安的晚上。「軍隊在凌晨五時開始鎮壓」的消息，使不少人忐忑不安。加上很多不確定的傳聞四起，叫人不能確定下一刻將會如何。對過慣「安定繁榮」生活的香港人來說，這是一種既新鮮又可怕的經歷。

關於軍隊的行動，記者當然不敢掉以輕心。在戒嚴令頒布的前一夜，軍隊入城之說已甚囂塵上。記者有責任報導事態發展。但一旦採訪，便違犯了戒嚴令，後果如何，不得而知；若真的進行鎮壓，正在採訪的記者，如何保護自身安危？

出發前，許多香港記者聚在一起商討對策。結果決定由各採訪轉為集體行動，各記者分組，分地點行事，互通消息，務求盡量把事情真相傳送到香港，突破中國新聞封鎖的防線。明月皎皎，誰曉得今夜如何？大家都有「壯士」去兮不復還」之歎。

我沒有做壯士，對這個動盪時局，我仍未習慣。我決定留在酒店，收集各方消息，通知其他記者。一夜無眠，各人盡力把各項消息安放在香港報章的頭版。街上情況漸趨平靜。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聲不絕於耳，學生嚴陣以待，始終未見軍隊的踪影，却傳來解放軍指揮官和學生談判的消息。旅程的第一天就這樣度過了。

五月廿二日，來京第二天了，我的恐懼減少了，胆子也大了。我希望親臨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雖然盛傳軍隊在下午三時入城，但風聞一批知識分子會遊行去天安門，支持學生。我也顧不得後果，尾隨記者入內看個究竟。

天安門廣場 旗幟飄揚

有些學生在廣場外圍把守，任何人想進廣場中心，必須出示證件，以免其他人混入學生當中。會場內有很多架起來的帳棚，帳棚上有一面面寫上各高等院校名字的旗，隨風飄揚。場內充滿濃烈的消毒藥水氣味，而垃圾、廢物則聚成一堆堆，盡量保持衛生。

學生有懶懶地臥在帳棚內的，也有埋首油印宣傳單張的。在烈日下，學生臉龐都晒得黑黝黝的。雖然學生在二十日晚停止絕食，仍有點兒疲乏，但精神頗不錯。我聽到一些學生埋怨市民支持的熱情漸減，廣場內外却忽然響起歡呼喝采聲。原來，批知識分子——包括中國作家協會以及很多傳播媒介、出版社工作者，組成一支龐大的遊行隊伍，人數幾近萬人，向天安門進發。對學生來說，他們好比一枝強心劑，一時士氣大振。天空突然出現一架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盤旋，大量傳單從天而降，好不壯觀。學生說這是官方向學生發布軍方宣言，重申不會對學生用武。

傳單只是一段小插曲。遊行隊伍仍是吸引人的主角，其中以「中國作家協會」和《人民日報》最醒目，《人民日報》行列中有前報社總編輯王若水先生。他們高呼「支持學生運動」、「打倒李鵬」及「新聞自由」等口號。他們大部分是文化工作者，所以，總是表現得溫文文火的。

為了拍照，我也跟大隊走了好一段路。假若香港的記者此時和他們走在一起，加上一幅「香港記者」的橫額，便是新聞封鎖下海外記者的同聲咆哮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也有學生參加遊行，而本港幾名大專學校老師亦手舉橫額遊行，他們雖然人數不多，却大大鼓舞了北京的學生和市民。

夜探天安門

天安門的晚上跟白天絕對是兩回事。烈日西沉後，學生提高警覺，應付漫長漫長的恐怖。踏入黑夜，我再度夜訪天安門。九時多的時候，我在街上踴躍，市民不斷路自行車來回於天安門，希望知道天安門的最新情況，愈夜人數愈多。這兩夜並沒有民眾遊行，却開始有幾輛巴士行走。

凌晨三時，我再踏足天安門，還走進中心區，極目望去，一片旗海飛舞，比白天好看得多。天氣涼了，學生精神也好了點，而且略為鬆弛下來。三時以後，大概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身旁的記者告訴我：三時以前比較緊張，學生經常開會、廣播。她說，今夜聚集的學生人數較少，可能有些是回校宣傳，也可能有些放棄了。

風聲鶴唳，昂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在明月相照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字高懸，似乎在守護着學生。廣場中心的防衛愈來愈嚴，我們要出示證件，才能穿過一道道關口，進入廣播區。這時比白天熱鬧。站在旗海下的我，四處踴躍，覺得他們並不害怕，士氣反而更高。今夜比昨晚平靜得多。我想不到什麼重要事情發生，但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我們漫步回旅店。凌晨四時多了，街上仍有人踴躍，偶然看到一大羣自行車宣傳隊在街上來往，高喊「打倒李鵬」，甚至「小平下台」。沿路更有些攤販擺賣小吃和飲品。我細看街旁的大字報：學生把北京學潮、市民遊行的圖片印了貼在路旁，上書「悲壯壯哉驚天地，黨心民心同此心。」星期一的《大公報》頭版，也已縮印了貼在報告版上，把昨日香港一百萬人遊行支持學生的行動公告天下，鼓舞人心。這消息對他們十分重要，甚至廣播出來。我雖然無法參與遊行，但今次香港人真的寫下了歷史的一頁，我十分高興。

來京已兩天了。千里迢迢，用自己的假期來到這座圍城。不少人千方百計要離去，我却誤打誤撞進來。結果是吃不好，睡不足，放假比工作更辛苦，累壞了，真是愧對同來的玩伴。

在香港，我也參加過遊行、示威，但往往都很快鬆懈，根本用不着付上代價。眼下的學生，在危險形勢下，竟顯得如此從容，準備隨時就義。我已走進歷史裏頭了。用筆盡量記錄這段歷史，是我這類

歷史見證人的責任。我並不後悔到京。在這個關鍵時刻，我願意與北京市民共度憂患，共嘗為不可預知的一切而衍生的恐懼和迷茫。我沒有參觀各勝古跡，但我走過北京人民的心路，體會到他們的感受，這對我來說，未嘗不是新鮮的經歷。

衝破新聞封鎖

澄清動亂

真相

軍隊、統戰與輿論工具向來是為中共所重視的治國、鬥爭法寶。當學生絕食之初及之前一段時期，中共的統戰工作頻繁，表現出平和的氣氛。及至調軍進京，則露出獠牙面目，這時候，統戰不需要了，要的祇是輿論上的吶喊助威。為此，緊抓輿論工具是配合調軍的、刻不容緩的工作；祇是，時至今日，已沒有多少人甘心淪為工具了。

反新聞封鎖行動

反對軍管電視台

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抗議示威、反對李鵬的全市大遊行中，綿延數公里的隊伍內，這個小隊是那樣的突出，一直在緊聲不絕中前進——隊伍前面的旗幟寫着：反對軍隊進駐電視台，CCTV。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站播出了這個消息，更引起數以萬計的學生響應行動。

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令，在市民堵截軍車成功、解放軍無法大舉進城的情況下，已被民眾視為無物，形同廢令。不過，深諳控制輿論的中共，早已派軍進駐主要傳媒，而這個消息通達全國的大機構，更是官方首要控制的對象。中央電視台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早實行軍管；五月二十一日，七十名解放軍以便衣方式進入《人民日報》，新華社內亦來了四十多名軍人。

要求與黨中央一致

新聞界不需要他們的指導，連軍隊都不怕，何懼幾個跳樑小丑？

刊出引起軒然大波的「四·二六」社論的《人民日報》，反抗最為激烈，以致指導小組對之大大不滿，五月二十三日，斥責該報成天兩天的報道不實話，重申要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甚至有些人認為《人民日報》已不再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今後一切評論以《北京日報》為準，不以《人民日報》為準。

《人民日報》雖是令他們不滿，李鵬和楊尚昆於五月十九日晚間在黨政軍大會上發表世界級的談話後，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報》報道此番談話時，並無用「動亂」兩字在標題上。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出現很多「別有用心」的標題，頭版上有一意大利總理辭職，「定西蘇聯進軍建設」，國際新聞版上又有：高梅尼年高體衰，「誰來接班」；塞內加爾政府決定「解除緊急狀態」；南朝鮮朝野一致要求「清算弊案」。這些含沙射影的字眼，均以黑體刊出。

自從首都新聞界在「五四」大遊行之時開始掙脫束縛，公開奮起爭取自由後，新聞界的獨立人格不容易再屈服了，縱使在槍口之下，也要抗爭到底。它們的冒險犯難是可想而知的，難怪中央電視台公然反對軍管之舉，贏得羣衆的極大敬重。

為了加緊控制傳媒，中共中央於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成立了「戒嚴時期宣傳指導小組」，奪去胡啓立的主管宣傳權力。小組以中宣部長王忍之為首，成員包括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中宣部副部長曾健徽、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志堅。這份名單充份反映出當前的執政者的面目，幾個最左、最受羣衆歡迎的官僚，都匯集到這個小組，而其中何東昌更是從未接觸過宣傳工作，如何「指導」？

此外，更有一段聞訊「北京戒嚴第一天」，報道說：「天安門廣場上，數十萬大學生仍在和平靜坐。白天，大街上游行隊伍不斷；夜晚，廣場附近東西長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道滿市民。」這一段客觀描述，對戒嚴令的無法執行，作出無聲的嘲諷。其後，「北京戒嚴第二天」、「北京戒嚴第三天」的實況報道刊出後，更充份反映出戒嚴令的失效，「北京市仍在人民手中。」

與中央公開決裂

錢李仁兩點都不答應，他說假若做得過火了，會出現第二次胡耀邦事件。這次聚談還沒有結果，錢李仁便臨時接到通知，到中央開會，回來後沒說甚麼，但馬上佈置從翌日起不再發任何聲援學生的消息。

接着就是李鵬講話、戒嚴令頒佈、軍管，在恐怖氣氛籠罩下，員工將報社內的評報欄意見全部撕掉，轉入一種消極抵抗的鬥爭方式。

謝苑貞

《人民日報》早在戒嚴前已展開爭取新聞自由的鬥爭，在「五·一七」聲援絕食學生的環市大遊行，該報內參加遊行的員工達一千人，全報社員一千七百人，包括駐外記者，標語上指出「四月二十六日社論不是人民日報寫的，要嚴肅鮮明地反對」。

鑒於從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的學生，為的是否定「四·二六」社論；《人民日報》編採人員也同樣要求，五月十六、十七日，每天都聚集，給總編輯施壓力，希望刊出一篇社論來解釋「四·二六」社論的由來。總編輯譚文瑞已多勞住院，社長錢李仁代管編輯。在多番商議後，錢同意於五月十八日發出長篇通訊報道學運，作為「交代」。於是「五·一七」的聲援學生大遊行，佔據了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的頭版整版，而且都是持正面肯定態度的，媲美當日《科技日報》的「敢有敢哈動地地」長篇報道（也是頭版整版）。

中央電視台不做傳聲筒

最早受到軍管禁制的中央電視台，也是不甘做傳聲筒。最動人的一幕，就是五月二十一日著名的男新聞播音員謝飛，在晚間七點的新聞聯播中，趁著結束前三十秒，自己講了一段軍隊尚未開進北京，首都並未實行軍管的話。

由於李鵬發言首都發生動亂，要調軍入京執行戒嚴，其後即進行新聞封鎖；又要各省各地區表態。若各地在了解情況下，以為北京真的發生動亂，當然要衷心擁護李鵬的講話的。謝飛這一段話，就將真相向全國揭露了。據說安徽電視台在接收到這段消息後，將這三十秒消息反覆播送。

而謝飛在勇敢地做了這件事之後，便好幾天沒有出現在螢光幕上了。

中央電視台在五月二十一日當日還耍了一招，它一面由報道員讀出戒嚴部隊指揮部的聲明，一面卻在播出天安門示威的畫面，直到念完聲明，螢幕上還

在無聲地播出上述畫面，鏡頭前出現「李鵬下台」的標語，長達半分鐘。這不合常理的無聲畫面說明甚麼，是令人會心微笑的。

此後幾天，《人民日報》與中央電視台都報道戒嚴後的北京城情況，低調地衝破新聞封鎖。

首都新聞界抗爭到底

同受軍管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曾在戒嚴令頒佈後，由播音員自行講述北京市面狀況。新華社則報道了市民要求撤消戒嚴令的大遊行。

其他報社雖沒有軍隊進駐的威脅，可是「指導小組」要求各報編輯要與中央保持一致，又要各報保留自己的聲音。後一項要求，可能是為了掩飾專制，不過對於某些報紙卻不實，如率先報導導報胡學潮的科技日報，每天正面報道學生的靜坐和市民遊行，不見得就與中央一致。最與中央一致的，看來就是《北京日報》、《解放軍報》等，其他都免不了要在內部或在版面上鬧别扭。

另一方面，數千名首都新聞記者，不理會報社禁令，私自前往參與「五·二二」知識界遊行。

部份新聞記者表示：五月二十一日晚，報社負責人向他們闡明利害，李鵬未宣佈戒嚴令之前，可以不秋後算帳，但頒布戒嚴令後，記者仍堅持前往，則肯定會追究。

被認為最左的《北京日報》三十名記者，於五月二十二日偷偷地出來，出來後始打起戒嚴令去遊行。

李鵬等人所作所為見不得人，所以還要封鎖新聞、改組宣傳小組加緊控制，不過，首都新聞界的覺醒，使他們發揮了無比的聰慧，從各種不同途徑進行抗爭。中共利用新聞工具作為黨的喉舌，這日子已成過去了。

北京之春的政治時針

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的政治時針，乍然飛速行走，似乎把「一天等於二十年」這個三十年前的神話，在某些方面變成現實了。

可能在沉默中死去的人們，一下子在沉默中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壯舉。許許多多缺鈣的軟骨病者，霎時間伸直了脊柱，像一個正常的人而不像一個奴隸那樣挺立起來。

無數的靈魂驟然閃爍出政治智慧的火花，在民間，第一次出現了一「向前看」壓倒「向錢看」，美德壓倒了缺德。

一切都像是超音速地變化着，行進着。

無庸統一意志，無需練習和操演，千萬顆心在相同的時間，以相同的節奏，高呼「反對暴政！」「打倒李鵬！」……

遊行，示威，絕食，靜坐，上書，請願，抗議，最初是學生民運，其後是全國民運，「一小撮」很快就發展為一大片。這個運動衝破和壓倒一個個禁令、雷區、恐嚇、威懾。強烈的衝擊波在天安門廣場輻射出去，北京在怒吼！上海在怒吼！南京在怒吼！武漢在怒吼！西安在怒吼！廣州在怒吼！……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動亂」帽子與李鵬、陳希同

這就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月的北京，這就是抖動了地球的中國。

被這場超級地震嚇破了膽的中共統治集團，倉惶地應付着場外的災難。他們把「動亂」的帽子，扣在學生和學運頭上，同時對學生羣衆施加威脅、恫嚇，使用一鞭一石兩手。

《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和李鵬的「五·一九」講話，是向學生和其他羣衆的直接挑戰。學生羣衆對此作出了強烈的反應。

許多人關心，「動亂」的帽子是誰定的？是誰定的性？

天安門羣衆大遊行 本刊記者攝

抖動了地球的日子

北行放語之二 羅冰

現在大家都知道，「動亂」是由鄧小平定性的。不過這頂帽子和北京市委書記李鵬和北京市長陳希同有關。

鄧小平：犧牲一二萬，「換取二十年」

從學運興起至四月二十五日，李、陳二人向鄧小平先後提交了九個關於學運的報告，說學生搞「叛亂」、「反對共產黨」、「衝擊中南海」。四月二十五日下午，鄧小平發話：即使犧牲一二萬人，也要控制全國局勢，「換取二十年寧靜」（引號內的是原話，一字不改）。他又說，對學生的「反革命動亂」，必須調兵鎮壓，求得平息。「我有百萬大軍，不怕。」於是，奉命聖旨，由黑秀才執筆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就出來了。

謠報軍情的最後根子是李鵬

由此可見，「動亂說」的「根子」，是李鵬、陳希同的「謠報軍情」。他們兩人，一個想爬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李），一個有意撈個國務院副總理（陳）。

而「根子」的「根子」，是李鵬，是這個野心家慾惠李、陳二人提供假消息的。而此二人爲了討李鵬歡心，也樂意積極地和李鵬相配合。

一個反動陣地和張百發的廣播

北京市委、市府多年來就是中國大陸極端保守派的一個頑固陣地。「清污」、「反自由化」這些運動，都是北京市委、市府「爲天下先」，而且鬧得最兇，走得最遠。爲了向李鵬邀功，製造市民、職工和學生的矛盾，北京市委、市府還由張百發副市長在電視台廣播，說明牛奶、石油、液化氣罐等生活必需品「無法運進市區」，是由於學生在各重要的郊區路口設下路障。他們還下令停開公共汽車、電車，讓銀行（儲蓄所）關門，郵電局停業，把這一切歸罪於學生「鬧事」，胡說學運「影響正常工作」。張百發的話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但是，五月二十三日的情况已漸有轉機，這與市民不再受蒙蔽大有關係。

艾青與李鵬抱頭痛哭

「動亂」的帽子不但沒有嚇倒學生，而且更激發起學生的高度義憤和鬥志，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矛頭直指李鵬及其背後的鄧小平。此外，不少工人、農民和一般市民都加入了反鄧倒李的鬥爭行列。特別引人注目的一批共產黨幹部，包括「黨的喉舌」、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解放軍和公安部門一批文職人員（有個別武裝人員），也同學生羣衆一道行動。還有爲數更多的其他知識分子——作家、理論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等等都參加了鬥爭。

五月十七日午後，詩人艾青由青年推著輪椅，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大學生，當他和中顧委、理論家李鵬相遇，見到絕食大學生的慘狀時，不覺悲從中來，兩老在天安門前抱頭大哭。

葉文福在天安門宣布退黨

同日晚上，台灣籍全國人大代表黃順興，身佩寫明身分的彩帶，和理論家嚴家其、于浩成、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天安門廣場示威，支持大學生。

五月十八日黃昏，著名老作家冰心由其女兒等陪伴，來到天安門，對絕食大學生表示支持與慰問，當她來到絕食學生身邊時，頓時流下了熱淚，泣不成聲。當晚十時許，著名諷刺詩人《將軍，你不要這樣》的作者葉文福，曾到天安門廣場支持絕食示威的首都學校學生，他在朗誦其新作《苦戀》後，

以激動的聲音公開向廣大羣衆宣布：「從現在起退出中國共產黨！」羣衆報以熱烈掌聲。

強烈要求鄧李楊下台

李鵬兇狠的「五·一九」講話和「五·二〇」的戒嚴令，以及隨之來的局部軍管，只造成了政治社會生活的真正動亂，却沒有使學運遲遲受到打擊，反之，更大的鬥爭浪潮激盪起來了。在開始實施戒嚴的五月二十日上午，就在北京郊區，市民、農民、工人奮起阻止挺進北京的軍車，與此同時，一大學生和市民、工人在西單十字路口的廣告牌上刷上了大字標語：「強烈要求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下台」，道出了廣大市民的心聲。

如此軍管中央電台

從那一天起，軍方先後對人民日報、廣播電台、電視台及新華社實行「軍管」。軍管下的中央電視台，在當日全國聯播節目裏發布《公告》，宣稱「有人假冒人民日報的名義，出版發行一份《號外》，要求社會人士了解這是一些反對李鵬的記者和編輯不顧其主上的阻攔編印出來的《號外》的確以揭露李鵬陰謀爲主要内容」。

相對而言，軍方對廣播、電視的控制最嚴密。他們除了將一批「不可靠」的工作人員派往西山搞綠化造林以外，還嚴令全體編輯、播音人員按時上班，不得隨意請假，並在戒嚴期間不得與家人、同事以外的人接觸。更妙的是，官方委派的領導總是在臨近播發新聞的前幾分鐘，才指定播音人員，交給稿件，不讓他們有所準備，以收控制之效。

《WM》作者和一批作家退黨

戒嚴令下，民運繼續發展。五月二十日夜間，天安門廣場有大學生和前來支援的市民羣衆近五十萬人，却沒有一個軍人進入廣場。

當天，著名劇作家、《WM》（《我們》）的作者、原部隊中年作家王培公（日前擔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編劇），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並說明他和日前的黨中央根本「不能保持一致」。山東以王金年爲首的部隊及地方青年作家（專職）十八人，也在同日宣布退黨，和李鵬政權鬥爭到底。

過了一天，近二千名首都新聞出版、文化、文藝、理論界知識分子在北京復興門立交橋集合，向天安門廣場出發示威遊行，沿途高呼反對李鵬、要求新聞出版自由以及否定「四·二六社論」的口號，強有力地聲援學生。

火山將有更大的爆發

可以預料，這場可歌可泣的反獨裁統治的鬥爭，將發展成爲持久戰。鄧李楊憑藉著手中的武力，和套施的策略，企圖以軟硬兼施的手法對學運進行分化瓦解、軟化，最後把學運遲遲拖垮，以達到建立法西斯專政的目的。這是他們的如意算盤。這個算盤不一定能打得響。但是，即使李鵬得逞，也只是短暫的。歷史終將由羣衆改寫，因爲在李鵬的法西斯統治下，在經濟政治危機深化的情況下，火山的再度爆發，更大地爆發，是歷史的必然。

北京的政治時針不會停下來，即使減速，也是爲未來的高速準備條件。



我在天安門廣場上

艾思華

我以悲痛的心情寫下我不願寫下的一頁。
十天前，我曾和天安門廣場的同學們一起談論大局，如今他們之中，不少人已被中共的坦克輾成肉醬，倒在自稱為人民政府的軍隊的刺刀下。我悲哀！我憤怒！但我也相信，那些殺人的魔王，日子不會太長了。

軍隊壓城廣場告急

五月十九日，李鵬下戒嚴令的當天下午，我到達北京。到家以後，我就給報社一位朋友打電話，他在電話裏說：下午情況發生急變，要報社工

作人員學習「四二六社論」，和今晨趙紫陽書記會見同學時那種謙和之情相反。於是約我八點見面。我準時到達，他卻比預定時間遲了一個半小時。一見面，他以悲憤的語氣說：「軍隊已開來鎮壓學生了！在北京西郊公主墳一處，軍隊被市民、學生截住了，我也被截住，過不來。」然後他難過地說：「這可能是學生們在天安門最後一晚了……」沒等話說完，我們就奔跑到廣場。

我在絕食同學面前痛哭

廣場和往日一樣，聚集着幾十萬的市民、學

生。這是學生們絕食的第八天。響着撕裂心肺號子的救護車，一輛接一輛載着昏迷的同學上醫院。同學們井井有條地維持着廣場的秩序，市民們拉着帶口、老少雲集在這裏，他們臉上都流露着悲憤的神情。市民罵道：「這是人民政府嗎？我們的孩子就要死了，他們（官僚）的孩子在幹什麼……」救護車發出急救的呼聲，孩子們的生命垂危，作為孩子們的父母，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甚至外國人，無不為這種悲壯的氣氛所感動。曾在大陸任教十餘年的我，看見這些可愛的、勇敢的學生們，忍不住痛哭起來。我想，他們為的是什麼？他們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沒有私利！他們天真！他們對未來充滿着理想！一位外地口音的清華大學同學激動地對我說：我感謝香港同胞對我們的支援，我們將為民主自由奮鬥到底……在他們的面前，我感到內疚。

我們不願離去

我們不願離去，市民們也不願離去，想看看中共的一小撮人今晚如何血洗天安門。有些市民和學生已得知軍隊壓城，情緒已非常激動。有一位北大教師在演講，吸引了大批圍觀市民，市民不斷鼓掌，以表支持。有一位女學生在演講完問大家，你們會不會離開？羣衆高聲答：我們支持你們，我們不會回家！不料十一點多鐘，廣播傳出李鵬的講話，市民靜靜地站在廣場聽着李鵬胡說這是一場「動亂」，人民政府將制止這場「動亂」等等。羣衆沒有畏懼，沒有回家，依然在廣場看護着學生。市民在大街上高呼：打倒李鵬！李鵬下台！

李鵬一伙自以為他話音一落，軍隊即可開進天安門。他們打錯了算盤，他們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軍隊被學生、市民堵在城外。市民和學生也被李鵬這一欺騙行為激怒。市民和學生異口同聲地說：現在不同往日了，想封住我們的嘴辦不到。我們不再是奴隸，我們要自由！三輪車工人罵道：李鵬不是娘養的……

跳上告急車 面對入城軍

一連幾個緊張的夜晚，一直和學生心連心、手拉手並肩戰鬥，他們設路障、堵地鐵口、堵軍車。學生們一喊六里橋告急，就有一輛汽車載着市民學生飛馳到那裏，或者一聲公主墳告急，幾千人就撲向公主墳……在這緊張的夜晚，我忘記自己是港客，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我和家人跳上告急的車來到六里橋，那裏有十七輛軍車和五輛客車，情況一度緊張。但市民、學生、士兵都表現出高度的克制。學生上前向士兵宣傳，

有的士兵忍不住說：「我們上級說來北京拉練的，不是鎮壓學生，我們已經有十多天沒看報，沒聽新聞廣播了。」那位娃娃兵表現出無奈的樣子。李鵬一伙以為當晚（十九號夜）可以拿下天安門廣場，士兵們均沒有帶吃的，他們餓着，汗流滿臉，等待上級命令。

軍人化裝入城遭識破

第二天，第三天……李鵬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軍人化裝入城。二十二號解放軍穿着便服入駐了有軍管的單位，其中新華社就是這樣。二十二號晚，一批六十幾人的解放軍，身穿便服，半夜偷偷地進駐新華社，直至第三天，那批軍人仍沒穿上軍衣。第二天被羣衆發現，羣衆高喊：打倒李鵬！軍隊滾出去！

也有一部分新華社職工表示要留住實力，以備後用，對軍管採取了另一種抵抗方法，由於不能如實報道國情，發稿處在軍管當天，只發了與國情無關的兩條消息，然後留下字條說：其餘部份由軍管處發消息，職工提早下班離去。

對共產黨的幻想徹底破滅

李鵬一伙在鄧小平支撐下，變本加厲，一錯再錯。他們利令智昏，不聽海內外華人的勸告，終於失去理智，於六月三日以坦克車開路，用「達姆」子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用殘暴的手段來殺害中華兒女。他們已到瘋狂的地步。我相信，那些無知的士兵是受那些殺人魔王藥物刺激才會紅了眼對待學生。我同時深信，在這之後，這些士兵的命運將和學生一樣，因為這些受騙的士兵是這次歷史的見證人，共產黨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今天，那一幕幕在天安門前所見到的，包括充滿勝利信心的學生們、市民們、新聞界、文藝界、知識界的有良知的公民們，他們英勇不屈，不怕戒嚴令，不怕秋後算賬，仍然打着他們所屬單位例如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的旗幟高聲喊著：「中國人！不要怕！」「中國人！站起來！」的景象仍在我腦海中縈繞。我深深相信，天安門前被中共血洗的青年們、市民們，他們一個個倒下去，將會讓千萬萬中國人站起來。他們以自己的鮮血告訴全球的炎黃子孫，丟掉對共產黨的任何幻想，高舉民主、自由的旗幟，奮勇前進，戰鬥到底，勝利一定屬廣大人民！

痛心疾首話圍城

郭倩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鬥爭總是和槍桿子分不開。政治力量較量，最後總是靠軍事力量決勝負。

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政治鬥爭引起軍事力量的對峙這一幕，又再度上演。雖然至執筆為止（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仍然未有正式的、明確的公佈，但很明顯的是：有權調動全國軍事力量的一派，佔了上風。而失敗的一方，最後就只有一條出路：被指為反黨反革命集團而遭受無情批判。

民衆怨氣衝天

四月十五日中共前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突然逝世，由此而引起的大學生悼念活動、上街遊行，是促成今次變局的主因。

進入一九八九年後，中國政局沉悶之極，猶如風暴來臨之前的寂靜。一年多以來由於價格改革失控，民衆對物價快速上升甚表不滿，加上官倒猖狂，貪污腐敗，物價提升只爲官倒集團積聚奇帶來更大的利潤，生產者及企業經營者並未能從中得到好處。更由於物資、能源缺乏，生產力未能相應提升，通脹肆虐。

中共以李鵬、姚依林爲首的保守派（總後台是陳雲、彭真），有意以行政手段，即以票證制度控制物價；曾經說要「硬闖物價關」的鄧小平失去豪氣，亦傾向於保守的觀點，反而遷怒於改革派。

積極推動經改、政改的趙紫陽一派被迫承認錯誤，但並不甘心就此失勢。而這一次學生上街遊行、悼念胡耀邦、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以及五月十三日開始的三千多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事件，可能被趙派覺得可以利用來形成一股推動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學生運動發起之後，趙留下一「冷

靜、理智、克制」等處理原則，便離開北京去北韓訪問。大概在趙紫陽的心目中，李鵬一定處理不了學運；而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將學運定性爲「動亂」之後，四月二十七日學生照樣大遊行而未遭軍警強行阻擋，便是趙紫陽下指示的結果。

在絕食事件發生之後，中共高層遲遲不表態，只是由李鵬的親信袁木等發言，因而矛盾激化。後又因爲蘇共領袖戈爾巴卓夫訪華，領導階層忙於準備，暫置絕食事件於不顧。

趙紫陽在五月十六日下午會見戈爾巴卓夫，有關鄧小平是「舵手」的一番話，不管動機如何，客觀的效果是引起了民衆遊行將矛頭指向鄧小平。閻明復（統戰部長）晤見學生與李鵬在人民大會堂對學生的訓話，都未能使學生停止絕食。直到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對學生作情詞懇切的談話，學生們才在幾小時後決定停止絕食，只用靜坐的方式繼續爭取與政府對話。

鄧小平的心路歷程

在這個時刻，局面似已有了緩和，一場動盪可以逐步平息。

但是，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爲轉移。在大學生決定停止絕食之後兩小時，當天晚上，李鵬、楊尚昆召開了「黨政軍幹部萬人大會」，宣佈調集解放軍入北京「平息動亂」，又實行新聞管制、戒嚴。事件的發展，就此急轉直下。

至目前爲止，我們還不完全了解五月十九日星期五發生的事。根據幾個傳說的版本，綜合起來，可以得出以下較爲合邏輯的估計：

第一、胡耀邦逝世之後，在全國人民及

知識份子中間引起的強烈反應，觸到了鄧小平的痛處。鄧在八七年一月罷免了胡，悼胡有反鄧之意。胡的追悼會上，鄧神色凝重，但也有幾分惱怒。

第二、鄧的惱怒，使中共高層對後來發生的學運處理，傾向於「從嚴」；只因趙干預，四月二十七天才沒有發生流血事件。但四、廿六社論符合鄧的意旨，所以高層（包括趙紫陽、李鵬）無人敢糾正它。而且鄧有了指示，趙、李不敢和學生對話。後來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向學生講話，遂令鄧覺得趙「背叛」了他。

第三、趙對戈爾巴卓夫的談話，使民衆矛頭指向鄧，鄧覺得很惱怒。後來發覺北京軍警並未全力對付學生，聯想到趙違背其旨意擅自接見學生，再加上有人唆擺，覺得趙可能和北京軍區的人勾結，聯合起來反對他。爲安全計，鄧離開了北京，據說到了武漢，臨行授權李鵬、楊尚昆開會傳達戒嚴令。

第四、鄧以軍委主席的名義，自山東、湖北、山西及內蒙調兵迫近北京，但目標主要是趙紫陽及其支持者。所以，李鵬、楊尚昆主持的大會，要對付的「一小撮人」是指趙紫陽及其親信，並非學生。

第五、鄧的決定太倉猝，李鵬五月十九日晚的講話和五月十八日會見學生領袖的講話全然不同，這不但令北京百萬市民自發上街攔阻軍車，也令聶榮臻、徐向前這些老帥不安。據報前大將葉飛，更痛斥李鵬。與此同時，鄧在外地發揮影響力，命令各軍區表態，及加緊調兵進入北京外圍，以防趙紫陽「兵諫」。

第六、老帥的講話及軍隊遲遲未入城，使北京傳出「李鵬下台」的消息。民衆支持學生的遊行規模也在二十三、二十四日達到高峯。衛星傳送新聞的禁令一度解除，使人們以爲大局眞的好轉，鄧會在這時「棄車保帥」，把李鵬推上祭壇。

第七、鄧在外圍的努力有了「成果」，七大軍區之中，到五月二十五日早上已有六大軍區表態支持李鵬，而且海、空軍黨委，及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及總後勤部都支持李鵬及「認真學習李鵬講話的精神」。



憤怒的民衆焚燒裝甲運兵車

至此，鄧小平已經控制大局，趙紫陽的反撲（如果有的話），終不免勞而無功。

兵臨城下的北京

資料顯示，這次向北京進軍的解放軍部隊番號甚多，有二十七軍、二十九軍、三十七軍、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六十五軍及六十九軍。不過，有一些軍只是來了一部份人，而這種調動，美國的軍事偵察衛星早就偵察到。

其中，空降的十五軍（原駐地武漢）由大量軍用運輸機運往南苑機場。不少部隊用卡車、坦克、裝甲運兵車經陸路運載，但在進城途中，於距離天安門廣場十五公里至三十公里的地方被市民堵截。

大學生和市民以講理、懇求的方式，向入城解放軍解釋北京發生的事情，說明大學生和示威民衆並非他們要對付的「一小撮」，也不是在搞動亂。學生糾察隊更調來公共

汽車及卡車，攔在通路前面，阻擋軍車前進。

面對着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解放軍只好原地待命。據報有些士兵反映，已經幾天沒有看報紙及聽廣播，只是被領導集中起來學習《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因此，北京民眾普遍認為政府在搞「愚軍政策」。一連幾天，民眾白天輪流監視部隊動向，而晚上則大舉出動，人們認為部隊入城會在午夜至凌晨人們最鬆懈的時刻，要兜截軍隊便要在晚上。

民眾對士兵並沒有明顯的敵意，因為大家認為士兵被蒙蔽，有些部隊根本不知道來京的目的，有些以為是「拉練」，有些以為是救災。民眾向解放軍送水、送食物。

最緊張的是五月二十日及五月二十一日這兩天；不過在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晚上，傳來聶榮臻和徐向前兩位老帥「軍隊不鎮壓學生」的談話，人們才較為放心。

在五月二十二日早晨，一些「直九」型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說有哪些軍區、總部支持李鵬。奇怪的是：這天晚上的中央電視新聞介紹「戒嚴」下的北京城，一切如常，從另一角度反映了一軍隊入城維持秩序」並非需要。

以後又有報導，說一些小規模衝突是由壞人而不是由大學生掀起；受傷者大多是大學生及解放軍戰士云。又有些報導說，在一次軍民衝突中，戰士舉槍喝止武警向大學生動粗。

這些報導似乎是想向大學生說明：軍隊要入城，但目標並不是大學生及民眾，而是「一小撮人」。

黨內好人盡數挨整

「一小撮人」是誰？到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才漸告明朗。

趙紫陽自然是「罪魁禍首」，北京軍區遲至五月二十五日才向李鵬等人表態效忠，軍區負責人免不了要負些責任。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據說也是「反黨集團」成員之一。（難怪他在「萬人大會」的主席台上，神色是那麼頹喪。）趙紫陽親信、國務院副總理

田紀雲，還有鮑彤、溫家寶等都被指為「反黨集團」的成員。

無論如何，趙紫陽一派被整肅是免不了的。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很難不受影響；外資對中國政治局勢的穩定性估計，要再作評價。此外，香港的股市和地產，不免都要大跌了。

但大學生的英勇行為，對自由及民主的追求，已在十一億民眾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京人民而言，前一段時間還是一向錢看，怨氣衝天，動不動便吵架，甚至動粗。但在大學生絕食及「戒嚴」期間，人們卻變得互相關心和體諒。

民眾不滿政府漠視民意及麻木不仁，這種情緒中共高層後期也已察覺，變成要爭取民眾的諒解。所以在「反黨集團」的說法流行以後，北京市面氣氛漸告緩和。

北京市面氣氛緩和了大約一個星期，這期間，雖然仍有遊行和示威行動，但整體而言，自四月底以來一直壓在人們心頭的那份緊張感已漸漸消失，北京學生組織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員，數目也減至只剩數千。就在事件有可能和平解決之時，六月三日，當局突然又召軍隊入城，立刻便引起軍民衝突，與此同時，軍隊即將進佔天安門廣場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北京市。留在北京採訪的外國記者都受到警告，他們被禁止接近天安門廣場，較為敏感的市民知道當權者真的要動手了。

但他們不知道接踵而來的竟是一次血洗天安門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六月四日凌晨，喪心病狂的李（鵬）、楊（尚昆）集團下令坦克和裝甲車駛向天安門廣場，軍隊也以機關鎗朝羣衆掃射。由楊尚昆嫡系部隊二十七軍充任主力的武裝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勢攻佔了天安門廣場。危城之圍已解，代價是萬多學生和市民的傷亡。

北京版「國會縱火案」

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爲了鎮壓反對派，製造了一起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

今年六月，面對北京人民非常守規矩、有秩序的大規模民主運動，鄧、楊、李集團爲達到其血腥鎮壓企圖，更是大量地製造「國會縱火案」。

一九三三年一月，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被任命爲總理。一九三四年八月，德國總統興登堡病逝，希特勒假國會之名被宣佈爲「德國人民領袖和總理」。他則自稱「國家元首兼總理」。但有國會議員不服，希特勒乾脆指使他的「親衛隊」(又被稱爲「黑衫隊」)是希特勒最心腹的特務組織，一把火燒掉國會大廈，然後借「追查」放火者之名大肆逮捕稍有不同意見的國會議員，並趁機解散國會，取消所有反對派政黨，大肆屠殺進步民主人士，進行空前未有的殘酷大整肅，「魏瑪共和國」的議會制度被徹底摧毀，實行法西斯獨裁制，進行高壓統治。這就是德國歷史上有名的「國會縱火案」。

陰謀製造事端嫁禍於對方而達到某種目的，當然不是希特勒的發明，古人早就使用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鬼子也是使用這個方法，即九月十八日晚上十時許，日軍先將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路軌炸毀，然後誣指是中國人破壞的，作爲進兵藉口，繼而向北大營、東大營及瀋陽城進攻。

中共的「四人幫」也曾使用這個方法，如爲了消滅反對勢力，派出便衣特務冒充普通市民或學生，放火燒車輛，放火燒兵營(樓房)，「取證」之後即加罪於「反革命暴徒」，然後就是「鎮壓有理」了。

上述現象，都可稱作「國會縱火案」。

鄧、楊、李反人民集團這次在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中，由於學生十分克制、守規矩，不容易抓到鎮壓學生的把柄，於是便大量製造「國會縱火案」，其手法之多、手段之辣、規模之大，遠勝「四人幫」。下面舉若干事例來說明：

一 塗污毛像

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消息傳出之後，天安門廣場就不斷有大學生在活動，十七日起則有大型的示威活動，幾乎每天都有數萬、數十萬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二十七日在廣場的學生和市民羣衆更達百萬以上。五月十三日起有幾千

名學生在廣場開始絕食，更是引起各界注意，廣場幾乎是日夜人潮不斷。

五月二十日，李鵬發佈戒嚴令，並調動軍隊進城。從此北京市民和學生便分出很大一部份力量去阻攔軍隊入城。鄧、楊、李集團爲製造鎮壓學生的藉口，第一件大事就是製造「塗污毛像案」：五月二十三日午，北京各界都在抗議戒嚴時，有三個人却趁機用化工顏料塗污天安門正中的毛澤東巨幅畫像，但被學生糾察隊捉個正着。天安門正中的毛澤東畫像，象徵着中共的領導權威，象徵着社會主義。膽敢在這心臟地方塗污毛像，是非徹整不可的。

這三個人自稱是「湖南赴京請願團」成員，一位是工人，一位是瀏陽日報記者，一位是教師。他們三人表現出毫不在乎，完全像沒有事一樣。他們不會講湖南話，却是一口京片子。學生糾察隊把他們扭送公安派出所時，他們也仍然很輕鬆——這一切都告訴人們：這三位是北京公安局或安全人員裝扮的。

如果不是給學生捉到，這筆賬肯定記在學生和市民賬上——也即後來所稱的「反革命暴徒」賬上，如果直接給公安局的人捉到，效果也一樣，仍可記在「反革命暴徒」賬上。就可以大肆誣謗學生，提早鎮壓。可惜，這次北京公安局失手了，派出的三個人是笨蛋。如果這三人能機靈逃脫就立了大功。

現在，時間已過去一個月，仍不見北京公安局對這三人的處置。學生被鎮壓下去了，如果北京市民不追究這三人，就可能不了了之過去了。如果北京市民緊追不放，鄧、楊、李集團則必定把這三人拿來犧牲，槍斃或者判以長期徒刑(判徒刑也可以前門進後門出)。

二 軍車熄火 司機被砸死

我們都看到中央電視台播放的、由戒嚴指揮部提供的這節電視片：其他軍車飛速駛過，這輛軍車走得慢，然後停下來。約有二十多人手持

吳天岱

石塊擊碎玻璃，並不斷的把石塊投入駕駛室。電視解說員聲言是「把兩個司機活活打死」。還有一個「暴徒」在車頭站了一會，又走前去往司機室扔石頭，解說員說：「他仍然不解恨……」裏面到底是一個司機或兩個司機？無人看得見。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六月五日所寫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對這事有如下記述：「在長安街上，一輛軍車熄火，一二百暴徒湧而上，亂開鎗，將司機活活打死。」沒有再說是「兩個司機」。

熟悉中共的人立即就可以判斷，這又是一齣導演的戲：第一，軍車隨時都處於備戰狀態(廢棄、待修的例外)，不可能無故「熄火」，何況長安街是平直的大街。第二「暴徒」們個個影像模糊，沒一個是面目清楚的。第三，既然「暴徒」都經過不少車輛，却偏偏不點火燒這輛「熄火」車。似乎對這輛車厚愛了。第四，顯然預先有佈置，所以中共電視錄像機才專門跟蹤這輛車和這「暴徒」。港、澳、台及外國那麼多電視記者却沒有發現這輛車。

結論：這羣砸石頭的「暴徒」(從電視畫面看只有十多個二十個)，也是裝扮的；裏面的司機，可能死了，可能沒死，而是藏在安全的護罩之下。沒有死的可能性大，因真的死了，可拍特寫鏡頭，更有力地控訴「反革命暴行」。

三 大批軍車同時被燒

北京大屠殺過後，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一長串的軍車被燒的鏡頭。這些軍車包括坦克車、裝甲車、吉普車、解放牌大卡車等，共八十多輛，電視播音員解釋說是：六月三日，一羣暴徒在木樨地附近燒燬……

我們從這些鏡頭可以看到：這些被燒的坦克、裝甲車都是五十年代的舊式貨，完全不符合現代戰爭而需要回爐的。今天中共把它們「廢物新用」，既不損失鋼鐵原料，又可提供大批「罪證」。播音員把燒車時間報前一天，以便觀衆有一

個印象：是暴徒太猖狂而使人民軍隊忍無可忍。

其實這是屠殺過後六月四日早晨八時至十時發生的事。當時很多市民和學生看到，這一行有八十七輛軍車的大隊伍，是屬三十八軍的，而且都是空車，只有開車的司機，沒有運載官兵，每輛車上放兩支沒有子彈的衝鋒鎗和步鎗。裝甲車也是空車，有的車上的塔頂活門是故意打開的。他們魚貫駛至一輛用作路障的廢置巴士前停下，車上的司機們便一個個跳下來了，邊脫下軍衣邊跑進軍事博物館去。

在正常情況下，作爲一名軍人，不論棄鎗而逃或棄車而逃都是犯罪，都要執行嚴厲的軍法處分。現在竟是把八十七輛軍車棄掉，沒有上級的命令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也即是說，是鄧李楊集團部署的又一「國會縱火案」。

屠殺過後仍然部署燒車事，是爲了能拍攝到更多的「證據」，以便在事後欺騙大陸人民：看，是「暴徒」燒車在前，他們「被逼」鎮壓在後。當然，不是所有燒毀的軍車都是軍隊有意給市民去燒的，有些市民羣衆的確是因憤恨至極而燒車，但無可懷疑的是有些軍車是有意棄給市民羣衆去燒的，有些還是便裝軍人自己燒的。

被打死的士兵也同樣理由：有些官兵因屠殺平民而被老百姓打死的；有些則是上級的安排，有意讓一些士兵向羣衆挑畔而活活被羣衆打死的；有些則是不願向平民開鎗而被後面的軍官開槍處決而又嫁罪於「暴徒」的。

四 鄧小平爲何要確定軍事鎮壓？

鄧小平做「沒有皇帝街頭的皇帝」十年來，不斷地受到知識界和青年人的挑戰。七九年三月的務虛會議，就是學者向權威的挑戰，當時學者們的發言雖然不是針對他，是指領袖制度不是好制度，但鄧卻覺得是針對他，於是來個「四項基本原則」，同一個時間，青年工人魏京生又向鄧挑戰，這回是直接指鄧小平「你們的行爲是否合法」，並提醒人們「必須警惕鄧小平醜化爲獨裁者」。八三年老鄧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又遭到他自己的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和全國知識界的抵制，只「清」了二十八天就擺旗息鼓，使老鄧十分不舒服。而青年學生則年年在躍躍欲試，八六年底發展爲全國幾十個城市的學運。鄧不惜把胡耀邦拉下馬，並趁機在全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又是遭到全國知識界抵制而夭折。今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猝然逝世，看來全國知識界、大學生都一邊倒地傾向胡耀邦，胡耀邦在人民心目中成了大英雄，把胡拉



下馬的鄧小平等老人黨自然就成了小人。接着掀起比八六年規模還要大得多的學生民主運動。

老鄧面對這樣的新形勢，除了軍事鎮壓而外，完全無能為力，老人黨的致命毛病就是思想僵化，沒有理論，欲與年輕人辯論取勝，是絕對無望的，因此只好求助於權力和武力。既然只有武力一途，而不願意作政治解決，那末，製造武力鎮壓的理由就十分必要了。用什麼方法呢？

首先是擴大矛盾，使矛盾衝突表面化。這是中共解決矛盾的最基本的傳統方法，即毒草讓它出土，才使於鋤掉。而讓毒草出土的方法就是「引蛇出洞」或曰「陽謀」。這次學運才數天，中共就下意識地激化學生和政府的矛盾，如污蔑學生「喊打倒共產黨口號」，並且絕不出來接見學生。《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就是激化矛盾最厲害的武器，公開把學運擺在對立的位置上去，氣得學生「紫紫跳」，於是掀起更大規模的遊行。以後，眼看學潮快平息了，中共又突然放出硬性言論，使矛盾一浪高一浪。知識分子從旁觀，至看不順眼，至支持學運，全都動起來了，部分工人也動起來了，鄧小平認為這時是「收網」的時機了，因為他最頭痛的知識界中的「毒草」都暴露出來了。

矛盾擴大和表面化之後，第二步就是陰謀製造事端。如果單是思想言論就直接用槍桿子去鎮壓，不僅會遭到學世譴責，最重要的是國內老百姓不會同意。於是必須製造一些事端，如破壞公物、放火燒建築物或車輛、打死公安武警或解放軍等等就是最有說服力的「罪證」。

鄧、李、楊陰謀集團大量使用「國會縱火案」的方法，就是要把學生及支持學生的市民打為「反革命暴亂」，便於用槍桿子鎮壓。

與知識分子有刻骨仇恨的王震，去年就嚷着要用武力去抓方勵之。但正常狀態下，談何容易？而一旦造成「反革命暴亂」的假象，就可以實行戒嚴，就可以把一切法律扔在一旁，就可以用槍桿子直接去逮捕平時無法逮捕的人，甚至可以立即處決。

至於犧牲一些士兵生命，中共向來就很捨得。五十年代為了拍攝到藏胞打死解放軍的照片和影片，物色一些愚忠的士兵，或先給他入黨，然後交代他去執行某項任務，如遇藏胞襲擊，打不還手，也不能往後跑，往後跑要槍斃。而「藏胞」一暴徒，或由藏族解放軍扮成藏民，或物色一些真的藏民，挑撥說：那位解放軍打死過藏民，交代給他們的任務就是一定要打死這名解放軍。這名愚忠士兵完全被蒙在鼓裏，被人石塊砸，也不

敢還手，就這樣活活被打死。而中共則把這一過程拍了影片，然後當作是「西藏反動分子殘殺解放軍」而廣泛宣傳，說明鎮壓西藏叛亂分子是不得已的事。

今天，鄧、李、楊集團更心狠手辣，竟大面積使用這一方法，被打死、燒死的官兵中，無疑其中佔相當數量是有意識要他們犧牲掉的。



被塗污的毛像

平鳴月刊 1989/7

北京出現城市游擊隊

·簡評·

預謀

鄧小平指揮下的李鵬、楊尚昆陰謀集團，一手策劃、製造的六月四日天安門27屠殺事件，是有預謀、周密安排，層層佈防然後動手。

早在五月十九日，李鵬頒佈戒嚴令的時候，他們就準備好了兩套方案：一由戒嚴部隊、防暴警察、公安幹警和北京市府組織的首都工人糾察隊，以棍棒、電棒驅趕、打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聚集的羣衆，對天安門實施清場；二、由戒嚴部隊在坦克、軍車掩護下，強行衝入天安門廣場，不惜開槍動武，驅趕、屠殺在場的學生和羣衆。

不料二十日凌晨部隊入城，受到北京市民奮死攔截，迫使部隊無法入城，戒嚴令不能實施。接着黨內有不同意見，軍內出現了抗命部隊。李、楊反革命集團，出師未捷，反而自己陣腳先亂了方寸，迫使戒嚴方案擱置，入城部隊暫時後撤。

五月底，李、楊集團扣留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胡啓立，強迫各省市效忠表態，伺機實行鎮壓方案。

戒嚴未成，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直是李、楊反革命集團的一塊心病，必欲除之而後快。五月卅日，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民主女神」塑像。

六月二日晚，台灣歌星侯德健、北師大青年教師劉曉波等四人開始在天安門絕食。天安門廣場大有再掀高潮之勢。此時，李、楊集團做了六月三日天安門清場完畢，百萬人集會慶祝勝利的部署。他們通知了石景山部分敵礦六月三日上午十時在天安門遊行集會。又通知天安門廣場的外地學生免費乘火車返回原地。

六月二日零時，東線先頭部隊脫掉軍裝上衣和軍帽，十幾人一伙，偷偷摸摸混入市區，在北京飯店樓下開路時，被市民發現，堵截，同時，北京各城門入口，都有市民堵截和焚燒了突襲入城的坦克車、裝甲運兵車和卡車，直至三日上午八時部隊仍無法入城。

六月三日李、楊及中南海政治局委員，已全部撤離中南海，集中到北京西郊的西山戰備指揮部。

火拚

六月三日晚八時，沿天安門、東西長安街的各個路口，都佈置了救護車待命。六月四日零時，這伙凶行善，身行惡的國妖們，撕去了最後的一切偽裝，向人民動手了。

六月四日五時卅分至六時，天安門廣場整打響三十分鐘密集的槍聲，滅絕人性的攻城部隊佔領了天安門廣場。

六、四大屠殺，最賣力、最凶悍，屠殺北京市民最多的是西線部隊——由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之子任軍長的二十七集團軍。

此次屠殺，執行逮捕不願進城殺人的38軍軍長的是27軍。

六月四日一時卅分，27軍攻到天安門廣場，被迫入城的東線部隊，借故市民攔截軍車，遲遲按兵不動，27軍的一輛裝甲運兵車，從天安門廣場橫衝直撞，開到東線建國門主體交叉橋上，當場撞翻滿陽軍區某部的一輛軍車，壓死該集團軍兩名戰士後，調頭衝回天安門廣場（該輛裝甲運兵車在南池子被憤怒的羣衆截獲焚毀）。被壓死的戰士的軍長，在建國門橋上撫屍痛哭。

屠殺之後，北京市民和沒有向羣衆開槍的外圍部隊都對27軍恨之人骨。北京市民憤怒地喊出，要在北京市內滅掉27軍。

為了殺人滅口，李、楊陰謀集團密令要將在天安門廣場執行屠殺任務的27軍幹部戰士殺人滅口。他們的方案，是把27軍調離天安門，再借口把天安門廣場屠殺的部份戰士處死，一是借東、西線外圍部隊對27軍的不滿情緒，挑動軍隊門軍隊中打殺天安門廣場的27軍，以滅口。

六日下午四時，天安門一帶曾有廣播，說當晚要攻打屠殺人民27軍，勸市民晚上不要出

來。不知是李、楊集團借此掩護27軍撤離，還是真有部隊要火拚27軍。但當晚並無發生戰事。

八日，李、楊集團把聲名狼藉的27軍撤離天安門，由20軍接防，現在須密切注視的是27軍的動向。

但是，事難到截稿為止，只是部隊和部隊之間的火拚磨擦，大局仍由李、楊集團控制，尚無發生反叛的內戰，因為如有部隊聯合反叛李、楊集團，戰場應在北京西部的西山，而不是天安門，長安街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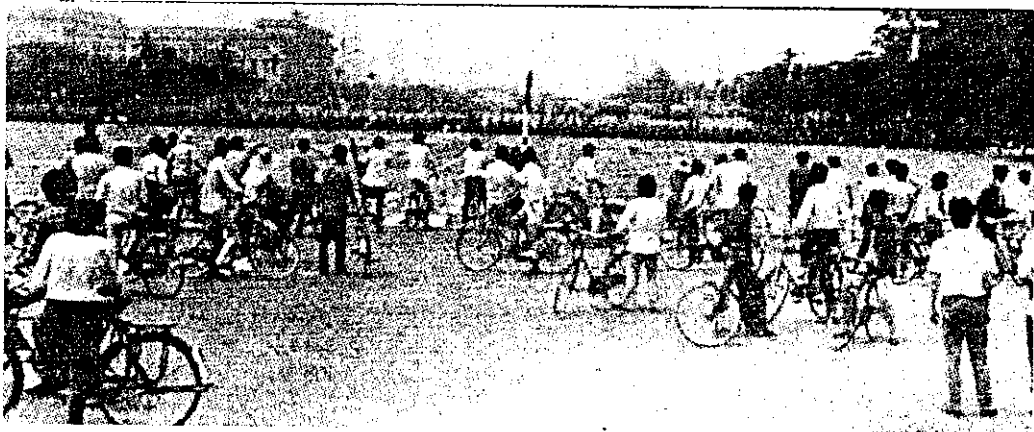
反抗

李、楊陰謀集團動用重兵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的滔天罪行，在北京市民心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火種。屠殺之後不久，在東四大街的一輛做路障的大巴上，出現了一打倒人民公敵鄧小平、楊尚昆！「血債要用血償」的標語，在東直門外的公路上，也出現了橫貫公路的條幅「殺死李鵬、楊尚昆！」

反抗李鵬政府的城市游擊隊已經形成，並正在發展壯大之中，七日部隊調動中，在建國門橋外的外交公寓，發生向調動部隊開槍狙擊，就是城市游擊隊所爲。

目前城市游擊隊的成員，一部分是刑滿釋放或犯有前科的青年人，因爲已宣佈他們是「反革命革命分子」，活著死了都沒有好結果，於是決心拼死反抗，另一部分是屠殺中親屬被害的人們，他們飽含對李、楊腐敗政權的刻骨仇恨，決心拼死一戰。也有一部分是學生、工人和普通市民。他們的武器裝備來源大致是兩種情況，一是在關敵軍車時搶奪的；一是有些抗命的部隊發給、供應的。

這支城市游擊隊正在形成、發展、壯大中。



5.13 學生絕食求對話至中央戒嚴令出期間雙方拉鋸戰表

北京學生將學運推上高峯，以絕食抗議來要求政府為學運正名，得到的回應卻是一直拖延。若仔細觀察雙方每一天的行動部署，就會發覺，表面上黨政要員雖也有回應行動，實際上，這些行動不過是個人的，或敷衍

性的，不解決問題。中共早已存心不答應學生的要求，而且要借這次機會進行內鬥，因此，當後期學生自動「降價」之時，他們也不接受。學運確實被「一小撮」利用了。

日期	學生行動	政府行動及暗中部署
5.1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千人天安門絕食，入夜數千人加入。 ②學生提兩對話條件，自定代表，並准記者現場採訪。 ③北京學生往蘇駐華大使館前遞信，遞戈爾巴喬夫訪問校園，受公安阻攔。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趙紫陽呼籲學生理智切勿妨礙中蘇高峰會。
5.1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三千五學生第二度宿絕食，二十萬人聚集聲援圍觀。 ②答應5.15戈爾巴喬夫到訪時不組織上街遊行。 ③四十名學生代表對話後指對話缺乏誠意。 ④要求直播對話不得，產生爭執，對話中止。 ⑤重申行動目的要求兩點：要求政府速與對話代表團對話，並要求政府速給這次學運正名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凌晨三時，教委主任李鐵映、北京市長陳希同、市委書記兼副市長李錫銘等到場安撫學生，逗留約十分鐘。 ②政府宣佈天安門廣場封鎖。限令學生5.15日凌晨三時撤離廣場戒嚴。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閻明復下午四時十五分與部份學生代表座談對話，希望學生顧全大局，要中央否定4.26「人民日報」社論，目前是不可能的。 ④天安門廣場重播趙紫陽講話，呼籲學生勿礙高峰會。 ⑤李鵬往首都鋼鐵廠與工人對話，聽取對學生遊行看法。
5.1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學生繼續絕食堅持兩項要求。八十萬人集天安門，一百三十多人不支送院。 ②早上六時，部份學生移出廣場西半部，學生糾察隊員搬動停放在廣場東側的自行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早上八時半宣佈天安門廣場戒嚴十二小時，但軍警沒依通知封鎖廣場。 ②下午趙紫陽登人民大會堂城樓，用望遠鏡觀察學生情況。城樓上並架起攝影機，不斷有領導人觀察。
5.1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絕食第四天，不支輩倒學生四百人。十名中央戲劇學院絕食學生，升級行動至「絕水」，另有部份學生登稱不惜自焚。至晚上聚集人潮接近一百萬。 ②學生領袖晝夜北大開會，會後宣佈呼籲各階層人士在天安門進行大示威，號召環市大遊行。 ③絕食學生召開記者會重申學運乃一個愛國民主運動。 ④人羣一度湧進天安門廣場西面人民大會堂圍口，並與該處石梯駐守的公安人員對峙。會堂正進行中蘇高峰會。 ⑤各遊行隊伍標語措辭尖銳，字字直指高層。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早上十時開始封閉一段東長安街。 ②閻明復乘一輛麵包車往天安門廣場，進入絕食學生指揮中心，表示完全理解和同情，強調已將要求轉告中共最高層。他又要求學生回校，並聲明對參與學潮者不予打擊報復，自己願做人質與學生同靜坐。 ③總書記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第一次提出，中共決定重要的問題上仍「離不開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 ④傳聞中央政治局深夜開緊急會議，趙紫陽堅決與學生展開直接對話，投票四比一，他輸了。趙紫陽提出解決絕食狀況五方案，被否定。
5.1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絕食第五天，二千人送院，改變戰略，接力絕食。 ②下午三時，廣播三項要求，肯定學運是民主愛國行動，盡快安排與領導人直接對話，新聞報導要如實反映。 ③計劃下午二時廣場東集合，進行環市大遊行，但有自發隊伍由四面八方湧至，標語有「小平休息，李鵬辭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凌晨二時半，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發表書面談話，肯定學生愛國行動，要求同學停止絕食，保證不會秋後算賬。 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主持上海知識界座談會，談及學潮事件，答允認真思考意見。
5.1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第六天絕食，昏迷送院超過三千人次。北京街頭二百萬人雷雨中遊行。 ②高校聯會要求對話矛頭急轉，要求鄧小平交出決策權。 ③學生天安門廣播播放軍部軍官致中央軍委公開信，進言反對武力鎮壓、槍殺絕食學生、改革軍隊，消除官僚。 吾爾開希電 《人民日報》致意中央，希望不要動手，祇要領導人到廣場講話，學生便撤離。 《人民日報》轉達吾爾開希之意見，但得到的回答是：「太遲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清晨五時，政治局四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和胡啓立親赴北京協和醫院探視入院學生。 ②早上十時，李鵬接見絕食學生十一名代表，李指政府再坐視不理，恐怕會發生比較文化大革命更大的動亂，又指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並責斥新聞界報導煽動更多人參加遊行。 ③國務院下達指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上街遊行。 ④政治局常委會議，趙紫陽被變相罷免。 ⑤人大委員長萬里在加拿大肯定學運愛國。
5.1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下午六時過後，天安門學生一度取消絕食行動改為靜坐，收聽李鵬講話後宣佈再度絕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趙紫陽凌晨四時五十分到天安門，含淚懇勸學生停止絕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②絕食總指揮部作出四項緊急應變措施：一、保護絕食學生。二、呼籲同學保持冷靜、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容忍態度。三、中、小學生馬上離開。三、遇緊急情況即到歷史革命博物館召開中外記者會。 ③數十萬市民和學生湧上街攔截軍車。人羣高叫「解放軍、愛人民」。 ④高校聯發表聲明，外地學生勿進京，工人不要罷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②中央電視台自上午八時三十分，反覆播出趙紫陽的講話。 ③晚上召開中央和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透過中央電視台播送李鵬、和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講話，李鵬指學運為動亂，為小撮人蓄意製造，表示要迅速恢復秩序，指解放軍不得已開部份進駐北京。 ④晚上十時，即有軍隊從外地調進北京。
5.2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早上十時二十分，絕食請願團發出廣播，絕食五天以上同學，即登救護車送醫院。有學生新加入絕食馬拉松。 ②呼籲利用放風箏，放白鴿阻止直升機飛行。 ③廣場靜坐二十萬學生堅守崗位，不要站起來，如有直升機降落要維持和平方式。羣眾與學生互相遞口罩及濕毛巾，以防空投催淚彈。廣播囑咐「打不還手」。 ④天安門水源被截斷，北京市民提供食水。廣播呼籲羣眾帶備手電筒，以備軍機「空降」時廣場燈光會被關掉。 ⑤大批市民及學生躺臥廣場附近地鐵站出口，以阻軍車出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①早上十時十分，天空初次出現直升機盤旋偵察廣場情況，十時四十五分下午三時二十分，天安門上空再度有直升機來回盤旋，五時三十分直升機向廣場散發李鵬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講話單張。 ②超過十一萬抽調自五省市的解放軍部隊，自凌晨分批由北京市的東、西、南三面向天安門開進。 ③凌晨在六里橋有十七輛軍車和五輛大客車，在豐台，有九輛軍用卡車。在西郊紅山口，有一百多輛軍用卡車。在南苑機場，有十六輛軍用卡車和裝甲運兵車。在長辛店，有二十多輛軍用卡車和七十多裝甲運兵車。在五顯松，有二十四輛軍用卡車。在雙井，有二十多輛軍用卡車。

關於北京學潮情況的通報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五一九幹部會上的講話

李錫銘



李錫銘：李楊集團的急先鋒

北京四、五月間爆發的這場學潮，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也最為嚴重的一次學潮。下面，我就這次學潮的過程，它所反映出來的政治鬥爭情況，以及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造成的損失，向到會同志作一簡要的通報。

去年九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方針之後，廣大黨和青年學生對黨中央的決定和採取的各項措施是支持擁護的。整個社會秩序、校園氣氛都是基本穩定的。部份學生對社會上的某些腐敗現象、分配不均和大學分配問題有些意見，也是正常現象。但是，我們也清楚地覺察到，學校內外的確有極少數人在那裡積極活動，試圖借「五四」七十周年、國慶四十周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時機，煽起學潮，挑起事端。

今年三月初在北大、清華等高校相繼發現了一些沒有署名的大小字報，明目張胆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例如，有人寫了所謂「討論撥款」，公開叫嚷要「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基本）原則，「憤起討賊」，把矛頭直指鄧小平同志。另一份題為「為中國人悲哀」的小字報，認為現在的政府是「獨裁專制」，號召大家「為自由而戰」。還有一份題為「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提出了「社會主義

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用甚麼樣的哲學體系去取代馬列主義」的問題。在北大三角地，還貼出來一張所謂「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鼓吹在方勵之領導下為「民主、自由、人權」而戰。在社會上，一些帶有領導政治色彩的「沙龍」也相繼出現，頻繁聚會，十分活躍。方勵之稱這些聚會為「對當局採取完全抵制、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並且預言，「這種會連續開三次就要上街了」。四月十五日，方勵之同志逝世，這些人認為時機已到，決心大鬧一番。

李鵬氣死胡耀邦

應當肯定，廣大黨和青年學生悼念耀邦同志，表達了深切的哀思，感情是十分真摯的。各高校也為學生的正當悼念活動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但是，極少數人乘機大肆煽動，一時間，謠言四起，氣氛極不正常。當時社會上圍繞耀邦同志的死因謠傳很多，最多的是說「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大罵胡耀邦，胡被氣死」，甚至謠傳「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幫手，人員開槍打死的」。許多學生不明真相，憤怒激動，各高等院校大小字報急劇增加。許多大小字報和標語，挑撥等根本不是悼念耀邦同志，而是借悼念之名，惡毒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四月十五日耀邦同志逝世的當天，北京大學就出現一張題為「贊耀邦」並致另一些人的大字報，說中央批評耀邦同志的錯誤是「罵別人淫蕩只因自己陽萎」。清華大學等院校出現「李鵬辭職」、「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等標語。四月十六日，人民大學出現「哭耀邦」的大字報，用漫罵的語句，對小平、紫陽、李鵬、尚昆、萬里、先念、王震等幾位中央領導同志指名道姓地進行了惡毒攻擊。中央民族學院有人貼出標語，說「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却沒死」。四月十七日，中央民族學院貼出題為「快訊」的大字報，聲稱「北六、清華等二十多所在京院校均掀起了反三人（指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的浪

火燒中南海

僅僅兩三天的時間，學潮迅速發展。遊行、集會從校內擴展到校外，聲勢越來越大，政治口號也越來越明確。在極少數人的挑動下，上萬學生走上街頭，到天安門廣場靜坐。四月十八日、十九日深夜，接連發生兩次建國以來所未有的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的事件。衝擊過程中，現場有人呼喊，「打到共產黨」的口號，學校裡有人打出「火燒中南海」的橫額。隨後，就傳出了所謂「四、二十慘案」的謠言，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的前夜，數萬學生佔領了天安門廣場。追悼會當天，又傳出了李鵬同志先同意後拒絕接見學生的謠言，激起了青年同學的強烈不滿。會後，就有人提出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造成了六萬萬萬學生罷課的局面。同時，也開始了「五四大鬧」的串聯活動。

在辦理耀邦同志喪事期間，為了保證悼念活動的正常進行，出於對廣大青年學生的愛護，黨中央、國務院和市委、市政府對學潮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儘管多次發生了傷人衝擊事件，但一直沒有釀成大的事端。

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後，善良的人們認為學潮總該告一段落，可以恢復正常了。恰恰相反，學潮不但沒有平息，反而向着更加激化的方向發展。它的特點，一是學潮出現了向社會擴散的趨勢。四月廿三日，有的大字報提出，「我們不只要罷課，我們要高唱凱歌，以實際行動聯合工友，打倒暴政」。接著，一些人到中學、工廠、商店、農村串聯、散發、張貼傳單，蓄意擴大事態。有的中學出現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標語，有的中學出現了「罷課罷學萬歲」的大字報。許多高校學生上街演講、散傳單，搞募捐，開飛行集會。僅四月廿五日這一天，就有二十二所高校的部份學生搞了一百五十起這類活動，佔全市高校總數的百

這是一場利用我們的失誤，挑起以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治鬥爭。

北京去的學生：天津、河北、安徽、上海等地的學生也到北京去參加遊行。與上述三個方面的活動相配合，學校內煽動性、攻擊性的大小字報也不斷升級。有的發表了「私有制宣言」，號召「讓我們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去迎接共和國的明天」。有的發出了推翻現政權的信號，提出「最近目標則是要讓黨職的李鵬辭職」。

四二六社論

在學潮規模日益擴大，情況日益複雜幾近失控的情況下，政治局常委對形勢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對問題的性質作出了正確的判斷。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揭露了極少數人企圖利用學潮製造動亂的實質。這裡應當強調指出，就大多數參加學潮的學生來說，儘管他們採取的方式是我們不同意的，但他們的愛國熱情和憂國憂民的心是可貴的。在促進民主、深化改革、懲治腐敗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許多是合理的，即使有些過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社論所說的「動亂」，決不是針對大多數學生，而是針對少數趁學潮之機，利用青年學生的激情，利用我們失誤和存在的一些問題，挑起了

一場以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政治鬥爭，並且企圖把這場鬥爭從北京擴大到全國，製造一場全國性的動亂，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的社論儘管被相當多參加學潮的學生所誤解，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揭露問題實質、穩定全國形勢的作用，迫使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憤慨迅速收斂，策略相應改變。與此同時，學潮中提出的口號也迅速降調。四月二十七日有三十八所高中三萬多學生參加（不包括尾隨、圍觀）的遊行中，大量攻擊罵詈的語言驟然消失，打出了「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等標語，提出了「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穩定物價」等要求，得到了街頭羣眾的支持。四月二十九日國務院發言人黃木等同志與學生代表對話，以及國務院部處負責人、北京市委、市政府負責人同所屬院校學生代表對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在「五四」遊行的時候，人數大為減少（只有一萬多人），情緒也不如過去激烈，在天安門廣場宣读了「五四宣言」之後，學潮的組織者便宣佈遊行告一段落，次日復課，轉向同政府對話。

出現兩個中央

當時，多數同學都願意恢復正常秩序，大部分也已復課，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但是，由於盛傳中央領導同志對學潮有兩種認識、兩種評價和兩種處理方式，輿論導向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出現了與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迥然不同的基調，廣大幹部和積極分子感到困惑不解，無所適從。少數唯恐天下不亂的人看到有機可乘，重新活躍起來，時局驟然逆轉，已經回落的學潮又轉向激昂，新的攻擊性大字報就不斷增加，同政府對話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時提出的主要要求：一是徹底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否定極少數人在學潮的掩護下製造動亂的實質，承認這次學潮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二是承認學潮中非法成立的學生自治組織，政府只能同他們選出的學生代表對話，而不能同合法的學生組織的代表對話；三是給「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輯欽本立平反；四是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以後這幾條要求又集中到前兩條，特別是第一條。與此同時，少數人玩弄兩面手法，一方面表示願意與政府對話，一方面又宣傳政府沒有誠意，不能滿足學生的要求。在十三日上午接到中辦、國辦關於準備對話的通知幾小時後，就急急忙忙地拋出早就準備好的「絕食宣言」，把一些

所謂自願絕食的學生推上了第一線。當時，黨和政府盡管做了大量疏導工作，但沒有取得任何效果。

傳媒誤導學潮

五月十三日下午，有二十個院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來到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隨後，絕食的隊伍日益擴大，最多時達到三千多人，圍觀的羣眾極多。截至十九日，累計有三千五百人次的學生因絕食暈倒，被送往醫院急救，其中二千五百多人次留院治療。這樣大規模的絕食活動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大多數羣眾都表示同情。

在學生絕食過程中，黨和政府懷着十分焦急的心情，竭盡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進行思想疏導。張陽、李鵬、喬石、啓立、鐵映、明復同志。和北京市的書記、常委、副市長先後到絕食現場和醫院探望絕食同學，進行了苦口婆心、仁至義盡的勸導。其次是利用紅十字會名義，先後調配了一百多輛救護車，抽調了數百名醫護人員，晝夜守護絕食現場，並動員五十二家醫院近兩千張病床，保證因絕食休克或致病的學生能得到救治和治療。三是提供各種物資，儘可能地減少絕食學生的痛苦和保障他們的安全。市委、市政府抽調幹部、工人和車輛，用紅十字會的名義，晝夜不停地為絕食學生運送飲水，提供食鹽和食糖，環衛局調出了洒水车，配備了臉盆、毛巾、肥皂、牙膏、牙刷、漱口水、消毒藥水、防中暑、防感冒、防腹瀉藥劑，交由紅十字會分發，食品部門運來大量飲料、麵包等，以備緊急搶救學生時用。商業部門調運了六千頂草帽，北京軍區支援了一千條棉被，供絕食學生白天避暑，晚上禦寒，為保持絕食現場的衛生，搭起了各節日使用的臨時沖洗廁所，環衛工人還深夜進行了絕食現場的大清掃。十八日大雨前，又從公共交通公司抽調七十八輛運客車，從物資局調來四百多塊厚木板，供絕食學生遮雨防潮。學校教師和社會各方面也對絕食學生關懷備至。許多老教授、老校長、老書記親自到絕食現場，勸同學停止絕食、接受治療、返回學校，情深意切，聲淚俱下。廣大醫務工作者晝夜辛勞，保證了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全。社會各界還紛紛發出緊急呼籲，建議中央領導同志及時同學生對話，學生也要保持克制，以防事態進一步擴大。所有這些，說明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對絕食學生採取了十分關懷、愛護和負責的態度。

呼喚中國華里沙

但是，這些努力並未使學潮得到緩解。相反，由於輿論的錯誤導向和竭力鼓動，由於極少數人的繼續煽動，由於部分學生的偏激情緒，由於廣大羣眾的不明真象，學潮向更加激化的方向急劇發展。一時間，似乎不參加遊行就是「不愛國」。從十五日開始，上街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從幾萬，十幾萬發展到近百萬，參加遊行的人不僅是大學生，還有工人、農民、機關幹部、民主黨派工作人員，以至中小學生和幼兒園的娃娃，一些司法專政機關的幹警，個別軍事院校的幹部和戰士。外地也有兩萬多人專程趕來北京聲援絕食。這種作法，實際上是把絕食學生逼到一條「死路」上去。而有的新聞輿論不僅不改正錯誤引導，反而連篇累牘地宣傳鼓動，推波助瀾，特別嚴重的是，在如此聲勢浩大、持續不斷的遊行示威中，極少數人更加肆無忌憚，重新提出各種攻擊罵詈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口號，把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鄧小平同志，有的甚至公然要求「鄧小平下台」、「強烈要求小平退黨」、「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反對寡頭統治結束老人政治」，有的橫幅寫着「鄧小平狼心、趙雲陽謀」、「李鵬下台、謝國安民」，還有的橫幅公開呼喚，「中國的瓦文薩（波蘭團結工會領袖沙里沙）你在哪裏」。

所有這些尖銳地說明，現在已經擴大到全社會的這場學潮，絕不是甚麼一般的學潮，而是有人借學潮挑起的一場動亂，是一場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鬥爭。還有，在這次學潮中，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介入，更加說明了這場鬥爭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民聯插手

原非法組織「人權同盟」負責人、曾被勞教過四年的任曉明，從這次學潮一開始就積極插手，多次在天安門廣場和一些高等院校發表演講，他說：「這次學潮，就是借胡耀邦逝世搞起來的」。他攻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四十年是個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的「高壓政治腐敗」，攻擊四項基本原則則是「高懸於人民利益之上的利劍」，污蔑「開放改革和振興民族只不過是掛在牆上的一幅畫餅」，提醒學生「一九八九學潮失敗的原因就是沒有聯合工人」，主張工會「要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成立真正的工會」煽動「學生要聯

這次學潮很有可能發展成爲一場全國性的動亂，把很有希望的中國變成沒有希望的中國。

合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浴血奮戰」。在演講中，他還公然提出共產黨和八大民主黨派都領導不了中國人民，號召成立「自由民主黨」。對任曉明的這些污蔑、攻擊和煽動言論，有的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向全校進行了播放。

被我們宣佈爲非法的「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等人，聯名於四月二十二日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不僅對學潮表示聲援，而且爲學生出謀劃策。他們要求學生注意「黨國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力求以一個堅強的羣體進行有效的活動」，要求學生「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具體要求」，目前「應把徹底否定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爲突破口」，「如果這些要求得不到相應的回應，應繼續堅持抗議活動」，認爲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多次運動『有聲勢無結局』的循環不前局面」。同時，他們還建議學生「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繫」，「加強與社會其它各界的聯繫」，「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的支持和參與」，「要『努力落實校園內的自由』」，「包括在校園內創立獨立刊物」，「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種社團、鞏固校園內的表達自由」。煽動學生「隨時準備採取張貼大字報和遊行等方式」，同我們進行鬥爭。不僅如此，「中國民主聯盟」的兩個頭頭王炳章和湯光中也急急忙忙從紐約飛往東京，企圖闖回北京，直接插手運動。

一些主張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海外華人和知識分子推舉方勵之領銜，於四月十七日從哥倫比亞大學發回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中國是全體人民的中國，絕不是一黨一派的中國」，「現在是人民主動起來表明自己的政治要求的時候了」，「根本的問題在於人民必須擁有對執政黨的選擇權」。

國民黨出面打氣

一搬身居美國的持不同政見的中國人，於今年四月成立了「中國民主黨」，以「臨時執

行委員會」的名義向北京一些大學發出了「告全國同胞書」，說胡耀邦同志是「共產黨專制制度的犧牲品」，煽動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行動起來，「要求保守派的官僚們下台」，「促使中共結束其專制統治」。

國民黨的中常委也於四月廿六日召開了中央常務委員會，討論了大陸學潮的情況，認為「最近大陸學生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已點燃起大陸同胞長期以來對中共暴政憤怒的火苗，我政府與民眾應有更積極、更主動的作法支援他們，使大陸早日民主與自由化」。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和中央社也接連寫文章、發消息，或轉發西方通訊社的報道，給學潮聲援打氣、喝采叫好，說甚麼「經驗證明：不論在此地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都已經失敗」。

美國政府也竭力對我國內政進行干預。四月二十八日，美國白宮發言人菲茨特發表講話，支持中國學生舉行的抗議活動。他說，美國總統布殊「信奉中國正在表示的言論自由的原則和集會的權利」。還說「鑒於中國學生有進行抗議的權利和有表達爭取自由的民主行動的興趣的權利，我們對此持支持態度」。

這次學潮時間之長，聲勢之大，牽動社會面之廣，影響危殆之烈，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四次衝擊新華門，多次佔領天安門廣場，這種情況就是十年內亂時期也沒有過。上千人連續七天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這也是建國來歷次學潮沒有出現過的現象。這次絕食選擇了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時機，嚴重干擾了國家的重大外事活動和損害了國家形象。由絕食引起的連續數天的數十萬、上百萬人遊行，甚至超過了「文革」紅衛兵大串連的時代，使無政府主義重新泛濫，國家的一些法律、法令形同虛置，造成了劇烈的社會震蕩。特別是造謠中傷、惡毒誹謗、人身攻擊、反民主反法制，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影響十分惡劣。

造成社會混亂

這次學潮嚴重破壞了首都正常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市區道路交通阻塞，十七日以來六十多路汽車停駛，繁華地區的公共交通基本上陷於癱瘓。大批職工上班受阻，直接影響生產。市經委系統的四百二十五個大中型重點企業中，已有三十五個處於半停產狀態，有十六個企業已經停產。銀行每天不能按時清算資金，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紊亂。有些加油站告急。液化氣和生活用煤不能及時運送，牛奶不能及時供應，報紙、郵件不能及時投遞，道路清掃、垃圾清運、公廁清掃不能正

常進行，給醫院送氧不及時，已經直接影響羣衆生活。蔬菜每天只能調入二百多萬斤，不敷最低需要量，造成菜價上漲，黃瓜已由五角一斤漲到一元多一斤。肉、醬油、醋等的調撥也受到衝擊和影響。王府井、東安市場、西單、隆福寺等幾個大商場銷量急劇下降。四月二十七日以來已分別下降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三十不等，有的甚至下降一半。社會治安受到破壞，已發生犯罪分子搶銀行的案件。近日常常有人吃飯不付賬，賣東西不付錢，加油不給油票，甚至攔截汽車。一些不法分子聚集華北地區，揚言「非砸不可」，隨時有發生打、砸、搶、燒事件的可能。

尤其嚴重的是，這次學潮不僅破壞了首都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而且也影響和破壞了全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全國近幾天有二十多個大中城市有人上街遊行，少則數千人，多則上萬人。上海、太原等地也發生了絕食請願。所有這些說明，我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這次學潮很有可能發展成爲一場全國性的動亂，造成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形勢，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變成一個混亂不堪的，沒有希望的中國。在這樣重要的關頭，爲了黨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也爲了保護捲入學潮的廣大高校學生，我們決心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採取果斷又審慎的步驟，盡快地把這場學潮平息下去。同時，也要認真懲治腐敗現象，以取信於民。我們要努力做好當前工作，爲維護首都和全國的安定團結，爲推進改革和四個現代化建設大業，竭盡全力。

內部講話

揭露高層鬥爭內幕

來京參加。中央最後才下決心實行戒嚴。

趙紫陽在關鍵時刻把鄧小平拋出來

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我黨究竟以誰為核心領導，誰代表改革、開放。是紫陽同志，還是小平同志？一點大家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十年改革以來主要方針、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總設計師，對世界來講，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國改革、開放的。當然紫陽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執行小平同志的。他的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誤。他在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中，首先講小平同志是我黨最高決策人，說這是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的，我們所有重大問題都是通過他的。這是甚麼意思呢？就是把小平同志拋出來了。結果第二天遊行的口號就是「打倒鄧小平」。如果要維護黨的團結，黨的核心團結，我認為就應當放聲鮮明地維護小平同志。

5月19日大會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決議，實行戒嚴也是常委的決議

再介紹一點情況，我在5月19日召開的在京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機關負責同志大會上的講話，是經過中央批准的。開那個會是常委的決議，實行戒嚴也是常委的決議，如果想到了要維護黨的團結，紫陽同志應該出席那次會議，但是他請病假了。作為總書記，身體不行，不講話，主持一下會議總是可以吧，但他拒絕了；不主持也可以，由別人主持，你參加一下總可以吧，但連這一件事他都不幹了。是誰破壞了黨的團結，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看望學生時他講的話，就是把黨內分歧意見暴露給全國人民。

這場鬥爭確實很複雜，問題就出在黨內。如果不是這樣，不至於鬧到現在這種程度。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從黨內解決，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不行的。

廣角鏡月刊 89/6

1989年5月22日，李鵬、喬石、姚依林、楊尚昆在中共內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介紹了學潮期間，中共領導層內激烈鬥爭情況。李鵬談話要點如下：

絕不能從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立場後退

最近，中央雖然未開過政治局會議，但常委多次研究過，幾乎所有的老同志都參加了研究。總的認為，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是正確的，當前發生的事件是一場動亂，其目的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現在越來越看得清楚了。所以黨內幾位最有威望的老同志，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王震同志和中央常委領導班子的大多數同志都認為，絕不能從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立場後退。當然，那篇社論還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寫得更清楚一些。這是總結經驗的問題，完全可以解釋清楚。但是社論本身沒錯。如果否定了它，就等於失去了整個精神支柱。

從深層原因看，這次事件是長期自由化泛濫結果

從深層的原因看，這次事件是長期自由化泛濫的結果

結果，就是要搞西方的一套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進一步，你退兩步，他進兩步。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國送給他們了。黨內幾位老同志一致意見不能退，但同意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所以，我在5月19日的講話中特別重覆了兩次「極少數、極少數、這樣的人確實存在，有在一線指揮的，二線、三線的也有，相當高明。他們絕不是只搞一個月，二個月，而是作了長期打算的。」

黨內有兩種不同意見

我們不希望黨內分裂，非常願意能夠團結一致。如果是一般性問題，即使在政策上有些不同意見，大家還可以討論達成一致。但是這件事不同。紫陽同志從朝鮮回來後，發表了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這篇講話未經過常委任何一個人，是他自己準備的，調子與4月26日社論完全不同，而且廣為傳播，宣傳聲勢不小。從這以後，大家至少看出一個問題：黨內有兩種不同意見。任何一個有政治經驗的人能看出來，搞動亂的人當然也看出來了。紫陽同志5月3日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事先送給我們看過，我們幾個人提出必須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未採納。5月4日那篇講話後，學潮更不斷升溫，達到一百萬人上街遊行的高潮，外地也有很多人

喬石5月22日內部講話： 不能再退讓了！

不能再退了，軍隊進城是要維持秩序

這次學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開始，一個多月了，事態不斷擴大。這中間我們一直採取忍讓、克制的態度，學生頭頭中提出希望「下一台階」的，只要不喪失原則的都盡可能地做了。所以，維持了一個多月，沒有抓一個人，沒有流血。4月18日學生在大會堂請願，北京市派了三位人大代表把信接下來，他們認為勝利了，說要走了。但又連續兩天衝擊新華門，有些人衝進去了，喊的口號也是很反動的。總之，一步一步，有好多台階可以下，但是始終沒有下來。我早就認為不能再退讓了，但如何了結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找出好的辦法。如果能再退一步解決問題，早就退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不能再退了。現在戒嚴令發布了，我們不想發生衝突，發生流血事件，但軍隊完

全不進城也不行，實際上已經有一些進城了。軍隊進城是要幫助維持秩序，保衛重點部門、要害部門，根本沒說要鎮壓羣眾。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緊張，一個多月沒好好休息了。這種局面如曠日持久，他們會認為你沒法了。

找個適當時機清場

目前，一方面把軍隊作為威懾力量，一方面找個適當時機清場，用一部分警察，動員學校黨政幹部，加上部分家長協助。如果這樣能解決問題，最好這樣。拖下來的原因就是不想動武，避免流血。但拖長了不好。我們力求把問題解決了，又不流血。現在軍隊不撤，問題不大。如果後退，他們就認為勝利了。但軍隊總待在路上不行，要進營房。希望人大、政協都幫助盡量做點工作。

廣角鏡月刊 89/6



參考文件

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

楊尚昆的講話要點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四日（根據記錄整理）

編者按 本文為中央軍委常委副主席楊尚昆在五月廿四日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原題為《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講話要點》，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四日「根據記錄整理」。小題為編者所擬。

這情況還不說是動亂？

軍委決定召開緊急擴大會議，請各大單位主要負責同志參加，主要給同志們說一件事，現在北京局勢處在一個混亂狀態。雖然宣布戒嚴，但實際上有些戒嚴任務沒有執行。有些執行戒嚴任務部隊受阻，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未強行通過。經過工作，現在多數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還更亂，所有軍部的車都不能通行。這樣的情況還不說是動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非平息。

政治局常委兩個司令部

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還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鄧大姐，對這件事非常關心，事情怎麼搞成這樣呢？經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裏頭，但根子是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說法，就是兩個司令部。

是退還是不退？

本來二十六日的社論精神是堅決反對動亂，這是經過常委討論決定的，是小平同志同意的。當時紫陽同志不在北京，在朝鮮，把常委決定和小平同志意見打電報告訴了紫陽同志。他回了電報，是同意，完全擁護的。但是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國，首先就提出來，這個社論的調子太高了，定性是不正確的。這個社論講了反對動亂的問題，指出這場動亂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其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而他認為這是愛國的學生運動，他根本不承認這是動亂，一回就要中央按照他的說法，要宣布這個社論是錯誤的，五個常委中另外一個聲音就出來了。接着他就講了好幾篇話。第一個是五月三日講話，是紀念五四運動的，當時還看不明顯，他長一段講了動亂，說我們中國經不起動亂，這都是好話，但是裏頭有些話，說學生運動還是愛國的。最明顯的是接見亞非理事會的話，這話你們回去好好看一看，講學生是一個愛國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然後就提出我們確實有很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起了，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問題，這個講話根本沒有說二十六日社論是否正確，繞開這個問題。但是動亂他講了。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發言。所以鄧主席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覆，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這是一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出來，學生更起勁了。所以就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

這期間，中央常委多次開會，說調子不能再變了。但是他堅持意見，在小平同志來開會的時候，他也堅持了他的意見，說他想不通，在學生運動性質這個問題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說法和常委其他幾位同志的說法保持一致，因此，他就提出辭職，說他幹不下去了。後來我勸他，這個問題大得很，如果把他性質變了，我們就都垮了。學校廣大的教員、校長、積極的學生統統都要挨個耳光，毫無立足之地，一直在學生中做工作的廣大學生黨員、幹部、校長等都要被打下去。這個時候學生就提出成立他們的新的學聯，反對原來舊的學聯。而且他們自己選舉，北京也出現有些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樣子，如北京大學佔領了學校的廣播台，把學生會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學也出現，好幾個大學都出現了華爾街，甚至破窗而入。現在的問題是把黨內兩個不同聲音完全暴露出來，學生覺得黨中央有一個人支持他們，因此越鬧越厲害，要求開緊急人大常委會，開緊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目的就是要明白地想這些組織作出一條決議，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照他們的說法，學生運動是一個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你們想一想，如果人大常委會作出這麼一個決議，那不是等於把前面那個社論都推翻了，現在他們正在積極搞這個事情，還在發動簽名。面臨這麼一個情況，我們怎麼辦？先念、陳雲同志都從外地趕回北京，要求無論如何要開會，要確定一個方針，究竟怎麼辦。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同志如彭真、王震、鄧大姐還有我們兩位老師，都很關心這個局勢。究竟是退，還是不退？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不退，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我們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方針。

多少年來，幾位八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台，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就是美國杜勒斯所希望的，經過幾代之後我們的社會主義要變成自由主義。陳雲同志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說這就是要把幾十年戰爭所奪得的人民共和國，成千上萬的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果統統毀於一旦，就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北京的同志看得很清楚，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陽同志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人，你們看他講了些甚麼話？稍稍有腦子的人都覺得他講得沒有道理。第一，他說我們來遲了，就哭起來了；第二，說情況很複雜，有很多事情現在解決不了，經過一定的時期終究可以解決，你們還年輕，路長得很，我們老了，無所謂。講了這麼一篇調子很低沉、一片很內疚的話，好像有很多委屈說不出來。北京多數幹部看了他那個講話，都說這個人太不講組織原則了，太沒有紀律了。當天晚上召開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本來安排他要出席的，但一到開會的時候，他突然不去，這樣一個重要會議，總書記不參加，人家馬上就看出問題，原來安排他講話，他不來，等到開會的時候，大家還在等他，這個時候，軍隊就開始向北京開進了，原定是廿一日零時宣布戒嚴的，因為這個形勢不戒嚴不得了，所以就提出二十日戒嚴。那天本來沒有安排我講話，臨時不能不講那段話，因為軍車阻在那裏，不講幾句怎麼行呢？所以我講軍隊是奉命來到北京，是維護治安，決不是對付學生的，你們不信以後可以看看。

趙寫信給鄧說不能幹了

社會上流傳的有那麼幾個研究所散布的材料，他們冒充《人民日報》印號外，講了五個問題，這個東西總政可以印給大家看看。材料說趙紫陽同志提出的這幾個問題，統統被常委否決了，根本沒有那回事，比如其中提出今後要納入民主法制的軌道解決問題，大家都贊成的嘛，準備萬里同志回國後召開人大常委會。近一個月的時間，大家都在作趙的工作，說不能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否定了我們就站不住，他聽不進去。等到小平同志和我們幾位老前輩決定了不能退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平同志，說我不能幹了，我的想法與你們的想法不一樣，我思想上跟不上，我參加常委工作會妨礙常委執行幾位老同志的主意，包括鄧主席在內。但當時他同意，第一，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這是最重要的一句話，退還是不退，總要有個決斷。小平同志同幾位老同志決斷了不能退，所以他表示了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第二，我少數服從多數，小平同志講話是對的，是黨的組織原則。最後他就掉挑子了。

所以我們說，問題的根子在黨內。關於這個問題，小平同志已有兩次講話，一次是說我們出了經濟失調、通貨膨脹、經濟過熱這些現象，這在五年以前就有了的，特別是最近三年比較嚴重，沒有採取預防的措施。另一次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說現在黨內有不同的聲音，就拿起來說，在反對資產

彭真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編者按 五月廿六日，前任人大常委委員長彭真在部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此為講話全文。小題為編者所擬。

今天，我受中央委託，請幾位老戰友、老同志老朋友談一談，通過氣。

不能再「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這次學生遊行的動機是好的、純潔的、善良的、建設性的，目的是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把國家的事務、社會主義事業辦得更好，這同我們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方式，是不妥當的。這不僅是孩子們。一是他們對法律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二是他們缺乏政治經驗，對極少數極少數陰謀家、壞人乘機製造動亂的險惡用心，警惕不夠。我們這些老同志有責任幫助他們，提醒他們。否則就對不起孩子們。

現在思想比較亂，有各式各樣的口號，各式各樣的看法、主張，各式各樣的綱領等等，問題曠日持久得不到解決，思想怎麼統一？我們有憲法和法律，應該也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憲法和法律為準繩來統一思想。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難道苦頭還沒有吃夠嗎？還要讓災難重演嗎？我這樣說，決不是主張懲辦無辜的學生和其他善良的人們，對他們不存在進行制裁的問題。至於對極少數極少數陰謀家、壞人，另當別論。解放軍決不是來對付學生的。

為了統一思想，我講講有關的憲法和法律規定。

一、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也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同領導平分天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不是以別的什麼階級、階層為基礎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不是資產階級專政，更不是地主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行動是違憲的，也是違背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確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統一思想，這是絕無。這一條不解決，思想不可能統一，問題無法解決。黨內的問題也是發生在這裏。

二、最近一個多月來首都是不是發生了動亂？是。看看事實和法律就清楚了。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合法的遊行示威是合法的。但是，還有一條。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刑法第二條、第一百五十條、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了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擾亂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羣眾生活秩序。現在鬧得連國事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連歡迎戈巴卓夫的儀式和接待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鬧得連走路、上下班都成了問題，首都還有什麼秩序？還能說沒有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還不是動亂？我們誰要承認這種行動不是動亂，實際上等於鼓勵全國各地都可以像北京這樣鬧，那還怎麼進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必須把煽動、製造動亂的極少數極少數人，和動機純潔的學生及其他善良的人們嚴格區分開。

戒嚴合不合法？

三、國務院決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合不合法？有人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撤銷國務院宣布的戒嚴令。這裏，有些是對憲法不熟悉或者有意誤解，有的則是別有用心。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的戒嚴。北京市總面積一萬六、七千平方公里，實行戒嚴的地區不過千把平方公里。為了維護憲法的尊嚴，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羣眾生活秩序，國務院決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完全是合法的、必要的、正確的。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七項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請注意，這裏講的是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不是別的。國務院的戒嚴令完全符合憲法和法律，同憲法和法律絲毫沒有抵觸。全國人大常委會怎麼能不支持呢？

四、任何組織和個人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憲法規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中也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也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各政黨，包括共產黨，也包括各民主黨派；個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誰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誰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有人口上講法制，實際上不僅自己踐踏憲法和法律，還煽動別人違反憲法和法律，請學生們和各界羣眾提高警惕。

是不是發生了動亂？

二、最近一個多月來首都是不是發生了動亂？是。看看事實和法律就清楚了。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合法的遊行示威是合法的。但是，還有一條。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刑法第二條、第一百五十條、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了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擾亂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羣眾生活秩序。現在鬧得連國事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連歡迎戈巴卓夫的儀式和接待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鬧得連走路、上下班都成了問題，首都還有什麼秩序？還能說沒有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還不是動亂？我們誰要承認這種行動不是動亂，實際上等於鼓勵全國各地都可以像北京這樣鬧，那還怎麼進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必須把煽動、製造動亂的極少數極少數人，和動機純潔的學生及其他善良的人們嚴格區分開。

戒嚴合不合法？

三、國務院決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合不合法？有人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撤銷國務院宣布的戒嚴令。這裏，有些是對憲法不熟悉或者有意誤解，有的則是別有用心。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的戒嚴。北京市總面積一萬六、七千平方公里，實行戒嚴的地區不過千把平方公里。為了維護憲法的尊嚴，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羣眾生活秩序，國務院決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完全是合法的、必要的、正確的。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七項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請注意，這裏講的是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不是別的。國務院的戒嚴令完全符合憲法和法律，同憲法和法律絲毫沒有抵觸。全國人大常委會怎麼能不支持呢？

四、任何組織和個人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憲法規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中也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也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各政黨，包括共產黨，也包括各民主黨派；個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誰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誰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有人口上講法制，實際上不僅自己踐踏憲法和法律，還煽動別人違反憲法和法律，請學生們和各界羣眾提高警惕。

是不是發生了動亂？

階級自由化和胡耀邦是一致的，如果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工作進行到底，也就不會出現現在這種情況，特別是反對精神污染，只進行了二十天就丟了。這次事件和反對自由化不徹底有關，和不搞反對精神污染有關。所以說，紫陽同志的話與胡耀邦同志不反對自由化性質是一樣的，這就把問題講透了。還有一次，小平同志和外國人談話，說我們十一屆中全會以來十年最大的失誤是對教育重視不夠，接着說對在開放條件下進來的思想，我們沒有進行艱苦工作，沒有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所以他講的是兩面，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精神文明，不是只講教育經費不夠。小平同志思想是一貫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四有」公民。

現在擺在面前的就這麼一個問題，怎麼解決？

今天我想給軍隊各大單位的同志先打個招呼。中央考慮來考慮去，勢必要換領導，因為他不能執行中央的指示，同時另外還有一套。他就是要通過這樣一套立法程序達到他的目的，因為在黨內政治局大多數不同意的意見，常委裏只有他一票。趙紫陽要辭職，傳到外面去了，現在外面就放出空氣，說是七老八十的人，怎麼能解決問題呀？我說這個問題很好回答。這是政治局常委多數作出的決定。這幾位老同志在黨內威望最高，歷史最長，而且對黨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小平同志不用說，先念、陳雲、徐向前、聶帥、鄧大姐、彭真，還有王老都是有大貢獻的，在黨和國家這樣緊急關頭，他們怎麼能不出來說話？他們不能眼睜睜地看着國家處於危亡狀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責任。現在有人散布說沒有甚麼黨，都是一個人決定的，這是非常錯誤的，這件事的處理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多數人作出的正確決定，陳雲、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擁護這一正確決定。戈巴卓夫來華，趙紫陽對戈巴卓夫講小平同志的歷史地位，是完全應該的，但是發表消息時，勢頭就講這個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說所有重大問題都是小平同志決定的。稍有頭腦的同志都覺得這是一篇推卸責任的話，把小平同志擺在前面，說明一切錯都是從他那裏得來的。最近他有這麼一系列的東西，我相信你們都會有些感覺的。

現在全黨必須團結起來，一心一意貫徹四二六社論精神，只有進不能退。今天就是給你們打個招呼，有個精神準備。特別重要的是軍隊無論如何要鞏固。軍隊是不是都思想通呢？這就要靠你們去作工作，我想大軍區一級的同志沒有問題，但軍以下會不會有人有問題呢？現在還有人說，軍委有三個主席，為什麼鄧小平一個人就能調動執行戒嚴令的部隊。這些人根本不懂軍隊，只能欺騙學生，軍隊實行首長負責制，我們這些人只是協助主席工作，起參謀作用。他下決心，不僅找我，還找學習，華清去了，秦部長也去了，他為什麼不能下命令？

我這個消息通報給你們，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一旦有人事變動，免得大家感到突然。紫陽同志做這些工作，老實講，我們給他貼了不少金。這幾年的成績，根本正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政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請大家來，就是要做這幾方面的工作。

一、請你們心中有數：

二、回去開黨委會，跟大家說清楚，軍隊要傳達到團級幹部，團之幹部非常重要；

三、黨委要統一思想，無論如何要統一到中央的思想上來，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令，我要以軍法論處。

四、請你們特別注意院校，院校的幹部、主任、教授，要對學員做好工作。軍隊院校絕不能參加遊行示威和聲援。

五、現在到達預定地點的軍隊，要立即安置好，保證他們休息好。要下去動員，向基層幹部講清楚是什麼回事。

剛才我來的時候，鄧主席給我傳了一個意見，要組織幹部幹事，做學生和市民的工作，向學生和街道（羣衆）講清楚我們是來幹什麼的。今天已是戒嚴第五天了，五天來我們沒有開過一槍，沒打一個人，這一點老百姓是清楚的，我們要有針對性的做好宣傳工作。

還有一些離休的老同志，我們要分頭向他們打招呼，這是非常重要的。離休幹部的工作不做好不行，這些工作儘快去做，開完會以後，看看情勢怎麼樣，幾天以後，你們把大致情況簡單地做過報告，通過你們的工作，是中央決定的精神，能貫徹下去。

一、請你們心中有數：

二、回去開黨委會，跟大家說清楚，軍隊要傳達到團級幹部，團之幹部非常重要；

三、黨委要統一思想，無論如何要統一到中央的思想上來，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令，我要以軍法論處。

二、平暴？屠城？



中央下達了戒嚴令、實施新聞封鎖、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熄了……在一切部署完成後才進行清場。中國政府堅稱不是屠殺，而是合理地平息暴亂。海內外人士瞠目結舌！究竟死了多少人？外界的報道只是歪曲、造謠？只是現代科學的特技產物？解放軍以坦克、機關槍面對羣衆，結果仍是軍隊傷亡慘重？

且看一些北京市民、學生、香港記者等的目擊見証。尤其值得注意、絕大多數文章均在六、七月間已經面世，極近事件發生時間。而今日讀來，仍覺字字血淚。

鎮壓後，中央搜羅了許多學運「黑手」，推諉學運涉及外國勢力，目的在於顛覆中央，故此「平暴」是必須的。另外更舉辦「平暴」展覽，出版官方紀實，褒揚戒嚴部隊，讚譽為共和國衛士。但歷史終歸是由人民寫出來的。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44	大屠殺的台前幕後（羅冰）	爭	特6/89	6/9
45	四段式：當局鎮壓學運的策略（林衛）	九	7/89	64/66
46	獸類們的世界——六四喋血的另一面（許秉克）	九	特6/89	40/43
47	六四國恥（古德明）	明	6/891	122
48	殺機初露——記六月三日西單及新華門事件（林東生）	百	16/6/89	7
49	我是屠城的見証人（鮑艾文）	爭	特6/89	10/12
50	京華惡夢（張結鳳）	百	1/7/89	20/22
52	京華惡夢（張結鳳）	百	16/7/89	30/33
55	從圍城到大屠殺（承嬰）	九	特6/89	12/18
57	浴血天安門（楊天樹）	中	7/89	39/43
60	紀錄事件：佔領天安門（黃碧雲）	博	7/89	4/9
62	血洗北京，舉世震動（鍾草原）	廣	6/89	12/14
63	天安門「六四」事件紀實（曾斌）	鏡	7/89	49/50
64	六四天安門記（光魯）	鏡	7/89	51
64	北京大流血到底死了多少人（左逆）	爭	7/89	10
65	北京屠城記（郭倩）	南	6/89	3/9
68	天安門最黑暗的一天	亞	18/6/89	16/17
69	軍隊鎮壓民運過程紀要	明	7/89	45
70	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告世界同胞書	爭	特6/89	33/34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71	踏着屍體衝出廣場——幸存者的控訴之一（趙汗清）	中	7/89	44/45
72	人羣一個個倒下——幸存者的控訴之二	中	7/89	45
73	柴玲追述天安門屠殺慘況	明	7/89	51/54
74	學生沒有製造動亂，天安門真的血流成河（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會）	百	1/7/89	12
75	大屠殺之後——北京化工學院一大學生接受訪問（吳越、于汶）	百	16/6/89	22/23
76	血的證言（一靜坐學生）	九	16/6/89	36
77	血的見證——北京「新聞快訊社」一發言人關於屠城事件真相之簡報（夏榮）	百	1/7/89	9/12
79	屠城前後——一名北京教師的見證	百	1/7/89	4/6
80	我看到解放軍怎樣殺進北京	百	16/8/89	30/31
81	我親眼看見（目擊學生）	守	7/89	16
82	我一生中最長的四十小時（曹新源）	中	8/89	8/10
84	我在西郊民巷目睹六四慘案（魏安娜）	中	10/89	70/72
86	國內來信——屠城目擊紀實（眞言）	十	9/89	36/37
87	北京來信——被屠殺和恐怖洗劫的北京	十	9/89	37/40
88	一個醫生眼裡的悲慘之夜	中	10/89	73/74
89	一個未完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北京、木地（文川）	明	2/90	48/53
91	屠城中的幾個鏡頭（聞凌）	爭	8/89	16
92	「六、四」訪問目擊者（莫利人）	爭	特6/89	13/14
93	回來的人這樣說（何立）	九	特6/89	48/50
94	我們好好活着回來作證——香港學生的血淚見聞（方禮年）	明	7/89	41/44
97	這一段血淚歷史——謝彩雲談北京見聞（張田）	博	7/89	16/19
99	六四屠城日：眞真假假【節錄】	博	7/89	32/40
100	生路（曾憲冠）	博	7/89	14/15
101	北京人準備犧牲一百萬——血洗北京的我見我思（黃銳）	解	6/89	12/15
103	六·四中德通話——北京血腥屠殺的歷史見證（無萍）	爭	7/89	17/18
104	三人幫比四人幫更反動（李玉）	南	6/89	10/12
106	天安門大屠殺的調查報告	解	7/89	13/16
108	大屠殺之後——記六月四日之所見所聞（林東生）	百	16/6/89	9
109	在北京，那血腥的日子（莫利人）	爭	7/89	19/21
110	「六五」、「六六」北京街頭見聞（光魯）	鏡	7/89	69
111	屠城五日記（毛孟靜）	爭	7/89	15/16
112	血洗京華風雲錄（黎加路）	百	1/7/89	36/39
115	逃出北京城（林東生）	百	1/7/89	34/35
116	成都屠城六日記（李繁譯）	中	11/89	52/55
118	成都人的六四壯烈起義（蔡詠梅）	解	12/89	11/13
120	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中共北京市宣傳部）	明	7/89	54/57
122	陰謀——揭陳希同的「平亂」報告（戈揚）	百	1/8/89	7/8
123	從陳希同「平亂」報告看中共的意識形態危機（黎思）	十	7/89	13
124	鄧小平的六九講話	鏡	7/89	55/57
125	鄧小平要「冷靜地考慮一下！」——從「六九」講話看中國當前政局（劉燕英）	鏡	7/89	52/55
127	誰要對「六四」事件開槍負責（魯人）	鏡	1/90	58/59
128	中共玩弄宣傳之手法（包美玲）	百	1/7/89	13
130	清洗鎮壓遍及全國、平暴展覽自暴其醜（岳南）	百	1/11/89	25/28
132	北京「平暴」宣傳圖文自打嘴巴（阮眸）	百	1/12/89	36/38

大屠殺的台前幕後

北行放話
羅冰

指揮部十天制定屠殺計劃

五個師三裝甲團奉命大鎮壓

當人們從電視的熒光屏上看到以色列軍開槍射殺巴勒斯坦人時，心中會燃起一團人性的怒火。如今，比以色列軍以至日本皇軍更兇殘的軍隊屠殺人民的事情卻出現在北京城，這些軍隊不是外國侵略軍，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是中國史上從未有過的、令人髮指的暴行事件。誰能原諒殺人兇兇？誰能忘記「六·四」這個血淋淋的日子？

中共這次血洗京華，奉命執行鎮壓任務的部隊最初有五個師和三個裝甲團。六月三日深夜向學生開火的計劃是戒嚴部隊指揮部早在十天前提前秘密制定的。為了換取人民鬥志，頭幾天故意有些放鬆，暗地裏却從各地增兵入京。

大屠殺前層層立下「軍令狀」

攻不下天安門廣場將被處死

為了執行向學生開槍的命令，五個師的師首長，包括師長、政委和參謀長，三位一體，向戒嚴部隊司令部立下了軍令狀。所謂軍令狀，就是如果攻不下天安門廣場，不能鎮壓「暴亂」，將受軍法處置。軍法處置的含意，就是槍斃。由於師首長向戒嚴部隊司令部立下了軍令狀，所以部隊官兵層層立了軍令狀，特別是團、營、連三級，分別向上級首長立了軍令狀，軍令狀實際上是迫戰士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開槍，因為如果戰士攻不下天安門廣場，那麼他們自己將有被處死的危險，戰士們還得到軍官的許諾和保證，即事後不會追究戰士的暴行責任，並讓戰士們爭取「火線入黨」等等。

軍官組督戰隊督促士兵殺人

出動少數民族士兵有利控制

執行鎮壓命令的戰士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少數民族的戰士。中共用少數民族戰士鎮壓學生，蘊藏着一個陰謀，就是利用他們由於語言隔閡，無法和學生、市民溝通的條件，一方面使他們難於了解民意和真相，一方面在屠殺後又易於防止暴露實情，這和毀屍滅迹有同等效果。

瘋狂的士兵，殺人殺紅了眼，我看見在木樨地一帶集結的部隊，士兵後面有由軍官組成的督戰隊，粗粗計算一下，大約有五十多名手持衝鋒槍，並配紅袖標和手槍的軍官。在士兵的後面，還看見有幾十名拿樣子軍階很高的軍官，向手握衝鋒槍的官兵們大聲吼叫。

瘋狂軍人亂槍掃射「高幹樓」

十三名高幹親屬子女被打死

位於西郊復興門外木樨地的二十二號樓，是西郊地區有名的高幹樓，在這座樓裏住的全部是副部長級以上的中共高級幹部。例如：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李立三夫人、徐向前元帥的女兒、北京市副市長等。在這次鎮壓學生的血腥中，二十二號樓也被瘋狂的士兵開槍掃射，打死了十三人，李立三的家遭了罪，一下子有六個人死亡，李立三家族有不少人住在北京市的其他地方，為了安全，不少人回到二十二號樓，沒想到，四日清晨天朦朧亮的時候，一隊瘋狂的外地士兵狂呼亂叫，並突然向二十二號樓猛烈掃射。五層以下

的玻璃幾乎全部被打碎，躲在玻璃後面的十三個人，當場被打死，九個人被打傷，其中有六個人是李立三家族的人。原河北省書記林鐵的女兒也被當場打死。軍人的暴行激怒了二十二號樓的全體高幹。住在這個樓的十幾名部長和其他老幹部，準備聯名向國務院和軍委提出抗議。

個別士兵不忍開槍慘遭處決

屍體捆綁電線桿上慘禍學生

慘無人道的戒嚴部隊，瘋狂地屠殺了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但是也有個別戰士，不忍心向學生開槍，結果被後面的軍官當做違抗軍令而當場處決，事後軍官們又把戰士的屍體用鋼絲捆綁在路邊的電線桿上，欺騙其他戰士，說是暴亂的學生殺死了戰士，以激怒士兵，讓他們更瘋狂地去屠殺所謂「暴徒」。當然，羣衆打死軍人的事情也是有的。一個二十七軍軍官，在開槍處決了抗命屠殺羣衆的士兵後，這軍官就被羣衆擊斃，暴屍路旁。

槍擊外交公寓有兩個原因

外國人離京有利掩蓋真相

一些中外合資酒店以及外國外交人員居住之所也受到槍擊，彈痕累累。戒嚴部隊槍擊外交公寓，有兩個原因，一、楊尚昆、李鵬一伙對美國、歐洲共同市場等要求制裁中國政府的聲明和談話非常不滿，楊尚昆曾說：「美國人說要制裁我們，什麼局面也嚇不倒中國共產黨人，嚇不倒我們的軍隊，讓他們滾蛋好了。」二、是希望用槍聲把外國人在非常時期全部趕走，掩蓋他們進一步血腥屠殺愛國學生和市民的罪行。

北京七名記者中彈死傷

電台廣播員李丹傳處死

截至六月四日中午十一時正，北京新聞界已有七名記者中彈死傷，北京晚報記者劉源，腹部受重傷，工人日報一名攝影記者，雙腿被子彈打斷。在六月三日深夜開始的大屠殺，到底死了多少人，現在無法統計。

為了控制新聞發佈，中央電視台播音室，有四名持槍士兵守住，當播音員進入播音室之前，必須在軍人的一份文件上簽字，文件嚴格規定：如播音員不按事先準備好的稿子播音，一切嚴重後果由本人自己負責，將立即遭到逮捕等等。一些播音員說，簽了字，實際上是自己生生死權交給了軍人。

「六四」後在電台報告了在血腥鎮壓下學生死傷枕藉的消息的廣播員，據說是被槍決了。他的名字叫李丹。

李丹，人民的好兒子！人民不會忘記你！

軍隊進駐火葬場親燒屍體

學生重傷未死也被送火化

位於北京西郊八寶山和東郊、南郊、北郊的四個火葬場，從六月二日就接到秘密指令，要求火葬場秘密作好燒屍體的準備，由於火葬場的工人們執行不力，六月四日中午，四個火葬場分別進駐了穿便衣的軍人，火葬場的黨支部書記親自帶領士兵燒屍。

火葬場的情況非常殘忍，有些學生根本沒有死，僅是受了重傷，也被士兵扔上卡車拉到火葬場燒了。北京南郊火葬場老工人出身的黨支部副書記，從載死屍的卡車上救出了四名重傷學生。

據說在火葬場外，也有火化屍體的情況。坦克碾死的學生、市民，不少是現場火化的。這就是為什麼在軍隊「清理」過的地方，還出現一堆堆「火種」而沒有立刻撲滅的緣故。

鄧小平親下令 楊家將等人傳令

鄧說不手軟 不看洋人指手劃腳

這次鎮壓命令是鄧小平親自簽署的。他曾收到外交部等有關方面兩份報告，談及各國及海外華人對北京事件的巨大反應，他歇斯底里地說：「對反革命暴亂分子手軟不得！還問：『誰罵得最兇？』又說：『我們黨從來不看洋人指手劃腳。』」

北京一度流傳：是楊尚昆下令遣兵調將和血腥鎮壓，實際的情況是楊尚昆和軍委三總部遲遲未下命令，楊白冰一起傳令而已。因此，楊尚昆雖然犯下極嚴重罪行，但鎮壓的元兇還是鄧小平。

廿五中央委員抵制四中全會

各省市黨書記分成對立兩派

由於軍隊向學生開槍鎮壓，在中共高層已引起嚴重分歧，目前在北京正在準備參加四中全會的二十五名中央委員，已向政治局準備提出抗議，並提出將拒絕參加四中全會。儘管包括這二十五名中央委員在內的近一百名中央委員表現出不滿情緒，但靠武力支撐的中共政權是不會理睬的。

目前正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已分成強烈對立的兩大派，包括廣東、福建等一些較為發達的沿海省份的省委書記，擔心由於趙紫陽辭職、政局不穩而嚇跑外商，因而表現出對李鵬保守政權的不滿。而內地省份的省委書記們，則堅決支持中央的決策。由於意見不統一，中央正在這個做思想工作、聽匯報，預計四中全會和人大常委會還會推遲召開。

軍委保衛局看管一批前將領

鄧小平厲聲責備楊得志張愛萍

楊得志（前總參謀長）、張愛萍（前國防部長）等發表聲明，呼籲不要出動軍隊鎮壓學生並致電中央軍委之後，鄧小平於六月一日曾嚴厲批評了楊得志等軍中老幹部（中將、上將）助長了反革命分子的氣焰。六月五日楊得志、張愛萍等十七名前高級將領再給鄧小平和軍委楊尚昆及人民日報等寫了一封信，再次表示他們擔心這樣搞下去會使軍隊分裂，使國家陷於崩潰的境地。

據可靠消息說，一批有不滿情緒的老幹部，已被軍委保衛局全部強行集中看管，美其名是爲了安全。

蘇聯趁機拉攏中共大頭頭

暗示爲李楊提供個人保護

蘇聯政府趁美國、西歐、日本紛紛譴責中共暴行之際，拼命拉攏中共。蘇聯政府除了表示理解和同情之外，甚至還暗示答應爲李鵬、楊尚昆等暴君提供個人安全保護。不少高級大官的家屬、子女，除了一些人秘密到了美國、香港，也有不少已經秘密逃過蒙古或其他地區進入了蘇聯。蘇聯在中蘇邊境秘密調動了軍隊。如果楊尚昆、李鵬最終掌握了政權，他們勢必會建立一個親蘇的軍政府，那麼這個局面一定會影響世界的安定和平。

四段式：當局鎮壓學運的策略

林衛

某些人藉學運進行黨內鬥爭，先是把學生定性為「動亂」，再千方百計刺激學生，製造「暴亂」口實。對屠夫來說，殺多少人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樹立「權威」。於是，屠殺之後隨即進行大搜捕。

從北京學運爆發到中共屠城，當局的鎮壓策略可謂「四段式」：第一段是《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第二段是五月十九日李鵬和楊尚昆宣佈調動軍隊鎮壓及其後宣佈的戒嚴；第三段是六月三日夜裏到六月四日凌晨的屠殺；第四段是屠城後的大搜捕。

第一段：定性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後，學生藉悼念胡耀邦逝世而引發對現實的批判，要求政治民主、吏治清明。這個行動一開始就引起黨內特權集團的恐懼。

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為代表，早在二、三月份一些知識份子要求釋放政治犯的時候，他們就將之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甚至「預見」到會有一場「動亂」。其後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的名義向中央作的彙報，即是順着這條「紅線」，而且他們的特工一直在搜集學生運動中的過激言行的證據，把它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

他們將學生運動定性後匯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再由政治局匯報給鄧小平。然後鄧小平作出指示，炮製出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在列舉了一大堆陰謀面後說：「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本來，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大會開完以後，學生已經從天安門撤回學校，以罷課要求中共領導人出來對話。只要中共領導人有誠意出來和學生對話，尋求解決學生所提出來的問題，這次學生運動不難得到疏導而平息。但是中共某些領導人的想法不一樣，他們自以為騎在人民頭上，絕不會容忍學生公開向他們要求對話、要求那。所以他們一定要把學生的「氣焰」壓下去。某些人更想藉此引發一場黨內鬥爭，所以不惜為學生運動加上「黑手」，以便在黨內鬥爭中打擊「黑手」而爬上高位。這就是將和平和理智的學生運動上綱為「一場

嚴重的政治鬥爭」的原因。

在定性以後，當局就千方百計用言論和行動去激怒學生，逼使學生從和平的遊行請願變為「動亂」，以顯示其高明見識。因為社論的肆意污蔑和亂扣帽子，激發了四月二十七日學生大規模的遊行和上百萬羣眾的熱烈支持。也因為這篇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使學生運動不得不以否定社論為焦點。

此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五月三日和四日的講話雖然降低了調子，肯定青年人的探索精神，也認為中國不會發生動亂。但是由於當局不肯否定這篇社論，所以學生繼續開展鬥爭，並且從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由於當局不理不睬，五月十七日北京市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遊行，各階層都參加了。

學生以為絕食會感動中共的當權者，或者會逼使當權者出來「對話」。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反而逼出一個「黨內鬥爭」出來。因為趙紫陽同情學生，主張對話，同意否定四、二六社論；而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在與學生對話的問題上，一直拖泥帶水，更反對否定四、二六社論。不但如此，他們已積極對付趙紫陽，還從外地調軍隊到北京對付學生。於是就有李鵬和楊尚昆的五、一九講話和宣佈北京的戒嚴。

第二段：戒嚴

五月十九日凌晨，在黨內鬥爭失敗了的趙紫陽走到天安門廣場，含着眼淚向絕食的學生說：「我已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來日方長！」這句話其實也向學生說：你們還年輕啊，來日方長，不值得和那些老人硬拼。

趙紫陽的話打動了學生，所以學生經過討論後，當晚已決定退出天安門廣場。但是由於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已決心鎮壓，非得把事情搞成「動亂」不可，所以當天夜裏召開了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在講話中表明是「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而楊尚昆則說：「為了維護首都社會治安，恢復正常秩序，我們不得已，從外地調來了一部份人民解放軍部隊。」

這完全是為了協助首都武警、公安幹警執行任務，絕對不是針對學生的。」

五月二十日凌晨，軍隊就開進北京，市民紛紛上街攔阻。李鵬在五月二十日早上沒有召開任何會議，就以總理名義宣佈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並由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下令，針對外國及港澳記者，實行新聞封鎖，為防止大屠殺真相的洩露而做準備。

也在這一天，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做報告，根據學生運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拋出了經過渲染和無中生有的材料（例如說有人要火燒中南海），大造輿論，為大鎮壓做準備。

楊尚昆在五月二十四日的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透露了調動軍隊等一系列活動是黨內的幾個老人決定的，包括鄧小平、陳雲、楊尚昆、李先念、彭真等。他們的地位，凌駕於中共中央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上。

為了使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和平靜坐演變成「動亂」，當局採用了各種卑鄙的手段。其中包括：

多次散佈軍隊即將進城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謠言，使學生和市民的神經日日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這種緊張狀態助長了某些對立情緒。在神經戰的同時，又放出陳雲、彭真、聶榮臻、徐向前的一些講話，表示軍隊不會對付學生，要愛護學生，使精神緊張的學生處於麻痺狀態。

也是在這個時候，小道消息滿天飛，特別是中央的「白頭文件」，指責趙紫陽及其智囊，借以摧毀一些主張開放改革的知識份子和學生的心理，斷了他們「和平解決」的希望，把學生逼上衝突的絕路。

另一方面，當局除了通過廣播不斷指責學生運動，挑起學生的憤激情緒，使學生在廣場的行動升級。又策動了一系列事件為當局的鎮壓製造口實和影響當事人的心理。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百萬大遊行。在高呼「打倒李鵬」聲中，有人弄污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學生當場抓獲三人。這三個人被送往公安機關後就沒有下文了。

五月三十日前後，當局逮捕了多名民運份子，其中三人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領導人。一千名學生羣眾聚集到公安局門口要求釋放。當局釋放了三名工人領袖，但有關於動亂成了「衝擊公安機關」的口實。

六月一日，學生在天安門捉到一個小偷，交到公安局門。有一個日本記者拍攝小偷的照片，被公安人員毆打，激起學生的不滿。二、三百名學生又擁到公安局門，又形成「衝擊」場面。

六月二日，當局組織北京郊區的一些農民工人、警察遊行，喊出支持李鵬的口號。參加遊行獲得獎金、草帽、雪糕等獎賞。

第三段：屠殺

六月三日凌晨，當局派解放軍徒步衝向廣場。由於事先一部軍車撞死三名路人，引起市民和學生的警惕，他們很快攔住軍人。當然，軍民之間發生了碰撞，於是又被扣上「阻攔軍隊執行戒嚴令」的罪名。當局一再製造這種對立，並用來煽動起軍隊的「殺心」。

六月三日凌晨，又有多部軍車衝向西長安街六路口，被羣眾攔截，車上有一批機關槍、步槍、電棒、匕首和拘人用的頭箍等等，學生將之展出，又被扣上「搶劫武器」之罪。當天下午軍警施放催淚彈，憤怒的羣眾焚燒車輛，於是又多了一條罪名。

在學生和市民「萬罪俱備」，「動亂」成了「暴亂」之後，當天晚上當局開始了血腥大屠殺。但是在屠殺之前，當局為了麻痺學生心理，當天仍由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言人聲稱因為天安門前有人日夜靜坐，所以六月二十日的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難以如期召開云云。這番話製造了當局會容忍學生靜坐到六月二十日的假象，而實際上大批坦克已經候命衝入天安門廣場了。

六月三日夜，中央電視台多次中斷廣播節目，播出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對北京市支持學運的市民和工人強加多種罪名，一片殺氣騰騰。同時，復興門外木樨地一帶，軍警已開始開槍了。裝甲車開進長安大街，橫衝直撞。

六月四日凌晨四時，軍隊開進廣場，侯德健等絕食者代表學生和軍方負責人談判，協議讓學生安全撤走。但軍隊在學生開始撤走時掃射，繼而向後撤的學生追殺，並有坦克車由後轍上，進一步擴大屠城血案。那天上午及其後幾天，軍隊繼續射殺街道旁的人羣或行人，甚至安坐家中也會飛來槍彈。

第四段：搜捕

對屠夫來說，既已見血，殺多少人已無關緊要了，要緊的是樹立「權威」。

大屠殺之後，當局隨即進行大搜捕。大搜捕從六月三日開始，包括搜捕知識份子和學生。一些人在三日午間就失蹤了。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務秘書長郭海峯估計是在六月三日夜裏被捕。

正式搜捕令是六月八日由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即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號三個通告。第九號是「當場強行處置」；第十號是「高自聯」的頭頭和「工自聯」頭頭必須立即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否則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第十號則是「北京將在各城區分設舉報電話，讓市民檢舉、揭發暴亂份子」。

六月十一日，公安機關發佈通告，通緝學生領袖，聲稱他們持有武器，因而可以無須請示而將他們射殺。同時，也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為名，由檢察部門下令通緝進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李淑嫻夫婦。

六月十四日，公安部發佈「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告，其中第七條規定：「人民警察執行職務遇有拒捕、暴亂、襲擊、搶奪槍枝或其他以暴力破壞社會治安、不聽制止的緊急情況，應當依據有關條例、規定使用武器進行自衛和制止犯罪活動。」這樣為擴大殺戮而大開綠燈。

接着北京市當局又宣佈通緝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和三名工人領袖。幾日之內，已有數百人被捕。抓人之後，隨即「從重從快」判決。上海和北京在六月中分別公佈判處三人及八人死刑。可以說，在赤裸裸的屠城之後，屠殺仍在繼續。

據載軍車，罪名是「阻攔軍隊執行戒嚴令」。



獸類們的世界

六四喋血的另一面

許秉克

五月二十日戒嚴失敗後，當局絕沒有認輸。各種準備功夫做完，喘好氣才正式開殺。用不着詛咒某一個人。他們是一夥，他們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最頑固、最無恥、最陰險的一群。

① 牠們冷血而理智

獸類喋血的時刻，牠們的心理，人根本無法理解。有人以為是熱昏地瘋狂。不，牠們冷血而理智，有策有謀，有計劃的瘋狂。細細地殺，慢慢地吮，徹底地咀嚼。嗜血慾得到充分滿足，激起更大的興奮和慾望，煥發出迴光返照的活力，會想出更多、更陰毒的吃人奸計。對付這種獸類，頭腦必需清醒，還要反應迅速、準確，不能有絲毫地掉以輕心。

② 到口的肉一定要吃下去

五月中，張百發（北京市副市長）說：「早該嚴厲制止，這會兒鬧大了，動手也晚了……」大有惋惜坐失良機的慨嘆。

公安部的劉某（中幹部）說得更乾脆：「其實好辦，機槍一嘟嘟，全老實了。這會兒人太多了，再說吧。」當時，我驚愕了。但也暗暗以為他是在說熱昏的胡話。而那麼胸有成竹的模樣，隱隱感到潛在的恐怖。

果然。五月二十日戒嚴失敗後，當局絕沒認輸。到口的肉一定要吃下去。進行了第二套、第三套……第n套方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他在天安門廣場二十四小時瘋狂廣播戒嚴令。——疲勞轟炸法。

牠自放流言：一會兒李鵬下台，一會兒今夜行動。又自己闢謠，抬出兩老帥講話：軍隊不是來鎮壓學生的。——欲擒故縱法。

牠故意派小股軍隊，深入長安街，讓牠們受憤怒羣眾抗議、拉扯。故意用軍車壓人，故意讓羣眾在怒火中燒車。牠們更自己燒車。牠們把不願鎮壓學生的軍人殺掉，棄屍街頭，倒吊起來。——國會縱火法。

③ 殺人的好處說不盡

鮮血浸透天安門廣場。

這麼殺人，有幾大好處：

一、做殺人前動員工作，方便多了。放錄像給洗過腦的戰士看。看完立即開誓師大會，讓勇敢份子寫血書，寫請戰書，寫表忠書……

然後酒管夠，甚至可打什麼藥針。血紅着眼出發。見人就殺。

二、不造如此大的血案，不足置政敵於死地。現在他們還在故意燒軍車、燒坦克，今後才有足夠數字列入反革命暴動罪行錄中。

否則，對方一旦平反，當局必受審判，罪責難逃。真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遊戲。以人血做注碼，押注數目愈大，輸贏才徹底，才解恨。

三、按殺一敵百的比率，殺的愈多威懾力愈大。「要用二十萬人頭，換二十年安定。」——鄧小平是這類數學家。要製造極度白色恐怖，嚇破所有人的胆。故意陳屍街頭，讓人民腿軟臣服，然後再去安撫，給人們服「洗腦安神丸」，建立新的信仰。

四、最早切斷交通、切斷通訊全是牠自己搞的。國民經濟崩潰，不怕不怕。崩潰才好，百姓餓死千萬，便於管理。餓殍滿地時，救世主出現，用刺刀挑着高頭，所有跪下的都有飯吃。

誰叫你給肉吃還罵娘，你要罵娘我放槍。這會兒賞你窩頭，你還得千恩萬謝。軍事共產主義實行供給制。當年八路回來了，真是人民大救星。百姓只配這麼活着。多咱見過牛馬造反？不能把牠們當人。

五、國際制裁求之不得。外國的技術、資金，全帶「民主」、「自由」、「人權」的病毒，都清掃才好，都滾了省心。只有和老大哥攜手，才能使國際影響成為完全正面。將來蘇、中、朝、越、東德又組成陣營。這個國際大家庭，才能保住中國皇族的鐵打江山。好一個神聖聯盟。

今後任何有附加條件的投資全滾蛋。按我的條件簽，來不來活該。根據計算，全部封鎖，我們的經濟沒有任何收益，至少可以支持二十年。當年老毛「深挖洞，廣積糧」，我們使上了。

當然，只夠支持皇族，以及保衛皇族的御林軍。草民死活，請民自理。要活活，乖乖當奴隸，好好生產，好好種地，要找死，容易，只要說「不願做奴隸」，立時免費送你一顆炸彈。

六、外國佬，全滾回去。外交官全是毒



大屠殺後北京街頭景象。

（資料照片）

當年希特勒多笨，戈培爾更蠢，戈林是隻豬。縱火案就殺他幾萬，再發消息不就得了。還蓋透了鬧着上法庭。當了婊子還要同時立牌坊，腳踏雙船做不到。

毛澤東要殺劉鄧、彭羅陸楊，還不想辦了手，以為只要不像斯大林那麼殺，就除了惡名。於是唆使學生拉他們下台，省心又乾淨。左了吧？如今鄧、楊、李……等等全體還鄉團，照樣讓老毛當千古罪人。

李鵬多清楚，不可留後患。先當婊子，就婊子徹底，流氓徹底。殺乾淨之後，斬草除根，犁庭掃院，讓對手永無翻身可能，等騰出手來，再慢慢寫歷史，三條腿蛤蟆難尋，二條腿走狗好找，給根骨頭立時提筆寫春秋。包你紋絲合縫。幫李鵬裁一身「新權威主義」的皇帝新衣。

以刀為筆，以筆為刀。使江山舊貌換新顏，訂出一套新規章。以下安排，可以請波爾布特做新秩序顧問，金日成做繁榮景觀顧問。那時的皇族們多麼安定，多麼團結，多麼省心，多麼愉快。這就叫盛世太平天下。

也許智者早就知道會來這一幕：陳雲會哀嘆：「死了二十萬人，才造好這麼個白骨宮殿。奴隸人心不足蛇吞象，不能開這個口。千里之堤，潰於一穴。給他了肉，他又魚。吃了魚又要吃雞，最後他還要吃活人腦子。得了，給他們來個高頭徹底。」

王震會嘆曰：「給我兩個團，早平下去了。」

鄧大姐、李前主席都要驚嘆：「這麼下去，我們孩兒可怎麼辦？」

鄧舵手後悔了：「真不該開放。十年養一虎，養虎容易擒虎難。前門來客送錢，後門引狼入室。那外匯真是魚餌。」

少年英才李鵬大可向前一步拍胸口：「鄧媽媽，別為我們擔憂。鄧爸爸，也別為後方兄弟着急。眾兄弟！」

「在！」李瑞環、李錫銘、陳希同、江澤民……各路小將必上前抱拳。袁木、袁立本也躍躍欲試。

楊老將軍想必哈哈大笑：「鄧媽媽，我早就看出來這孩子有出息。老鄧啊，授給他把尚方寶劍，掛印拜帥吧。」

鄧媽媽擔心：「這孩子還嫩，還有點弱智，別累糊塗了。」

楊尚昆笑曰：「這孩子個又矮，那不算弱智。天才殺人家，全這個勁兒。有這麼個勁，才能殺人不眨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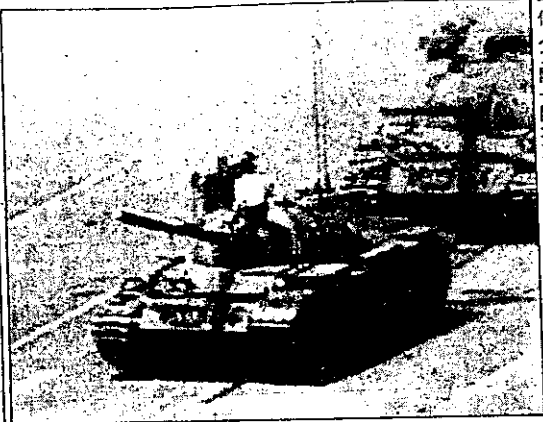
李鵬揮起小白拳頭，嘶叫一句：「鐵腕治亂，肅我的。預備，齊——全體摘面子。」

「哇——」一片喊，紛紛撕下人面，竟全體是猙獰的豺狼。把面子全撕個粉碎，才好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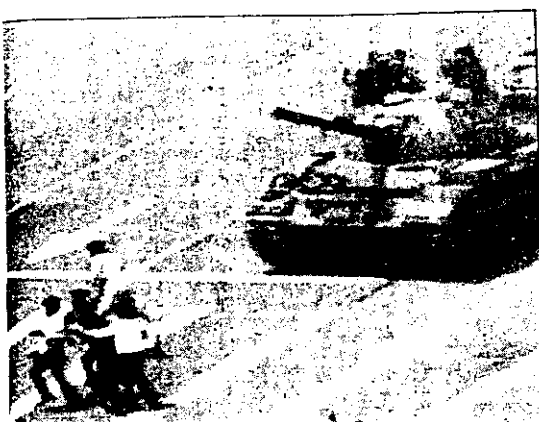
也好，終於從此以真面目示人。本來容易的事，讓面子弄的碍事。吃人得張開血盆口，戴着人面張不開口。聽見大智若愚，撕了面子多麼簡單。

長者心裏明白，這話讓鵬兒說最好，我們只能在私下陰說。將來真有麻煩也簡單，讓鄧媽媽「轅門斬子」吧。送顆人頭平平氣，小事兒。

一個人力阻一隊坦克。



（美聯社）



⑥ 鄧大爺鬆了口氣

鄧大爺這會兒可鬆了口氣，「紅色江山萬年長」有望了。兒女有時天真，信那些奴隸和書蟲子嘴裏。不是多不願圖善名，可那是婦人之仁，哪能保你們的日子。我要一證，你們可怎麼活？尤其我孫子怎麼活？我重孫子、曾孫子怎麼活？都是我心上的肉，……他們可怎麼活？你們還信那套，還說鄰居怎麼說，外邊怎麼說。誰說什麼我都不怕。

一百萬人？少數。全國十幾億人，這連十分之一都不夠。早就該死。按規律辦事，淘汰一批劣種吧。該殺的殺，該餓的餓，勞動太富格了。草棚子不夠睡，窩頭不夠吃，他們就折騰。殺一批奴隸，糧食就夠吃了。很簡單，我看過統計數字。

⑦ 主子眼裏的世界

用不着詛咒某一個人。他們是一夥，整整

一層。包括老、中、青。他們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最頑固、最無恥、最陰險的一羣。羣體的一致，生活在自我臆造的幻象之中。

他們不讀書不看報。看報是貼身秘書從「參考」上摘錄的。「參考」是御用清客們選編的。選得讓主子聽得小悅的消息，或有一點點刺激的。他們得揣摩主子腦子裏的圖像到底是什麼樣，再照方抓藥地編「參考」。國內、國外消息全消滅過濾，再細細篩過，才請主子品嚐。

主子看書太費眼力，由貼身秘書再摘抄。那是廚房裏摘頭去尾剝了皮的菜心，夠嫩的了。秘書從盤裏挑了最小的綠葉，那又是味精、醬油、花椒泡製過的。

老人家一吧嗒嘴：「噫，世界是變化了，菜能長出來這麼個味。不錯，不錯。」

⑧ 整層人彈冠相慶

下流清客有時也危言聳聽。放危言的奴才，有奴才的目的。

五月十七日某智囊團的清客說：「完了完了，大亂了。不可收拾了。和文革一樣了。外地學生已經上火車不要錢了。下面就自然是暴民運動了，立刻發展成白色恐怖了。我出國不行，隱居也不行。我申請幾次參軍了，只有在軍隊裏才安全。我都給中央上書好幾封了……」

主子聽得心亂如麻，想起文革時，一旦喪失權力之後真如喪家之犬。「出了軌的××，卸了職的官。」真嚇得主子分秒不寧。趁刀把子在手，趕緊殺人才有救。你不殺人，人就殺你。

你。快！掌聲如雷。

一刀殺出去了，刀刀全殺出去。

整個一層人彈冠相慶，以人血為賀酒。

清客們也得意思了，跟在坦克後面，收集着將來記實文學或現代史實的資料。那也得蘸着血寫。那的確是不朽之作。

⑨ 斷了動亂之根

當他們穩坐在人大會堂裏，品着小葉茶，不時舉千里眼。眼前是波瀾壯闊的殺人活劇。哪去找這樣的真刀真槍真活真死的超級演出？確是空前絕後。

他們太舒適了，太高興了。

小民得意時罵過娘，那會兒不是狂麼？看我怎麼收拾你們。坦克、機關槍、卡賓槍……

毛澤東在廬山說過什麼都使上了，那是比噱。這會兒我們玩真的。李鵬大可淺笑着說：莫謂言之不預。我仁至義盡，再三警告，你們偏找死，我成全你們。哈哈哈哈。

皇爺們報了受辱之仇，斷了動亂之根，解了心頭之恨，盡了嗜血之興。皆大歡喜。狂喜。樂極。

⑩ 徹底認清獸類的習性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人類永誌不忘的日子。

你們記着吧。

我們也記着。

只記恨一些獸類沒有用。我們先要徹底認清獸類的習性。那時我們會知道該做些什麼。我們不再等待。

六四國耻

古德明

六月三日凌晨三時許，中共派遣逾萬士兵赴天安門廣場，要驅散和平靜坐的學生，但遭十萬市民民衆成人羣把他們攔回去。當日下午，軍隊再赴廣場，民衆再度把他們攔回去。還在軍車上搜到大批步槍、彈藥、刺刀——還有菜刀。配備精良的軍隊當然不會淪落到使用菜刀。但菜刀確實可以做「暴徒斬兵」的證據。可以激起全體軍人對百姓的仇恨。

中南海諸公可謂算無遺策了。

六月四日凌晨，北京中央電視台多次警告市民要「留在家，以保證生命安全」。這就是說，不聽在家的人，生命便難保了。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所以市民還是湧到天安門廣場保

衛學生。中共所謂「極少數極少數的別有用心人士」，竟然堆滿了長安大街。

同時，數萬軍人圍着百多輛坦克、裝甲車向天安門廣場推進。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平民，就在槍聲中倒地；天安門廣場上的營帳和帳內的學生，就在坦克車輪下壓得形體不存。在宣佈戒嚴前夕，李鵬說「愛護廣大的同學」，楊尚昆說調軍入城「不是對付學生」。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愛護」呢？「不對付學生」，軍隊進城做甚麼？我們現在都明白了。

我們明白無窮不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怎麼要趁黑夜出擊，因為他們配不上「光明正大」四個字。

個字。

我們明白中共領導人為什麼要封鎖新聞，因為他們自知所作所為如果給全國人民知道了，全體「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會「起來」。

其實「解放軍」何必把彈藥彈藥向中國百姓？我們早已淚流成海。「解放軍」何必費力搗毀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她已經在我們心中復活。沒有她的支持，百姓怎會以血肉阻軍車？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在日本威逼利誘下接見「二十一條要求」，國人稱為「五九國耻」。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威逼中國人民的不再是外國，却是「中國人民政府」。這是「六四國耻」，而是比「五九國耻」更難堪的恥辱。

孔子說：「國耻，足以興之。」今日國有大耻，但大耻中蘊藏着希望。毀壞毀壞，多難興邦，中華民族過着國耻的日子應該不遲了。



一名女學生被軍隊拉走。

殺

機初露

林東生

記六月三日西單及新華門事件

羣衆包圍軍車

六月三日上午，北京市滿城風雨，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昨夜解嚴軍的輸入北京，使本來已趨沉寂的學運，又再掀起高潮。

我僱了一輛計程車，來到城西的木樨地，遠遠看見橫排了幾輛公車用作路障，車頂站滿人羣，熱鬧非常。我讓司機把車子停在安全地點後，徒步走到木樨地之三環路口，這裡塞滿了人羣，人面上喜氣洋洋，我看見有幾輛旅遊車和麵包車被羣衆包圍，其中一輛車頂上，陳列了一些解放軍的帽子、軍服、鋼盔和自動步槍等。

車頂上的學生用揚聲器向羣衆演說。原來昨夜有部份軍人穿便服，駕駛民用車輛，企圖混入北京城，但被羣衆識穿，終於成了俘虜。圍觀的羣衆越來越多，有人說：「解放軍真丟人！」

再往前走，見一堆人圍成一圈，我鑽進去看，幾個學生用繩子圍了一個長方形，地上寫着：「昨晚（六月二日）十時三十分，一輛麵包車在這種撞倒四個路人，其中一名婦人死亡，車內人被羣衆逮捕轉交警察，他們直認是戒嚴部隊，奉命進城執行任務。」

這時附近路口起了一陣騷動，我連忙跑去觀看，只見一名大學生在車頂上大喊：「讓開！讓開！不准打人！」原來一輛無車牌的麵包車被羣衆包圍，懷疑車內人是軍隊。

羣衆在學生的呼喊下，終於讓路，但車子駛了一段路，仍陷入另一股人羣中，動彈不得。我離開木樨地是上午十一時左右，這裡沒有任何衝突發生。

再乘計程車到西單附近，這裡更加熱鬧，人羣川流不息，自行車及行人多得無法估計。同樣地這裡每隔不遠，就有一輛旅遊車被包圍，這一帶最少有三輛車陷入人海。每輛車頂都陳列了軍用品，其中一輛還有衝鋒槍。不過市民說，那些槍都是沒有子彈的。

軍警施放催淚瓦斯

其中一輛位於新華門西約二百公尺，包圍這車的人特別多，這車部份玻璃窗被砸破，車身上貼了大字報說：「玻璃是軍人自己打爛的，與羣衆無關。」車頂上的學生，不時向羣衆演說，請市民們繼續支持學運，一定要打倒李鵬。羣衆回報以熱烈掌聲。已經許多天未見羣衆這樣熱烈了，我想：如果不是部隊再次

開關，市民是不會再熱起來的，李鵬那小撮人真笨。

這時約中午十二時左右，我在附近吃過午膳後，續向新華門方向走去，來到大門口嚇了一跳，這裡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的圍滿人羣。記得昨天路過這裡，門庭冷落，只有少數學生象徵式的坐在門口；但如今又恢復全盛時期的熱鬧，我很辛苦才鑽進人牆內，難以置信地看見門前展示一大批軍用的衣帽鞋水壺等，亦同時有幾枝步槍展出。我趕忙拍照，這時有人拉着我說：「那邊東西更好，快去拍。」我立即趨前拍攝，原來一名學生把一些士兵證放在地上任人拍照，這時我看見旁邊坐着的軍人，面色非常難看，心中起了一種不祥之預感，學生展示士兵證不過幾分鐘，就把證件收回，我亦迅速退出新華門。

新華門往東十餘公尺，又有兩輛軍車被羣衆包圍，但車上空無一人，我自然又不斷拍攝。就在此時，忽然聽見一聲巨響，人羣紛紛向西單跑，只見西單那邊冒起白煙（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是催淚瓦斯），遠遠西單，但見人羣向新華門這邊跑來；不久又一聲巨響，又是一陣白煙，人羣開始走避；我遠遠看見一條帶盾牌的木棍，頭帶鋼盔的防暴警察將西單與新華門之間的一半隔開。我當時正想趕往西單拍照，誰知就在新華門對面不遠又爆了一陣白煙，我嗅出一股酸酸的空氣，接着圍在新華門大門口的人羣紛紛奪路而逃，後面一大羣武警手持木棍追趕，見人就打；由於距離太近，我亦慌忙逃跑，有些跑得慢或者不甘逃走的市民學生，就要捱棍子。結果不到五分鐘，新華門口的人羣就被驅散，手持木棍的武警，重重的守衛着大門。

吸進瓦斯頭暈四肢酸軟

這時我感到頭暈，四肢酸軟，才知自己吸進的是催淚瓦斯。我仍停留在新華門附近，遠遠的進行拍攝，部份市民向武警投擲石頭，武警亦聞聲衝出來打人。但他們基本上是守在新華門口，不過剛才在那裡展出的軍用品，已被奪回，學生的標語、旗幟等亦蕩然無存。

同一時期，西單那邊不斷傳來施放催淚瓦斯的巨響。而新華門這邊的人羣則與武警對峙，不時發生小衝突，氣氛十分緊張。過了不久，逃走了的人羣陸續回來，又再度包圍武警，剛才被打的部份市民，高喊着要報復，武警亦嚴陣以待，衝突一觸即發，幸好從天安門廣場陸續有學生趕來增援，學生手牽手的把人羣和武警分開，既不讓武警衝出來打人，亦不讓人羣襲擊武警。我見形勢漸穩，才敢走近拍攝，一個市民指着武警

對我說：「那幾個武警剛才打人，快拍！」

這時西單那邊的防暴警察撤退，大量人羣擁向新華門，但始終沒有再和武警衝突。

我走到西單那邊一看究竟，但是其中一輛便衣軍人的車輛，玻璃全打碎，裡面空無一人，車頂上的槍枝、軍服等亦不見了。旁人告訴我，軍人已被救走。防暴警察總共放了十一顆催淚瓦斯，其中兩顆射向新華門，並會施放橡膠子彈，暫時知道一名學生被催淚瓦斯的碎片割傷小腿。

這次防暴警察及武警的突擊行動，約於下午一時三十分發動，歷時約四十分鐘，奪回新華門前之軍用品，救走西單被包圍之軍人。但防暴警察退後，西單至新華門前一帶，基本上仍由學生羣衆控制。

我由於感到非常頭痛，乃趕回旅館休息。黃昏時（約下午七時）我再度來到新華門，武警已換班，學生仍擋着人羣，避免發生磨擦，許多市民對武警說話，有些則送水送煙，但武警均不理不睬。

我走往西單那邊，沿途看見有人演講，說武警下午之行動，打死了一名八歲小孩；又看見有人帶着血衣，拿着鋼盔，訴說遭武警毆打。這時我才知道，原來今午在人民大會堂南側，武警亦同時出擊驅逐人羣，結果與市民發生流血衝突。

但到此刻，亦未聽說有任何實彈槍擊事件。我來到天安門附近，看見一輛巴士載滿了學生巡遊，他們喜氣洋洋，吶喊高呼，市民則報以英雄式之歡迎。學生之氣勢，市民之響應，完全回復到戒嚴前後幾天的盛況。

這時暮色已合，天安門廣場一片和平安祥，市民攜幼扶老，乘涼的、吃冰棍的、唱歌的……誰也沒有想到幾小時後，這裡變成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屠場。



學生將便衣軍人的軍服在車頂展示給羣衆觀看。

我是屠城的見證人

鮑艾文

民主的歷史是血寫的。一切獨裁者，一切硬要一黨專政的帝王將相，都把要求民主、爭取自由的人們看作死敵。因為，沒有奴隸就沒有奴隸主；為了保住奴隸主的權力和利益，就得向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開刀。於是，天安門廣場的水泥板、廣場之外一個個地區的大街，染上了要求做共和國主人的學生和其他羣衆的鮮血。

給殺手上課

「打倒民主！」「獨裁萬歲！」當六月二日數以千計的遊行學生帶着冷笑喊出諷刺統治者的喜劇性口號時，獨裁者已經在磨刀霍霍，大屠殺的行動已經如箭在弦，一觸即發了。

預兆是有的。這個漫畫色彩強烈的遊行所針對的官辦「擁護李鵬」的遊行，就是一個先兆。「擁李」遊行的醜陋演出，是給全國、全世界看的，特別是給入城部隊看的。這是給屠城殺手上的重要的一課。

大屠殺的預兆

這也是預兆：五月三十一日，高級幹部接獲通告，在北京的部隊所有師、軍級以上和其他單位副局長、局一級以上的幹部，包括家人、親屬、朋友，六月一日起兩天之內，不許上街。這是大屠殺的一個信號。

這也是預兆：五月底，大批軍人（不少是軍官），化裝平民入了京城。六月一日開始，北京公安局許多軍裝的、文裝的人員，連一些打字員，一律穿上便衣，混在入羣中，準備用各種方法、手段接應和配合武裝部隊進城。

這也是預兆：六月三日之前，羣衆在和武警的衝突中，拾獲幾百把遺棄的刀，這不是標準的軍刀，而是特製的、用三角鐵磨成的三角尖鏢，這些武器是準備嫁禍羣衆用的。

屠城計劃拖了兩天

全世界都知道北京的「六·四」發生了什麼事情，却不知道六月二日本來應該比六月四日更加令人舉世矚目，因為血腥鎮壓的時間表，原定六月二日軍事攻佔天安門。

當天小湯山溫泉一帶貼出通告，警告市民不得攔截軍隊，否則必受最嚴厲懲罰。但是當天稻香湖、溫泉一帶極可能發生了軍隊與軍隊之間的戰鬥，而羣衆又到處堵住軍隊進入市中心的通道，因而拖延了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計劃。

部隊與部隊間的「砲戰」

當天上午，十一時左右，這個地區傳來未間斷過的砲聲，附近有一石礦

場，往日每天只炸兩次石，但這天的爆炸聲不同，低沉而急促，可聽出是砲彈由砲口射出後又落地爆炸的聲音，爆炸聲一直響了三個鐘頭。相信發生過坦克砲戰，但因山嶺所隔及軍隊戒備，人們未能看到現場情況。

誰向誰開砲？是不是三十八軍和二十七軍之間的「砲戰」？我無法核實，但相信這不會成為千古之謎。

一個奸計被學生識破

六月三日，從六部口到木樨地，軍隊、武警停放了十多部的軍用卡車、軍用巴士等（六部口二輛、西單二輛、民族飯店二輛、軍事博物館一輛、公主墳三輛、木樨地三輛），每一輛車有二十多名士兵，裝滿槍枝彈藥、成箱的手榴彈——故意讓羣衆搶燒。但學生糾察隊包圍了軍車，不讓市民打、罵軍人和燒車。學生們懷疑軍火讓羣衆拿着觀看，是鎮壓者嫁禍羣衆，以便他們武裝鎮壓的奸計。這一天，學生和工人的自治組織宣佈下午二時大遊行，許多人都往天安門跑，長安街上、西單、木樨地、六部口、前門、東直門都是人，超過一百萬。

又是一個苦肉計

當天正午十二時十五分，六部口的軍警開始向羣衆放催淚彈，並毆打羣衆。打傷了十幾人，其中一名六歲的小童被打重傷，下午三時在醫院死去。羣衆亦開始用磚頭還擊，到六時半，五百名左右的防暴警察開始往西北撤退。羣衆向記者展示了V字形的姿勢。

六月三日晚，從工人文化宮故意放出七名剛入伍的小兵，沒有帶武器，只背着裝防毒面罩用的背包。羣衆立即追過去，但被學生全部保護起來，並將他們趕回去了。過不久，又跑出幾名士兵，但又被學生們趕回去。當局想犧牲這些士兵，為屠殺製造藉口。太卑鄙了！

當天晚上，二十七軍在右景山被困了五個小時後，才能開往天安門。

廣場陷在重重包圍中

過不了多久，十一時四十八分，羣衆同防暴警察在民族飯店外衝突，對打了半小時，警察撤退。五分鐘後，電報大樓外開進了坦克和裝甲車，以每小時七公里（比步行稍快）的速度向前推進。每部軍車上有二十名士兵，滿載槍枝彈藥。

這時候，法西斯政權已經把北京城、天安門置於層層槍桿子的槍口之下了。

六月四日凌晨，防暴警察在西單與羣衆衝突，每個防暴警察均帶有深咖啡色塑料做的盾。一名學生抱住一個受傷的警察，用身體護着，要求羣衆「不要打他了」。由於羣衆人數多，五百名防暴警察抵擋不住，開始往北撤，羣衆邊追邊打，有一百人躲在民族飯店裏。

全世界不會忘記這一天

凌晨一時半，軍隊準備包圍天安門廣場，出動十幾輛坦克和裝甲車，幾輛裝甲車、二百七十輛滿載軍人的軍車、汽油車從東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合攏。還從大會堂衝出幾千名軍人，將廣場團團圍住。高音喇叭不斷傳出戒嚴部隊以一切辦法清場，叫在場民衆迅速離開廣場。四點零五分，廣場上的燈熄滅，不久又亮了，軍隊開始向學生和民衆開槍，裝甲車等也開始突擊廣場。甚至，軍隊違反了已答應給半個小時讓學生撤退的承諾，向着正在撤退的學生背脊開槍掃射，裝甲車和坦克也向走避不及的學生和還在帳篷裏熟睡的學生身體壓過來。隨後軍隊就把學生的屍體連同帳篷雜物一起焚化，毀屍滅迹。全世界不會忘記「六·四」這一天。

罪証是掩蓋不了的

天安門廣場大部分用水泥板做成的地面都被坦克壓碎，這些水泥板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建國三十五周年時重鋪的，每塊板上都刻有號碼，以方便檢閱時辨認位置。經過幾年的風雨，這些號碼都模糊了，或風蝕或踩平，據說中共要重新做一批鋪上，以証明坦克沒有開入天安門廣場，但他們決不可能掩蓋罪証。

三十八軍裝甲車中了燃燒彈

六月四日早上六時二十五分，五十輛坦克開過木樨地，其後趕來的三十八軍裝甲車和卡車隊，被羣衆用無軌電車堵住。八時左右，早一點開過去的二十七軍士兵向後面的三十八軍發射燃燒彈，當場燒毀了一批裝甲車，別的軍車上的三十八軍士兵都站在車頂罵「×他媽的」，羣衆都叫三十八軍士兵下車，並向他們說明前面羣衆被二十七軍射殺的情況，士兵紛紛下車，羣衆燒毀一批軍車和裝甲車。被燒的軍用車共約四十二輛。

遠遠望去，兩條煙柱直衝蒼穹。一條煙柱是三十八軍的燃燒彈造成的，另一條是羣衆燒軍車的標誌。我拍下的照片，有點像「戰地沙龍」的樣子。

兩條煙柱 一個答案

這裏有兩個問題：二十七軍為什麼向三十八軍那些部隊開火？三十八軍軍車為什麼讓羣衆燒燬？

誰也不能從現實中尋找到答案，除了推理。按照邏輯求得的答案是：三十八軍某些部隊有同情學生的傾向性，和兇狠的二十七軍（整體而言）有明顯的區別。兩個問題的最後答案是一致的。

根據我的觀察和學生領袖的反映，三十八軍對羣衆的態度一般是不錯的。不少官兵格於禁令，不敢和羣衆多接觸，但也有不少官兵和羣衆敢於偶爾聊一兩句，似乎有點「魚水情」的樣子。他們不像二十七軍那樣懷許多彈藥，每個三十八軍士兵身上只有一個彈盒，裝甲車上的重機槍也只有個彈盒。他們對於羣衆燒車，似乎一點不在乎。說是一「袖手旁觀」，也不為過。

有這樣兇殘的殺人武器

在木樨地，羣衆撿獲一些彈頭，這些彈頭有兩種，一種是達姆彈，可在人體內爆炸，是一種國際上被禁用的子彈。另一種也是世界上已被禁用的子彈，彈頭分成兩部分，中間連接點十分小，打進人體後遇到阻力時可從這個地方斷開。據說被這種子彈打中身體，百分之百要死亡。

正如一些學生說的，法西斯兇手不是人，是野獸！比野獸更野獸的殺人動物！而他們要殺的，是不動武的學生，是沒有武裝的羣衆。

「我們的國家有救了」

當廣場告急，學生們準備平和地挺胸迎接鎮壓者的子彈的時候，他們把決意以牙還牙的敢死隊請離天安門廣場。敢死隊撤去了，什麼抵抗和抵抗力都自動瓦解了，消失了，這難道是「動亂分子」該有的思維和舉動嗎？

在屠夫們還沒有下令二十七軍開槍時，一位在廣場上演說的工人說：「當野戰軍的槍口指向人民的時候，我們的國家有救了。」從現實的窗口望出去，在染着大學生鮮血的土地上，在那飄着野戰軍的硝煙的天際，我彷彿看到一個埋葬法西斯統治者的火海，又彷彿聽到那位工人的聲音。

「我們的國家有救了。」歷史將証明這是偉大的預言。



京華惡夢

張結鳳

①天地不仁 血淚交織

不打倒李鵬中國將走向毀滅

比起成千上萬為咱們苦難的祖國捐軀的人，流幾滴血，實在微不足道。

祇是，太突然了。我沒有準備要流血。
正如他們中的大部份，並沒有想到要流那荒唐、違憲的戒嚴令，竟落得葬身莊嚴的大道上、或廣場邊。誰能料到？縱使鄧楊李集團在宣佈戒嚴後的倒行逆施，已逼使善良和憤於忍氣吞聲的中國人民，以憤怒的吼聲投了他們不信任票；但一直堅持和平請願的首都市民與學生，仍然對所謂「軍隊絕不鎮壓學生、鎮壓人民」的哄語懷着信心，相信「人民軍隊愛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可以感化那鐵般硬的軍心……

正因為這一點虛幻的信念，數十萬民眾於六月三日晚湧上街頭，保衛廣場，捍衛民主。

電視廣播於下午六時半已播出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強硬聲明，表示局勢發展已令當局忍無可忍，一定要不惜以任何代價來平息「動亂」，實施戒嚴，並呼籲北京市民不要在晚上六時半之後上街，否則後果自負。

我沒有聽到這項廣播。當時我正在紀念碑下，等待着廣場指揮部的記者會。這是一個多月以來最熱烈的學生運動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了。六月三日，北京時間下午七時，記者會上三名傷者分別自述他們在三天這一天的受仍的經過；然後廣場指揮部又發出了緊急動員令，宣佈：「不打倒李鵬政府，中國將走向毀滅！」

這是學生們首次喊出如此「反政府」的口號，當晚柴玲和吾爾開希均在場，吾爾開希以低沉沙啞的激動聲音，唱出侯健健為絕食學生而作的半開新歡。我對他說，本刊將刊出一篇他的專訪，刊出後我會寄雜誌給他。他笑得怪怪的，說好，假如他仍在的話。

我心裡忽地打突，預感這是不祥之兆。

如何部署外出採訪

晚上港、台記者都集中在北京飯店，有些已三三兩兩出外。我這時纔知悉戒嚴部隊的「忍無可忍」聲明。其實，綜合各方面得來的消息和迹象，大家都知道這次不是「狼來了」，是真的要動手。真的動手，外出便很危險了，可是採訪是新聞記者的職責，不能因為危險便退縮啊！而且說真的，在京採訪一直獻到此刻，也是存着「看結局」的心理。

如何部署外出採訪的行動？實在是沒有經驗。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人結伴同行，不要落單。我感覺到這氣氛特別凝重，忐忑不安，許久未能判斷，還是先在飯店的露合看下一街上的情況吧。夜幕籠罩長安街，華燈閃耀着昏黃的光，騎着自行車的人潮東、西川流，鋪滿整條寬廣的大街，東至建國門，西到新華門（再遠肉眼便看不到了），擠滿流動的人。人啊！流轉的車帶着昏暗的燈影，令人目眩。明知軍隊今晚就要進城，明知這強權者今晚就要動手，仍然要出來以血肉之軀拼搏的人啊！有着這許多可愛可敬的中國人，為何中華大地依然如斯黑暗？

悲觀眺望暗影頻移，我看得痴了。

傳言滿天飛求證不易

暮地「轟隆」巨響，使我從迷茫中驚起，返回現實。祇見一部裝甲車自西向東，迅速撞倒街上的路障，霸氣十足地向前衝。路上人羣紛紛避讓，裝甲車呼嘯而過東長安街，衝破建國門前的人牆，轉向北行。

竟然出動裝甲車在人羣中衝撞！暴力手段開始顯露了。可是，為何只有一部？是挑釁？是探路？或清除障礙為軍車開路？

這時已是夜間十一時多了，外電不時傳來軍隊開始殺人的消息。可是大夥兒都半信半疑，因為連日來外電報過不少錯誤消息，在極端新聞封鎖下傳言滿天飛，求證不易。

接着又傳來軍隊在前門放催淚瓦斯的消息，我感到呆不下去了，在飯店內根本無法了解形勢，何不走到現場？兩名行家亦有同感，於是三人一起出動。為安全計，身上不帶身份證以外的任何雜物，包括相機，方便奔走，但同時又帶上一條濕毛巾，以防催淚瓦斯。

黑夜的長安街，暗暗的廣場，本是熟悉的，但此際肅殺的氣氛却令人感到這塊大地是那樣的陌生。草叢上滿是人羣，他們說裝甲車兩部從前門方向開出，一部向東一部向西。言談間一名行家「失散」了，祇餘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萊莉亞與我攜手同行。我們商定，不入廣場，祇站在長安街遠眺廣場，因為軍隊一旦進攻，那裡是沒有退路的，倒不如「保持距離」更利於進退。

鮮紅的信號彈不斷從「毛主席紀念堂」發射到空中，帶着陣陣硝煙。我們不曉得這些信號彈的含義。忽地人聲喧嘩，一部裝甲車從東面開過來了！途人有些閃避，有些衝前擊打它，但它不管有人沒人，照樣橫衝直撞。

「狂暴」場面生平未見

接近凌晨一時，裝甲車又一次衝來了。憤怒的民眾向它拋棍棒、石頭。一條黑影影影地飛出，人羣中驚呼四起，它撞了人！我倆驚駭之極，站在路旁不知所措，欲上前察看是否真的撞倒人，又怕路中央太危險。後來還是趨前看了，但黑暗中看不到什麼。

被驚擾的人潮尚未平復，一時十分，裝甲車再一次自東而來，羣衆恨透了它，追着它來擊打。這次它出意外了，衝不過路障，正正天安門城樓前，「死火」了。它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發動引擎，均祇能滑兩兩步，終於再也動彈不得。

羣衆歡呼雷動，蜂湧上前圍住它。幾名青年手持棍棒攀上車頂，用力地抽破車頂蓋。

我生平從未見如此「狂暴」場面，緊張得透不過氣。但更「狂暴」的手段還在後頭：他們撬開車蓋，放火燒車！一下子熊熊烈火在廣場邊冒起來，四周羣衆鼓掌歡呼。想想也難怪，裝甲車如此不顧人民死活向羣衆挑釁，人們焉得不憤恨？

烈火中噴出噓人黑煙，羣衆有些自動散開。天空上的信號彈更多更頻密了，有些是從人民大會堂放出的。我凝望那駭人的火光，心情很沉重，我想到燒裝甲車者一定會被當局打成「暴徒」，這部激怒羣衆的裝甲車，說不定就是誘人「犯罪」的餌……

補充「戰地記者」

街上人潮聚散，不時驚走，來回湧動。火在燒，人在跑，好一幅戰亂圖。這時我們已站到護城河圍欄上，居高遠望，似在等不可測的結局到臨。

一時四十五分，西面傳來連串槍聲。是真槍？放的是子彈？催淚彈？向天開或是向人羣掃射？我無法從槍聲中判斷。我與萊莉亞帶着苦笑自嘲，我們這不及格的「戰地記者」，回港後需得好好補習軍事常識。

這時長安街上到處火光。除了被燒的裝甲車燃燒至爆炸外，遠處地上又有似是燃燒彈造成的火，西長安街以近新華門處，更有烈火逾丈。我們看不到廣場南面，但表面上廣場似乎較為平靜，長安街則已成亂世。我倆面議，不如向西前進，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從那密集的槍聲而言，可知西部有戰事。可是我們跟那天真的羣衆一樣，不敢相信軍隊會將彈藥射進血肉之軀。五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日日夜夜又浮現眼前，熱情的羣衆圍住一排又一排的軍車，勸說他們，感化他們，告訴他們學運的真相……大兵感動了，從那迷惘的眼神、從那軍民相握的手、從那後撤時的歡欣笑臉……

「不會開槍的！」當時士兵的誠懇語音，他們也是那麼真誠地相信上級不會命令開槍啊。

在下卜槍聲中，我們懷着軍隊不會開槍的幻想，在灌木叢的掩護下步向天安門城樓的西面，甫至西側，便無法再前行，前面是疏落的人牆。

我倆攀上華燈的石柱墩旁，眼前的景象令我倒吸涼氣，怪不得無法前行了，就在人民大會堂的北面，數百名士兵持槍或站或立，圍成半圓，蓄勢待發。旁邊的人說，剛剛開槍打死人了。由於地上不見屍體，我仍設法安慰自己：槍是朝天開的吧？

我倆開始想到逃跑。槍口就在眼前，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憤怒的羣衆也沒有對軍隊叫嚷，祇靜靜地互望。環視四周，發覺燈柱底部圍着七、八尺高的圓形石屎牆，形成「井型」窄洞，我們想，一旦有意外發生，跳下去便是了。

羣衆催我們快走

還未構想完畢，忽覺前面人牆已散去，周圍的人已開始奔離現場。西面熊熊烈焰之側，映照出一隊墨綠色的整齊隊伍，迅速朝東推移。

六月四日，凌晨二時零五分。

一隊看不清多龐大的防暴警察，頭戴鋼盔，手持槍枝，向我們步換而來。他們整齊的步伐，一步一步沉沉地踏在我心坎上，來得那麼快，迫得那麼近，萊莉亞和我都慌亂了。想跳下燈柱底的洞，外面却有羣衆向我們招手，催我們快走。



■民衆展示遇害同胞的血衣。

無暇再猶豫了，我倆趕快跳落地面，向東面狂奔。跑回北京飯店去！由對峙轉為進退，任誰都知道這是鎮壓的前奏，而且長安街上人這麼多，他們一定是先「掃平」大街再進攻廣場的，我們雖缺乏軍事常識，也預計到這支防暴警察是真的要清理長安街了。

沒命狂奔，其他人跑得都比我們快，我們變得首當其衝，變得毫無掩護……

幾顆過毛像底下，跑到金水橋，突然間腦袋一黑，劇烈的疼痛使我右腦發昏，我驚叫，我意識到額上中彈了！大滴大滴的鮮血掉在地上，瞬息間我想到生與死。我竟然還能清醒，迅即臥到地上，茉莉亞也跟著我倒下。伏下後我用外套蒙住頭，草地背後又是一陣劇痛，又中一彈！

他們開始發狂地胡亂掃射，我們走得慢，他們距我們已不遠十米。胡亂掃射！生與死，全靠命運之神的眷顧了。我的頭顱發熱，鮮血汨汨直流，背上的疼痛又使我半身發麻，幾乎動彈不得。茉莉亞在旁緊握我的手，告訴我她沒有中槍。我稍感安慰，即使我去了，仍有人曉得此時此刻此情此景……

繼續伏下還是起來奔逃？泉湧的鮮血使我失了方寸。坐以待斃。這好像已不是一句成語，而是應驗到我身上的精確語句。平生痛恨暴力，更懼怕鮮血，我閉上雙眼，高呼：血！血！

羣眾扶住我逃生

很多人向我奔來，幾個年輕人趕緊來扶起我，顯然他們看到我受傷了。他們扶着我奔向廣場，廣場中央有救護站，我知道。可是路途是那麽遠，街上是那麽亂，防暴警察的隊伍又不知打到哪兒？

「背起來吧！」年輕學生怕我走不動。不用。抓住了救命稻草，求生的意志冒起來了，我忘了額上不斷淌下的血，忘了背上刻骨的劇痛，扶著他們的肩膀，拔足狂奔。穿插在雜亂的人羣中，跨過廣場邊的矮圍欄，逃生！逃生！

此時我不知道被打中，也不知道傷勢有多重。想起學生宣誓時的誓詞：「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丟。」假若無法逃生，也可算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而犧牲吧。我開始冷靜下來。這時再無謂畏懼死亡了，但我唯一想的是母親。六十多歲的母親。每天通過長途電話懇求我離開北京的母親。我沒有聽您的話，我對不起您啊！一想到這裡，我又開始慌亂了，我對着茉莉亞大喊：「我祇求你辦一件事，天亮打電話給我姐姐，告訴她我的情況，但請她告訴媽媽，我沒事，我沒空打電話回家……」

茉莉亞連聲說：我一定辦到！

像了却一件事，我安心了，感到很快便到了救護車旁。救護車已擠滿傷者，我是最後能擠進的一個。茉莉亞也勉強塞進來了。救護車一路前行，不斷有人拍打車身，車上的人向外叫嚷：實在擠不下了，不要再阻碍傷者……

一定是傷者無數。我幸運地進了救護車。那些進不了的了？我複雜的思緒難以負荷，再加進「同情」啊！

醫生為我動手術

救護車在喧鬧、顛簸中停下。不知道該怎樣感謝那幾位連模樣也未曾看清的學生，他們領我逃出生命，在車上，蜷曲着身體地抱持着我，護住我的腦袋。由於我最近車門，可以第一個出來，第一個被送進手術室，沒有耽誤時間。

醫生匆匆而來，問我傷了那裡。他沒有時間為我詳細察看，幸好我出奇地清醒，我告訴他額上和背後各中了一下。

「是什麼東西打傷？」



和平的絕食靜坐如何抵擋坦克實彈。

我也沒有看見啊。但此際我很清楚不是真的子彈，因為背上中了一下，沒有流血，額上中了一下，也是明顯擊中的，若讓子彈擊中頭額，肯定不能支持活命到現在。我以有限的器械常識判斷，這是防暴警察配備的橡皮子彈。

醫生為我止血、縫針，一切進行得那樣快，像幾分鐘就完畢。醫生一面自言自語：沒有辦法了，危急時候，手術是粗細些，肯定留下疤痕……

那裡顯應得許多呢？感謝你這快而準的縫針啊。做完手術，我曉得，畢竟活下來了。很快地護士扶我下來，另外的傷者等着上手術台了。手術一完，彷彿我便不再是傷病者，沒有人理會我。幸而茉莉亞一直在身旁，她扶我出手術室，又找到一張長椅讓我躺下。

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

後來知道這是位於東安民巷的北京醫院。它離天安門那樣近，我即使昏昏沉沉地躺下，也能聽到外面密集的槍聲。

血止住了，熱淚却不停地在臉上奔流。沉鬱的槍聲擊在心弦上，雖看不見那血肉橫飛，腦中却浮現出一幅兵荒馬亂的戰難圖。再也不能不信，他們是真的開槍。推人心碎，難眠的黑夜。半夢半醒中，不斷聽到醫生們在說：

「都是些什麼子彈！一沾上人體便爆炸！」

「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啊！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

「沒有人性的劊子手！現在不該救護車進廣場！」還有躺在身後受傷學生，訴說他在紀念碑撤退時，被軍隊打重傷。

又有受傷學生說，清晨前坦克「清理」廣場，壓向仍有學生酣睡的帳篷！坦克碾過民主女神像，神像底下有七名學生，同被碾死。

軍隊驅趕長安街上的羣眾，出動坦克和機關槍。更驚人的噩耗：一名高自聯常委跑到醫院來避難，慟哭不止，他說軍隊在學生撤退時開槍，死傷無數，而且三十八軍因為保護學生，沒有動手，也給從後追殺的二十七軍射殺，屍橫遍地，死人逾萬。掃射完畢後，士兵更起火燃燒廣場，毀滅滅迹……

火燒天安門。我腦海裡空空盪盪，流得太多的淚已枯乾，抽痛得過久的心要麻木，但願這僅是一場惡夢。天地不仁！百姓遭難！已到了火燒天安門這一步了。

火燒圓明園的國恥，遺跡歷歷，永誌不忘。凶殘的鄧楊李集團，完全將京城當作敵國，殺我人民，毀我廣場，竟然還要放一把火來在莊嚴的天安門前示威。

坦克、機關槍、達姆彈、烈火，無一不是不可思議。可是這些醫生、傷者的目擊，又豈會作偽？

沒有作偽。亦不是幻夢。清晨七時，電台廣播的強音，清晰而宣稱：軍隊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

由「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亂」，反正電台早已軍管，你說什麼都可以。

反革命！暴亂！火燒裝甲車那一幕瞬即浮現腦海。火燒裝甲車。火燒天安門。

到處是熊熊烈火。中國啊！你會被無情的火焰吞噬？抑或浴火而再生？

二 倉惶別京 步步驚心

大屠殺在延續

血漬、槍聲，將六月四日凌晨的大屠殺，在光天化日之下延續。

傷者不斷湧入醫院，有被射至身上整排彈孔者，有路上經過被「誤傷」者，總之，人命無價，彈藥無情。

早在黎明之前，我已經聽到護士對醫生說沒有血漿了。我有點慶幸受傷得早，要不是防暴警察一出便中彈，緊跟着防暴警察後面的，是荷槍實彈的解放軍，發射的不是橡皮子彈而是達姆彈。要不是早受了傷，再晚便沒有救護車送入醫院。要不是早進了醫院，施手術時連麻藥也沒有。這樣一想，我這樣縫上幾針的小傷口，確是微不足道的。

實屬不幸中的大幸。後來得悉，六月六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與戒嚴部隊負責人張工見記者，撤了彌天大謊後，各記者均無興趣發問，掉頭就走。祇有人問了一個問題，就是問戒嚴部隊何以不用催淚瓦斯、水炮，而要用真槍實彈？

張工答：我們軍隊是正規部隊，不配備這些裝備。多狡猾的遁詞！但由此可見，我遇上防暴警察而不是軍隊，多麼「幸運」。

後來亦得悉，六月三日晚軍隊分兩路進攻，東面的一路在大北窩被民眾攔住，軍車停下了，士兵棄車而逃。西面的一路則由翠微路、公主墳一直向東橫掃，至木樨地死傷最多，屍橫遍地亦不足形容。當我和茉莉亞好奇地欲往西行之時，西面早已死人無算，軍隊已殺至新華門前，距我們僅咫尺之遙。

後來曾設法探聽，是那部歷史罪人下此凶殘命令？一個說法說，喬石作為指揮，下令軍警三時進迫，五時清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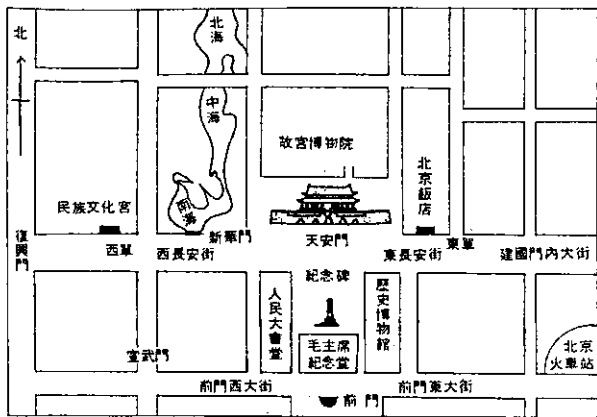
柴玲在劫後餘生的錄音中說，當天晚上李鵬下了三道命令，其一是軍隊可以開槍。

我得到的訊息則是，這一幕屠城醜劇，是楊尚昆一手導演的。

直到六月九日鄧小平與老人黨齊齊亮相，大家恍然大悟，原來總指揮仍是鄧小平。

不管是誰下達具體命令，他們全部都要負責！在螢幕前趾高氣揚，讚揚血腥鎮壓的，全都要負責！

清理天安門是為了平息反革命，難道我也是「反革命」，所以活該受傷？我願以血的見證，指證劊子手的謊言。



■北京天安門前路綫圖。

雨水洗不清血漬

四日下午京城大雨，莫非天若有情？但雨水洗不淨廣場上的血痕，天地變色，血淚斑斑，誰能拂拭？

比起其他人，我僅屬輕傷，惟是這輕傷已令我不能輕易動彈。受傷後，我原想大概得多留數天，最少得待傷口癒合，不怕震盪搬上飛機。

可是六月四日整日不斷的槍聲，使我很快便改變主意。一定要盡快離去！誰知道這會亂成什麼樣子？在北京如何能好好養傷？

問題是，我們根本不敢踏出醫院半步。軍隊射殺路人，掃射民居的消息不斷傳來，我這樣頭繫繃帶的人走到街上，不是令軍隊認為我是「反革命」麼？

我們不斷致電外面求援，無奈槍聲阻斷歸路。北京飯店的行家更傳出軍隊將入記者的房間搜查稿件，更令我兩處憂心忡忡。

平生第一次要為存亡問題而焦慮！顧不上憤慨，顧不上悲傷，禁絕腦際的，就是如何逃出險境。找到一位住在麗都酒店（機場附近）的朋友，代訂機票，不管能否出外，先訂下六月五日的機票再說。我們甚至考慮過，若能找到車直出機場，乾脆不返回北京飯店取行李，隻身離開北京。因為北京醫院與北京飯店是相距極近，可是兩者皆靠近天安門，路程雖短，却是槍林彈雨驚險地，可謂寸步難移。

紙有等待黎明。香港行家說要往英國領事館求助，但我們不樂觀，仍然委託友人代訂機票。結果祇顯示出我們不抱希望是對的。

六月四日就在如此焦慮中渡過。

別矣北京如此殘局

六月五日悄然降臨，睜眼醒來，眼前若有一線曙光，來醫院探病的人陸續出現了，這是四日所不曾出現的景象，於是我想到了，街上可以行走自如了。

經過與北京飯店的行家聯繫，又文匯報駐京記者劉銳紹到醫院來接我回飯店去，因為他比較熟悉路，知道如何避。

走出醫院，看到路上自行車三三兩兩，途人雖不多，總算不是死寂。路上橫亙毀壞車輛、路障，遠處士兵挺立，隨時有危險發生。一步一驚心，橫過長安街，走進北京飯店，仍似經歷了一場大試煉。

險阻重重。能安全返回北京飯店收拾行李是一幸，再要找到車子、找到機票、通過機場海關……經多少朋友的幫助，始能一一克服。

不堪回首，我以疲弱的身軀，奮力闖過一關又一關，當最後登上CA三三〇班機時，不禁熱淚盈眶。北京，別矣北京！我不想離開你，却又不得不盡早離開你。別矣北京！如此殘局，何日得再返京華？

重重設阱 血暴如潮

暴亂猶未生 社論已完稿

和平的學生請願，民衆示威，竟一夕之間由「動亂」而演變為「反革命暴亂」，據鄧小平說，這是不以人民意志為轉移的。

手握軍權無法無天的鄧小平，是不配談「人民」的。不過他這句話倒沒有說錯，「暴亂」，不是人民搞出來的，而是由他這一小撮製造出來的。

六月四日清晨五時許，天安門廣場清場，在此之前，公報放軍報的社論，欲鎮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奇文，早已送到其他報社的編輯部，好讓及時「轉載」。撰寫公報放軍報社論的人是先知，抑或預知計謀，相信不必明言，大家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就好像沒有動亂而偏要強行宣佈戒嚴，為了給自己找到一點理據，於是自己製造動亂：北京市委下令公共汽車停開，為了暗運軍隊進城而令地鐵停駛，油站不供應汽油，派出軍用飛機在大街上亂發傳單。種種技術出齊，北京市還是沒亂，首都民衆的耐性與守紀律，令人佩服。

既然「亂」不起來，又何來「暴」之有？「暴」，也是可以製造的。

血與暴，從六月二日深夜開始。

車禍奪人命 夜半急行軍

六月二日晚，是大批軍隊徒步進城之前夕，前此北京城氣氛平和，最多只有零星的小遊行。當晚十時四十分，一部無車牌軍用吉普車以時速一百二十公里高速，駛經復興門外木樨地，撞倒四名途人。一名送抵醫院前已停止呼吸，另兩名在搶救期間死亡。

這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嗎？羣衆並不這樣看。據目擊者指出，車是屬於戒嚴部隊的，肇禍司機撞人後，仍然大刺刺地說：我們是執行上級命令的！交通警察很快便將這名司機帶走，完全不按一般的處理程序。

所謂實施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早已萬民共憤；如今戒嚴部隊為了「執行命令」，竟罔顧交通規則，飛車撞死人！羣衆已平伏數天的怨氣一下子直衝雲霄。高牆更在血漬斑斑的肇事現場，以粉筆在地上大書：六月三日下午兩點抬棺遊行。

還沒有到發洩怨氣的時刻，短短半天內又發生了連串令民衆血脈憤張的異事。六月三日凌晨，軍隊真的進城了！

為了避免「驚擾」民衆，進城的士兵不坐車，不穿綠色軍裝上衣，跑小步而來，分東西兩路進城。一路從城東北的通縣而來，直入東長安街，直到了北京飯店前被民衆截住，先頭部隊突進至南池子，距天安門廣場僅數步之隔，學生捏一把汗！

血洗京華猶如一夢，何以至此？前此情事，一幕幕常翻湧心頭。

兵士成俘虜 軍械作展品

另一路從西南豐合縣而來，一直逼近到西單。成千上萬的徒步士兵，在凌晨兩、三點，被驚起的市民像堵戰軍一樣攔住，對峙的人潮推推搡搡，軍隊始終無法進入廣場，迫得分批後撤，至早上九時多，完全撤出城外。

緊張的氣氛並未就此消除，大批的軍隊後撤了，却只有少數的士兵被「俘虜」，圍困於大街上。

如此奇景大概是世上罕見的：

光天白日之下，一輛麵包車停在木樨地，復興門外大街與三里河路交界處，市民圍圍圍觀，十字路口交通癱瘓。

交通阻塞已是北京市民月來慣見的事了，可是從未見過「俘虜」士兵、展示軍器。數名學生站在麵包車頂上，高舉車牌，掛起軍帽、匕首、繩套（捕人用）；車內六名不穿軍裝上衣的士兵目無表情。這是一輛偽裝客車的軍車，由於車牌沒了底，英文字母前不帶地名，被羣衆識破，攔住了。那是六月三日凌晨兩時多截住的，是七首與繩套引起羣衆的憤怒？還是因為血腥車禍正在旁邊帶來聯想？圍觀市民對車內士兵很不客氣，頻頻大喊：「出來！出來！」有些人更欲衝前。學生在車的四周拉起繩子阻攔，有學生勸說士兵：出來講幾句話吧，不會對你們怎樣的。士兵仍神態漠然。

就這樣相持不下，士兵像猴子一樣被觀望嘲弄，市民阻攔在大街上起哄。

其實，這一天不僅在木樨地，很多地方均有被圍困的軍車，被「擄獲」的軍用物品，在西單、在六部口，北京市鬧市比往常更「熱鬧」。

到了下午，更鬧得炸開了。



在六部口被軍警打傷的學生的張華潔。

血債誰能償 軍民相浴血

下午兩點，遊行隊伍從復興門出發，為首的北京大學隊伍，打着「償還血債」旗幟，一馬當先；還自通縣趕來的北京服裝學院，則舉起「要贖為你償」、「血肉長城」等標語；中央美術學院的標語是「人血不是水」。跟過去的行進相比，這次遊行顯得格外悲憤，顯示出民衆對執政者的不滿，已上升到新的高度。原來號召的是抬棺遊行，後來沒有抬棺，祇用一部車在車頭結隊，扮作靈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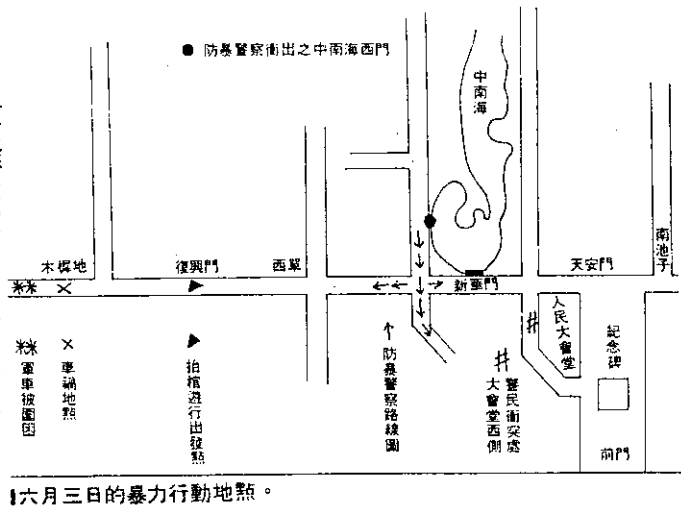
暴風氣不斷轉動，流血事件陸續增加。

下午兩點多，人民大會堂西門忽然湧出數千士兵，經過大會堂便是廣場，軍隊卻繞不過去，羣衆將他們攔截在西門外，動彈不得。

烈日曝曬下，這支軍隊與羣衆僵持了整整一下午。與過去一樣，學生聲嘶力竭地演說、解釋，羣衆對水連向士兵扔石塊，士兵解下皮帶抽打市民，三輪車載走一個又一個的傷者。

一名傷者後來在廣場上的記者講述他被打的經過。下午三點多，這名測繪出版社職工在人民大會堂西側看到士兵用皮帶打人，他上前抓住一個抽打老人的大兵，冷不防被大兵用鋼盔打在他額上，登時血流如注。熱血湧起激情，他一把搶過鋼盔，高舉鋼盔，血流披面，當場轉了一圈，大聲說：我是一個黨員，我熱愛黨，但我認為李鵬政府不代表黨！

一個個傷者的血淋淋的忍耐，到黃昏，更產生大規模的衝突，羣衆向軍隊扔石。這支沒帶槍的軍隊大概是奉令不得開槍戒嚴的，面對市民的「襲擊」，他們祇得退入大會堂，可是門又緊閉着，他們拳腳而入，真個是抱頭鼠竄！直到下午七時多軍隊全部退回大會堂。



六月三日的暴力行動地點。

暴警齊動武 鎮壓奏先聲

與這場持續不斷的小衝突同時揭幕的，則是六部口一場連環決鬥的混戰。

由於過去一天軍隊不時在市內「乘機而逃」，遺下一車車的軍械，被市民當作戰利品搬在大街上展覽，高懸到不安，下午派人去還給官方。

下午二時，廣場指揮部民主之聲廣播站社長張華潔趕到六部口，正有大批市民圍着兩輛滿載軍械的軍車，當時官方正在廣播，請眾眾趕快撤離，否則採取嚴厲措施。

這個毫無信譽的政府，任何號令祇要是不合眾眾意的，祇會引來眾眾的唾棄。市民並沒有散去。

忽然，中南海西門開了，跑出一支白制服警察，跟着三支綠制服防暴警察，向南推進，到了十字路口，忽然加快腳步，分東、西、南三面壓向眾眾。手持電棍的防暴警察很快使將眾眾衝散，一面衝、一面打，還放了催淚瓦斯。

這場混戰不到十五分鐘便解決，根據高懸的統計，打死一人，打傷五十餘人，目睹整個過程的張華潔則被打了一頓，臉、額。

一個多月的眾眾運動，當權者首次大規模動武，首次放了人們想像中的催淚瓦斯。

指揮部在緊急動員令中說：「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歷史會將這個日子作為恥辱象徵，為人民永遠記住。就在這天，這個偽政府撕破了蒙在野蠻面目上的最後面紗，出動上千名凶惡的軍警，猖狂地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人民進行殘暴地鎮壓，使用了由催淚瓦斯到電警棍等一切防暴武器。」

此際，催淚瓦斯與電警棍已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凶暴武器，無人會想到坦克、機關槍。正如六月二日之時，大家都沒有想到，血與暴在半天之內由冰點上上升到沸點，即使到了沸點，大家還是沒有想到，半天之後便會爆炸，炸成血光、火海！

■本報地被困的軍車。



被逼開殺戒 一派荒唐語

暴，不出自人民的意志，是軍警製造血腥引發暴動，憤怒的眾眾不知不覺走進圈套，企圖以暴抗暴。

恬不知恥的李鵬，竟有臉皮胡吹黨政軍一直採取舉世無雙的克制態度，祇有在最後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軍隊進行自衛，如果不這樣做，犧牲將會更大些（六月十九日講話）。

我們將眼光放到木樨地、南池子、大會堂西側、六部口，誰在挑釁？誰在自衛？甚麼是迫不得已？迫不得已的是人民！而且，不要忘記，直到六月四日之前，忍無可忍，迫得怒火攻心的眾眾，沒有毀壞過一件公共器物，直到軍隊開槍殺人之前，沒有打死過一名士兵。第一宗眾眾的破壞性行為，是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多天安門前被焚毀的軍車，這時軍隊早已在四面圍攻殺人了。燒軍車、公共汽車、殺死個別士兵，都是六月四日，軍隊屠城之後的事。官方傳媒「列舉」暴徒毀壞軍隊的「罪證」，但他們不敢將士兵與平民的真正死亡數字對照，更不敢詳列時間和事發前後的經過，不儘顯倒黑白，更欲顛倒時序，捏造軍隊「被迫」開槍的藉口。

即使是港、台人士，也有人在說，眾眾中確有暴徒，他們燒車、打人……但願所有人擦亮眼睛，搞清楚「暴」是怎樣醞釀出來的。

四 狐面狼心 伺機出擊

官方蠢蠢欲動 學生撤退不成

沒有人會天真到以為當局會放過學生，任由他們在廣場長住下去。若當局真的這樣寬容、克制，軍隊便不必偷偷窩藏在廣場周圍建築物內，不必裝模作樣紀念陣前拍照，不必在故宮內演習抓捕學生……危機早已暗伏四周。

路過六月，毋需有特殊的政治敏感，也可以預感，當局鐵定數天之內動手了。

且看一些明顯的跡象：

六月一日，電台廣播宣佈，外地學生憑學生證免費乘火車返校，原來的期限是到六月一日，現改為六月三日，這不啻是最後通牒。

許多單位接到通知，要撤員工，於六月三日舉行「勝利大遊行」，擁護李鵬政府，遊行後到廣場集合，此行動表面上徒增笑柄，眾眾在廣場邊拉起橫額「戒嚴期間奉令每人十元擁護李鵬」，骨子裡却透出他們要在六月三日收復廣場的訊息。

再加上當時傳言於六月五日舉行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央委員會已遷集北京，更顯出李鵬集團要控制局勢，好待順利為趙紫陽定罪。

形勢是這樣明顯，學生們當然知道，知識分子也知道。事實上早於六月之前，一羣學生運轉核心分子，已在每天開會商議行動對策，並且不少人士主張學生撤離廣場，採取另外的形式作長期鬥爭。五月二十七日，首都各界

■侯德健等四人絕食抗議，掀起民運新高潮。



聯席會議（包括北京市高聯、外省赴京高聯、和廣場指揮部）發表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其中便提出學生運動已經取得重大勝利，希望五月三十日舉行一次勝利大遊行，然後廣場上的學生光榮撤退。可是這建議一拿到廣場上表決，便無法成立；五月二十八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祇得又開會，改為在廣場上的和平請願至少堅持到六月二十日，那是當時期望的人大常委會召開之期。

神像英姿勃發 絕食再起波瀾

既然不退，就只能前進。學生和市民在支持學運的心態驅使下，惟有不斷推出新構想，以保持士氣，再創學運高潮，總不能讓人看到，學運竟是不死不活地拖拉着。

五月三十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揭幕儀式，掀起了新的高潮，官方對它的諷刺，更令高潮持續不退。原本只餘下五千學生堅持在廣場過夜，曾有數天廣場人影疏落，可是民主女神像一豎立起來，馬上像磁石一樣將人潮吸了過來。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接連數天，從黃昏開始，便聚集着數十萬計的眾眾在廣場邊，至夜不散。以神像作為象徵，廣場重新成為眾眾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心。

六月二日，眾眾運動更進入新階段，一直以學生作為主體的運動，知識界來接棒了！首都知識界發起了接力絕食運動，抗議戒嚴和軍管，第一棒絕食人士是作曲家侯德健，學者與新聞界人士周舵、劉曉波、高新。六月二日下午四時，四位絕食人士在紀念碑下高喊：「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祇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

從四月學運開始，知識界不斷聲援，後更參與遊行抗議，與學生緊密聯絡，表現積極。發起紀念碑下絕食行動，更將運動的焦點從學生轉移到知識分子身上。學生向來是運動的前鋒，而知識分子則一向軟弱，如今軟弱的人挺起胸膛，是叫人刮目相看的。

六月初，廣場學生在大量物資支援下，架起整齊的帳篷，儼然長期作戰的模樣。六月三日晚，「民主大學」開學，標誌着廣場上的運動正向縱深發展。

民運震懾昏君 不按牌理出牌

原本已呈疲態的學運民運，經一番整頓後光榮煥發，參與面更廣、更深，在眾眾當中的影響力得以維持不墜。

假如中南海裡的老頭兒，遙向廣場遠望，看見井然排列的帳篷、看見手持火炬的民主女神（雖然它完全不像美國的自由神像，但遠看還是一點影子的）、看見每夜蜂湧的人頭、看見絕食行動又再開始……他那老朽的腦袋，會不會想到這羣廣場上的人，是如何有組織、有計劃地採取激烈行動、震撼眾眾、奪權！

無疑他們就是這樣想的。半世紀前他們就是藉着學運來擴張勢力、奪取江山；他們怎能體會，半世紀後的學運，是如此自發與單純。廣場上的重振聲勢，却是伏下更大的殺身之禍。

形勢的發展是如此矛盾，似乎大家都迷失方向。一方面，學運的領導者分明知道當權者最後一定要動手；另一方面，他們又積極活動，刺激這批老頭。豈有自尋死路之理？

這是一場賭注。不管領導學運的人當時有沒有想到要賭，今日看來，當日的形勢確是像在賭，押對了，中國的民主歷程將邁一大步，滿天光明；押錯了，惹來無窮災難，民主倒退，人民遭殃。可恨的是，這場賭博太不公平，因為其中一方不僅可以不攤底牌，更可以肆意亂局、不依章法！

一個剛剛說過「從來沒有說學生運動是動亂」，翌日立即宣佈學運是嚴重動亂的政府；一個切切保證軍隊不是對付人民、對付學生，却把坦克機關槍對準人民和學生的政府，行事能有章法嗎？若有章法可循的話，它採取的就不是暴力，而是相對和平的手段。

寫作班子出動 重彈文革老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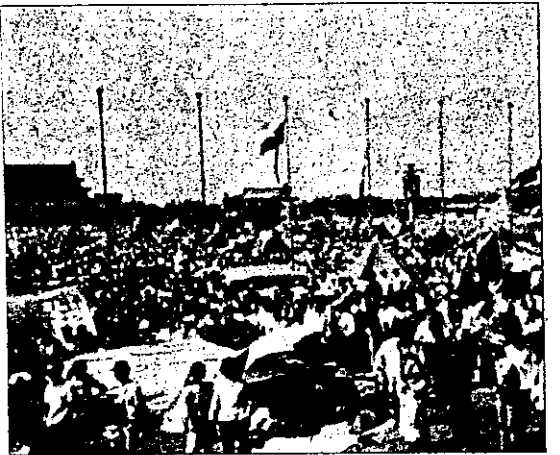
從當局在五月底到六月初這幾天的表現來看，它似乎要採取分化、瓦解學運的手段。也許這種手段畢竟較為「文明」，掩蓋了當權者的凶暴本性，使人失去對血腥鎮壓的警覺。

這幾天內，當權者策動了連串醜陋的、但總算是非暴力的活動。

一種是中共慣用的宣傳技倆。

請看看取代了《人民日報》機關報地位的《北京日報》的頭版「消息」吧。

五月三十一日的頭條新聞是：「首都環衛工人發出呼籲：廣場亂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文中說環衛工人對廣場衛生情況感到憂心如焚，他們向廣場上的學生呼籲：「天安門廣場是人民的廣場，任何人都沒有權力玷污她，這種亂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



學生堅決不撤離廣場，於是架起整齊的帳篷。

同日同版還有北京市少先隊聯合會寫給「天安門廣場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的信，請求他們：「讓我們在雄偉整潔的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慶祝「六一」活動吧！」同日同版還有「許多羣衆對在天安門廣場搭設女神像表示強烈不滿」，包括天安門管理處、北京高校五名學生、一位中年知識分子。

圍繞着廣場的衛生狀況和女神像，〈北京日報〉每天大造文章。

六月一日，又有「六家大型建築企業負責人」呼籲天安門廣場必須迅速恢復莊嚴優美環境；市規劃局和首都城市雕塑委員會指出，民主女神是建國建設應無條件拆除；更有「一位外地大學生離京時的反思」，指稱外地學生進京暨援不過是貪圖遊玩，到了北京後却有受騙感覺。

六月二日，仍然有各界人士，「一個關心你們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譴責豎立神像；另外又增添了要求高校全面復課、要求取締工人自治聯合會等新主題。

六月三日並未拋開「還我天安門廣場」的老調。但最可笑的是，當日〈北京日報〉特別聲明，所登來信都是羣衆來稿，所謂市寫字樓子炮製大學生來信，純屬謠言。

出動寫作班子來偽造民意，是文革時期的慣常手段。〈北京日報〉這篇累積地刊出與民意對立的署名文章，又有多少人相信是真的？鬧謠之舉，顯得欲蓋彌彰。該報的「旗幟鮮明」態度，惹得數百羣衆於六月二日遊行到其報社門前抗議，焚燒〈北京日報〉。

挑動階級仇恨 農民奉命遊行

偽造民意不限於寫文章，花樣多着呢。

五月三十一日，一場亘古未有的農民遊行出現於京郊。經北京市委批准，位於非戒嚴區的大興、順義、懷柔三縣舉行了以農民為主的示威，舉着「堅決擁護李鵬

、楊尚昆同志講話」、「堅決反對動亂」等橫幅，說甚麼：「現在農民的西瓜熟了，不敢進城去賣……如果繼續動亂下去，我們農民甯願餓死，怕連飯都吃不上了。」大興與順義縣各一萬多人參加，懷柔縣近二十萬人參加。

對於這種遊行，王忍之甚至親自打電話到報社叫人去採訪，當然要在電視上大大宣傳。可惜清晰的畫面殘了底，祇有領頭叫喊的人在叫「擁護李鵬」、「擁護鄧小平」的口號，遊行隊伍却沒有齊聲響應，隊伍中祇發出哼哼之聲，甚至喧笑聲。

一份高聯的材料揭發：縣政府規定各機關、廠、鄉必須到齊，如不到者，黨、團員要開除黨、團籍，工人則扣發工資和獎金。

滑稽戲上演一場不夠穩，六月一日繼續上演，五個遠郊區、縣農民、羣衆，各在其所在地舉行集會遊行，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黨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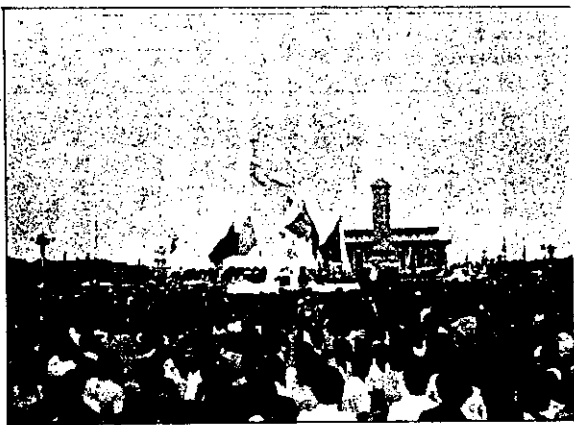
像焚燒〈北京日報〉一樣，學生要造謠對假遊行的惱火。六月二日下午，學生在北京市內，帶着面具，舉行了首次假面遊行，並且一路高呼：「挑動農民鬥學生是個好辦法！」「無賴精神永垂不朽！消失民主，萬古長存。」「支持腐敗、擁護鎮壓。」「黨員黨員歡迎戒嚴、幹部幹部幹掉民主。大家都來鬥學生，鬥垮學生大太平！」

狐狸笑臉突斂 露出豺狼血牙

此外，還有更見不得人的花樣：

五月二十九日，開始抓人，拘捕了十一名摩托車隊成員，說他們是造謠生事的「飛虎隊」；又拘捕三名工人。

五月三十日，六名人大常委發出聲明，否定會聯署要求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六月二日，馬洪加入否認行列。



民主女神像一如磁石吸住人潮。

種種招數，無非欲從各層面打擊壓運民運，分化羣衆、瓦解鬥志。手段雖云醜惡，却勝於血腥。是甚麼變數使鄧李楊集團放棄漸進的分化手段，改行急驟的血腥鎮壓？我答不上來，相信也沒有誰能給我們精確的答案。

不過這答案已不重要。到底夢魘已經籠罩神州，重要的是趕快從夢中驚醒，擺脫厄運。

吾爾開希低沉的歌聲又在腦中迴盪：

有人在夜裡哭泣

也有人歡歡喜喜

今天不是甚麼天氣

今天我不再哭泣

誰願意虛耗珍貴的淚水。中華大地，幾時纔教人不再為你哭泣！

從圍城到大屠殺

承 嬰

歷史將記住這一天：號稱「解放人民」的軍隊，向數以萬計的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大開殺戒。
歷史將記住這一天：成千上萬的精英學子被虐殺，只為了他們以最和平的方式爭取民主。

六月二日中午，北京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條不尋常的新聞片：曾被指為「反黨集團」成員的秦基偉出面亮相，他親自前往駐守北京某地的戒嚴部隊官兵打氣。李、楊政權似乎又多了一根支撐樑。但一般人都認為，李楊已掌握大局，而且北京高教學生已大部份撤出天安門，看來拖下去對李楊集團有利。鎮壓似乎不必了。

前奏：大兵二度入城

六月三日凌晨二時，大約一萬多名身穿白衫綠軍褲的軍人，以密集的隊形，從東西長安街兩個方向向天安門廣場步步進發。這些年僅二十歲上下的軍人未帶武器。消息立即傳開，睡夢中的市民紛紛跑到街上堵截，不多時超過十萬民眾築成厚厚的人牆，將兩路軍隊截停。人聲鼎沸，市民和學生大聲責罵。「回去！回去！」「不許打人！」「人民的軍隊，站到人民一邊來！」的呼聲響徹夜空。人們發現，這些滿身汗水、神情惘然的士兵已疲勞不堪。他們承認，他們是駐守機場的戒嚴部隊，深夜接到命令，必須在今晨三時趕到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行動。

與戒嚴初期軍隊入城受民眾阻攔時尚能保持和善或聽從勸導的態度不同的是，大部份士兵這次對羣衆的堵截與憤怒很少理睬，甚至採取對立的態度。王府井大街並發生了軍民打鬥的磨擦。當羣衆的堵截成功，軍隊逐漸後退時，人羣依然給予掌聲。小部份士兵很激動，有士兵將軍帽擲地，大聲怒道：「我不幹了」。也有軍官表示「我們絕不打羣衆」。

終於，被衝散的軍人後退到王府井街口坐在地上待命。一部份軍隊在混亂中成功地進入天安門廣場附近。

第一滴血

在市民攔截軍隊的過程中，建國門和西單分別截停了四輛滿載軍事武器的軍車。車上麻包袋裏裝著的有衝鋒槍、步槍、手榴彈和防毒面具，並且有大量鐵棒、菜刀等兇器。羣衆將武器送到新華門外展覽，數萬市民前往觀看。

此時，新華門內衝出二、三百名武裝軍人，用木棍、電棍見人就打，一時新華門前秩序大亂，部份學生市民被打得血流滿面。西單的軍警並首次動用槍械，向人羣發射橡皮子彈。受傷人數有四十多人。

下午二時，二千名頭戴鋼盔、手執電棍的軍人和武警，從中南海西門突然開出，將西單府右街及六部口街道封鎖，施放了二十枚（一說五十枚）催淚彈，並用警棍毆打驅散人羣。搶走了被展出的武器裝備。

消息一傳開，數萬人立即趕到新華門及六部口，他們怒罵軍警「法西斯」、「流氓」，他們推倒一輛吉普車，將兩輛運送軍用品的汽車玻璃全部砸碎，軍警撤出西單縮回中南海內。

幾乎是在新華門軍警鎮壓行動的同時，大會堂西門約一萬名軍人以密集隊形衝出來，到西門路口佈防。但被數萬羣衆和學生衝散，衝突中雙方各有五六人受傷。在大會堂門口，軍隊坐在地上，四周圍着人羣，一直對峙了近六個小時。羣衆和學生高呼「人民軍隊愛人民」的口號，唱歌、國歌、國際歌，有學生走入軍隊中，向軍人講解北京學生運動的真相，但是，軍隊事先得到命令，對羣衆的勸說無動於衷。

三項通告火藥味重

此時，北京局勢呈膠着狀態。
但是，軍隊奉命強行挺進的強硬行動，已開始使局勢發生令人擔憂的逆轉。軍隊處處受阻，民眾羣情激憤，氣氛已接近爆炸性。
在天安門南面門前，數百名軍警試圖由西向東進入廣場，他們配有衝鋒槍和機槍，但為羣衆設下的兩部巴士所阻，軍警一個小時後離去。

在永定門火車站，數百部軍車停在火車站旁，欲想從南向北駛向廣場，但為羣衆所阻，不得前進。
在復興門附近西安長街民族飯店附近，防暴警察與市民對峙七個小時，互擲石塊。

天安門廣場上的一日，六月三日度過紛亂、緊張和憤怒的一天。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鑒於形勢危急，組成宣傳隊，到全市每個

角落去動員、呼籲人民羣衆，旗幟鮮明地反抗李鵬政府的軍事鎮壓，他們號召全市總罷工罷市，提出「與天安門廣場共存亡」的口號；臨時成立的北京市民自治會也提出了「與大學生共存亡」的口號。儘管北京市白天天氣酷熱，但仍有數十萬人聚集在廣場，聽學生演講。廣場上出現了這樣的標語：「我們決不倒下，讓創子手顯得高大，好阻擋那自由的風。」

從早到晚，廣場上由政府操縱的廣播台，不斷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北京日報》的新聞及通告，指出凌晨堵截軍人入城、攔截軍車是由於少數人煽動所致。把羣衆說成是歹徒、流氓、地痞。市民對政府的廣播，不斷發出嗤聲。

根據中共處理大規模羣衆事件的慣例，反覆的廣播，往往是行動的先兆。

從六時半開始到深夜，電台電台先後多次中斷正常節目，播出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三項緊急通告。任何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從官方的緊急通告中嗅到火藥味。通告說，「近來，極少數人製造謠言，惡意醜化、攻擊戒嚴部隊，用極其惡劣的手段，挑撥人民羣衆和戒嚴部隊之間的關係，煽動一些人破壞軍車、搶奪武器，毆打幹部戰士，盤查、圍攻軍人，阻攔戒嚴部隊的行動，蓄意製造事端，擴大動亂。極少數人的這種嚴重違法行為，引起了廣大人民羣衆和部隊官兵的極大憤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通告接着以威脅的口氣宣稱：「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

最後的通告是午夜時分發出的，這份通告中多了兩句意味深長的話：「……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不要到街上，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受不必要的損失。」

皇子第一槍

後來有消息證實，從三日凌晨的軍人四處出動，到當夜的大規模瘋狂的彈壓，都是在執行當局一項強硬的命令：只需執行命令，無需顧及人命傷亡。執行中可使用一切手段。
另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稱，鄧小平對彈壓造成傷亡的預計是一千人。

晚上十時，槍聲首先在皇子（皇子，新華社宿舍附近）。目擊者說，有人在槍聲中倒下。屠殺從此開始。
十一時，木樨地（高幹樓一帶）也傳來了槍聲。

零點五十七分，廣場附近伴隨着槍聲，升起了幾處火光，照明彈、曳光彈在廣場上空飛舞。

凌晨一時零五分，天安門南面的崇文門區也槍聲四起。

鮮血正在飛濺，人們一批批倒下。
從皇子第一槍響起開始，數以萬計的軍隊和大批坦克、裝甲車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推進，軍隊所經之處，凡有羣衆阻攔的，照樣行駛或以槍彈開路。凌晨一時二十分，以四、五人一排為數約六百名的軍隊，由南向北朝大會堂推進，周圍羣衆不敢接近，與軍隊保持百米距離，部份市民以石塊、玻璃瓶還擊。

廣場的最後一幕

倒下的羣衆，立即被人搶救。有人指着滿鮮血的傷者，奔向醫院；有人用自行車架着傷者拖離現場；有人自覺找來了三輪車，運送垂危的傷者，飛奔送往搶救。

凌晨二時許，天安門城樓前的長安街，市民們不停裝甲車，有人爬上車頂，奮力顛動車蓋，數不清的人向車上擲物，在一片歡呼聲中將軍車點燃；在建國門大街，近萬人圍堵十多輛軍車，並將車推往路中心。在長安大街路口，放置了很多路障，阻止裝甲車進入廣場。

一隊坦克開來，經過羣衆設置的路障，車身冒着火花，沿途遭到羣衆的圍追堵截。發了瘋似的坦克不顧人羣的密集，向人羣和行人道橫衝直撞，不斷有阻攔坦克和裝甲兵的人被碾死。人羣中發出震天的叫罵聲：「走狗」「殺人犯」「法西斯」。

一輛又一輛軍車和巴士被羣衆焚燒起火，兩邊長安大街上火頭處處，幾處火勢越來越猛烈，並傳來爆炸的巨響。

日前早已進駐大會堂、中山公園和文化宮的軍隊從四面八方出來向天安門廣場推進，行進中都發生開槍事件，死傷羣衆不斷在增加。讓我們看看，這千學生、羣衆被殺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以「清場」天安門廣場為勝利目標的戒嚴部隊，實現了對廣場大範圍的行動之後，集中把目標對準了仍留守在廣場上的數萬學生和羣衆。

一位最後撤離廣場，在槍林彈雨下死裏逃生的學生這樣描述。

當晚十二點之後，得到軍方會實行鎮壓的確切消息的四、五萬學生都退縮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無形之中，他們結成了一個堅強的團體，仍抱着與天安門共存亡的決心，堅不撤退。學生中男的佔三分之二，本地高教學生約佔三分之一，多數是外地學生。北京音樂學院的管弦樂隊伴奏下，學生們唱着戰歌，秩序依然良好，呈現一片悲壯、緊張的氣氛。

午夜一時，學生代表為表示學生「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原則，去到天安門城樓下與軍方談判，願意主動交出較早時在衝突中從軍人手中奪得的二十三枝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但斷然遭到軍官的拒絕。學生們不得不在紀念碑台階上砸毀了這些武器。

以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知識份子為首的代表，也同時出面與部隊談判，表明為了避免更多流血，學生和市民願意撤出廣場，要求軍方讓出東交民巷方向的通道。戒嚴部隊表示，如果學生們五時前撤出，他們不會採取行動。在這危急關頭，學生們終於同意撤出，並安排清華大學學生殿後，人們開始向軍事博物館方向撤退。

市民中彈，人們合力送院。





疲倦不堪的娃娃兵



居民歡送軍隊出城



配有重武器的第三縱兵力



大攻裝甲車



赤手擒坦克



她有何罪？飲彈身亡

浴

血

安

門

血肉長城

北京時間六月二日晚十點半，一輛疾馳的吉普車在西長安街木柵地附近撞死了三位平民。當開觀的群眾從四方湧到出事現場後，意外地發現，跟在這輛武吉普車後面的竟是一輛載滿了士兵的軍車。一個精心策劃的、巨大的陰謀被發現了。原來中共數萬大軍正兵分五路，分別從東長安街、西長安街、東北的北京機場、西北的頤和園以及西南的宣武門乘夜開進北京城，企圖於凌晨前會師天安門。

解放軍進城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北京千家萬戶。孩子們在街上跑着，嘴裡尖叫着：「鬼子進莊了」。堅守在天安門的學生指揮部立即用廣播發出緊急呼籲，號召市民保衛天安門廣場。

近百萬居民從大街小巷湧上街頭，許多人穿着睡衣、披着毛毯，攔向列隊的軍人。

很多進城的軍隊未帶武器，他們的槍械子彈是分開裝在後面的軍械車裡。這些部隊一進城就陷入了人民的包圍之中。這是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

從西部進城的部隊乘數十輛大公共汽車，其汽車被團團圍住。周圍的居民隔着車窗向士兵大喊：「滾回去，北京好好的，不需要你們。」士兵們莫名其妙地望著憤怒的人群，不知所措。他們從前聽慣了軍隊為人民服務，受人民歡迎的宣傳，沒有想到會落到不受歡迎的地步。

從東部進城的部隊動作最快，一支五千人的隊伍身穿便衣一路跑步前進，凌晨一點多鐘已達東長安街北京飯店前，然而却在離廣場三百米的地方被上萬名群眾攔住。被圍困的部隊像一條掙扎着的長龍，在人海中左突右奔，然而始終無法突破人牆。人民用自己的軀體組成血肉長城，保衛着民主的大本營——天安門廣場。

數萬軍隊與百萬市民相峙整夜，天亮開始撤退，一些市民仍不放過，騎車跟在後，一直到軍隊撤出市區為止。一些部隊在廣場周圍被衝散，脫離了隊伍的士兵顯得狼狽而可憐，被居民追趕着在巷子裡跑。居民們把俘獲的士兵集中在街道旁，嚴厲訓話，教訓他們不要向人民開槍。一些十七八歲的新兵從來沒見過這個陣式，差點哭出來。

市民紛紛拿出食物、飲料慰勞這些士兵。周圍的人高聲歡呼，伸出手指形成V字，慶祝勝利。

在六月二日夜和六月三日晨進城的軍隊中，只有從東北首都機場入境的軍隊是全副武裝的。他們分乘的五十輛軍車被數萬居民攔在東直門外。僵持中，士兵們安靜地坐在車上，聽着居民的訓話。約下午三點鐘，軍隊在居民開闢的夾道中徐徐退去。一些不放心的居民騎車尾隨在後，直到確實部隊離城為至三日中午，除萬餘軍人成功突破重圍逼近人民大會堂外，其餘部隊均因受挫而撤退。學生們將繳獲的軍械陳列一輛卡車上，在天安門廣場上展覽。

下午兩點，廣場指揮部將繳獲的槍械集中在一軍車上送交公安部的槍械庫。當車經西單六部口時，遇見一車防暴武裝。警察跟到新華門時，從上面跳下大批警察，搶奪被群眾繳獲的軍械，手持警棍見人就打。押車的學生張潔華被打得渾身是血，逃進居民院裡求救。

武裝奪得軍械後，放催淚彈驅散人群，並用棍子、皮帶驅趕居民。國家測繪出版社的鄭魯兵上前制止武裝鞭打一個婦女而被打得滿臉是血，但他搶到了對方的鋼盔，趕到天安門向那裡的群眾報告。

在新華門的衝突中，約二十三名居民受傷。個體戶高長生和一名七歲男孩被催淚彈炸瞎眼，一名十二歲男孩被炸死。

廣場東部北京飯店門口，下午也出現兩軍防暴警察，以電棍毆打群眾和學生，並發射了二十五枚催淚彈，大約有三十人受傷。

廣場東西兩邊的暴行引起廣場人群的憤怒，大約有一萬名群眾前去支援，醫務人員緊急動員，送來大批口藥，居民紛紛拿出毛巾，抵擋催淚彈。群眾以石塊還擊武裝，雙方有七人受傷。

下午，人民大會堂西側發生當天最嚴重的衝突。五千名到達人民大會堂西側的軍隊被六萬名示威群眾包圍。軍隊未帶武器，士兵以皮帶抽打周圍學生，奪路前進，民衆則以飲料瓶、石塊還擊。連送這批軍人的車輛的玻璃都被砸得粉碎，一輛吉普車被推翻並被燒毀。

婦女們集體攔住軍隊，哀求他們不要向人民動手。一名七十四歲

的老太太身穿睡衣，躺在士兵腳下，大喊：「要開槍先打我，不要打學生！」民衆見此大驚，向士兵高呼：「你們也有爹娘，你們也是人民的兒子，他們不會同意你們鎮壓人民！」

軍隊無法突出人圍，被群眾強令坐下。東西長安街兩處被武裝警察攻擊的學生和傷員向在場六萬餘人訴說了那裡的暴行，並展示了他們的傷口及從武裝身上奪來的鋼盔、鞋子、催淚彈等。全場齊聲高呼：「勝利屬於人民！」

下午四點鐘，一位匿名的軍隊指揮官打電話到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傳呼站，指名要廣場指揮部負責人接電話。這位不願露名的軍人說：「天安門今夜要強行清場，軍隊要荷槍實彈進入市區，上邊已下決心開殺戒，希望同學們做好準備。」

據後來證實的消息，此次圍城部隊進京的全盤計劃早在六月前就擬定。「動亂」部隊達十萬之衆，分三個梯隊進城。

第一梯隊不帶武器，起試探性威懾作用。若威懾生效，學生和市民讓步最好，若後者抵抗，這批第一梯隊的士兵將作為誘餌，讓他們挨打，以製造「暴民暴亂」的新聞，不但為第二、三梯隊的士兵開槍鎮壓製造借口，而且可以激起後繼士兵的憤怒，激勵軍心。這一手毛澤東常用，曰：哀兵必勝。這就是為什麼六月二日夜進城的軍隊都是毫無經驗的娃娃兵，而且身穿白衫，以便染上血跡。

第二梯隊進城的軍隊則配有電棍、鋼索、催淚彈以及衝鋒槍等輕

武器，可以主動攻擊民衆和學生。如果前兩個梯隊不奏效，則出動第三梯隊。第三梯隊的兵力由裝甲車開路，配有重武器。可以突破一切障礙物，遇到反抗格殺勿論。

顯然，時至六月三日下午，第一、二梯隊的軍隊在百萬市民的血肉長城面前已失去用武之地。下一步，楊尚昆、李鵬政府要動用第三梯部隊了。法西斯孤注一擲了，他們要突破這血肉長城。

匿名電話之後，廣場指揮部和高校自治聯合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當時學生手中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這都是從上午入城軍隊的軍械車裡繳獲的武器。一些激烈的學生主張把武器發下去，組成敢死隊，進行抵抗。但大部分學生十分理智，主張堅持「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原則。最後會議決定，將槍支送還給戒嚴部隊。可是當學生們和天安門城樓下的解放軍聯繫交槍時，對方奉上级指示不收。學生們無奈，為表示和平誠意，他們最後拆散了槍支和燃燒彈，銷毀了所有武器，以防政府抓住他們「暴行」的證據。多麼善良的學生！他們沒有想到，幾個小時後，他們的軀體會被坦克的履帶碾成肉泥！

黑雲壓城了，這一夜，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血染長安街

六月三日夜十點半，西長安街萬壽路以西上空，一聲凄厲的槍聲劃破夜空，揭開了北京大屠殺的序幕。

黑壓壓的軍隊在坦克車隊的配合下，從西向東壓過來。軍隊在人口相對稀疏的郊區沒有受到強烈抵抗，萬壽路的槍聲只是軍隊向零星

的阻撓者鳴槍示警。

當軍隊進入軍事博物館後，遭到當天最嚴厲的抵抗。從軍事博物

館到西單街口之間的這段路，軍隊幾乎是踩着人民的鮮血開過去的。

「軍博」之役是這次北京大屠殺的第一仗，準備和平阻攔軍隊的市民和學生毫無準備，開始手裡拿着鐵棍的士兵被幾百名市民攔住。

士兵開始打人，遭到怒斥，後來人越集越多，聚起幾千人，組成人牆。附近幾個大學的學生聞訊趕來，擋在軍隊與市民之間，與軍人論理。

高呼「人民的子弟兵不打人民」。軍隊雙方僵持約一小時，在這一小時中，顯然軍隊指揮官請示了最高層領導人，並得到殺人的許可。

一小時後，軍隊突然向天開槍，群眾發生騷亂。在前方的大學生呼籲群眾冷靜，一再向大家保證軍隊不會向人民開槍。於是大家又恢復冷靜，全數坐在地上，作為路障。

軍隊又連續向天鳴槍，但群眾顯然相信了大學生的話，不為所動。可是第一排向天開的槍響過後，第二排槍突然直接射向人群。

前排的學生和群眾紛紛倒下，群眾大嘩，向四面奪路而逃，而軍人們仍不罷休，追在後面掃射。前排人牆，每排一百多人，死亡過半，站在最前排的一百二十名北大学生，無一生還。

人民被激怒了，他們迅速聚集在人行道上，利用道路路障，且戰且退。狂怒的學生衝上坦克，用磚頭、木棍徒勞無益地敲着。撤退的居民沿途燒毀作為路障的公共汽車、和當天繳獲的軍車，組成火牆，阻擋步兵。

軍隊改變了戰術，用坦克在路中間衝鋒，突破路障，步兵在人行道上挺進，一路槍聲不斷。

當軍隊挺進到木犀地時，長安街南側一幢十幾層高的部長樓上的窗戶紛紛打開，上面傳來婦女們的罵聲，瓶子、瓷盤紛紛般落下，被這突然襲擊打懵了的士兵舉槍向窗口射擊，當場死傷十幾人，李立三的孫女在窗口被打死。

士兵的射擊是間歇的，行進時

偶朝天射，但一遇人牆逾百，便舉槍平射，且只要路邊有三十人聚集者，便開槍射擊驅散。沿途三三兩兩不斷有人死亡。

群眾撤到民族文化宮後再度聚集，並發動了一場新的攻勢。一輛坦克被用棍子卡住履帶然後被群眾燒毀。在場數千名居民歡聲雷動，乘勢以磚石、木棍向士兵發起攻擊。

軍隊被迫後撤兩百米，有八名士兵頭部被擊傷。雙方相持約半小時，軍隊中忽然吹起衝鋒號，部隊一齊舉槍平射，從此後的傷員看，士兵已換上強力子彈，同時西長安街上出現了增援的八輛重型坦克。作為路障的大公共汽車，被重型坦克一撞，如同切瓜。居民用燃點瓶作戰，燒毀軍車廿八輛，裝甲車兩輛。另外俘獲裝甲車一輛，編號四二二，上面有五〇六式機槍一挺，七八個居民開着這輛裝甲車向三里河方面駛去。

軍隊開始發射抽光彈，並交替用催淚彈和機槍開路。百姓不支，紛紛倒地。潰退的居民、學生邊走邊喊：「保住西單」，遂向西單退去。

在西單，原被居民圍困在宣武門方向胡同裡的軍隊蜂擁而出，逐趕群眾。部隊調整陣容，右側為裝甲車，中間是步兵，左邊是汽車隊。裝甲車又突破兩道路障，群眾四處逃散，混亂中有人高呼：「砸了中南海」。

於是憤怒的人群衝向中南海新華門，與前三排士兵發生衝突。群眾口裡罵着李鵬，以石塊攻擊守軍，守門士兵以棍棒還擊，並鳴槍示警。

這時穿過六部口路障的野戰軍趕到，一排坦克衝過來，將群眾與新華門隔開。一輛坦克在衝鋒時當場碾死七名學生。憤怒的群眾一直追趕該坦克至人民大會堂北側，一隊人爬上坦克，將棉被點燃蓋在上

面。裡面的駕駛員熱得忍不住，爬出裝甲車，被群眾捕獲，打得半死。後幾名學生趕到，救下該士兵，

送去醫院。那輛裝甲車被燒毀，大火映紅了人民大會堂。

新華門之後，最後一道路障已被突破。部隊不再急於推進，而是整頓軍容，肅清殘餘抵抗。

隨着陽光彈劃過天空，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城樓側面清晰可見。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西路已經打通，這條路，是由七百多具平民的屍體鋪成的。

十里長安街，血流成河！

天安門廣場陷落

四日凌晨一點五十分，一個大功夫的廣播聲音反覆迴蕩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廣播限令廣場上的人群立即散開退出廣場，否則軍隊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清場。

從東長安街開來的坦克已突破建國門的路障，二點鐘到達北京飯店。此時東西兩支部隊隔著廣場遙遙相望。包圍廣場的合圍已經形成。這時被困在人民大會堂內的數千名士兵也從北門衝出，直奔天安門城樓。

這時天安門廣場仍有一萬餘人，在軍隊的壓迫下向廣場南端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群眾臨撤前將天安門左側松牆點燃，一片烈焰衝天，映紅了天安門。

很快兩邊衝過來的軍隊在天安門金水橋前合龍，一字排開，開隊向挑畔的群眾點射。從南邊來的部隊也完成了合圍，封住了毛澤東紀念堂左右的路口。在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頂端，隱約可以看見黑壓壓的鋼盔和架好的機槍。

突然間，兩輛公共汽車從廣場左右兩邊開出，直衝向一字排在城樓前的士兵，群眾在後面吶喊助威。當車衝至軍隊前幾十米處，一陣密集的槍響，汽車橫着停住了。士兵從車裡拖出受傷的司機和學生痛打。對面的群眾起哄鼓噪，但軍隊點射威脅，無人敢向前。

兩點三十分，在一片熊熊大火

中，自由女神像倒下了。軍隊完全控制了天安門廣場北部，逐漸向南壓進，不斷舉槍平射。前面的百姓紛紛俯身向後退却，口裡喊着各種口號。

四點鐘左右，整個廣場的燈光全部熄滅。剩下的一萬名學生和市民全部被壓縮在英雄紀念碑周圍。北京的學生約佔三分之一，大部分是外地的學生。四名絕食的知識份子候德健、劉曉波、周佗、高新也在其中。

廣場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候德健建議為避免傷亡，撤出廣場，但仍有部分學生願與廣場共存亡。最後，人們同意撤退，候德健前去與軍方談判。

四點四十分，一串紅色信號彈劃破天際，廣場上燈火復明。這時學生們發現，軍隊就近在咫尺，已將他們團團圍住。裝甲車已將英雄紀念碑包圍，只留下東面的博物館方向一個出口。一隊穿着迷彩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從大會堂跑出來，在學生正面一字排開，架起機槍。

但學生們坐在紀念碑前和台階上不動，嘴裡高唱「國際歌」和高呼「人民軍隊不打人民」的口號。

一隊武裝警察從槍手背後衝出，手持警棍衝入學生隊伍亂打，殺出一條血路，登上紀念碑第三層，四五十名學生被打得血流滿面。武警將第三層上的印刷、廣播設備搗毀後，將學生趕下台階。但是從台階退下來的學生將最前面的學生擠出警界綫，一字排開的槍手立即射擊，當即有人中彈身亡。於是人群退回紀念碑階梯上，可是上面的武警又打人，把人往下趕，而人一退下來，機槍又響了。來回折騰了幾

次，已有十幾名前排學生身亡。一批敢死隊的人急了，抓起瓶子要反擊，這時廣場指揮部急忙下令撤退。這時是凌晨五點。

三千名同學手挽手，高唱「國際歌」徐徐向廣場東部的缺口退却，可是由於人多，動作很慢，在限定時間過後仍有大部分人未退出。

這時軍隊用裝甲車封住出口，三十幾輛坦克無情地向學生壓過來，隊伍前面發出慘叫，一些學生喪生坦克輪底。整個隊伍大亂，學生衝上去齊力推開坦克，機槍響了，一批人倒下了，又一批人衝上去，最後合力衝出一個缺口。三千人分批從缺口衝出去，後面機槍在響，中途不斷有人倒下。衝到歷史博物館門口的學生只剩下一半，一些居民等在那裡援救，截住從南邊衝過來的另一隊軍人，攔護學生向東邊火車站方向撤退。後邊的軍隊則拿着棍子邊追邊打。

機槍響了整整二十分鐘，廣場紀念碑前整個布滿屍體和傷員。學生還未撤完，五輛坦克就朝學生的露營帳篷壓過去，直到把所有的一切碾平。有五名清華大學和人民大學的女生躲在帳篷裡避彈，沒來得及突圍，結果被坦克活活碾死。隨後，軍隊用火炮噴射器燒毀所有帳篷，整個廣場一片大火，英雄紀念碑被映得血紅。

天安門廣場陷落了，這個民主運動的支點被坦克碾碎了。為了趕走幾萬名手無寸鐵的學生，中共當局動用十萬大軍，把整個北京城扔進了血海。可是這個政權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不可估量的，從此，它在十一億中國人民和三千萬海外華人心中的合法性蕩然無存了。

請記住這個日子——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今後這一天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國殤日；每一年的這一天，都會有千萬人聚集在英雄紀念碑下，悼念那些為中國民主事業獻身的勇士們。

可是，人們在問，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政權能活到明年的六月四日嗎？

所事事。我非常疲倦，動念想回港。記者、香港學生、民運人士之間瀰漫白色恐怖，被人拍照、照錄像、電話被截斷、接得無名電報、房間被搜查、採訪隊伍被公安警告。但北京市面平靜，我們午膳後還懶得半小時到王府井大街買皮大衣、絲襪睡裙。

六月二日，日間發生學生衝擊公安局及零星遊行。天安門廣場又醞釀開辦「民主大學」。據北高聯常委李路說，這是為了「長期佔領天安門」。四名知識分子開始在紀念碑下進行七十二小時絕食。絕食者之一侯德健為參觀者唱《龍的傳人》。天安門廣場的一切愈來愈像鬧劇。

六月三日凌晨四時，我的同事急連地拍我的房間門，告知我復興門有軍隊試圖入城，又撞倒四名市民，並被羣眾堵塞。我在飯店負責聯絡，在露台居高臨下，視察動靜。被衝擊的解放軍潰不成形，沿長安街向東撤走，離開天安門。我到街上一看，發覺解放軍已十分疲乏，羣眾拍掌歡迎他們離去，並做「V」字手勢。如今想來，羣眾最可悲的地方是在於他們的天真與善良。

六月三日上午，北京氣氛開始緊張。電視廣播每十分鐘便播出戒嚴通告，勸喻市民切勿上街，切勿圍觀，以保障生命安全。朋友收到中央內部消息：「今夜切勿外出。」天安門廣場政府的廣播愈趨嚴厲。羣眾如羊羣聚集在天安門、新華門、西單。凌晨羣眾於西單奪得解放軍武器，早上於西單示威展覽。當然這成了政府行動的藉口。

六月三日下午，新華門及人民大會堂西門都出現解放軍。新華門外，直有政法大學的學生在靜坐。學生與軍隊發生衝突，軍隊毆打羣眾，並施放催淚氣體，同時大會堂西門的軍隊與羣眾又發生衝突，軍隊與羣眾互擲石頭。羣眾憤怒了。

六月三日黃昏，我再到天安門廣場視察。學生開始很不安，聚集於紀念碑下，纏上布條。政府廣場聲浪更高，重申戒嚴令。那邊軍隊仍與羣眾對峙。我回飯店，一步一步在走，心裏跳，只重複道：「今天晚上有事。今天晚上有事。」我卻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只是源於動物性的敏感：危險了，今天晚上有事。

夜晚還是來了。天安門廣場聚集了更多的人，「民主大學」開課，大會堂西門與羣眾對峙的軍隊經已散去，但卻令羣眾很疲倦。學生組織了敢死隊，拿着鐵鍊、水喉鐵作武器，圍繞着紀念碑。我只跟自己說：「今天晚上有事。」恐懼在事情未發生前已經開始。

六月四日零時，羣眾愈聚愈多。廣播尖聲呼令羣眾離開天安門廣場。一輛裝甲車以高速衝入天安門廣場，而附近的建築物立即射出信號彈。羣眾喧嚷了。坦克的隆隆車聲，沉寂而遙遠的傳來，像夏日的一陣悶雷。廣播說：戒嚴部隊執行任務，羣眾必須立即離開天安門廣場。



攝影：羅綺潔

六月四日凌晨二時，戒嚴部隊陸續以裝甲車及坦克開入廣場，羣眾放火燒車及城牆，我站在人羣之中，頭昏腦脹，羣身軟弱得不能站立。北京市民卻極其勇敢，迎着裝甲車投擲石塊及叫罵。有市民還將小孩擡在肩膀上看熱鬧。我掩面道：「請不要迎上前去。」羣眾還是以血肉迎上去了。（請不要逼我以血肉書寫歷史/請不要逼我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請不要逼我離我所愛去我所思/請不要逼我一無所有）我說：「我要回去。」恐懼卻令我舉步難行。

我們飯店的露台上已經黑壓壓的聚了一羣人，因為對面有人監視，大家都不敢開燈。裝甲車隊及坦克車隊一列列的衝過，三輪車載着受傷的軀體在其中左穿右插，機槍開始在廣場及長安街掃射。露台上兩位女朋友開始哭泣，在坦克的炮火之間，顯得極為無聊。我想喝：「請不要再流淚。」卻想到必須對他人的感受有所尊重。而我只是將臉靠着粗糙的牆壁，擦着，火辣辣的，呵，就只剩下這一些，其他的我都無能為力。天安門着火了。成千上萬的人流了血。而我渾身打顫，不能遏止。過往的平靜的美麗的優裕的聰明的生活，就打碎了。痛苦偉大的將來，就在火光中誕生麼？

我們再次見到北京的黎明。廣播聲稱所有人必須於五時前離開天安門廣場，接着是機槍的連續掃射，長達三分鐘。坦克已經駛入了廣場，救護

車聲卻漸漸疏落。什麼時候天亮呢，什麼時候機槍稍為疏落，什麼時候羣眾已經被槍彈射散，我們都搞不清楚。好像已經是早上七時了吧，誰在敲門呢，誰在輕輕握着我的手。我們心神俱裂。誰在說，我們還有多少日子呢，一個人的生死又算得什麼呢，你又對你的一生遺憾嗎，北京市民如此勇敢而你又如此怯懦，又不見得誰的生命比誰的寶貴些。我無法思想亦無法工作，只是神經如此尖如此細，小刀一般刺痛我每一寸皮膚。

歷史事件在我們眼前發生（北京失火了）。我們卻怯懦得無能為力。

我們嘗試去吃早餐，食不下咽。很餓很餓，吃不下。很渴睡很渴睡，睡不着。

六月四日日間，北京仍整日爆發機槍槍聲。

在飯店見着記者同行，都互相問好。好如初後餘生。

由於有人於露台窺望長安街被解放軍槍擊，我們都縮在房間裏面。同行為集體撤退的事宜奔走，我們十多入瑟縮在一間房間裏面等候消息。此時我忽然很渴望，打噴嚏。因為這樣渴望，我便神經質地笑了起來。

晚上我們稍稍能吃一點東西。是口暫時不能離開北京的了。我便徹底地洗了一個澡，極之專心而好脾氣的做一點日常的瑣事。畢竟我們活着。真的，我們只有這麼一點怯懦，及極其脆弱的生命（不見得一些人的生命比另一些寶貴些），但我們只有這



攝影：黃想雲

些。

記者同行紛紛打電話給他們親愛的人，父母、情人、丈夫。而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所以來，也就算了。生命亦至無牽掛的地步，在這嚴峻的時刻，竟然無人可親（只有一點怯懦，以及生命本身）。

我們活在圍城時刻，狀態真是卑鄙，恐慌令我們千方百計要離開北京城。但我說：北京市民這樣勇敢……他們甚至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受傷在街頭沒人料理……他們仍常以血肉迎著解放軍，高呼「壓迫！壓迫！」。

在極度的疲乏與恐懼中，我還是睡了。

醒來只是覺得心跳。天是漆黑的。下着雨。隆隆隆隆的聲音不絕。我赤足立在地氈上，側耳細聽，方搞清楚，是坦克的聲音，在飯店附近的橫街穿插，射殺街上任何的平民。伸首一看，坦克車隊無窮無盡，事後有人稱約有八十架。坦克亦射擊任何有燈的窗戶。我返回牀上，心裏不再恐懼，只是再明晰沒有：恐怖的年代即將到來。中國這一頁血腥的近代史，我們無可推諉。我們必須動員每一分力量與強權政府抗爭：我們別無選擇。

翌日早晨我跟同事說：我要留下來。好像不因為工作，或是勇敢，只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我們被迫參與歷史。

當然這又引起了一場爭論。我安然道：好。可以留便留。不留便走。

因為歷史如此龐大，我們在微小的崗位上觀察、反省並建造它。一個崗位與另一個崗位之間，分別不大。

歷史不分巨細，我們都在其中。

然而飛越廣大的大陸，回到南方小島來，我還是若有所失。巨大的歷史事件，至今仍令人難以消化理解。但我們不要忘記，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前，我們有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我們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一九四九年中國立國，四九年以前的漫長戰爭、割據、革命。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並非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它的總方向是明確的：不斷的羣眾活動（總帶點非理性的成分）及其鎮壓。歷史事件驚人地重複。我們必須對重複作最深刻的破壞與反省。

面對廣大的將來，我將再一次感到了北京的黎明，困惑而又沉重，光明永不到來，而我們過往平靜而腐朽的生活，卻必須摒棄。至今我仍無法忘懷我對優裕的文明生活，極深刻的戀好，猶如一隻小小的美麗的玻璃盒子，在時代之前，「碎」的碎個稀爛。革命卻是艱苦卓絕的，那是人性的另一面，而我每念及此，便站在露台上眺望風景，而香港的偵察直升機不斷盤旋，遊行隊伍漫漫無盡，城市有騷動及恐慌，我用手遮着盛夏殘餘的陽光，想到了未來的日子，如此這般，空氣涼颼颼的圍上來，天使黑了。

紀錄事件：佔領天安門

黑夜，給了我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註：天安門廣場掛着的一條橫額

北

京發生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事件。而我卻時常是一個冷漠的旁觀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二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自發的追悼會，悼念前黨總書記胡耀邦，同時開始以靜坐、遊行、絕食的方式，表達對共產黨領導的不滿。

歷史事件此起彼落，它和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如此相似。我們不應忘記民眾自發的紀念活動受到鎮壓，數千人死傷，血跡要三日夜才能清洗。

但我們還是忘記了血腥教訓。天安門廣場再次成為了中國民眾的希望。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北京有百萬人示威遊行。學生遊行提出加速改革的要求。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遊行再推到另一高潮。市民、知識分子、新聞工作者、共產黨員、工人都加入了遊行行列，和中國以往所有的歷史事件一樣，羣眾以浩大的規模創造歷史。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將運動進入另一個階段。天安門廣場成了醫院、臨時居所、垃圾及病菌的堆積地。絕食引起了廣泛的同情與支持，成功地迫使領導人與學生對話。另一方面，曾經大力支持學生運動的知識分子，卻進場勸說學生暫時停止推進運動，返回校園復課。當時立場顯得很反動的知識分子，如今看來，可能是因為他們較明白共產黨處事的底線，因此嗅到了危險的氣味。

戴晴，《光明日報》記者、作家。她的思想，明晰如刀。如今我見着好的事物，亦不驚喜，只覺原應如是。她冷靜、明晰、決絕清亮。她認為：學生運動已經完成它在歷史上的使命。它豐盛的果實讓民眾在一段長時期內都消化不了。任何的改革都是漫長而艱辛的：「尤其是中國，移一小步都這樣困難。」如果學生的目的並非要推翻共產黨，改革必須按秩序進行。

溫元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團成員。他完全肯定學生運動的偉大感召，只是他認為：「中國民主前途的命運短期內十分悲觀。長期來說，

卻並非不樂觀。」我提出難以理解國內知識分子的樂觀情緒。他笑道：「你不能作橫的比較。在中國，你要作縱的比較。今日的運動，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

令我記起了北京的黎明。凌晨五時整，長安街及天安門的燈熄滅。天色未亮，黑暗如此沉重，壓得人透不過氣來，那是一個軍隊入城的黎明，六月三日，巡邏了一個晚上，軍隊退出城去，天色方自遠而近。黎明的誕生，如此巨大、艱辛、困乏，它似乎並非新生，而只是個不可知的將來——有更大的黑暗與紛亂。

高辛，共產黨員。六月二日開始在天安門紀念碑下進行絕食的四名知識分子之一。他只是重申：「我們肯定作為一個人的權利」。他對民主的要求，超越了學生，回到基本的人權。當日烈日高掛，他汗涔涔的在紀念碑下發表演說，然後退到帳棚內絕食休息。如今下落不明。

曹思源，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專事經濟及政治改革研究，是一個小胖子，聲音宏亮。研究所在中央民族學院附近，是一間他形容為「條件很差」的四合院。他全面肯定學生運動迫使政府作更深刻的政治改革，而他本人亦透過游說活動，嘗試影響政府決策。他於五月底發動五十七名人大代表簽名，要求召開緊急人大會議。不過他目前已經失蹤。

曾經公開提出要推翻李鵬的北大哲學系教授嚴家其，現時亦宣告失蹤。

八六年影響學生最大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六月五日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

大量知識分子四處逃竄。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北京實行軍管，並簽發戒嚴令，封鎖新聞，軍隊調動入京。

學生與市民立即組織敢死隊，以路障堵截軍隊，又把守各個主要通道，保衛天安門。而北京市民又向進城的解放軍游說，說明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

表面上軍隊成功地受到攔截，過程並無軍民衝突。

學生與羣眾慢慢鬆懈，天安門廣場起了腐朽的變化，而羣眾平靜的生活。

我到達北京的時候，它時常如此，廣大而寧靜，無論它在什麼時刻。即使在戒嚴令下，它黃昏的面貌，仍然靜謐。我還是在機場往北京市的途中睡着了（在密閉的楊樹果子/疏落而遙遠/陽光的升起而日落/間或記起），醒來已是復興門外大街，自行車緩緩駛過，市民在攤子間流連，街道空曠而乾淨，我伸出車外，不禁問：「這就是戒嚴令下的北京嗎？」

天安門廣場凌亂而又骯髒，我們說：「日日曝天安門廣場對住軍火庫。」屎臭薰天，同學在帳篷裏打牌，攤子賣水鎮汽水、醬鴨。此時聚集在廣場的學生約五、六千人，不少來自瀋陽、遼寧、哈爾濱、山西、四川、河南等偏遠地區，而曾經帶頭運動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很多已經返回校園休息及學習。

同時開始出現學生領袖貪污的跡象。每晚十二時整召開的學生代表大會，經常不歡而散，學生廣播站受到同學的衝擊，小旋流混雜其間，滋事打架。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會常委郭海峯、絕食團總指揮柴玲都表示要辭職。凌晨三時，我到絕食團廣播站去找郭海峯。他是當初在人民大會堂下跪的三個學生代表之一，北大學生。在昏黃的燈光下，他非常疲憊失望，說：「沒意思，沒什麼好談的。」學生應該撤走，撤不去，站着。而柴玲只是焦着臉，揮手說：「我很累，都垮掉了，不必說。」

而前學生領袖古爾爾希卻說：「做人要熱情、正直、勇敢。」

我卻斷斷續續記起郭玲來。郭玲是北京航海學校一年級學生，長得小，卻非常富有神采，長髮凌亂，足球鞋，見着我，總將我大力一握，笑：「香港記者。」然後，我帶你找什麼，帶你找什麼，沒事哪，就這麼着，嘩，累死了。但天天在見着男同學，勾勾搭搭，轉身卻無影無踪。我問男同學：「你是她同學？」男子搖頭，說：「不認識。」最後一次在紀念碑前見她，是六月三日的下午，見她的影子一閃，想跟她招呼，她便走了，如今不知她的下落。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都會經熱情和勇敢。因此我難以忘懷工人自治聯合會。工人自治會在戒嚴令後方成立，成員只有幾十人，而且被學

請不要逼我以血肉書寫歷史。請不要逼我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請不要逼我離我所愛丟我所思。請不要逼我一無所有。

生擠出至廣場西南角去。和其他帳棚一樣，昏暗、凌亂，散發塵草與污臭的氣味。他們設了一個廣播站，印發傳單，鼓吹工人獨立。

在此我遇到王登躍，三十歲，建築工人。現在相信已經被槍擊。當時傳出三名工人自治會成員被公安扣留調查的消息，我去工人自治會找他的時候，廣播正指責李鵬政府用恐怖手段對待工人。

王登躍的手掌厚實而穩重，見面時可大力一握。剪了小平頭，臉上有刀疤，神情惺惺。他亦不多話，只招呼我們坐下。我和一羣中大學生斷話，與另一名工人交頭接耳。王登躍沒有加入說話，在帳棚中做他的事。我跟他約了另一個時間見面。跟他分手的時候，他只是把大家護着，道：「千萬小心。我們已把性命豁出去了，你們不。」又叮囑我們不得單獨行動。

如果真有革命的浪漫病，那一刹那，我們都染上了革命的浪漫病，互不相識的幾個人，因為革命的熱情，緊緊的握着手，有無限的溫柔親密，親密得只能是愛情。

我還是一個人離開天安門廣場，時已夜深。學生豎立的自由民主女神像，在黑夜裏尤其顯得亮白。零星星星的是官方及學生的廣播在對罵。夜色清涼。我略一站，抬頭是城牆的毛澤東紀念像，而學生在紀念碑上卻豎立了「人民不會忘記」。工人自治聯合會高高的掛着紅旗。我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去尋求歷史的肯定，中國尤其難以拒絕歷史的誘惑。但歷史如此沉重，沉重得令人難以負荷。在革命的高溫裏，我只反動地渴望有平靜的生活。

六月一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氣氛非常沉悶。政府廣播不斷呼籲學生交出天安門廣場，而且又聲稱派發給學生回家的免費火車票將至六月三日。國務院向中外記者重複發出通牒，警告記者不得採訪。學生仍然無

血洗北京，舉世震動

■鍾草原

解放軍進城

1989年6月2日清晨二時許，許多正在熟睡的北京市民被大街上「沙沙沙」的腳步聲驚醒，有人開門走出一看，只見昏暗的街燈下，身穿白襯衣和各式運動衣，下身穿著軍褲的解放軍隊伍，黑壓壓的看不見尾，正在往天安門方向跑去。有的市民立即大喊：「解放軍進城了！市民們快起來！」市民們有的披著毛毯，有的穿著睡衣，有的只穿背心褲叉，紛紛走上大街攔截入城大軍。城西和城南數十萬市民即刻將這些數以萬計的入城部隊分割，像「包餃子」一樣團團圍住。在市民的質問下，這些軍人多數沉默不語，有的說，他們是急行軍來的，已走了三個多小時，上級命令他們到指定地點集合。許多士兵腰繫兩根皮帶，其中一根特別粗大。在隨後攔截到的軍車裏，經市民和一些學生檢查，車上除了裝載軍衣之外，還有大量的武器裝備，顯然是用來進行鎮壓用的。

攔截部隊進城的行動持續到上午，市區多處交通堵塞，許多幹部、工人無法上班，人們議論紛紛，預感到近日天安門將會出事。一周多來日趨平靜的市面，又緊張起來了。

6月2日上午，市民在中南海新華門附近的六部口，截住了兩輛載有槍枝彈藥的大巴士，羣眾將車內的槍枝彈藥取出展示。下午二時，當局出動七百名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強行驅散人羣，奪回了這兩輛載有武器的大巴士。

木樨地車禍

6月2日晚上十點五十五分，一輛配有警燈、未掛牌照的警車由西向東高速行駛，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木樨地撞向一邊的行人，將四名騎車行人撞倒，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傷的事故。肇事者是北京武警總隊五支隊司機陳福玉。肇事後，陳福玉態度輕慢，說是執行公務，圍觀羣眾十分氣憤，數千人將肇事警車和跟在後面的幾輛軍車團團圍住，發現後面的大卡車上都坐滿了身穿便服、但配有匕首、警棍的武警。

6月3日，種種跡象使學生們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市中心已有逾萬士兵「臥底」，近郊公路上也擠滿軍車。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組織召開會議後，立即採取應變措施，力求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

當時學生從軍隊手中搶來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這是前兩天市民與軍隊發生衝突時，從部隊手中繳獲的。「高校自治聯合會」開會後決定，為表明學生「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初衷，立即將槍支彈藥送還戒嚴部隊。晚上，學生代表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底下與軍隊聯繫此事，一位軍官出面表示，他們不予接收。學生們知道情況十分危急，為防止被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為學生殘殺軍人的罪證，大家在夜裏一點左右，在紀念碑台階上銷毀、砸爛了這批槍支彈藥。學生的廣播站同時發出緊急通知，說局勢十分危急，希望廣場上的市民和學生迅速撤離。當時廣場上仍聚集著數十萬市民和學生。廣播後，許多市民和學生撤走，但仍有約三四萬人是不願撤離，多數人不相信軍隊會向手無寸鐵的羣眾開槍。

深夜十二時，裝甲車衝進天安門

實際上，深夜十二點三十分左右，在西長安街上，數萬市民已與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推進的軍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民族飯店門口，上萬市民擋住軍隊的去路，而軍隊大量施放催淚彈。羣眾開始向部隊扔

石塊和汽水瓶，部隊開槍，一陣陣槍聲中，羣眾紛紛走避，許多人受傷倒下。羣眾主動將傷者送往附近的復興醫院搶救，醫院當時曾向電話採訪的記者證實，送到該醫院的受傷羣眾一百二十人，有三十多人已死亡。



▲有多少人在這次事件中傷亡，將可能永遠得不到確切的數字。

當晚十二點以後，裝甲車衝進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城樓下，對着成千上萬的人羣橫衝直撞，人們紛紛走避。憤怒的羣眾向裝甲車扔木棍和石塊，裝甲車飛快地前進後退，市民奮不顧身，終於包圍了這輛裝甲車。有人爬上裝甲車，試圖打開裝甲車的頂部入口，沒有成功。有人當場用火點燃一幅寫着標語的旗幟要燒裝甲車，有學生和一名中年男子上前制止，並高喊：不能燒！但已經晚了，憤怒的人羣不停地向裝甲車扔棉襖等易燃物，裝甲車迅速燃燒。裝甲車內有兩名士兵逃出，羣眾上前痛打士兵，局勢越發緊張了。廣場四周，裝甲車和衝過來的部隊不停地向廣場逼近，一面不停地放槍和施放催淚彈。不斷有市民中彈倒下。有的市民為擋住裝甲車前進，開來大巴和貨車擋在長安街中心，並用街上的水泥欄桿擺成障礙。坦克和裝甲車過來推開障礙，衝進廣場。官方的高音喇叭反覆播放當局的《通知》，密密麻麻的軍人，已緊緊包圍廣場。在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頂層，已經架起了機關槍。

廣場燈光熄滅

這時，留在廣場的學生約有三千多人，絕大部分緊縮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四周，也有少數學生仍留在帳篷裏。凌晨四點鐘正，廣場上的燈光熄滅，四周的裝甲車隆隆地開過來，部隊的包圍圈不斷縮小。

正在廣場上參加絕食的侯德建等四名知識分子經與軍方談判，同意廣場上的學生撤離，學生們也已同意撤退。可是，部隊很快就展開了「清場」行動。

事後，一個從廣場死裏逃生的清華大學學生，揭露了部隊「清場」的經過。他說，四點四十分，同學們正要撤退，一串紅色信號彈飛上天空，廣場上燈光又亮了。只見廣場上全是士兵，並在學生跟前架起機槍。一隊武警和軍人衝過來使勁追打，驅趕學生。學生們四處尋路逃走。三十輛裝甲車向人羣開來，一些學生給輾死了。退到紀念碑上的學生，被後面的機槍掃射，又死傷了一些學生。

一整夜槍聲大作、到處火光

一整夜，北京城槍聲大作，到處火光。因為實行新聞封鎖，新聞記者不能採訪，天安門廣場裏的真實

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仍有許多外國和港、澳、台記者，冒着生命危險，對這一嚴重流血事件作了採訪報導。

波蘭電視台記者貝雅在1989年6月4日當日報導說，他看見中國士兵在學生逃離天安門廣場時，朝學生的背部開槍。一名站在他身旁一公尺的學生在大聲斥罵向前推進的士兵後被射殺。

歷史將記住這一天

路透社記者1989年6月4日報導，中國科學院一名教授說，一名七歲大的孩子在人民大會堂外被殺死。

在這一流血事件中，有多少北京市民和大學生傷亡？中國官方的新聞媒介沒有報導，只報導了軍方有一千多人受傷的數字，而市民和大學生死傷的數字則未有報導。只承認「有一些」平民死亡。

據法新社6月4日報導，「從北京二十多間有人滿之患的醫院搜集得來的資料，經過一晚和一晝血腥鎮壓，釀致一千四百多人死亡和一萬人受傷。」

有外電報導說，傷亡數字遠遠不止此數。

也許，永遠得不出確切的傷亡數字。

但是，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

（內容未完） 89/6

天安門「六四」事件紀實

□曾斌

屠城那天夜裏，屠城軍架起機關槍對準學生亂槍掃射，三千個學生從紀念碑向東衝出去，衝到歷史博物館門口時，只剩下千多人了！睡在帳篷裏的學生都給坦克碾死了！



一名工人被士兵打得渾身血跡。

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血案，已是舉世皆知的了。對傷亡人數，美國報導說，死亡的市民和學生約有三千人。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六月六日對記者說：「據不完全統計，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暴徒和羣衆受傷兩千多人，軍隊和羣衆死亡近三百人，有四百多名軍人失蹤，生死不明。學生死亡的準確數字是二十三人。」到六月十六日袁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採訪時則改口說，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時「沒有打死一個人」，「一軍車也沒有軋死一個人」。美國記者形容這是「令人震驚的說法」，並稱該公司電視網拍攝的數以千計的錄影帶顯示學生和旁觀者遭到射擊，袁木回答：「在歪曲事實真相方面，現代技術的成果可以拍出更長的影片。」究竟誰的說法更接近事實呢？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先來說說「六四」血案的經過。

製造口實使鎮壓堂皇進行

「六四」血案完全是政治需要而製造出來的。爲使鎮壓得以堂而皇之地進行，在李鵬發表了宣戰性的「五一九」講話後，有關方面即不斷爲鎮壓製造口實。

首先，他們挑起並激化軍民矛盾。據部分軍人揭露，部隊在進京前即「關」了兩個星期，不准看電視、看報、聽廣播，集中學習《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從而培育軍人對所謂在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暴亂」的市民和學生的仇恨心理。部隊開到城郊遭受阻截時奉命原地待命，官兵被困在軍車裏幾個鐘頭不吃不喝，連大小便都很困難，自然產生報復情緒。臨近「六四」，一支軍隊奉命向天安門進發，他們着便衣跑了六個小時快到達時被阻截，由於疲憊不堪弄得丟盔卸甲，返軍營訴說後自然

使部隊產生廣場有暴亂的印象。總之，用大軍壓境的方式來造成軍民的對峙，激起士兵的屠城意識。其次，他們莫名其妙地指責「極少數人」和「開離人員」，並由北京市公安局拘捕工人領袖，給市民火上加油。

再次，他們故意將整車整車裝有槍枝等軍械的軍車開到新華門附近，讓市民和學生「搶」一槍「奪」一械，或者將整列軍車棄之路旁，讓阻截者去砸毀或焚燒（據說有的軍車是軍人自己放火燒的），從而製造了出現「反革命暴亂」的場面。

在上述種種蓄謀之後，古都京城終於在一夜之間變成血腥屠城。

十餘機槍一字架開亂掃射

「六四」天安門廣場血案的真實情況如何呢？一位逃離天安門廣場的北京清華大學學生訴說，六月三日晚上，「我一直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目睹了軍隊向我們靜坐學生及市民開槍鎮壓的全過程。」「我的好幾位同學已經被槍打死了。我的衣服上還染着他們的鮮血，我願以一個幸存者、見證人的身份，向世間一切愛好和平的善良的人們披露我所見到的槍殺的全過程。」

據這位學生說，他們是六月三日下午得知軍隊要鎮壓的消息。爲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他們將前兩天與軍隊衝突時獲得的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交給廣場的軍隊，軍隊稱奉上级指示不予接收，學生便將槍支和燃燒彈銷毀，以防破壞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爲學生殘殺軍人的「罪證」。

午夜十二點以後，當兩輛裝甲車從前門分別向廣場兩側急速開過，氣氛越來越緊張，官方的高聲喇叭反覆播放戒嚴部隊指揮部要人們離開廣場的通知，頭戴鋼盔的軍人密密麻麻地由四周圍向廣場，黑暗中，在歷史博物館的頂端，可以看到架出的毫

不隱藏的機關槍。

當時他們全體同學都緊緊退縮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學生當中，男生約三分之二，女生約三分之一；北京高校學生約百分之三十，多數是外地大學生。

六月四日，凌晨四點正，廣場上的燈光忽然熄滅了。廣播裏又傳來「清場」命令。當時參加絕食的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協議同學和平撤退。但是學生們正要撤退之際，四點四十分，一串串紅色的信號彈升上了天空。緊接着燈又全都亮了。廣場的正前方全是士兵。這是，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面迅速跑出一支部隊，他們全部穿著彩服，持衝鋒槍，戴鋼盔和防毒面具，據說是四川兵。

這支部隊一衝出來，首先在紀念碑正前方一字型地架起了十餘架機關槍。機槍手全部臥在地上的。槍口向着紀念碑的方向，背對着天安門城樓。當

還沒有到清晨五點，高聯下達向廣場外撤退的命令。於是，大批同學往裝甲車留着口子的方向衝去。喪盡天良的裝甲車這時却把原來的口子封死了。而且，三十多輛裝甲車還向人羣壓來，一些同學給輾死了，連紀念碑的旗桿也給輾倒了。這下子，整個廣場大亂了。我沒有想到同學們是這樣勇敢的，一批人衝上去推裝甲車，給子彈打倒了，又一批人踩着同學的屍體衝上去，終於將一輛裝甲車推開了一個口，我和三千個同學就是在槍彈中衝了出去，衝到歷史博物館門口，這批人只剩下千多人了。

「我當時是一邊跑一邊哭，我看見同學們正在機槍的掃射下往外衝，衝出來的路上趴下了很多人，我們都哭了。這時是五點。機槍掃射全過程約二十分鐘左右。

「我們這批人跑到了北京火車站後，我和兩個機槍一架好，馬上有大批的軍人和武警手持電棒，

膠皮棒和一些我從未見過的專門武器從紀念碑正前方衝入我們靜坐的隊伍，使勁的打，把學生的隊伍打開兩邊，他們就這樣打開一條路，一直打到紀念碑的第三層。有四、五十個學生被打得鮮血滿臉。這時，更多的裝甲車和軍人圍過來，在紀念碑周圍圍成一個大而緊密的包圍圈，只在博物館的方向留了一個口子。

帳篷裏面的學生都給輾死了

當紀念碑第三層的學生被打退到地面的時候，機槍響了。有的士兵跪着端起槍掃射，這些子彈是從頭上擦過；趴在地上掃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學生的胸膛和頭上。一見到這樣，大家只能往紀念碑上面退了，一退，機槍就停了。但是，在紀念碑上的軍人又把學生打下來，學生一到地面，機槍又掃射起來。

同學再回到廣場，這時是早上六點半。我爬上路邊樹上，看到廣場的士兵正拿着大塑料袋裝學生和市民的屍體，一個屍體裝進一個袋裏，然後用大帆布把成堆的袋蓋上。」

另據一名「外高聯」糾察隊學生訴說，當晚，在紀念碑下民主女神之下有幾十個帳篷，幾百個同學睡在裏面，還來不及喊醒他們，幾十輛坦克就在他們身上碾過去，並排地碾……

這些血淚的控訴，是對袁木之言的最有力的駁斥，難怪人們要稱他爲「袁廿三」，稱他爲「中國的戈培爾」（希特勒時代的撒謊專家）了。

創子手焚屍滅迹銷毀罪證

天安門「六四」血案製造者、屠城元兇窮兇極惡，手段毒辣。

本來，對付示威的學生，國際標準的武器是催淚彈、高壓水龍、塑膠子彈和警棍等，都是非致命的。可是，屠城元兇竟連重型機關槍、裝甲車、五噸重的巨型坦克，甚至在戰爭中也不容許使用的特種爆炸子彈，也用上了。在和平時期，用這樣的致命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誰敢相信？

「清場」軍隊，滅絕人性。他們在廣場堵截學生的退路，然後集中火力圍殲；他們從奔跑者的背後開槍，向街道兩旁住宅戶射擊；對趕來搶救的紅十字會救護人員也射殺，簡直毫無人性。

爲了銷毀血洗天安門的罪證，他們竟然焚屍滅迹。由於屍體太多，兇手們已不及將完整的屍體運走，於是他們運來了鋼架，將屍體架上去，用燃燒彈燒。更慘絕人寰的是，先用裝甲車將屍體輾碎，再放到架上焚燒，以便燒得更徹底。他們還對北京火葬場實行軍管，下令不准職工向外透露加班加點處理屍體的詳情，足見他們何等心虛！

「六四」天安門記

□光 魯

點滴的見聞，匯集起來就是珍貴的證據！

六月三日凌晨，戒嚴部隊進入市區，有的便衣，有的武裝，一部分軍隊在到達長安街六部口時被市民、學生堵住，有的機槍、彈藥被截。上午九時，許多市民、職工上街觀看，大學生將軍隊於晚上丟下的武器及用來打學生的各種器械在新華門前展示。下午二時許，防暴警察用催淚彈向圍軍械庫的市民、學生進攻，許多人被催淚彈打傷，有的是兒童和婦女。晚八時，電視連續播放戒嚴部隊的緊急聲明。要市民不要上街。但仍有數十萬人向廣場走去。廣場，人頭攢動但井然有序。十時許，據傳，在軍事博物館一帶的軍隊開始與市民發生衝突。十二時左右，軍隊在裝甲車的掩護開道下，全副武裝軍兵跑步從東西南北向天安門攻擊，沿街市民向其擲磚頭石塊抗議，官兵跑步強行通過各路口。

六月四日凌晨二時，槍聲四起，軍隊開始武力鎮壓，復興門、木樨地、珠市口、東單等地都發生血案，沿街許多市民被無辜打傷。三時半，在象來街宣武門一帶五十多輛軍車被市民堵住，四輛軍車被市民憤怒推翻點燃，火光照明黑夜。四時，數十輛坦克沿東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並傳來密集的槍聲。四時半從廣場方向傳來如大年三十夜晚一般的炮竹爆裂聲和人們絕望的呼喊聲，大約持續二十分鐘之久。槍聲悄然平靜，其後是可怕的死一般的黑暗。五時，零星的槍聲划破夜空，四方的信號彈不時升起。

多少夫妻離子散，多少人血染廣場，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家破人亡！

據紅十字會粗略統計六月四日晨，市民、學生傷亡二千多人，詳細數字無法統計。

六月四日早七時，在六部口附近的小胡同，記者碰到四名北師大同學，二名男學生身上全是血跡，但他們沒有受傷。問他們，他們說：「身上的血都是同學們的，我們逃出來，還有幾百名學生死在不離開廣場，現在下落不明。」另二名女同學，面色蒼白，神情恍惚，她們是在天亮之前藏在附近的小胡同裏，碰到二位男同學才一起出來的。這幾名大學生立即被附近市民騎車帶往學校。

八時三十分，七八輛坦克將六部口三面路口堵住，他們這些士兵，有的坐着，見到市民便條件反射的站起來或把槍端起，不讓人們靠近。有的在神經質地笑。據說他們是二十七軍的主力。

九時，大會堂兩側，代號一〇〇一部隊將路口封鎖，一輛宣傳車不讓市民靠近，從遠外望過去，有些兵士正在用塑料桶沖刷地上的血跡，一堆堆燃燒物還在冒煙。據附近居民說，凌晨密集的槍聲是從天安門廣場傳出的，屍體有的已被燒。此時，直升機不斷從天安門起降。



六月四日天亮後，天安門附近佈滿學生的屍體和自行車殘骸（美聯社照片）

升機不斷從天安門起降。

據觀察，和平門、宣武門、復興門、西單等各路口都有被憤怒的羣眾點燃的軍車。通往天安門西路被坦克壓得條條傷痕，有的商店玻璃被打成彈眼。筆者了解到，在六月四日凌晨武裝進攻天安門中，有些市民在樓上、道邊被子彈打死打傷，包括婦女、兒童和老人。復興醫院門口過道血跡斑斑，人們懷着悲憤的心情，排隊進入醫院認領自己家人的、朋友的屍體。在該醫院裏已死的四十四人，包括住在附近二十二號樓的工程師尹敬、公安大學學生李強、師範大學政教系八六級學生李平等，還有記者。有些是無名屍，身份無法查清。認領的親屬悲憤至極，痛哭失聲，大罵當權者。在復興路，有十多輛坦克及三十多輛軍車被憤怒的市民點燃，十一時，爆炸聲仍在響。

下午四時，雷聲滾滾，淫雨將至。據悉軍隊當晚如碰到阻止，官兵便開槍打擊。血仍要流下去！

歷史將永遠記住「六·四」，「人民將永遠不忘「六·四」！

新華月刊 1989/7

北京大流血

到底死了多少人

據可靠消息透露：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到七時，死亡人數是八千七百二十餘人。六月三日至九日，受傷者二萬八千七百九十餘人。

本刊特約記者 左逆

在這次鄧小平下令數十萬大軍屠城中，市民學生死了多少人？

袁木在六月六日下午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說，只有二十三個大學生死亡，部隊、「暴徒」、圍觀者死亡共近三百人。

時隔十日，即六月十六日，又是這個袁木，在國際俱樂部特設安排美國金門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電視採訪，說「在對天安門廣場的清理中，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沒有打死一個人，解放軍的軍車也沒有軋死一個人」。

到底這次屠城中，死了多少人？

有人說，這是一個永遠猜不到的謎。

要進行極精確的統計幾乎是不可能的。被坦克或裝甲車輾成肉醬而就地焚屍的，就難以計算。為了尋求數字答案，筆者跑了醫院，更通過朋友在一些軍事機關找到幾個可靠的數字，綜合起來就是我們需要得到的答案了。

據可靠消息透露：

從六月四日凌晨一時開始到早上七時，在廣場、東西長安街和前門，死亡人數是八千七百二十餘人。

六月三日到六月九日，包括阻截軍車和六、七、八、九日斷斷續續被打死的（不包括四日廣場、東西長安街及前門死者）是一千七百二十餘人。

六月三日至九日，學生、市民受傷人數是二萬八千七百九十餘人。

四日後，天安門廣場的屍體被焚後，每天用直升機運出去，四五、六接連運了三天，直到七日早晨。數字不詳。

袁木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說，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死亡三百人（包括「歹徒」和旁觀者）。據可靠消息的數字是士兵死亡十七人，受傷二千零四十三人。

一位學生親眼目睹了戒嚴軍在天安門廣場瘋狂屠殺愛國學生的暴行。他揭露說，屠殺之後戒嚴軍在成堆的屍體上倒上柴油燃燒，燒屍的濃煙滾滾衝天，難聞的臭氣衝天。燒屍之後，第二批隊伍迅速把遺留的殘骨和垃圾一起用鏟子裝走，然後第三批隊伍來消毒，整個屠殺場面安排得非常有序。

據說，有兩名解放軍戰士偷藏了幾塊燒屍的遺骨，準備作為戒嚴軍及鄧李楊集團屠殺人民的罪証，但事情敗露，兩人被捕。楊尚昆聞訊大怒，指責這兩個士兵是「人在曹營心在漢」。

新華月刊 1989/7

北京屠城記

郭倩

六月三日深夜至六月四日凌晨，全球炎黃子孫都不願意看見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據說是學習了半個月「愛護首都、愛護人民、愛護年青學生」，以及「爲人民看病、担水、和兒童開聯歡會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首都戒嚴部隊，用坦克、裝甲運兵車、輕重機槍和自動步槍，向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衆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現在，讓我們懷着悲憤的心情，回顧一下由六月三日深夜到六月四日凌晨四時五十分發生的、被北京市民形容爲「北京大屠殺」的經過吧！

序幕：詭計的運用

從整個事件的經過，可以知道這場屠殺是中共內部有些人一舉而兩得的是李鵬、楊尚昆一精心部署的、連串陰謀詭計的一部份。

五月十九日深夜，李、楊二人發表了臭名遠揚、自打嘴巴的「戒嚴令」後，各路大軍便逼近北京。這些軍隊多至五個軍的番號；部隊來自山東、山西、河南、遼寧。而且部份配備主戰坦克、裝甲運兵車、地對空導彈這些重型技術兵器。此外，民衆又發現，一部份士兵近一個星期來集中學習《人民日報》「四、廿六」社論，不許看報紙，不許聽廣播。而另一些部隊離駐地出發時，根本不知道來北京的任務，有些以爲北京「發大水」要來救災。

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北京衛戍區的部隊調動不到，或者是不獲李、楊的信任；第二，配備的武器不像用來對付「暴亂的民衆」，人們都知道一個月以來的「學運」一克制得很，絕無使用暴力，反而像用來發動軍事政變，或者是收平兵變。

數十萬大軍部署在市郊之後，老帥表示軍隊不會鎮壓學生；徐向前還說「誰開槍打學生就槍斃誰」。軍隊沒有即時強行人城，五月二十三日更傳出「撤離」，及「李鵬下台」的消息。但事後證實有誤，因爲軍隊只是調防，李鵬也沒有下台。

隨着解放軍幾個總部、海軍、各軍區及省市表態效忠李鵬之後，趙紫陽大勢已去。整肅包括趙紫陽、胡啟立、閻明復、田紀雲、秦基偉、洪學智、鮑彤等「七君子」之說，一時甚囂塵上。

由於幾次盛傳「軍隊入城」都未成爲事實（最引人注意的一次，是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從中國殘疾人福利會處得到消息，爲避免無謂犧牲而下令「撤離」致引起學生不滿的那一次），使北京學生和民衆益發相信大軍不是用於鎮壓學生，而是用來恢復秩序的，因此，警惕性逐漸降低。

另一方面，大軍未有迹象調離北京，人數反而越來越多；尤其是第二十七軍（現任總參謀長遲浩田，曾是該軍軍長，而現任軍長是楊尚昆之子）調來北京南郊之後，曾被總部一些軍官貼大字報，說要教導其「堅持真理」，不要被少數人利用，反映了軍內的鬥爭。

很明顯，軍隊背後有其代理人，而且在背後有所交易。傳聞版本甚多。

幕後的角力，在幾個老而不死的元老陳雲、李先念、彭真分別代表中共顧委會、政協及人大常委發言之後，形勢已急轉直下，李、楊集團，顯然已佔上風。其中最引人恥笑的是彭真，滿口依「憲法」辦事；其實這一個「老而不死」只是個普通黨員，却對幾個人大副委員長訓話。人大委員長萬里則留在上海「養病」。

最後，北京軍區司令部也表態支持李、楊。

五月底，怪事出現了，要打倒的「七君子」之一的閻明復，以政協副主席的名義出席座談會；現國防部長、原北京軍區司令秦基偉亦首次露面，探望戒嚴部隊，表達支持戒嚴及制止「動亂」。陪同的還有相當同情學生的、近幾年才升任副總參謀長的徐信及何其宗。而洪學智，較早已已表態支持李、楊。

此期間，北京局勢趨向緩和，六月一日

國際兒童節，天真爛漫的兒童，到天安門廣場探問靜坐的學生，還在美術學院學生製作的民主女神像前拍照留念。據說，傳已下台的趙紫陽，曾去市郊打了一場高爾夫球。

六月到來，北京屠城的日子近了！

避免大屠殺的最後機會

利用廣場學生更換指揮權，以及首都人民多天疲於奔命地配戴軍隊之後需要休息，那幾天，大批李、楊親信統率的部隊更換了便服，潛過市民設立的交通檢查站，進入市區，在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內集結待命。此外，又利用喬裝過的軍車，將制服、軍械及彈藥由市郊混過交通檢查站，運入大會堂及天安門城樓。

由五月二十七日起，不少這類混入的武警及士兵，換上了制服，不帶槍械地在天安門廣場邊緣步操及緩步跑，以展示實力。

六月三日凌晨，突有大批穿白襯衣、綠軍褲的士兵，沒有帶武器，由北京火車站，三四人一排以慢跑形式逼近天安門廣場，隊伍長約一公里。直跑到距離天安門廣場三、四百公尺，才被萬多市民截止。雙方僵持了二十分鐘之後，軍隊在三時〇五分散去。現場留下木棍、餅乾及方便麵。

後來證實這一萬多軍人係由東、南、西三個方向沿長安街及前門大街向天安門廣場進發。但在北京市民「全民抓兵」下失敗。這些士兵據說隸屬三十八軍，大多數態度溫和，打不還手。

有消息說，戒嚴部隊司令是由北京軍區司令周衣冰擔任，原來部署是以三十八軍官兵，以較溫和的方式進入天安門廣場，再迫令學生及民衆撤離天安門廣場。因此，這些士兵在遭遇市民一些非嚴重的暴力制止之後，便行後撤。

可能，這是避免屠殺事件的一個最後機會。因爲，大約二十四小時後，沿着原來路線向天安門廣場進迫的，便是號稱「楊家軍」的二十七軍了；以坦克、裝甲運兵車爲前導，其兇殘表現，令人髮指。

三日凌晨五時，陸續有消息傳來：要進城的軍隊有一部份並非那麼友善，像在溫泉附近的一支軍隊雖然被截住，但混亂中壓死了八個民衆，到七時五十分又壓死四人。

三日中午十二時，兩卡車武警在北京飯店外和市民衝突，傷三十多人。羣衆從車上搜出彈藥、刺刀、菜刀及匕首。市民認爲這是武裝壓制以嫁禍羣衆的。市民控制場面甚久，車上武器由武警施放催淚彈後奪回。

三日下午二時至六時，五千士兵由人民大會堂走出，即被廣場人羣包圍，發生間歇性的打鬥，人羣擲石，六名學生代表和軍隊指揮官談判，要士兵撤回。其後雙方對峙，士兵唱軍歌，學生及市民唱國際歌以作對抗。士兵在晚上八時退回大會堂，並口頭答允四十八小時內不返回廣場。

由上述的零星衝突，可見雙方仍有節制，軍隊至少未放槍。這也可能是屠殺令尚未正式下達，或戒嚴總部有意以這些部隊轉移羣衆視線，因爲二十七軍已部署強行進入廣場。

暴軍屠城

木樨地在永定門大街北端近前門大街，是政府比較高級官員的宿舍區。三日晚上一時，大批解放軍向城內推進，在此區和攔截的市民相遇，對峙；一百二十多位大學生照例把民衆與軍隊分隔，在短暫的衝突之後，大學生靜坐在軍隊和羣衆之間。但後來，軍隊向前推進，用自動步槍射擊靜坐的學生和後面的人羣。剎那間，大批學生及平民中彈倒地，其他未中彈者完全被嚇呆，根本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在來得及轉身奔逃前，又倒下了一大批！

這批部隊在開槍殺人後，殺性頓起，索性向周圍街道上的人，和在兩旁樓房上憑窗遠望的人開槍。（據說有一位國務院港澳辦高級幹部，以及兩位副部長住宅內的人，新華社工作人員的一些家屬被殺。）採用這種「格殺勿論」的方式推進，行軍速度便快得多了。同時，廣場西邊的復興門（距離廣場四公里）附近也響起槍聲，有四人當場死亡，百多學生受傷。

午夜時分，大量部隊進抵天安門廣場邊緣。同時，埋伏在人民大會堂、故宮及南海子一帶的幾萬名解放軍亦走向廣場，軍隊向廣場上空發射曳光彈。

天安門廣場上則聚集了十多萬羣衆，他們要保衛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靜坐的大學生。

六月四日凌晨零時三十七分，一輛裝甲運兵車沿長安大街西面高速衝向天安門，目擊者說時速約五十公里，完全沒有理會廣場的人羣，因此有七、八人被撞死，死者中甚至有士兵在內。據推測，此裝甲車的目的是為了衝破路障，但後來撞中一輛攔截的貨車而停下。羣衆一擁而上，用淋滿汽油的棉被覆在裝甲車上放火燃燒，車內幾名士兵意欲逃跑，但被人推回車上，結果被燒死。此外還有兩輛裝甲車分別在天安門的毛澤東像前、故宮旁邊被人縱火焚燒。

由於發生了裝甲車壓死羣衆的事件，天安門廣場氣氛大為緊張，靜坐的學生作出預防催淚彈的措施，作好被毒打及被逮捕的準備。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坦克及裝甲運兵車大量集結。

一位緊隨北京大學生敢死隊的香港學生對這經過有詳細的敘述：凌晨二時，民族飯店附近，幾千個工人市民以鐵鉤、尖竹、憑藉着四輛打橫的巴士做成的路障，準備和軍隊決戰。三百位學生在路障後數丈處形成第二道防線。

那時，突見一輛坦克全速駛來，不理會巴士上有人及人羣，將巴士撞開一個缺口。坦克退開後，學生敢死隊三十多人上前，以為可以沿用舊方法，用說服的方法叫士兵放棄武力。但是，天真純潔的大學生，被一人民軍隊——一排槍彈打死了。這位香港同學在其他中國學生拼死掩護下，才逃出修羅場。以後的一個多小時，二十七軍的士兵使用這種極其殘酷的方法——由坦克衝鋒，繼以亂槍掃射——粉碎廣場上的民衆和大學生的抵抗。最後，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同學團圍住。

紀念碑週圍的三千多學生，二時半便知道軍隊屠殺羣衆，但仍不肯放棄這民主陣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上唯一的民主土地），準備以悲壯的心情去迎接死亡。

凌晨三時三十分，廣場上絕食的侯德健、劉曉波等，和戒嚴部隊司令邵達成協議：在凌晨五時以前，容許學生們安全撤走。於是，北高聯和外高聯的負責人便接受侯德健的勸告，在同學們之間進行表決（在危急關頭還要實行民主，令人覺得可敬又可憐）。這時有一位香港學生亦在紀念碑台階上，

他聽到學生們「守」的喊聲遠比「撤」的響亮，但學生領袖還是下令「撤」。

當學生開始有秩序的向廣場東南方撤離，但在四時四十七分（還未到五時的時限），軍隊便開槍了。在一片混亂中，這位香港學生也是在不少北京學生的掩護下，才逃離廣場。有些同學受傷後仍囑咐他，一定要將廣場發生的事件真相，告知香港市民。

三天後，那厚顏無恥的袁木竟然說：在戒嚴部隊清場的全部過程中，死亡人數接近三百，其中大學生只有二十三人。而戒嚴部隊一個「政治主任」張工，更笑瞇瞇地說，從凌晨三時半至四時半，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

廣場的屠殺過後，坦克輾過帳篷，推倒民主女神，更燃起火堆將雜物燒毀。此外，更將死難學生、民衆的屍體焚燒，骨灰用塑料袋由直升機運走。

大屠殺後傳說紛紜

北京人民面對屠城士兵，表現出無比的英勇氣概。

在大屠殺後，北京人並沒有被嚇倒。在長安大街，坦克縱隊迎着朝陽前進，一位青年從樹叢走出，將帶隊坦克截住。坦克向左轉，他也向左，然後爬上坦克，掀開炮蓋叫裡面的士兵不要再殺人。整隊坦克似乎被其無畏氣概震懾，竟然沒有人開槍。這位青年終於在幾位冒死走近的市民攙扶下離去。羣衆並不怕死。他們在一定的距離痛斥軍隊的獸行，惹來一陣槍彈，人們伏下；但站起來再繼續罵。如果有人中彈死亡或受傷，後面的人便衝上來把死傷者抬走。

亞洲電視台的記者便目擊以下的一幕：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帶着幾個青年人高聲罵：「一、二、三，法西斯！」迎着軍隊衝去，他們沒有武器，直到全部中彈死去。大概這些人便是袁木之流口中的「罪有應得的歹徒及不明真相的羣衆」吧！

毛澤東說過：中國人民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

四十年來，毛澤東像一直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不知道他老人家看到六月四日由凌晨開始的屠殺，有何感想？

鮮血，激動了全球的華人，喚醒了炎黃子孫靈魂深處高貴的情操。

目擊者說，四日凌晨軍隊在廣場上殺人時，有些士兵雙目通紅，邊放槍邊狂笑，似乎吃了某些藥物。這些士兵在六、七個小時之前，對學生和民衆仍甚友善。一個香港學生便說，三日下午四時，他和一些學生在太會堂與軍警對峙，他單獨走出隊列，不斷和軍人說話，看到某些士兵眼有淚光。後來有些武警衝出用皮帶打他，但他却拉士兵拉入軍隊中保護起來，武警才悻悻然而去。

很難想像，這些解放軍在八小時後忽然變了一個模樣。

除了「吃藥」的說法之外，還有一種傳說，那便是鎮壓有賞，後退抗命者受罰。「賞」是軍官升一級，士兵可選入軍官學院學習（所謂「提幹」）。「罰」則十分殘忍，便是在抗命者頸部打一槍，雖不會死亡，但終生殘廢。

另一方面，有傳說說三十八軍部隊在城南跟隨二十七軍進城，但得知二十七軍大肆屠殺之後，這支部隊便主動走下坦克，裝甲運兵車及軍車撤離，讓羣衆將這一批八十多輛車燒毀。

軍隊間的火併？

六月五日下午，傳來軍隊火併的消息。由於大部份香港新聞機構人員已經撤離北京，因此消息頗為零碎。傳說是第三十八軍不值二十七軍屠城所為，因此向二十七軍發動進攻。

傳言是因北京城內槍聲不斷引起的；由於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在屠殺過後已不存在，所以揣測是兩軍衝突。此外，廣場上大軍集結，大批坦克列陣，並逐步向東、南、西三個方向推進，砲口朝着城郊方向。兩軍衝突的消息，最早是由一個西方外交官傳出，說天安門廣場以西兩公里，裝甲車以機槍互射。此外，目擊者又看到南郊路上躺着七個傷兵。使兩軍交火的傳聞越傳越熾烈。

此外，美國的軍事偵察衛星發現，集結在北京周圍的大約有三十萬至三十五萬部隊；城西出現兩軍對峙，坦克的主炮都向着對方。天安門廣場某處已被闢為直升機場，大型直升機穿梭來往，為屠城的二十七軍運來

補給。因此，又有人揣測：二十七軍已被圍，陸上補給斷絕了。

人們在不安的揣測中度過了六月六日。初期人們反對內戰，但此時人們却渴望有內戰：仁義之師揭竿而起盡殲屠城部隊！

六月七日上午，大批軍隊由天安門廣場撤離，坦克、裝甲車及卡車先導，步兵排成整齊的營方隊，唱着軍歌，叫着「反貪污」、「打倒官倒」的口號，不時向天空放槍。廣場以東使館區附近，發生軍隊包圍樓宇，說要追捕一個狙擊手，後來帶走一個自稱「香港人」的男子。槍聲仍不時傳來，有一次斷續長達十分鐘。

在這天上午，國內八間廣播機構的記者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安排到天安門廣場採訪，中央電視台拍下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寧靜」情況。直升機卸下大量辣味雪菜罐頭，有些記者品嚐了軍用壓縮乾糧。這段錄影帶後來被反覆播送，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有康一再重申：廣場上的學生「自動撤走」，當時軍隊沒有開槍，也沒有死傷一個大學生。

七日入夜，大批部隊（他們向羣衆說是三十九軍）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們右臂纏紅布條，部份神情緊張，警戒兩旁樓房可能有槍手出現。

二十七軍屠城部隊似乎需要撤出休整。傳媒則從主觀上判斷：二十七軍是被迫離城的。

李楊集團篡黨篡軍

雖然人們渴望見到暴軍被正義之師圍剿，但是，到六月七日為止，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已發生內戰，或二十七軍被圍剿。由於中共頭號強人鄧小平自五月十六日上午會見戈爾巴喬夫後便再也沒有露面；有關決定性的指示，也只是看到他有關四、廿六社論的指示。此外，一連串調兵、密雲不雨的形勢，使某些論者認為是楊尚昆，在利用鄧的威望「挾天子以令諸侯」。目前的形勢實際上是發動了一場武裝政變。

李楊集團在北京軍區中只控制到二十七軍，約佔該軍區五個集團軍的百分之二十兵力。但他們能利用楊耀遠浩田，以及另一個政治局常委喬石（公檢法系統頭頭，控制近



北京民衆圍觀被坦克碾成餅狀的屍體。

百萬武警），近乎完全地控制了北京市區。據報五月二十六日發表的「秦基偉慰勞戒嚴部隊」影片，是由舊新聞片剪輯而成，目的是穩定局勢。

此外，在戒嚴令發出之後，立即派遣親信部隊便裝進入中央廣播電台及中央電視台，牢牢地控制了輿論。而且悍然實施新聞封鎖，使趙派只能夠由海外的親信傳出消息。有關屠殺鎮壓令，說法很多。一說是由鄧定策，而由李、楊執行。另一說是鄧已死亡，但由李、楊極力掩護，利用鄧的威望以及前一段時間指示的精神，冒名下達命令。（編者按：六月九日鄧小平公開露面慰問平亂軍隊領導人，已使後一說法不攻自破。）

可以肯定的是：屠殺令，以及要將趙打成「反黨反革命集團」，都會受到軍方、黨方及政府方面高、中層某種程度的反對和抵制。老帥、老將內不乏反對者，但五月底以後則無消息。正因為如此，形成鎮壓行動中，不同派系部隊有極大的表現。

不過，陰謀家及劊子手總是心虛的，李、楊等（還有其家屬）傳已不在北京，或躲在兵團的指揮部內。北京市內由次一級的幫兇如李錫銘、陳希同及戒嚴司令部負責，由袁木之流出面開新聞發佈會。

從外長錢其琛在國外訪問講話口徑和李楊集團一致，以及各軍區、省市仍在執行中央命令，控制大局的目前顯然還是李、楊集

團。

至於六月四日至六日市區內的鳴槍，以及屠殺部隊的緊張氣氛，可以解釋為殺人後的神經質行為。事實上在三日至四日凌晨，已有一些軍械散落在民間，也有一些熱血市民用它們來襲擊暴軍。至於士兵之間的衝突，似乎是個別部隊所為，並非大部隊策略性的行動。解放軍傳統上受「黨指揮槍」的教育，中共軍委威望仍高。

李、楊集團大體上控制了黨、政、軍，這可能是在鄧的支持下達致。

一而再、再而三，事情向着人們所不願意見到的一方面發展。

巨大的迴響

北京屠殺中死難的同胞的確數，可能永遠不會為世人知道，因為很多大學生的屍體，就在天安門廣場上被處理掉。

外交界人士的估計，是死亡約七千人。各大學之中，以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及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死難最多。

學生的死難在神州大地產生巨大的迴響。成都、上海、廣州、南京、武漢、長沙等地，學生和羣衆都起來了。成都和上海等地都出現騷亂的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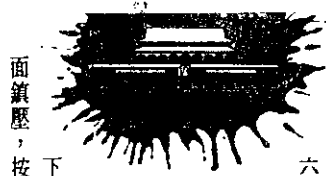
屠殺事件激起世界各國對殘暴的中共政權的嚴厲譴責，經濟方面的制裁將陸續有來。居改革前列的東歐國家匈牙利，亦率先發出嚴厲譴責；蘇聯則在觀望。令人覺得滑稽的是：越南表態支持。

大屠殺過後，中共面臨的內外交困，是四九年以來之最。人民心已寒，且看老人黨如何「回天」吧！

南北極月刊 89/6



天安門最黑暗的一天



六月三日晚上至翌日的一段時間，大陸發生了舉世震動的「北京大屠殺」。當地民衆和學生並不理會當局五月二十日頒布的戒嚴令，奮勇抗擊全副武裝入城的軍人，死傷數以萬計。以下是軍隊由首次施暴到全面鎮壓，按時間順序的簡要過程：

六月三日凌晨二時：數萬軍人出現在北京通衢大道東西長安街上，向市中心天安門廣場推進，但在市民堵截下被迫後撤。兩輛運送武器的汽車上午在中央重地中南海的新華門附近被市民截住。下午二時，千餘名防暴警察以催淚彈及警棍驅散人羣，奪回那兩輛汽車，是為月來民主運動首次遭遇的暴力鎮壓。期間，萬餘軍人自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西門衝出，列陣進入長安街，被市民圍困六小時後向前門方向撤走。此時已有大批軍隊進駐廣場四周的主要建築物。

晚八時後：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聲稱以「一切手段強行處置」違抗者；北京市政府透過電視呼籲市民勿上街，以免生命危險。

晚十時：裝甲運兵車和軍車由復興門外突入北京市西區，沿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市民沿途築路障阻截，軍隊開火；裝甲車高速衝撞，造成首批數十人死亡。

晚十一時三十分：軍隊以坦克和裝甲車開路，由建國門外突入北京市東區，沿著東長安街向廣場推進。在建國門立體交叉橋處一度受阻，一些軍車被市民焚燒。軍隊向市民開火後，進入東長安街。

六月四日零時：作為先頭部隊

的裝甲車到達天安門前的長安街，衝撞人羣，造成死傷。市民放火焚毀其中一輛，車中的軍人逃出後被圍毆，後由學生救離。

凌晨二時：更多軍隊自東西長安街開抵廣場前面，以密集火力驅散市民，造成大批死傷。部分市民向廣場靜坐的學生匯合。又有軍車被焚。軍隊包圍廣場，槍聲更加頻密。軍隊向廣場上十餘萬學生和市民反覆廣播「最後通牒」，命他們立即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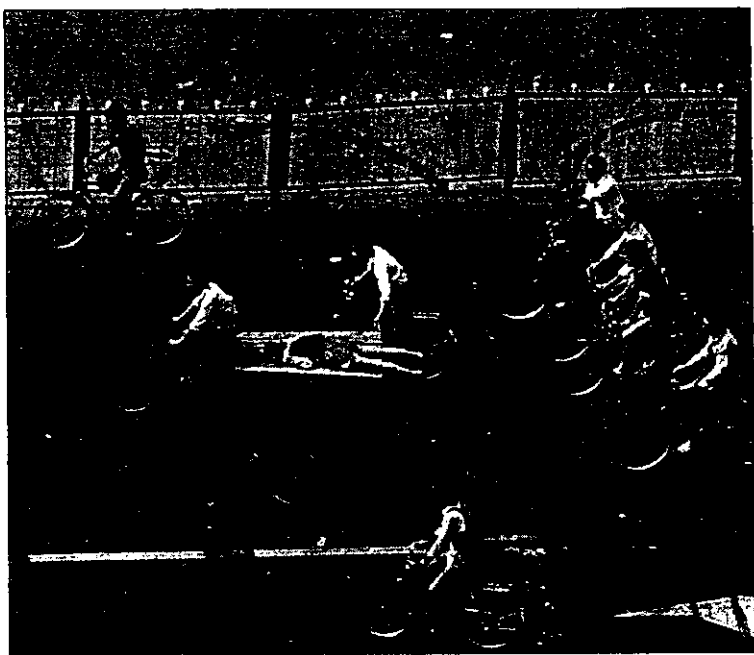
二時三十分：軍隊從廣場四周向前推進。學生要求談判，軍隊沒有答覆。其後一隊軍人端著刺刀由廣場南面衝向人羣，人們以磚塊還擊。

二時四十五分：北京中央電視台公布戒嚴部隊的「最後通牒」。學生繼續呼籲談判。這時廣場北面一輛裝甲車高速衝向人羣，造成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人羣被迫向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

三時三十分：在廣場上絕食的作曲家侯德健代表學生同軍隊談判不果，定於清晨五時再作談判。廣場上仍有十萬名市民和學生。

四時：廣場燈光突然熄滅。一

市民用「大板車」把傷者送往搶救：血腥鎮壓



系列：新聞特

片漆黑中，軍隊廣播「清場」的命令，學生則播放《國際歌》，並繼續要求與軍方談判。軍隊在照明彈指引下，繼續收縮包圍圈。

四時三十分：學生口頭表決同意撤退。軍方限半小時內全撤走。

四時四十分：學生和羣衆開始撤離。突然紅色信號彈升起，廣場燈光復明，學生發現面對無數士兵和成排的機槍，裝甲車從西、南、北三面輻向學生的帳篷。軍人手持電棒、膠皮棍撲向人羣時，子彈掃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的學生。

四時五十分：人羣向東南方撤離，有人中彈或被毆斃，還有人為掩護同學而被裝甲車、坦克壓死。

五時左右：廣場上的人羣大多已被驅散；軍隊推倒了數天之前由學生矗立的「民主之神」塑像。

五時三十分：軍隊完全佔領廣場。續有大批軍車和士兵開到。坦克和裝甲車則在東西長安街來回高速開動，並向兩旁的人羣開槍。

七時三十分：軍隊向廣場四周重新聚集的人羣發射催淚彈。之後，數十輛坦克、裝甲車及數萬士兵把廣場四周嚴密封鎖。時有直升機在廣場上上升。大批坦克、裝甲車把守西長安街至新華門一段。

早晨時分：軍民在東長安街對峙。市民向軍隊投擲磚石，軍隊不時開槍，多人死傷；直到下午三時許天降大雨，市民才陸續散去。市民在市內多處築起路障，燒毀大批裝甲車和汽車。軍隊的數十輛坦克、裝甲車通宵在東西長安街上往返行駛，向民衆展示實力，流彈四射，兩旁不斷有平民中槍倒下。

上午十時：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通過電台宣布：完全佔領廣場。下午七時中央電視台向全大陸轉播戒嚴部隊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亂」的「第一步勝利」。同一天晚上，北京市內槍聲不絕，多處可見火光，不斷有死傷者送院。

腥風血雨的時刻(北京時間)

軍隊鎮壓民運過程紀要

六月三日

凌晨一時 數萬軍人由北京城東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大部分士兵並無武裝。西、北兩面也有軍隊開進。

凌晨二時十分 二輛裝載軍人及軍械的大巴士在西長安街被羣衆包圍，學生將車上之槍枝放於車頂；另有十五輛軍用卡車在附近被羣衆成功攔截。

凌晨二時二十分 約三千名戒嚴部隊由東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至距廣場五百公尺處受阻。

凌晨三時 羣衆在天安門附近將逾千名軍人趕進一建築地盤，軍人惟有席地而坐；在東長安街，在民衆的掌聲中，約三千名士兵被迫撤退。

清晨六時半 約五十名北京政法大學學生在新華門前展示奪得的軍帽、軍靴等。

中午十二時 兩卡車武裝襲擊北京飯店外的羣衆，約三十人受傷。

下午二時 武警在廣場以西發射催淚彈，毆打和驅散人羣，歷時三十分鐘。另五千名軍人在人民大會堂前被羣衆包圍。

下午三時半 在西長安街，軍隊奪回裝載X-2自動步槍的巴士後撤退。

下午四時半 在人民大會堂外，軍隊與民衆衝突，互擲玻璃瓶及石塊，軍人並用皮帶抽打人民，有人受傷。

下午五時半 五十輛運兵卡車在東直門口爲學生、市民截停。

晚上七時 中央電視台重申戒嚴規則，警告人民不得上街，並須離開天安門廣場，宣稱戒嚴部隊、公安警察、武裝警察有「採取一切手段強制處理的權限」。

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在人民大會堂西側，遭羣衆包圍的部隊中將答應撤退，「四十八小時內不進天安門廣場」。

晚上七時五十五分 約七十輛軍用卡車抵達建國門立交橋，又爲羣衆所阻。

晚上八時二十分 人民大會堂西側的軍隊開始退入大會堂。

晚上九時 二萬多人在廣場以東四公里截停廿六輛軍用卡車。

晚上十時 軍人在北京市木樨地攔路民衆放催淚氣及開槍，約廿人受傷；近二萬軍人進入廣場周圍的建築物。

晚上十時四十分 北京飯店內傳出兩響槍聲，隨後拒架扛出一位胸膛染血的學生。木樨地的軍人一面開槍擊倒人牆，一面向廣場推進。

晚上十一時 在復興門的軍隊開槍，數十市民死傷。

午夜 軍隊以裝甲車清除羣衆設立的路障。武裝部隊由坦克車和裝甲車開道，殺向天安門，一路向羣衆掃射。羣衆惟有以石塊、棍棒還擊。

六月四日

凌晨一時 二輛裝甲車高速衝向廣場，輾死市民。一輛在新華門前被巴士截停，另一輛被民衆用鐵枝插進履帶而不能動。其後裝甲車內士兵被拖出毆打，車則被民衆潑汽油燃燒。

凌晨一時半 軍隊由新華門推進，開槍驅逐民衆，百多人死傷，救護車往來如梭。

凌晨二時 公安人員在多數記者下榻的北京飯店，設立三道檢查關卡，沒收所有膠卷、錄音帶、錄影帶，並禁止記者到陽台觀看。同時，軍隊由北大、頤和園、公主墳、人民大會堂等地向廣場推進，不斷向羣衆開槍。

凌晨二時二十分 軍隊由三面進入天安門廣場，羣衆四處奔逃。約萬餘名學生與侯德健等四位絕食者堅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

凌晨二時四十五分 官方在電視上聲言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叛變」、「流氓瘋狂攻擊人民解放軍部隊，搶奪武器，毆打官兵，意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社會主義」。同時，一列長約兩公里的軍方車隊由城西向天安門推進，約有二萬名士兵的裝甲師由東面進城。廣場上，軍隊用噴火器、刺刀、機關槍等肆意屠殺。

凌晨三時 學生透過廣播系統要求與軍方談判，軍方不予理會。約二百名士兵由南面向人民大會堂推進。羣衆高呼「法西斯！法西斯！」不少人向人民大會堂窗戶投擲磚頭。

凌晨三時半 侯德健等人與軍人談判。

凌晨四時 廣場燈光熄滅，大批軍人在一聚光燈照射下衝向紀念碑。五千多名留在廣場靜坐的學生被包圍。數以萬計的市民回到廣場上，高唱《國際歌》。八輛軍車駛入廣場。

凌晨四時半 學生以口頭投票方式決定撤離廣場。當人羣開始撤離時，軍隊已推進至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坦克縱隊駛入，向人羣開火，遇警即開槍還擊。

凌晨五時 五輛坦克由東南兩面駛入廣場。槍聲卜卜。學生手牽手撤離，高唱《國際歌》，並作出V字的勝利手勢，與進駐廣場的部隊擦身而過。

凌晨五時半 方圓數公里內爆炸聲和機槍射擊聲此起彼落。工程車清除路障後，約二百五十輛軍用卡車開入廣場。軍隊調派士兵，約四十一組，坐在廣場邊的長安大街上，一見羣衆接近即

開火。一輛坦克將民主女神推倒。

清晨六時 東單冒起陣陣火燒汽車的黑烟。部分民衆焚燒公共汽車，砸破商店窗櫺，部隊和武警四出開槍殺人。

早上十時 北京電台一名新聞報道員譴責軍隊暴行，並謂遇害的無辜市民達數千人。該報道員隨即被另一報道員取代，新報道員聲稱軍隊已勇敢地粉碎了一場反革命暴亂事件。

(按：本紀要根據各方面之報道整理而成。)

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 告世界同胞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剛過去了一個多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又一次愛國民主志士用他們的鮮血染紅了鮮紅的五星國旗，長安街上血流遍地，北京城裏哀樂四起。中華民族到了這樣危急的時刻，這與我們向為共和國的命運而受傷的民主志士致敬，也向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作出嚴正的宣告。

四月十五日以來，北京青年學生自發掀起了大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四月二十二日，北京青年學生衝破禁令，到天安門廣場參加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會後，學生代表長跪人民大會堂前，呈遞請願書，政府官員無一出面。

反覆無常 定性動亂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粗暴地將此次學潮定為動亂。次日，為抗議人民日報惡意歪曲污蔑，首都高校再次舉行示威，首都各界民眾熱情支持，予以肯定。百萬人民走上街頭，全國各地學生與各界民眾紛紛響應，掀起了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潮。

面對人民的呼聲，面對勢不可擋的民主愛國運動，政府當局使出慣用的伎倆，陽奉陰違、拖延、搪塞、挑撥離間，不與真正的學生代表對話，拒不容應對話條件，蓄意製造事端、擾亂社會秩序。期間，青年學生和出色的北京人民表示了最大的克制與秩序，維護了北京的安定團結，對於青年學生和億萬人民的民主要求，政府置之不顧。

五月十三日，首都高校學生忍無可忍，近千名同學自發組織了絕食請願運動。兩天之內，絕食學生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社會各界反應強烈，聲援活動遍及中華大地，廣大人民強烈要求政府立即坦誠、平等地與學生對話，迅速接受絕食同學的條件。

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李鵬等人終於忽忽出現於天安門廣場，看盡了絕食同學，並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聲稱黨中央沒有說過學生運動是動亂，保證絕不秋後算賬。然而，就在當天晚上，李鵬、楊尚昆召集北京部分黨軍政幹部會議，稱愛國民主運動為動亂，並號召緊急行動制止動亂。

次日，國務院及北京市政府發出戒嚴令，數十萬軍隊進城，大軍壓境，殺氣騰騰。

血腥暴行 亂殺無辜

就從軍隊開入北京的那一刻起，青年學生和北京市民便奔赴各個路口和子弟兵談心，共議國

家大事，暢敘魚水深情。其後數日，政府一手製造的首都混亂秩序，得以迅速恢復，軍民關係十分融洽。首都人民在和平、安定、美麗的古都愉快生活和工作者。據新聞報導，這些天首都刑事案件、交通事故和火災發生率明顯下降。

然而，暴行正在陰謀的計劃中，正在向無辜的學生和民眾逼近。

六月二日，軍車超速行駛，在本樺地附近撞死三人，重傷一人，拉開了反動政府向愛國民眾血腥鎮壓的序幕。

六月三日凌晨，軍隊穿便裝乘客車向城中進發，市民學生起而攔阻。前門、六步口、西單等地的軍隊施放催淚瓦斯和發射橡皮子彈，打傷很多學生市民。在六步口，當場有一名七歲兒童被士兵踩死。

便衣縱火 嫁禍羣衆

六月四日凌晨左右，在西單路口由北向南高速度開來的三輛裝甲車，撞壞了一輛停在路中的公共汽車。旋即，從軍事博物館方向傳來了隆隆的行軍車和連續不斷的槍聲。據被射擊而跑出來的學生說，在軍博到西單之間已有大批學生、市民傷亡。零點四十分，軍隊在距西單路口五百米處，首先發射了大量的催淚瓦斯，人羣雙目難睜，只好就地蹲下。就在此時，幾輛汽車同時起火，顯然這是便衣有意所為，意在嫁禍於學生市民，為當局暴力屠殺提供藉口。

六月四日零時五十分，大批防暴警察口中狂呼「打」，將投擲子彈射向正在路邊毫無預備和抵抗能力的學生、市民。頓時，一排排學生、市民應聲倒在血泊中，幾十人當場死亡，數百人受傷，死亡者還包括路過圍觀的民眾。那些進入胡同躲避的學生和市民，只要被士兵發現，就有發子彈彈射擊。在西單東面的一小胡同深處，一梭子彈一氣打傷了四人，街上的人羣中從娃娃到老人，無一倖免。

一點多鐘，大批滿載軍隊的軍車趕至西單路口，無數羣衆立即在路邊或胡同口靜觀，但一批批衝來的士兵，對着人羣不時掃射，人們成羣成羣的倒下。他們不僅向人羣掃射，而且追打躲閃不及的市民學生。所有器械有警棍、皮鞭、槍托等，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一位同學，雙腳被打得

流血不止，他說，他們幾個男生上前救一名女生，一梭子彈飛過，頓時倒下了五位同學。三個小時之後，西單路口軍隊過完，當時倖免於難的市民和學生，紛紛往天安門廣場，通向天安門的街道又被軍隊封鎖。軍隊毫不猶豫地向道邊的人羣掃射，即使是退却的人也不放過，口號聲起處槍聲更為密集。

慘絕人寰 血債血償

從六月三日三時至四日六時，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及前門大街一帶，響徹着機關槍與衝鋒槍的掃射聲。軍隊所經之處，處處血漬斑斑，傷亡無數，街道哭聲不斷，慘不忍睹。天安門廣場軍車林立，坦克衝鋒直撞。自清晨六時，據不完全統計，傷亡共七千多人，死三千多，屠殺還在繼續，傷亡還在擴大。難以計數的市民學生倒在血泊中，他們手無寸鐵，毫無防衛槍彈的能力。不過，他們帶着毛巾口罩，以為軍隊頂多施放催淚瓦斯，發射橡皮子彈，善良的學生市民絕對沒有料到，李鵬政府如此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在木樨地一帶首批被射擊的學生市民，他們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是死在真槍實彈之中。這些無辜的渴望民主與自由的共和國公民，就是李鵬政府的所謂的反革命暴徒。

六月三日至四日發生在北京城內，由政府軍隊蓄意製造瘋狂屠殺毫無防衛的人羣中，槍傷血案才是李鵬偽政府真正的反革命證據。全世界人民絕不會饒恕李鵬的反動政府，他們欠下的血債一定會如數償還。

歷史罪人 民族敗類

四月十五日發起於北京，燃遍於全國，影響及全國，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青年學生舉起爭民主、爭自由、反專制、反獨裁、剷除官倒、廉潔政府的大旗，代表了全國億萬人民的意願，喊出億萬人民的心聲，這次運動繼承和發展了五四精神，揭開了中國歷史上民主自由的新篇章。然而，以鄧小平、李鵬及楊尚昆為首的一小撮反黨、反人民分子對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懼怕萬分，恨之入骨。他們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為了保護自己及極少數人的利益，掩蓋事實真相，造謠滋事，稱愛國民主運動為動亂、反革命動亂。他們的一意孤行威脅、恫嚇、軟硬兼施，以致於向無數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北京市民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世界特大慘案。事實充分暴露了他們的極端兇殘和腐朽的本質，有力的證明了他們的政府根本不是人民的政

府，而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專制、獨裁政府，證明子鄧小平、楊尚昆及李鵬一小撮是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人民的公敵。

法西斯政府已經撕下了偽善的面紗，獨裁者已經暴露了兇惡的嘴臉，中華大地陰雲籠罩，北京城裏血雨腥風，然而歷史早已宣告：人民必勝，民主自由必勝，我們北京高校學生，絕不在邪惡勢力面前，退縮半步，一定和他們鬥到底，我們將用我們的熱血、青春，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告，我們必定無愧於五四先賢，六四英烈，必定無愧於我們的時代及民族，必定無愧於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藉此民族危難之際，我們呼籲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推翻鄧、楊、李的反動政府，推翻肆意屠殺人民、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打倒肆意踐踏人民意志的獨裁者，我們呼籲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自由、民主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和平、自由、民主的旗幟下，聲援中國學生和民衆的愛國民主運動，聲討中國政府當局的法西斯暴行，對鄧、楊、李政府這些獨裁者實行有效的經濟、外交制裁，以弘民主之精神，張人權道義，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為民主、為自由而戰，打倒專制，打倒獨裁，打倒法西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萬歲。

北京市高校聯合會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踏着屍體衝出廣場

幸存者的控訴之一

趙汗青 整理

(轉載自六月五日香港文匯報)

我是清華大學學生，現年二十二歲。四日晚上，我一直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目睹了軍隊向我們學生及市民開槍鎮壓的全過程。

我的好幾位同學已經被槍打死了。我的衣服上還染著他們的鮮血，我願以一個倖存者、見證人的身分，向世間一切愛好和平的善良的人們披露我所看到的槍殺的全過程。

學生交槍軍隊不收

坦率地說，我們四日下午就知道軍隊要真正實行鎮壓的消息。原因是一位不願透露身分的人在下午四點左右打來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廣場附近一條胡同的傳呼電話站，這個人叫我們學生負責人去聽的）。這人在電話中明確地告訴我們即將進軍天安門進行清場的情況。這個消息引起我們的警惕，我們緊急商議後採取一些措施，力求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

當時我們學生手中有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這是前兩天與軍隊發生衝突時，從他們手中繳獲的。「高校自治聯合會」召開會議後決定，為表明我們同學「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初衷，立即將槍彈送還戒嚴部隊。四日晚上，我們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下與軍隊聯繫此事時，一位軍官表示，奉上级指示，他們不予接收。

商談無效，同學們便在夜間一點左右，因為當時情況已經極度危急，在紀念碑台階上鎗戰，把燃燒彈擲向，倒出汽油，以防被壞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為學生殘殺軍人的「罪證」。

學生心中尚存希望

然後「高治聯」在廣播中通知大家，局勢十分嚴峻，鑒於流血難以避免，希望廣場一帶的學生和市民離開，但仍有大約四、五萬學生和十萬左右的市民堅持留在廣場上。我當時就沒有走。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氣氛的確非常緊張，同學們是平生第一次經歷這樣的險惡環境，說不害怕那是假話，但大家已經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意志堅定（當然也有同學認為軍人不該開槍打死人），總之，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在鼓舞我們，那就是，同學們將為中國的民主和進步作出犧牲，這是有價值的。

十二點鐘以後，也就是兩輛裝甲車從前門分別在廣場兩側急速開過以後，情況越來越嚴重，官方的高音喇叭反覆播送「通知」，頭戴鋼盔的軍人密密麻麻地由四周圍向廣場，黑暗中，在歷史博物館頂端，可以看到架出的毫不隱蔽的機關槍。

當時我們全部同學都緊縮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我留心計算了一下，同學當中，男生大約佔三分之二，女生佔三分之一，北京高校學生約有百分之三十，多數是外地大學生。

凌晨四時正，廣場上的燈光忽然熄滅了。廣播裡又傳來「清場」的命令。我當時心裡有一種很緊張的感覺，好像只有一句話，這個時刻到了，這個時刻到了。

十餘機槍一字架開

當時，參加絕食的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協議同學和平撤退。但是同學們正要撤退之際，四點四十分，一串串紅色的信號彈升上了天空，緊接著，廣場的燈又全部亮了。我看到廣場的正前方全是士兵。這時，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面迅速跑出一支部隊，他們全部穿著迷彩服，持衝鋒槍，戴鋼盔和防毒面具。這支隊伍在六月三日傍晚六時左右，我們曾經跟大會堂西門的一個團的軍人談判，他們的團長說過，他們只是接應部隊，到時與學生直接見面的是四川來的部隊。他保證不會向學生開槍。也許，現在跑出來的就是四川兵了。

這支部隊一衝出來，首先在紀念碑正前方一字型地架起了十餘架機關槍。機槍手

打下碑後亂槍掃射

另外，打到紀念碑第三層的士兵和武警把我們設在上面的廣播設備、印刷設備、汽水全打爛以後，就把上面的學生打到了下面。我們一直沒有起來，只是手拉手，唱着「國際歌」，喊着「人民軍隊不殺人」。但是，被那麼一大幫人在上面亂打亂踢，坐在紀念碑三層，密密麻麻的學生就被迫退下了。

當時第三層的學生被打退到地面的時候，機槍響了。有的士兵是跪著端起槍掃射，這些子彈是從頭上飛過，叭叭叭叭地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同學的胸膛和頭上。一見到這樣，我們又只能往紀念碑上面退了。我們一退上去了紀念碑，機槍就停了。但是，在紀念碑上的軍人又把我們打得退了下來，我們一退到地面，機槍又掃射起來了。

這時，工人和市民敢死隊的人急了，他們操起能作武器的瓶子、木棍就衝過去與軍隊對抗。在這個時候，高射炮下達了向廣場外撤退的命令。這時還沒有到五點。

踩着屍體衝開缺口

於是，大批同學們往裝甲車留著口子的方向衝去。喪盡天良的裝甲車這時卻把原

來的口子封死了。而且，三十多輛裝甲車還向人群壓來，一些學生給輾死了，連紀念碑前的旗杆也給輾倒了。這一下子，整個廣場大亂了。我沒想到同學們是這樣勇敢的，我們一批人上去推裝甲車，這批人給子彈打倒了，又一批人就踩著前面的屍體又衝上去。終於將一輛裝甲車推開了一個口，我和三千個同學就是在這推開了一個口，衝到了歷史博物館門口。衝到這裡，這一批人只剩下千多人了。

這時，博物館門口還有很多市民，我們跟他們一會合，見到情況這麼惡劣，大家立即向北即天安門方向跑，但是剛剛跑幾步，北面樹林就響起槍聲，不見人，只見到槍口的火光，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立即轉向南即前門方向跑去。

機槍掃射達廿分鐘

我當時是「一邊跑一邊哭，我看見第二批同學正在機槍的掃射下往外衝，看到衝出來的路都封住了，我們都哭了，一邊哭一邊跑。我們這批人剛跑到前門，就迎面碰上了從前門方向跑來的大批軍隊，他們是從珠市口方向跑來的。他們碰上我們沒有開槍，都是拿著大木棍，往我們身上使勁的打。在這同時，前門衝出了大批市民與這批軍隊發生激烈的衝突，保護我們向北的方向。這批軍隊就在後面追我們。這時是凌晨五時。廣場的槍聲也漸漸停下來了。後來我在國際紅十字會見到了同學，他告訴我，五時最後能跑出來的都跑出來了。機槍掃射全過程約二十分鐘左右。

最令我難忘的是，我們清華的一位男同學（江蘇籍），他被機槍打傷流血，依然與我們一同逃跑，半路上他支持不住了，從後面撲在我肩膀上說：「你扶我一下吧！」當時我兩臂攙著兩個體弱女同學，沒來得及救，使他倒在地上，人群紛紛踏在他身上……他肯定死了，你看，我背上還有他的血跡，當時他手邊身體都是血。

奮不顧身搶救死傷者

我永遠忘不了同學被槍殺倒，大家奮不顧身搶救和救護傷者的情景。有些女同學，脫下單衣為同學包紮傷口，身上已經沒有衣服可再脫了……

我們這批人跑到了北京火車站後，我和兩個同學再回到廣場，這時是早上六點半。前門圍了很多多市民，我跟著市民往裡走，走到紀念碑時就再走不進去。幾排裝甲車就在那擋著，士兵也站成人牆。於是，我走到路邊爬上樹叉，看到廣場的

士兵不讓醫生救人

在這裡，我碰到了一個和我同一個部的同學，他是第二批衝出來的。他告訴我，死亡人數很多。士兵不讓國際紅十字會的救護車進場救受傷的市民和學生。我和這個同學立刻趕到和平門的國際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看到很多打傷的人都是用人力三輪車送來的。這裡的醫生告訴我，一輛進入廣場的急護車被士兵開槍打著火了。我在這裡見到了第二、三、四批衝出來的學生，他們說，很多受傷倒地的同學都躺在廣場。

七點二十分左右，我又折回廣場，問了一下情況，特別問了十幾個上了歲數的人，他們都說，廣場的人行道上的死的人都是人挨著人，軍車支起了帆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軍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軍車，不知運去了什麼地方。

大約是七點半吧，廣場的士兵突然向這裡的人群發射瓦斯，大批士兵也向人群衝來，這時，我再次向北即前門跑去。在往北京的路上，看見第一、二批衝出的學生，他們都在哭。

居民領同學回家避難

高校聯給我們北京同學的任務，是負責將外地同學送到火車站。我把這些學生帶到火車站，想送他們回去，但是站的負責人說，火車全不通了。我們只好又走了出北京站。這時，周圍的市民大批地圍上來，說願意領同學回家避難。很多市民很難過，都哭了。北京市民真好，他們真好。一共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我堅信，總有一天，人民會清算清楚的！

悲觀？不，我不悲觀。因為我看到了民心，看到了正義，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的一些同學死了，更多人的傷口在流血，我是一個倖存者，我知道該怎樣去生活，我不會忘掉死去的同學，我也深深地知道，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都會理解我們、支持我們！

人群一個個倒下

幸存者的控訴之二

這是一名北京首都鋼鐵廠工人經歷的一夜，請聽：

我是首鋼的工人，三日下午六點我就到天安門來了，要看看怎麼回事。因為我對政府還抱着一份之一的好感。到了廣場上，我還和學生們說，政府不會做得那麼絕，所以呢，我就和大學生們做工作，求他們千萬別動手。四日凌晨一點十分，槍聲在天安門廣場響起。我還說不要怕，他們只是對空射擊，大家不要先亂起來，也不要怕那些棍棒棒子在手裡。我說：這沒用的，他們手裡有武器，咱們就沒動，這樣，他們是不敢輕易動手的。咱們可以和他們講道理，要是講服了，就別動手，他們講得通，那麼咱們就跟他們，押着走都可以，就別動手，別流血。講到這兒，一看東長安街天安門前，排了兩輛坦克車，我就跑到南池子大街口道邊，大伙兒對這兩輛坦克車直揮手，喊着不能動手，你們要是動手，他們又會製造起來，咱們是動亂。

一點四十分，硬是放槍了，警車、裝甲車一路由西面中，兩點，那是真動手了，分不清是警察還是軍人，就往裡面，往群眾開槍，大家還以為是橡皮子彈，我還是攔着學生，不要動手，能開一個是一個。我來就是抱着和平的態度來的，一個人在這個廣場上並不能起多大作用，要攔軍車、攔當兵的我一個也攔不住，但我可以脫服他們。這時，我的想法就在煙硝槍聲中全給抹了，人民解放軍向群眾開槍了，群眾看到人是一排一排的倒下，人家斃傷了，然後沒命地躲，有的繼續跑，一個一個就看着人群倒下。

槍聲才歇，由西向東的軍車和裝甲車就趁勢推前，向東驅趕群眾，當時從天安門前到廣場都是人，一下子就都完了。

我躲在旁邊，一個一個的數，從兩點十分到三點五十分，就在這個位置上，從血泊中拉出了廿九個人。其中最慘的一對姐弟，弟弟後背被打得全是血，是被抬出來的，姐姐一看弟弟這個樣子，就豁出去了，要了一根香煙點上，就要衝向軍車，大家把她攔下，要她看清，動手的部隊已經不能用人性來看，姐姐才說不衝了，抽了幾口煙，忽然又激動起來，又衝了。旁邊好些小伙子，看她是女的，敢往前衝，也跟着衝出去。這些當兵的，開始還沒有開槍，接着就往後頭的人群開火，小伙子全給打倒在地。女的還是不顧一切地往前衝。

我喊着，她是女的，當兵的不會向她開火，畢竟她是個姑娘，衝上去，手裡也只有一根煙，不是定時炸彈，怕有一點人性，等她衝上去再連也行啊！但他們是齊射啊！就距離十步遠，姑娘直挺挺地被打得渾身浴血，隔了幾秒鐘，群眾們放聲哭了，好些人冒冒危險跑進去，把躺在地上的姑娘救回！一位就是一大灘血。

那位姑娘人長得挺高，穿粉紅色的連衣裙，年紀不過廿出頭，就這樣完了。

你看，前面都是一大灘一大灘的鮮血，故宮圓牆外的便道上，全是血跡。

不管是誰受傷都應急救，但軍隊就是不讓，一輛標幟救護的公車想開進廣場前救人，但硬是被幾排槍聲攔住了，車前玻璃嘩啦全毀了。再過來那還是救護車，還是不准進。而我們真真切切看着人馬路上躺那麼多人，渾身是血的等着急救，就是不進，好多人想，算了，就躺上吧！想進去把躺著的人拖回來，硬是被打回來，就這樣那些倒下的，還不時又挨些子彈。

我們怎麼能反抗，只有全市大鬧市、全國大鬧市，到今天出現這種亂，是什麼反革命啊！你知道，清早新聞會怎麼報導，想都想得到。

也因此，有一位外國記者被打得滿身是血，人家想到要爭取國際同情，爭一個公道，於是大家夥兒圍圍把他護起來，要護他到這邊的事情和真相大白於天下。



柴玲追述天安門屠殺慘況

編者按 香港無線電視台六月十日廣播了北京學運領袖柴玲的錄音，講述北京大屠殺前和大屠殺當晚的一些情況，以下是講話紀錄。



柴玲

那晚上八、九點鐘一直到十點鐘，情況愈來愈惡化，這樣的消息已經傳來不下十次。當時我們指揮部在當晚七點八點左右，即時向記者舉行一個招待會，把我們所知道的真相全部的告訴在場的中外記者。外國記者很少，因為據說在這些天的飯店、外國人住的飯店有軍隊軍管，而且他們的房間也都被搜查。那天只是零散的有兩個外國記者進入了廣場。指揮部發表了一個聲明，我們提出的唯一的口號，就是「打倒李鵬偽政府」。

用年輕的生命戰鬥

九點正，全體在天安門廣場的同學站起來，舉起了右手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的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在白雲藍天中永生，我宣誓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直到最後一個人！」

「誰他媽的愛你！」

六月一號晚上十點左右，最初的一個訊息是，一輛警車撞了四個無辜的人，其中三個已經死了。其次緊接而來的是第二個訊息，一些士兵，他們整車整車的放棄他們的槍枝、軍衣，以及其它一些器材，丟給堵截軍車的老百姓和我們的同學，對這種作為，同學們很警惕，及時把這些東西收集在一起，交給公安局，我們有收條為證。第三個訊息是當天，六月三號下午三點左右，兩三點左右，準備時間是六月三號下午兩點十分，在六部口新華門，同時出動大批軍警毆打我們的同學和市民，當時我們的同學是站在車上，用着話筒對他們喊：「人民警察愛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我有一位同學，他剛剛喊第一句話的時候，有一個軍人衝上來，對他的腹部就是一腳，對着他說，罵他：「誰他媽的愛你！」一頭頭又是一棍，這孩子當時就倒下。

從那以後，我說一下我們的位置。
我是總指揮，當時在這個廣場上設立一個廣播站，這廣播站叫絕食圍欄廣播站，我一直守在那兒，通過廣播指揮全場同學的行動，當然我們指揮部也有其他同學，像李路、封從德等。我們不時都收到來自各方面的告急，同學們、市民們不斷有被打

到我們指揮部來說，既然都這樣了，應該拿出武器來。男同學也很憤慨。我們指揮部的同學告訴大家，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最高的原則就是犧牲。我們就是這樣手挽着手，肩並着肩，大家在《國際歌》聲中緩緩的一個一個從帳篷中走出來，挽着手走到紀念碑的北側、東側、西側、南側。大家靜靜坐在那兒，用我們平靜的目光，迎接刺子手的屠刀！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在進行的是一場愛與恨的戰爭，而不是武力與武力的戰爭。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們以和平為最高原則的這場愛國運動，最後的結果是，如果同學手裏拿着一把棍子、汽油瓶等等不成為武器的武器，跟那些手持衝鋒槍、開着坦克這些已經發了瘋的、沒有理性的士兵去拼博的話，那麼這就是我們這場民主運動最大的悲哀。

同學們就這樣靜靜坐在那兒，他們在等待着犧牲。這時候在指揮部的小蓮子裏，這裏有幾個話筒，外面有幾個喇叭的小蓮子裏面，放着《龍的傳人》。同學們和着歌聲唱着，眼裏含着淚水，大家互相擁抱着，握手着，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生命最後的一刻到來了，為這個民主犧牲的時刻到了。

有一個小同學，他叫王力，他只有十五歲。在那個時候他寫了絕筆，我已經記不起，那個絕筆具體的資料，我只記得他說這麼一句話，說有時人人生挺奇怪的，生和死就是那麼一瞬間。他說有時時候他來一個小蟲子，爬着，他動靜想死他，那小蟲子立刻就死了。他才十五歲就開始考慮什麼是死亡。共和國，你要記住，你要記住，這些為你奮鬥的孩子們。

不要再犧牲

大約在凌晨兩、三點鐘多的時候，指揮部不得不放棄在紀念碑底下的廣播站，撤到紀念碑上面的一個廣播站，指揮部全體，我作為總指揮跟副總指揮李路等同學，環繞着紀念碑四周，向同學們作最後動員。同學們就這樣靜靜地坐着。他們說，我們就默默地坐着，我們第一排是最堅定的。同學們說，我們後面的人也這樣默默地坐着，那怕第一排的同學被殺被打，我們都靜靜坐着，我們不動，我們絕不會殺人。

我跟大家講了幾句話，我跟大家說，有這麼一

個古老的故事，可能每個人都已經知道，有一隻螞蟥，大概有十一億，有一天山上起火了，這些山上的螞蟥必須要下山去，才能整個家族得救，這時這些螞蟥就圍成一團，滾下去。這些螞蟥死，但是更多螞蟥活下來了。同學們，我們在廣場，我們已經站在這個民族的最外層，因為我們現在每個人的心裏都明白，只有我們犧牲，才能換來這個共和國的生還。

同學們唱起了《國際歌》，一遍又一遍的唱着，他們的手緊緊的挽着。直到最後，四位絕食的同胞，侯德健、劉曉波、周乾等，他們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們說，孩子們，你們不要再犧牲。但是每一個同學都非常堅定，他們去找軍方談判，找一個所謂負責或戰任務的指揮部的一個軍方人士談判說，我們撤離廣場，但是希望你們保證同學們的安全和平地的撤離，這時候指揮部在徵求廣大同學的意見以後，是撤還是留，決定把所有同學撤離。但是這個時候，這班刺子手他們沒有信守諾言，在同學們撤離的時候，頭戴鋼盔的士兵，手持衝鋒槍的士兵，也衝上了紀念碑的三層。

「我們會再回來的！」

沒有等指揮部把這個決定，撤退的決定告訴大家，我們設在紀念碑上的喇叭已經被打成蜂窩狀。這是人民的紀念碑呀！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呀！他們居然向紀念碑開槍。

其他多數同學撤下來了，我們是哭着撤走的，市民們都說，不要哭。同學們說，我們再回來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廣場。可是……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對這支軍隊還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軍隊把大家強行的架走。他們太疲勞，還在懷裏裏甜睡的時候，坦克把他們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有人講這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但是，那些在廣場最外層工人自治會的人，他們浴血奮戰，他們統統都死了，他們最少有二、三十個人。據說，在同學們打算撤離的時候，這些坦克、裝甲車把帳篷、棉衣灑上汽油，還有同學們的屍體統統都焚燒了，然後用清水洒地，廣場不留一點痕跡。我們這次民主運動那個象徵民主女神也給他們碾成碎塊。

我們手挽着手繞過毛主席紀念堂從廣場南面走，向西撤離的時候，我們看見紀念堂南側坐着大概有上萬的黑壓壓、戴着鋼盔的士兵。同學們喊：「法西斯！」在我們往西撤離的時候，我們看到一排排的軍隊，他們跑步向天安門廣場集結。市民們、同學們咬牙切齒的喊：「法西斯！狗！畜牲！」那些士兵們目不斜視，火速向着廣場跑去。



殺人後即收屍

我們經過六部口撤離的時候，指揮部的所有全體成員站在第一排，經過六部口，也就是六月三號下午，在那兒發生過最初一場血戰的地方，瓦礫遍地，有燒毀的、砸毀的垃圾堆。我們從六部口一直走到長安街上，沿着一條血路走下去，只見只有燒毀的車，地上是瓦礫、殘渣，可以看到剛剛經歷過一場惡戰，但是沒有一具屍體。事後我們才知道，這班法西斯，他們在前面用機關槍，他們就殺人。殺人的時候，後面就有他們的士兵把屍體送往公共汽車上，送往三輪車上，有的人還沒有死，沒有斷氣，可是已經被活活的悶死了。這班法西斯把他們的罪惡在光天化日下遮藏得無影無蹤。我們只有用的我們的胸膛，我們要大遊行，再回到廣場上。這時候，所有市民都來助阻我們。他們說，孩子們你知道嗎，那邊架起了機槍，你們不要再犧牲了。我們只好從西單往北到西城區、高校區走。路上有位母親嚎啕大哭，她的孩子已經死了。路上見到四具屍體，是市民的，他們打死的，這些屍體暴屍街頭。

越往北走，越接近我們的學校，每一個市民眼裏裏都含着淚，有的市民說：「我們買國庫券，難道是讓他們換子彈來屠殺無辜的人民嗎？屠殺我無辜的孩子嗎？」

向民居發射火射炮

我不斷收到各方面的消息，有同學自睹的消息，有市民告訴我的消息，這班劊子手他們真殺的呀！他們對着長安街兩旁的居民區發射火箭炮，有孩子、老人統統喪生墮下，他們有甚麼罪，他們連口號也沒有喊！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是凌晨兩點鐘在長安街上堵坦克的。他親眼看見一位個子不高的女孩子，她的右手揮舞著，站在坦克車的前面，車從她的身上過去了，她被碾成肉餅。我們這位同學，她右手挽著的同學，一個子彈過來，倒下了；左手挽著的同學，一個子彈過來，也倒下了。她說：「我是死裏逃生呀！」

我們回來的路上，媽媽在找她自己的孩子，她說，我的孩子，他叫什麼什麼，他昨天還在，他還在嗎？妻子在找丈夫，老師在找同學……。周圍的機關上還掛着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政策，同學們憤怒的拆下這些標語，燒掉了。電台裏還叫著，軍隊的開進北京是要制止一幫暴亂分子……是要維護首都秩序。我想我是最有資格說，我們這些學生們不是暴亂分子？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把你們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你想想，年青的孩子們，手挽著手肩並着肩，靜靜坐在紀念碑的下面，他們用目光迎接劊子手屠刀的時候，他們是暴亂分子嗎？他

廣場首先進行絕食而後改為靜坐請願活動，和平請願活動被迫結束。

人民必勝！

事後我們得到的情報：六月三號晚上十時鐘，李鵬下了三道命令：第一、軍隊可以開槍；第二、軍車全速前進，必須在六月四號凌晨徹底的收復廣場；第三、對參加這次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格殺勿論。

同胞們，這就是現在仍然調動起了部隊統治着中國上空的喪心病狂的偽政府，北京大屠殺正在進行，甚至全國各地的大屠殺也慢慢的開始，也在進行。但是同胞們，越是黑暗的時候，黎明就要到來了。越是法西斯、喪心病狂的鎮壓的時候，那麼，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國也就要誕生了！民族存亡，最後的關頭已經到來了！同胞們，每一個有良心的公民們，每一個中國人，覺醒起來吧！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人民的。以楊尚昆、李鵬、王震、薄一波為首的偽中央，滅亡的日子不遠了！

打倒法西斯！

永遠回不來了！

法西斯到什麼樣的程度？他們可以厚著臉皮昧着良心撒謊、撒天下之大謊！如果說那些拿着衝鋒槍槍殺無辜（市民）的士兵是野獸畜性的話，那麼這些坐在電視與幕前、照相機前撒謊的人，他們是什麼人？因為，就在我們手挽手撤離廣場的時候，我們還走在長安街上的時候，一輛坦克車追過來，向同學放催淚瓦斯，坦克車就在同學身上壓過去，在同學的腿上一頭上，許多個同學再也找不到完整的屍首。誰是暴亂分子？就這樣，前面的同學還是按著我們原有的步伐！就這樣走着。

同學戴起口罩，因為瓦斯刺得每一個人的喉嚨乾死，那些已經犧牲了的同學們還有什麼能夠收回他們的生命？他們永遠的留在長安街上。

我們這支從天安門廣場被迫撤下來的同學們，這支隊伍緩緩的走到北大的校園裏，因為有很多外校、外地的同學，北大已準備好了床位，接待大家。可是我們非常非常難過，我們是活着的人，可是有更多的人留在廣場，留在長安街上，他們永遠的回不來了，永遠永遠的回不來了。他們中有的很年青很年青，他們永遠的回不來了！

人民必勝！

事後我們得到的情報：六月三號晚上十時鐘，李嗣下了三道命令：第一、軍隊可以開槍；第二、軍車全速前進，必須在六月四號凌晨徹底的收復廣場；第三、對參加這次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格殺勿論。

同胞們，這就是現在仍然調動起了部隊統治着中國上空的喪心病狂的偽政府，北京大屠殺正在進行，甚至全國各地的大屠殺也慢慢的開始，也在進行。但是同胞們，越是黑暗的時候，黎明就要到來了。越是法西斯、喪心病狂的鎮壓的時候，那麼，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國也就要誕生了！民族存亡，最後的關頭已經到來了！同胞們，每一個有良心的公民們，每一個中國人，覺醒起來吧！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人民的。以楊尚昆、李鵬、王震、薄一波為首的偽中央，滅亡的日子不遠了！

打倒法西斯！

打倒軍人統治！
人民必勝！
共和國萬歲！

學生沒有製造動亂 天安門真的血流成河

——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合會發起爲
兩個事實眞像作證的百萬人簽名運動

一個多月來，中國大學生們以其勇敢和獻身精神贏得國內外廣泛的尊敬，在這場磅礴的民主洪流中，大陸社會具有遺傳意識的官場現象，以及現代官倒的驚人的腐敗，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動。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以來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精神神話後戰無不勝的權威地位被學生們的行動所打破，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中華民族面臨自己的抉擇。

以非暴力為學運宗旨的民主運動，在北京一直是健康和秩序井然地成長和發展的。學生們在運用以中國憲法所允許的、合理鬥爭方式下，始終保持冷靜、克制的態度。在以李鵬政府為首的強權淫威下，始終以理智面對非理智，這是首都市民有目共睹的。

「六·四」日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終於在鄧、李、楊一伙權貴集團預謀的、喪心病狂的精心策動下，動用武裝到牙齒的軍隊竟然不顧國內外輿論，用槍械、裝甲車、坦克、大炮、火噴射器以及最新式殺人武器，一夜之間竟將數千名手無寸鐵的市民學生進行血腥屠殺。這場舉世震驚的暴行，血跡未乾，槍聲未絕，屍骨未殮，軍

政府當局竟宣稱天安門廣場並無一人傷亡，無恥之尤到何種地步！

面對李鵬政府一貫造謠、撇謫的反動本質，我們首都全體人民只有憑着自己的良知，勇敢地起來，用我們的目睹、用我們的思想來為這場殘暴的屠殺進行歷史的作證。現作證所擬幾點事實：

- (1)在首都發生的民主運動沒有出現任何打砸搶之事，有關搶商店等事純為政府造謠。
- (2)在羣衆遊行中，交通秩序、公安秩序完全由學生組成的糾察隊進行維持，沒有發生一例有關的事故。
- (3)羣衆的聲援行動都是自發的，是被李鵬政府可恥行為肆意激化所致，這更不是動亂。
- (4)首都數百萬人參加阻截軍隊的行為完全是出於保護學生不受傷害而自發出現在街頭的羣體精神，是為了制止軍隊和李鵬政府用屠刀導致的重大動亂。
- (5)天安門廣場死傷逾萬，據中國紅十字會有關人士統計死亡人數接近五千，死亡者大多被機槍、衝鋒槍掃射所致，不少屍體被坦克輾毀，用汽油等當場焚化。
- (6)目前各大醫院屍積如山，每一位有良心的首都市民都是直接或間接的見證人。

鑒於以上事實和血證，我們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暨首都各界人士發起的百萬人簽名運動，就是用我們的良心、用我們歷史責任感為無辜死難的民族精英們進行人民的作證。

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會
首都《新聞快訊》社

時間：六月六日下午四時 地點：北京化工學院校園 ■吳越訪問 ■于汶整理

大屠殺之後——北京化工學院一大學生接受訪問

六、四屠殺真相

問：能否談一下六·三、六·四大屠殺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實況？

答：我是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到天安門廣場的，當時，侯德健和另外三位知識分子在絕食，同學們的情緒很高漲。當時，遠處槍聲響了，解放軍已經開始殺人了。當時廣場估計有十多萬人，聽到槍聲，圍觀的市民開始往外撤。起初，我和大多數人都不相信解放軍會殺人。到了大約四點的時候，坦克、裝甲車已經從長安街那邊開過來。清華大學學生組成的敢死隊前往攔軍車，後來一些市民也去了。一輛裝甲車從天安門東邊開過來，一直跟着這輛裝甲車的市民說，這輛裝甲車在新華門那邊壓死了六十多個人了。我們學生包圍過去，往裝甲車的履帶上插木棍、鐵棒、裝甲車停下了，有人把浸了汽油的棉被蓋上去，把裝甲車燒了。燒了二十分鐘以後，裡面的人出來了。一共出來三個軍人，臉上是血、軍裝也燒了，市民看見他們就打，罵他們壓死人。當時，我們學生保護學生登上軍車，展示軍車號碼。



護送三個軍人，把他們送到「高自聯」，然後由救護車送往醫院。

後來，我到了金水橋西的地方，看見清華大學學生在那裡排人牆，大概一百多人，分兩層，後面是市民、外地學生。大家是自發的，沒有組織，大概有六、七層人牆。人牆剛排好裝甲車的機關槍就向人牆掃射，前兩排清華學生倒下了，市民往外跑。當時我沒有跑，站在那裡看，我根本不相信他們用的是真子彈，以為是橡皮子彈之類的。槍還在打，有機關槍、衝鋒槍。我旁邊一位武漢大學的學生中彈倒地，流血了，我才知道

軍人打的是真子彈。我就往回跑。當時，廣場上侯德健他們還拿著喇叭在說，說什麼記不得了。正在說的時候，一排子彈打過去，聽不到聲音了。有一幫部隊，我看是特種兵，他們的速度特別快，往天安門紀念碑的台階上往上跳，然後往天安門廣場上「高自聯」的喇叭全打碎了。後來據說，當時，侯德健他們和一個校官談判，說保證學生在早上七點之前全部撤出廣場，你們軍隊不許再開槍。侯德健回來跟學生們說，但這時學生表示死也不走，要堅守天安門廣場。侯德健他們勸學生，說軍隊已經殺人了，殺十個是殺，殺一百個也是殺，我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然後，有一些學校開始撤退，我們學校就撤得比較早。學生開始往南北方向撤，往外撤的時候，後面一直是槍聲。我在金水橋那邊，比較靠後，旁邊一個同學中彈了。跑在最後的是北航的隊伍，聽他們說，他們看見裝甲車往人羣壓。地下通道兩邊架了機關槍，往裡面掃射。外地來的學生就全死在地下通道裡。外地學生以為坦克、裝甲車來了，地下通道安全，壓不着。他們從外地來了以後就駐在天安門廣場，他們的帳篷就在那裡。他們也不知道往哪裡撤好，所以他們就只有跑到地下通道，結果都死在那裡。當時，北京學生一直往回跑，我從前門大街往南跑，然後從那邊拐回來。當時，看到軍隊向地下通道掃射，槍聲，掃完了，裝甲車就開始在天安門廣場上追着人羣壓。清華大學十一個學生跑得很慢，就壓死了，腦袋都出來了。接着壓過來，慢速裡有沒有人也不知道。倉促撤退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還在帳篷裡睡覺，我顧不上喊他，踢了他兩腳，起來就跑。當時我也不知道他醒了沒醒。後來回到學校，他回來了。同學們回來以後，都談到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這幫當兵的，打死人以後，舉起槍笑，喊勝利。

軍隊分兩路進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死的人只是這次大屠殺死難者的少數，大部份犧牲在木樨園到西單那一段，那一段市民死得特別多。四點多鐘，廣場熄燈，裝甲車開始壓人。頭一批當兵的進廣場，穿的全是迷彩服，就是在越南戰場的那些人，他們的態度特別快，槍法特別準。據一些目擊者說，居民樓的窗戶只要有一個人探出頭，他們就能開槍打死，打死以後掉下來，小孩也有被殺的。今天，我的同學在街上看見一個婦女抱着她九歲的兒子，身上有六個子彈眼，死了。

問：那天部隊是分兩路進天安門廣場的，是嗎？
答：十二點以後軍隊分兩路進天安門廣場，一路從新華門進來，這路速度最快，打人最慘。西門那路開始沒有打槍，我們當時不是在那裡攔住一輛裝甲車嗎，市民說這輛裝甲車已經壓死了六十多人，我們就把那輛裝甲車攔了，三個當兵的從裝甲車出來，市民打他們，如果沒有我們學生攔住市民，三個當兵的肯定要被打死。我們攔住市民以後，把他們送到「高自聯」。市民在廣場上非常憤怒學生的做法。他們說：你們這樣做是沒用的，他們已經殺人了，你們還在這裡靜坐，還保護他們。他們的拿著棍子跟我們說：如果現在誰保護當兵的，我就打誰。市民太憤怒了。當天我撤出廣場之後，到北口，看見有四個青年哭著對市民說：「我們真窩囊，我們當時就是沒槍，我們不如死在天安門廣場。」

問：當時「高自聯」有多少人？
答：四點鐘開槍以後，「高自聯」基本上沒有什麼行動。侯德健告訴我們全撤，「高自聯」字樣也同意撤。「高自聯」的負責人葉玲、吾爾開希在那裡。早些時候，十點多鐘時我還跟他們談話，當時，決定不撤。吾爾開希說：「我們爭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在廣場上的學生都沒有往外撤的意思。雖然那邊槍聲響了，還是沒有撤的意思。後來，侯德健來了告訴大家撤，才開始往外撤。

問：現在有沒有葉玲、王丹、吾爾開希的消息？聽說葉玲失蹤了。
答：這些都沒有確定的消息，不能肯定。現在「高自聯」的學生領袖都沒有消息。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學校，現在學校之間沒有聯繫，學校都空了。

學生原來不相信軍隊會開槍

問：我是香港來的。香港學聯代表團來北京之後北京民主運動，住在北京飯店，我有學生在裡面。那天夜裡在槍聲中我給他們打電話，一位同學一邊哭一邊說：「他們現在在殺人。同學們都出去了，武警要進飯店搜查。我現在在把材料燒掉再下去勸阻他們不要殺人。」那是六月四日三點鐘的時候，我要他留下他的名字。

答：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學生的做法非常的幼稚，我們原來不相信他們當兵的會這樣殺人。我自己原來就不相信，直到旁邊的同學中彈流血，才知道他們用的是真子彈。我們都跑到坦克上機關槍的子彈。

問：以後該怎麼辦？你們有沒有想過？
答：現在學生有許多想法。我自己從天安門回來了，我想現在我要是有槍，我就出去跟他們打。現在，校園裡學生聚在一起就說：咱們手無寸鐵，不能作無謂犧牲；只要咱們手裡有武器，只要有槍，我們就去跟他們打。我們的生命是從天安門廣場回來的，也不怕死。北京市民也有這種感覺。

我們懷疑，頭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士兵，殺人還笑，是不是政府或部隊給他們注射什麼藥物。因為這現象很可怕，不可想像。而且，我們一位同學的妹妹在北京醫院，給一個當兵治療的時候，看見他身上有紋身，紋了龍鳳什麼的，我們懷疑他們不是一幫死囚犯，把



■被公安警察打傷的學生展示警帽、鋼盔為證。

他們拉來，專殺學生。

問：你對下一步整個局勢的發展有什麼看法？

答：整個中國來看，我認為中國將遇到一個很困難的日子，無論誰勝利，中國將是一片混亂。以前，政府說亂，但北京市並不亂，公共汽車很暢通，市民生活很正常，幾十萬人的運動，沒有砸爛一塊櫥窗玻璃。但是，開槍以後，北京一片恐怖。我們現在坐在這裡也感覺到不安全。我認為，不管誰勝利，被政府強硬派全面鎮壓，中國要渡過一個很困難的日子。

要把鄧、李、楊罷免

問：你們有什麼期待？最好的前途應該是什麼？
答：我們覺得最好的前途是到天安門廣場殺人的二十七軍全部軍事審判，而且，以後也防止別的部隊軍事政變。最好中國有一個領導人出來，主持一下現時的政府，把鄧小平、楊尚昆、李鵬這些人全部罷免。不管獨裁或是別的什麼，暫時維持一下，再重組政府。現在民憤特別大，現在只要當兵的，有一兩個敢出來在大街上，肯定被打死。另一方面，我走在馬路上，我也不安全，說不定在什麼情形下，給我一下子彈。從六月四號開始才真是真正的動亂。我說的動亂並不是和政府一樣的。一定要懲罰劊子手，像什麼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應該按中國封建社會的方法（不管對不對）滅門九族。我們都是這種想法。因為，這次有許多家庭被破壞了，而且，很多整個家庭只剩下一個人。

問：這是不是因為你們認為鄧小平那些人的家屬也參加了屠殺嗎？
答：我認為他們不可能拿着槍到天安門屠殺，但是他們很可能是指揮的。二十七軍的軍長是楊尚昆的兒子。學生提出滅門九族也不是很高的要求。

問：你對北京市的整個局面有一個怎樣的設想呢？未來一個月或一個星期，會有什麼發展，現在北京市是半癱

答：最可怕的是將出現兩軍作戰。今天早上，聽說三十八軍把槍炮口對準二十七軍。美國之音報導，三十八軍和二十七軍在外圍發生衝突。如果兩軍在北京城內開火的話，倒霉的是老百姓和廣大市民，一些建築物會毀壞。市民很可能不顧一切，支持三十八軍。

學生最需要是武器

問：北京會不會出現罷工罷市？

答：現在已經出現罷工罷市了。不過，現在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不敢隨便走動，不敢聯合聲明罷工罷市。我昨天跟一位工人談話，他說他們廠長告訴他們：我們也不宣佈罷工，你們就回去照顧孩子。北京已經成了一個罷工罷市的事實，因為現在很多工廠已經不工作了。但是，如果政府用經濟壓力，扣發工資，凍結銀行存款對付北京市民，北京市民要怎麼辦？我們聽到消息說政府要凍結北京市民的存款，不上班的就扣發工資。答：北京市民這個已經顧不上了，因為他們生命也不要了。我認為政府真的使用經濟手段，北京市民應該撤出了北京城，就是「空城」。因為在北京已生活不下去了。問：如果你們希望得到外面的支持，你們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支持？

答：我認為現在學生最需要的是武器。

問：對於海外的中國人或者全世界的人民，你們有什麼期待呢？

答：這個不大好說。北京的學生運動已經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如果說還要得到什麼支持，我現在也不大好說。最好是靠我們自己，靠我們中國自己的人民。「美國之音」廣播說許多國家對中國政府採取外交凍結，而且武器的先進技術合作暫停。我覺得這個對那些創子手並沒有什麼真正制裁，他們不顧這些。這些做法對中國將來發展並沒有好處。中國人不必從這裡感謝美國。問：有沒有想到李鵬政府這樣冷酷鎮壓北京學生運動和北京市民，是不是跟他們最近會見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有關。李鵬跟蘇聯有特別的關係，戈爾巴喬夫邀請中國官員訪問蘇聯，只邀李鵬，不邀趙紫陽。是不是他們打算投奔蘇聯，所以他們這麼不顧世界輿論？

答：這個我倒沒有想到。

問：我能否給你拍照？你的形象很能代表現時的北京大學生。

答：不必了。（他當時頭上戴布條，左手臂纏黑紗。）

百姓半月刊 1989/6/16

血的證言

他們用機槍掃射人牆，凡開門觀望者一律射殺……裝甲車和坦克並排推進，把人們壓為肉餅，又繼續追趕學生……

一 靜坐學生

（編者按：六月八日，一位由北京飛香港的旅客帶來一份草稿，出自一個經歷過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的學生手筆。草稿寫於六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即慘案發生後四、五個小時，由於匆匆寫成，手稿較為潦草，現按原稿重排，實在無法辨認的字迹則以空格代之。）

六月三日凌晨，十幾輛軍車裝載着為數不多的士兵，試圖從西面進入天安門廣場地區，被數萬市民和學生阻攔。有四名市民被軍車壓死。士兵絲毫不加抵抗，輕易地下的衝鋒槍、彈藥等被市民搶走並展覽示眾。

下午三點左右，政府出動防暴警察和大量投擲催淚彈，驅趕了聚集在新華門前圍着幾輛軍車數萬市民，其中有婦女和兒童。

接着，五點五十分整，從人民大會堂裏出動了約兩千名武警，使用警棍和投擲石塊，毆打在天安門廣場上靜坐請願的近萬名各地學生，有人親眼見到一個小女孩的眼睛被警棍擊中，憤怒的市民舉起鋤頭、鐵棍之類，把武警逼回了人大會堂。馬上一架武裝直升飛機在廣場上空飛過，政府的高音喇叭開始對市民反覆廣播戒嚴司令部的最後通牒。

至此為止，除了在廣場上靜坐請願以外，北京市內交通暢通，工作比較正常。

六月三日深夜十一點多，集結在市郊的十幾個軍（但是政府已經製造了鎮壓這次所謂的「反革命暴亂」的把柄；□□是一小撮人攔阻軍車，侮辱綁架士兵，搶奪軍械，衝擊人大會堂、中南海，還捏造說有人焚燒大樓。）開始乘軍車和裝甲車進入市區，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壓向天安門廣場，僅僅從西方面壓向市中心的軍車就有一千多輛，都荷槍實彈。由於士兵長期被封閉在兵營中，除了中共中央的社論、新聞以外，什麼都不知道，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所以對在公路上阻擋軍車的學生、市民十分仇恨。他們用機槍掃射人牆，當人羣退入胡同時，還衝上前去掃射，血流成河。凡開門觀望者一律射殺。據目擊估計，在木樨地，打死了約一百多人，在西單打死了三十人左右。軍隊用機槍、催淚瓦斯開道，緩慢地推進。在六、四凌晨三點二十分左右包圍了天安門廣場，約兩個師的軍力包圍廣場上手無寸鐵的約二萬名學生和工人，嚴令他們在五點前撤出。同時向一米二左右的高度射擊，以恐嚇學生。學生決定整隊退出，由於人數太多，出口又一時未找到，就誤了些時間，五點整一到，廣場上路燈熄滅。軍隊開始封閉出口，用一百多挺機槍掃射，沒有撤完和堅決不撤退的學生紛紛中彈。之後用幾

十輛裝甲車和坦克並排推進，把所有的死人、傷員和□□壓為肉餅。然後坦克繼續追趕學生至六部口，在六部口壓死十一名學生。廣場西北角的首都工人自治會的廣播站一帶□□的人在廣場上，死者大約有一千二百人左右。在最後的大清場中，至少二十人被擁擠踩死。

在□□軍隊佔領的各個主要通道，佈滿了軍車。他們向兩邊建築、胡同零零星星地射擊，打死打傷許多無辜的市民。士兵用鋼盔、槍托毆打無辜市民學生者，比比皆是。據說最精銳、從來不會動用過的第十五集團軍也調入北京，濟南軍區的部隊正在源源趕到。在廣場，只有三十八軍槍裏沒有上子彈。三十八軍一前軍長一星期前因為拒絕鎮壓學生運動而被送上了軍事法庭。據撤出學生組織的不完全估計，死亡的學生和市民之多，達二千六百左右。在上午十點以前，紅十字會接到指示，只搶救士兵和學生，對市民不給予醫療救治。

殘餘的外地學生約一千名左右，在退往北京大學的長途中繼續遊行，宣傳這一慘案，號召罷工、罷市，北京市民□□□□。

到上午十點卅分，政府還沒有佔領學校。除了市中心以外，其他地區已沒有軍隊出現。市民用石塊打死了幾個掉隊的軍官。□□因為是星期天，罷工罷市已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

九十年代 1989/6(特)

血的見證

時間：六月五日早上十時

地點：北京麗都飯店

北京「新聞快訊社」一發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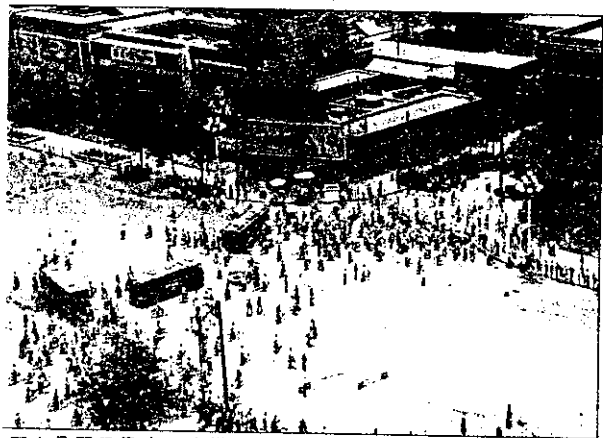
■夏葵整理

關於屠城事件真相之簡報

我是新聞快訊社的其中一位編委，名字不說了。北京「新聞快訊社」是由三十八家新聞單位和文化單位及知識界所組成的新聞發布社。我本人也可以說是六月三日、四日大慘案後尚存的一個目睹者，對北京大屠殺所發生的事情，一些事實情況，作為新聞工作者，我有義務向外界說出真相。下邊的事情因為我是親身目睹的，所以我可以負責。

目睹市民被坦克壓成肉醬

六月三日的晚上，當時我聽說天安門廣場告急，希望能去一些人。趕去了以後，在長安大街路口那個地方，就被軍警堵住了。我們要往裏進，他們不許進。當時部隊已經都上了刺刀和戴了鋼盔，對着人羣。但當時還未開槍。這時候街中央的路口先從西面橫街直衝開進兩輛裝甲運兵車，這時大概是四日凌晨一時四十分。這裝甲運兵車根據番號是二十七軍的，廿七軍是屠殺天安門廣場的主要兇手，楊尚昆的侄子的軍隊。戒嚴總指揮運浩田是楊尚昆的女婿。當時天安門四周各路路口人很多，但廣場上的人並不很多，總有十多萬人。那輛裝甲運兵車從西面一直開來，因為人羣稠密，它就在人羣當中橫穿過去，一下子，我看到就有七個市民，身體被壓



■六月四日早上，大批羣衆不怕死亡威脅，仍聚集在王府井和長安街交叉處議論駭人局勢，路中巴士已被燒焦。

成肉醬。身份沒法辨認，是工人、市民、店員，還是學生，就這樣壓過去。正好那東單路口，所有經過的公共汽車全部被擋在那地方，它就從那中間就擠過去，當時撞傷了很多，一直撞到了建國門橋頭。後來我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出去，大約五時半左右到橋頭的時候，才發現橋頭上也躺著屍體，三個市民給壓死，還有一輛軍車被裝甲車撞翻了，據說當場至少兩名武裝軍人被軍車壓死了。我看到的是後來的現場，沒看到撞翻的情形。被撞的部隊是東北軍區，六十四軍，當時他們的軍長急了，準備帶部隊進去跟他們拼。可是這部隊是一顆子彈也沒有給他們。他們後來就全部撤退。他們說：這樣殘暴的軍隊，我們簡直都不相信是自己人幹的。所以他們都軟化了。

後來裝甲車又開回來，開回去後又開回來，是想把這條路打通，讓軍隊進來。它開過來後，因為它殘害了這麼多的市民，市民為了保護手無寸鐵學生受到軍隊的殘殺，為了防止他們的施暴，市民甘願自己出來去堵塞軍隊，當時大家就用攔路的水泥墩子，把一個個水泥墩子堆成新的路障，結果它重新衝過了第一道，但衝不過第二道水泥墩子，因為它不能持續往前衝，所以停下來了，後面的退路又被市民用水泥墩子給堵上了。市民用鐵杆把它的輪子給堵死了，開不動了。當時有人帶著裝有汽油的瓶子，燃點後，揭開那蓋往裏扔，然後拿大棉被子這樣悶住，大約十分鐘左右，有一個拿白襯衫舉着當白旗從車裏出來了。出來了四個，有兩個是老兵，頭髮也白了，看他們至少是中校級以上的軍銜。他們一出來，大家都憤怒了，恨不得把他們撕碎，因為他們太殘忍了。那軍人說：我們知道，我們也不願意這樣做，我們沒辦法，請你們原諒我們。他們就這樣說。大家說：原諒你們？你們是兇手，壓死這麼多人，這樣殘忍，今天就得要你們償命。市民很憤怒，就把他們攔住就打他們。當時學生說不要動手，千萬不要動手。保護住他們，說如果你們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找到借口了。我覺得學生做得很對。學生們把幾個軍人保護住了。要不然的話，在當時氣氛下他們給打死絕對是死有餘辜。可是學生

考慮到大局，學生還是堅持以非暴力來對抗暴力。這幾個軍人後來給保護出去了，受了點傷是可能的。後來這裝甲車被燒，出現了這事情以後，馬上被當局宣佈為「反革命暴亂」，說兩輛裝甲運兵車被燒。可是這輛裝甲運兵車為何被燒？他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就是因為這輛裝甲運兵車在稠密的人羣中去壓死這麼多人，所以引起這麼大的憤慨，直接導致火燒這輛裝甲運兵車。

機槍掃射市民一片倒下

大約三點多鐘，廣場上宣佈這是「反革命暴亂」以後，從天安門城樓上往日毛主席開兵的那個地方，架出了三挺機槍，當一宣佈完了，機槍就開始往我們這裏掃射。先還未往天安門廣場掃射，就往這邊的人羣掃射。當時人羣正湧向廣場。有一個女孩，大約二十二、三歲，很年青的女孩，她帶領向前衝。大家看這個女孩這麼勇敢，想退也沒退路，大家便都往前衝。機槍就這樣掃射，當時就一片倒地了。他們又把整個地下通道，唯一通往天安門的通道，用機槍給封鎖住了。後來他們又派兵帶了刺刀就往裏面扎，前面用機槍就這樣掃射。說實在的，我的命大，我旁邊有一位大約四十歲的男人，一下就倒下了。我們往後撤，當時死的人也太多了，這是在歷史博物館北邊的長安街這段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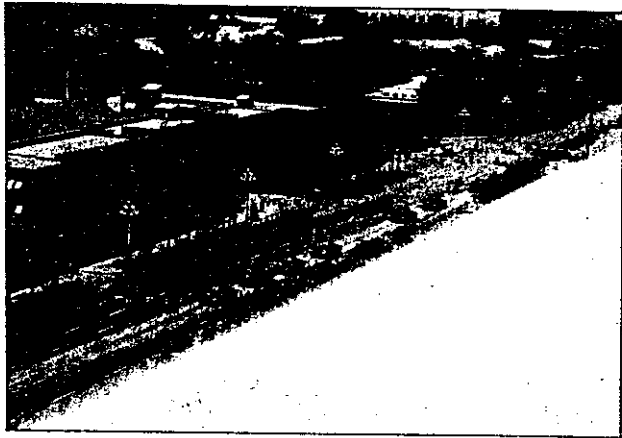
我還記得，當宣佈「反革命暴亂」以後，第一就是打炮，打了幾炮。我們從側面可以看見，一下就把民主女神像給打掉了。接著各種裝甲運兵車、坦克車、轟隆的就往廣場裏開進去。大約到了四點鐘的時候，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間全部熄滅了，整條長安街的燈都熄了，熄燈以後，就聽到機槍聲，看到子彈一個個接着一個的炸開，都跟放煙花一樣。後來冒了黑煙，後來他們的車往我們這裏壓，我們根本沒辦法進去。我們便往外面撤，一直撤到建國門的地方，一大片的撤回來。我們還接了幾個從廣場裏跑出來被打傷的。我們把他們接過來，送去醫院。有一個是重型機械廠的小工人，年紀輕輕的，他說你別送，他傷了肩膀的部份，他說：哥哥你拉着我，我就沿着北京這條街，用我的血（他全身都是血）告訴人們他們到底幹了些什麼。後來弄了板車，板車的車夫是北京聯社的，就專門出租三輪車。板車聯社的自動出來拉他。我們沿着建國門，朝陽門，東西四條的立交橋，還有東直門，以及和平街北口，從這條路撤下來了。

士兵追斬女孩孕婦也被殺害

說回來，當時在建國門的時候，人圍得密密麻麻的，我看到一個女孩，她往外跑，有一個大兵，追呀追，那個女孩走到一半路，那個大兵就開槍了，她倒下了，他還走過去用刺刀將她刺死。死者裏面還有孕婦，也是被刺刀刺死的。有另一個女孩，被大兵追斬，那個女孩已沒路可跑，就跪下來求命，請不要殺我呀！這大兵似乎一下瘋了，或是神經錯亂，他都受不了這個刺激，瘋了。

至於天安門廣場裏面發生的事情，我昨天晚上去了

人民大學，找到了虎口餘生的幾個學生。他們說：當時三點鐘，當局用喇叭說要他們馬上撤離廣場，這是最後通告，你們如果不撤離，一切後果你們自己承擔。說了以後，便派人來廣場指揮部交涉，指揮部看了周圍的情況，當時的形勢很嚴峻，就接受了撤退的條件，就是說如果我們撤離廣場，希望你們給在廣場的人加以保護。這些條件他們都答應了。準備分三部份撤離，第一步從歷史博物館那裏有個小夾道，可以穿出去，從那裏疏散出去；另外一路從前門，從地鐵那裏出去；再另一路從人民大會堂那邊疏散出去，分成三個部份，分開疏散出去，他們都答應了。駐在前門的防線是三十八軍的防線，三十八軍把那個地方全給攔住了。可是昨晚他們沒有放槍，他們放的是空槍。逃出來這一千多人統統是三十八軍那個方向放出來的，最後廣場上剩下來共有六千多人，祇跑出一千多人。學生們剛準備撤退，分三部份，但大兵已經進來了。有幾個學生喊：我們勝利了。剛喊完，機槍就砰砰的開始亂掃。後來就是正面的學生把侯德健和參加絕食的四個人給保護起來。就是為了保護他們，當場就給打死了三、四百人，硬要把他們送出去，這四個人安然無恙的給送出去了。死得最慘重的是清華大學，昨天晚上，六月三日，是清華大學值日，北京的大學每晚都輪流值日，派出一些學生做糾察。當天晚上，清華學生四百人在外圍拉起人牆。昨天下午六點鐘，我到清華大學詢問，知道撤出來了兩個，四百人祇有兩個活著回來。當時死得最慘重的是往歷史博物館小道那個方向，軍隊把大羣放進去後，就往裏面掃射。學生一看他們真的開槍了，好多學生又重新跑回紀念碑，往紀念碑擠。原來開始時軍隊所以沒有往紀念碑方面開槍，因為那裏面有很多是他們的便衣，還來不及撤出去。後來學生回到紀念碑地下，他們的槍就開始掃，紀念碑堆的都是人：屍體都堆起來。



■坦克車浩浩蕩蕩開進北京城進行屠殺。

軍隊調動一石三鳥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到紅十字會的人，他負責救護車，他跟我說了一個數字。死亡人數大概二千五百人。說完就走了。學生開始撤退的時候，就讓當時前幾天一直在接待學生的各個醫院派來的大夫，有二百多人，有的說一千人，其實沒有，祇有二百多人，這二百多人全部撤到歷史博物館的地方，不准他們抬頭，蹲着。可是他們有幾個大夫，一個是北京醫院的大夫，他拿了一面紅十字會的旗子，他走前去，要學生坐在紅十字的旗底下，說：按國際條例是受到保護的，你們跟着我走。但和學生全部被打死了。還有些爬在地上沒有死的、受傷的，軍隊的坦克就在他們上面碾，來回這樣碾。碾完後把人堆到一塊，拿帆布往上面蓋，用火炮噴炮器噴。這簡直是太慘無人道了。清場完了，廣場上到處帆布蓋的，下面都是屍體。

再說說部隊進城的情況，到昨天為止，北線、南線、東線的部隊都沒有進城，這個我可以作保證人。這幾條的部隊由東北軍區和北京軍區負責，南線是北京軍區，東線是東北軍區，他們沒有進城，所以沒有直接參予這場屠殺。這場屠殺全部是由二十七軍、直接由楊尚昆和他的女婿，就是總參謀長，這次戒嚴總指揮運浩田，他們直接操縱，直接指揮屠殺的。東北軍區的六十四軍和三十八軍、四十二軍，他們開始還不大相信跑出來的學生，市民跟他們說軍隊在殺人。他們說：你們冷靜，我們軍隊不會動手開槍的。後來，那些車不停地拉傷，拖屍體出來，他們也看到了，才相信了。昨天下午六點多鐘，本來北京軍區負責全市軍管，剛這麼說了，在和平街北口地方就開出三輛軍車，直接從二環路殺過來，車上面架了機槍，就沿街，朝着大街，開槍不停，不管有沒有樓，就那樣掃着走。居民都在街上聽消息，嚇得大家都跑。而當時負責警戒那地方的部隊也正好在街上，他們一看就氣壞了，他們的少校就要他們攔住這輛軍車。當時車上的機槍就對着他們說：要是敢攔就連你們也打。地面的部隊祇好散開，因為地面那些部隊是東北軍區的，沒有一粒子彈，沒有帶一粒子彈。上面跟他們說是來「演練」的，他們的營長當下給氣壞了。後來馬上給他們的團長、師長調走。所以到今天，包括這一帶的部隊已經全部撤走，往回撤。他們也很危險，他們也都目睹北京這一場軍事政變。而且根據可靠的消息，二十七軍也會撤走，讓這些外國部隊接管北京，將來把責任推給他們；將來有人來採訪，他們說沒有殺過人，他們不知道，完了讓他們跟北京市民發生衝突。等於是一石三鳥。昨天凌晨我拉着那個受傷的青年，路過東直門立交橋那個地方，正好部隊還在跟老百姓說：部隊不會開槍。我把傷者拉過去一看，確實是部隊的子彈打傷的。沿途都是人，每個點都上萬人，大家都在喊要罷工、罷市，羣衆太氣憤了。東直門立交橋下面堵住了很多軍車。橋上站着專門負責保衛橋的武裝班長，後來受傷的人把傷勢給他們一看，當時有兩個班長，看來像上士級的那種班長，他們突然離開部隊了。後

來聽說他們一共三個排都是從各個連裏抽出來的，不是同一個連的那種建制。有一個營長、少校級，做指揮的，那兩個班長不知怎樣，將他們的機槍保險一打開，轉過身來，一發子彈，就把他們的營長給幹掉了。他們說你把我騙來，說我們到北京來拍外景，這太殘酷了。羣衆一下子把他們保護起來，趕緊走了。

工人糾察隊被市民驅散

我在建國門立交橋底下，在上面那條是通到天津的路，下面這條是回北京的二環路，在二環路外交公署的底下，我去的時候一共有九輛軍車。有五十輛軍車從南往北，被市民堵住了，走不動。從北往南一共九輛，車被砸了，發動機也砸爛了，車胎也扁了，玻璃也打碎了。後來我過去，問一位老師傅：這是那方來的車？他指着那車牌的地方，給擦掉了，可是隱約還看得見：「北京承建二公司」汽車的字樣。後來他們跟我說，昨天晚上市民堵住了九輛承建二公司的車，上面滿載着人，他們拿了鎗頭、鋼釘，還裝着汽水、麵包，後來被市民堵住了以後，他們說要配合清場天安門廣場，要參加行動。車上貼着的是「北京工糾察隊」，是「工人糾察隊」的字樣。他們還說每人給六十元。後來給堵住了以後，他們就乾脆把那些鎗頭、鋼釘扔下來，說：我們不幹啦，我們也不願意，我們要我們幹的。原來承建二公司和承建三公司，是兩年前，由北京原來的機械工程兵這一個機構，因為撤銷了，這些人的戶口也轉到了北京，所以原來都是復原軍人。市民就把他們驅散了，然後就把那輛車砸了。所以後來官方說是首都鋼鐵廠的車被砸了，這是不確實的。還堵住了一輛大麵包車，是北京橡膠二廠的，裏面裝着燒餅和各種食物，坐着都是科室幹部，說是幫助解放軍維持治安，車被擱着以後，當時看到了情況以後，他們掉頭就走了。

暴動是當局嫁禍給市民的罪名

昨天下午一點鐘我出發，去了人民大學、北大、清華。因為我聽說部隊已經把所有的學校都封鎖了，都已經軍管了，包括外資大學、化工學院，到昨天晚上七點鐘我都走了一遍，回來時候還未實行軍管。當時北師大的高音喇叭廣播說，希望所有的學生，要求他們都回到自己的宿舍，不要給當局借口。因為我們要保存實力，要長期的抗暴下去。昨天下午二時半我在人民大學門口，正在這時候來了一輛裝甲運兵車，這輛車是從軍事博物館那邊搬來的。根據市民說，軍事博物館還在跟軍警繼續戰鬥，還一直在巷戰。就在那邊沿線已經搬了將近三百輛軍車，因為軍車都下了車，軍車被棄置在那裏。而且搬了七輛裝甲運兵車，有三輛就當場燒了，有四輛就由市民、學生和復原軍人搬獲，有的復原軍人是坦克兵會開車，就把搬獲的一輛車開到人民大學門口。大學門口估計有三萬人，大家都鼓掌高興。還展示這軍車的番號：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九二〇部隊。這輛車祇停留了二個多小時，為了不給當局借口，已把這

輛車開到別的地方去。正好有座兵工廠，而這兵工廠全是在學生一邊的，就把這車送到那裏去了。

我到德勝門立交橋往北去，那邊有炮兵軍車，市民把一百三十輛軍車全部給燒了，濃煙滾滾，那大炮柱，簡直是冲天而起的。昨天晚上十點多鐘，我得到一個電話，我在軍隊裏有朋友，電話說：昨天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北京武警部隊、北京市公安局，已經全部被軍管了。海軍大院、空軍大院、鐵路兵大院、所有部隊大院也被軍管了，因為這些都是不同意這次政變的。實際這次是以楊尚昆、遲浩田、李鵬，這個集團為主的一次反革命軍事政變，當然肯定是以鄧小平為背景。昨天零晨時，坦克車在二環路轉來轉去，那輛裝甲運兵車、坦克車上面的機關炮，就沿途亂打。到了木樨地那個地方二十號樓，二十二號樓，都是那些副部長級以上的幹部住的樓。包括王光美，好多知名人士等，把他們的窗戶打到千瘡百孔。他們都不管了，他們想這成是一個暴動的場面。但事實是軍隊打的，他們想加禍給市民。但市民並沒有槍，那麼高的樓上他們也扔不到什麼。民族學院的大樓樓也打了。昨天我到北京大學門口，正好看到一家人拉着一架板車，拖着一個女孩，九歲，她的身體被打了一槍，頭上一槍，身、背、腰、腿及膝蓋上。他們搬開背看，那已經沒有背了，那子彈打進去都是開花的子彈（他們是用爆炸子彈打的），而頭部的後蓋骨都沒有了。他們拉着血淋淋的橫幅寫着：這也是暴徒嗎？當時打死的兒童不下十個。就在天安門廣場，都是些五六歲、六歲的那些小孩叫喊着解放軍叔叔，不要打我，太哥哥、大姐姐……結果都給他們打死了。還有一個三歲的孩子也給打死了，還有很多老人、老太太。

學生已轉入地下繼續鬥爭

六月三日下午，屠城之前那天下午三時，我從你們那裏出來，經過新華門，看見軍隊在發射芥子毒氣，芥子毒氣國際上已經禁止使用，他們共放了將近七十發。先是有重車經過人羣時往下扔菜刀、匕首、棍棒，扔到人羣裏頭，想殺害市民有兇器，被市民抓住。這時從中南海出來一千多個軍警和防暴警察，警察先用大電棒打人。但人羣不屈服，還要往前推進。當時有個賣冰棒的老太太，他們正好堵在街角老太太那地方，老太太說：你們不要打人呀！那個警察一棒就把老太太打下去。後來他們看到人羣擋不住，就發了幾百發橡皮子彈，還是擋不住，後來就發那芥子毒氣，發了七十發。很多人中毒，他們用板車把中毒的市民、學生、工人抬走，我看到大概有十幾輛板車，他們都躺在板車上抽搐。還有兩個三、四歲的小孩子也中了毒氣，生死未卜。大人都這樣，更何況小孩子呢！這時是二時卅分到二時五十分，他們共施放了大概二十五分鐘。後來他們就撤回中南海，而且也抓了幾個人，抓到中南海裏去。他們就想羣衆去搶回工人，以便造成羣衆衝擊中南海。當時給學生們勸止。學生說：我們不能動手，我們就是採取非暴力。後來我騎單車又到了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地方，正好圍住了二、三千的部隊，市民用五路公共汽



市民赤手空拳與全付武裝的軍警對抗。

經過大屠殺，但學生組織仍然存在，仍然在活動。學生領袖除了柴玲下落不明外，王丹、范爾開希、還有……都還在。柴玲昨晚在天安門廣場。這些民運組織都還在，將繼續鬥爭下去，而且已經轉入地下。現在人民都起來了，比以前更廣泛。我們的「新聞快訊」還一定堅持辦下去，一定要把這次的真相讓所有人都知道，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們已作好了各種準備，不停息地跟他們戰鬥下去。

民主運動現在進入高潮了。這個政府的反動性大家都十分認識了。所有人民現在都戴着白花，哀悼我們的死難者，並等待着這個政權的覆滅。⑤

屠城前後

本刊記者

一名北京教師的見證

六、四慘案，罪證昭彰，中共雖千方百計掩飾欺騙，無奈堵不住千千萬萬見證人之口。本刊訪問了一名北京的大學教授，將他耳聞目睹的六月初這幾天情況，公諸於世。最珍貴的是他親眼看到了廣場學生撤退回校的情景，慘厲而又悲壯。文中以第一人稱敘述這位教師的所見所聞。

學生從廣場撤回大學

我住在海澱中關村，三日晚沒有到天安門去。到了六月初四日上午九、十點之際，看到一羣一羣的學生，打着北大的、清華的、外大地大的旗幟，走過來。他們是從廣場撤回大學，經過中關村。比較有組織的有兩批，每批四、五百人，一路喊口號：「打倒李鵬！」「血債要用血來還！」「堅決討還血債！」「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打倒法西斯！」喊得喉嚨都啞了。場面非常悲壯。就像從戰場上退下來的戰士，但又表現了學生的紀律，不是敗兵，而是很光榮的。學生們手挽着手，一排一排的走，有些背上已纏上黑紗，有握腕高呼，有失聲痛哭，有的有血污，有的身上非常髒，好像是从地上爬過來，滾過來……看起來很慘，但他們都挺起胸膛。

(初後學生，從血的戰場上退下的學生！柴玲、封從德走在撤退隊伍的前排，仍然是隊伍的總指揮，學生撤退時也不忘紀律啊！)

西北面是大學區。撤回大學區的機不過一千學生，算它往東面走或跑回家的也佔一半，那就是共兩千學生撤出廣場！廣場上那麼多學生，結果祇撤出兩千人，死去多少不是很清楚麼？

疏落的撤退人潮，有圖為證。高科技也拍攝不了的照片，柴玲、封從德在裏面。(請閱本期第一頁彩圖，初後學生兩千人。多麼令人心疼的數字。)

住在附近的居民看到這些隊伍，真是難過得要命。我們院子裏住的都是教授、研究員，這幾天大家也不上班，一天到晚議論，沒有一個支持政府。真是人心不可侮。

學生準備繼續鬥爭

六月四日當天，北京大學校門馬上掛了黑布，掛起了橫幅：「血沃中華，慘絕人寰」。校門外張貼血紅大字寫的「我們的宣言——堅決討還血債」。學生回來後在整個校園做了緊急的佈置，因為學生估計軍隊會跟過來，在校園進行圍剿，所以馬上集中所有校內的磚頭、啤酒瓶等準備抵抗。同時，學生的廣播台、編輯部、印傳單的宣傳部，馬上轉移，有些學生領袖也在四日後轉

入地下。

學生在校園裏已準備了軍隊過來，再拼。六月初，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從夏威夷回來，馬上宣佈學校放假。要不這樣，學生犧牲更多，因為學生都紅了眼，很多同班同學死了，若軍隊來，肯定又要拼命。學校放假，動學生能回家的就回家。

(比學生罷課還要徹底的罷課，是冷血政府迫出來的罷課。校園成了靈堂，悲雲慘霧。)

六月十二日，部隊進駐海澱區，中關村大街上有士兵巡邏，居民晚上八點鐘之後便不能上街。這時學校裏祇有很少很少學生了。

(北大學生在返校後，雖然忙於轉移陣地，還是發出一份「六月四日緊急呼籲」的傳單，全文見本期八百姓快訊。)

二十三人死亡的由來

官方對學生傷亡的數字當然是絕對保密的，可是哀木為什麼說學生死了二十三個，講得這麼具體呢？這是六月五日那天，北京市十一所高等學校的校長開會，統計其本校死亡的同學，第一批往回撤回校園的，能夠從屍體找到明顯標誌，有學生證的，共是二十三個。剛好政府要這個數字，便拿去了。

(死亡學生大部分死於廣場，能夠拾返學校的自然不多，何況還要明碼標記，何況僅是十一所高校！哀木自以為公佈了確實數字，何等自欺欺人。)

是，這「二十三」的數字不代表整個天安門的學生死了多少，東西長安街的學生死了多少。死的學生當中，外地學生很多，這怎麼統計得了。

無論是北京學生或是外地學生，從絕食開始，就寫下遺書，堅決與不民主、獨裁鬥爭。市民們談起都流淚，說從來未看見過這樣的學生，一位教授的鄰居，祇有一個女兒，哈醫學院，參加絕食，父母將她拉回來，拉了又跑，跑了又拉回來，第三次走的時候，寫下遺書，說為了理想，堅決鬥爭，多動人啊。所以我估計相當多的學生，不管是坦克來也好，槍炮也好，都不跑。一邊是高壓，一邊視死如歸，當然犧牲大。

(教授的估計真沒錯，學生看到軍隊進廣場，都圍

在紀念碑下，平靜地等著犧牲，後來還是因為侯德健與軍方談判後撤退的。)

一間醫院內死掉三十人

聽了袁木的講話，我們都在分析死亡的數字。鄰居有一個某醫院的醫生，他們的醫院在六月四日收了八十個非常重傷，從木樨地拉過來，或是從廣場拉過來的人，裏面有三十個已經垂危。他在談話的正好是一個血站的醫生，他剛下班回來，他說血站已沒有血了。沒有血，這三十個垂危的相信就救不回来了。

八十個是重傷，包紮一下便可以出院的不在此數。依此比例算一算，北京的醫院五十多所，算每一所死掉三十個，光死在醫院裏已是一千五百多個，而這家醫院離天安門很遠，拉到該院的一定比不上拉到其他醫院的多，因此死亡數字很可能更多。

(很早就傳出來自紅十字會的消息，說死亡數字是二千多人，可能就是從醫院得來的。可是抬到醫院後不治的，大概還是少數，當場倒斃、被殺的，在大街上、在廣場上，又如何計算，這些都被士兵處理掉，毀屍滅迹了。)

大屠殺：從預謀到下令

中央機關、機關部門從五月中旬開始控制起來。我的一個朋友在某機關部門工作，五月中旬的時候，所有該部大院裏的電話都裝了竊聽器，他警告我千萬不要在他家裏打電話談話運動、示威什麼的。其他機關也是通過電話竊聽，進行監視。我想這是防止機關幹部與學生串連，而且是有預謀準備要算帳的。

一位在總動員軍某部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六月一二軍方下了命令，勒令部隊和部隊家屬，不得到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幾天內將有重大事情發生。

現在想起來，他們是早就部署好進行血腥屠殺。六月三日晚八點，一位朋友在木樨地的部隊機關大院(該院早已進駐許多戒嚴部隊)親自聽到，一位團政委在作「戰前動員」，說什麼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要佔領天安門廣場。

一定要佔領！講得完全像打仗一樣。

(跟手無寸鐵的人打仗！對着完全沒有殺傷力的羣衆，全副武裝準備開戰的軍隊，一出動便是爲所欲爲的屠殺。)

屠殺開始前，有人聽到開槍的命令。六月三日晚十點多的時候，還沒開槍，軍隊已進到木樨地，與圍堵的市民來回推擠，兩方面對峙了很久，情緒越來越高漲。這時候部隊後面一輛小吉普車，是軍隊的指揮車，高音喇叭叫出：現在中央軍委下命令，可以開槍了！

有這個命令是肯定的，就是沒聽到也可以猜到，普通戰士一定不會自己作主開槍，要請示最高指示。

(可是，這一聲令下，在當時卻是極度驚心動魄的，前幾天軍車都是一攔就停，過不了就後退，對羣衆來說，這一聲軍號令，是何等錯愕。隨着這一句命令，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開始了！)

解放軍名聲敗壞

六月四日居民知道出事了，也看到學生退回來，大家整天就怕戒嚴部隊過來。現在解放軍在人民心中的威信低極了。大家正在談話，忽然有人喊：「解放軍過來了！」便趕快跑，連小孩子都哭起來。四十年來，解放軍的威信沒有到這個地步。現在大家都說「鬼子兵進村」，將電影中拍的日本鬼子，比作戒嚴部隊。小孩很害怕「鬼子兵」，哭着問：媽媽，戒嚴部隊過來，會不會殺了我們？

看當局真糟透了！

大家都知道開槍的是二十七軍。當局爲了要扭轉大家對解放軍的看法，有一天放了一段錄像，現身的一批部隊，首先聲明：我是三十八軍，我不是二十七軍的，我們來維持秩序。於是大家就鼓掌。

戒嚴部隊成份很雜，從西面入城的二十七軍最壞。我有一個親戚住在東郊，看到天津來的一個坦克部隊到了大北窖，剛好在他樓下。這支部隊還不錯，下來一個師長，與堵車的羣衆談話，後來這師長主動說走，三十六輛坦克駛走了，還剩下四輛坦克堅持要執行軍委命令。發生衝突後，這四輛坦克被燒了，不知是羣衆燒的還是他自己燒的。

北京人不受宣傳欺騙

北京的老百姓都清清楚楚，學生沒有罪。「反革命暴亂」是謠言。現在政府是騙外地人，農村的，以前的消息一直沒播，港澳的消息又進不了，祇能聽中央電視台。

雖然當局極力封鎖消息，但市民聽「美國之音」、BBC(英國廣播公司)。我是聽BBC的，六月四日國際廣播電台(中國向外廣播的電台，英語廣播)一個廣播員說，今天我國發生一件流血事件，政府出動多少軍隊，已經兩千多人死亡。BBC收到了，馬上反過來廣播到中國大陸的老百姓，BBC播音員講完之後，又把國際廣播電台那播音員的英語播了一遍。老百姓更證實這回事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播音員在四日、五日、六日都穿黑衣服，一個女的講到廣東大雨，死了多少人，忽然眼睛紅紅的，掉眼淚。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從六月七日起，就不用廣播員出鏡，報新聞時都打字幕。

老百姓都清楚的，暴力、欺騙，這樣搞下去，如何了結？(如何了結？暴政不亡，無法了結。學生說的：血債要用血來還。早晚要償還的。)

我看到解放軍怎樣殺進北京

■本刊記者

編者按：關於六·四慘案，本刊在過去幾期已從多個不同角度詳細敘述；惟是關於西路軍車如何進入北京、造成傷亡最慘重的情況，筆墨較少。

一名北京大學生，從六月三日下午到四日清晨，一直在城西（民族飯店至六部口一帶）活動，親眼目睹大軍進城、坦克頂上機槍旋轉掃射的景象。這位學生向本刊講述了當時的實況。

學生市民攔截放軍

從六月三日下午兩點多軍警放了催淚瓦斯，就顯出鎮壓先兆；電視上不停廣播叫市民不要出去，可是我們都覺得沒什麼。我們七個人一起出去，帶了濕毛巾，當時感到就得到去，如果這次不去戰鬥，就是一生的遺憾！

西邊特別早便打起來了，可是，當時我們不知道，聽說晚上九點多便打起來了。那時，我們到了六部口，一個女學生坐着平板車過來，手裏拿了一槍，說：快去聲援，木樨地打起來了！我們拿起毛巾，就說：趕快去「前線」，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了。

我們往回跑。還沒跑到木樨地，剛到民族飯店，防暴警察便出來。這是六月三日晚上十點十分。我們對民族飯店一帶的地形很熟悉，可是不知道防暴警察從那個胡同鑽出來。他們都頭戴鋼盔，手拿鐵棍，盾牌，大踏步地走過來了，大概五百多人，排成方陣，向着我們這方向仍催淚瓦斯。瓦斯在我們頭上冒白煙，噁得人眼睛、鼻子都流淚交流。

防暴警察怕群眾，他們最前一排拿盾牌，後面的沒有。前排的防暴警察老是在後排後面，不敢跑過來，不斷仍催淚瓦斯。羣衆定下來便不怕了，想在地上找磚頭，可是長安街特別乾淨，別說磚頭，想找紙片也沒有。後來市民就想把路邊的方磚翻出來（按：即鋪在路面的大方塊石），用手挖，挖得十個指頭都流血。女的把挖起的方磚使勁砸，這塊砸那塊地，一片一片掉下來了。還有馬路邊上的墩子，也砸碎，男孩子抱起墩子猛力摔在地下，連着墩子的鐵棍掉出來。後來不知誰拉來一車紅磚頭，這可好了，大家砸碎磚頭，扔防暴警察，將他們打散了。

老百姓打散防暴警察的方陣，還覺得不解氣，四個警察掉隊了，便給老百姓圍起來，使勁地打，有個北大學生大喊：別打！將他們送進民族飯店裏。老百姓對學生說：你們學生去守天安門廣場，這裏交給我們市民！

裝甲車掃射學生市民

就在這時，「轟隆隆」的聲音傳過來，滿街的市民在跑，一面跑一面大喊：車過來了！坦克過來了！我看見放槍，火光衝天，於是趕快跑到市民院子裏，不敢說話，不敢動，過了一會兒又跑到胡同邊往外看，看見裝甲車由西面駛向廣場，一面駛，一面掃射，跑得很慢的都被射倒，民族飯店那邊馬路，沒有胡同，市民無處躲藏，傷得特別多，市民只有臥在地上閃避槍彈。

親眼見坦克碾死學生

我們一直退，到了六部口，看見很多市民的屍體。大批倒在地上的屍體。袁木說死了二十三個，光是我們眼前一小塊地方倒着的也不止二十三個，一直到早上很多屍體都沒有收。

在六部口，幾個學生站在一輛二十二路公共汽車的頂上，擋住坦克的去路，大喊：別過來，別過來。可是坦克不管，一點沒減速度，呼的一下過去，撞翻公車，車頂上的學生摔下來，坦克、軍車在這幾個學生的身上碾過去了！我親眼看到，三個學生是這樣被碾死的！後來我們還將這經過寫成報告，貼在校門口。一個女學生目擊了這件事，後來在大街上給市民講這些經過，被逮捕了，當局要她承認講的是假話，她不，她說她講的都是真話。很遺憾，最後被判刑了，犯的是反革命煽動罪。其實，沒有這樣的事人家怎麼能說出來呢？而且那麼多人看見了，我也親眼看見了。

我們還看到坦克把所有軍車都打着了。長安街上被燒的軍車、公共汽車，全是軍人自己點的，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他們說：是軍人自己點的，這是一起跑，那有時間放火？可是後來坦克過去後，馬路上停着的車全都起火了。這是坦克機槍掃射的時候，打着油箱起火的！坦克一路過去，路上的車便一路着火，我們還說：啊，怎麼自己把車給點着了？不過當時也沒有害怕。軍車全部過去後，我們也不去廣場了，向西折回西單。

在西單前面，看見老百姓在打一個士兵。那當兵的大叫：別打我。老百姓說就是要打你！這一個士兵從軍車下來，打死四個人，我到的時候還看見他旁邊躺着一個老頭、一個男孩、一個女孩，還有一個沒見着。他坐的軍車開走了，剩他一個，老百姓便圍着打他，拳打腳踢。忽然有人叫：汽油！便有人往他身上澆汽油，有人用打火機點火，士兵大叫：別燒我！一個男孩說：你不是愛打人嗎？說完便將一根木棍塞在他手裏。士兵說：我現在不打人了。男孩說：你現在說不打不行，打！

燒着燒着，這士兵自己將衣服脫下。我們走的時候，還在燒，沒有將他攔在車上。不知道第二天怎麼就吊在車上。

然後有人就在西單路口，向市民演講，說我們要挾銀行的存款出來，這個政府是無賴政府，法西斯，暴政。大家鼓掌，正在鼓掌，流彈過來了，我旁邊不遠的一個老頭，腿上挨了一槍，穿了一個大窟窿。老百姓趕快散開了，我們也不敢再在馬路上停留，跑進小胡同裏。

大批屍體倒在地上

第一批軍車完全過去後，市民又跑出來大喊。這批軍車無邊無際，跑了幾個鐘頭，大概凌晨三點（六月四日）的時候過過去。車駛過的時候，我們在旁邊數，光裝甲車就過了一百多輛，沒數坦克，因為太多了，根本數不過來，三層交錯着走，前面是裝甲車，然後是坦克，再後面是載士兵的卡車，最後一輛又是坦克。開始時準備仔細數，後來就是數不了。

我們逆着軍車的方向向西跑，沒跑到木樨地，就聽見了歌聲響起來，是在六部口附近的學生和市民在唱《國際歌》。平時常看書上寫的「響遏雲霄」，纔算第一次感受到，那嘹亮、雄壯，我們隔了幾里地，也給震撼了。

坦克把民房廁所都壓倒了

當時還不知道血洗天安門廣場。五點多，我們剛出去，十里長街的華燈全滅了，接着「轟隆隆」聲傳出，第二批軍車自西邊過來，前頭第一輛車一面開一面放槍，老百姓急了，不知誰弄到「燃燒瓶」，往汽水瓶裏倒汽油，塞上棉花，往軍車扔，真點着一輛了。後來一看裏面是白麵和米，原來是一批給養車。這輛車燒着，走不動，車上的士兵給老百姓逮着了，也沒打他，不知給誰殺走了。

我們這一晚上在民族宮到六部口這一段路來回跑，我估計在這段路上死掉的大概有二百人。當時只要有人受傷了，就有平板車來拉到醫院，可能也有拉走以後死掉的。有些挨了「炸子」（達姆彈），特別慘，救不了。

除了軍車被燒之外，軍隊還有丟失槍支。很多槍不是老百姓搶，是軍人自己丟的。木樨地那邊真是有些軍人「起義」，把槍扔到八一湖裏，我聽當地的居民講，當兵的扔掉槍支後，說了軍裝就跑了。後來撿槍我也看見，六月七日我到那居民院探朋友，看見他們在撿槍。有些槍則是市民從坦克上卸下來的。

六月四日早上七點多，我回家去，在我家附近，一路汽車總站前面，一、二、一、一八、一一一、一一等幾路汽車排成三排，聽說五點多坦克經過的時候，撞了一次沒撞過去，又撞一次又不行，最後繞道而過，把旁邊的公共廁所推翻了。是轎車廁所過去的！完了還把民房壓了一角，撞倒了兩棵樹。市民很生氣，有人從樓上扔下花盆，士兵仰起頭來就掃，掃射了十多分鐘。民房外全是彈孔，有一塊玻璃八個槍眼。掃完了，坦克還往前開。一路上市民都躲開，剛巧一個老頭出來散步，他不跑，士兵就給老頭一槍，死了，一個年輕人上去扶他，他挨了一槍，又死了。我回家時候還看見兩人的屍體倒在銀行門前，銀行樓上留着子彈孔，地面全是血。



大量裝甲車源源開進北京。

整晚到處看見血，我也被濺得渾身是血。可是當時一點不害怕，到處跑，情緒很高漲。

直昇機運載學生市民屍體

六月四日下午，我經過南昌街的時候，親眼看到運屍體。我看到天上有直升飛機，旁邊的市民說：你看，還在運屍體！我回頭一看，離廣場上的戒嚴部隊二百米，看見他們正在抬屍體往上送。我趕快走開。

建國門前士兵被坦克壓死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我也在六月四日下午看到。被壓死的屍體，根本不成人形，沒有立體感，腦袋全被擠出來，眼睛、鼻子都擠在一塊，腿變得扁平。後來有人用布蓋上，天正下雨，從布下流出的水，全是紅色。

六月四日白天開始，市民搶購糧食和日用品，還到銀行取存款。結果銀行和糧店全關門。

銀行關了一個星期。六月十日下午剛恢復營業，大家便都搶着去拿錢，我也趕快去排隊。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個農民，他填了單子取七萬塊，銀行人員說現在銀行沒有那麼多錢，你不能取那麼多。農民問：現在不是存取自由嗎？職員說：是存取自由，但現在是特殊時期。後來只給取一萬塊錢。

六月十日是星期六，銀行只開兩個鐘頭，戒嚴部隊守在門口，開一道小門，隨時準備關門的樣子。第二天又關門，再隔了四、五天纔開，老是上半天班，上午上班下午休息。幸好我在剛開門那天便將存款全部提出來了。



北京戒嚴部隊，荷槍實彈、虎視眈眈，目的只有一個：屠殺！！

百姓半月刊 1989/8/16

我親眼看見

■ 目擊學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下午約二時，一學生領袖在急救中心給他母親的電話錄音。
(斷斷續續的錄音，邊談邊泣不成聲！)

我們還沒來得及撤退，他們就開槍！我們手無寸鐵在那裏坐著，手拉手站著往後退，他們就開始開槍！……我的眼睛看見一個一個同學都倒下了，……

媽您當時沒有看到那種場面，他們不是人，他們不是人啊！媽，您知道我身邊倒下多少熟悉的同學。他們都倒了，剛剛還說話呢！剛才還一起，現在都死了。我們還沒來得及撤退，他們就開槍，我們還沒來得及撤退，他們就開槍呀！我們手無寸鐵在那裏坐著，手拉手站著往後退，他們就開始開槍！死了的同學無法統計，他們打死了的人太多了！媽……您想不到現在我還活著跟您說話吧。有的同學已經死了，父母卻不知道啊！我們從西單那邊看，我的眼睛看見一個一個的同學都倒下了，他們竟敢開槍。啊！他們還敢開槍！死了多少人啊！死了多少人啊！他們太沒人性了。媽，我爸爸他不要來啊！媽，我跟你說現在我一個人外面，您們就別出來找啦！媽，我跟你說：現在有一口氣，我就跟他們拼了，奮鬥到底！

媽，我馬上就要走了。媽，媽，您放心！我不會那麼蠢的！媽，媽，您放心！您拿錄音機，您拿錄音機，聽聽紀念碑下的槍聲。

媽，您拿錄音機錄下給咱們全家及鄰居聽，聽聽天安門前拿衝鋒槍對準我們手無寸鐵的學生的槍聲。我們正往後退，他們竟開槍掃射。多少同學倒下了，死了的同學的屍體都給燒了。天安門廣場的帳篷裏，連屍體都沒有，他們都給燒了。媽，我跟你說，我們看到所有場面的同學決不會就此罷休的。媽，我跟你說：我不會坐著讓他們白白給打死的。媽，您知道有多少的家庭已經四分五裂了。他們從三歲的孩子到七十歲的老頭都拿槍打死了。一個老太太跪著求他們不要開槍，當場就被打死了。媽，媽，咱們最好還能見一面，好多同學從十三號以來，就沒有見過父母的一面，就這樣死了。沒有用！他們進來了，見到人就開槍。媽，我懂！媽，我懂，我懂！媽，我會回來的。您不要找我了。我會回家的，您放心！別讓我爸再出來了，媽，沒有用，跟畜牲打架沒有用啊！您別讓我爸爸出來了。恐怕到時，我爸爸再被人打死。媽，媽，我跟你說，您別再讓他找我，我會回來的。我隔一段時間就給家裏打電話，媽……我還活著。您想想天安門前躺著的屍體，他們竟敢朝我們開槍，媽，媽，我有一段錄音（註），您錄下來給鄰居聽聽是他們在紀念碑下開槍的聲音，您讓他們錄下來聽聽。媽，您再聽聽吧！

註：是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的現場錄音，相信這位學生現時尚生還。

守望中華 89/7

我一生中 longest 的四十小時

曹新源（根據錄音整理）

我今天的講話如果加一個標題的話，那我將它命名為「我一生中 longest 的四十小時」。

我是今年三月三十日回到北京的，所以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到五月二十日頒發戒嚴令，直到六月四日大屠殺，許多發生的事情我都目睹了。我想從六月三日凌晨開始講起，告訴大家我這四十小時的經歷。

六月三日凌晨，我剛從天安門回到我住的招待所，就聽有人在街上大聲叫喊：共產黨進城了！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國民黨撤退前夕，每當共產黨軍隊打進來時，就有人大喊：共產黨進城了。這在共產黨拍的電影中常有這樣的鏡頭。現在「共產黨進城了」這句話從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學生口中喊出，確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諷刺。

當時是六月三日凌晨兩點，我急忙起來，我住的地方近美術學院，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十幾分鐘路，我跟著同學們向天安門廣場跑去，在北京飯店門口發現了軍隊，大約有一個師的軍隊，全部是便裝，穿白襯衫，背著一個防雨布的小背包，上面有軍上衣和軍帽，帶著乾糧，沒帶任何武器。我們有二十多人上前跟他們講道理，說北京沒有發生暴亂，勸他們退走。幾分鐘後，東單一帶的北京市民紛紛趕到，僅持一個多小時後，這一個師的士兵被迫退到東單以東的方向。在勸退過程中，我們還設法給他們弄到一些吃的東西。據這些士兵說，他們被汽車拉到通縣，然後強行軍一路小跑進城，所有的軍人全是大汗淋漓，確實相當疲勞，有的甚至鞋子都跑爛了。天亮之前，市民把軍人都分散了，坐下和他們談話。天亮以後，軍人就撤退了。同時，在西單方向開來的軍隊由於軍車開得太猛，壓死了三個市民。這個消息很快在北京市區不脛而走，於是就有人呼籲是否在天亮後的八點鐘在北京舉行抬棺大遊行，向政府抗議示威。既然北京並非發生暴亂，為什麼要採取派兵進城的強硬手段。後來有沒有發生抬棺示威，我不知道。但整個三日這一天，北京市又重新回到了五月二十號戒嚴初的狀態，居民到處設路障，剛剛走向正常的市內交通，又一次被打亂，市民感到萬分憤怒。剛才幻燈片展示了市民從長安街上揀來的軍帽、搭帳篷

的鐵鉤和防雨布，這些都被放在新華門前展覽。市民在天安門西邊的六部口攔獲一輛指揮車，上面有一挺輕機槍和六支半自動衝鋒槍，車裡坐的是一個軍官，我看見有一個穿黑襯衫的人往車上遞一個條子，條子還未遞進去時被市民抓住，大家看見條子上面寫的是「什麼也不要說。」

到了三日的下午還不斷有兵進來，在人民大會堂的西側、歷史博物館、六部口、中南海的西北角等地，都有軍隊不斷進來，或者是進退不得，坐在地上。所以有人估計，當晚會屠城。當晚九點，我騎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希望同學們最後見一次。見面後，同學們都勸我走，趕快離開中國，他們說如果抓人的話，我只會連累他們。

於是我繞到正陽門，再回到天安門的金水橋，這時我還相信政府不會真正動武，頂多是用電棍打人。所以那裡打人，市民就到那裡幫忙。這是五月二十日以來我們得到的經驗，市民聚得愈多，政府動武的可能性就愈少，傷人的數量就會愈少。可是到了午夜十二點，兩顆信號彈從天安門東西兩側升起，廣播裡一直在揚言要清場，希望市民退出廣場，否則責任由個人負。這顯然是一種威脅，可是市民退走的人很少。將近一點半鐘，有一輛坦克（就是很多報導多次提到的那輛坦克）在長安街從西往東，再從東往西，再從西往東……以很快的速度來回奔馳；我估計約每小時四十英里或六七十公里的速度在跑，當它開到建國橋上時，撞翻一輛軍車，據說是三十噸的，壓死了兩個戰士和兩個市民，建國橋上一片自行車行人來不及躲避，扔下車就跑，自行車全被坦克壓平了，成了鐵皮地毡。由於坦克壓死了人，群眾追著喊打，一路上往後帶帶塞塞，一直追到天安門西側，終於用一個帶水泥底座的鐵桿路障卡住坦克，用裝汽油的燃燒瓶往車裡扔，駕駛員從坦克中逃出來，後來被學生救下保護起來。

到了兩點多鐘，從西單方向並排開過來兩輛坦克，據說這兩輛坦克是由西向東開路的，在西單附近壓死過十二人。它們以每小時一百公里的速度全速前進，把一切障礙毫無顧忌地碾平。在它們的後面跟著一輛單獨的坦克，向長安街兩邊的人放催淚彈。我在人群中也能幸免，只覺眼前一片昏花。在它之後是一輛

裝甲車，朝兩邊的人群一路打槍過來。我當時在金水橋上，急忙退下來，退到城牆腳下十米左右，這時我已看到廣場上有人倒下。

之後，一隊早就準備好的防暴警察從天安門城樓的門洞裡衝了出來，推推拉拉地把人們從金水橋上趕走。他們還算客氣，可能是北京當地駐防部隊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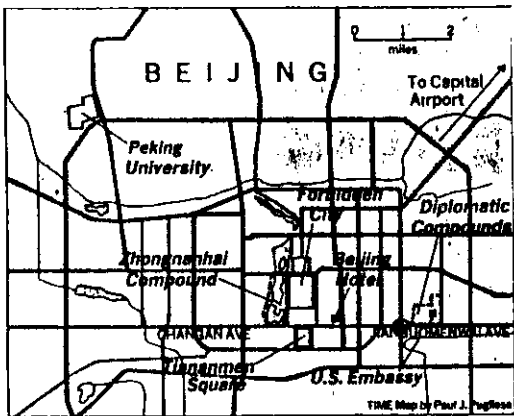
我被迫離開天安門城樓門洞，繞到故宮、角樓，這時整個長安街上槍聲不斷，很悶的響聲是催淚彈，總是不斷；很清脆的聲音有連射也有點射，像是輕機槍和自動步槍。這時大家當然都很怕，可是沒有一個逃跑。

我又來到南池子，這時戒嚴線早已拉起來了。在南池子以東二、三十米，拉了一條軍人的防線，他們不斷開槍，逼群眾退却。市民們企圖往前走，與士兵對話，告訴他們沒有人要搞暴亂，完全是政府腐敗。如果政府肯承認一些錯誤，並願意和市民、學生進行平等的對話，並能夠把國家搞好的話，就不會出現這種狀況。大家和相互不認識的人手挽著手，唱著國歌，一步步地向警戒線靠近。我們每一個人都意識到民主對我們的國家是多麼重要，民族的前途就在我們身上，我們正在和反民主的暴力進行較量。我們中間各種人都有，有市民，也有從外面趕來的學生，人們走著，走著，心裡都有一個暗暗的希望，希望軍隊會在成千上萬的人民的熱誠力量的感召下向廣場後退，使這次軍事戒嚴行動再次化為泡影。可是人們的願望太善良了，軍隊突然向手無寸鐵的百姓開槍，用衝鋒槍平掃。當時在我前面的人就倒下了，有的倒在地上，有的倒下了。我確實感到很愕然。這時人們才意識到這不是一個不會與人民對話的殘暴政府。人們開始調頭朝北京飯店方向跑，我也跟著人群向後跑，剛跑幾步就被下水道沿絆倒了。當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完了！因為有千百個人從我身上跨過。可是等槍聲稀稀後，我發現自己竟然完好無缺，在一片混亂中人們還注意不踩到地上倒下的人，從我們身上跨過去。

槍聲一稀，人們又紛紛回來，大家都有一種念頭：就是受傷的人需要我們救護。廣場裡的學生需要幫助。我看到幾輛汽車想衝進廣場搶救傷員，但是都沒成功。有一輛三十八路車，大家後來稱它為英雄車，為了搶救傷員，它換了三次司機，每一次都被打傷，最後一個司機在大約四、五點時拉了一車的傷員搖搖晃晃開到協和醫院，當人們把傷員救下來時，想讓司機休息一下，可是發現他已倒在駕駛盤上死了。三點多鐘後，軍隊組成的戒嚴線向群眾開槍已成了規律性的了，每當群眾靠近戒嚴線時

就打一陣槍，群眾一退還，就停止，在這個過程中，群眾傷亡不少。後來我離開了，到了建國橋，在那裡我拍了一些死傷群眾的照片，現場狀況非常之慘。到那裡之後，據說天安門廣場一帶就熄了燈。我回到天安門廣場時已五點多鐘，有些學生逃出來了。不久我看見兩輛軍車由東向西駛過來，沿途向群眾掃射，在北京飯店時，也向北京飯店的窗戶掃射，一個大窗被擊碎，兩個窗戶留下很多槍眼，北京飯店正門也留下一個大槍眼。一個商店的鋁合金大門上我也看到布滿了槍眼。我在南池子時，突然有一個男子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救救我，我受傷了。」我趕緊喊大家幫助他。他是被一顆流彈打中，這樣受傷的人很多。

六月四日清晨六點鐘，我在北京飯店附近看見一種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車，上面用血寫著（確確實實是血寫的）：向李鵬討還血債！在旁邊的路障上、牆上也有用血或者墨寫的口號：絞死李鵬，血債血償。這些口號表達了北京



人民的義憤之情。如果說北京有暴徒的話，那麼全北京一千二百萬市民都是「暴徒」，他們和全副武裝的人進行面對面的抗議。

六月四日上午九時，我又回到南河沿，這是北京飯店旁邊的一條路，從天安門廣場數過來是第二條街，也是最靠近警戒線的一條街。市民還在那裡聚著，想和士兵對話。有一個在法院宿舍的小伙子告訴我，他一早借牛奶的機會騎車跑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了一下，結果被軍人抓住，差點打死。他說他看到廣場內有五堆直徑十米左右的火，黑煙滾滾，有士兵不斷向火裡潑酒精，整個天空彌漫著酒精的氣味。據說是為了掩蓋屍體燃燒的氣味。

九點到十點間，警戒線的士兵還是不斷地向市民開槍，我數了一下，在一小時之內已有四十七人被打死打傷，抬出去了。有一個小伙子全身都是血，他對我說：「你別害怕，這一身血都不是我的，全是傷員的。昨晚槍響以後，我就衝進廣場搶救傷員，這個政府真狠心，居然連傷員也不許救，受傷的統統拉到廣場裡面。他親眼見一個學生模樣的姑娘，肩中了一槍。他剛想上去救，就被幾個軍人補了一槍。他說：「我就呆在那裡，那麼多人死了，活著的人應該做點事情，哪怕還有一口氣我也要把手搶出來。」周圍還有很多市民用各種各樣的手段，用自行車、三輪車運送傷員。

從六月四日凌晨，直到上午，軍人每隔一、二十分鐘就對市民打一次槍，我在那裡呆的時候每一次打槍我都記錄下來了，九點廿分一次，九點四十分，十點十分，十點半。在軍人的戒嚴線和市民之間有一百米開闊地帶，任何人不得走過去，一過就開槍。

我看見的最喪心病狂的一幕是六月四日晚九點，軍人端著槍跑過來，非常激動，興奮地一邊狂笑一邊向群眾開槍。我想當年日本人打進中國也未必會這樣喪失理智，他們不但向長安街東邊衝鋒射擊，而且還衝進南沿河的小街追著群眾開槍。這一幕我是親眼見到的。當時我想，作為一個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支持者，即便不能與他們站在一起，也要站在離他們最近的地方聲援他們。

六月四日晚我住在北京飯店，見到一個香港學生代表團成員，他一直在廣場堅持到四日凌晨五點鐘，和其他同學一齊撤出廣場。他臉色蒼白地告訴我，大約四點鐘，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之後他聽到槍聲大作，傷了多少人他不知道，他承認他當時嚇壞了。當時沒有一個人不害怕，但沒有一個人後退，也沒有一個人把這個「怕」傳染給別人，大家都處在同一環境之下。

將近五點鐘，一個高音喇叭播放：現在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請人們立即離開廣場，從開始廣播到坦克壓過來前後只有七分鐘。而這麼大的廣場想跑出去，七分鐘是很緊張的，他是跟著別人一塊跑出來的。我問他有沒有看見軍人打人，他說他不記得了，他當時頭也不敢抬，只覺得槍柄頂著他的腦袋。他說他根本不是走出來的，而是連爬帶鑽地逃出來的，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跑出來的。他承認他當時很不敢，但是又畢竟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在天安門廣場和大陸學生一直堅持到最後。以上就是三個目擊者告訴我，和我自己親眼見到的事情。

下面是聽眾提問：

問：報紙上登了熊玠的一個證詞，說他在北京飯店上沒有看見軍隊殺人，只看見市民打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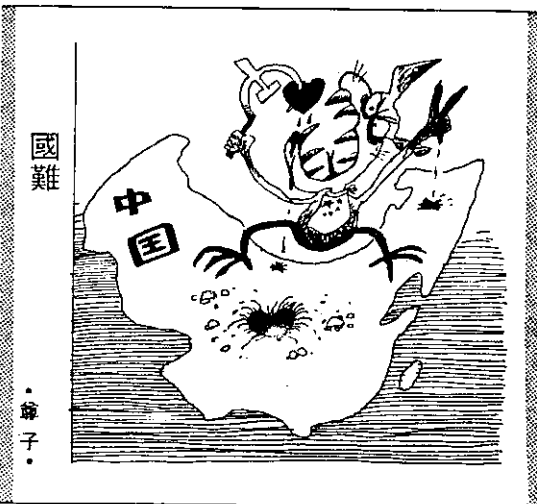
答：我只想證明一點，在北京飯店樓上，除非用高倍軍事望遠鏡，否則根本看不見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

問：他不但看清了，而且還看清了「暴民」中有一兩個學生模樣的人。

答：您相信嗎？（笑聲）

問：報紙說軍隊使用了還鄉彈，你們是否能證實？

答：我看見一個婦女，中彈後胸前被打爛，像蜂窩一樣，只有還鄉彈有這種效果。香港得到了一些協和醫院醫生的證詞，說從對傷口處理的情況來看，顯然很多傷員是中了開花彈。



國難

· 筆子 ·

我在西郊民巷目睹 六四慘案



爲使六四大屠殺的真相爲外部世界所知，我決定拿起筆來寫出自己在西交民巷目睹的六四慘案的經過。我希望更多目擊者也拿起筆來，從更多角度——人大會堂、前門、歷史博物館、金水橋……將六四慘案的全貌公之於世。

六月三日。當時北京的情況已很不正常。一般單位均提前下班，地鐵、公共汽車時常停頓，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前晚木樨地軍車壓死了人，使得氣氛變得比較緊張了，人們估計會有更大規模的遊行，政府方面亦會有所舉動。

六月三日傍晚，我和我丈夫從西交民巷的家裡出來，習以爲常地來到天安門廣場。我們當時沒吃晚飯，就想在前門找個飯館。誰知前門一帶的飯館都關門了，只好找個煎餅攤解決問題。學運期間，許多小攤販聚在廣場附近，生意不錯。正吃着煎餅，廣場喇叭開始播音，

說是晚上十點民主大學在廣場成立，王丹、嚴家其、吾爾開希這些人要出席。很多記者、市民就往上湧。我和丈夫決定等着看熱鬧。我丈夫說着笑話：今年春節聯歡晚會上相聲演員姜昆說他做了個夢，天安門廣場改成農貿市場了。你瞧，還真讓姜昆說着了。那年春節晚會上，費翔唱了個「冬天裡的一把火」，果然大興安鎮森林就燒起火來了。這些演員真靈呀……

忽然，又聽到廣播聲，聲音不對了，很緊張，說東大橋等地方來了軍隊，要學生、市民去支援。一共四、五個地方。又說塔基炸藥店也有軍隊出現，我一聽就急了，軍隊已經開到廣場啦！

這時候，又有學生、市民跑過來，渾身是血，向廣場上的人訴說軍隊打人暴行。戒嚴上幾天了，北京也沒什麼事。這回軍隊真動手了，大家都很氣憤。我跟丈夫一商量，決定不回家，留在廣場上。人大會堂有個政府安插的喇叭，這時反來復去廣播一篇稿，要市民們快快回家，可誰肯聽政府的？

六三之夜，廣場上的人比平時少得多。我猜都是去各路口堵軍隊去了。快到十二點了，還沒什麼動靜。我們以爲軍隊不會來了，就回家睡覺。剛進院門，就聽見裝甲車隆隆開進的聲音，還有很多人跑，在吶喊……我們趕緊又走出院子，裝甲車剛剛開去，留在地下壓出來痕跡。天安門廣場附近，那些市民（包括我們）每隔十幾米設的橫竿，全被壓平了。

我和丈夫趕快向塔基炸藥店方向跑去，數不清的街坊居民也往那邊跑。許多不知從何而來的士兵，頭戴鋼盔，列隊跑向正陽門。市橋不住地響，就在旁邊高呼，打倒李鵬的口號。

有一隊學生頭纏白布條手拉手地跑過去，與士兵對峙。市民們都湧到學生方面給他們助威。我和丈夫也擠上去，對士兵們講道理，勸他們撤回營房。這些士兵都不說話。這時市民們有人朝士兵投玻璃瓶子，我們都很意外，覺得有使公安人員混進來，想鬧事。於是好多市民（包括我們）便扯頭向市民喊話，讓他們別動手。混亂很快便平息了。群眾覺悟很高，不給政府提供鐵證藉口。有些外國記者開始拍照。我和丈夫見這陣沒事了，就往東邊走去。這時，一大群市民潮水般地向後撤，原來是防禦警察進來了，他們列成四路或六路縱隊，手裡拿着大木棒子，逢人便打。我們也跟著跑，到了毛澤東紀念堂附近才停下來。我親眼看見不少市民被警察追上，打倒。我有些害怕，緊緊抓住丈夫的手，我們跑到松樹邊上的水泥片上了。市民們群情激昂，大聲警察是法西斯。

西斯。市民們準備還手，就彎腰拾東西，廣場上沒啥東西好擡，就把毛澤東前面的水泥墩子摔碎了，用小碎塊還擊警察。

學生的廣播響起來了。聲音很危急，呼籲大家向紀念碑三層靠攏，說只要人在廣播站就在。我們走到紀念碑附近的草坪上，這裡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學生。我挺奇怪，這些學生怎不去支援紀念碑？我丈夫說他們折騰了這麼多天，又困又乏，哪裡醒得了？

躺倒在地的學生不醒，周圍是一堆堆垃圾。我差點踩著一個學生。他用毯子蒙住臉，只露在外面一雙腿。可憐！這麼熱的地方也能睡覺，足見他太乏了。我對丈夫說，萬一軍隊衝進廣場，學生市民一跑，非踩傷這些學生不可。

這時，遠處響起了零星槍聲。我和丈夫有些害怕，商量了一下，覺得還是回家爲妙。我們當時以爲政府對學生比較寬容，而我們是市民，軍隊會對我們不客氣。我承認我們有私心。

回到西交民巷口上，聽得槍聲大作。塔基炸藥店那邊也有人打槍。槍聲是很奇怪的響聲，叭叭……是爆出的聲音。天空也升起了信號彈，紅的。這時是凌晨一點多鐘。

槍聲越來越密，軍隊大批湧過來。戴著鋼盔，亮著刺刀，很嚇人。有膽大的喊：「鬼子來了！」我看見有個外國記者騎自行車靠近軍隊，躲在樹後照個相，然後騎車離去。這時市民已四散奔逃。

我和丈夫躲在牆角往外看，又怕又好奇。我說這槍聲就跟煤礦似的，跟平常在電影上聽到的不一樣。丈夫安慰我說，這可能是橡皮子彈，打到身上頂多落塊銅錢人的疤，沒危險。我一聽又長了膽子，就朝軍隊喊了一嗓子：「不許鎮壓學生！」誰想馬上招來了一陣槍。我丈夫氣得大罵：你不要命啦！

我這一嗓子提醒了附近的市民，好多人都喊起了反政府口號。連銀行總行、保險公司的宿舍樓上也有人響應。喊得最多的是「打倒李鵬」。

我和丈夫回家拿了望遠鏡，爬上自家房頂，往天安門廣場看。我清楚地看見蒙了苦布的軍用卡車一輛一輛開入廣場，總共約二十幾輛。空氣中能嗅出燒著膠皮的氣味，四下裡都有火光燃起。

不一會兒，東邊槍聲緊了。又聽到有砲聲，跟放禮砲的聲音差不多，氣味難聞，刺激得人要流眼淚。原來是催淚瓦斯，我丈夫下去弄個毛巾，我還在房頂觀看，各種車輛（包括押送犯人的囚車）開過來，一邊開一邊扔催淚

些市民也跟著哼，很多人哭泣、落淚。學生廣播又有個沙啞的聲音說：「讓我們平靜地面對死亡」，而人大會堂的政府喇叭也同時沒完沒了地宣讀市政府的命令。

四點多鐘，廣場上的燈刷地一片雪亮，軍隊從人大會堂跑出來，兵分幾路，有從正門，有從側門出來。學生廣播說士兵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們，我們是要建設富強的中國。



北京街頭荷槍實彈的軍人

瓦斯。防暴警察封死了正陽門至毛紀念堂的空地。

正在這時，機關槍響起來了。跟電影上完全一樣，我用望遠鏡看見有人隨著機關槍倒下！我一下子就哭了，明白這回政府真要大開殺戒了！

紀念碑的學生廣播又開始對士兵喊話。很悲憤的聲音，說國家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你們也有父老兄弟，怎忍心下此毒手等等。房上房下，一片悲聲。

台灣歌星侯德健在廣播中說：我是侯德健，我們的人死得夠多了，現在在廣場裡的每一個人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不能再傷亡了。侯德健的話概括成一個字就是「撤」。他要求與戒嚴部隊談判。

這時大約是兩三點鐘，槍聲稀了一些。一些左鄰右舍的人從北京各處跑回來，爭說軍隊在復興門、建國門等地殺人的慘況，涕淚交流，泣不成聲。這下我們才知道原來天安門廣場的情況還是最文明的呢？

大概是四點，侯德健的聲音又響起來。他說與戒嚴部隊談妥了，從東南角給學生留出一條通道撤退。

這時候，廣場熄燈了，除了天安門城樓下還有幾盞燈，整個廣場黑壓壓的。靜了幾分鐘，一點聲音也沒有。學生廣播開始放國際歌。這些天來，廣場上經常放國際歌，但都沒有這次悲壯，很慘。紀念碑上的學生在唱，我們這

這時學生開始撤退了，我用望遠鏡看見校旗在移動。許多軍隊從我家房上經過，呈扇形移動。也就是說，不是整個一路開過去，而是先留個道口，然後一隊士兵上去填補一下，又一隊士兵補上去，士兵站定後，最外圍一排槍口對準廣場。

沒過幾分鐘，北面突然槍聲大作。機關、步槍都有。北面一響槍，廣場四周槍聲大作地



被槍殺的學生橫屍街頭

開火了。還有士兵向我房頂打冷槍，嚇得我們

我趴了一會兒，聽到槍聲稍稍歇了，就探

個頭用望遠鏡觀看廣場情況。這時，毛紀念堂後面又有學生呼口號，喊的是「殺人犯！」「殺人犯！」我心想怎麼喊口號呀，這不是拿雞蛋往石頭上撞嘛。果然，我看見士兵像野獸一樣向學生開槍，當場就倒下了十多個，槍聲壓住了口號聲。我們房後街上的士兵也開始漫無目標地舉槍亂射。

這時候，我們房後一陣騷亂，我丈夫趕緊拉著我連滾帶爬地離開房頂。四鄰聚了好多人。我們房後就是人行道，搭了個臨時廁所。這時人行道上站滿了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市民都背對士兵逃散，只有我們街坊的一個傻子（低智人）想上廁所，就朝著士兵走去，士兵們見傻子走近，就用槍托一頓亂撻。傻子跪在地上求饒，三個士兵還不住手，把他打倒在地。房頂上有個小伙子，用照相機拍下了這個鏡頭，

差點被子彈打中。

六點多鐘，有個推着光頭的軍官模樣的傢伙率一隊士兵從街上走過。這時天已亮了。許多市民站在自家門口，敢怒不敢言。有個青工小聲說了句什麼，好像是軍隊不應打老百姓。這個軍官就喝起來：「你敢再說一遍？老子斃了你！」青工扭頭便跑，這軍官掏出槍，也不知怎樣一拉槍栓，結果子彈落在地上了。他一驚，腰裡彈子彈一裝進去，叭地射了出去。有個娃娃不知死活地走了過去拾子彈，被這軍官一腳踢得哇哇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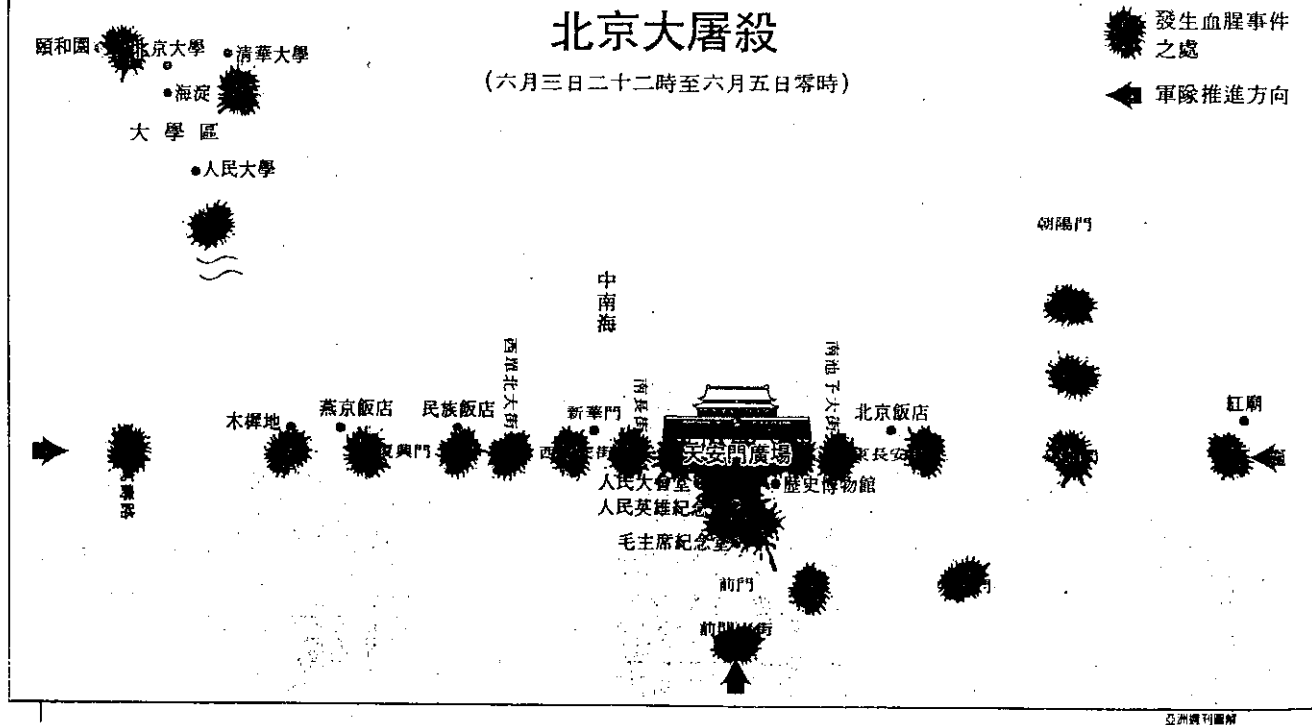
北京的老百姓從未見過這種真槍實彈的架勢，根本不知道厲害。我們湊在一起，用極小的聲音咒罵解放軍簡直比法西斯還法西斯。待軍隊走遠後，才開始破口大罵。大家都說要罷工罷市罷課，全國大罷工。

以上就是我在西安民巷目睹六四慘案的經過，如果將來有一天，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像當年審判四人幫那樣審判六四慘案的元兇，我願意出庭作證。

中國之聲 89/10

北京大屠殺

(六月三日二十二時至六月五日零時)



《真言》

博、在木柵地、在札士路都有被燒毀的軍車、裝甲車。我數了一下，僅從木柵地到新華社宿舍門前，就有二十七輛裝甲車被市民燒毀，還有數十輛軍車，路上全是石塊、瓶子渣等，完全是電影裏的戰場樣子。這些又說明了什麼？

今天我太激動。活了三十一年，從沒聽過槍聲，從沒見過流血犧牲。外面現在風聲大作，小雨漸漸。被軍管的北京一片陰森。恐怖氣氛透過牆壁進到房間的每一個角落。記得當年四、五也下雨。怎麼這麼巧？這雨洗不掉廣場的血迹（外面槍聲大作，來自廣場附近），這雨遠不及我們的眼淚。中國法西斯如此慘無人道、可恥。現在看他們如何收場。天安門進得去，出不來。商店全閉門了，交通中斷了，之後就是通貨膨脹，物價漲到了天上。苦的是市民。血流成河的是市民。我們曾經充滿幻想，曾經那麼善良。這次教育了我們。你知道嗎，我手上會沾滿了無數人的鮮血。先是戰士的。他們打了我們的市民，反而讓我們陪着去醫院治療，而後來還是要打我們。後來是學生和市民的。我在盡力，我在投身。你的電話能找到我不能不說是我命大，不僅活著，且一絲損傷沒有。現在我在積存力量，軍隊一走就去遊行。從明天起罷工了！

恐怕你們在電視裏看不到天安門。那裏沒有照片，沒有記者。連外國記者都說在智利也沒北京兒。他本人現在醫院，身上被打了個大洞，並且開了花。軍隊的子彈不是電影裏的，不只是打一個眼，而是進去後爆炸。所以有的槍孔的肉都翻在外面，慘不忍觀。

我是太平的，也不會太狂熱。因為狂熱是沒用的。你也要留心才好。明後天我再寫信。或許這信海關卡住了。

剛才看見××了，他們都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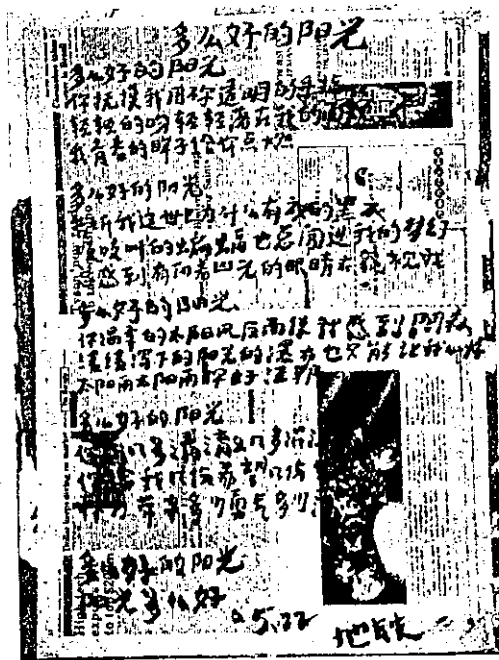
外面還在打槍。聽說今天中午又要採取行動。長安街上全是議論的人群。昨天我太累了，什麼也沒有聽見。據說師大內打死許多人！有人從死人堆裏爬出來講的。這幫流氓一不做二不休了。復興醫院門前全是認屍的群眾，慘啊！

6.5 ~~at~~ 8:00

(轉載自聯邦德國中國留學人員聯合會的《真言》創刊號；本文標題是編者所加)

十月廿九日 09/9

◎ 5月下旬北京大字報



6月6日凌晨一點左右，體士路（復興門）一帶又響起了密集的槍聲，一陣陣一直持續到4點多。這兩天襲擊軍人的事件時時發生，直升機每時每刻在城上空飛行，我們院空氣也很緊張。

這日子真沒法過了！我記得你會問我“爲什麼從一個堅定的國內派轉變成出國派？”這就是理由，這種空息的空氣不轉，誰也不會活踏實的，你會理解這種心情的。

6月6日上午，我去日壇，街上情景和昨天一樣淒涼、恐怖。回家時路過王府井，正好趕上軍隊向東調坦克，我急忙找個地方躲起來。十幾輛坦克慢慢地沿長安街向東馳去，巨大的轟隆聲震動着北京飯店的玻璃和其它建築，一輛坦克上的士兵向四周晃動着高射機槍，槍口指向之處人們都趴下了，真他媽的。在自己國家首都怎麼過起類似亡國奴的日子？！我沿王府井北去，在“東四”看見一些被燒毀的電車和卡車，人們都默默地往視着，誰也不說話……我去單位，看看單位的同志有沒有需要間道掉會的，還好，哥兒們幾個都還活着，可他們說比死了都難受，我們幾個人都哭了，這些天不會哭的大概已經沒有了，中午在單位喝了些酒，使本來就不舒服的心更難受了，飯後，大家握手告別。

兩天來，我經過西四、西單、王府井、東四和前門大街，沒看見一例碰商店的，商店的玻璃門窗完好無缺，這真是奇跡！北京人，我真為你自豪！唯一遭破壞的是前門大街西側，一個漂亮的商店牆壁上，有幾十個彈洞。

北京幾天沒報紙了，電視、電台除反覆播放成嚴令及其它類似的東西外，沒有新聞，外地情況也不了解，外國電台受強烈干擾。小道消息、馬路新聞四處傳播，使人半信半疑，北京就像一個垂死的老人，除仍在呼吸外，沒一點生氣。甚至連天氣也討厭起來，連續的陰天下雨使氣氛更加淒涼，我想貝魯特西區人們的心情也不外如此！

這兩天街上行人已很少，我單位的頭兒說，5日上午上班，碰上兩輛軍車，一個騎車人罵了句「法西斯」當場被打死，然後把屍體丟到汽車上拉走了！他難過得一天沒吃飯，路邊的人看着，誰也不敢說話。昨天復興門的一個騎車人說了句什麼，十幾個士兵將他開槍打死，還打傷了幾名市民，其中有婦女，說老實話，現在市民在持槍的士兵面前吐痰都不敢，反之零星的士兵也不敢在街上行走，現已發生多起殺死士兵的事件，晚上有人用槍襲擊士兵。北京已處在高度恐怖的状态，這種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的，如果這樣相持下去，局面將更加惡劣，外地的局面也將出現危機，那時共和國將大亂，可以說，中華民族已處在最危險的時刻！我們這代人真倒霉，沒幾天和平日子過

1989年6月7日晨

(轉載自《新聞自由導報》總第八期)

十月廿九日 89/9

從昨天到今天，歷史將寫下這悲慘的一頁。我真不知怎樣寫這封信。但我必須寫，告訴你一些實情，決不誇張。北京局勢萬分緊張。我們手無寸鐵，大量學生、市民流血犧牲，譜寫着又一曲民主之歌。

昨日（六月三日），我在天安門廣場。學生在廣播晚上軍隊要鎮壓學生，廣場告緊，呼籲市民支援。東到大北橋，西到翠薇路，滿街的市民，有工人、農民、幹部、個體、老人、孩子。我們把長安街上的分車道橫在路上。約十點鐘，三千多軍隊衝了上來。他們採取個人突破，揮動手中的皮帶向市民、學生打去。由於人多，被阻了回去。我在第一綫，被兵打了一下，到現在後背還痛得很。在我身邊就有被打破頭的市民。這是前奏。十二點，裝甲車肆無忌憚地從東衝了過來，一路壓死不少無辜市民。到了東單，人們用上千輛自行車組成路障。但裝甲車仍橫衝直撞，所有自行車一瞬間全部壓壞。躲避不及的人被撞死撞傷。裝甲車過了東單，又從天安門返折回來，這樣往返幾次。我們忍無可忍，有志之士衝了上去，用鐵棍挿入裝甲車履帶，在天安門前點燃了這該剗的軍車。之後又有兩輛軍車在天安門被燒。當時，東錢的軍隊被阻在建國門以外，有七十多輛裝甲車，一百多輛軍車，這邊是二十四軍。西錢情況不妙，軍車在軍博一帶打得厲害。下午我去看了，所有的樓房上全是彈孔。壓說，打西錢的是二十七軍、三十九軍。現場情況是，二十七軍打道，機關槍開路。百姓死傷不計其數。這個二十七軍的軍長是楊尚昆這惡棍的侄子。他們以市民的鮮血鋪路打進了天安門。是時三點三十分，我剛剛撤下。東錢軍隊也上了。上面要求四點前佔領廣場。從前門來的五十軍也打通路。

我在王府井協和醫院門前，被打的人抬下來，一批又一批。第一車據說就有八人死亡，六部口一帶更慘。四點十五分以後，槍聲大作。今天聽從廣場逃出來的學生講，廣場被封後，軍隊先用機槍掃射安扎在廣場內的學生帳篷。之後限定時間讓學生集中。但被打傷的、跑得慢的均不能趕到地點。這時裝甲車排成橫隊從廣場一側壓向另一側。帳篷、活人全被壓碎。這個逃出來的學生神經已不正常。當兵的殺紅了眼，開始整個清理廣場，決不放一個活的出來，並把屍體集中起來燒掉。在王府井可以看到那滾滾的黑煙，並聞到氣味，好慘啊！那時不准救護車進廣場。被市民救出來的只是外國的人們，有學生、有市民，幾乎都是死人了。有的人胸上開了花，有的人身上多處子彈，還有腸子流了一堆，都是用平板三輪拉來的。所有的人都睜着眼睛，滿車是血、滿地是血、滿身是血、滿眼是血。

數府口口聲聲說軍隊戒嚴不是針對學生，這又如何解釋？到底是誰在製造動亂。難道是我們嗎？我們手無寸鐵，我們保持冷靜。可軍隊呢？政府欺騙了我們，現在露出了獠牙的面目：奸惡、流氓。這慘案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四．一二蔣介石沒有這厲害；八國聯軍侵略北京也不及這殘忍。過了五點半，那些當兵的殺紅了眼，見人就打，還衝入小胡同開槍。有一個胡同一下子就死了十三人，僅一個小小的院落就有三人死於無辜。中國如此黑暗，人身沒有絲毫保障，更談不上什麼民主。我說的全是真話。今天我看了太多鮮血，那都是我們的同胞。現在外面還在打槍。對面的外交學院，一直播著國際歌和國歌，還有哀樂，那裏死去了我們的學生，還有許多學生失蹤。聽說晚上軍隊要來，這太讓人憤怒了。這渾蛋政府到底要幹什麼？本來天安門已沒有多少學生了，市民也已正常上班，沒有再去遊行。而這時血洗天安門，難道是學生挑起的嗎？當年學潮只有一個劉和珍君，而今成千的學生市民死於無辜。誰再來一篇？我們的新聞機構不講真話，一派胡言。軍隊在控制，已有幾名新聞工作者死於非命。他們置全國人民及世界輿論之不顧，如此血腥鎮壓人民，已激起了市民的仇恨。在軍

被屠殺和恐怖洗劫的北京

成百上千的人被打死，可袁木却說廣場沒死一個人

《新聞自由導報》編者按：這封信是北京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
給他在美國的親人的，最近由可靠渠道帶出)

6月3日上午我去了天安門廣場，沿途沒有公共汽車，除少數汽車外都是騎車和步行的人，使人感到很別扭、反常，街上除少數幾個路口因群眾圍軍車外基本上暢通無阻，也沒有打砸搶燒的活動，天安門廣場中的人沒有增加，人們都正常上班，侯德健等人在紀念堂前的一個小帳篷裏，門口一個木牌上貼着絕食宣言，廣場上的氣氛很平和，沒有不安和衝動。

六部口：

一名血淋淋的孕婦被抬過

下午，氣氛緊張了，群眾發現了大量穿着便衣的軍人在市內，經過盤問，他們受命3日晚在廣場集合。人們被激怒了，政府一邊說保護學生一邊又在暗地派兵。在六部口附近，一輛軍車被人們圍上，軍人丟下武器跑了，這大概是報道中講的“搶奪武器”。學生們把武器收集起來，擺在一起準備交給有關機關，下午兩點左右，防暴隊出現在六部口，為驅散圍困軍人的群眾向人們發射十幾枚瓦斯彈，一名學生被炸成重傷（不知什麼原故，瓦斯彈還有殺傷力？），小A的單位正好在六部口，聽到響聲後出門，正好看到一名血淋淋的孕婦被抬過。

六部口的情況傳遍了北京，人們預料，今晚一定出事，晚上街上的人群是一個月來最多的，整個長安街都被擠滿了。

這天正好是星期六，天氣很熱，我在家吃完晚飯，便送一個朋友去大同出差。我們從家走到火車站花了兩個小時，長安街上都是憤怒的人群，西單和東單路口設了路障並橫了十幾輛大公共汽車，天安門廣場擁滿了人，整個長安街至少有百萬民眾。

送走了朋友，我從二環路沿前門回家，二環路情況基本上與長安街相同，只是在宣武門路口和長椿街路口各圍住兩輛裝滿武器的卡車，人們在和戰士交談，沒有漫罵和爭執，情況大體和5月19日晚堵軍車一樣，只是再沒有人給他們送水送飯，魚水情已沒有了。

晚上11點30分左右，我們達復興門，無數人在立交橋和馬路上，橋上有幾輛汽車和馬路的隔離帶組成的路障，人們極度不安，因為西面軍車方向傳來槍聲，木樨地方向燃起兩團火，聽說燒了兩輛軍車，我有些緊張，怕家裏為我擔心，所以趕緊回家了，回到大院中感到一陣緊張空氣，聽某首長的一位公子講：今晚兩點動手！我們都去了一座高樓，到陽台上去觀望，木樨地，禮士路，復興門傳來一陣陣槍聲，很恐怖，不一會兒，院裏一個人從外面回來，匆匆回家說道：“慘不忍觀，不是橡皮子彈，能把腿穿個洞，是實彈。”大家都呆了……12點半左右，復興門，禮士路火光閃閃，濃煙滾滾。我心裏難受極了，我從樓上下來，穿上了長褲和小A講了一下，就出去了。

婦女和老人哭着喊：“不要向人民開槍”
回答仍是亂槍掃射

6月4日凌晨1點多，我沿着二環路向復興門立交橋走去，路上滿是往來人群，復興橋頭一片戰爭氣氛：幾輛車在燃燒，把黑夜照得通亮，一個龐大的軍車隊在行駛，前後看不到邊，軍人手持衝鋒槍，頭戴鋼盔，面無表情……地面一片狼藉。長安街上不時傳來陣陣槍聲，人們不時臥倒，以防呼嘯而過的子彈，我流淚了，流得很多，準確地講是大哭！我一生中從未這樣哭過，軍隊在慢慢向東挺進，兩側有不少人跟在後面，不同的是他們不是坐在戰車上，而是靠着牆，

時而跑兩步，時而臥倒。這些人中有各階層人，甚至有大量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婦女們哭着向大兵喊着“不要向人民開槍……”回答她們的仍是槍聲！好心的人們把她們拉回到安全處，我這時才深刻發現婦女的心是多麼善良！士兵的心是多麼狠！復興醫院傳來消息：死亡30多人，軍隊尾隨一百多米處圍着無數人，前幾排人手挽着手，大家憤怒的高呼“殺人犯”、“土匪”、“法西斯”並唱着國際歌，回答他們的仍是槍聲！！人們極度憤怒，以石塊和瓶子回擊他們，但無用，因為他們頭戴鋼盔，四周又有車廂擋着，西單到了，場面比復興門更慘（愈往東愈慘），我發現軍隊尾部很不安全，於是越過軍隊，快速向東走去，沿途是一輛緊挨一輛的軍車，從西單一直排到廣場，聽說這一線是27軍的，最狠！路邊的鐵板都被打成篩子，北京成靶場了！這簡直是發洩！！不時有人中彈被送走，我沿路北一直到了新華門。在離新華門一百米處被一群平端衝鋒槍的士兵擋住了，我們很多人被迫坐在路邊，幾個上年紀的婦女哭喊着：“你們不要殺學生，他們是你們的同胞，他們沒罪！”士兵默不做聲。

遠望新華門前，已無靜坐學生，一些軍人在用水龍頭沖洗地面，人們都在低聲議論着，東西兩面仍有零星槍聲。

突然，天安門方向傳來密集的槍聲，像是機槍在連發，隨後是幾秒死一般的沉寂，令人窒息，一個中年男子首先號啕大哭，頓足捶胸，衝向前去！我們急忙把他拉住了。這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哭了！哭聲震天！！我相信，這哭聲包含着巨大的力量，足以使害怕的人發抖！我們幾個人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從馬路北面走到路南，咀裏一直喊着什麼，我現在想不起來了。穿過軍車隊時，士兵沒有開槍，他們都在聽着，想着，默不作聲。路南，警戒較鬆，我繼續向東走，快到南長街人民大會堂路口時被一群士兵和軍官擋住，前面槍聲又響，軍官舞着手槍把穿白衣的醫生也趕回來了。我沒動，但手心裏出滿了汗。一會兒，一羣人被追打着從東跑過來，後面有大量手持棍棒和槍支兩套武器的軍人，許多人被打倒在地，士兵們狠踢他們，伴隨着槍聲……我好像所有的血沖到了腦部，我覺得我快瘋了！我以前不愛打架，遇事總是很冷靜，而這時我都控制不了自己了，如果不是一個人手扶着一個學生走到我面前，我不知會做什麼！

屠殺後的慘景如同唐山大地震，

不同的那是天災，這次是人禍

這個學生很年輕，20出頭，大腿上挨了一槍，他穿着短褲，傷口用一件白衣包着，兩腿滿是鮮血，臉色蒼白，我們一行人用自行車托着他（路邊都是無主的自行車），學生的腿仍在不斷的流血，因找不到其它東西，我把褲帶給他，把腿的上部扎緊，防止流血過多，我們一直跑到六部口，碰上一個穿白衣的醫生，他用紗布給學生包扎了一下，我們繼續由六部口向南跑，在這期間，軍車上的士兵默默地看着我們，路邊人群破口大罵“這些法西斯……”，跑了不遠，迎頭碰上一個三輪車，三輪車工人讓我們把學生抬上車，我們一直向南，據三輪車工人講，他已經跑了好幾次了，在絨線胡同，我們又碰上一個傷員，是從大會堂那邊抬過來的。就這樣，我們把兩個傷員一直送到北京急救中心。

北京急救中心位於和平門以西的二環路北側，是前不久意大利政府援建的，全套進口設備。它的建成是那麼及時，第一次大規模行動是搶救絕食學生；第二次則是搶救遭槍擊的傷員。上帝，你真的有預感？！

我們來到急救中心時，中心病房已全滿，一些傷員就在門口的大廳躺着，醫生、護士川流不息，一片緊張氣氛，手術台已不夠用，醫生們在大廳裏作臨時緊急處理；打破傷風針、輸液……送傷員的汽車、三輪車隔一會來一輛，活着的在大廳裏，死的直接送到地下室（停屍房）！唐山大地震時我去抗災救災過，那時的情景和現在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這同是人禍，更讓人震驚！！這些傷員裏除男人外有許多婦女，有青年學生，也有市民，我照顧的這個是北方交大研究生。他膝蓋中彈，小腿因充血腫大，令人害怕。醫生說骨頭斷了，子彈仍在裏面，恐怕要殘廢，受傷者有被衝鋒槍打的，也有被手槍打的。一個中學生被一個軍官在近距離用手槍打中胸部，另一個婦女被衝鋒槍打中腹部……頭腦中彈的幾乎都到地下室了。大廳

的牆邊上靠着一排頭部包着紗布的傷員，他們是被棍棒打的。一些輕傷的因無處待，包扎後就被送回家或學校了，令人可敬的是幾個三輪車工人和三個汽車司機（其中兩個是出租汽車司機），他們整整忙了一夜，不停地拉送傷員，他們不掙錢又冒風險，為什麼？

天快亮的時候，急救中心門口響起槍聲，市民躲進急救站，醫生和護士跑了出去，堵住了大門，手持紅十字大旗。過了一會槍聲停了，又抬進幾個傷員，其中有一個士兵，頭被磚頭打破，一群憤怒的人用拳頭猛揍他，如果不是被醫生勸阻，他肯定活不成！士兵被抬到樓上。

猛然間，前門方向又響起槍聲，人們的心又提了起來，一會兒，一些天安門的學生被抬了進來，有的被棍棒打的，有被槍打的，我問了一個輕傷的學生，他說：“軍隊從北、東、西三面把我們圍住，我們要求撤退，雙方談好7點鐘全部退完，但不到7點，軍隊就開始了進攻。一時間秩序大亂，死傷無數。許多人沒來得及走出帳篷便被裝甲車輾死，連在廣場上救護的醫護人員都不能幸免，聽說中日友好醫院死了九名醫護人員……人們向南撤退，但二環路（前門大街西馬路）太窄，許多人擁擠在前門箭樓前，因往南的路已被軍隊擋住，情況十分危急！這時負責在南邊路口警戒的部隊主動讓開一條路，讓人們站在他們後面，並說：他們（指另一方向的士兵）不敢打死我們，後了解，從西線打過來的是二十七軍，南邊是六十五軍，三十八軍未進城。”以上是那個同學講的，我沒加進個人意見。

天大亮了，我和那個研究生含淚告別。我們互留了地址，今後不知是否還能相見！

這不是戒嚴，而是戰爭！！

我沿二環路向西回家，一路上一片悲觀的景象，這大概只能在電影中才能見到，被燒的軍車、民車比比皆是，馬路也成了垃圾站，快到復興門時，聽到巨大的轟隆聲，大地在顫抖！像是天上的隕石落地，甚是恐怖！！我跑過去一看：上百輛坦克高速沿長安街向東馳去！我像觸電似地站住了，這不是戒嚴，而是戰爭！！對付老百姓肯定不需要坦克，有槍就足夠了，那麼坦克是對誰來的呢？！

坦克後面有一輛百普在廣播大廈前停下了，廣播大院的門未開，幾個軍人無法進去。這時兩旁的人群開始攻擊他們，開始用石頭，後來街上去用拳頭，我心裏極不是滋味，軍人和人民本是一家人，怎麼關係搞成這個樣子？悲哉！如此下去中國怎麼辦？！我感到一陣頭昏，不忍再看下去，回家了。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是我永生也不能忘的一夜！

到家後，頭昏眼花，迷迷糊糊睡了一天，傍晚才醒。後來接到你的電話，因有些話電話裏不好講，而且怕講不全面，所以沒談，請包涵。我的腦子都有些亂了，一時不知說什麼。

這天晚上接了許多朋友的電話，大家都互相擔心。有個朋友的腿被槍打中了，幸虧不重。

6月5日早晨，我騎自行車去辦簽證，一路沒敢走大路，穿小胡同東去，街上全是手持衝鋒槍的軍人，很吓人。

回來的路上情景更甚，建國門橋上，天安門廣場，復興門橋頭都是坦克、裝甲車和武裝的士兵，我沿長安街邊上向西騎，一路上滿目創傷。昔日美麗、整



我是一個醫生，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也是我有生以來最悲痛的日子！

六月三日，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了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市中心的道路兩旁和每一個主要路口，並在十字路口設置了路障。人們紛紛談論着：「今晚軍隊可能要採取行動了！」「絕不能讓軍車進入天安門！」「北京的市民要遭殃了……」聽到這些議論，我有些毛骨悚然。深夜十一點多鐘，我聽到街上一些喧嘩聲，緊接着一陣震耳的隆隆聲。我下意識的衝到了街上，清楚地看到一隊裝甲車以飛快的速度向前開去，憤怒的人群攔截起路邊的石塊和瓶子朝裝甲車投去。但無濟於事，裝甲車隊像瘋子一樣撞翻了路邊中間的汽車，衝向了長安街。平整的柏油路留下了兩道長長的凹凸不平的痕迹。過了一會兒，已經是零點以後，我聽到不遠處傳來了可怕的槍響，急救車鳴着叫聲，疾馳着向醫院開去。

此時，一種做醫生的責任感撞擊着我的心靈，我毫不猶豫地跑向醫院投入了緊張的搶救。我看到有四、五個已經中了槍傷的青年躺在地上，還有幾個被棍棒打傷了頭部的人，都是血淋淋的。他們當中大部份是市民，小部份是學生。在場所有的醫生護士都緊張的忙碌着。縫合、輸液、取彈壳……當時取出的彈壳都是一種薄薄地圓形金屬片，直徑約一、五公分。

彈壳大都是射在肌肉層，很少有射入內臟的。

過一會兒，一位哭喊的婦女抱着正在滴着鮮血的頭，在她丈夫的陪同下走進了急診室。她的丈夫非常氣憤的訴說，他看到外面的情況不好，趕到工廠去接上夜班的妻子，在街上被擁擠的人群擋住了去路。防暴警察手持帶釘子的木棍，朝着人群亂打。他趕快向人群高呼：「請幫幫忙，保護一下我的妻子！」當即有四個男青年手拉手圍了一個圈，將他的妻子圍在中間。然而無情的警棍偏偏向這位女性的頭部打來，就這樣，她的頭上留下了兩條約五、六公分的撕裂傷。緊接着，類似這樣的患者一個接一個地被抬到醫院。在忙碌中，我們仍然可以聽到外面的槍聲，而且越來越激烈。急救車似乎是在咆哮着奔向各個醫院。這時一羣人抬着一副擔架跑進了急診室。一個女人緊抓着擔架嚎啕大哭。當我們檢查擔架上的這位傷員時，發現他的呼吸心跳均已停止了，瞳孔完全擴散。心內注射，心臟按摩絲毫沒起作用。在他的身上，胸腹部有三處槍傷，傷口還在往外冒着血。他，死了。而他的妻子似乎還抱着一線希望地哭着，呼喚着他的名字！這時，我看了一下錶，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受傷的人一個接一個，大部份都是槍傷。他們當中有大學生、大學講師，還有站在各個路口無辜的市民，市民當中也有知識份子、工人、孩子和老人。我們不停地縫合、取子彈、堵傷口。兩位大學生幾乎

是同時被抬進來的，都是股動脈破裂，股骨頭被打碎，護送他們的大學生們，脫了自己的襯衫或褲子，緊緊地勒在他們大腿的根部以減少出血。儘管這樣，鮮血還不停地從翻開肌肉的傷口湧出。由於出血過多，他們很快表現出口渴，面色蒼白，血壓急劇下降的休克症狀。醫生們大都是聞訊趕到醫院的，因此很快將他們抬進了手術室進行手術。

我們在取彈壳的同時，發現了彈的大小在逐漸升級。從開始的金屬圓片，到約二公分、三公分甚至四公分的銅彈壳。傷口在不斷地擴大，出血量也在隨之增加。又一位女性受傷者被抬進來了，她是在醫院附近的大街上被掃射上的。她的小腿一片血肉模糊，經檢查小腿的左右側有兩個很大的窟窿，子彈已經穿了出去，排骨已經骨折。像這樣的槍傷越來越多，大批的紗布和細帶從全院的各科室送到急診室。更重要的是：由於每個傷者都大量失血，因此都面臨着休克的危險！血庫裡的血已經用完，只好用代血漿來維持他們的生命。平時常為一些小事情發生爭吵的北京市民，在這種危難的時刻，表現出了極高的精神境界！很多市民爭先恐後的要求獻血，但是考慮到獻血之前查體的困難，我們只採用了一小部份身體力壯的小伙子的血。

街道上倒下的人越來越多。急救車已經供不應求！一輛急救車開進醫院的時候，我們跑過去迎救。沒想到的是，五個血淋淋的肉體幾乎是捆在一起送來的。當把他們抬下來的時候，從他們胸前的校徽上，得知他們都是大學生。有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理工大學的。送他們的同學說，他們是從天安門遭到機槍掃射的。這五個大學生中，當時已有三人死亡，其餘的二名我們在全力搶救。他們全都是胸腹部開放性損傷，而且都不是只挨了一槍。護士和

他們的同學哭泣着把死去的學生送到太平間。急診室亂做一團！滿地的鮮血，到處都是叫罵和痛哭，人們幾乎都要發瘋了！

由於診察床和觀察室的床上都躺滿了傷者，後來再送來的只好放在地上搶救。我們所有的醫務工作者都流着淚水為他們工作。

這時，人們又抬進來一位傷者。他是個工人，三十歲，看上去他身軀非常高大。他的胸前有五個大小不一的傷口，最大的約有五×七公分肋骨斷裂，胸腔開放，大量的鮮血不住的往外滴。護送他的人當中，有一位是他負傷的日擊者，這位日擊者說，他是個英雄！當他挨了一槍之後，他沒有倒下，他以頑強的毅力衝向了正在向其他人射擊的槍口。就這樣，他中了四發子彈，兇狠的劍子手又狠狠地照他的胸前挑了一刺刀！儘管如此，他的精神仍然是那麼驚人，送來的時候，他神智仍然是清醒的。他說：「醫生，請你們一定要救活我，因為我妻子是殘廢，我還有一個僅僅兩歲的小孩。」聽到他的話，我們全都哭的泣不成聲了。我們以最快的速度為他縫合了傷口，做了胸腔閉式引流、吸氣、輸血等等，然而他傷的太重了，凌晨四點四十五分，他永遠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多悲慘的一幕！我默默地為他致哀，為他祈禱。祈求上帝讓他的靈魂升天！

天已經漸漸白，而槍聲還在不斷續續的迴旋在北京的上空。從長安街和天安門開出的急救車還在奔馳向各個醫院。又一輛急救車，同時送來七個傷者，這一次又有四個死亡，四具血淋淋的屍體，全都是死不瞑目！我們輕輕地幫他們合上眼睛，推著他們去了永遠安靜的歸宿。

天已經接近亮了，一位七十四歲的老人，被抬了進來。他的頭部中了一槍，老人已經完全昏迷，生命危在旦夕。他身邊五歲的小孫孫用力的拉着爺爺的手，大聲哭喊著：「爺爺，你怎麼啦，你怎麼不說話呀？」多可憐的孩子！可惜的是，這糊塗的爺爺為什麼偏偏抱着小孫孫出來？為什麼要在他的幼小的心靈上留下這永遠不可磨滅的創傷？這千秋之罪，應該由誰來承擔？

凌晨五點半鐘以後，槍聲漸漸稀落，在送到我們醫院的一百多名傷員中，有十六個死亡，其餘的大部份都身負重傷，住進病房。隨着槍聲的減少，急診室也漸漸地安靜下來，而此時我們——所有的醫生和護士，精神已經達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究竟是為什麼？這血的代價由誰來償還？殺人的劍子手什麼時候才會有良心的發現？全世界的幾代人將如何評價這段發生在北京的悲慘的歷史？

一個未完的故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北京·木樨地



六月十一日零時天安門廣場解嚴後，首天即有市民圍觀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由坦克車碾破的台階。

文川

棍棒在揮動。一排排全副武裝的士兵，正以戰鬥隊形向我們逼近。最前面的兩列橫隊，是防暴警察。他們舉着半透明的盾牌，頭上的鋼盔連着一個面罩，一律手持白色棍棒，不分青紅皂白地打着，像是要為士兵砍出一條通道來。

出來。將來，這就是歷史。我相信，歷史無論如何會恢復這一夜的本來面目。」
就這樣，劉君面對着我的筆記本，緩緩地講述起來。

必爭之地：木樨地大橋

「那天晚上，我和好朋友齊君約好到政法大學去。我們是騎自行車去的。城裏不好走，想繞個道。結果，想到了走木樨地。」

「到這一天，戒嚴令頒布正好是半個月。北京人都蔑視這個命令，誰都不把它當一回事。軍隊始終進不了城。全民戴兵，還真的是戴住了。北京市民所表現的勇敢和智慧，現在再想想，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在平靜的大街上騎着自行車，怎麼也想不到，頃刻之後，一場無法描述的大災難就降臨到北京老百姓的頭上了。」

「晚上九點多，我們到了木樨地二十二號樓前。這是一幢遠近聞名的高級住宅大樓，大家都叫它部長樓。住在裏面的人，至少要有部長的級別才行。木樨地大橋，就在這幢樓西面大約四百米的地方。北京西面的軍隊，如果要長驅直入到達天安門廣場，這座大橋是必經之地。戒嚴令頒布後，這座橋理所當然地成為市民和軍隊兩方面都特別注意的要地。」

「我突然發現，這裏氣氛異常。從大樓到大橋之間的大街上，擠滿了人，少說也上萬，黑壓壓地一大片。人羣似乎在等待，沒什麼聲音。在橙黃色的路燈光線下，一種極其緊張的沉寂籠罩着這塊地方。」

「用橡皮子彈打人了！」

「齊君本在我前面，但很快就騎着車折回了。他說：『不能向前了，前面已經打起來。』我找了個高一一點的地方，踮起腳朝前看，只見人頭攢動中，磚頭、石塊在飛舞，

「一羣學生模樣的人向他們跑去，想和他們交談。但是白色棍棒繼續揮舞，這些人倒下了。我特別注意到一位學生，他高喊着『誰也別打了』，衝到了警察跟前，但立刻被打倒了。憤怒的人羣奮力反抗，但他們手無寸鐵。他們把人行道上鋪着的混凝土板撬起來，砸碎，然後朝警察扔過去。對方也把這些碎塊扔回來。大橋東側，一片混亂，市民方面受傷的看來不少，因為他們沒有任何防護器械。」

「在吶喊着、擁擠着的人羣對面，士兵的隊伍在向前推進。因為遇到阻擊，他們推進得緩慢，但是隊伍越結集越多。我放眼看去，竟看不到盡頭，大橋以西密密麻麻全是軍隊。軍用大卡車開過來了，荷槍實彈的士兵，簇擁在它的周圍。市民的對策是把停靠在附近的一四路無軌電車朝大橋推進過去。這種電車又笨又長，我看總有十五、六米長吧，要推動它可不容易。可是，多少素不相識的人齊心協力去推。轉眼之間，兩輛碩大的無軌電車就橫在大橋的東側，正好把軍車前進的道路擋住了。」

「這時，開來了一輛中型卡車，上面有清華大學和北京師範學院的旗子。車上裝的是渣土、石塊，站在車上的學生拿着棍子。幾乎就在學生跳下車、卸下車上東西的同時，我清楚地聽到了槍聲。」

「槍聲中，人羣似乎驚愕地戰慄了一下，但是沒有散開，也沒混亂。我很快就看到兩個中彈的男子給人用自行車推着過來了。一個是手上中彈，另一個是臉上中彈，雖然都是皮開肉綻，流着血，但傷勢像是不重。送他們下來的人叫着：『小心，小心，他們用橡皮子彈打人了！』」

殺殺殺殺殺殺殺

「一輛軍用卡車衝上來，向無軌電車撞過去，一下，兩下，但沒能把電車撞開。人羣叫喊着，雨點似的磚頭石塊落在卡車上。」

士兵不得不退回去，軍車孤零零地停在那裏。幾個人衝上去，打開油箱，把汽油弄出來澆在車上，然後，劃亮了火柴。

「蓬的一聲，卡車起火了。熊熊烈火把四周照得更清楚了。我看到，離開着軍車約三十米的地方，一個高個子軍官一手舉着手槍，一手舉着小型擴音器，在士兵中來回地走，好像在下達命令。緊接着，防暴警察一個也見不到了，都不知撤到那裏。一列手持短把衝鋒槍的士兵，以整齊的隊形，閃電般出現在最前列。人們還沒來得及看清情況，他們就開火了。我清楚地看到槍口噴發着駭人的白色火苗。有的槍口朝天，有的則集中打前面的無軌電車，有的則朝着電車輪子底下的路面射去，這樣，子彈彈起來，就可能擊中電車後面的人羣。」

「一時間，子彈橫飛，地面被打得直冒火星。人們起先還以為士兵用的仍然是橡皮子彈，所以吃了大虧。好些人倒下去了。士兵依然不放過，他們繞過電車的兩側衝上來，然後齊射。在這裏，我要說明一下，後來官方喉舌說『暴民』在木樨地一帶燒了多輛軍用卡車，掀起『暴亂』，導致軍隊開火鎮壓，這是完全不對的。停在那裏的軍用車輛，是在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上午，才被渴望復仇的民衆燒毀的。」

「我很難向你講述當時的情景。全副武裝的士兵向沒有任何武裝和防護的人羣開火，會是一個什麼景象，還須細說嗎？但當時我根本無暇想這些，因為我的朋友齊君也中彈倒下了。」

「他倒在人行道上，我在大街上。要趕到他身旁，得越過隔在中間的比我胸口還高的鐵欄杆。我也不知打從那兒來的力氣，不顧一切從欄杆上翻了過去，只聽到子彈呼嘯着在我頭上、肩膀飛過。我奔到齊君身旁，把他撿倒，和他一起伏在路旁的草坪上。士兵仍然在射擊，子彈打在建築物的牆上，發出撲撲的聲音；打在路旁鐵欄杆上，則發出噹噹的聲音。一個穿着白色短裙的女孩子，剛剛奔到我們身邊，『噢』地叫了一聲，捂着肚子倒在我身邊。槍聲、人們的驚叫聲、奔跑聲、呼救聲和切齒的咒罵聲響成一片。我的心在顫抖，並且像是落入了冰窖之中。『儘管這樣，一些勇敢的人仍在救援受

一月初，我遠行後回到北京，見到劉君。他告訴我，在那恐怖之夜，也就是去年六月三日夜間，他就在戰鬥最激烈的木樨地一帶。他以平靜的語調，向我講述當時所見所聞。這位年僅三十的化學工程師，似乎已經懂得如何把自己的感情完全隱藏起來。他只是以非常客觀的語氣，毫無渲染地在我面前展示那幅幅血淋淋的畫面。我在這裏所做的，就是如實地記錄他的話。

「我能活下來，自己都覺得奇怪。我媽媽曾認定我死了，並通知了親戚朋友。多少人死在我周圍，死在我眼前。我如果有幾條命，也應該沒有了。我有責任把這一切都講

傷的同胞。倒在我身旁的女孩子，很快就給幾個人拉走了。這使我恢復了勇氣。我用力把齊君攙扶起來，發現他一條腿像是被血浸過一樣。他已無法行走了。

到醫院去

「我想起，就在二十二號樓的東南側，有一所挺大的醫院，叫做復興醫院。只要我找到自己的自行車，推着他，拐到南面的胡同裏，就可以到達醫院的急診部了。」

「可是齊君流血過多，在我自行車的後架上已坐不住了。我向兩位不相識的中年人求助，他們毫不猶豫地跑過來，扶著齊君。我推著車，冒著還在空中歡戰飛行的子彈，不顧一切往醫院跑去，一口氣就跑到宅的急診室裏。」

「一股難聞的血腥味道迎面撲過來。我定睛一看，一共六個傷者，已先我而至了。他們的傷，看上去都比我朋友的重。一個是頭部中彈，另一個傷在腹部。最慘的是一個小伙子，他的大腿動脈給打斷了，血汨汨地在流。但他還掙扎著要起來，一面哭喊著：『我弟弟已給打死了，你們瞧，他就在樓道邊上躺著！他才是個中學生！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你們讓我出去，我跟他們拼了！』」

「實際上，他已經無法動彈，幾個人掠著他，好像在勸他什麼。隔著一扇玻璃門，就是手術室，好幾位醫生正在裏面緊張地工作。有人說，槍聲一響，凡是住在附近的醫生，都好像是接到命令一樣，趕到急診室來了。」

「沒有人能騰出手來護理我的朋友。比起別的傷者，他的傷最輕。可是他一直在流血，顯得支持不住了。當晚我身上只穿了一件黑色的汗衫，並且已弄得髒了，我顧不得這些，用汗衫把他的腿包裹起來，試圖為他止血。最後，來了位年青的醫生，他給齊君輸液，可是怎麼也找不到吊輸液瓶的架子。我只好用手托著瓶子，把它舉得高高的。」

醫護人員冒死來援

「外面傳來一陣緊一陣慢的槍聲。我給困在這個充滿血腥味和消毒藥水味的屋子裏，心急如焚。傷者還不斷地往這裏送，醫院

看來已無法招架。一位醫生說，已經向鄰近的醫院求援了，他們都答應趕來幫助，這話給我的朋友帶來了希望。我當時看了一下手表，還差一些便是午夜十二時。血腥的六月三日馬上要過去了，六月四日的黎明將是什麼樣子的呢？我不知道。殺戮會不會停止？和平會不會到來？我的朋友能不能生還？我默默地向上蒼祈求。」

「一陣腳步聲，進來的是幾位神色驚惶的醫生。我拉住其中一位很年輕的女醫生，請她察看齊君的傷勢。她喘著氣，告訴我：『我們是XX區醫院的醫生，接到告急電話，就趕來了。誰想到，他們連救護車也不放過，朝著我們就是一陣掃射。救護車被打得盡是子彈洞。幸好我們都躲在車廂地板上，才沒有傷亡。』」

三位死者

「急診室裏再也無法容納受傷的人了。他們只得躺在樓道走廊裏。燈光昏黃，到處鮮血淋漓。傷者在呻吟，家屬在哭泣，白衣戰士含著眼淚在忙碌。我盡力幫助抬傷者。槍聲還清晰可聞。我身上什麼穿的也沒有，不知是因為半夜的寒氣，還是由於內心的悲涼，只覺得從心裏升起一陣陣寒意。除了抬傷者，我還抬了三位死者。」

「第一位是年青男子，是我和其他不相識的五個人一起抬的。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六個陌生人就這樣把一位不該離開世界的人送走了。到了太平間，我們想看看這位死者的身分姓名，以後可有個交代。可是他身上除了一包香煙，什麼也沒有。第二位是個中學生，他的同學一直跟著我們，一個勁地哭著：『我們是一起出來的，誰想到會這樣！我回去怎樣向他媽媽交代！』第三位是個女的，三十多歲的樣子，眼睛閉不上，頭髮散亂。我們誰也不敢去碰她的眼睛闔上。」

「那時，擔架、竹榻，什麼都沒有了。我們就是用手托著死者，小心翼翼地把他們送往太平間的。死者顯得沉重，我們又生怕碰壞了他們的遺體，抬起來非常吃力。我真是精疲力盡了。我身上只是一條牛仔短褲，腳下是一雙涼鞋。由於老是在血泊中來回走動，結果渾身上下，特別是腳上鞋上，染



面對慘重的傷亡，醫生也感到力不從心。

滿鮮血。一位醫生誤以為我也受傷了，攔住我問傷在那裏。

「閉門家裏坐」的悲劇

「大街上的人固然傷亡慘重，高層建築裏的居民竟然也禍從天降，被橫飛的流彈打傷打死。從二十二號樓的十三層送來了一位老太太。她胸腹之間中彈，衣服已被血浸透了，但還睜著眼，喘著氣。醫生剪開她衣服，發現已無法挽救，眼睜睜看著她斷氣。緊接著，從二十四號樓的八層送來一位傷者——其實是死者——子彈正好從他的眉心部位穿過去。這是位工程師，四十來歲。他的哥哥也跟著來了，以為他還有救。看到他哥哥那種神情，誰也不忍心把實情說出來。待到醫生告訴他，他弟弟早已死了時，我趕忙過去扶著他，對他說：『你難過就哭吧，不要悶在心裏……』」

「他掙扎著還在我說話，但已語無倫次。我從他的話中只勉強知道了大概。他們兄弟都不是北京人，是來作客的。他弟弟中彈時正在廚房裏洗碗，還在他說話呢！」

罵法西斯者死

「人聲嘈雜，一位很胖的老太太給抬進來了。她的老伴跟蹤地跟在後面。抬著她的小伙子央求醫生快點給她看，說她身上接了好多槍。醫生問她老伴，這麼大年紀了，為什麼還要到外面去。她老伴聲淚俱下地說：『我們老兩口原先是出來散步的，沒想到這麼一亂，就給堵在大街邊上，回不了家。她先是挨了一槍，倒在地，軍隊正好衝

過來，她罵他們是法西斯，軍人就再朝她連開好幾槍。』

「醫生一邊掉眼淚一邊給老太太驗傷。解開衣服一看，一共八個彈孔。醫生以為抬她進來的幾個小伙子中有她的親屬，一問，誰都跟她非親非故。參加搶救的一位女醫生哭得像淚人一樣。誰都明白，老太太已無任何希望了，但醫生還是要小伙子們把她抬到手術台上去。她就在那裏停止了呼吸。」

「這一夜，復興醫院到底收了多少具屍體，到頭來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一位醫生在事情過後好幾天，悄悄告訴我，天快亮時，一共是四十二或四十三具。」

「我又給叫去抬傷者。傷者躺得滿地都是，我幾乎無法落腳了。担架早已用完，只有用鐵床的床架抬。最後，什麼可抬的都沒了，就用書桌抬。書桌裏原有的東西都在，上面還躺了個人，重得很，要七、八個人才抬得動。但誰也不說什麼，互不相識的人同心協力，默默地抬著，送上一個，再送一個。我穿上了一件醫生動手手術時穿的白衣服，但依然覺得很冷，很冷。夜真長，似乎沒有盡頭。什麼時候，明亮的白天才能到來啊！」

那個絕望的醫生

「清晨三點鐘過了一些，一位看上去五十多歲的醫生，滿身沾著傷者們的血，張開雙手，用沙啞的嗓音對大家說：『我們這裏，血漿沒有了，止血帶沒有了，消毒的手術器械也沒有了，我們已不可能再進行什麼手術。你們大家要想辦法，傷者能轉走的要盡快轉走。要快，不能再耽誤了，耽誤就等於多喪失生命。』」

「我永遠忘不了這位醫生。他戴著大口罩，我看不清他的臉。但他那雙憂鬱的眼睛所流露的悲哀甚至絕望的神情，已深深地烙在我的記憶之中了。」

「大家都默默地點頭。誰都看到，醫生、護士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否則死亡人數不知會增加多少。午夜過後不久，這裏的醫生曾打著紅十字的旗幟到大街上去，看看

是否還有沒被發現的傷者。可是迎接他們的，是排槍齊射。他們是伏在地上爬回醫院的。

這就是北京城？

「大約在早晨四點鐘，外面平靜下來了。槍聲只是從東面較遠的地方傳來。各個醫院來疏散傷者的急救車紛紛到達。我和齊君一起，上了從××醫院來的急救車。」

「我們的車像是在剛經過戰爭的地方行駛。毀壞了的馬路，各式各樣的障礙，焚燒着的汽車，滿地的石塊、碎磚，爆炸聲，槍聲。而某些地方卻蒙上死一樣的沉寂。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就是北京。這是我生活了幾十年的城市，我要認不出了。」

一位北大學生的遭遇

「到了醫院，齊君的腿傷被診斷為子彈洞穿，必須馬上動手術。我利用他在手術室的空隙去對付我那滿是血污的腳和鞋。我找到院子裏的水龍頭，用水沖了又沖。可是，人民的鮮血，那能一下子就沖洗掉？正在這時，我看到一個工人模樣的中年人蹬着三輪車進來，車上坐着一個學生模樣的人。」

「這個學生胸前別着北京大學的校徽，戴着手套，穿着運動衣，背着一隻小軍用挎包。他目光呆滯，渾身哆嗦。醫生問他那兒受傷，他說不清楚，只說背上被踢了一腳。他告訴醫生：他是從天安門廣場來的，受傷後被人拉着飛跑，也不知道怎麼就到了這裏。醫生再問送他來的人，回答說並不認識他，看到他躺在路旁，像是受了傷，就把他送來了。」

「醫生檢查後告訴他，他並沒有受傷。醫生給他打鎮靜劑，騰出一張病床讓他睡覺。他在朦朧中不住地叨念着要回到廣場上去，他的伙伴全都在那裏，說着說着便入睡了。那是早上六點鐘左右。」

「齊君的手術做得很順利，但醫生認為傷口有感染的危險，要他住院觀察幾天。但聞訊趕來的齊君父親堅持要兒子馬上離開，怕耽在醫院裏有別的危險。這時，那位學生醒來了，哭着，自語自語地要找醫院的大門出去。我們拉住他，安慰他，希望他安靜下來，好好休息。」

「這位不知名的北京大學學生才一年級，來自外地。他是昨天午夜過後從天安門廣場東南方向撤退出來的。他一面哭，一面斷斷續續地說出自己的遭遇。我好不容易才聽清楚他的話。」

「我們已經撤出了，我記得，前門的那個門樓已經在我們後面了。多可怕啊，前後後全是軍人，多極了，端着槍，還上了刺刀！……坦克車在後面追我們，跑慢一點就得給坦克車壓死。我拉着二位女同學，沒命地往前跑。跑着跑着，女同學突然不跑了，我再也不拉不動她了。我回頭一看，她的頭已經沒有了。我想喊，可是喊不出聲來。我嚇壞了，又給重重地踢了一腳。別的同学奔過來拉着我繼續跑……往下發生了什麼，我都不知道了……」

「我們聽後才知道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都勸他快點離開北京，回到自己家鄉去。他這才明白過來。我摸出自己僅有的七元錢給他。齊君的父親含着眼淚，把自己帶着的五十元也給了他。」

「他哭着向我們道謝：『大哥、大伯，謝謝你們了。這個世界到底還是好人多啊！……』」

「我們目送這位小同學離去。他似乎已經走不動了，一步換一步的。但我們都希望他快快離開，心裏默禱着老天爺保佑他。」

未完的故事

劉君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了。我也沒請他再說下去。到了這個時刻，語言顯得那樣多餘，那樣笨拙。

但我知道劉君還有好多要說的話。我也相信，能讓他痛痛快快地把心裏的話都說出來的一天，總歸會來的。而且，不會來得太晚。

1998/2



沉淪黑夜裏，生死未卜

女教師嚇瘋了

在發生大屠殺的當天晚上，在西長安街與六部口交接的街頭上，一位中學女教師目睹了一場人間慘劇。一輛開得很快很急的坦克車衝向人羣，把人們壓成了肉醬。這位女教師大喊：「底下有人，別壓啊！」說時遲，那時快，從坦克履帶底下只露出人的腳丫子。這位女教師目瞪口呆，結果她瘋了。

屍體堆成五六層

在醫院的屍體情景更是慘不忍睹，一具具屍體堆成五六層。醫院為了方便親屬認屍，事先給屍體照了像。一旦有親友認出來後，就往屍堆上扒了下來。

在這裏，不禁要問中共的當權者：坦克車底下的人，算不算被壓死的？醫院的屍體又是從哪裏來的？

利用舉報電話報私仇

北京公安局設的舉報電話（五一二一四八四八），成了「死亡電話」，不少無辜的人因此走上了斷頭路。



有人因與某人素有私仇，便利用這電話向公安局舉報他的仇人，說這個人六月四日晚上在天安門鬧事。公安人員憑這個舉報電話逮捕了這個青年人。一進公安局大院，青年人立刻遭到幾個大漢的拳打腳踢，鼻樑被打斷了。這位青年人分辯說，六月四日前後，他一直住在醫院裏，根本就沒有到過天安門。公安人員經調查，發現這位年青人的一供詞「屬實」，叫他的家人把已受重傷的年青人領回。當家裏人向公安局提抗議時，公安人員惡狠狠地說：「少囉嗦，把人領回去！」

「我要殺死那幫王八蛋！」

屠城事件已在人民的心底裏播上仇恨的種子。現在人民的情緒，特別是在屠城中無辜犧牲的學生、工人以及各階層市民的親友們，他們的情緒，就像一股在火山最低層滾動的岩漿，總有一天會爆發。

有一位弟弟被殺的工人壓着滿腔怒火說：「看吧，總有一天我會報仇的，殺死那幫王八蛋！」這種復仇情緒瀰漫着北京城，只待時機一到，便會爆發。現在有不少軍隊的槍彈已流入民間，儘管公安局三申五令老百姓把槍枝上繳，但反應冷淡。總有一天，仇恨的子彈會射向這幫劊子手。

1989/8

屠城中的幾個鏡頭

聞 凌



莫利人

「六·四」訪問目擊者

六月四日凌晨，奉鄧小平之令，中共二十七軍血洗天安門廣場，從而導致了震驚全球的「六·四」慘案。當日下午，本人在京採訪了這場血案的目擊者——他們是北京大學學生鄧××、北京啤酒廠司機××、北京日報兩位記者，他們以親身的經歷，揭露了事件的真相。

軍人屠殺在先，市民反抗在後

一個目擊者說，六月四日凌晨一點多，軍車、坦克、裝甲車以每小時超過六十公里速度前進，在六部口有一百多人被輾死，其中包括小孩、老人，甚至孕婦。在南池子被打死的也有一百多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死傷的更多。

解放軍開着軍車把廣場圍了起來，學生們正在紀念碑下和平靜坐，誰也沒有想到解放軍會被政府利用，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槍響時，同學們始終守在紀念碑下，旗幟被打倒了，但一次又一次被舉了起來。

槍聲停下來，人們趕快從東南角的一個缺口撤下去，才撤出一小部份，槍聲又響了，沒撤走的人全部被打死、打傷。廣場上的醫護人員上前救傷者，軍方堅決不讓，雙方發生衝突，醫生也被打死兩人。

廣場上開來二十輛坦克，其中三輛坦克先並排推倒了「民主神像」，然後所有坦克向廣場上的帳篷壓去。有的學生因多天勞累，還在帳篷中睡覺，這就讓坦克壓成肉塊。廣場上所有東西，包括被打死、打傷的愛國志士被他們用火炮噴射器全部燒掉。

六月四日，目擊者在木樨地看到十八個居民被打死，在崇文門有個正在打瞌睡的老大爺被打死，軍隊在無人阻擋的情況下對華民樓開槍。別以為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打死了這麼多人，老百姓就被嚇住了，當天早上北京市民在東單路口設了四道路障，在復興路燒了廿八輛裝甲車、十多輛卡車。北京是全民皆兵，能跑動的都出來了，只聽老百姓在喊：「燒死他們！打死他們！」有位老人哭着喊：「你們還是人嗎？老百姓養你們，你們有腦子嗎？」我親眼看到當兵的受了傷，死了無人拉，有人還踢上兩腳。一位拉平板車的工人說：「你們得意！我已拉了六個受傷的學生。」他在前邊拉，後邊有三四人在幫着推。

有的軍人在民衆喊話下，脫下軍服走了，邊走邊說：「受蒙蔽了，只聽命令說有保衛首都的緊急任務。」

坦克、裝甲車衝街直撞

死者黃雲海是我採訪的一位目擊者的鄰居，是名剛參加工作的高中畢業生。六月三日晚睡到值夜班，當晚沒回到家。六月四日晨，他的父親（老共產黨員、知識分子）和他的哥哥到各大醫院去找他，沒找着，有人提供「復興醫院」內有幾十具屍體，他父親和哥哥上醫院一看，就認出來了。黃雲海的工作單位離木樨地很近，誰會想到部隊會向老百姓開槍？廣大市民出於對學生的愛護，出於對解放軍的信任，認為去各個熱鬧或將大學生的情況向這些當兵的說說，誰知竟做了共產黨槍下的亡魂！他說，他親眼見到一名看熱鬧的只有九歲的女孩和一名十多歲的女中學生在崗樓上喊幾句口號，也被打死了，任何有正義感的人怎麼會不激怒？！

另一位目擊者說，六月三日晚他在廣場上，十點時「廣場民主大學」舉行開學典禮，當廣播播放到一半時，聽人說軍隊已到建國門了，他就趕快去看。四十多輛軍車在橋上橋下被民衆攔住了，有的市民爬上車與軍人交談，軍民關係似乎不錯。他看到橋下有五十輛北京官方組織的「工人糾察隊」的車——這些工人，如首鋼給每個工人發三百元，叫他們來協助解放軍，但車被毀了，工人拿了錢不知去向。

建國門立交橋上的人特別多，軍人待在那裏的軍車裏，他們被民衆攔在那兒。十二時他回去廣場，經過北京火車站，只見一輛裝甲車開得很快，車輪上的履帶碾着路面，發出火星，闖過一個個路口，從天安門方向朝立交橋開去，這時橋上橫攔着兩輛公共汽車，它闖不過去，就從人行道上過去，這時人行道上有一百多輛自行車全被壓扁了。橋上市民被激怒了，人們再用公共汽車和橋上裝有軍人的車子推到路中攔阻，裝甲車見了，只得減速。它上橋時，差點將一輛滿載着軍人的車子給翻過來。裝甲車來回地跑，將民衆設的路障全部碾了，這時，路兩邊的老百姓才開始用石頭、汽水瓶砸這輛軍車。這時崇文門南又來了兩輛裝甲車，撞向路口攔阻的三排公共汽車，打了個拐彎，朝人行道上開，這時民衆只能用身體攔截，傷亡慘重。一輛朝賓館方向開去的車亂撞，讓在場的民衆截住了，很多人擁上去，將裝甲車蓋子打開，開車的軍人被打死。

廣場上的圍殺揭穿當局的謊言

目擊者說，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帳篷裏作曲家侯德健、北師大講師劉曉波、原北師大校刊主編高新、原北大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周



六月四日早上，一個學生被軍人活活打死。

蛇四人在絕食，他們已絕食五十多個小時了。這時廣場的廣播裏傳來劉曉波和周曉的講話，他們建議廣場上的人放下手裏的東西，紀念碑周圍有工人、學生和市民。裝甲車衝來了，大家就手挽手。三點多鐘，大批軍人來了，對着紀念碑開槍，有的人倒下了，他親眼見到軍人跪着單腿開槍，所有進入廣場的都開了槍。受傷倒下的人太多，但只有一輛救護車在來回跑，因為一次裝不下傷者或死者。

此前，侯德健與軍隊指揮交涉，他們限定學生在半個小時內往東南角上撤退，理由是由於他們必須在七點前清掃乾淨廣場。很多受了傷的，挽着繃帶的，近一兩千人在緩緩地撤，他們流着淚，一個學生跪下對目擊者說：「我們對不起大家！你們對我們期望太多了！」然後站起來喊着：「我們還會回來的！打倒李鵬！」

又一個目擊者說，撤退時，八輛裝甲車排成三排押着學生，裝甲車後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學生們沒走完一百米，軍人又開槍了，又一大批人倒下，有的女孩在尖叫，瘋了！有些男同學扶着她們。

他說，一名香港記者被武警打傷了，是警棍打在他肩膀上，她身上有血跡，要他指點回北京飯店的路，他讓她坐在自行車上。他們繞道走時只見崇文門地鐵站內跑出一個軍人來，將他們的一個同伴砍了，他給香港記者指了回北京飯店的路，將同伴扶去北醫。大廳裏，死傷者太多，等了半天才輪到縫針，同伴的眼眶被縫了四針。他親眼見到一人一死就被推去停屍間。

一個目擊者六月三日下午去西門，見到許多被軍人用皮帶和磚頭打傷的學生和市民。

六點半他到廣場去參加記者招待會，李錄、柴玲和封從德主持會議。李錄和柴玲介紹了當天學生被打的情況，吾爾開希也來講了話，還給大家唱了個侯德健的歌。學生領袖們說，他們已得到消息，部隊將於六月四日凌晨要動手，只留長安街這個出口。

九點左右，嚴家其、趙瑜來廣場為「廣場民主大學」致詞。十點廿分傳來一名女學生在軍事博物館前被打死的信息，形勢很危急，有人說能撤就撤。

十二點時，他看到軍車來到廣場，十二時半，軍人開槍，他們還朝着搶救傷員的人開槍。有的腦蓋被掀開，白色的腦漿流淌在一灘灘的血上。他親眼見廣場學生糾察隊以胸膛擋住子彈。後來出口被封住了，沒撤出的約六百多人全被殺死。最後從廣場上出來的是北京第六醫院的幾個醫生，他們也都挨了打，問他們裏邊的情況，他們晃搖腦袋，哭喊着：「都死了！都死了！」

回來的人這樣說

何立

當晚已聽到消息，說一時入城鎮壓。軍方收到死命令，天亮之前一定清場，不惜代價。結果……
記者本來有責任見證所發生的事，但香港記者有事，誰出頭保護？英國領事館只是推卸。

他們回來了，從被血洗過的北京回來。他們包括香港的學生、記者、北上支持民運的人和其他訪客，帶回來種種見聞和感受，以及這場殘酷的劫難給他們的記憶和心靈上的傷痕。

民運支持者的簡報

一位北上支持民運的人，在六月五日返回香港，作了以下的簡報：

六月三日下午，有人見到人民大會堂後面有軍隊，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軍隊沒帶武器，人羣過去向軍隊講解。廣場上官方的廣播說學生搞事，又指香港某大學在場支持反革命，具體提到錢。

然後西單傳來消息，說有衝突，廣場的人羣湧去攔截。後來知道，西單那邊死人最多，軍隊出動坦克，開了槍。從那裏到天安門十八里地已再無人。長安街西邊過了過百萬，有死傷。人羣一聚集，軍車就廣播，要人羣撤離，否則會不顧一切。

(六月四日凌晨)軍隊清天安門廣場，用了過百輛軍車和坦克。廣場在四時突然開燈，亮燈後就見到坦克都進來了。軍隊還使用了機槍，見人就射。

軍隊在清理時，見到人羣撤退，仍開槍追殺，整夜火光熊熊，槍聲不絕。軍隊見民居有燈光即開槍。

城內氣氛很緊張，說會停水停電，軍隊會進駐北京飯店、醫院，會開入大學。聽說軍隊會入院射殺，醫生勸阻也被殺，有三個學生領袖在醫院遇害，但不知是誰。他們說，你們是香港人，希望你們安全離開，把消息帶出去。有人憤憤地說，最初阻擋軍隊時還很樂觀，以為人民包圍了軍隊，沒想到會變成這樣。他們再也不敢承認這樣的政權了，有槍就和它拼了。

學生目擊的情況

從北京回來的香港學生曾在電視、電台的特備節目中出現，談他們目擊的情況：

●鎮壓當晚，我在香港物資站，在廣場東邊。其實那晚已聽到消息，說一時入城鎮壓。

在京訪客的見聞

一位六月八日從北京飛港的海外華人了解到的情況是：

六月二日晚，天安門廣場仍是帳幕齊整，人很多，男女老幼都有，像個遊藝會。當晚侯德健等四人絕食，人們圍着紀念碑，廣播着絕食宣言。在此之前經過新華門，見到有士兵坐着和站立，另一側就是靜坐的人，圍觀的人很多，很和平。

六月三日晚十一點，在人民大學門口聽廣播。人羣中傳出木棍地開槍，有人中彈，送海軍醫院。醫院說槍傷不重，要送北醫院。

六月四日上午，沿海澱路走，途中見到從天安門廣場撤回來的人，人數不多，叫着口號，說死了二千六百人，要報仇，要罷課、罷市。很多學生的衣服上染了血。有兩個人出示檢到的子彈。看的羣衆不很多，都在消滅和咒罵。

六月五日，有人騎車出去，晚上才回來。他說在廣場上的裝甲車和坦克圍成圈，前面是兩排軍隊，持衝鋒槍。在前門，看見一堆路障。聽人說，軍車衝過來就掃射，前排有人倒地，不久人們又走上去，又掃射。羣衆說，軍隊有廣播，說天安門沒死一個人。

跟着的兩天，聽人說，醫院堆滿了人，病房、走廊滿是傷者，醫生要在走廊醫治傷者，經常搖頭，說炸壞了。協和醫院說死了百多人，幾無例外是中了那種子彈，有人檢到彈殼，頂端爆了。聽說軍隊連小孩也打，女的打得特多。有人說，有兩件事做不得，一是罵軍隊，二是拍照。你罵軍隊，他走過來近距離開槍。

撤回來的記者

香港北上採訪的記者很多，由學生悼念胡耀邦到遊行、絕食，到軍隊圍城、中共高層異動，直到大屠殺。由於北京已下了戒嚴令，又會重申禁制採訪，記者的壓力很大，他們的人身安全更令人擔憂，何況他們根本沒有任何領事保護。為保安全，香港記者大批撤回。以下是一些撤回的記者談論較多的情況：

●香港去的記者大部份住在北京飯店(因為較接近天安門廣場)。六月三日下午六時，北京電台特別通告，戒嚴部隊已經忍無可忍，一定不惜手段去解決這次事件，後果由搞動亂的人自負全責。通告說不得上街，以保障生命全；不要圍觀，避免無謂損失。通告的字句很強硬，意思就是，如果出去，打死了自理。但當時已有記者出去了，沒聽到。

●當晚(凌晨)即在陽台上看，也有自稱服務員的人走進記者房間，不准觀看，說是觸犯戒嚴令。也有人和他理論，說戒嚴令沒有說不讓往街上走。當晚很緊張，但仍有記者出去。留在房間的，整晚都能看到軍隊在長安大街的情況，街上不時傳來槍聲。我們目睹裝甲車好像騎馬那樣越過羣衆設的路障，坦克過來開槍，有人倒下，大板車就來救人，槍聲不斷。

●當晚很多記者出去採訪。TVB(無線電視)為安全起見，深夜沒放人出去。ATV(亞洲電視)有一批人去了，在廣場西南一個廁所頂上留到四點，後來無法返回北京飯店去。事實上，凌晨回來的人，很多被沒收了菲林和錄影帶。香港的記者很危險，一來沒有人出頭保護，二來沒有戰地採訪經驗。外國有些新聞機構，宣佈戒嚴之後就換人，調來一些戰地記者。但是，這次也有外國記者出事，在機場就看到一個英國記者受傷，腿部挨了槍托，折了。香港也有記者受傷，是六月三日下午，在新華門，幸而當時還只是用橡膠彈(按：受傷者為「百姓」記者張結鳳，已無大碍)。這次回來，真有點像「走難」。再留下去，不知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撤得很急，電視台部份器材就留在北京，人安全回來，就很不錯了。

●這兩天(六月四至五日)有很多傳聞，說軍隊要接管北京飯店，公安會來搜查。於是有人毀掉筆記，洗掉錄音帶，擔心會成為違反戒嚴令的罪證。記者本來有責任見證所發生的事，紀錄下來，但香港的記者問題比較大。外國記者出去拍攝，但香港記者有顧慮，因為外國人有領事保護，香港人算是中國公民，沒有人出頭保護，危險性較大。香港的記者並不是都想回來，但大家開會討論過。因為(六月五日)中午收到消息，說軍方下令搜查北京飯店，相信是針對香港的記者。在這種情況下被抓去不值得。既然大屠殺可以發生，他們進房間之後，搜查以外，還有什麼做不來？

●我們撤回(六月五日)之前，打電話給英國領事館，但領事館只是推卸。我們打電話去，希望大使館安排車輪，因為在飯店租車去機場很困難，而且途中有很多軍車。當時很多人已紛紛撤到王府飯店，因為北京飯店風聲太緊了。六月四日上午，北京飯店已有特殊現象，連服務員也不見了。打電話給英國領事館，結果是叫我們留在飯店；再三要求送我們到機場去，則說運輸有困難，只有一輛麵包車；要步行去領事館過夜，又被拒絕；要大使館派代表來，答案是他自己也不來了。

× × × × ×

幾乎每一個從北京回來的人，都說像「走難」。還會再去嗎？大多數的答案是等穩定下來或好起來再說。然而，這一等，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即使表面上穩定下來，情況又能真正好起來嗎？



港人在京參加遊行。



我們好好活着回來作證

——香港學生的血淚見聞

方禮年整理

中共領導人試圖用新聞封鎖的方式來掩蓋北京大屠殺的真相，但事實終會慢慢揭露出來的。雖然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現在還不能親自公開控訴殺人者的罪行，目擊暴行的香港人可以。一班曾與北京百姓出生入死的香港學生逃出了虎口。「你們得好好回到香港去，將事情告訴天下人。」捨命幫助他們脫險的北京學生說。這些逃出虎口的學生在北京有相同的經歷，也有各自的見聞。六月十五日晚上，他們聚在一起，分別敘述自己的經歷和見聞。筆者事前已訪問了林耀強同學，現在再把其他同學的話一一記下，希望能夠較全面地清晰報道這件事。由於時間迫促，本文未及交與有關同學過目，合注明。

林耀強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聯會代表會主席)

六月三日，我們已覺得事態不妙，便棄了傳真機，再在北京飯店燒毀一切文件和名單。十時許，我和李蘭菊、陳清華和陳宗森等到天安門廣場去。我們先到指揮部，見到柴玲、封從德和李錄等人，雖然握手道別。跟着，我們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第二層探望侯德健和劉曉波等人。不久，廣播台傳來有人被打死的信息，吾爾開希在廣播站激動地說了幾句話，隨即暈倒，給抬走了。

大約凌晨一時，我與程真、李蘭菊、陳清華等離開指揮部到廣場西面去。在那裏，我們看到一輛裝甲車高速衝入人羣中。氣氛即時緊張起來。各人立刻拉攏杆設路障，那輛裝甲車回頭又向人羣衝過來，簡直是冷血謀殺。

之後我們走到歷史博物館，坐着與距離三百碼左右的軍隊對峙。李蘭菊走過去與軍人談話，陳清華則於二時左右到廣場邊拍照，給軍人發現，腳、腹被毆，照相機也給打破了。他回來告訴我們，我便和程真去看，却看到一隊軍隊由西面衝來，沿途不斷向地上開槍。

一輛公共汽車忽然衝向軍隊，沒有傷人便停下來。鄭鳳海在西長安街看到兩人由車後跳下，立即給射殺了。我看到士兵打破車窗，將司機拉下，用槍柄狂擊。看到的人都憤恨，他們衝前救助，却給亂槍擊回，不少人在槍聲中倒地。一名工人衝前，擲出玻璃瓶，擊中一個軍人的頭部。跟着響起兩下槍聲，那人抱着腹瀉下身子。我們立即跑去把他抬過來，早已軟作一團，鮮血像水龍頭的水般從背後湧出。我看到他兩眼翻白，死了！我和程真的手都染滿了血。

我和程真回到歷史博物館。李蘭菊刺激過度暈倒，陳清華便扶她到臨時救護站去。我和程真走到紀念碑的最高層，那時已近凌晨三時。我看到柴玲、封從德、李錄、梁二、馬少方

等。我跟他們擁抱、握手，生離死別的感覺填滿胸間。他們要我立刻離開，好好回到香港將事情告訴天下人。我說，我也是中國人，跟你們一樣；他們便不再說什麼，讓我留下。

凌晨三、四時左右，廣場的燈光突然熄滅。一位男同學把汽油澆在自己身上，立刻給其他同學捉住了。廣場上經常放着幾桶汽油，準備隨時製造汽油彈。

大約四時，廣場四周亮起了強烈的射燈。封從德向大家說：我們要堅持和平而非暴力的請願，請各位同學交出全部武器。大家服從地將木棍、鐵枝等交出來，希望軍隊看到，不忍加害。

這時四位絕食者跟軍方談判回來了。他們說軍隊要在天亮前清場，勸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由東南面撤走。封從德於是請全體同學立刻用口頭表決：是堅守還是撤走？當時我聽到「堅守」的呼聲較高，但封從德說「撤走」的聲音較大，決定分批撤離。

封從德的話才說完，便有幾個軍人衝上來，木無表情的向天開槍。程真原不願走，但我拉着她就跑。有些同學也不願走，軍人就用槍柄打他們。我們到了紀念碑第二層，聽到槍聲，一位同學就跪在地上。其他同學拉着他走。

走到底層，我們在較安全的石碑後停下來。程真說要看到所有人撤走後才走。這時上層和第三層已盡為軍人佔據。我拉着程真由東南方撤走。北面傳來一陣歌聲。軍隊開始向東撤離，前排的人紛紛倒下。人羣急速散開，互相踐踏，場面非常混亂。

學生撤走時，有人大叫「血債血償」、「把怨恨埋在心裏」、「我們一定再回來」。那是悲鳴，但那是多麼豪壯的悲鳴！

我回望廣場。整個廣場已給軍隊圍住，再也沒有通道進去了。我看到場內冒起陣陣黑煙。焚燒的可能不單是營帳。

逃離廣場，我和程真便在大街小巷中穿梭，有時還在軍人之間擠過，程真還跟他們說話，有時甚至罵他們。

到了北師大，學校門口已有悼念死者的輓聯。北師大沒有地方可以安歇，我們於是轉到海澱區一間住所，休息數小時，再到朝陽區住了一晚。我們曾到木樨地看過，街上有大量血跡。六月五日早上，我和程真坐三輪車到王府飯店和其他同學會合。司機老伯不但沒有收錢，還送了我一包中國名煙。

在這次學運期間，林耀強先後兩次到北京，第一次還參加絕食。他也曾投入一九八六年的北京學潮，但覺得當時知識分子和學生的表現都不夠積極，這次卻完全不同了。

這次學運，發展至後期，一度出現混亂情況。林耀強於五月廿八日抵達廣場，看到的情況可說極為惡劣：廣場的環境很差，學生的組織也很鬆散，他們是從旁協助。他和學生領袖都十分發熱，覺得他們有理想，雖然組織能力不很高，卻能接受意見。六月一日後，廣場的情況開始改善。

對於外高聯，林耀強不大同意一些報章的說法。「那些來自北京以外地方的同學，其實也很有理想，許多人都說是來學習民主的。有些只逗留三兩天便回原地，說要將民主的訊息帶回去傳播。我覺得這些同學也很有希望。」

陳清華

(香港浸會學院社會工作系學生)

我大部分時間與李蘭菊在一起。

當羣衆圍觀和焚燒一部坦克車時，我過去拍照，給一個年青軍人發現。他當頭一棒打來，我連忙躲開，但腹部和腳部卻接連給打着了，幸好力度不太大。他跟着打破我的照相機。我倒在地，給人抬到救護站。我休息一會，回到博物館前看到李蘭

菊嘔吐暈倒，便和人合力扶她到救護站。救護站內躺着十多個傷者。一些受傷的士兵也給抬進來，有人試圖阻攔，但有人說：「大家都是人啊！」於是傷兵也照樣受到護理。

我陪李蘭菊到醫院去。救護車曾給軍人截住，有人說是「京紅的」（北京紅十字會），就通過了。車子後來也數次給市民截停，有一次他們甚至上車察看，知道載的是學生，就讓我們通過。車上的人除了不停地說「學生」，還說：「我們是不會載狗軍隊的！」

我在醫院裏站了一會，看見護士為一名傷者剪開衣服時，駭得連退兩步，醫生也呆了一陣。原來傷者的胸口血紅一片，部分好像不見了，但醫生還是趨前替他治理。一位年青的傷者跟我說：他是逃跑時給軍人在背後開槍射傷的。

在醫院裏，我們曾經致電英國大使館求助，却只得到敷衍式的答覆。我們說軍人可能來抓我們，對方却叫我們留在原處。

黎洪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後，我還在天安門廣場上。廣場的喇叭傳來官方的廣播，要場內人立刻離開。我跟着聽到學生的廣播。封從德說：「我們平日在這裏學習民主，現在就少數服從多數，分批撤離廣場。」

「你們才是少數，我們堅持不撤！」我身旁的個學生在吶喊。有學生甚至說：「我們不能撤離，一定要堅持到底，否則支持我們的市民一定會很傷心！我們只要支持到天明。北京市民每人一塊磚頭，就可以把軍人砸跑。」現在看來，他不是太天真了麼？

軍隊殺到時，我由紀念碑上層的北面轉到南面撤走。營帳內還有學生沒有離開。我穿過人民大會堂旁的小巷，走到西長安街，跟着大堆人跑——和在後面追趕的坦克車賽跑。我們在驚惶中逃進一條小胡同，逃不及的有些給坦克車壓死了。我走回去，只見一具具支離破碎的屍體浸在血泊中。

幾經轉折，我走到政法大學。該校的一位學生領袖說，據他們從醫院、紅十字會等收集到的消息，死傷者達六、七千人。

政法大學內放着五具屍體，都是搶回來的。三人是該校學生，其中一人的頭顱爆裂，顯然給坦克車壓過。有兩個傷兵給抬進來，有人要以牙還牙，但我制止了，因為恐怕政法大學也遭血洗。當時，大學已吃了幾記冷槍。

我離開時，一些學生領袖也離開了政法大學，但剛才所說的那位領袖還留下來。他說領袖不能一下子全部撤離。他面上完全沒有張惶的神色。這分勇氣令人難以置信，難以忘懷。

李蘭菊 (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學生)

在紀念碑的第二層探望侯德健和劉曉波等人後，我就與林耀強他們失散了，我一個人返回指揮部，看到吉爾開希和程佩。

吉爾開希不斷催促我回飯店去，說這很危險，又說這是他們北京人的事，不要我這個多事的香港人來管。我於是拉着程佩，說要和她去找林耀強他們，一起堵截軍車，吉爾開希這才不再叫我離開廣場，只是說找到林耀強後，不要再堵軍車，要回到指揮部。我們回到指揮部時，他說：「我死後，你們得抬着我的棺木遊行，讓我再看長安街和這個廣場。」

廣播站傳來了軍隊開槍殺死同學的消息。吉爾開希走到廣播站，很激動地說：「我們要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我們要與人民英雄紀念碑共存亡！」激憤的聲音忽然中止了。跟着有人在廣播中叫喚通知救護車和找氣筒。我沒有看見吉爾開希被送走，以後也不知會不會見到他了。

我們幾個人離開指揮部，走到廣場西面，看到高速來回的裝甲車，有一輛還在我身邊擦過。

歷史博物館前有近千名戴著頭盔、手執長木棍的軍人。一個十五、六歲少年在附近人叢中大哭，說他哥哥給軍人打死了，他要跟軍人拼命。我過去拉着他，叫他安靜下來。他伏在我肩膀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然後追着救護車去了。

我看見軍人越來越多，阻擋軍隊的人卻很少，便奔向指揮部，希望指揮部派人增援。在紀念碑下的石階上擠滿了學生，手牽着手，高唱《國際歌》。他們的面孔顯得無比莊嚴。

我獨自回到博物館前，看見已有人築成血肉之牆與軍人對峙，我加入人牆中。那些靜坐的軍人每看到有傷兵經過，便激動地大叫。

負責這排人牆的工人，高聲呼籲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和平，不能動武。有幾個手持木棍、水管的工人走過來憤怒地說：「你們還坐在這裏等死？那些畜牲見人就殺！」我們看着那些靜靜地坐在石階上的軍人，完全沒想到他們會動殺機！

跟着來了一批手持衝鋒鎗的士兵，氣氛馬上緊張起來。有人上前試圖勸說軍人，我也走上去，拉着。一位軍官的手鳴咽着說：「我是香港學生……廣場內的全是大學生，是國家的精英和棟樑，他們的和平請願絕對不是暴亂，全世界的中國人都把希望放在他們身上。你們不能開槍，求求你，不要向他們開槍……」我哭着跪在地上。我看到那軍官的眼中也有淚水。

我回到原位，一個學生拿着木棍加入，我憤然說道：「放下武器，不然就先把我打死。」他委屈

地把木棍放在身後。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孩也從身後拿出一枝約十二吋長的小鐵枝交給我。

凌晨三時左右，我看見有人抬着血淋淋的屍體和傷者往來奔跑，不禁冷汗直冒。我忽然看到先前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他滿身鮮血，由一名工人抱着。我覺過去去了。

我在廣場的救護站中醒來。醫生和護理員知道我是香港的學生，雖然明知我並無大礙，仍堅持送我到醫院。我身旁躺着一個滿身鮮血的學生。他的背脊血肉模糊，身體已不能動彈，但仍不停地說：「要堅持到底，要堅持到底！」

第一輛救護車來到時，我沒有上，第二輛，我仍掙扎着不肯上。一位女醫生握着我的手，哭着用英語跟我說：「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讓全世界知道這裏發生的事，知道嗎？」

到了醫院，看到牆上、牀上、甚至抬我的擔架都染滿血。我由一位很高級的醫生看治，他的醫務室躺滿了受傷的人。他很細心替我把脈。我求他不要管我，去救治其他傷者。他含着淚說：「孩子，你很虛弱，但休息一下就會好的。你要好好保重。我們需要你回到香港，向世人宣布我們的政府究竟幹了些甚麼。」我被送進一個安靜的房間休息；外面的走廊躺滿了傷者。

六月四日中午，醫生吩咐所有可以步行的傷者馬上離開，因為入夜後軍隊便會到醫院抓人。

醫院內，不時聽到醫生說：「瘋的！瘋的！」我聽到一位醫生哭着說，在死傷最多的醫院內，軍人不許醫生救人；兩位醫生跪着哀求，結果竟給槍殺了。後來得知這間醫院有九位醫生，也在出外取血時給軍人槍殺了。

一位受傷的工人跟我說，市民一直在廣場外保護學生。凌晨四時，他還在廣場上，看到軍隊向人亂槍掃射，坦克車隨即推進，另一批士兵就持棍追着人亂毆。他對軍人說：「後面的人都給你們打死了，不要再打了！」軍人說：「打死你們！暴徒！誰叫你們不走！」這名工人終於給擊中後腦受傷。受傷以前，他還看到一個抱着小孩的婦人給槍殺了。這孩子只有七歲左右，一邊哭一邊跑。一名市民把他抱起來，軍人却把他們一起射殺了。

離開醫院時，伴我入院的陳清華將身上的錢分給傷者作路費。一位躺在牀上的學生流着淚把錢交回給我，說：「我是不行了了，胸口中槍，一條腿也斷了，就是不死今晚也不能離開這裏。把錢留給其他同學吧。很多謝香港同學的支持……不要再逗留了，回香港去，叫同學們堅持到底。」他看到我腰包扣着「天下為公」的徽章，嗚咽着說：「告訴同學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陸德泉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六月三日晚，我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頗為平靜。十時許，嚴家其和他的妻子高舉應運到天安門民主大學致詞。我聽了一會，轉身走到指揮部的廣播站，聽到消息說軍隊成功將軍隊堵截於安定門外。

十一時左右，槍聲分別由人民大會堂和新華門傳來。跟着陸續有傷者被送到救護站：一位同學送到救護站時已經死了，有人為他唸一首詩，說他是死在天安門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廣場的氣氛漸趨凝重。廣播站呼籲同學聚集到紀念碑周圍。有些同學拆了舊帳，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紀念碑下。但有些同學仍在帳內睡覺。

我留在廣場上看事態的發展。我看到一輛裝甲車好像是撞了人，被迫停下來。人羣圍上去，開始打車、砸車、燒車。後來聽一位同學說，車上的士兵走出來，被人圍毆。一位香港同學試圖保護他，也給打傷了。

我退到北京飯店外，看到板車來回，車上載着傷者。由於長安街有公共汽車堵塞，救護車不能開進廣場，板車便將傷者送到北京飯店前，再轉到救護車上。板車每次三部，我看到來回了三三十次。

四時左右，槍聲特別頻密。羣衆不再像先前那樣退了又進，而是急速地後退。情況非常惡劣。就在這危急的時候，我前面一個少女尖叫一聲，便即倒下。有人將她扶走，我看到地上有一灘血。這時大約是凌晨四時半。飯店外的人很少，人羣都聚集在王府井與長安街交接的街口。

我返回飯店。五、六時左右，由記者房往外望，看到不少坦克、軍車等由東駛來，攔截的公共汽車給撞斷了。很多羣衆躲進行人隧道。我看到隧道內有黃烟冒出——是軍人向羣衆投擲催淚瓦斯吧？

永遠的懷念

香港理工學院學生 陳宗華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回港後，這些樂曲一直在我腦海中湧漾。在六四屠城前，我曾經和北京學生、市民，甚至解放軍數十萬人齊唱國際歌，雄壯的歌聲蘊含無窮的希望，然而，到如今，這首歌竟

變成了哀歌：從北京回港那天，當飛機着陸時，香港學生情不自禁地唱出這首歌，在機上的記者、市民都激動得流淚。六四屠城那天，北京學生就是唱着這歌，冒着槍彈勇敢地前進的。然而，那羣喪心病狂的屠夫，竟向他們開槍，甚至用坦克碾過他們的身軀，鮮血淋漓，在一剎那間，已奪去人民對政府所存的希望。

六四事件距今已半個月了，但至今我仍感不安，特別是當我想起北京學生如何在槍林彈雨中保護我，以身軀擋着槍彈，給我足夠的時間離開。當初，我們香港學生到天安門，目的是保護他們。我們估計中國政府不會逮捕香港人，頂多是遞解出境，想不到他們不由分說就亂槍掃射，本來我們要保護北京學生，最後竟要他們保護，我們成為他們的累贅，這是始料不及的。我永遠懷念他們。

另一位同事接上報道，我跑回房間去，開水龍頭的聲音彷彿和槍聲一般，風聲鶴唳！閉目只見長安街上一幕幕抬傷者的情景，當時內心充滿着悲憤與無奈，他們一批接一批的送死，我是一個旁觀者，什麼也做不了，好痛苦！我跑到北京飯店的大堂，打聽公安搜菲林的情況，再找找其他的記者，從東樓跑到西樓要兩分鐘，每個人都在哭，心情惡劣到極點；更從各方面不時傳來公安搜查房間的消息，說要找有沒有記者違反戒嚴令的證據，我便立刻回房去，我們一行十九人，各自拿了最簡單的行裝，證件留在身邊，便開始毀滅筆記、北高聯等的新聞稿，甚至「傻瓜」機拍下的一點留念照片。初時我死命的要保存菲林，把它們埋在茶葉堆中，然而上司一再指出，必須以全團人員生命為重，我最後也投降了！我的心在絞痛，在這個國度中，竟然連這麼一點的權利——保有回憶的權利也受到威脅。

早上我與另一位同事再回到飯店大堂，但見北京飯店玻璃門上有一個直徑一吋的子彈孔，隨之又是恐慌性後撤的人潮，一陣混亂，四個人把一個受槍傷的男人抬進來，一大羣人立即圍攔上來，我與一位男同事死命的推開圍觀者，好讓傷者有更多空間及空氣，無效！後來方知道那名傷者是北京飯店的廚師，他從對面的宿舍步行過來，被流彈誤中臀部，立時血流如注！

我逃回房間去，遠離戰場，遠離槍聲，遠離因悲憤而把自己生命也豁出去的人羣，可是它們卻是一幕幕的在腦海重現！我祈求上帝別讓那些具有偉大人格的北京市民再衝向士兵的槍口，積了兩天的疲勞，我溜進了夢鄉，暫時逃避這殘酷的現實。

北京市下午開始下雨，大抵老天爺也為大屠殺而流淚，也正好是這場雨，憤怒的羣眾暫時撤下，不再撲火。看着官方喉舌的中央台，氣得快要爆炸，顛倒黑白，胡說八道，說什麼靜坐人士已安全撤離廣場，明顯地這一段是預先錄映的，因為該名女新聞報道員在數分鐘前報告天氣時，不但沒化妝，眼睛還哭得像核桃一樣腫，後來戒嚴部隊控制下的中央台索性不用報道員，好幾段公告及消息只是用中文打字映於螢幕上，報道只有聲音，沒有出鏡。

整天我的腦袋一片空白，任何一點屠殺消息也會流淚，只感到無助及徬徨，內心充滿無奈，我不是激情的人，而且還不斷提醒自己該客觀中立——「我是記者」。可是，我也是中國人，正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工人，或是長

安街上的衝鋒羣眾，那種感覺是難以言喻的，因為這時並非戰爭中兩軍對壘，而是螳臂擋車，用機槍、坦克、有毒氣體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我立時想起為什麼中國會支持越南波爾布特這些劊子手政權。簡直「以百姓為芻狗」！

記：不過，最終你們能安全抵港，你的家人和香港市民都鬆了一口氣。你是那天回來的？

謝：六月五日，我回香港了，臨走時一位北京朋友對我們說：你們別要全都走，留下一兩個人住進我家中，向全世界繼續報道這一段血淚歷史。我感到十分痛苦，無疑我們再留下，或許可以多報道後幾天的情況，然而我們在香港的家人，甚至老闆同事都心焦如焚，加上我們是港澳同胞，英國大使館態度曖昧；最後，我走了，別了北京！回到香港，家人及老闆還有一些市民也在機場接機，老闆兩行珠淚簌簌而下。我很是感動，見過家人後，心中即時泛起再回京城的念頭，但這已是不可能——家人親情的羈絆，我再不是孑然一身，我對他們也有責任。

走在街上，好些市民上前來多謝我，我感到十分內疚，我只是盡上基本的責任，也沒什麼應該感謝的，加上他們的道謝令我憶起北京友人臨別的請求。千千萬萬仍要在這政權下生存、仰統治者鼻息而苟全性命的北京人，心中又被一針針的刺着。這幾天我變得心情煩躁，每從電視上看見目擊者憶述六四慘案情景，淚水便不受控制！正如嚴家其先生說：我們是為每一個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人而哭，為民族的苦難而哭；我曾訪問一位黨校的年輕女教師，她說：局勢就是平靜了，但我們的心是再也不能平靜！

對，再也不能平靜！

博益月刊 89/7

血祭

鍾玲

·夜之間

忽然，北京長滿綠樹
廣場上到處林立
撐開殘酷的烈陽
對抗槍林彈雨的狂風
在二十億顆靜仁衷
點燃生命的火苗
幾十萬棵樹啊
你們把青春
還給今年的春天
把將血
獻給明年的大地

（轉載自《聯合報》「聯合副刊」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攝影：羅綺萍



照片由無線新聞部提供

謝彩雲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

這一段血淚歷史

——謝彩雲談北京見聞

記：你是那個時候上北京做新聞的？
有考慮過安全嗎？

謝

：回來多天，內心總是不能平靜，看着照片及錄映帶，不期然想起那一羣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同學，無論是充滿理想的一羣，還是態度有點囂張的部分小糾察，也許他們已全死在槍下，又或者是倒在坦克的輪下了！還有那不計其數的北京市民，他們為了支持學生，為了對苛政、高壓手段抗議，勇敢的毫無懼色地付上了他們的性命——這亦是他們目下唯一能夠控制的東西！

打從四月中開始，我便渴望能到北京去，見證這場驚天動地的學生運動，尤其四、廿七的遊行，我向上司自薦了，卻以危險為理由給拒絕。直至五月廿八日那時，學運彷彿已陷入低潮，看來廣場上學生早晚還是要撤走，我才踏上北上的征途。

記：看當時新聞報道說：學生很散漫，天安門廣場上的氣氛不大好。你上去時又看到些什麼？

謝：滿懷希望的我，抵達北京天安門時只見一個個體分分、一羣羣彷彿不知自己在幹什麼的學生，就在廣場不走，他們主要都是外省來的，本是來聲援北京的學生，卻釀成一幕幕奪權（爭奪保衛廣場指揮部控制權及運用捐款權利）的鬧劇，那時候我實在氣得不得了，一方面是因為腦中不斷湧現前一陣子北京高校學生們絕食絕水、以死向政府進諫的鏡頭，以及戒嚴令初期市民以身體擋軍車的場面；一方面則是香港人剛籌得二千多萬元支援學運，可是到廣場後發現好些外省來的學生只是剛剛抵達，早上三十多度時就不知所終，晚上開始派發食物便出現。還有北京市民覺得學生行為不檢，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及外高聯，各組織間的利益矛盾，彷彿給這場偉大崇高的學生運動留下了一條爛尾巴。那時我巴不得立刻回香港去，告訴每個香港人我的觀察，再也不來北京，好保留從前的好印象。

記：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多久？

謝：過了幾天，不少抱着玩票性質的學生走的走，餘下數千留守廣場的學生開始重整旗鼓，把廣場的垃圾徹底清掃，還把帳幕整理好，加上中央美術學院送來的民主女神像，令廣場氣象一新，運動的高潮再出現了！

記：政府血腥鎮壓前，有沒有在言論

宣傳上鋪下伏線？

謝：政府大抵本想讓這個爛尾巴全失民心，再進行清理，誰料又再有復甦跡象，便立刻採取主動。初則在中央電視台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民主女神進行攻擊，稱她為「什麼」女神，又指她污蔑了神聖的天安門廣場云云。隨之更展開一連串較「硬」的攻勢，包括企圖綁架學生領袖、扣押工人自治會的工人。還特地向在京採訪的外國、港澳、臺記者詳細解釋戒嚴令，看來就是最後通牒一般。對北京市民方面，還特地在北京電視台播出了軍隊在北京火車站步操的畫面，向京城市民發出警告——戒嚴部隊已經進來了。

另外，在血腥鎮壓前兩天，把對着天安門廣場的喇叭音量調高，遠在一公里以外之處仍能聽到；還向留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發出最後呼籲，若他們在六月三日前離開仍可取得免費火車票，電台電視及報章也不斷報道一些市民對女神像、學生們行為的不滿，尤其特別的是不斷發表各團體及機關對政府——李鵬及楊尚昆同志的堅決支持，甚至所有中外合資飯店外面也出現「堅決支持共產黨領導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紅底白字布條。

記：新聞報道說，北京當局曾經做了一些抗衡性活動，例如安排一些人上街遊行，學生的反應怎樣？

謝：是的，政府發動了農民和鄰近縣市的人民舉行支持政府的大遊行，誰料卻把學運帶上高潮，刺激了北京學生們起來反攻，進行諷刺式大遊行，一味的叫「反話」口號。

記：北京當局在血腥鎮壓前一天做了些怎樣的「準備」工作？

謝：在六月三日凌晨，就有少年解放軍從東面入城，這一萬個小伙子看來是來天安門廣場紮營的，西面卻靜悄悄地由巴士及客車運來了武器及較老練的兵士，想進行其聲東擊西的計策。誰料幾萬個沉寂了十多天的北京市民又湧到街上，以身體阻擋軍士前進，還識破了西路軍隊及武器的用意，第二天早晨學生們還向上班的市民展示所找到的機關槍及似是用以嫁禍羣眾的民用武器——菜刀。

從這寺起，形勢急轉直下，三日下午中南海西門湧出頭戴鋼盔的武裝警察，拿着狼牙棒衝向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當時新華門外有大批羣眾包圍着較早時載獲載有武器的軍車，不讓駛走。

六月五日，我回香港了，臨走時一位北京朋友對我們說：你們別要全部走，留下一兩個人住進我家中，向全世界繼續報道這一段血淚歷史。我感到十分痛苦……

「武警見人便打」，這是一個手掩破頭的伯伯告訴我的，他說當時他只是騎單車經過，也沒有圍觀，卻給棒子打穿了頭，其後武警還放催淚瓦斯驅散羣眾，住在北京飯店的電視台記者給公安警告，不得在露台拍攝，因為這是違反官方的戒嚴令，還給抄錄了證件號碼。

到了晚上，橫跨北京市的長安大街氣氛更顯凝重，我們都預期政府將採取武力鎮壓，就如下午時一般，誰料午夜時在長安大街上出現的卻是裝甲運兵車、催淚瓦斯、戒子毒氣、機關槍的連珠掃射。我來不及詳細思索，已見從南面的崇文門區射來點點紅光，彷彿煙花一般，後來才知道那是訊號彈，全是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射去的，在天安門廣場對面的政府廣播調高了音量，說要「清場」；廣場燈滅了，機關槍的聲響連串不停，長安大街上的市民一時向廣場衝擊，一時卻沒命的退了回來，每次運回不少傷員——有的在十字車上，有的在三輪車上，有的只有幾個人用單車前後的駕着、觸目驚心的場面一幕緊接一幕！

更令我意想不到的還在後頭，首先在王府井大街，人羣出現了不正常的排列，整個晚上，他們都是向東西方向移動，但突然間，他們向南北兩邊奔跑，趕忙設置路障，好不容易才把一輛風琴式的公共汽車（無軌電車）從南邊拉到長安街，橫放在路上，東面卻已傳來隆隆巨響，這時候我們十多個在露台的同事，均不自覺地驚叫起來——竟然出動了坦克連同裝甲車及卡車，共有幾十部。它們全都走單車徑，後來才知道這樣的路線是要衝過躲在那裏的羣眾。它們都是從東面來，直趨天安門廣場，在廣場那邊卻連聲槍響，那時我在與香港的同事通電話，立刻將所見透過電話線傳到香港去，這時天安門廣場的人、帳幕、民主女神都消失了！整個晚上所看見、所聽到的，以一個採訪港聞的香港記者的標準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一位北京朋友跑來告訴我他在廣場附近所見，我亦透過電話線把那段感人的衝鋒事蹟報回香港去。天漸亮，但槍聲不絕，混雜着十字車

的聲音，街上的人羣漸少，及至七時左右，士兵還由坦克帶頭，從天安門那邊向東面駛過來，在附近沿路繞了一圈，尾隨幾輛卡車上的士兵還舉着勝利的手勢，我心中立時有想嘔吐的感覺：他們定是瘋了！

軍士們的槍聲沒有因為天亮——「光天化日之下」而停止，相反的，他們像是機械鉛兵一般，一排排地橫擋在天安門廣場的外圍，後頭是坦克和裝甲壓陣，卻看面對着他們的槍枝炮塔的是手無寸鐵的市民，天亮後市民的數目亦倍增起來！從潰不成陣的幾百人增至數千人，他們就在士兵擺陣的數百公尺以外築成人牆，而在第一度人牆後百多公尺又是另一堵人牆，其餘的人則以最原始的通訊方式，將發生的事對任何一個過路的人述說，羣眾便分為一堆堆，在東長安街這邊議論，有些則顯得相當憤怒，除了破口大罵，還焚燒公車，李鵬總理從四月廿六日開始講的「動亂」終於「如願以償」了！軍士們差不多每小時開槍一次，總是連珠炮的，用重型機槍，毫不留情，第一堵市民防線潰散了，第二層防線的市民試探式的跑前收拾屍體及傷者，又是三輪車、木頭車，甚至是徒步，把死傷者抬走，不一會，他們又築回剛才的人牆，指着士兵們罵「法西斯狗」，未幾又是連發機槍掃射聲，一位目擊者跑來告訴我，他看見一位帶着十多個青年衝鋒的女士，她不是學生，但她挺胸昂首，向着手持機槍的士兵衝去，還一邊喊：「一、二，法西斯，殺人犯！」本來坐在地上的士兵站起來，把槍頭瞄準衝鋒者的大腿，好些青年趴在地上，那位女士卻始終保持她的堅毅姿態，結果她的腿給無情的槍彈轟碎了。

記：面對這種「前所未見」的悲壯場面，作為一個應該時刻保持冷靜的新聞記者，你當時有什麼感受？

謝：好痛苦！

我們從凌晨至天亮，六月四日那天，整天所見均是面對死亡毫不畏縮的北京人，我和好幾位同事都哭了，深知當記者的必須客觀中立，但當時我再也忍不住淚水，我放下直播香港的電話，由

我們可以先講一講，大家有什麼問題再問。我先講幾點：

第一點，現在的局勢。總的來看，六月三日凌晨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在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鬥下，暴亂者的陰謀沒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亂取得了初步的勝利，或者說第一步的勝利。現在暴亂還沒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勢仍然是相當嚴峻的。

第二點，暴亂發生之後，社會各界包括輿論界，對傷亡情況都很關心。國務院也很關心這件事，因此，讓有關方面盡可能去調查了解，但是由於局勢還不穩，秩序還相當混亂。許多正常渠道還沒有恢復，所以統計數字還不完全，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

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羣眾)共傷二千多人；

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羣眾。

除此之外，軍隊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有四百名官兵失蹤，生死不明，等將來局勢穩定下來，有些可能生還，有些可能犧牲了。

大體情況就是這樣。對這個數字，我已經再三說過不是很準確，但是有一個數字相對來說比較準確，是

經過向各個大學了解的，就是到現在為止北京各個大學死亡的大學生二十三名。我預計隨着事件的發展、局勢的進一步穩定，各方面情況了解了，可能這些數字還會有變化。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首先給同志們通報一下……

張工：首先我想向新聞界的同志負責任地說明一個問題，並且也想通過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國人民明瞭，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羣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

(新華社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電)

後話：默哀

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對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中犧牲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對受傷的解放軍官兵、武警官兵和公安幹警表示親切慰問，對執行戒嚴任務的全體同志致以親切問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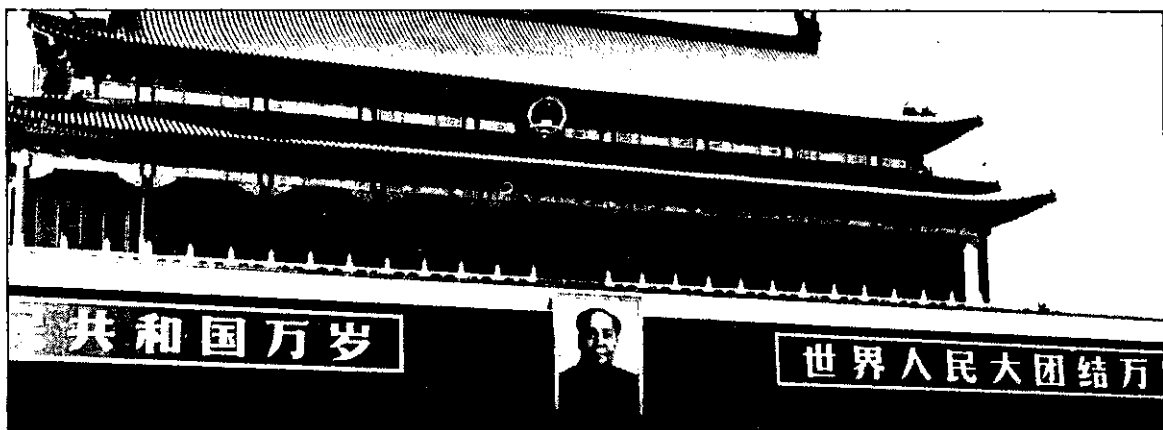
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以及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參加了接見。陳雲同志沒有到會，他向戒嚴部隊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在平息暴亂中死難的烈士表示深深的哀悼。

鄧小平同志神采奕奕，精神飽

滿，同大家合影後作了重要講話。他首先提議，為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犧牲的烈士默哀。全體到會同志肅立默哀。

(新華社北京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電)

博益月刊 89/7



攝影：羅樹培

我們回到空寂的廣場

葉輝

The dead will think the living are
worth it we will know
who we are
And we will all enlist again

When the war is over
: W.S. Merwin

三天之後我們回到空寂的廣場
水淋熄了火，洗擦了血跡
台階上留下子彈殼，書籍，擴音器
以及許多淋不熄洗不掉的記憶
紀念碑上，有撫之猶覺灼熱的彈痕

守候了好幾十個日日夜夜，這廣場
從熒屏伸延出來，走進家家戶戶
我們的居室也像廣場上的營帳了
我們像沉悶而悲痛的同學躺在地上
看來去的身影開着沉悶而悲痛的玩笑

他的汗衫寫着
「我餓，但吃不下」
她在身上掛一幅血書
「媽媽，我沒有錯」

廣場的燈光時明時滅
就像熒屏的映像時隱時現
他們曾經在廣場上唱歌跳舞
他們曾經在廣場上流乾了眼淚
在救護車的哀鳴聲裏對過路人說
「中國再沒有希望了」

廣場的燈光時明時滅
就像熒屏的映像時隱時現
我們只聽見槍聲
我們只看見坦克輾過去
他們曾經阻截軍車，教子弟兵

緩緩垂下冷硬的槍桿
他們也許不明白，不是每支槍管
都可以插上鮮花

廣場的燈光時明時滅
就像熒屏映像的時隱時現
熊熊火光裏，他們消失了
變成北京天空濃稠的黑煙
他們消失了，沒有完全消失的
是掉在石階上的一冊英語入門書

他是一個穿白襯衣的倖存者
擋着深綠色坦克的去路
他在追問失蹤親友的下落嗎
他是那樣安靜，只想壯烈犧牲嗎
士兵惶惑了，猜不透不怕死的意思
他終於死不去，也許永遠不能入睡

黃昏的時候，天空紅得像要下一場血雨

他們終於在中國變成風沙裏的塵土
就像十三年前在同一廣場上的難胞
他們會想起前夜徒步入城的青年士兵
給羣眾衝潰了像白色的碎片
廣場上的兄弟姊妹流着血散入民間
死者認為倖存者的悲痛是值得的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是誰
六月七日

(轉載自《星島晚報·星期日雜誌》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六四屠城日： 真真假假

血染天安門廣場紀實

北

京四日凌晨零時，長安街依然熱鬧，但人數不多，大概只有五、六萬左右。

就在此際，一陣轟隆的聲音由長安街西面迫近，只見一團滾起的塵土如箭般滾來，當一部「九九三」號裝甲車切切實實出現在眼前時，許多人都目瞪口呆，完全來不及反應。裝甲車全速挺進，如入無人之境。

北京人民的惡夢開始了。

人們立即齊心協力擺設路障，更多人上街。這時，裝甲車走回頭，人們以零星石塊及竹枝飛襲裝甲車，它同樣以全速壓過重重關口，直向西單駛去。不久，隨後而來的「〇〇三」號裝甲車由東向西駛到接近故宮門前，鐵帶被欄杆鐵枝卡住，進退不得。這時候，有人攀上車頂，用大石砸緊閉的小鋼窗。擠在人羣背後的一個中年人呼喊：「不要給人製造藉口！」可是，無人理解或者能克制了。

幾張棉被鋪在裝甲車上，怒火燃起。十分鐘後，兩名軍人耐不住高熱，打開鋼門逃生，立即被人圍毆，但三個學生迅速緊抱頭破血流的軍人，苦勸各人冷靜，結果兩人由救護車送走。

這時候，羣眾又發現西長安街的軍隊已悄悄地摸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外。人們感覺到軍隊要動手了。

凌晨二時許，北京城傳出了密集的槍聲，大批羣眾倉促地沿長安街向東撤退，有十多名死傷者被人用單車和三輪車運走，羣眾退走時，高叫罷工、罷市。

二時四十五分，中央電視台公布戒嚴部隊通告，警告在場羣眾立即離開，否則無法保證他們的安全。

在廣場和長安街方面，很多市民在驚惶地奔走，學生廣播不斷呼籲與軍方談判，表示願意和平撤出，並叫學生交出手上的木棍。這時，一輛黑色私家車從大會堂向廣場開去，估計是談判者。

在北面，有一隊裝甲車高速地橫衝直撞，速度甚高，有七人被撞死，四百多人受傷。

三時五十五分，廣場上燈光盡熄，顯示鎮壓前兆，廣場內傳出槍聲，學生廣播仍播出《國際歌》，並仍

在呼籲和平撤退，但軍方毫無反應。

一名受傷平民表示，在菜市口，解放軍用機關槍向人羣掃射，他的三個同伴紛紛倒地，生死未卜。

四時，廣場學生和羣眾近十萬人被軍隊包圍。

在長安街傳來長達半分鐘的密集槍聲，並有曳光彈射破夜空，廣場政府廣播系統，聲稱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

四時三十五分，廣場廣播限令學生五時離開。

四時五十分，廣場上燈火重明，學生正準備撤退，但廣場方面仍不斷發射催淚彈，引起陣陣白煙及傳來巨響爆炸聲，很多羣眾受催淚氣體侵襲，盲目奔跑。

雖然學生已表示撤退，但廣場已全被軍隊包圍，並不斷縮小封鎖圈，當學生向東南方撤退時，仍在向他們發射催淚彈。

有目擊者稱，有部隊由南向北推進，並沿途開槍掃射，較早時，當學生提出談判後，兩輛裝甲車開入了長安街。

據逃出的學生事後表示，當學生準備撤退時，武警和軍人衝前用棍子、槍托毆打學生，當學生走遠時就從後開槍射擊，有些學生中彈倒地。學生說，當時約有十萬人在廣場，學生都坐在地下唱歌，沒有任何行動。

學生說，部隊由坦克、裝甲車開路衝入廣場，首先撞倒民主女神像，接着衝向帳幕區，首先將一些企圖以血肉之軀阻截的學生撞倒，當坦克壓上帳幕時，部分帳幕內還有學生。

在此情形下，學生們仍手挽手撤退，軍隊又向學生開槍。據估計，在廣場的死亡人數達二百人。

五時，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被推倒，人民大會堂東門數千軍人開入廣場。三十部載着軍人的卡車自北向南向廣場進發。

另一方面，六輛坦克風馳電掣由建國門方向西行到天安門城樓下，並有十輛軍車尾隨而進，沿途開槍掃射，數分鐘內發射逾百發。

五時三十分，超過三十輛坦克及大批軍車由西向東推進，市民紛紛走避，槍聲一直不停。

天亮後，軍隊仍不斷增援，有坦克、運兵車、裝甲車，並沿途向地面開槍掃射，這批裝甲車輛都停在廣場內，此外，還有大量步兵開入，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和西門均駐有數千步兵。據稱，部隊在建國門出發時，肆意開槍掃射，而羣眾曾躲在地下隧道和出租車站內向軍隊扔石頭。

六時，廣場已被部隊控制，但在西長安街，仍有數百市民築起路障，並焚燬了一部巴士。此時，數十輛裝甲車自西向廣場推進，也是沿途開槍和發射催淚彈，稍後，已進入廣場的坦克又再開入長安街來回行駛，街上流彈四濺。

（《大公報》北京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專電）

中共中央國務院的 「告全國人民書」

全體共產黨員、全國各族人民：目前，首都北京的形勢嚴峻。一個多月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蓄意製造動亂。從六月三日凌晨起，這種動亂已經發展成爲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

極少數暴亂分子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製造了種種暴行。他們攔截戒嚴部隊進駐市區和天安門廣場執行戒嚴任務；砸毀、焚燒軍車和公用車一百餘輛；辱罵、毆打和綁架幹部戰士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用設備；衝擊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中央廣播電視大樓、公安機關等首腦要害部門；搶劫商店和燒燬警察崗樓。他們還慘無人道地殺害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甚至把被他們殘害的戰士屍體懸掛於立交橋欄杆上。他們進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號，公然叫嚷「要殺死四千七百萬共產黨黨徒」。這次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主要是極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面製造種種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團夥，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和其他社會渣滓。總之，他們是一夥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動分子。

眾所周知，一個多月來，政府對極少數人蒙蔽羣眾製造的動亂一再採取忍讓、克制的態度。但是極少數人以爲政府軟弱可欺，變本加厲進行活動，終於發動了反革命暴亂。面對這種嚴重局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採取果斷的措施，堅決平息這場暴亂。爲避免誤傷好人，從三日下午開始一再發出緊急通告，勸說廣大學生和市民不要妨礙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在平息過程中，戒嚴部隊又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極少數暴徒置若罔聞，對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擊，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一些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這是我們很不願意看到的。但是，不這樣做，暴亂就不能平息，那就要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

事件。幾千萬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人民共和國就可能被顛覆，社會主義建設和十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毀於一旦，全國就可能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果斷地平息這場暴亂，完全是正義的行動，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國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的。

依靠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的英勇鬥爭，依靠廣大人民羣眾和青年學生的積極配合和支持，我們已經取得了平息暴亂的第一步勝利。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亂還未完全平息，極少數暴亂分子是絕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還會伺機反撲，製造種種事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務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團結一致，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保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果。只要他們膽敢繼續搗亂下去，我們就同他們鬥爭到底。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有幾千萬共產黨員，有幾百萬忠於黨忠於人民的解放軍，有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大力支持，我們完全有力量有信心徹底戰勝他們，徹底平息這場暴亂。

全體共產黨員、廣大人民羣眾和各界愛國人士，一定要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明辨是非，顧全大局，迅速行動起來，挺身而出與製造暴亂的極少數人作堅決的鬥爭，而不要做任何親痛仇快的事情。要相信黨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亂，共產黨員要處處以身作則，起模範帶頭作用。廣大幹部職工要堅守崗位，搞好生產，保障供給，積極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正常秩序。各級黨政組織，要加強正面疏導和思想政治工作，耐心教育青年學生和廣大羣眾，不要輕信和傳播謠言，不要進行任何形式的串聯。爲穩定局勢創造安定和良好的社會環境而鬥爭，同心同德把建設和改革繼續推向前進。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新華社北京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電）

袁木「揭露真相」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六月六日下午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內容如下。

袁木：今天舉行一個國內記者招待會，主要是因爲從六月三日凌晨以來，在首都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建國以來沒有過的反革命暴亂，這件事引起了國內國外輿論的密切關注。所以國務院委託我請來了戒嚴部隊某部政治部主任張工，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俊，給大家提供這方面的有關情況。

曾憲冠

生路

四五個國內同學護着我們往前走，他們說，你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不要再犧牲。在他們的心裏，我們是特別的……

剛

到機場，就有一位自稱是律師的先生歡迎我們，歡迎我們回到香港。他說，這裏是一個有法治、有人權的地方。一刹那，我驟然感到我現在的處境是多麼的不同，眼前一切漂漂亮亮的，地方乾乾淨淨的，連燈火也是明燦燦的，比之陰慘、肅殺的北京城，我彷彿從地獄回到人間了。

才是上午，我們還在市中心的一所飯店裏；才是下午，我們還在機場的大堂裏候着。從飯店到機場，穿過大大小小的街道，看見許許多多的軍車和軍人；我們收起了無線電話和照相機，我們真能到達機場嗎？機場真有飛機回來嗎？然而，彷彿只一瞬間，我們回來了，穿過幾許時間和空間。

我們安全了，因為我們回到這安全的地方，這裏是我們的退路，是一個保護罩，我們可以在此獲得安全。這是我們所特有的，然而北京市民和同學所沒有的。我想，這也許便是他們勇於赴死的一個原因，因為他們委實是無路可退。

我們是沒有理由特別的，我們跟其他的中國人、北京的中國人有什麼不同呢？就因為我們還有一塊香港？就因為我們還有以退麼？然而，我當時都沒有考慮這些了，我只是想逃，逃出屍首纍纍、彈痕纍纍的北京。

我當時真的沒有想到別的，只是想着那一條才是生路。軍隊已從四面將廣場包圍了，我們無法從東長安街走出去，幾個國內同學來說送我們從南面走，然而幾經猶豫，結果連南面也不能走了。廣場的東南角有個小路口，從路口可轉入一條小巷，我們當時自然不知道這路之所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埋伏了軍隊。五六個國內同學來保護我們，和我們一起離廣場向東走去。

我們離開的時候，同學差不多都聚到紀念碑四周來了，好多的同學神情呆滯的坐着，有的躺着睡覺，有幾個敲着結他，唱〈一無所有〉。我們離開了，把他們丟在後面，那是凌晨三

時許，後來據說軍隊不久就開入了廣場。

四五個國內同學護着我們往前走，他們說，你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不要再犧牲。在他們的心裏，我們是特別的，我們對他們的聲援已經足夠了，沒必要連性命也賠上。我們有我們的限度，死是屬於他們的，生是屬於我們的，正如法治人權是屬於我們的，坦克子彈是屬於他們的一樣。然而，又有誰是應該將性命賠上的呢？

沿着那條小巷往前走，我們看見許多市民站在街上，不知在等待着什麼。有的市民問我們廣場那邊怎樣了？我們只是說打起來了，開槍了。從東南面還不時傳來槍聲，是那邊又開了新的戰場了？

我們停停走走，想找個庇護的地方暫時躲一下，然而有兩處地方都不敢收留我們。天開始亮了，黑暗逐漸變成灰黯。我們來到一處民居，在梯口旁的一個小間躲起來。原來這兒早已是來京聲援學運的外地同學住宿的地方，我們躺睡在他們遺下的衣被上，暫時紓解一夜的勞累。天已亮，幾個同學從廣場跑回來，他們有些是認識的，見對方安然回來，都擁着一起哭。他們一邊哭，一邊說自己的同學，死的死，散的散了。一個同學捏着一個彈頭和我們說話，我後來把彈頭拿了收起來，將這殺人武器帶回了香港。市民也陸續起來，也都來看我們，都發出同樣的詛咒，有位老太太說：「我五十幾歲，只在電影上看過一次這樣的事。日本人沒有做，國民黨不敢做，共產黨做了。這叫共產黨領導！」

我們也沒能睡去，耳邊「喪盡天良」、「回來報仇」之聲不絕。市民又給我們買來烘餅，給我們倒水、煮稀飯，更加給我們送藥，叫我們好好休息。而這時，窗外的一面黑板上已寫上今天是國難日，大家應戴上黑紗和白花的字眼，黑板旁邊還有大堆黑紗和幾朵白紙花放在窗台上。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將以北京市民裁剪的黑紗，裹上那一枚殺人的彈頭，永藏在仇恨的心裏，永記着慘痛的歷史。



剛從北京飛回香港的記者和學生，「我彷彿從地獄回到人間了」。

從民居轉出後街，崇文門一帶街上滿是碎石磚塊，軍隊設置了一道封鎖線，將路切斷，只餘一條自行車徑讓人通過。市民走到士兵跟前和他們談話，說解放軍跟人民的關係有什麼時候像現在這樣壞？士兵只是聽着，微笑，說你們跟我說也沒有用啊。他們彷彿不大曉得他們在外圍封鎖，而裏面則在殺人。

我們不知道街道上的具體情況，尤其是往北京飯店那邊的路的情況，長安街上會不會仍是槍林彈雨？逃回民居來的同學和市民說外面的士兵現在不分是誰，見人就射。於是，我們只好在民居躲下去，等待時機。

意見很是紛紜，有的市民說外面很危險，不要出去；有的說不要回飯店去了，坐火車到天津吧，火車站的路沒問題；有的說剛從飯店那邊回來，路上平靜。我們決定還是回到飯店。沿路沒有幾個行人，只是在醫院門口堆了好些護理人員。東長安街上沒見士兵，然而街上十分狼藉，兩輛燒焦了的公共汽車停在路中心，是惡戰後的局面。

我們回到酒店，準備打點一切離去，一時又將在民居裏的市民和同學丟在一邊了。後來據說那幾個同學平安離開，乘火車去了天津。市民呢？市民當然還在民居裏，繼續面對着政治、軍事的恐怖。我們這些特別的、受保護的人，在乘車往機場的路上看見滿街是燒殘了的车子；交通告示牌、報紙櫃上滿寫着正在流着淚的字，說毋忘六四，說血債血還。而我，竟不復記起那些市民對我們的愛護，和他們叫我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要將北京的事情帶回去的話語了。只是現在，當我想起我沒有特別的理由，沒有活下去的理由時，我才想起這些話來，並將之作爲理由，化爲繼續走人生的路的勇氣。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博益月刊 89/7

攝影：羅綺萍

北京人準備犧牲一百萬

——血洗北京的我見我思



星星畫家黃銳和他的日籍太太回北京探親，剛好遇上六四天安門大慘案，本文寄託了作者的一腔悲憤。圖為黃銳夫婦在香港解放月報。

我是一個畫畫人，一向不允許自己寫甚麼文章。文字表現對我多餘的。經歷了六月三日、六月四日之後，文字表現亦是可憐的。我憂慮、我惶恐、我震怒、我戰慄、我悲痛。我無法想到這個國家政府竟如此法西斯至極。我也沒有料到與它對立的人民是如此正直和熱情。當軍隊將槍口指向老百姓，包括兒童的時候，並突然射出凶彈的時候，一個正常人的頭腦還能留下甚麼呢？

到天安門

五月三十一日中午，我和愛人第一次來到天安門，我一向想念的，近乎十三年未見的天安門。我的職責是給我們，包括幾位朋友，畫商和畫家的捐款交給學生們。天氣極熱，廣場似在蒸騰。雖然滿目仍是旌旗招展，但守在下面的學生們卻極具疲勞之色。我們先繞廣場一週，不免拍了一些紀念照。許多外地人，市民也穿插帳篷之中，背對學生們，留下紀念照。我多少有些惶惑。圍着紀念碑，有三道學生們的防線。我介紹來歷，被先後帶給三個學生，這幾位頭纏紅布條或白布條，直到最上層的台階上。這裏是指揮部，好像是威虎山。相互的口號也似乎是暗語。只是站在前面的「官」却非常年青。聽口音知道他們是外地的學生。他們拿來一個捐款記錄本，讓我在上面簽名。我潦

潦一看，覺得這天我們的捐款數目是最多了。我說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包括日本人，感情與你們是一致的。你們在做最有意義的鬥爭，而我們不能與你們並肩而進。兩位學生領袖，極疲憊的臉上極肯定的表情，說：我們沒有家，到這兒安了家。這兒就是民主與自由。我們一定要堅守天安門，決不退一寸，到死方休。

那幾天的政情極不明朗。流言蜚語四處傳播，官方的新聞媒介在叫囂着李鵬勢力的穩定與強大，似乎學運的成果已巧妙地被李鵬、楊尚昆之流所利用。學生停留在天安門不能動，彷彿在證明他們「三愛」的偽宣傳。所謂三愛，是指軍隊愛首都、愛首都人民、愛青年學生。我接到學生們送我的傳單，上明寫廣場指揮部將靜坐示威延至六月二十日的決定。我腦中生疑，政局已轉惡，政客們老奸巨滑，正對學運做反宣傳，學生們一貫堅守的做法是否太僵直了？天氣亦像是下火，廣場上呆幾小時已是頭昏腦脹，是否政府就是讓學生們自然消耗，不戰自滅？

唯有十米高的女神像，驅除觀者的疲勞及困惑。那是甚麼地方？那是天安門與紀念碑的正中間，威然對着皮笑肉不笑的毛老人家像，手中高舉一把火炬。那有甚麼樣的意義？紀念碑是共產黨建國時立的。天安門立於明王朝，左右有兩大堂。在一堆可說是皇家建築中間，立起一個百姓們自己的東西，這女神，有說她是石膏的，極粗料，極不牢固，可關鍵是她代表了人民自由自主的意志。建國四十年來，我們自己連肉體都出賣給毛是父親，當是娘的國度，毛幹了黨以後生了我們，現大家以後，竟然用自己的手立起一個女神，可謂是真正女神了，這是第一次自由的信仰。學生把一個個香港運來的小帳篷圍成保護圈。準備共存亡。我對這女神有說不出的留戀和喜愛。眼中不禁要落淚。

後兩天，不出所料，真是一天熱緊一天，我們雖路過天安門，未曾深入。感覺是垃圾增多了，人數有減少。學生們亦是煩躁，我見到朝日新聞記者加藤千洋時，他告訴我，柴玲被兩位學生差點扼死。後來，傳來了鄧小平病危之消息。大概不要再等多久了，但沒有人心頭

黃銳

輕鬆，這一位老人家的健康與否，也成了中國人命運，中國生命秤上的鐵秤砣了。

京津兩重天

六月三日晨。我們照計劃出發去天津。天氣雖尚早，氣味不一，沒有公共汽車開過來。和太太商量一下，去坐無軌電車，一輛車上圍着不少人，上面站着也是人，在跳，在叫。原來是一汽車當兵的，屁股以上沒有軍裝，只有便服，屁股以下，武裝到腳趾，甚麼自動槍、沖鋒槍、短刀、大頭釘鞋，一盒盒子彈。隔着汽車玻璃看，一點也看不出來的。就當是一幫生產隊老嫗進城，結果還是被學生們發現了，截住了，堵死出不來了。你們要到那去？短刀要刺向誰的胸膛？

其他的車全被堵死了，路上出現路障。我們輾轉，終於到了天津。天津真是個和平之坡。汽車司機帶我們兜覽天津。知道北京的事嗎？一星期前的事都知道了。新聞封鎖，消息塞閉的結果，距離僅有百多公里，小平同志放個屁，天津也要戴口罩的地方，北京市民的行動與天津人的表情判若兩個世界。再說起政局，啊，那政府真是人心喪盡了。所以李瑞環進了北京也不行了，那鬼地方兒！來，吃西瓜，吃西瓜！

但是我們坐不住。那鬼地方的鬼進城了。鬼子進城了。不是來吃西瓜的，是叫人們腦袋開花的，那還有三老四少，所以要回去了。七點鐘到北京車站，只見一隊隊戰士跑來跑去。北京車站內停了一列車，住滿了當兵的。兵與也飄過來。從車上也曾看見，豐台的車道上，運兵車、裝甲車停着，一字九十九輛。

從前門下地鐵，又來天安門了。傍晚了，一輪昏日，映着一排掛着戰旗的旗桿，天安門是一臉憔悴。因為天也落涼了，或是人心發熱了，市民們從各路口不斷湧來，一會兒間便廣場的人數增加了幾倍。原來下午發生了流血事情。

從半夜，當兵換了便衣入城。雖然實行了戒嚴令，不戒當兵的。可不巧還是讓老百姓發現，六部口就攔住這麼一輛車。下午二點，中南海大門一開，兩隊武警開出來，手持尺半長

的三角鐵，見人就抽就打。（一部分三角鐵被繳獲，當場展覽在廣場上）老人，婦女全不讓過。行人的自行車攔了路了，舉起來，扒地一下砸過去。當場有兩個人包括一老人的腦袋開花了，十八人受傷了，血嘩嘩地流出來，就還不算，他們衝擊人羣的時候，人羣嘩地一撤，一名七歲的男孩一下子被踩了，當時就沒氣了。

七歲男孩被踩死

兵車是被武警給救回去了。武警得意地返回的時候，人們才撿起男孩的屍體，送到醫院的時候，人們的眼淚掉了。冥冥眾生，做出了何等安排？

所以人們才不幹了。沒辦法再用口講理了，軍隊先製造了血案。學生們，市民們，有的去沖中南海，有的圍緊大會堂，第一次喊出了，以生還生，以死還死，以血還血。我們也看見學生們撿石頭向大會堂擲去的情況。這是在晚上九時。

後來當局說那天傍晚在復興門一個當兵的被打死，屍體掛在牆頭上。我想是可信的。看看我們的下一代被如此愛護，頭怎不會發熱？就連我們聽講的，都一下子懵了，身體要失去平衡。

沒有車行，北京飯店沒有出租。門內外，一片清寂，成了蒙古的大軍店了。我們又回廣場，要了一輛汽車，車夫先講好，你們從國外來的，要表甚麼態？你要是支持李鵬的，我要你五百塊。說不定還把車翻在這兒。

雖說已是十點鐘了，可街上還是人羣一片。這不是長安街，而是穿過景山，北海的小街。平常有這麼多人嗎？沒有，人們在家呆不住了，說不定今晚要出甚麼事兒。

回到家，在家吃上熱飯的時候，聽到廣播一遍又一遍的警告，叫市民們不可出大門，否則不保證其安全。可這警告也成了廢話，政府的話在北京都成了廢話了。市民們都在街上，等着，看着，二十年前毛老人家如從門口過，也不過這等光景吧。

●一老人的腦袋開花，十八人受傷，血嘩嘩地流出來，一名七歲的男孩一下子被踩，當時沒氣。

●裝甲車突然開槍，前排人們一下就倒在血泊裡……僅僅一分鐘，這個世紀折回到法西斯世紀。

在家的側近，祖家街的路口，截了兩輛軍車。我們去看，一看恍然。不是因為所截的這些兵有甚麼不同。而是圍住軍車的，除了十幾個學生之外，黑壓壓一片，千人左右，一張張熟悉的臉。張大嫂、李大媽、楊大爺，小時候會見過的，會抱過我的，呵斥過我的，全在人羣裏面嗎。這是反革命暴徒一小撮嗎？會有文革時期的街道積極分子，立場也轉變了，罵起政府了。共產黨員，革命退伍軍人，覺悟都到哪去了？衆口同一，衆心同一了。這是政府一直標榜的鋼鐵長城嗎？怎麼現在來阻攔人民解放軍了？真是人心所向，無有餘地。

後來這兩軍的兵被繳了械了。他們帶的警棍被斷成了兩半。當兵的，讓民衆押着，帶向體育館的方向。這是因爲西南面響着激烈的槍聲，情況急轉直下。

全成了一小撮

我們不在流血的現場，現場在木樨地，但是很快就有跑下來的人。有的人血流滿衣，騎着單車大喊。軍人開槍了，人死的太多了。我的一位鄰居，因出身很好，當過解放軍的排長，復員下來，也變成一小撮去攔軍車了。本來學生們是一貫以人牆來攔軍車的，設路障亦來不及。沒有任何人料到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軍隊會突然開槍。裝甲車上的槍手架起機槍，居高臨下，車前站着的兵士端槍，槍口向上，這樣一個交織的彈網，可以理解成是威赫羣衆。機槍的子彈打在路旁，自動槍的子彈射向天空！可是前排的人們一下就倒在血泊裏了。我的鄰居很快倒地，一下子跑開臥倒在草叢裏。他看見那些屍體，不是一下可以數過來的，僅僅是一分鐘，這個世紀折回到法西斯的世紀了。一個男孩從旁邊的樓上跑到陽台，一排子彈過去奪走了他的生命。

另一個小伙子騎着摩托車奔回來，說軍人開槍，有一個年青人騎着自行車，倚在電燈柱上不動，他去拉他，朋友，怎麼還不跑哇，看他眼睛還睜着，胸上盡是彈孔，血流了一地。然後就是緊急的悲鳴，不絕於耳。在我們的街上，有白塔寺的古老的街上，平均兩三分鐘就有一輛救護車通過。有的就是卡車，因爲缺少担架，一兩把長椅就成了担架，有人用手舉着輸血的瓶子。沒有人可安心睡覺，這個一貫市民氣的城市被撕裂了。九十年平靜的日子被撕裂了。從老人的咀裏，日寇進城，如果日兵殺人日方都要嚴懲，解放時更是和平入城的浪漫的年代，沒有經歷過今天的經驗。誠實的心被撕裂了。我父親一下子躺倒床上，發了老病。他幾十年忠心耿耿爲國效勞，退休了還進了西城協協的夜校，凡是黨指示都是真理的當過國民黨員的他，感情上理智上無法平衡了。

夜裏三點鐘，我們去了人民醫院的門口，很想去問一下傷員，可是大門緊閉，非救護車不可進。門口的醫生說，此時爲止，人民醫院已有五位傷員死掉，郵電醫院是二十二位。子彈大多在胸上，脖子上，重傷員亦有隨時死掉的危險。從時間，從附近醫院的數字看，本樺地的屠殺最少也有一百位以上的平民死亡。白塔寺的路口上，一輛軍車的面包車橫躺着，車上的玻璃全碎了，輪胎也被拆掉了，一幫小伙子，還在把這車翻來翻去。原來這車是部隊的一個傷兵，由五六個兵陪着，送到人民醫院，可此地是居民醫院，或是本是居民感情，拒收了這個傷兵，傷兵車出來時就被人們攔住了。傷兵不禁折磨，馬上就死掉了，有兩個兵見事不好跑掉，還有兩個兵留在裏面。我去看，見兩個人，都是十八、九歲，滿臉是血。此時這方又是喧聲大作。羣情激憤了。殺了這麼多老百姓，不可殺他們這些混兵麼？殺！拉出來殺掉！人們叫喊着，兩個兵被拉出來，三五十人圍住一個，用拳頭，用腳，抬起來，又摔下去。就聽得一聲，血濺開來。

一灘血跡上一雙軍鞋

第二天，我路過此地還見到這個現場，一灘血跡上放一雙軍鞋。第二天，主要大街上的血跡上沒有什麼其它遺留的，可是偏僻的小巷，幾灘血跡上放有軍鞋。我看見三處是這樣。這是市民的報復。軍兵出來了，絕有被殺掉的危險。可是特放軍鞋以示區別，也實是北京人的幽默。

從天安門方向傳來的槍聲一夜也沒有停過。坦克車隆隆開過的聲音，自動步槍機槍聲，交織在一起，晨五時，槍聲終於停歇了，我們都知道天安門的清場結束了。學生們的命運怎樣了？想起那幾位學聯的外地人，說起這

廣場是他們最後的家，我們的心疼了。我不會忘記那幾張憔悴的，堅定的年青面孔。太太還說新潮社的記者永島會不會危險？他有一張北京人的臉，子彈是不長眼睛的。

六點，中央的廣播又開始了，什麼進入了天安門，什麼反動派的勝利，市民們不禁破口大罵，看你們猖狂到幾時？

北京變成死城

6月4日清晨開始，北京變成了死城。不是說死的人已太多。而是太多的人抱着決死的念頭。天空灰蒙蒙，彌漫着汽油味，燒輪胎的臭味。前門一帶，復興門一帶，滾滾的黑烟升上天。我和太太，騎單車出發，準備到琉璃廠去踐一個約會。市街變了模樣。戰鬥過的痕迹、彈壳、血跡到處可見。只要有兵通過的地方，旁邊的磚瓦就飛到街上變成了碎片。車開的碎片。

琉璃廠的一個女店員，聽到中央的廣播後繼續上班來。她推着自行車，小心地想穿過天安門，一排子彈就朝腦袋上方飛過來。使她對中央的指示有了新體會。有幾個冒死的，「以身試法」的小伙子就這樣被殺掉了。

一輛軍車從街前飛馳而過。舉出白色畫紅十字的旗子，上面放出廣播：我們學生在昨夜的

陳屍街頭，羣情激憤。



●來殺吧，殺掉我們一百萬吧，我們是準備死掉一百萬，但要他十萬兇兵作代價，血債要血償！

屠殺裏死了一千多人，市民們，不要忘記他們啊！

能有什麼忘記呢？沒有人會忘記。這是最黑色的一日，最羞耻的一日。在犧牲者中，市民與學生是沒區別的。只是市民們更沒有組織。完全是自發的。憑着反暴政的概念。誰家沒有妻子兒女，兄弟姊妹，親朋好友呢？被政府的子彈扼殺了，還要定一個反革命的罪，連及九族親類。北京的市民已經沒有保留了。在街頭巷尾，我多次聽說，軍隊還要擴大勝利，那麼，來殺吧，殺北京市民，殺掉我們一百萬人，我們還有七百萬人呢。而我們十個人殺死你們一個，你們還有多少呢。我們是準備了一百萬人的死的，但要他們十萬凶兵的死做代價！

我們跑遍了飯店去叫出租車以去機場。沒有人出車。「就算給我兩千塊，我還是不去。沒那個心思。死都放前邊了」。終於妹妹叫了一個朋友的車。使我們告別了北京。這個可愛的，夢一樣的，被魔鬼纏住的北京。實在是一場惡夢。

六·四中德通話

北京血腥屠殺的歷史見證

無萍整理

在「六·四」這個黑日子，西德一些中國人和北京的友好通話，談及城事。由於對方有個保護傘，他們就暢所欲言。

問：你好！你能給我講講北京天安門鎮壓的情況嗎？

答：我覺得這次鎮壓的規模非常大，非常殘酷，非常厲害，很多人，甚至老人、小孩、孕婦，在家裡的一些市民，都被開槍打死、打傷了。

要用鎮壓來保他們的利益和地位

問：他們怎麼能這麼幹呢？

答：現在顧不過這些了，而子上的事已經不管了。現在要通過這些方法和手段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和地位，保他們自己的命。

問：你能不能講點兒聽到的事情？

答：民衆的情緒非常激動，反抗也相當強烈，很多人都出來了。今天早晨十分八點，我上某醫院去，走到五棵松處，剛剛過路口，軍車來了，一邊開，一邊向路邊的行人射擊，當場就有被打死打傷的。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我們幾個嚇得就往醫院裏跑。那時路上基本上是上下班的行人，哪有什麼暴徒！

問：還有什麼暴徒？

答：官方說的情況，和老百姓看到的完全相反。今天中央電視台的兩個播音員播送節目的時候，都穿著黑衣服，眼睛都紅了，報道的時候，聲音非常沙啞，幾乎說不下去了，等於是在向全國和全世界用他們的感情來宣佈這悲慘的事情。

市民能不反抗嗎？

問：我們這邊的學生要組織遊行，但我們缺乏具體的事例來告訴他們。

答：（註：這時換了一個人）據一個目擊者說，學生從天安門撤退的時候，清華大學的十幾個學生走得較晚，在後邊喊口號，後面的坦克開了上來，當場就將五個女學生壓死了。五棵松有個人被壓死了，今天上午那兒過了近一百輛坦克和裝甲車，這個人已被壓成肉醬了，慘不忍睹。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在六部口、西單，把學生、市民輾成肉醬了。市民能不反抗嗎？

問：你們再談吧，我們還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機槍響得如同炒豆一般

答：他們有人看見，一羣學生被驅散後跑到一輛車上。司機說：「我開車送你回去！」這時，防暴警察上來，先把司機打死，接著把所有的學生都打死了。我們學校有一個學生說：昨晚四點（即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上燈全關了，在將大燈打開時，機關槍全架起來了。士兵

許多人表情都呆癡了

剛才最新消息，傍晚在木樨地，直升飛機對着老百姓掃射。據說，打死許多學生，外地的學生死得特別多，也特別慘。天安門那士兵用刺刀挑死了一個懷孕八個月的婦女。有位婦女坐在車裏，就被槍打死了。只要你一露頭，馬上就打。另外，今天，有人到天安門去看，機槍掃射了不少圍觀的羣衆。除了打死那位十四歲的小女孩，還打死一個八歲和一個三歲的小孩。他們在胡同內往角落裏掃射。有的解放軍當時就脫了衣服，說我們不上，當時就走了。有些士兵還得出奇，見人就殺，你說老百姓能不跟他急眼嗎？你想，五棵松的那個小伙子就攔了一下軍車，近百輛軍車就從他身上壓過去了。幾千人看着他的屍體成了肉泥。當時，他的妻子就昏死了過去，他弟弟直到今天還守在他哥哥的肉泥旁邊，人都傻了。我們學校的學生回來後，許多人表情都是呆癡的，臉色鐵青。

學生抬着屍體放在校門口

政法大學的學生從天安門撤退中，抬着屍體，流着眼淚往回撤，他們把屍體放在校門口，寫出橫幅：「血債要用血來還！」師範學院把死者的名單都列出來了，新聞學院死了兩個研究生。新華社記者死了一個。數十人下落不明，醫院人滿為患。

問：現在北京局勢怎樣？老百姓出去了沒有？

答：今天有幾個大連來的士兵，失敗了以後，被羣衆一直追到東方歌舞團的院子裏，他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有的人當時就把肩章撕下來了。東方歌舞團的人還對他們不錯，把大門關上，把市民給隔開了。問他們：「你們打槍了沒有？」他們說：「沒有，我們是從大連來的，出發時，說北京發生了暴亂，讓我們來鎮壓。」他們還說，二十七軍的裝甲車衝着他們，把他們的車撞倒了。當時死了兩個戰士，一個市民。二十七軍的裝甲車在木樨地瘋子般開，最後撞在水泥桿上，把車都撞壞了，他們自己把車燒了，然後嫁禍老百姓。公主墳那裏槍聲的最激烈，今天有人看到，地上一灘灘的血。牆上都是彈孔，有的

彈孔有巴掌大。你說打着人能不死嗎？有多少人親眼看見，同胞們在自己身邊倒下，有的被輾成爛泥，還有的老太太罵他們不是人養的。有輛裝甲車撞倒了作路障的汽車，當時就壓死了九個清華大學的學生，像這樣的事根本說不過來。

人民羣衆是忍無可忍了

人民羣衆對二十七軍氣得欲哭無淚，怒火中燒，不知該怎麼辦？但真有不死之身，真有敢跟他們幹的。一些市民把當兵的從裝甲車中拉出來，用木棍就給打死了。另外還有當兵的死也不出來，就連人帶車一塊燒了。人民羣衆是忍無可忍了。

問：你說，我們在國外該作些甚麼來制止他們的暴行？

答：就是要讓全世界都知道事實真相，讓全世界來譴責中國現政府。這個政府簡直太腐敗了，太墮落了，太殘暴了，黑暗到了極點。

問：我們打算把我們通電話的所有內容，盡快地告訴這裡的中國同學，訴諸西德輿論。

答：從天安門廣場撤回來的人說：我們根本就不怕了，憤怒已極。當兵的打我們，我們就用瓶子、棍子，還擊他們，根本想不到怕死。

問：你再往下說。

答：當時，天安門吵成一片，不斷傳來嗚嗚的槍聲。有一個五點鐘最後離開天安門，他說，後來就像炒豆式的，嗚嗚嗚……就這麼橫掃。甚麼朝天朝地，就是平射。還有那些當官的，拿着手槍，喊：「上！上！上！」……

問：明天市民要不要上班？有沒有宣佈甚麼呢？

真正製造動亂的是他們一小撮

答：上甚麼班？沒有辦法上班。真正製造動亂就是他們那一小撮，根本不是老百姓。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動亂。當我們在十七、十八號上街遊行的時候，非常有秩序。原來經常有吵架、打架的事。那幾天根本沒有。天安門廣場上秩序井然，老百姓給學生送水送吃的，各種各樣的飲料堆成了兩座小山。同學們說要甚麼，老百姓馬上就送。從新街口到西單，老百姓都成了網了。市民們非常齊心。政府也承認說五月份是交通事故最低的一個月，好多小偷現在都不偷了。

問：今後局勢怎樣發展？怎樣收場？

答：繼續鎮壓，鎮壓到底，部隊在北京要過冬。

問：好了，你們要小心呀！

答：好的，再見。

三人幫比四人幫更反動 李玉

王、江、張、姚「四人幫」，又稱「上海幫」。其鎮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歷史已作了定論：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被打成「黑後台」的鄧小平，也一起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平了反，證明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鄧小平曾撰文指出：「前幾天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平反，全國各族人民歡欣鼓舞，大大激發了人民羣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羣衆提了些意見應該允許，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這是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收集在《鄧小平文選》裡面。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可能連鄧小平本人也沒有料到，十年之後，他完全背叛了他自己說過的話。或者說，當時講這個話是有意欺騙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欺騙全國人民的，以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鄧小平成了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法西斯集團「三人幫」的頭目。他們三人都是四川人，又可稱作「四川幫」。

四人幫在廣場殺人記錄

「四人幫」鎮壓天安門廣場事件，其總指揮是從上海調來的工人兵頭目馬小六。出動的主要力量是北京工人兵和北京公安局，動用的武器主要是棍棒。

天安門事件的目擊者徐文立有如下記述！

四月四日夜的流血事件：
「我們快步走到與東西交民巷相通的橫街時，這兒已佈滿了警察和「工人兵」，並站成了一道封鎖線：祇許出，不許進。……我們剛走出警戒線，警察、「工人兵」就開始轟我們，一直轟到正陽門下，才

停住。這時聽到紀念碑前的噪雜聲，持續很久。……原來是許多人被打、被抓，花園全部被拉走，一部份拉往郊外，一部份拉進歷史博物館和東南角那座小紅樓的後院裡。最慘的是，許多人仍然圍觀一張「揭貼」（註：即毛批評江青的話），還不十分瞭解自己處於什麼樣的危險之中。這時突然來了一個便衣，讓那位才應大家要求小聲唸這份「揭貼」的人嚷道：「唸啊！唸啊！怎麼不唸了？」那人語塞。便衣們便開始按着這個人的頭往紀念碑上撞，其他便衣警察開始打人抓人，不服者反抗者更是被毒打。青年們的血、無辜者的血第一次真正染紅了紀念碑。」

四月五日的流血事件：

「四四事件」是「四五事件」的導火線。四月五日清晨，羣衆一早來到紀念碑，發現花園全不見了。於是羣衆要求討還花園，接着就有人燒汽車、打警察、燒小樓……一輛廣播車不停地播市長吳德的話，說天安門廣場有極少數反革命份子在煽動，希望大家趕快離開。但沒有人聽他的，廣場越聚越多，大多數在紀念碑前唱歌、唸詩、交談、獻花圈。晚九時許，廣場四周不斷跑出一隊隊軍隊，軍隊在外圍，「工人兵」和警察在內層。他們包圍「人民英雄紀念碑」，警察和「工人兵」揮舞棍棒，於是叫罵聲、慘叫聲不絕於耳。……我們幾個人站在廣場欄杆以外，警察並不理我們，又壯着膽子向中心靠，剛到廣場邊緣，一個五、六十歲的警察大聲道：「有什麼好看的？還不快走！快走！」他見我們倒退幾步又停下，便發火道：「快走！快走！革命的走，革命的留下！」這時，一位身穿綠軍裝的退伍軍人模樣的青年接了茬：「好！咱們走，革命的走，反革命的留下！」以挖苦那位留在廣場的警察是反革命。但他話音剛落，便被警察抓回去，尤其是那位五十多歲的老警察，朝這青年臉、腹，一陣兇狠的拳打腳踢，青年奄奄一息，朝天倒在地。那位老警察仍不甘休，一邊用黑皮鞋亂踩這年輕人的

腹部、胸部，一邊說：「誰是反革命？我叫你說呀，你說呀！」這野蠻人行兇的一幕，在我腦海裡留下永世不忘的印記。」

「四人幫」在四五事件中到底打死多少？徐文立沒有說。他能證實的死者只有一位，那就是「四五」之後江青要追查「謠言」，他所在路段的張師傅因講過江青壞話，忍受不了「反革命」帽子的污辱而上吊自殺的。

三人幫在京城殺人記錄

鄧、楊、李三人幫爲了鎮壓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有北京市內的三萬多武警、便衣警察及一萬多的北京衛戍部隊仍嫌不夠，還要從各省調集約三十五萬的正規軍雲集北京周圍，把中國最現代化的幾個集團軍都投入了。四人幫鎮壓天安門事件還沒有戒嚴，三人幫則實行戒嚴令。戒嚴部隊的總指揮是總參謀長遲浩田上將。整個戰局的指揮則是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家副主席王震上將及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出動幾十萬正規軍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絕對地破世界歷史紀錄。

從徐文立的記述可以看到，「四人幫」殺人主要是靠棍棒打人及皮鞋踢人，沒有記述過聽到有一聲槍響。而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殺人，則是用坦克車、衝鋒槍、機關槍殺人，全港人幾乎都在電視上的現場錄影看到了。六月六日《明報》報導：據中國紅十字會抽樣統計的資料：協和醫院已收到的死者五十人；復興醫院收死者四十多人，傷者四百多人；首都醫院收死者五人，傷者八十多人；同仁醫院收死者二十人，傷者一百多人；廣安醫院收死者二人，傷者四十多人。北京共五十間醫院。統計死者總數超過二千多人，但不包括天安門廣場內遭屠殺的學生。天安門廣場又屠殺多少呢？據六月五日《文匯報》的報導：機關槍掃射二十分鐘，學生推翻坦克往外跑，三千人衝過缺口只剩一千人。也即有二千人死傷在天安門廣場上。（見《天安門廣場大屠殺記——一個倖存大學生的血淚控訴》）

六月六日《文匯報》頭版「本報記者組」寫的特稿則說：「最保守的估計，北京市民、學生以及外地學生，至少已有五、六千人死亡，三萬餘受傷。」

六月七日，又有中國紅十字會的統計，謂死亡人數有七千六百人之數，大學生佔百分之四十。

很明顯，死亡數字還會逐日增加，重傷不治者也將不斷的歸入死亡數字。

動用本國軍隊屠殺本國的和平居民，這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比日本鬼子及德國法西斯還殘忍百倍千倍。尤其這事件又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國際局勢緩和的年代。此外，其撒謊手段也是極卑鄙的，先後兩次向全世界撒謊，一次是六月六日下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以及戒嚴部隊的張工在中南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袁木宣稱「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是：「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人」；「地方上（包括爲非作歹暴徒、圍觀羣衆）共傷二千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是近三百人」，「還有四百名官兵失踪」。「各個大學死亡的大學生共二十三人」。張工則說：「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羣衆，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另一次是六月七日上午，由戒嚴指揮部的指揮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帶領新華社、中新社、中央電視台等內地八家新聞機構參觀天安門廣場，明明是紀念碑上血漬彈痕累累，最下層的三級石頭台階有約一米長的破損，紀念碑前的牢固的鐵旗桿，有兩根折倒在地，這分明是坦克或裝甲車撞毀的，但指揮官劉存康（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立即斷然否認，另一軍官也說廣場沒有死一人。如此彌天大謊，大概連戈培爾也自嘆不如了。這也說明鄧、楊、李三人幫，是古今中外最無耻、最黑暗、最反動的勢力。

鄧爲何與楊、李勾結起來

鄧小平與李鵬原是屬於不同權力派系的人物。當一九八〇年九月趙紫陽取代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之後，陳雲、彭真和鄧穎超就推薦當時已擔任電力工業部部長的李鵬爲副總理，但遭鄧小平拒絕。直至八三年六月，總理、胡、趙體制自覺已非常鞏固，並且有了自己第二、第三、第四梯隊接班人的長遠安排，才與陳雲、彭真作爲權力交換而吸納李

鵬爲副總理，在當時四位副總理中排行末位——萬里、田紀雲、姚依林、李鵬。

從當時這一排列順序來看，李鵬是不大可能接任總理正職的，就像過去許多副總理一樣——如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陳毅、賀龍等，一輩子只能任副總理之職。

李鵬是親蘇派，鄧小平也非常警惕李鵬的冒升。八五年十二月，李鵬曾以「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身份，率團訪問捷克、保加利亞和法國，返國時途經莫斯科而會見了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被鄧小平抓住這個機會狠狠教訓了一頓，指責其未請示中央私會戈氏，使李鵬十分難堪。

可能連鄧小平本人也估計不到，才不到五年時間李鵬就擔任總理之職。不僅如此，還同李鵬、楊尚昆結合起來，向自己的心腹趙紫陽開刀，向一切改革派開刀。實際上，鄧小平是向陳雲和李鵬投降繳械。或者說，鄧小平已成了野心家楊尚昆、李鵬篡黨奪國的幫兇。

鄧小平之所以落得如此，在於他的封建專制心態特別強烈。他自己與時代脫節，却又硬要年輕一代適應他的思想狀態，要求年輕一代削足適履。但任何有志爲中國現代化出力出智的人，任何比較開明的新一代的領導者，都不可能適應鄧小平的要求。這樣，善於拍馬屁的野心家如李鵬之流，就裝得很聽話而博取到鄧小平的歡心。

三人幫政權的前途

鄧、楊、李集團是徹底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權，遭到全中國青年、工人和知識份子以及全世界華人、華裔人的反對，因此，這個政權是不可能前途的。執筆到此的時候，電視螢幕上播放出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官的新聞，這是自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後第一次露面。鄧的露面示意着老鄧仍然控制着大局，仍然是中共最高領導人，他親自下令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已取得基本勝利。陪着鄧露面的，幾乎全數老人黨都出齊了：楊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姚依林、萬里、彭真等，陳雲沒出面，却有賀電。比較年輕的就是李鵬一個，而較年輕又較開明的則一個也

沒有。這說明中國這個十一億總人口的大國，是由一小撮老朽在統治的。而且爲了繼續他們的統治權，不惜屠殺近萬最優秀的中國的大學生和青年工人，並且仍然在不斷逮捕著名的中國知識份子。

但正如中國歷史上每次學生運動一樣，反動政府可以把學生運動鎮壓下去，但不用多久這個壓迫人民的反動政府就隨之垮台或者滅亡。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學生運動，鄧小平把他們鎮壓下去了，才不過兩年多的時間，却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這次學生運動震動了全中國和全世界，振奮了全民族精神。全世界所有華人和華裔人士都來支持這次運動，全世界各國政府都在譴責鄧、楊、李鵬政府。可以預見，不出二三年，或者四年，將會有一個比八九年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學生運動，那時鄧小平不知還有沒有力量來鎮壓？（也許屆時老鄧已不在人世。）極可能的結果是：將導致中共的現行統治制度的滅亡——即一黨專政的滅亡，波蘭式的改革將產生，也即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多黨並存的政黨政治的產生。

中共的老人黨們，你們實在無須高興得太早，你們畢竟老了，行將入木了，老年人總是賽不過年輕人的，未來的世界總是屬於年輕人的。你們的雙手沾滿了年輕人的鮮血，歷史是不會寬恕你們的。鄧、楊、李的血債，必須用鮮血償還。

一九八九·六·九·

南北極月刊 89/6

天安門大屠殺的調查報告

106

· 本報編輯

六月四日的天安門大屠殺，是一場引起世界公憤的野蠻屠殺，但是中共當局至今不承認廣場有學生死亡。官方公布的全城學生死亡數字，一次是袁木說的二十三入，一次是陳希同說的三十六人，均與外界報導相差甚大。

追尋大屠殺的真相，成爲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本報爲此特作了一次廣泛的調查，包括訪問曾採訪過學運的記者和在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的目擊者，以及部分報章資料的摘要。

柴玲（女，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北師大研究生）

帳篷的同學被壓成肉餅

侯德健等人與戒嚴部隊談判後，同學們決定撤離廣場，但軍隊不守信，衝上紀念碑三層台階，把廣播喇叭打成了蜂窩狀。同學們以爲軍隊頂多把大家架走，有些同學太疲勞，還在帳篷裏酣睡，但坦克把他們輾成肉餅。

有人說同學死了二百多，有人說整個廣場死了四千多人，我不知道具體數字，但廣場外圍的工人自治會的指揮人員統計死了，至少有二十至三十人。

士兵壓過帳篷後，脫下棉衣洒上汽油，把同學的屍體統統焚燬，完後用清水洒地，使地上不留痕迹。

就在我們撤走在長安街上時，一輛坦克追上來，放催淚瓦斯，坦克從同學身上壓過去，許多同學找不到完整的屍首，他們永遠永遠地留在長安街上，永遠回不來了。（根據柴玲錄音帶）

吾爾開希（男，北高聯負責人、北師大學生）

那晚死人至少數以千計

我無法具體地說到底有多少人傷亡，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天安門廣場那天晚上死的人至少數以千計，整個血腥鎮壓之中的北京，說死傷數以萬計，絲毫不過份，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四日大屠殺，許多人在廣場上被法西斯軍隊用槍、木棍打得死去，就在送我的那輛救護車上，一個同學頭蓋骨被打碎了，腹部中彈，肚子還在咕咕咕冒血，還有一個穿幻變裝的士兵被打傷了。

很多同學被坦克壓死、輾平，壓死在天安門廣場，很多屍體被一垛垛的堆起來。一個師大科察隊員，親眼看見，同學的屍體被裝進裝起來，堆在一起，放火燒了。清華三個同學手拉坦克，結果三人中彈，死了，坦克從他們身上壓過去。（根據吾爾開希電視講話）

蔡秀霞（女，快報記者）

焚屍的白煙連日不斷

大屠殺開始時，我已從廣場回到了北京飯店，但通宵都沒睡覺。約六點鐘，一位金髮姑娘（路透社記者）跑來我房間，她整晚在廣場，她說親眼見大隊軍人從歷史博物館衝出來，不由分說向學生開槍，有人倒下。學生撤退時，軍人也非常粗暴，以槍柄木棍毆打學生，撤退的學生只知後面的隊伍越走越遠。

同時，我收到電話，說廣場上死了兩三千學生，他親眼見坦克將學生壓成肉餅。

清晨的天安門廣場，我看到厚厚的白煙從地面升到天空，直到午夜，都一直在冒煙，軍隊重重駐守，我們看不清是燒甚麼，不過，我們推測是燒屍體，因爲人體有水份，燒時會冒白煙，野火燒烤肉時，煙也是白色的。那兩天，廣場不斷燒東西，也有冒黑煙的，直升機則不斷在廣場升降，我們看不清，估計也是在將殺人罪証運走。

亞洲週刊（六月十八日）

坦克壓死一排跪下求情的學生

之一：二時四十五分，中央電視台公佈戒嚴部隊的最後通牒。三時三十分侯德健與軍隊談判。四時，廣場燈光突然熄滅，軍隊撤出清場命令。四時三十分，軍方限半小時全部撤走。四時四十分，學生市民開始撤退，信號彈升起，燈光復明，裝甲車向帳篷、軍人持電棍撲向人羣，開槍射擊紀念碑台上的學生。四時五十分，撤離中百人中彈或斃，被坦克、裝甲車壓死。五時左右，軍隊推倒民主女神像。

之二：清場令下後，持衝鋒槍的軍人將廣場四周圍住，軍隊截斷東西長安街，廣場的學生向紀念碑靠攏。四時正廣場熄燈，十幾輛坦克開進廣場，壓碎帳篷，軍隊縮小包圍圈，驅趕學生，學生決定和平撤退，坦克仍快速推進，一排學生跪下求坦克停步，坦克不理，從人羣身上輾過去。

外高聯糾察隊員

幾百個熟睡同學被輾死

正當我們緩緩撤出的時候，後面警察向地上開槍，用木棒打後面的，一些女同學被打得血肉模糊，衣衫襤褸，踩死的人都不知道多少。廣場上有五十多個大帳篷（每個可住三至五人），一百多個小帳篷，當時有幾百個同學睡在裡面，他們太累了，我們來不及喊他們，幾十輛坦克從他們身上壓過去了，帳篷全部壓碎了，坦克還從打死的人身上壓過去。（取材都市周刊）

廣場喋血（東方日報不知名的作者）

坦克把幾名學生捲入履帶下面

六月四日五時十五分，廣場上的人已基本撤出，二十一分，場內除少數人外，全部撤到了場外東側的人行道上，學生糾察隊撤後，徐徐撤向門路北的安全帶，軍隊、防暴警察和裝甲車則步步緊逼，氣勢洶洶。有幾部裝甲車在場內橫衝直闖，將地面的帳篷和那少數幾名學生一齊捲入了巨大的履帶下面，其行令人髮指。場內人員撤到安全地帶後，十多輛裝甲車，配合軍隊又向南衝來，軍隊開槍射擊。

文匯報記者（男）

內部承認廣場有死人

當天我在廣場，但沒有留到最後。但我相信清場殺了人的，多位目擊者的證詞不約而同，我們做新聞，有三個不同來源的消息相同，就可以報導。天安門屠殺何止三個來源？

官方說法矛盾，也是一個旁證，袁木和張工說法不一樣，日本記者的照片（見本期三頁）出來後，袁木又說要調查。紀念碑台階上有不少彈孔，是開槍的證明。據說，大陸內部有傳言，說廣場死人有的，但沒有外界傳的那樣多。

聽說西德有片子拍到屠殺。中國軍方一定拍得有實況，等到內部矛盾嚴重時，他們就會以此爲證據攻擊對方，那時就可能真相大白，否則，可能永遠不知道。

南華早報記者（男）

槍聲不斷而且密集

我估計的總死亡人數是三千人，廣場一千多人。當然，沒有確實證據。廣場上殺人的時間在六月四日四點半至五點半之間，當時，能作見證者，多是文字記者，故照片難見到。我在廣場採訪至兩點鐘，返回北京飯店，但通宵都在觀察廣場，四點至五點廣場上槍聲不斷，且很密集。爲甚麼要在廣場殺那麼多人？一是當局已決心要用一次屠殺來證明它的權威，以威脅鬧事者，讓他們不再鬧；二是軍人一路殺進來，已失去理智、心情緊張，可以隨便開槍殺人。

上千具屍體如何處理？我相信一部分是當場燒掉，一部分運走。

英文虎報的前記者（女）

柴玲講的情況沒錯

我認爲柴玲講的帳篷中有學生睡覺是可能的。我是五月底回到香港的。在北京採訪時已知道學生已不止一日處於緊張狀態，戒嚴令下之後，隨時準備軍隊衝進廣場，因此，他們已習慣於在吵鬧中入睡。六月一日以後，晚間都有敵情，但誰都不知道甚麼時候會真的「狼來了」。有人問如果學生早撤了，這場屠殺是否可以避免？我認爲不可以，因爲當局已定了方針，你二十八日撤，他也要在二十七日來一次「清場」，殺幾個人顯權威。

劉賓雁（中國作家、記者）

廣場死人不會超過幾百人

天安門大屠殺的人數，我是根據報導得出的，我相信全市的死亡數在二千六百至三千人之間，廣場上死人不會超過幾百名。很多報紙都報導了軍隊在廣場上架設機槍，射殺了不少人。我知道南開大學就死了幾十人。

集體屠殺幾百人，屍體如何處理？不排除焚屍的可能。紐約時報克羅斯多夫的報導，我已留意到。沒有殺人是不可可能的。只要殺了人，具體數字並不是很重要的。

信報（六月五日）

軍隊一邊殺人一邊狂笑

來自北京的可靠消息來源說，六月四日解放軍坦克、裝甲車衝進天安門廣場後，成批的學生在帳篷中被碾死。僅北師大就有一千人遇害，北大至少一百人遇害，廣場靜坐的外地學生幾乎全部遇害，約幾千人。

目擊者說，解放軍已完全殺紅了眼，見人就殺。內行人表示，這些士兵像是服了某種藥物，神情瘋狂，滿臉通紅，一邊殺人，一邊狂笑。

消息人士說，四日凌晨到黃昏整整十多個小時，廣場黃烟滾滾，解放軍就地燒毀了幾千具屍體和帳篷等雜物。

美國駐北京研究人員（女）

估計廣場死人不多

我大約在四號凌晨五點左右，和學生們一道撤退的，當時，並沒有見到大隊軍人和坦克進入廣場，我可以說，學生都撤走了，沒有留下，其他人是否留下，我沒有看到，有的話也不多。至於我走後，是否又有人進來被槍殺，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從木樨地到天安門這一路是死了不少人。撤離廣場之後，也有槍擊學生隊伍的。我從復興、協和等三家醫院得到的死亡人數達五、六百人。

我聽說，好像軍隊接到過命令，進軍路上可以不惜手段，但到了廣場不准朝學生開槍。柴玲說帳篷中有人睡覺，這我不信。當時那樣吵鬧，怎麼可能還有那樣多人在帳篷中安睡？



劉忠繼（台視記者）

徐宗懋在撤退時被打傷

兩點五十分，部隊陸續進入天安門廣場，部隊解決了圍在自由女神旁的自治工聯的工人，近一千人被槍擊倒在地，坦克開進去碾平這一部分，死狀極慘。然後，侯德健、王丹、李路跟被嚴密指揮官談判，學生決定撤退。

當時約有三千人，沿東南角一個小出口退出，走得不快，有些人不願撤。五點半槍聲大作，學生幹部後來向我證實，時間未到，部隊就開槍射殺後面的人，不願走和走得慢的學生，大多被殺了。

東南角的武警部隊再用鐵棍追打撤退的人羣，有五六百人躺下，徐宗懋就是在這時被打傷的。（取材自新聞週刊）

李廷勇（華視記者）

一百五十人敢死隊被槍殺

四日凌晨，我們看到裝甲車開到廣場，預感到有大事發生，我們爬到公共廁所頂靜觀其變，不久，數以萬計的軍隊向廣場湧進，佔領了廣場四周，形成包圍。凌晨四點左右，廣場燈突然熄滅，軍隊吶喊，坦克開動，壓死了許多帳篷中的學生。民主女神像被推倒，軍隊逼向紀念碑四週。還有一百五十名學生組成的敢死隊誓死不退，他們還機槍掃射，死得很慘。五六千軍隊繼續往南推進，我們不得不從廁所頂下來，從廁所往外看，軍隊見人就開槍。槍聲稍停時，我們撤退，躲進一間民房，將近四十個小時後才出來。（取材自新聞週刊）

熊玠（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暴民先殺解放軍造成慘案

六月三日、四日在北京飯店。三日深夜，看見街上人山人海，軍人向天安門跑，便回到飯店，上十五樓觀察，見軍人被路人截住追打，聽說向軍隊扔石頭的是勞改犯和暴徒。

四日晨四、五點左右我看到羣衆和軍車衝突，開始軍人忍讓，後來被暴民襲擊打死，才開始掃射人羣。我在飯店看不到廣場的行爲，問了不少留在飯店的記者，關於廣場傷亡的消息，都是來自學生的電話。而官方宣傳只說軍人的死傷，軍車被燒和外報報導相去太遠。

六月十三日美洲中報頭條報導熊玠教授目擊天安門事件，大標題是「暴民先殺解放軍，還擊造成大血案」。

陳若曦（女，美國華裔作家）

熊玠受楊尚昆之託當說客

熊玠新聞不得人心，朋友來電切齒之聲可以割耳。

許多目擊證明，這是一場先鎮後暴的悲劇，熊玠弄錯了一天時間，他說的是六月三日所見。熊玠六月四日凌晨屠城時分，根本不在北京飯店，而是在美國大使李潔明家裏。據說熊玠受楊尚昆之託，於屠城之六月三日午夜至四日凌晨，一直在使館傳話當說客，因此，屠城之時，他應該告辭大使館，坐在楊尚昆家中。

熊玠與楊尚昆的親密友誼，美國華人圈子盡人皆知，我要抗議的是熊玠屠城不在場就不該捏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尼·克里斯托夫（紐約時報駐北京主任）

紀念碑下殺人無確切證據

我和許多目擊者看到軍隊在長安街和天安門附近開槍殺人，但沒有確切證據顯示軍隊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學生開槍。歷史博物館上架了機槍，我也未見到。

但各目擊者都不能肯定廣場中央沒有任何人被殺。可能仍有一些工人和學生留下，但不會多於數十人，也可能有人留在帳篷裏被碾死，但數目也不會多。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八九年六月五日）

清場不用半小時，學生無死亡

六月四日一時半戒嚴部隊宣佈「首都今晚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三時左右學生代表表示願意撤退，四時半宣佈清場，五時左右，數千名學生離開廣場，少數學生堅持不走，武警戰士強制他們離開，五時半清場完畢，靜坐學生沒有死一人。

大屠殺之後

林東生

記六月四日之所見所聞

人民廣場變屠場

六月三日晚十時，我離開天安門廣場。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決定；但也是我攝影生涯中最大的損失，我避過了這晚的血腥大屠殺。

六月三日下午，我拍攝新華門的衝突，吸進了一些催淚瓦斯，一直頭痛和非常疲倦；加上當夜天安門熱鬧和平，聚集的人羣接近百萬，我判斷共軍不會強行進城，因為市民已經再次警惕起來，如強行進城，必定有傷亡。我想當局不敢這樣做，所以決定回旅館休息。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幸運。

六月四日上午七時許，我特約的計程車司機氣急敗壞的推門進來，神色倉皇的說：「不要去了！天安門的學生出事了。昨夜部隊開槍，打死了許多人。」

驚聞此語，我面色大變，我說一定要去看一看，司機推說沒有開車來。結果我坐在他的自行車尾座出發。那朝天色陰暗，街上蕭條冷落，車輛幾乎絕跡，只有稀疏的自行車穿梭於灰色的街道上，出門不久，看見一個婦人在路邊痛哭，她身旁欄杆上的「維護安定團結」的標語被撕碎，我心中一沉，知道已發生嚴重事故。

沿途都見行人三三兩兩，交頭接耳，顯然在傳講一些重要事情，來到王府井大街的百貨大樓前，司機不肯再走，我決定步行前往，這時我看見一羣手持木棒的大漢，魚貫登上一輛旅遊巴士，不知是甚麼人，司機說：「這都是便衣公安，正在撤退。」

我沿王府井大街向南走，不到十分鐘，就來到東長安街口，看見幾輛被焚毀的巴士，有些還在燃燒，其中一輛車身上寫著：廣場，人民的廣場！血債！血債！

這一帶的人羣，明顯較昨日大量減少，看看鄰近的北京飯店，全部開門都關起，無人進出，債常在門口兜生意的計程車司機，一個也看不見。我踏著碎石破玻璃，沿東長安街往西行，來到南池子街口，就不敢再往前走，因為這裡是最前線了；朝天安門那邊望去，約一百公尺之遙，密密麻麻的，黑壓壓的，一字型的排列了一羣軍人，一律戴鋼盔，有些手持木棒，有些手持衝鋒槍，背後還有幾輛坦克，上面也擠滿了軍人。雖然隔得很遠，仍覺殺氣騰騰。

羣眾怒罵廿七軍是畜牲

這是二十七軍，拍吧。身旁一男子輕聲對我說。我

躲在他身後，拍了幾幀。心裡有點慌。這時後面陸續來了一羣人。人多壯，羣眾緩緩向前推進。有人帶頭喊：「畜牲！畜牲！」其他人立即附和，都朝軍隊喊：「畜牲！畜牲！」我跟著羣眾向前走，一步一驚心。走不了幾步，突然一批持武器的軍人向我們衝來。我來不及拍照，慌忙往後跑。其他人亦爭相走避。但軍人追到一半，忽然又往後跑。隔了幾分鐘無事，羣眾又再向軍隊逼近。繼續罵他們，但每一個人手上，都沒有任何武器，連一塊磚頭也沒有。

我再度舉起相機，忽然身旁一個男子，隻身朝軍隊走去，旁人立即勸說：「別過去！別過去！」但那男子置若罔聞，仍然一步一步往軍隊走去，這簡直形同自殺！我舉起相機，雙手顫抖，我知道，我即時拍到一個人被槍殺的鏡頭；也許這人就是要自我犧牲，尋求血證。那男子走到軍隊前面不遠，單腿跪下，舉起相機，似乎要拍照，就在這一刻，大批軍人朝我們衝過來，我大驚，忘記了拍照，回身就跑。不知那人遭到甚麼惡運。我躲進街角，幾分鐘後，那人滿身鮮血，步履維艱的走回來，幾個市民立即攙扶着他，但見這人神色自若，左手舉起一張記者證，右手仍握著相機，都已沾了鮮血！真是勇敢的記者！

我想：大陸記者真可憐，他們一直被嚴密控制，有時甚至被迫做假消息。這記者身受重傷，還要拿著記者證。也許是要告訴市民，記者也有不畏強權的。這時我深知拍照危險，於是躲進南池子大街，不敢隨便走到長安街口。不久，忽聽一輪機關槍聲，接一聲隆隆巨響。從南池子城牆望出去，見一輛麵包車撞在路中心交通指揮亭上。旁人說，有人企圖開車撞向那羣刺子手，不幸被射殺，車子半途撞毀。我想市民真是恨透軍隊了，這種自殺式的報復，恐怕死的人要更多。

打死羣眾打死孕婦

我深知圍觀軍隊十分危險，於是退入南池子大街的安全位置，一直在觀察，但聽得長安街不時傳來機關槍聲，一批一批的市民退回來，但更多的人又擁上去，這些人難道不怕死？又是一陣槍聲，一羣人又逃出來。過了不久，忽然一輛木板三輪車，急駛而來，車上躺着一個滿身鮮血的男子，看來已死亡，我大驚！竟忘了拍照；驚惶未定，又看見一個用血衣裹頭的男子騎別人單車尾走過，一片血淋淋，此情此景，使我胆戰心驚。驚魂甫定，又覺槍聲已停。我冒險走到南池子城牆下，看見地上一大灘血，周圍連拉圾桶、城牆都彈痕累累，顯然曾遭亂槍掃射。光天化日，照樣開槍殺人。這是甚麼世界！

為安全計，我決定離開。回程不斷聽到市民的耳語，大致知道昨夜大屠殺的概況，心中悲憤莫名。這一個上午，我所看見的，我所聽見的，我簡直無法相信是真的，我是否活在一個惡夢當中。

「他們連血車都封鎖，不讓輸血救人，你們最好到醫院去，看看是否需要捐血。」一個騎車的青年對羣眾說。

「一家三口都給打死了，真可憐！」

「新華門那邊，打死了一個孕婦。」

「士兵殺人後還笑呵呵呢？好像瘋子一樣。」

「他們用刺刀把小孩子挑上空中，還在狂笑呢，真像南京大屠殺。」

這些恐怖的話，聽得我毛骨悚然。我的心一直往下沉。我趕忙僱了輛三輪車，逃回旅館。

看電視，不斷播出戒嚴部隊緊急通告，內容已記不清，只記得一句：「所謂血洗天安門，全屬謠言。」真是不打自招。

聽到吾爾開希消息

在旅館呆的過了兩個小時，情緒稍定，我再步到街上，旅館位於安定門區，這裡非軍隊進軍路線，一向平靜無事。這時下午四時左右，天正下雨，天色昏黑，行人絕跡，偶爾幾輛救傷車疾馳而過，平日熱鬧非常的京城，如今一片愁雲慘霧，籠罩在恐怖悲慘的氣氛中。我看見一間商店門口，幾個人正在竊竊私語。於是趨前詢問有甚麼消息。誰知一人反問：「你哪裡的？」我答道廣東來的！他說：「你不要多事，甚麼地方也別去，快回家。」我看他一面憂慮驚恐，唯有離開。

大雨在黃昏時降了，路人漸多。我來到安定門大橋，但是許多市民東一堆、西一團的，交頭接耳，料想一定在談論天安門事件，所以趨前聆聽。

其中一個廿來歲的女孩子說：「我昨夜一點多鐘才離開天安門廣場，那時已子彈橫飛，都是伏在地上爬出來的。」

「學生死的很多，太可憐了。」

「有些女學生跪下向軍人求情，也給他們用刺刀挑死。」

「吾爾開希也死了嗎？」一個少女問。

「吾爾開希也死了，是給士兵用刺刀挑死的。」

「啊！這能幹的孩子也死了，太可惜呀！」許多

人掉下眼淚。（編按：吾爾開希是否死了未經證實。）

我不忍再聽下去，含淚而回。

這一夜，在惡夢中度過，感情上仍然無法接受大屠殺的事實。

學生不怕死勇敢抗軍警

好不容易捱到天明。我僱了一輛三輪車，到海澱區去找朋友。路上幾乎沒有任何機動車輛，三輪車幾乎成了唯一交通工具。海澱區是大學區，沿途看見幾間大學

，例如中央民族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都在大門口上掛了一個巨型的寫字，民族學院更豎起一幅標語：向大屠殺死難的烈士致敬！沿途看見一些大學生，臂上都纏了黑布，有些則掛了白花。大學區完全沉浸在一片哀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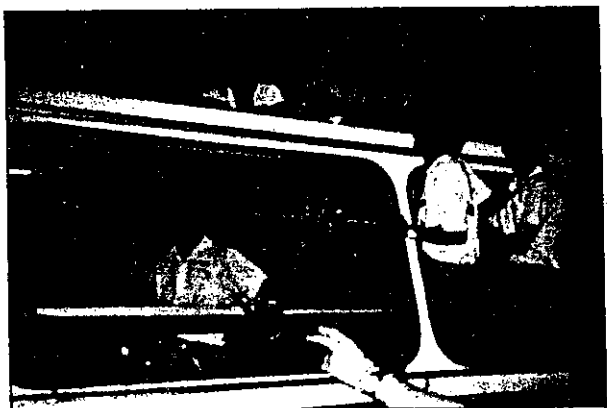
朋友住在北大附近，那房子住了三個大學生，都是我認識的，他們都有參與學運，我很擔心其安全。結果三個人中兩人失蹤，剩下那一個受了傷。他說：「我是最後撤出來的一批，我也不知怎樣活過來。我親眼看見裝甲車壓死十多個同學，我氣得瘋了，我用磚頭扔那車，車子衝過來我也不跑，當時我也不打算活了。」

「他們不但開槍，還放毒瓦斯，不是催淚瓦斯，那是黃色的，其中一個打到我身旁，我拾起又擲回去。」我看看這個來自山東的大學生，毫不畏死的樣子，難怪說他多慷慨悲歌之士，北方大學生特別勇敢。但我仍勸他別再作無謂犧牲。

朋友說這一帶很危險，聽說軍隊馬上要開進大學，許多大學生都已疏散。朋友一家五口，有老有嫩，每人都一面恐懼之色。他的女兒還在唸中學。她說勉強上了半天課，就停學了，老師都沒有心情。中小學大都停課了。朋友說：我不會讓女兒考大學。

有人問我：聯合國能夠幫助我們嗎？我低頭不答，心想：聯合國有什麼用？

朋友紛紛勸我趕快離開北京，這時我也開始恐懼起來，於是匆匆告別這家人。我當然可以離開，但北京幾百萬善良的老百姓，以後的日子怎過呢？惶惶不可終日，對未來感到絕望，無奈又無奈，我心如刀割，帶著萬千的悲哀，踏上逃亡之路。



六月三日黃昏學生坐巴士遊行慶祝，尚不知大屠殺來臨。

在北京，那血腥的日子

本刊特約記者 莫利人



五月二十五日 北京戒嚴進入第六天了，市民生活秩序較穩定。廣場上的學生在是否撤出廣場的問題上仍有不同意見，湧入北京的外地學生仍未減少。下午數以萬計的知識界人士、大專院校師生及外地大中專學生上街遊行，連中共中央黨校的人士也上了街。

五月廿一日，在東京採訪後飛港，由港急飛北京。下機是晚上十點半，北醫的友人接機，請他們直接送我至天安門。

整夜在天安門廣場上，見了廣場現任的總指揮、總財務主任等，了解到有四個軍的部隊將分三路進入城區，他們來自山西、河南、山東、湖南。鄧小平在武漢召開中央軍委緊急會議，十五個將軍宣誓對他效忠。北京市民和學生們已三天三夜未睡，堅守在部隊聚集之地，要求他們不要鎮壓，不要開槍，往後撤。

廣場現場指揮小伙子是中國航空學院學生，曾參加絕食，身體非常虛弱，和我講話時，還吐了幾次清水和口水。他說：「軍人在今晚接到撤退命令，但聽不聽，吃不准，他們多數來自工廠，命令剛下來會執行，但難免也有衝突；二、首都新聞界今天大遊行，要北京市委交代向中央匯報學潮和「請戰」的真相，人民日報記者在遊行示威時高呼：四月二十六日社論不是我們寫的，連標點符號都不是我們摘的。」

廣場上亂、騷，但面對這羣為中國民主獻身的戰士，心裡羨慕：我希望自己再回到學生時代，投入他們的行列。

五月廿二日 今天在靠近廣場的崇文門飯店住下了。去了六里橋。同學被防暴警察打了，但防暴警察也被市民打了，還把他們一百多人關在院子裡，這批防暴警察是為軍隊開路的。

和方勵之通了電話。

在八角村看到軍民相互理解的情景。

五月二十三日 下午在雨中看到全市市民冒雨大遊行——戒嚴令中有一條是不許工人進入學運。直昇飛機不停地在散傳單，李鵬講話遭到新聞單位抵制，只能用傳單來宣傳。

晚上，雨停了，去廣場，只見眾多市民用小三輪送來熱稀飯和薑湯等。一些外地來的學生在紀念碑下領取民衆支援的衣物。

五月二十四日 學生領袖王丹來電話，約我在中午十一時見面，可惜我得到這口信時已晚。和李淑嫻通了電話。

六月一日 中共外交部舉行新聞發佈會，會上再次宣佈限制港、澳、台、外國記者在京的採訪活動，但廣場和大會堂周圍、新華門前仍有很多記者在採訪拍照。民衆、學生積極提供消息。

六月三日 據記者小姬來電，昨晚有不少軍人脫了軍裝，欲闖天安門，被百姓截到光明日報社。這些化了裝的部隊帶有菜刀、尖刀、鋼絲圈和麻袋，讓民衆一眼認出來，民衆與他們口角不斷。

六月四日 昨天深夜開始，部隊血洗天安門廣場，所有進入天安門廣場的部隊都開了槍。二十七軍、三十八軍、二十軍及十五軍（空軍）都有人進入廣場。因血洗天安門時不在廣場，今天我找了很多探訪。和小姬去木樨地，看到大批軍人，看到兩灘鮮血，部隊比平日向前移了二百米。

在六部口的長安街電報大樓處，看到坦克、裝甲車，佈滿了十字路口的部隊。西邊有幾百羣衆默默圍觀，滿臉仇恨。小姬說，二十七軍昨晚由西邊殺了無數人才進入天安門廣場。聽說二十七軍頭子是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總政治部主任）的兒子。凌晨從大同來的二十八軍到達北京，被民衆截在木樨地。二十八軍沒有採取二十七軍的激烈手段，不再前進，退了一公里，退到軍事博物館的大院裡集結。他們為什麼和前進的軍隊二十七軍脫了節？而且二十八軍下三十三輛裝甲車，這些車留在路上，讓百姓燒了？

下午在軍事博物館的鐵大門前，見到無數圍觀的羣衆，人們冒雨在鐵門前訴說昨晚二十七軍的暴行——他們如何血洗天安門，如何殺害無辜的人為討還血債，對着這些軍人罵：「你們是法西斯！」有位五十多歲的老漢在訴說：「當兵的，你們記住，從今以後，再也沒有八、一建軍節之說了！」一個個高個子的兵哭得對着對軍人講：「你們是什麼子弟兵，這樣殺人！」

這些兵默默地在軍車上看着底下的老百姓，有個別的將子彈夾取下，向軍下民衆示意，說：「沒子彈，不會開槍。」有的戰士遭了罵，將帽



人們在質疑，二十八軍裝甲部隊為何棄車而去？是詭計嗎？難道是有意讓民衆燒車，以便加上「暴徒」之罪？有人分析二十八軍和二十七軍不一樣，確實沒有動武的準備，在向天安門進發時，遇到羣衆攔阻，考慮實際狀況，棄車而去。但也有人肯定地說：二十八軍也殺了人。為了血洗天安門廣場，中央十位老人簽了字，在瀋陽軍區中調了三十九、四十軍中的一部分來京。

六月五日 記者和小姬等去政法大學，據學校老師介紹，他們搶回了五具屍體，經辨認，兩具是他們學校的學生。

一具變了形的血肉模糊的屍體，停在主樓大廈上，屍體曾被槍擊中，還被車輪碾過，他穿著褐色夾克衫。學校周圍的居民，三三兩兩到校來認屍。主樓大廈上下兩側的樓梯是：

致 血債血還銘心刻骨
難 慘絕人寰千古奇冤
死 爲

去農業工程學院，他們將拍到的死者照片放大，印成傳單張貼在牆上。一名九歲的女孩被打死後躺在醫院的手推車上；一個青年倒臥在血泊和被碾扁的自行車等物上……

晚上我惡夢聯翩。

六月六日 軍民對峙局面仍極度緊張，為了新聞，仍約小姬上街。很幸運不用騎自行車，××廠的小×給我們找了一輛小麵包車。在車上我拍下人們以白被單寫的「絞死李鵬、楊尚昆」等的橫幅，這橫幅掛在馬路電綫桿上。拍了崇文門一帶燒毀的自行車、公共汽車、坦克等照片。

崇文門這兒仍戒嚴森嚴，停着八輛滿載着軍人的車子，軍車下是頭戴鋼盔、手拿衝鋒槍的解放軍。幾十個穿着白衣的武警，他們發了幾天，今天出場了，他們在幫着軍人對路人呼喝：「快走！好好走！快走！」直升飛機在天上來回盤旋，沒有一家商店開門，連空氣也充滿着血腥味。

自六月四日後，大部份港澳駐京記者都撤了，我還是留下了。天安門四圍都在軍人的包圍中，這些範圍內的大酒店全部空了，整個飯店大樓就我一個人住。

記者小姬幾乎天天來找我，今天他去報館接到一民衆來電：下午集結在軍事博物館的二十八軍和二十七軍發生了激烈的槍戰。軍事博物館的南側是一個剛建的白色大樓，二十七軍的坦克從六部口、木樨地向二十八軍喊話，要接他們進城，二十八軍說沒接到任務，不願動。二十七軍佔領了白樓，監視二十八軍，雙方發生摩擦，槍聲響了很久。這位來電的民衆就住在該地附近。但晚上電視新聞說，一些「暴徒」在白樓裡和解放军對抗。官方的解釋能讓人信嗎？

電視裡播出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袁稱人學生死亡人數二十三名，解放军、市民死亡人數三百多，四百軍人失蹤，受傷軍人兩千，受傷的官兵五千。袁木在電視上神態緊張。

六月七日 長途電話根本打不通，小姬等也



公安呵叱記者採訪

沒來，好害怕！不敢去大街上，只在旅館附近幾條小街上走走。只見有人的地方談的都是誰死了，誰失蹤了，這些軍隊如何「血洗天安門」廣場。沒有交通車，整個城市都似乎毀了。晚上近八點，小姬等送來他們報社的報紙，現在報印了沒人送，等於印了給自己報社裡的人看。北京市委直接控制了北京日報，怪不得該報在保衛李鵬上立了功！

今天又發佈了第八號通告，明確表示要清洗和抓人了。小姬說，早上國家建設局招待所的一位女士向報社打電話說：她招待所來了兩個由齊哈爾出國剛到北京的客人。他們去北京路，打算橫穿長安街，這時坦克車、軍車來了，他們非常小心地等車通過，車過完了，他們過馬

路，這時最後一輛軍車上的軍人先朝天開了幾槍，然後對這兩個齊哈爾人掃射，一個胳膊中了槍，另一個身上和腿上各中了一槍。他們被送進協和醫院，並告訴大家，一位同過馬路的女市民同時中槍，但她被打死了。

這是六月七日北京城裡的又一筆血債。

六月八日 今天，北大學生領袖和幾名記者來看我，都勸我早些離京。我有預訂的六月十一日飛港的機票，但航空公司根本沒人辦公，無法訂位。有人非常同情我，幫我出了一張談業務的證明，再由小姬的好友幫助搞到一張明天由京飛廣州的機票。

六月九日 一早小姬他們就來了，沒有出租汽車，他們幫我租了一輛三輪車，而他們則騎着自行車在後邊跟着。在前往機場民航班車的路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全是頭戴鋼盔、手拿衝鋒槍的解放军。天安門前不能過只能拐道而行。內心無限痛楚，我是可以離開這魔窟了，但這些可愛的朋友們呢？我捨不得他們。

六月九日 1989/7

「六五」「六六」北京街頭見聞

點滴的見聞，匯集起來就是珍貴的證據！

□ 光 魯

六月五日凌晨，北京街頭仍不時傳來槍聲，上午十時，直升飛機不斷從市區上空向廣場飛去，氣氛很緊張，大多數職工不敢上班，有些青年勇敢騎車上班，有的騎車帶着親屬回家。十一時建國門立交橋上，二輛軍用卡車，被坦克撞壞，有一市民被壓，自行車扁毀，橋下有十幾輛軍車和兵士守着。

下午五時見王府井大街無一商店被砸，使館區很平靜。然而在公安部門門前的封鎖線邊，有些市民向軍隊抗議，一名市民被子彈從額頭穿過，周圍的市民立即將其拉到王府井附近的醫院，但已不治。在國安部門前有許多疲憊不堪的士兵，院內有許多傷員。從廣場大廣播中傳來軍隊廣播員的講話聲：「希望市民不要有過激舉動，我們也不想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之後見廣場軍隊在換崗。

五時半，從廣場下來的大約三四個排的士兵組成方隊向永定門方向走去，每到路口不時向空放槍警告，壓陣的士兵不時回身觀望，向尾隨下班的人們上空放槍。行到虎坊橋虎坊路地帶時，兩旁的市民向士兵怒罵，有些市民向前圍去，被這些士兵開槍鎮壓，有位拉平板車的老人被打死，一些人受傷。據悉這些士兵是進攻天安門廣場下來的二十七軍。

晚十時——十二時不時有槍聲響起，十二時半槍聲大作，有一些有武裝的市民與軍隊交火。天安

門廣場的裝甲車向西增援。在東郊化工路方向也響起密集槍聲。據悉，化工學校的學生拿了軍隊武器與軍隊發生衝突。

六月六日，在復興路橋頭有十多輛坦克及三十多輛軍車前天被憤怒的市民、學生砸毀，堵在橋頭，有些被鐵索拴住，連成整體，形成堡壘。往西看去，長達千米的被毀軍隊如同打了一場阻擊戰，有些仍在冒煙，許多人在照相觀看。據悉士兵在前天衝突中也有傷亡。在橋下有座街頭銅塑女性雕像，雙臂舉向天空。臂纏黑紗，腰間白帶來回飄動，基座布滿了鮮花，有個輓聯寫着「含淚飲泣，為死難的大學生、市民、士兵、默哀！」基座上立着一架被卸下的機槍。基座上有被打破的槍眼，許多人在圍觀默哀。殘暴與和平，悲痛與浪漫複雜的交織在一起。

在復興門，又一名抗議的大學生被槍打死，他臂上帶着黑紗，身上臉上被過路的市民用路邊的花草蓋着，由板車拉着，二名勇敢的女記者將其護送往醫院，盼能挽救。她們一邊走一邊告訴路人：「大家不要圍觀，大家知道就行了，不然他們又要開槍了！」在她們身後長隊的騎車人跟在後面，為死去的學生送行。悲壯啊，偉大的人民！多難啊，人民的首都！是誰造成了這樣的慘劇！歷史你應該回答！

六月九日 1989/7

屠城五日記

六月四日 星期日

在飛機上，看窗外下面一大片好江山，想起郭蘭英唱的《我的祖國》：「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鼻子一酸，眼淚流了一臉。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

電訊說，自昨夜開始，軍隊闖入天安門，有坦克，有裝甲車，起碼已死了四十多人。

看在那德機場買的文匯、大公報，文匯全黑印刷。標題說，《建國四十周年，京華竟現大慘劇》。李子誦在頭版刊登署名文章，頌北京懸崖勒馬。自《痛心疾首》社論以來，一直親共的文匯報表現了驚人的愛民風骨。

大公報說，死傷人數逾千。「市民滿腹疑問，究竟誰是人民的罪人」。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手顫抖。

飛機降落停頓後，乘客紛紛起來拿手提行李。前排的一個英國人說，通常這是飛機最吵雜的時候，第一次經歷如此的鴉雀無聲。

過關時，海關人員收起我帶來的香港報紙。他們是留著自看罷。嘲諷地想，若果他們細心地檢查，可能發覺大公、文匯更「反動」。

計程車司機說路都給堵了，去不了市中心。在離開機場的公路上，路旁放了一輛輛連綿不絕的軍車。有軍人在抽煙，有躺在地下睡覺的。司機忽然伸出車外，暴怒的向一個年輕軍人大叫：「你們殺了兩萬多人，回家去罷！」

女服務員爭看香港報紙

酒店的樓面上女孩子爭相看香港報紙。都說：「千萬別到天安門去，路都給封了，他們不管你是否遊客，格殺勿論。」

原預備自酒店走路到友人處，結果找着三輪車。司機開高價，說「這是冒生命危險的」。同意。

北京究竟怎麼了？不是說不會武力鎮壓，不會秋後算賬麼？是發生了內戰麼？

在友人處，突見窗外街上的人紛紛倉惶走避。原來有三十多部軍車開過。人民竟然這麼怕人民子弟兵！

毛孟靜

為什麼不是派出一般的防暴警察？為什麼出動到國防部隊對付自己的人民？為什麼不只是用催淚彈和警棍，而是從坦克、裝甲車開火？

計程車司機用「卑鄙」總括了當今政權。雲一直很低，下午來一場大雨，該可沖掉了一些血跡。黃昏時竟又有夕陽斜照。

北京仍是一貫的灰濛濛。街上仍有自行車。人們說，血洗天安門啦。夜裏四週一片死寂，昨晚的叫嚷狂亂已成歷史，偶爾仍有零星的槍聲和聽來似炮聲的囉囉聲劃過夜空。

你這次時間來錯了

六月五日 星期一

清早聽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國人民書，說若不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全國就會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沒有計程車，又得坐三輪車。每有軍隊開過就跳下車躲在牆後或燈柱後。一個市民問：「你是遊客嗎？怕嗎？你這次時間來錯了。下次再來，北京會好玩點。」

是嗎？流著中國人的血，我可以再以以外來遊客心態遊逛宮、長城嗎？

自小在基本上安定的社會長大，至今未明白動步槍、輕機槍與衝鋒槍的分別。

電視說，「血洗天安門」屬謠言。說血腥鎮壓「得到廣大人民的理解支持」，說「一小撮打砸、搶、燒、殺的暴徒」謀殺綁架士兵，而在場的羣眾「也有人死亡」。

只有疏落的自行車

六月六日 星期二

在友人處接一電話，線路雜亂無比，模糊中只聽到「出事了」、「作反了」。驚愕半分鐘才明白是「廚師」打來的，他解釋他是「做飯的」。沒有報紙，沒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什麼都沒有。聽說是報販或不肯派，或四處仍有路障派不了。新華社一職員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壓力，就是與外地聯絡有點困難。」

坐三輪車，在街上已再無戰慄的感覺，人竟這麼容易習慣環境。又下大雨，三輪車有膠布蓋着，燭得頭昏。掀開膠布一角往外望，只有疏落的自行車在路上走，沒有公共汽車，沒有行人。

晚上看電視，說鄧小平未死。軍部亦出來為內戰之說辯護說二十七軍與三十八軍並未衝突。最驚人的，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正天安門廣場上，無一人壓死或壓傷。

外國人開始「大逃亡」

六月七日 星期三

酒店門外一條長長的坦克車隊，路過時不時向天開槍。躲在燈柱後。一市民說，物價現在很貴，「黃瓜以前六毛錢，昨天買一塊二。肉價？根本買不着肉，沒有價。」

坐三輪車，在後街聽到一輪槍聲，見一外國電視隊躲在樹叢後「偷拍」。抵友人建國門外外國人住宅區，方知軍隊向這方開火。未幾持槍的解放軍包圍整區。臥在地下向英國大使館求救。

對方答曰：無法幫忙。勸我緊閉低頭，遠離窗戶。已麻木，並不真正害怕。

終於有幸得隨法國大使館的保護軍隊離去。官方後來說，有狙擊手由使館區向軍隊「打黑槍」。

在酒店遇烏干達使節太太，驚魂甫定地帶着五個兩歲到十五歲的孩子，說他們在建國門外八樓的家玻璃窗給子彈打破。

外國人開始「大逃亡」。做生意的，觀光的，以後還會回來嗎？民生將如何受影響？

兩隻耳朵塞滿了官方的宣傳口號。常聽的是：「煽惑人心」、「製造混亂」、「駭人聽聞、驚天動地的反革命暴亂」、「不明真相的羣眾」、「暴徒、歹徒」、「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血洗天安門屬謠言」、「暴徒慘無人道、喪心病狂、罪有應得……激起人民極大的憤慨。」

領導人都病了，神經病

六月八日 星期四

電視說軍用直升機運送壓縮餅乾與罐頭、鹹菜，給在場保護北京人民的子弟兵。

昨天看漏了袁木在中央電視台的一幕表演。說到國際制裁，他拍桌子色厲內荏地說：「我們不怕……我們都會頂過去。」

毛澤東將中國大門關起。好不容易捱到了一點開放改革，現在是外國人不來叩門。

晚，與友人聊天，交換笑話。我說前陣子從文匯報看來的，說江青在獄中看到四、二六人民



北京街頭和現實不相稱的口號

把首都建成最清潔、最衛生、最優美的城市。

我強烈感到自己是中國人

六月九日 星期五

人民日報在頭版點名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李卓人，說他承認支持非法工人學生組織，受「教育」後已被釋放。

去機場，有幸乘坐意大利使館的免費包機回港。手持英國護照，一度受法國政府保護，由意大利政府安全撤退。只是，我從未如此強烈感覺自己是中國人。

血洗京華風雲錄

黎加路

(採訪外記)

前言：這個多月中國首都北京爆發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北京市民以至全國部份地區由支持聲援，到主動介入參與，及後當局採取血腥暴力鎮壓，血洗天安門以至接踵下來的屠城行動，震撼了舉國上下，亦令世人齒冷。

記者自四月底，一直留在北京，注視事態發展及採訪報道。

記者看見一幕又一幕悲壯哀歌，他們曾經熱血沸騰，豪情洶湧，對國家抱著殷切期望，他們以血鑄造歷史，歷史在這裡凝固。

記者嘗試通過所見所思，為他們作見證，向千千萬萬傷亡受迫害的中國人致敬。

愛國逃亡

我回來的晚上，深夜致電他，他說情況很危急，是時候行動了。後天吧。他問我明白嗎？我答明白。

今天凌晨我又掛電話，沒人接，然後又不通，很擔心，出事了。

今早他的家人說：他出去了，很快和你見面，又問懂嗎？

他終於離開北京城，像數以千萬計的愛國學生，支持民運的人士。

離開他們曾經滿懷希望的國土，南下尋找藏身之所，避開血腥的政治大搜捕。

早一段，國家不濟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政治低氣壓籠罩整個首都，他常捉狹說：「太無意思，死了算了。」

我正是說：「死了不算數，活着可難過。」

不幸言中，該死的沒有死，不該死的像骨牌般一個又一個倒下。

他像千萬萬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在這個民主運動中，毫不猶豫的掉進去，為這偉大事業加把勁。

生在軍隊家庭，家教本來很嚴，但他的姊姊、姊夫本來不理政治，也晝夜夜出的到各大路口，幫忙設路障堵軍車。

他的一個朋友更從部隊溜回北京，就是為了看事態發展，看看可以幫忙什麼。

四月二十二日，數以十萬計學生靜坐天安門廣場，要求見李鵬，要求平反胡耀邦，情況一度混亂，他為了營救一名被憤怒羣眾圍困的官兵，自動提出作中間傳話人，在學生代表、治喪辦之間，幫忙聯絡傳訊。

絕食行動開始，學生希望把紅十字會的聲明發放出國外，剛巧遇上他，他義不容辭又找着渠道發放出去。

之後，那一個通向香港的渠道，便成了學生對外聯繫的其中一環，除了成為學生代表通話處；知識分子，以至政府內同情學生運動的人士，也利用來接觸學生，及互通消息。但基本上，只是提供通訊設備。

到學生停止絕食後，他們的任務也告終。北京戒嚴令頒下來，人心惶惶，他開始安排他海外的朋友離去，因他們已被定性為「一小撮支持動亂的海外勢力」。

他們像理想主義的大學生，對國家寄予無限希望的老百姓，從沒想到軍隊真的會開槍，他們以為極其量，便是用警棍毆打，哄他們，抬他們出廣場。

更沒想到的是軍隊用的是致人於死的「爆炸子彈」，並有計劃地堵死廣場，企圖殲滅全部倡民主的種子。

六月三日，六月四日凌晨大屠殺，接着下來數天，白天軍隊也向喊「李鵬下台」口號的人羣放槍，晚上鄰近天安門廣場一帶的長安大街，如同鬼域，軍車、坦克不斷開出掃射人羣，到六月六日凌晨，更升級為抓路人，追捕路人「正法」槍斃。

六月七日市面平靜，軍隊沒有再向人羣亂開槍，但羣眾知道另一階段鎮壓馬上就開始。

果然，六月八日消息傳來當局要進駐高校集結區——海澱區，中關村。

六月九日，更傳出軍隊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抓人。第二輪的鎮壓開始了——當局將抓民運分子，進行政治迫害。死的已經死了，生者將如何活下去？

軍事政變？

派系鬥爭？

日前，不斷有消息傳來什麼軍打什麼軍，軍隊幹起來，正義之師勝了等。

又傳出「李鵬下台」、「鄧小平死了」、「李鵬中槍」等消息。

截至六月六日記者離開北京前，記者都認為上述消息不太準確。

事實上，戒嚴令，以至屠殺行動後，記者的採訪工作嚴重受阻，但據記者向當地居民求證，如傳得最厲害的木樨地和建國門外，居民都肯定地說槍聲不斷地響，但不覺得這就是等同軍隊互打。

至於「李鵬下台」、「李鵬中槍」，以至「鄧小平去世」，都純屬主觀臆望，加上推敲想像。

當消息傳來，記者會多番求證，但京城較高層次的傳媒工作者，以至於中層領導都未見證實。

事實上，戒嚴令頒佈後，京城消息封鎖得厲害，一是通訊大多被監聽，交通不便，街道滿佈伏兵，根本沒法親自求證。

部份消息渠道，也因局勢緊張嚴峻而沉默下來。

六月九日，鄧小平終於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身份亮相，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謠言不攻自破。

陪同出席的包括李鵬總理、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喬石，其他元老彭真、王震、薄一波、李先念、萬里。

唯獨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胡啓立未見露面。

鄧小平在慰問官兵時，竟為殉難的軍兵默哀，簡直置萬千無辜被殺的老百姓如蟻民，對着以億計雪亮的眼晴撒謊的謊話。

他重申「極少數敵人在搞動亂，並演變成『反革命暴亂』，企圖打倒社會主義，推翻共產黨，建立資本主義國家」。

人民對政府完全失望

同時，中國七大軍區的五個——北京、濟南、南京、瀋陽、廣州發表聲明支持中共中央，並表示，只要中央軍委會一聲令下，他們將全部行動。

蘭州及四川兩個軍區則暫未表態。五大軍區在血腥暴行後首次表態，揭示所謂軍隊內閣，正義之師將拯救老百姓之說，純屬良好的願望。

事實上，面對這非分明的暴行，有良知的軍官都應該竭力反對，或叛變，但目前為止，各軍仍是「忠誠」的捍衛當權者，沒有越雷池半步。

另一方面，面對共同利益，為捍衛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領導頭頭都不哼一聲，毫無異議地合力幹此無恥屠殺勾當。

正如一位國內記者引述他所調查南京大屠殺的數據，對我說：「中國人沒有希望，他們死有餘辜，因為他們認命，甘於被殺，甘於被壓迫，從沒有想過犧牲自己，來拯救他人。」

他舉他調查後的資料說：「幾千名幾萬名中國人眼看同胞一個一個給槍斃，他們有足夠力量反抗，因為起初日本兵只有幾個，但他們沒有反抗，他們不敢。」

屠殺陰魂又向京城的同胞索命，但沒有一個領導，為這種變態行為，犧牲自己，站出來，維護子民，也沒有嘗試反抗，拯救千萬無辜的人。

共產政權決不允許組織產生

一個對改革派非常維護的年青人說：「改革派在妥協，整個政府都要對屠殺負責，他們都是幫兇。」



市民展示催淚彈殼。

人民對政府完全失望，炮彈殺死他們的子弟親友，震碎他們對黨、國家、政府的心。

可能他們真的太天真，他們喊得太厲害，四十年來，從沒有人敢喊共產黨的領導下台，從沒有人敢向權威的黨挑戰，現在竟然有上百萬人，不只是學生，不只是知識分子，還有千萬的羣眾都醒了。

反對聲音響起來，打着「平等」旗號的社會主義政府，根本不能容下反對的聲音，他們心虛，怕數十年來緊抓的江山拱手讓人。

悲哀的是市面平靜了，軍隊鬆懈了，軍兵和市民閒聊，解除了軍隊對教民的可能性，也破滅了人民的一絲幻想。

接著人民極可能在人間蒸發掉，無聲無息的。共產政權深明不可讓民間組織滋長，不可讓反對聲音傳播，他們要牢牢抓住，因這兩樣都直接威脅他們的政權。

國內記者之反抗令人敬佩

真是北京日報的記者，戒嚴令頒佈後，他仍不時來找我，他說報社領導已明令說：李鵬、楊尚昆來講話前，記者上街可以不算帳，之後則肯定算帳，叫他們好自為之。

他說他仍會上街遊行，現在已不是支持學生，這是關係國家，每一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義不容辭。

他很沮喪，說北京日報太不像話，什麼「一個市民、五個學生」支持中共中央的信，全是捏造。北京日報比人民日報還要左。他說要辭職，他不想背着「同流合污」的臭名。

事實上，新成立的中央宣傳領導小組，已著各報緊跟北京日報做法。

之前，北京日報作為北京市委報紙，一直都很保守，在學生進行絕食那段期間，該報負責人每晚都致電人民日報，詢問那條「新聞」作頭條，連多字號，什麼字體，都緊緊依照人民日報。

後來，人民日報也「造反」，該報就成為「正統」官方喉舌。

每次來他都要問我要港報，後來才知道他把激動人心的文件，知識分子的動向剪下來，影印給學生。

國內記者是令人敬佩的，他們在巨大壓力下，根本無法報道事實。

他們亦以身體語言來表會觀衆，六月四日血洗天安門之後，中央電視台的報導員身穿黑服，以報喪的嗓子敘述，頭也不抬，而且不斷提醒觀衆那些都是軍方，軍委會的消息，意味不是他們採訪得來的。

國際廣播台的記者更大膽的在新聞報導結尾時，說「歷史將永遠記住六月四日」，然後他宣佈默哀，雖然迅速有人更正，但這現場播音，已被外國錄音向外傳播，而全國人民也意會到六月四日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也奮力突破，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報紙，頭版下角，有一段消息，標題是「黑黑黑黑黑」，「五月三十日天安門即景」，誰也不會錯過這斗膽的內容。

內文紀錄了有一個「民主之神」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並客觀地說在戒嚴令下，紀念碑台階上仍可見到外國記者的攝影架。

該段消息沒有加上記者的態度，但報導出來，如實地呈現，已間接表示了他們的態度。

六月三日的白天，軍警在新華門及西單六部口附近打人，我們到達新華門時，爲二時許，軍警剛放完催淚彈，軍隊和市民對峙，學生站在中間，不讓市民動武。除了這天，市民、學生一直是和平的，他們理智地以身體保護軍警，稍有異動，他們便大喊勸止「不要打人」，「非暴力」。

但當天中午，情況開始稍稍改變，人民都變得很激動，因爲軍隊毆打老翁小孩，不過基本上人民仍是節制的。

六月三日晚上記者分批到廣場附近巡察，大批軍隊到達，人羣亂哄哄，軍隊向人羣開槍，人們不敢相信，嚇得尖叫，呆著的流淚，說：「軍隊真的開槍了！」我們隨著人羣伏下狂奔，流彈在兩旁擦過，背後响起哭喊聲。

文字記者在凌晨前回到北京飯店發稿，部分電視台記者，在廣場附近找到安全點避難。

部分國內記者留駐廣場附近，其他居住在外圍飯店的記者，也同仇敵愾地齊心合作採訪，互通聲氣。

電話不停地响，廣場的消息，外圍的消息不斷傳來，回來報告消息，發完稿又趕快下樓查看。

人民軍隊變成禽獸

我們伏在陽台地，以望遠鏡，長鏡輪番當值觀看廣

場的情況，除紀念碑附近被歷史博物館擋去視線，其餘大致都看到。

我們聽見隆隆聲的坦克部隊自東郊趕來，把石廠路陣變成粉末，我們看見羣衆像螞蟥一個一個倒地，羣衆四散，然後是勇敢的互不相識的羣衆奮力以三輪木板車拉來，送他們入院，前面是自行車哭喊著開路。

我們看見亂槍掃射的火光，聽見密如雨下的槍聲，慘絕人寰的哭喊聲，人民軍隊變成禽獸，槍口對著沒有還擊力，也不會還擊的老百姓。

子彈對著我們開發，誤中隔壁的窗戶，玻璃鏗鏘碎裂，猶如萬顆人民的心。

市民把受傷的學生抱回家，把奄奄一息的屍體抬回家收藏，不敢送到醫院。女學生脫下衣服爲同伴裹傷口，說得不能再說了。

醫院護理人員說：六月五日才陸續收到更多的傷亡者，市民太好了。但他們不敢把學生送出來。直至屠殺翌日，這另一方面，重傷的也就無法活過來。

光天化日，勇敢的市民，仍是一波又一波的湧向廣場，喊「李鵬下台」，機關槍一輪掃射，倒下血泊的給人抬走，另一批不畏死的人又圍過去。

不惜以「二十萬人的生命來換回二十年的太平」，原來不是謠言，領導層有人欲以屠殺來制止聲音，堵塞子民的口。

藍天之下，直升機在盤旋，撿起一袋又一袋的血腥罪證，軍隊拼命洗刷廣場的血漬。

有人抬著屍體，經過王府井大街，一個用碎花布覆蓋，一個用藍布掩埋，天空不再是藍色，一切的事物只有一個顏色，都染著血紅。

人羣憤怒放火燒軍車

我們四個人，急促地走著，一邊走一邊四處望，有的圍著當中的攝影記者，保護他的拍照，他相機也不抬，放在胸前，「卡擦」一下，馬上離去。

行至單東，有數輛軍車開進，人羣亡命地逃，我們手拉手，衝進第一條胡同，怎料是死巷，欲衝進一個小劇院，暫避，裏面的人馬上關門，推我們出去，我的腿被夾住。

我們迅速躲在樹後，幸好軍車拐過燒焦的公共車，畢直駛去，人們才鬆一口氣。

軍隊胡亂開槍，便衣公安也一樣，我們都不敢停留，但外地的市民，在燒焦車堆面前留影。

路口是燒焦的汽車，是憤怒人羣放火燒的。路旁的大樹被坦克裝甲車連根拔起倒地。

人羣設置的路障，被數十輛的坦克碾過，鐵閘扭曲，石墩成了粉末，馬路裂開，裏面全碎了。根本承受不了坦克沉重的壓力。

據說每開動一部坦克，要花二萬人民幣，等同發動一架飛機的燃料。

建國門附近，十多輛軍車被燒，有人說軍隊不願前進，自己燒的，有人說是羣衆燒的。

濃濃黑漆的煙霧籠罩大半個天空。

軍隊在橋下站崗，三三兩兩市民騎自行車在橋上穿過，部分人士駐足隔遠眺望，低聲議論局勢。

馬路邊都被裝甲車撞成凹凸不平的齒角，牆壁可見彈孔。

王府井與長安街交叉點的豎立招牌，被砲火燒成黑焦。

商店都關了，原先熙攘的王府井大街，空無車輛，只有一堆木牌放在路中央，上書「血債要用血來償」。

我們來到協和醫院，大門不讓進，溜到停屍間，醫院工作人員低聲說屍體太多，怕要腐爛；手術室一邊放手術搶救，另一張床堆滿了傷者，希望不大的傷者。

他說：沒有收到廣場來的傷亡者，恐怕都被軍隊處理淨盡。

他們收到的都是逃出來，或是在外圍被殺傷的，軍隊沒有送過傷者來。

軍隊來過，都是問有沒有收到廣場死傷者，他說：軍隊要滅口。

沒法聲淚俱下整理目睹慘象

事實上，軍隊已下達文件，說日內軍管醫院，醫院基於人道，都盡快搶救傷者，送他們走，又或匿藏他們醫治，不過人太多了，有點無能為力。

我們看見有市民來領屍，屍體用舊碎花布床單裹著，上蓋紙皮，市民踏著三輪大板車來，把屍體平躺在上面，他問車四在車房，記者迫前要求跟去，他沉默哀傷的擺擺手，想必是受死者家屬所託，來領屍的好心人。

醫院工作人員說：六月四日大屠殺後，軍隊都處理了死傷者。

負傷逃出來的學生對他們哭訴：士兵把傷者拋進軍車，不知送到哪裡。

死者則被推進膠袋，以帆布覆蓋，有些已被坦克輾壓成漿；士兵又架起鐵架，把屍體焚燒，直升機竟在廣場升降，就是要把殘骸清理。

至此，記者哽咽，聽者掩面，無法繼續下去。

回來之後，朋友拉我到座談會，講目擊記，記者平靜下來，略去驚心動魄的畫面。

我們是逃兵

香港記者被逼撤離北京

「再見，我們很快便回來。」

我緊握著K的手，他點頭微笑，說：「對，很快回來。」

W拍了我的膊頭，還調侃地唱了一句《大約在冬季》，他說：「沒有我的時候，你要自己保重。」我苦笑，其實我的心情都異常難受。那天是六月六日，早上七時，最後一批香港記者撤離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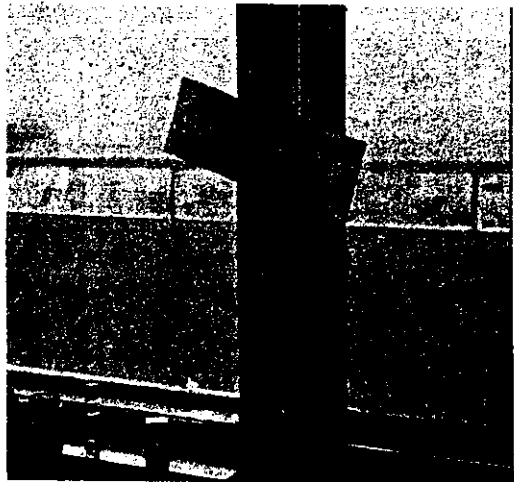
K和W都是香港某左報駐京記者，因北京局勢嚴峻，他們駐京辦事處所在地北京飯店，極可能隨時被軍管，香港總社決定暫時停止北京採訪活動，令他們回港。我最擔心他們，香港記者都是持回鄉證，遇上政治突變，可以回港躲避，國內人則最易被禁出境，或受到其他無理待遇、迫害。尤其學運後期，他們都豁出去，大幅報道。

六月六日凌晨，文匯報香港總社，下令該報駐京記者立即回港，該報記者聽到消息，拿著電話筒，便已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事實上，學運後期，可供內銷的文匯、大公以及可訂的明報，已被內部點名，涉嫌煽動「動亂」。

國難當前，為什麼香港記者要撤？

六月三日晚上，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以至北京市區發生大屠殺事件。香港記者都趕站崗位，盡量第一時間發佈消息。

然而，目睹這場血腥法西斯暴行，記者的心全都被震碎。六月四日早上七時，槍聲稀稀了，我們呆坐在酒店房間的地板上，手在哆嗦，腦子一片渾亂。



■六月五日，北京飯店通到陽台的窗戶被封（圖）。從陽台俯瞰可眺望長安街及廣場情景。

電話不停地響，香港各大報章，要求記者盡快寫特稿，分析評論文章，以至最新發展。

我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心力交瘁，無淚且無言，心都死了。

鐵一般事實，政府亂槍屠殺老百姓學生，我們無法分析，也不願意為他找原因，明明白白的是無恥勾當。六月五日上午，整個北京飯店亂哄哄，記者串連通消息，說何時有飛機，記者奔走勸說不願撤離的記者。有些女記者含著淚要求同行離去。第一批港記於六月五日下午離去，僅餘部份留下。當日下午五時起，電話一個接一個，機場的記者堅持說他們不走，一定要等到「頑固」擬留下的同業，才一同回去。

「死硬派」答應撤離北京飯店，在場的記者才答應上機。

為離開崗位而難過

六月五日晚，北京飯店服務員進來記者房間，以封條封閉窗戶，不讓記者出去陽台，遠眺天安門廣場的駐軍動向。

晚上傳來解放軍戒嚴部隊進駐了北京飯店西樓的消息。

部份發完稿的記者，經過地下大堂時，都被手持強力電筒的公安人員，在漆黑的大廳中喝住查問。

六月六日凌晨香港消息傳來第一個港人被逮。他是護送香港捐款支持學運的民主派人士：李卓人。

文匯、大公兩報駐京記者徹夜開會，商討應策，兩報香港總社勒令駐京人員回港或撤離。

凌晨一時許，軍隊首次在長安大街追捕路人，並就地槍斃「正法」。那時北京飯店一段長安大街，突然燈滅，數輛吉普車、軍車及裝甲車開至北京飯店正門前停下，我們伏在陽台地上，屏息細聽軍隊動靜，突然有人喊「站住！站住！出來！出來！」



■六月六日，北京機場擠滿心急如焚準備撤離的外僑。

有人嘶喊，似乎被抓，然後槍聲卜卜，活生生的人應聲倒地。

吉普車及一輛裝甲車更追至台基廠，然後是猛撞聲音，有人發出臨死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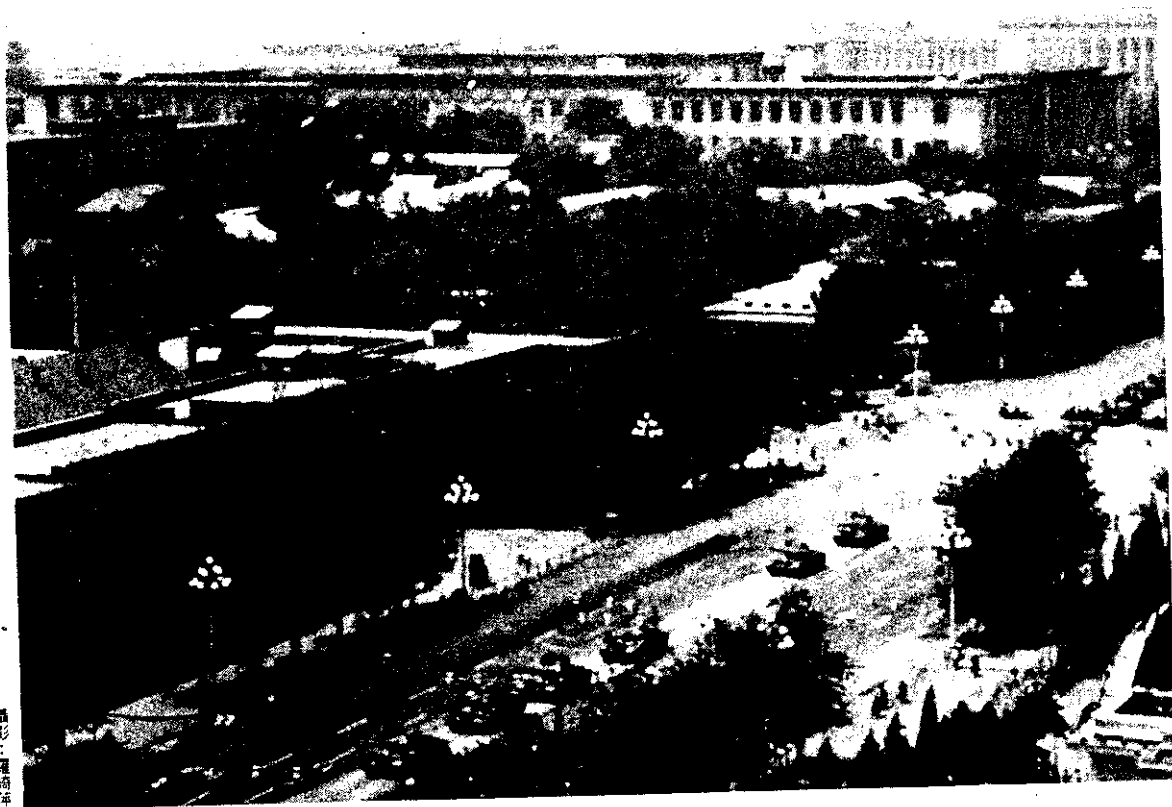
餘下在北京飯店的約十名記者，重估形勢，敵不過報社的壓力，家人的電話哭求，終答應在六月六日全部撤離，僅餘兩份英文報章的駐京記者，部份台灣記者，外國記者。

香港記者離開了動盪的京城，接著下來，他們將如何面對這血脈相連母體的惡化局面？

我為我們離開崗位慚愧及難過，無論是基於何種理由。

寫於六月七日

百姓半月刊 1989/7/1



攝影：羅綺萍

六月五日的長安大街，馬路上只有坦克，沒有汽車。

逃出北京城

林東生

決定由陸路離京

六月四日血洗天安門後，北京人心惶惶，而共產黨胡亂開槍殺人，北京友人都勸我盡快離去，我亦覺事態嚴重，久留可能無補。於是決定六月五日離開北京。

當時我擁有一張六月七日由北京到香港的機票。但我知道機場早已封鎖，乘坐飛機離去，可能要遭海關官員搜查，則我拍攝的底片，有被充公的危險，對我來說，扣留底片，等於奪去半條人命，所以我決定放棄空中路線，改為從陸路離開，無論如何，先離開北京再算。

六月五日上午，我來到北京火車站。原本在車站門口站崗的軍人不見人，進入車站並無困難；我到國際旅客售票處購買晚上到廣州的高鐵票，竟然輕易買到。離開北京時才注意到，軍人都換上便服。

接著我到西苑飯店，把機票退了；但對方只接受退位，不接受退票，沒法取回現款。當時西苑飯店的外國旅客，亦紛紛準備撤退。不少人帶著機票代理處，急欲買票，氣氛緊張。

我回到自己的旅店，收拾行李往火車站。同行還有一對年輕的丹麥夫婦。這兩個丹麥人從莫斯科坐火車，經西伯利亞到北京旅遊，但不幸抵達那天是六月三日。一夜之間，北京變了個恐怖城市，他們甚麼地方都不能去；曾求助丹麥領事館，領事只告訴他們留在酒店，不要外出。我見他們形同坐監，十分可憐，所以決定帶他們一起逃亡。他們亦欣然同意。

火車站擠滿離京人潮

六月五日，整個北京市公共交通仍癱瘓，我們飯店附近連三輪車也沒有。唯一往火車站的方法就是坐地鐵。我較早時往火車站買票，就是坐地鐵去的。但地鐵只是有限通車，而且單向環城而走，沒有對頭車。乘客往往繞一個大圈，才能到目的地。地鐵所以能通車，據說當局有意讓北京的上百萬的流動人口疏散，以免防範其「戒嚴」實施。

我們一行三人，都背著沉重行李，匆匆來到地鐵站，但見人山人海，其中以大學生及外地人為多。列車一進站，人們就蜂擁而上，使本來已擁擠不堪的車廂，見縫插針的擠得水洩不通。列車嚴重超載，以致火車來時，這是極其危險的，萬一有意外，很可能被壓死，空息而死。那兩個年輕的丹麥人，一面驚惶之色，丹麥人口只有五百多萬，小國寡民，恐怕他們一輩子未試過這種擁擠。

兩人頻頻問我甚麼時候到站；但列車員不報站，我視線又被遮擋完全不知停站何方，真是焦急萬分。幸而火車站下車人多，我們僥倖沒有坐過站。

到達火車站：下午三時左右，車站內已擠滿急於離開北京的人潮，進入國際旅客候車室，同樣擁擠，外國人更多。

仍然聽到機槍聲

到廣州的火車開晚上十時半，我見時間尚早，把行李安頓後，獨自一人走出車站，想到前門那邊看看，前門是往天安門廣場的重要通道。離開車站，沿崇文門東大街往右走，經過崇文門西大街，走了差不多一小時，進入前門東大街；氣氛愈來愈緊張，這一帶車輛絕跡，但騎自行車的仍不少，走著，走著，心情愈來愈緊張，忽聽遠處，一排機槍聲響，接著許多人騎自行車自西向東急走。我心知有事，拉著迎面而來的一個行人問：「前門那邊怎麼了？」他也許聽出我的外地口音，反問我：「你是甚麼人？」我說從廣東來旅遊的。他說：「那邊坦克開出來巡邏，見人就打槍，剛才又打中了一個女人，流血很多，你還是不要過去，很危險！」

我面色一變，心想：已經打死那麼多人，為甚麼還要開槍呢？難道要打死所有北京人嗎？

站在路上遲疑了一會，要不要去看呢？終於還是不敢前行，回頭往火車站去。

回到火車站，下午七時許，還有三小時才開車，所以我打算寫一點東西，我走到候車室遠遠一角，坐在地上的寫，文章題目是：大屠殺之後，寫了一會，偶然抬頭一望，一個身穿幹部服的男子正低頭看著我，我心頭一震：難道這是個便衣公安，於是馬上停筆，只見那人笑吟吟的說：「你到哪裡去？我冷得說廣州。那人隨後便離去。」

我寫作的心情，一下子沒有了。

車上談論國是至深夜

好容易捱到晚上十時，我們逃難似的擠到月台，登上火車，才算鬆一口氣。在站台上，我看到幾個大學生，急不及待，向乘客做宣傳工作，控訴當局的暴行。人人都希望盡快離開北京，想不到連列車長也如是，火車竟然提早了兩分鐘開出，這是絕無僅有的事。火車緩緩駛出站台，我憑窗外望，夜色下的北京市，行人絕跡，一片死寂，彷彿鬼域，行車一小時後，在離開保定站之後，眾人才真正鬆一口氣，大家都有一種逃出險境的感覺。

同一臥鋪廂座的是廣州人，其中兩名青年目擊那晚的屠殺。他們說了很多使人心寒的情節。

六月四日零晨三時許，軍隊已包圍天安門廣場一帶，他們退到北京飯店附近，目擊許多死傷者被抬出。一個穿裙子的少女，也許是親人死了，精神大受打擊，竟然獨自緩緩的走向守著天安門的軍隊，結果被當場射殺。

一個司機駕駛著巴士，由馬力撞向軍隊，但被猛烈而密集的衝鋒槍射擊，還未衝到，車頭已被打散，司機當場死亡，但軍人仍然把他的屍體拖下來，用刺刀亂挑洩憤。

他們住在北京協和醫院附近，曾到醫院去觀察，看見許多死的屍體，情況觸目驚心，醫生們也擔心自己的安全，一個醫生說：「我們是無辜的，我們既救學生、市民，也救軍隊；問題是我們知道的太多了。」

當晚協和醫院的救傷車司機也死了幾個。兩名青年對子彈很有研究，他們說除了人所共知的爆炸子彈外，軍隊還用上「捆頭子彈」。這種子彈射到地面或牆壁上，就會向左右橫飛，許多躲在角落的圍觀羣眾，就是被這些流彈所傷。

用上那麼厲害的子彈對付平民百姓，這究竟是什麼軍隊？

我們談論國是至深夜，大家都感到悲傷，最後廣州青年說：「這個國家一定亡！」

這火車上的一夜，我在惡夢中度過，無法安睡。翌晨七時許，丹麥青年從軟臥那邊過來，低聲問我為什麼火車停了幾小時都不走。我一時無法回答。火車停在石家莊以南的一個小站——落後。此後一整天都不再開動。消息傳來，長沙和武漢的鐵路都給羣眾堵截了，武漢長江大橋的鐵軌被撬起，拋進長江。京廣線已完全癱瘓了。

除了我們這一班車外，前面也滯留了許多班列車，使鐵路交通大混亂。停在這裡一天，只有大學生仍然活動，他們下車，在火車站附近向這個小鎮的居民講述北京的真相。最後被便衣公安阻攔，有幾個同學還被警察帶走。火車停了一天一夜，仍沒有開動的消息，於是我便帶同兩丹麥人，兩名新西蘭人下車。打算換乘另一線火車到鄭州。

黨員學生決定退黨

六月七日上午八時，我們一行五人，真像列車大逃亡一樣，強行爬上一列南下的火車。同時換車的還有許多大學生；誰知道這班由北京開往鄭州的火車，上面也坐了許多大學生。

我偶然遇到一個北京工業學院的學生，他也是最後一批從天安門撤出的學生，同樣是死裡逃生，但他看來並無畏懼之意。他說學生決不會罷休，現在大家都轉回家裡去做宣傳工作。

他說自己本來是共產黨員，但已決定退黨，大學生黨員都決定退黨了。這個黨已經沒有希望了。

坐在他對面的，恰巧是個軍人，一個來自秦皇島的年輕海軍，這個軍人對北京屠殺事件本來一無所知；但到北京時，上級告訴他，千萬不要穿軍服。後來到北京車站轉車時，他也不敢把士兵證亮出。事實上，在北京，軍人都不敢穿軍服外出，所謂的軍民關係已崩潰了。

這士兵了解天安門事件後，一面茫然，他說不知該怎麼辦。服從命令是軍人天職，即使打內戰，他也無可奈何。這士兵與死裡逃生的大學生，結成了朋友，我佩服這學生的量度。

鄭州公開大播「美國之音」

到鄭州後，我們一行五人，加入了空前激烈的機票爭奪戰，鄭州彷彿一個孤城，除了往北京，其他鐵路都不通。中外旅客都集中到鄭州，希望坐飛機到香港或廣州。但到香港一星期只有兩班機，到廣州則每天只有一班。但都是容量百餘人的小飛機。

我在酒店、民航售票處、機場候機處都打探過，都說最近幾天的機票全售光。最快也要四天後才有票，我那能等幾天，千方百計，結果是出高價才弄一張第二天到廣州的機票。我付出較原價高二倍的費用，才買到票。

想不到那些售票的人，乘人之危，在這情況下，仍要耍花招來乘機謀私利。大陸官員幹部的不正之風，已達到空前泛濫地步。

這個國家真可悲！我的機票是六月八日到廣州的，上機前，我到鄭州最著名的二七紀念塔參觀，當地大學生在那裡公開哀悼北京死難學生。並且以擴音器廣播美國之音的新聞報導，大膽得很。

在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焦躁不安的乘客，竟爭先恐後，不肯排隊，我想大家都已機票在手，只不過換取登機證而已，還要爭執，真是大難臨頭了。

飛機延遲了二小時，乘客更感不安，直至最後登上飛機，終於凌空而起時，眾人才鬆了一口氣。

神州鉅劫 四海同悲

下午七時許抵達廣州機場，我立即叫計程車到洲頭咀，打算坐夜船回港。的士司機說，這幾天廣州很平靜，但平靜得恐怖。許多人都不敢上街，都傳說軍隊要開進城。他也勸我馬上回港。

在碼頭我遇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一個從蘭州大學撤退的英國教師，他也背著黑紗（那是悼念死難學生），他說蘭州也很緊張，軍隊已開到街上顯示威嚴。沿途我都看見許多緊急撤退的外國人，技術人員和教師。各人都是形色匆匆，愁眉不展。這些來華工作的技術文教人員，大都是對中國有點感情的，這次神州鉅劫，真是四海同悲了。

自五日晚離北京，至八日晚上登上廣州至香港的輪船，我才確定完全脫險了，我更慶幸「菲林」能順利帶出。

然而輕鬆的心情很快轉為悲哀，我想起北京的朋友，想起我認識的一些大學生，生死未卜；即便未死，以後還不是惶惶度日，本來舉世讚譽的學運，如此悲慘收場，我但願我是在惡夢當中，而不是真實。然而，這是真實發生了，我想悲哭，但不知為什麼總是哭不出來。◎

成都屠城六日記

李繁譯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星期五)到六月七日(星期三)是成都事件的主要時期，其時筆者正在成都。以下是一個基於我個人經歷的簡短報告。我寫這一報告的目的，一是為了提供一些目前中國省會城市(至少成都)的情況；二是為了履行我的許多中國朋友和熟人的囑托：把成都發生的事情告訴世界。

以下報告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和經歷以及中國目擊者和在成都的其他美國目擊者提供的情況而寫成。我將以記敘的方式來寫作這篇報導，對資料的來源不加說明。這篇報告由兩部份組成：(一)按時間順序的敘述；(二)一些補充情況。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星期五)

晚上，我從上海到成都，住進錦江飯店。我被告知在四川省展覽館門前的台階上有相當多的學生在進行示威和絕食。四川省展覽館正對着人民南路的路口，人民南路在此與人民東路呈「T」字形相交。錦江飯店位於人民南路，在四川省展覽館以南約四個街區的地方。錦江飯店是成都市為外國人服務的一個主要設施，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以及領館人員的住所都在此飯店內。

四川展覽館座北朝南，正對着人民南路，展覽館門前有一個寬闊的台階，一個巨大的毛澤東塑像矗立在台階的前方。學生的示威活動就在展覽館的台階上進行。一些學生的絕食抗議已經持續了一段時期，而其他的人則似乎以輪流換班的形式佔據着台階。所以在台階上的學生數量在不斷變化。當我到達時約有一百到二百人。

在此之前，街上學生的人數一直在減少。到我到達的那個星期五，百分之八十的學生已回到了學校，學校也已正常開課。然而，到最後幾天，局勢又變得緊張起來。儘管中國的傳媒對北京和其他地方發生的情況進行了全面的封鎖，但私下的信息卻十分活躍，它傳出消息說，軍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但行動並

不順利，或者可能已被廣場上的學生全部或部分地解除了武裝。人們估計政府必將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氣氛一下變得非常緊張。

可能更重要的是，兩天來，一批學生在一條交通要道上靜坐(可能是為了阻擋軍車通過)，然而幾輛卡車強行開過，刺倒了六、七個示威者，他們全都受了重傷，其中兩人於次日死亡。展覽館的台階上還放着悼念死者的花圈和標語。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星期六)

這一天的上午和晚上我都去了展覽館。台階上嚴嚴實實地站滿了學生，台階下向三個方向伸展開去的三條街道上也滿是人，連幾個街區之長，其中尤以人民南路上的最多。毫無疑問這些人都非常支持學生，雖然他們看上去一般還比較輕鬆，賣食物的小販出賣着各種小吃和飲料，人們之間開着玩笑，就像是星期日的郊遊一樣。然而在整個白天，有關軍隊可能鎮壓的傳聞在人群中廣為流傳，緊張氣氛明顯地在增加。

當我去展覽館時，我的中國朋友們警告我不要拍照。兩週前，一個日本留學生拍照時被發現，他因此被吊銷簽證而離境。人們告訴我人群中有很多警察特務，他們既拍攝示威者，也拍攝觀眾和同情者。我也被提醒在旅館裡也要小心，因為旅館裡許多房間據說都裝上了監視器，另外還帶着微形相機的便衣公安人員就在附近活動，準備拍攝中國人和外國人接觸的照片。

四川大學的校園裡非常安靜，只有一個大字報欄前有一小群人。大字報的內容除了對政府的譴責和對朋友、同志的激勵之外，還有一些非常動人的訣別信，這是那些決心在必要時堅持到死的絕食學生寫給他們父母的。我聽說學生領袖已宣佈進行「空校運動」，很多學生都啓程回家。然而，我後來發現，他們並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警察在火車站巡邏，阻止學生上火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星期天)

星期一早，有關北京大屠殺的消息開始一點點地傳了過來，雖然這些消息極為零散並且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美國之音、英國

廣播公司的國際新聞節目和個人之間的聯繫都是消息的主要來源；但所有這些消息似乎都沒有能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圖景。國內和國際長途電話仍然暢通，但在白天，通話質量却大為降低。這一天的白天，我大部份時間在城外渡過，城外一切如常，城內大部份地區也是如此。然而，在學生和市民聚集的地區，緊張氣氛陡然而增。到下午，未經證實的消息如全國範圍的鎮壓已奉命開始進行，所有發生了學生遊行示威的省會都將在傍晚受到人民解放軍的進攻等，在人群中不脛而走。

黃昏時分，從展覽館方向傳來了第一陣陣淚瓦斯彈爆炸的聲音，以及沉悶的、像砲擊似的騾彈的爆炸聲。我試圖趕到出事現場，但當我走到離展覽館一個街區的地方時，也擠不過去了。事情很清楚，到此時為止，鎮壓行動還局限於使用催淚瓦斯和騾彈，但無論如何，還是有人受傷，救護車在人群中費力地來回往返。每當載着傷員的救護車通過時，人群便鼓掌和高呼，表示他們對負傷者的支持。我和幾個美國朋友在錦江飯店附近的一個小飯店吃了晚飯。稍後，約下午八時左右，我登上錦江飯店九樓的屋頂餐廳，從那裡觀察事態的發展。在這一時期裡，催淚瓦斯和騾彈的爆炸聲連續不斷，其劇烈程度使我當時感到整個城市都處於震動的震擊下，儘管如此，人羣仍然沒有散開，夜幕降臨後，大批揮舞着棍、匕首和電棍的武裝人員開過來。我聽到了幾聲零星的自動步槍射擊聲，但並不是很多。我不能確定這些武裝人員的成份，但看起來既有警察也有解放軍。

警察和軍人的行動包括將示威者分割包圍起來，用棍棍電棍他們，把他們打倒在地。沒有一個示威者帶着武器，這一事實是不容置疑的。而另一方面，警察和軍人都極其殘忍野蠻，甚至在他們把示威者打倒後，他們仍繼續用警棍和匕首打他們，電棍電他們，直到他們不能動彈為止。他們打人的規律是，對男人專打頭部；對婦女專打腹部。無數拳打腳踢發生了。警察和軍人的暴行都是任意而為的，甚至倒在地上的乞求憐憫的人也遭到他們的棒擊。對他們來說，也沒有什麼年齡的區別，雖然無法證實

，但好幾個人都告訴我，最年輕的犧牲者是一個四個月大的嬰兒，最年長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我也聽到好幾次別人告訴我，一個六歲的孩子被打死了。

在衝突中，示威者向警察和軍人投擲磚石、路面的碎片和其他能夠抓到的東西進行還擊，他們燒了公共汽車、卡車和裝甲運兵車。晚上十點到十一點之間，距展覽館東南一個街區的人民商場起火，整個街區基本上全燒光了，直到次日餘火才完全熄滅。起火後兩個小時，公安人員和消防隊才到達現場。到星期一的凌晨，街道上已看不到多少示威者了。當我在早晨七時去現場察看時，已沒有軍隊的踪影了。

開始時，幾乎無法得到可靠的傷亡數字。人們的說法從十、二十到一千不等。逐漸地，我才得到了一些可靠的消息，在成都四家主要醫院之一工作的、一位醫生私下說出在她的醫院裡有二十七人死亡。人們可以據此推測其他醫院也應有相似的數目，由於軍隊命令醫院不得收治病傷的學生，情況更加複雜。在兩所大學的醫院裡，這一命令尤其被強制推行。我說說至少在其中一所醫院裡，一些醫護人員由於違反軍隊的這一命令而被捕。有的人根本沒有被送進醫院。救護車的救護工作十分困難、混亂，黑夜的來臨更降低了救護的效率，有些人是被出租車和自行車送往醫院的。但也有些人根本就沒有得到任何治療。不管怎樣，人們最後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大約三百到四百人被打死，一千人被打傷。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星期一)

當我在上午七點仔細巡視昨晚發生暴行的現場時，大約二十名左右學生回到了展覽館的台階上，市民也開始在台階前的街道重新聚集起來，但看不到任何軍人。的確，整個白天，整個城市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任何警察，甚至交通警察。人們向我解釋，他們全都不敢出來，因為人們都由於昨晚的事件而極度憤怒，如果遇上單個的警察和軍人，他們會立刻襲擊他們。此外，街上自行車的通行情況幾乎接近正常，路上也有一些公共汽車和卡車，但幾乎沒有任何小汽車。對此，人們又告訴我，大部份小汽車都與黨的幹部、軍隊和警察的高官有關，少數有小車的市民擔心被錯認為高幹，所以也寧願讓他們的小汽車呆在家裡。

白天基本上比較平靜。我騎着自行車在城裡轉，為我的職業興趣會見了一些人。但也就是在白天，關於已有命令星期一晚上將有比前

晚更大的騷擾的傳說開始傳播。儘管有此傳說，展覽館前和人民南路上的人數在整個白天繼續在增加。他們對外國人極為友好，急著告訴我們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我被一些說英文的學生和一些不會說英文的工人圍住，他們最關心的事情之一是外國人應該知道所發生的事情，並將此告訴世界。有人給我出主意說：「如果你遇到麻煩，就說你是從美國之音來的，人們馬上就會幫助你。」

四川大學被極度憂鬱的氣氛籠罩著，人們擔心破壞的事情將發生，校園中那些思想開放和同情學生的人更為憂慮。軍隊將奉命佔領四川大學，對知識份子的全面騷擾即將來臨等消息開始流傳。北京已宣佈與國外反革命勢力勾結的知識份子足策動這次「學生暴亂」的四川人之一。

大抵在下午六時半，錦江飯店的一些工作人員警告住在飯店內的為數不多的外國人不得離開這座建築，因為據說錦江飯店當晚要受到攻擊。這時從展覽館到錦江飯店的兩個街區上已塞滿了人，但聚集在飯店前的人群卻沒有任何要使用暴力的跡象。從下午六時開始，便又開始聽到從人民南路北端傳來的催淚瓦斯和驅逐彈的爆炸聲。大約在八時半或九時的時候，示威者與突然出現在錦江飯店前的治安人員開始混戰，石塊橫飛，建築前的財物被毀壞，有些玻璃窗被砸碎，飯店前有人放了火，飯店的大廳裡也起火，但不嚴重。據說有人要襲擊飯店。

美國總領事把他能抓得到的所有美國人都趕到他在二樓的單元裡，不讓出去。與此同時，警察和軍人關上了錦江飯店外面的鐵欄門，將一、兩百名示威者關在錦江飯店的院子裡，對他們施以與前晚在展覽館同樣的暴行。一個美國人從他的窗戶裡看到了這一切，他是如此驚駭，以至於次日他無法再將此情景敘述出來。人們被用警棍毆打，每當有人被打倒在地，就有幾個軍人跳到他們身上猛踩，並繼續打他們。

在新川飯店正對面，軍人、警察與示威者之間的拉鋸戰一直持續到午夜一點左右，是時大隊的軍人開到，街道才被肅清，人民和軍隊之間的衝突也在其他地段發生，一座大型電影院被燒毀，與前一夜不同的是，警察根本禁止救護車出來搶救。所有的屍體和傷員都只能用自行車運走。在錦江飯店的院子裡，約有三十到五十人被打成致命傷或被打死。他們可能是被一輛軍用卡車拉走的，但沒人能證實這

一點。次日早晨，唯一留下的證據是散落在地上的衣服和鞋子。我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是在夜內其他地方有多少人被打傷或打死的信息。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星期三）

我又步行和騎車出去巡視，到早晨八點，所有的警察和軍人又都不見了，除了在錦江飯店院子裡，鎖上的鐵門後面有一小隊裝備著警棍、戴著鋼盔的士兵，他們每一班約十個人。錦江飯店的大部份男職工也被召集起來，每人都發給一根四英尺長的鋼棍，好像也有人對他們進行了使用這些棍子的基礎訓練。在展覽館，少數學生又出現在台階上，較前人數減少的人群又再次聚集在街道上，一小群好奇的旁觀者聚在錦江飯店和對面峨嵋山飯店緊閉的門外。很明顯，峨嵋山飯店昨晚也經歷了同樣的騷亂，但遠不如錦江飯店的嚴重。

下午晚些時候，美國領事發出通知，敦促所有美國公民離開中國。我也知道所有在成都設有辦事處的外國公司也都召回了他們的僱員。上午，人民南路上有少量人群，到中午時就突然散開了。到了下午和晚上，街道上幾乎是死一般的沉寂。戒嚴令宣佈了，到處在傳說當晚會有一次更大的鎮壓。人們還相信軍隊要佔領四川大學，搜捕持不同政見者。在錦江飯店內，軍隊也加強了防衛，手持警棍的職工守在建築內每一個要害位置上。然而，這一夜却是安無事。

當天晚上的電視新聞持續了一個小時，第一次，實際上也是獨家播出了北京和其他城市，如西安、上海騷亂情況的連續累積的電視剪輯鏡頭。其中也有一條關於成都的消息，播放了錦江飯店內被「暴徒」破壞的情況。整個新聞的編排完全是為了突出「暴徒」的破壞和暴力行為，而避而不談軍人和警察方面的任何暴行。更有甚者，新聞之後的電視節目是一名軍官會見二十名經過挑選的記者，這一軍官否認軍隊造成了任何死亡，但強調有兩千到三千名軍人被「暴徒」打傷和打死。

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星期三）
整個上午成都都很安靜，展覽館附近的街道上只有很少的人。人們傳說軍隊的大規模行動已從星期三晚上推遲到星期三晚上。但我不知道星期三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我在下午一時二十五分乘中國民航飛機離開成都去香港。飛機上只有很少幾個中國人。我聽說所有國內航班都停飛了，但我却仍然看到有其他飛機起飛，

我猜想那很可能是國內航班。

(二)

以上所敘述的事件本身就能說明一些問題，但是，我還想再補充一些確切的印象，以及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我的中國朋友所告之的情況得出的解釋和猜測。

1. 我的好幾個中國朋友都同意，儘管有卡車在路上飆死、飆傷幾名示威者的事件發生，到六月二日，成都的形勢已接近正常；而且如果沒有這次武力鎮壓，還必將進一步改善。

2. 有充分的跡象說明，武力的介入並非是為了恢復秩序，而是為了鎮壓學生運動。有一個事實指明了這一點，那就是學生回家的做法受到了阻止，而這舉動肯定是有助於使成都局勢趨向安定的。此外，武裝力量在街頭的行動方式也證明了這一點。

3. 我非常懷疑，而且有一些跡象證明（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被幾人民商場以及興隆錦江飯店都是在軍隊和警察便衣人員的慫恿下所為，以便說明學生運動的暴力性質。示威者進攻錦江飯店尤其使人不可思議，因為學生以及他們在人民中的同情者都將住在飯店裡的外國人看作是他們的主要同盟軍。

4. 雖然十分明顯，學生從最初起就得到民衆廣泛的支持，但直到星期日晚上，民主運動的主幹仍然只是學生。然而，在星期天晚上軍隊的鎮壓之後運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成為一個廣泛的群眾運動，這並不是說運動可以征服武力的鎮壓；但是，明確無疑的是，在成都的城市人口中，對政府和軍隊的仇恨已經銘心刻骨，而且幾乎遍及千家萬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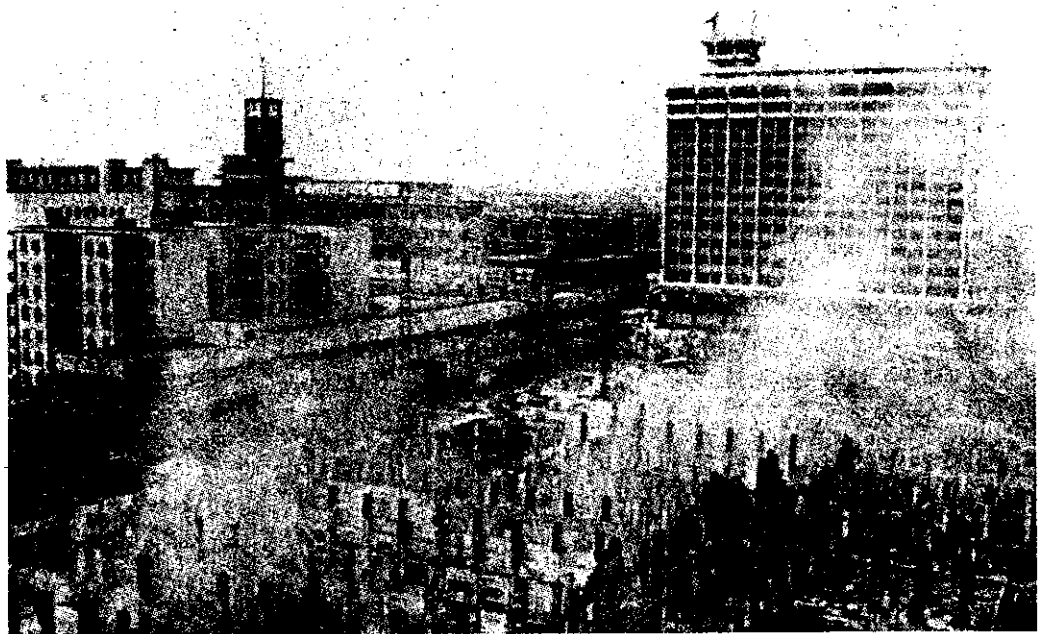
5. 在成都的各大學師生中，充滿了難以用語言形容的憤怒、悲傷、焦慮和失望的氣氛。每一個人都預見到一個壓制知識份子、沒有言論自由的時期將要來臨，所有從對外開放以來所逐步爭得的自由都將一筆勾銷。與我談話過的每一個人無一例外地期望從西方國家獲得道義上的和其他的支持，而同時又相信，目前與西方同行和機構的公開聯繫會帶給他們更多的麻煩。

關於作者的說明：本文作者為美國某機構的學者。為了不致使他在成都的一些朋友受到牽連，他要求在發表這篇文章時不要公開他的姓名。

這是在成都現場拍攝的照片



成都人的六四壯烈起義



• 6月5日，舉行暴動的成都市民燒毀了市中心的人民商場。

街頭，攻打市政府，與數千武裝警察展開了整整一天的街頭激戰，把用警棍、電棒、高壓水龍、催淚彈和槍支武裝起來的警察打得狼狽不堪，雙方傷亡至少一千八百多人。號稱中國十大商場之一的成都人民商場被憤怒的人民一炬燬成平地，損失一億多元，製造了中共稱之為「四十年來的最大縱火案和城市火災」。

在六四之後的三天，中共專政機器，被包圍在人民的汪洋大海，暫停運轉，警察絕跡，公檢法人員和軍人沒有一個敢穿制服上街，否則便會被憤怒的民眾圍攻痛打。

六月四日凌晨，處於八九民運熱潮中的成都還是平靜的。在民眾半月來示威抗議的中心——人民南路廣場只有五十多位學生靜坐，圍觀民眾也很零落，遠不及高潮時那樣熱鬧。

突然間，血洗天安門廣場的噩耗像晴天霹靂在蓉城（成都別名）頂上炸開。同時，成都市當局又急急下達清場的命令。終於激怒人民，引發了一場人民起義。

上午七時四十分，成都市公安局發出緊急通告，宣佈人民南路實行交通管制。十餘分鐘後一大隊武警和公安幹警開著警車，殺氣騰騰趕到廣場，先封鎖廣場四圍入口，然後強力清場。五十多名學生與圍觀民眾慘遭毒打，然後被強行拉上警車載走。據說成都高自聯在廣場的播音員、四川師範學院一位十七歲的女學生因拒絕離開廣播站，當場被武警殘忍地刺了數刀。

官逼民反，爆發起義

各校學生從「美國之音」和香港「光華之聲」電台聽到天安門發生慘案，政府出動坦克、機槍鎮壓學生，「死傷七千多人」，已悲憤異常，清場消息一傳來，無不失望痛哭，喊著要上街去抗議，去聲援。

四川大學、華西醫科大學、成都軍事科技大學等校學生抬著高音喇叭，一路狂呼著「打倒偽政府！」「為七千同胞報仇雪恨！」的口號，從南前往廣場示威遊行。沿途有無數憤怒民眾加入，隊伍不斷壯大。

上午十時，這支憤怒大軍抵達廣場南面時，與一道密密麻麻、殺氣騰騰的武警人牆相遇。廣場上的市政府高音喇叭正在播放交通管制通告，警告「一小撮暴徒不得越軌鬧事」。

學生和民眾一邊高呼口號，一邊怒喝武警讓路，並強向前衝。但回答他們的是象雨點似的警棍襲擊，頓時就有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

四川人的蠻勁和亡命精神被激起來了，憤怒的民眾開始向武警扔石塊、扔瓶子。手無寸鐵的學生脫掉上衣和鞋子，把衣服朝腳上陣，發狂般往前衝。武警則以警棍、電棒死命地往衝在最前面的學生。鮮血、棍棒、怒罵、瓦礫……混戰中不斷有重傷者被抬出來，送到附近的第一門診所。

這天是星期日，放假的醫生聞訊，紛紛趕來義務搶救。門診部已裝不下了，但傷者仍源源不斷。據說，這些武警都是從外地山區調來的，很多是涼山彝族人，特別愚昧殘忍，出手特別毒辣，拿著警棍專打人要害，有的用電棒刺女孩子胸部和陰部。女孩子陰部受傷後，灼痛難忍，只能張開兩腿跌跌撞撞逃命。

當場即有學生嚎啕大哭說，「天！這是什麼樣的政府，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竟向人民下毒手！」

前面不斷有人受傷倒地被打下來，後面的學生和民眾仍往前衝。許多老師死命地拉住學生，流著淚勸學生不要送死，「同學們，你們一定要冷靜，千萬不要去作無謂的犧牲！」但勸不住，學生已打紅了眼。男孩子赤裸的上身和雙腳全是血痕，狂吼著踩在遍是碎瓶和瓦礫的地面上，義無反顧地向廣場衝去。

民警武警，狼狽潰逃

武警施放高壓水炮，衝在前面的學生和民眾被淋成落湯雞，但擋不住；武警施放催淚彈，滿街刺鼻臭味，學生和民眾眼睛睜不開，但依然擋不住。流血衝突一個多小時後，武警終於抵擋不住勢如破竹的憤怒民眾，節節後退。退到廣場時武警隊伍被民眾衝散，分割成小塊，被民眾團團包圍。

同時，廣場西面也有體育學院的學生和民眾衝成殺機。他們巧妙地以已停駛的電車作掩護，推著一輛輛電車往前衝。成排的武警衝過來，他們就朝後退；武警一退，他們又朝前衝。這樣一波接一波地衝鋒，終於在正午時衝入廣場。從廣場東面衝鋒的成都地質學院學生，也同時衝開了缺口。

這時聚集在廣場的學生和民眾已達十萬人。最初他們衝鋒時手無寸鐵，此時已陸續補給了木棒、匕首和鋼釘等武器，戰況越趨激烈。下午三、四

• 蔡詠梅

●在「燒掉國家，為北京學生報仇」的怒吼聲中，在萬目注視之下，人民商場燃起熊熊烈火，火光徹夜不息。

點鐘，武警向人羣開槍，許多民眾中彈倒地，但仍無法阻止民眾的反抗。武警再無法支持下去，狼狽逃竄，分別奔逃到廣場北面為毛澤東展覽館，西面的市政府，東面的錦城藝術宮。人民東路派出所

來不及逃進避難所的武警被民眾一路追打，有的當場被打死。有位受了傷的武警逃到小巷中，一位老太婆在樓上看見，提著一壺滾燙的開水從他頭上淋下去。人民對武警已恨得咬牙切齒。

市內各大醫院門口都圍著人山人海的羣眾，罵

• 被捕的成都民運青年。



聲不絕，見有受傷武警逃進去，立刻高吼，「拖出來打死！」許多本來輕傷的武警果然被拖了出來，被民眾打得半死不活。衝突剛開始時，市上命令：各醫院不准收受受傷暴徒，只准收武警。但結果所有受傷武警只敢送往部隊醫院。

狂暴怒火，燭天燃燒

躲到錦城藝術宮和東安門派出所的武警被民眾包圍。因人東派出所的一百餘名武警曾向人羣開槍，所以民眾特別憤怒，不斷攻打派出所。但幾次衝進去，在武警開槍後又退了出來。於是民眾把自己的單車一輛接一輛地堆成一人多高的路障，封死了大門，然後點燃車胎。派出所內的一百餘名武警，在錦城藝術宮的武警的接應下，才倉皇逃了出來。夜晚十一時，象徵中共專政機器的人東派出所被烈火吞沒，圍觀民眾紛紛拍手稱快。

對政府失望已極、憤恨已極的民眾並未解恨，又趕到派出所後面的國營人民商場縱火。

人民商場號稱全國十大商場之一，為成都及西南最大的綜合性零售批發商場，有職工三千一百

六四屠城，觸發衝天怒憤

北京六四屠城的慘案後，成都十萬民眾衝上

多人。據目擊者說，五日凌晨二時後，數萬人聚集在廣場外，高叫：「燒掉國營商店」、「燒掉人民商場」、「燒掉國家，為北京學生報仇！」

凌晨二時，人民商場在萬目注視下燃起了熊熊烈火，火光映紅了整個天空，整夜不息。清晨時，佔地一萬五千平方公尺的商場已成焦黑的廢墟。

四、五、六這三天，成都市政府和公檢法機關完全被淹沒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人民視政府為敵人，公檢法人員或軍人不敢穿制服上街，否則就會被憤怒羣衆包圍痛打。有的公安人員甚至連家也不敢回，在單位裏躲了好幾天。

六月五日上午民衆包圍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大樓，高叫「打倒不爲人民說話的人大！」「打倒偽政府！」。樓上有人朝下扔磚塊，一些十幾歲的孩子在竹竿上綁着匕首向樓上敲。後來一些青年把樓上的國徽鉤下來，倒舉國徽遊行，高叫「共產黨垮台了！」

下午民衆又包圍市政府辦公大院，砸毀停在車棚的十二輛摩托車，並把市政府招牌取下來，掛在街後面的公廁外，請來外國記者拍照。他們說，「這個招牌只配掛在這裏。」

在這三天，成都民衆還放火燒了國營的人民電影院，砸了國營的錦江賓館。

成都的老百姓說，這三天雖然社會秩序亂了一點，但共產黨統治四十年，只有這三天才是政府怕了人民，他們感到出了四十年的氣，特別是出了六四大屠殺的氣，心中很痛快。

血腥鎮壓，血債待償

四川人性情燥烈，可能缺少了一點理性。但必須承認，這是人民起義，是官逼民反。

六月七日，當局開始出動軍車隊和警車隊，武警和軍人個個荷槍實彈，挨戶搜查抓人，白色恐怖開始籠罩蓉城。學生採取「空校」行動，各大學校園一片死寂……

中共爲這次北京的八九民運定性爲「暴亂」，其餘城市爲「動亂」，只有成都被定爲「嚴重騷亂」，意謂嚴重性僅次於北京。

在三日的人民起義血戰中，有多少人傷亡？中共公佈的數字是：傷一千八百人，其中武警一千一百多人，學生和民衆七百餘人；死八人，其中有兩個是學生。但民衆說，學生和民衆傷亡應該高得多。但在目前的恐怖氣氛下，誰能爲學生和民衆說話。不過相信這筆血債早晚是會償還的。

編者按 新華社六月九日轉發了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六月五日的文章，題爲〈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全文如下。

輕賢的英勇鬥爭，依靠廣大人民的配合和支持，已經取得了平息暴亂的初步勝利。但是，這場反革命柱。

他們說，「要用廣場的鬥爭，來支持全國的鬥爭」，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段，威脅青年學生，不許撤離廣場，甚至揚言，「誰要撤就幹掉誰」。

他們生怕青年學生靜坐請願的行動難以堅持，又動員搞五千人的「知識分子大絕食」，但號召不起來，結果搞了一個僅四人參加的四十八小時至七十二小時的絕食鬧劇。

他們散發煽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傳單，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叫嚷要組成「武裝力量」，「團結包括台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不

、有的同志提出，前幾天動亂的局勢已有所緩和，戒嚴部隊還有必要進城嗎？

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它的政府」。

應當明確，執行國務院戒嚴令，完成首都部分地區的戒嚴任務，部隊必須進城。事實上，從五月二十日發布戒嚴令之日起，戒嚴部隊每天都在按照預定部署，採取不同方式向城裏開進，到達指定部爭。

所有這些說明，極少數人有計劃、有預謀製造的動亂，絕不像善良的人們想像的那樣正在趨向平息，而是改頭換面，繼續在那裏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

位。正是因為戒嚴部隊的陸續進駐和各方面的艱苦努力，動亂的局勢才開始向着緩和的方向發展。但是，必須尖銳指出，極少數人製造動亂的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目標絲毫也沒有改變。

他們深知，戒嚴部隊一旦全部到位，廣大羣衆進一步動員和組織起來，他們的陰謀就將落空。於是，伺機挑起事端，使動亂激化。

六月一日，我公安機關收審了非法組織「工自聯」的幾個頭頭，他們就借機煽動一些人，包圍和

他們聲稱，已經內定了「新政府」的成員，準備了要鎮壓的幹部名單，繼續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不斷製造事端，可以達到「推翻現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目的。

衝擊了北京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機關和公安部。

六月二日晚，中央電視台借用了十個月的武警部隊的一輛吉普車，在返回原單位途中，由於車速過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車事故，撞死三人，

他們積極組織力量，糾集流氓地痞，網羅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刻骨仇恨的人，拼湊所謂「飛虎隊」、「義勇軍」、「敢死隊」，揚言要「軟禁」黨和國家領導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政權。

重傷一人，沒有一個是學生。這本來是一起交通事故，有關部門已在處理，但是，極少數人却有意把它同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城的行動聯繫起來，大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的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鼓動不明真相的人，要搶奪屍體，舉行抬棺大遊行。一時

他們用海外反動政治勢力援助的資金和物資，間，人心悸動，氣氛極為緊張。經過這兩天的煽動和鼓噪，暴亂的火就被他們點了起來。

聲稱這是「新時期的黃埔軍校」。

他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豎起了一個甚麼女神

像，原來叫「自由女神」，後來又改名爲「民主之神」，要用美國的自由民主來作爲他們的精神支柱。

他們說，「要用廣場的鬥爭，來支持全國的鬥爭」，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段，威脅青年學生，不許撤離廣場，甚至揚言，「誰要撤就幹掉誰」。

他們生怕青年學生靜坐請願的行動難以堅持，又動員搞五千人的「知識分子大絕食」，但號召不起來，結果搞了一個僅四人參加的四十八小時至七十二小時的絕食鬧劇。

他們散發煽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傳單，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叫嚷要組成「武裝力量」，「團結包括台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不

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它的政府」。

所有這些說明，極少數人有計劃、有預謀製造的動亂，絕不像善良的人們想像的那樣正在趨向平息，而是改頭換面，繼續在那裏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

他們深知，戒嚴部隊一旦全部到位，廣大羣衆進一步動員和組織起來，他們的陰謀就將落空。於是，伺機挑起事端，使動亂激化。

六月一日，我公安機關收審了非法組織「工自聯」的幾個頭頭，他們就借機煽動一些人，包圍和

衝擊了北京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機關和公安部。

六月二日晚，中央電視台借用了十個月的武警部隊的一輛吉普車，在返回原單位途中，由於車速過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車事故，撞死三人，

重傷一人，沒有一個是學生。這本來是一起交通事故，有關部門已在處理，但是，極少數人却有意把它放成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城的行動聯繫起來，大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的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鼓動不言，說是戒嚴部隊的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鼓動不明真相的人，要搶奪屍體，舉行抬棺大遊行。一時

間，人心浮動，氣氛極爲緊張。經過這兩天的煽動和鼓噪，暴亂的火就被他們點了起來。

二、有的同志問，六月三日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夠得上是暴亂嗎？

這個問題，最好還是讓事實來回答。

六月三日凌晨，當戒嚴部隊按既定計劃繼續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就有人大呼小叫，煽動一些

人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路口攔攔小車輛，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

一時許，魯各莊附近十二輛軍車被攔，從燕京飯店門前經過的戰士被強行搜身，電報大樓前的軍車輪胎被扎穿，並被隔離繳圍住。

的軍車車胎被扎穿，朝陽門的四百多名進城的戰士被歹徒用石塊亂砸，六部口、橫二條一帶軍車被攔

早上七時前後，有的歹徒鑽進被圍困在六部口的軍車內，倉庫裝有子彈的機倉。從連發門到東單

上午，虎坊橋一帶的倭成部隊被衝，敵土曹南、敵打、以及天橋附近，進城部隊被零星隔斷，遭到圍攻、毆打。在建國門立交橋上，有些戰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戰士被打得痛哭。

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有些被打傷的戰士在被送往醫院途中被人攔截，急救車被放氣，傷員被綁架。虎坊路至陶然亭二十一輛軍車被圍，在戰士轉移彈藥時，前往護衛的民警被打傷。

武門、虎坊橋、木樨地、東四等路口的解放軍戰士，有的被打傷，有的鋼盔、軍帽、雨衣、水壺、挎包被搶。有的路口，壓縮餅乾、罐頭等撒滿一地。

部隊和公安幹警多次解圍均未成功。這車槍走彈藥如被搶走或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爲了保護首領人生命財產安全，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武警部隊施放了催淚彈，搶回了彈藥車。在這時，有的學生高喊，隨即發生衝突完台聚。

與此同時，一夥暴徒開始圍堵和衝擊國家機關

街一個團的戰士被圍堵，建國門立交橋三十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三百多輛軍車被圍

堵。爲保證軍車前進，有的戰士和指揮員下車做疏導工作，被圍攻毆打，有些被強行綁架，不知去向。在南苑三營門受阻的軍車，爲避免衝突，往東繞

行，至天壇南門再次被堵，許多軍車被砸、被燒。珠市口一輛軍車被堵，一幫人爬到車上，下邊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勸他們下來，當即被痛打，生死不

六月四日凌晨以後，焚燒軍事情況愈演愈烈。和重要部位。他們衝人民大會堂，衝中宣部，衝廣播電視部，衝中南海的西門和南門。保衛這些機關。

的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數十人負傷。

隨著事態的急劇惡化，暴亂的挑動者也更加猖狂。下午五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

」的少數人，向天安門廣場不明真相的羣衆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

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工自聯」在廣播中大肆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一夥暴徒糾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單附近一個建築工地的圍牆，搶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鋼筋、磚塊等，準備打巷

請大家看看，這不是暴亂是什麼？在這緊急關頭，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城區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暴亂。

三、有的同志問，部隊進城平息暴亂，為什麼向老百姓開槍？

自戒嚴以來，陸續進城的戒嚴部隊始終保持高度克制的態度，盡量避免發生衝突，這是有目共睹

的。六月三日暴亂發生後，大部隊進城前，爲了避免傷害重慶，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於晚六時半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全體市民要提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

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這個《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各種廣播器，進行了反覆廣播。

在天壇東側路、天壇北門、前門地鐵西口、前門東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單、復興門、南禮士路、木樨地、蓮花池、車公莊、東華門、東直門、以及朝陽區的大北窯、呼家樓、北豆各莊、大興縣舊宮鄉等地，數十個路口的數百輛軍車，被暴徒用汽油、燃燒瓶和土製噴火器引燃，火光衝天，有的戰士在車內被活活燒死，有的跳下車後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幾輛、十幾輛，甚至三四十輛同時被燒，一片火海。在雙井路口，有七十餘輛裝甲車被圍，其中二十餘輛車上的機槍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三十多輛軍車被暴徒付之一炬，現場濃煙衝天。有的暴徒手持鐵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見車被燒，車上戰士鳴槍警告，暴徒也置之不理。有幾名暴徒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開着搶來的裝甲車，邊行邊邊開槍。非法的「工自聯」還在廣播上宣佈，他們繳獲了一部軍用電台和密碼本。還有多輛軍用運糧車、被服車被暴徒搶劫，不知去向。

一些暴徒趁機大搞打砸搶。西城區的燕山等商店的櫥窗被砸。一夥人點燃了毛主席紀念堂西側的松樹牆。一些公共電單車、消防車、救護車、出租汽車被砸毀和燒毀。特別惡毒的是，一夥人將一輛公共汽車推到天安門城洞下點燃，企圖燒毀天安門城樓，被及時撲滅。

在猛烈攻擊軍車和大搞打、砸、搶、燒的同時，殘殺解放軍戰士的暴行接連發生，手段極其殘忍。

六月四日凌晨，東單路口一夥暴徒用酒瓶、磚頭、自行車砸死戰士，許多戰士血流滿面。復興門一輛車被數人圍住，車上的某部管理科長、管理員、炊事員等十二人被拉下車來，強行搜身，然後痛打，多人受傷。六部口四名戰士被圍毆打，有一名被當場打死。廣安門附近三名戰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救出。兩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區西興盛胡同有十餘名武裝戰士被一夥歹徒堵住，有的被打成重傷，有的下落不明。護國寺、輔軍車被數人圍住，被拉下來痛打後當作人質，一批衝鋒槍被搶走。一輛裝滿彈頭的汽車，由東交民巷開往天安門廣場，車上的人高喊：「是中國人的上車，砸解放軍去。」

拂曉之後，打、殺解放軍戰士的暴行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隊的兩輛救護車，拉了八名受傷的戰士送往附近醫院時，被一伙暴徒攔住，當場打死一名，還叫嚷要把其餘的七名一齊打死。在前門大街的一家自行車店門前，有三名解放軍戰士被打死，暴徒們圍住狂叫：「誰敢救他們就打死誰。」在長安街上，一輛軍車熄火，一百多名暴徒一湧而上，砸開駕駛室，將司機活活砸死。西單十字路口以東三十米處，一名戰士被打死，又在屍體上澆汽油焚燒。在舊城門，一名戰士被暴徒殘

害後，屍體被懸掛在立交橋的欄杆上。在崇文門，一名戰士被一夥暴徒拉上過街天橋，從橋上扔下，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暴徒們狂叫：這是「點天燈」。在西長安街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解放軍軍官被暴徒打死後，剖腹挖眼，把屍體掛在一輛正在燃燒的軍車上。還有一名解放軍被搶掉眼珠，割掉生殖器，將屍體扔進護城河。

暴亂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被暴徒砸毀、燒毀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達四百五十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百八十多輛，裝甲車四十多輛，警車九十多輛，公共電單車八十多輛，其他機動車四十多輛。搶走一批武器、彈藥。負傷的解放軍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數千人，死亡上百人。他們為保衛共和國、保衛憲法、保衛人民，付出了鮮血甚至寶貴的生命，對他們的功績，人民將永遠銘記。

如此慘痛的代價，最有力地說明了戒嚴部隊所採取的極大的容忍和克制態度。否則，部隊怎麼可能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和損失呢？這難道不正說明我們的軍隊是人民軍隊，為了保護人民而不惜犧牲自己嗎？但是，為了迅速平息反革命暴亂，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迫不得已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無忌憚的暴徒。由於圍觀的軍人和在場的學生很多，有的被軍備、人擠，有的被流彈擊中，暴亂中有上千人受傷，上百人死亡，這是大家都不願看到的事情。對於被誤傷的軍人和學生，政府、戒嚴部隊和受害者家屬的心情是樣的，要做好善後工作。

四、社會上盛傳，戒嚴部隊進城之後，「血洗天安門」。這完全是謠言。

真實情況是，戒嚴部隊進入廣場之後，凌晨時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奪火、藥、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這個緊急通告用高音喇叭，進行了反覆播放，時間長達三個多鐘頭。在廣場圍觀的軍人，多數都已迅速離開。這時，停留在廣場上靜坐的青年學生只有數千人，集中在廣場南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三時左右，他們派出代表向戒嚴部隊表示願意自動撤出廣場，戒嚴部隊表示歡迎。

凌晨四時半，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同時，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說：「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後，須立刻撤離現場。二、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告，仍繼續留在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理。三、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亂的廣大學生和軍人，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

停留在廣場上的數千名青年學生聽到通告後，立即撤離了隊伍，布置了手拉手的糾察隊，於五時左右，打着各自的旗子，開始有秩序地離開廣場。戒嚴部隊在廣場東側南口開出了一條寬闊的通道，保證了學生迅速、順利、平安地離開。這時，還有少數學生堅持不走，武警戰士按照「通告」要求，強制他們離開了廣場。到五時半，清場任務全部完成，整個清場過程用了不到半小時，廣場靜止的學生沒有死一個人，包括最後強制離開的。所謂「天安門血流成河」，完全是胡說八道。

五、提高認識，奪取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全勝。1. 要正確認識這場反革命暴亂的嚴重性和平息暴亂的嚴重意義。製造這場暴亂的極少數人是指的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在這場暴亂中，出面製造打、砸、搶、燒、殺等種種暴行的，主要是那些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團夥、「四人幫」的殘渣餘孽、潛藏在非法組織中的少數壞人和其他社會渣滓。廣大軍人和青年學生，包括不同程度捲入了的人們，一定要和他們劃清界限，積極投身到這場反暴亂的鬥爭中來。

2. 在平息暴亂的鬥爭中，廣大幹部、軍人，應在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黨政領導下，更積極地組織起來，加強聯防，做好護廠、護站、護校和保衛本單位安全的工作。同時，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恢復交通秩序，維護社會治安，完成各項戒嚴任務。在平息暴亂的過程中，許多軍人表現了很高的政治覺悟，他們有的積極保護被追打的解放軍戰士；有的及時向公安、保衛部門送交失散的槍枝彈藥；有的主動宣傳黨、軍、政、警、民團結一致的工作；有的積極檢舉揭發暴亂分子的罪行；有的挺身而前，同暴徒進行面對面的鬥爭。這種精神是十分可貴的。

3. 廣大軍人和青年學生，對那些荒誕離奇的謠言，要動腦筋好好想一想，不要輕信上當。在戒嚴期間，一定要嚴格遵守戒嚴令，千萬不要好奇圍觀，更不要跟着起哄，避免再發生意外的傷亡。

4. 要增強敵情觀念，密切注意極少數暴亂分子的動向，隨時掌握他們的犯罪事實。同時向政府和本單位領導機關揭發，協助政府儘快將這些暴亂

分子繼續拿歸案，依法嚴懲。現在，一些暴徒仍在繼續焚燒軍車和公共電單車；一些暴徒用搶到的武器在那裏放冷槍，殺傷戰士和軍人；非法組織「高自聯」還在散發傳單，煽動全國總罷課、總罷工、總罷市。對他們的罪行，必須予以堅決的打擊。5. 有關部門已經宣布：在暴亂中幹了壞事的人，要趕快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如果不想悔改，繼續作惡，一定從嚴懲辦。

陰謀

揭陳希同的「平亂」報告

■戈揚

122



■身在美國的戈揚(圖)憤怒駁斥陳希同的謊言。

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太客氣了。」

是的，確有其事。

那一天，我被臨時邀請參加會，匆匆來到會場。既無發言稿，又無思想準備。金觀濤講完話，他的夫人問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評價是否過了頭？」我不但如此回答，還用這個題目講了話。誰知我本無心，陰謀家們卻有意。他們事先派了人去，很快就把小報告送上了。趙紫陽看了小報告，不久就在政治局會上點了我的和金觀濤的名。

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失敗，有目共睹，在理論上是否違反客觀規律，也有案可查；這不祇是一個實際問題，也是理論問題，屬於學術範圍。不是說學術問題可以自由討論嗎？為什麼說過的話總是不算數呢？

尤其令我驚異的是，一份要讓人民代表相信的大報告，居然拾取我沒有準備的片言隻語作為有計劃有預謀的證據。不過，這樣一來也洩漏了天機。我在明處，陰謀家們在暗處，到底誰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呢？

陳希同怎樣編造故事？

第二個例子。

報告說，二月二十六日，張顯揚、包遵信、李洪林、戈揚等四十二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也要求釋放所謂的政治犯。

這真是一個笑話！今年春節期間，文藝界有人寫信給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放魏京生時，希望我也簽名。偏偏這時我從內蒙古回京，為了趕寫一篇文章，我把電話關了。他們以為我不在北京，便沒有去找我。

三十三人簽名過去後，又有人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與釋放政治犯，徵求我是否簽名。我認為，一個呼籲發出後，如果不被接受，再寫多的信也沒用，所以，我沒有簽名。

而陳希同的「大一統」觀念則認為，戈揚既然「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就必然會簽名。想當然耳，因此鬧出了這個笑話。

不過我這樣說還是太善良了，他們並非如此。他們明知我沒有簽名，也要栽上。否則，怎樣編造故事呢？

第三個例子。

報告說，這場動亂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劉銳紹。

安門，我還親自去送了花圈。

胡耀邦是怎樣下台的？

來到天安門廣場一看，我嚇了一跳，這麼多人，也擠不進去呀！別人扶着手攀花圈的我，一步一挪。我邊走邊想，誰說中國沒有希望？這麼多人擁護改革，能說沒有希望？如果政府真正講民主、講法制，按客觀規律辦事，大家把力氣用在生產、科學和文化的發展上，二十一世紀肯定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四月二十三日，我在離京來美臨上飛機前，用這個意思寫了一篇《新觀察札記》。沒有想到，就在我出國的短短一個多月裏，《新觀察》被停刊了。更沒有想到這樣一個中國人民的共識和希望，被扣上「動亂」的帽子，而且硬說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誰有計劃？誰有預謀？不但從我的這三個例子看得清楚，整個報告也告訴人們，有計劃有預謀的，絕不是愛國愛民、擔心中國會開除球籍的知識分子，正是那些視權如命、置國家和人民於不顧的保守派陰謀家們。

請看胡耀邦是怎樣下台的？

胡下台前，他們早就利用鄧小平害怕大權旁落的心理，告黑狀，要把胡搞掉。但苦於理由不夠，祇得伺機而行。一旦看到有些大學因伙食管理不善而罷課，或因選舉不合理而遊行時，如獲至寶。他們不是去解決矛盾，而是去抓階級鬥爭，立即運用新聞機構，如新華社和《光明日報》責令駐各地的記者專門搜集反動口號和標語，一日多次電傳，大肆渲染，印成《簡訊》，日夜飛向中央領導人的手裏。而這些反動口號和標語的來源卻十分可疑。

以暴亂作為殺人藉口

這一回又是如此。學生悼念胡耀邦逝世的和平請願才第二天，中宣部一位副部長就利用新華社記者寫的一篇關於有人衝新華門的報導，加進去「打倒共產黨」的口號，編造工人路過時的反應，來歪曲學生請願的性質。可見，他們早就把帽子準備好了。再過兩三天，李錫銘的系統彙報已經寫好，鄧小平乃上綱定性。正當悼念活動結束學生回校的時候，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出來了。這才幾天，不是說學運初期承認過學運是愛國的嗎？什麼時候承認過呢？

目的很明顯，他們就是要用這篇不講理的社論來激怒學生，促使事態擴大。而且一激再激，早就痛恨專制主義的人民自然要站在學生一邊。於是他們把準備好的第二頂帽子拿出來了，將「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亂」，以此作為殺人的藉口。

陳希同的報告不就是這樣寫的嗎？有什麼好掩飾的呢？

在這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年輕人的文明與講道理同舊黨老朽的野蠻與不講道理；人民的莊嚴與崇高同陰謀家的卑鄙與無恥；民主戰士的大公無私同官僚當權者的極端自私自利，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呵！難道歷史真的如此無情，讓正義死亡，讓魔鬼當道？

不，不可能，歷史是公正的。正義的種子已經深深埋在人們心裏，「於無聲處聽驚雷」，這個時刻即將到來！

戈揚女士為北京《新觀察》主編，被陳希同在「平亂」報告中一連點了三次名。此文是回應，也是反擊。——編者

到底誰是預謀？

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人大常委會上的「平亂」報告，長達三萬餘言，美國華文報紙以整版篇幅連載兩日。我能在異國他鄉及時讀到，不能說不是新聞自由給我的好處。

這篇報告不但是長文，也是「妙」文，妙就妙在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調重彈羅織，而且造到我的頭上來了。報告的前部份列舉了我的三個例子，來說明這次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

第一個例子。

報告說，去年十二月七日，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與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作證說：「金觀濤對社

從陳希同「平亂」報告 看中共的意識形態危機

黎思

陳希同以國務委員和北京市市長身份，在1989年6月30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這是八九民主鬥爭和六·四鎮壓後中共官方較有系統地申述它的立場、辯解它的行為的文件。

即使不看這份《報告》，大概也可想像它有什麼內容。但這並不表示《報告》是不值一顧的。《報告》如何篩選「事實」，如何界定所謂「動亂」的性質，如何解釋「動亂」的起因和發展，如何陳述首都各階層人民的參與，這些都有必要掌握，以便分析中共官僚統治到現階段——與人民公開為敵、要用軍隊赤裸鎮壓城市廣大群眾，以致「推翻現政權」的口號為海外中國同胞公開呼籲並非過癮提問——怎樣在意識形態上企圖支撐政權的「合法性」和辯解它仍是全民利益的代表。

顯然，《報告》所鋪陳的「事實」，都是為了支持某些結論的。一些「事實」可能的確發生（例如它列出學潮醞釀階段在知識份子和學生中間曾舉行過多次的研討會、民主沙龍，以及3月1日起北京幾所大學出現的一系列大字報）。對於這些事實，我們也有必要全面掌握，以能了解學潮醞釀時期及發展以後校園大字報的內容、知識份子的言論，等等。越是掌握這些事實，我們就越是看到，這場震驚中國和全球的民主鬥爭，絕不是幾個人的「蠱惑人心」、「造謠煽動」所能掀起的。這場民主鬥爭的背景，其實是很深刻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直接源於中共官僚層統治，近年的「開放改革」使矛盾更為激化。一些大字報質疑中共的「正確領導」，一些大字報力主徹底的政治民主改革，一些大字報提出要改變中國的財產關係，這些都是從現實矛盾衍生出來的各種思潮、看法，其中不少觀點互相矛盾對立（例如有些主張行真正的社會主義，有些主張進行全面市場化、私有化的經濟模式）。

可以看到，在4月中學潮爆發以前，在學生、知識份子中間已感覺到社會危機的爆發正臨近。《報告》所援引的一個「動亂醞釀」的例子，就是2月中知識份子簽名要求釋放政治犯。的確，這個簽名運動反映了社會關係開始緊張，並表現為尖銳的政治要求。

由此可見，問題其實不在於《報告》所羅列的一些「事實」是否真的曾經發生，而在於，這些「事實」怎樣經過篩選甚至扭曲後，被中共官方辯護專家用來詮釋所謂「動亂」的起因和經過。

《報告》的整個思路邏輯並不複雜。它界定這次事件由「政治動亂」發展到「反革命暴亂」，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它既有「國際背景」，又有國內的「社會基礎」。關於後者，《報告》點名指責十餘名知識份子（主要是嚴家其等屬於趙紫陽旗下的智囊團成員）挑唆、造謠、煽動動亂，而趙紫陽則初是縱容，後是鼓勵這場「動亂」，以達到打倒鄧小平、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目的。這個「陰謀」是與國際敵對勢力「內外勾結、上下串通」，以求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

《報告》強調這次事件是由少數知識份子煽動挑起的，而在事件激化成為暴動的過程中，群眾是「不明真相」被鼓動起來的，是「好人和壞人混雜在一起」的。之所以要強調是少數人挑事，有兩個目的：一是為辯說中共與大多數人民仍然利益一致，大多數人民非與中共為敵；二是唯心主義地將事件起因歸咎為少數人思想錯誤，迴避對客觀社會矛盾的分析，也就迴避了中共政策在激化社會矛盾上所應負的責任。

這次民主鬥爭一個顯著的發展，是中國工人階級經過長期的沉寂後開始動員組織起來（工人打着麻旗坐着麻車上街遊行；同時工人獨立於官方控制而組織「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報告》中，組織工人「敢死隊」等的英勇工人，被形容為「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竄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滿釋放份子」、「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刻骨仇恨的人」。中共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推行無產階級專政，《報告》刻意迴避工人的自我組織和獨立動員，是意料中事。

《報告》值得我們分析留意的，反而是它的一個並非不正確的斷言：「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勢力，總是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都放棄社會主義的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這是他們長期的根本戰略。這些年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誤和經濟上的暫時困難，更加緊了這個戰略的實施。」

如果將這個分析推深一層，就是說，國際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力量之間的爭持，一直是存在的；國際壟斷資本從沒放棄它的根本戰略——令資本主義制度重新在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復辟；國際壟斷資本之所以想將各國重新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不是簡單因為它「敵視」這些國家或政府或人民，不是簡單因為它要豎起「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旗幟，而是它要擴張它的經濟利益。

從這個分析出發，邏輯結論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對國際壟斷資本勢力加以警惕防範，尤其是由於二者的生產力水平差異很大，無所謂「公平的物質交換」。可是，《報告》卻同時簡單地強調，「我國將它不動搖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矛盾就在這裏。

「堅持開放改革」，是78年以來中共大力推行的經濟路線。這個路線對內鼓勵市場法則的運轉和自發資本主義勢力的滋長，對外引入外國資本來中國投資和開發市場。這條由中共政權推行的經濟路線，這個助長資本主義勢力生長而又繼續壓抑工農大眾民主干預的政策，使中國這個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更偏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半前倒後，而這個政策恰好有利於一直覬覦中國的國際壟斷資本勢力。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代表國際壟斷資本勢力的組織，近十年來與中共保持密切關係並企圖影響中國的發展路向。勾結企圖將中國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勢力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共政權本身！

因此，實質上是主張財產私有制更廣泛地以至全面地恢復的「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是在中共開放政策推行者的智囊班子內探討、鼓吹，毫不為奇！《報告》批判這個智囊班子，又批判學潮期間出現《私有制宣言》之類文件，如果要追究，中共正是始作俑者！

（人民爭取各種政治權利、爭取對社會生產及分配有決定權等要求，固然也被中共指責為「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但這些權利絕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可以享有的；只有在工農大眾真正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才能實現以上人民權利和權力。所以，提出廣大勞動者——而不是一小撮資產擁有者——享有真正民主權利、權力的要求，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民主思潮而不是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這些要求是絕不會為國際壟斷資本勢力所認可的，當然也是絕不會為一黨專政的中共所容忍的。）

中共近年來多次聲稱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少提社會主義，又在理論上修正以往說中國處於社會主義階段的說法，改為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扭捏的姿態，反映中共統治官僚層不願放棄從無產階級手裏篡奪的對國有財產的支配權，官僚層的一部份卻又伺機改變其寄生基礎，轉向將其掠奪所得的財產變為私有。但是，有趣的是，在這次城市群眾大規模興起挑戰中共權力的民主鬥爭之後，中共在實際經濟路線上維持「開放改革」，在實際政治權力方面維持「黨的領導」，但在意識形態上，從《報告》可見，中共急於以「社會主義」的守護神姿態出現。

現時尚無跡象顯示中共在「開放改革」政策上收斂，當然這在未來是有可能的——如果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而中共進一步失控的話。但在目前，在意識形態上，中共已開始扭捏，將「資本主義泛濫」的責任推在趙紫陽及其智囊班子身上。但由於當權者以至其反對者都不能提出另一套可行的經濟路線，「開放改革」及它帶來的一系列社會矛盾，仍可能持續一段時間。不過，在意識形態上強

調中國的社會主義要由中共來領導，反映中共的權力基礎仍主要是依附著被它剝削支配的國有財產之上。

但正如本文前述，今日出現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素及惡劣後果，始作俑者是中共政權本身。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一個要移去的障礙就是中共的官僚統治。不管它如何聲稱維護社會主義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但它却提不出什麼具體可行的辦法。《報告》只能主張：「廣大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正在為挽回遭受的損失，進行艱苦的勞動。」

當然，中共官僚統治既是中國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障礙，也是中國倒退回資本主義的障礙。在掃除這個障礙上，中國工農大眾與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似乎有共同點，但掃除障礙的過程和之後中國要走那個方向，兩者却是利益截然相反的。要走一個有利廣大勞動者的道路，就只能靠勞動者自己的組織和爭取。

陳希同「平亂」報告的缺乏說服力，尤其在它的理論支柱——中共是打擊資本主義思潮、維護社會主義的力量——這方面，是完全虛弱無力的。這個意識形態上的貧乏，正反映中共統治的深刻危機。

1989年8月18日

十月評論 89/7



鄧小平的「六九」講話

本刊資料室

中共四中全會公報稱鄧的講話是「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的綱領性文件」，真有如此大的作用嗎？

文內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同志們辛苦了！（熱烈鼓掌）

首先，我對在鬥爭中英勇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沉痛的哀悼！對在鬥爭中負傷的幾千名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親切的慰問！對所有參加這場鬥爭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致以親切的問候！

我提議，大家起立，為死難的烈士們默哀！（肅立默哀）

利用這個機會，我講幾句話。

風波是大小氣候決定的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

《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李鵬插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我們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軍隊，也有一批各個時期參加革命的幹部還在，因此，事情現在爆發，處理起來比較容易。處理這一件事的主要難點在於，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一小撮壞人

暴亂目的是打倒共產黨

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二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僅僅是他們的一個階梯，而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這次平暴亂中，我們那麼多同志負了傷，甚至犧牲了，武器也被搶去了，這是為什麼？也是因為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於出手，處理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謝解放軍指戰員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暴亂事件。儘管損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贏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變觀點。讓大家都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谁。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雖然犧牲了許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觀地分析事件的過程，人們就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這也有助於人民理解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所採取的方法，今後解放軍遇到問題，採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這裏順便說一下，以後再不能讓人把武器奪去了。總之，這是一個考驗，考試合格。雖然軍隊裏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戰士們都是十八、九歲，二十歲出頭的娃娃，但他們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險面前，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面對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們當之無愧。我講考試合格，就是指的軍隊仍然是人民子弟兵，本身的性質合格。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這次過的是真正的政治關、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這表明，不管我們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不管如何更新換代，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同時，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兇殘。對他們，連百分之十的原諒都不應有。

要冷靜考慮過去和未來

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件壞事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開來講，只是提出一個課題。

第一個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步曲」，正確不正確？是不是因為發生了這次動亂，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發生了問題？我們的目標是不是一個「左」的目標？是否還要繼續用它們作為我們今後奮鬥的目標？這些大的問題，必須作出明確、肯定的回答。我們第一個翻一番的目標已經完成了，第二個翻一番的目標計劃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後五十年，要達到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二點幾就夠了。這就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對此，我想我們做出的不是一個「左」的判斷，制定的也不是一個過急的目標。因此，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當說，我們所制定的戰略目標，現在至少不能說是失敗的。在六十年後，一個十五億人口的國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應該是能夠做到的。不能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就說我們的戰略目標錯了。

基本路線「一中心兩基點」

第二個問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够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協講話，講了「四個保證」，其中有一條叫「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艱苦奮鬥是我們黨的傳統，艱苦奮鬥的教育今後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於克服腐敗現象。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後來日子稍微好一點，就提倡高消費，於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麼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絕不能再重複回到過去

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錯了沒有？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應該說我們上了一個台階，儘管出現了通貨膨脹等問題，但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要充分估計。當然，改革開放必然會有西方的許多壞的影響進來，對此，我們從來沒有估計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志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講這點，可能對我們以後制定方針政策有好處。還有，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加靈活一些。以後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國搞成一個關閉性的國家。鴉片戰爭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國一直實行的是關閉政策，這種做法對我們極為不利，連信息都不靈通。現在不是講信息重要嘛，確實很重要。做管理

工作的人沒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靈。再是絕不能重複回到過去那樣，把經濟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這個建議，請常委研究。這也是個比較急迫的問題，總要接觸的問題。

要人大制不要三權鼎立

這是總結我們過去十年。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我們在改革中遇到的難題比在開放中遇到的難題要多。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也並不都是實行三權鼎立式的制度。美國罵我們鎮壓學生，他們五十年代一個學校鬧事，政府派了軍隊去佔領。美國在六十年代發生了多次學潮和騷亂，他們還不是出動了警察和軍隊，還不是抓人、流血？他們是鎮壓學生和人民，而我們則是平息反革命暴亂。他們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今後，在處理這類問題的時候，倒是要注意，一個動靜出現，不要使它蔓延。

基本路線方針政策不變

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除了個別語言有必要的變動一下，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政策都不變。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請大家認真考慮一下。至於一些做法，如投資方向、資金使用方向等，我贊成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基礎工業，無非是原材料工業、交通、能源等，要加強這方面的投資，要堅持到二十年，寧肯欠債，也要加強。這也是開放，在這方面，膽子要大一些，不會有大的失誤。多搞一點電、多搞一點鐵路、公路、航運，能辦很多事情。總之，外國人判斷我們將來需要一億二千萬噸，現在我們接近六千萬噸，還差一半。如果在現有企業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增加兩千萬噸，就可少進口鋼材。借點外債用在這些方面，也叫改革開放。現在的問題不是改革開放政策對不對，搞不搞，而是如何搞，開哪方面，開哪方面。

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緊動。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

利用這個機會，我就講這一點。

1989年7月1日

鄧小平要「冷靜地考慮一下」！

從「六九」講話看中國當前政局

劉燕英

所謂國際大氣候，應是近十年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社會出現的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革形勢。所謂中國小氣候，則是改革開放十年來培育出來的一種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思想。中國政治大倒退，於今不但表現在老人政治的強化，而且表現在個人崇拜的復活。歷史證明，凡是大搞個人崇拜的時候，往往是被崇拜者政治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

血洗北京天安門的「六四」慘劇發生後，善良的人們一時不敢相信這會是鄧小平的意旨。國際上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也大跌眼鏡，直到六月九日從電視上看到鄧小平公開亮相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並發表講話之後，人們才不得不痛苦地接受這個事實，並且感到必須重新認識鄧小平，必須透過鄧小平的「六九」講話以及《人民日報》最近連續發表的歌頌鄧小平的社論，重新把握中國政局的脈搏。

鄧為何會鎮壓學運

以「三起三落」經歷和倡導改革開放而贏得世人尊敬的鄧小平，為什麼竟會調動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和無辜市民呢？欲求取正確答案，必須全面認識鄧小平。

如所周知，鄧小平是「貓論」者，沒有什麼「經典」理論。他第三次復出時所表述的治國思想，概而言之就是：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十年前，他在提倡改革開放不到三個月即強調四個堅持的必要性，從此把改革開放套上四個堅持的緊箍咒，而且從來沒有放鬆過。自八〇年到八七年，他先後發動的對民主牆、因魏京生、批《苦難》、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運動，無一不是四個堅持的體現。可見鄧的「兩點論」思想很明確。然而許多人却一廂情願地只相信他是改革開放的倡導者，而把他所強調的四個堅持視為他對保守派的讓步，他搞政治平衡的需要。鄧還是新權威主義者，他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國家，要發展經濟，必須

有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來領導。「中國不能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我們的政治優勢是說了就幹，經濟上去了，其他一切問題都好解決」。要發展經濟，必須有穩定的環境，要穩定，就得堅持四項原則，「不堅持四個原則，我們比歐洲還要亂」。

在鄧看來，不加控制地讓學生隨便上街遊行示威，必定破壞穩定，因此，對學生運動要採取高壓手段，甚至武力鎮壓，堅決制止。八六年底學運爆發時，鄧就指出：「對學生上街遊行，貼大字報，決不能手軟，要旗幟鮮明」，「我們不願意流血，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那也沒有辦法」。

那時鄧已有鎮壓學運的意圖，但後來學運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台而告終。今年適逢「五四」七十週年和「四五」三十週年之際，自二月中至三月中，北京又連續發生三起知識份子聯署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事件，鄧已預感到一場比往年規模都大的學運風暴即將發生，因此，據熟悉內情的人透露，三月中旬鄧就讓楊尚昆秘密到軍中作平亂的部署。四月中旬胡耀邦猝然病逝使學運提前爆發，四月二十五日鄧在向李鵬、楊尚昆談話及處理學運時就強調了鎮壓的意向。鄧說，這是一場動亂，是有計劃的陰謀，要旗幟鮮明地堅決制止動亂，絕對不能讓步。要避重就輕，但恐怕完全避免也很難。制止動亂，行動要快，不要怕人罵娘，不要怕什麼國際反應。否則國家大天不寧，永遠不寧。鄧的強硬口氣已經預示着他今年非對學運算總賬不可了。在鄧認為非用武力不能把學運壓下去的時候，善良的人們卻還在幻想鄧不會出兵鎮壓，難怪「六四」慘劇發生後，人們感到格外震驚。

今次學運的悲慘結局終於使人看清了鄧的兩面性，他是改革開放的倡導者，更是四個堅持的維護者，一旦四個堅持受到挑戰，他寧可犧牲改革成果也在所不惜。因為在他看來，維護專政政權——實是維護老人政治——比什麼都重要。鄧的這種抱殘守舊的思想在他的「六九」講話中更加表露無遺。

給學運上網的目的

鄧小平在「六九」講話中認為今次學運發展到「動亂」，最後發展到「反革命暴亂」，是必然的。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所謂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六月十四日《經濟日報》登載的《從大背景認識這場反革命暴亂》點得十分清楚，即國內外一階級鬥爭的大小氣候，「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複雜情況，包括國際上、切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掀起的反華大合唱，以及近年來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綿延不斷越演越烈的情況」。在這氣候下，「極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應和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不時搞起一陣陣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搞亂了黨內的思想，搞亂了黨內的事務，這是事件的根源」。至於事件的目的，鄧指出，「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裏，鄧重現了十年之久的「階級鬥爭」和「資產階級」，完全是毛澤東時代強調的階級



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北京戒嚴部隊各部隊負責人。

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翻版。

其實，只要不是執迷於僵化過時的教條主義者，都會看到，所謂國際大氣候，應是近十年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社會出現的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革形勢，特別是蘇聯和東歐等國近幾年來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對中國產生的巨大影響；所謂中國小氣候，則是改革開放十年來培育出來的一種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思想，這種思想發展下去，勢必動搖建黨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深化改革、實行商品經濟的必然結果，是中國政治的大進步。

正是在這種氣候下，北京學生基於對中共幹部貪污腐敗的不滿，對官倒的深惡痛絕，對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未能起步的厭煩，在四月中旬胡耀邦的悲傷中爆發了學生運動。一切善良的人們都知道，學生的要求無非是剷除腐敗，推動改革，促進民主。他們始終堅持理性、克制的和平請願方式。整個事件清楚地顯示，學生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根本不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現政府。當局只要順應潮流，肯定學生的行動是愛國行動，將學生的愛國熱情引導到推動政治改革的軌道上，一切矛盾就都迎刃而解了。

可是，鄧小平不僅不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反而挑起階級鬥爭的教條，將學運無限上綱，定性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西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這樣，既可證明鄧所判斷的「學潮

變為動亂再變為暴亂」的準確，又可為鎮壓學運、清除異己以及處理黨內反對派提供依據。既然學運已演變成反革命暴亂，那麼，為了平息這場暴亂，下令北京戒嚴，調動軍隊圍城，動用坦克、裝甲車、火箭炮、機關槍、衝鋒槍、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就屬「無可厚非」；通緝在逃「反革命暴亂」份子及煽動者組織者，快捕快訴快殺，則是一完全必要；對犯了「支持動亂錯誤」的趙紫陽、胡啓立、芮杏文等中共高層領導人進行嚴肅處理，更加「理所當然」的了。

依靠老人主宰政治

鄧小平在「六九」講話中特別讚揚了中共元老的重要作用。他說：這場風波「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如果沒有我們黨這許多老同志支持，甚至連事件的性質都難以確定。」由此人們可以發現一個重要事實：老人主宰黨政軍，主宰中國政治。這從六月九日陪同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名單也可得到佐證。名單中除政治局三個常委外，其餘絕大多數是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而且排名順序有了新的變化，其順序是：鄧小平、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趙紫陽、胡啓立。名單上失蹤，政治局常委中的三人，名字居於軍委會領導人鄧、楊之後，政治局的許多成員，也未露面，不免令人疑惑：「黨中央」是否軍委會，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

按照中共黨章，中共最高決策機關應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委會閉會期間應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常委會中的最高決策人應是總書記。可是在學運問題上，真正決策的竟不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而是一羣年屆八十以上的元老。這種架空政治局或「垂簾聽政」的老人政治，顯然踐踏了黨的組織原則。可見鄧小平把老人政治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也將老人政治的弊端暴露得一覽無遺。

越來越多的事實顯示，老人戀棧不願放權。鄧小平八〇年就提出元老要退下來的問題，八五年黨代會上一批老人退下來，但主要元老沒有退。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四老全退，三老半退，老人表面上完成了新老交替。但在這次權力鬥爭中，老人們又都當了主角。由於老人在平息暴亂中被認為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相信今後一個時期內老人政治仍會強化。但是，老人政治不結束，中國政治勢將大倒退！

個人崇拜今又復活

中國政治大倒退，於今不僅表現在老人政治的

強化，而且表現在個人崇拜的復活。《人民日報》六月十六日發表的題為《統一全黨思想的綱領性文件》的社論，充滿讚頌鄧小平「六九」講話的語言，把被中國人民和中共自己批判和唾棄了十多年的個人崇拜再次推到了最高峯。

這股個人崇拜——實為鄧小平崇拜風是李鵬和姚依林吹起來的。社論完全根據李、姚六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講話的基調，題目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氣味，內容中戰戰兢兢的言詞俯拾即是。

社論首先稱，鄧的「六九」講話「極大地鼓舞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接著讚揚鄧的講話「高瞻遠矚，深刻精闢」；是「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綱領性文件」。社論又讚揚鄧這場風波的「敏銳的洞察和科學的判斷」，認為若非鄧平息了這場暴亂，「中國將重新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以鄧為代表的中共黨人「挽狂瀾於既倒」，不愧為「中流砥柱」。社論還說，「今後無論遇到怎樣複雜的情勢，我們都必須牢記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並稱「以這個講話為強大思想武器，就能排除一切干擾，戰勝一切困難」。這些吹捧，和文革時期的「天才」、「頂峯」何其相似乃爾！

中國人民已從遭受個人崇拜的苦難中覺醒，他們早已不希望再有一個恩威莫測、高高在上的神，個人崇拜已經沒有紮根基礎了。

歷史證明，凡是搞個人崇拜的時候，往往是被崇拜者的政治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或者有人想利用它來打倒被崇拜者的時候。

鄧小平要冷靜考慮

鄧小平在「六九」講話中提出要從今次爆發出來的事情，「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考慮一下未來」。果真能這樣做的話，鄧小平首先應當考慮，為什麼會重犯毛澤東十三年前的錯誤？十三年前為什麼會重犯毛澤東十三年前的錯誤？今天，鄧也重犯毛澤東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錯誤地判斷為反革命事件，並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今天，鄧也將天安門愛國學生運動錯誤地判斷為「反革命暴亂」，且出動坦克、裝甲車進行殘酷鎮壓，從本質上看，完全是七六年的舊戲又重演。七八年鄧在談及處理「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教訓時說，「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羣衆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何以今天反而只相信自己的判斷能力，一意孤行呢？

其次，八〇年鄧在評毛時說：「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份違背了他

原來的思想……他不容易聽進不同的意見。」這些話用於鄧身上真是再恰當不過了。鄧自八〇年以來先後四次提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一再表示自己要退休。但是，當他發覺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時，就將政改擱置；當人們請他早點退休時，他不但退，反而將自己選定的接班人一一打倒。如此獨斷專橫，要將中共、中國引向何處？難道不該「冷靜地考慮一下」嗎？

再次，也是八〇年鄧在談到如何避免類似文革的錯誤時說：「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可是今天，鄧卻重啟階級鬥爭，復活個人崇拜，在黨內外進行大清洗大整肅，似要趕盡殺絕方才罷休。這種恐怖行徑會造成什麼後果，實在也該「冷靜地考慮一下」。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在血洗天安門遭到舉世譴責的今日，鄧小平對自己十一年前講過的這段話，實在應當「冷靜地考慮」。切不要以為自己真是在做著什麼「挽狂瀾於既倒」的「偉大事業」。如果「不顧輿論，不怕流血」地蠻幹下去，那將會把中共、中國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啊！

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四日

誰要對「六四」事件開槍負責

□魯人

北京「六四」事件，何人下令開槍？鄧小平？楊尚昆？還是戒嚴部隊總指揮？本文首次透露了知情者爆出的一些細節，有助讀者了解事件的內情。

去年北京「六四」事件之後，海內外議論最多的一個問題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六月三日夜間突進天安門廣場時，究竟何人發令開槍？筆者通過若干渠道了解到一些有關內幕，現借鏡報一角予以披露，以饜讀者。

戒嚴部隊開進伊始 高層尚未決定開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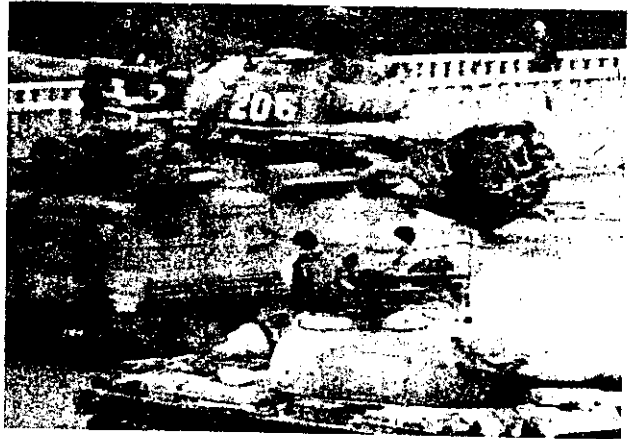
來自各方面的可靠消息證實，中共和軍方高層向戒嚴部隊發出強行進城的命令時，尚未決心採取開槍的極端行動。戒嚴部隊強行進城的命令是六月三日傍晚作出的。在此之前，戒嚴部隊指揮部已將各路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四周的位置進行了部署，並試圖於六月三日白天分散進入城區一部份，由於北京市民和學生羣起攔阻，未獲成功。在木樨地、新華門等地，市民和學生們還將截獲的槍枝、頭盔等展示出來，令中共高層大為光火。他們意識到，如果軍隊不能一鼓作氣開進城區，北京市民的情緒將更加高漲，而軍隊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不僅戒嚴難以實現，局面也更難收拾。是日傍晚六時許，經鄧小平批准，楊尚昆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名義向戒嚴部隊下達了強行進城的命令，大意是：北京今天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各戒嚴部隊於今晚開進城區，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在戒嚴部隊指揮部給各戒嚴部隊的命令中，還分別規定了到達指定位置的時間。至於可否開槍，命令中均未言及。

另據知情者透露，六月三日晚六時許，解放軍三總部負責協同戒嚴部隊進城的高級將領應召到總部受領任務，總部首腦包括總參謀長遲浩田、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等親自傳達了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傳達之後，曾有人當面問

及總部首腦：「會不會開槍」，回答是「不會」。正因如此，一些總部的高級將領也對戒嚴部隊進城時開槍大感意外。

某戒嚴部隊鳴槍開路 指揮部推廣「經驗」

既然中共和軍方高層並未明確下達開槍命令，北京六三之夜又如何槍聲大作呢？據參加戒嚴行動的某集團軍高層人士透露，他們部隊在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時，同其他部隊一樣遭到羣衆攔阻而無法前進，士兵們擠縮在一起，用頭上的鋼盔組成一層保護蓋，抵擋從四面八方飛來的石塊、玻璃瓶的襲擊，緩慢向前挪動。指揮員遂通過無線通訊設備向指揮部報告，請示如何處置。起初得不到明確答覆，稍後，指揮部電示，大意是：×××軍團了槍，攔阻的人羣開始散去，效果很好。各部隊可根據情



坦克進駐北京城

況判斷處置，但必須在規定時間到位。在這種情況下，該部隊便也決定開了槍。其他戒嚴部隊決定開槍的過程亦大體如此。

至於首先開槍的部隊在上級沒有明令的情況下因何開槍，目前尚不清楚。如果不存在其他背景，則可能屬於一種帶自發性質的機斷行為。理由是：

一、按照中共軍隊的條例規定，軍人在遇有危及自身安全的侵害行為時，有正當防衛直至開槍的權力。

二、戒嚴部隊指揮部對各戒嚴部隊到達指定位置的時間做了死規定，部隊在前進受阻，無他計可施的情況下，決定「鳴槍開道」，是完全可能的。

三、中共和軍方給戒嚴部隊下達的進城命令，提法是「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這種提法同早些時候發佈的戒嚴指揮部通告中的提法一樣，可作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開槍」即屬於「可以採取的手段」；另一種解釋是：「可以採取的手段」不包括「開槍」。如果按前一種解釋，部隊決定開槍就是執行上級命令。

海外傳媒在六四事件後紛紛報導說，中共軍隊出現了分裂，稱二十七軍是楊尚昆的嫡系，三十八軍拒絕開槍云云，這些說法大都屬於猜測。無可否認，中共軍隊內部包括一些相當級別的軍官對北京學潮的看法不盡一致，個別高級將領對調動軍隊進城也曾提出異議，但尚未達到整體分裂的程度。各戒嚴部隊在開槍問題上執行情況不一，主要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命令。據筆者瞭解，各戒嚴部隊進城時發放彈藥的情況就很不一致。有的發至士兵班長，有的僅發給了排長以上軍官。及至戒嚴指揮部推廣×××軍經驗後，各戒嚴部隊幾乎都開了槍。開槍的程度大體同受阻的程度成正比。同當時

的傳聞相反，開槍比較激烈的並非二十七軍，而是三十八軍。因為三十八軍主要承擔由西路入城的任務，受阻最甚。

鄧楊默許開槍 迴避直接下令

儘管開槍的命令是戒嚴指揮部以「推廣×××軍經驗」的形式委婉發出的，也肯定得到鄧小平、楊尚昆的首肯，這是毫無疑問的。鄧小平對開槍問題作過何種指示，目前尚不得而知，而在日後的各種講話中，鄧對此均隻字不提，想必當時也是採迴避態度。楊尚昆於六月四日晨則有如下指示傳達至戒嚴部隊：「軍隊執行戒嚴任務，遇有抵抗，可以開槍還擊，但在人羣密集的居民區開槍時要特別注意，盡量避免誤傷羣衆。」從這段指示的內容看，六三夜間楊尚昆直接下令開槍的可能性並不大。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六四事件開槍鎮壓的問題上，中共高層和軍方統帥部門並非無所顧忌。他們未必不知道，站在槍口前面的絕大多數都是市民和學生，誰下令開槍，誰就有可能成為千古罪人。相信包括鄧小平、楊尚昆在內，誰都不願擔此責任，於是便搞成了一筆「糊塗賬」。日後倘若追究起來，大家便可以「踢皮球」。這也算是一種「中國特色」吧！



鄧小平和楊尚昆

中共玩弄宣傳之手法

包美玲

六、四天安門事件震盪世界，國內國外新聞界不惜冒生命危險忠實報導，國內更有不少報章甘犯可能被整肅而不畏死的向人民訴說實況，反觀中央電視台卻輸出不少不實的虛假新聞，歪曲報導，現且把其謬誤開列分析。同時，本刊鳴謝無線電視借出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錄影帶，方便完成此文。

中共利用電視傳播掩飾真相

「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把天安門前發生的血腥事件真相告知全世界。」這話肯定非出自北京中央電視台的廣播，相反，它顛倒黑白，衆傳播界都視之爲恥辱。

六月四日，中國學生和人民慘遭人民軍殺戮，天安門廣場上血流成河，中央電視台已被軍事接管，並泡製出連串任意剪輯，歪曲真相，作假白白的所謂「新聞片」，香港同胞收看轉播之餘，無不氣憤大罵，這算什麼新聞報導。

倒不如稱之爲中央電視台自編自導的愚民話劇吧！他們祇不過是利用鏡頭，剪輯、接駁錄映帶，片面「選材」報導。

幸虧生活在香港的我們能接觸本港及外國新聞界的採訪報導，可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內地人民卻受其一言堂的宣傳毒害，深信不疑。

且看中共如何控制傳播機關，操作宣傳工具。在鎮壓殺戮前，透過電視新聞散發藉口，製造形勢。六月三日晚新聞聯播中，頭條新聞是李鵬就環境問題發表講話。第二項新聞是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知，報導純爲報導員口述，並無畫面，報導指：「少數人違抗攻擊，惡意醜化戒嚴部隊，煽動一些人堵塞軍車，搶奪武器，毆打戰士，阻攔戒嚴部隊行動，肆意製造事端，挑動大動亂。這少數人的嚴重違法行為，引起了人民羣衆和部隊的極大憤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跟着另一則新聞是國防部長秦基偉上午去市郊看望戒嚴部隊的消息，附有畫面鏡頭說明，用意顯然是爲戒嚴軍隊長士氣。

當晚六時新聞聯播指少數人攻擊戒嚴部隊，似乎已爲入夜後之解放軍開進天安門，大開殺界留理由，措辭特別形容忍無可忍。

傳播史上最大宗虛假新聞

到六月四日，血洗京城發生後，當晚新聞聯播，標題是「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進駐天安門廣場」，報導員口述新華社報導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發表談話：「從昨天開始，北京事態急轉直下，一個月來少數人製造的動亂，已發展成爲一場反革命暴亂。」報導員在無畫面口述，指暴徒阻攔軍車，有軍人被活活打死，屍體被吊起，八名受傷戰士送院途中遭受民衆阻攔，士兵被綁架，又稱軍隊保持克制。口述廣播如下：「今日凌晨一時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指出發生了嚴重反革命暴亂，解放軍連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戒嚴第一號令，決定立即在天安門實行清場。）（如果有人違抗，所有人員必須撤離。）（如果聽廣播後，所有人員必須撤離。）（如果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清場後，廣場由戒嚴部隊管理。）（廣場上反復播送這段通告後，大批圍觀羣衆先自離開，但仍有一羣人盤踞在廣場南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凌晨四時半，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於五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開始撤離，戒嚴部隊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到五時半，整個過程結束。」

跟着，螢光幕上首次播出中央電視台拍攝的簡短新聞片及粗略旁述，敘述說：「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天安門廣場廣播了戒嚴部隊的通知，同意學生撤離廣場。」畫面出現頭戴鋼盔軍隊步履進入廣場的鏡頭，第二個鏡頭映出一列運兵裝甲車，鏡頭再轉看見民主女神像後面被推，向前翻倒在地上。當中，學生撤離鏡頭欠奉。第四轉接鏡頭已是白天，只見士兵在清理廣場垃圾，繼而是廣角鏡頭顯示廣場遍地廢物。報導此時旁述：「於五時左右，戒嚴部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到五時半整個過程結束。」最後鏡頭映出部隊洗紀念碑下浮腫的口號標貼。

中央台借題諷刺政府

整段片歷時四十八秒，就這樣交待了事件經過。其中不敢公開示人的片段去了那裏？其實，僅從當晚兩名新聞報導員一身黑色衣服已洩漏真相，其中女報導員杜憲惠了的眼晴，仍可看見紅筋，她雙眼泛著淚光在讀出中央指定的字句，報導時的低沉語調，不正說明了一切！後來，兩名報導員均被換掉，改由別人出鏡讀新聞。

翌日六月五日的午間新聞，播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內容主要是爲羣衆製造罪名，無映片的口述是「戒嚴部隊平息暴亂過程中，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當極少數暴徒向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擊，造成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戰士。」並重新提到「忍無可忍」地步的強硬措辭，又指「這是我們極不願意看到的。」「否則，暴亂不可平息，那就要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

是項消息，似是爲掩飾已被外國記者公佈的大屠殺真相而提出以讓編人民，編出抵銷事實的宣傳。

當晚新聞聯播中，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幾則非常日常時發生的舊外國新聞消息，其一是報導用字幕映出的波蘭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又在螢光幕顯示「告誡任何人不耍玩火」十個大字。另一則外電是「日本首相宇野表示：推進政治改革，恢復國民信



六月四日解放軍入天安門，揮棒動槍托把一名學生打死的鏡頭，全不見在中央台新聞片出現。

不斷污蔑羣衆行使暴力

此外，新聞聯播中於當晚推出一輯題爲「暴亂真相」的「特別新聞」，片長八分鐘有多，由戒嚴部隊指揮部新聞處提供，由六月三日至四日的兩天情況提供，內容不外是重覆指「奉命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遭受暴徒襲擊，圍攻戒嚴部隊，阻攔戒嚴軍車，搶奪武器，毆打、綁架，甚至殺害部隊戰士。」旁述者持誣責性指控聲調。畫面出現的是黑白片，影片底部附有時計，顯示拍攝時間，鏡頭一開始是七時許，民衆包圍軍車，人羣掀開車頂布蓬，抽出車牌，但並無鏡頭顯示有人毆打軍人，綁架或搶奪武器，畫面只見有幾名軍兵走在人潮中，人們你推我擁，人羣手拉手的開出一條窄路，護送軍人離開。這幾名士兵看來似是在隊尾走散了。不過旁白却道：「事實證明，北京已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下面是暴亂中的部份情況。」

「六月三日晚二十三時，一伙歹徒拉來一車廢磚，在木樨地路口設置路障阻攔軍車，他們放火燒毀一輛軍車，企圖掀翻一輛無軌電車。歹徒們向戰士擲石塊磚頭，戒嚴部隊戰士表現了最大克制，主動撤退。」時計是零時五十二分。六月四日凌晨，軍車仍在燃燒。凌晨五時，一伙歹徒在歷史博物館北側用石塊投擲過路的軍車。」又說其中一輛死火停下，民衆上前用石塊擲向司機，把司機活活打死。但從片中可見，停在路中央的軍車似是棄車，不見車內有司機，在旁另一條行車線則有一排排軍車不停地慢駛而過，人羣三三兩兩的趨前拋擲石頭，然後又退回路旁，車頭擋風玻璃破碎，整塊脫落，民衆遂向司機座位投擲石頭，駛過的軍車照樣經過，不停下，不理會。如果司機給活活打死，為何不停車加以拯救，難道怕敵不過手無寸鐵，只在擲石頭的民衆不成？

重開天安門鏡頭搜罪證

六月六日，中央電視台再次利用外電消息諷刺政府，「以（色列）總理承認武力平息不了巴勒斯坦起義。」相信中央政府對此表達最是真知肚明。

當天，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及戒嚴部隊司令部代表張共分別在國內記者會上指出，學生死亡具體數字爲廿三名，而張共還荒謬地對鏡頭指出，戒嚴部隊進駐天安門廣場沒有發生任何衝突，沒死一個人。單聽袁、張二人說法已有差別，官方公佈傷亡人數何足信？

六月七日，新聞聯播中兩位報導員都身穿灰色衣服，當天戒嚴部隊指揮官招待國內記者參觀天安門廣場，停放的坦克早已退走，但畫面上近歷史博物館前仍見有一輛坦克，相信這是中央電視台攝影記者有意把它拍攝下來的，那個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還曾從統一口径，盡把傷亡數字降至零，回答記者詢問時強調「沒死一個人，基本上與學生無發生過衝突。」隨後的一分半鐘影片全無旁白，鏡頭在廣場上四周掃描，記者刻意在找尋軍隊殺人罪證，大理石階梯上清楚留有彈痕，鏡頭在燒焦的廢堆中近鏡映出一本「英語指南」，是想指控政府焚書坑儒嗎？

同日另一則新聞是訪問受傷士兵，花時詳述，給機會一名傷兵去自圓其說，「大部份羣衆受蒙騙，所以我們沒有還手。」



北京中央台違法截斷外國記者街頭訪問片，改稱「造謠者」。

向有一段名為「北京城區某地反革命暴亂現場記實」的新聞片，並且採用了打字幕方式全文報道，全文十五分鐘長，不外又是再三反覆指責焚燒軍車，車上無人就指說是給歹徒綁架去，民眾爬上裝甲車，說成是烈士兵出來打，強說是「滔天罪行」。片長嘔嘔沉悶。

再播片面虛假報道

六月八日的新聞是李鵬、王震等看望戒嚴部隊官兵，九日的午間新聞的公專新聞是放映發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亂，六月三日至四日部份實況，內容重提焚燒軍車阻交通，「面對粗暴的攔阻，軍兵表現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讓，耐心地勸導他們（羣衆）做宣傳解釋工作。」旁述是陳腔濫調的一式樣板，影片則是另一套來的，是三日晚上另一些街頭景況。

九日的新聞聯播中放出了最具爭議性的一段，題為「部隊進入廣場，學生自行撤離天安門廣場」，報道說：「凌晨四時半，戒嚴部隊從不同方向來到天安門四周，準備清場，這時，廣場上學生約有二千餘人，聚集在人民紀念碑的四周，廣場上反覆播送通知，請同學們盡快撤離廣場，學生們向戒嚴指揮部提出要撤出天安門廣場，戒嚴指揮部同意了他們的要求，並用廣播通知了他們。從五時開始，學生們排隊，從東南方面撤離。凌晨五時半，原先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已經全部撤離，在整個清理天安門廣場過程中，部隊與學生沒有發生衝突。」這顯然全是謊言。

電視上鏡頭映出一排排頭戴鋼盔的軍兵進入廣場，但當時天安門的燈已熄滅，夜景中已不見民主女神像，歷史博物館前有駐兵，上述數個軍隊鏡頭後，突然一節播映的黑白片，與先前士兵進入廣場的彩色片完全不配合，黑白片顯出時間為五時十一分，畫面是百多名羣衆悠閒散漫地在慢行，時天色漸明，背景是不知何處的街道，相信離廣場很遠，入彀所持示威橫額不多，見有一條寫有政法大學的，此段所謂學生列隊離開片段，只三十秒長。跟着，鏡頭一轉，接回一段彩色片，所見廣場上清潔非常，僅見一輛坦克車在鏡頭中。

問題是彩色黑白片的接駁剪輯播放，實在是動了手脚，期間四時半至五時十一分的一段時間全無交代，五時十一分至五時二十八分指學生排成隊伍向東南方向離開，懸疑性甚高，彩色片中廣場上不見垃圾，不是六月四日凌晨拍攝的一點也不出奇，否則，何以到六月九日才播出此段「新聞」。

六月十日，中央台播出一個造謠者，呼籲北京市民檢舉「造謠者」說：「我看見，壓死的人，打死的人太多啦，他們用坦克車，裝甲車壓，壓成肉醬，還用槍打，用警棍打，打昏後再用槍打上一槍，太兇殘了，沒有見過。」報道又指稱該片段播出不到一小時後，造謠者就在大連被捕。據本港一位電視新聞編輯認為，公安局可能先拘捕了造謠者，後才播出那段較早前非法截斷了美國廣播公司的衛星轉播片段，違法留歸己用。

六月十一日，所指造謠者蕭斌接受審問，在鏡頭前自行承認了「對於社會、黨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害。」

同日，中央台又播出一「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真相」影片，（似是對柴玲十日在港播出的血淚控訴反擊），再次重提廣場圍觀的羣衆聽到廣播之後散去，只餘數千靜坐青年學生，部隊檢查過幾蓬中無人時才開始清理。

影片簡短播出軍兵操出歷史博物館的彩色片，第二個鏡頭是另一版本的黑白片，顯出人羣背向慢慢撤離，片上無時計，但可見街道位置在民族餐廳附近，然後，返回廣場上的彩色鏡頭，神像仆倒，士兵扯出帳篷木架，映示一個近鏡的空帳篷，及一排四、五個帳篷。

這些鏡頭全用近鏡，避用廣角鏡，顯然是怕把廣場四周的坦克攝入鏡頭。

十三日，新聞聯播發佈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拘捕王丹、吾爾開希、劉剛及柴玲。同時播出了在北京飯店偷拍吾爾開希吃飯片，指他「一面叫同學去絕食，一面自己大吃大喝」，加以醜化。事實上，該片在五月廿九日偷拍，當時已無學生絕食。

十五日，播出六名士兵被燒焦屍體，此日前亦播出指為歹徒燒死士兵的屍首，頸部用繩拴着屍體懸在軍車門外，近鏡拍攝死屍恐怖狀，存心引導觀眾認為暴徒殘殺士兵。但拍攝尚留破綻，屍體頭上仍戴着一頂新的軍帽，實大可存疑，死者身份不明，是市民，是士兵，根本都難辨別。

十六日聯播新聞中，是工人清廣場，鋪新草坪，鏡頭清楚拍攝到工人在修補崩塌了一大塊的石階，如非坦克裝甲車駛上來，何來損毀？

隱瞞歪曲顛倒卑鄙三手法

其實，中央電視台移花接木，玩弄鏡頭剪接技巧，隱瞞事實的技術還失高明，加上是次事件有千名中外記者現場如實報導，新聞封鎖才不為所逞，又怎



右邊《北京週刊》圖片可見王洪文、張春橋排列於第二、三位，前為華國鋒，後為喬冠華，但左圖《人民畫報》已把王、張二人刪掉，將喬擡前，虛構王、張俱無到場的假新聞照片。

切餘生者都有血的見證，豈容中共持權狡辯。

劉賓雁說得好，中共慣用三種手段來製造新聞，封鎖實況，第一是完全隱瞞，根本不去報導，第二是片面報導事實，實際是歪曲事實，第三是完全顛倒是非。

中大新聞系主任朱立指出，中共政權一直把新聞傳播當作宣傳工具，今天又再清楚說明一次。早在五十年代初大躍進期間，已出現報假增多生產數，報章報導湖北省人民公社的一畝田，種出三萬六千多噸水稻，事實當時國內餓死不少老百姓。

文革期間，更是虛假報導的高潮，報章不提黨中權力鬥爭，只謂形勢大好，外交幾乎完全中斷了，還指朋友滿天下。

當權派只求有利打擊別人，可隨意歪曲真相，如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後，王洪文、張春橋等會出席追悼儀式，於九月底出版的北京週刊，刊登有相片，足以證明。可是，十月打倒四人幫後，於十一月那期的人民畫報所刊登的同一圖片上，王、張等人已被塗掉，不見踪影。

現時，中央電視台倒亂新聞片時間次序，把無關事件放在一起，足以左右觀眾判斷，是當權者造成傳播之恥，自招「信用破產」。中央台記者為求忠實報導，被迫在拍攝清理後開放天安門廣場片段中，後半部保持沉默不語，只用鏡頭四處搜索解放軍殺人證據，是採用隱晦間接手法表達意見。

朱立強調，是次事件說明無傳播自由，由少數人壟斷傳媒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中央台的失實新聞，教育了我們認識到忠實報導的珍貴，只不過，這些反面教材背後代價太大太血腥了。

清洗鎮壓遍及全國

■岳南

平暴展覽自暴其醜

王丹戴晴包遵信情況

筆者最近到北京公幹，與北京一些熟悉高層情況人士聊天時，他們向筆者透露了不少內幕，其中包括王丹可能將被處決。

一位人士說，由於王丹是排在首位的被通緝學生領袖，而且被捕後堅決不承認「罪行」，加上這場全民愛國運動已被冠上為「反革命暴亂」，所以王丹將被判處死刑的可能性極高。在這一問題上，握有大權高層人士已取得較為一致的意見。

這名人士還透露，著名知識分子包遵信、女記者戴晴仍被隔離審查，在長時間內不會釋放。除非等到有什麼重大轉機時，才有可能獲釋。

而惹上麻煩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老新聞工作者胡績偉由於曾要求全國人大召開會議，討論學潮和罷工問題，全國人大成立了專門工作小組對他進行調查，但由於他堅決不承認犯有錯誤，所以他的麻煩仍未過去。

有關人士還披露了侯德建出來證明「清場沒有死人」一事的內幕。他指出侯德建是與有關方面達成了某種協議，才承諾出來「作證」的。北京不少人都知道這一原委。

「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機構的記者前往侯家參加記者會的通知，是由原北京市委宣傳部、現任中宣部副部長徐惟誠發出的。

徐惟誠曾與袁木一道，炮製了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

目前，北京市各企業、商店、機關正大搞「人人過關」的審查。有關方面規定，凡參加過遊行的人，均要被審查，而審查方式有各種多樣，估計要接受查的人數多達百萬計。

這些被審查的人均要寫一份自今年四月中旬學潮爆發以來的名為「五十天

的反思」報告，報告內容逐日寫，清楚交代和反省自己在這五十天內每天的生活和思想情況。

一位北京知識分子憤憤地說：「這種做法，連『文革』都未出現過，簡直不像話」。

不過，筆者另一位朋友談到這件事時，反而沾沾自喜的說：「在北京，如果沒有參加過遊行的人，這個人一定是不正常的。」

各地進行大清洗及洗腦

這種內部審查遍及全國，無一倖免。如珠海市的《珠海特區報》一名男記者，因學潮期間，自告奮勇，自資將收得的珠海讀者捐款送到北京，交給學生，較早前亦已遭隔離審查，至今仍未獲釋。而《珠海特區報》則因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在報社內設立靈堂，拜祭死難者，目前這一事件正被上級追究。記者編輯們自亦要寫報告，進行「反省」。

如果這口氣也咽得下去，還算是北京人？一位二十歲的北京女孩子憤憤的對筆者說。雖然四、五月份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已被鎮壓下去四個月了，創子手又進行了大清洗和種種洗腦工作，但是北京人的不屈服情緒仍令當局心驚、膽寒，所以遲遲不解除戒嚴。

筆者在「國慶節」期間，在北京居住了幾天，耳聞目睹，第一個感覺就是北京人絕不屈服，解嚴之日，就是李鵬之流倒台之時。

北京的國慶節假期是十月一、二、三連續三天。雖然十一、二晚天安門廣場有焰火和舞蹈表演，但多數北京人都是呆在家中渡過。此刻他們的心情絕不快樂：共和國的四十歲生日是在刀槍「保護」之下渡過的，有誰會快樂？

一位中年朋友對筆者說：「在電視上我看到廣場跳舞的場面，就想起文革時的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黎族姑娘

被南霸天脅迫跳舞舞臺的情景。」

國慶前夕，北京市及戒嚴部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發出告示，加強巡邏等。還有一點就是類似五月戒嚴初期那樣，命令各機關、企業、出租汽車公司，停駛絕大部分車輛，以減少市內車輛流量，防止「壞人」破壞。

北京超過九成以上的士被鎖在公司內，本來就不多的士的北京，這段時間在市面行走的就更少。大量剛抵北京的外國人，滯留機場內等候的士。

為了讓國慶晚會順利舉行，十月一日晚，機場開往市內的巴士，更改為停泊在朝陽門，而不停泊東四機場大樓內，令乘客更感麻煩。

戒嚴部隊毀台階仍未修復

《人民日報》曾報道天安門廣場作有限度開放，所以，筆者就在十月四日到廣場去參觀。

廣場四周範圍圍牆仍然封閉，不許行人通過，但騎單車或乘搭機動車者不限。各個路口堵截行人的工作人員，來自北京市各企業，亦有戒嚴部隊士兵擊著衝鋒槍在看守。

因廣場嚴密戒嚴，所以，很少人在附近馬路行走，廣場、人民大會堂附近街道如西交民巷、東交民巷顯得冷冷清清的。但居民委員會要求居民要掛國旗，故此，在這些街道，倒見到不少民居門口掛了旗子。

廣場內邊緣有不少穿紅衣裙的女孩子排着隊，拉着繩子維持秩序。但入廣場的人極少，祇有二、三百人。工作人員看過我們的同鄉證後，就讓我們入內參觀。

今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筆者亦與學生一起，在廣場渡過了十多個日夜。在抵達廣場時，內心十分難過。看到燒焦了的地面，仿如見到燒焦了的一顆顆炎黃子孫的心，仿如聽到「清場」

時，赤子們撤退的呼號之聲。

已經過去四個月，天安門廣場現時仍留下了創子手鎮壓民運的不少罪證：裝甲車碾過大方磚的痕迹歷歷在目；「人民英雄紀念碑」北面被戒嚴部隊毀壞的台階仍未修復。（見圖）

在這裏順帶一提的是，紀念碑台階依筆者觀察，並非由裝甲車撞毀，而是被戒嚴部隊在清場後，焚燒物體燒燬的結果。

因為紀念碑台階是用麻石做成，損口及周圍是燒焦的痕迹，而爆裂、毀壞的損口又頗為齊整，顯然不是被硬物撞毀，而是麻石無法抵禦高溫，燃燒而爆裂的。同時在仍然完好的部份，則沒有被燒痕跡。

為什麼說是戒嚴部隊毀壞的？原因是在中國人民革命軍軍事博物館展出的一「平暴」展覽中展出清場圖片顯示，紀念碑為穿「班衣」的戒嚴部隊士兵佔領時，台階仍然完好，並未毀壞。而北京市委六月五日所作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一文，亦沒有提及紀念碑台階被學生毀壞的事件。

首先提到紀念碑台階被毀原因是戒嚴部隊發言人，他謊稱紀念碑台階是為學生燒毀罪證而破壞。此說顯然不對。因為學生無須燒毀什麼罪證。

平暴展覽反露馬脚

筆者在北京逗留期間還發現多個地方仍有彈孔：六部口首都電影院正門東面上部牆角，有七、八個拳頭大的彈孔；靠近木樨地的燕京飯店前的一座低層樓宇，亦有蜂窩狀彈孔。據朋友說，首都電影院的彈孔是出於當時，電影院門前一塊用作宣傳的巨型電子螢幕，不斷發出支持學生、反對戒嚴的字樣，在軍隊攻入六部口時，士兵用衝鋒槍向螢幕掃射，子彈「順帶」打上電影院正面牆上的。

而民族飯店正門的門楣上，亦有一個拳頭大的彈孔。

「平暴展覽反露馬脚」從七月底開始，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軍事博物館「西側二樓展出已經兩個多月，據稱已有過百萬人次觀看。

在軍事博物館門口售票窗，筆者聽到一個小青年與女售票員有趣的對話：

小青年：「還有沒有暴亂？」

女售票員：「有。」

小青年：「還有多久？」

女售票員：「不知道。」

小青年：「一賺錢咧！」

聽了令人不禁莞爾。

而在軍事博物館大樓前西側「軍民魚水情」塑像下，展出了二十九輛軍車，有公共汽車、軍車、裝甲車、坦克、警車。展出已有一段日子，這些被燒車輛均已生鏽。在這些車子旁邊有一個巨大的白色牌子，寫着「被反革命暴徒毀壞的車輛統計：軍車警車、公共電汽車一千二百八十輛」。其中軍車一千輛、裝甲車六十輛、警車三十輛、公共電汽車一百二十輛、其它機動車七十輛。

車輛未毀也被展出

在展出的車輛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輛未有被燒過的白色私家車和一輛救護車。兩輛車子仍很新。

救護車車身上寫着是北京紅十字會的，由意大利政府送贈。說明牌子上指這輛救護車的救護車，亦被暴徒「砸毀」。

其實，這輛車子祇是車身有幾塊玻璃不見了（可能是被戒嚴部隊子彈打爛了），車身上紅燈亦毀壞，但車身仍十分新淨，不似被「砸毀」。

一名男青年見到這部救護車，故意大聲的自言自語說：「這部車子這麼好，幹嘛放在這兒呀？」引得周圍的人都笑了起來。

白色私家車前的一塊牌子則指四通公司在「反革命暴亂」中推波助瀾，這輛私家車是四通公司屬下的華城托運公司經理負責人代表四通公司「給高自聯頭頭使用的」。不過，牌子並未指出車子給「高自聯」哪一位頭頭使用，因為北高聯頭頭有多位。

筆者雖收集了大量的關於學運資料，但卻從未聽聞過官方有過四通公司送車子給高自聯頭頭使用這一報道。

這還算不得什麼，更離奇的是展覽場展出了一枝據說是以「吾爾開希保鏢鄭重家中搜出的九節鞭」，但與《人民日報》的說法有矛盾。展覽說明指這是七月份在鄭重家中搜出的九節鞭，但並未說明搜出有鐵標槍。

倒是九月一日的《人民日報》對九節鞭的說法有了新的「發展」。《血寫的教科書》一文說展覽中「有吾爾開希的保鏢鄭重在遊行隊伍中刺向民警的兩米長的鐵標槍和九節鞭」。

九節鞭是用來刺人的嗎？

北京人心中有數

五月中旬開始至六月初的北京每次大遊行，筆者都經歷了，從沒聽說過有人拿一兩米長的鐵標槍和九節鞭刺向民警。

中國習功夫的人多的是，家中有九節鞭有什麼奇怪？與動亂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官方對同一件東西有不同說法，你說離奇不離奇？

這次展覽中令筆者大開眼界的，倒是大量的從未見過的圖片和傳單、北高聯決議、會議紀錄。

筆者雖在學潮中盡量收集各種傳單（包括戒嚴部隊空降的），但真是收不勝收，單是北天一所印就以萬計，如何收集？在看展覽的人羣中，不少人看得十分仔細，他們看的均是傳單和港台報紙、雜誌的內容。這些印刷品當時傳播範圍十分有限，但在展覽中，卻獲廣泛傳揚，相信這是主辦者始料不及的。

而且有些圖片亦十分罕見，如侯德建與戒嚴部隊談判照片，從來未在海外報章刊出過。又如「清場」時，有人在紀念碑北面第二層圍欄上寫着「六四慘案，血染京城」字句，也未曾完整地與海外讀者見過面。但這些，均可在展覽中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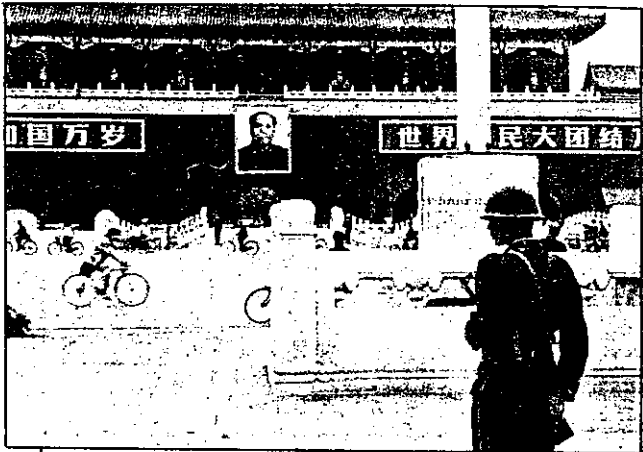
筆者仔細的看了一個多小時的展覽，但未聽聞過場內的幾百人中，有誰說過一句評論的話。看展覽的人均十分專注，但基本上不做聲，並沒有像人民日報《血寫的教科書》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有人「正在含淚認真抄下戒嚴部隊的宣傳口號」的現象。因為北京人都心中有數。（編按：請參閱彩色圖片。）

筆者與一位北京朋友談起「暴亂」展覽中觀衆的沉默反應，他說：「北京人不會這麼蠢，拿雞蛋碰石頭，但北京人是不會罷休的，我絕不相信這個事件十年內不反。李鵬鄧小平正坐在要爆發的火山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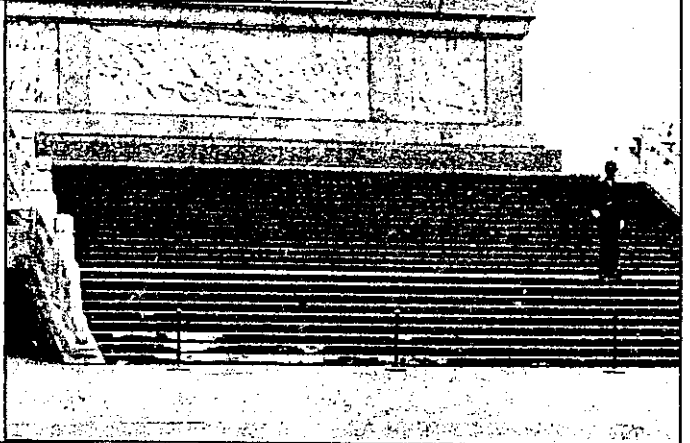
他還說：「死了兄弟姐妹、父母、子女的人，絕不會放過這些兇手，一百一年以後，帳也是要算的。」

百姓半月刊 1989/11/1

■戒嚴部隊士兵守衛在天安門廣場。



■執勤的士兵與警察在街頭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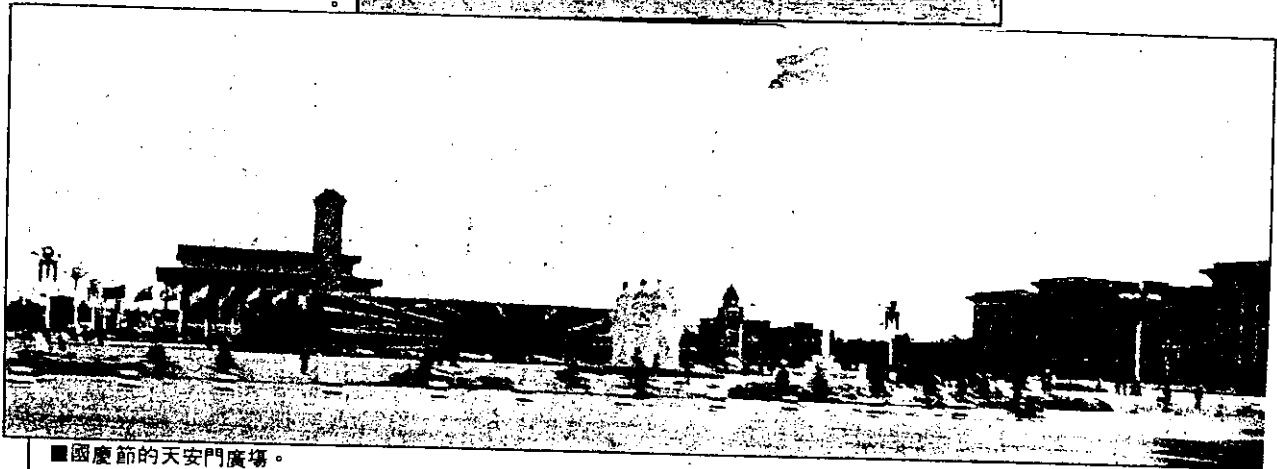


■四個月過去了，被戒嚴部隊焚毀的紀念碑台階仍未修復（見底下一二三層）。

■士兵在街頭巡邏，「保衛」首都安渡「國慶」。



■士兵在廣場巡邏，防止「破壞」。



■國慶節的天安門廣場。

北京「平暴」宣傳圖文自打嘴巴

稱頌解放軍誣陷北京人民

在血洗京城以後，北京當權者迅速組織出版了一批攝影集、文集，揭發所謂「暴亂真相」，欺騙人民，以便於實行法西斯統治，在政治上奴役人民。

目前已見的文集、攝影集、雜誌專號已有十種，相信近期還將有不少推出（參閱附錄）。

這些書籍基本上都是依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為藍本剪輯而成的，在觀點上誣陷「八九民運」是一動亂，而發展為「暴亂」，為鄧李楊政權「屠城」開脫。以收「誣害重覆千次，就會成為真理」的宣傳之效。

這些書籍除引用陳希同的報告外，還大量引用中央已公開的文件，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北京日報、新華社、戒嚴指揮部的文章，在已見的十種有關書籍中，有八種在「清場」時的圖片之一，裝甲車和持槍士兵在監視着通衢學生。圖中可見學生拉着手，組成人牆離去，還有人高舉拳頭高呼口號。



籍中，有五種是屬於資料剪輯或輯錄。

而不同名稱的「暴亂」書籍刊出的圖片，亦有不少相同的，幾乎均為解放軍畫報、解放軍報、新華社記者所攝，是稱頌解放軍、誣陷北京人民學生的照片。

但是由於收入的文章是由不同的人所執筆，相當部份內容是屠城創子手偽造的，所以，細心的讀者就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不同的文章互相矛盾、互打嘴巴。

譬如說，公推衛社主義共和國的一書收入的兩篇關於「清場」的文章，就互相矛盾，令人發笑。這兩篇文章剛好是一前一後，讓讀者讀完上篇，再讀下一篇時，就發現兩文雖談論同一件事，却是兩個不同版本，變成「清場羅生門」。

這兩篇文章一篇叫作《一位目擊者談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情況》（原載北京日報六月十日），另一篇叫作《清理天安門廣場目擊記》（作者柏軒，原載解放軍報六月七日）。

目擊者誣蔑自打嘴巴

北京日報的目擊者自認「看到了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全部事情」，「目擊者」談到廣場清理「起火」事件時說，「在學生撤退之前，一些圍觀羣眾和個別學生把他們穿的那些指縫來的棉襖，還有看見明明是新毛毯，第一次使用踏踏了的那種毛毯，還有新的棉被，他們用火點着了，點着以後，他們扔到路障上，覺得能夠防止裝甲車開過來，火燒到第二天凌晨以後，部隊也沒有去撲滅它，因為當時廣場垃圾很多，一把都燒了」，他還強調「我看到着的是圍觀羣眾和學生點的，戒嚴部隊是否燒我沒看到。」

令人奇怪，當時尚未天亮，這位北京日報目擊者居然可以看出學生羣眾焚燒的衣服是「指縫來的」，棉被是「新的」，「明明是新的毛毯，第一次使用踏踏了的那種毛毯」，還稱看到「廣場發生的全部事情」，唯一看不到的却是戒嚴部隊是否在廣場放火？

阮眸

而解放軍報的「目擊者」談到廣場起火時却明確描寫：「由於少量搭帳篷的木架是用鐵絲網條捆在一起，戰士赤手空拳無法拆除，一些垃圾堆物又難又臭，加上對少數暴徒的仇恨，因而，那些清除到一起的東西，被戰士點燃燒着。」（豈非搬了北京日報目擊者的嘴巴！）

看了這兩篇文章，使人不禁莞爾，兩位目擊者太沒有默契了，而這些書刊的編輯又太粗心大意，他們都應該好好向袁木、李金華師傅學習、討教，滿臉後來擔任「目擊者」角色。更要命的是這兩位目擊者還知道解放軍記者已拍得士兵在廣場不僅燒棉襖、棉被，還燒單車的圖片，並公諸於世，原來沒有默契的不止他們兩人。

資料不盡不實不可相信

而在這些書籍中，表面看來較有參考價值的是「內部發行」的《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一書。這本書披露了部份「不完全統計」的資料數字，讓我們看到當時不知道的情況。



▲侯德健與戒嚴部隊談判，提出和平撤退條件。

民主女神雖被毀，但人民追求民主的意志不可摧。



△「據不完全统计，在動亂和暴亂期間，計有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八十四個城市中的六百餘所學校，有二百八十餘萬人次上街遊行」。

△「據不完全统计，在平息反革命暴亂過程中，北京高校死亡人數為：學生二十六人，教職工六人，共計三十二人」。

其中北京教職工死亡人是首次披露的數字，但三十六人之說，早為人嗤之以鼻。

△在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九日，「全國有近八十個城市，五百餘所學校的一百五十萬人次上街遊行」。

△「據不完全统计，五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九日，北京共有七百多個單位參加遊行。其中：高校和成人高校等近六十家，中學、技校三十多家，職業高中十多家，文化部門四十多家，科研機構五十多家，中央、國家機關五十多家，市屬機關、單位二十多家，民主黨派九家，宗教界三家、工廠、企業、商店、飯店、公司一百六十多家，醫院十三家及其他。外地八十多所學校學生來京，來自十五個省市自治區。」

由於已證明是「不完全統計」，所以只具參考價值，不可盡信，筆者資料：在五月十八日大遊行中，據當時報道：僅是北京王府井大街參加遊行的商店就不止一百六十家，當然本書的作者是穿新衣的聰明皇帝，他早已宣佈是「不完全統計」。

△透露絕食抗治情況：「北京急救中心披露，截至五月二十四日晚六時，全市三十二所醫院救治學生九千一百五十八人次，留院觀察八千二百零五人次，至今無一人死亡」。若據這一資料，

則在三千名絕食學生中，平均每八人入院超過三次。

△國外留學生情況：「據不完全统计，自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我國在國外的留學生先後參加遊行、集會的約三萬多人。其中在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各有數千人」。從這裡可見，大陸是十分關注海外留學生動態的，雖然上述數字一定是大打折扣，書中不少資料不盡不實，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它，知道一些情況。

△例如西藏對學運反應。由於拉薩早已戒嚴，海外一直無法確知拉薩在全國學運波瀾壯闊展開以後的情況，這本書讓我們知道了，拉薩學生也如全國各地人民那樣，勇敢地投身這場運動，在五月十八日西藏大學四百餘名學生和少數青年教師在校內集會，要求上街遊行（拉薩仍處戒嚴期，禁止集會、遊行活動）。學生衝出校門，在高校門口約三百米的拉薩市政府門口發表演講，聲援北京，一名女學生呼喊「打倒中央」，但無人響應，學生返校後宣佈罷課，直到北京學生絕食請願活動結束。這些記述，顯示西藏人民是何等勇敢和富有正義感。

盡致發揮造謠專家技倆

在同一天，在中國北端的大城市哈爾濱，也有「二萬餘人上街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參加遊行的高校學生及幾千名科技界、新聞界的工作人員、中學和中小學學生等。哈爾濱工業大學一千多名教師，包括二百多名教授、副教授，也有上街聲援，哈工大等七十餘名學生上午在省政府門前組成「志願絕食團」宣佈絕食，絕食學生下午二時增至近二百人」。

天涯海角都有人參加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

而對於北京以外的大學學生死亡情況，海外亦一無所知，本書披露了兩宗學生死亡案件：六月一日「凌晨一時許，四川工業學院百餘名學生在成灌公路上攔車進城時發生車禍，一名學生當場死亡，五人受傷」。同一天，合肥地區安徽大學四所高接近千名學生，晚上在市府廣場，為離京返肥途中墜車死亡的安徽大學學生劉玉根開追悼會」。

當然我們現在尚無法知道這些事件的真相，但是筆者相信，在將來這些事件定會水落石出，證明北京以外學生在當地亦為「八九民運」流了血，付出了代價。

選輯都用偏面手法，比如公驚心動魄的五十天談到五月二十七日「北高聯」的中外記者招待會時，就隻字不提當時王丹所作的「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呼籲廣場上的學生在五月三十日撤出廣場一事，該書反而還指「北京一些高校的非法組織的廣播站繼續為動亂加溫」，「不少高校學生希望盡快復課」，但是，一些非法組織仍在積極活動，事態沒有平息」，盡數地發揮了造謠專家的無恥技倆。

而在出版的攝影專集中，亦大量挑選那些軍隊如何被打、軍車被燒的場面來刊出作宣傳，而成千上萬的平民、學生無辜被射殺、擊傷的圖片，却一張都沒有。

例如一張廣場被「平暴」書籍刊用的圖片，圖中是屠城軍在搬運路障，其中一個士兵，用右手舉著步槍指向天空，左手在拖拉路障，明明是士兵在清除路障，說明却說士兵「追不得已對空鳴槍，進行反擊」，既是向天空鳴槍，又怎麼會是「反擊」呢？又拿編造較容易，但照片却不易偽造，從有些照片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不少東西。（參見彩頁）

在現有的兩本攝影集中，看到的幾幅學生在清場時撤退的照片，我們可以知道：

一、學生是在廣場路東側向南撤退的，估計當時學生從紀念碑被驅趕倉皇退至廣場東側中國歷史博物館前。

二、學生撤退時，至少是在持槍的



■民運人士被捕。(原說明說是歹徒)

士兵和裝甲車脅逼、監視之下離開的，而當時仍有學生呼號。

三、天大亮時候仍有學生在廣場上，因為現在無法估計仍生存的學生是在何時全部從廣場上撤走的，從圖中估計至少是在上午六時仍有學生在廣場。

四、從公開的圖片中，無法看清廣場上的情況，顯然是有意識挑選的。這些圖片無法證明廣場上沒有死過人。

五、我們在屠城後看到的中國官方公佈的所謂全部學生安全撤退的電視片，播出的畫面是當時天色尚昏暗，所以可肯定說片子所見撤退的學生，絕不是最後一批，因為現有一頓官方公佈的圖片顯示，天色大亮以後仍有學生在從廣場上撤退（參見彩圖）。

筆者強調的是，這些「平暴」書籍的相當部份內容都不可信，因為這些書籍全部都是依據北京市長陳希同所作的「平亂報告」為藍本派生的，騙人手法亦如出一轍。

百姓半月刊 1989/12/1

附錄：北京新近出版「平暴」宣傳圖文集

近內地出版的關於平息「暴亂」專集、攝影集、資料輯錄可見的至少有十種，分三大類：攝影集、文集及資料輯錄、雜誌專號。

摄影集

一、《北京風波紀實》，北京出版社出版，中英文版，印數一萬冊，共收入圖片一百三十三幀；

二、《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長城出版社出版，中英文版，印數二萬冊，為攝影集，共收入圖片八十五幀。

文集、資料輯錄

一、《捍衛社會主義共和國》，長城出版社出版，五百三十頁，印數二十二萬冊。

本書較全面輯錄了由四月份至七月份的已公開中央文件、法令、報紙的文章（包括人民日報、北京日報、解放軍報）及新華社文章。

二、《一九八九年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市委辦公室編，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印數十萬冊；一百六十八頁。

三、《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大地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印數二十五萬冊；二百三十一頁。

以上兩樞書，均用日記形式，記述八八年下半年起至八九年六月十日所謂鬥爭情況，兩書披露了不少未公開過的資料，特別是〈驚心動魄的五十天〉一書，有很多關於八九民運的統計結果未見公開。

四、〈徹底揭露反革命暴亂的真相〉，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宣傳司編，法律出版社出版，印數四萬一千冊，一百七十三頁，收入今年六、七月份新華社、人民日報、戒嚴部隊新聞處部分文章。



■最近幾個月大陸出版的部分「平暴」書籍。

五、《京都血火》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印數五萬冊；三百七十一頁。

六、《學潮·動亂·暴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十萬冊，四百零四頁。

以上三書均為內地的新聞機構所作的報導輯錄，內容大同小異。

雜誌專號

一、《西域藝苑》一九八九年第五期，（反革命暴亂的始末專號），九十六頁。

二、《紅與黑的紀實》，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上海市總隊政治部《人妖間》雜誌編輯部編輯，印數七萬冊；八十八頁。

雜誌專號內容亦以大陸新聞機構的報道為主。📖

三、劫後京城



自六月九日鄧小平亮相往慰問戒嚴部隊後，世人均明白鄧小平不單是改革的總設計師，亦是鎮壓民運的幕後主腦。平息「反革命暴亂」後，北京市民再度面臨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文革創傷記憶猶新，想不到十年改革開放後又走回頭路。中國，究竟何時才能脫離苦難？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日，北京戒嚴令終於解除了，但人民是否就可鬆一口氣？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137	大屠殺後的中共命運（歐陽明朗）	爭	7/89	61/63
138	茫茫長夜的開始（王路）	南	6/89	24/25
139	屠城之後（金延湘）	九	7/89	82/83
140	白色恐怖在海內外	民	7/89	19/21
141	白色恐怖到處勒索公安警察成了強盜	百	16/7/89	49
142	北京流傳的內幕消息（易辰）	解	7/89	6/10
144	槍桿子下無言的頑抗	亞	23/7/89	9
145	一手收、一手放	亞	30/7/89	6/7
147	黑社會主義怎樣治國（齊辛）	九	8/89	19/21
149	槍口下的北京（張河）	爭	8/89	14/15
150	審查、復仇、對抗、京城劫後（張結鳳）	百	16/8/89	28/29
151	中國式的黑色恐怖（任鳴中）	九	9/89	22/23
152	客從北京來——六四後北京城的眼淚（幽芳）	明	9/89	33/34
153	是非聲中北京行（丁明）	鏡	9/89	37/39
155	北來雁（四十五）（趙凌如）	南	8/89	90/92
			9/89	46/48
158	北京檔案（汪希祐）	九	7/89	76/77
	北京檔案（汪希祐）	九	8/89	71/72
	北京檔案（汪希祐）	九	9/89	74/75
	北京檔案（汪希祐）	九	12/89	71/72
162	北京歸來者放談內幕民情（石鳴）	民	10/89	40/42
163	北京心態錄（曉冲）	爭	11/89	22/24
164	仇恨充滿着北京城（謝民）	爭	9/89	15/16
165	粉飾昇平下的北京淚（龍子）	百	1/10/89	52/53
166	白色恐怖下的北京（傅妮）	百	1/10/89	54/55
167	解嚴之前的北京（古雪姣）	中	10/89	22/23
169	「十、一」北京聞見錄（新華橋）	明	11/89	38/40
171	來自中國的信（吳明）	中	11/89	81/84
173	無聲中國的人民心聲	九	12/89	15/18
175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江河海）	中	12/89	16/21
177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江河海）	中	1/90	21/26
181	中國政局內緊外鬆（靳軍）	中	12/89	25/27
183	一九九〇年來臨之前	解	12/89	7/9
185	北京解嚴內張外弛（何伯施）	當	13/1/90	5
186	中共仍靠槍桿子說話（賀貞明）	爭	2/90	25/26
187	外鬆內緊未解先嚴 出爾反爾令人心寒（曾英）	鏡	2/90	40/41
188	夢的傷感——北京最新聞見錄（李遠）	百	16/3/90	20/23
191	北京在軍事管制之下（北音）	爭	3/90	15/17

大屠殺後的中共命運

歐陽明朗

十年改革蠶食了中共的統治基礎，經濟活動的自由開放引致專政功能的衰退。

中共血洗京城反映了這個政權再也無法以政治手段控制大局，只能以軍事手段維持血腥統治。

中共的統治並沒有因為軍隊的介入而堅強起來，而是因此更變得虛弱、無能和無奈。

大陸民主運動從要求對話發展為要求政府下台，反映着人民要收回「人民政府」權力的一種趨向。

中共拒絕民主，但用槍桿子清除不了黨內腐敗，解決不了黨與人民的矛盾，反而等於自掘墳墓。

覺醒與徬徨

中國大陸四五月六月的民主運動，是一次全民民族意識的大覺醒，也是一次民主力量的大檢閱。而同時，在這個運動的反面，是中共政權反動性、腐朽性的一次徹底暴露，是共產黨反動派勢力的一次總崩潰。

中共用機槍和坦克血洗天安門廣場，這反映了這個恐怖警察國家，再也無法以政治的手段控制大局，只好以軍事的手段實行血腥鎮壓。這既說明了中共的虛弱，也說明了人民力量已壯大到了威脅着這個專制政權的生存。這正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在暴風雨過後，中共在全國實行白色恐怖，到處追殺民主分子。在屠刀面前，許多人感到絕望而產生悲觀主義，只見漫漫長夜而看不見黎明的曙光。

專政功能極大衰退

其實我們也應該看到，血腥鎮壓只不過是中共反動派走向滅亡的一次垂死掙扎，只能靠動用槍桿子來維持它的統治，這已是它十八般武藝中的最後一招了，這一招過後，就是它的末日了。

在過去四十年中，中共軍隊除了在文革的非正常時期內，並沒有直接參與中共對人民的統治，在專政功能中，公安局比軍隊更為恐怖，公安局憑着各級組織機構、戶籍制度及鐵飯碗，對人民的統治發揮到了封建現代化的頂點。但是，十年經濟改革與開放，慢慢地蠶食着中共這個統治基礎，經濟活動的自由開放對政治制度的僵化保守產生了極不協調的作用，引起了專政功能的衰退。

中共也早已感到了這種自由經濟形成的政治壓力，所以近年各地成立了企業化經營的集體所有制的保安隊伍，公安局、派出所、武裝警察也都擴大了編制，並在各大城市成立了防暴隊。

但是，這只是治標的做法，經濟開放與政治保守所產生的巨大矛盾無法排解，警力的增強抵

消不了專政功能的衰退，經濟改革開放所產生的自由化巨浪，把原有專政機器都淹沒在羣眾運動之中了。所以四月下旬北京大學生及市民的愛國民主運動一起，公安局和武裝警察的阻撓根本不起作用，到五月，這兩個專政機器甚至完全癱瘓了。

中共不得不不在其統治史上第一次直接動用軍隊大規模參與專政。現在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相對於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軍隊是無辜的，人民軍隊的光榮稱號被鄧小平出賣了。開放改革的十年中，「軍隊反對改革」、「軍隊不穩」、「軍隊沒有鄧小平領導不行」這些論調無疑是被人為地誇大了。實際情況是，鄧小平一直死保住軍權，以作為自己在最後權力鬥爭中的籌碼。這次血洗北京城，整肅總書記趙紫陽，就是軍委頭頭鄧小平對這個籌碼的充分運用，這也開了中共統治四十年來增進軍權的先例。

如今，二三十萬大軍開入北京戒嚴已經一個多月，軍隊仍沒有撤離北京的迹象。這反映出中共集團統治下的反對力量並沒有因為軍隊的血腥鎮壓而完全被擊潰，各企業、機關的黨委，各地區、街道的公安局對社會局勢仍然無法恢復有效的控制。中共的統治並沒有因為軍隊的介入而堅強起來，而是因此更變得虛弱、無能和無奈。

新聞封鎖暴露中共不敢面對事實

中共的血腥屠城，在海外傳媒的努力下，以第一時間將事實真相告訴了全世界人民，導致了全世界一致指責中共暴行的新浪潮。

中共不去檢討自己的毫無人性的野蠻行徑，卻不斷指責海外傳媒「歪曲事實」和「造謠」，並以驅逐外國記者作為報復，甚至指責不值其所為的海外親中共報刊和其海外直屬機構被「壞人」利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六月十六日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所有報道天安門廣場六月四日有流血事件的都是用八十年代科技進行的一「造謠」。

中共這是把全世界人民都當作白痴，以為用一條遮羞布就可以遮蓋完他們所幹的暴行和醜事，他們一小撮人以爲宣佈戒嚴，實行新聞封鎖，就可以封住人民的口，遮住記者的眼睛，可以任由他們所欲爲。但是，盡忠職守的海外記者，寧願冒犯中共的「法律」，也要把事實真相報道給自己的讀者和觀（聽）衆。在此種情況下，記者們確實「違法」，但「違法」不等於造謠，反而是「違法」威脅採訪得到的新聞，會顯得更加珍貴，也更接近事實真相。

反觀中共，不僅對外封鎖新聞，對內也新聞封鎖。他們對所有自己的新聞和宣傳部門都不放心，不信任，取消了它們的所有職能，全黨、全國、全軍只由一個戒嚴指揮部發佈所謂有關「新聞消息」。

中共一小撮人就是以此單一的「新聞渠道」，發佈任由他們編造的所謂「新聞」，所謂「事實」，所謂「真相」，並以此指責有關新聞自由的海外傳媒「歪曲事實」和「造謠」。而這恰恰反映了他們不敢面對事實和真理。

中共剝奪了人民的知情權，不面對新聞記者，不承認它所做的一切見不得人，在殺害了手無寸鐵的平民之後，中共要用鄧小平的屠城部隊創子手的昏腦亂，去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這是對人民進行中世紀式的精神專政。

重彈統一思想老調證明無法統一

鄧小平老人小集團的這種做法，連四人幫也不如，四人幫當年造謠，還能控制着「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如今鄧小平一小撮人除了一個戒嚴指揮部

新聞處，什麼也沒有。面對這樣一個虛偽和殘暴的政權，世界各國和人民，甚至絕大部分親共人士，都對其避之則吉，過去十年中共改革派辛勞所創外交成就、統戰成果，一夜之間被鄧小平老人幫踐踏殆盡。

中共軍隊控制了國內所有傳媒，利用單一的宣傳渠道，發佈諸如軍隊開入天安門廣場沒有向人羣開過一槍，沒有一個人死傷的這類由他們任意捏造的消息，意圖讓人相信他們沒有殺人，相信他們所鎮壓的不是愛國民主運動，而是一「反革命暴亂」。但是人們不禁要問，如果鎮壓過程真的這樣和平進行，為什麼見不得人，要禁止記者採訪？為什麼你剝奪了人民的知情權，不敢面對新聞記者的鏡頭，你所說的話還有多少誠實可言？你所做的一切見不得人，見不得光，難道這是在做好事？是在爲人民造福？

在殺害了幾千手無寸鐵的請願者之後，中共老人幫還要用鄧小平接見屠城部隊高級創子手時所說的昏話，去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這真是對人民進行肉體專政之後，又企圖對人民進行中世紀式的精神專政。

但是，中共專政四十年來，一直強調要「統一思想」，而思想卻沒有一天真正地統一過，幾乎每年都有所謂「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出現和政治運動不斷，就是證明。如今鄧小平妄圖以他老朽的法西斯思想統一開放改革了十年的中國人民的思想，這實在是痴人說夢。他逐步毛澤東的後塵，以一個腐朽的大腦取消十一億個大腦的做法，只能促使十一億個大腦更加覺醒，更快地埋葬他們一小撮人的統治。

見不得人的宣傳

像大屠殺見不得人一樣，中共用槍桿子控制局勢後所做的一切仍然是見不得人的。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中共北京市委、中共戒嚴部隊指揮部在血洗天安門後三位一體，不斷聲言在「六·四」大屠殺中，在天安門廣場沒有向人羣開過一槍，沒有死一個人，紀念碑周圍沒有遭到戰火的破壞。

但是，如果沒有水洗不淨的血迹，如果沒有無暇搬走的屍體，如果沒有無盡的彈痕和裝甲車履帶摧毀的台階建築，那麼第二天戒嚴部隊為什麼不及時向全國人民提供清場時的影片？在第三、第四天為什麼不可以讓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新華社甚至《解放軍報》的記者到廣場做屠城軍隊沒有殺人的「見證人」？這只能說明一個事實，他們殺的人太多了，戰火彈痕太多了，他們清完生人的場還要時間清死人的場

他們除了劍子手們誰也不敢相信，他們只好自己證明自己「清白」。

他們除了靠自己證明自己「清白」外，又要「證明」反對他們的人「不清白」，但他們的「證明」同樣見不得人。

他們為「證明」方勵之是「壞人」，是「反革命暴亂」的「黑手」，先是公佈「一位作家」的說話，說方勵之避進美國大使館是「叛國投敵」的敗類，繼而公佈一位「認識王丹的大學生」揭露學生領袖王丹經常得到方勵之夫婦的「教唆指使」。然而，這兩位「作家」和「學生」連姓都沒有，他們為什麼不敢公開亮相？中共說搞「暴亂」的人是「極少數極少數」，絕大部分中國人民是支持共產黨的，共產黨又有槍桿子支持，那為什麼支持者連姓名都不敢說出？這說明了什麼？這只能說明所謂「作家」、所謂「學生」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在說假話見不得人。由此也可見中共一小撮當權者極不得人心，只能靠一些見不得人的蠱惑宣傳騙取人民。所謂「人大常委會七名工作人員」指責香港人支援北京學生運動違反國內「法律」，情形也是一樣。

綜觀四五月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運動的主導方面的人民，民主意識不斷高漲，從要與「人民政府」對話發展為要李鵬政府下台，反映着人民要收回「人民政府」權力的一種趨向。

反人民救不了黨

在運動的被動的一方，中共統治集團專制腐朽思想日見暴露，由拒絕對話墮落到不惜公開反人民以挽救黨小集團的統治權。

一個以「人民政府」自居的政權，居然不肯向人民認錯，拒絕人民收回權力，甚至用槍桿子鎮壓，迫人民屈服，這樣做清除不了黨內的腐敗，解決不了黨與人民的矛盾，反而使中共淪為一幫黑社會分子、一羣政治流氓。而這非但救不了自己，反而等於自掘墳墓。特別是，中共反人民本質的充分暴露，勢必加強人民對執政者的不合作態度，令本來已經陷入經濟危機的中共，更加無法走出危機，從而加速毀滅。

一個政權的末日

六月四日中共屠城之後的所作所為，可以用八個字形容，就是：虛偽、虛弱、無能、無耻。文革浩劫之後，十年改革初期，中共曾有過改過自新的中興機會。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如果權力夠大，早就有了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時代。但是，政治老人幫阻礙了他們。中共僵化腐朽的政

治制度，早在五十年代就鑄造了鄧小平、陳雲、彭真、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和王震他們。他們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他們會拚老命保住他們一手參與打下的「紅色江山」、斯大林體制和毛澤東體制。胡趙十年改革中所遇到的障礙，都可以從這批老人幫身上找到根源。

我們可以看到，十年來，中共老人幫幾乎每兩年就會發動一次破壞開放改革的運動：一九七九年逮捕魏京生和整肅北京民主牆；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五年圍剿劉賓雁，一九八七年推倒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和進行大規模反資；一九八九年血腥鎮壓民主運動。

在改革動力方面，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在一九七九年受挫之後，認識到面對一個殘暴和強大的政權必須有長期充分的準備，故有了幾年的民主啓蒙。一九八五年，民主力量再次見諸行動，這就是一九八五年北京的「九·一八」愛國學潮。第二年，一九八六年更是全國三十多個大城市同時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而且直接對中共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要求。而一九八九年的學潮更是轉變成了一場全民民主運動，要求也更高更強烈，要政府下台。

從改革與反改革兩方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改革運動的發展趨勢是一浪高過一浪。中共反動派已窮於應付；而中共改革派卻不斷在黨內鬥爭中折兵損將，潰不成軍，對中國改革已不起主導作用了。

我們還看到，中共反動派對民主運動的反撲，在一九八六年學潮中有了質的變化，八六年學潮波及面之廣、政治要求之高，有別於以前的自由化運動和民主牆運動的是已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威脅。中共開始從反撲轉變為掙扎求存了。

八九年四五月中國民運，更是以人民的勝利而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認，而且人民直接左右北京局勢長達一個多月。中共的戒嚴和鎮壓，已經不能證明它的勝利，只能證明一個政權的垂死掙扎。

只要看一看民主力量與中共反動派近年鬥爭的發展曲線，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人民很快會得到徹底勝利，也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共反動派的末日已經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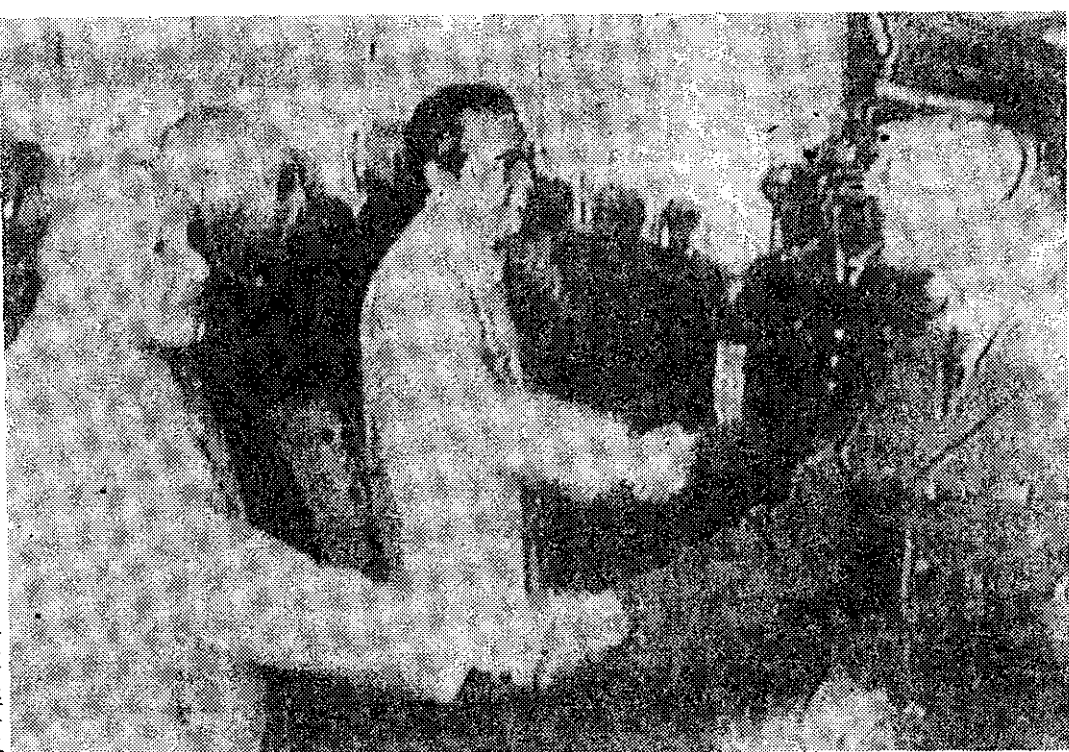
平鳴月刊 1989/7

茫茫長夜的開始

王路

中共主政大陸四十年，已犯下兩宗「史無前例」的罪行：一是文化大革命，二是「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如果說前者是愚忠的結果，那麼後者就是暴政的體現。

六月三日深夜，從天安門的第一聲槍聲起，中共已進入瘋狂的晚期。就在四十年前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地方，成



六月九日，大屠殺後第六天，鄧小平終於露面，與部隊高級軍官握手致意。另與軍官握手者為李鵬。

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和市民倒了下去。他們的「罪名」很簡單：追求民主和自由。

坐在電視機前徹夜不眠的炎黃子孫，看着自己的同胞在機關槍和坦克車前倒下，這些只能出現在《戰火屠城》的鏡頭，如今竟出現在「人民共和國」的首都。而創子手不是別人，正是「人民子弟兵」，這些來自鄧小平家鄉的川軍，注射過含興奮劑的「防疫針」後，瘋狂地向手無寸鐵的人們射出了能在體內爆炸的達姆彈；坦克衝向學生帳篷，他們甚至來不及呻吟，就同民主女神一起倒在天安門廣場的地上……

接下來的幾天，人們從憤怒與絕望中，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屠城的二十七軍與被稱為義軍的三十八軍火拼的傳聞，使人們看到了一線曙光。在血腥鎮壓之後，如果有正義之師挺身而出，即使使用打內戰來推翻現政權，也比在嗜血成性的李楊集團下苟活強得多。可是事態的發展，讓我們看清，血洗天安門只是茫茫長夜的開始，而不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六·四」血腥大屠殺後四天，李鵬意氣風發地出現在電視上，他與王震一起希望戒嚴部隊官兵，只有李鵬一個人發表講話。六月九日，鄧小平又率眾元老在電視上出現，表示當權派甚為團結，鄧小平身體也很健康，加上在此之前，對峙中的二十七軍和三十八軍突然同時調防，看來內戰只是虛言。其實不少人倒希望有「正義之師」出來收拾殘局，既有在天安門為民主捐軀的先烈開路，人們已不怕犧牲，以暴易暴，用槍桿子打出一條生路。

當權者的殺手鐮

一位北京人士在回答筆者的求證時指出，儘管有軍隊互相開火的事情發生，但以中共的「國情」來說，槍桿子一直是最高當權者的殺手鐮，對它的控制之嚴非外界人士可以想像。三十八軍和二十七軍的矛盾只是小衝突而已。至於流落在民間的槍枝，在嚴厲的追緝令下，相信起不了什麼作用。

在六月九日鄧小平再次公開露面之前，海外人士曾希望大屠殺是李、楊「挾天子令諸侯」所為。但是事情已很明白，李楊集團現在所採取的手法，全是根據鄧小平四·二五講話的「精神」，一句「不怕輿論，不怕犧牲」，楊尚昆便可以具體佈置了。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參與屠城計劃的創子手，過高估計了槍桿子的力量，以致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人民羣眾反抗的慘烈狀況，是他們始料不及的。此外，他們還要面對來自全世界的指控和制裁；由此引起的經濟惡果，並不是靠坦克和機關槍所能解決的。

這位人士預料，鎮壓了廣場的學生和羣眾之後，大陸將展開全面的清算運動。在「秋後算賬」聲中，又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遭殃。大陸已進入空前黑暗、殘酷、專制的時期，除非鄧小平死去而再引起高層變動，動搖中共現有的統治，否則，短期內十一億人民是沒有民主和自由的希望的。

屠城之後



屠夫與代理人：鄧、李。

屠城之後，現在是全國性的大逮捕、大顛倒、大恐怖。中國從此進入一個赤裸裸的暴力專政時代，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原原本本出現人間，只不過更原始、更野蠻、更冷血、更殘酷。

在專政機關的縱橫控制下，從北京到地方，從國內到海外，中共正在全力推行統一口徑的工作。目前，全世界的震動還沒有平息，全國的創痛還沒有癒合，所以我們還不太能夠聽到統一口徑之後的妙論。現在，殺人犯忙著滅口，忙着消滅證據，忙着編造歷史。但我想，用不了多久，特別是在海外，就會湧現一些人，為這次血腥屠殺，曲曲折折地進行辯護。

我可以這樣推想：

他們會說：鄧小平本來就是改革派的火車頭嘛。他本人要改革，要開放，十年來的政績，不能一筆抹殺。即使他通過自己的手，捏死了自己培養的改革派接班人，那只是因為這些人執行政策有了偏差，過了頭，嚴重威脅到黨的生存，國家可能變質。鎮壓行動之後，鄧小平第一次露面，不是仍然重申不放棄改革開放嗎？

他們會說：不論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是

否過份，為了防止中國全面內戰，經濟崩潰，軍閥割據，為了顧全大局，還是應該支持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讓他們鞏固政權，繼續未完成的改革工作。中國還沒有另外一個足以取代共產黨的政治力量。誰都知道，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有組織有經驗的政治力量，誰來治理中國？

他們會說：中國地方太大，人口太多，教育水平太低，知識太普及，經濟太落後，問題太複雜，太亂。中國要發展，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就必須有一個執行改革政策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就不能過早實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就必須推遲民主的進程。人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權，不得不暫緩實施，這些本來就是舶來品、奢侈品嘛！只有等經濟發展了，知識普及了，交通通訊發達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才有能力談民主，而且，那時候的民主制度，才有基礎，才可能長久。你看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落後地區，哪一個地方有真正的民主？就算是印度吧，你看民主對他們究竟是好是壞，不是還很難說嗎？

他們會說：我們也同意，學生們的願望是好的，初期的行動，也還合理，口號提得也算合適。但到後來，總歸是太年輕了嘛，難免不夠成熟，情緒超過了理性，容易被利用。你看，口號提到「打倒鄧小平」這個高度，不就過火了嗎？鄧小平是整個改革的象徵呀，你不可能打倒他的。打倒李鵬還可以商量，究竟只是個執行人而已，執行有了錯誤，當然可以糾正。但你不能打倒那個最原始的設計師，那個發號施令的，你打倒他，這個學生運動就變了質，就走向它最初目標的反面，建設性變成了破壞性，這怎麼行？你看，學生不是要民主嗎？現在只好更不民主；學生不是要自由嗎？老百姓得到的是更不自由；學生要改革深入、開放擴大，結果呢？改革受挫，開放收小。這不是適得其反嗎？總而言之，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學生沒有責任嗎？

上面這些虛擬的說法，我想不久就會在海外出現。國內基本上已經不可能再有

什麼對話。恐怕有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將回到無聲的中國。如果地下還保存一些抵抗力量，同志之間，也用不着對話，只有憤怒和工作。只有海外，情況比較特殊，這一類貌似老成謀國、忍辱負重的說法，肯定會隨著中共統一口徑工作的逐步貫徹，隨著新聞報導強度和廣度的逐漸淡化，隨著我們久已習慣的國事健忘症的重現，而曲曲折折地開拓市場。

怎麼駁斥這一類無耻謊言呢？對不起，恕不提供答案。大家還是各自開動腦筋，想一想吧！

我只想在這裏提出兩點，作為我們的良知備忘錄。

第一，只要我們接受這套邏輯，就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整個學生運動，立刻從「愛國民主運動」變成「動亂」；而且，更進一步，還可以接受「初期是動亂後期是反革命暴亂」的定性法。其次，以鄧小平為首腦和以楊尚昆、李鵬等為劍子手的整個鎮壓屠殺行為，立刻從最壞最醜惡的形象中解脫出來。無耻獨裁變成必要的權威，瘋狂冷血變成理智冷靜，非人道變成有遠見，亂國變成愛國，反人民變成愛人民……

第二，上面列舉的幾種說法（恕不盡列，因為只要你開動腦筋，便可以從五花八門的巧言善辯中，鑒別出它們的真性），其實有一個總綱領。這個總綱領，就是鄧小平的「四·二四講話」（有的報導說是四月二十五日，我根據的是美洲《華僑日報》的版本）。我請大家仔細研讀一下這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法西斯宣言，為我們下一個階段的戰鬥作好思想上的準備。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

九十年代 1989/7

金延湘



(左上照片说明文：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中国公民)

据外电报道，自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血洗之后，由杨尚昆为主席组成的“六·一小组”，专门负责对中国学生、市民的民主运动领导人物与积极分子，进行大规模的肃清。

该小组肃清方针与步骤如下：

(一) 逮捕。对学生、市民民主运动中的领袖、积极分子，在全国范围实行大规模逮捕，并教唆公安军警在追捕中格杀勿论。被逮捕者则将被强行押送至新疆、青海、云南的劳动改造所，或被处死。

(二) 清党。杨尚昆在一次讲话中称党员也很靠不住。因此，在大规模逮捕之后，继之，便是一场大规模的清党。据悉，自中共高层至基层都要展开大清洗。

(三) 整军。邓小平称对人民进行大屠杀的二七军是合格的军队。但言外之音透出他认为也有不合格的军队。在清党之后，便是一场整军。整军主要是整掉军队中对镇压学生运动所持反对意见者，同时整掉派系异己。

目前，“六·一”小组正指挥全国的军警对民运领袖与积极分子实行大屠杀。

据目前所得的消息，据北京崇文区公

白色恐怖在海内外



安局透露，该区已抓了三百多人，全北京市已抓了一千多人。在石家庄也抓了近千人。上海也抓了三百多人。在西安、广州、杭州、长沙、大连等地，也抓了大量人。

目前，中国公安部已对民运领袖发出全国通缉令，全国军警已封锁了所有的港口、机场、交通要道，并在各旅馆、人民住宅肆意进行搜查。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

据北京消息，“六·一”小组定的抓人指标是万字数。

白色恐怖气氛还渡过重洋，弥漫至日本列岛。

自邓小平六月九日在电视登场露脸后，一小撮丧失良知的国安部走卒，在京都偷拍参加抗议北京大屠杀游行示威的留学生的脸。被留学生发觉质问后，不得不掉头鼠窜。

在东京也发现了类似的鼠窃狗偷的卑劣行径。在六月十日，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接到了令其三日内去大使馆自首报到，否则就要动手的恐怖电话。使其请求日本警察保护。

同时，一小撮走卒还到大学和语言学校去调查和威胁参加支持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学生。有些受到威胁的语言学校，还贴出了要开除参加游行示威学生学籍的通告。

据可靠的消息，中国驻日大使馆已整了三十三名中国留日学生的名单与材料，并偷摄了几次中国留日学生民主活动的录像。

同时，中国驻日使馆的情报工作的一负责人，对使馆内也加强了监视，并扬言要切断使馆的电视线路，胡说使馆工作人员中了资产阶级宣传的毒。

尽管防范如此严密六月十五日，使馆领事人员马秋耘女士，毅然作出脱离李鹏法西斯政权的选择，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

但是，除了极少数极少数国安部一小撮走卒，既得利益者的高干子弟，政治小爬虫外，绝大多数留日学生是能区分黑猫白猫的。

这些甘与民主为敌的黑猫牌走卒，我们要正告你们：“日本不是二七军枪杆子统治下的屠场，你们在留日学生民主运动大潮前，只不过是几只嗡嗡乱叫的没头苍蝇。你们搞恐吓、造谣言，偷偷摸摸地拍照、录像是干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坏事，也是没有力量的表现。”

再者，你们这些违反日本国内法规的特务活动，也是对一个民主国家主权的严重挑衅，如继续为非作歹下去，是必定会被日本法制社会的法规所取缔的。

日本的留学生们，我们是大多数，你们是极少数极少数一小撮，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干，这些走卒鼠辈是无法逞其阴谋的。我们留日学生民主运动，只要能站住脚，继续前进，那么也是对国内白色恐怖活动也是一个大牵制吧。

英国诗人雪莱说的好，“既然冬天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大屠杀、大肃清的恐怖之冬，终究要过去的，民主的春潮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迎着我們奔腾而来。

白色恐怖到處勒索 公安警察成了強盜

混水摸魚趁機擄亂

每遇亂世，就必然有人混水摸魚，即「擄亂」。北京大屠殺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追捕民運分子，製造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一些曾參加天安門示威、遊行、絕食、慰勞學生的人，更惶惶然不可終日。他們此刻但求平安無事，殺雞宰羊「還神」在所不惜。

北京和深圳的所見所聞，叫人唯有搖頭嘆息。

北京大屠殺之前，學生和市民萬眾一心，築成血肉長城，阻截軍車進城，寫下可歌可泣的歷史新章，在市民隊伍中，以個體戶的熱情最高，他們除了積極參與阻截軍車，還傾其所有，支援學生的絕食和遊行鬥爭，因此，警察和公安人員對於北京的個體戶恨之入骨。但是，秋後算賬的主要對象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個體戶不是打擊的重點。可是輕易放過他們，警察和公安人員又心有不甘，於是就用敲詐勒索的辦法逼個體戶就範。

譬如說，指某個體戶違反某條例，強行罰款，或沒收貨品，這是公然的事。以「依法」辦事為幌子，天經地義，被整的個體戶只好啞巴吃黃蓮。

更可惡的是暗地裡敲詐勒索。北京不少個體戶都經歷過這樣的事。一位個體戶說，某日，兩名「聯防」（便衣警察）人員把他叫到聯防辦公室，惡狠狠地指他參加了民運，攔截過軍車，而且有充份的證據。經他們一嚇唬，那體戶心理失去了平衡。在那段火紅的鬥爭日子裏，哪個北京市民沒有投身到時代洪流中去？他是否認，是不可能的，最後只有承認「錯誤」。「聯防」人員於是提出「私下解決」的條件，無非是勒索錢，那個體戶也只好照辦，交出一筆錢了事。據那個體戶說，他的夥伴們差不多都被勒索過，勒索者有聯防人員、警察和公安人員。尤其是自稱公安人員的人，弄不清是真是假，反正他找到頭上來了，給他一筆錢就是了，如果不給，萬一是真的，豈不更麻煩？

學生家長被勒索

此外，還有的學生家長也被勒索。勒索者上門，指其子女參加了民運，他掌握證據，然後提出「私了」的要求。做家長的雖然知道自己的子女很安分，但又不肯肯定子女沒有參加，因為這是全民性的運動，即使沒有去遊行，沒有參加絕食，但少不了說過一些話。還有，家長自己也少不了捐獻衣服、毛巾，甚至鈔票。總之，尾巴是被人家抓住了，無法抵賴，只好有求必應，勒索多少給多少，只要不被檢舉就謝天謝地了。

總之，在當前，仗著一點點權力，就可以隨意發橫財。那些勒索者有的是真警察、真公安，有的卻什麼也不是，但他們有檢舉權，而且他們的檢舉，最容易獲得當局相信，這種「羣衆檢舉」給了為非作歹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機，也使善良的人們防不勝防。

在南大門深圳，勒索的花樣更新。就筆者所見，深圳的勒索目的是廉價套換外匯。被勒索的人不都是港客，更多的是北方去的人，這些人到深圳去，總帶着一些外幣，以便到購買洋貨。那些勒索者聽他們的口音就能判斷他們是北方人，於是三言兩語搭訕之後，就逼對方換外幣，如不同意則進一步指出對方是可疑的民運分子，揚言要帶去公安局檢舉。被勒索的人當然不服氣，但強龍又鬥不過地頭蛇，更不清楚那些與公安局有什麼關係。再說，到公安局後，要接受調查、審問，即使最終無事獲釋，時間也賠不起，所以只好乖乖順從，滿足勒索者完事。

到處亂抓人

按理說，敢於在深圳大街上招搖過市的人，肯定不會是被通緝的民運分子，但是，當前正是風聲很緊時期，當局寧可錯抓錯殺，也不能放走一個民運分子。對於「羣衆檢舉」，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檢舉對了，可以立功；錯了，也表現了對於中央的無限忠誠，只會受表揚而不會受處分。不管檢舉者是什麼人，能夠檢舉別人就是好人。這與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耗子就是好貓，道理雷同。

這樣的環境下，為各種各樣的「好人」提供了為黨「立功」的絕好機會。前些時候，沙頭角抓到了一個「吾爾開希」，不久後，雲南那邊又傳出消息，又抓到一個「吾爾開希」，都是爭當好貓的好例子。那些根據兩個「吾爾開希」長着大眼睛、維吾爾族人、會說普通話、知道北京的一些情況，就斷定是吾爾開希，幸好他們沒有即捕即殺，要不然那兩個青年就死得太冤枉了。

北京還有怪事，由於到處都在抓吾爾開希，北京街頭賣烤羊肉串的新疆小伙子們，都不敢擺攤了，因為他們的長相與吾爾開希差不多，而且也會說一些普通話，很容易被人誤認，一旦被抓進公安局，少說也得挨頓揍。現在大概好了，吾爾開希已經證明不在中國，烤羊肉串的生意又可以興隆起來了吧？

鑒於當前的社會氣氛就是這麼恐怖，老百姓普遍保持戒心，逢人不說真心話，盡量不招惹是非，人人都勉勵自己「好自為之」。這種消極被動的處世態度，並不能保障他們的安寧，不知何時有人找上門來，輕者勒索，重者報私仇。如此過日子，會好受嗎？可又有什麼辦法？不好受也得受啊！



北京市公安警察手持警棍到處拉人。

北京流傳的內幕消息

解嚴遙遙無期 軍隊補給困難

警車拉着警笛呼嘯而過，劃破了古都的沉靜，周而復始的一夜又開始了。半月之前，還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學運，驚天地泣鬼神，一夜腥風血雨的屠殺之後，一切都轉過來，舉世為之瞠目結舌，許多人還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回事，就忙著為「犧牲」的士兵敬獻花圈和挽聯了。自從發生了本世紀最大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城市騷亂以來，北京便一直處於重兵把守之下，戒嚴將持續至過冬，好戰還在後頭。截至六月廿六日筆者離開時，北京街頭仍然到處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各大體育館、展覽館、公園、禮堂都駐滿了兵，數十萬大軍雲集京城，給養發生困難，陸運、空運中相當一部分已經用於軍事用途——為戒嚴部隊運送補給、食物。

軍人持槍調戲婦女 百姓敢怒不敢抗

軍紀也發生了問題，有些軍人帶着槍上公共汽車引起市民恐慌，有些軍人調戲婦女引起憤慨。目前，戒嚴部隊的任務，除了滿街站崗，保持威懾作用之外，主要是逮捕那些「反革命暴徒」。為了防止被捕的「暴徒」逃離北京，在車站、機場都佈滿了便衣警察和穿軍褲、白襯衣的軍人。一到晚上，軍人們便在便衣公安人員（他們是當地人，不便堅敵我仇）的帶引下四處捕人。

方勵之早遭嚴密監視 特工化裝賣冰棍街頭

住在中關村的方勵之、王超華的家都被大肆查抄，查抄時軍隊將四週道路封鎖，如臨大敵，各帶走一包東西。其實，早在學潮之初，方勵之就來過兩個賣冰棍的老頭，報話機藏在保冷用的棉被裡，抄家之後兩個老頭就不見了。據說迄今已抓了兩千多人，目前主要抓「反革命暴徒」，即有「反革命」行動的，扔磚頭、拔氣門嘴、喊「反革命」口號、燒

·易辰

車、設路障、打軍人的，都在逮捕之列，有一個提供幾軍車的火柴者，被判刑四年。

有一個僅僅搶到一頂鋼盔帶回家，被人舉報後帶走，戒嚴部隊一士兵用槍指着他劈頭橫掃過去，兩排門牙全部打掉，血染四散。抓人不需證據，抓「暴徒」的依據有二，一是錄像，長安街的街燈上都裝有攝像機，大批便衣，公安化裝成市民混在學生中間偷拍了不少照片；二是舉報，電台、廣播反覆播放着舉報電話的號碼，每個城市各有兩個號碼，還到處張貼。街上的電線桿上，單位的大門口上，掛着「檢舉箱」，當局不顧一切地煽動起人性最陰暗醜惡的一面，大力鼓勵告密、扯謊。只要有人告你——不論是否誣告，立即會被帶往戒嚴部隊「傳訊」——先是痛打一頓，逼你認罪，認了罪的立即判刑，至死不認的就放掉，並受到警告：「回去不許亂說！」

秘密逮捕知識分子 侯德健業已陷魔掌

北京遠洋公司幾個同事去看望一個幾天沒來上班者，見他躺在床上，身上、臉上都被打的瘀腫傷痕。軍警問他，就是不說，後來才知是被入舉報。北京人現已經大為收斂，不敢公開議論政府，尤其在公共場所，稍有不慎，被入一個電話就「吃不了兜著走」。據筆者一位在軍界的朋友講，北京的抓人是「內緊外松」，更多不公開的逮捕發生在學生、知識分子、文藝界和機關幹部上，他告訴筆者，侯德健、劉曉波在撤出天安門廣場後不久就遭逮捕，侯被當作台灣特務，劉當作美國特務來處理，這是外國勢力插手學運的「證據」。(將軍，你不能這樣)的作者，詩人葉文福因為此詩，在第一次反自由化中受到批判，他在北京魯迅文學學院學習期間參與學運，此次亦遭逮捕。此外，中國最大最成功的民營企業，著名的四通集團總經理萬潤南、曹思源；社會科學院的嚴家其、蘇曉康、陳一咨等著名知識分子，都在秘密通緝之列，當然，這麼晚才發出通緝，足見他們還未落入魔掌，他們的下落，亦成為眾人所關注的話題。

槍斃人數四位數 開除黨籍六位數

「肅反」、「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重新出現在黨內的文件上，上面下達的肅反指標，槍斃的至少在四位數以上。這一行動將延續至今年十月一日。接着進行清黨，凡是參加過遊行的黨員，都要交待，嚴重者開除黨籍，你不是要退黨嗎？這回可輪不到你退了，參加動亂的黨員，統統開除！凡是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黨員一律開除，當有六位數以上的黨員將受到整肅。

建議修改黨章 鄧小平任主席

自六月四日軍隊武力鎮壓之後，北京的各大黨政機關有一星期沒上班，現在已陸續恢復上班，但並未恢復正常工作，因為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上班時間用於學習、討論、表態，這是慣例了，黨員們早已駕輕就熟，許多黨員和中高級幹部在學習中表示，總書記一職應由鄧小平擔任。軍黨政關係才能理順，否則仍會有大亂，也有的建議修改黨章，重設黨中央主席，由鄧擔任。

老太太戴紅袖章 小腳女人緝逃犯

北京軍事戒嚴，釋放出許多老事物，居民委員會重新活躍起來，老太太們戴紅袖章，上面印着「執勤」二字，三五成羣地站在胡同放哨，監督鄰里有無外人進入，舉報可疑分子，在街道張貼「向解放軍致敬」、「嚴懲反革命暴亂」一類紅標語，弄得四周熱鬧開闢人稱「小腳緝拿隊」。

關山復女婿煮水喪命 李立三孫女斃於流彈

戒嚴軍隊屠殺平民，連中共高幹家屬、司機也不能幸免。戒嚴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在廚房倒開水，被街上軍人開槍打死，中共元老李立三的運氣更差，其父親在大革命時期被毛澤東新倡之湖南農民運動定為地主分子，被農民活活打死，這次孫女又被不知哪裡飛來的子彈打中喪命，另一位元老劉瀾濤（原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司機拿着望遠鏡對着窗外望，看熱鬧，被士兵發現，一梭子彈過來，當場打死。

薄一波孫子生病 司機送院被掃射

薄一波的司機死得更冤，薄的兒媳住在娘家，其父是軍人，軍階上將，一日半夜，小兒急病，要送醫院，但家中轎車是白牌軍車，怕受「暴徒」襲擊，故打電話給薄家，要薄家開一輛地方牌的車來送孫子住院，薄就叫司機開了一輛隨車（不是薄一波自己坐的車），去親家，出發前大家商定，遇到「暴徒」攔車不要停，衝過去。薄的司機開車，兒媳抱着孫子坐在前座，後座是薄親家的司機，駛至一路口有幾個穿白初衣的人攔車，薄的兒媳命令：「衝過去！」司機遵命直駛，衝過這幾人的堵截，不料前面又閃出數人，攔攔掃射，前後夾擊，薄的司機當場中槍不支，但車仍然在開，親家的司機見狀立即翻身而上繼續駕駛，這輛灰色皇冠轎車加速前進，一直到黃寺的陸軍醫院門口才停下來。薄一波的司機已經斷氣。

廣東幹部趙承人馬 下一輪清洗當其衝

此次學運中，廣東省長葉選平，省委書記



• 公然在大街上舉行審判大會(軍事博物館門外)。

林若表態支持中並不堅決，其中原因不難明瞭。趙紫陽長期在廣東工作，文化革命前即任廣東省委書記，七九年鄧小平上台後才調任四川省委書記。林若與趙的關係不同一般，是趙的老部下，老幕僚，趙為廣東省委書記時，林若就是廣東省委書記，趙赴京任總理、林若接替了趙曾任的省委書記職位，林若與趙亦頗好，每次進京謁見，林若都帶了家鄉特產去趙府拜望敘舊。省長葉選平與趙亦是世交，被視為廣東改革開放的代表力量，此次中央倒趙，鄧小平專門把葉、林叫到北京訓話，要他們分清路線是非，堅決站在鄧的中央一邊，不要因為都是廣東來的幹部而對趙的錯誤認識不足。有迹象顯示，在清黨過程中，中央領導班調整之際輪到省一級班子，下一個目標將對準葉選平、林若。

許家屯落台無疑 李子誦「特殊」解決

香港新華社和中資機構當然逃不掉換整的命運。許家屯被公認是趙紫陽的人，按年齡他早已超過中央規定的最高限，早該退休，是趙保他，才使他成為全國最高齡的部級書記，據北京消息來源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曾討論過香港問題，對此次香港中資機構的表現極為不滿，本來早已準備大清洗、大換血，但投鼠忌器，一方面怕引起香港更大的不安，另一方面也怕引起更多的公開叛逃。因此，目前採取安撫政策，先穩住陣腳，等國內平衡之後，香港及海外的反對之聲漸息之後，就開始清洗駐港的中資機構，今年年底將是大換血的時候，護照到期，自然不再延期，改派政治上更為堅定可靠赴任，據筆者了解，國內已有不少共黨幹部紛紛辭職這塊肥缺了——政治上的鮮明態度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難怪國內一些幹部的調子愈唱愈高，大家都想乘虛而入，分一杯羹可以預見，許家屯、鄭華、楊奇，在香港的日子不會太長了，李子誦不是共產黨員，將來採取特殊方式「解決」他。

鄧小平察覺兩個聲音 還以一月中央無聲音

鄧小平畢竟老謀深算，跟毛澤東學了不少中國特色，毛曾稱讚「小平會用兵」。在當今世界上論資排輩，比政治經驗之坎坷，政治經驗之豐富，玩權弄術之精明，無出其右者。早在五月四日趙紫陽會見出席亞細亞代表時強調冷靜、理智、克制和增加透明度時，鄧就發覺趙曾公開反抗，他一面講「中央出現了兩個聲音」，一面開始佈置，讓中央一個月沒有聲音，這種大膽策略是過往政治家從未敢採用的。鄧開始給光養晦了，他行跡詭秘，誰也見不到他，連李鵬也不見，除了一個人——楊尚昆。後來北京發佈的鄧在接見軍以上幹部及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照片，就是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所拍攝，新華社記者早被撤到一邊去了。

撤開黨政軍 只見楊尚昆

在這一個月中，國務院各部、委、全國各省、市、軍區三總部（總參、總政、總後勤部）乃至各大軍區、海、陸、空各軍兵種司令部，全都撤開小平撤開了。他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伸出直接抓野戰軍，牢牢抓住了那些直接聽令於他的軍長，調大軍進京勤王，一來顯示全國軍隊（真正能打仗的而不是那些騷擾龐大的機關空架子）仍由他控制，二來用以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鄧小平這一招，不但外人沒有料到，就是中共高層，亦大吃一驚。三十八軍軍長因調兵手續不全而發生質疑，遲未發兵，立即遭到撤職查辦。

在中央一個月不吭聲，不表態，不發指示的情況下，急壞了各地政府的大員們，廣播、電視裏報導著首都黨政、軍各界聲援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上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中央黨校、團中央、解放軍報、外交部、人民日報等各單位的大幅標語，瞞目驚心，李、楊政府大有風雨飄搖之勢，全國各地紛紛響應，上街遊行。各省、市黨政領導未接到中央指示毫無頭緒，不知如何措置，個個如坐針氈。於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到絕食羣眾處轉圈，不做任何表態。有的講官話打官腔，反而激怒了羣眾，引起更大的憤怒。

陳希同拍馬屁過火 江李討好百姓成功

北京的陳希同、李錫銘，他們擁護李、楊的態度極為堅決，但過於火爆。有論者說是被人授意，但據筆者所知，是馬屁拍過了火候。李錫銘當不上政治局委員，陳希同當不上副總理，無論如何他們都已無法實現其政治野心了。有的地方大員則講「民話」，安撫得比較成功，亂子沒有升級，天津的李瑞環、上海的江澤民即為此類。李瑞環說，中央也有不同看法，但搞亂了社會秩序，影響了經濟生產，還不是你們市民自己倒楣？上海的江澤民安撫得更透：上海搞亂了我們一起承受，上海不會用武力鎮壓羣眾，我家就住在XXXX，我不會走開，不會離開羣眾，大有即使天下大亂也與市民同甘共苦的氣概。

有些省、市的領導根本就沒出來講話。總之，各省都是自發行為，各人都憑直覺做事，多數人是靜觀其變，誰勝誰負，而不敢輕易下河。他們黨內鬥爭的經驗教訓太慘痛了。鄧小平此招一石數鳥：檢驗了軍隊，重新抓牢了兵權，同時，讓全國各省市官員自由發揮，在大非面前排出了「忠、奸」，讓不知天高地厚的讀書人，及黨內那些「化成美女的毒蛇」以為氣候到了，紛紛出籠，一網打盡。處變得當的江澤民、李瑞環則隨著得勝王侯，登上了政治生涯的巔峯。

紅頭文件不見了 謠言傳說滿天飛

北京是古老的東方專制帝國的中心，其城門對城門，大道對大道，整齊方正的城市佈局，象徵著封建帝王的無上權威。每個月，從這裏發往全國的文件無以數計，僅紅頭文件，都不下數百種，人稱中國是以文件治國，一點不假。可是忽然間一切都消失了，一切正常的統治渠道都停頓，堵塞或者說不見了，北京成了謠言與傳說的淵藪，無數的傳聞，小道消息代替了紅頭文件飛往各地，乃至全世界，外國政府找不到北京的決策者，甚至不知道中國是誰在掌權，當北京傳出鄧小平已死的消息，引起了更大的恐慌，居民們自發組織起來，以最具北京特色的四合院為單位，實行區域聯防自保，所有的人都認為鄧一死，軍方必火併，北京會成為內戰的發源地，人們搶購糧食、鹽、買回一箱箱汽水運回家裏——預防斷水，家裏準備好汽油瓶、棉布條、鐵線、木棍乃至小口徑氣槍，一些人將年老的父母送出城外疏散。

軍人家眷紛紛外逃 軍隊大院聯防自保

北京西郊海澱區一帶的軍隊各兵種大院更為緊張，一方面院內駐紮了不少外地調來的軍隊，一方面被成千上萬憤怒的羣眾圍得水泄不通，劍拔弩張，氣氛相當緊張，大院中的軍人家屬紛紛往外逃遷，多數跑往鄉村，直至六月十日局勢完全控制在軍隊手中才陸續撤回。一些素有頭腦的軍隊高幹子弟還擬定了區域自保的詳細作戰方案，如第一步先自保，同時招募散兵游勇，逐步擴大自保區域範圍，擴大武裝，接著提出綱領，徵集兇手，吸收更多的社會力量，組織成一個獨立於各火併集團之外的新崛起的軍事力量，伺機奪取全國政權。

沒想到百姓這麼勇 沒想到當兵真開槍

六月四日屠殺事件之後，筆者訪問了數十名當事者，有指揮坦克進城的軍官，戒嚴部隊的參謀，偵察員，有參與堵軍車，設路障的市民、學生，有職業記者，也有天天在外面「看熱鬧」的無業市民，得出了一个政府派和學生派雙方都不願明言的結論：當兵的沒想到老百姓這麼勇，老百姓沒想到當兵的真開槍，難怪這次北京事變的結局，令到全世界的中國通都大跌眼鏡。

北京軍區司令被擄 堂堂上將受窩囊氣

戒嚴後，北京軍區司令周亦兵身穿便衣乘車入市觀察情況，半路被學生從司機的寸頭髮型（大兵通常只准留一寸長的短髮，被稱之為寸頭）察覺是便裝軍人，便截停查問，學生們爬上爬下搬弄車子，氣得周亦兵要掏手槍，被身邊的保衛幹事死命按下，車子進不了城，悻悻而返。回到司令部，氣得周亦兵往桌上摔擲大罵，堂堂上將，哪兒受得了這氣！逐漸地，戒嚴軍隊由下自上一個個咬牙切齒，要將「暴徒」徹底消滅的殺氣已經騰騰起來，當局仍然壓按住，引而不發。這一變化是外人以至學生、市民都難以察覺的。因此，直到六月三日晚軍隊大開殺戒前一秒鐘，市民們還不相信軍隊真敢殺人，毫無顧忌亦毫不防備地阻擋，打那些端槍怒視的士兵，直到事情真的發生了。人們仍然難以相信這是真的發生了。人們都氣瘋了，拚死報復。建國以來最大的京城慘案，就是在衝突雙方都沒有料到然而卻是被設計好的情形之下發生的。

張伯笠組織暗殺團 學生領袖四處逃亡

六月三日晚，天安門廣場上正在宣佈中國民主大學在廣場正式成立，就傳來了放鞭炮般的槍聲和軍隊殺人的消息，學生們一時都呆住了，憤而變成了瘋狂的仇恨，個個咬牙切齒，正在麥克風前發表演說的民主大學副校長，北平作家張伯笠，突然歇斯底里地喊道：「血債血償！我們要組織暗殺集團，暗殺你們這幫劊子手！」廣場上一片紛亂，張伯笠就是後來被當局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之一，他在喊完了復仇的誓言之後，與其他多數學生領袖一樣，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逃亡之路。

學生的逃亡主要有四個方向：一、南下廣東，由深圳等地越境，這是最多採用的方向。然當局亦戒嚴最嚴，在此方向佈置了最強的力量。安全部一團部長親自南下，指揮封鎖通向港澳的一切通道。南下的飛機、車、船上，不時可見手持電棍的武警檢查證件。二、福建，試圖逃往台灣。三、雲南，翻過重山峻嶺，向緬甸方向越境，這是最艱難的路，當年不少紅衛兵就葬身於通往邊境的密林中。四、新疆，這是最少人想到的路徑。

吾爾開希經新疆出境 學生領袖早準備護照

據悉吾爾開希就是往新疆、伊犁出境轉去外國的。吾爾開希具有戰略眼光，料到當局抓人最先封鎖南方的去路。而且絕少有人夠胆深入遠離沿海的新疆腹地，故能搶先一步，逃出性命。據可靠人士透露，當局通緝的學生領袖和那幾位著名的知識分子，均未奏效，絕大多數黑名單上的人均在六月四日之後的一星期內逃出國外。其實，在六月三日晚，當張伯笠在天安門大喇叭裏，喊叫着要組織暗殺團進行報復的時候，七位學生領袖手裏已接到了外國護照入境簽證的護照，當局的反應又遲了一步，等他們剛剛從收復天安門的「壯舉」中緩過勁兒，想騰出手來抓學生領袖，並且向各地發出通緝令的時候，已經晚了。

元老高老邁 政府決策遲緩

「慢半拍」是政府此次對付民運的重要特點，從決策對話，至宣佈戒嚴至實施行動，再到抓人，無一不比對方慢半拍。這一點兒也不奇怪：中國現在是鄧小平加「元老」當政，（元老：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王震、彭

真、楊尚昆），無一不是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每天只能工作兩個小時。從接到情報，至聚集到一起，開會、討論、實施，決策過程之拖延低效率是可想而知的，以致多處出現對峙情況。還美其名曰「節制、克制」決策慢、效率低、不變通，是政府此次處理事變的特徵，亦將成為今後中國政治的特點。



·吾爾開希6月29日發表錄相講話。

解放月刊 89/7

槍桿子下無言的頑抗

北京近貌

北京實施戒嚴迄今已兩個月，在重兵鎮守下，市面漸趨平靜。但「六·四」慘案陰影未散，戒嚴令下市內仍瀰漫着肅殺之氣。以下是在亞洲週刊記者上週所見的北京：

今年北京的夏夜顯得特別寂靜，過往到天安門附近納涼的市民消失了踪影。昏黑的街頭上，仍見士兵持槍守衛。學生運動期間羣情沸騰的天安門廣場，成了瀟灑全大陸的政治低氣壓的中心。

不但外國人不來，過往成千上萬湧到「京師」的大陸其他省、市居民也裹足不前。在有一國國際旅館者天堂之稱的北京飯店，原先座無虛席的咖啡室，現在空無一人，連設於大廳的禮品零售櫃也漆黑一片。客房使用率只有百分之五。新近開張的五星級王府飯店，今年初期一直保持百分之八十五的客房使用率，現已跌至三成左右。

表面上，北京部分生活已恢復正常，但戒嚴部隊仍在通衢大道和主要黨政機關崗崗巡邏。當局似乎刻意令人們見到軍人，以示警戒仍未鬆懈。站崗士兵頭上支起的彩色太陽傘，稍為沖淡殺氣。而那些來自農村的士兵大都憨厚，對身邊的事物充滿好奇，甚而友善到把沒上膛的空槍交給外賓「觀賞」，增添了些許和氣。但軍人進駐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依然門禁森嚴。一個本地人欲入內訪友，在出示工作證和介紹信後仍不得其門而入。據說，院

內正在繼續「清查」。

北京白天的交通又開始擁擠。各單位正透過黨的系统進行由上而下的層層傳達，以及由下而上的層層「交待」。上週被北京市市長陳希同點名批判的多位人士，其中尚留在北京的自然成為朋友眼中的「問題人物」，只在碰面時私下打聽他們的處境，默然關切。雖然各界紛紛表態，聲稱統一於中共十三

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精神下，但許多人情緒尚難平復，思想上還打不開結，拖延着不肯妥協。學生運動期間吶喊的口號已聽不到，無言的抗拒卻仍頑抗。一位曾對開放政策極感興奮的北京老知識分子，只重複一句話：「自六月四日起，就只埋頭寫書。」未被波及的知識分子礙於局勢，不得不暫時冷卻前一陣子沸騰的熱血，鑽回「象牙塔」避世。

現旅居美國的大陸異見作家劉賓雁的著作已不見蹤迹。另一位異見分子方勵之的言論則成了「反面教材」，由官方編寫的《方勵之的眞面目》到處可見。書報販子說官方最近頻頻檢查，有些書刊不能再賣，談話問題、講道理的內容少了，令書報攤上的懶惰、武俠書籍更為刺眼。

方對外極力突出太平景象，外國人得以攜帶印刷品入境，而不受抽查。但北京城內午夜過後仍可聽到槍聲，中、小學生暑假期間得學習「熱愛解放軍」，不熱悉的人見面時只談天氣打哈哈。對比之下，益發突出了內外有別的一雙重政策。然而過慣了這種日子

的北京人，對月來的事大多心知肚明。一位賣報的年輕人說：「這些事只可意會，不得言傳。」但一知識分子則仍固執的說：「即使有生之年看不到『實現民主』那一天，也不放棄。」



一手收，一手放

一面加緊政治整肅和控制，一面又想繼續推動經濟對外開放，北京當局正在這條自認為「符合中國國情」的險路上躊躇而行。以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新班子」上馬已近月，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要他們在三個月至半年做出實績，樹立形象，但外界看到的只是對民主運動人士的更大範圍鎮壓，以及伸展到社會各個角落的思想控制。江澤民在上週舉行的中共宣傳部長會議上，要求黨組織和行政組織都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

鄧小平六月十六日說：「對於專政可以少講，或只微不講。」當前，大陸的專政機構正加緊搜捕和審處民運人士，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週前表示要將「進行暴亂、製造動亂的犯罪分子……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清查出來，依法嚴懲，不留後患」。

據悉，支持民運的北京《光明日報》記者、已故中共元帥葉劍英的養女戴晴於本月中被捕，居室被查封。接着，因參與前年學運入獄、半年前獲釋的留美博士生楊巍在上海再次被捕。在此之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王正雲落

網。另外，有關人士向亞洲週刊證實，理論家李洪林七月初在福建省福州市被「拘傳」，手稿、信件均被搜去。被捕的還有曾以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名義印製號外反對戒嚴的該報記者張抒，以及出版持不同政見者劉賓雁報告文學集的陝西省華岳出版社副總編輯李貴仁等。

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當局還力圖查出吾爾開希等民運領袖外逃的「地下通道」。北京消息人士說，大搜捕將持續到年底。但民間反抗情緒依然強烈。日本航空公司駐北京辦事處上週接獲自稱「血光敢死團」的恐嚇信，說要處死在大陸的日本人，以懲戒日本「勾結共黨獨裁政府」展開「大規模經濟侵略」。亞洲週刊獲知，北京自上週起

海南省洋浦港：鄧小平堅持搞「大特區」，租予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成片開發



段文華：新華社

停止火車托運服務，因有消息說托運的物件中可能會藏有爆炸物。早兩天，北京菜市口的人行天橋上曾掛出書有「北京人民不服」大字的橫幅。中共為了紀念「七·一」建黨，推出歌頌其當年擊敗國民黨政權的電影《巍巍崑崙》。但在有要員出席的首映禮上，當影片出現當年北京學生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的情景時，觀眾熱烈鼓掌，暗示對今日學運的同情。當局事後對有關鏡頭大加刪剪。

北京街頭白天軍人活動有所減少，但入夜後的檢查仍然嚴格。據悉，「六·四」事件前後散失的槍枝，仍有數百枝不知所終。戒嚴部隊擔心受襲擊，軍人家屬害怕遭報復。

《北京晚報》日前報道說，一名自稱是「敢死隊」成員的人承認他參加的小組殺死了三名士兵，奪走了武器。據北京的東歐人士透露，北京市十月以前不會取消戒嚴。有傳聞說，當局擔心民運分子在九、十月間官方慶祝當政四十週年的時機，重新活動，製造尷尬場面。

但是，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真正使當局不安的，是在政治和思想上達到的廣泛抵制。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部長王忍之日前對理論界人士說，策動「動亂」的人肯定是要翻案的，他們的理由有四：得到國際輿論和潮流的支持；這次很多人都參與運動，說明了民心所向；歷史上有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翻案等先例；年齡上的優勢。

分析家認為，王忍之的

談話顯示當局急欲加強思想政治控制的急切心情。王等人曾受到在這次事件中失勢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排斥，現在捲土重來，更欲藉全面整肅取得更大的權力，控制宣傳部門。

北

京當局已向主要傳播媒介及一些中央機關派駐工作組，以「指導學習」和「協助清查工作」。亞洲週刊得悉，在清查中，每個人都須交代「動亂」期間的行為，甚至要交出私人日記為證。成為重點清查對象的「問題人物」被衆人迴避，其私人信件往往被截上繳。人們重施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求存自保的「故技」，閉口不談國事。

面對這種氣氛，在法國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已決定不返回北京。他對友人表示「不想整人，也不想被整」。



戴晴：「大清算」的新受害者

北京加強政治思想控制的另一舉動是全面清理出版物。新聞出版署上週將六十多種書刊定為「宣傳色情、迷信和暴力」而予取締，同時禁售一批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刊，包括方勵之、嚴家其等十名持不同政見者的全部著作。當局又沒收了北京、上海等地旅館中出售的海外報刊，並宣布從此不准出售，官方的理由是由這些報刊「散播謠言」、「干涉中國內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北京當局把高等院校看作是次「動亂」的「溫牀」，決心大加整頓。江澤民在有關會議上說，「不少

青年這幾年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很大」，今後要在高校「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理直氣壯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青年學生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國務院總理李鵬重提文革之前的「又紅又專」口號。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更突出教育的「階級性」，明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服務」，保證黨組織的「領導和政治核心作用」。

據悉，整頓高等院校的措施之一，是大幅減少曾是學運中心的北京大學等院校下學期招生人數，並停止招收研究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院面臨關閉。曾同情學運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等人職位恐怕難保，一批參與學運的教師亦將被清洗。在校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尤其是即將畢業者，都須接受「思想教育」，寫出「反省」這次「動亂」的思想報告，方能過關。

大陸理論界已被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重災區」。在日前的理論界座談會上，中共中央

央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社的張啟華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歸結為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文化「西方化」和思想「非馬克思主義化」，而「中心是資本主義化」。中宣部部長王忍之更表示：「要徹底清算資產階級自由化，就必須深入各個思想理論領域。」一位大陸知識分子說，這實際上是要扼殺改革十年來大陸理論界所有新的思想觀點。《人民日報》上週刊登長文批判電視片《河殤》，並指趙紫陽庇護「在文藝領域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少數人」。

鄧小平前不久曾表示，現時討論市場、計劃等理論問題，「不但不利於穩定，還會誤事」；對於以往經濟中的責任問題「過兩三年再談」。但在「左」的勢力迅速崛起的情況下，鄧看來無力阻擋這些人「算老賬」。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研究員在北京的《經濟日報》上撰文，對「私有化」的主張大加撻伐。分析家認為這是當局收縮私人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前奏。

對於西方七大工業國會議對大陸鎮壓民運的譴責，北京指此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但在反擊時又重申不改變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分析家認為，北京當局相信西方出於經濟利益和戰略考慮，不久就會逐步與其恢復往來。基於這種判斷，鄧小平甚至提出推行「大開放」，欲利用大陸的勞動力和土地大規模吸引外資。

中共「新班子」能否貫徹鄧小平的這種想法，海南島的洋浦開發區計劃是一個指標。去年海南建省後，就決定將洋浦建為大陸第一個自由港，由日本熊谷組公司租下港內三十平方公里土地成片開發，租期七十年，全部投資將為十餘億美元。

但是，這一方案在今年初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期間被一些人指為「出賣主權」，國務院也遲遲不拍板。「六·四」事件後，由於海南主要負責人梁湘、許士傑與剛下台的趙紫陽關係密切，趙的兒子趙二軍又曾積極參與制訂洋浦計劃，加上傳言李鵬反對讓熊谷組獨家承包，因此，當梁、許日前受召到北京時，許多人認為兩人以及洋浦計劃都凶多吉少。

到了上週，情勢趨於明朗。海南領導層透露，江澤民和李鵬表示堅決支持開發洋浦。江還重申海南辦「大特區」的方針不變；給海南的地方立法權也不變。據悉，洋浦計劃得到鄧小平的首肯，也受到近來甚為活躍的中共元老、國家副主席王震的大力支持。王日前會晤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的王元平，相信與爭取日方繼續投資有關。有消息說，北京當局還計劃在天津、廈門等地將土地整片出租給外商開發。

一些學者指出，北京這些舉動顯示其確想進一步利用外資，以擺脫經濟困境。但大陸整體經濟狀況正在惡化，政治壓制又越來越嚴厲，許多外商要經過長時間觀察，才會決定是否參與大陸的大型投資項目。

北京的書店：全面清理「毒草」



黑社會主義怎樣治國

齊辛

控制軍隊的秘訣，是中央軍委在戒嚴前派出特派員，到各軍區、各部隊去擔任聯絡工作，藉以緊握各地軍權。所謂「六四」事件中「誤傷死亡」的群眾，實是當局派去冒充「群眾」以製造事端的「特工」，因家屬鬧個不休，當局只好重賠。

中共當權者口口聲聲說要堅持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六四」屠城及以後的發展，已充分說明，他們所堅持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黑社會主義」。

什麼是「黑社會主義」呢？黑社會主義就是奉行黑社會的邏輯：只講強權，不講道理；暴力就是一切。看過《教父》這本書或電影的人必會發現，「黑手黨」的組織權力結構、輩份因素、辦事邏輯以至意識形態，與「六四」後以中共政權可以說極為相似。電影《龍年》以及香港一些以黑社會為背景電影，也可以找到與中共現政權相似之處。

「公雞吃燒餅」學

搞政治，當然不能不講實力，而且實力應是執掌權力的最主要因素。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實力，講的是民衆的支持程度，或可掌握社會上多少利益集團，或擁有多少金錢力量。但黑社會主義的政治實力，只有一樣東西，就是槍桿子。不但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以槍桿子保政權」，而且以槍桿子代替了政治運作，代替了行政、司法、立法機構的功能，是赤裸裸的槍桿子拜物教。

對於和平表達意見的學生，用的是槍桿子，實行慘無人道的屠殺。戒嚴前或戒嚴後，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一直呼籲召開在憲法上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掌軍權者可以置若罔聞。對於可能會有與掌軍權者不同意見的人大委員長，可以用槍桿子迫他留在上海，然後由槍桿子「請」一個已經退休的、什麼職位也沒有的元老（彭真）來主持人大副委員長會議。最高人民法法院院長，要同宣佈戒嚴令的總理表態效忠，以表示司法將會誠意為槍桿子服務。戒嚴令下，清除高層權力中不聽槍桿子指揮的領導人，並在軍委主席的決定下重組政治局常委，更由軍委主席指定誰當「核心」，其他人「誰也不要不服氣」。（這像不像「教父」的所為？）在槍桿子的威懾下，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人大常委會，脅迫會

經在自由意願下表示過支持民主學運的中央委員和人大常委做舉手機器，通過指鹿為馬的李鵬報告和陳希同「平亂」報告。在戒嚴令下曾經聯名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的人大常委，在槍桿子之下紛紛被迫否認聯署，倡議者則像犯了天條似的惶恐待罪。

看「六四」後的一連串以槍桿子施政、司法的動作，再讀了由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陳希同「平亂」報告，不能不使人想起柏楊先生敘述過的北洋軍閥張宗昌打麻將的故事。

話說張宗昌打麻將，牌運不佳，老是吃不到糊。有一次他叫「公雞」（廣東人叫「一索」，外省人叫「一條」），別家打出「一筒」，張宗昌竟說：「糊了」。別人問他：「你不是叫公雞嗎？」他說：「這叫做公雞吃燒餅」。別人要反駁，但見張宗昌身後站了四五個荷槍實彈的警衛，人人目露兇光，就只好讓張宗昌的「公雞」去吃「燒餅」了。繼續玩下去，有人如法炮製，明明叫「公雞」，別人打出「一筒」，他也說：「糊了，這是公雞吃燒餅」。張宗昌說：「不行，剛才公雞已經吃飽了，不能再吃了，你不能糊。」對方待要反駁，但見到張宗昌身後的荷槍的大漢，也就只好作罷。

黑社會主義王國的邏輯，正與「公雞吃燒餅」相同。

真正的核心是掌軍權者

黑社會主義奉行槍桿子拜物教，因此能否牢牢掌握軍隊，是能否堅持這種主義的關鍵。中共現今的當權者能否控制軍隊呢？這是黑社會集團內部最機密的運作，外界是難以了解的。我們只知道，在戒嚴令下、屠城之前，仍有軍校的師生到天安門廣場支持絕食的學生。而在屠城後，則有關於廿七軍與卅八軍衝突的消息。從各種跡象看來，軍隊不可能上上下下都心服，但軍中更需嚴格奉行「公雞吃燒餅」學，故要造反也不那麼容易。廿七軍與卅八軍的小衝突縱使有，也決沒有發展到「開戰」的程度，因為「開戰」一定是炮火連天的，北京的外國記者不可能感覺不到。

在這次屠城事件中，中共當權者用什麼辦法控制軍隊呢？據筆者獲得的可靠消息，在中共宣佈戒嚴令之前，中央軍委在鄧小平、楊尚昆主持下，已向各軍區、各部隊派出了特派員。特派員到全國各軍區、各部隊中，是中央軍委特命全權代表的身份，實際上這是這段期間的「太上司令員」和「太上政委」，直接傳達中央軍委的指示，幕後操縱及直接參與各部隊的高層會議。原有的各部隊的首長名義上還在，實權上被暫時架空。這就是中央軍委控制各地方部隊的「法門」。至於調進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廿七軍等，更是在出發前基本上已確定由鄧楊的嫡系掌握，而且在軍中推行了一套嚴密真辦的「教育」，才放心讓他們進城的。即使如此，中共還要採取「以軍制軍」的雙重保險的暴力崇拜，已到了除槍桿子外不再依靠任何東西（包括自己宣說的道理）的程度了。

槍桿子下的權力重組，完成了新的最高掌權的政治局常委的班子，是六個人。有人認為雙數的最高權力班子，在表決時會有爭持不下的局面出現。後來《人民日報》刊出一張照片，是七個人站在一起合照的，中間站著的是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左右各三人是政治局常委。這張照片顯示了最高權力層中，不但有楊尚昆一席位，而且相信是以他為中心的安排。鄧小平之所以不把楊尚昆正式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只是因為他在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前，曾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表示過要在年齡上「一刀切」，七十歲以上的都不能進入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正好七十歲，故能「進入」，萬里過了七十，故不能進。為了不想明顯地出爾反爾，所以這次是讓楊尚昆「實進名不進」。從黑社會主義的邏輯來看，軍隊既是楊家將，楊對鄧又似很忠心（據說還有親家的關係），他今後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中，不但一定參與，而且會代表鄧小平的聲音。

用人邏輯：打擊，殺絕，行賞

黑社會主義的用人邏輯，是凡對「教父」表現出有拂逆意思的，一律予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於有可能危害這個幫派的力量，必須斬草除根地趕盡殺絕；對於為「教父」賣命的走狗，則要論功行賞，予以安撫。

對過去的胡耀邦，最近的趙紫陽、胡啓立、鮑彤等人，「教父」已一再顯示出「我可以把你提上來，也可以把你打下去」的手段，並顯示出「垂簾聽政」的鄧氏王朝的權威。至於有可能危害這個幫派的力量，「教父」已認定是一批知識分子及據稱是由他們「利用」的廣大搞示威的學生。七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以惡狠狠的語氣顯示「教父」們斬草除根的「決心」：「為了消除隱患，鏟除禍根，我們要下決心把那些煽動、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幕後指揮者，各種非法組織的骨幹份子（按：指學生領袖）和進行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徹底清查出來，及時依法懲處。如果讓他們逍遙法外，必將後患無窮，使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對這些兇殘的敵人，連百分之十的原諒都不應有。」因此，大規模的、牽連母親的逮捕殺戮，會是這個黑社會王朝在感覺受到「威脅」之後的瘋狂反應。這種反應相信不會隨著局勢的表面平靜而穩定下來。

至於那些為黑社會頭子賣命的走狗，從接見戒嚴部隊、頒發獎章、報紙上歌功（殺人立功）頌德（護主之德）的文章等等，已算是做足論功行賞的工夫了。不過有一個消息，是人們忽視其含意的，就是七月七日北京市副秘書長俞曉松的透露，他表示對於在「六四」事件中被誤傷死亡的羣衆，政府對每一個死者的家人，核發一萬元至二萬元人民幣之間的「撫恤金」，對死者的子女，政府則撫養至十八歲，並對死者家屬的生活進行妥善安排。

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對於「被誤傷死亡」的人這麼優遇？當局已宣佈了戒嚴令，因此「誤傷致死」應是闖下的事，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實無需要賠償，即使表示政府的關懷，也無需付一、二萬元，幫死者撫養子女，更對其生活作妥善安排。除非是政府對這些「誤傷致死」的「羣衆」感到有虧欠。

當前內外政策的要點

黑社會主義的頭頭們在以殺戮來穩定自己的地盤之後，也要穿上禮服，戴上白手套，裝出笑臉去參加上流社會的宴會。無奈手上的血腥味未除，窮兇極惡的臉上的神經尚未能鬆弛下來，而且殺戮又太明顯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因此仍受到杯葛。

在這種情形下，中共當權者定下的最新政策路線是：恢復國際形象，收拾國內人心。

恢復國際形象，就是為屠夫打扮，在禮服上插朵襟花。除了用各種手段，邀請外界人士去訪問，以及努力促成原定在大陸舉行的各種國際交流能繼續舉行之外，還採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其中兩項是：

一、削低原料出口的價格，吸引日本、台灣的商人到北京去交易。削價的幅度達二成。這對於許多要購買大陸原料的商人來說，無疑是撿了很大的便宜。利之所在，當然也就有些外商開始去洽談業務了。

二、對學運領袖和支持學運的知識份子，一方面繼續進行逮捕殺戮，貫徹對他們「百分之十的原諒都不應有」的方針。另一方面，卻改變了開始大逮捕時把逮捕、審訊、判刑、處決予以公開的辦法，實行不公開「處理」，以免損害國際形象。例如王丹因為黃德北同他聯絡而被捕，當局就一直不公佈他被捕的消息，甚至被問到也表示「不知情」。直到七月十七日《北京日報》刊出文章，揭露方勵之、張顯揚與王丹的私下談話內容，就顯示這是王丹被捕後受迫供而說出的。七月十八日，中共當局再次發出新通緝名單，王丹已不在名單內，更說明他已被捕。這種秘密「處理」的辦法，相信會在一段時間內使用。

至於收拾國內人心，則強調第一不能讓經濟「滑坡」，第二要做幾件讓人民滿意的好事，實事。要防止經濟滑坡，可能這時候會因此在

對外經濟合作方面對外商更優惠，除了削價出賣資源之外，還要「不要怕吃虧」地鼓勵外商投資。至於做些實事，照《人民日報》社論的說法，就是「要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在黨內認真地抓反腐敗鬥爭，抓一批大案公佈於眾」。據說，首先被拿來開刀的會是趙紫陽的二公子。倘如此，則與其說是做好事、做實事，不如說是藉做好事之名以遂打擊政敵的目的。

一口活的棺材

黑社會主義王朝的本質，在「六四」以後已陸續暴露。不管裝笑臉也罷，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也罷，對外商更優惠以至削價傾銷也罷，大逮捕之後不予公佈也罷，抓幾個腐敗的案例也罷，目的都是為了維持這個黑社會主義的政權，為了本身腐敗透頂的當權者的利益。對人民，對知識份子，對青年人不正是壓迫、屠殺、施以軍事恐怖手段，而且還要予以凌辱。例如強迫人大通過顛倒是非黑白的「平亂」報告，強迫知識份子和幹部去學習侮辱自己的文章，甚至要輪番表態，用暴力威脅的手段將人們的人格尊嚴凌辱殆盡。

黑社會主義的頭子已經變態。正如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的一首詩《瘋女人》所說的：「中國，一箇殺死了自己的兒子的父親，在這夜裏又凌辱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九十年代 1989/8

得民者昌
失民者辱

目前，北京的社會秩序已經基本恢復，包括交通、水電供應、郵政、商業等都恢復正常。但是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內心，充滿憤怒。這怒火，是中共任何鎮壓和欺騙所撲滅不了的，它必將成為另一次燎原之火。

大兵仍在街上來來往往

戒嚴部隊的坦克已經撤出了北京的市區。據了解，有大部分返回原地，但仍有一部分是長期駐在北京郊區。現在，估計有一個軍的力量還駐紮在北京。他們都分駐在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經貿部、外交部等地方，白天在各個交通樞紐和各路口設卡戒嚴。晚上，戒嚴部隊在邊遠的地區都撤回去，只在東西長安街上設一些崗哨。這些崗哨隨時對路過的行人車輛進行檢查，行人的手提包大一點也檢查，車輛的尾箱或卡車也都檢查，有時還叫你出示身份證。

頭戴鋼盔和背帶槍的士兵，一卡車一卡車在北京街道上來來往往，構成目前北京的「戒嚴」景象。

軍警聯合瘋狂抓人

「六·四」以後，特別是五、六、七日，中共在北京掀起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拚命抓人。駐京的戒嚴部隊還分配到各個派出所。一個派出所大約配備一個班或是更多的人，協助警察抓人。由警察帶路，軍隊壓陣，軍警聯合起來，同去抓人，進行瘋狂的報復和「秋後算賬」，矛頭指向知識分子和參加過高自聯、工自聯、敢死隊的人，對燒車和搶了武器的人，更是拚命追捕。有的人拍了屠城的照片，拿去相館沖印，一被發現，也遭到軍警的毒打。

那幾天晚上，軍警還在路上隨便開槍，隨便懷疑，隨便抓人。被抓的很多人中，有的是去上班，有的是去接孩子，有的是去喝酒，有的是過路人，幾乎都是無辜的老百姓。

許多人被打骨折、尿血……

軍警毆打老百姓也很厲害，他們用槍托、警棍、皮靴，毆打被抓到的人。許多人被打重傷或是殘廢。有的骨折，有的尿血，有的被打得臉都變形了。

軍警還經常在夜裏挨家挨戶進行搜查，以查戶口為藉口搜查外地人，把人從床鋪上抓走。他們抓人並不需要出示逮捕證和拘留證，完全是無法無天。

北京這種白色大恐怖，來勢兇猛和突然，比毛澤東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被毆打死去的人，現在當局隨意按照「戰爭誤傷處理」，很輕率地處理掉。

去舉報的三種人

北京設了許多舉報電話。只要有人電話指控，不需要任何證據，也不需要任何調查就先被抓去毒打，進行收容審查。收容審查短的十五天，長的以月計。這種作法與現行法律完全抵觸。中共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拘留人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就要通知其家人，沒有證據就得放人。但來這一條法律外的補充，叫收容審查。這樣就可以任意逮捕任何人，拘押以後再說。舉報電話，還造成社會上的混亂。一部分去舉報是「黨性」很強的人，完全站在鄧小平的立場上，這種人是少數。另一部份人是因受騙去舉報。他們坐在家里，對天安門事件不太清楚，再加上受當局宣傳，看了經過他們剪接的電視，只見暴徒在打解散軍，而看不到解散軍的坦克把人民壓成肉餅和解放軍向人民開槍。這部份人受了騙，也去舉報別人。第三種人是利用舉報來報私仇。過去兩個人有私仇，現在利用舉報電話進行報復。因為這種舉報不需要對任何人和事實負責任，鼓勵父揭子揭父，互相誣陷，互相指責，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時的那一套。許多人還不知怎麼回事，就被抓走了。

在電話亭裏舉報電話不掛線

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朝陽區有一輛裝甲車，在兩個個體戶的飯館門前被點燃了，其中一個個體戶，看見裝甲車着火，怕危及自己的房子，就提一桶水，跑去潑在車上，事後他忽然被抓了。他問警察：為什麼抓我？警察說：有人指控你向裝甲車潑了汽油，不是潑水。原來他與鄰居的另兩個個體戶，由於生意上有競爭，兩邊不和。這樣他潑水就被舉報為向裝甲車潑了汽油。也有市民因為不滿，就到公用電話亭裏撥舉報電話，故意不掛線，講個不停，給舉報工作製造困難。

「反革命暴亂」案必定會翻

北京的另一種情況是人民的抗暴鬥爭一直不斷。儘管中共當局把「八九」學運和民運誣蔑為「反革命暴亂」，但是普通老百姓和許多幹部心裏都明白，這個案子始終要翻，十年、二十年、

槍口下的北京

張河

常估計不足，歷史總是在前進。必須看到的潮流是，你既然是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整個社會的支持，遲早是要垮台的。

「走着瞧吧，相信歷史吧！」

原來人們對形勢是感到很有希望的：第一是寄望於學生，希望學生和民衆的力量能夠更加壯大，能夠徹底把鄧小平和老人黨轟下台，出現新局面。

後來又寄望於軍隊，希望軍隊中有人主持正義，能夠站到人民一邊，能夠轉變，出現像菲律賓那樣的情況，軍隊支持改革派，把那些元老派搞下來。

兩個希望破滅了，人民又對國際局勢寄予希望，都在收聽「美國之音」，希望聽到各國經濟制裁中共的消息，希望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安全逃離大陸。這方面已經得到一些安慰，嚴家其、吾爾開希、沈彤都脫離虎口了。

但是最近中共採取了許多措施，加強宣傳，召開四中全会和人大常委會，獨裁者又控制了局面。對此，人民羣衆有點灰心喪氣，大家都不願意說話，再也不願談論這件事，雖然知道中共

在撒謊，但只好說：「走着瞧吧，相信歷史吧！」有的人只在私下的一些好友間，才敢談一談看法。

心虛，鄧的孫女不在景山學校了！

戒嚴部隊丟失在北京的槍支有上千件，除了收繳以及在河裏撈到的三四百支以外，還有五六百支流落在民間。這些槍對中共造成極大的威脅。現在中共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非常虛弱。許多高級領導人的汽車都換了車牌，把過去的「A01」等中央軍委、總政、國務院的牌子都換了號碼，一看都是什麼出租汽車、普通汽車的牌子。車型也換了，過去愛坐大「奔馳」（即平治），現在改成「伏爾加」，改成日本車，坐日本車的又改成北京吉普了，因為怕引起注意和遭到襲擊。另外很多高幹子女已不知去向，鄧小平的孫女也不在景山學校了，都被接走了。這一切表明，中共高層心虛得很。

「毛的《論持久戰》脫銷了！」

北京市民的確在堅持各種形式的地下鬥爭。最近不斷傳出，人民在利用手中的武器，頻頻對軍隊進行襲擊。市民開玩笑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已經脫銷了！」意思是人民羣衆現在要與當局打持久戰。下面是一些傳聞：

▲六月七日，在使館區發生過開槍事件，造成一死三傷。

▲在古巴使館附近，六七個青年人襲擊哨兵，把哨兵打昏，把槍搶走。

▲在勁松區，戒嚴部隊的哨兵在夜裏被人用刀子捅死。現在市民的叫法是「摸哨」（這個詞是借用的，過去共產黨的游擊隊利用黑夜把國民黨軍的哨兵幹掉，就叫「摸哨」）。

▲西直門有兩兄弟（都是工人）開了一輛卡車，高速衝過戒嚴部隊的哨卡，搶奪槍支，向戒嚴部隊進行襲擊。後來，這兩兄弟都被抓了。

▲崑崙飯店附近的河裏，漂着戒嚴部隊士兵的屍體，也是被「摸哨」死的。

▲中國科學院的帳篷裏，有一位戒嚴部隊的士兵沒有出街，也被幹掉了。

這些傳說，有的中共自己已經承認，有的未經證實，但都說明人民對戒嚴部隊不存好感，他們的士兵在不斷遭到襲擊。據說有些人倡議組織城市游擊隊，和戒嚴部隊進行對抗。



北京市民人心不死

四個階段調查學生

目前當局將市民和學生各分成四類人，逐步調查、清洗。

學生方面，教委分四個階段來調查學生的行為。從五月十六日到五月二十日，是第一階段；從五月二十日戒嚴令發布，到五月三十日民主女神像豎立起來，是第二階段；從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六日晚上，是第三階段；從六月三日晚一直到後來，是第四個階段。

例如有些學生參加絕食，絕食結束後便回學校，那麼他就被歸入第一階段，就不算參與動亂、暴亂。假如全部活動都參與，六月三日晚晚上還在廣場，便等如參加了暴亂，這些參與「全過程」的，便是校方「通緝」的對象。

有些大學生表示，北京市政府公開通緝的二十一個不算甚麼，每個學校校方要自己「清洗」一批學生，開除出校。除了「全過程」的學生之外，其他的便要看是否有過激行為，進行思想教育。

這一次「清洗」運動，大學三、四年級的學生都給「犧牲」了，因為畢業分配的時候，肯定很多單位都不敢要，像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一樣。可是曾經參加「全過程」的學生實在多得！

待八月中旬過後，學校陸續開學，屆時對學生的大規模審查便要開始了。

人人過篩市民疑慮

對待市民的調查是：一是你遊行沒有？二是你捐了

多少錢？捐多少錢就罰多少。三是你上班沒有？凡是一暴亂以後上班的，一天獎三十塊錢，還有蛋、肉等獎品。北京市民都感到滑稽，「暴亂」期間戒嚴部隊不是勸人不要上街嗎？可是不聽勸告上街去上班的，反而得獎。期限是六、四之後一個月。不上班的，也獲發基本工資，可是沒有獎金、副食補助和車費補貼。

工人和學生一樣，要「人人過篩子」，寫參與動亂的過程，互相揭發。

現在北京工人上班，任務多得。每天加班，每天進行政治學習。口號是「把暴亂期間的損失奪回來」，上午、下午都上班工作，中午加班，吃飯完了，便讀報紙。

不過一般工人互相揭發的並不多，有些地方，幾個工人一看附近沒有黨員，便關起門來大罵。大家都害怕黨員，祇要有黨員在便不說，大家都盡量不跟黨員在一起。

但是共產黨的監視制度太嚴密了，即使朋友之間不會互相揭發，居委會的老太太負責，對市民卻有生殺之權。居委會監視著院子裏所有人的進出，要證明誰六月三日晚出外沒有，居委會負責人最有發言權。因此老百姓就害怕居委會檢舉，甚至陷害。

老百姓一方面被白色恐怖籠罩著，人人自危；另一方面，卻緊抓一切機會，發洩心頭怨氣。

審查·復仇·對抗·

京城劫後

張結鳳

六、四之後的北京，一片蕭條之氣。曾經參加過「動亂」、「暴亂」的人，面臨著冷酷的懲罰：曾經領導學生、屠殺人民的軍隊，亦時刻提防市民的復仇。

復仇行動此起彼伏

六月中旬的時候，有人在正義路遊行，人數約二百人。遊行時間很短，一下子就被過去，喊著「還我死難同胞」、「償還血債」，在某飯店門前遞了傳單。由於戒嚴部隊沒有在這一帶守衛，市民便鑽空子上街示威，等人知道後他們已經散去了。

老百姓不甘心就此沉默。遊行示威屬於和平手段，還有暴力的復仇方式：放冷槍。

傳說有一次當局準備在一天之內處決七人，「槍手」便公開宣佈要殺七名士兵。結果，在天安門廣場殺了一個，在西直門殺了一個，崇文門殺了一個，北門殺了一個，在西直門殺了一個，剛好七個。一個「槍手」寫了一紙條：你殺我們七個，我殺你們七個。最後士兵六死一傷，沒能完成「任務」。不過「槍手」是一人還是多人，甚麼身份，大家都不知道。

放冷槍的事，老百姓知道了，大感痛快；政府不願報，祇報了在西直門的一個，因為這個士兵在白天被殺的，很多人看到，不報也掩蓋不住。

七月的北京特別熱，太陽直射、乾晒，站崗的士兵帶著鋼盔站在太陽下，非常難受，所以會有一段時間換了布帽。可是因為出現放冷槍事件，士兵又得帶回鋼盔了。而且站崗時都是四個人一組，面向四方，背靠背地站著。

「槍手」的神出鬼沒令人吃驚。天安門廣場不是老百姓可以隨便進去的，可是七月初在廣場裏一個廁所內一名士兵被殺了。肯定北京市市民已經組織了地下的敢死隊。

北京市挖了戰壕

一夕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與信任破壞無遺。市民對軍人，充滿仇恨，最初這種情緒是表面化的，後來在高壓之下祇有隱藏。除了打殺軍人之外，市民還有消極的抵制。

仇恨情緒在屠殺之後馬上發生了。六月四日下午，北京市東面，國際大廈之前，兩支部隊打起來，其中一支部隊沒有槍，逃跑了，看見市民

北京城的外貌變了，北京城的空氣也變了。革命歌曲再度無法阻擋地鑽入人民的耳鼓。滿街上的廣播喇叭，整天在播放《社會主義好》、《祇有共產主義能夠救中國》、《黨啊！親愛的媽媽》、《歌唱祖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等，好像回到五十年代。北京市委選在各單位中學辦歌詠比賽，而曲目就是以上的幾首。

在大力宣揚軍威、黨權之外，國歌已經沒人唱，《國際歌》更成為禁歌。本來學生祇會唱《國際歌》，對那些頌揚社會主義和軍隊的舊歌，一點不懂，當局趕製磁帶、趕印歌詞，到處散發。

某校數學系學生，七月間舉行畢業會餐，往年畢業之際總要慶祝一番，又唱又跳的，今年不行，新歌不會唱，怎麼辦？各人猶豫一番，終於提出唱《國際歌》。唱起來，悲壯的歌聲響徹食堂，不一會，戒嚴部隊便過來干涉，問學生幹甚麼？學生說唱《國際歌》，甚麼也沒幹。戒嚴部隊說誰讓你們唱？導致老師紛紛出來解釋。

瀕臨絕望不怕制裁

西方國家應否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引起很大爭論，有些人指出制裁中國，將令老百姓受苦。對此，不少北京人都說不怕，贊成制裁。他們認為老百姓的生活從來沒有好過，再苦也苦不到哪裏去。下半年又開始攤派國債了，每人強制性認購五十塊國債。老百姓討論的是中國是不是應該被開除球籍，而不是生活水平的問題。眼前一切都好像沒有希望，祇有希望逃出國外。

京城劫後遺跡猶存

天安門廣場「清場」之後，公共交通一直未恢復，地鐵在一個多星期後始通行。馬路的路障，燒車多日還未清除，汽車怎能通過？雖然當局努力沖洗血漬，可是無法完全洗淨，直到一個多月之後，有些距離天安門廣場較遠的地方，血漬猶存。

剛開放讓入通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市民去憑吊廣場劫後的模樣。松樹下的泥土全被翻起來，當局怕樹下掩埋著屍體哩。已經過去一個月了，工人還在換地上的方磚，原來的磚被坦克壓裂了，慘了血，怎樣洗也洗不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松樹，被燒成焦黃色，底座全變黑，石階被撞壞。碑前兩根旗杆折斷（紀念碑前有八根旗杆，斷了右面兩根）。碑上有槍眼。

由於燒車太多，膠皮輪胎被燒得臭氣熏天，過了三天，走在路上還聞到那膠皮味兒。十里長街的磚地，被坦克壓得成碎末，個多月仍沒有修理，馬路像麻子一

中國式的黑色恐怖

任鳴中

戒嚴令下，北京市郊人民被軍車，現在所有軍車被截停過的地方，晚上捕人。被捕者自述在獄中的非人待遇；住在打靶場附近的人有一天見到上百人被殺。中國人民生活在黑色恐怖中。

中國人有人權嗎？中國人連狗權恐怕都沒有。

中國式的恐怖不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斯大林的紅色恐怖，而是由鄧楊李集團獨創的「有中國特色」的「黑色恐怖」。稱之為「黑色」，是因為北京現在通常在晚上十二點後才抓人。

我們都知道，「六四」後中國政府不停的抓人、殺人。現在由於國際上的抗議，他們不公佈數字了，但不等於他們就停手。暗地裏他們更加變本加厲地侵犯人權。

以下我要寫出真實故事，讓世界的華人都知道，讓世界上所有尊重人權的人們都知道，目前的中國政府是在什麼背景下，如何對待被抓、被殺的人。

軍車被截停的地方

關心中國事態的人會記得，五月二十日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北京郊外給勇敢的市民截住了。第一次截車，據說是有兩位練氣功的老太太，在清晨五點鐘看到軍車開往北京城區，覺得不對頭，她們知道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莫非這些軍車是對付學生的？她們倆不顧生命危險的躺在路上，結果把軍車擋住了。後來越來越多的市民來圍觀，大家都用說服的方法來勸說士兵們。當軍隊從北京四面八方的時候，這種羣衆性的自發「截車」英雄也越來越多了。

那時北京人的心裏，就是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對政府企圖用暴力鎮壓都非常反感。一旦了解了士兵也是被騙過來的，他們幾個星期沒看報紙，不知道北京發生什麼事情，有的以「操練」、「拍戲」、「有任務」等名目被派到北京。經雙方一解釋，大部份地區可算還保持「軍民魚水情」的情景。那時候，很多市民也提供住、吃、喝的方便給那些士兵們。

現在，倒霉的事就發生在軍車停過的北京郊區這一帶。市民們被稱為「攔軍車的歹徒」，「妨礙軍隊執行任務」。這一帶的居民每到半夜十二點後天天都聽到警車的聲音，他們都提心吊膽，生活在恐怖之下，不知今天晚上又要輪到哪家人被逮捕。

一位被捕市民的自述

以下是一位被捕市民的自述：
我犯了攔軍車的罪，說服他們不要用武力對付學生，把我抓起來，天天挨打，屁股打裂了，腎臟打壞了，放了我出來後，精神始終處在緊張的恐怖狀態。

一天晚上我們全家都睡著了。大約十二點後，突然聽到敲門的聲音，幾名警察和戒嚴部隊衝進我家。警察拿着一張名單問誰是×××，我就這樣稀里糊塗在夢裏被抓走了。一下車就把我關在約八平方米的監牢裏，裏面一共擠了二十個人。這裏面別說躺下睡覺，就是站着也站不好。吃的方面，一天就給一大桶棒子麵粥，二十個人搶着吃，大小便就限制我們一分鐘得回來。廁所不近，時間肯定不夠，每次回來我一定要捂着耳朵，因為肯定要超過一分鐘，挨打是免不了的。每天逼着我們坦白交待，怎麼打解脫軍，不交待又要挨打。我說我不過是個圍觀者，湊熱鬧，說服軍隊不要對學生開槍。他們不相信，逼着我承認就說「你走」。我死也不承認，因為我沒有幹過這些事。其實如果我承認的話，他們就有足夠的理由把我送到打靶場。

你知道他們怎麼打人嗎？讓我們全身趴在地下，告訴我們挨打時不要喊出任何聲音，不然又得打多一次。你根本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打你，只好捂着嘴巴準備突然挨打。他們拿一根很長的扁担，使勁的往我臀部打，一般的大

男人，沒打到三下屁股一定會裂的。我就這樣的打打打，打得不活不活了四次，最後打得我身體受不了。我在想如果第五次我再昏過去時，他們逼着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反正死活都一樣，活的這麼痛苦，不如一死了之。二十天後，我什麼也不承認，他們也抓不到證據，就把我放出來了。但我的腎臟已打壞了，坐都坐不住，活動一下都要靠家人和朋友幫忙。晚上睡覺時，一定要亮着燈，一有動靜，我會嚇得渾身都是汗，不知往哪裏藏，全身在抖索。在黑暗中，那種可怕的遭遇又會在我腦海裏重現。

狗都不如的監獄生活

以下是另一位被捕者的監獄經歷：
我一進監獄就被一羣老犯人圍毆二十分鐘。他們也是聽命令去打犯人，抗拒的話他們自己就要挨打。監獄大約是八平方米，住上二十個人。大小便只給一個鐵桶，也放在這八平方米裏面。我就這樣的住了三個月，挨了不下十打。找不到任何證據，我什麼也不承認，他們就把我放了出來。在那裏人和動物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人的尊嚴、人的權利還存在嗎？

我的家人在我被捕的第二天去找公安局，他們承認抓了我，但已交給戒嚴部隊，由戒嚴部隊全權處理，與公安局無關。公安局說：「警察負責抓人，戒嚴部隊負責處理。這是我們的分工，找我們也沒用。你們回去吧！」由於警察以後還要長期在北京工作，所以所有的壞事就讓戒嚴部隊幹，反正他們遲早離開北京，連蹤影也找不到，誰還能找他們算賬呢？被捕者的父母、家人，沒有一天能安心。

幸運的話，還能活着回來，不幸的話只能去八寶山領骨灰，更不幸的連骨灰也沒有，領骨灰時還要簽字承認是「暴徒」才可以領。要嘛就逼着你承認是自殺。家裏人哭鬧、憤怒也沒辦法。這種政府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它不把我们當人，連狗都不如。

蘆溝橋打靶場的大屠殺

有位住在打靶場附近的朋友告訴我，自「六四」慘案後，每天至少有十多輛警車停在打靶場的門口。每輛車裝滿人是十二名。他們的規律是每天早上九點鐘就開始槍斃人。大約七月中旬有一天，竟然排了四十輛警車在門口，試算一下如果一輛警車裝五個人的話，那天就槍斃了二百個人。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已廢除了死刑，即使執行，法庭判決也極為慎重。但中國處決了這麼多人，都沒有聽說有審訊、有判決。許多人的名字就在這個打靶場上消失了。

目前中國政府還在拼命抓人、殺人。多位學生領袖被捕了，王丹、劉曉波被抓了，姚勇戰在上海被抓了，他們在獄中就過着上述的生活，並隨時有可能被送到打靶場去。

「六四」慘案，有數以千計的中國人無辜的犧牲了。「六四」後更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在監獄裏受折磨，平白無辜的在打靶場。我們要向全世界呼籲！向世界人權組織呼籲！要求中國政府提供事實，他們到底抓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我們要求聯合國人權組織派代表團參觀中國的監獄。我們希望世界上的華人、外國朋友、一切有人道主義立場的人們努力阻止中國政府慘無人道的行為。





客從北方來

六四後北京城的血淚

幽芳

「六四」屠城事件帶來的震驚漸漸過去，港人紛紛收拾細軟，靜悄悄移居外國。但在北京，被抓的一萬多名知識分子卻絕望地坐在監獄冰冷的濕地上，猜測着自己的命運。

來自秦城監獄的消息

筆者與北京一些高幹子女頗熟，其中一位跟姚依林女婿過從甚密，他告訴筆者：曾經看到鄧小平簽署的一份文件，說那一萬名被抓的知識分子要有一半以上送去青海及新疆「勞動改造」，並且永遠不准回北京，其餘的則要判坐牢。這個文件還有特加的附件，說上述知識分子無論被判流放或入獄多久，都不須公開審判，楊尚昆、李鵬可以決定。

據悉，當年專門經營整肅的「南泥灣」旅長、現已升元老級的王震，聽說又要流放知識分子到他的屬地青海、甘肅、新疆三省，高興得手舞足蹈，頻頻向楊尚昆、鄧小平「請戰」，由他負責處理被流放的知識分子，但鄧小平暫時沒有正式答覆。因為鄧深知王震與知識分子的仇恨從延安時代就已結下，而王震復仇式的整肅，將打擊鄧小平的威望。但鄧小平也贊成王震的「耳根清靜」建議，這就是說，要在國慶前先把那些最有「煽動性」的知識分子如李洪林、蘇曉康、劉曉波等送走，無論是一輕判「流放或重判坐牢，都必須離開北京，以圖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

據筆者得到的消息，在秦城監獄關押的三千多名知識分子中，有八名原是趙紫陽「智囊團」的成員——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屬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員。而經常以「風」為筆名尖銳批判保守派老黨的一位研究員，本來沒有參加是次學運，只是有時到廣場慰問學生，居然也在「策劃反革命暴亂」的「罪名」下被捕。六月中，他還沒有被捕，在廣州與筆者見面。當時他認為當局沒有理由抓他，因為他根本沒有參加學運的任何活動，而他在五月初出國講學，到六月二日才返國，實在沒有什麼「把柄」落在當局手裏。他被捕後，北京大學一位曾做過「右派」的教授說，這是共產黨慣用的伎倆，再一次對知識分子算總賬。他還預言：如果被流放的知識分子落在王震手裏，結果會比「文革」時落在紅衛兵手裏要壞得多。

自從「風」被捕後，筆者日益擔心這位朋友不知受到如何對待。剛巧一位到此公幹的北京朋友來港前去過秦城監獄。他說：戒嚴部隊奉命，凡找到「黑手」名單內的知識分子，例如李洪林、劉曉波及「風」等，都要狠狠打一頓，然後關入牢房。這些「黑手」的伙食是：二二三，即早餐二兩飯，午餐晚餐則三兩飯。這些「政治犯」的伙食，比監獄內刑事犯的「三五五」就差得遠了。

筆者這位來港公幹的朋友並帶一張染有血跡的紙條給筆者看，字條上是「風」的筆跡：「我還能看書，他們尚稱我同志。」公幹朋友說：最初，「風」是與十多名大學生一起關在二百呎的小屋裏，後來，《人民日報》點名說，「風」與劉曉波是「黑手」，於是他因罪名升級而轉房，剛好轉在「四人幫」首領江青的隔壁。轉房那天，「風」站在秦城監獄的廣場上聽戒嚴部隊軍官訓話時，看到江青在護士的攙扶下，上了一個「紅旗」牌轎車，揚長而去。後來「風」與劉曉波被關在一起，他說見到江青出獄，劉曉波說有人告訴他：江青是去看病。「風」說：他看見江青對廣場上的知識分子微笑了一下。

知識分子奉命撰寫回憶錄

從「風」的事件可以看出：以楊尚昆為首的保守派是次大規模逮捕知識分子，並非只針對這次民運事件，而是「舊賬」、「新賬」一齊算。那些沒有被抓去的知識分子，在六月中旬就接到命令，要交代從學運起至六月四日期間幹了些什麼，而且必須有證人證明他沒有參加學運。他們一共要寫五十二天的回憶錄，於是由六月中至七月底，每晚都看見那些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知識分子，在海淀大學區騎著自行車瘋狂地來回，急於找證人，結果大家對天發誓互相作證。至七月底，官方收到的「回憶錄」共五十萬分，這些回憶錄皆聲稱，沒有參加民運的任何活動，有的甚至說學運是什麼都沒聽說過。對於這些「回憶錄」，李鵬和楊尚昆是極不滿意的。楊尚昆說：「這些人靠不住，下面的單位領導也在包庇，也靠不住。」於是他在八月派了一個「嚴打」小組入駐體改所，終於把正在四川某縣舉行婚禮的體改所所長秘書當作「漏網之魚」，從四川抓回北京來。

待機而起的北京百姓

雖然北京現時掌權者對他們早已視作眼中釘、肉中刺的知識分子為所欲為，但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近來春風得意的袁木、袁立本、何東昌等屬於李鵬的「智囊」，就必須集中在西山住在一起，並須派遣一個營的兵力保護，此舉令一些軍中將領也有怨言。

就是在這樣嚴密的保護下，袁立本讀高中的兒子仍然在返家路上遭人痛打，而袁木及何東昌的兒子因為難以忍受同學的冷嘲熱諷，被迫停學。至於戒嚴部隊的士兵，因大部分來自農村，在北京呆久了漸漸受到物質引誘，軍紀鬆散，有的軍官甚至與北京女孩談戀愛，北京市民就利用這些機會再講述民運真相，令很多軍官大受感動，追捕民運分子的工作也開始鬆懈下來。而一些士兵原來專抓知識分子拳打腳踢，現在也變得斯文客氣，其中有些士兵乾脆開小差一跑了事。根據近日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內部通令說：有五個士兵與自稱「血光敢死隊」的分子，已有兩個被抓回。



北京市民誓言要把戒嚴部隊拖垮在長安街上

來自軍方的消息說：楊尚昆準備撤走原駐陝西西安市郊的兩個師，該師師長先回陝西，要求陝西安公署派人保護師級官員家屬，免遭百姓襲擊。陝西省公安廳長當即拍案大罵：「你開玩笑，我還沒有要你軍隊協助，你倒要我保護，難道不知道公安應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你什麼時候聽說是用來保護軍隊的？荒唐！我現在還沒有接到這樣的命令。」這位師長惱羞成怒，向楊尚昆報告，楊只好叫他們留在北京，但北京市民誓言會把「戒指」（北京市民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稱呼）拖垮在長安街上。◎

是非聲中北京行

丁明

大多數北京市民仍不相信政府和傳媒所說的話，他們回到家裏或與親朋好友相聚時，經常談論着與政府和傳媒完全不同的觀點和事實……

八月的北京，蟬陽高照，天氣宜人。表面上看，除了天安門廣場之外，全市似乎已恢復了平靜、熱鬧的生活。王府井、前門、西單等幾個主要的商業區又見人頭湧湧；公共巴士擠滿了人；以及上下班時間浩浩蕩蕩的自行車洪流。北京似處在戒嚴部隊管轄之下，傳媒與公眾場所的輿論已趨一致。但有一個與「六四」以前極不尋常的變化却顯而易見，那就是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仍不相信政府傳媒所說的話，他們回到家裏或與親朋好友相聚時，經常談論着與政府和傳媒完全不同的觀點和事實。

天安門廣場 仍戒備森嚴

天安門廣場仍是戒備森嚴的地方。整個廣場除東西方向的行車通道之外，仍然全部以鐵馬封閉。在金水橋前勞動人民文化宮至中山公園以及馬路對面廣場邊緣的一線上，每隔十幾米就有一、二名手持衝鋒槍、頭戴鋼盔的士兵筆直而立。這些士兵看上去大都面無表情、高度戒備。據說衝鋒槍裏都裝滿了子彈，可以隨時發射。天安門東西兩側的南池子、南長街街口，則各停有一輛載有十名左右全副武裝士兵的吉普車，準備隨時出動應付緊急情況，北京市民稱其為機動部隊。

人民大會堂與歷史博物館前通往前門大街的馬路則被封閉，所有的天安門巴士站，奉命不准停車，整個廣場空無一人。筆者借了一輛單車代步，慢慢的從東單經天安門騎往西單，再由西單經天安門騎回東單，一路上思緒萬千；百萬興高彩烈上街遊行的大學生、市民今安在？在廣場上和平請願、靜坐、絕食的大學生今安在？北京各界前來聲援的市民今安在？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科技界那些憂國憂民、敢於挺身而前、講真話的知識份子今安在？

逮捕得太少 領導層不滿

「六四」事件以後，極少數人逃出國土，絕大多數積極參與者，則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最初階段大逮捕是公開進行，通緝、抓捕、快審判、快處決，當權者本想以此嚇住人民，沒想到却引起了世界各國和一切善良人們的抗議和制裁。形勢不妙，當權者改變策略，採取了較為隱晦的內張外弛的鎮壓方式，這就是大部份逮捕、審判而不宣，極少數有確實證據者，則公開宣佈，以正視聽。這一招果然見效，外部人摸不着頭腦，所引起的反感也就明顯地減少了。

據《北京晚報》報導，「六四」以後，僅北京一地六月份已有三千五百八十人被戒嚴部隊逮捕。另據知情人士透露，至七月底北京被捕人士已達五千人左右，對於這個數字，當局表示強烈不滿，理由是戒嚴部隊的各種軍車有一千多輛，難道只有五個暴徒繞一輛軍車？何況還有那麼多戰士被打死、打傷？在北京被捕的約五千人當中，學生與知識份子限於參與今次學運的頭頭和積極份子，人數應不會多，被捕的大多數人則是一個月來被公安人員攝影、錄像為證的工人、市民、待業青年，還有被各級組織與個人告密的異己份子。西郊「北京重型電機廠」共有職工六千餘人，被捕的「暴徒」竟有四十餘人，其中大部份却是近一、二年分配來廠的大學、中專畢業生。

知情人士說，預計在今年「十一」國慶前，全國範圍內將掀起另一個大逮捕浪潮，務求斬草除根，不留後患。

招生減三成 分配者寥寥

中國高等院校在今年應屆畢業生的分配及新生的招錄兩方面，都面臨着建國四十年以來最嚴峻的局面。先說分配吧，由於應屆畢業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支持和參與今次學運的，他們都是完全瞭解真相的人，怎樣防止他們在全國各地散播學運真相呢？考慮來、考慮去，教委最後決定，凡參與「學運」的積極份子包括參與靜坐、絕食的同學一律不予分配；其它可分配者，大部份分配到邊遠地區無影響的單位，不服從者，不再分配。這樣做的結果，實際被分配的學生也就寥寥可數了。

招生的情況就更嚴重了，教育部已於七月正式對外公佈，削減招生百分之五，即比原計劃削減招生三萬人。但實際的情況遠非如此，據瞭解內情人士透露，教育部所指的招生總數是將今年大批招收的大、中專學生一併統計在內的。國家教委直屬的全國重點高校，今年將削減招生三至四成，重點高校如北大、北師大、人大等校與社會科學有關的學科，可能完全不招新生。

大幅度削減招生的原因，主要是當局要吸取今年學運的「教訓」，認為這次學潮以至「動亂」、「暴亂」，是由各重點大學的學生帶頭鬧起來的，國家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財力培養出這樣的學生是「得不償失」！因此必需減少招生、停招生。進行徹底的整頓，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和領導，這樣才能培養出「真正」的接班人。

上述做法，表明當局不惜犧牲一代青年也要保住自己權位的決心，它將給予中共建國四十年來已經千瘡百孔的教育危機帶來更加深遠的惡劣影響，對國家、對民族都將是難以彌補的創傷和損失。

工廠開工不足 旅遊收入驟減

「六四」事件以後，北京西郊中關村那條專門從事電子產品生意的電子街已經一片蕭條。北京那些有成千上萬工人、專門生產重型設備機器的大工廠，由於開工不足，日子難過。有些工廠已經宣佈，準備要求約三分之一的工人停薪留職或提前退休，每月只領取基本工資，不再發放獎金。這種情況雖然尚未實施，但已在工人中引起強烈不滿。當局最近又不斷號召人民「艱苦奮鬥」，這些都在顯示了內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將會進一步下降。

「六四」以後，北京遊客驟減，所有今年準備到北京的外國旅行團已全部取消。在此旅遊旺季裏，各大賓館入住率僅為二至三成，虧損嚴重。而北京一萬多輛出租「的士」，則大都停在賓館、飯店門前等客。雖然營業指標已降為每日人民幣五十元，司機們也難以完成。據估計，中國旅遊業今年的損失將超過十億美元。到明年以後，旅遊業才可逐步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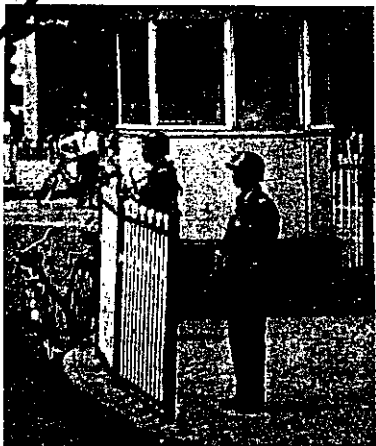
「北京國際旅遊宣傳年」的大型宣傳廣告牌仍然豎立在「燕京飯店」側樓的樓頂（樓高五層），但在該廣告牌下約三米處的牆上，也就是第四層至第五層的樓牆上，却明顯地看出被機槍掃射留下的累累彈痕，總共有三十幾個彈孔！這種強烈鮮明的對比，真是對「北京國際旅遊宣傳年」的莫大諷刺！

軍人對「六四」看法不一致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共政權的保衛者，黨中央的保衛者、黨領袖的保衛者，是黨的工具。由於對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根深蒂固，極為嚴格又極為成功，所以個個士兵都對黨中央和黨領袖表現出絕對忠誠。外部人看起來，恰似鐵板一塊。

由於中共黨內鬥爭錯綜複雜，不斷深化和激烈，再加上軍隊現代化要求軍官年輕化、知識化，使得鐵板一塊的軍隊不斷發生了結構變化，在這次「六四」鎮壓行動中，有部份軍官私下裏也說出了與中央領導層不同的意見。

據知情人士透露，戒嚴部隊中的部份師團級年青幹部認為，今次「學運」的最初方向是對的，共產黨內部確有貪污濫權幹部，應該整頓。但後來被壞人利用，提出了錯誤口號，如「打倒共產黨」、「打倒李鵬」、「打倒偽政府」、「還我紫陽」以及針對鄧小平的標語等等，使性質轉變了，應該鎮壓。但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又做得太過份了！留下了很大的後遺症。他們預言，在鄧小平死後，或者不出十年，將會翻案。據說在戒嚴部隊下達的最後清場命令中，只有「利用一切手段，準時清場」字樣，並未寫明「開槍」，指揮官們曾逐級向上請示，是否包括「開槍」，答覆的都是模稜兩可。這些請示的時間、地點，請示人與首長姓名，都已一一紀錄在案，以備將來層層追究責任之用。



持槍戒嚴，高度戒備的士兵在站崗。

「六四」後，戒嚴部隊爲了加強親民宣傳，曾派二十七軍和二十八軍的政工幹部到中學做報告，介紹「暴亂」經過和所屬部隊未發一槍執行清場任務的情況。奇怪的是，在報告開頭部份他們首先都強調自己所屬的部隊（二十七軍或二十八軍）不是從西面進城的，也就是說不是從石景山、五棵松、木樨地、西單方面進城的。爲甚麼要先避開北京「西面」呢？因爲北京的市民與學生都知道，軍隊從西面進城的路，是一條血路，是槍殺學生、市民最多的一條路！所以一定要先避開。那麼究竟哪個軍是從西面進城，是殺人最多的部隊呢？據說確實不是二十七軍，而可能是二十八軍？是否如此，相信不久一定會揭曉的。

兵是「傻大兵」 民是「精市民」

人民解放軍血洗京城，聲震大損。北京市民在私下裏已不再稱其爲「人民子弟兵」或「解放軍」，而是統稱「大兵」，甚至稱之爲「傻大兵」。原來是這些戒嚴部隊的士兵大都來自偏遠的山區、農村，多數是小學文化程度，有的參軍前還是文盲，由於自幼與世隔絕，加上參軍後單一的思想和教育，嚴格的控制，使得他們的思想境界與對外事務的認識都極爲單純、有限，許多人最初根本不知道來北京做甚麼？也不清楚北京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學生、市民爲甚麼上街遊行？提出了甚麼主張？有的連李鵬是誰也不清楚！後來他們只知道是來北京「保衛黨中央」、「保衛鄧主席」、「保衛共和國」。這些情況在「六四」前市民阻截軍隊入城的電報畫面上，均可清楚的看到。「六四」後，在北京主要地區值勤的士兵已經過多次輪換。每當傍晚，大批的市民仍然湧往街頭乘涼，在天安門以外的地區，仍有不少青年三、五成羣與值勤的大兵聊天，「要貧嘴」，問這問那，有時也透露一些大兵們不知道的事。據一位青年朋友講，他感覺大兵們的思想還停留在文化大革命年代，甚麼「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最偉大、最正確」、「誓死保衛黨中央、中央首長，決不讓反革命得逞」等等，仍是大兵們的主導思想。這就難怪市民們稱他們是「傻大兵」了。

「精市民」則是大兵們對北京市民的印象，他們認爲北京市民，特別是青年人太愛湊熱鬧，太愛提問題，知道的也太多，甚麼「正面的」、「反面的」情況都知道。總之是「腦瓜太精」，「不好管」。

「暴徒」與「砍爺」 袁木是侃爺

自學運開始至「六四」爲止，北京城裏的五百萬市民，凡是走得動的，幾乎沒有人沒去過天安門廣場，在情況緊張、傳言軍隊即將入城的日子裏，

北京青年們幾乎夜夜都去廣場。這些青年除中學生外，大多數是年青的工人。依據北京市政府關於「六四」受傷市民的善後處理規定，凡在戒嚴區域內受傷或死亡的市民均屬「暴徒」不予撫恤；在戒嚴區外子彈從後面射傷或打死的市民，是因逃跑所致，亦屬「暴徒」不予撫恤；凡在家裏或機關、工廠上班時，被流彈誤傷或致死的市民，有確實證明者，給予撫恤。根據這個規定，受傷或死亡的市民能有幾個不是「暴徒」！以此類推，那些未曾受傷而又經常出入戒嚴區支援學生的青年人豈不都是「暴徒」？！因此之故北京的青年人在一起相聚時，竟以「王暴徒」、「李暴徒」戲稱。

「砍大山」是北京人這幾年時興的一個新名詞，意思是吹牛、講大話，其中的佼佼者，被稱爲「砍爺」，既是尊稱，又有諷刺意味，這在真正北京人的口語中亦屬常見。「砍爺」前幾年流行的並不太多，一般只限於經濟領域，這是因爲在經濟開放中，做生意最能賺錢，所以公家辦的、集體辦的、個人辦的，還有外資來辦的合資或獨資公司等各種名目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其中魚龍混雜，吹牛講大話、買空賣空者不乏其人，這樣也就造就了一批「砍爺」。「六四」後，受經濟大收縮的影響，這個層面的「砍爺」也大爲萎縮。但在政治層面上，却獲得了更大發展，講大話、講空話、講假話的侃侃而談者大行其道，「砍爺」從此也就晉升爲「侃爺」。在北京話裏「砍」與「侃」的發音是相同的。

此「侃爺」真是與彼「砍爺」大不相同，一下子成了北京人家喻戶曉的口頭語。「你少跟我侃，讓我信你，甭想！難道你還侃得過袁木！」意思是說袁木的話我都不信，難道還能信你的話。袁木已經是北京人口語中的大侃爺，有人直稱其爲「袁大侃爺」。



1989/9 154



北來雁

(四十五)

趙凌如

「三城其口，現在即使大大開放，來個放，來個幾千幾萬外國記者，也有待無恐，那些記者亦難以施其技了。」
要人們做到三城其口，很容易；規定和外人接觸，是出賣國家機密（魏京生就是出賣國家機密）；告訴外人聽見槍聲，是造謠。但那些在今天到北京來的人，是一羣討厭的傢伙，東問問，西看看，拿着照相機亂照。幸好我們滿街都是解放軍，沒收他們的機器，把底片拉出來曝光。
雖然有三、五成羣，稀稀落落好奇的旅遊者，點綴街頭，但作為北京人，內心惶惶然，白色恐怖纏繞着每個人。
軍人盯着你，你心慌；便衣人員盯着你，你不知道他究竟是人是鬼！
恐怖，你說他恐怖，他說別人在搞恐怖呢。上海松江鐵路線上的火車爆炸，離海路上的西安旅遊區火車相撞。北京為什麼至今還不解嚴？此次丟失槍枝彈藥太多，冷槍打軍人事件時有所聞，至於遊客，當然不會打，但吃流彈是誰也難保證的。
日本人想趁洋人不敵來華之際，多多插手做買賣，可惜又來了一個暗殺團體指明要殺日本鬼子，這可就麻煩了。
大陸的保險公司也想在混亂中大撈一票，提出政治保險，這個項目並不新鮮，文革後，就打出這張牌。可惜，問題發生時，保別人險的人自己也捲入在內。再不然，「保險」發生爭執需要解釋時，便鬧上公堂。公堂又不是為你開的，你又怎樣！

無恥，無恥，到處都是無恥！
一面裝扮成妓女死勁拉客的陪笑臉，謊言滿天飛，只為向全世界那些他們心裏要打倒的資產階級乞求施捨。
「你們趕快送錢來，我們有大軍保護你們的安全！」
「我們鄧主席最關心無煙工業，你們趕快帶外幣來旅遊吧，鄧主席會關照人民子弟兵，對你們特別保護的。」

殺歸殺，但要裝笑臉

「楊耗子，李阿斗向大家保證過，軍隊不會打學生、百姓。」
「兩位老帥保證過，老寡婦保證過，很多很多當權者保證過，軍隊不打學生、百姓。」
「幸虧我們英明的鄧主席沒有提出任何不切實際的保證，軍隊嘛，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軍隊不殺人，養來幹什麼！」
追捕，殺戮，無時無刻不在神州大地上進行。它的數字正直線上升，已經遠遠超過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死亡人數幾倍。
追殺，不要手軟。對外，則裝出笑臉：「殺人要有限度」、「學生的意見應該肯定」。這是七月中旬鄧的話，但殺戮永不停息，仍在進行。
你會聽過古今中外最大的謊言嗎？
你可知道古今中外最無恥的事嗎？
你曾見過最殘酷的殺戮嗎？

歷史多麼殘酷

我想歸去，兒，她來過幾次催我回家的長途電話了。但是，我想研究歷史，歷史既正確記錄人世間發生的一切真實事件，它也殘酷地橫拖一羣人走向罪惡的深淵。歷史啊，你為何不讓他保持晚節？即使是五月以前讓他閉目而去，「一生真偽有誰知」呢？

放下屠刀也難成佛

從現在局勢的發展看，並不是殺人者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你怎知被殺者陰魂已隨着焚屍爐滅了？
現在，老鄧正在落力演出《伐子都》，舞台四面都是陰魂，陰魂何時消逝，看來得等這齣《伐子都》主角在舞台上倒下，落幕。
全國學生、知識份子、百姓都在惶恐不安中度日如年，在那個社會制度下，誰沒有發過一句牢騷，誰沒有說過一句怪話？中共有一種有名的控制人民思想的武器，叫做把反革命帽子拿在手裏，我們握着主動權，誰不聽話，就給他戴上。何況現在又發展一種恐怖政策：互相檢舉。
在這次血腥屠殺之後，社會基本上分成兩大類：人民與一小撮。我想凡是注意看報和電視的人都可以對這一分類作出正確的估計，但一小撮中又包括社會上一些不法之徒、壞人、惡霸等，這些人可以成為建立奇功的鷹犬，可以虛報好人以邀賞，這也是大大增加社會不安的因素。

鄧小的不愧毛學生

小姑子的丈夫去北戴河開會，她因為母親在北京，藉故也跟着來了。她在市上轉了兩天之後，向我輕聲說：「看起來，這是一場全國性的災難。以上海與北京對比，大概因為北京街頭仍到處站着一些手持長鎗怒目而視的大兵，北京街上的外來客就明顯地比上海

少。」她調皮地說：殺人看來也有某些好處，逛商店買東西少聞些臭汗，小貓三隻五隻，餐廳沒有人排隊，隨到隨坐，寬敞舒適。過去三反運動時老毛創造了這好環境，如今鄧小的不愧老毛的好學生，幹得比老毛更利落。上海銀行擠提外幣，提款者怒容滿面，就像在發洩深仇大恨，工作人員從未表現如此誠懇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她為此納悶了好久，忽然眼睛一亮，在屋裏踱來踱去，口中吟唸有詞：「祖國有救了，祖國有救了。」

祖國有救了！

是的，祖國有救了。人們對上海那列火車在松江爆炸，各人談起，都互作會心微笑，只對死難者略表哀念。
小姑有一位出租汽車司機親戚，他曾向一位官氣人物由衡山路去虹橋機場索價五百元，他也曾向一位衣服襤褸的學生由威海衛路開往閔行索價五角。
人民、人民，美好的世界是由你創造的。當一個舊的世界被摧毀時，你也會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
我的心境越來越清澈，我的眼睛越來越明淨，一個光芒萬丈的社會已由鮮紅的血液灌溉出美麗的花朵，現在是全世界炎黃子孫做出各人的貢獻的時候了。

嚮往自由民主的人們

我每天從高樓下望，下面黑點似的一月人羣，那不是崇洋媚外的人羣，那是嚮往自由、民主的人羣。去吧！祖國在一場曠世未有的大災難中損失了萬千精英，他們為祖國的新生灑出了寶貴的熱血。你們，未來祖國的新秀，你們千萬不可忘記，他們為十一億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權、幸福獻出了頭顱，他們將血肉鋪出了一條康莊大道。他們不愧為「中國魂」。我們將永遠銘記。他們——天安門廣場、十里長安街的英烈——將永載光榮的史冊。
歷史將以另冊記載一小撮永受詛咒的罪犯！
凌如寓於「六·四」第四十九天之七·七



北來雁

(四十六)
趙凌如

鄧是否一無是處，一竅不通，我現在不敢下結論。但這十年來，從民主牆到六四，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懲惡官、促進腐化、阻礙徹底否定文革、為右派改正留下小冊子，到「六四」大屠殺的元兇，……這些壞事都是鄧一手包辦的……

整整四十天，我住在湖邊醫院，躺在安樂椅上，望着前面波平如鏡的湖水，只覺心曠神怡。（許大夫給我安排這間病房，大概頗費了一番口舌）想起兩個多月前在北京那些日子，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越學習越反感

白主任來看過我兩次，他也許是借這機會來此享受湖光山色之美，避開煩悶的辦公廳幾小時，藉此休息。他說：「學習還是天天抓，學什麼東西呢，人們越學越反感，最近又重印出版部過去講過的話，寫過的文章，有人學了就拿來和他現在的所作所為對比，提出問題，我只好勉強解答還要看具體情況、具體時間。有人插話說：譬如這一次天安門暴亂，暴徒冒稱學生，靜坐、絕食、喊口號，要推翻我黨，這就不能手軟，應該斬草除根。接下來發言熱烈，我只好忙宣佈休會。」

「這種開會的情況，聽說到處都是，但也有的全體閉口不言。我不知道別人怎樣向上面寫學習匯報，我是從來不寫這些細節的。」白主任臨走時叫我再安心住一個時期。學習文件很多，什麼內容，你可以想像得之，不必再送來給你了，免得看了氣悶。

機關裏天天過節

小肖近日常來「探病」，他是有最正當的請假理由的。從政府機關到事業、企業單位，每天都像春節放年假，除學習時間比較嚴格執行外，各處都只設「值班」，只要有人接電話，應付特殊事件就可以了。總之，人心散漫，今後如何收拾，甚至要不要收拾，誰無法作答。大家都在過一天，算一天，誰知道明天又是怎樣。

種日子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有過，只是那時叫做停止工作鬧革命，現在則是各人自動怠工或停工，看你怎麼辦。

人們在談起毛、鄧的時候，多數人用褒詞，說毛有文才、詩詞氣魄雄偉，書法龍飛鳳舞；一談到鄧，就說他的秘書不錯，說他有伯樂之才，能看中胡耀邦等，能抓對外開放，只是改革步子嘛……那意思是說開放的主動力是胡耀邦等，這個「等」大概是胡趙紫陽了，趙現在不好提，便只好用「等」代替。

鄧是否一無是處，一竅不通，我現在不敢下結論。但這十年來，從民主牆到六四，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懲惡官、促進腐化、阻礙徹底否定文革、為右派改正留下小冊子，到「六四」大屠殺的元兇，……這些壞事都是鄧一手包辦的。經濟開放、政治改革，前者益了他的家庭，後者他握住不放。他出去巡遊一次給中央、國務院帶來很多麻煩，他為過一次國慶閱兵，浪費已瀕空虛的國庫四十餘億元。在黨內高層對他不滿時，他便犧牲替罪羊作為平衡，以求自保。

天安門軍事大洩密

現在鄧已餘日無多，鄧之死是指顧間事，人們也不會為他惋惜或流淚。（江澤民和他的家屬當然不同。）全國也必然會因此而出現大動亂。據老郭和他們軍界人士的看法，「六四」軍事大調動，透露了一個無形的秘密，今後全國的前途，看來非搞聯邦制不可了。本來是一衣帶水的台灣，一橋之隔的香港，現在越看越模糊了。就算收復香港、收復台灣，這些滿腦子裝泥漿的人能管治得了嗎？

中蘇又握手言和了。就算它是真誠的，對中國又有什麼好處呢？老大哥過去喜歡佔小弟便宜，改不了脾氣了沒有？把一些不合格的機器塞給兄弟，價格却比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國家貴三、四倍，向中國收購的酸黃瓜幾分錢一瓶，在莫斯科餐館賣給中國兄弟客人却是一條黃瓜三塊盧布。

當然，老鄧的中蘇和好是接他的橋樑打法進行的，這是他玩的國際平衡術。不過，老鄧會不會像難不着蝕把米呢？也許黨在蝕把米的時候他已抵達陰間，正在地獄中向老毛匯報他近期在天安門廣場的業績呢。

上月，中南海在國際一片經濟制裁聲中，曾傳田紀雲試探向老大哥請求協助填補歐美等國暫停的貸款。如果此說確實，我們這個黨真太可憐了。它竟無恥、無知到這樣的程度。請聽聽那個只有一百多萬人口的蘇聯小國愛沙尼亞加盟共和國的人民的談話，在人們問到蘇聯那麼大，你們這麼小小的國家怎敢和他對着幹時，他們說：我們有經濟，我們有法制，蘇聯在大聲疾呼要搞經濟改革，正說明他們的日子很不好過。

現在，連在一起的就有三個小國在喧騰不已，南邊還有一個小國波蘭達維亞，顯而易見，接踵而來的可能還有別的，包括「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兄弟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等的政制改革，東德「難民」大批擁入西德、奧地利等。

中蘇在剛握手那時候，戈巴卓夫不好意思發表意見，但上月間，他終於忍不住說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的悲劇。老鄧現在是在中南海和家庭的新聞封鎖和包圍中，假使他知道他自己在全世界已經是狗屎不如時，他也许会選擇忍受一利那工夫，他的罪惡，他的痛苦便可以獲得大解脫了。

殺戮追捕，暗中進行

一些外國書呆子在喧騰什麼戒嚴問題，其實戒嚴和解嚴，對外人和對百姓是毫無意義的。殺人、追捕，沒有一時停止過，只是掩耳盜鈴，某些洋人也喜歡你不要大聲嚷嚷，進入地下，偷偷摸摸幹，他們也可假裝事情已經過去了，中共還是希望和他們做生意的。這戒嚴說穿了，只是為了保護老鄧的事業。一旦解嚴，士兵、坦克、軍車都回原駐地去了，老鄧嗚呼哀哉了，這首都出了事（又不是老毛在中南海的時代，有一支御林軍八三四一），那時老人們和阿斗李鵬等才真正是呼天天不應，入地無門。所以這嚴是一時解不得的。何況，「六四」以來，一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有一些部隊駐紮在首都，畢竟可以壯膽。（事實上，現在戒嚴與解嚴，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有多少分別了，仔細注意一下，還可以看到紀念碑上有三兩個解放軍在上面站崗，可能是防止人們到上面去研究子彈的痕迹吧。）

王公子又出院了

我省高占祥前年離石家莊到北京文化部時，省裏好些人都估計他不久可能取代王蒙。王蒙，還有一個英若誠，再怎麼說也還是兩個書獃子，在那些瀟灑開放、改革假象的日子中，平平穩穩當個太平官還可湊合，若要在老鄧那個三天兩頭心血來潮、喜怒無常的大風大浪中過太平日子，豈非痴人說夢！王蒙的文化部黨組書記已由賀敬之取代，這是意料中事，吳祖光在作協四大發言曾提及的專給作家穿小鞋的正是這位宣傳部副部長，他是那批極左人士如鄧力羣、林默涵、劉白羽、黃綱等中的一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王蒙能在此時擺脫這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未始不是好事。

現在中南海各人心中七上八下的，就是外債內債的高峯期即將到來，經濟崩潰的末日在折磨着他們。至於那些老人，他們才不管那麼多，從前山溝裏幾十年的日子也過了，現在怕啥？

說謊也應統一口型

謊言重複千百遍，連自己也不相信說的是假話了。看來，這確是希特勒和鄧小平的真理。從天安門廣場大洗刷以後，兩個月來，已有不少這個代表團、那個青年精英代表隊等親自上京考察。廣場上自然仍有不少彈痕、破裂的石級、被焚燒過的痕迹，但經專人解說，指那些都是學生破壞的，之後，大家回去，都敘述了「真相」。

「，天安門確實沒有殺過一個人。但可惜版本太多，袁木說的是二十三人，張工說一個也沒有，李鵬比較老實，他既不說打死若干人，也不說沒有打死人，只說因為沒有催淚彈、橡皮彈，所以才用實彈云云。這話就說得比較實在。」

不論如何，謊言的效果還是很大的，近日各國旅遊團赴京已陸續有所增加，當然要恢復到以前的數字為時尚早。但不斷的宣傳「真相」，不斷駁斥外國人製造的恐怖謠言，這是當務之急。眼看廣州交易會就要來了，更重要的是明年的亞運會。（對亞運會，黨內高層悲觀調較為嚴重。）

亞運會需要大量電力供應，這是北京市沒有力量供應的。如採取停止供應半個城的電來應付亞運，在黑暗中又會增加不安全因素。至於交通安全、食物供應、防止中毒，以至是否會發生爆炸等問題，在今天誰也打不出這張保票。

體育場的大量建築，都要經過工人之手；只要有哪個環節出毛病，哪個場子塌下一角，後果便不堪設想。

工人恨自己的黨

二十年來，黨與工人積怨太多，首先是建築業，有人甚至翻十餘年前一筆老賬。那年夏天，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按規定，到達四十度即須停工全體放假，但是統治者不顧工人死活，強令氣象員只報三十九度幾。那時有許多工人便憤怒責問：我們的剩餘價值被誰剝削掉了？

「六·四」大屠殺，使他們更增加對中共的仇恨。如果說這一次學運有暴力對抗的話，那是工人，而且他們真正不愧為最堅決最勇敢的工人階級。中南海強調有不少槍枝彈藥流失民間，主要就是工人在階級手裏。

現在有人警告：全國面臨一個最重要的局面是各種安全問題，包括大官僚們的後代。情況難道真是這樣嚴峻嗎？

凌如 十月

南北極月刊 89/9

「六·四」事件中被殺的解放軍，在被燒過的車身上，老百姓寫下了他的罪狀



北京檔案

屠殺前後，官方宣傳口徑突變。作虛弄假的騙子，竟然指斥別人「造謠」。

大鎮壓前：「不會開槍」

△《人民日報》海外版五月二十日報導：趙紫陽懇切地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嫌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九歲、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

△新華社多倫多五月二十一日電：萬里表示相信，中國政府「能夠以冷靜、理智和克制的態度，克服困難，妥善地解決問題」。

△《人民日報》海外版五月二十四日凌晨：昨日起，在學生和市民的疏導下，全市街道基本暢通，職工上下班大多轉入正常，運送煤炭、液化石油氣及肉蛋菜奶的車輛受到格外關照。

雨後天安門廣場，氣溫驟降。大批寒衣和薑糖水送到學生手中。某中央機關幹部捐贈四千件衣服……

△《人民日報》海外版五月二十五日報導：解放軍三軍總部聯合致信慰問戒嚴部隊全體官兵。信中說：「要熱愛人民，加強團結。我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軍的唯一宗旨……我們要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文明值勤……」

△新華社北京五月二十四日電：戒嚴部隊某團政治處主任劉智軍對學生代表說：「有一點可以告訴你們，軍隊不會對學生開槍。」

△新華社五月二十六日電：陳雲今天主持召開了中顧委常委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中國革命經過了幾十年艱苦奮鬥，犧牲了兩千多萬人，才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勝利來之不易……深知如果不把極少數人製造的這場動亂堅決平息下去，就會黨無寧日，國無寧日……都有喪失殆盡的危險。」

△新華社北京五月二十七日電：戒嚴指揮部負責同志說：部隊……絕不是來鎮壓青年學生的，根本不可能攜帶瓦斯毒氣，相信廣大羣衆是不會輕信這些謠言的。

△新華社五月三十一日電：戒嚴部隊一位

軍官對記者說：現在社會上一些人將軍隊執行「戒嚴」任務說成是「軍管」，這是非常錯誤的。所謂「軍管」，是指軍隊將地方部門的權力接管過來。

△《人民日報》六月一日訊：今天，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帳篷上掛起「祝小朋友節日快樂」、「大哥哥大姐姐與你共歡樂」等標語，帳篷之間，三五成羣的少先隊員和跟着家長來的小朋友隨處可見。

大屠殺後：二十三人是確數！

△中共市委宣傳部六月三日文件：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決定作出之後，消息很快就流傳了出去。「極少數人為了對付我們，就搶先出謀劃策，設法動員停止絕食，改為靜坐。這恰好說明是極少數人的一種策手段。」

（按：難道當局是希望學生不知消息，而繼續絕食，才便於實行戒嚴？）

△新華社六月四日電：「一小撮喪心病狂的歹徒和暴亂份子……肆無忌憚地砸毀軍用汽車上百輛，燒毀三十一輛，有數名年輕的戰士被活活燒死。」

△新華社六月四日電：「在民族文化宮門口的一名戰士和建國門橋上的一名戰士被暴徒們活活打死……受傷的戰士送往人民醫院門口時，被一夥暴徒攔住，當場就打死一位戰士……」

△中共中央、國務院六月五日「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極少數暴亂份子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製造了種種暴行……他們還慘無人道地殺害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

△《人民日報》六月六日：陳希同廣播講話：「他們……打死打傷一千多名解放軍人員。」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六月六日答記者問：「據不完全統計，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暴徒和羣衆受傷兩千多人，軍隊和羣衆死亡近三百人，有四百多名軍人失蹤，生死不明。學生死亡的準確數字是二十三人。」

△新華社六月九日轉發中共北京市委宣傳

部六月五日的文章：六月三日、四日，北京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一些「暴徒」趁機「大搞打砸搶」、「打、殺、放火、放毒」、「暴亂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被暴徒砸毀、燒毀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達四百五十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百八十多輛，裝甲車四十多輛，警車九十多輛，公共電氣車八十多輛，其它機動車四十多輛。搶走一批武器、彈藥。負傷的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數千人，死亡上百人。」（六月四日凌晨）

露面、講話、驅逐、緝捕

△新華社六月九日電：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發表了重要講話，指「極少數人先是搞動亂，後來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他們的目的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

（按：這是鄧小平五月十六日之後首次露面。）

△新華社六月九日電：今天清晨，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官兵舉行隆重的升旗儀式。

升旗儀式結束後，人民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為戒嚴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彭麗媛、克里木等演唱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

△《北京日報》六月十二日刊登題為《一位目擊者說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情況》的文章，以證明六月四日凌晨廣場上沒有學生傷亡。《北京日報》按：「這份材料是根據一位機關幹部的採訪錄音整理的，為保護被採訪人的安全，文中省略了被採訪人的姓名單位。」

（按：為政府說「真話」的人，為什麼竟不安全？）

△新華社北京六月十二日電：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向所有參加這次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戒

嚴部隊官兵、武警官兵和公安幹警發表談話。他說：「在制止動亂和平息暴亂中，你們為維護首都的安定，為保衛用幾千萬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功，保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立下了新的偉大功績。」

△六月十二日《北京日報》評論員文章：「四月中旬以來，對中國首都北京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美國之音》表現了異常尋常的熱心。每天用三種節目，花十多個小時，進行喋喋不休的報導。」（《美國之音》造的謊是實在太多了，表演也夠充分了，為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推波助瀾也真夠賣力氣了……下一步它還會編造出什麼謊言，我們等着聽吧。」

（按：六月十五日，北京當局下令驅逐《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 Alan Pessin 及美聯社記者 John Pomfret。）

△六月二十日官方再次「澄清」廣場「清場」的事實。發言人一連用了幾個「決沒有」、「決沒有向撤離的人羣開槍、決沒有用裝甲車輾死人。」闢謠多次，是否會改變事實。

△新華社六月十三日電：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負責人在中南海召開會議，傳達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

△公安部六月十三日向全國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並由新華社發出各學生領袖的詳細資料及體貌特徵，其中對王丹的描述竟有：「門齒有洞齙」之語。

（按：某些真正的人民公敵的「體貌特徵」似乎也有公佈的必要。）

汪希祐

北京檔案

一面是層層清算，學界到文藝界面臨「整風」，另一面加強控制求「補回損失」。

汪希祐

作者：化名如何？

以往國內報刊的文章，尤其是會引起爭議問題的文章，一般是署名的，大概是表示文責自負。但六四事件後的首都各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卻一反常態，開始用似有其人卻未知誰人的署名方法。試看幾例：

△六月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一篇題為《美國之音造謠可恥》的文章，署名「北京青年教師」。

△六月十日《北京日報》題為《一位目擊者談六四凌晨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的文章，署名是「一位機關幹部」，按語中說這是「為保護被採訪人安全」。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一篇《大學生不是特殊公民、學生犯法與民同罪》的評論，署名是「一位北大學業生」。

△六月十五日《人民日報》長文《對近期香港某些人一些活動的看法》，嚴厲抨擊香港「某些團體」對北京學運的支持，署名是「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八名工作人員」。

△新華社六月十五日西安電，轉述國棉五廠的一篇《回擊美國之音造謠誣蔑》的文章，署名是「部份職工」。

△《北京日報》發表一個自稱是王丹好友的來信，揭露方勵之夫婦如何唆使王丹搞動亂，這篇文章的署名是「北大一學生」。

這樣一來，寫文章的人全不用負其文責，因為「北京高校的青年教师」少說也有上萬，「機關幹部」起碼數以十萬計。

其實，北京的宣傳喉舌大可以篇篇署名，如果考慮到安全問題，用個「化名」如何？

書店書架：清一批上一批

△《光明日報》六月二十一日報導，鄧小平同志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述一書，即將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在全國新華書店陸續發行。

同期將在全國發行的，還有一批思想教育學習材料，計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捍衛社會主義祖國》、《請看方勵之的眞面目》及重編的《革命歌曲選集》。

△《經濟參考》六月二十二日稱，國內即將推出的新書之中，還包括台灣作家南方朔所著《憤怒之愛》，該報並且轉載這本書的片

段，在編者按語中特別指出：「我們平息的是場反革命暴亂，美國政府鎮壓的是美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兩者性質根本不同。」

△有人帶來首都的消息，新華書店接到通知，將劉賓雁、嚴家其、包惠信、蘇曉康等「極少數」人的著述一律從書架取下。外國報刊一夜之間也不見了。

△國家教委向全國中小學校發出通知，中小學校必須在「各地黨委統一領導下」，暑假安排「一定時間」學習四中全會公報，鄧小平的講話等文獻。全國中小學教職員工終於結束了多年「自由化」假期的局面，重新開始過上「革命化」的暑假了。

△國務院七月上旬發出通知，全國幹部八九年一律取消休假，目的是「把動亂中造成的損失補回來」。一位北京駐港的幹部說：「這叫做中央損失地方補，北京損失全國補。」

△《人民日報》海外版七月四日在第四版刊登「香港十二位青年」的《自由須有制約、動亂不得人心》一文，大唱北京學運的反調。過了三天，七月七日，該報在第二版，又重刊這篇文章，一字不改。是宣傳？是廣告？還是這十二位青年為得雙份稿費而講究經濟效益？

整風：先下毛毛雨

△七月十三日首都各報報導「部份文藝家」的「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座談會，與會人士揭

露「腐敗」現象時列舉下列事實：「性文學、走穴盛行、思想風氣敗壞、違法亂紀現象頻繁出現，都說明了文藝界的腐敗現象令人觸目驚心。」報導最後掛了個小小尾巴，說「有的與會同志建議進行一次新的文藝整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基本路線」。

△江澤民七月十四日在高校工作會議的代

表座談會上說：「一些學校一切向錢看……創收與教學、科研毫不相干……黨委要抓住這個機會把高校的領導班子切實整頓好。」

李鵬在同一場合說：「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新華社北京六月十八日電，楊尚昆會見三位烈士親屬時說，革命烈士的優秀品質與家庭教育是分不開的。劉國康烈士的父親劉志遠說：「我兒子為國為民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光榮，我感到自豪。」

△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篇文章透露整風將指向社會科學界。這篇文章題目是《從事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也應當反思》其中一段如下：「過去一些年中，一個怪現象是，倡導反政府、反體制、反文化、反理性、反社會主義甚至反憲法的言論，是安全的，並且容易在國外揚名。相反的做法卻是真正不安全的。」

△《文藝報》於戒嚴第一天（五月二十日）發表全國文聯支持學生的通告說：「我們代表全國文藝界對近日常同學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意……我們真誠希望並呼籲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盡快與同學們直接會面……」

一個月之後，新華社於六月二十四日電訊中稱：中宣部文藝界人士學習鄧小平講話，「大家認為」，這多年來，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志往往被斥為極左、僵化。至於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卻被吹捧為「英雄」。

△老作家賈祖璋學習了鄧小平講話後，向記者發表感想：「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方面是個學者，但在歷史方面尤其是現代史方面只是個『半史官』。」賈祖璋對現代史的解釋是這樣的：「縱向比較，我們的步子也很大，衛星上天、運載火箭打入國際市場。」

△新華社北京七月十八日電：江澤民總書記指出：「加強黨的領導，建立一支精幹的政治工作隊伍，加強對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作，是高校教育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其他：姑妄聽之

△《解放日報》刊登《關於謠言的街頭對話》，講述「一個青年人」的憤慨，他說：「平

息一場暴亂死三百人有什麼不可公佈的！蘇聯火車站爆炸還死幾百人呢！」他接著說：「真不知道我們中央那些宣傳部門幹什麼去了！」

△《人民日報》六月二十二日刊登了「兩

名大學生」《致高校同學們的一封信》，規劃學生要同反革命暴亂份子劃清界線。信中的稱呼是——「親愛的同學們」。袁木及高校黨委領導在學運中也是這樣稱呼學生的。

△中通社北京七月七日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俞曉松表示，北京六四事件中誤傷致死的羣衆，每個死者家屬可獲發一至兩萬元人民幣撫恤金，對於死者的子女，政府撫養至十八歲。甚麼是「誤傷致死」則無人知曉。

△《光明日報》報導，九名四川訪美學者「不為國外某些新聞媒介歪曲報導所惑，按期回國效力」。原來，「四川省教委不斷用電話電傳與九位訪問學者聯繫，有時一周之內聯繫多達十五次之多」。但電話電傳的內容是什麼，秘而不宣。

△台灣《自立晚報》記者徐璐被中共驅逐出境，此事件發生前幾天出版的北京《文藝報》全版轉載一篇報告文學《徐璐小姐對大陸的歷史性採訪》，徐璐小姐以新聞界女英雄的形像躍然紙上，徐璐還說：「我的工資是一千五百美元。」

△七月十六日團中央會議指出，在學潮中「成千上萬的青年捲入動亂」，今後團中央「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北京國家旅遊局發言人鄭重宣佈：海外人士來華旅遊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他又高度贊揚國內旅遊業廣大職工堅守崗位。

△七月九日，袁木回答記者問「什麼時候取消戒嚴」時說，戒嚴令沒有取消是因為「被暴徒搶去的槍支還沒盡數收回」。

北京檔案

抓人之外大抓思想教育的結果，使今年高校入學試中，理工、文史、外語成績都大幅下降，只有政治科成績上升。

汪希祐

抓人之外還要抓思想

京城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便是抓思想教育，尤其是中學生、大學生的思想教育。

△七月二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的幾個問題》，又創造了一批新的政治口號和術語，僅舉一例，文章提出思想教育必須有下面這四條「性」：長期性、一貫性、全體性、全方位性、豐富性、針對性、整體性、協同性、必要性、一致性。

△中通訊社北京的一則消息說，前不久結束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的閱評卷工作已經結束，得出了「一個令教育界擔心、卻令黨放心」的結果：理工科各科考試成績大幅下降，預取分數線比去年下降四十分；文史科下降二十五分；外語下降二十五分。但是，唯有政治一科成績比去年上升。

△八月十四日香港《文匯報》引自北京的一則消息，表明對高校思想的整頓仍在加溫加碼。這則消息說，北京高校新生入學後須先以半年時間（一個學期）接受政治教育。而學運發源地的北京大學則規定，該校新生第一年將接受軍訓一年，軍訓期間伙食費為七十元。大學生接受軍訓，解放後有過兩次，一次是六五年夏天，軍訓時間為二個月；第二次是文革後期一九六九年，為期十八個月。

新樣板戲：總導演王震

全國出了一部新的電影，其宣傳聲勢不下當年「樣板戲」。反映鄧小平早年革命活動的影片《百色起義》正在全國範圍內推出。

△《瞭望》週刊海外版八月中一期載文，披露了《百色起義》的製作可謂不惜工本，人力物力全力以赴。影片中千餘人以上的羣象場面有十四次之多，其中有六千餘人以上的場面達五次，動用三個師的正規軍參加拍攝。涉及攝製的工作被當作「嚴肅的政治任務」。

△《文藝報》的一篇通訊說，該片的劇本於八七年六月由王震審閱。王震當時正生病輸

液輸氧，護士為他讀劇本，王震先後多次對創作組和攝製組作指示，他自己說：「我成了這個片子的總導演了。」

△「百」片放映時，片頭打出的字幕是：「總顧問王震。」

△除了北京的影院之外，全國各地電影院的海報和招貼畫，也都把宣傳《百色起義》作為首要政治任務，以突出鄧小平的革命史蹟。有關該片的介紹及評論文章，在中央到地方的報刊上可謂「泛濫成災」。

△《人民日報》七月二十五日曾有報導，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的紀錄片《共和國衛士》於八月一日在全國上映，消息特別指出，影片中有一天安門廣場清場實況的紀錄。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全世界的傳媒天天在「造謠」說廣場發生大屠殺，而既有可證清的證據影片在手，何以遲遲不肯「出街」？

開門「七件事」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近期做幾件羣眾關心的事的重要決定——七件事。

七件事的第三件：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第四件：嚴格按規定配車，嚴禁進口小轎車。高幹一律用國產車。這一「大」事，到八月上旬已經落實。越來越多的國產轎車要換上「紅旗」牌轎車，造成進口車浪費和「紅旗」供不應求。

熟悉高幹用車規定的一位北京人透露了一個小小的秘密：「紅旗」牌轎車勝過進口車，設計和改良，其豪華及舒適的程度與進口轎車不遑多讓。

△《北京日報》報導，北京市委緊跟中央，也要辦幾件大事：「六件事」，比中央少了一件，沒有「取消特供」這一條。

△中央七件事，一掃到底，各省市紛紛學

樣。湖北省學得最早，省委決定辦四件事，與中央略有不同，四件事是：①清理整頓公司；②取消幹部節日「特供」；③車輛禁止辦私事；④查處違紀建私房；頗具湖北地方特色。福建省委中央，也要緊緊實實辦幾件事，也是七件事，並且件件與中央的七件事相同，與黨中央完全保持一致。

△《文藝報》七月十日刊登解放軍總政治部推出的「戒嚴一日」徵文活動啟事。來稿者須是參加過平暴的軍人、武警、幹警，作品限於寫戒嚴期間和暴亂期間的經歷。入選的優秀作品將匯集出版，作為國慶四十週年的獻禮。

△《文藝報》的另一篇雜文，卻議論現在徵文成風，單北京兩家報紙去年一年就刊登了徵文啟事一百多則。這篇議論稿：有些徵文主辦單位其實是發「徵文財」，作者必須交納「評審費」、「領獎費」。文章問：「靠現在的徵文，能徵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嗎？」

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徵文，徵得出八十年代的董存瑞、歐陽海嗎？

「宜將剩勇追窮寇」

△新華社七月二十八日電，歌頌在中央組織部的老幹部座談會說：「我們打了大勝仗，戰後要打掃戰場，要『宜將剩勇追窮寇』。」

老革命王鶴壽在會上說，這次動亂，黨風不正是個重要因素，他列舉的黨風不正：「工作不積極、遇事推諉、敷衍塞責、見壞人不批評不鬥爭。」

△七月二十八日中紀委列舉的黨風腐敗的現象包括：「貪污、受賄、看淫穢錄像、侮辱婦女。」

△八月八日，江澤民、李鵬接見「平暴英雄報告團」，中共宣傳部、總政治部、北京市委並為報告團組織了首場採排，為一千五百名軍民做了「平暴英雄事跡報告」。

北京市民在忍辱偷生中盼望春天



本刊攝

團、珍寶島英雄報告團、中越自衛反擊戰英雄報告團。

△《人民日報》報導，八月九日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作出了一系列新規定，以結束文化宣傳界的局面，其中有：設立省市政工學院，培養黨幹，其級別相當於正廳級；減少「擦邊球」，書攤個個有人管，片子部部有人查，分區分片實行包乾制。

賣地與賣國

△《人民日報》海外版八月八日報導一則消息：天津市以每平方公里三點二五美元的價格向美商出讓五點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設施七十年後無償交還。

△八月十二日，廣州市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對外出讓四萬二千平方米的有關法規。這塊分為七小塊的土地大小不一，均為商、住用地，年限也是七十年。

△八月一日新華社宣佈，國務院通過了新的土地法規《關於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批准權限的通知》，與前兩則消息難言巧合。根據中國人「一窩蜂」、隨大流的習慣，中國的土地會一塊一塊對外賣「讓」出去。

出賣國有土地不是賣國。但有人被稱為「賣國賊」，請看：

八月一日，新華社發文抨擊流亡海外的民運學運領袖和學者，譴責在美國召開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第一屆代表大會」，文章說：「嚴家其、吾爾開希等人……靠美、港、台反動勢力，充當賣國賊，也是不能得逞的。」

△七月三十日《光明日報》報導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一組數字：今年上半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為一百四十四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但銀行擔心會造成四十七億的購買力，供不應求的「潛在危險」不能掉以輕心。

△《北京晚報》八月十五日報導了四十週年國慶準備大事慶祝的消息：一百門禮炮，五十門同時發炮二十八響；九個地點施放烟花；北京市舉辦大型歌舞晚會。中央專門成立四十

大慶籌備委員會，各項活動正如如火如荼。

△北京傳出的消息：原計劃將國慶的歡樂氣氛帶到香港的一個大型歌舞團來港的計劃已取消（原定國慶之夜在紅磡體育館表演）。此消息已得到駐港中資機構官方人士證實。

北京檔案

歌頌中共的歌詞源自蔣介石著作；爲了「掃黃」去「搶黃」，大陸怪事多多；
東歐大變革隻字不聞，對台、港輿論步步逼進，政治空氣依然肅殺。

汪希祐

幾樁怪事

△這幾個月，大陸又流行唱革命歌曲，集會時要唱，學習時要唱。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最爲流行。上海出版的《上海經濟時報》居然對此歌出處作了考證：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在《中國的命運》一書中最早用了這樣一句話：「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藝術家便挪用來歌頌共產黨。此一「考證」，真令人瞠目結舌！

△北京出版的《中國機電報》爲黨的政工幹部大抱不平。事情是這樣的：福建省南平市輕工業機械廠黨委書記、副書記等三人有一天忽然不見了，勞動人事科長認爲他們未辦手續外出（後查明去市裏開會）應按廠規處罰，於是貼出佈告扣發三人獎金和當月浮動工資。此事捅到省委，省委下令「嚴肅糾正」，南平市委執行的結果：該廠勞動人事科長解僱，理由是：歧視黨的政工幹部。

△北京下決心在全國掃黃，各地土政策多多。京報披露江西省永新縣中學，定下掃黃指標，每班上繳一百本黃書黃帶，並落實到人頭，完不成作政治態度論。許多學生家長從此不得安寧。家中無黃書黃帶只得高價徵求，好讓子女交差，一時間永新縣搶購黃書黃帶成風，被查禁的黃書反而居奇，價格更高。掃黃效果恰得其反。

△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政協報》揭露了一件怪事，中國公安部所屬的北京聲像公司以錄製在押犯人或刑釋人員的「囚歌」來牟利。文章透露，近年勞改犯發不滿情緒或表現囚犯心態的「囚歌」走紅一時，犯人歌星更爲吃香，一位犯人張行出獄時以三十萬元獲簽錄製「囚歌」。

產品積壓增四成

△《經濟參考》近期揭露不少企業存在的歪風：獎金、物品越發越多，工人積極性卻越來越低，根源是「新的平均主義減弱了工資對生產的激勵作用」。

△北京出版的《中國城鄉開發報》報導，去年以來國際市場對中國出口的棉紗棉布的質

量很嚴苛，有的投訴，有的索賠。歐洲客戶說，如果中國棉紗布質量再不解決，三年後就要退出國際市場。

△北京《金融時報》透露，今夏以來，全國各地商品積壓情況嚴重。至十月份，企業產品及商品積壓的總值超過一千五百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中國青年報》十一月一日報導，大陸的占相熱依然不退。在大肆清理、整頓文化市場的同時，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堂而皇之」出售《易經十八卦》、《麻衣神相》等書；在解放軍某部調查，百分之六十的戰士手上有這一類書。

△新華社十月十八日透露，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統計數字，今年全年中國人口出生率將達到千分之二十一，遠遠超過了國家千分之十二的預定限度，其中第二胎有上升趨勢。人口形勢極爲嚴峻。

遲鈍的和敏感的

△十一月，象徵兩個世界的柏林圍牆被拆，成了全世界的新聞焦點，唯獨中共顯得遲鈍，大陸報刊對此隻字不提。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國際版，新華社僅發了五行字的小消息，而且其中連「柏林牆」三個字也沒有。一句巧妙的修飾句是：「民主德國決定開放旅遊，實質上意味開放了兩個德國和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

△查閱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東歐各國劇變的政局新聞少之又少。《南方日報》、《深圳特區報》等國內報刊也不見消息披露。

△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瞭望》週刊，刊登署名文章《台灣當局搜羅大陸外逃份子目的何在？》歷數台灣近來的「小動作」，對台灣收留三位大陸民運人士極爲憤慨，措詞強烈。

△十一月十日八時左右，美國之音報導了中國十三屆五中全會的消息，稱全會期間省一級與中央發生爭論。第二天，新華社發表措詞強烈的抨擊，責問「美國之音居心何在？」先後不到二十四小時。

對台灣大選之競選動向，特別是有關「台獨」和暴力事件，中共報刊曝光不少。

以十一月九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爲例，在第五版的港台消息欄中，與台灣大選和台灣有關的消息連發五篇：分別是競選暗殺事件、立委候選人接恐嚇信、台南暴力事件、台島「台獨」言論猖獗及對台灣選舉的評析。

△十一月八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轉載《大公報》的署名文章《「支聯會」及其領導人自北京事件以來的言行備忘錄》，可謂是「支聯會」的「起居註」，何年何月何時何地何人如何說，摘而不漏，詳盡之至。

△香港《國際金融家》雜誌十月份在大陸的《中國青年報》多次刊登廣告，招聘、選拔一千名駐國內的編輯人員。條件頗具吸引力。只不知這與十月廿六日國務院頒發的港澳記者去大陸採訪的新規定中的有關條文有否衝突？

胡風翻案復翻案？

△反映歷史冤案的《胡風案始末》一書出版不久，大陸文藝界有了一點小迴響。十月二十八日《文藝報》不尋常地以三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胡風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林默涵的長篇「答辯詞」。從文內大量以前未被引用的文件及書信來看，對胡風案當年的幕後運作大有「澄清」某些史實的意思。林默涵在文末表態說，他決不向任何人「懺悔」，也根本不需要懺悔，當初他並「沒有違背黨的利益」。

聞到了一點火藥味。在此「清算」的年代，是否意味著「胡風案」會再翻案？

△新華社十一月二日電，李鵬簽署了國務院第四十五號命令，發佈《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辦法》，定於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零時開始普查登記。

△《勞動報》十月十七日披露，大陸多地發現了電腦病毒。上海市的部份經濟統計數字受到該市計算機站病毒的影響發生誤差。

△國務院在海南、深圳兩地實行「社會保險綜合改革」，自今年九月一日起開始實施。新措施對該兩地職工的養老、待業、醫療等作了諸多詳盡的規定。

今年內不解除戒嚴

△《人民日報》海外版加強了對民運人士的攻勢，十一月七日、八日連續兩日發表署名文章，分別對劉曉波和方勵之再次筆伐。題目分別是《從民族虛無主義到賣國主義》和《折方勵之鼓吹的西方民主》。一週之後，中科院撤銷了方勵之學部委員的稱號。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四日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門、各學校、企業堅決抵制、堵截「民陣」從海外傳入的宣傳品，對隱匿者或知情不報的依法處理。要求做到「三不」：不聽、不信、不擴散。

△《南京大學報》報導，南大學生在反思中「重塑自我」，精神面貌大改觀，表現在：挑燈夜讀的人多了，恢復晨跑的人多了，二十幾名學生申請入黨，一千多人主動獻血。

△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十一月十三日對日本《東京新聞》記者明確表示，北京市今年內不會解除戒嚴。

△十月十二日，以江澤民和李鵬爲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會見出席「優秀少先隊工作者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建國以來所少有的，顯見中共對小抓思想意識教育的重視。全國少先隊員現有一億三千萬。

北京归来者放谈内幕民情

石鸣采访整理

人人过关的大清查

石：听说北京在搞清查运动，不知怎样的清查法？

M：北京搞了两次了。第一次，各单位领导，大都以走过场的态度去查所谓的暴徒、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学习了邓小平讲话、陈希同报告、《人民日报》社论等，便向上汇报说：本单位没有什么参加“暴乱”活动者，也无重大过激行为……。北京市政府中央组织部与李鹏一看，便急了，连连开会，决定，在总支一级派遣或成立清查领导小组，制定了清查表发给每个人。

清查领导人把一张张清查表发下去，命令要背靠背地填好，一个个地交上去。表中规定了十九种必须交待的行为。最轻的是去过天安门广场看了示威游行，其次是参加过游行；最重的便是参与“暴乱”，“设路障”、“拦军车”、“杀解放军”等。

参加游行者，要讲清楚自己前后左右的人，谁喊口号了，谁唱什么歌了，谁出了什么主意了，必须写明。随大流参加过一次、二次者，讲清问题，挖资产阶级思想根，至少写过二、三次交代检查，总支一级的清查组认为可以，便可算清查完毕。至于捐款者，游行主要组织者，要在公司党委一级清查组受审查，方能决定通过与否。至于参与什么“暴乱”者，那是要报北京市委与戒严司令部的。

丧心病狂的李锡铭，似乎视其管辖下的人民为仇寇，竟在一次报告中说：现在北京只清查出一万余名暴徒，这是远远不够的。据他估计北京至少可抓到十万“暴徒”。

石：对人民如此凶残，那么对于参与的干部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M：这次是下紧上更紧，特别是对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更是在搞斩草除根的大肃清。

例如中央组织部清查三十多名游行参加者、学生民主运动同情支持者，一律开除出党籍，赶出组织部，降为一般劳动者与普通机关工作人员。中央统战部、共青团中央，也都开除了三十多名党籍，中宣部也有十几名；广播电视部，更有一位唯一以副部长身份参加过游行，受到学生热烈鼓掌欢迎的退休老干部，不仅被开除了党籍，剥夺了副部级待遇，还立刻勒令赶出了原住房，你们看，李鹏、李锡铭之

类狠不狠。

石：那么对留学生呢？现在留学生回去不要紧吗？

M：中共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目前李鹏政府采取的是内紧外松，放在秋后再算帐的办法。

因此，一般在国外参加过一、二次游行、喊过二句口号者，暂时来回没问题。但你出国前，需将护照放到领取出境卡办公室约一个星期，当他们根据所得情报请审完了，内部备好案，定好性，只要你不是什么头头，一般可放你出去。他们知道，国内卡一个，那么国外留学生将是一个不回，而且又要受到国际舆论批判。据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的方针是先清理好“内”，再待时机整“外”。不是不算，而是时候未到。这些敢杀人的家伙，还能在秋后放过你们这些喝过“民主国家”水的“异化分子”。

北京人民不服

石：现在想听M小姐谈谈自己在北京所见所闻的北京人民真实思想，北京人民是怎样对待李鹏政府的大清查运动的。

M：我先跟你讲一件我自己见到的事，那确实是我自己亲眼见到的。北京人民真了不起、勇敢！八月二十八日早晨，我正去菜市场，见立体桥围着一堆人在抬头看。我也过去看，嘿，立体桥上吊下一张大幅标语，一个字有一人大，上写：「北京人不服！」

石：北京人民这次真是好样的，那么北京的学生情况，又是怎样呢？

M：北京的学生当然是好样的，尤其是北大的学生，搞了二件令中南海魔王大为紧张的事件。中央定为、（一）未名湖哭案；（二）为蒋介石演说鼓掌案。

先说未名湖哭案吧。八月初，二百多名北大应届毕业生、集体喝了酒，在未名湖畔打着拍子，捧着小瓶（啤酒瓶）高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当局提倡的革命歌曲。

歌毕，大家相向抱头痛哭，辛酸、悲愤的泪水汨汨地流入未名湖。哭罢，二百多名学生还准备继续上街去唱去哭。这时一位北大副校长急急赶来，哭着拦着大家说：你们再出去，北大可就完了……。在副校长的再三哭劝下，学生总算没上街。

但这歌声、哭声，已使中南海魔王神经如被电触，下令追查哭者，并定名为：

「未名湖哭案。」

哭案尚未了，又发生了为蒋介石演说鼓掌案。

你别紧张，用眼睛瞪我，以为我胡说八道。我知道你想说：蒋介石不是早就去世了，怎么跑到北大去演讲呢？我告诉你，那是电影中的蒋介石在演说。北大星期六晚上，一次放战争片，中有蒋介石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说：三个月消灭共军，半年消灭共产党。

银幕上的蒋介石的演说尚没完，下面黑暗中北大的师生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长达三分钟的热烈鼓掌，这鼓掌不正反映了北大学生对镇压人民的中共军队、共产党领导的态度吗。

于是，中央又定此案为：「为蒋介石演说鼓掌案」。

众叛亲离的反动政权

石：那么根据您在北京的观感，您认为李鹏政权能长此以往地推行目前不得人心的政策吗？

M：那当然不可能，老人党卵翼下的李鹏政权，实已处在众叛亲离的状况。

我再告诉你一件薄一波司机被戒严军打死，中央机关司机集体罢开事件吧。

薄一波你是应该知道的，「文革」中被称为「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头子，现任中顾委付主任的那个倒挂眉毛的家伙。他有一个女儿，平时仗势欺人，霸道极了。「六、四」大屠杀后，满城是打枪的戒严军，她有一天却嚷着要去医院看病取药，叫司机开车。

司机无奈，只能提心吊胆为她开车，半路上，正碰见戒严军叫停车，要检查。平日蛮横贯了的薄一波的女儿，竟然下死令，叫司机不要停，冲过去。在薄雌虎的淫威下，小司机只好硬着头皮冲。那戒严军见有人要冲，抬手一梭子，就把司机打死了。

为司机开追悼会那天，葬礼一完。中央机关的司机一个个走到薄一波面前，把车钥匙扔在他脚下，拒绝这样无生命保证的开车。

事闹大了，无理的薄一波，只得陪小心，说给司机追认为烈士，优厚发抚恤金，并通过其他中央头头来说好话，好歹才了事。

现在，我告诉你，北京人照样有话还讲，有不平就骂，只不过曲些吧。明眼人一听就明白这个话中的意思。

我看李鹏政权，就如风中残烛的邓小平，快完了。

天安门广场事件迟早一定会平反的，李鹏之类将一定要受到人民公审的。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民主中国 89/18

戒嚴下「平暴清查」觸礁

北京心態錄

本刊特約記者 曉冲

學運民主搖籃北京大學所以拖到十月十四日才開學，是因為九月中旬北京大學區發生了……光是北京市，監獄裏就關押了近兩萬名民運人士，有二十萬人涉嫌「暴亂」而尚未被捕，而受民運牽連者則有二百多萬人。

北京槍聲不斷，人心不死。整個北京仍像一個火藥庫，只要有人點火，隨時都有爆炸的危險。

年前，大陸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理山到香港採訪，回到北京寫了一篇《香港心態錄》。這次到北京採訪，非常時期北京人的心態一直感染着我，激勵着我，回程中我就打算，要寫一篇戒嚴下的《北京心態錄》。

槍聲不斷，人心不死

「國慶」之後到達北京，北京的朋友少不免就談起「十一」前後的事來。

今年參加「國慶」觀禮的代表，都是各單位機關經過多次遴選後才選出來的，都是一些所謂「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據介紹，這些代表都經過黨政部門嚴格的政治審查，比文革時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時的政審還要嚴格，凡是學潮期間參加過示威遊行、簽過名或支持、聲援過學生的人都不夠「資格」。雖然參加「國慶」觀禮是支持當局活動，但為了安全起見，當局還是寧缺勿濫，故一些廣泛支持過學生運動的單位，只有個別領導人獲准參加。

即使這樣，當局對這些學潮期間聽黨話的「三不」（對學潮不介入、不上街、不支持）黨員和幹部還是不放心，還有一條鐵的紀律要求他們，就是參加天安門廣場觀禮期間，各單位的代表不能走散，不能自由活動。

至於觀禮期間的「遊藝節目」，北京文藝界人士都沒有那份心情去粉飾太平，戒嚴部隊的文藝隊伍又遠遠不夠，當局只好從外省一些邊遠縣市抽調文藝團體赴京助慶，因為那些縣市的人既不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更不理解時下北京人的悲憤心情。

即使「國慶」期間控制得那麼嚴，北京市不時還是有槍聲傳出。朋友介紹說，北京不斷的槍聲有兩種，一種是統治者打的，一種是人民打的；無論是哪一種槍聲，都反映了一個事實，北京人心不死。

據說中共當局近月槍斃了不少民運人士，但不像外界所說是完全秘密地處決，而是半公開地處決。所謂半公開處決，是不經過法庭審判，不讓外界知道，但會通知被槍斃者的親屬，且是事後才通知。在北京，近月已產生了不少這樣種下了仇恨種子的家庭，這些家庭在「六四」之後的大搜捕中，有家庭成員被戒嚴部隊或公安、武警公開槍斃了人。但過了一段時間，當局就通知家人去收屍，說被捕者因參加了「反革命暴動」，已被槍決，並警告他們不要亂說亂動，說他們是「暴亂」，如不聽勸告一切後果自負。

校園火燭，半明半暗

人心不死在校園裏表現得尤為明顯。

「六四」之後，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被鎮壓下去了，但學運的火把並沒有隨着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的被摧毀而倒下。本來九月一日開學的北大，一直延遲到十月十四日才開學，已說明了問題。

學運民主搖籃北京大學所以拖到十月中旬才開學，是中共當局有意避開十月一日這個不祥的日子，因為九月份北京大學區的情勢，使中共當局異常震怒，不得不把本來延期了一個月的開學的北大，再延期一個月。

九月十二日，是「六四」大屠殺百日之奠，北京學生、市民和全世界各地華人一樣，舉行了祭奠天安門死難者亡靈的活動，所不同的是，海外華人可以用公開的、傳統的方式進行，而北京只能在槍口下用半公開的方式進行。

百日祭當天，已經開了學的多間北京高校，悲傷之歌相聞，縹緲不散，師生們都以白花、黑蠟及白服、黑服表示對死難者的哀悼。

中共法西斯當局對這一個日子也早有防備，那兩天，戒嚴部隊調派了幾團軍隊到海澱大學區，不斷地進行操練，以起威懾鎮壓學生的作用。

為了防備學生在該日走往市區「鬧事」，當局向該等部隊下了命令：衝出校園者格殺勿論。

當天，曾在學潮中起過先鋒作用的北京師範大學及中國人民大學，大批學生在懺哭之後異常激動，要衝出校園到天安門廣場去拜祭死難者的亡靈，但該兩校的教職員工恐怕再次演變成流血事件，死死相勸相阻，把學生擋了回去，才避免了慘劇發生。

在還未開學的北京大學，校園也並不平靜。留校的學生也都以黑白的服飾表示對死難者的追悼，他們知道校外有很多軍隊，故沒有打算組織出街，而是分散到校內的園林區舉行小型集會。兩天後的中秋節晚上，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內各建築物的天台上燃點蠟燭，舉行晚會，繼續對死難者進行追思……

北大開學後，已遭減少招收的七百多名新生被送去河北軍訓一年，而其他學生則要先進行軍訓和政治學習，主要是學習鄧小平的「六·九」講話及有關中央文件，但遭到學生普遍的消極對抗。許多學生為原校長丁石孫的被免職鳴不平。而對新校長吳樹青極為不滿，因為他不僅是一位思想非常保守的經濟學家，而且是劊子手總理李鵬的親信。

而在北京的幾十所高校，開學後發現不見了許多學生，除了在「六四」大屠殺中死去的，及逃亡到了海外的學生領袖外，尚有許多人仍在大陸內地流亡避難，據稱其中不少人已經出家，河南、山東、山西及四川等地的廟宇，近月都收了這種新弟子，有些已遭中共當局強逼還俗，「輯拿歸案」。

北京仍是一個火藥庫

到北京採訪，習慣上有空時在酒店房間裏就會打開收音機，收聽外國電台的新聞節目。十月十七日夜間，有一項消息說，中共政府發言人袁木說：對「動亂分子」的清查，包括對被撤職的趙紫陽的支持者的處理，「不應擴大化」。

事實上，這並不是鄧李楊法西斯政權對「平暴」動了惻隱之心，有所回心轉意，實在是他們遇到的反抗力量太強大，他們根本沒辦法按原來的計劃「清查」下去。

據公安部一位幹部私下透露，光是北京市，監獄裏就關押了近兩萬名民運人士，有二十萬人涉嫌「暴亂」而尚未被捕，而受民運牽連者則有二百多萬人。

文藝界、新聞界、清
大規模捲入民運，成了
查運動開始後變成了
大面積積極怠工。全國
中國作協在全年會
極有影響的中壯年數
員中，幾乎有近半數
已在近月中出國不
及逃亡海外……

名、戒嚴期間上街遊行和堵截軍車進城者，則有二百多萬人。

一些知識分子成堆的機構，如大學、新聞單位和兩個科學院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都捲進了，要按中共的「十九種人」的標準進行徹底「清查」，確實太難了，也可以說不可能。而以單位而言，上至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機構，下至小學、幼兒園、個體戶，都與民運有關，「六四」後又都要展開「平暴清查」。

「清查」初期，鄧李楊集團兇神惡煞，反革命意志頗決，叫囂「寧抓一千，勿漏一個」、「抓盡殺絕，一個不留」，他們要消滅盡民主火種，免得為專制政權留下後患。

但是，中共的「清查」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一千萬北京市民幾乎都不予合作和消極對抗，在一些中、高層機構，政治學習變得一片沉默，而在基層單位，政治學習甚至中共的幹部也不大正經，冷嘲熱諷，羣衆更是大講鬼話，諷刺挖苦當局。而在私下，人們開口便罵政府，並沒有因為北京仍在戒嚴而有所收斂。整個北京仍像一把乾柴，一個火藥庫，只要有人點火，隨時都有燃燒爆炸的危險。

北京出現文革「還鄉團」

所以，李鵬、楊尚昆之流越查越心虛，越查越心慌，不得不「走夜路吹口哨」，掀起文革後期落實幹部政策的口號，在「清查」工作中提出「孤立一小撮，解放大多數」。這就是袁木「不應擴大化」的背景。

北京一位工人朋友說：「六四」大屠殺都過了三個多月了，對那些被他們逮捕的著名民運分子，到現在都定不了罪，判不了刑，你就知道他們的清查有什麼能耐了。」

對於中共的「清查」工作，北京學衛界、新聞界、文藝界等都是清查重點，但各界都不予合作，令中共無力清查，只好組織清查組、清查隊進駐這些機構和單位，組成人員百分之八十為文革時期工作隊員、專案組人員及政工人員，北京人都戲稱這些清查組、隊為文革「還鄉團」。

但即使是這些文革餘孽們，也多數不能認同郭李楊殺人集團，他們只為形勢所迫，才不得不做醜人。

電影界、新聞界各大機構也大規模捲入了八九民運，清查運動開始後變成了「大面積、大規模的消極怠工」。這令中共非常頭痛，因為這些精神勞動生產不是靠強制所能指導動的。中共為此撤了北京電影製片廠及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的職務，但士氣更加低落，而消極對抗則更趨激烈。

中國作家的大流亡

在文藝界，文聯及各協會幾乎癱瘓。據朋友說，在五月下旬戒嚴期間，國家直屬機構中，對李鵬政府或嚴令沒有發賀電的只有三個單位，就是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全國僑聯。特別是作協，八九民運的衝擊無可估量，作協領導層普遍對現政權不滿。而中國作協轄下的魯迅文學學院、北大作家班，則成了中國八九民運的先鋒隊。

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層，受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及其後的反資運動所害，舊傷未癒，領導層早有消極怠工之意，年初作協書記鮑昌明病逝，近日書記唐達成更因對當局處理「六四」手法不滿而辭職，書記束沛德也「因病」住院，只能由不倒翁文人馮牧及馮拉沁夫支撐場面。「六四」事件已令中國作家完全絕望，中國作協在全國極有影響的中壯年會員中，幾乎有近半數已在近月中出國不歸及逃亡海外，如劉賓雁、張潔、阿城、高行健、張辛欣、古華、王兆軍、楊煉、顧城等皆屬前者，而劉再復、徐剛、祖慰、孔捷生、蘇曉康、老鬼、李陀、蘇偉、北島、老木等，都是

「六四」前後為了逃命而流亡海外的。而此類作家尚在國內者，如鄭義、趙瑜、賈魯生、葉文福、熊召政等，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自動失蹤了。而其他尚在國內者，則有更多的人在等待出國的機會。而在電影界、體育界、學衛界，情況與作協也是大同小異的。「六四」震碎了中國人的心，也加強了人民對中共的叛離及反抗的決心。



六月六日北京一張抗議標語

仇恨充滿着北京城

謝民

六月二十七日，我終於離開充滿白色恐怖，充滿悲傷、憤恨、創痛的北京城，來到可以自由說話、自由呼吸的香港，但我永遠忘不了「六四」血洗天安門後的日日夜夜。

北京死一般的「寂靜」

六月四日，是北京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也是世界一切愛好和平、民主、自由的人們不能忘記的日子。這一天，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為首的刽子手們屠殺了以死氣沉沉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鬥的、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市民、用坦克、衝鋒槍殘酷地粉碎了青年人們對中國前途的美夢。如今，硝煙依舊，鮮血尚存。人們依然悲傷地生活在大追捕、大殘殺等無休止的政治迫害之中。他們有話不能說，有苦無處訴。我那年

老的「三八」式退休老幹部父親，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獨自開門出門，自言自語罵道：「這些當權者是法西斯！是畜牲！」北京城不再有些日子裏為學生革命行動而奔走相告的歡樂氣氛，它表現得死一般的寂靜。在一些機關單位，幹部們只能以無聲相待；工人憋不住氣，只好挖空心思說一些比資本更左更假的諷刺話，並且消極怠工，以此進行對抗。

古城充滿着仇恨

「六四」血洗天安門廣場後，北京這個古城充滿着仇恨與恐怖，在大街上，你到處可以看到端着衝鋒槍、滿臉充滿敵意與殺氣的士兵，他們恨市民，恨學生。同樣，市民和青年學生，甚至老太太、小孩都以橫眉怒目注視着武裝到牙齒的戒嚴部隊。小孩們不再叫他們為「解放軍叔叔」。在搜捕的日子裏，人們都怕落在戒嚴部隊手裏，因為他們比武警更兇惡，更沒有人性。落在他們手裏的人，稍有反抗就一梭子彈掃過去。一天，我走過西單胡同，剛聽見有人喊「法西斯」，立刻就一梭子彈從我頭上飛過，然後士兵躲在旁旁發笑。他們草菅人命，把握在手槍中的槍當兒戲。你還可在大街上看到可笑又可悲的情景：一個軍官模樣的軍人，穿着拖鞋漫步，他的後面緊跟着兩個全副武裝的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戒嚴部隊士兵不敢單獨行動。他們殺了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他們膽怯，怕人民向他們索償血債！

「六四」大屠殺期間，我在西單親眼見到一個士兵殺了市民，被憤怒的羣衆用連接路鐵的鐵條整死了，兩天沒有人來收屍（當局有意製造「暴徒」的罪証），後來，他被人用玻璃片割開肚子，腸子流出。我的一位鄰居每天經過都要看兩次。我問他為何每天看兩次，不噁心嗎？他回答說：「看了我就解恨！解氣！」

恐怖籠罩着北京醫院

北京戒嚴部隊不但佔據電台、報社、機關、學校，那些天，他們也嚴格控制醫院。在醫院工作的姐姐告訴我，戒嚴部隊對還有一口氣或是受傷的市民、學生，逐一進行追查。有一天，醫院送來一位胳膊中彈的市民，戒嚴部隊表示懷疑，要進行審查，那個中彈的市民憤怒地大聲地嚷道：「你們可以到我家調查，如果我家牆上沒有一個子彈孔的話，算我撤職，可以抓去槍斃！」調查結果，他家有八個子彈孔。就在同一天，戒嚴部隊送來一個受傷需要動手術的士兵，醫生一

看是殺人的兇手，馬上說：「我們這裏是五官科，不會動手術，我給你轉院吧！」那個端着上了刺刀的衝鋒槍的戒嚴部隊士兵命令醫生、護士搶救，並要在處方上註明用什麼藥物。小護士嚇得顫抖着雙手，好半天都無法在靜脈注射葡萄糖液。在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因為他們生命已不如草芥，他們隨時都有被毆打、綁架、逮捕甚至槍殺的危險。

戒嚴部隊最恨個體戶

戒嚴部隊最恨這次學運中擔當敢死隊並給學生通風報訊、又給學生物資援助和積極承擔搶救傷員任務的個體戶市民。「六四」大屠殺那天清晨，槍聲四起，只見市民慌忙搶救倒下的學生和市民。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憤怒的市民將停在西單路口的三輛裝滿軍人的武警車倒推倒到西四（約三站地）一個個體戶商店門口。這時，武警見到天安門殺人兇手，跳下車跑到天安門加入殺人的行列，草草就氣憤地把三輛軍車全燒了。但是，到了第二天，這個個體戶商店就被戒嚴部隊砸個稀巴爛。在我離開北京那幾天，戒嚴部隊正在大肆尋找機會消滅個體戶，有的個體戶把蔬菜拿到居民樓下小巷出售，只要被戒嚴部隊士兵發現，不但沒收，還遭一頓毒打。

北京回到「文革」時期

北京已經回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除了槍聲、殺聲之外，在高音喇叭裏一遍又一遍地播出殺人元兇鄧小平的講話，這聲音比文化大革命「最高指示」更為可怕，它使心頭沉重、苦悶的北京市民又增加了壓抑感。北京當局還厚顏無恥地說，由於「暴徒」在北京的非法行徑擾亂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不少市民氣憤地罵道：「你們才真正是擾亂市民正常生活的暴徒！」

人民寧願吃窩頭抵制獨裁

天安門前的鮮血，不只是中國人的悲劇，而且是整個人類的悲劇。我相信，北京城當時的沉默默將變成巨大的力量，淚水將洗淨這航禍的古。六月廿五日，當我離開北京的親友時，他們沉痛地希望我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呼籲，希望他們對李鵬偽政府進行各種各樣的制裁。他們說：我們寧願吃黑窩頭，過苦日子，也不願看到外國貸款養肥這批官僚、殺人犯！老百姓哪怕再勒緊褲帶，也要親眼看到滅滅人性的法西斯政權垮台。

粉飾昇平下的北京淚 殉難「共和國衛士」復活了

龍子

崔國政活著並未死

「六·四」剛過，北京有件轟動烈的大事，那就是崇文門立架橋時，有位爲了「保護人民」而被暴徒燒死的戰士崔國政。一時間，電視台日夜轉播，到處設靈堂，老太太、婦女、少先隊到烈士被燒死的橋上獻花圈、哀悼、流淚。崔國政烈士的母親被請到北京，國家領導人接見，各界慰問。直到被命名爲「共和國衛士」，可謂光耀耀宗，流芳百世。

不料最近崔國政竟活生生地回到了吉林老家。原來他是個逃兵，當時一看局勢緊張就逃跑了。所在部隊少了個戰士，而立架橋下的屍體無人敢認領，竟演出了這一個國家光榮、部隊光榮、家庭光榮、個人光榮的絕對光榮戲。

崔國政當然不敢露面，直到最近才回家。他的母親已經把所領撫卹金趕緊退給國家了。

動亂期間，難免有誤差，問題是共產黨從來不會承認錯誤作出更正的，那麼只好讓活著的逃兵崔國政英名常在，永垂不朽了。

北京有些新聞記者已經知道了這件事，誰也不敢報導，這是可以理解的。萬一報導，會有數不清的親眼目睹的證人，出來證明這位記者是別有用心地造謠生事。

但是我認爲應該將事實大白於天下，說不定這關係到崔國政的生死存亡。

被捕的人生死未卜

「六·四」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現在統計不出來，也許永遠統計不出來。因爲許多人已經在天安門廣場火化上天了。天安門廣場以西六部口被坦克壓碎的人，只有被到被遺下的學生證的，才留下了名字。各醫院絕對不許說出死傷人數，後來由於被捕，醫院裏的傷員有些不翼而飛了。馬路上還擲子彈掃射死的，送到火化場，火化單上必須填寫「病死」，否則不予火化，這大批的

死亡數字都記入病魔的帳上了。誰也不敢上報「誤傷而死」，萬一自己突然被列入暴徒家屬，後患無窮。

事件後的殘酷鎮壓也是無以復加的。夜進私宅亂抓人，先毒打再死去活來，發現抓錯了，還要厲聲訓斥：「出去不許說。」這樣的冤鬼，不計其數。

五月份，就在李鵬在衆目睽睽之下對學生說：「我們絕不秋後算帳。」但同時，北京已經騰出許多平房。現在，北京市郊豐台、順義一帶，監獄人滿爲患。牢房裏的人像沙丁魚一樣擠着。每天吃兩頓，每頓兩個窩頭、一碗清湯，小伙子們餓得哇哇叫，住在秦城監獄的于浩成、戴晴等稍好一些，只要有錢，可以買到東西。六、七月間北京捕人的警車日夜叫囂，使人們的心弦顫抖不已。光是木樨地這一居民區就逮捕了數百人，這些人到哪裏去了，生死如何？家屬不知道，也不敢問。有的判了刑，一個十多歲的無知少年，在地上撲了兩個子彈，十分得意，他被判兩年徒刑。被捕而未死的犯人，按照王震的旨意，發配青海，吊銷北京戶口，永遠不得回北京。這一批批的「犯人」，維繫着多少人民的心與淚。

政治局上的爭吵

早在五月份，中央已經確定由江澤民擔任總書記；當時楊尚昆和李鵬不服氣，鄧小平在五月初九日說：「不要吵了，江澤民當總書記已定下來了。」在重組政治局常委會時，鄧小平曾舉薦里為政治局常委，但是老人們不同意。後來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萬里發言說，經美國回來時自己並不知道先到上海，經上海回到北京後，他是照着李鵬交給他的講稿發表講話的，說明當時全盤由李鵬主持。不久前鄧小平找江澤民談話，講了三方面的事情：一、不要把趙紫陽說得一無是處，他也做過不少好事；二、要注意領導人的形象；三、「六·四」事件我沒有責任。九月十六日鄧小平在接見李鵬時說了相，否則這些話聽來頗像最後的囑咐和自辯。

對趙紫陽生活鄧小平親自過問，讓趙紫陽仍然享受特供。報上大事宣傳的取消高幹特供，事實上並沒有取消。所謂取消，是高幹的司機、保姆、親友不能同享了。過去買特供只憑本子不限數量，借到特供本可以盡量買，現在限量了，但保證高幹享受。

鄧小平說：「全難老還在。」因此退休了的老人正在還朝。賀敬之是其中之一。賀敬之主持文化部是鄧力羣爲他奔走的，但是名字遞到人大常委會，萬里說年齡太大，不肯任命，於是經過人大常委會，賀敬之擔任文化部黨組書記，由國務院指定他爲代理文化部長，這可以說是「事在人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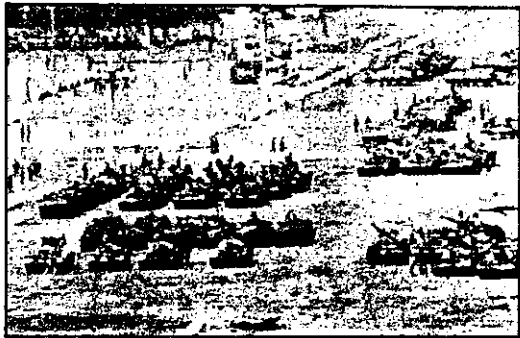
製造昇平大家心裏明白

北京正在製造歌舞昇平，經各機關、學校抽出幾萬名最可靠、最老實、最聽話、最信得過的人，經九月六日開始練習集體舞和交誼舞，由國家供吃，到十月一日那天的下午開始，這些人要在天安門廣場站方塊，跳舞，直到結束。到那時，電視上播放的歌舞昇平的天安門，實際上規定在裏面的，不許出來；在外面的不許進去。滿街的花，夜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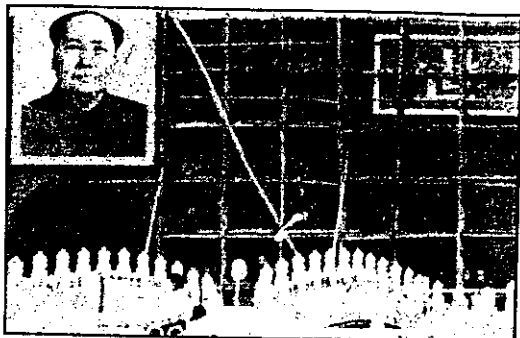
裏的烟火，老百姓都明白這是花了誰的錢在做給誰看。

職工們，剛剛在八月份付清買國庫券的錢，九月份要買公債，上級規定買公債每人攤派的份額是工資的百分之七十，有的規定至少五十元，包括月工資五十八元的大學畢業生。報上說買國庫券和公債都是自願的，但這種自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願。大家但願這筆勒緊褲帶擠出來的錢真正用在正道上，而不是粉飾太平。

中央正運行一切力量在宣傳四十年來的成就，大家心裏很明白，國家債台高築，還要充胖子放烟花，經濟困難，國營扶不起，現在又要全力打擊私營，對於偷稅漏稅的個體戶要「罰得他們傾家蕩產」，今後要實行「稅後承包」，即先納稅後承包，有多少人敢擔風險。中央無能，只好朝令夕改。六·四以後最繁榮的莫過於說假話。報上到下午，說假話是無需培訓的。



坦克帶領軍士圍戒嚴地區。



爲了粉飾昇平，北京天安門城樓立即進行修繕。

白色恐怖下的北京

傅妮

最近，兩位剛從北京飛抵美國留學的北京大學學生，向我描述了在白色恐怖下煎熬的北京，我覺得有必要把它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六四」後北京大學學生和市民表現出的英勇與平穩政府的兇殘和無恥。

人人「洗腦」

北京人有兩手

「六四」大屠殺使所有的北京人震驚，因為事先沒人料到政府會用坦克機槍來解決民主運動。然而，更令人震驚的是，政府殺人後還撒謊說天安門廣場沒殺一個學生，並把這場有一百多萬市民和學生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說成是「動亂」、「反革命暴亂」。

現在，人人怕「舉報電話」，因為不曉得哪一天被誰舉報。有些人現在利用舉報電話「公報私仇」，平時與誰「過不去」，現在就悄悄打舉報電話，舉報某某去過天安門廣場，曾參加過軍隊。馬上那個個人就倒霉。現在又有點像文化大革命時那樣，不需證據，僅憑一個電話就抓人、打人。

北京，每天都有人「失踪」

現在戒嚴部隊抓人，都是在夜間悄悄地進行，幾乎沒人知道。以前通緝學生，抓住的還報到，後來乾脆不報到了，人們根本不知道，誰被抓走了，誰沒了。現在經常聽到有人議論，某某失踪了，好端端的一個人突然就沒有了，誰也見不到了。不知是否逃走了，躲起來了，還是讓政府抓去了。就像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失踪了一個多月了，直到報上開始批判她，才知道被逮捕了，據說關在秦城監獄。那種白色恐怖的氣氛把人都壓得喘不過氣來。

「六·四」後出現一個新名詞「暴風」

街道居委會老太太活躍了一個舉報電話三個陳軍被抓

「六四」後，街道居民委員會有些老太太又開始活躍了，幫助政府清查「壞人」。我家附近居委會一個老太太曾給「舉報中心」打了個電話，說我們這一帶有個叫陳軍的小青年，「六四」那天，經常三更半夜才回來，可能去廣場了。戒嚴部隊馬上派了很多荷槍實彈的士兵，一查，這一帶有三個叫陳軍的青年。結果，三個陳軍都被抓去了，抓

公報私仇人人怕「舉報電話」

去就是一頓暴打，到最後也沒查出哪一個去了天安門廣場。

北京宗教研究所追查：誰給學生送了二百五十個雞蛋

現在，每個單位都在追查，在五月份學運中，誰支持了學生。當局把學運分成兩段，前期是「動亂」，後期是「反革命暴亂」，不管你在哪一期支持了學生，都需交代，接受組織審查處理。北京市宗教研究所曾在學生絕食時給學生送去了二百五十個煮好的雞蛋。現在，上級派來工作組追查，誰送的，誰煮的，誰出的錢，誰出的主意，人人過關。而全國總工會曾給學運撥款十萬人民幣，以示支持。現在則成了大罪。不僅追查責任，當局還決定，讓決定撥款者、執行者、贊同者一起賠償這十萬元錢，從每個人工資中逐月扣回，要一直扣到二十一世紀才能扣完。

今年北大招收八百民兵

「六四」，北京大學是重災區。在政府公佈的死亡二百七十名學生的數字中，北大就有五十六名。今年，北大原預計招生二千名，結果當局給砍了八百，並指令，凡在學運中表現活躍的、黨委管理不力的系，今年都不招新生，集中時間整頓。像哲學系、社會學系等人文學科今年都被取消招生。而招來的八百新生也不許馬上入學，而是派到石家莊先參加軍事訓練一年。而且學校還要為每個參加軍訓的學生付繳軍方二千元人民幣。學校當局也叫苦連天，學生們則說「我們是招了八百民兵」。

諷刺政府，中國人學會了「黑色幽默」

七月中旬，北京各大學都收到通知，讓該屆畢業生回校參加學習，然後分配工作。不參加學習或參加了思想未能與鄧小平保持一致者，不能畢業。「學

習班」一般六天，前三天學習「平亂」報告，後三天每人寫「思想匯報」。但在學習討論中，人人變着法說挖苦政府的話。比如，有的同學故意提問：現在說學運被一小撮壞人利用，為什麼每次都被壞人利用，正確力量怎麼一次也不利用呢？有的人問管政工的老師：北京的暴徒真他媽的怪，在五月份學生管治安，連一個民兵也不到的天安門廣場，他們不碰槍也不燒，到六月四日，解放軍的機槍坦克來了，他又碰又搶，喜歡槍林彈雨。

失足青年挽救失足政府

學校組織學生看錄相，說披露北京高自聯頭頭醜惡面目。當錄相中播出全部偷拍的五月廿九日吾爾開希等人在飯店吃飯鏡頭時，錄音說，看，他們如何大吃大喝。一同學在場中喊：太寒酸了，大吃大喝連酒都沒有，只有幾道菜。大家一陣哄笑。因在暗中，當局又查不出是誰喊的。後來，一個女同學在討論中說，錄相說高自聯頭頭都是醜惡面目，可我們見過吾爾開希，覺得他長得挺漂亮的。同學們又是一陣大笑，弄得主持會議的政工幹部也哭笑不得。同學們說，我們要學習學運中的一些策略，當時，有許多打出的標語極為幽默，又一針見血。如當時北京市一批勞教釋放

中組部下令：中直機關不許錄用北大學生

中共中央組織部最近下令，北京中央直屬機關一律不許錄用北大學生，其他北京各大學畢業生原則上也不錄用。很多學有專長，早已被各機關選中的學生，也被退回。而且，當局還下令，兩個月內在京找不到工作的應屆畢業生，需遣回父母所在原籍，由當地人事部門統籌安排。學生們想抗議，又不許遊行，又不許唱歌。最後大家利用在飯堂排隊買飯機會一起敲飯盆、唱八九歌學表「一二得一一二得一二得……」，其悲壯情緒令很多人落淚。

北京大學生最推崇兩個人——王維林、劉曉波

當局搞了幾個版本的「反暴亂」錄相帶組織學生「洗腦」。但學生們從錄相中看到天安門廣場上戰場自己學校的校旗時，就熱烈鼓掌。洗腦完全失敗。而且，同學們原來很少有人知道隻身擋坦克的王維林，對劉曉波在廣場活動也知之不詳。一看錄相帶，大家才知道這兩個英雄的壯舉。現在，北京的大學生最推崇王維林和劉曉波，把王看作是中國當代最勇敢青年的象徵，把劉視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現在，劉曉波在大學生中的威望遠遠超過方勵之。

大學生普遍認為：現在是封建王朝，鄧是皇帝

「六四」屠城，天怒人怨。在全國總工會，有一個局有五十多幹部，贊同政府行為的只有一個人。連那些平時維護黨的利益的黨棍，也認為李鵬政府此事做得太過份、太蠢。同學們普遍認為「六四」證明中國現在的社會還是一個封建王朝，鄧還是皇帝。解決中國的問題，道路還十分艱難。大家普遍對三、五年內國內將有大的改變沒有信心。沮喪、壓抑、悲憤成為學生們的主要情緒。出國留學前去北京協和醫院「體檢」，醫生們一聽要去美國，都說：快走，這個國家沒希望了。

解嚴之前的北京

舊曲新辭，革命歌曲大家編

針對新青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中共老人黨沒有什麼招數可以用來洗腦，於是「老八路」王震想出了一個傳統辦法，讓娃娃們大唱革命歌曲。

據國內消息來源稱，王震在六四後的一次校長工作會議上曾經發表過這麼一通講話：政治課程要恢復，但不一定有用，我年輕時就不喜歡讀馬克思的書。但年輕人喜歡唱歌。你們看，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唱民主，唱個屁！還不是唱了兩首歌：一個叫「國歌」；另一個叫「國際歌」。

王震還對各大學校長說，你們沒帶過兵，不懂青年心理，所以把娃娃們教壞了。我們的戰士也是青年，為什麼政治立場堅定？因為他們天天唱革命歌曲。你們回去後，要學習解放軍的方法治校，譬如，吃飯前要唱「社會主義好」，就這麼辦！

現在，北京各大學校已經開始大唱革命歌曲的活動。像解放軍軍營一樣，每日食堂開飯時，學生會要組織學生唱歌，然後才能吃飯。革命歌曲的曲目有：「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等等。

北京的學生都是文革後長大的，唱起革命歌曲覺得十分滑稽。但他們亦發現，革命歌曲顯然比流行歌曲好唱一些，不必用「輕聲」、「氣聲」等歌唱技巧。於是，他們便在舊歌曲中添上新詞。這些新歌詞便一下子流行起來，其中有兩首是這樣的：

原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新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死了個毛澤東。如今又來個鄧小平，帶着坦克進北京。

原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覺悟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挨着尾巴逃跑。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那建設社會主義新高潮。

新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官倒不得了。幹部子弟私囊飽，日本鬼子挨着皮包回來了。全國人民站起來。

古雪姣

掀起那民主改造中國的新高潮。

北京學生學會了這些革命歌曲後，把這些歌曲作為特殊武器靈活運用。例如新近北京大學臨屆畢業生，為抗議校方的強行分配的政策，六月二十三日數百名學生聚集三角地，鼓盪而歌。為防止中共軍隊藉故佔居校園，同學們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校領導向中央通報時說，大學生雖然在學校聚眾，但沒有鬧事，「因為他們唱的是革命歌曲」。

學生削髮，大兵圍剿五台山

五台山，中國四大佛山之一，座落在北京城西南五百華里，冀、晉兩省交界處，巍峨峻偉，神閣林立山間，著名的旅遊勝地。自四九年以來，這裡的佛家弟子從五百多人減至十餘人，並由當地縣政府直接管理。

然而，今年六、七月，不知是佛祖顯靈，還是風順水轉，突然從北京來了一批批學生，上山削髮為僧，一時間香火旺盛。不想，這却為五台山佛門引來了一次「大兵劫」。

某一日，北京某部一個團的兵力，帶着高級通訊設備和輕自動武器，突然將五台山包圍起來，展開了一場大搜捕。

原來，近月裡到五台山削髮為僧的學生，都是北京學潮中的積極份子。他們在六、四屠殺後，已無法安居學府，只好長途跋涉，來到五台山「政治避難」，以期靠佛祖的神靈保佑自身的安全。

這些學生真是太天真了。他們居然忘記，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佛門豈能避政治之難。中共在全世界的攝影機前都敢大開殺戒，五台山這種幽靜的佛門去處，自然防不住他們。

大兵們將五台山各條通路封住，通訊兵直接從北京獲得命令後，開始搜山。只見大廟裡一片喊叫聲，凡是戴眼鏡的，講北京話的和向，一律被大兵們帶下山去，押上兵車，載回北京城。

當地的五台人稱，「五台佛門靜，未免亂世劫」。歷史上，五台山百年內必有一次劫數，但不想現在却成了十年一劫。一九六六年，五台山便遭受過一次「紅衛兵劫」，那必竟是年輕孩子們上山「破四舊」，砸了幾尊佛像而已。此次的「大兵劫」却是真刀實槍真抓人。

之後不久，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會館為此，向有關部門抗議。但是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神權可抗拒王權的事情。「佛愛協會」亦只好不了了之了。

旅遊淡季，賓館淪為看守所

進入八十年代後，許多外國遊客到中國一遊後都會承認，盡管中國什麼都落後，唯有一樣東西不落後，那就是高檔賓館。一位在北京飯店住過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因飯店的服務高級而相留，北京已經消滅了蒼蠅。因為她在飯店裡住了多日，沒有見過一隻蒼蠅。

中國大陸的旅館的確不錯，是中國大陸開放後，第一個達到國際水準的第三產業。然而，外界有所不知的是，中國的賓館之所以迅速趕過了世界先進水平，絕竅在於：它沒有旅遊淡季的煩惱。因為，中共正在把北京的賓館變成公堂，關押和審訊大批學運份子。

六月盛夏，正是世界旅遊業的黃金旺季，一兩個月間，一般的旅遊公司都可賺到一年利潤的一半以上。可是今年的六月四日，北京城發生了一場大屠殺。殺紅了眼的士兵們，坐着軍車，在北京長安街經過時，胡亂地向建築物開槍。有一次，大兵包圍了使館區，闖入「外交飛地」要捉拿「狙擊槍手」。

於是，世界各國政府紛紛發出緊急呼籲，要他們的國民，不要到中國去旅遊。使大陸旅遊業面臨崩潰局面。據希爾頓旅遊集團在中國大陸的總經理夏墨龍稱：希爾頓飯店在大陸北京、上海、桂林、天津、西安等地的所有賓館，已從往年同期百分之七十五的使用率，降至百分之三十以下。

據一位剛從北京回來的美資公司人員稱，他所任的北京前門飯店，是一個中檔飯店，目前一百多套房間，僅有幾個長期客戶和一個外國遊客。而其中的一層樓，不知被什麼黨政單位佔用了，二十四小時有警察守衛，不斷有警車將人帶進帶出。

據瞭解，六、四之後北京城被正式、非正式逮捕、拘留者達萬人之眾，其中有很多是外地學生。北京市內現有的監獄、看守所皆已人滿為患。若大北京城，還真找不到關押犯人的合適去處。因為，北京人平均住房面積是每人四平方米。

到那裡去找地方關押這些政治犯呢？北京市長李錫銘終於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法子來：把北京城內空出來的高級賓館，臨時改造成看守所。

和法庭，緊急處理學潮後逮捕的這一萬多嫌犯。於是，北京城內的許多高級賓館，都有一定數層樓，整個地被公安局所徵用。白天嫌犯在裡面提堂，晚上在裡面睡覺。

當然，即使是一流的賓館，改造成看守所後也有所不同。原來一個雙人套房，現在要塞八個犯人在裡面，冷氣空調也不再供應。據稱，之所以使用賓館作為臨時看守所，這是因為北京市內的賓館都有一套公安人員建制（保衛部），而且賓館的建築結構易於看守。

上山下鄉，學生帶上禁箍咒

如今的學生為什麼會嫌共產黨不好？這是鄧小平一般老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問題。中國不是已經開放了嗎？不是已經可以穿西裝了嗎？不是已經可以放洋了嗎？你們為什麼還要上街遊行，分明是想叫我共產黨下台不可。

是的，老人黨不理解青年人，他們為什麼還不知足？那一定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毒化的。怎麼去清除毒化呢？老人黨根據自己的理解，當然是「艱苦奮鬥」、「不忘本」這一類的教育。

於是，中共新近作出有關對大學生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決定，規定大學生要接觸社會的實際，瞭解民眾的生活方式。其具體的規定是：所有高中生在考上大學之後，要先到軍營受訓一年；所有研究生在入校之前，先要到工廠和農村去接受兩年社會教育。

問題在於，目前這項規定只適用於北京大學，而其他省市的大學，可能不願接受這樣的規定。北京市高校招生委員會發出的「北京招生通訊」中透露，北京大學今年秋季入學新生，將先前往軍事院校進行軍事訓練，並由軍校發給結業證書，一年時間可以併入工齡計算。

此外，其他大學尚未知是否要推廣這樣的做法。研究生入校前的兩年體力勞動，已經被確定為全國的政策。據估計，北京市對北大新生軍訓的決定，雖然有懲罰北大學生的意味，但很可能推廣為一項全國性的基本政策。如果那樣的話，每個中國培養前途最好的青年，在入學前後就要浪費三年的時間。青春時期最寶貴的三年，另有畢業生疑心，強行將他們放下到農村兩年，是當局為了迫害參加學運的高年級學生的一種手段。一到了農村，主動權就在當局的手裡了。那些學運的積極份子很可能被用這種方式排除掉，永遠回不了城。

中共作孽，大兵池魚殃及

六四後的中國大陸，一片肅殺之氣，民情由公開的、積極的發洩，轉為暗中的、消極的發洩。

北京的西瓜小販見當兵的來買西瓜，不是吹鬍子、瞪眼睛，就是亂提價錢。賣北京人六角人民幣一斤，賣當兵的則要一塊一二。北京的一位個體鞋販，拒絕向解放軍出售鞋子，被大兵報告公安局，被以「反軍」罪判刑，另據三〇一解放軍總醫院一位醫生透露，今年北京部隊的流行病發病率奇高，京畿部隊從地方強徵的蔬菜、水果，大部份都是受到病菌污染的，如果按正常情況下的部隊供給營養標準，這類食品將會被退回。但由於京城平添了二十萬大軍，新鮮蔬菜短缺，不要說沒有，部隊只有乾受着。

在木樨地的一個北京部隊機關大院裡，曾經發生過一次水源下毒的事件，還上了內參。這次事件的時間正好是「七一」黨的生日那天。因為該部隊大院駐了一個團的野戰軍部隊，結果有人便在水塔裡下了毒。造成一百多人中毒的嚴重事件，雖然下毒者至今沒有查到，但一般分析，是大院裡的部隊家屬幹的。

除此之外，當兵的夜間外出被襲擊事件，更是層出不窮。當兵的外出，輕則被人把軍帽搶走，重則在公園裡被小青年毆打。如果碰上「北京六四死難家屬敢死隊」則十分危險，輕則一頓悶棍打得暈頭漲腦，重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因此，人們很難看到當兵的單身在街上走。

北京市還流傳着一個故事。據說二十八軍的一名連長，四川人。有一次在南池子嫖上一個妓女，上床之後，被該妓女用剪刀在下體動了「手術」。這位連長吃了虧之後，又不肯告訴別人，因為嫖妓行為違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後因流血過多，只好去解放軍總醫院再動一次手術。事情被上級知道後，派了一個班長去抓妓女，早已無影無蹤。結果這位連長被開除軍籍，送回了農村老家。

除了直接向刺子部隊洩憤外，北京市民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地下團體，如「工自聯地下委員會」、「民主正義聯盟」、「市民懲兇游擊隊」等，還有專門向日本人下手的「血光敢死隊」等。目前，各種消極破壞活動遍佈全國範圍，從軍車、火車，到電影院的椅子、公園的金魚，全都成了民眾發洩不滿的對象。據說，七月一日，北京中山公園的幾十個名貴金魚

不知被誰下了毒，有十幾條魚翻了白，一位遊客稱：這叫「共產黨造孽，殃及池魚」。

挽回民心，本錢無多空悲悽

鑒於上述種種情況，中共中央十分惱火，又無計可施。因為人們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反抗，中共可以派出克爾斯，但十二億人民如果暗着跟你鬧，那是十分可怕的。

於是，最近小平向中共書記處下指示，要盡快想出法子來，「幹幾件讓人民高興的事」。並且把「七一」黨的生日到「十一」國慶節這三個月，定為「革命宣傳月」。在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的親自督導下，按鄧小平指示，從國務院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全部動員起來，大做「好事」。那麼，中共做了那些好事呢？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這裡也一概介紹一下：

(一)解放軍展開「微笑」攻勢
解放軍自稱「人民子弟兵」，但自「六四」以後，却成了全國人民最為深惡痛絕的對象。因此，鄧小平首先指示，「解放軍必須扭轉形象，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的江山很危險」。

在北京剛剛控制住北京上流社會的駐京部隊，突然改頭換面，成群結隊地上街「做好事」。來到他們到公園、車站清潔衛生，到胡同弄裡給市民免費理髮，還派出機械師，幫助北京的個體戶修車，帶着氣筒在街上給市民的自行車打氣。派出宣傳隊，星期日在公園給遊園的人們免費演「革命節目」。

儘管老百姓一見軍人眼睛就會冒火，面肌就會跳動，但解放軍却不在乎，因為他們是軍人，軍令如山，他們見人就作出極不自然的笑容。這雖然無傷大雅，却讓北京的姑娘們煩得要命。

微笑攻勢的努力，無論如何，收到了一些效果。北京市火車站自從七九年以來，一直有一個老大難問題：就是各地上訪告狀的人太多，沒錢住旅館便睡火車站。北京站前的廣場很大，足有紐約時報廣場三倍，但還是被遊民睡得滿滿的。北京市政府曾做過多次大掃蕩的努力，想清除車站廣場，但一直無果。

不料，解放軍到底是軍威赫赫。只見解放軍一到車站去「做好事」——清掃廣場，在那兒佔地盤的遊民立刻一轟而散，被服、行李扔了一片。如果說他們怕當兵的，解放軍並沒有帶槍，只是肩膀上面扛了把掃把，而且是來「做好事」的，不是來鎮壓的，有什麼好怕呢？不過，這些遊民進局子都不怕，就怕解放軍來打掃衛生。因此，現在的北京站廣場，確實是文革以後十年來最乾淨的。

解放軍做好事的另一成就，是北京市理髮店清閑了不少。因為解放軍上街理髮，不是做生意，顧者上鉤，而是到街道委員會去找老太太，挨家挨戶拉小孩子去讓當兵的剃頭，反正是免費的，剃得好不好是另一碼子事兒。於是，北京的婦女現在有了一個剃孩子的新招。小孩子一哭，媽媽便說：「別哭，別哭，再哭解放軍叔叔來剃頭了。」小孩子一聽準不哭了。

(二)出口轉內銷，老百姓吃上「蝦」
「六四」之後，世界各國紛紛制裁中共，不向大陸賣高科技產品，也不買大陸的東西。結果不僅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生活的困難，反而有所改善，這是西方商人所無法想像的。過去大陸的農副產品經濟有兩個特徵，就是「幹什麼吃不到什麼」。對蝦產地的大連人吃不到對蝦，大開蟹產地的鎮江人吃不到大開蟹，這是怎麼回事兒呢？原來這些名貴佳產，過去都被國家統購，拿去換外匯了。

「六四」以後，由於出口被抵制，許多東西過去買不到。現在既然市場飽和，只要你肯花錢，在大陸現在什麼都能買到。餐廳裡也推出了許多新菜，過去是花錢沒處買的，連「青島啤酒」也多了起來。

過去，大陸老百姓常說，開放以後什麼都好，就是吃得不好，好吃的都賣給外國人了。今年夏天倒是破天荒的現象。

(三)國家補貼，物價下降，票券滿天飛。
鄧小平、李鵬作的第三件「好事」，就是用國庫的錢來買人民的情緒。據國內的人寫信出來說，最近許多民生必需品，諸如糧食、雞蛋、布匹等，價錢都有所下降。當然這未必是件好事。

在八四年，八八年物價飛漲時，人們罵改革越改越糟時，趙紫陽的幕僚也曾勸過老趙，要他寬心點，寧可改革失敗，不可喪失民心。他們勸趙紫陽多發些財政補貼，以免人民對改革不滿。但趙紫陽是個變法者，他深知只有經濟搞好了，人民生活才會提高，用補貼來維持改革的假像，最終意味著徹底失敗。所以趙紫陽情願讓李鵬、姚依林背後拆台，也不願用空國庫的方式製造繁榮。

但鄧小平等人不是這樣，他們在「六四」大屠殺中民心盡失，為了確保極權，不惜花錢製造假像，並一箭雙雕地讓人民感到，趙紫陽下台，生活反而好。

可是，人們都明白的是，財政補貼的方式

是一項拆底抽薪的歪招，緊跟而來的，必然是經濟危機、物資短缺。經濟學家更預測，未來一兩年內，中國的經濟將會大崩潰。

這話不錯，現在在上海、東北、河南等工業省市，憑票供應的物品日見增多。例如，滿陽的工人周末騎車下鄉買蔬菜的現象又出現了。因為很多蔬菜果類不儲藏，而且買不到，只好到農民的地裡去買。

一位三八年代的「老八路」就說，當年在晉察、冀邊區，沒有東西，沒有薪水，上面就開空頭支票給老百姓，就說解放了省城時，可以用這支票分東西，不過當時共產黨畢竟兌現了諾言，從國民黨手裡奪來了江山，老革命都獲得了特權。但是今天，人民有什麼指望呢？江山就在共產黨手裡，空頭支票再也不會兌現了。

四十年來，中共其實作過一些好事，但它對民族所犯下的過失遠遠超過其德政。它的統治結構已經不敷使用。中共儘管真心實意地想為人民作點好事，但它已經沒有這個本錢了。以致建國四十大慶如此悲慘。

知識份子：胡蘿蔔加大棒

在這次學潮中，知識份子顯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是中共領導人重點整肅對象。

「六四」之後，中央主管宣傳的常委胡啓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均受到處分。文化部長王蒙、北大校長丁石孫等最近亦被免職。鮑濟、金觀濤、蘇曉康等一批知識份子的書籍被禁止出版。現在大陸所有的新華書店都在清理書架上的書，原來都是側放，現正面擺仍占不滿書架。一大批出版社、圖書發行公司、雜誌社被取締，私人發行書攤幾乎被掃光。

在中共對知識份子的一片大棒中，也夾雜着幾根胡蘿蔔。如最近身在海外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長劉再復投石問路，寫信回社科院問黨委關於清除自由化的政策。此信轉到江澤民處。江批了三條指示：第一問題談清楚；第二不作組織處理；第三在海外不要參加反動組織和活動。表面雖然寬容，但放外之音，令人不寒而慄。

「十·一」北京聞見錄

新華僑

「十·一」將到時，我這個一向不問政治的小商人，忽然接到中國大使館的電話，邀請我參加赴京慶祝「十·一」觀光團，從歐洲坐飛機到北京。憑良心說，「六·四」之後，我是不願參加什麼「十·一」慶祝活動的，但爲了看看北京近日的真相，我還是答應了。

北京官方舉辦的那些慶祝活動，《人民日報》都已報道，這裏不贅，只談談自己的見聞和體會。

不平靜中的平靜

北京表面似乎很平靜，但細心觀察，卻發覺到處都不平靜，暗潮洶湧。

我一到北京，就聽說北京市領導人要所有軍警把民運學運「斬草除根」，「死貓當做活老虎來打」。

同時，還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在東四、光天化日之下，有青年搶了軍警的槍支。

——北京郊區和外省，都發生了彈藥庫被劫事件。

——北京高校學生第二自治聯會的傳單在多處出現，有些大學的校園內貼上了有關這個聯會的大字報。

——北京大學的牆上，出現這樣的口號：「民主運動鎮壓不了！」

——九月二十日，日晚上，就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小樹林裏，一名戒嚴部隊戰士，被人用鐵絲網纏住頸部勒死。

——去天安門練習跳舞準備在「十·一」演出的人，後幾天淨練「臥倒」——即練習槍戰時怎樣「臥倒」的姿勢。

——北京市政府號召：所有幹部在國慶節期間（三天），盡量留在家裏，不要外出，以免遭遇意外。

這些傳聞，使我和其他觀光團成員心神

不安，生怕參加慶祝活動時發生意外。每天晚上回到飯店，大家才鬆一口氣，高興地說：「今天總算平安無事了。」特別是「十·一」之夜，天安門廣場舉行大型烟火晚會，可我們站在觀禮台，如坐針氈，只盼快快結束，根本無心看烟火。

希特勒的信徒

「十·一」過後，我去天安門附近的南河沿路一位華僑補校的老同學。我說：「資本和陳希同都說，戒嚴部隊在清理天安門廣場時沒打死一個人。你就住在天安門廣場旁邊，你說，說真話吧。」

他憤然回答：「他們說的都是屁話，只能欺騙遠離北京的鄉巴佬，北京人那一個相信！」「六·四」凌晨四、五點的時候，我在家裏聽到廣場發出炒豆、抹的槍聲，趕快跑到廣場東側的公安部門前，只見裏面衝出來的戒嚴部隊正向羣衆開槍，羣衆應聲而倒，死傷慘重。我立刻參加搶救工作，幫助把死傷者抬上板車，送去醫院。這支部隊先後打死了二百多人，我雙手就抬過幾十個人上板車。」

「爲什麼責備他們堅持這麼大的謊？我問。」

「因爲他們迷信希特勒的教條：『謊言得大，多少總有一部分得人相信。』大謊較小謊容易欺騙民衆。」

「希特勒這話有點道理。」

「用坦克殺人，表面看好像很威風，實際上圖窮匕現，虛弱得很。殺人後不敢承認，就是理虧胆怯的表現。」

「我看過他們東拼西湊而成的『六·四』真相」影片。如果沒有外國記者拍的新聞片，恐怕就會相信他們的謊話。」

「那套電影，漏洞甚多，細心的人是不難看出來的。最可笑的是把『六·四』那天羣

衆被迫反抗的行動，都說是六月三日發生的暴行，偷天換日，但這怎能欺騙北京百姓？」

子彈的痕迹，人民的見證

我還到木樨地附近的地鐵站參觀，那裏牆上的子彈洞都已經補了，重新刷上灰水，但窗門上的鐵柵還有子彈洞，沒法補上。我暗中數了幾箇站的鐵窗，大約有一百多個子彈洞。憑此也可想像當日有多少人死傷。

我去拜訪住在廣播電影電視部後面的位老朋友。他告訴我：六月四日上午，他的隣居在復興門看戒嚴部隊，誰知瘋狂的軍人向他們開槍，結果兩個鄰居中彈死了，一個被子彈打中頭部，腦漿也流了出來，令人不忍卒睹。

他還告訴我：有一位住在復興門附近的工人，當天臥在地上，點數着周圍被槍擊倒的人，在四個鐘頭內，倒下的有三十六人。問他爲什麼不怕危險，他說危險是危險，但這種事情，輩子大概也只有機會見一次，要做「歷史的見證人」啊！

死亡通知書

那位朋友又說：六月四日那天，馬路上有很多丟棄的坦克和裝甲車。一個中學生由於好奇，爬上一輛裝甲車，還開動起來。

這事被人告發了。那中學生被當做「反革命暴徒」，給警察抓去。他的父母十分緊張，但求救無門。那孩子平時品學兼優，隣居都安慰這對父母說：「你孩子這麼乖，大不了被拘留一段時間，經調查清楚，就會否定他是『反革命暴徒』。不會有大危險的。」

誰知大約一星期後，警察來他家裏，丟下一張紙，一句話也沒說就走了。母親拿起那張紙一看，頓時面如死灰：她的寶貝孩子在六月某日已經依法槍斃了！那是一張「死

亡通知書」。這對父母只有一個孩子，母親已作了絕育手術，他們再也不會有孩子了。那個母親自此不去上班，神經失常，老是哭着喊：「孩子！孩子……」

朋友嘆息說：「中國人太多了，人命不值錢啊！」

分裂的家庭

我還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北京的許多家庭裏，夫與妻、兄與弟、父與子，像文革時期一樣，分成兩派，一個是民運派，一個是中央派。表面上，中央派佔上風，實際上是民運派佔上風，中央派頗爲孤立。

我去拜訪從前的一個老上司——一位已退休的副部長。他一家五口，兩夫婦，三個孩子。見到我來，夫人竟對丈夫說：「你是中央派，先出去，讓我跟海外的來客談談，省得你在這裏與我們吵嘴。」

「有朋自遠方來，我總得和他先談吧！」副部長說。

「不，不，我們先談。不要你先來入爲主。」老太太堅持着，老部長只好走開。

我還去拜訪一位在華僑補校唸書時的老同學，他們一家兩個孩子，老大是當兵的，老二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兩兄弟就是兩派。我的同學說：「我們全家同情老二，因爲學生说出了我們的心裏話。」他還告訴我：有一家人，兩兄弟也是兩派，弟弟是武警，哥哥是個體戶。哥哥叫弟弟不要主動打人打人，如果不得已要打人，也不要使勁。誰知弟弟沒聽哥哥的話，在大樓中中了功，還獲送去北戴河休養。哥哥知道了，十分生氣，大罵弟弟的「良心被狗吃了」。兩兄弟因此鬧翻。父母都同情哥哥，也罵弟弟是「敗類」，「沒有好下場」。

政治學習

北京的幹部，現在又要學習「一大疊一大疊的『平亂』文件，以便『保持與中央一致』」。

這麼多的文件，不容易唸完，大家也不願意聽。於是各個機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一個部的領導幹部在唸文件時，每頁只唸兩、三行字，就跳過去，用了半個

鐘頭，唸完了一大堆文件。接着，就讓大家討論，發言表態。

「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真是所向無敵，只用幾個鐘頭，就把天安門廣場清理完畢……」

「魏京生關那主席是獨裁者，判了十五年。這次反革命暴亂，竟然敢喊『打倒鄧小平』，這些反革命暴徒真太猖狂，就是用坦克壓死也活該……」

冷風熱嘲，成為許多學習會的特色。

我的一位老同事悄悄對我說：「現在又在搞政治掛帥，不上班沒事，不參加政治學習，就要當缺勤扣工資。」

這位老兄苦笑着補充：「我們現在是和尙唸經，有口無心。」

中共為什麼提到遷都？

在北京呆了十天左右，我深深地感到，北京人民已經不像「六·四」剛過時那麼悲觀和失望，他們又「敢說」起來，說出內心的憤怒和不平。我相信，只要戒嚴部隊一撤，北京人埋在心裡的憤怒岩漿就會迅速噴射出來。

來到香港後，在報上看見北京市長陳希同的文章，他說：「水的問題是北京城市發展的近慮，也是遠憂，如不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就有被迫遷都的危險。」

缺水是北京的老問題。陳希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到「遷都」？看來陳希同是不願說清楚的。實際上，在今年民運期間，羣衆示威運動持續不斷，北京領導人焦慮不安，無法應付，當時就曾提出「犧牲北京，保住全國」的口號。甚至傳說，老軍頭中有人發火，主張炸平北京、遷都南京。現在中共談到「遷都」，是因為無法欺騙和控制北京人民吧？但這個「秘密」，陳希同是永遠不會說出來的了。

◎ 明報月刊 1989/11

的信

信

每每閱讀好友來信，便不覺促然淚下。這才是真正的「暴亂」真相，是世界珍寶。

寄上好友從北京寄來的信件若干，分屬不同三人，因原稿手跡除我之外他人難辨，便復抄一份。為他們生命之安全，刪去若干內容。如有可能，請盡快發表，稿酬你們暫存，日後我會伺機和你們聯繫。發表之後，請馬上銷毀稿件，以防被「一小撮」利用。

一九八八年九月

學運骨幹

上山下鄉

人 是人啊！每一個人，活生生的人，不那麼簡單。只要是你認識，要好的一個朋友倒下去，翻過去，你是什麼心情？你要是親眼看着你的朋友倒下去呢？從你身邊幾米遠的地方，白宮前可以吶喊，BOSTON可以示威，這說明我們的心是相通的，自有良知在吧，但那畢竟是美利堅，而我們還生活在窮山惡水之中，你知道我們在幹什麼嗎？在「轉門」，學習最高指示，文件、報紙、看錄像「反革命暴亂真相」，然後交待下去。談認識、寫檢討，幾個人一組，二、三個老師帶着學習，表態、認識自己的錯誤贖罪，誰敢不這樣做？你懂我這話的意思吧，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還要學耕，要畢業，要工作，要吃飯，要生存。我們這些人都不是勇士，勇士在監獄裡，在九泉下，我們在這裡「轉門」。

你也許已經親眼看見多少「精英」在這裡備受煎熬，苦苦掙扎，而最後，歸於完蛋。珍惜你的機遇，你的好運氣吧。有的人，苦苦奮鬥十年，一輩子也沒有（得不到）你的好運，羨慕和嫉妒一樣，都是多餘的。關鍵是爲老同學的幸福而祝願。我從前只是覺得生活在這片國土上太累太累了，但那也許只是個生所造成，而這個，我却感到，活著太不易了，一切通往成功之路一一堵死。只告訴你幾個簡單的消息（這也許是使我情緒消沉，心境不佳的原因），有中央文件，××級是此次學潮、動亂、反革命暴亂的骨幹力量，畢業全部下基層鍛鍊。各大機關、各大部委，一律不得收。好在還沒有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那天不會太遠了，你記住我的預言。所有考上的研究生，一律下基層鍛鍊一至三年，視其政治表現好壞，再決定准其上研究生否。好消息還多着呢，「土政策」國寶也多着呢，信不信多說。

這是我這次事件後，在我目睹、經歷了朋友、同學的一件件遭遇，目睹他們徹底弄丟前程，以致獻出生命以後的反思，是長時間反省，人是這樣，黨籍怕是保不住了，（這是國內，它所意味着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我想你明白），吉凶難卜。我必須奉守這樣一條原則：妥協的結果，中國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者已在國外的

，那正是因爲她有清醒的頭腦，掃得鬭爭的藝術的結果，但你知道，更多更多的人是在監獄中度過十年，二十年，甚至×……。

不多說了，歷史是殘酷的！（這幾個字好重！）

田率地告訴你，我現在只想找一個我愛的女孩子，握着她的手，訴訴苦衷，流一次眼淚！

開學已有一段時間了，不是上課，也是上課，人人過關，且課程雖於描素，你能明白吧？我真憎惡我目前的生命與良知，我真想結束它。情況比我原來預想的要糟，至少對我個人是可以的，屈服也可以接受，但，以不污損自己的人格與良心為前提。我不能出賣自己，更不用說賣人害友，我不是英雄，我還是那句話，英雄已倒下去，死去，或者歷盡中世紀式的酷刑折磨，而人鬼難辨（決非戲言，或一時氣話），我是懦夫，我在屈服、忍耐、接受現實、承認我的無能與卑下，承認聖武們的偉功，但我不能做文化流氓，不能做政治婊子，我可以沉默，可以像活屍一樣等於死亡或已經消失。但我決不能像狗一樣肥着生活，如果為此必須付出代價，那就隨它去吧，反正目前還沒死，這就是萬幸了，罪名隨便給，可以查祖傳家譜，也可以查中外大全，隨便。

中央五號文件已下達，全部畢業生下基層，何謂基層？縣以下單位，像我這樣，本應該分到街道辦事處接受再教育爲宜。我的幾個朋友（××學院）畢業，都是北京孩子，分到青海省一個縣的鍊鋁廠爲革命工作。畢業證、戶口、派遣證，三宗歸一，寄到單位。這幾個孩子意志不堅定，只好辦了退學手續，到×××去當臨時工……，這種趣聞，你要有興趣，將來我可以編本書寄給你，一定暢銷。

生活真有趣啊，有老漏，就有新漏，真正造就人。

畢業後，何去何從？再說吧，總之，要活下去！『有生之留戀』，而且你記住我的話，上帝造成，就是『勞其心志，餓其體膚，苦其精力。』總當『生命不息，奮鬥不止』。我現在是越來越體會這句話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廿四日

第二封信

子彈打穿的幻想

又開學了，又回到學校，又坐到經過幾個月
月的時間而變得陌生的教室和圖書館，這幾個
月，發生在你的家鄉的事情現在你已經瞭解了
，它曾經成爲愛國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成爲
思想啓蒙的自由講演，成爲正義向邪惡宣戰的
戰場，而後成爲血雨腥風的人間地獄，成爲製
造謠言欺騙國人與世界的中心，成爲衆多小醜
輪番表演的舞台，隨後的瘋狂大搜捕又使人人
自危，大規模的清查、檢舉和「統一思想」使
人疲憊而又麻木。這是一段每個中國人都會永
志不忘的日子，這是段留給後人思考的歷史，
這對中國前途的影響也許用不了多久就會顯示
出來。

那段爲理想而吶喊，爲自由和尊重而戰鬪的經歷和同在死亡的背景下展開行動而變得極強有力的生活節奏，使得眼下的此時生活平淡，無聊得近乎不真實。現在一切都很不靜，好像不會發生過什麼，只是偶爾從夢中醒來，耳邊還回蕩着在廣場宣誓絕食的誓言，眼前閃現着被子彈洞穿撕成布條的系旗，鼻腔裡還殘留着長安街上的毒氣味和血腥味，但忽爾又遠逝爲記憶了，人是最能適應環境的動物，而中國人又爲最中之最，我不幸而成爲這一類。

八月末的北京，依然悶熱，在我看來，夏天是單調而煩躁的，並且漫長得令人絕望。比天氣更壓抑人的是政治空氣。學校被打死了幾名同學。×××也犧牲了兩個，被逮捕了二十多名，在獄中飽受折磨，其中一位同學，原來的糾察隊隊長因不屈服而被打得吐血。更多的人正在從事「洗腦」的活動，這的確是一項使人智商降低的活動。大清洗在進一步的進行，「黑名單」上的人越來越多。北大的新生要去外地軍訓一年，在他們剛剛邁進青春之門的時候，這太殘酷了，太險惡了。今年的畢業生一律帶戶口下基層，我的一個法律系的朋友被下放到鄉里當司法助理，我的一個法律系的朋友被下放到鄉里當司法助理，主管一些諸如妯娌之間吵架的調理之類的事務，而重要的是他要在這個崗位上幹一至三年的時間，據說我們明年的分配一律統分，且待遇比八五屆的還要慘一些。種種跡象都說明了他們正在發洩着一股仇恨。

進行着農氏式的狹隘報復，他們已經完全地失去理智了。把一大批有思想、有活力、有才幹的青年學生統統流放到社會最底層，這只有中國政府才幹得出來。這證明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清醒的，有思想的人對於他們來說是很危險的。

「六四」以後，我帶着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打擊，帶着一種毀滅感和滿腔悲憤離開家鄉，儘管我反對暴力和仇恨，因為它們會蒙蔽我們的心靈和智慧，儘管我宣誓忠於運動的宗旨，即以和平、漸進的方式爭取民主，但令人髮指的暴行使我狂熱而偏激，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稍有刺激，我會拾起石塊衝向坦克的，我對這個政權和政府一切殘留的幻想都被子彈擊穿了，被冰冷的彈殼壓碎了，被一灘灘鮮血而無辜的鮮血污染了，被瓦斯窒息而死了，一進家門我就崩潰了，我放聲大哭，這場運動，為死難的同胞，為自己的理想，也為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恍惚過幾個月後，我又住進了醫院，因為體檢結果證明我因飢餓七天而患了心肌炎，住了十天我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出院後，又為擺脫民政局、警察、居委會卑鄙的盤問和監視，我又到了鄉下「隱居」了一段時間。回校之後許多的人和事都微妙地變了，對我這個「運動健將」，系裡的態度當然可想而知，但令人不知的是，一些平時關係還很不錯甚至很好的同學，也都冷冰冰的，一般的時候都遠遠避開，偶然的或不得已的見面也顯得極不自然，也許是因為我政治上的不潔淨的缘故，我並不怨恨他們，倒有些同情他們，為什麼總有人那樣關心他人政治上是否潔淨而不去反省一下自己心靈上是否潔淨呢？前幾天，學校派人找我，讓我交待我進行煽動和串聯的活動，我聽了半天不得要領，直到他們把一封信攤在我面前時我才明白，這是我五月份寫給我在大連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的一封信，談及我對如何把運動推向深入的看法，如此而已。他却在交待中把這封信連同他親筆寫的一份證明詞亦上交了，後來到咱們學校他以此來證明他是多麼實誠和我的感情。一連幾天我都默然無語，我感到痛心，因為這所謂朋友，好朋友的意義就在於他能在最關鍵的時刻在你最致命的部位，最準確，最熱練，最有力地刺上一刀，曾有一段時間我們幾乎忘記了那著稱於世的中國人的劣根性，現在才感到這的確是一片可怕的沙漠，再強大的洪荒也無法穿越它而奔向海洋，再兇殘地要擠入這沙漠的暴行在這裡也會溫

嘲弄的，也許這就是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男人和女人，有世界上最少的自由和歡樂的緣故。也許我們真的在追求一種象徵，像堂·吉珂德，悲壯而荒唐。小時候，不知你有無這樣的經歷和感覺：花費半天功夫搭起來的積木，被大人輕易地推倒了；當時幼小的心靈雖也長久地顫動，但還不知道想一想，這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種預示。如今知道思考了却找不到答案。一個幻想的破曉，會帶來無盡的心靈寂寞，也會帶來清醒的反思，反思之後，留下的仍是難以排遣的失落、孤獨與憂慮。我擔心在這如夢地般的夜般的沉寂中，一切的努力都會付諸東流。在這白色恐怖下，有的懷惻隱之心，有的背叛，越來越多的人做出不負責任的主人有過二心的樣子，越來越多的人對學生和市民的屍骸指手劃腳甚至恨不得手上多塗點血以表示他們做奴才的決心。當然，也有相當多的人在屈辱中沉默和忍受，痛定之後，只能是長歌當哭，只能是伏虎一方，以待天時，只能是臥薪嘗膽，冷眼觀察，另圖東山。因為我們相信歷史，也相信我們自己。

通過各種渠道瞭解了一些在美國留學生的活動，不知你是否參與，但我總覺得你會支持我們的，如果在北京的話，你也會加入我們的。在如春，再壯烈的獻身，再深切的同情也不會引起感動。成敗在我都不重要，得不到理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惠特曼曾說：「在那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英雄們總是追逐着歡樂和自由。」在中國追逐自由的人是要被當成瘋子加以隊伍的，因為這的確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召喚。我人曾對我說：「你們實際上是在拿青春做賭注為中國的命運與一伙政客進行一場注定的要輸的賭博。」這話不對，但有道理，想一下，除了青春之外，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賭注的。至於評價與與否，那是別人的事，也許我們與旁觀者的區別就在於：在歷史給我們做出評價之前，我們已經自己做出了評價。因此我會坦然地接受對我的任何懲罰。但承受不一定就是接受，如果將來把我分配到暗無天日的小機關裡做一個無聊的職員，那我寧可餓死也不與之合作。也許那時的出路只有兩條：幹個體謀生或出國求學，關於後者，我曾在是否考托福之間猶豫了很久，現在決心已下，但因半年沒摸英語了，今年沒戲了，明年再說。原來想出國，僅僅是為求學問，想不到現在此舉，竟帶上一些逃避政治迫害的色彩，命運真有趣。

當我寫下這些雜亂的文章時，你可知道，在這中國的大地上，有多少人正在悼念死者，正在忍受拷問，正在屈從高壓，正在憂傷痛哭，正在轉瞬輾轉，正在飲彈受戮！他們曾是我的戰友，我無力幫助也無力拯救他們，這是我沒大的無奈和悲哀。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九日

第三封信

一顆紅心 十八種準備

開學後學了一個星期文件，脫胎換骨，觸及到了靈魂深處。這次運動咱們系裡出了一個英雄×××，五月份他就寫文章在××日報發表，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現在，北京市的大、中、小學正忙著請他作報告，他也夠忙的了，一會去電視台，一會發表廣播講話，嚴然成了我們的理論權威。雖然反對動亂，絕食他可是去了，並且被送到××醫院搶救，似乎有些白玉微瑕，但他自己講，有人想陷害他，掐斷他的輸血管。當他醒來後大發雷霆：我死了不要緊，要是有人借我的死向黨和國家人民發難怎麼辦？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怎麼能為黨工作，為人民作貢獻？總的人均被深深感動，弄的也是黨員恰巧與他同組的××接連表示：「很慚愧沒有起到共產黨員應有的作用」。××平日和他挺好，他就把××揭發了，說××在六月三日晚上表示要退黨。下課他們班的同學紛紛往我們班跑，給××通風報訊。雖百般解釋，但退黨不同於絕食、遊行，比較嚴重，此事現在還沒定論。

開學後第二個星期開始補上學期的課，補一個月，然後考試，每星期三、六下午學習。到目前為止，所有人均已明確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鄧小平太偉大，再見着反革命暴徒一定打死他，咬爛他（不共戴天）。咱們班目前所有人都還沒有事，只是黨員們一個個心驚膽顫，怕受黨內處分。有一個姐妹動輒期間給老外翻譯，課業，黨內處分，現在還沒有分配，天天在晃。

我報了十月份的TOEFL，你絕想不到，這次報名了，所有的報名點都打出了腦仁。要不是戒嚴部隊，非出人命不可。謠傳明年取消TOEFL考試，今年十月份是最後一拔，於

是所有跟美國、TOEFL有關的人全報名去了組織「托自聯」，組織發號排隊，好不熱鬧。提前八天拿號，然後每天一大早去換號，一次不去即作廢。於是有人大發其財，在此處，一個號曾賣到一百元人民幣。我自己簡直是死裡逃生，險些又漏了，我早計劃好了，十二日一大早我就去了，本想排個兩天兩夜應該沒有問題。可到學校一看，人家都換了好幾回號了，事先我不知道發號。我險些一頭栽倒。五月份就漏了，十月份再漏了，不用說你們，我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了，連個名都報不上，還他媽的出門子國？我像個沒頭蒼蠅，在撞了二個鐘頭後，HOPELESS！我來我轉到了×××，當我聽說××還沒發號時，我簡直快哭出來了。哪怕給出去兩天三夜不睡，我也在這等了。老天有眼，也由於我充分運用了我的聰明才智，我不但排上了，而且還拿到了個號碼。由於我的謙虛，自己要求換成了NO. 九。這兩天，尤其是十二日，太BITTER了。十二日晚我睡在×××的女生宿舍，一夜沒合眼，樓下有人放個屁我都得跑下去看看。心臟一會跳，一會不跳，一會兒快跳，一會兒慢跳。十三日晚我便睡在×××大門口的水泥地上。簡直是受罪！兩天沒吃飯，兩夜沒睡覺，倒像提前到了，於是我報上了十月份的TOEFL。

你雖身在美國，國內的情況你一定也知道很多。革了半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高考落減招生，北大新生改為五年制，第一年軍事訓練。我們八六級實行統一分配，不許考研究生，好像自己還不能找工作，分哪去哪兒，分配後下基層工作一年，帶戶口，表現不好不能上來。你我知道，一顆紅心七、八十種準備，我準備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找個什麼大機關村，簡各莊的鄉鎮企業，去為黨和人民發光發熱作貢獻。



五中全會前後

無聲中國的人民心聲

加緊約束、限制採訪，中國果真已成了無聲的中國？
從各種渠道來的信稿及傳來的訊息，有資訊，也有感情的抒發，選刊如下。

（來信摘錄）

本刊

前言

中國人民在暴力淫威之下，已變得鴉雀無聲，所有的傳播媒介除了宣傳官方的謊言之外，已不可能有任何批評意見。如單看中國大陸的報刊，會認為目前的所有政策，都大受人民擁護、歡迎。

外國傳媒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已被加緊了約束，港台的記者到大陸採訪，更被限制得幾乎寸步難行。因此，中國官方宣傳以外的民情報導，也不多了。

中國已成了無聲的中國。然而，就在中國官方把有聲的中國壓成無聲的中國的同時，這

幾個月本刊卻收到了由各種渠道從中國帶來的信稿和傳來的訊息。這些信稿和訊息有的寫得頗粗糙，有的卻是大師手筆，其中有資訊，也有純粹個人感情的抒發。在多數情況下，這些東西都不成文章。為此，過去幾期，本刊部份文章參考及取材自這些傳來的訊息。這一期，我們決定選幾篇信稿刊登，讓本刊讀者聽到無聲中國的人民心聲。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這些信稿多已隱去原名，或用化名，發表時則註明來自何地。

我們還期待與中國大陸人民有各種聯繫的海外人士，繼續向我們提供這一類的信稿與訊息。

強買債券及其他

●（廣州）公營計程車司機，每月薪金八十一元，被剋扣三十元強買債券。

最近全國各地泛起一片債券之聲。工人們每月領薪時，被剋扣比例相當高的一部份作債券。一公營計程車司機指出，他現時除獎金外，月薪為八十一元，被剋扣了三十元。現在債券名稱為「金元債券」，這些時「鐵路債券」、「國家教育基金債券」、「鄧小平債券」、「楊尚昆債券」、「江澤民債券」也可以出籠。報章說人民出於自願，但目前大家的日子這麼緊，怎會自願呢？

此外，交通幹警每月檢控的交通違例指標，是每人一百大張。故他們只好亂抄亂抓。輕微犯了點交通條例，便鐵面無私執行任務。初犯者被罰五十大元公款，加私人香煙一條，

以長城牌為準。多犯者扣押車牌，罰款與香煙也增加。自行車違例罰五元。個體戶（即小販）也是剋扣對象。我看見一婦孺挑着一雙竹籃販賣家種木瓜，因被罰（由街道委員執行）而在街上嚎啕大哭。

在廣州有一外語培訓中心，於六·四前，許多大學教授（外國人）晚上來義務教授語言。經大屠殺、大搜捕後，外國教授拒絕赴教，他們並非害怕本身安危，而是顧及學生們日後安危，免他們被扣帽子。

現時最佳行業是公安，油水充足，許多人家中都有「四大頭」，進而冷氣機，進而小房車。

消極反抗持續

●（北京）在壓抑中，知識份子自殺人數大增，精神病患者也大增，說來讓人心酸。

近期知識份子自殺人數大增。有人從立交橋跳下，了卻一生，控訴李鵬之流的政治迫害。這些人多對前途感到悲觀，他們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中國將成為軍人和警察控制的政權，人民越起越反抗，就越加速這種政權的形成，專制和強權將會把中國引入黑暗。這些人大多在民運中是組織者或贊助者，現受政治迫害，不堪忍受屈辱而走上消極反抗的行列。

另一情況顯示精神病患者大增。安定醫院人滿為患，已拒絕收病人。這些受害者在情緒上受到了極大刺激，如化工部宿舍一中年婦女用手不停拍打玻璃，滿手是血。高喊「打死我吧，殺了我吧」。見者無不落淚。

中國的民主運動被扼殺了。百日祭時北京市公安接到文件要與戒嚴部隊一起將可能出現的民主活動消滅在校園內，任何人在校園外的活動可當場擊斃。北大貼出了傳單讓學生不要輕舉妄動，保存實力。師大有人騎車高喊「打倒李鵬」繞學校三圈，便衣警察竟未能抓獲。許多人穿上了黑衣服。傳說釣魚台公園有集會，警察去了很多，卻撲了個空。入夜城郊槍聲不斷，戒嚴部隊極為緊張。為了緩和國際矛盾，中央內部文件提出要內緊外鬆。什麼不怕國際制裁，沒有的事，任何形式的制裁對現政權都會產生影響。時代不同了，毛澤東的那個自力更生閉關鎖國的時代有可能再現嗎？

亞運會勞民傷財

●（北京）工程三十億，收入不過七分之一。國家資金緊缺，為甚麼要打腫臉充胖子？

專家們早就提醒北京市委，在北京舉辦亞運會得不償失。這不但由於北京運動場、體育設施差的太多，還在於廣告和門票收入都無法與國外相比。拿門票來講，國外一張門票可以幾千元，而國內超過五元錢人們就會猶豫。可北京市委還是打腫臉充胖子，接下了這棘手的「活兒」。人們不禁要問：在國家資金緊缺，重點工程無法保證的情況下，花幾十億搞一個無經濟效益的運動會是否應該？

有人推算，整個亞運會工程近三十億，而收入不會超過七分之一。

在國家的壓力下，北京副市長張百發幾次解釋，我們是一個大國，要從政治上考慮。北京市委心裏明白，一旦亞運會開幕後，中央發現運動會收回投資，加之人民羣眾不滿，中央很可能會為這一決策失誤抓一個替罪羊。此時的北京市委人心惶惶，像李錫銘這種在趙紫陽眼中歷來是個無能之輩的人更是坐立不安。

民主運動興起後，這些人唯恐天下不亂，他們希望事態越大越好，這樣亞運會無法舉辦就可以歸罪於學生了。

可是事情偏偏過去了，民運中也未造成亞運會建設的損失。只好硬着頭皮又搞起來。利用亞運會宣傳攻勢，既要騙外國人，也要騙中國人。騙外國人可說中國國內穩定、內部團結，都來參加運動會吧。騙中國人可說，雖然我們殺了人，各國政府不在乎，認為是內政，不干涉，以此削弱人民的反抗心理。

近來街上開始賣亞運會獎券，北京人採取了不合作態度。由於買獎券的人很少，一些銷售單位賣出的獎券還不夠支付工作人員工資，只好停售。

將來北京人會採取不買門票以及其它消極對抗的方法來抵制這次亞運會。中國目前的局勢若沒有突破，若繼續戒嚴，亞洲各國來看亞運的一定很少，場面冷落，可望成為歷史上賠錢最多的亞運會。

當然，屆時中國當局會強行向各單位分配門票，不惜血本拉外國遊客，就像最近高本辦旅遊一樣。

即使這樣，仍然會有頭痛的問題出現。比如觀衆不進場或中途退場，入球不鼓掌，等等。保安措施更是問題，體育場裏必須安排大量軍人，可是城裏怎麼辦？

戰勝追捕

麥國強

●(北京)這是一位曾經獲獎的著名詩人用化名寫來的詩。

戰勝追捕，
能走得快就多快，
能走得遠就多遠，
能藏得多深就多深，
能活下來就一定活下來！

掛懸露珠的
希望的茂草，
在山凹裏，
人民是你身邊信心的土地。

戰勝追捕，
戰勝離別，
戰勝眼淚，
戰勝追捕！
不管在哪裏，人民都跟你在一起。

在黑夜裏，

人民是千萬萬望着你的星星；
在森林，
人民是環繞在你周圍的

戰勝不支的體力，
戰勝孤獨與寂寞！
為了人民，
一定能戰勝。

你是全世界父母獨生的
戰鬥的兒女，
你是我們最珍貴的希望。
為了將要到来的勝利，
孩子，
用你的意志，你的信念，你的智慧，
戰勝追捕！

戰勝追捕，

因為你為真理逃亡，

為爭取一個好世界逃亡，

為敬啟待哺民主自由的人民逃亡。

個體戶自白

●(北京)當局加強對個體戶的迫害和壓榨，稅率從百分之七增至百分之三十。

胡耀邦、趙紫陽上台執政時，大力表彰宣傳發展和支持我們個體戶。正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北京個體戶愈來愈多。人們對個體戶的金錢傳說也由「萬元戶」逐漸提高為「十萬元戶」。事實也是如此。

我們個體戶都是以鐵驢(摩托車)代替了腳踏車；幾乎每個人都傳呼機；並常給咖啡酒吧、高級飯店、飯莊送花錢！

可是，我們個體戶只在人們的眼裏有了「金錢」位置。人們稱各行各業的個體戶為「倒爺」，但在人們眼裏我們的政治地位還不如少先隊員！

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開始，北京個體戶就積極響應。因為我們雖然每月按章納稅，按時交納個體協會會員費，但在任何方面卻受不到保護，歸根結底是因為沒人為我們個體戶說話。我們個體戶是沒有權的。因此我們個體戶也需要民主，也要競選國家要職。

我們個體戶自發的組織起了「飛虎隊」。每個人頭上全纏着「聲援學生愛國運動」、「要民主，爭民主」等各式各樣勇士巾。所到之處，廣大人民羣眾無不拍手稱快，熱烈高呼「人民支持你們」，使我們個體戶興奮不已。只要「飛虎隊」經過學生們的各個募捐點就會停下來，少則十元幾十元，多則千元萬元給學生們，以示我們個體戶的真摯心意。廣大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絕食的學生，常向「飛虎隊」熱淚盈眶的高呼「北京個體戶萬歲！」同學們的呼聲，使我們個體戶受寵若驚。自有「個體戶」這個名稱以來，我們第一次聽到「個體戶萬歲」這個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隨着這個世人難忘的日子，北京個體戶受到空前的排擠和屠殺。首先鎮壓「飛虎隊」。幾個組織者先後入獄，至今無任何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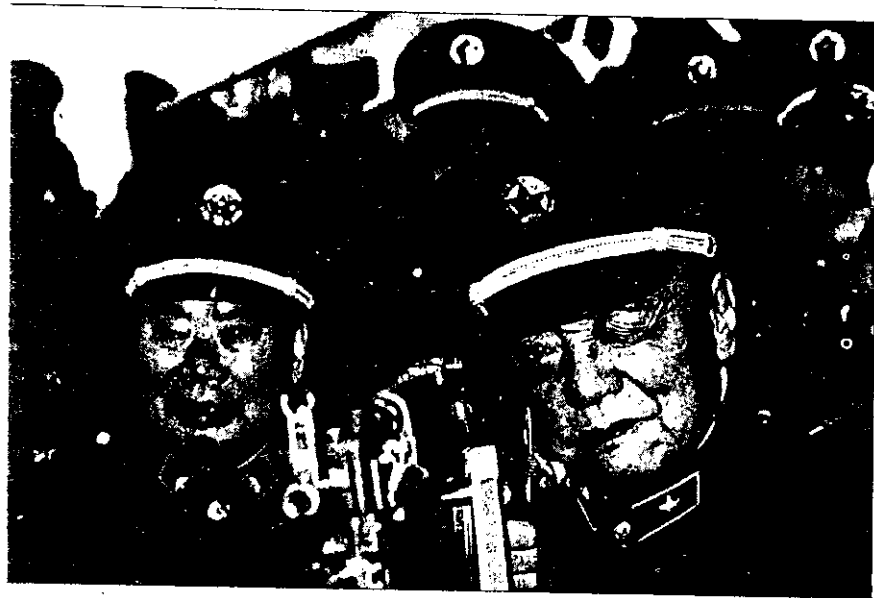
接着江澤民上台。據悉，江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時，北京個體戶就成了主要話題。江說：「北京的個體戶在暴亂中太活躍了，要對他們進行治理整頓。」

結果，八月份就開始實施了稅務大檢查。首先自查自檢有無偷稅漏稅情況。也就是說要個體戶的錢。然後公檢公查，一旦查出就要罰到底兒掉(傾家蕩產)。

沒有停業的個體戶，以後的納稅指標也比原來翻了好幾倍。比如我的一個小髮廊，以前營業稅稅率為百分之七，每月交稅四十二元，加上其他稅項每月約一百八十塊錢。「暴亂」後，每月營業稅稅率就由原來的百分之七增至百分之三十，而且由稅務局定稅。也就是說，不管達到達不到都要按它的規定納稅。這樣，僅營業稅一項就由四十二元增長到了三百六十元。再加上其他稅項，每月要交六百到七百元之多。再加上僱工開支，我就所剩無幾了。尤其更加令人氣憤的是：街道幹部硬行攤派戒嚴部隊的慰問品和金錢，如若不出，當場就吊銷營業執照。現在，北京的個體戶，聰明一點的就趕緊將自己的店舖轉讓賣掉或出租。傻的，就等着倒閉。

唉！這回我們個體戶也沒戲唱了，牛皮也吹不起來了。全在吃老本，大家都處在敢怒不敢言的地步。

有一次，共產黨叫我們個體戶座談天安門事件。有一位朋友幽默地說：「根本問題是紫陽同志分裂黨、分裂中央，其他問題嘛，就是鄧小平、李鵬胡來！」全場轟然大笑。可是不久此人也失蹤了。



刊於內地某刊物的一張照片，寄出海外，再從海外轉轉到了本刊。圖中對槍瞄準的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軍委大員楊尚昆，伴隨在旁的是總參謀長楊得志。讀者來信有以下的簡短說明：

「這是一張不可多得的照片。它使人想起這樣的標題：『向人民開槍』。」

向人民開槍

●(海外)一張不可多得的照片，它使人想起這樣的標題……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

江河海

編者按：本刊記者最近採訪了三名剛從大陸來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是中共六、四大屠殺下的幸存者及活的見證人。他們提供了許多真實的第一手材料。為了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及他們的家人的人身安全，我們全部抹去化名「江、河、海」以代之。本刊記者則用「問」代之，如果一些內容有可能暴露他們身份的，我們只好忍痛割愛。在成稿後，本文經他們審閱、修改、校正。現在發表，以饗讀者。

海外影集害了國內人

問：今天請大家來，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知道你們都在國內積極參加了民運。而現在又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逃出了中國。不知大家離開中國後的最深感受是什麼？

江：我現在的心情十分複雜，就和基督山伯爵一樣，一方面是我感恩；一方面是我復仇。我感謝那些保護過、幫助過我的善良的人們。沒有他們，我是決不會來到美國的。但我也要復仇，向那些告密者、那些餉子手、那些用同胞的鮮血染紅了頭上頂戴的敗類們復仇。當飛機離開紅橋機場，衝向藍天時，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可算逃出來了」。上海機場的公安人員非常多，戒備森嚴，和往日大不相同。他們嚴格地檢查我們的證件，而且在過道中來回走動。我當時心緒緊張極了。說實話，在北京這幾個月，我見到公安人員心裡就有些打哆嗦，生怕他們逮捕我。幸好在我出境時一切順利，什麼意外也沒有發生。

河：我剛下飛機後，時差還沒調過來，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我的朋友將他們在這裡電視台錄製的六、四那天的情景放給我。我看了幾小時，一點兒也沒感到疲乏。我的朋友問我：「怎麼樣，是這麼回事嗎？」我常常沒有回答。因為我的心又飛到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從四月十五到六月四日，我天天去天安門廣場。我能說出鏡頭中是哪一天的天安門廣場。我感到六、四那天的鏡頭還是太多了。我現在非常思念家人，感到自己是異鄉人，十分不習慣，但又不敢回去，內心十分痛苦。

海：我來後，看了不少報刊。如世界日報、爭鳴、九十年代、中國之春。當然，也有人民日報海外版。我還看了一些海外出版的一些有關天安門廣場的圖片、文集。除了人民日報是造謠外，其他報刊的報導大部份是真實的。基本上和我看到、聽到的情況一致。當然，有一些細節和局部上也有失實的地方。不過有一點我必須指出來，很多文集，尤其是圖片，暴露了很多。海外出版這些照片，不管主觀上是想推進民主運動也好，還是爭浪潮趕時髦也好，實際上害了不少人。

問：請問海先生，能將這段話解釋得更清楚些嗎？

海：請看這張相片（指某文件中的一張），每個人的面孔服裝都十分清楚。後面單位的名稱也十分清晰。中共很可能沒有這張相片，那麼好了，這張相片就幫了他們大忙，他們很容易搞到本文集，那麼相片上這些人就倒霉了。

還有十九萬人漏網

問：我想出版單位是考慮到這一點了，你看相片上的主要人物的眼睛全是被遮擋住了嘛！

海：那有什麼用。人的眼睛離看不見了，但根據臉型、髮式、衣著，仍可一清二楚地認別出是誰。你們在海外大概不知道現在國內整肅的厲害程度。本應在九月三十日結束的第一階段整肅並沒有達到目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鵬銘說過「從電視錄像及相片上看，在六月三日及四日大約有二十多萬學生參加了鬧、燒軍車、攻打解放軍，可我們只抓了一萬多人（編者按：注意，只抓了一萬多人，還嫌少！），還有十九萬多人沒有找出來。所以，第二階段整肅工作從十月一日起又要掀起新的高潮。將相片及錄像帶分解是他們在第二階段中的主要做法。這就是說，只要在相片上，錄像帶上，到某單位的名字，就要將有關部份複製下來，發給這個單位的清查小組。一定要將相片上錄像帶上每一個人都找出來，然後和他們分別談話，採取供、認、悔、改、保的政策。比如第一階段中，申供是大家一致的做法，那麼在第二階段中，有這些證據的話，申供這種做法就不一定靈了。你說你去過廣場，但現在相片就擺在你面前。即使蒙上了眼睛，也一看就知道是你。那麼好了，剛才你說你去過就是撒謊，你在欺騙組織，態度不誠實。你已被清查小組攻破第一道防線。下一步，他們將迫使你交代：你旁邊這個女同志是誰，誰是組織人。若拒絕合作，那麼對不起，你就是組織人。不少人當然不敢承認組織人這一罪名，因為還有被抓起來坐牢的可能。可是他們只好將組織人供出來，那麼清查小組再和這個被供出來的人談話。比如問他：「你是不是組織人？」如果他否認，那麼清查小組就會說：「早有人供出你了，請看口供。」當他看到和他一起串供的人將他供出來後，也許會怒火冲天，也許會感到一切全完了，還是爭取坦白從寬吧。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一會兒大伙兒就都被找出來了。

問：這真是太糟糕了，我們確實沒有想到他們手段的卑鄙、殘忍。可現在很多文集已出版，無法收回，只能提醒人們以後注意。請問首都的民眾是如何對待這次整肅的呢？

江：在這種白色恐怖下，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在各基層單位採取的做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經常出現領導保群眾，群眾保領導的現象。

集體串供 個人否認

問：這真是十分有意思，難道群眾還保領導嗎？

江：是的。因為這次運動捲入的人太多，連許多單位領導也參加了遊行，這批領導有良心，群眾需要這批領導來保護他們，他們也要保護這些領導。那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第一個做法就是串供。比如某單位（名字略去）在戒嚴令下連夜還遊行了三次。因為戒嚴令前遊行和戒嚴令後遊行在處理起來是大不一樣的。那麼參加過遊行的人就要商量對策，主要是要保護所謂的策劃者、組織者。在這一點上大家的說法要一致。比如說我的一個同事發明了「光緒二十九年」這條標語（編者：為保護這位同事，標語的全文略去）。這條標語針對對小

平抓獲不放、大搞垂簾聽政的封建統治，是一針見血。但真到追查時，則說是從街上抄來的，別人也予以證實，於是大事化小。有些人會自己去過廣場，清查時則一口否認，於是小事化了。概括說，反清查的方針是：凡集體活動，大家串供；個人活動，則堅決否認。

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清查是非常殘酷的，萬一查出來，後果十分嚴重。我到海外後，看到中文報刊上也登出了關於國內清查的情況。但由於你們身不在其中，決想不到其殘酷性。其特點首先是所有參加者都要先講清楚，後挨整。北京市委確定出十九種人，前十種屬清查，後九種屬清理，其餘皆為考察。

清查是敵我矛盾。如吾爾開希、嚴家其這些所謂和海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民運組織者及幕後策劃者等，以及燒軍車、毆打解放軍者等十種人。這批人是要被抓住甚至被殺的。

清理是屬於犯嚴重錯誤的「人民內部矛盾」。但其標準十分含糊，範圍大的很，實質上是中共一貫鼓吹的敵我矛盾人民內部處理的翻版。例如「與動亂組織者有聯繫者」這一條，就頗有株連九族的意味。儘管被清理者屬「人民內部矛盾」，但對黨員及幹部來說，處理是十分嚴厲的。一般來說，黨員在戒嚴令下連夜參加遊行的，要被開除黨籍；參加鬧、燒軍車的，也要開除黨籍，幹部往往連被開除公職。雖然清查對象是指民運的組織者、策劃者；清理對象是指民運的積極參加者，但在實際處理中，兩者界線很難分清。

至於其他所有老老考對象都要講清楚自己戒嚴令發佈以來的每一天的活動情況。要有除家人以外的兩個人以上證明。因為北京市區的人幾乎人人都上過街、遊行，所以若碰上有人揭發，考查對象也要變成清理對象。事實上，北京現在大搞人人過關，一片白色恐怖。

但總的說來，學校比黨政機關的日子好過多了。海外的中文報刊常常報導學生和老師如何挨整，其實學校的情況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密雲不雨」。每天教師、學生都有政治學習，但並沒有像機關那樣認真追查。北大的學生、教師幾乎都參加了遊行，要是在黨政機關，相當一部份人都會成為清查或清理對象。但在學校，這批人就相對平安的多。我想主要是因為學校和國際上進行學術交流較多，在國內外輿論上比較敏感。雖然很多黨政機關幹部也是知識份子，但學校的教師、學生們似乎更「名正言順」些。因此中央在目前還沒有在學校

採取大的行動。今後也許會大動手，但是歷史的經驗證明，時機一過，大動手就不容易了。

重點是黨政機關不是學校

河：江談的很好，我想就我知道的事實進行一點補充。這次中央打擊最狠的是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尤其在戒嚴令發表後，部、司、局級幹部公開支持學運的，一律都要整下去，以至於開除黨籍、公職。就是在戒嚴令發佈以前所謂十分同情學運者，也要倒霉。比如開明復本人對此就早有預感。一次他去某單位和幾個幹部談話時說：我是以平中百姓的身份來的。談話中流露出要改行、搞搞專業。言外之意是他要下台了。最近他已不再出面。再比如故宮博物院院長五十五歲的張宗培教授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張教授是搞考古的，開除了公職，能幹什麼？誰敢僱用他呢？換句話說，中共斷了他的生路。雙開除的理由何在呢？一是他簽名要求取消戒嚴令，他在長沙開會電告故宮博物院捐款三萬元給廣場上的學生，這當然支持動亂了；第二個罪名是反對戒嚴部隊，羅列的事實是令人可氣又可笑的。他堅決反對戒嚴部隊進駐故宮，因為故宮裡有大量國寶，一旦被破壞，損失是無法挽回的。但他的反對沒有用，部隊還是照樣進駐。這些進駐的部隊什麼也不管，在故宮午門前的空場升火做飯，張教授堅決反對，認為可能會引起火災。所以戒嚴部隊告了他一狀，他就被雙開除，斷了生路。還有大家所熟悉的著名演員姜昆、陳佩斯也都被捕了。陳佩斯的罪名是六月三日晚在西單攔軍車，聽說陳已被釋放。姜昆自己有一部小汽車，借給學生用於聯絡，當然這是支持動亂，現在不知是否已被釋放。被開除公職的司局級幹部很多，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本領，無法謀生。目前，凡是會公開表態支持學運的領導，全部受到整肅。

北京人感到很自豪

問：那麼在這麼殘酷的整肅下，北京的一

般幹部、市民表現如何，大家怕不怕呢？

海：怕還是有些怕的。但北京人全知道真相，非常有正義感，世界日報上有篇文章講，北京人覺得在全國人民面前抬不起頭來，我真不知此文從何而來，正相反，北京人感到很驕傲。北京的工人起碼沒有像上海有些工廠那樣，天天晚上去拆路障。反對學運的人是有的，但在各單位確實是一小撮，他們決不敢在公開的場合下反對學運，只能在暗地裡打聽電話、寫黑信。一旦他們被發現，就會被全單位人所痛恨，他們往往也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知道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我認識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工作多年，提升很慢。原以為要提升為主任，不料單位的頭兒選了一個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幹部當主任。馬列主義老太太懷恨在心。對主任及提拔主任的書記恨之入骨。學運開始後，主任支持學運，參加了遊行，尤其是在戒嚴令發佈後，主任還遊行。老太太雖沒親眼見之，但也風聞一二。於是，她將舉報信向公安局、國務院、北京市委到處寄，弄得這些頭兒們如坐針氈。因為一旦查實，單位的頭兒就要因提拔了手下的主任而倒霉，主任則黨籍、公職都難保。幸好單位的頭兒有權，居然從公安局部門搞到了舉報信的復印件。雖然匿名信，但從信件的口氣和人們的日常表現已判斷出是誰了，於是他們以攻為守，這幾年來搞開發，辦公司中，老太太並不那麼清白，加上這次運動中，她上串下跳，很多人都恨她。於是單位開始整她搞官倒、搞貪污。現在這個老太太也不斷了，終日愁眉苦臉。當然這傳言的小人在各單位是極少數，一般是二三人。但他們破壞力很大。領導也怕這種小人給本單位找事，使領導的官位不穩，因此這種小人在單位根本不得勢。像我說的這個老太太，她必定為有經濟問題，因此她的舉報信都成了誣告信，領導們安然過關，群眾也聞之稱快。

用手語錄反李鵬

河：至於廣大群眾，都有正義感，不少人根本就不怕。比如說一名高級幹部的兒子不久前在我們單位的政治學習會上痛哭流涕地講了二個多小時。他說：「我就是想不通，我至今還是支持學生運動。」還有一位國內外十分著名的學者，大師就公開提出了四不：不看報紙、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不問國事。以示對這場大屠殺的抗議。（編者：請原諒我們不公佈

他們二人的名字）許多人在政治學習中以十分巧妙的方式支持學生運動，諷刺李、楊的反動統治。

比如說李鵬十分無能，他聽過的許多話都前後矛盾，漏洞百出。那麼他的講話就成為大家的摘簡牌。某位工程師在單位政治學習會上發表了如下的發言：「我是共產黨員，我今天應該表態。但我今天不表態，我以後會表態的。其實我已經表態了。」會場哄堂大笑。因為這段矛盾百出的話恰恰是李鵬和學生對話時的一段話，他用李鵬語錄來回答，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另外就是檢查自己時輕描淡寫，一切責任推給上邊。比如一位參加過遊行的幹部檢查時說：「我是參加過遊行，但我個人沒有什麼責任，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響應了黨中央的號召。趙紫陽當時是總書記，他說學生是愛國的；李鵬總理親自去醫院看望絕食學生，萬里委員長說要保護學生的偉大愛國熱情。我一看，這麼多中央領導都支持學生，我要是不去遊行，就是沒有緊跟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嘛！當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都不支持學生嗎？誰知道趙紫陽是壞人？我做為一個普通老百姓怎麼會知道中央的內幕？我又怎麼敢懷疑黨中央的報紙與電視廣播呢？讓我今天檢查什麼呢？李鵬、萬里也沒有檢查嘛！我當時就是支持反動派、反官倒，現在證明也是對的。因為中央新班子還提出了廉政的七條措施。」然後這位老兄大罵了一頓官倒、腐敗。主持會議的書記也毫無辦法。

電影宣傳效果相反

江：這個政府很笨，他們總是強迫人們做事，結果適得其反。比如他們安排每天下午政治學習，就是念鄧小平的講話，念報紙，但人們越學越反感。前幾天我去國務院禮堂看「魏錫倫」這部電影。裡面有一九四七年學運的鏡頭。當銀幕上出現壯大、清華的遊行隊伍時，全場掌聲雷動。要知道觀眾全是中央機關和國務院機關的幹部，人人的向背就可見一斑了。

以剪報，場面十分壯觀，不少人沒有看過這些鏡頭，因此大家看得十分高興。這片電視片好就好在按時間順序，以胡耀邦去世至六月四日，人們可清楚地看出戒嚴在前，攔軍車在後；軍隊殺人在前，燒軍車在後。北京市委編的小冊子「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也很值得一看，很多東西反著一看，就真相大白了。當然不少人看到這種違背新聞，就氣得慌，像我父母以前一直訂人民日報，現在就不訂了。

戒嚴部隊四面楚歌

問：說起戒嚴部隊，各位能談談戒嚴部隊的情況嗎？比如說他們之間的關係，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與公安人員、警察之間的關係等等。

江：在大屠殺後，軍隊和人民的關係完全是對立的。現在北京人民特別恨當兵的，不論是戒嚴部隊，還是非戒嚴部隊。我看到幾個鐘頭，感到十分有趣。一個鐘頭是在崇文門菜市場，幾個戒嚴部隊的軍人在買豬肉。肉是裝在塑料袋裡的，因為放著冰，冰有些化了，塑料袋裡有不少血水。一個小伙子走過來，大聲喊道：「瞧，這肉好香啊！還是帶血的呢！」他把「帶血的」這幾個字說得十分重，然後揚長而去。在場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戒嚴部隊的乾生氣也沒有辦法。另一個鐘頭是在西單。因為天氣太熱，戒嚴部隊站崗均用日光傘。兩名婦女走過去諷刺地說：「這個大蕭蕭還挺花俏的。」戒嚴戰士也只好默然地聽著。不少人故意從戒嚴戰士面前最近的地方經過，擠一下，擠一下，大熱天弄得他們十分難受。

至於給戒嚴部隊下毒的事，確實發生過，曾有幾十人中毒。開始時，還宣傳慰勞軍隊，後來就不怎麼宣傳了，戒嚴部隊還專門下了條文，不准接受食物，軍內現在有個絕密文件，專談下毒的情況。這個文件我是在三〇一醫院一個少將那裡看到的。因為食物中毒的現象時有發生。包括在自來水中下毒。現在是人民軍隊怕人民，人民軍隊人民恨。解放軍被「摸哨」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在西便門，一次就有四名解放軍被「摸掉了」。在護城河也發現了解放軍的屍體，戒嚴部隊便不再敢單人站崗，他們或是三人背對背或三角形站崗，或是二人去馬路上，面對面遙相呼應站崗，在長安街上，戒嚴部隊常出動百輛摩托車荷槍實彈地巡邏，頭戴鋼盔，令人記起了日本鬼子，或德國鬼子，非常恐怖，但也使人們痛恨萬分。

在北京除了血光敢死隊外，據說還有其他九個敢死隊，揚言要進行恐怖活動，他們宣傳要炸火車站、西單商場、王府井，甚至包括公共汽車。弄得人心惶惶，不少人說，要少上街，免得出事。這些目標全是民用目標，是反感的，但它反映了一些人一種盲目的復仇心理。

這種復仇心理演進成一種與災難禍的心。聽說西方國家要制裁中國，不少人都說活該；現在北京的外地人少多了，汽車也不那麼擠了，外國遊客少了，大酒店空了。這樣北京的收入少多了，國家旅遊局十分着急，可老百姓都十分高興，恨不得進出口再少些。連體育上也是如此，贏了沒人高興，輸了反而不少人興高采烈，連聲說活該。一個國家的人民不愛自己的國家，那麼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前途？

公安人員對軍隊不滿

海：我認爲一些警察及公安人員，據他們反映，不少警察及公安人員對戒嚴部隊十分不滿。大約有三千多名警察及公安人員這次捲入了學運，參加了遊行。其中一部份人被捕或被開除公職。我們單位一個同事的丈夫是警察，因爲參加了遊行被開除了公職，家中生活都成了問題。還有一位副處級的公安人員及其助手因同情學運，在獄中幫助那些被捕的學生及市民傳遞消息、串供，不斷走漏了風聲。他們被開除黨籍、公職並被抓起來。

戒嚴部隊在北京以老大自居，根本不將法放在眼裡。一次他們開車過快，被交通警察攔住汽車。從車上跳下幾個戒嚴戰士，不由分說將那個交通警察拉上汽車，開到部隊駐地。說這警察故意刁難戒嚴部隊，把他狠狠打了一頓。後來給他所在的交通大隊交涉後，戒嚴部隊才放人。當他回來後，他的同事都大罵戒嚴部隊，在心中結下了仇恨的種子。

由於戒嚴部隊打人太狠，也引起了公安人員的不滿。人落到戒嚴部隊手中就沒有好下場

一位十五歲的中學生被戒嚴部隊抓起來，關了二十多天，天天挨打。放他出去後，戒嚴部隊還威脅他不許到處講。當別人問他被抓後怎麼樣時，他只是默默地擦起了衣服，讓人們看他的遍體傷痕。首都賓館的工作人員有四十多人因曾衝擊市公安局而被戒嚴部隊抓起來。在電梯裡就劈刀亂砍地打；抓上汽車後又開打，相對地講，落在公安人員手中還好一些，關在秦城監獄比被戒嚴部隊抓去要好得多。

第一監獄天天處死人

問：海外傳說有不少人被秘密處死，你們是不是知道這個情況？
海：秦城監獄似乎不是沒有。比較著名的民運人士全關在那兒，如鮑彤、包遵信，他們表現都十好，一言不發。如鮑彤連問他什麼名字都拒不回答。如果包遵信招供了，我恐怕就要被捕了。

但永定門外的北京第一監獄就有秘密處死的。七、八月間，每天上午九時都有一輛行刑車開去，拉走幾個人，就再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人去哪兒了。這個監獄關的都是些無名小卒，即使處死了，也沒有太大的社會影響。這裡我還要說一點，中共這次處死的不少人都所謂的「二進宮」。這些人過去之所以犯罪，與中共在政治、經濟上的一連串失誤及文化革命的錯誤有直接關係。因此可以說中共把不少「人」變成了鬼，在這次八九民運中，偉大的民主運動教育了這批人，他們真正認識到他們靈魂中作爲「人」的那一面，煥發出無比的熱情。我認識這次在北京表現最勇敢、最無私、最無畏的並不一定是學生，而恰恰是這些歷史上有過污點的人們。他們在這次民運中要用自己的行爲表明他們已經由「鬼」變成了「人」。

但中共對他們壓壓最狠。因爲中共知道這批人「有前科」，即使處決了，社會影響很小，於是，便把這批人真正變成了冤鬼。

高幹家屬多冤魂

河：關於戒嚴部隊的殘暴，我還想補充幾個例子。據我所知，連薄一波、劉瀾濤的司機也都被打死了。其實這兩名司機都是支持政府鎮壓學生的。劉瀾濤的司機六月七日那天，在陽台上大聲大叫，向戒嚴部隊表示忠心，告訴戒嚴部隊要往哪個方向跑了，好讓戒嚴部隊快點兒去追。但樓那邊高，戒嚴部隊也聽不清，以爲這小子在比比劃劃地罵他們呢，這批射手都是偵察兵、神槍手，一槍就把他打死了。薄一波的司機平日仗勢欺人，耀武揚威，開一輛大「奔馳」，以爲無人敢阻擋。他在送薄一波家人去醫院的路上行進速度較快，戒嚴部隊要他停車檢查，他沒減速，以爲人家不敢動他，怎麼樣。結果對方一梭子掃過來，將他打死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副院長關山復的女婿也被打死了。他當時就在復興門二十二號樓上。這個樓還有一個司機被打死。非常有意思的是戒嚴部隊一個副團長的老婆也被打死了。這個副團長警告他老婆不要上街，於是他就沒上大街，就在家門口乘涼，他家就在公子坡到木樨地之間，不料戒嚴部隊追殺到小胡同殺人，恰逢他老婆在大門外，被戒嚴部隊一槍打死。聽到的老妻在大門外，被戒嚴部隊一槍打死。聽到的老妻在大門外，被戒嚴部隊一槍打死。

人無不拍手稱快。這些人全是高級幹部的親屬司機，住的都是高幹住宅區，也沒有逃脫死的命運。當然他們還可以告一狀，獲一筆高額賠償費。但對於一般老百姓，就是誤傷，也無處講理。現在許多北京市民在家人被打死後，不承認是誤傷，乾脆就說是參加了動亂。因爲人反正是死了，將來案子一旦翻過來，他們就是烈士。而誤傷在任何場合下都是誤傷。不要看江澤民、袁木他們信誓旦旦地說鐵案如山不可翻，人們相信現在的「衛士」，將來連祖墳都會被人剝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人民的信念。

天安門廣場強顏作歡

江：這個政府太虛弱了。比如十、一慶祝活動，參加遊園的人每個人都要填政審表，參加遊行的人不許去。其實沒人願去遊園，去的人也有不少遊行，只不過沒被揭發出罷了。至於十、一前在天安門廣場組織跳什麼舞，就更可笑。規定一律不許請假，連病假也不許請。二千六百人在廣場上強顏作歡，

在刺刀下載歌載舞，比文革時跳忠字舞還過份，因爲當年不少人還是以崇敬的心情去跳。現在則讓人聯想起當年猶太人在德國人的刺刀下在集中營中演奏「藍色的多瑙河」的情景。

政府強迫老百姓買國庫券不說，最近又強迫老百姓買公債。國庫券規定是工資的百分之十二，公債是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說你的月工資是一百元的話，要買一百二十元國庫券，一百五十元公債，每項都在三個月內扣清，那麼在六個月內，實際上你每月只發到五十元到六十元的工資，收入幾乎降低一半。老百姓私下淨是罵大街，非常恨這個政府。

問：關於六四後整肅的情況，你們談到很多人。國外對這方面情況瞭解不夠多，你們的材料十分寶貴。關於六四大屠殺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比較多，但不知各位能不能補充一些材料。
江：我在我在木樨地。
海：我在天安門廣場。
河：我在南池子。

江：來到海外後，我看不少材料，但我要強調一點，從六月三日夜裡十一點多開始到六月四日晨，部隊殺人比較多，比較集中；但從六月四日晨至六月八日，部隊殺人也不少，這一段往往被忽略了。在特定的時間內，任何人看到的都是屠殺中的一部份。但是從六月四日至六月九日，全北京的人都在議論，屠殺的情況從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方向一點一點地描繪出來了。很快就成爲一幅詳盡、全面的景象。

不少材料都提到了木樨地殺人的情況，但似乎並未強調指出，這裡是軍隊首次屠殺民衆的場所。我死裡逃生，是這場大屠殺的活的見證人。我家離木樨地不遠，六月三日晚，鄰居們都議論今晚要出事了，我很惦记學生的情況，就上長安街去了。在街上，看見一幫人圍着個學生。這個學生氣喘喘地說，軍隊從萬壽路方向朝東進，在公主墳就開了槍，公主墳已經失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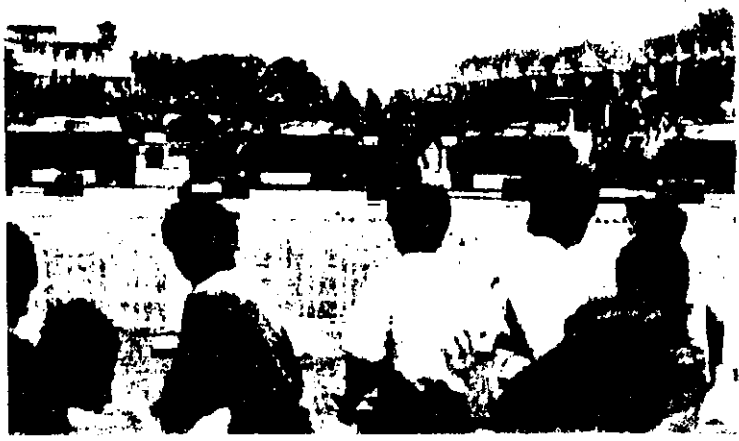
當時，不少學生、市民已在木樨地橋頭堵了許多障礙物，我認爲有那麼多汽車堵在那兒，部隊很難通過。我當時穿過了木樨地，來到橋西，事後回想起來，這一行動也許救了我的命。

十一點，部隊從西來到了橋頭前。我們在路邊向部隊扔磚頭、石頭。李錫銘在報告中講，北京哪來那麼多石頭，這些石頭都是暴徒事先準備好的。他的話講對了，不過這些暴徒不是別人，就是戒嚴部隊。北京市內沒有什麼石頭，戒嚴部隊的汽車載了很多石頭，一些士兵背兩條子彈帶，一條裝的是石頭，一條是子彈，所以在大屠殺前，他們早已充份準備。

因為我們知道戒嚴部隊在公主坟開了槍，都非常氣憤，一邊罵他們，一邊扔石頭，這支部隊開始也向我們扔石頭，後來，向天空鳴槍，以示警告。然後突然調準槍口，向我們射擊。當時他們的射擊還是有控制的。一是打我們腳前一、二米處，一是打我們頭頂上一、二米處。開始我以為是橡皮子彈，但一看腳下子彈將馬路台階打得金星四濺，頭上樹葉紛紛被打落，不少人嚇得翻牆跳進院子，我也躲在一個水泥柱後，動也不敢動。這時，有人從牆裡向外扔石頭，遭到了部隊更多的射擊。我附近兩個人被打倒，在呻吟。一個老頭大聲對牆裡的人喊：「牆裡的不要再扔石頭了，要不然我們都會被打死的！」而且有人大喊部隊派人向我們這邊搜查了。我心想這下完了。由於彈藥不再扔石頭了，加上天黑，搜查的部隊沒深入幾步，就又退了回去。

我們正要過去救那兩個被打倒的人，一個我一生中永遠不能忘記的情景發生了。從這支部隊中跑出二排人。前排半跪，後排站立，兩排人之間相隔大約六米左右。因為木柵地橋頭的學生、市民為了阻擋部隊通過，已點燃堆在橋頭的石塊，試圖用火阻止部隊。透過火光可以看見不少人影在橋上晃動。就在這時，這兩排士兵開始用手中的自動武器向橋頭橫掃，射擊持續大約三分鐘。橋那邊先可以聽見哭喊聲、呻吟聲，之後就沒有聲音了，再也沒有人影晃動了。我的心戰慄了。然後我看見部隊很快上去清理這些還在燃燒的石塊，開出了一條可供一輛車通過的道路，然後，整個部隊就開始通過。從射擊結束到第一輛車通過，速度很快，不到五分鐘，車一開過橋，頓時就槍聲大作。士兵在軍官的指揮下，見誰打誰，並開始向兩側追殺。

部隊這時命令我們不許抵抗，一律逆部隊前進方向向後撤退。我承認人們都嚇呆了，誰也沒反抗，就遵照部隊的命令撤退了。



我們橋西傷亡不大，我撤的時候右腿被四、五個人流血。但橋頭和橋東太慘了，橋頭上大約有五十人至一百人之間，估計很少有生還。我有幾個同學在橋東，一個雙腿受傷，筋被打斷了，估計要終身殘廢。一個被彈片彈進眼睛，左眼完全失明，右眼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了。他們請抬轎後老百姓就開始跑，復興門一帶兩邊還開槍，比較容易跑，但軍隊與警察天

良，延仲到兩個追殺，住在廿二樓上的人從高處看到士兵在軍官的督戰下，向人民瘋狂地射擊，軍官的槍指向哪兒，士兵的槍就向哪兒，開始是打單發，後來完全是自動武器打連發，第十六軍軍長汪洋的女兒在廿二樓險些被擊中，子彈穿過她的被子，擦傷了她的大腿，免於一死。我另一個同學在西單住，他講西單也非常慘。因為木柵地到西單一帶路障林立但人並不多。西單附近及六部口一帶聚集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在攻破木柵地橋頭後，因開了殺戒，士兵也就視人命為草芥，不少士兵射了人後哈哈大笑，殺紅了眼。他們約十二

點時到達西單，因受到阻攔，於是採取立體射擊，上、中、下一起掃。因為不少人在樹上、房上或牆頭上，上就是掃他們。掃射的結果，很多人像鳥一樣被打落到地上；中是平掃，下就是打臥倒的人。西單附近四合院多，馬路上的無處可跑，殺得極慘重。六部口一帶的情況也差不多。一直到今天，西單、六部口一帶的牆上還殘留着這支殺人部隊立體射擊的彈痕。北京市委只能修天安門廣場，還無力重修一切殺人場。這支殺人部隊於十二點二十分到達天安門廣場，提前了十分鐘，受到戒嚴部隊的嘉獎。過去都傳說他們是二十七軍，其實是三八軍一二師的紅軍團。在五十分鐘內，衝破至少十萬市民、學生的阻攔，不殺死成百上千的人是根本辦不到的。當時，槍聲震耳欲聾，根本無法辨別單發的聲音。我在另一條馬路上和軍隊平行前進了一會兒，心裡因為憤怒和恐懼直打哆嗦。

長安街上的大量自行車被打壞，兵卒在路邊。事後據統計，長安街上扔了人約十五萬輛自行車，至今無人認領。因為誰也不願意為了一輛自行車而上黑名單。幸好中國的計算機還不發達，沒有用計算機登記車主、車牌，否則我用 SAS 編一個 PROGRAM，一下子就能將車主全找出來。

海：六月三日夜至六月四日晨，我去了廣場兩次，在四點前離開。那天是星期六晚上，天有些熱。三號下午，氣氛也十分緊張，上自師的一些人下午被打傷了，在北京市委前示威向人們展示軍警的暴行。下午六時，從廣播中傳出北京市委及戒嚴部隊的警告，讓市民當晚不許出門，否則後果一律自負。大家都憤慨到那天晚上要出事。到了晚上八、九點鐘，幾十萬北京人不約而同地來到長安街。當時廣場上人山人海，有老人、小孩、情侶、夫婦。有的穿著拖鞋、短褲、背心，根本沒有任何暴力的準備。我看到那麼多人在長安街上，心想政府怎麼下令向這麼多民眾開槍呢？不少人都認為那天晚上將和五月十九日戒嚴令下達時一樣，民眾一上街，軍車就進不來了。廣場上的學生對形勢估計也十分樂觀，認為軍隊是無法清場的。所以我轉了一會兒，就回家了。

當時我們以為是朝天開槍，打的也是橡皮子彈，因為我們總是認為人民解放軍是不會打人的。就在這時，我的一個鄰居匆匆跑了回來，說：「不好了，解放軍在木柵地、宣武門一帶已開槍了，打死的人海了。」他說他是從宣武門那邊回來的，死了很多人，醫院住滿了傷員。不少人當時還半信半疑。但我很瞭解我這位鄰居，他為人忠厚豪爽，因此我知道事態非常嚴重。大約午夜一時，約一連解放軍從我們樓上經過，我們不少鄰居還上前宣傳，要他們不要開槍，不要打學生，不要打人民。但這些軍人一百不發，只是上進，方向是天安門廣場。他們先是側背著槍，手裡拿著棍棒。過了一條馬路後，他們突然把手中的棍棒全部扔掉，持槍跑步前進。

我因怕學生吃虧，就和這位鄰居一起去天安門廣場，一是勸學生快離開廣場，二是想看看解放軍到底要怎樣清場。我們到達廣場時是半夜一點多，前門外有三十多個解放軍坐在地上，中間有二、三十個人傷勢很重，躺在地。群眾不斷地罵他們是法西斯、活該，經人指點，我們到了肯德基炸雞店附近，我親眼看見四具被解放軍打死的屍體。一個是老頭，一個是年輕的小伙子，還有一位婦女及她的十五歲的女兒。地上全是鮮血，我這才相信解放軍是真殺人，剛才看見那些受傷的軍人還有些可憐憫他們，現在則變成了滿腔仇恨。當時廣場北部已佈滿了戰車和坦克，但包圍圈還沒有合攏。一點半左右，約二千多學生從市場東部經南池子撤離了。他們跑到火車站，車站讓他們免費上車。其餘的學生都撤離到紀念碑附近，默然地坐著，外人根本進不去。歷史博物館及大會堂附近全是軍人。我因為六月三日去過新華門，看見中南海裡人影綽綽，全是軍人在跑動。後來一位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處級）告訴我，大屠殺前在中南海及大會堂共集結了大約六萬軍人。其中約四萬軍人通過地下通道進入到大會堂。（編者：這和我們所掌握的情況是一致的。）這麼多軍人，吃飯、飲水、上廁所，甚至呼吸都成了問題。所以這批軍人十分煩躁，他們把大會堂的冰箱都撬開了，將裡面的食品吃光。在屠殺前，大會堂的工作人員三天三夜不許回家，怕他們走漏了風聲。同時，不許打電話，不許會客。當這批軍人從地道中放出來後，他們如放虎歸山，殺人特別狠。

三點多鐘，一輛坦克從南邊以高速瘋狂地駛進了天安門廣場。它一定是在宣武門一帶殺了人，見人就開槍，我們當時嚇得趴在地上，它橫衝直撞，壓壞了好幾處鐵柵欄。當時廣場南部有許多帳篷，裡面還有人。這輛坦克上的人決不會像人民日報講的那樣，將一個個帳篷掀起來看，它壓死人的可能性極大。

廣場上不斷廣播讓學生立即離開廣場，否則軍隊要以一切必要手段來清場。現在中國在報導這一過程中，把軍隊講的是那麼克制、有禮貌，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當時廣場上恐怖極了。

四點前，我離開了廣場。剛離開，從四點到四點十五分，廣場上槍聲大作，沒有片刻停息。當時我在廣場給家裡打電話，他們從電話中也聽到了廣場上密集的槍聲。從四點十五分到五點三十分，廣場上時有零星的槍聲，而不是像中共宣傳的那樣一槍未放。

中共的報導一直宣傳清場到五點半結束，避而不談從五點半到六點半期間的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我們有理由證明中共在這段時間內對廣場上殘留的數百人進行了大屠殺，家住在六部口的人聽得十分清楚，在這段時間內廣場上不斷響起國際歌聲，然後是密集的槍聲。之後又是國際歌聲，密集的槍聲，到了六點半鐘，什麼聲音也沒有了。在這段時間內，廣場上濃煙滾滾，烈火熊熊，直升飛機往來如梭。

六月四日上午七時在會堂接見六部口附近，一個小伙子從廣場軍人的包圍圈中突然跑了出來，他手中沒有武器，對軍人不構成任何威脅，當時所謂的清場也已經結束。在他跑回包圍圈十多米後，軍人以密集的火力打死了他。為什麼要打死他，至今還是個謎。只能解釋為他看到了屠殺的全部過程，留著他總有一天會將屠殺經過大白於天下。據說這樣被打死的還有一個。

我在北大的一個好朋友清場時在紀念碑下。他說清場部隊是老山的偵察兵，對待這些學生的態度完全像在山打越人一樣，離學生還有五十米時，就臥倒匍匐前進，當接近這些學生時就像猴子一樣在地上滾滾爬爬，使在場的學生感到十分奇怪和可笑。但戰士們的槍口一直是對準學生的。戒嚴部隊先讓他們從東口撤，但東口很快封死，不准他們通行，他們只好折到西邊大會堂一個側門，軍人們毫無耐心，對他們連推加踢又打，最後還有幾百人不肯

離開廣場，他們的命運如何就無人知道了。

河：四日清晨，我在門口眺望天安門廣場的濃煙與火光。這時，一個清華的學生騎車過來，他衣服上全是血。人們就圍上去，問他受傷沒有，要不要上醫院，他苦笑着說：「完了，全完了！」他還說，他自己沒受傷，但他不少同學被打死了，他背下不少傷員，因此衣服上全是血。他還說，太恐怖了，他的精神全崩潰了，他要回家休息去了。然後他就像醉漢一樣搖搖晃晃地騎著車，向北去了。

上午九點鐘，我在南池子親眼看到了解放軍是如何屠殺市民的。六四的大屠殺，激起了北京市民的無比仇恨，在南池子，一批市民指著解放軍大罵他們是法西斯、劊子手，罵著罵著，一批軍人從隊列裡衝出來，端槍向市民平射，我親眼看見二十多人倒在血泊裡，北京市民是真勇敢，又有一批人上去罵，這時，我們這邊有人照相，被軍人發現了，衝著我們這邊又開槍，又迫，我嚇得躲進一條小胡同，騎車跑了。在路上，看見三輪車上拉著一位婦女，全身是血，估計活不成了。

問：你們估計死亡的人數有多少呢？

河：死亡總人數我估計是至少一千人。其中軍人大約是五十多人，這五十多人在六月三日到四日被群眾直接打死的不過十個人左右，這些人都是像崔國政那樣的殺人兇手。我在大屠殺後拍了一些照片，你們可以看一看（衆圍觀）。這就是崔國政，他旁邊的軍人還朝群眾射擊，就是他專照人打。當然要激起公憤，就被群眾打死，點了天燈，群眾用的是熱武器，像刀、汽油，表面上手段殘忍，但殺傷範圍很有限，軍人用的是冷武器，槍、坦克，從形式上不像熱武器殺人那麼殘忍，但殺傷力大，實際上很殘忍。

北京的市民還是太克制了，最初部隊打死、打傷了不少老百姓，還有不少人出面制止那些憤怒的群眾不要對被俘的解放軍進行報復，並將受傷的軍人送到醫院。死的軍人中有七人是給燒死的，被命名的共和國衛士。其實他們車上運的是鐵絲網和木棍，即人民日報稱之為防禦器材，因車翻油箱起火。當時群眾還是要救他們。但不料鐵絲網阻攔，他們出不來，就會給燒死了。上述十七個人還可以將原因歸到暴徒身上。其他三十多人就死因難以啓口了，多半是走火、流彈打死的，是屬於部隊自己的問題。

但相比之下，軍人是太喪盡天良了。有一個年輕的工人，在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晨跑過了北京所有的醫院，將死亡數字全部統計下來，可惜我來得太匆忙，否則應將這個數字帶出來。復興醫院死亡（四日晨止）是四十九人，宣武醫院也基本上是這個數字。那麼我說上千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是根據死、傷比例推算來的。政府承認受傷的民衆是五千人。據我們去過醫院的統計，死與傷之比基本上是一比五。比如國務院說死了四十七人，傷一百六十七人。因此說死亡三千、七千、一萬，可能是過高了。但死亡一千是起碼的，傷亡總共七千也是起碼的，因為到六四早晨，光復興、宣武兩個醫院已死亡上百人。在復興醫院，約有四十具屍體是堆在自行車棚裡，慘不忍睹。其他每個醫院也有二、三十人死亡。四號到八號之間還繼續有傷亡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在醫院死去的，都是在屠殺現場沒有死，群眾認為還有搶救的可能，才送醫院的。據一個參加過屠殺的軍人的透露，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即六月四日五時半至六時半，軍人打死一百七十多名學生和市民，逮捕了八十多名。當場被戒嚴部隊打死的，屍體幾乎全被戒嚴部隊搶走了。

戒嚴部隊是由全國各大軍區派兵混編組成，各部隊都分別搶屍，可能打死的越多，說明領導有功吧。正像三十八軍在木樨地殺人的部隊，就搶走屍體七十多具。北大化學系一名留校老師被打死，他的屍體是走後門才搬出來的。問：走後門？我還真沒聽說過。河：是的。能夠親自去辨認屍體的，全要認識戒嚴部隊才行。當時去認屍時已是八號。屍體沒有冷藏保存，已開始腐爛發臭，而部隊根本無法辨認，後來發現了一串鑰匙，用這串鑰匙打開了他的宿舍，及化學系實驗室，才確認是他。其他七十多具屍體，兩天之後全燒了。每個屍體都留了幾張照片，後面認屍的人只能去看相片了。根本無法辨認清楚。所以認屍也要先認識人，真是天大的諷刺。這個老師也真夠倒楣的了，剛出差回來，坐地鐵在木樨地換車，在那看熱鬧被打死的。他平時從不參加學運，那天晚上偏偏大難臨頭了。

江：是啊，我這個天天搞學運的命運挺大，從木樨地逃出來了。河：這還有幾張照片，可以說明戒嚴部隊決不是鐵板一塊。瞧這兩張相片上的軍人，他們旁邊的立交橋就是崔國政被燒死的地方。崔

的屍體擺在那兒兩天了，無人收屍，我當時問這些當兵的：「那邊有個當兵的給燒死了，你們怎麼不去收屍」。他們回答：「又不是我們部隊的，誰管他」。

本來，戒嚴部隊應從四個方向攻入天安門廣場。但東路北路均停止了進攻。原因是在東部一輛其他部隊的坦克撞翻了一輛軍車，壓死了一名軍官，一名戰士。這支戒嚴部隊指揮一怒之下就下令就地駐防，在北部部隊打死了兒童，當悲憤的母親抱著她的孩子在戒嚴部隊前示威時，部隊指揮也感到不太像話，停止了進攻。

江：不過這些並不能掩蓋戒嚴部隊的殘暴，五號北師大展覽了五具屍體，全是坦克壓死的，肢體破碎，慘不忍睹。同日，政法大學也展覽了三具屍體。當時戒嚴部隊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向無力到廣場以外的地區鎮壓。後來，戒嚴部隊開入這兩個大學，將屍體搶走。以後，誰說他看見坦克壓死的屍體，誰就是造謠，有兩個工人因為說他們看見了這些屍體，就被抓了起來。

海：以造謠定罪的太多了。山東某大學的青年教師因得知大屠殺的消息後，十分憤怒，他向群眾宣傳說北京打死了三、四千人，並要求退黨，結果被判了九年徒刑。

關於死亡人數，我還要補充一下，各校都有十幾個以上失蹤的人。北師大失蹤者達三、四十人。北京這麼多大學，失蹤的不就不少，不知這些人是死了，還是躲起來了，還是逃到國外去了。

問：那其他地方如何？你們是否瞭解天津、上海、成都等地的情況？你們以什麼渠道獲得消息？我們從海外傳來的消息有多大作用？

江：我們對其他地方的情況瞭解不多，只聽說成都被打死了三百人左右。我在美國碰到一個剛從成都平的老師，她什麼都不肯說。我們在國內很難得到海外報刊。比如說，我從未見過「中國之春」是什麼樣子。除了親人來信外，我們就是聽美國之音和自由中國。這兩個電台在學運中起了重大作用。在收聽時，我父母十分擔心，大熱天也將窗戶關得緊緊的。儘管政府干預，但還有兩個頻率根本無法干擾。我在大樓裡轉一圈時，經常能聽見「小洋果」的音樂聲。我就知道我的鄰居們也在收聽美國之音。我們的消息來得很快，也很詳細。要不是美國之音傳遞消息的話，上海、西安、成都都

不會知道六四屠殺的情況，也不會上街遊行示威的。

問：你們都剛從國內來，是不是從國內人民的口實談這次學運的經驗、教訓。是不是可以展望一下海外的民運。是不是可以預測一下國內的前途。

海：首先應該承認八九學運是失敗了。有些人認為這次屠殺使人民看清了共產黨的本質，使全世界對中共有了新的認識，因此不承認是重大失敗。至今還認為廣場上的學生不應該撤，應該堅持到天亮，要拿一萬多人的性命去賭到底。

我認為這不是在搞民運，是在搞賭博。我每天都去廣場，我認為這次學運最大的教訓是急於求成，沒有把握住有利時機，當退不退。

最應該退的時候是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後，當時北京市民對學生佩服的五體投地。你要是佩帶大學校徽上公共汽車，車上的人都投以崇拜的目光，並可以免費乘車。學生當時應返回學校，保留和政府對話的要求與權利，政府不對話的話，鬧三岔五的幾十萬人的遊行行列就拉出去了。可學生們就是不肯撤退，他們認為他們的最低要求沒有達到，好像一撤他們就輸了。其實能組織這麼大遊行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勝利。八五年、八六年的學運我都參加了。這次到四、二七大遊行已是極大勝利。民主的道路是長期的，不能一次求成。假定當時共產黨很明智，他們說他們可以下台，學生們怎麼樣，他們有能力接過政權，並把它管得好嗎？我看是不行的。從民運、民主陣線及全美學生會的現狀來看，民主力量在中國還很小，也不成熟。

以後還有多次可以撤退的機會，如五、四，但一經食，學生就騎虎難下了。然後政府宣佈戒嚴令，政府也騎虎難下了。雙方都不肯退步，只有決鬥了。學生的肉體怎麼能抵過政府的坦克。以這個意義上說，政府贏了，而且既然開了武裝鎮壓的先例，那麼今後即使再遇上有利的時機，民運也很難開展了。也就是說，絕食實際上並沒有將這次學運推向高潮，相反是從高峰向低谷走去。我和學運領袖及廣場上的學生們多次交換過意見，辯論過。我認為為陣一踏、踐家其、萬間南等人在讓學生撤回校園這個問題上看法很對，但學生們就是不聽。結果這次八九學運慘遭失敗。在死亡的上千民衆

中，學生連一百人也不到，首都的民衆擔負了最大的犧牲，現在在清查中又承擔了最沉重的擔子。因此，學生們應好好想一想這一教訓。

河：我和王爾開、王丹等在廣場上接觸過，也聽過他們的講演。他們有熱情、有組織才能、敢出頭。儘管也犯過不少錯誤，但仍是可欽佩的。但他們很不成熟。範形入獄，就保護別人，也就保護了自己。王丹則說了一些他不該說沒有人知道的事情。王爾開關於學生的理想主義與知識份子的實際一段評論，我不敢苟同，我們既然搞和平、理性、正義的鬥爭，就應該不給政府造成武裝鎮壓的口實。而廣場上二個月的鬥爭證明，我們自己的失誤給政府也造成了不少口實。我們雖年長一些，知識份子，並不是實用主義的人，我們也是理想主義。我們吃過虧，知道這個政權如何吃人，也知道如何用最少的犧牲去換取最大的成功。如果說這是實際，不如說掌握了鬥爭的藝術。現在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多少好同志被捕、被處決了。中、上層內公開支持民運的人幾乎全被一網打盡，這個血的教訓一定要吸取。

海：我同意河兄的意見。這次民運之所以沒有及時撤退，還是低估了政府的力量，低估了軍隊的力量，一句話，低估了共產黨的力量。到了運動後期，大軍壓境，形勢十分嚴重，但學生領袖們還是高估了民運力量，總是要掀起高潮，一個行動接一個行動，一個遊行連一個遊行。說實話，首都民衆對學生長期佔據廣場，運動不斷升級，內心已有一些厭倦的感覺。比如說，許多人上、下班都受到很大影響。我過去上班只要二十多分鐘，現在常常要兩個小時，頭腦中確實因過勞而產生煩躁感。行動早日結束的念頭。這種厭倦感使一些人在政府宣傳學運是反革命暴亂時，容易聽信、同情政府，使他們的宣傳有了一些市場。

河：我認為這次學生與政府方面都使用了不少謊言。謊言這種手段在短期中使用，還有效果。但從長遠來看，是嚴重的錯誤。比如五月中旬，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發表緊急公告說天安門廣場管理處實行斷水，大概是為了激起人們對政府的不滿。結果全市幾十萬人火急行動，肩挑手提，用暖瓶、水桶向廣場緊急送水，場面上十分感人。但大家到了廣場，才發現廣場從未斷過水，許多群眾十分憤怒。這件事嚴重地傷害了群眾的真誠與熱情。這種「狼來了

」式的做法不只一次，每天晚上都宣傳常晚戒嚴部隊要進城。結果我在天安門廣場呆了六夜，每次都沒有任何事情，等到六月三日部隊真的進城時，許多人反而半信半疑了。可以說，這個政府太笨，這種極其拙劣、人心喪盡。否則像學生也使用這種手段的話，很快就會脫離群眾。在海外也應吸取這個教訓，在重大問題表態上，要慎重一些。寧可憐一些，不要信口開河。

一些民運知名人士在海外的宣傳太誇張了，當然宣傳也可以有問題。什麼中共經濟將年底崩潰，這個宣傳支持不了幾個月，至多兩年。不知道這種預測根據何在？我還要打持久戰，從殺人後，槍已經說過了。那麼物質的力量還是應由物質來打破。問題是軍方會站了嗎？我看從目前的情況說，決無這種可能。國內許多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北京市民也閉口不談學運的事情，所以不要總宣傳樂觀的觀點了。

海外現在是應該保存力量，並發展壯大力量，但真正要在中國實現民主進程，一定要國內起來才行。

江：這話說得很好。中國的前途是要靠國內的力量，光是在海外活動、宣傳，對國內的作用不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將中國的命運寄托在外國人身上，比如寄託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身上。中國的命運還要靠我們中國人自己。這次美國之音在傳播消息，使八九民運形成高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從六月二十日後，它就開始不怎麼關心中國的情況了，當時國內逮捕十分厲害，需要他們支持，但美國的表現讓國內人民十分失望。據說包遵信被捕前曾和美使館打過交道，希望他能取得他們的幫助，但被拒絕了，結果他在安徽老家被捕。美國在支持中國民運上又做了多少具體事情呢？連一個保護中國留學生的法案至今都遲遲未通過。經濟制裁不徹底，還總是向中共討好、讓步，中共也不說它好。

美國領館對待中國留學生簽證的態度是令人不能容忍的，連起碼的禮貌都沒有，我簽證時，美國領事居然對我前面的學生大罵：○○○○多少人被拒簽。自費學生只要沒有全資助就不行。許多學生半資助或免學費就遭拒簽。現在多少知識份子害怕中共的專制，躲避這個恐怖政權，想到美國來，他們應該得到美國的歡迎與幫助。現在國內對出國是嚴加審查，

參加過遊行都不行。有三十六個單位如北大、清華、人大、師大、四通公司、社科院等，不論公費還是自費，出國一律停辦。不料美國也卡，現在簽證極困難。因此令人十分失望。

我因為有全資助，那個領事批了我的簽證，但我心裡十分不舒服，總覺得自己的同胞在受侮辱。大家可能看過「苦海餘生」這部電影吧。現在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態度，就像二次大戰前，他們對猶太人的態度差不多。說一千道一萬還是怪我們國家不爭氣，希望海外外共同攜手，早日推翻這個反動政權，否則我們真是有家難回。

問：在採訪結束前，我有個問題可能有些好奇。諸位都參加民運很積極，為什麼還能到達美國？大家到底是怎麼出來的呢？

衆笑：無可奉告，這叫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海：說在人們對這個政權早已喪失信心了。有些人也利用這種信心喪失大發其財。比如黃克誠的兒子就賣假護照，包括簽證、出境卡一切齊全。到美國的護照一本要三千美元，到其他国家可能便宜些。他們什麼都倒，連軍艦也倒。倒一倒一軍艦一下就能賺幾十萬美元，你們這些留學生一輩子也掙不到那麼多。但我相信中國的前途還是光明的，民主是必然要戰勝專制的。魯迅先生說的好：「血沃中原肥勁草，寒風大地發春華」。六四大屠殺教育了人民，共產黨已喪失了人心。六四大屠殺的血決不會白流。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中國一定要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

問：謝謝大家接受我的採訪，謝謝你們的材料及照片。你們的姓名、地址我們一定嚴格保密。最後我代表中共青年們在萬一，切如惠，順利！

中國政局 內緊外鬆

靳軍

靳軍自一九八二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共中央所屬的某家大報任編輯和記者。「六·四」事件後，他的許多朋友、校友和接受過採訪的知識界人士，均遭警察逮捕或傳訊，更不少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同學被停職審查，寫交待材料，在巨大的精神折磨、壓力和痛苦下忍辱生存。他本人因安全受到威脅，費了一些周折終於逃出中國。下面是我們通過電話與他交談的記錄。

記者：你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靳軍：我十月中離開北京，十月底才到美國。

記者：你出國前國內這一時期的一般社會狀況怎樣？

靳軍：黃木不久前在一個內部會議上承認，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對眼下的政府、清查運動不滿。但據許多中央一級新聞單位資深記者分析，這個數字應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至少是百分之九十的人有看法，但憋在心裡不敢公開講。「反右」及「文革」教育了所有中國人，極少有人願為講一句真話而丟掉飯碗或坐牢。「六四」前，傳了一個北京市政府文件，說九月十二日這天誰也不許戴白花、穿黑衣服，更不許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頭有紀念的表示，否則戒嚴部隊將不能保障他們的安全。「六四」前，天安門廣場原「民主女神」舊地豎起了工農兵知識份子群像，被過往市民嗤之以鼻。有人評論說：「他們的思維方式就像孩子一樣，水平極低」。北京市要選拔十萬人「十·一」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跳舞，主動報名的人很少。一是大家心情沉重，沒有興致歡樂，不想做政府粉飾太平的工具；二是怕挨炸彈。一個被迫去跳舞的人說：「不用真的炸彈，只要有人喊一聲有炸彈，就可能擠死幾百萬人。現在人人擔驚受怕，知道政府及戒嚴部隊

欠下的血債太多，仇人太多了！」總之，誰願當他們的陪葬品呢？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舉辦亞運會的準備工作。宣傳聲勢已展開，宣武區政府在一份街頭散發的材料中說：「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政治大局的穩定和改革開放政策，恢復我國的國際形象，團結更多的朋友，粉碎國際上少數人企圖孤立我國的陰謀」。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更好地清除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各種影響，對廣大群眾進行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振奮民族精神，堅定人民克服困難的信心……，重振國威」等等。事實上，人們對亞運會熱情衰微，再也不會像修長城那樣掀起捐款浪潮了，而亞運工程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六四」事件殘酷地打擊了人們的愛國心，不少人反懷著看政府笑話的心態。現在，人們把對國家大事關切的心情，全放在對個人前途，或如何得更多經濟實惠上了。但儘管冰箱、錄像機等高檔消費一再降價，人民的購買力還是不高，許多國營大企業因沒有周轉資金，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

記者：

現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外緊內鬆」。即對外宣傳「開放政策」，對內實行高壓手段。許多清查工作是不是仍在向縱深發展？

靳軍：

不僅如此，而且已達到人人過關的恐怖地步。「十·一」前工作重點在搜捕「暴徒」上。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抓人、審判及槍決均秘密進行。一位警察朋友告訴我，槍決一直沒有停止過，還有大批的人在押待審。一般十五平米房間關六七十人，像魚一樣一個個擠在一起，七月北京炎熱時，許多人的腳都站爛了。國務院所屬某大報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學生見記者，向坦克扔了一磚頭恰好被攝像機錄下，電視台一放，馬上被老家的鄉親舉報了，現被判無期徒刑。還有一位工人不過向同事遞了一桶汽油，點火的人跑了，他則被抓住了判了死刑。由於他在廠裡表現極好，廠領導不斷出面求情，

均未奏效。執行槍決前，僅讓他見了妻子一面，連七歲的兒子都不讓見。這兩個例子是我的朋友看了內部簡報後透露的。「十·一」後清查重點放在知識份子上，當然意味著從意識形態徹底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王震對這些年輕的知識界精英恨之入骨，說：「如有必要就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一個不留。」江澤民說，四千八百萬黨員「不惜開除八百萬」。現在搞「人人過關」。原將界綫劃在李鵬發「五·二〇」戒嚴令後，此前聲援與遊行不為過。現在則提前到「四·廿六」社論後，凡聲援、遊行，甚至捐了幾塊錢的都不行。每個人必須詳細說明那一段時間你幹什麼了，若沒上街，證明人是誰，簡直像接受審判調查一樣。知識界清查重點除社科院、體改委、體改所、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高級黨校外，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人民日報」可能會從部主任級大換班，高迪（音）說：我們黨這歷多年來最大的教訓，就是「人民日報」在這次動亂中起了錯誤的輿論導向作用。他說：「不把那些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全部整掉，我決不走！」

記者：

這麼說，「六四」事件後，知識份子又要陷入惡運了？

靳軍：

比這還要嚴重得多。可以說這回是知識份子精英「全軍覆沒」。儘管江澤民對外宣稱「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沒有變」，但對內連與他們所謂的「動亂」毫無關係的人也不放過。現在是「翻老帳」，包括在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中較活躍份子，不向官方低頭的新潮時人，與方勵之或其他被通緝的人認識並有聯繫的人，參與創辦過一些思想較解放有進取精神雜誌的人，編過介紹西方民主思想書籍的人，主持過政治體制改革或文化發展戰略討論的人——總之，凡是受過高等教育，有較強思考能力和理論水平，具真知灼見觀點，年紀在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均遭不同命運。

他們不是被捕就是被傳訊，或逃亡外地，或被停職、開除。更多的人要寫檢查及交待認識材料。總之，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不信任，決定了他們今後的命運。這就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不願國內的研究了，千方百計自費留學。可以這樣說，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認為留在國內沒有前途，都想離開中國。許多人說，他們現在比「植物人」過的還痛苦，因為植物人不能夠思考。我的一位朋友是部隊軍醫，四十多歲。她對我說：「我十六歲參軍，可以說紅了半輩子，從來都是聽黨的話。但是現在政府竟然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我實在不能忍受了。我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救護工作，親眼看到學生一點錯也沒有。像我這麼大年紀還找路子出國，你覺得奇怪嗎？我現在是在考慮往波利維亞移民，也不受共產黨統治了！」隨後她長嘆一口氣說：「真沒想到，我這個老革命竟成了堅定的反共份子……」。現在，北京大學招生減少後，仍不能開學，原因是教師隊伍整頓清查未完，有相當部份的中、青年教師不准繼續開課，面臨調出北大的危險。但北大同仁都知道，除非政府將北大關閉，否則其民主進取思想不是調走幾個優秀教師就能扼殺的。中國人的文化素質本來就不高，十億人裡有幾個頭腦清醒具將帥才能的？中國的未來全靠這些人。所以說「六四」事件後，知識份子的災難對中國前途有毀滅性的影響。

記者：

你能就你所知道的情況舉幾個具體例子嗎？我們在海外留學生都很關心他們的命運。

靳軍：

可以舉例子，但不能說他們的名字，否則會使他們背上與國外敵對勢力有聯繫的罪名，罪加一等。我的一位朋友是某報的編委，有較高的政治經濟理論水平，每次開這類理論討論會，他除了採訪通常即席發言，還點撥人。他被捕後，一直堅信自己是正義的，沒做過任何有損於黨和國家的事。所以，有次審訊他竟向對方慷慨陳詞達六小時之久，從法國大革命一直講到當代西方民主，以及當今中國社會與真正文明社會的距離，審訊人員覺得他骨頭太硬。在我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我他已遭到毒打。還有一位大學青年教師，「六四」後他得知公安局在通緝他，

便也懷着正義之心前去自首。他以為他面對的是人。可是他完全想錯了，他向審訊人員解釋他與學生領袖接觸是為了勸說他們撤離天安門廣場，並在政府與學生之間斡旋，使政府也適當做些讓步。但他說的這些被對方寫成材料向上匯報，就變成：據×××交待，他們在背後策動，支持學生絕食，主要是向政府施加壓力，逼政府一步步後退，最終達到他們顛覆政府的目的。一位在社科院工作的青年學者被捕後，他妻子非常為他的生命安全擔心，有好幾次她哭着找我說一點她丈夫的消息也沒有，他們四歲的兒子還不懂事，總是趴在媽媽身上問爸爸怎麼還不回來。有位記者在獄中傳出個條子，說要他妻子捎幾本圍棋棋譜，但後被警察阻止。據一位在秦城監獄關過的某公司職員，他住的房間門口有兩名士兵把守，兩個多月的時間沒讓他看過報紙上的一個字，書和電視就更不行了，他因與某高幹兒子是好友，兩個多月後被釋放出來，才得知江澤民當了總書記。

記者：

這樣看來，要想營救這些在獄中的知識份子，當然更重要的是改變所有中國人民的命運，就只有要現在手上沾滿人民鮮血的政府垮台了。

斬軍：

是這樣的，因為他們手裡有槍。若想加速現政府垮台，最重要的是經濟制裁。據國內權威經濟學家分析，若國外不再繼續給中國貸款，那麼現在鄧李楊政府只能生存兩年，若拿到貸款，則可生存三年以上。因為眼下國內經濟已到崩潰邊緣，物價上漲難以控制，給國家上繳利稅的大戶是國營工業大企業。但大企業不僅虧損嚴重，而且根本沒有生產資金，銀行也沒有錢貸給他們，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比過去更低了。據預測，一九九〇年中國經濟將進入最低谷，若政府仍拿不出錢扶植大企業，整個國民生活將進入混亂狀態。如果說這次學生因求民主而遭軍隊鎮壓那有那麼一點理由的話，那麼一旦工人、農民因經濟衰退而鬧工資、鬧物價，政府就無法讓軍隊開槍了。當然，這屆政府遲早要垮的重要因素，是由於他們已完全失去民心。

中國之聲 89/12

仇恨的旋風在北京

一九九〇年來臨之前

假話成風的洗腦運動
知識份子滿懷東歐式幻想
物價回穩但是市場蕭條
鄧小平成了一隻紙老虎……

當香港的聖誕燈飾漸次亮起來時，北京人卻在面對一個悶悶不樂的新年。

六四之後的秋後算賬尚未結束。經過十年改革的中國人幾乎個個都相信文革不會再來，但現在的中共領導人為了保住他們的江山，又在全國各地搞起「人人過關」那套文革的整人運動。主要目標是大城市的學校、知識界和黨政幹部，也包括一些指定的工廠。

人人表態，互相揭發

很多單位都在迫令職工寫「五十大反思報告」(五十大即胡耀邦死到「六四」)，要詳細交代五十年內，尤其是五一九或六四之後做了甚麼，有沒有上街遊行？捐款？北京重點追查六四當日的活動，互相揭發，人人表態。對搞學運的黨員更嚴格，據說有的黨組織開門會議就專門爭論一樣，氣。鄧像毛晚年一樣，要女兒鄧榕給他傳話。



氣氛火爆。有的地方連連中學生也不放過，要交代問題。有一名報社記者，六四時表示要退黨，現在交代了幾次也過不了關，最後「講清楚」了，還是被開除出黨。因為中央有指定：學運中要求退黨者一律按開除黨籍處理。

黨要應付運動自有一套方法，一位中年教師私下說：「久經考驗的中國人民，懂得如何在共產黨管治下保護自己，現在全國又假話成風，甚至超過了文革時期。」幹部一個比一個更滑頭、更油條，不同意見不說，執行任務陽奉陰違、敷衍了事。各地已召開組織工作會議，幹部政策明確宣稱，「德第一，才其次」，不再強調學歷和年輕化。這就是「與中央保持一致」，介入學運的黨員幹部都要作組織處分。

黑市護照五十萬港元

羣衆最有效的自保方法是出國，這是比文革更絕的地方。上海的「留學熱」比過去更甚，有的家庭把能賣的東西都賣了，在黑市換外匯，只要湊足三萬元左右，取得國外的經濟擔保，就可以走。但要交一份學運表現報告經黨組織批准，證明沒有問題才可放行。據說廣東深圳一帶，黑市護照的價格已從六四前的六萬漲到了四、五十萬港元。

普遍收聽美英蘇廣播

北京已全面控制了市民與外國人的交往，加強了各種方式的監視。街頭增加自動監視器，酒店與大機關的閉路電視也增加了，以便隨時盯着和外國人接近的中國人。女孩子尤其倒楣，動輒被指為「是不是想賺老外的外匯？」意即賣淫。

在外交官館內，也是一片淡風。一位將離任的外交官舉行告別招待會，他發現前來的中國客人和過去不同：他們不和坐在身旁的同胞說話，視若無人。而有些朋友則不敢來。

為了防範外來的影響，當局加強了傳統的信箱和電話監聽，最令官方頭疼的是傳真機(FAX)，由於民陣搞過FAX攻勢，安全部作過一次詳細統計，上門查閱每一部傳真機的管理情況，包括那些國內外單位知道你的傳真號碼。

中國特派員

但是，北京人仍然是消息靈通的。筆者接觸到的人透露，他們的消息來自收聽外國廣播。比如最近的東歐事變震動全世界，北京的所有媒介都進行封鎖，只報導一點人事變動，或某國強硬派的表態。



美國大使館日夜被安全部密切監視。

之類，完全看不到造成變革的反抗運動。但北京市民可以從美國之音VOA、英國廣播電台BBC和蘇聯廣播電台收聽到真實的消息。VOA、BBC有干擾，但可以聽到。蘇聯的華語廣播則沒有干擾，很清晰。

收聽「敵台」會不會被人匯報？一名青年幹部說：「不會。現在上面管不了這麼多啦，到底已經開放了十年，想完全退回文革也不可能，根本上是大家都不信那套神話了。」

崔國政烈士還活着

這種神話之一，是關於平暴亂的英雄崔國政的宣傳，一度說他被暴民吊死在天橋上。李鵬六月份接見了崔烈士的母親，但後來要崔母去領獎時，她拒絕去北京，據說寫了一封信給李鵬，報告她兒子已回到家。

崔國政是瀋陽六十三軍的一名排長，六月三日奉命向學生開槍，他卻帶領十名士兵脫下軍裝從北京坐火車溜走了。其實他們也沒有領到子彈，不知

●美國一再試圖解決方勵之問題，均為中方所拒，尼克遜到訪，巧遇萬聖節，北京大為緊張怕方勵之被弄走。

如何張冠李戴使他成了全國聞名的一烈士」。

一名醫生透露，六四事件中受傷的軍人約兩千人，失蹤的也有兩千人，多數是臨陣脫逃。下級軍人很多反對開槍，上級則很少有人反對，三十八軍軍長是其中之一，現仍軟禁在北京。

怕方勵之趁萬聖節逃走

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避難已經半年。現在中美關係雖有點鬆動，但仍未能恢復到六四之前狀況，方勵之問題自然是麻煩之一。據來自外交界的消息說，陳香梅及十月底訪問北京的尼克遜，都曾試探解決問題的途徑，美國當然希望方勵之夫婦離開中國，看中國方面要甚麼條件。但都不得要領，中國拒絕妥協。

據估計，在強硬派當權之下，方勵之問題還得拖下去，即使高層有人願意講價，現在也不敢出聲。北京市長陳希同在答記者問時，曾強硬表示，美國要帶走方勵之可以，條件是要同時帶走一百萬中國的貪污和流氓罪犯，陳希同並說可以等五十年，方勵之會自己走出來。

北京人相信，當局當然怕方勵之出國，有位朋友說：「現在民陣不敢打黨的旗號，等方勵之出去就敢啦！」十月三十日的萬聖節是天主教的一個紀念先聖的節日，西方人將有古怪的化裝晚會。公安部門十分敏感，據知情者透露，當局怕美國佬利用化裝術，趁節日氣氛將方勵之弄走。

於是美國使館周圍加派了便衣保衛，兩輛黑色本茨車二十四小時停在使館附近。據悉車內有安全部人員值班，每人一天一元津貼，在車內吃麵包。尼克遜在北京時向北京領導人表示，不想見到大使館處於被包圍狀態，所以現在軍警改成了民兵。一位西方記者透露，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中，不僅尼克遜不能見他，使館內的工作人員都見不到他。

老鄧精力只能集中十五分鐘

最近的高層動向，中國人關注的自然還是鄧小平和趙紫陽，而不是天天露面的江澤民。記者在北京聽到關於鄧小平退休的內部消息是，鄧有意和陳雲、楊尚昆一道退下來，但陳楊不同意。而鄧小平

由於胡耀邦、趙紫陽的下台，他在權力高層的實力和威望已被削弱了。而且，他知道人民反政府的情緒高漲，乃決定退下來，這一抉擇有以退為進之效，以後的壓力就在陳揚身上了。因此，北京有人覺得鄧還不是最壞的，很欣賞學運時的口號：「小平你好你好糊塗。」

至於老鄧的健康，觀察家們都留意到，鄧的老年態加重了，過去那種賊溜溜的眼神不見了。見過鄧的人說，跟他談話時，最初十五分鐘，他可以集中精力，以後就不行了。現在也僅毛澤東晚年靠姪女王海容一樣，靠他的女兒鄧榕給他傳話，翻譯的話他已聽不明了。

和海外一樣，估計老鄧的壽命也是某些北京人的話題，一位學者的看法是：「六四事件之於鄧小平，猶如林彪事件之於毛澤東，毛在林彪之後五年去世，鄧可能只有三年的命！」

最近捷克人熱烈擁戴杜布切克復出，是中共頑固派最忌諱看到的事。在此之前就有一個關於趙紫陽的傳言，說李鵬、楊尚昆集團為了防止六四事件翻案，趙必死無疑。一度傳趙心臟病入院，可能與此有關，據說趙從無心臟病史。甚至有胡耀邦死於非命的傳說。趙紫陽之子在內部被通緝的事，也有人傳了出來。



李鵬打擊個體戶不留情，這是北京被封的酒吧。

●北京有人說，六四事件之於鄧小平相當於林彪事件之於毛澤東，林死後毛活了五年，鄧可能只有三年的命。

通脹降低市面一片蕭條

經濟方面，在採取多種緊縮調整政策之後，通貨膨脹確實降下來了，生產過熱現象止住了，人民幣比過去值錢了。據悉，為了打擊外匯炒賣，年底年初幣值要一次到位，和港幣的比值定在六比十左右。而今年初上述比值達到一比一，海南島炒到一元二換一元港幣的地步（人云「港幣領導人民幣」）。

貨幣升值後，搶購緊俏商品如家庭電器的現象也止住了。但是，隨之而來的是市面蕭條，從北京到大江南北，筆者所見到處是「大拍賣」「大減價」。「出口轉內銷」的商品滿街都是，五元的可口可樂只賣八毛，還沒人要。有的商品以「終身保修」、「十年退本」的優惠推銷，也無人光顧。人們只願意把錢花在消費品上面，貨幣回籠率很低。奇怪的是，工廠不理市場，電器照樣生產。

在各級經濟機構會議上，計劃派又佔了上風，「按計劃有比例地發展」——這五十年代的公式又一再成為官方語言。稅務局的幹部過去滿臉堆笑的去討稅，現在又神氣起來，到處去挑毛病，動不動就罰款。個體戶有苦無處訴，上交五成半的盈利後，還要七折八扣，名目繁多的補稅一次就是幾萬、十幾萬，迫使不少個體戶關門大吉。

當局為了緩和矛盾，活躍市場，撥了一千億人民幣給各省及重點企業，同時許諾普遍加一級工資，「六四」有問題者除外。

血海深仇未曾沖淡

面對全國如此不景氣的局面，大陸人如何看來呢？一位酒店職員講了他的一位朋友的故事：「他從圓明園一號監出來，見我第一句話就是『中國有希望』。他說，六四後被抓的人就呆在公安分局，他們逼你在認罪書上簽字，簽了就叫五年，不簽就要挨打。崇文區就打死三個人。頂課住打，就有希望出獄。而被打得最慘的是公安內部參加學運的人。他說，監獄裏已關滿了人，大家擠在一起，腿都伸不直，每天只有兩頓窩窩頭。」

在高壓的政治氣候裏，私下敢講話的，還是大有人在。出租車司機見中國人不會多說一句話，見西方人用中文搭讪的，便可以聽到不少民聲，說「要審判李鵬」的都有。北京不時有放冷槍事件發生，其他地方也不平靜。十月一日江蘇徐州市中心大樓，竟有人懸吊大標語慶祝民陣成立，結果四人被捕，……這些都是北京戒嚴不敢解除的原因，官方知道，和市民的鴻溝已無法填平。

北京市民的六四血海深仇，並沒有因時間而沖淡，誰家死了兒子，誰家死了兄弟，知道的人越來

越多。連當初不滿學運過激的人也認為，「要打，要抓都可以，你不能殺人！」而官府內有人認為處理學運「戰略上正確，戰術上錯誤」的話也到處流傳，助長了那股等待爆發的憤恨之氣。

何時爆發？知識界受東歐的刺激過分樂觀，但不少冷靜的北京人都斷然地說：「肯定會出事！」都在等待這一時機。無論是變，是亂，還是反，反正不用幾年就會到來。

北京解嚴 內張外弛

何伯施(北京)

李鵬於一月十日宣布北京解嚴，歷時七個多月的戒嚴令終於結束。相對於過去七個多月的情况，撤消戒嚴令當然是好事，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國現時的氣氛和局面。

中共過去聲稱不怕外國的制裁，但今次撤消戒嚴令，很明顯就是在國外一定程度的經濟制裁之下所作出的讓步。據國內經貿界的人士告訴筆者，雖然在近兩、三個月來，一些國家已逐漸恢復與中國較高層的往來，間接取消了“禁止高層接觸”的禁制（例如美國、英國都先後秘密派遣特使前往中國，澳洲和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亦見軟化，連態度一向較強的法國也鑒於中國的抗議而取消向台灣出售護航艦），但每次當中國與他們接觸到經濟問題時，他們都表現出猶疑的態度。

知情人士還告訴筆者，最近還有人向中共提出，如果不盡快改變現時緊張的氣氛，今年秋天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就更難有號召力了。這個亞運會是中共極為看重的一次國際活動，招攬遊客的工作必須現在馬上進行，再晚就來不及了，如果這次亞運會搞得不好，不單聲譽受損，而且還會蒙受很大的經濟損失，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來說是承擔不起的。逼於國外種種經濟上的壓力，中共不能不考慮如何應變。

此外，鑒於羅馬尼亞的形勢和東歐的局面，中共也知道必須要創造一種寬鬆的氣氛，否則形勢對他們更為不利。在中共取消戒嚴令之前，侯德健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也提到，如果中共不撤消戒嚴的話，那麼很快就會出現類似羅馬尼

亞的情况了。他表示。這是根據他們在國內生活的感受而作出的判斷。

知情人士又告訴筆者，中共雖然已經下達文件，說撤消戒嚴令是因為國內局面已經普遍好轉和得到控制，但實際上在軍方內部還下達了另一個文件，指出“目前形勢仍然險峻，全軍必須提高警惕”，並要求軍隊繼續發揚保家衛國的精神，堅定不移地保衛社會主義江山。較早時候，全國人大還通過了國防設施的保護法，除了要保護邊防的國防設施外，其內容還包括對破壞其他國防設施的人的懲罰，這明顯的就是針對類似去年民運時破壞軍事設施的“暴亂行為”。此外，秘密警察和情報人員的活動最近亦見加劇。

戒嚴令雖然已經撤消，但情況並不因此而放鬆。現時還有很多現象，反映出目前問題之所在，而這些問題能否解決，正可看出中共當局是否有誠意接受人民的意見，改變現時的上下不交心的緊張局面。茲舉一些例子以說明之。（1）對民運分子和不同意見者的逮捕、打擊和壓逼仍不斷進行。較早時候，雖然當局釋放了一些有關人士，但他們都已備受摧殘。例如大半個月前才獲得釋放的高



“嚴”已解，愁頭未解。

的北師大講師），他出獄後就向外界證實了在獄中所得到的對待“非常差”（很多人遭到毒打）。很多曾經簽名支持學生或公開向當局上書的知識分子，審查後雖然獲釋，但都被軟禁（例如戴晴），不得隨便離家，離家外出都要通知監視他們的人。此外，還有很多主要的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仍然關在獄中，例如于浩成、張顯揚等，于浩成有時還要請家人送來食物，其情況可想而知。

（2）到目前為止，中共對“六·四事件”的性質仍堅持其立場。李鵬在宣布取消戒嚴時仍說：“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決定是及時的、必要的、正確的。”他們仍一意孤行，指稱去年的學運和民運是“反革命暴亂”。這一點是最根本的，絕非一朝宣布解嚴就可以不了了之。

（3）中共現時仍奉行“秘密主義”（這與保密完全是兩回事），把人民的知情權壓至最低。以最近開放給港澳記者到北京採訪為例，表面上已經比以前開放，但實際上中共方面事先已向記者打招呼，只准採訪當局指定的活動內容，而且採訪之後最好馬上離京，不要停留；此外，還要所有記者一起住在北京飯店，以便“統一安排”。對於限制記者採訪的七條規定，到今仍未隨着戒嚴令而撤消。再加上國家安全部人員的活動比以前明顯加強，“秘密主義”的氣氛並沒有因取消戒嚴令而有所改變。

（4）所謂堅持開放改革並沒有實際的行動。以最近舉行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會議為例，知情人士告訴筆者，這只是一個姿態而已。事實上，體改委中很多曾是趙紫陽用過的人，現在都已被打入冷宮，其中也有不少人被抄家，很多材料都被取走，現在仍不時遭到問話。據知情人士說，現在李鵬所重用的智囊班子是國務院政研室的人，也就是以袁木為主任的班子，體改委的功能基本上已是點綴的作用了。

中共仍靠槍桿子說話

李鵬在宣佈解嚴的同時，又大肆吹捧戒嚴部隊和武警，說明中共當權者並沒有吸取羅共暴政崩潰的教訓。

賀貞明

一月十日，李鵬穿著西裝，坐在塞滿精裝書的書架前面，發表電視講話，宣佈解除實施七個月之久的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看他那裝模作樣的模樣，與去年五月十九日在黨政軍大會上宣佈實施戒嚴時的兇相，完全兩樣。

那時，他咬緊牙根，下令坦克車碾壓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學生，並藉藉此機會來打擊他的政敵趙紫陽；現在，他擺出一副乞和相，目的是要爭取外國的諒解，取消經濟制裁，恢復正常關係。

李鵬是中共的恥辱

自李鵬下令血洗天安門以來，全世界所有有正義感的國家及西方各大國，大使部長級以上高官，都拒絕與李鵬往來，連香港報刊副總編輯級人馬最近也拒絕去北京與江澤民「談心」，他們亦不約而同地拒絕與李鵬見面。人們看不起李鵬，近日港督訪北京，他主動要求會見，堂堂一國總理，信譽跌到這種地步，真是中共的恥辱。

李鵬在中央電視台發表的「解嚴講話」，坦率承認「社會仍然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又認為「國內外敵對勢力不會放棄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這種可愛的坦白，比起中共官方文章一貫睜着眼睛說瞎話確有一點進步。但李鵬的通篇講話，仍修談「制止動亂」的必要性，吹噓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幹警「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而並非自我檢討，吸取羅馬尼亞共產黨暴政崩潰的教訓。

李鵬電視講話的第二天（十一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及軍方宣傳機器《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社論，支持李鵬的講話，這是李鵬豎義的保守派文字打手、應聲蟲的拍馬屁「傑作」，但從這些拙劣的宣傳文字，亦可以看出破綻來。

《人民日報》社論題為《中國穩定的重要標誌》，它把「六四」血洗天安門事件由過去一口咬定的「動亂」、「暴亂」，降級為「政治風波」，這是為了緩和反對派的壓力，亦為了討好外國人。

《人民日報》社論強調：「解除了戒嚴，並不意味著天下太平。國際反動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國內極少數頭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不會甘心於他們的失敗。」《解放軍報》的社論《穩定的標誌 正確的決策》亦是同一調子，說：「敵人決不會甘心於他們的失敗。」

坦承仍有「不安定因素」

中共當權者至今仍未從東歐共產世界崩潰的「大氣候」中醒悟過來，也不願意看到中國人民要求民主、自由、法治的「小氣候」而順應民意推行政治改革，而是仍然要堅持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一黨專政、人治，堅持「鳥籠經濟」，不顧人民死活，不尊重人民的意願。

為了維持其僵化的路線，中共當權者無力說服人民，只有靠槍桿子講話。在李鵬的電視講話及上述兩報社論中，都肉麻地吹捧軍人、武警、幹警血腥鎮壓學生的功績，並恬不知恥地引用老毛的話說：「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解放軍報》社論坦率地說：「國內還存在著其他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我軍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在解除戒嚴任務之後，決不可解除思想武裝。要堅定不移地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切聽從黨中央、國務院、中央军委的指揮……提高警惕，保持戒備……為維護社會穩定，作出貢獻。」

解嚴是給外國人看的

而戒嚴部隊雖然在北京街頭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是「武警」，以及穿便衣的「公安幹警」，他們對社會的控制，並不遜於戒嚴部隊，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這些專政人員的窮兇極

惡，是令人咋舌的，亦說明中共當權者繼續用槍桿子統治人民。

在宣布戒嚴之前，政治局開會統一了意見，決定採取一些重要措施，其中以下三項最重要：一、加強控制軍隊，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防止軍隊像羅馬尼亞那樣，反轉槍口；二、堅持清洗黨內不堅定分子及堅持「自由化」分子，防止黨內有人分裂，另樹旗幟，推翻中央；三、對地方治安，如發現有示威活動，必須馬上制止，不准擴散，這是吸取了天安門事件教訓，要把民運消滅於萌芽狀態。

由此可見，這次北京解嚴，只是技術性的措施，是做給外國人看的，並不表示中共當權者要順應世界潮流，走向緩和對話，推行政治改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陸再出現風暴，那就不是要求中共改革，而是要結束中共的統治。



楊白冰（左一）向部隊贈送「平亂」錄相帶和政治說教書

外鬆內緊未解先嚴

出爾反爾令人心寒

曾英

解嚴是中共為打破外交困局的舉措，但解嚴實際是「外鬆內緊」，「未解先嚴」，戒嚴部隊改編成武警部隊增多，北京地區的駐軍也增多，中共向美國客人承諾不追究參與民運的人，但過後又發文件稱不追究的只限學生。

外鬆內緊 未解先嚴

北京一月十一日解嚴，使去年五月二十日凌晨在北京部份地區實施的戒嚴終於宣告結束。世界各國政要對北京解嚴均表歡迎。美國總統布希認為這是「完美的一步」，「對中國進行的改革有與興趣的人士，決不會說這不是積極的做法」。英國外相達德爾稱：「這是一個好消息，此舉將有助於港人對中國的信心」。泰國總理說：「這可以改善中國的氣氛，對整個亞洲有好處」。反而是北京人對解嚴反應平淡，沒有特別高興的表現。

不過，北京知識界人士則有評論。他們認為，北京解嚴是中共當局為打破戒嚴，特別是六四造成外交困局所採取的重大舉措之一。但解嚴實際是「外鬆內緊」，「未解先嚴」。

據他們說，當局在宣佈解嚴前夕，已將約十萬名戒嚴部隊官兵改編成北京武警部隊，即是說，讓這些戒嚴官兵脫下解放裝，穿上武警裝，留守在北京。不僅如此，其他戒嚴部隊也多沒有撤回原駐地，而是屯紮在北京郊區。袁木一月十一日在外交部新聞發佈會上更稱，解嚴後，部署在北京及市郊的軍隊，較戒嚴前增加。傳說北京地區的部隊增至五、六十萬人，準確人數無法證實。

東歐劇變後，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李鵬在一次會上說，東歐的問題在國內有市場，主要在知識份子中有市場，很可能再出現動亂，一定要將動亂因素制止於萌芽狀態。據此，當局對可能引發罷工罷課、集會遊行等動亂的機關、學校等單位，嚴加控制，一經發現苗頭，立即利往。去年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運動五十四週年紀念日，北京一批高校

學生慶祝戒嚴令，到北京政府機關門外示威，結果有二百七十多人遭警方帶走。羅共黨魁壽西斯古十二月二十五日被處決之後，北京大多數校園都有鞭炮聲，一批高校學生在北京廣播大廈門口集會，要求徹底清查貪污大案，結果有七百多人被拘捕。

一面清除 一面安撫

當局吸取了去年夏天「動亂」的教訓，認為防止動亂的一項有力措施是使各級單位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為此，要堅決打掉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幹部，或革職或他調；黨員不能反對黨，否則開除黨籍。據說，這類幹部、黨員，即使是高幹子女，若無很硬的後台，也不能倖免。這項措施在新聞界、文藝界等敏感單位落實最快。最近，《人民日報》文藝部就作了人事調整，原《求是》雜誌社文藝部主任丁振海出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原天津《散文》雜誌社總編石英、新華社記者李德潤調任該部副主任；該部原副主任修俊傑被留任；原主任藍翎、副主任舒展則告免職。

《文藝報》上層也作了重大調整，由陳涌、鄭伯農出任主編，實行雙主編制；該報原副主編吳泰昌留任；原主編謝永勝、副主編陳丹晨、鍾藝兵被免職。陳丹晨和舒展都是筆者的朋友，前年我還分別同他們暢談過，他們對繁榮文藝的深遠見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相信他們是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幹部」。但在左風又起的今天，他們竟不能倖免，消息傳來，令人惋惜。而有的左王如陳涌之輩又走到前台，不禁令人太息！

與加強思想、組織控制的同时，當局也採取安撫政策。六四之後，經濟受挫，許多工廠企業對無

解嚴後，天安門城門外像下滿好奇怪的人羣，一名武警在附近站崗。



知名人士 未獲釋放

與解嚴同時，當局也決定分批陸續釋放民運人士，以進一步緩解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據日本一家報紙報導，在被中共當局逮捕的四千名政治犯（即中共所謂的動亂、暴動份子）中，有望獲釋的為百分之六十，約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反體制派的著名知識份子，而釋放的方式將分階段實施。一月十八日中國公安部宣佈釋放五百七十三名參與去夏「暴亂」而確有悔改者。此舉又獲西方國家歡迎。

但是北京知識界却不表樂觀。理由是所釋放者無一是參與民運的活躍份子和著名的知識份子。而據他們所知，前公安部草率出版社長兼總編輯、著名法學家于浩成，雖然一度監視在家，最後還是被投進秦城監獄。一度盛傳《光明日報》著名記者戴晴被釋放，也非事實。中國政法大學憲法教研室副主任、民運活躍份子陳小平，已經轉到北京監獄，顯然已被判刑。

最令知識界人士難以信服的是，去夏參與民運的絕大多數人，包括許多共產黨員和國家幹部，當時只是希望嚴懲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貪污腐敗行為，並非要推翻現政權和打倒整個共產黨，但却一律遭到清算。他們認為，把要求個別領導人下台，說成要推翻整個政權，把共產黨員同情和支持自己黨

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說成是反黨，都難自圓其說。

出爾反爾 令人心寒

據說，去年美國客人訪華時，李鵬曾向客人保證，對曾經參與民運的人們一律不予追究。大家以為政策放寬了。豈料不幾天就下達內部機密文件，說明李鵬的許諾只限於學生。言下之意對幹部職工還是要追究。如此出爾反爾，瞞騙外賓、瞞騙人民，怎不令人心寒！

據知情人說，這件事反映中共最高領導層對清查工作存在着分歧。知情人士還說，高層的分歧在其他方面也顯露出來。據知情人士透露，某大員一次說：「某大城市搞『樓高路寬』，資金是用攤派辦法得來的。」顯然有所指。過不久，李瑞環則表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要搞社會主義現代化，但不能搞僵化」。某大員主張把胡耀邦、趙紫陽有關的人員全部撤換。但江澤民反對，認為這樣做，打擊面太寬，不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某大員則指江澤民的做法是培植私人勢力。最近的中共中央文件一再發出「要求同存異，不要不服氣，不要讓矛盾繼續擴大，以免自取滅亡」的警告。其針對性甚明。是以某大員才作出回應，表示願意合作，願當副手。

又據這位知情人士透露：所謂「趙紫陽病重入院」的消息是不確的。趙紫陽沒有病，和他的家屬仍住北京，但已搬出中南海（按：據報去年十月號有報導），住到胡耀邦生前住的地方。胡耀邦家屬則遷往他處。



大批市民湧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細察坦克碾過的台階。

夢——的——傷——感——

北京最新新聞見錄

經濟垮台、中共可能孤注一擲攻打台灣
控制人民、籌發「終身社會識別號碼」
六四鎮壓、拘捕二萬二千開押三倍以上
留學新例、家長紛紛不讓子女讀大學

李遠

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悄悄地來到大地，浴血之後的大陸並沒有因為春的到來而恢復生機。經濟指數在繼續跌落，工廠停工待料，公司貨物積壓。街上的人們行色匆匆地從報攤旁走過，若有所失地掃一眼天空和周圍，賣冰機的老頭嘆着氣慢慢地推着吱吱作響的車，幾個大兵神情緊張地攔開人們鄙視的目光擠上擁擠的公共汽車，潮水般的自行車衝向沒有警察指揮的路口，撞擊聲和吵鬧聲伴着車鳴聲，在灰色的風沙中聚集着一種強烈的情緒——不滿和怨怒。

八十年代的春天，中國從上到下充滿了夢的喜悅和亢奮，城市的脚手架和鄉村中的集市，構成了這首夢幻曲的基礎音符，民刊、競選、平反、獎金使音調不斷上升，揭開了十年改革的序幕。然而這只是一個漫長而短促的夢，令人們從「六四」大屠殺的槍聲中驚醒，在坦克的轟鳴聲中顛抖時，他們的心碎了，痛苦和失望淹沒了夢幻，面對今天的中國，面對無數的工廠停工待料，面對着賣不出去的大白菜，面對着灰溜溜的解放軍，他們不再敢有奢望和幻想。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對什麼都不再激動，對什麼都不抱希望，對什麼都不再相信。

年輕的寄希望於房子、工資和出國，中年的鍾情於安寧和吃喝，老年的沉醉於棋牌和老年迪斯科。不要再對他們有更高的要求，當你生存在別人槍口之下時，也許找不到比這更實際的生存方式。他們是生靈，是活生生的人，人類最基本的渴望是生存，他們不想失去這基本的權利。

公子們不敢再惹事生非

我疲倦地從外地回到北京。北京人

似乎突然間熱衷於古典音樂，原本無人光顧的音樂廳天天人滿為患，李德倫不用再大張聲勢文化的失落，中央樂團的小提琴手已拉壞了好幾把。報紙雜誌被覽掉了一大半，電視電影題材單調，千篇一律的新聞和文件使人們尋找被允許範圍內的刺激。於是音樂廳、酒吧和私人沙龍就成了北京的時髦。

過去的圈子被打散了，體改所的人開始研究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有路子的則出國、買護照。還有一大批既不想出去，又不願沉默的人，只能重新組合，形成一個個新的沙龍，新的圈子。「周南這傢伙傍到了肥差，香港現在是最好的地方，進可攻，退可守，實在不行一走了之。」有人不顧周公子在場，半羨半嘆地說。

「李總理這次去蘇聯回來，不知海關怎麼處理無稅指標？聽說海關已經承受不了各部委的壓力，準備廢除三個月內出國人員不給無稅指標的規定。」某副委員長的公子說給在座的海關關長公子聽。……

這種不定期的聚會已不再輪流在各位家中，中國政局的微妙使公子們知道現在應該少惹事生非，老歸歸天之後的生死沉浮現在誰也說不準。香港有雜誌報道國內軍方一些少壯派要政變的新聞，着實使高幹子弟恐慌，但使一些知識分子興奮。雖然「總政」後來下了個文件闢謠，但這種事情每個人心中都有數。目前北京最有名的沙龍要數大北賓館小餐廳和四單的豆花飯莊。這兩處要吃的有吃的，要女孩有女孩，從來無奸細，去往皆熟客。素以台灣新上任海工會主任章孝嚴表姐自稱的豆花飯莊女老板劉則智，近來已不再拿鄧小平、楊尚

昆等在飯店的照片來吹噓自己，因為她不想讓人們對她有某種說不出的成見，反而公開承認認領領袖王軍濤、陳子明是她至友，臨離北京前還在她這兒「撮」了一頓。遇到老友台胞，還常常拿出當年蔣經國的一件皮袍照片當家寶，訴說她母親和堂弟的姐妹深情。豆花的情調華而不艷，交通方便而地處繁華之地的西單路口，當入夜北面的百花夜市燈火輝煌、人聲鼎沸時，吃客漸少的豆花飯莊則開始換來開車族的常客，奔馳、豐田、尼桑、切諾基等北京顯赫的名牌轎車停滿不大的停車場，把古色古香的豆花飯莊染上一層現代的色彩。

報紙文章一派胡言

走上二樓，竹子隔開的五間雅座秀麗迷人，身穿四川布衣的女服務員在劉老板的調理下，個個彬彬有禮，微笑勤快。熟人有熟路，每個週末九點左右，一伙人就有大半已經落座，一碗四川地道的湯圓上來，能侃者早已侃出聲：「諸位看沒看昨天的北京日報？河殤百勝搞完之後，徐惟誠還覺得不過癮，又開始進行深入攻擊，矛頭對準蘇曉康的籍貫了。」說者是在文化部工作的甄某，為河殤的發言，他沒少費過勁。他說着手裏拿出一份北京日報，手指着一段文章說：「看，就是這兒。文中說作者原來被河殤騙學中西的架勢『鎮』住了，後來聽說蘇曉康是四川人，立刻想起了四川的『把子客』。什麼是『把子客』？聽劉大姐講，她家鄉的土語。」

劉老板用沙啞但清晰的聲音解釋道：「四川人把吹牛、說謊、信口開河和『侃爺』叫『把子客』，也叫『扯把子』。到四川鄉下，站『壩子』，就是拉一個圈子，要麼套槍桿，然後就開始吹或賣的人就是『把子客』。」

甄某繼續道：「這篇文章把蘇曉康稱為『把子客』，不惜進行人身攻擊，並透露蘇曉康他們要在美國辦刊物。我看徐惟誠這篇文章完了以後還有什麼可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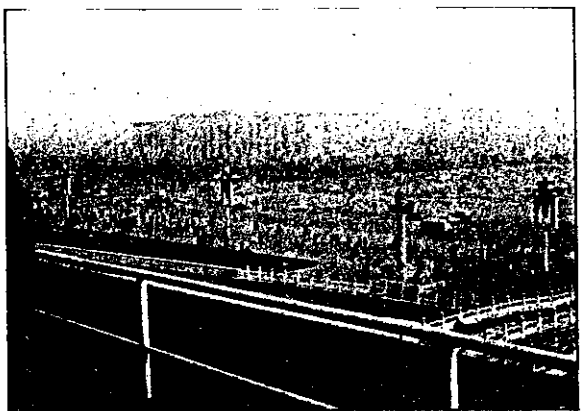
另一個戴眼鏡的人說：「瞎編什麼不可以寫？報紙電台在手中，還不隨自己編，老徐現在是常務副部長（中宣部），隨便寫點什麼，底下報紙總編保證放頭版。現在有個人專靠亂編亂造過日子，烏鴉記者，前幾天我看到新華社一個叫鄭什麼的記者，寫了一篇通訊，題目叫『雷鋒屬於世界』。居然聲稱美國西點軍校所有學生均以雷鋒為楷模，每位學生手冊上都印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的雷鋒日記摘抄。並活靈活現地說西點軍校校部大廳掛着五個全校師生所仰慕的英雄像，雷鋒是第一個。真是叫人哭笑不得。這則通訊居然登在全國各大報紙上，不知新來的美國大使李潔明是否會輩過去。共產黨的堂堂黨報辦通訊社，撒謊不怕別人O.R.D.A.T.O.，這個政府真是沒救了。」

沒辦法交待只好假話連篇

筆者插言道：「這算什麼？天安門廣場千萬隻眼睛都看到坦克碾人，李鵬袁木他們不照樣說天安門廣場六四之夜沒死人嗎？」

幾隻眼睛刷地一下朝我看過來，這種話也許說得太重，劉老板見狀馬上打圓場道：「他剛從美國回來，說話不知輕重，我們不談李鵬聊別的。其實李鵬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媽媽當水電部副部長時，他才從蘇聯回來，還是老娘給他找的工作。」

「其實剛才李先生說的對。」一個四十左右的人，猛朝我看了一下，說：「現在報紙沒真的可寫。寫什麼呢？國內現在在百分之卅六的工廠停工，國庫祇有三四個月庫存額，九〇年開始還借款，世界各國如不解除制裁，新的不來舊的還不上，他們沒辦法向老百姓交待，只好假話連篇。國際問題所有版面均減少，中央電視台國際新聞盡報導南非下雨，美國漏油的小事填時間。羅馬尼亞變字不提，東歐現在成為禁區。最近六八參考連蘇聯的國會開會情況的



■從天安門城樓上俯瞰，遊人稀少。

看來明眼人持異議，一位經濟學的博士慢聲慢語道：「我覺得中國經濟狀況並不像老說得那麼慘兮兮的。首先排除六四的政治因素，今年經濟增長雖然低於百分之十，大批工廠停工停產

荷一眼周圍，發現幾位當年活躍於北京經濟圈的聞人，他們都是體制改革的骨幹成員，現在有的調入體改委，有的則到大學教書去了。大北賓館現在是法國人包租的賓館，不對外開放，所以比較清靜。而且有許多旅居北京的外國學生，學者和外交、新聞圈的人常來。由於這裡是「租界」，不用擔心「查戶口」（公安局的人）的進來，所以這個沙龍的談話內容開放得多。一位在八五年鼓吹梯度經濟論的學者正談外債問題：「現在經濟狀況已經走進谷底，底坑了。從八一年到現在外債已有四百億美元，每年光利息就近一百億。而這個月庫存只有一百六十二億左右。西方國家一制裁，原來以為能用來借新還舊的十幾億美元泡湯，日本卅三億美元貸款的談判又停止，使大陸整個C.A.I.P.全沒了。不要說世界銀行剛動一點，就是所有西方國家全都恢復貸款，沒有六七年都緩不過來。加上內債一千二百億人民幣，赤字一千一百億，低增長率，按我哥兒們劉利華的話：『不要說六四有一天可能平反，光就經濟壓力，也夠那幾個人受的，好命不長。』」

好像經濟走入死谷。但別忘了這種低增長是我們在八六年所要求最響的口號，從八〇年到八八年，中國人民銀行平均每年多印五百億鈔票，物價上漲指數和通貨膨脹玩命上升，已經到了極限，如果沒有八九年春天的學潮，李鵬倒得更快。其實「六四」殺人救了李鵬政府，轉移了經濟矛盾，把多年來所追求報導也停了。怕影響高級幹部的情緒。現在中國又回到了文革之時，全球皆敵。美國講人權是帝國主義，蘇聯講多黨制是修正主義，鄧小平比老毛走的路還窄。毛澤東時代雖然全世界不喜歡他，可他畢竟還有十億子民頂膜崇拜。老鄧可好，裡外不是人，連大公子、二公子都有怨言。我看我們今天在這說這些犯不了死罪，也不會像文化大革命那樣關起我們來。」

也許他是軍人又是長者，屋內的氣氛立刻顯得更自由了。人們不斷地埋怨大陸新聞的枯燥和虛假。筆者知道李瑞環近日要求各省市在九〇年清明節前，再借掃「黃」為名，將各地不受控制或控制不力的刊物查封，不稱職的主編社長撤掉，以免「六四」一週年時再發生輿論失控的動亂局面。中宣部為了配合李瑞環的指示，專門抽調了「共產教師」曲孝、李燕杰等組成檢查小組，由文痞徐惟誠帶隊巡查各省區。同時在三月份召集全國各省黨委宣傳部長和大報主編到中央黨校中學習二個星期，佈置宣傳方針及針對蘇聯和東歐的變化，怎樣對中國老百姓宣傳。中共軍方總政治部為此還專發了一個長文件，要求全軍在近日內「掀起一場學習馬列主義的高潮」，以免軍心不穩。

所以，目前國內的老百姓根本不看報紙。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央電視台從二月初開始重新播放電視連續劇《末代皇帝》。人們竟都預感老鄧的末日快到了。

「六四」殺人轉移了經濟危機

一日，應老友之約到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大北橋的大北賓館參加Party。一進小廳門就聽到裡面吵成一鍋粥。坐下來一聽才知道是在爭論經濟問題。的低增長一月之間實現，應該是對搞經濟的人來說，目前物價增長指數為百分

之七點六是最佳幅度。這時候重登大陸經濟秩序是最好的起步。關鍵是這時候應該有個經濟有雄心的總理。李鵬肯定不行。民情、政情和他自己的能力與德性都不行，不用談他了。趙紫陽？也屬淘汰之列。性格懦弱，耳根又軟，打高爾夫球都打不好，何況執掌大陸。李瑞環更不行，哄哄街頭打牌下棋的老頭，捧捧花旦歌星的臭腳還是塊料，搞經濟他一邊站。」

「那非你莫屬了？」有人大聲道。他也不行，普林斯頓的墨水澆不開東方的雙鉞鈴，看來只有等李登輝來大陸競選總統了。」另一個人嘲笑道。宣傳備戰攻台轉移國內矛盾

一句話讓人們想起了馬上就要開始的縣鄉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的事。中共大概想起了十年前北京高校競選風潮，唯恐學生們再次借此鬧事，這回居然由中共中央下達了有關選舉換屆的文件，連最起碼民主的樣子也不裝了。文件內容連選舉權，要求七億選民不得有一「非份」之思想。議論一會兒選舉問題，又進入經濟問題的討論。素有「侃哥」著稱的大才子曹×聲稱：「經濟底谷狀況是李鵬的一道難題。但李背後有老鄧、陳雲，他們還有最後的殺手鐮——打台灣。最近楊尚昆巡視上海、福建，引起軍內上層注意，海軍已調動最佳裝備給南海和東海，海軍航空兵也將擴五換成殲十，這在軍隊換裝史上從來未有過，一下跨五代。從中蘇邊境下撤的部隊和雲南邊境的部隊正向福建轉移。戰爭，只有戰爭才是解決經濟危機的最後辦法。日本、德國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正是因為國內經濟糟糕而引起的。台灣是塊肥肉，外匯存底七八百億美元，只要準備充分，一個星期就可以拿下。關鍵在於怎麼找國際藉口。以前一段對台獨猛攻，就是給全世界，當然主要是美國聽的。最近楊尚昆接見南京軍區司令向守志時說：『美國可以打巴拿馬，我們也可以打台灣，而且比美國要佔理。我們是爸爸打兒子，美國是欺負鄰居的小孩。這段話的記錄給老鄧看後，大發雷霆，將楊叫去訓斥一通，所以最近楊放風要退休。其實老鄧最喜歡楊尚昆，只是覺得楊沒有國際經驗，

前一段放楊去中東玩一圈，目的就是叫他長點見識，誰想楊仍然沒長進，但楊尚昆的話實在是老鄧心裡的話，只是還不願過早吐露而已。挽救中國經濟，唯一省力的辦法就是佔領台灣。老鄧現在是在等美國的態度，如果西方制裁停止，大陸貸款有著落，台灣問題可以放後一步，如果西方仍然不鬆口，那對不起，十億人民要吃飯，只好管台灣同胞伸手要了。」

幾位軍界的朋友證實了軍內對台灣注意力，舟山羣島基地已擴大為海軍陸戰隊培訓中心，青海湖潛艇製造中心的產量大增，今年可出十艘。這是一個悲劇，民主的浪潮衝擊了大陸的經濟，走入底谷的困境使其想到鋌而走險。嗚呼，美麗的台灣島。

老人黨表態「多黨參政」

記者近日連續走訪了幾位在中共中央有關部委的朋友，從中得知，目前由於蘇聯戈爾巴喬夫公開提出多黨政府，迫使中共老人黨做出「多黨參政」的表態，其實就連這個口號的提出也會遭到以王震、薄一波為首的死硬派反對，陳雲在病榻上有氣無力地呻吟：「不能把幾十年戰爭所奪取的紅色共和國，成千上萬的革命烈士的鮮血所換來的社會主義變成修正主義，不能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為了這個多黨參政，老人黨分成兩大派，另一派是以彭真為首的「法制」派，他們借學運的結局，連繫東歐這段時間的巨變，提出艱難時期的工作方針和策略，在幾次政治局會議上爭吵不休。最後由於老鄧站出來表態，同意彭真的分析，使多黨參政出籠。據說老鄧是受到中央統戰部朱良搞的一份內參的影響。這份內參是由去年派出的大量情報專家，實地考察東歐和蘇聯之後，費心一個月在萬壽宮賓館內寫成的關於東歐時局的若干問題。文中對蘇聯戈爾巴喬夫的主義是「善於借西方的民主制約反對派，抬高自己的權威和權力，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鄧小平看後感觸極深，大概後悔自己沒能像戈氏一樣大出風頭，兔子落毛了鳥兒後面了，棋差一着。

鄧不愧為政場老手，他知道，如果中共繼續頑固抗拒和敵視東歐與蘇聯的民主浪潮，將使中國在東西方之間處於日益孤立的困境。同時由於「六四」大屠殺，使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內部面對十億雙憤怒的眼神和無數個怨恨的生靈，共產黨目前所處的困境並不次於八九年春天所處的局面，羅馬尼亞的結局時刻都會發生。所以，中共高層在痛苦思考後，決心在東歐變局中苦思冥想，打出「多黨參政」的牌，企望以此緩和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獲得新債還債。

進一步控制人身自由

但與此同時，國內開始大規模肅清異己份子，繼海南黎澍之後，鄧爾康等紛紛下台。八九年春天指揮不力的武濟司令李連秀、政委張秀夫被撤職，調入兩萬名屬城有功的解放軍充實北京武裝警察部隊。同時以掃黃為名繼續封殺自由性的輿論，並在中央黨校一部開始省長班，清洗地方首腦的頭腦。

在政策上，用江澤民的嘴到處宣揚中央集權的領導，要求各地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穩定社會主義經濟，加強黨的領導。企圖重新用黨專制堵塞由於十年改革所打開的自由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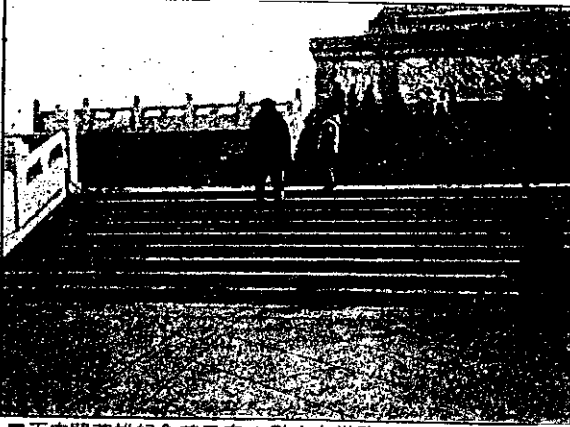
在行動上，為了防止出現東歐式的動盪，中國政府發誓要將所有的「不穩定因素」有礙在萌芽狀態。所以，各名牌大學一年級學生被送往軍營，使人想起了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政治學習每週三次，學文化大革命時期。關停四百家出版社和報刊，並準備利用今年三、四月份的基層人民代表換屆時，同時換班

各級黨委，「徹底掃除前一段時期存在黨內外的各種不利因素。」在策略上，宣揚民族仇恨，報刊電台不斷攻擊美國及西方的制裁和歷史仇恨，「激起人民對帝國主義和西方霸權主義的無比憤怒。」在軍備的同時，以台灣為靶子，對台灣政府進行攻擊，為攻打台灣製造輿論準備。

美夢被坦克碾碎

由於八九學潮源於大學生，為了從根本上「改造」大學生和知識份子，從今年春天開始，將有廿萬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研究生被下放到基層，而且強迫轉戶口，尤如二十年前的「五七幹校」運動，目的是懲罰大學生的叛逆心理。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布的大學生畢業五年內不准出國留學規定，在知識份子階層引起相當大的驚慌，許多人開始考慮子女的前途，有海外親友的人已不讓自己的子女讀大學，而是盡快復習英文和考托福，準備中學一畢業就設法出國留學。

為了防止大陸局勢出現東歐的情形，中共從意識形態到治安手段都採取了嚴厲的控制方針，生怕八九民運的餘波再起。這種整肅的氣氛對中國大多數老



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只有少數人在遊覽。



■國內新聞工作者正在粉飾太平。

百姓多少還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筆者在春節期間看到北京的市民熱衷於購物和大吃大喝，彷彿去年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從來未發生過。無數人和無數個家庭冒着寒冷的北風站在剛剛開放的天安門廣場前拍照留影，從那一張張微笑的面孔上絲毫找不到我們身在海外的民運人士臉上常常流露的傷感和惆悵。

中國人也許對政治太疲倦了。幾十年、幾百年的戰火和政治運動，使中國的老百姓追尋一種安定的環境，即使是多麼壓抑和痛苦，只要有飯吃，有衣穿也就夠了。中共正是利用了人民大眾的這一心態，瘋狂地抓捕異己份子，使這些人與百姓隔絕，逐漸消除他們的影響力，達到消滅的作用。

總之，十年的中國革命歷史終於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劃了句號。中國人再沒有十年前的那種狂熱和興奮，對未來寄予希望的美夢已被坦克車的履帶碾碎，留下的則是一片帶血的傷感和痛楚。這種內心深處的傷感和失望還有多久，沒有人知道。正如北京火車站一位中年售票員所說：「世界那麼大，而人生又那麼短暫，我們不會再對未來去做美夢，因為它已經使我們傷心了。今後的日子，我只希望有吃有穿，每天回到家裡能安安靜靜地看看電視，並在電視沒關之前睡着了。明天再說明天的。」^⑤

百姓半月刊1998/3/16

四、逃亡・捕殺



戒嚴前，中央曾明言軍隊不是用來對付學生的。屠城後，中央亦說過絕不秋後算賬。言猶在耳，但政府卻已準備就緒，頒下通緝令，展開全國性大規模捕殺行動。被視為「反革命份子」的民運人士只好四處逃竄，亡命天涯。

雖然，各處邊防加強戒備，刁陡森嚴，可幸部份民運人士畢竟能從「秘密管道」逃往海外。

屠城後，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那些在牢獄中受逼迫，與及在逃亡路上顛沛的義士，定不會被人忘懷。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195	大捕殺的內部策劃（重陽）	解	7/89	17/18
196	敢於挑戰權威慘成階下囚	亞	25/6/89	9
196	王丹這孩子真硬（吳越）	百	1/10/89	53
197	黃德北講述營救王丹及被捕審問經過（黎加路）	百	16/7/89	5/6
198	通緝令下的知識份子（施華）	九	7/89	25
198	知識份子面臨大劫難（傅曲）	鏡	7/89	58
199	中華精英逃亡落網（張結鳳）	百	16/7/89	7/8
200	精英大變節大叛逃（柳彥）	解	7/89	19/21
201	在白色恐怖下（常川）	爭	7/89	11/12
202	算帳何須到秋後（承嬰）	九	7/89	26/29
203	留學生返國內支援學運被捕	民	7/89	31
204	大屠殺大追捕下的勇敢中國文化人（曾慧燕）	百	16/7/89	10/11
205	大陸文化人再遭劫難（曾慧燕）	百	1/8/89	36/37
206	搜捕浪潮下的深圳之行（王路）	南	8/89	86/89
207	六四後的大浩劫（蔡省三 曹雲霞）	爭	9/89	45
208	中港澳邊境大追殺（曉沖）	爭	8/89	17/18
209	大追捕下的廣東（曉沖）	爭	9/89	18/19
210	廣州公安局嚴刑逼供（孟歌）	解	10/89	49/50
211	中國獄中酷刑知多少？（李重生）	百	1/10/89	56/57
212	新通緝令另有所謀	解	11/89	8
212	北京危城（黎加路）	百	1/10/89	57
213	逃亡與反逃亡面面觀（星野）	解	9/89	59/61
214	中共政治局六常委答中外記者問（節錄）	廣	10/89	60/62
215	「河殤」作者逃出大陸譴責暴政（遠志明）	百	15/9/89	3/4
216	黃德北和侯德健的屈辱（韋刃）	解	10/89	40/41
217	我是怎樣逃離中國大陸的——工自聯副總指揮岳武自述	中	1/90	31/32
218	大陸民運人士逃亡故事（三則）（蘇陽）	九	1/90	86/88
219	北京傅柴玲被捕關秦城監獄·戴晴于浩成仍有機會被算舊賬（黎加路）	百	16/12/89	63
220	鏡子裏的真實故事（金戈）	當	10/2/90	17/18
			17/2/90	30/31
222	一個被抓大學生的自述	九	2/90	126/127
223	追尋外逃的「秘密管道」（曉沖）	爭	10/89	14/16
224	安全部在深圳設監聽站（李豐）	當	3/2/90	7
225	珠海澳門「秘密通道」的來龍去脈——兼談民運人士外逃經過（堯士）	百	16/2/90	6/7
226	民運秘密通道如何被破——中共黑手伸向海外	百	16/2/90	3/5
227	深圳國防機密大曝光	解	3/90	9/10
228	流亡生涯多是夢——記六四後出逃的作家和知識份子（老盛）	解	3/90	40/41
229	中國大逮捕報告（亞洲觀察）	中	10/89	75/79
			11/89	93/94

殺盡「暴亂」份子 滅絕民運火種

大捕殺的內部策劃

·重陽

據中共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自六月四日屠城截至六月底，被中共公安機關拘捕和自首的涉及民運的學生和平民已達二千多人，其中判處死刑已執行的二十七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一百多人。並在全國範圍內取締了幾百個民運團體……

現在，鄧小平業已基本上控制了大局，已無學生公開上街喊打倒鄧小平了，但是鄧小平手上鎮壓的大刀依然在四處揮舞，毫無「收手」之意。顯然，屠城後的大捕殺，是中共作為「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具有近期和遠期目標的戰略部署。

「快捕快訴」穩定局勢

六四屠城後，令海外華人和西方世界反感的是，中共當局不理會他們對民運份子免除死刑的呼籲，一意孤行，照殺不誤，並激起了西方世界對中共進一步的憤怒，進行了進一步的制裁行動。

在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中共對自己的「一意孤行」將會引起的後果，當然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想到。但是，在他們衡量利弊的天平上，他們認為這是次要的。莫說說政權丟了外國給再多的錢也沒用的話，正是他們權衡利弊的最好注腳。

事實上，大捕殺就是六四屠城的延長。據悉，就像中共高層對屠城有分歧一樣，對「快捕快訴」也有不同意見，較溫和的一派，主張要遵守「秋後算賬」的語言，對廣大羣眾網開一面，基本上不予追究，只經過一般的學習，提高認識，作自我批評了事，便一方面可贏得全國廣大羣眾支持，一方面也能安撫學生和知識界，做他們的轉化工作。這一種意見，主要是江澤民和宋平、李瑞環等政治局委員提出。

但李鵬、楊尚昆和喬石持反對意見。李鵬認為，「對反革命的寬恕，就是對鎮壓反革命暴亂中犧牲的解放軍官兵的不敬，就是對革命的犯罪，甚至可以說是對犧牲了幾千萬人打下的紅色江山的背叛。」喬石說：「現在，幾千支槍、幾十萬發子彈流落在外，這些槍枝彈藥落在反革命份子手裏會怎樣？現在天安門廣場

雖然收復了，但是北京城裏打黑槍的事時有發生，各地打砸搶的事還接連不斷，現在就講寬大，壞人乘機又起，怎麼辦？至於，以前講不秋後算賬，是指或戰前，不能作廢自縛。」

經過一番爭論，李、喬佔了上風，明確一定要迅速展開全國規模的鎮壓反革命份子、打擊動亂份子行動，要以「絕不手軟」為堅定原則。但是鑑於這次屠城在百姓中間、黨內、決策層內積怨甚深，李鵬也作了少許讓步，也講要嚴格區分兩類矛盾。

很快，公安部就落實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的精神，發出了「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公告，宣佈了取締非法組織，追究民運中刑事犯罪的八項規定。之後，又提出了「快捕快訴」，不糾纏枝節，只要犯罪基本事實弄清即判刑。北京的林招榮等七人，上海的徐國明等三人，很快就成了刀下冤鬼。

扭轉輿論導向

很明顯，六四後幾天的捕殺首先是為了阻嚇平民，進一步控制和穩定局勢。除了公安部公佈的八條規定外，據悉，內部又對「反革命暴亂分子和動亂分子」劃分三類：第一類是在事件中設置路障，焚燒軍車或公共汽車、阻攔軍隊入城，與軍人打鬥、騎電單車傳遞訊息的工人或其它市民，捕到後即行處決。北京、上海已槍斃的十人即屬此類。

第二類是散播謠言，張貼海報，偷竊和散播黨和國家機密，攻擊黨與政府、軍隊及其領導人、包庇隱蔽「反革命暴亂分子」，知情不報者，按情節輕重處理，原則是先嚴後寬，一般不作刑事起訴，特別嚴重者才拘捕。但現行犯或拒捕，則格殺勿論。

第三類是煽動點火的大知識分子、獻策獻計的教授、講師，以及在北京組織靜坐絕食和鼓動外地學生到北京的學生領袖，各機關單位組織進行的領導人士，一般先拘禁審訊，追查其他有關的共謀人物，尤其是尋求「幕後黑手」的證據。

從這個劃分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對各類

民運分子的打擊是有所區別，對知識分子以外的其他階層的「暴亂分子」，中共是「即捕即殺」，一點不猶豫，主要是基於：一、主要的打砸搶分子都是這些人，殺他們一般百姓不會反感甚至擁護；二、顯示政府對知識分子還是寬大，藉以拉攏；三、更主要的是起震懾作用，將各地蠢蠢欲動的社會渣滓、各種刑滿釋放分子以及亡命之徒鎮住。四、為六四血腥鎮壓尋找根據，用這些不是學生的刑事犯罪栽贓於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改變前一段的輿論劣勢。

為了充分證明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中共當局還精心策劃了一幕抓拿十二名台灣特工的醜劇，以證明學生是被騙，台灣特工是操縱學生的「黑手」之一。此舉遭台灣當局抨擊，指出台灣早已不使用那些低劣的隱形藥水。據權威人士分析，這些「台灣」特工中確是有假的，也有些同時為台灣、中共服務的兩面間諜，還有些確是台特但中共原想「放長釣大魚」不想馬上抓的，但為了找借口，也只好犧牲了。

不可否認，中共「殺頭」政策確是收到了威懾作用，但正如中共常說的「壓迫越大反抗越大」。民運分子並沒有完全屈服，六月二十七日的滬杭和蘭海列車爆炸的事件就是明證。

不給反對組織生存機會

從中共這次大捕殺看，下手毒辣的第三處是對各種自發成立的民運組織，非置於死地不可。

鄧小平、李鵬和楊尚昆等人在幾次講話中，都強調這次學生運動，就是企圖建立反對黨、反對派組織，與中共唱對台戲，進而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的目的。

追溯鄧小平一九七九年開放改革以來的講話，他對共產黨獨裁的體制是非常固執的。他起初十分欣賞波共對團結工會的強硬態度，後來又對波共的妥協不滿，並指責波共這次在大選失敗是「投降主義」的結果。他非常固執地認為只要中共稍為退一步，讓反對組織合法存在，便「黨無寧日，國無寧日」。因此，在學生絕食前屢屢要求中共與其對話，李鵬死都不答應，就是不承認「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生怕由此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在全國引發一連串的反對組織。

據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層曾專門開會研究這一問題。他們事實對學生的反對組織並不

十分擔心，因為學生流動性大，組織紀律性差，而且對社會的經濟生活影響不大，很容易自生自滅。他們最擔心的是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工人反對組織，因為工人組織紀律性強，集體主義精神強烈，組織較為持久，而且是國民經濟生活中的主體。學生鬧事頂多不上課，工人一鬧事，國家就傷筋動骨。因此，中共當局對工人組織更敏感於學生組織。在北京六四屠城前，當局就向「工自聯」下手，抓了三個頭頭，後來迫於工人的壓力，又不想影響後來的天安門清場計劃，才使出緩兵之計，先縱再擒。

滅絕民運火種

「斬草除根，以防東山再起」，六四屠城後，這句話經常掛在中共決策人嘴邊。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是中共大捕殺的近期目標，那麼斬草除根，滅絕民運火種，就是他們的遠期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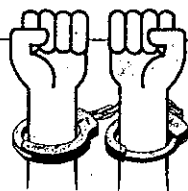
從鄧、李、楊最近一系列的講話中可以看到，搞打砸搶的主要是社會的流氓，而策劃和組織領導學潮的則是知識分子，而且並不是那些乳臭未乾的學運領袖，而是學術界、理論界、新聞界中的精英；不是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而是鮑彤、嚴家其、劉曉波等人。從前面的公安部內定原則中可見，中共當局對他們是絕對不會放過，對「首要分子」是一定要抓。但如何判刑呢？將會慎重考慮。因為中共一方面考慮這些人對社會影響較大；另一方面，中共認為這些人的危害性不在於打砸搶，而在於散佈民主思想。陳雲曾說：「泛濫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比燒軍車、燒坦克危害更大。但是搞反革命分子易，槍斃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難。」所以中共高層決定，對這些知識分子主要不是從肉體消滅，而是肅清思想，這是「以防東山再起」的根本途徑。

此外，中共還認為，北京有禁止遊行鬧事的規定。但沒有違反規定後懲罰的法令，也是這次鬧事的原因。因此要借這次「快捕快殺」，為制定這方面的法令提供根據，以作長治久安之計。

總之，從組織上、思想上、法律上，滅絕民運的火種，是中共大捕殺的最終目的。

清算對象

敢於挑戰權威成階下囚



北京當局上週展開大規模行動，搜捕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工人領袖以及知識分子，其中一些人已被捕，部分知識分子據聞已遭拘留，但未來當局證實。此外，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的個別智囊也可能被捕。以下是部分人士的背景簡介：

任曉町，四十五歲，畢業於北京建築工程學院。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期間，組織「中國人權同盟」，並起草《中國人權宣言十九條》。同年四月被捕入獄。

嚴家其，四十七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學運期間多次簽署公開信，要求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審議李鵬、楊尚昆的戒嚴決策，並發起組織「知識界聯會」。於六月四日中午離家後失蹤，可能已遭拘留。

劉曉波：這「神秘人物」帶走



鮑彤，一九八四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七年調任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政治秘書，同年十一月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一九八八年四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以鮑彤為首的趙紫陽智囊班子，在學運期間被指為「動亂背後的黑手」。現下落不明，可能已被捕。

劉曉波，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年

任曉町：再次因民主運動而被捕



前曾往瑞典、美國進修，於四月十七日北京學運高潮時返回大陸。本月六日送友人回家途中，遭一輛汽車攔截，被架上汽車帶走。劉曉波返大陸後曾積極支持學運，是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的顧問。六月二日與另外三名知識分子在天安門廣場開始七十二小時絕食靜坐行動。

郭海峯，二十三歲，北京大學學生，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北高聯）常務秘書長。六月三日至四日

被軍民與軍隊裝甲車衝突時，被軍隊當場拘捕。
周鋒鎖，二十一歲，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北高聯常務委員，六月十四日在西安被捕。
熊森，二十四歲，北京大學法律系代培研究生，這次學運領袖之一。六月十四日在銀川至包頭的客車上被捕。
劉強，二十六歲，印刷工人，北京工人自治聯會領導之一。六月十四日在內蒙古武川縣被捕。

亞洲周刊 89/6/25

王丹這孩子很硬

吳越

朋友因事到北京，他原與北京市委一中層幹部有多年交情，遂以海外關心的幾個問題相詢。他日前返港，把談話內容告訴我，謂北京市民均希望海外能了解他們。以下是談話的要點。

問：北京市現在一般的情形怎樣？

答：北京現在表面上很平靜，其實老百姓和戒嚴部隊兩方面都很緊張。陳希同、李錫銘為了向李楊集團表明心跡，強迫各單位慰勞屠殺部隊，派款派物，層層分攤，老百姓和單位幹部均叫苦不迭。三十萬大軍現大部駐在城郊，但一個兵不撤。北京市食品供應很緊張。為修補形象，軍隊命令士兵做好事，像打掃衛生之類，市民對此皆無反應。北京姑娘特別討厭大兵。那些大兵站崗時，兩眼盯着女孩，北京話是「行注目禮」。所有市民都痛恨李（鵬）楊（尚昆）政權，但又要保護自己，大家都從一個極端角度，戲劇性地表達自己。開會時表態，故意說李鵬平亂有功，不要當總理，應該升總書記。回家則罵李鵬八輩子祖宗。大家都流傳一句話：「走着瞧！」

問：北京的秋前算帳，現在算到什麼程度？

答：現在搞人人過關、人人登記、人人自危。經常有人失蹤，被抓了，秘密逮捕、秘密處決。一個十五歲小孩被指燒坦克，秘密槍殺了。那個單位在學運期間支持學生最力，勞軍派款就分攤最多。當局雖然夠狠，但基層幹部和羣眾抵制，清查並不順利。單位領導若出賣

下屬，下屬則以牙還牙，來一個反清查。市民佔用舉報電話，舉報陳希同、李錫銘、李鵬之類，這是報公仇，也有利用舉報電話報私仇的。弄得公安部門啼笑皆非，不勝其煩，不斷更改舉報電話號碼。當局以為市民還擁護它，才有電話舉報之設，可見這個侏儒政權同時是狂迷者。

問：但侏儒的狂迷離不開恐懼。到底戒嚴令什麼時候解除？戒嚴部隊什麼時候撤走？

答：短期內有幾件事令當局寢食難安，一是四十週年國慶，一是亞運會，還有鄧小平的健康。戒嚴過冬是肯定的了，已調來大批軍隊過冬物資。為了掩飾，正把部份戒嚴部隊改裝為武警，其餘大部駐到郊區待命，絕不會很快撤走。戒嚴恐怕會繼續下去，與這個政權共存亡了。

問：「血光敢死隊」聲言要殺來華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北京市民對此有何看法？

答：北京市民希望各國以各種方式制裁李楊政府。這時任何給李楊政府經濟上或其他形式援助的國家或個人，都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都不是對中國友好態度。日本商人的無良無耻，應該受到懲罰。中國老百姓願意過幾年苦日子，也要李楊集團盡快倒台。

問：外間報紙報導王丹被捕後被迫供出一些關係，引致其他人被捕被整，而中共喉舌亦以王丹所供作整治知識分子的材料，請問這消息是否屬實？又，柴玲等學生領袖的處境如何？

答：中共專政機關之殘暴人所共知，文革時期已經有很多揭露，所謂「迫、供、信」。中共的特務又非常

奸詐，最會使用離間計。說王丹被捕後供出誰誰這種消息肯定是他們捏造出來的。事實是，據可靠消息，王丹這孩子很硬，一直和審訊他的人辯論，絕對沒有供出任何人。被捕的知名學者包遵信也是這樣。中共特務對人民生活的監視，在民運期間對學生和民運組織的滲透，完全可以想像；而他們的卑鄙，亦有目共睹。在這種時候，發表這種未經證實的消息，我很替香港的報界難過——這家報紙至少這次被利用了。北京市民都有一個共同想法：柴玲或任何一個被通緝的學生半夜敲開任何一戶人家的門，她（他）都會得到全家的保護。北京人絕不會向惡勢力屈服，特別是，當他們清楚知道這惡勢力很快就要垮台。◎ 百姓半月刊 1989/10/1

黃德北講述營救王丹及被捕審問經過

黎加路

「每一個有良知記者都會去見王丹……」

告知王丹脫險二法

黃德北

北京屠城後一個月，學生領袖王丹有消息了，他尚在人間，但身處險境。

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在七月二日上午約九時，收到他的國內司機王楊電話，叫他「馬上上他家，王丹的事」。他和同事徐曉說了一聲，馬上便出去。較早前他留下與王丹聯絡的方法，而當時仍在北京的中國記者並不多。

他住在和平飯店多天，不覺得電話被竊聽；他在學運前認識王丹，和他有感情，他說在公共場所會去。

黃德北抵達司機家，空無一人，等了一會，司機匆匆回來，說他拉了王丹來，在附近等他，黃德北一楞，因他根本沒想到與王丹馬上會面，他以為在司機家候王丹電話或消息。

黃德北出來時，自覺沿路沒有人跟蹤，但他估計做錯了一事，他在和平賓館對面的王府飯店乘車時，告訴了出租車司機他的目的地。

黃德北與王丹會上面，同時發覺有人監視，便跳上司機的載客小貨車，邊逃邊談。王丹說他剛從南方回來，在北京之外，他不斷變換藏匿處，最後棲身地因朋友的父親回家，不得不離開，他表示被捕後利害，他希望黃德北逃出國外，當時，黃德北告訴他（一）是通過外國大使館，但風聲緊，外國使館未必願意冒大風險，危險性也高；（二）是通過香港的「地下渠道」，他相信憑徐曉的聲名，可聯絡上，但需時至少一週。黃德北建議包下國際大廈房間，讓王丹暫棲，但王丹表示害怕……其時，他們發覺一輛摩托車及一輛小轎車尾隨吃緊，黃德北香格里拉飯店下車，心付可引開及分薄跟蹤力量，臨行前叮囑司機「車王丹到愈遠愈好的地方，安全才再聯絡他。」

精神磨折迫供認罪

黃德北並沒有成功地引開跟蹤記者，他根據當時雙方車速，差不多可以肯定地判斷二人落網。七月三日上午，過了和司機約定二十四小時內聯絡的限期，黃德北心想沒希望了，便趕快和徐曉到王府飯店發稿，把這事公開，並打算到公安局，交涉王楊的下落。

中午時分，黃德北兩人發完稿，從王府飯店出來，黃德北被等候多時的持槍武警公安，強行架走，徐曉被攔著，她大喊：「你們不要這樣，把我一塊帶走。」

黃德北問公安是「誰？」要求看證件。公安答：「你不需要知道」，黃德北問：「至少請說是什麼機關？」那人答：「要讓你知道就知了」，黃：「這樣做不合法！」那人用力使勁地扭黃的頸後，反問黃：「這樣做不合法，你趕快說！」黃疼痛難耐得低頭彎腰，還掙扎說：「不要動粗」，另一人動止動粗並叫黃不要囉嗦。

黃德北被帶到頭，他感覺車子穿過樹林，兩小時到達市郊山區的一幢兩層高的拘留所。六小時後拘禁他的人才說黃德北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由國家安全局拘問。

黃德北單獨囚於一室，兩名人員不分晝夜看管，八天拘禁期間，每天被問話三、四次，每次兩三小時，但沒受到體罰追問，早期他可看報，總共洗了一次澡，刮過一次鬍子。有一天，攝影隊來拍攝，首先是進餐時，端來了三個菜——炒蛋、蒜苗炒蛋，是最多菜的一次；問話時，黃故意說忘了悔過書罪狀，要來悔過書，拿著，後攝影隊破他的用心，要他放下悔過書。

黃德北每天都要寫悔過書，國安局羅總了四大罪名：（一）協助及策劃王丹外逃，這個他感到「光榮」，很早便承認；（二）戒嚴令下採訪，他就這罪爭持很久，因上百名中外記者也同樣「犯」了；（三）失實報道對「動亂」及「暴亂」起了煽動作用，這條他覺得無稽荒謬，因台灣報紙進不了大陸，談何煽動！最後他還是接受，並檢了兩個極端例子來說明自己失實——承認天安門沒死人，及惡意攻擊李鵬。

最後一條指他為台灣特務，他堅拒承認，因他不是！若承認了，將牽連很多交往過的人。

不相信和平飯店電話受監聽

七月十日晚上，公安人員暗示他的態度不好，指他仍不悔認第四條罪，並暗示坦白從寬，他有機會被釋。他簽下了接受的審訊是「文明及依法辦案」，「他的生活得到很好的照顧」。

黃德北說：作為記者，他沒有什麼害怕的。他和徐曉屠城後留在北京，都準備了坐牢，徐曉半開玩笑說：二人都不結婚，關兩年沒事。王丹出事後，徐黃相約，什麼罪名二人一同承擔，因徐是首名前往大陸採訪的記者，希望有助減低受罰。

公安人員盤問他的家庭背景，家人的個人資料；徐曉的個人資料，以至他八八年二月開始來北京採訪的人與事都一一細問。

公安人員天天要他說與台灣的關係，要他說接觸過的人，怎樣反共產黨，迫他承認某人對他這樣那樣的話。他當時覺得很難受，希望盡快了結這審問過程，一是把他關下獄，一是讓他離開北京。

公安人員把他與方勵之的合照相片、部份人家給他的名片帶走，並把他的通訊錄、筆記簿子拿去複印。他感到很難受，公安對他說，誰說了什麼什麼，刺激他承認或舉出某人也說過什麼什麼，迫人互相誣陷。

公安人員以他的司機的口供，向他對證，他估計司機已落網，也基於此，很多事情，如王丹學運期間，有一次曾到他房間進食洗澡，並借了另一香港記者房間，與溫元凱單獨會面，黃德北都和盤托出。

黃德北對王丹被囚（官方仍未宣佈，但國安局跟他說了），有些內疚，因王丹向他求救，他讓王丹被捕，司機也牽涉其中，他感到很難過。

他強調「那個是王丹」，他想「每個有良知的記者都會去」，他也承認事實不一定跟「善良的願望」一致，不一定有好結果。

戒嚴令頒下，以至屠城後，黃德北曾說過「與北京共存亡」，堅持不離開崗位，他中段短暫離京回台，補續發證。

黃德北於七月十一日被中共遞逐出境，三年內不得回北京，他說沒有採訪場地，他可能暫不作記者，專心寫他的博士論文。

他至今仍相信國營的和平飯店不一定裝有錄音竊聽儀器，公安追尋到他與王丹會面，可能是跟蹤到王丹。他向外透露與王丹會面的逃離方案，是因在拘禁時已寫了材料交待。

北京學生看不過當權者的猙獰面目，六四屠城，學生忽以自己寶貴的生命向外界揭示了殘酷的現實。王丹以至數以千計的學運分子被白色恐怖籠罩的同時，海內外人士似乎應該警醒，不應再以民主法治國家的常識去推想大陸形勢，不然發生更多「良好願望」的悲劇。

通緝令下的知識份子

施華

關於知識份子，緝捕名單增至二十人，已知被捕的有……，已逃出國境的有……，大屠殺前離境的有……

北京大屠殺之後，接下來是大逮捕，然後是大處決。

嚴家其(屠城之前，北京)

中共當權者目前的主要緝捕及處決對象，是搞組織的工人、學生、知識份子，包括工自聯(工人自治聯合會)、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外高聯(外地高校學生聯合會)、北知聯(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的主要負責人。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在這次民主學運中有積極表現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



據聞，關於知識份子，當局已有了二十人的名單，其中為首的是「黑名單」，後又增至二十人。其中為首的是發表「五一七宣言」的嚴家其、包遵信、李南友(記者)，在這第一批名單中的還有萬潤南(四通集團總經理)、程明遠(北京大學講師)、陳一諮(體制改革所所長)、王軍濤、鄭義、蘇緯、曹思源、李陀、遠志明(《河殤》作者之一)、趙瑜(報告文學作家)、李洪林、于浩成、蘇紹智、甘陽、蘇曉康、劉再復、李澤厚、劉曉波、高瑜等等。

目前已知被捕的有劉曉波、高瑜、曹思源。已逃出國境的有嚴家其(及其夫人高阜)、萬潤南、蘇緯、甘陽、蘇紹智，還有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人。

在大屠殺之前離境的，有李陀、北島。劉再復原定參加六月初在新加坡舉行的文藝營，但臨時未見出席，相信仍在大陸，下落未明。其他被通緝的知識份子，分別躲藏了起來，情況未明。

「龍的傳人」侯德健，大屠殺的當晚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還扮演了與戒嚴部隊交涉的角色。據悉他已受傷，正在醫院中。當局對他還未採取行動，可能因為他既是從台灣回歸的歌手，又沒有參與有關「非法組織」的原故。他的妻子程琳，則已在大屠殺後離開國境。

老一輩的書法家與畫家黃苗子、郁風夫婦，曾在香港電視的訪問中，言詞激烈地批評當權者及袒護學生。據知他們兩人已在大屠殺後到澳洲探望兒子去了。

這批知識份子中，處境最危險的是嚴家其和包遵信。嚴家其發表「五一七宣言」，把鄧小平指為末代皇帝。戒嚴後又發表「告李鵬書」。他又組織了「北京知識界聯合會」，並任會長，更在廣場辦起了民主大學。直至六月三日晚上，他還到民主大學演講。傳說他為趙紫陽的智囊，實不可信。在八七年反自由化時，趙紫陽曾保過他，但兩人並無特殊關係。嚴家其基本上是獨立的學者，在這次民主學運中備受尊敬。

據說，嚴家其去年因為提過聯邦制，被鄧小平說成「比劉賓雁還壞」。最近鄧小平又有新的評語：「嚴家其比方勵之還壞。」嚴家其逃離之後，通緝犯中「最壞」的大概要數包遵信了。

至於另一位在民主學運中也是常常出鏡的戴晴，據說只有她還留在自己家中，沒有躲起來。這可能因為她的出身(葉劍英養女)有關，另外則是因為她這次民主學運中，一貫持較為穩健的觀點，以免免犧牲為主。她的意見雖未被學生所接納，但已給當權者一個「不算激烈」的印象了。

在通緝二十一名學運領袖之後，於六月十九日，中共又在機場、車站等公共設施的地方，張貼通緝中國著名學者「七君子」的命令。這七人是：萬潤南、嚴家其、程明遠、包遵信、陳一諮、王軍濤和蘇曉康。萬潤南、四通集團公司的董事長，被指控在北京民運期間，提供物資，支持學運。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高過《文革十年史》和《首腦論》，是中共黨內批毛的健將。曾被延聘為趙紫陽推行行政體改的顧問。在學運期間，非常活躍，聯繫其他知識份子發表了數封公開信，要求中共採納並推行民主化的建議。五月中旬，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期間，嚴與包遵信、戴晴(作家、葉劍英的乾女兒)等人到天安門廣場，斡旋於學生和中共政府之間，試圖勸說雙方讓步，但未有結果。陳一諮，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是趙紫陽的智囊，對大陸農村的經濟改革作過一定貢獻。北京發佈部份地區戒嚴令後，陳的一體改所，頒發發表了六點聲明，抨擊李鵬對學運的政策。蘇曉康，是電視系列片《河殤》的撰稿人之一，《河殤》的播映，他曾被中共一位政治老人斥為有「殺祖之仇」。

九十年代 1989/7

知識份子面臨大劫難

傅曲

繼六月四日血洗天安門之後，中共當局為在大陸採取高壓手段，佈下天羅地網，在全國緝捕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以抓「黑手」為名，對於支持學運的知識界、新聞界進行大清洗，全面整肅，以致大陸籠罩在一片赤色的恐怖之中。

赤色恐怖：緝捕、綁架 六月十二日，中國公安部公佈了「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告，公開地在全國緝捕學運首腦及民運份子。通告指令各地公安機關及武警可以不依照正常的司法執法程序捕人及使用武器，公安部還指示要快捕快審，「從嚴懲處」。為了宣傳效果，起到震懾作用，中共電視向大陸觀眾展現了一幕幕「反革命份子」被中共警察、軍隊、法官和檢察官組成的「人民審判團」審問的短片。文革中那套精神上侮辱、肉體上折磨「犯罪份子」的情節，又一展示在人們的眼前，受審者的雙手被緊緊地吊鎖在背後，頭被士兵狠壓下去，胸前掛着一塊大牌，寫着觸犯的罪狀。中共此舉暴露其踐踏憲法的醜惡行徑。

中共利用輿論工具，號召人們舉報學運及民運的頭頭，並囑咐百姓不得協助隱藏那些人士。中共還設置專門電話線，要人們舉報「犯罪份子」。

在通緝二十一名學運領袖之後，於六月十九日，中共又在機場、車站等公共設施的地方，張貼通緝中國著名學者「七君子」的命令。這七人是：萬潤南、嚴家其、程明遠、包遵信、陳一諮、王軍濤和蘇曉康。萬潤南、四通集團公司的董事長，被指控在北京民運期間，提供物資，支持學運。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高過《文革十年史》和《首腦論》，是中共黨內批毛的健將。曾被延聘為趙紫陽推行行政體改的顧問。在學運期間，非常活躍，聯繫其他知識份子發表了數封公開信，要求中共採納並推行民主化的建議。五月中旬，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期間，嚴與包遵信、戴晴(作家、葉劍英的乾女兒)等人到天安門廣場，斡旋於學生和中共政府之間，試圖勸說雙方讓步，但未有結果。陳一諮，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是趙紫陽的智囊，對大陸農村的經濟改革作過一定貢獻。北京發佈部份地區戒嚴令後，陳的一體改所，頒發發表了六點聲明，抨擊李鵬對學運的政策。蘇曉康，是電視系列片《河殤》的撰稿人之一，《河殤》的播映，他曾被中共一位政治老人斥為有「殺祖之仇」。

中共在大陸各地，還加緊搜捕民運份子和持不同政見者。在北京的街頭，不時可看到「尋人啟事」，在「六四」之後，曾支持或參加民運的人突然失蹤了。民辦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六月四日上街去買醬油，據傳竟然一去不復返了。師大講師劉曉波，四月廿七日從美國回來，投入學運之中，一天他騎着自行車上街，被一輛衝過來的白色小轎車截停，車上下來幾個人，把劉連人帶自行車，塞進車裏駕走了。《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和《新華社》等傳播機構，也有一些青年記者失蹤。由六月四日始，中央已緝捕近兩千人。

箝制思想圖愚弄人們 為了箝制人們的思想，繼續愚弄大陸人們，對新聞界的整肅在日前已經開始了。

早在五月廿三日，李鵬便任命了王忍之、袁木、何東昌、曾建徽和李志堅組成中央宣傳小組，並要派人進駐《人民日報》，以被報社員工頂住，未果，但每天大槩要送袁木等人審問。廣播電台已派有軍管人員監督，編播諸如天安門廣場沒殺死一人之類的謊言新聞。

六月廿一日，北京已傳出《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陳瑞文已被撤職，分別由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和總政宣傳部長邵仁華取代。而一向敢說敢做的老報人戈陽主持的《新觀察》雜誌因第十期刊登了《四·二七遊行日記》被勒令停刊。而北京另一刊物《經濟學週報》亦遭勒令停刊。一些「不合格」的新聞從業員也將被調離。

中共中宣部除加強控制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外，還旨在加強「星期一會議」的作用，即於每星期一召集各大新聞單位負責人舉行會議，檢討各單位的新聞發報情況，提批評、挑毛病，加以控制。將進入九十年代的中國人民隨着民主意識的增強，獨立分析的能力的提高，加上科技資訊的發達，再要箝制人們的思想，愚弄人們，已是不可能了。世界在不斷進步，圖以專制取代妥協，以武力取代勸誘，只能引爆更激烈的反抗。

一九八九年六月廿三日

中華精英逃亡·落網

張結鳳

王丹、柴玲仍在匿藏

腥風血雨之後，又是白色恐怖籠罩神州大地。中華民族的精英，正面臨新



■沉思的吾爾開希。

香港人提供吾爾開希錄像

據了解，柴玲既沒有在香港，也沒有到澳洲。

吾爾開希的狀況較為明朗，他已於六月底到了法國。他能夠成功逃離中國，據他自己說是「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他的錄像講話，相信是自六·四以來最令入振奮的學運消息了。不過這錄像帶的處理問題，曾鬧出小小風波。

六月二十八日，早上盛傳吾爾開希經港逃往外國，當天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部接到美國全國電視公司的通知，有一輯吾爾開希的講話錄像，將於香港時間下午播映，而下午七時過後，便可傳片至香港。無線方面要求先要文字稿，但美國方面表示根據提供影片的人士指定，不能提前給予無線，必須待當天下午七時。很明顯，下午七時剛好是無線新聞新聞播完（連天氣報告也播完了）的時刻，如此規定，是不讓無線在六時半的晚間新聞播出這輯錄像影片。

可是在當天早上，亞洲電視卻從影片提供者手上拿到一個拷貝，根本不必待美國傳過來。雖然仍需待美國方面先播，但影片在手，可以先行做好字幕等準備功夫。後來祇因亞視高層反對全部播出這輯影片，致使亞視新聞部原準備在晚間新聞全部播出的計劃成空，祇能播出片斷。後經爭取終於可在晚上八時半播出，但事前沒有把握爭取成功，沒有宣傳，觀眾沒有注意，反而多數觀眾都在等晚上十時看無線播出的特備節目。

上述安排，兩台新聞部的員工均大感不滿，無線是對提供影片者的處理手法不滿，亞視則對公司高層干預編輯政策不滿。基於影片提供者熟悉本港兩台的電視運作，間接暴露了他的香港人身份，亦說明了這輯影片是在香港錄製。

李進進被捕秘而不宣

經一輪快捕、快訴、快殺，北京當



■柴玲如今既不在澳洲，又不在香港。

嚴家其欲往英、美不果

知識分子是當局繼學運領袖之後，另一類大力搜捕的對象。知識分子在過去數十年屢受迫害，「反迫害」的鬥爭經驗豐富，故此早於事態未惡化前，不少人已作出了逃亡的準備，甚至有些早已躲藏起來。

嚴家其並沒有蓄意，他一直到六月三日晚上仍公開露面，積極活動，屠城之後始踏上逃亡之路。

嚴家其在香港之時，曾接觸多國領事館，尋求庇護。其中美國早已因為此護方勵之而與北京當局鬧得很僵，為了顧及其全球戰略考慮，美國政府不欲嚴家其馬上前往美國。英國由於香港問題而與中國關係微妙，亦不願沾惹此事。法國則最是爽快，毫不考慮便答應收容，於是嚴於六月二十二日離港。

二十多名民運人士在法國

法國在這次血洗北京事件後表現極為強硬，強烈譴責北京當局，並曾發表願意庇護參與此次民運的中國人。據知，目前已抵達巴黎的北京民運領袖，包括知識分子和學生，已超過二十人。

法國政府這次「仗義」的表現，已引來北京的抗議。可見美國的願應，亦不是沒有根據。北京指責美國政府在國際上煽動反華反共，其實華府雖然說話多多，但行動極其謹慎。除了嚴家其之外，亦有會參與民運的人士趁著一次來港的機會，要求美國領事館庇護，遭到拒絕，祇得快快逃離。

中共在搜捕知識分子方面，除了劉曉波被捕會正式公佈外，其餘傳聞被捕者均得不到公安部門的證實。

目前傳聞已被逮捕的知識分子（編按：名單詳見本期智慧版），除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包遵信之外，很多與學運的關係不是很密切。因此，假若這些傳聞屬實，則按照他們的邏輯也是無法解釋得通的。中共大舉搜捕民運人士，藉口是「制止動亂」和「平息暴亂」，假若知識分子並無積極參與行動，與學生關係又不密切，那除了以言入罪、思想入罪之外，確是沒有逮捕的理由。

最近北京方面已傳出要逮捕政治犯，所謂「宣傳與極端資產階級自由化」亦列為犯法。在如此空泛和難有確

切定義的原則下，正成了當權者打擊異己、剷除眼中刺的大好時機。

打擊體改所及河殤派

五月學運期間，知識界已接到消息，謂當局欲對付幾類人士，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趙紫陽智囊）、「河殤派」（文化批判思想）、長期自由化傾向的人士等等。

其實上述這些人士，早已是李楊集團和老人黨極度討厭的人。樹倒猢猻散，趙紫陽倒台，體改所自然遭殃，因此體改所所長陳一諮自然是他們要去除的重要人物。電視系列片《河殤》曾被老軍頭王震大罵，趙紫陽則表示讚賞，《河殤》的一批作者的批判性言論，保守派當然也是受不了的。《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除了參與四月二十一日日的知識分子聯名信，和五月十四日會到廣場勸絕食學生撤退外，後期參與學運、民運很少，因學運而逮捕他，確實「冤案」。

方勵之更是自覺與學生接觸彼此均不利，自始至終沒有介入四、五月學運，竟然也成了頭號通緝犯，除了因為鄧小平討厭他之外，實找不到其他解釋。其他傳聞被捕的知識分子，如四通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和北京經濟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亦是早已受當局注意的活躍分子，如四通研究所今年初主辦憲法研討會，陳子明是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積極參與者，當然是不為保守派所歡迎的人物了。可以說，保守派在這次大獲全勝，掌握思想控制權之後，所進行的逮捕，實際上是一次大清洗，將所有具有民主、開放思想的人，一網打盡，斬草除根。手段之狠，可謂歷年來之最。

猶記今年三月底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曾傳出人大正在研究取消「反革命罪」法律條文，並指出所謂「反革命罪」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容易製造以言入罪冤案。言猶在耳，當權派却大抓「反革命」，將言論、思想上的異己當作最嚴重的罪犯。這種倒退做法，無疑是自取滅亡。

李瑞環禁止大肆宣傳快捕快訴，以求低恐怖氣氛，可是追緝民運分子的命令一天不撤除，仍然是人人自危。唯一緩和當前局勢的辦法，祇有停止大搜捕。

精英大變節大叛逃

● 柳彦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以來經歷過不少政治和經濟的困難時期，例如：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年朝鮮戰爭期間，中共來不及醫治由奪權引至的戰爭創傷，又要與

六月二十三日，美國洛杉磯「中國民主聯盟」的大會上，突然有位叫邵華強的盟員上台宣佈自己是中國「國安部」特務，聲明從此脫離黨籍，並要求美國保護，使全場震驚。

於中共副部級幹部。他一九四六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一九五三年受聘燕京協和神學院教授，一九六四年進入中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一九八五年擔任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迄今。他曾獲得法國文化教育最高勳章。

趙復三曾任中共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代表。六月九日，他在巴黎出席該組織會議上出人意表地抨擊中共的屠殺行為，他以英語表示：「我與大家一樣憂慮。我希望創傷很快癒合，錯誤獲得矯正，並為中國悠久歷史掀開新頁。」

在美集退黨的一百多名中共黨員的綱領更爲尖銳、鮮明：第一、呼籲、動員全體中共黨員以各種方式儘快退黨；第二、不承認以鄧、李、楊、喬爲代表的暴力獨裁政府；第三、不承認中共的基本綱領，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四、積極參加和支持海內外的中國民主運動，主動配合享有共同大目標的志士仁人與政治組織最終促成一個制度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的中國而努力。

至於業已逃亡或要求庇護的著名知識分子嚴家其、蘇紹智、萬潤南等其政治目標就更明



•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趙復三

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作戰，並承受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封鎖。五十年代末期，連續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上千萬人，整個國民經濟達到崩潰的邊緣。一九六〇年代初，中共與蘇共分裂，除受到蘇聯撤消經濟援助的打擊，還遭到蘇美南北台圍。十年文革，更是全國幾如召入地獄，幾千萬人受到迫害，一個

此外，這次中共宣佈脫黨的人數也可謂驚人。六四屠城後，中共元老葉劍英元帥的養女、北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即在接受香港電視台訪問中表示：「再也不能在這個法西斯黨呆下去了！」劇作家王培公也公開表示退黨。更驚人的是，在美國洛杉磯的以柯剛為首的三百一十五名中共黨員，在「新聞自由導報」第二

許多在海外留學的中共高幹的子女，也都紛紛反叛。當今中共的排名第三的人物喬石的女兒喬小茜在美國留學，也公然不顧父親的警告，參加留學生反對中共政府的遊行。胡耀邦的外孫女和外孫徐佳姐第二人，也在美國麻省州立大學參加遊行，抗議「北京大屠殺」，並

至於葉已逃亡或要求庇護的著名知識分子，嚴家其、蘇紹智、萬潤南等其政治目標就更明確。他們繼承了中國士大夫「士可殺不可辱」的風骨，可以不吃不穿，但政治理想不可丟。嚴家其在逃亡中依然表示：「我希望把三權分立、聯邦制、軍隊的非政治化、國家化作為憲法的根本原則……以法治代替人治，最終地結束有幾千年歷史的王朝循環。」

界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但沒有成功。一般信，他的後半生會是悲慘的，即使不被中共決，也會被流放到塔里木沙漠裏了此餘生。對此，相信所有背叛中共的人都曾考慮過，但也沒阻止他們的決心。被中共通輯的十一名學生領袖目前仍有十五名在逃，儘管

但是，注意觀察中國大陸事務的人都會發現，以前再困難都好，也不至於出現象北京屠城後中共面臨的大變節，大脫黨，大叛逃的現

期上發表「集體退黨聲明」。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二名中國在日本東京的留學生在國立京都大學出席記者招待會，宣讀了他們的退黨聲

接受邀請放暑假時訪問台灣。她們還明確表示要無限期延期留在美國。

一代民族精英

共當局仍一再宣傳自首後即寬大處理，但他都不信當局宣傳，積極尋覓通道，逃離中國大陸的消息人士透露，起初一些低層駐外使節裝節、留學生要求退黨以及民運分

象。可以講，這是中共四十年未遇的分崩離析，衆叛親離的窘境。細微分析這一現象，可以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中共的前路何在！這次中共幹部大變節、大脫黨、大叛逃有以下顯著的特點：

至於，在中國大陸各地，分散在各行各業中的對中共幻想徹底破滅而申請退黨者不計其數。按北京、廣州、雲南的抽樣調查，估計總數不下於二十萬。而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建政近三十年期間，中共多次遭到國

過去四十年，中共與變人鬥爭從來沒有停過。政治色彩不濃，追求個人生活享受多於追求其它個人的思想，例如負債、桃色事件、職上級認同事不和。例如前年中共安全部派邊局局長賈

澳門的大陸人士更是每日每時都可以聽到，但實話說，這些大都是大陸社會的末流人士，他們許多目不識丁，但作姦犯科無所不爲，甚至一部分就是社會的渣滓。是否接受他們，對自

外逃並未引起中共高層的重視。劉少奇逃
用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蒙古時說
「老天照樣下雨，姑娘照樣嫁人」，表示無
謂。李鵬還說，「中國第一偉人，跑他一億
也沒有甚麼了不起。」但後來變節人員家多
了，「一連串貪官、巨賄、更荒了手腳，

超過前四十年總和

自中共六月四日北京屠城後至六月底，不過短短二十來天時間，但是宣佈脫離中共，取消黨員資格；向西方世界尋求庇護；或者以各種方式逃離鐵幕的，其總數可以講，除了朝鮮戰爭中，中共官兵被俘投降外，已超過了前四十年之總和。

變節、退黨和叛逃的中共人員的級別高，也是前所未有的。過去，一般都是使館下層工作人員，搞外貿的一般辦事人員，以及一些運動員和演員；中共軍隊外逃的也是下層的兵士和飛行員。

時間不長就捲入「桃色新聞」，輿論多認為他起義並非有甚麼政治抱負，實在是圖那幾千兩黃金而來。

但這次中共叛變人員多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有強烈的政治理想。如前面提到的中共黨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就是一個對西土

是知識分子，而且都是知識分子裏面的精英。發表退黨聲明的是留學生；變節的外交人員據悉有一半以上是碩士、博士；趙復三是世界知名的教授；被通輯的學生領袖也不乏研究生；至於講到藏匿的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更是目前大陸學術界、理論界的頂尖級的人。

此外，中共使館加強使館人員的控制，甚至不可靠的人員採取禁止外出並監視的手段，留學生也加強了控制。但這些倒行逆施招致巨大的反抗。

可以相信，今日背叛中共的這批民族精英，

據路透社十七日電，至少已有二十名在海外的中共外交官和使館人員尋求庇護。被要求庇護的西方國家有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法國、比利時等。這些國家爲了保護這些變節人員及其仍在中國大陸的家眷，拒絕透露變節的人數和姓名。

但是，這次中共使節變節的就有多名領一級的人物。最早「曝光」的中共變節使節中共駐澳大利亞雪梨領事館的副領事董洪。六月二十二日，在紐約華埠召開記者會，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並尋求政治庇護的陳彤，就是在鄧小平兒子鄧懷方擔任理事長的

主的生活方式有深刻研究、瞭解以至認同和一定的有思想的人。他曾斷言「在中國大陸，中國傳統的東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和隨着對外開放而來的西方民主、個人主義文化這三種思想相互作用的結果，將決定中國大陸精神文化

據大陸知識界的權威人士評論，六月四日北京屠城後引致的中國大陸知識界大叛逃，其造成的直接損失或將來可能造成的損失，遠超過「十年文革」所引致的破壞。加上中共在校大學生的殘暴鎮壓，將使中國大陸出現周所約「文化水可朝」。

分子，將來就是中共暴政的掘墓人。

路透社十六日渥太華電，還指出加拿大政府證實有六名以上的中共駐渥太華大使館與駐溫哥華領事館人員，投奔自由。其中一位中共外交官員的兒子在六月四日北京屠城喪生。

資料顯示，中共在「文革」前，外交人員變節幾乎可以講沒有的，開放以後才有數量很少的人員變節，頂多一年跑個把人，絕沒有過二十天裏跑二十多個人這樣的「奇迹」。

團長職務。

而級別最高的要算趙復三，據台灣聯合六月二十四日消息稱，趙復三已在巴黎尋求治庇護。如果這個消息獲得確證，趙復三將中共政權成立四十年來，向外國尋求政治庇者中「官階」最高的一個。

趙復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相

這次背叛中共集團的人士中，許多還形
發展趨勢。」

了組織，製定了明確的政治綱領。如，留日
中共留學生在退黨聲明中，明確提出其政治
領是要求中共「放棄政治獨裁、平等對待其
政黨和組織、尊重黨內反對意見、調查鎮壓
運事件並為民運平反以及要求開除搞官倒和
壓民運的黨員。」

此外，我們還可以留意到，這次背離中人士是毫不動搖，義無反顧，態度非常堅的。由於中共有着一套非常嚴厲的制裁制度，背叛人員不但顧及個人可能遭受的打擊，還顧及到妻兒、父母可能遭到的報復性制裁，至可能丟失生命。但是，這些中共變節人員這些置之了度外。據悉，中共駐哥倫比亞大

解放月刊 89/7

全國兩天抓人近萬

在白色恐怖下

本刊特約記者 常川

由於大批中共黨員在學運中支持了學生，因此在逮捕學生領袖的同時，實際上展開了新的清黨運動。鄧小平、陳雲對高幹支持學運很生氣。鄧小平批評說：「立場不穩的應立即從崗位上撤下來！」在一個會議上，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與中央領導雙方拍了桌子。譚當場氣得吐了血。在場的《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也心臟病發作，雙雙被送進了北京醫院。

楊尚昆說：「新聞界煽了陰風，點了鬼火。這幾年記者隊伍素質降低了，現在到了非整頓不可的時候了！」李鵬說：「有少數記者上竄下跳，執意和黨中央唱反調！」一些大報的員工，已開展了一個不合作的「沉默」活動。

北京的血還未乾，全城就陷在白色恐怖之中。不僅一個北京城，是全國都在進行大逮捕，大追查，大鎮壓。

極大規模的逮捕浪潮正席卷全國

鄧小平，又是這位「總舵手」，北京廣城的「總設計師」，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暴亂分子」全部捉拿歸案。從公安部內部透露出來的一個十分機密可靠的消息說，在六月十一、十二兩日，全國已逮捕了近萬人。各地公安部門上報公安部需要逮捕的超過十萬人。這個數字說明，一個極大規模的逮捕浪潮正在席捲全國。中共之所以鎮壓學生，一方面是要扼殺民主運動，另一方面是為了轉移全國人民對物價上漲和官倒的視線，壓制他們日益不滿的情緒。兩者都是從根本上保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利益。說到底，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不惜血洗京城，還要把全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和先鋒趕盡殺絕，這是多麼野蠻，多麼殘暴！

打擊黨內反對派的新的清黨運動已展開

六月六日，喬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部委領導幹部會上強硬地表示，凡是在這次「反革命暴亂」過程中，搞過簽名、搞過聲援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都將受到黨紀的追究。

北京市局級以上黨委，已接到市委和中央的通知，凡是在這次學運中參加了遊行、示威的中共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必須在所屬黨紀登記，然後逐級上報。登記後還必須在黨員大會上做深刻檢查。黨的紀律委員會根據黨員本人的檢查分別作出處理。由於大批中共黨員在學運中支持了學生民主運動，因此在逮捕學生領袖的同時，實際上展開了新的清黨運動。不少參加過學生運動的中共黨員，正處於惶惶不可終日的境地。

據統計，參加簽名的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已近千人。截至六月十日，查清了的五十多個人。鄧小平、陳雲對高級幹部支持學運很生氣。鄧小平批評這些搞過簽名的黨員高幹，並說：「立場不穩的應立即從崗位上撤下來！」有跡象顯示，楊尚昆、李鵬反動集團將乘機大規模清洗反對他們的黨政軍各級領導人，白色恐怖同時在黨政軍高級幹部中產生。

新聞界成重點打擊對象之一

中共當局在瘋狂逮捕、鎮壓所謂「暴亂分子」的同時，還開始「清理」新聞界。首當其衝的是中國青年報駐雲南記者，他已被雲南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向雲南大學、西南大學等大學學生「傳遞北京情報」、「煽動、支持大學學生上街遊行」、「在自家裏保護兩名被雲南省公安廳通緝的反革命暴亂分子」等等。這是中共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後第一個被逮捕的新聞記者。

六月十六日，北京市新聞界，由市委宣傳部責令十二名新聞記者停職待處理。這十二名記者的罪名是支持學運，向大學生「傳遞情報」、「參與反革命暴亂」、「煽動和組織北京地區的新聞記者」、「非法」聲援學生絕食、「陰謀串連組織非法的首都新聞記者自治聯合會」等等。據消息來源說，這十二名記者已被公安局立案偵查，如果「罪行屬實」，他們將會被逮捕。

在整個學運中一直堅持支持學生運動的中國青年報，有六名記者受到停職待審的處理。其他大報，也傳出同樣消息。

鄧小平、楊尚昆、李鵬對新聞記者上街遊行極為不滿。鄧小平批評說：「學潮搞得這麼大，新聞界煽了風。楊尚昆在傳達鄧小平的這段話時說：『新聞界煽了陰風，點了鬼火。這幾年記者隊伍素質降低了，現在到了非整頓不可的時候了！』」李鵬說：「有少數記者上竄下跳，執意和黨中央唱反調！」



北京已成了戒嚴部隊的天下



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

人民將再遭文革式的東西愚弄

最高等級的「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清理工作早就進行。這種對新聞自由不由分說的踐踏，用強權和命令野蠻地干預報社的舉動，在報社內引起了公憤。

六月三日上午，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報總編輯編輯前會議上，向中央領導發了脾氣。譚文瑞痛苦地說：「我們人民日報不站在學生立場上，客觀反映一些情況行不行？」中央領導說：「不行。」譚又說：「如果不行，我就辭職！」中央領導說：「辭職也不行！」譚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中央領導說：「你住嘴！」雙方拍了桌子。譚當場氣得吐血。在場的《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也心臟病發作，雙雙被送進了北京醫院。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在醫院給報社打了電話，激憤地說：人民日報要屬於人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據說，當譚文瑞聞訊軍隊開始大屠殺之後，曾企圖以自殺來抗議，但被搶救，並被嚴格看管起來。

現在，錢李仁、譚文瑞都被迫離職，接替他們的是李鵬、楊尚昆的宣傳班子。在中共內部鬥爭史上，爭奪輿論陣地、宣傳機器是極其重要的一役。看來李鵬已經在表面上掌握了這些機器。所以說「表面」，是因為傳媒內部人心不服，像譚文瑞那樣處事比較圓滑的人尚且拍案而起，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軍方將全面接管北京新聞單位

四中全会後，中央已決定用很大力量整頓新聞界，除北京日報、解放軍報之外，其他各大報都將面臨著改組領導班子問題，並已決定各大報刊的總編輯都將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派出。來自各大軍區的十四名原屬軍隊文化、宣傳部長的師級以上高級官員，已到中宣部和總政治部報到。一場大清洗運動即將在新聞界全面展開。

北京大屠殺的那幾天，筆者常打電話給上海的一位朋友，向他通報北京的局勢。電話中，友人不斷大呼：多打電話來，那怕只講一句兩句也過癮。豈料，六月九日鄧小平的亮相，竟使國內氣氛為之一變，此後那位朋友再接到我的長途電話時，卻連連驚叫：「不要多說，不要多說！」我曾在國內生活過幾十年，可以想像得出電話那一頭朋友的驚恐狀：氣溫跌到零下，人們等待着一場清算。

北京學運被中共當局血腥鎮壓後，幾個星期以來，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更因當局大肆通緝、搜捕參加學運和抗議活動的人士，變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中共當局，除了捕殺行動之外，已經開展了一場規模更大的向廣大人民報復清算行動。事實上，遠遠未到秋後，算賬已經開始，而且是連本帶利，聲勢超過以往任何一次。

要知道中共怎樣秋後算賬，讀者不能不知道中共一向以來是怎樣向人民記賬的。港人只有身份證一張，但生活在中國，每個人都有一本「政治賬本」。

檔案袋：不斷加厚的賬本

在中國，上至黨的首腦，下至縣鎮小單位的司機，只要他捧的是共產黨飯碗，只要他屬於國家幹部，每個人都有一本賬本的。這本賬，就是那神秘的「檔案袋」，從中央到各級人事組織建立的檔案館或檔案室，可以稱為他們的賬房。

不用說海外或港澳的人，就連國內幹部們自己，對裝有自己一生「賬單」的檔案袋，到底有什麼內裏乾坤，多數也未必清楚，因為他們不知道黨主人什麼時候會在你的檔案上任意加上一筆。

檔案袋裏裝的是什麼呢？個人歷史資料與現行材料，是無所不包的。

你的從中學入學到畢業時填寫的一式三份履歷表；你的家庭成員、社會關係、親朋好友的政治面目和簡歷表；你的太太、你的岳丈、岳母大人的政治面目記錄；你的入黨入黨申請書副本和介紹人的資料；你的父母重大歷史問題的結論；你的中學、大學班主任、政治輔導

員對你的評語；你的過去的朋友為發洩而向領導揭發你私下一句「反動言論」；你的在重大政治運動中的定性材料；你的在牽涉到某個刑事或政治案件中的角色地位的確認；你的海外親友的解放前後的身份和海外地址電話；你曾經工作過的單位裏的黨支書或黨委給你的表考評（標準A B C D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無所不可）；你的人伍或復員立功受獎、記過懲罰的證明文件；你在歷次運動中，上級規定要寫的那份鑒定式的總結文字；你的申請出國出境的表格副本；或許還有一張你自己根本從未見過的與某個案件有關的「筆跡鑒定」書；你的……無所不有，不斷的增多，直到你老，直到你死。

不公平的是，所有賬本，都是你欠黨的，黨永遠不欠你，所以，一旦機會到來，秋後算賬，你就有對黨的還不清的賬了。

共產黨有許多向人民算賬的術語，如「坦白從寬」，如「既往不究」，就是告訴你，以前的賬一筆一筆，從不翻記；比如說，「老賬新賬一起算」，就是告訴你，我已經對你仁慈過一次，這次你可得小心；比如「將功補過」，反正一句話，有賬豈能不算！

從通緝到大搜捕

中共為了將學運領袖趕盡殺絕，再也顧不得面子，顧不得「不對付學生」的承諾，立即開始了對學生的清算了。

大屠殺：六月十七日，北京判處八人死刑，並由官方電視台播放消息。



路透社

算賬何須到秋後

承 嬰

早有「賬本」在手，中共撕下面具大舉緝捕學運領袖，清算離心知識份子無所不用其極。時移勢易，人心背向，當局倒行逆施難以得心應手，執行通緝令大打折扣。

會」的頭頭劉強、劉煥文被捕。同時，上海逮捕並判三名「騷亂份子」死刑，是緝捕之後首開殺戒，為中共的大清算造成更大的威脅的聲勢。

十六日，公安部門加強各出境口岸的管制，以防止學運份子出境出國，並於十九日宣佈，一切已辦妥的出國證件全部作廢，需重新申請。使得一大批等候出國留學的人被阻在國門之內。

十七日，北京大開殺戒，判處八名「騷亂份子」死刑。同日，被通緝的學生領袖楊滿在廣州被捕，另一名馬少方在廣州自首。

為配合嚴密的大追捕，中共不忘抓緊輿論的配合，告密信開始曝光，對方勵之的輿論圍剿也在進行。

十九日，中共發佈《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規定海關人員執行緝捕任務時可以開槍。

六月二十二日，北京當局不顧世界多國的輿論譴責和呼籲，又在北京處決七名民運份

子，同日，濟南處決了十七人。

為了造成聲勢，並印證學運背後「一小撮」的說法，國家安全部門逮捕了十一名台灣特務，早就一直處於公安部門的監視之下。

在學運領袖通緝之後，人們關心一大批知識份子的命運，儘管他們在學運中曾動說過學生，但中共並沒有因此而放過他們。六月二十日，在全國各大口岸張貼了印有嚴家其、包遵信等人照片的海報以防他們外逃。整個搜捕網越收越緊。

至本文截稿時，被捕的學運領袖已達七十名，更多骨幹份子被捕。

但是，比較以往公安部門的緝捕行動，這次在全國範圍大規模的通緝，成績似乎並不值得誇耀。在過去的運動，如屬於全國通緝人物，在短期內是極難逃過公安之手，人民羣眾的舉報和協助，使得犯罪份子難以藏匿。但這次可謂人心所向，老百姓的消極對抗，使得公安部門的追捕大打折扣。

黨內先行外鬆內緊

不久之後，當搜捕行動告一段落，黨內黨外的清算整肅會相繼展開，首先會是黨內。黨員的失檢，和一大批中資知識份子黨員的離心，是這次學運聲勢猛烈及持久的重要原因，因此，控制黨內的離心份子，進行思想整肅和組織清算就勢不可免。人人表態，這不過是最初的站隊，但光表態是過不了關的，沉默

則更不能通過。就以駐港的中資機構而言，據說從頭頭到普通黨員，都不能不表示一表示，而對組織上的整肅，則至今憂心忡忡。從國內傳來的消息說，有的學校，一個黨員一個黨員去談話，除了表態之外，還需揭發。

根據「思想從嚴、組織從寬」的一貫政策，黨內的組織上的整肅，不至會造成大面積的處理，特別是近幾年來，中共為了營造形象，擴大在知識份子中招收黨員，中共對已經入黨的知識份子不會大規模採取組織手段。

但是，對於那些在全國有知名度的、對學運有重大影響的人物，等待他們的，恐怕不僅是黨票的問題了。中共對於他們，是欲剷除而後快的，方勵之只是一個例子。

對方勵之會如何處置？袁木答西方記者問中洩露了天機，翻譯在譯出袁木話中對方勵之「處死」的話後，隨即改口說成「通緝令」。

相信這不會是翻譯的技術性錯誤。

對學生手上有王牌

收拾青年學生，是中共的拿手好戲。

第一關：畢業關。從博士碩士研究生到專科、本科的應屆生，其畢業分配大權都握在黨的手裏，現在，七月已到，分配在即，這會是對學生報復和清算中的第一個衝擊。連分配與早分配、分在城還是邊遠，去大單位還是去小城鎮，全由你的「表現」和「站隊」決定。你不是喊過「打倒李鵬」嗎？現在李鵬同志讓你去大西北，那是革命需要，你不去嗎？

第二關：出國關。學運之前，一大批在與外國協議中將要外派、外訪或留學進修的人員，現在面臨着另一次更為嚴格的「甄別」了。已辦妥的出國手續一律不算。用不着穿小鞋，可以明明白白告訴你，你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楚，

六月十三日，即北京屠城後一周，公安部向全國通緝包括吾爾開希、柴玲、王丹等人在內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在全國各地佈下了天羅地網。

同日，北京戒嚴部隊宣佈「北高聯」、「外高聯」、「民自聯」、「知聯會」四個組織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在幾天之內，上海、成都、武漢、杭州等城市相繼跟進，對學運期間的同類組織予以取締。

六月十四日，兩學運領袖周鋒鎖、熊毅分別在內蒙和西安市遭逮捕。公安部門不僅一日多次通過電視廣播，並對「大義滅親」大肆宣傳（周鋒鎖由其姐姐送交公安局）。

十五日，大搜捕在全國進行，北京「工聯

你不是喊過「要自由要民主」嗎？黨現在給你「講清問題」的自由，夠你慢慢受用。

第三關：入學關。幾百萬應屆中學畢業生，面臨着升學考試，這對他們中大部分人是穿草鞋與穿皮鞋的分水嶺。現在，他們的檔案裏會加上一條：親友中有人參加過學運遊行嗎？有受過通緝或有傷亡的嗎？諸如此類。沉寂多年的「強調政治條件」這一條，又將重提，並將成為進入大學的主要因素。寧要奴才不要人才，共產黨難道還肯花錢去招收可能成為「絕食勇士」的吾爾開希嗎？

一人一信有得有失

中共實行新聞封鎖之後，香港為了使國內人民及時知道事件真相，發動了一人一信或一人一電活動，大力向國內各省市單位寄發港報印件或傳單。這一活動衝破中共的新聞封鎖，把港、澳和國外華人聲援國內民運的消息以及北京事態的發展最快送給大陸人民，中共對此又怕又恨，於是，隨着鎮壓和對學運份子份子的搜捕和清算，戒嚴當局向各地發出通令，勒令港、澳「反動傳單」的收件人，必須立即將收到的信件上交，否則後果自負，這是中共一系列秋後算賬行動的一部份。

當然，有一大部份信件是只有單位而沒有收件人的，公安局門難以據此去追究，即使是有名有姓的收件人，中共的公安局門，也只能要求人們上交了事，難以對大面積的有海外、港澳關係的人實行打擊報復。

在風聲收緊之後，確實會有不少人怕成為打擊的靶子，主動上交外間的印刷品，免生枝節；也確實會使正常的通信受到中共的檢查，但是，外間的聲援行動，使人民更加認清了中共的新聞封鎖，對中共自說自話的宣傳更不人相信了。

幾位學生領袖在天安門血案之前曾對外界表示，如果運動遭到鎮壓，他們會轉入地下活動，堅持長期鬥爭。

地下活動談何容易

其實，這只是天真、幼稚的想法。為防止學生轉入地下和盡快逮捕「反革命暴徒」，中共會採用下列的手法：

- 一、加大宣傳聲勢、把緝捕對象說得十惡不赦，增加人們的仇恨；
- 二、加強典型宣傳，「秦曉投明」的典型或抗拒被嚴懲的典型。這次大逮捕，一位姐姐、姐夫送弟投案和母親送子自首的新聞，在中央電視台無數次播放，造成心理上的威脅。
- 三、殺一儆百。這是中共加強恐嚇的極端手段，一面加緊緝捕追殺，一面在上海、北京

拿十幾個人頭開刀，同時提高戒嚴部隊通令的語調。

在第十五號通令中，打擊面竟擴大到「知情不報者」，這實際上不但為了打擊學運領袖，也是為向廣大同情者算賬埋下了伏線。

領袖人物命運堪虞

歷史的政治運動，都會創造出一個新的「份子」來，「反革命份子」、「胡風份子」、「右派份子」、「左傾機會主義份子」、「五類份子」、「保皇派」、「四人幫幫派份子」、「三種人」不一而足。如今北京事變，鄧小平也會發明一個什麼「份子」來為他的敵人定性嗎？單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夠用嗎？「暴亂份子」如何？

一旦被劃上了「份子」，被戴上了帽子，自然會被列入另冊，只有在期望中等待着歷史給他們平反。

那些被通緝或被追捕的學生和工人，當然早已列入了另冊，人們關心的是，等待他們的命運是怎樣的？

事實證明，中共在學運中的所作所為，是只講需要而不講是非的。對這樣的政權，還能抱着仁慈的幻想嗎？你還能指望一旦那些被通緝者落網，軍政當局還會「保護」他們的愛國熱情嗎？

對中共來說，殺一個學生領袖易如反掌，雙碼蟻。但是，估計中共對學運領袖不會輕易動用極刑，理由如下：

第一、對北京當局的大屠殺造成的國際反響，其強烈的後果絕非中共始料所及。雖然鄧小平一貫「不信邪」，但如一意孤行殺害學生領袖，則不能不憂及更加可怕的國際後果，美

國及西方國家相繼與中共斷交、經濟封鎖等都是可能發生的後果，已處於困境的中共當局是不願為幾個人頭造成如此後果的。

第二、國內民心的震盪，亦會是中共考慮的因素，而且，如要殺人，總得有罪名。手無寸鐵，以絕食為武器的學生們，如何定罪呢？這本來就是棘手問題。

第三、中共勢必會借機製造假象，來進一步營造它的「寬容」的姿態。而且，中共從來就善於分化瓦解，對娃娃們做一番軟硬功夫之後，或許會有幾個為爭取「寬大」或「落實政策」而變成中共方面的「證人」，去證明袁木之類的彌天大謊，這也是不足為怪的。

九十年代 1909/7

童伯寧，程渝之外，另有一名叫丁健的留學生，目前也下落不明。

三人中，程渝就讀芝加哥大學；童伯寧、丁健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生。

兩周前，童、丁二人，返回大陸觀察北京學運，臨行前并帶走該校「中國同學學者联谊会」捐獻的九千美元給北京示威學生。

據加大同學八日說，當童、丁二人抵達北京之後，丁健曾打電話回校告訴一位同學，如果他不回來看學運，一定會遺憾終生。

不久，他二人曾將北京所見寫回美國。但是上周六有同學打電話到北京丁健的家中，其家人却要他不要再打，因為他們擔心已有警察在錄音。

該校同學說，最後得到丁健的消息是本周二，他打電話到美國之後就失去踪影，當時他說，他懷疑有人跟踪他。「究竟丁健是否安然無恙不知道」，他的一位同學說，「有時我覺得丁健膽大了一點」。

與他同行的童伯寧，是五日在北京搭機準備飛返美國時，在入關後沒有下落，他的朋友曾在舊金山機場迎接，却没有看到他，經與北京連絡，他的家人說，曾親自送他進關的。

此外，當天與童伯寧一起登機的程渝，最後也跟童一樣失蹤，而懷有四月身孕的程渝，身邊還有她的幼子。

為了找尋他們三人，兩校同學，已寫信給美國布希總統，請他幫忙代為尋查，以便早日返回美國。

本刊消息：

一位中國大陸的留美學生，六月八日表示他已寫信給布希總統，希望他能拯救他的妻子和一個一歲大的孩子，他們已被中共綁架。

這位現住芝加哥的李姓學生，八日接受CBS的電視訪問時說，他的妻子和小孩，原定本周一自北京搭機返美，在北京的親友曾到機場送行。但他按時到舊金山機場迎接時，却没有發現妻子和小孩的踪影。

李的妻子也是一位留學生，她于這次北京學生民主運動高潮時期，自美國返回大陸，主要目的，是到天安門參加學生們的示威活動。她在行前告訴CBS的記者，她是深深受到大陸學生那種爭自由，爭民主的精神所感召，身為中國人，她必須前往給他們支援。

她也是大陸民主運動展開以來，第一位返回大陸現場支持民主運動的人。

李姓學生說，經過幾天來的打聽，有位「中國民航」的職員告訴他，他的妻子和小孩以及另一位加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登機前被中共的便衣人員挾持走了。

李姓學生說，中共扣押他的妻子，很可能是害怕她回到美國之後，把中共鎮壓學生的實況，告知自由世界。他說，雖然已有很多外國新聞媒體的現場報導，但他的妻子是親自參加運動的人，她也是中國人，對內情的了解更多，也更為深刻。

最近返回大陸失蹤的大陸留學生，除

留學生返國內支援學運被捕

大屠殺大追捕下的勇敢

中國文化人

勇敢播音員李丹

歷史將會記住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華民族的「國殇日」。歷史也將記住這個人：當代中國最勇敢的記者——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

「邪惡要贏得勝利所需要的就是善良的人們保持沉默，但這位勇敢的中外記者面對恐怖卻沒有沉默。」一位在北京「六四」慘案之夜，及時錄下李丹那段以非凡的勇氣自撰播出的廣播稿的外國記者如此表示。

當晚，李丹在工作崗位現場直播英語新聞時，向全世界的英語聽眾報道了中共軍隊殺害市民和學生的暴行，話音剛落，即被接管電台的戒嚴部隊拖走，至今生死成謎。

且讓我們記下李丹這篇碧血丹心、捨生取義而發表的廣播稿全文：

「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成千上萬的羣衆，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着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羣發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羣衆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衆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以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衆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河殤》作者蘇曉康攝像也被捕。

當這位勇敢的播音員讀完上述廣播稿時，電台馬上換成另一名播音員的聲音。而這位歷史性的一瞬間，被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捕捉到了，而且記錄下來，並在播送有關新聞時，把這「最真實的聲音」重播一遍，使蒙在鼓裏的大陸老百姓確知在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

筆者在「六五」大遊行時，從留學生手中獲得這份廣播稿的文字資料，大家還不知道這位勇士的名字。一位留學生激動地對筆者表示，你一定要報道這位記者的事蹟，我們不能讓他沒沒無聞。他太了不起了！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這位「無名英雄」的名字。為了突破暴政的新聞封鎖，而於六月九日在美創辦的《新聞自由導報》，在第三期鄭重推薦「當代中國最勇敢的人」，其中最勇敢的記者正是李丹。(該報還選出最勇敢知識分子——劉曉波；最勇敢的中國青年——長安街上隻身阻擋十八輛坦克的王維林。)

會慧燕

新聞自由導報創刊

目前，由原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曹長青等多位原中國大陸新聞從業員發起創刊的旅美中國新聞從業員協會暨新聞自由導報，已增至四十四人，其中包括原新華社記者九人。該會於六月三十日發表「致世界新聞從業員聯合行動拯救那用英語向全世界廣播北京大屠殺真相，而被中共逮捕，可能要被殺害的記者的生命。」

該協會指出：「中國發生的悲劇，再一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黨謀私、與人民為敵的黨，中國現政府是一個法西斯政府，中國現行政治制度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制度。沒有新聞自由，沒有監督與制衡，什麼悲劇都會發生。」

「因此，我們——一羣旅美新聞從業者將和國內新聞同行一道，為爭取人所應有的基本權利——新聞自由而與暴政做永不停止的抗爭。我們堅信，新聞自由的光一定穿透暴政的鐵幕。」

在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八九中國學運」期間，不知湧現多少感人的個人和場面，都是值得將來史學家大書特書的。其中不可漏掉的一筆，便是「不甘喉管被割斷」的大陸新聞從業員的覺醒和奮起，儘管他們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仍無所畏懼地「伸出剩下的半截舌頭」吶喊。

大舉搜捕民運分子

據了解，在中共當局目前大舉搜捕民運分子的紅色恐怖中，首位遭正式逮捕的記者是《文藝報》的老本(也是詩人)，他在三月初曾與北島和陳軍發起並推動大陸三十三名著名知識分子聯署要求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活動，當局拘捕他的理由是參與「反革命暴亂」，是「幕後煽動者和組織者」。

繼而被捕的是《中國青年報》經濟部副主任楊浪，當局指控他和學生串聯「煽動暴亂」。

另外，中央電視台兩名播音員及兩名新聞編輯，由於在北京戒嚴宣佈後，「未能認同政府立場」，也遭撤職查辦。記得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播讀員在大屠殺後，亮相螢幕時身穿黑衣服，滿臉愁雲慘霧，只顧低着頭機械式讀新聞，未知受查處的是否包括上述人員在內。無論如何，國內新聞界在中共建國四十年來，第一次走上街頭，公開喊出「新聞自由」、「不要逼我們造謠」等口號，其意義將記入中國的新聞史冊。

據悉被捕的，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記者站負責人、七名編委之一的張偉國，他從福建返回上海金山時即被拘捕；該報另一名記者、要聞部主任許小微也在上海被捕。

此外，已證實被捕的著名知識分子、學者還有下述人士：法學家、評論家于浩成；電影片《河殤》解說詞作者王魯湘；電影《老井》的編劇和原小說作者鄭義；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等人。

知識界精英成打擊對象

消息人士還透露：繼趙紫陽的主要助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被捕後，該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高山也被捕，罪名是向學生傳遞黨的機密文件，洩漏中央高層分歧的消息。是一「反革命暴亂」的幕後煽動者。此外，趙紫陽另一智囊成員、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研究人員白南風，也於六月十八日下午兩點半被一名武裝軍人和四名便衣警察從家中帶走，至今下落不明。

至於被鄧小平說成比劉賓雁和方勵之更壞的著名學者、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已和其妻、中科院副研究員高果逃離毒手。惟其同事王炎及楊百揆卻在七月初被捕。下落不明的尚有文藝界的老鬼(《血色黃昏》作者)，柯雲路(《新星》作者)，趙瑜(《中國夢》作者)和原中國新聞記者、現任《經濟學週刊》副總編輯高瑜。較早時被捕的則有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五一七宣言》作者之

一、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包遵信；《河殤》解說詞撰稿人之一、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經濟學週刊》副總編輯王軍濤等。

由此看來，在中共全面鎮壓民主運動行動中，知識界精英已成重點打擊對象。本來，直接對天下國家負責、直接對自己的良知負責，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五四」的原始精神是追求民主、科學及個人的尊嚴與自由，這一精神會長期處在民族危機的壓抑之下。今年二月十六日，中國大陸爆發三十三名知識分子聯署公開信的壯舉，使文化界出現大覺醒。在四、五月學運期間，知識分子出於對學生的同情和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關懷，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情。即使這樣，仍被學運領袖之一「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榮玲批評「理論界遠遠落後」，沒想到中共某些獨夫民賊，從來就把知識分子看成眼中釘，一有機會必欲除之而後快。令人痛心一代菁英重又「零落成泥碾作塵」。行文至此只能擲筆長嘆：豈有文章值社稷，只因奸佞覆乾坤。

寫於三藩市灣區比德蒙山莊

大陸文化人再遭劫難

抓一批、殺一批、流放一批

■會慧燕

「無論甚麼黑暗來防範思潮，甚麼悲慘來襲擊社會，甚麼罪惡來襲擊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蹄向前進。……」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大陸精英成驚弓之鳥

中國大陸，又一次進入「萬馬齊瘠」的年代。
來自北京的消息指出，中共對新聞界的修理已趨白熱化，在紅色恐怖籠罩下的大陸知識精英，成了驚弓之鳥，人人自危。誰也弄不清自己何時「今天不上班」。一如《光明日報》著名女記者戴晴，在「六四慘案」後，仍非常自信地「不會有事」，豈料突然間，就「人面不知何處去」。她的同事，祇知她

■北京大學捕獲民運人士。



已多天不上班，究竟「何處覓芳踪」，看來祇有公安部才曉得。

消息透露，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雖然會向著名理論家王若水請教過：「『異化』這兩個字如何寫？」但他對知識分子一向恨得牙癢癢的，目前趨紫陽面臨「內部審訊」的命運，使王震報了電視系列專題片《河殤》的「一箭之仇」。可也還覺得不解恨，務必將他早就看不順眼的「臭老九」趕盡殺絕。日

二、搞好治理整頓，堅持改革開放，三、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四、大力加強黨的建設。

果然，中共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情，應是優容的，但對打擊異己則雷厲風行。根據戴晴、吾爾開希等人在巴黎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在七月二十日發表的一項「緊急呼籲」，指出中共已從公開搜捕民運人士轉入秘密搜捕，據同情民運的北京「官方人士」從內部文件獲悉：全國逮捕民運人士已超過十二萬人。北京秘密逮捕達一萬多人；秘密傳訊、拘留、審判兩萬多人，秘密處死已達百人以上。

不斷有知識分子被捕

此外，北京當局於六月三十日正式批發「一九八九年中共中央三號文件」，列明十種清查整肅對象，目前已傳達到省市級幹部。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已在加緊全面鎮壓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和民衆，而且不會有「絲毫的心慈手軟」。

消息人士指出，在「八九中國學運」期間發起簽署請願書、要求與中共中央主管宣傳的領導對話的中國青年報學校教育部主任李大同、與五十名作家騎單車示威的詩人徐鋼和「中國文化知識界救國團」發起人之一許良英及「五·一七」宣言簽署人之一李南友等人，目前處境危險。至於在學運期間由北京三十八間新聞機構和多個知識分子單位突破官方新聞封鎖台辦的《新聞快訊》，由於其創辦宗旨是要推翻下台和反對軍管，目前已成當局重點打擊和追查的目標。

大批未能及時見機潛逃的新聞界、文化界和科學界的精英，早被中共列入黑名單中秘密監視，並有計劃分期分批逮捕、審訊。

在中共公安部最近重新公佈全國通緝四十八名學生領袖和二十四名知識分子名單中榜上有名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

研究所所長陳子明，已證實被捕。一位日前返抵紐約的中國民運人士在七月十九日自北京獲得這項消息。陳子明在北京市長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作的「平亂報告」中，曾被「光榮點名」。他主持的社經科學研究所，以推動大陸自由民主化為目標，曾出版一系列政治性叢書。該所共有十五名所務委員，目前至少已有包括王軍濤在內的五名重要成員被捕。

另有消息指出，在學潮期間力爭新聞自由，曾以頭版整版篇幅刊出一敢有歌吟動地哀「長篇報導的《科技日報》，目前已有工作組正式進駐。該報社長兼總編輯林自新、副總編輯孫長江、林叢均在日前接到撤職通知。

楊魏再次被捕

至於曾在六月二日與劉曉波、侯德健及高新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的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周龍，已在七月九日左右在華南地區被捕。他會先後擔任北京外語學院講師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講師，並協助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工作多年，八八年曾陪同費孝通訪問香港。今年初才辭去北大教職，加盟四通集團。

上述戴晴、陳子明及周龍等人，至今仍未見官方正式公佈其被捕消息。倒是原大陸留美學生楊魏，則由新華社報道他被上海市公安局拘留審查。楊魏這次是「二進宮」。第一次被捕是八七年十二月，被上海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兩年。今年一月刑滿釋放。當局指「他在劃奪政治權利期間，又與『中國民聯』進行聯繫，提供情況。

在上海最近發生學潮和動亂期間，楊魏混進大學校園和學生遊行，絕食隊伍中，收集情況，多次通過長途電話，向在美國的「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報告他的活動情況，提供非法組織上海「高自聯」頭頭名單和聯絡電話。楊魏還為上海「高自聯」頭頭出謀獻策，唆使他們對抗中國政府。」

楊魏當年被捕時，曾引起美國國會對中國人權的關注。這次再度被捕，據他在美國留學的妻子女少利（其父曾為前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表示，楊魏自出獄後，言行都很謹慎，並未參與今次民運，中共沒有逮捕他的理由。

限制知識分子申請出國

為了進一步強化對思想意識和文藝創作的控制，擴大在知識界的一秋後算賬，中共中央宣傳部日前召開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有中共各省宣傳部長、文化廳長、中共中央各部與宣傳有關的主管幹部、國務院文化、廣播電影電視部、出版總署、教委等機構的主管。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政治局常委李鵬、李瑞環和書記處書記丁關根，在七月二十日會見了與會人士。江澤民發表談話說，「這次從學潮到動亂再到反革命暴亂，我們的經驗教訓之一，是全黨要深深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不管是不是黨組織還是行政組織都要重視。」

取代胡啓立主管「思想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工作的李瑞環也要求中共宣傳幹部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近期內要出版一批宣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書籍。

一位自北京探親歸來的人士對筆者表示，目前北京新聞界、知識界人心惶惶，風聲鶴唳。人人都得寫書面材料，交待自己在學運期間的表現。一批參加學運表現積極的新聞從業員，將會被清理調離新聞單位。此外，負責簽發出國護照的單位已接到上級通知，要嚴格限制兩種人的出國申請：一為知識分子；二為大學生。

百姓半月刊 1989/8/1



搜捕浪潮下的深圳之行 王路

近日陪友人到深圳一行，所見所聞，似乎零碎的，不完整的；在大搜捕、大清查浪潮下的深圳人，言行果然收斂了不少，彼此見面，已有些「盡在不言中」的味道。

綜合各種見聞，給筆者一個強烈的印象是：血腥鎮壓已埋下了復仇的種子，只要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相配合，大陸還會有「次動亂」，甚至真正的暴亂。其中鄧小平的去世是關鍵時刻，各種政治勢力將會作一次正面交鋒。

內地人士看問題比海外人士清醒得多，甚至比流亡海外的嚴家其、吾爾開希、劉賓雁更清醒。他們認為，鄧小平的去世並不意味著大陸從此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如果沒有一套民主政制，即使包青天上台，在中共那套專制制度下，也一樣會成為暴君，鄧小平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何況中共老人黨的能量，並不會隨鄧小平的去世而馬上消失，有可能大陸整個局勢變得更壞。不過，要改變中國的命運，只有靠「亂中求變」了，猶如火鳳凰在烈火中重生一樣，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這次到深圳，完全是被動的，事前根本沒有這種打算。

事緣友人鄭君的公司日前突然收到大陸某市檢察院發來的傳真，查詢在兩年前的「宗買賣合約中，中方人員非法收取佣金之事，並謂有關人員已被檢控，希望港方人員能夠作證云云。

肅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鄭君覺得很奇怪，因為有關同一事，涉及金額約一萬元人民幣左右，白紙黑字寫明是給某單位的，而不是個人，對方只是普通工作人員，要貪污也不致於「獨吞」吧？為了弄清這筆糊塗賬，鄭君決定前去查個明白；另一方面，他也想知道，目前中共雷厲風行地開展肅貪工作，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過，屠城後踏足大陸，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日前聽說有華僑回去探親，同親友談及「六·四」大屠殺事件却被人告發，結果被公安局以「散播反革命謠言」拘留問話。而港澳人士在大陸有什麼「麻煩」，更是以「自己人」視之。鄭君考慮再三，除了邀筆者同行壯膽外，還要求某市檢察院保證安全。對方很快回音，謂可以派員到深圳錄口供。看來新任黨總書記江澤民的「辦好七件事」已經成了當務之急。

一路上羅湖橋，立即感受到氣氛不同尋常，檢查證件的力度比往常慢了不少，海關人員仔細核對照片才放人。一般來說，入境應該比出境簡單才是，其實不然，筆者後來才知道，在北京當局認為香港是「反革命基地」後，加強了對入境「目標」的注意，據稱有港人攜護照出境，交與民運人士。公安人員主要監視「全支聯」和「中國民聯」的人員，對於後者，中共早就佈置了特務混入其中。但應學運而生的「全支聯」，聲勢浩大，尤其是成功組織百萬人以上遊行和籌款三千萬，使有關方面十分緊張；加上當時香港新華社傾向同情學運，因此情報有限。據有關方面對「全支聯」的瞭解，主要是根據李卓人交代的材料。這裏順便一提，知情者透露：李卓人當日帶上北京支援學運的二百萬港幣，早被中共沒收，而且這個決定在釋放李卓人時已告訴了他。

有了檢察院的「護身符」，我們的過關非常順利。在酒店安頓好之後，鄭君忙著與有關方面聯繫，安排作證的事項。而筆者這個陪客，就趁機到處去找朋友聊天。

「六·四」事件後的深圳，表面看來還是一樣，雖然遊客驟減，高級酒店的人住率一度不足五成，但本地消費能力却有增無減。一些的高士高、舞廳生意一樣興隆，一到晚上就人頭湧湧；而那些高級食肆，座上客均是本地人士居多。友人苦笑着對筆者說，這

也許是深圳人的末世情懷。「六·四」事件後，不少人想通了，認為空談政治還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至於說人們不知道「反革命暴亂」真相時，友人認為，現在還不是談「真相」的時候，反正中共當政四十年，有多少「真相」可言？遠的不說，近的如林彪出逃、「一四·五一」天安門事件、四人幫被捕、華國鋒下台等，十一億人中又有幾個知道箇中真相的。

希望逃脫的民運分子有作為

不過，由於深圳毗鄰香港，「六·四」大屠殺當晚，不少人看到或聽到了香港電視台的「特別新聞報告」，他們當然不會相信袁木之流的胡說八道。但在目前大追捕、大清洗的環境下，人們面對的已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如何在這場運動中自保和過關。現在每個單位幾乎每天都要有一、二個小時的政治學習，學習鄧小平及黨中央關於「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講話。據稱有些地方已出現了「土政策」，搞文革時期「人人過關」的那一套，並向每個單位下達「指標」，一定要揪出幾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才算完成任务。

「沒有辦法，我們都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絞肉機裏，只要它一開動，我們便體無完膚……目前只希望逃出天網的民運分子有所作為，因為只有他們才能說出我們的心裏話。」來自海口市的一個幹部這樣對筆者說。據他透露，海口的形勢遠比深圳嚴峻，半夜還聽見過槍聲，顯然是追捕民運分子。但他同許多人都告訴筆者，當局在搜捕民運分子時處處碰壁，非常失敗，人們想出許多巧妙的方法同公安幹警周旋，掩護民運分子。如聲東擊西報假案，使公安人員疲於奔命，讓真正的目標得以脫險。反正到處是熱錢檢學電話，很方便。當然多試就會失效，有些人更會上門報案，聲稱在某處發現了學運領袖，不料到現場抓人，其人只是與某人相似而已，這樣當然不能怪檢舉者。

記得在文革浩劫的十年中，只有一個著名知識分子馬思聰逃亡海外，事隔四年，中央還派專案組到廣東南海縣某村調查「協逃者」。可是在這次「六·四」大屠殺不久，成批的被通緝的民運分子都逃亡海外，現身

控訴中共當局的血腥罪行。據已逃到美國的學生領袖沈彤披露，他們從屠場死裏逃生後，沿途得到人民羣衆、特別是公安幹部的幫助，才得以踏上流亡之路。這一點中共高層是清楚的，震驚之餘，北調武警南下來堵截逃亡通道。據稱這批兇悍的「過江猛龍」果然不負主子期望，在深圳、珠海一帶搜捕到十幾個南下逃亡的大學生。筆者曾在深圳聽到柴玲被捕的消息，但一打聽，却是誤傳；聯想到那幾天深圳各處均傳「柴玲落網」的消息，不少人曾露出會心的微笑。「他們在人民羣衆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名小販悄悄笑着說。

對王丹被捕感痛心

不過，人們對王丹不幸落入魔掌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同時對台灣記者黃德北的「間接出賣」表示憤慨。一位參加過遊行的深圳大學學生告訴筆者，他們是收聽「美國之音」知道此事的，如果說王丹和黃德北的會面而被捕是無心之失，還勉強說得過去，但黃德北被關了八天，寫了悔過書，放出來還大放厥詞，說什麼王丹向他求助逃亡國外，王丹換了眼鏡電了頭髮，並透露其「六·四」以後的行踪，先逃往南方又折回北京等等，這不是向中共告密又是什麼？這位深大學士還說，他們對海外傳媒把注意力焦點集中在黃德北身上，而不關注王丹安危感到不解，事實上，當局至今沒有宣佈王丹被捕，已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這位同學綜合評價了幾位北京學運領袖，他認為吾爾開希最勇敢、有領導才幹，但比較浮，沒有理論基礎；柴玲則比較激情，有一股鼓動魅力，但理性不足，她與封從德的「綁架疑雲」更使人懷疑其作為領袖人物的品格（注：柴玲和其夫封從德在六月二日曾召開中外記者會，聲稱當局收買學生綁架他倆。但有消息說，是學生指她對籌款運用不當有意見前來理論，引起糾紛，並有錄音帶為證）。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王丹，則是學運領袖中比較成熟的一個，他在學運之前的一年多，就一直主持「民主沙龍」，對學運的方向作了不少探索，加上又是李淑嫻的學生，王丹自然得益不少，而且方勵之夫婦均是「民主沙龍」的座上客。這次中共把王丹排在通緝的二十一名學

運領袖之首，就可以看出他「受重視」的程度。

這位深圳大學的同學呼籲，希望海外新聞界筆下留情，不要大肆宣傳報導民運分子的逃亡路線和情況，反而要對被捕的人士盡量披露他們的近況，促請當局善待他們，和求公開審判。

等鄧小平死後再說

在全國各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際，大陸的民主發展如何？筆者詢問了好幾位朋友，得到的答案似乎是一致的：要等鄧小平死後再說。一位剛從上海出差公幹回來的人士堅信，鄧小平活不過今年，他說是上海一名醫生透露的「絕密消息」。據稱鄧小平於六月七日到上海作過一次治療，由七個醫生主治，診斷為晚期前列腺癌，已經不能動手術，生存時間只有三個月。「鄧小平只能活到九月」，這種傳聞已在上海公開流傳。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鄧小平本人並不知道自己的患的是絕症，他以為只是前列腺炎——老人病而已，因此才惹起風波地亮相電視，並發表「綱領性」的「六·九講話」。

現在看來，日本時事社日前發佈「鄧小平病危」的消息並不是空穴來風。而中共外交部在隔了一天才作出反應，稱此報道是「別有用心」而不是一毫無根據。事實上，自「六·四」屠城謠傳鄧小平身亡後，海外傳媒報導這類消息必定十分謹慎，而且在印象中，中共有把獨家消息透露給「日本友人」的慣例，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楊尚昆有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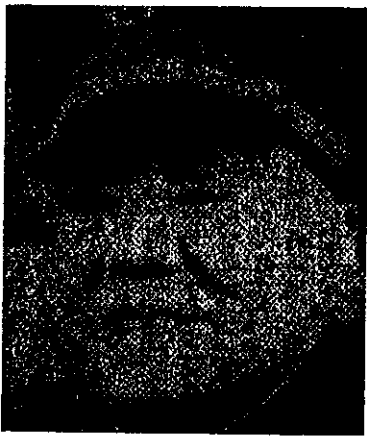
據知情者透露，鄧小平現在同晚年的毛澤東十分相似，直接能夠見到他的只有楊尚昆。如果隱瞞鄧的病情（包括他自己），顯然是想利用鄧的權威壯大自己的勢力。而目前最大的野心家公認是楊尚昆和他的「楊家將」，中共新領導六名常委如眾星拱月般地位與楊尚昆合照，就泄露了天機。屠城之後，軍隊勢力迅速坐大，即使鄧小平重選「第一軍委副主席」來制衡楊尚昆，恐怕也是有心無力。記得趙紫陽在政壇走紅時坐上這一交

椅，不料到軍委會開會時，門衛連門都不給他進。江澤民想沾槍桿子的邊，正如北京人說的，連門都沒有呢！

有消息說，「楊家將」的趾高氣揚已引起中共高層某些人士的反感，他們有可能放出鄧小平的病況來作爲試探氣球。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對外報導楊尚昆及其「楊家將」從不評論，如楊白冰是否他的親兄弟？趙南起是否他的外甥？二十七軍軍長是否他的兒子？其實不少報導是與事實有出入的，但楊尚昆似乎無所謂。反而新上任的黨總書記江澤民，對盛傳他是李先念女婿馬上作出澄清。

晚上，鄧君辦完了作「證人」的手續，與筆者會合準備回港，在車站外面，忽然人頭湧湧，公安人員如臨大敵，只見一輛小型客貨車改裝的囚車，押出幾個人來，直朝月台走去。路人議論紛紛，有說是當地的「暴亂分子」，被判刑後押往青海勞動改造，但也有說這批人是潛逃的學運領袖。一個武警向路人吆喝：「看什麼！快走，快走！」我旁邊一個老年人却大聲說：「陰功啊！但還咁年輕！」

也許他的聲浪太大，以致被押的人抬起頭向我們這邊注視了一下，我看見那剃光了頭的臉龐，是不足二十歲的年輕人，他臉上有一股不在乎的神色，然而目光是堅定的……至今，我還不時想到那一雙堅定的目光。



楊尚昆野心大？

南北極月刊 89/8

六四後的大浩劫

蔡省三 曹雲霞

陳希同，頂着「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的官銜，代表當道向人大常委會作被指所謂「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全文二萬餘言，極盡狡黠地掩飾案前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實，挖空心思來編造「截即穿的赤裸裸的謊言」，堪稱父老、父老、父老、父老的一篇「絕妙」的反面教材。我們認真地細閱深究，透過陳希同堂堂皇皇的「正面詞令」得以看清他們「背而實質」的黑暗重重、罪惡累累。

大陸來客的證言

陳希同之流以爲一手掩蓋天下耳目，就可塞家人之口，但這是癡心妄想。北京雖然「戒嚴」，大陸焉可「密封」？事實勝於雄辯。陳希同報告發表之後，我們接觸了多批大陸來客，爲替「報告」求證，且舉兩個例子。

北京一位退休老人，帶着一個十五歲讀中學的孫子來港。我們作過如下的談話——

問：你們北京市長陳希同作報告，說天安門事件只死了三十六個大學生，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死了二十三個大學生，你們知道的情況怎樣？

中學生搶着說：陳希同、袁木都是瞞着眼睛瞎胡說，六月四日早晨，我鑽到宣武醫院去看了一下，嚇人呀，從門口到走廊地上成排躺着滿身鮮血的受傷的大學生、工人，奇怪的是他們都不叫喚，只是大聲呻吟。

問：有死的吧？

答：那麼多人，血肉模糊，看不出死了還是活着。

問：你看到大概有多少人？

答：至少也有一百多吧，我見到一個受傷者的臉，像是炸開花似的，肚腸都翻出來了，真慘呀，我不忍再看就走了……

老者說：北京人全明白真相。現在是政府幹部公開說假話，不准老百姓公開說真話。

問：私下說「真話」嗎？

老者答：關起門來，沒有外人，大夥兒全是半壁滿腹，我認識的共產黨員也不滿。這樣殺人

、抓人哪能行呢！戒嚴也不能老是「戒」下去，咱北京人恨死了戒嚴部隊，管叫他們「驢子部隊」。

問：老百姓敢公開議論嗎？

答：不敢！公安武警、便衣，還有居民小組的「眼線」，隨時隨地偵察抓人。你如果說見到打死學生老百姓，就打成「暴亂分子」立即逮捕，你說聽到別人講的，就叫「造謠分子」，也要逮捕，還要拷問謠言來源，又會株連逮捕其他人。

問：這樣說來，北京逮捕的人可多啦！

答：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吧，北京的看守所、監獄全滿了，現在徵用大倉庫關人。一個接近高層的朋友告訴我：上邊認爲北京這次捲入暴亂的「壞人」很多，按北京人口的比例，有十分之一的人要「處理」。這怎麼得了呀！

湖南逮捕約兩萬人

又湖南衡陽一位幹部來港透露：六月四日上午，衡陽就得到北京大屠殺的信息，省師範學院、省礦冶學院、市師專等學校數千學生立即上街遊行，抗議北京屠殺學生。衡陽礦山機械廠、衡陽拖拉機廠等幾千工人也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學生同工人匯合到京廣鐵路臥軌，使鐵路交通中斷。當晚衡陽軍分區出動部隊把臥軌的學生、工人驅散，沒有「開火」，有無死傷不清楚，但長沙學生、工人又在臥軌抗議，鐵路交通幾天不能恢復。

湖南省方下達指標抓人，衡陽江東區派出所透露第一批抓人指標是六十人。兩天抓到五十八個，缺兩個就抓有案底的刑事犯頂數。抓人指標必須完成，衡陽另兩個區的指標是各抓一百人。衡陽市第一批指標共抓了二百六十人。湖南省共有一〇二個市、縣，平均每縣抓二百人計，全省大逮捕，至少在兩萬人以上。

另據合衆社自北京獲悉的一條信息，當局爲了對民運分子斬草除根，通令懲罰廿類人。大陸各省市以至基層，受害者之衆，可想而知。據此推斷，「六·四」北京屠城所揭開的全國範圍的大逮捕、大處決、大整肅、大羅織，將有億萬人遭殃，是中華民族又一次大浩劫。

中港澳邊境大追殺

爲了搜捕民運分子，深圳特區已進入了戰時狀態；

六月三十日，珠海抓了三百多人；
七月一日，拱北邊境槍殺了四名無辜；
七月十一日，廣州全城警察出動，大舉拉人……

本刊特約記者 曉 冲

「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民運分子展開了一場逃亡浪潮，至今仍有不少在中共通緝名單中的人士仍在逃亡中。

吾爾開希及嚴家其等人的逃出魔掌，給海外華人注射了一支興奮劑，但至今沒有透露他們逃亡的正確路線和經過。香港的傳媒有說吾爾開希是從珠海逃到澳門轉香港的，有說從海南島逃到澳門轉香港的，也有說他是從陸路偷渡到香港的，更有人根據吾爾開希是新疆維吾爾族人，想當然地推測他是由新疆逃到外國的。

秘密管道與東亞西

對於廣大關心中國民運的讀者來說，吾爾開希的逃亡路線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們逃亡成功已是一個事實。然而，他們的逃亡路線，對於中共安全部門來說，卻顯得異常重要，楊尚昆一再指示國家安全部門，一定要破獲這條偷運民運人士出境的秘密管道。

六月中旬，香港傳媒報道了吾爾開希逃出中共魔掌到了香港並轉去外國的消息，隨即劉賓維也在香港公開透露嚴家其已到了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這兩個消息在民運人士及中共高層中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民運人士嚴厲批評香港新聞界及劉賓維，說他們不該把消息透露出去，引起中共當權者的注意，這樣會影響其他民運人士的逃亡。
中共上層對此非常震驚，馬上加強了邊防，阻止民運分子的外逃。

但是，一位人士私下對記者說，這是吾爾開希等人有意利用香港傳媒聲東擊西，吸引中共的注意力，以掩護一些非經港澳方面外逃的秘密管道。他說，報告文學作家賈魯生等人去年就從容易地從福建、浙江沿海僱船駛到台灣海岸。他分析，中共對邊防口岸管理最嚴的一向是廣東省，北京戒嚴時期及通緝民運分子時應該更是這樣。而且，他認為嚴家其及劉賓維絕不會蠢到要自己暴露。

安全部滲透港澳調查此事

中共獲悉嚴家其等人逃出生天之後，馬上對可能逃亡的三個熱點——廣東、雲南、福建——加強了佈防。同時，派出特工人員展開調查，嚴密監視大陸的秘密管道。

據一位在中共重要部門工作的幹部密告記者，據他所知，已有數十名特工前往港澳追查香港新聞界報道吾爾開希逃亡的消息來源，這些人新開關出境時是被秘密安排的，直接到達港澳的邊境關卡，所以連中方口岸的邊境人員也不知道他們持有何種出境證件和攜帶了些什麼物品出境。這些外派特工與在港原有特工結合，對劉賓維夫婦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一些人士進行了秘密監視和調查。

另外，有消息說，由於吾爾開希逃亡成功，令中共法西斯集團極為惱怒，楊尚昆對一些海關及邊境部門失去信任，以工作疏忽和緝拿不力爲由撤了一些領導的職務，派其親信接管了這方面的主要部門。

槍口下的證件檢查

最近，記者出差到大亞灣核電工地，然後到小梅沙渡假區小憩，隨即實行了一次深圳——珠海——澳門的邊防採訪計劃。

在以往，從內地進入經濟特區（所謂二線關卡），是必須檢查證件的，離開特區返回內地時，是無須檢查證件的。而現在從內地進入特區，則需要進行雙重檢查，比過去嚴密了一倍，離開特區返回內地時，關卡還須進行雙重檢查，而且檢查過程由荷槍實彈的軍人進行監視，隨時緝拿到了特區找不到外逃之路而折返的民運人士，這是以往所絕對沒有出現過的，而且對青年學生模樣的人檢查尤其嚴厲，令經常進出特區的人士煩呼極不方便。

在特區內部，往日的自由氣氛不復見了，代之以一種戰爭前夕的緊張氣氛。記者從小梅沙到深圳市區，二十多公里路程竟遭到四次軍警設卡

的檢查。從深圳到南頭的一段，亦遭數次檢查證件。同車的一位沙頭角的幹部說，邊防區自開放以來已多年聽不到槍聲了，但最近晚上又開始聽到了槍聲。他透露，爲阻止民運人士從沙頭角中英街逃跑，六·四大屠殺之後深圳市公安局已接獲上級通知，停發通往沙頭角的特許通行證，令這個近年靠國內遊客發達的小鎮一下子變成了死城。而在蛇口方面，六月底的一天，公安就抓了三十多人。

以緝私名義追殺民運分子

爲了堵截民運分子的逃離，除了陸路封鎖檢查加強，海上堵截追緝以防民運人士逃離的工作也不斷強化，而且將往日用於查緝走私物品的海關和公安力量，盡量轉移到堵截追緝逃往民運人士方面。

面對走私活動的日益增多，今年五月中旬深圳九龍海關添置了一艘名爲「海關九〇一」號的四百噸級快速炮艇，設有進口先進雷達及導航系統，還帶有兩艘高速快艇，被譽爲海上緝私的「旗艦」。這艘高達二千五百萬元人民幣。這艘先進炮艇投入服務只有一個月，就被中共在堵截民運分子從海路逃往方面大派用場。爲了在珠江口堵截追緝上取得奇效之勢，中共當局又要黃埔造船廠趕製一艘造價爲一千多萬元人民幣的「海關九〇二」號豪華緝私艇，給拱北海關急需用。此艇七月三日交付使用，一開始就不是用於緝私，而是用於對付民運分子。

爲了追捕逃往民運分子，海關總署和公安部於六月十九日聯合發出《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賦予海關人員在遇到被截查船隻或人員反抗和逃遁時，可以開槍射擊。這個時候發出這樣的「規定」，一如鄧李楊法西斯集團在六月四日前賦予北京戒嚴部隊可隨時開槍殺人的權利一樣，無疑是一紙對付逃往民運人士的格殺令，與當年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一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

爲了對民運分子趕盡殺絕，中共武裝人員不惜開進香港及澳門水域，截查他們認爲可疑的船隻，對港澳居民構成極大的生命威脅。據報道，六月三十日晚九時三十分及十時十五分，中共一號配備武裝的深圳九龍海關「海關一〇三」號快艇兩度闖入蛇口對開香港流浮山水域，分別攔截搜查兩艘香港方面正在進行水上作業的運沙船，還一度企圖將其中一艘拖往蛇口，以搜查是否藏有逃亡民運分子。

拱北的槍聲與圍捕

本來，北京屠殺事件已對深圳及珠海兩特區旅遊業於沉重打擊，而中共緝拿民運分子運動南

移，到處設卡檢查，邊檢加嚴，造成了特區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氣氛，又更進一步打擊了旅遊業。記者在深圳逗留一晚，當夜就有公安人員查房，而在珠海逗留三晚，其中兩晚就有公安人員深夜查房，其中一次公安人員猛拍房門，進房後又兇神惡煞地搜查和盤問。而且，在珠海的一些主要路口，夜間不時會有軍警突擊設卡檢查路人和車輛。所以，不僅港澳人士已很少人到珠海旅遊，內地人也少了很多，一些賓館酒店門可羅雀。

據珠海一位知識分子幹部告訴記者，自從香港電報、電台播報吾爾開希及嚴家其已脫險境，內地不少人斷定他們是從珠海先逃去澳門再轉去香港的，所以六月下旬以來珠海邊防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他提供了幾個事實：
六月二十七日，軍警突擊包圍了澳門迷仔對岸的灣仔，拘捕了四十多人；
六月三十日，軍警又進行了一次突擊搜查，逮捕了三百多人（一說一百多人）；
七月一日，軍警在毫無警告下就開槍射擊，當場打死四人。而四名死者中沒有一名是民運分子，全是想偷渡到澳門打工及探親的人，中共殺無辜可見一斑。

由於特區變得越來越恐怖，邊防變得越來越殘酷，據稱港澳及內地一些毒蛇集團見風聲太緊而相繼縮手。香港警方公佈的近日截獲的大陸非法入境者數字，也說明了這一問題。警方說，六·四大屠殺以前幾個月，每日平均截獲非法入境者四十五人，而六月份平均每日只截獲三十五人。預計這個數字七月份更會大幅下降。

七月十一日，廣州市出動全部公安警察，在全市旅館、酒店、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實行大搜捕，十二日，又對全市有嫌疑窩藏外來人口的民居進行全面搜查，抓了不少人，其中是否有民運人士則不清楚，但據稱周純是在該次搜查中被捕的。據一位知情者說，六·四之後確是有一大批民運分子逃到廣東，但六月底大部分已知難而退，紛紛北返內地匿藏，以求再謀出路，情況令人擔心。不過，內地民運人士認爲，如果西方國家對中共現政權的態度更強硬些，制裁行動激烈些，拖下去中共經濟就會崩潰，時間將對民運分子較爲有利。

大追捕下的廣東

深圳大學、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最近都有學生被捕。
中央插手廣東公安局長會議，珠海市公安局長烏紗難保。
深圳短髮女郎人人自危，深大校長羅征啓從化溫泉「療養」。

本刊特約記者 曉冲

在八月之前，在廣東境內已逮捕了多名民運人士，這些被捕者據稱都是逃亡南下的，廣東本身的人一個也沒有。

但是，踏入八月，形勢起了變化，一股「寒流」突然南下，吹皺了廣東的一池春水，廣東省安全部門突然大開殺戒，拘捕起本省範圍內的民運人士來。

廣東省一位消息人士對記者說，在全國（大陸）範圍內，對北京民運及鎮壓事件知道得最清楚的，是廣東人民，他們知道真相，可是最近他們卻被迫學習歪曲事實的中央文件（陳希同「平亂報告」之類），心情很不好受。據他說，廣東當局在「六四」之後，為了安定人心（初期人們以為會內戰，食米搶購到三元人民幣一斤）和不影響外商的投資，想盡量淡化北京事件，盡量不激化矛盾，因此不跟着北京大肆抓人。但是，此舉令北京當局很不高興，頻頻責怪下來，使廣東當局受到很大壓力。廣東最近開始抓本省民運人士，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

深大、暨大、中大都有學生被捕

八月十六日，本港傳媒報道了有三名在廣州暨南大學就讀的澳門學生在內地被捕，消息馬上震動了港澳兩地。這些學生被指參與營救大陸民運人士的「秘密管道」的活動。照此說法，他們應不是參加學運而被秋後算賬那一類人。

但是，最近深圳大學有六名學生突然遭逮捕，就全是因为參加了學運而被說成不會秋後算賬之後而遭清算的了。

「六四」之後，深大校長曾接到深圳市委解釋深大校園期間的問題，當時傳出消息，說市委對深大校長的解釋表示滿意，全校師生都鬆了一口氣。但是，隨後風雲突變，深大校長突被撤職軟禁，最近更是連捕六名學生，搞得深大人心惶惶，非常緊張。

據深圳市一位幹部對記者說，這一連串突然行動，深圳市委是愛莫能助的，甚至廣東當局也是無可奈何的。據他透露，最近被捕的這六名深大學生，學潮期間都到過北京，與北京學生有過串聯活動。不過，這種活動在當時太過平常了，

誰也想不到會有被捕的結果，所以這六名學生的突然遭拘捕，多數是沒有思想準備的。

中央插手廣東公安局長會議

最近也有消息說，廣州中山大學也有數名參加學運的學生領袖，因拒絕到公安局自首登記而遭拘捕。

為了推動廣東方面的搜捕工作，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都派了人南下加強廣東方面的公安領導工作。據說在最近廣東省公安廳召開了一個全省公安局長會議，會上嚴厲批評珠海市公安局疏於防範，說如果再不問題就要把珠海市公安局局長撤職查辦。

據說，上頭認為吾爾開希、嚴家其等人是從珠海逃往澳門的，近月也特別多民運分子意圖從珠海偷渡去澳門。這就成了珠海「疏於防範」的罪過。最近被捕的三名暨大的澳門學生，也有人懷疑與此有關。

深圳亂抓人反受表揚

在那個公安局長會議上，珠海受了批評，深圳却受到表揚。

在深圳，沿海地區的居民都被告知，無事莫到海邊走。特別是與香港元朗隔海相望的後海灣邊的深圳大學和蛇口工業區，以前青年情侶談情說愛都喜歡往海邊漫步，「六四」之後青年人被告警：晚上到海邊會有危險。

據深圳一位人士透露，深圳的邊防軍近月也像北京的戒嚴部隊進城前被禁閉一樣，不准看香港電視，不准收聽香港、台灣及外國電台的廣播，只學習有關「平亂」的文件及當局有意剪接成的所謂「反革命暴亂」的錄相影片。所以這些受蒙閉控制的士兵很相信「黨中央」，對人民特別是青年和民運「嫌疑犯」非常兇狠。

假裝玲滿天飛

深圳亂抓人更表現在到處都說抓了「柴玲」，但都說是假的。

吾爾開希、王丹、柴玲這些學運領袖的名字，早在「六四」之前就為深圳市民家喻戶曉，

「六四」之後更是深入人心，贏得了深圳人的愛戴和同情。

但是，一些想立功升官的敗類，對搜捕南逃民運人士非常賣力，對稍為像學生領袖的人都會窮追不捨，必欲捕之而後快。所以「六四」之後沒幾天，深圳就傳出抓到了吾爾開希，後來證明是假的，被捕者只是長得有點像吾爾開希而已。

深圳的消息很靈通，吾爾開希逃亡成功，王丹被捕，公安人員與香港人同時知道（當然靠香港傳媒）。吾、王已無文章可做，注意力集中到柴玲頭上來。於是，女青年多難了，到處都找柴玲，到處都找到過柴玲，但都是假的。下面是兩個例子。

在蛇口工業區，一天一位青年女會計在街上給公安人員抓了，因為她樣子長得像柴玲，又留着短髮，於是被拉到了公安局。她講了自己是某某單位的會計，公安人員不相信。她單位的領導知道後，到公安局去請求放人，公安局不肯放人，直到那領導願以人頭擔保，公安局才相信是抓錯了。

一天晚上，在深圳大學的海邊，邊防軍也抓了一個「柴玲」，她辯解自己是深大的學生，到海邊散步，軍人不信，要抓她走。後來她說有一辦法可以證明她不是柴玲，她說柴玲不會講廣東話，而會講。待她講了幾句廣東話後，軍人才放了。據說，她是電視劇《紅樓夢》劇組的一個演員，目前在深圳大學進修。

羅征啓——深圳公安踢皮球

至於深圳大學校長羅征啓，「六四」之後不久，他已預計到會接整，果然七月份就遭到軟禁審查。

深圳大學在近年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全國許多著名學者都曾到該校講學，對於自由思想的傳播，深大師生可謂不遺餘力。在一九八七年反資之前，深大就已辦成了一間自由開放的大學，該校打破了鐵飯碗，不負責任學生的分配工作，學生畢業後都要自謀出路。而該校所有學生都要交學費，因為要自掏腰包讀書，學生的自由度也特別大。教師的招聘也只注意學術水平，不考慮政治觀點，一些中共認為的「自由化分子」，能得以在深大任教。所以，深大的學生會、教授會和教師工會，都是真正民主產生的，這次領導深大民運的，正是這些合法的學生會和教授會，這在全國據稱是唯一的。所以深大學潮期間的一切活動，從中共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合法的。

深大所以有此成就，當然與校長兼校黨委書記的羅征啓的努力分不開。但也正因如此，中

共保守派認為深大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堡壘，而羅征啓是一個危險人物，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中共這次軟禁羅征啓，撤了各系主任的職的同時，從廣州和粵西兩間低一檔次的大學抽了兩名很聽黨話的左傾官員到深大接替羅征啓的校長和黨委書記職務。深圳大學學潮期間的五月十八日，校長、副校長及全校共產黨員聯名急電中共中央，要求鄧小平退休，並發起全市簽名，以順利解決北京學生絕食及平暴學潮。故此今次整羅校長，據稱是北京的意見。

據說不久前曾有人勸說羅校長「逃亡」，但他心胸坦蕩，認為自己沒犯法，沒做錯事，不必躲起來。

但是，深圳的公安局對他沒信心，深大離香港太近了，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擔當不起，所以最近當局打算把羅征啓安排去從化溫泉「療養」（形同軟禁），相信校長是不得不答應的。◆

·一個四川農民的遭遇

廣州公安局嚴刑逼供

·孟歌

九月十九日，筆者在廣州車站送一位朋友北上。這是「六四」之後第一次去廣州，突然有人叫我一聲：

「這位大哥……」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青人，中等身材，衣衫破爛，蓬頭垢面，面色慘白，他說的是四川話，而我也正是四川人。便和我談了起來。莫名其妙被捉。他是四川郊區的農民，姓張，只有二十一歲。我問他：到廣州來做什麼？他說：

「……夏天，田裏的活不多。想利用這個時候出來做做工，賺幾個零用錢。成都亂，工廠開工不足，臨時工根本找不到工作。聽說廣州不亂，工資又高，所以找了一個伙伴，一起跑來廣州。誰知到廣州第三天，就被抓起來了！」

「為什麼抓你們？抓人要出逮捕證呀？」

「什麼逮捕證？什麼都沒有說。那天晚上幾個警察來到旅館，推開房門就給我們扣上手銬。問我們：你們犯了什麼罪？不回答，只是連喊帶叫，將我們推上汽車，抓去之後就把我們分別關進拘留所。幾個監房裏，那裏已經關了人，三、四十平方米的房間，足有數十人。我只盼快點審我，我好把話說清楚，可是等了一天也沒審我。吃飯沒我的份，我餓了一天，大約晚上八、九點鐘，監房門開了，一名刑警把我提了出去。他們把我拉到一個小房間。那裏已經有兩個警察坐在桌後面。問我姓名、年齡、哪裏人。接着問我來廣州的目的是什麼，我說是來做臨時工。那警官不記，冷笑一聲，說：『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誠心誠意地向他說明，我的確是來做臨時工。他不聽，叨起一枝煙，叫那刑警給我開手扣，我以爲要放我。但我高興得太早了，手銬剛開了一個，站在警官後面的那個警察立刻將我的雙手拉到我的後背卡

「你不會主動交代的。」接着命令他的助手警官：「開導開導他！」

他的聲音沒落，那助手一掌已經打在我兩眼上，接着來的是一拳，打在鼻子上，又一拳打在咀上，鼻子和咀一起冒血，我暈了，從櫃子上跌到水泥地上。然而那助手還覺得不夠勁，於是喊起來：

「你他媽裝死！不用裝，有你死的時候！起來！」

一邊說，一邊踢我的兩肋，我的肋骨幾乎被踢斷了。然而我確實站不起來。一直站在旁邊那個刑警，教我一把，將我扶起來了，汗衫被血浸透了，血在一滴一滴地流。警官又燃起一枝煙，一邊吸一邊瞪着我：

「你來廣州幹什麼？交不交代？」

我聽不出聲，我知道出聲就得挨打，莫如不出聲，打就由他打，反正是不會動的。警官只等了幾秒鐘就氣炸了，這回是他親自動手。他走到我面前，左右開弓打咀巴，左一個右一個，不知打了多少個，最後兩下不是咀巴，而是洋式的，在我的下額下面，左右各打了一拳，——我又被打倒了，昏迷了。那助手狠狠地踢我，把肝腸踢傷了，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監房裏了。嘴裏全是血，頭痛，喉痛，鼻痛，咀痛，最痛的地方是肝，呼吸都不用力。——我已經想到死了。

「吃飯的時間到了。飯是限量的，每人每天四兩糧，每餐一小碗有兩塊咸菜。我最需要的是水，我渴得要命。然而水和飯一樣——限量，也是每人只給一碗。如果不是難友們每人省下一口水給我，我會渴死的。

難友們紛紛安慰我，教我咬緊牙關，活下去，千萬不要死在裏邊，死掉白死，聽他們講話，大多數是外地人，廣東人很少，都是來廣州找工作的，無辜被抓到這裏來。奇怪的是警察也都是外地人，說普通話，據說，都是原來的知識青年，當過紅衛兵，管過牛棚，所以打人特別狠，百十個難友，個個都被他們打過幾次，沒有一個不被打傷，有的被打傷之後，一直坐不起來，只能躺在水泥地上，吃飯都需要難友喂，大小便都要人幫助。」

「難道他們真是不知道你們和民運毫無關係嗎？」

「難友們說得好：他們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知道；他們希望我們都是動亂分子，逼我們承認。」

有的人被打得精神崩潰，曾經承認。但承認之後並不饒恕，而是你的同伴，叫你交代，是誰派你來的？交代不出來，再打，打得更狠。所以難友們告訴我，寧願被打死，也不能承認。

「打不會只打一次，有人三、四次，有人五、六次。有人六、七次。五、六天過去，都沒打我。我以爲他們知道把我打垮了，無須再打了。誰知就在那一天晚上，突然來提我。我一出監門，立刻將我反扣起來，推着我走。還是那個房間，那警官還是坐在桌子後面，叫我的名字：

「張××，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想好了沒有？交不交代你爲什麼來廣州？」

他的兩眼直瞪着我，我感到渾身發涼。我牢記敵友們的叮囑，下定決心不說話。警官不耐煩了，用手推了一下助手，助手立刻走過來。我全身做好了挨打的準備。但助手沒打我，而是輕輕對我說：「跪下！我跪下了。」「不對！」助手對我喊。我不知道什麼不對，抬頭睜眼。這時刑警過來：「起來！」我起來了，他把我腳前的棍子移近我說：「跪在上面！」原來是叫我跪在棍子上面。我怕，我遲疑，助手過來左右開弓打我咀巴，打了一陣，轉到我身後，踢我小腿，將我踢跪在棍子上，雙手壓我的兩肩，我立刻痛得哭叫起來，他拼命壓，我忍不住，跌倒在前面，他把我揪起來，逼我挺直腰，我痛得連連哭叫，出了一身冷汗，小便也撒出來了，我再跌到前面。他抓着我的頭髮，再揪起我來。從後面狠狠地踢我一腳，我的頭咚一聲撞在水泥地上，我又昏迷了。

「和上次一樣，我醒來時，躺在監房的水泥地上。」



·抓入公安局，不問青紅皂白，先給一頓毒打。

上。手腕上道道血痕，額上一個血包，第三次打打幾時到？還能捱過來嗎？打打前的恐怖，比打打更可怕。」

「第三次又來提我了！」一出監房，照舊先跨上。還是那間房，還是那三個警察，擺在桌子前面的是一個棍子和一條竹扁担。

「叭！叭！」助手命令我。我照辦。「把手伸到前面！」又命令一句。這時我才明白爲什麼今天正跨。我把雙手伸直，雙腿也伸直，肚皮貼在水泥地上。於是他們把棍子放在我雙腳上，我的腳再也不能動了。這次什麼不問就開打了。打了三下我就忍不住，哭叫起來。這時警官才問我：「交不交代？」我不出聲，再加重打。打屁股，打大腿，打小腿。我只感到把屁股和腿統統打爛了，屁股和腿統統沒了。我又昏迷了。

這一次把我徹底打垮了，醒來之後也只能趴在監房的水泥地上，不能動。流血過多，褲子粘在屁股上和腿上。肚皮整天貼在地上。涼氣進入肚內，引起肚痛。肚子的痛造成了，肚皮明顯地鼓了起來。

「刑警知道了，從此沒再提我受審。後來還帶我去看醫生，給藥吃。」

突然一天，刑警教我給家裏寫信，請那邊政府開個證明信來，就可以放我回去，但是必須交足二百元伙食費和百元醫藥費。我想兩個多月的時間，糧和藥加在一起，不過幾十塊錢，憑什麼要三百多？又一想，活命要緊，只要能出去就行了。我立刻給家裏寫了信，很快就接到了妻子的三百五十拾元錢和政府的證明信。他們果然把我放了。不過我的病還沒好，肚子越鼓越大。但我沒錢吃藥，剩下的五十塊剛剛夠回去的路費！」

搭上回港的火車，一路上我心不能平靜！我想起當年逃出波爾布特魔掌的一位華僑說過的一句話：「寧做外國狗，不做中國人！」走！九七之前一定要走！

可是，就算我自自由了，那十一億同胞怎麼辦呢？

中國獄中酷刑知多少？

■李重生

被捕民運分子的處境

最近，又有兩位著名的民運人士，蘇曉康、遠志明成功逃亡到海外去了，而中國民運流亡組織「民主中國陣線」在九月下旬舉行的成立大會，則引起各界注意，我們的焦點也自然集中在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身上，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生活起居，都被詳盡報導。可是，當我們為他們歡呼、額手稱慶的同時，又有否想過，在中國大陸的監獄裏，有多少被捕的學生、知識分子、工人正在受着煎熬？他們的命運會如何？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中國大陸監獄內的情況，相信大家都有數，有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就曾說過，如果要坐牢，則寧願被即時槍決。此外，監獄中的虐待事件，已是屢見不鮮，特別是政治犯，他們的處境更使人擔心。

有消息傳出，學生領袖王丹、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包遵信，已證實被逮捕，而且可能被判刑。那麼，柴玲、封從德又會受到怎樣的對待？還有上千的被捕民運人士，實在十分需要外界的關心和幫助。

國際特赦協會就此做了一份有關大陸監獄虐待情況的報告，希望引起世界對大陸政治犯人權的關注。

國際特赦協會的報告

該份報告的資料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刊物，也有來自受害者的親目敘述。它詳細報導了大陸監獄的黑暗面。在此，筆者嘗試簡錄報告中一些文章，乘十月一日中國大陸慶祝四十年建國之際，讓我們進一步知道，在中國某陰暗角落裏，有些人正受着不合人道和不合理的刑罰。他們的處境，正是對「國慶」的一個大諷刺。

其實，大陸獄中職員虐待犯人的嚴重程度，不單震驚海外的人權份子，而國內有關當局也不得不視若無睹，《人民日報》和《中國司法新聞》(China



傳聞王丹在獄中遭受嚴刑迫供。圖為他與李淑嫻主持民主沙龍，此情此景，何時再見？

手銬與吊臂虐待殘酷

根據國際特赦協會的調查報告，在大陸監獄中最常用的虐待方法或工具有五種：手銬與電絕緣器、毒打與吊臂、電棒、箱禁、以及隔離等等。

手銬與電絕緣器：這是獄中最殘忍的懲罰方法，本來它只是用來防止犯人逃走的工具，但現在卻變成殺人的武器。那些獄吏比較喜歡採用牢固手銬，直扣入肉中直至露骨為止，犯人的雙手因此變白，由白又變為藍色，再變紫色，最後變成黑色，無論犯人如何堅強，在此情況下，他亦不能不痛苦地滾在地上大喊。這種刑罰連續實行多次，而每一次的痛苦都會加深，使到身如針刺，痛不欲生。

Legal News)亦有就此作出報道及提供改善的建議。不過，這些建議永遠無法得到落實。有人形容監獄職員濫用職權、虐待犯人為一種「死症」，是文化大革命後遺症，這由於當時這種行為被官方廣泛接受，他們都喜歡用嚴刑迫供，人性也被扭曲得殘酷不仁，直至現在，文革的影響仍然深深根植在執法者身上，那麼，大陸的監獄，便變成人間地獄，聞者色變。

著名良心犯劉青，他在八零年被拘留在北京主要的拘留中心時，指出他曾被毒打多次，後來更被迫戴上防毒面具，呼吸變得異常困難，而雙手同時被扣上牢固的手銬，獨自處於又濕又冷的監房裏，與外界隔絕超過半年，身心大受影響。劉青更指出，有些犯人不單被扣上手銬，雙手還反鎖於頸後多天，受過此刑罰的人，雙手都不能正常移動。

毒打與「吊臂」：這是最常用的虐待行為。有不少受害者形容監獄為住滿活人的棺材，所不同者，是該棺材充滿犯人被打的叫喊聲，喊得死去活來。另一著名良心犯徐文立說，在拘留中心裏，毒打和電刑之聲，不絕於耳。一名被判「反革命」的西藏青年，就給毒打得下顎破裂，不能飲食。

此外，「吊臂」也是酷刑之一，其意思是把新來的囚犯，繫扣上手銬，然後向後懸吊，就這樣維持多天。當他被放下來時，雙臂都近乎癱瘓，肌肉組織與神經嚴重損壞。一醫生說，囚犯遭受該刑罰，甚為普遍，他亦治療過不少該類囚犯。

政治犯傅月華，也曾遭受類似酷刑，當時並被打得遍體鱗傷。當她進行絕食表示抗議時，公安人員使用上火鉗強行把食物塞進她口中。其實，很多囚犯都想過以絕食來抗議，不過，這不會因此引起獄吏的憐憫之心，反而會招致更殘酷的折磨，因為對他們而言，死人祇是等閒事，每天不知有多少囚犯被折磨至死。更甚者，則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電棒和箱禁苦不堪言

電棒：它常被用於囚犯身上，來阻嚇他們有越軌行動。電棒的柄一般由橡膠所造，配以高電壓的合金鉗線，大部份公安人員都戴在腰間，預備不時採用它。

受過電棒虐待的犯人指出，電棒大約是一呎半長，獄吏受把它壓在他們頸項上，他們全身便立刻感到震盪，好像失去頭骨一樣，跟着小便失禁，肋骨和

組織細胞受到極大損傷，以致不能閱讀和寫作，產生不少後遺症。有些犯人寧願被刀割，也不願受這種神經上難以忍受的煎熬。現在，他們見到電棒，就如見到毒蛇一樣。

箱禁：不少囚犯曾被囚禁在祇有二、三平方米，猶如紙箱大小的房間裏，他們在那裏根本就沒有足夠的空間站立或坐下。這種紙箱式的囚禁，有時維持數天，有時亦會持續數月之久。無論如何，犯人祇要受到這種禁固，超過數天，他自然步履艱難，就算釋放出來，也會雙腳走路困難。

有時候，紙箱式囚禁不單限於一人，獄吏甚至可以同時安置十數人在內，擠迫情況，難以想像，法新社就此作出過不少報道。

舉例來說，被拘留在上海黃埔看守所的其中一個政治犯，便描述過監房的恐怖環境。他和其他十二、三個囚犯同處於三平方米的房間中，根本嚴重缺乏空間。在白天，他們要雙腳舉起，才能為自己的身體找到一個位置。但在晚上，他們則排成兩行，頭碰頭，或頭碰胸，像沙甸魚一樣，以便容納多一些囚犯。因此，他們就被弄得動彈不得，呼吸困難。

在此情況下，冬天已經比較好些，在夏天則更糟糕。他們祇能穿上一條短褲，汗水流得地上通濕。由於環境過份擠迫，衛生惡劣，使得犯人身背上生滿瘡瘡，他們稍為移動，瘡面便會破裂，流出膿水和血水，粘着褲子。他們形容這種生活比死還難以忍受。

此外，房間內空氣異常混濁，加上沒有空氣調節，慢慢缺乏氧氣，內裏的人就如處於窒息的狀態中。

曾受過此酷刑，現居於中國的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向筆者說，現在中國政府大舉逮捕成千上萬的民運人士，中國根本沒有足夠的監房安置他們，他猜測，他們很可能正受着以上的所謂紙箱式拘禁之苦。

隔離使人走向瘋狂

隔離：把一個囚犯長期隔離也是一種極不人道的刑罰。很多著名的政治犯便是受此對待。

一位名叫鄧奕明(譯音)的廣州區神職人員，他已被隔離了近二十年之久，在八二年獲得釋放。《探索》主編魏京生，也遭到長期隔離，親戚朋友不能

探望，傳聞他變得精神崩潰，不能認人。而《四五論壇》編輯徐文立也曾獨處於沒有窗門的房間，不准寄信、閱讀，或接受親戚朋友的探訪，食物更逐漸減少，身心俱損。

去年逃往美國的中國民運份子兼律師梁鐵杉，他因支持八六年學潮，也被送進牢獄，而處於半隔離狀態。他告訴筆者，他因獨處而有兩個月沒有說過一句話，之後，感到精神混亂，像快要發瘋一樣。他繼續說，獄吏非常殘暴，他祇要在你身邊經過，也會給你一個重拳。伙食更不用說，他坐牢初時，一天祇能吃一個饅頭，但饅頭也分大小，那要看你的運氣如何了。

折磨下造成不少冤案

梁鐵杉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最後以調理身體為理由，申請假釋。他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感慨，也替被捕的民運份子擔心，他估計，他們受到的折磨會更甚。

在折磨底下，有些人忍受不了而認罪，但有些人來不及認罪，便已經死去。一位流亡學生更認為官方今次對待民運份子，不會再花時間嚴刑迫供或公開審判，他們可能一槍把那些人了斷就算了。

酷刑下造成多少冤案？邁向九十年代的今天，仍然存在違反人道，封建式刑罰，那不但不是中國的恥辱，更是人類的恥辱。

雖然官方聲言和刊物曾批評監獄裏發生的殘暴刑罰，和執法人員的濫用職權，但在實際的情況中，官方祇是隻眼開，隻眼閉，並沒有一套具體的改善政策，有人更懷疑酷刑背後有官方默許。在建國四十年的今天，讓我們再一次呼籲中國政府，請停止殘害以良心入罪的政治犯！

黎加路

北京危城

王丹囚秦城 五部長未過關

如果說楊洋事件是民聯的一次勝利，這次陳軍汪曉波入獄，則是一次慘敗。成為港英圈套中的玩物。

嚴厲批判劉賓雁劉曉波

中共五中全會前夕，北京當局又擺出意識形態的強硬姿態，在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的頭版顯著地位，刊登長達半版的大塊署名文章，批判劉賓雁和劉曉波，令人瞠目。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當局向知識界「秋後算賬」，上人民日報重點批判者，除方勵之外，有八月十七日的萬潤南、九月十五日的戴晴和九月二十日的嚴家其，其他人的點名，僅見於某些官方文章之中。以上三人則只有萬潤南是放在頭版位置處理的，可見，中共當局對以上五名給予專文攻擊的知識分子，是有排位序列的。

劉賓雁六四之後言論激烈，某些論點雖有爭議，但仍是影響力大的一位，而他又是在上學運後的三大批判對象，所以，遭到如此「算賬」，應是意料之中事。但這次批判，對中共而言是事關輿論，據說一些知識分子看了文章後，對劉的許多觀點點節讚賞，比如：「中國的問題解決不好，將成為人類文明的包袱和累贅。」一類。文章指劉賓雁六月中訪港時曾同嚴家其、吾爾開希「勾勾搭搭」，如屬實，說明中共海外特種情報工作不可小視。

對劉曉波的批判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以批「民族虛無主義及賣國主義」為名，斷章取義地選用了劉曉波的若干偏激言詞，誣蔑他是為了出名，為了「滿足他的物質的性的欲望」而成為「歷史罪人」。文章引用中外多家媒介發表的劉曉波文章，包括解放月報對他的專訪。吾爾開希曾說對他影響最大的人是劉曉波，中共一再批判劉曉波，顯示了他在青年中有巨大影響。

解放月刊 89/11

新通緝令另有所謀

中國特派員

王軍濤在劫難逃

天安門學生領袖柴玲的下落一直引人關注。十一月初，一份新的通緝名單終於傳到海外，但令人詫異的是，這份名單只有七個人，柴玲與丈夫封從德排在名單後面，而六月十號的通緝名單上，她是首犯。

新名單的首犯是王軍濤，其二是陳子明，為什麼會有此變動？據知情人稱，經幾個月月的調查與逼供信，中共當局已認定王軍濤是介入學運最深的人物，而且有前科。他是民運的「三朝元老」，即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活躍份子，曾被捕至四人幫垮台出獄；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他又是活躍份子；加上這次八九民運，中共對他焉能恨不恨？

王軍濤三十一歲，不僅是民運活動家，而且理論興趣大，有頭腦，會寫文章。陳子明則是開放改革以來出現的民間企業家，比不上萬潤南，却也賺了些錢，自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任所長。「經濟學周報」破產後，被他買下來，是全中國唯一一家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雜誌，他請王軍濤做副主編，實則主編。

近聞王、陳已在廣東被捕，外逃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破壞，因為聯絡人中出了叛徒，同時被捕的還有陳子明太太和兩名香港人。

至於柴玲的傳聞有三類：①躲進了某國大使館，出不來；②已被捕，甚至已被槍殺，但官方不宣。

陳軍再被拒入境真相

四月上旬，中國旅美民運份子陳軍曾被中共驅逐出境，經香港時被拒入境。不料歷史重演，十一月八日，陳軍持入境簽證抵港，又被香港移民局拒絕入境，在啟德機場拘留一夜，已於九日早上九點半離港返美。

據悉，這次陳軍赴港，乃受香港學聯之邀，又有簽證，根本未想到會出問題。他在機場甚為憤慨，抱怨港府置港人信心於不顧。但陳軍低估了香港因楊洋事件造成的敏感程度，更對英國人的政治手腕沒有認識。

有熟悉港府政治運作的行家透露，港府有關方面基於楊洋事件的教訓，已定下方針不准搞份子入境。如同楊洋開記者會的民聯負責人汪曉波，早已列入黑名單，但汪亦不知，步陳軍後塵，結果抵港後亦已被「遣返」美國。

另一說則是，英國人已知港府會拒陳軍入境，却仍發簽證給他，讓他來港後被拒，以便做給中共看，表示楊洋事件再不會出現，中港關係最重要。

逃亡與反逃亡面面觀

——大逃亡內幕追蹤報導

· 星野

「六四」之後，最令國人關注的新聞之一，是大陸被迫害的學運、民運份子的逃亡實況。大體來說，這次「外逃」有合法的與非法的兩種方式。

兩類合法的逃亡

合法方式，通常又分兩類，一類是在領事館前已有出國證件，包括公務商務出國、留學講學或探親旅遊，這些人簽證在手，隨時可以走人。

蘇紹智、戴家其、萬潤南等人就是以合法方式出國的。蘇紹智有歐洲的邀請，戴家其夫婦有新加坡的講學邀請，早已辦好出境證件，他們都在六月十三日通緝令之前離開大陸。據報導蘇直飛歐洲，戴夫婦則於六月十日經深圳入香港，在港居留十日左右獲法國簽證而飛巴黎，他們當然不願去新加坡了。一位見過戴夫人高舉的朋友說，戴夫婦出走甚為匆忙，除了一身衣服，甚麼也沒有帶。

萬潤南作為四通公司的總裁，商務出國機會多，據云也是六月十號左右，拿合法護照出國。北京學運領袖沈彤，六四前已拿到赴美留學簽證，在學運高潮時，他一度想撕毀護照，決心在廣場抗爭到底，後經親友勸阻才保留下來。

合法的另類，是六四之後臨時取得出國證件，多數是原已申辦而後，少數則通過特殊後門辦成。據傳官方機構中，從有關主管部門到海關都有同情學運的人士，他們在六四之後的短時間內，還敢於睜眼閉眼暗中協助某些民運分子出逃。一位知情者告訴筆者，他親見六月某日，有些經北京機場登機者，過關時，關員竟不打開護照即讓人通過。

七月份，趙紫陽的重要智囊人物陳一諮、王小強等人的出國，詳情仍在保密之中，但許多人估計，他們也是通過秘密的合法途徑逃出大陸，而不是非法偷渡。

留港不歸的逃亡方式

作為一種特殊的逃亡形態，是「留港不歸」。英國治下的香港，現被中共指為「反共基地」，自然是大陸逃亡者的最方便的第一站。長久以來，大陸香港保持著雙方認同的合法移民關係，近年來，大陸百姓來港有單程、雙程之分。單程者即可合法地來而不歸，七年後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雙程者限時返回大陸，通常是三個月，這項防止香港人口爆

炸的政策，一般執行得不錯，時候一到，來港者便乖乖返回「鄉下」。

但六四之後，這類雙程來港探親者，不願回大陸，他們向港府或台灣駐港「救護」申請政治庇護。八月中，救護署表示，正在處理的求庇個案有五十多宗。但台灣政府的政策，現只接納傑出人士或探親奔喪的大陸人士，他們願意協助者伯回大陸的人士，辦理延長在港居留的手續，呼籲港府予以接納。同時，救護已受託可以資助留港的大陸學生和民運人士，如有生活困難和急需，核實後每人可獲得資助五百至三千美金。

港府對求庇者個案處理

香港政府過去予大陸來港的政治逃亡者以庇護，有過不止一次的先例，但基於中港關係的敏感，他們從來不曾公開去做，曝光後，也從來「不予置評」。八月十八日港府發言人就一名廣州學生被遣返的事實記者問，就是這種態度，表示不會對接納個別人士政治庇護作出解釋，港府會繼續對個別申請作出考慮。而早些時候，香港保安司班乃信曾表示，因民運而逃來香港的人士，港府不會實行遣返大陸的「即捕即解」政策。

八月廿三日，香港舉行了一個無先例的記者會，二十歲的中國游泳選手楊洋在中國民運總幹事在港陪同下，向記者宣佈已向港府要求政治庇護和延期居留。楊洋是三月份持雙程通行証來港的，已延期居留，八月十四日又已屆滿，入境處不准他再次延期居留，而澳洲已有報紙透露他求庇的消息，新華社與港府均派人到他親戚家找過他，還有恐嚇電話威脅他，因此，他只有將事情公開，訴諸輿論支持。

中國選手楊洋求庇案

楊洋是中國一流的運動員，他的二百米混合泳得過八七年全國冠軍和八八年全國亞軍。楊洋父親是教師進修學院的副教授，母親是豐台三中校長。楊洋出生在文化革命的高潮時期，成長在十年改革時期，是完全沒有歷史陰影的一代，但中國的運動員由於與外界接觸多，一向思想比較開放，楊洋在港參與過支持北京學運的示威遊行，而且參與籌款大陸民運人士的工作。據知情人稱，吾爾開希的出逃，楊洋曾參與協助，他還和民運香港支部有聯繫（一說楊洋已是民運秘密成員），因此，楊洋求庇的理由是參與民運，回國必將被捕受迫害。

楊洋公開求庇之後，迄今港府無正式消息。據快報八月卅一日報導，楊洋和其他大陸民運分子要求庇護的案件，正在由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處理。其程序是，由一專責小組受理求庇人士的申請，與港府合作，先鑑定申請者的身份是否政治難民，然後再向可以接納的國家推薦收容，通常只要身份無問題，送往第三國庇護的可能性很大。有時，這一幕後處理也不一定經過港府。

非法逃亡的四條路綫

第一條是深圳和蛇口。這是香港人都知道的一條傳統的偷渡路綫，除藏匿在火車、汽車中出境外，多數是買通偷渡販子（粵人稱「蛇頭」），由水路渡入香港海域登岸。

第二條是珠海。珠海經拱北至澳門，也是一條傳統路綫，關防且不如直接進入香港的第一路綫嚴格，成功機會大，但抵澳門後若不能及時到香港，安全堪慮，因澳門地位不如香港，中共特工活動自如，隨時有被捉回的危險。

第三條是中緬邊界。這是文革中知識青年熟悉的逃亡之路，漫長的中國邊界有河谷、有崇山峻嶺，這是一條困難而陌生的路綫，除地理條件外，民族隔閡也極為不利。現任民陣負責人的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在一九七〇年就曾同他的前妻，劉少奇長女劉靜一行四人，滿懷國仇家恨試圖從緬甸逃往緬甸，中共當局聞訊即分兵三路佈下天羅地網，以最高效率嚴密查緝，雲南與緬甸交界，終於在他們涉邊界小河時，被民兵截獲，押送北京。

八月初，法新社報導有十名北京上海及成都的學運分子在雲南邊境被捕，其中有一名工人。破獲之越境案已達二十宗。

第四條是台灣海峽。福建漁民在兩岸關係緩和以來，同台灣船民海上交往或走私貨物時有所聞，最近更有將大陸少女賣去台灣為娼的大新聞。據傳亦有民運人士從福建逃往台灣，但台灣不予接受，一是沒有政策，二是身份難以確定。相信九月初有關案從這條路去了台灣的報導，也不大可信，北京民運學運人士多數還不想被人指為「投靠台灣」，加之台灣對此的低調態度，估計這條路的使用價值比較小。

吾爾開希逃亡的幾個版本

一、吾爾開希對英國快報（八月十三日）稱，他是藏在貨車後面的木箱之下逃離大陸的，而協助他的人有香港學生和美國中央情報局。

二、中共官方八月八日透露，吾爾開希與女友劉燕及一名日本女子、保鏢共五人，六月十日抵廣州，住入廣州賓館，下午四時動身往珠海，當日到達澳門。中共當局已將該名日本女學生福田雅惠知會日本大使，指其涉嫌吾爾開希逃亡之事。

三、民間版本說，吾爾開希是走珠海出境的，但不是如他所說藏在貨車上，也沒有美國情報局插手。可能仍是從水路逃出來的。有人分析說，吾爾開希所以那樣說，是為了聲東擊西，轉移視線，保護他的真正支持者。

官方無孔不入的搜捕

六月十三日首批通緝名單公佈後，中共公安局即部署了廣東邊防的加強措施，以防「要犯」外逃。深圳內外兩條防綫，重兵戒備，去小梅沙浴場的遊客也要遭到邊防警察的檢查，深圳旅遊業為此大受打擊，內地人避嫌及忙於關卡重重，來深圳人數也明顯減少。

鑒於吾爾開希及戴家其均從廣東出境，民運分子相繼逃出，有關「秘密通道」之說便哄傳天下了。中共當局首次證實此事的是，七月二十六日在廣州拘捕了三名就讀暨南大學的澳門學生，指他們「參與引導不法分子逃離國境」。同時，北京國家安全部派出數百人南下廣州，專責調查「地下通道」。一時間，廣州的大小酒店、旅館、機關和大學招待所，連日半夜一點鐘都有公安人員來查房，發現可疑，即行搜查。

隨著台灣記者黃德北被拘留和招供，當局軟硬兼施地在被捕分子和學生中弄到了不少材料，據悉，因此而有十多名涉嫌外逃案的人被捕。

中共公安部門八月下旬會透露，偵查外逃「地下通道」的工作已有成效，多條地下通道已被截斷。中共特工無所不用其極，除對被捕者刑訊逼供，欺騙誘供，挖取外逃線索外，還派便衣打入偷渡集團中臥底，北京高自聯常委邵江九月在拱北邊防四號哨區被捕，就是臥底戰的結果。同時，當局對緝拿逃犯有功人員給以千圓計的獎勵。

尋求生路，保存火種

其實，所謂「地下通道」並不神奇，只是某些關係人物介入而已，偷渡的細節自有行家認識老馬安排。香港和廣東人知道，「偷渡」早已成為某些人和集團牟利的一個行業，只要大陸和香港的經濟生活與政治制度差別大，這個行業就一直會存在下去。

現在，面臨趨於絕境，嚴厲防範的高壓政策，政治逃亡者的前景更為艱難了，但天下事歷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六四大屠殺的血海深仇，激勵著海外外渴望中國民主的人們的鬥志、勇氣和智慧，他們將踏著先驅者的血跡去尋求生路，保存火種，以便迎接下一個民主高潮的到來。

中共政治局六常委答中外記者問

1989年9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李鵬、姚依林、宋平、李瑞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下面是這次招待會的問答全文。

江澤民：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在我們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選舉了新的領導班子。前不久，我陸續接見了許多記者希望對我們進行採訪，但是由於事情忙，沒有能夠如願。今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前夕，有這個機會同大家見面，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今天在座的李鵬同志、喬石同志和姚依林同志，我想你們都是比較熟悉的，今天參加的還有其他幾位常委，有宋平同志、李瑞環同志。現在，我和其他的常委同志願意回答記者的提問。

天安門風波不是一個悲劇

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記者：總書記先生，我想問您一個今天許多中國人都在問自己的一個問題，那就是，您認為天安門是悲劇是否可以避免？以及怎樣得到避免？

江澤民：這位先生我們好像面熟，我估計我在上海時可能與你見過。首先我想要講一下您剛才用的那個字眼，「天安門發生的悲劇」。我們認為不是一個悲劇。天安門屬於一場反對我們共產黨的領導、要推翻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暴亂。正如鄧小平所講的這場從動亂演變成的反革命暴亂，是由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所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國際上始終有這麼一股勢力，想使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同時，我們國內，也有一批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他們搞陰謀，也是企圖推翻我們國家現政府的政權，特別是出了我們黨內前任總書記趙紫陽同志這樣一個支持動亂、搞分裂的人，因此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了，失去了能夠更及時地平息這個動亂的機會。但是不管怎麼樣，事實證明我們還是一個偉大的黨，我們自己能夠平息這場動亂，制止這場反革命暴亂，直至取得決定性勝利。

有多少人被處決？

《紐約時報》記者：總書記先生，在海外的一些持不同政見的中國學生說，自從六月學潮被鎮壓以來，在全國已有十二萬人被逮捕或處決了。如果您認為這個數字不確切的話，為了增加透明度，您能不能告訴我們確切的數字？此外，像王丹、鮑彤、任曉軒這樣主張非暴力的人是否會被處決？您能否完全排除他們被處決的可能性？

江澤民：我想，這次從動亂到反革命暴亂，我們事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方針很明確。我們要求嚴格地區分、正確地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部分，應該說是絕大多數的人，由於對我們——剛才李鵬同志講了還有些腐敗現象，由於對現實的某些不滿，因此參與了這次的學潮。這包括參與遊行、示威、乃至於絕食。我認為對絕大多數同學來講，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團結、教育。我最近講過，青年是我們的未來和希望，我們對於他們是完全採取滿腔熱情而又嚴格要求的方針。但是絲毫不能否認，確實有一些別有用心搞陰謀的人，或者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我們現有的政府，因此就觸及了法律問題。我相信國家的有關部門，這主要是司法部門，會根據法律對他們進行處置。在這一點，剛才這位記者問我，你對某一個人具體怎麼處置，我很抱歉地說一聲，因為我們絕不能以黨代政，也不能以黨代法。新聞界經常講的，你們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我想我們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針。

如何吸收這次教訓？

日本廣播協會記者：李總理您曾談到共產黨中央和政府對這次風波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能不能具體地講一下？

李鵬：反省的地方可以從兩個意義上來說，一個就是在處理事務的過程中，一個是講這個事情雖然有國際的背景和國內的小氣候，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的結果，但是也包括我們黨和政府在前一階段工作中的失誤，所以引起了羣衆的不滿，所以才有這樣多的人捲入到這場動亂之中。所以在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成立以後，在消除人民的不滿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當然這方面的工作才開始，但是我們有決心把它進行到底，我們說這場風波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每次都表現為這樣一種激烈的形式。在處理的過程中，因為我們黨的前任總書記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行動，使這個事情複雜化了，使這個事情變成爲激烈的矛盾。

中共有處決政治犯嗎？

加拿大廣播電台記者：現在西方許多國家非常震驚地看到你們處死了一些不同政治觀點或者參加了政治抗議的人，你們是否願意向西方保證：在未來再有在政治見解上與你們的主張、觀點不一致的人不會被處死？

喬石：對這個記者先生提的問題，我認為有必要準確的說一下。我們在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之後，處理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些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打、砸、搶、燒、殺，其中一些情節嚴重的，經過事實的調查，和法院的審訊程序，給判處了死刑。到現在為止，我的對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採取的態度是非常慎重的，正像剛才江澤民總書記所說的，我們對他主要是進行教育而不會隨便給予打擊，我相信到適當時候我們的司法部門是會給予公佈的。我順便要說一句，剛才有一位先生說我們在事件中殺了多少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香港同胞會分清是非界限

香港《大公報》記者：前一段時間香港同胞對國內的事件發表的一些意見和一些行動，被指責爲「不要讓香港成爲反共基地」，「河水不犯井水」。我想問一下，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同胞如何表示對國家大事的意見，而不會被認爲是惡意的？

江澤民：前一個時期國外宣傳報道有若干是與事實真相不相符合的。有名言：謬誤的東西說千次就變成真理。香港同胞在錯誤的宣傳下產生一些不理解，我們是能夠理解的。這絲毫不影響我們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一國」可以「兩制」。我曾經與香港先生們講過一句俗語，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我認為是恰當表達「一國兩制」是不變的方針。

但也無可諱言，國際上確實有些人想要把香港成爲一個顛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攻擊共產黨領導的基地。在這一點上，我相信香港同胞是會分清是非界限的。

趙紫陽當前處境

葡萄牙通訊社記者：前任總書記趙紫陽在何處，將來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江澤民：趙紫陽同志的問題，正如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中講的，他現在還是一個共產黨員，他的錯誤結論是分裂黨和支持動亂，但是還有一些問題要

繼續審查。

記者們關心趙紫陽的生活，我們中央有一個一貫的方針，就是一個黨員犯了錯誤在生活上沒有任何影響，他現在生活得很好。順便說一句，他的資格比我老，他的生活待遇恐怕比我現在的生活待遇要高。

台灣《中國時報》記者：過去有兩位總書記因犯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下台，請問江總書記，您如何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政策，而避免兩位接班人的失誤？鄧小平說，要以總書記爲核心，至少在兩年內停止黨內爭論。目前中共內的爭論是什麼？剛才談到「六四事件」，江總書記說是「六四暴亂」，而李鵬總理說是「六四風波」，請問中共高層對「六四事件」如何定諱？

中共現今領導人對平暴沒有分歧

江澤民：兩位台灣記者的普通話比我說得還好，所以我更加感到大陸與台灣省應盡快和平統一，但可以「一國兩制」。剛才李鵬同志回答了那位台灣記者關心的「會不會武力解放台灣」。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我想再強調一下，我們方針是和平統一，但我們不能承諾不使用武力。不承諾就更有利于和平統一。

我們繼續改革開放，這方針我們各種報刊講得很多了。但是，今後貫徹改革開放當中，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實要十分重視，要堅持貫徹。這兩者之間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有的人提醒我：「前任總書記就是因爲反對自由化鬥爭不力下台的，因此你要充分注意這個問題。」從總的方針來講，從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從我們共產黨的領導來講，我們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剛才講了，趙紫陽同志的錯誤，主要是對他分裂黨和支持動亂而言；毫無疑問，他還擔任了好幾年的總理，也擔任了一年多的總書記，在其他方面而言，他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這在四中全會公佈上也講了。我們是抱着實事求是的態度的，但在具體執行方面也是出了一些偏差。當然我們有必要很好的總結一下這些年來究竟有哪一些工作不符合我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有利於進一步貫徹，但這和「爭論」不是同一個涵義。這位記者還問到「六四」的暴亂有的時候叫風波，是不是你們領導人之間有什麼不同的意見？我可以肯定的講，這一次是一場反革命的暴亂，但有些時候也可能用別的字眼來表達。但我想，科學的來講，對這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結論，我們是叫它暴亂，沒有任的分歧。⑤

廣角鏡月刊 89/10

《河殤》作者逃出大陸譴責暴政

遠志明

遠志明，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候選人，近年活躍的北京青年學者，《河殤》撰稿人之一，亦是最近在香港出版的《太平洋論壇》的副主編。六、四後名列第二批被通緝的知識分子名單。經兩個多月匿藏，遠志明於九月安抵法國，逃出生天後，撰文譴責暴政。

此外，《河殤》總撰稿人、著名的報告文學家蘇曉康亦繼遠志明之後，於九月十三日赴法國。蘇曉康與遠志明一樣，當今年學運初起，便聯同其他北京知識分子支持學生，呼籲政府冷靜、克制。蘇曉康後來曾到廣場作絕食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調停人；遠志明則曾帶首都知識界聯合會。

如果說五月份大陸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已經充分暴露了社會危機之深刻和民心逆反之嚴重，那麼，六月初的血腥鎮壓無疑沒有解決而是大大加重了危機和逆反，普遍的不滿經由憤怒而發展到仇恨。然而，鄧李楊是憑什麼平安過關並很快穩定了局面呢？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假如我們看不清他們維持政治生命的本錢是什麼，抓不住鄧李楊統治的根基和實質，我們就不可能對他們的前途作出正確判斷，也不可能對他們採取正確的態度和策略。

鄧李楊的生命之本：屠刀和謊言

我在大陸監獄期間，盡數領教了他們的欺騙技術。作為當事人，我對這種欺騙看得很清楚。我想所有當事人都是如此。然而，我們這些不能被欺騙的人，早已在屠刀下失去了揭露真相的自由，更多的難以欺騙的人們也在屠刀下失去了勇氣。所以結果是，凡能被欺騙的人都保持沉默，因為在謊言的背後藏著屠刀，看透了謊言的人一定看見了那屠刀，看不透謊言的人則沉溺在謊言中。

屠刀是什麼？不僅是槍炮、坦克，還有監獄、還有黨組織、還有大批判，還有分配、住房、晉級等一切「正常手段」。

謊言是什麼？謊言是官方的社論，陳希同的報告，鄧李楊的講話，化名的文章，以及那些駁斥謊言的聲明。謊言正大光明、理直氣壯地充斥在電視中、報刊中、廣播中乃至紅頭文件中。

的任何一點希望。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四項任務中有兩項是赤裸裸地維持其反動統治的，即鎮壓民運人士和加強思想控制。然而，任何一個中國人，祇要不是老朽不堪或與民為敵，他都會看到，爭取民主的鬥士是斬不盡殺不絕更抓不盡的。每一個有頭腦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學生和老百姓，都是一個民主的追尋者，因為他們都生活在專制的高壓下，心中都嚮往著自由和人的尊嚴。試看，今天的學運領袖，昨天不也是默默無聞的學生、埋頭書案的學者甚至碌碌無為的青年嗎？當春風吹來的時候，人們心中的人性之花就會開放，民主之火就會燃燒。六、四大屠殺，以及隨之而來的專制倒退，已將民主的火種更深更廣更強烈地種在了中國人民心中，差的祇是春風了。然而，這裏正用得著鄧李楊最喜愛的兩句詩：「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至於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辦法來控制人心，這更是徒勞無效的。這種愚昧教育，在十年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看起來非童叟可欺。什麼「階級鬥爭」，什麼「兩大陣營」，什麼「和平演變」，就剩下「鬥私批修」、「三忠於四無限」沒有提了。對這一套，中國人民厭惡已極，所以，現在的政治教育的情形是：一、領導幹部唱高調，一般幹部開玩笑，學生知識分子肚裏罵，工人農民不理那一套。人民不是聽你說什麼，而是看你做什麼，是憑自己的直覺感受作判斷。當專制暴政日趨嚴重，腐敗之風盛行不已，國家空虛局面愈加明顯之時，教導人民的陳詞濫調調子越高，不是越會招致人民的反感，越暴露出鄧李楊的虛弱無能嗎？

假作真時真亦假

對於人民最反感的腐敗問題，看起來鄧李楊是要動真格的，然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原來他們是在玩假把戲，

治腐敗，祇有他們在中國大地上消失了，中國的腐敗才能治療。所以，要解決他們提出的懲治腐敗的難題，唯一的前提條件就是打倒他們。

斬不斷理還亂

鄧李楊無疑意識到了，對其政權的最大危險是經濟惡化，於是也作為重點任務來抓。但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經濟幾十年來已經證明，不改革體制是沒有出路的，蘇聯及東歐各國也得到了同樣的啟示。而鄧李楊現在恰恰是反改革的保守派，是在逆世界潮流而動。在經濟思想上，李鵬和姚依林奉行的都是陳雲的路線，企圖以退回計劃經濟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除了他們幾個偏執狂以外，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會成功。具體來看，沿海地區及一些開放大城市的市場是不好收拾了；外資是不能也不敢驅趕了，農民的單幹也是難以收攏的了。在這種離散的情況下，加強計劃成份，既會破壞市場，又會加劇雙軌條件下的腐敗。加上國際的制裁和冷落，工人的不滿和怠工，老天不做美，大面積的乾旱和暴雨，都給中國經濟以嚴重影響。當然，最主要的是，按照陳雲的經濟思想和鄧李楊的政治反動，他們無法挽救中國經濟，而分明是在將剛剛從公有計劃死胡同中探出頭來的經濟，再壓回到死胡同中去；甚至，由於十年留下的影響很大，不等退回死胡同就會亂了。經濟的混亂必然導致政治動盪，這是毫無疑問的。

假如中共當局摒棄李鵬的經濟思想，逐步地恢復改革，那麼，結果又會導致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這是現政權所最為懼怕的。

所以，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鄧李楊的專制統治，到頭來都是死路一條，剩下的祇是時間問題。世界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李楊反動派過於老朽，過於偏執，不知自己正在走向可悲的下場。

鄧李楊的前途何在



·倖存者的經驗談

黃德北與侯德健的屈辱

·韋刃

對黃德北、侯德健、劉曉波與姚英等被捕或出獄以後的表現，引起海外社會與輿論之紛紛議論。顯然，由於人們很少與中共專政機關打過交道，甚至未曾與中共專政下生活過，因而有些議論純屬主觀臆測。

筆者在大陸先後被專政達二十年之久。由於多次被捕、審訊、判刑、勞改、細細吊打、被迫逃亡、又被捕……因而對中共專政機關的種種運作和手段並不陌生。而據此規律對某些事件作出判斷，雖不能說都一定正確，至少不至於太離譜。

黃德北「竹筒倒豆子」

對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的行徑，一些港報頗有微詞。斥其為搶新聞而出賣王丹，完全失去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基本道德。

在台灣，人們却把他捧為英雄。筆者認為台灣新聞界憂慮。如此水平，能鬥得過中共嗎？其實黃德北者，連狗熊都弗如也。

有人認為，很可能王丹先被捕，然後中共利用王丹誘捕黃德北。

如果說中共早就計劃逮捕黃德北，企圖通過他擠出些情報。這很可能。然而黃德北和其他所有進入大陸的人一樣，都是墜中之蠶。中共隨時垂手可捉。而且中共是種極端名的高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根本無須動用王丹。

顯然，對台灣記者，尤其處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白熱化的天安門前後，中共能不佈下天羅地網嗎？能不對反共基地來的階級敵人的一舉一動進行嚴密的監視嗎？然而，那些台灣的寶貝記者們，儘管他們可以從資料堆裏了解中共專政的種種記錄。但他們畢竟都生在台灣，根本沒有在大陸生活過。在鄧小平開放政策人士的宣傳中，他們以為中共不再講階級鬥爭了，自由了。他們還自以為很機靈，可以採訪王丹，及時發回新聞而不被竊聽發現。為急於成為新聞界的風雲人物而沖昏頭腦。

到處佈滿便衣監視

早在六十年代期間，筆者在北平曾被六七個女便衣跟踪不捨，怎麼甩不掉。那時候，據說北京市中心的每一根電線桿下面就有一個便衣。

有個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告訴筆者，他早先曾被發配到東北勞改，一排門牙曾被專政人員打掉。「六四屠城」前他就說：八十年代末葉是中共

進入垂死掙扎的階段。沒有多少人再像昔日那樣，積極主動甘當其大爪牙了。因而今後中共必然會僱用更多的職業特務便衣，依賴這些人維持其統治。中國將成為特務警察國家。他的話果然應驗了。港人請吾爾爾希吃一頓便飯被偷拍，以及加拿大一華裔女記者在大陸被連連綁架，這便是最突出的例子。台灣記者們今後應開動腦筋，睜大眼睛步步警惕，勿再像沒頭的蒼蠅在大陸到處亂撞，害人害己。

香港有一著名專欄作家認為，黃德北發現被跟蹤後，不應與王丹分手。而應陪他到底。這樣至少可目擊王丹之被捕。這也是由於沒跟專政機器打過交道的書生之論。

須知，中共公安局逮捕國內人，幾全在夜間進行。而且經常用漂亮的轎車把人送入鐵窗裏。人們就這樣靜悄悄地從地球上失蹤了。王丹既然已暴露，隨時可捉，公安局的捕房隊怎麼可以在黃德北的眼皮下捉王丹呢！

據剛從北京來的老友說，屠城後凡是被捉進去的人，不分青紅皂白，先遭戒嚴部隊一頓毒打。然而，據報導，公安局沒動刑，黃德北已像竹筒倒豆子那樣痛痛快快地把一切問題都交代了，甚至連公安局沒追問的，也都坦白了。為此，港報譏笑黃德北在北京成了竹筒。

筆者深信黃德北在被關押、審訊期間受到良好的待遇，吃飽喝足。（唯有夜晚睡不著！）這是因為他是公開活動的台灣記者，而不是台灣的地下特務。更不是螞蟥不如的大陸百姓。公安局宣佈這些新聞，目的在於借此掩蓋對國內人的酷刑。同時警告其他港台記者：只有像黃德北那樣老實交代交代問題，並寫悔過書，才可獲得從寬處理；驅逐出境而不判刑勞改。

在公安局階級鬥爭專家掌心的黃德北，如狼羶真的羔羊。審訊員只須一句話伺候他，已足令其屁滾尿流了。這句話很簡單：「你是按着記者外衣的國民，黨特務，來大陸盜竊國家情報機密，不但白死路一條。」雖然中共最後並沒有硬要他承認是特務，然而，為擺脫特務之嫌疑，免於一死，無疑，他不得不出賣王丹，出賣通信錄上所有的人，出賣他所知道的一切內幕、情報。總之大陸的語言說，他的態度很老實，用香港的話說，他合作得很好。因而在很短的期限內便獲釋了。

「竹筒倒豆子」是中共審訊員常用的術語。假

如黃德北是個英雄，他必會一問三不知，拒絕淪為竹筒，或者像擠牙膏那樣，擠一點，說一點後果就大不相同了，審訊員必將他「掛」起來。（長期關押不結案。）

六十年代，筆者曾被關押在北京草廠子胡同的看守所（註）。那裏有個台灣派進的特務。他被「掛」了三年仍被關押，不給結案。

那時候，被關押者雖不像現在這樣挨打，但由於在看守所長期「掛」起來，經不起饑餓的煎熬，無一人不交代問題，投降。

被捕者絕無拒絕回答的權利

筆者曾多次被捕。由於不承認甚麼「抗拒勞動」、「叛國投敵」等莫須有的罪名，從未在勞動通知書或逮捕證上簽名（為此被視為頑固分子而長期帶背铐，受罪）。然而，最初由於沒經驗，又由於經不起饑餓的折磨，也都終於成為竹筒。不過，由於筆者的「犯罪」純屬個人行動，不牽連其他人，如自勞改農場竊取電網逃亡，被迫偷渡鴨綠江潛逃到北韓等等。因而，可在印有「親筆供詞」字樣的專用紙上詳細交代「犯罪事實」及其過程，出賣自己，並不出賣其他人。後來，由於有了經驗，在第二次被捕審訊過程中便學會甚麼問題該交代，甚麼問題必須隱瞞，以鐵嘴鋼牙（犯人術語堅決否認指控）萬萬不可輕信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用犯人的話說：「捉住（證據）的，算你的；捉不住（證據）的，算我的」。

凡是準備與公安局打交道者，其社會關係（橫向關係）越簡單越好。而且，身上切勿攜帶通信錄、日記、筆記本這一類東西。否則，一旦被捕，都成了勒索死人的套索。你不徹底交代有關的人和事，休想離開鐵籠。在大陸，被捕者絕無「拒絕回答」的權利。

凡是被中共提過審訊或勞改的人，出來之後，很難再是一個在道德上、心靈上或肉體健康上仍保持原來狀態的人。其中尤其在心靈上的創傷最深——即由於被迫出賣親友，成為道德上的叛徒，而深感羞愧內疚，這些人，最敏感、最忌諱的問題便是被問及：「你向審訊員交代了甚麼問題？」黃德北如把他所交代的問題全部如實地公開——當即將成為「人類的狗屎堆」（中共語言）。

躲進大使館也是戰鬥

侯德健作的曲水平如何？見仁見智

不過，作為一個需要創作自由的藝術家來說，反而從台灣投奔到更沒有自由的大陸定居，筆者早就覺得此人像木求魚愚不可及。並斷定他不會有發展前途——除非他的作品能充分為中共的現實政治服務，並主動積極充當中共在文藝界的打手，如文學界的郭沫若，工程界的錢學森、彭培根之流。

侯德健、劉曉波、周舵與高新是在天安門廣場參加絕食活動的最後四個人。他們發表絕食宣言，掀起學運最後的一次高潮，影響不小。精神可嘉。報載「六四屠城」當晚，侯德健護送學生最後撤離廣場，為此，筆者對他肅然起敬。

之後，有一段時間，他杳無音訊。筆者擔心他已壯烈犧牲了。同時確信，萬一被捕，中共自有高招對付他，絕對不會軟辦虐待。因為他是中共重要的統戰對象之一。

沒料，他却躲入澳大利亞大使館裏。據報載，澳使館並沒趕他走，如果這是事實，那麼，他之主動離開使館，並在中央電視台亮相，說他投降並不為過。

雖然長期蝸居使館內，寄人籬下，精神上痛苦難熬，值得同情。然而，既然經不起痛苦的考驗而出降，怎麼還可以戴上光榮的桂冠呢？否則，對仍堅持戰鬥（躲在使館，誰說不是一種戰鬥！）的方勵之夫婦又作何評價呢？不公平吧！（至於有人認為方夫婦根本不應躲入使館，這種完全脫離現實比豬還蠢的書生氣，不值一駁）

侯德健在電視上說，他在擔架上蒙着頭離開廣場，所以沒見到死人，又說聽到槍聲，但槍聲是向天空放。這可能是事實，然而，他竟沒想到有些槍是對準學生放的嗎？

有朋友說：侯德健有朝一日如回台灣或來香港，沒臉再見人了。他的政治生命隨着在電視台亮相而結束了。不過，此人頗「聰明」，到時他一定會辯解說：我個人沒見到死人不等於證明整個廣場沒死人啊！

在大陸上大學的港澳學生，有的因參加學運而被捕。有些經關押審訊釋放了。有些仍被關押。港人姚勇便是其中之一。港人應積極主動營救他。至少須要求中共把他的問題公開。如無刑事責任，應立即放人。港人必須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共作堅決的鬥爭，為姚勇戰鬥爭就是為自己鬥爭。絕不可「自掃門前雪」啊！

（註）草廠子胡同看守所為北京著名的老看守所，一直專押政治犯（中共稱「反革命犯」）五十年代初被關押在那裏的一對美國夫婦夫婦後來寫的書《The Prisoner of Liberation》（譯「解放的囚徒」）以及後來被關押在那裏的中法混血兒包若望寫的《The Prisoner of Mao》（「毛澤東的囚徒」）都有詳細的描述。六十年代初草廠子胡同看守所被拆，犯人遷到功德林看守所時筆者恰好在那裏。故有眼福見到功德林看守所的所謂「八卦樓」。其實不是樓房，而是特設設計的輻射形監獄平房。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

我是怎樣逃離中國大陸的

工自聯副總指揮岳武自述

岳武

單位同志不信我是暴徒

「六四」大屠殺後，我保住了性命，隻身潛回了山西陽泉我的工作單位。當時我想，參加運動的人有一、兩百萬，要想到我沒那麼容易。因為「工自聯」很多人以為我是天津來的。公安局可能到天津去查我，那是很難的。（笑）

其實「工自聯」成立選舉出我們幾個領導人時，我們都把身份證亮出來了，因為大家規定要報真名字以示負責。當時我身份證的人不超過十個，並沒有很認真去記，當時已經過了半個月，至少一半人把我的身份證掉了。我就是抱著這個心理，回到陽泉鋸件廠，那是我做廠長承包的工廠，工人不會出賣我。

回到廠子訂到十二號，我就頂不住了。因為「學自聯」已經被通緝，「工自聯」只是遲早的事。六月十五號，我已下定決心去出差，那天下午幾個朋友來我家打麻將，告訴我，老岳你別回廠子了，今兒個來了四部警車找你。很偶然我躲過了這一切。

陽泉市公安局是接到北京公安部的通知來抓我的。但我們廠黨委對此表示懷疑，他們說我出差半個月，怎麼能從陽泉的廠長一下子成了北京「工自聯」的頭呢？成了暴徒。後來我們廠子的保衛科長還專門去北京看了錄相，回來後才相信。

我們廠長了不起

這是後話了，廿五日我南下到了深圳，找出去的路沒轍，錢也用完了，只好又回到陽泉，那已經是七月中旬了。廠裡的同志來家裡看我並向我表示，廠長你能夠成為北京「工自聯」的副總指揮，我們全廠都引以為榮。而且外單位到我們單位出差的人員都這麼認為，說「你們廠長了不起！」（笑）

後來我就又靠朋友湊了點錢，再南下，想法往外逃。路上有一個奇遇，給我增添了很大的信心。路上我遇到一個神算命，我也沒辦法

了，就讓他給我算一下。他先說我有兩個孩子，雙胞胎，很準，說到後面我就半信半疑了。他說我很快就會到香港，而且還要走得遠遠。但是有難使你走不成，他必須給我寫道符保我，我才能解難。

絕路求生算命求符

他要求我一定用毛筆，在沒人看到時把我的生辰八字寫下來，才能作成符。我又花錢買了筆紙，這下子有神暗中保佑我了。因此，我就放開膽子四處設法，深圳、廈門我都轉了。一直到沿海的漁村，都找不到出路。

後來我研究了一下地圖，發現珠海離澳門很近，我就打算走珠海試試。其實我那時已經沒什麼信心了，只是打算沒被逮着之前能玩玩也好。去珠海也要過邊防，我只有身份證，結果遇上個車，交了二十元錢，就搭我繞過邊防站，進了珠海市。

在那裡，我住在一家物業局的小旅店。因為司機在車上就告訴我，大旅館要邊防證，我不能住，小旅館把身份證押在櫃檯就可以。這其實已經很冒險了，當時我身上就藏著陽泉市公安局一處發的通緝令，上面還有我的照片。但我想，等這份通緝令發到珠海的小旅館肯定還要一段時間。因此我還在用我的身份證，兩個月裡就這麼一張證件。在大陸現在城裡人沒身份證根本不行。

司機要錢僥倖過關

住下後，我又跟著旅遊車到了海關一帶轉，當時已經是半夜了，燈光通亮，三里地之內的海面上，一個人影都不過去。一跳到水裡游準被打死，我只好呆在陸地上留個活的再被打算。

第二天我又打算在灣仔附近偷渡。我問旅遊司機有檢查的沒有，司機只顧收錢，告訴我沒有。結果一到海邊就真有檢查站，把我坑夠噲，這司機為了賺錢把我坑坑了。

到了邊防站，車子裡就十幾個人，人家都

有邊防證，我連身份證都押在旅館了。一下子就把我查出來，叫下了車子。派出所設在道邊上，叫我下車的解放軍只管查人，不管審問，把我帶進派出所就不管了。

派出所裡坐着四個人開聊天，我進去以後，只有一個人問我，其他三個人連看都不看我一眼。沒看，那個人問：「你哪的？」我就報了我的真實單位——山西陽泉鋸製品廠。我在想，如果他們打電話的話，報假單位，一打就露餡了；報真單位，碰巧同我不錯的同志接電話，證明我是那單位的，也就混過去了，不會把我扣下。

公有制沒人管事救了我

結果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那派出所的人第二句話就是「去吧！」我就這麼又逃過一劫。出來之後，那個站崗的小兵的很不好意思，還跟我說：「同志，對不起」。我是一陣害怕，因為進派出所時，那份通緝令就在我的錢包裡，有名有姓有照片，一拿出來就完了。

我又上了車，再往前走。我想這回要玩真的了，我要小心，於是就把那份通緝令藏進了游泳褲裡。到了碼頭，要上遊船了，沒有邊防證是上不去，於是我就沿着海邊轉悠，沒走幾步，就遇到「開人止步」的牌子，前面有當兵的站崗。這時候我見道邊有個賣飲料的舖子，我就去買了飲料，邊喝邊觀察周圍的地形。

我問那個開舖子的老板，澳門容不容易去，他說只要有錢，連帶路也能去。於是我心中有了數，知道還可能有活路。於是就向附近的一個村子走去。

這村子是在海邊一溜排開，一條街看到底，前頭還有個解放軍站崗，我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我。沒辦法，我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走，走到中間，又碰上一家賣飲料的店，那時八月份，天熱得不行，我就又買一杯喝。

這時解放軍換崗，那個看我的解放軍下崗也來這喝水，就站在我旁邊。當時只要他問我一句話，我就露餡了。我當時什麼信心都沒有了。因為一張嘴，一聽我口音就是北方人，不是本地人，再加上我連這個村的名字都不知道，要是外地來找人的，至少也應知道這村叫什麼名。可是這解放軍看了我兩眼，一句話都沒問，只是跟賣飲料的老老板聊天，我一看，趕

緊走開了。

絕路逢生跨上遊船

我沿原路往回走，總共有七八里路，對面就是澳門。下海游吧，周圍有解放軍荷槍實彈在那看着，不游吧，明天再來那是沒轍。到了邊防站，再沒身份證，人家肯定起懷疑：這小子也沒有邊防證，怎麼天天往這溜達，準是想偷渡。

一路上我心裡七上八下，好像走在絕路上，心裡不是滋味。這時又回到了原地，看那押開了十幾個人，我就無意識地走過去，沒想到這回是絕路逢生，那兒有一棟房子，乍一看什麼都不是，但房子後面却是個碼頭，有一隻游船停在那，我也沒看見。

我就坐在那開着，過了大概十分鐘，我還在那傻乎乎地抽煙。這時那些人都走到房子後面上了船。結果有一對帶小孩的夫婦，突然朝我喊：「嘿！船都要開了你怎麼還在那坐着？」

我莫名其妙地就跟他們上了船，一見開船的人，我就解釋我沒證，證被扣在旅館了，那開船的同好好像懶得聽，收了錢只說「上去吧！上去吧！」就這樣，我上了船，駛往澳門方向。

一上船我這心裡「撲騰」一下，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啊！

這遊船只是在海裡轉半圈，過了珠海橋之後又往回開了，我仔細一看，四五個船上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帶槍，夏天只穿小背心，一看很清楚，於是我就開始準備跳海了。

我站在甲板上從容不迫地脫衣服，把錶和錢包全部放在船上，留給自己的同胞了。船剛要往回返時，我脫光了衣服，穿一件游泳褲，裡面只放了一件通緝令，跳下海向澳門游去。當時也沒有人來拉我，也沒有人喊。游了幾米後，我還回頭看了一眼船上的人。船員和遊客都在那默然地看着我往澳門游去，誰都沒有什麼表示。

事後回憶起來，人生真是奇妙了。我跳船那天，八月十七日，正好是我的生日。我想起那個算命的，他當時非要我把生辰寫到護身符上，他沒說我非生日那天跳海，但真的就在這一天，我絕路逢生，逃出了魔掌，獲得了人身自由、新生。

大陸民運人士逃亡故事(三則)

三名民運份子：一個是中下級軍官，一個會保護民運領袖出逃，一個是從廣場撤出的學生。
三則逃亡故事：一個臥在車廂頂上過境，另一個會流落荒島，還有一個躲在港深旅遊車底。

蘇陽

〔編者按：六四以後，逃來香港的大陸偷渡客之中，不斷有從事民運的人士。由於他們因政治理由被通緝，使他們可獲得某些西方國家以政治難民的身份予以收容。因此，他們在香港沒有被即捕即解地遣返大陸。經短暫的囚禁、審查之後，他們都恢復了自由，並且陸續被移送往外地。本文作者是這些人中的一個。本文的第一段，是他自己的逃亡故事，第二段及第三段，是他在香港被囚期間，記述的其他兩個逃亡者的故事。〕

① 俯伏車頂，越過邊界

我是一名中國軍人，一個中下級軍官，曾工作於總政治部下屬的一個文化單位。由於在這次民主運動中投入太深而遭到通緝。當王培公老師被捕的消息傳出之後，我便出逃至大連。在大連住了近一個月，風聲愈來愈緊，好心的戰友們為我聯絡了北京的朋友，幫助我辦理一份公務護照，並答應送我上飛機。於是，我重返北京。

我從西直門下了火車，便見到一隊隊戒嚴士兵荷槍實彈地站在月台上，抽查旅客。也許我身著軍褲而未遭盤問。我與接我的朋友來到他所在的部隊，院內已經駐入了戒嚴部隊，我覺得有危險便請他換個地方。他想了想，告訴我，有幾個戰友正好在黃寺戒嚴部隊指揮部幫助工作，住那兒最安全。我便在黃寺總政治部大院內住了下來。

辦理公務人員護照並不容易。上級命令所有外事系統人員，一律交出護照，外出人員須持部委以上簽發的出境證方可出差。

怎麼辦？我經再三考慮，決定南下廣州想辦法。幾經輾轉來到廣州。廣州軍區的朋友很熱情，我住下後他們開始為我聯繫營救民運人士的組織。最後只找到了一個專送人去香港打工賺錢或去港當打份子的人。沒辦法，只有碰運氣去闖一闖了。這些人看了我的錢便為我找了些衣物和去深圳的邊境證。上路前，我才知道他們為我，剛剛放棄了一樁賺錢比送我多幾倍的生意。我心裏算是有了些底。

進站上車還算順利。在車上為了穩定情緒，我喝了幾瓶啤酒，讓臉色紅一些，免得被查

問時露出破綻。車至樟木頭之後，車內開始檢查證件，我算是順利通過了。不巧的是，我們對面的兩位乘客中，年輕戴眼鏡的人證件有問題，警察硬說我們是一起的（我們曾在一塊兒玩撲克牌），收去了我們四個人的證件，要我們下車後跟着他去盤查後領回，並且叫我們打開包包檢查。我的包包內有我的真實證件和一把剪鉛絲的備用鉗子，上面是眼鏡和買路錢。幸好警察見我不情願地露出錢，沒有再查。我又連聲用東北土話辯解，總算過了這一關。

在深圳下車後，送我的人帶我從邊境施工處溜了出來，引我進入了一間酒吧。他兩人熱，要了點吃的東西，讓我吃，自己去跟經理打招呼並為我買了兩包煙，換了幾十塊港幣。我們吃過飯便重返火車站。

他先讓我換上一條事先準備好的軍褲，他自己也換上一條軍褲。我們拿着手電筒，彷彿是執勤檢查車輛的軍人。四處轉了幾圈後，我們登上了距離罗湖最近的天橋上等待。他有些不安地說：「今天查得比前幾天要嚴格些，等十二點半左右，執勤的人發覺時也許能混上去。」

原定計劃是在列車掛好之後，弄開車門進去，便可安全過境。現在不能靠近車體，根本不可能實現計劃了。

我們重新走出車站，在邊境附近找翻鐵絲網的地方，四處都碰到明崗哨，無奈只好重返車站等待機會。

最後一列貨車掛好車頭準備啟動了。他從鐵橋下面跑上來，告訴我：「有露天車廂可以從鐵橋上跳下去，一定很安全。」我便開始準備跳車。我與他換了運動鞋，把包包內的證件塞入鞋中，把腰包連同錢都塞給他。他拉着我的大皮鞋回到月台邊守望着我以後的行動，很難為情地朝我笑了笑。列車開過來了，速度大約每小時十公里左右。我站在天橋外側等待着……車頭掛的是全封閉車廂，我看見車尾也是相同的車廂，我在幾秒鐘的判斷之後決定跳下去。當我縱身跳上車頂的剎那間，我頭朝前方平臥在車廂頂上，一動也不敢動。列車緩緩開着，我只有一个念頭，如果被發現我朝前跑，反

② 從汕尾乘船逃亡

正車頭已經上了罗湖橋。列車經過橋邊時，我清楚地看見了一隻貓頂，還聽到幾句講話聲。列車即將駛過罗湖橋時，不知為什麼停下來了，我被攔在明亮的燈光之中了。我靜靜地聽着風聲和自然界的一切響動，心臟的頻率幾乎要超過三百下了，「嗚嗚」的震響壓倒了一切聲音。

列車大約停了五至十分鐘後，重又啟動了。它順利地載着我通過了死亡的終點。當我望見遠處山頂上那盞界燈時，便知道我已自由的土地上了。

在上海的時候，因為我比較喜歡演戲，經常與文藝界的朋友們來往，這次民主運動中，文藝界的朋友們表現很激進，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後來領導發現了，找我談話，我不聽，與他爭吵了幾句，我便成了整頓對象。當時很不安，但事已如此，幹吧，反正難逃坐牢這關了。於是我主動保護民運領袖轉移出逃，幫他們傳消息。這時有位我們單位的老同志告訴我，上面有要抓我的迹象，讓我快走。我便倉促跑到福州。福州沒有朋友，沒有辦法走，只好又乘船來到汕尾。

到了汕尾，找到一位遷居來汕尾的舊友，交談之中說出了我現在的處境。他很同情，並且要盡力幫助我找去香港的船。大約一星期後的一天，他告訴我為我聯繫了一條船，七月二日啟航，讓我準備一千五百塊錢作買路費。我想了半天，告訴他，我手裏只有三百塊左右，請他想想辦法幫我借一點。他毫不猶豫地為我付足了船費，並在當日凌晨八點鐘帶我上了船上的船老大。

我上船後，他便與我告別回去了。在船上我只能呆在甲板下面躲着。不知出了什麼事，船一直沒能開動。下午，船老大下來告訴我：「為了安全要晚上才能啟航。」我無奈只有等着了。此後再也沒人下來說過什麼。

晚上九點鐘左右開船了，航行至海上的時候，我實在呆不住了，又漲又渴。我已十幾個小時滴水未進了。我爬上甲板，靠在船舷上問船老大要吃的，他聽不懂我的話，只顧自己吃着什麼的經文。他走之後，甲板上只留下我

一個人。見到貨案上有一碟水果、一碟包子，還有一碗水，我也沒想那麼多，抓來就吃了個清光。等他們發現時，我已經有幾分精神了。幾個年輕人吵着衝向我，船老大勸了幾句也沒攔住。他們與我動手打了起來。我抓住一個不放，抱着他要往海里跳。其餘的人給嚇住了。船老大對他們講了幾句什麼之後，把他們推回艙裏。我也回到船尾的甲板下躺了幾個小時。半睡半醒中，有人叫我出去，說是到香港了。我站在甲板上，望着前面半明半暗的島嶼，覺得不太像，因為沒有什麼燈光。

船靠了過去，船老大說只能送到這裏，穿過島便是香港了。其餘的人把我推下了船，我淌着水登岸一看，才知道這是對我的報復。這只是一個荒島。

我在島上呆了兩天，用海水充饑，等待着過往的船。島上雜草很高，晚上睡覺只好用衣服包嚴了腳，身上只有忍受蚊蟲的叮咬。第三天，一條過路的船聽見了我的叫喊，靠了過來。我講了遭遇後，他問我還有多少錢。我遞上最後的一百塊錢，便上了船。這條船繞路在一個小島附近一直等到天黑才駛入中環碼頭。臨下船時，船老大塞給我三十塊港幣，讓我搭車用。我緊緊握了握他的大手，表示感謝和告別之意。我上岸在路邊攔了一輛出租汽車，奔向朋友的住所。

③ 蛭伏在旅遊車底部

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在這次愛國民主運動中，始終堅持在天安門廣場直至「六·四」屠殺。我是隨着多數同學在士兵的槍口下退出廣場的。我們當時還打算回學校繼續校園民主鬥爭，回到學校後卻知道不可能再留校鬥爭了。當局正在準備清洗運動中的骨幹份子。於是我和同學老師們的勸說下，我們分頭離開學校，奔赴逃亡的路途。

我準備先回天津的家中看看父母再作打算。因在北京火車站沒法找到去天津的列車，便決定乘旅遊巴士回天津。誰知汽車中途發生了機械故障，無法修復行駛。我在附近的貨場看見一列準備啟動的貨運列車，上前與司機搭話，想搭乘去天津。司機無意中透露出是去南方的車，不走天津。我發現有幾個車皮印有山

西腐質酸公司的字樣。心想，腐質酸是煤的原料名稱，煤一定是送往南方的某個城市。當機立斷，我在開車前爬上了車廂。

列車開了一會兒，我也吃了一些隨身帶着的麵包，便昏昏睡在裝煤的編織袋上。醒來的時候已近中午，原野已呈現出南方的景象。我開始有些焦躁不安起來，誰知列車會把我載往什麼地方呢？

傍晚時我發現列車停靠在武漢附近的一個小站上。我下了車，在小溪邊洗了洗澡，換了衣服，在路上搭了一輛農民的拖拉機來到漢陽火車站。隨便吃了頓飯，買了些食品，在火車站附近等到夜裏零點左右，才乘坐上從北京到廣州的十五次列車。

在廣州下車後，先去中山醫學院找一位中學時的同學，沒找到。我開始盤算着如何能進入深圳，再想辦法去香港。我在火車站聽人說，沒有邊境證只能乘公路車到樟木頭。我決定試試看，於是設法乘上開往深圳的公路車。

在樟木頭下車後，我先對照地圖查看了一下地形和每處崗哨的距離，然後在一座小山丘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順着田間小路徒步朝深圳方向進發。大約下午兩點鐘左右，我來到一處檢查站附近，開始觀察過往行人怎樣通過檢查站。我在仔細觀察中發現檢查站側面是個小門，像是廁所，很少有人留意。將近黃昏的時候，我逐漸接近了等待接受檢查通過關卡的人羣，順利地混在人群中。我藏好眼鏡，看見無人注意便大大方方地朝那小門走過去。

小門內果真是個廁所，隔壁就是關卡內。牆很矮。我翻過去，朝沿牆的小路不遠處的一個小村落走去。當我剛剛鬆下氣來計劃下一步驟時，村中竄出幾隻狗朝我吠個不停。我怕驚動村民，急忙返回來路。此時我已進退兩難了。急中生智，我捲起褲角脫去上衣繫在腰間，拉着破涼鞋，撿起田邊的一捆甘蔗扛在肩上，沿着小路經過檢查站內側走上大路，朝深圳市區走去。或許我人很疲，幾個月的風吹日晒也黑了，很像農民的样子，所以沒有引起別人的懷疑。就這樣過關了。

蘇陽

靜。我就在此安頓下來，躺在池中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在街上吃了頓飽飯，沿着海邊觀察地形。海面很寬，我很難遊過去。我在遊樂場租了一艘小汽艇在海面上繞了幾圈。汽艇速度太慢，加上海防線上有巡邏艇駛來駛去，它的速度比我的快好幾倍。我即刻打消了渡海的念頭。

我灰心地繼續在街上轉來轉去想辦法。命運把我帶至一家酒店門前。我對停泊在酒店門前的中港旅遊大巴士產生了興趣。通過觀察，我摸清了它的開車時間，發現車體下面可藏下一個人。何況我身體不大，定可以乘它出境。

主意已定，我開始着手準備。那地方緊挨着發動機，我必須帶足飲水。我買了件長袖襯衫，把必帶的東西放入腰包。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左右，我來到了酒店門前，逐步靠近旅遊車。看看沒人注意我，便迅速溜入汽車輪的空檔，選擇了一根橫樑爬了上去。擺好姿勢，等待發車。

旅客終於上車了。發動機開始轉動，發出轟轟隆隆的巨響，灼熱的氣流撲面而來，噴得我幾乎窒息。汗水大滴大滴流下來，濕透了衣服緊貼在身體上。隨着車體的啟動，風抽去了部分熱量，才使我能夠堅持下來。

旅遊車走走停停，最後在接近邊境檢查站時停下接受檢查。汽車再度啟動，通過幾條白線後越過了那條粗粗的黃色橫線。我們終於進入了新界。此時我才鬆了一口氣。腦子裏一片空白，只覺得天昏地暗，酷熱難熬。我喝下最後的幾口水之後，身體已經不支了，急切地盼望汽車早一點停下來。我的身體下已被四處交錯的排熱管道燙了多處傷痕，在汗水的浸蝕下疼痛難忍。

我不知道旅遊車是什麼時候停下來了的，當斷定它已停穩後，我拖着早已麻木的肢體爬出來。天已經黑了，四處是耀眼的燈光。

北京傳柴玲被捕關秦城監獄

戴晴于浩成仍有機會被算舊賬

黎加路

據說柴玲已被捕

北京市委首先在六月十三日發出通緝廿一名學生領袖的指令。到十月發出通緝名單，柴玲、封從德仍列榜首。據來自北京的可靠消息，柴玲已落網，她並與王丹、劉曉波、任曉明等學生領袖或知識份子，同囚於北京市郊的秦城監獄。

據了解，柴玲曾一度逃離北京城，並已抵達廣州，而她在六月在香港公開的錄音帶，聲淚俱下地述她目睹血腥鎮壓及學生撤離廣場的經過，便是在廣州灌錄。柴玲在多方協助下，逃抵廣州。傳說中柴玲已被捕。因為她在天安門廣場上演講。



，但也難逃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空軍出動，終在廣州落網。

最近學生領袖李維和喬爾希在美國，獲頒由一個私人機構捐贈的人權獎，然而曾幫忙喬爾希逃脫的司機已落網，成為代罪羔羊。

以因政治犯聞名的秦城監獄，「六四」之後幾乎變成是「學生」監獄，囚禁的大部份是曾參與北京學運的活躍份子或頭領，知識份子也因了一大堆。秦城監獄對其他北京市監獄，並沒有對押者施以酷刑。

北京消息稱：秦城囚犯一週五天獲三發供應，早午僅得饅頭與粥，晚上則只有以碎玉米碾成粉末製成的窩窩頭，而週六及週日則只供應兩碗窩窩頭。所有囚犯都被嚴禁與外界親屬接觸。除頭號囚犯個別隔離開禁，一般都是七人共囚一個只有百多平方尺的斗室。每名囚犯每週「放風」一次，即被帶離開四壁密封的囚室，單獨到一個四面是牆，但頭頂見天空的空間，但是只可停留數分鐘。

戴晴于浩成釋放

「六四」之後被關進秦城，受調查後放出來的只有極少數的個別例子，如《光明日報》的戴晴和法學家于浩成，都是由於有力人士在背後極力斡旋，但他們獲釋並沒有註明是「無罪釋放」，而是找不出有什麼明確罪證。換言之，極有可能在環境氣氛轉變時，再被計算。

舊帳。至於被抓的學生，無論多「合作」，暫時都沒有「坦白從寬」被釋放的例子。

踏進十二月，北京市委在各高等院校大力推動連串大型活動。其中一個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四週年，重點是在北京大學舉行，用以恢復「北大元氣」，重整思想教育。

今年四、五、六月間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北京大學便是統領重鎮。經受「六四」鎮壓，九月新學期開學後，同學的情緒仍是徬徨不定，情緒低落。被指斥對學生思想控制不力的丁石孫在「六四」後被撤換，走馬上任的是吳樹青。他在十二月初，宣佈北大籌備活動，紀念「一二·九」學運，便指出上述學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救國於危亡之中的愛國學生運動，是看眼於祖國的前途、民族的利益」。事後語焉若揭，即指今年五、六月間的學運並非「正統」學運，他並強調北大應正確認識北大傳統——革命、民主、科學、愛國，缺一不可。

配合這種思想重整的教育，及粉飾精神豐滿的景象，共青團北京市委更籌組了第一屆首都大學生文化節，這個由數十高等院校參加進行的文藝節目活動，也是北大紀念「一二·九」青年愛國運動的重要內容。

「大白菜現象」的原因

北京城內，一般居民都對政治不太

感興趣，最近外國通訊社報導北京人「抵制」北京市政府，不買每年過冬都儲存的大白菜，導致大街小巷大白菜堆積，市長陳希同呼籲商人多買「愛國菜」等。中國官方喉舌《瞭望》海外版則反駁外國製造文章，謂「大白菜」現象是市場控制失調，對市民需求估計失誤所致。這一同，官方喉舌是說到了問題癥結。

「大白菜」事件實在與實際環境有緊密關係。首都開房子荒，一般北京人住的地方才數百平方尺，一家多口，根本沒空檔位置囤積大白菜。這幾年，北京菜種供應多了，一般人自然不願積存蔬菜。

北京市政府對於菜市場的供求預算偏差。以往曾出現個別冬季市民排大長龍買大白菜的情況，便大力鼓勵農民種大白菜。官方沒有掌握到準確需求，弄致一時短缺，而另一時候又過度的供應過多。

「大白菜」現象不是個別的問題，電器用品的供求如冰箱、電視機、自行車也出現類似情況，以往電器用品的市場繁榮，國家鼓勵生產，但國營企業以至個體私營企業爭相生產，政府沒作長遠的管理協調計劃，形成了目前的冰箱、彩電、自行車充斥商場，無人問津。在城市吸納電器用品已達飽和，加上政府又呼籲人民說幾年日子，滯銷的「繁榮」用品，似乎再不能在市場廣泛傾銷。那些「運籌帷幄」的官員又想到了另一妙計——到農村搞「模範電器村」，把電器用品推進入農村地方，然而他們似乎忽略了整個電力分配的問題，在電力不足的情況下，又出現了前一段鄉鎮企業盲目膨脹增長，導致國營企業電源不繼的教訓。

一看守（窗口，大聲嚷）：開飯了。
【D走過去，伸出手去。
【看守用煙頭燙。D急忙縮了回來。
看守笑。
【看守向裏面扔饅頭，一人一個。
D（向E）這裏面一天幾頓？
E（邊吃邊答）兩頓。
D：有水嗎？
E（指了指塑料杯）：到時候，一人半杯自來水。
D：解小便呢？
E（吃完了，扭頭對牆角）那兒有下水道。
D：大便呢？
E：到時候，喊報告到外面去。
D：那什麼時候能出去？
E：（低頭）不知道，給你看看手相吧！看看你什麼時候出世？
【D伸手。E握手。
E：（苦有其事地）這一條生命綫——這是一條坎，——不過，很快的。
【小賊們四處打鬧着。
【F嘆息。
【四周的人不作聲地坐着。
【一切在昏黃的燈下顯得可怕而不祥。
【朋友們似乎有些累了，抬頭看看我，我默不作聲地抽着煙。煙霧飄了一屋子。
他們靠過來，這是真的？
我懶懶地回答：是。
他們一人拿一杯茶，喝了一口，又問：那就是說，這跟電影裏國民黨的監獄好不了多少，甚至還慘？
我看了他們一眼：是。
他們又緊逼着：那就是說，這不是什麼人道主義？
我很狠地瞪了他們一眼：這是監獄，這本身就不是戲。
他們都埋了頭。
我抱歉地說道：放一段錄音，給你聽聽吧。這是劇中F的原型，他現在很瘦了。
（一九八九年，九月下旬）
我：你是說，現在還有人被關着？
F：是的。而且他們大多數和一幫流氓、地痞、社會渣子關在一起，他們不學習，不看報紙，與世隔絕，席地而坐，睡覺也是在地上，沒有床。
我：能具體地講講他們的生活情況嗎？我是指衣食起居的各個方面。
F：大約早晨是六點半被叫起來，晚上九點睡覺，中午有一個小時左右的午覺。
我：吃的呢？
F：窩窩頭。你沒有吃過。都是機做的，是陳年玉米棒子的糠做的，苦的。而且還經常是生的。至於菜嗎？夏天是老茄子，現在是燒白菜，那打菜的菜桶可以看到一層蟲子。至於碗裏嗎？是一層泥！一天兩頓，一頓兩個窩窩頭。
我：一個房間關多少人？
F：十四平米，關得多是二十五個，最少也有十八個，九平米，是十四、五個。
我：他們的大小便呢？
F：這些，我曾聽人說過，他們都不

相信，但是我還得說。早晨是七點半一次，下午是四點半一次，我是指大便。管教發草紙，一人一張，由管教發號司令：蹲、撒、起。一般半分鐘便是奢侈的了。當然，更有絕的，那便是「蹲、撒、起」三字連着說。那你便可以想象了。
小便嗎？在房間裏，下面是便池，上面是自來水。而且，由於有的人沒來及在外面完畢的，於是他們常把衣服撕了，包着大便，從窗口扔出去。那是一個巴掌大的小洞。
我：放風嗎？
F：不放？一天到晚坐着。
我：怪不得你這麼白。（我笑了，他也笑）
我按了stop，朋友們驚訝地看了我：他說的都是真的？他怎麼知道這麼多？太可怕了，一個人如果到了這種地步，還不如死了的好。
我吐了個煙圈，冷冷地一笑：相反，有很多人還沒有死。
我：現在關押的都是什麼人？
F：大多數是學生、學者、記者、北京的市民，有的是一家都在裏面，至於兄弟倆在一起的，更不必說了，還有「高自聯」，「王自聯」的人物。
我：你知道他們都是因為什麼進去的嗎？
F：這還用問。
我：能具體地說一，兩個人的情況嗎？
F：我不想給他們的家屬找麻煩。
我：挨打嗎？
F：這是經常的事。
朋友們這一次沒再說話。
我嘆了口氣：我們該排下一場了。
他們問道：他們又是怎麼挨打的？
我吼叫道：我不想獵奇。我只想說，有人挨打，這是事實，至於手鐐鐐在前面還是後面，電棍夾在手心還是打在身上……這都不是重要的。
（四）轉移
【下午兩點。
【小賊們你推我搡，彼此吹着牛皮，他們也只有十二、三歲，甚至還小。
【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四處茫然地張望，又低着頭想各自的心事。
B（站在窗口，嘆道）：噁到名字的出來。
【名字一個個過了，小賊們倒平安地留在裏面。
B（大聲）：一個挨一個蹲下，抱着腦袋。
B（環視了四周，看了看四周的警察）：好了——起來。（對持鐐子的警察）戴上。（他們一個挨一個戴好，連在一起）走。
【旁邊是兩列警察，扛着槍，槍口朝上。
【隊列無聲地移動。
【遠方是稀疏的槍聲。
【警察們互相笑了笑，漸遠。
（我給他們加了茶。他們又開始急急地問：他們到哪儿去了？他們又能轉移到什麼地方？

是啊，他們又到哪儿去了？也許，我是能給出一兩個確定的答案，可是，這能涵蓋所有一切嗎？
當然，轉移不僅僅是指轉監獄，大約也該有些別的地方。這只是我的一個小小的不太誇張的推測。在這裏，除了民主、自由之外，什麼不可能發生？
當我想到這一幕——這由於從生活中臨摹下來而顯得生硬的一幕時，前人的詩又響了起來：
“如期而來的不幸
並沒有打倒
那個悲哀隊伍前講話的人
他們的旗幟拖在地上”
……
幾十年來，我們似乎在重複着這樣或那樣的夢，可是結局是一樣的，槍口是一樣的，哭泣和憤怒是一樣的。
然而，這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或都願意去體味：
我們在絕食，有人在踢足球；
我們在為民主自由，為我們的明天奔走呼號，有人在冷嘲，有人在起哄；
甚至有人趁機玩樂；有人趁機發財；有人趁機擄取資本……
可是這一切綜合起來，到底又說明了甚麼？去問問廣場上的二十萬大學生，去問問百萬之眾的北京市民，去問問人心寂然的中國。
我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就套用過別人的一句話：多數人要讓少數人說話！——然而，今天，或更早以前，我就修改了它：權貴們要讓老百姓說話！
我不願去指摘那些利用手中權力進行世界級的各種醜惡活動的共產黨人——他們具有鐵一般的意志，這也就造就了他們的厚顏無恥：這不是整幾次黨風改變得了，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共產黨把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可恰恰又是它，把人民推進了死亡、恐怖和提心吊膽之中：就在不久前的一次採訪中，一位記者問一位中年男子對解除戒嚴有何看法時，他回答道：“那是國家和政府的事。”——如果我們把這僅僅看成是一種對政治的無所謂態度，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本身就意味着一種不合作，一種沉默的抗議。
似乎在這裏談論執政黨如何，有一點力不從心，因為它跟槍口、監獄、官僚、冤案以及野蠻、物價……連在一起，如果我們用一位被迫害致死的共和國主席的話，那便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這仿佛讓我們意識到議論齊奧塞斯庫和趙紫陽都是多餘的，這也使我們意識到：今天的沉默是和血聯繫着，明天的爆發也還得用血來喚醒，我們這一代必須付出這一切，否則，我們的後代也將走這條路！
“甯肯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希望總是有的，成功也總會有。
朋友們看看我，我想着默默移動遠去的那隊囚犯，我們都笑了笑，都有些淒涼地笑了笑。）
1990.1.作於一個不寒而慄之夜。
這篇文章最後陳述：
由於一切都是純然無解的未知數，尤

其在這一種時候，儘管我們對未來抱了極大的信心。
我說過這故事是發生在八九年六月中旬的一天，那後來這批人又到何處去了？他們的家人對他們又持何種態度呢？適有一友來訪，示我一信：
XX同事：
您好！
我是你的同儕者XXX的姊妹，在XX教育學院英語系讀書。元旦回家時，收到你給我姐夫的信，對你提供的一切情況，我們全家表示謝意。
比起那些尚在黑暗中的人，你是幸運的，目前國際形勢緊張，他們問題的解決可能會拖下去，我們深切地盼着能早日團聚。
倘你有時間能否將那兒的生活條件、所謂的學習狀況、他的身體狀況、心理狀態詳細告知，我們深為之擔憂。
XXX
1990.1.4
也許大家都發覺有部分是放出來了，盡管是極不情願的，然而更關鍵的，還有大部分人沒有放。
我們不願去談論那些心傷欲絕的家人，他們總是給孩子那麼多的支持，牽掛。
這是一個國家？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甚至連拉屎撒尿都得受人管制——這難道就是我們想走的社會主義？如果是這樣，還不如讓我們回到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不能實現什麼未來的理想，為什麼還這麼死要臉？
我這篇文章是給那些“尚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寫的，也許他們有的人永遠不會再感受到人的溫暖。

鏡子裏的真實故事

這是一個故事，一個真實的剛剛過去或仍在發生中的故事，它是那麼真實，又是那麼沉重，令人不忍去觸動，可又不忍不觸動。

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所說：

半身的坎坷風雨，幾代人的執著追求，一時間都湧到心頭。中南海的笑聲，天安門廣場莊嚴的宣誓，各種各樣的我不知道的或我所知道的共和國喜劇和悲劇……這沉默是有代價的，只有流血、嘆息，甚至捶心的痛哭，或者面對秋風化成一片落葉，都是不夠的。

荒唐的是這個時代，又哪裏是我們。

為了不妨礙故事的簡潔，我把它編成一幕小劇，請我的朋友們來幫忙排演一下：

A.B 北京市公安局X分局X派出所警察

C 戒嚴部隊一士兵

D.E 北京X大學學生

F 外地來京的大學教師

警察數人，士兵數人，外地來京聲援的學生數人，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數人。

我們把故事安排在北京站，這個生死之門檻上，時間當然是六月中旬的某一天。（早上十點）

（一）被捕

【遠處是稀明的槍聲。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平時忙碌的北京站，顯得特別清閑。

【一群叫化子，四處張望着。

【在售票窗口，售票員伸了個懶腰，隨手拿了份《人民日報》，看了一眼，又放下。

【士兵們手提沖鋒槍，槍口朝上，檢查着過往旅客的行李。

【D手提行李箱，從遠處直奔檢票口而來。

C（迎上去，提衝鋒槍）：停下！

D（停住，厭惡地）：幹嘛？

C（指了指皮箱）：把箱子打開，檢查！

D（皺眉，厭惡地）：要看自己打開。

C（惱怒地）：媽的！

【D提起箱子要走，C攔住，二人對視。靜場。

D（扶了扶眼鏡）：你幹嘛？戒嚴就讓這麼幹的？

C（抬了抬槍口）：哪個學校的？打開。

【D蹲下，不理C。C打開箱子，抖衣服，翻書。

C（拿出一張數學草稿紙）：這是什麼？

【D不理。

C（又打開一書）：哪個學校的？

【D不理。靜場。D想起什麼事，站起。

D（急急地）：我沒有什麼東西！

C（喝了一聲）：蹲下！

【C打開一個本子。D大驚。站起。

D（怒視，抗議）：這是我的日記，你不能看。

C（笑，得意地）：早就知道……學生……跟我走一趟。

【D在前。C在後，手提皮箱和沖鋒槍。下）

（我的朋友們配合得很好，他們盡心盡力地排演，使我又彷彿回到了那個恐怖的時候，處處都是槍聲。大街上都是張惶失措的人，不時有人喊道：這邊！這邊！救護車！

廣場，這便是六月三日夜裏的天安門廣場，血腥和恐怖再一次籠罩着這個政治文化也是動蕩的中心，不幸似乎又一次向中國人伸出了魔爪。

再去爭奪天安門廣場死了人或有沒有死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北京人習慣了，習慣了死亡，習慣了流血，習慣了不幸，他們在哭泣，他們只有無力的哭泣。

這一生，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位年輕母親的喊叫，和着淚水的喊叫：“為什麼我不死？為什麼不讓我死？”她的孩子，才幾歲的孩子，死在這個夜晚。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夜侯德健、劉曉波他們沉重、緩慢而又嘶啞的聲音，我請你們放下手中的棍棒，這對我們是沒有用的！

當然，我更不會忘記那個把槍口對着我的那一位人民解放軍：“走不走，不走就開槍了！”他是那麼偉大，面對我們這一幫手無寸鐵的學生。當趙勇明被寫成“共和國衛士”，一舉如何如何時，他似乎也該知道當時他根本沒有遇到抵抗？

……

處處是血的記憶：打彎的彈殼，一長串打光了的子彈頭，……光榮的人民解放軍，用他們的彈孔在北京街頭寫下了新的篇章。

六月四號凌晨，我們從廣場有秩序地撤出，我們永遠無法忘記六部口的那四輛坦克，那四輛橫衝直撞的坦克，從我們後面推過來，那士兵的頭露在坦克頂上，大笑着，向我們投擲了毒氣彈。黃煙冒出了，我們喘得咳出了白色的東西，我們四散逃命——這裏有一個需要爭論的問題：六部口死人沒有？

我不是目擊者，然而，我可以介紹一下那位目擊者的情形（清華大隊裏未必全是清華學生）。

他穿着一件血衫，騎了自行車。哭喊着：我們又有十一（實際是十三）個同學死了。他們竟在坦克前，想阻攔，他們給壓死了。

他狂亂地哭著，又往前去，把悲哀的消息傳到前面：這悲哀的隊伍已沒有了感覺，已經習慣了，也許是。

後來，清華的學生都這麼說着，甚至我還看到了題為“六·四——六部口”，黑白的複印件顯得不太分明，但依稀可以看出那模糊的東西，我手中沒有足夠的證據，只能在被人家概澆的水中，妄加一些揣測，這似乎是一個有節制的揣測。

我們不妨把目光再回到我們故事上來，儘管這並不比剛才輕鬆。）

（二）審訊

【簡陋的派出所，有一座的二層的樓房。四處是骯髒的牆壁，興奮的警察和

士兵們忙碌地進出。

拐彎。迎面是一扇鐵門——關人的監旁，陰森的通道，令人毛骨悚然。

拐彎口旁邊是提訊室，D坐在一張木槓上。回答A的問題。

【姓名、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之類問題，二人沉默。靜場。

A（拿着筆，準備寫）：你對這次動亂怎麼看？

D（略帶緊張地）：我沒有看法。

A（緊逼着）：你說說吧。

D（顯出茫然，然而鎮靜）我沒有看法。

A（平靜地，耐心地）作為大學生，你總得有個看法吧！

D（不慌不忙）我是團幹部，就說什麼就是什麼，我沒有看法。

A（嘆了口氣，頓，耐心地）。你談談，我們不會根據這個給你定罪，再說你這麼大了，能沒有看法嗎？（頓，低聲）我們才能放你呀！

D（懷疑地看）：是指當時的想法？

【A默不作聲，點了點頭。

D（緩緩地，有些疑慮地）我不是太反對的。

A（寫下，拿過談話記錄）：你看，然後簽字。

【D略略地看了一遍，指了十多處錯別字。簽字。按手印。

一個警察上，把D帶去。D大聲嚷：我要出去。

【警察嘴角一絲冷笑，

（我說過，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如果讀者有興趣，當然能找到。

在這裏，北京電視台，曾把一批流氓，小偷拍成了錄像，說他們是暴徒。

甚至，我劇中的主人公及其他人，也被他們編成從南下北上演講團的成員，大肆在電台、電視台宣傳，而進行他們的新聞導向。

奧妙不僅僅在這裏，是的，不僅僅在這裏，他們是絕不會守株待兔的，他們最擅長的當然是主動出擊，他們是那麼聰明。

他們在街上，四處堵截行人，逼他說出六月三日夜看到誰如何如何了，於是他們依法炮製，到處人心惶惶。不幸會突然降臨，在任何一個時刻。

至於聽到某人在深夜裏聽到急促的敲門聲，便跳了樓（儘管沒死），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無力描繪當時的北京市民是如何的驚魂不定。這是歷史學家們幹的事情。

我只想提一個問題，問一問憲法：到底日記在沒有正常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能不能搜查？

我的朋友們曾就這事進行了評說：當戒嚴是根據憲法來進行的，戒嚴的各項措施必須與憲法保持一致，否則一相抵觸便予以取消。

那我的主人公到底又犯了什麼罪？到底又犯什麼罪了他？

事情明擺着——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所謂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到底有多少是真實的？

當一代人驚醒了，他們便開了槍，事

後還宣稱是保障人民的安全，我們無需作太多的考慮，只要從六月三日以後的空蕩蕩的柜台，便可以看到人民是如何地缺乏安全感。

同時，一個奴才的軍隊，一個沒有頭腦的軍隊，一個唯上命是從的軍隊，一個由一批腐朽官僚們統治的軍隊，是多麼可憐。當他們喪心病狂地向學生市民開槍，他們是不會想到他們由於揮刀而落伍的士兵正是由於學生、市民的保護才躲開了憤怒的磚頭，棍棒。

也是那個恐怖之夜，一個士兵被一位中年婦女及一名年青人（學生？）拖到我們那兒，那婦女極其和善地說了許多話，她說她曾給我們捐過錢。她說那士兵已經繳了槍。

很自然的，我們都這麼認為，這是極其自然的，我們保護了他，並把他送上了救護車。

我們沒有想他的同伴在幹什麼，“他是無辜的，他沒有殺人，然而他所代表的是有罪的，聽聽槍聲，聽聽哭喊聲。”我的朋友這樣反駁，他是怒斥。

是的，如果我們想到被抓的市民受到的毒打正是他們幹的，如果我們想到一個個自由的人正是被他們剝奪了自由，如果我們想到他們的槍口和他們殺人後的狂笑聲，想到那個趴在樹上等部隊從死屍上走過去之後才戰戰兢兢地回家的青年工人，想到那些死屍……如果我們想到了這些，我們還會不會沉淪在那個“幹還是不幹”的荒唐詰問中？

是的，社會主義能夠培養雷鋒這樣政治上低能又無知的順民，然而，社會主義更善於培養的是它的敵人。）

（三）關押

【陰森的通道盡頭，三間監房。鐵的門，上面有一個人頭一般大小的洞。

【外面是來回的士兵，後面跟了學生、小偷，無家可歸者。

【門開了，D走進去。

【混濁的空氣及尿臊味撲鼻而來，D皺了皺眉。

E（樂了樂）：你好！哪個學校的？

D（笑，頓，遲疑了片刻）：你也是學生？

【E介紹了四周的人。還有幾個小賊。

【D打量了四周：一隻塑料杯子放在長凳上。

【總共三張長凳，小賊們躺着，別人坐着。

【屋頂是一盞污物蒙着的燈泡，發着昏黃的光。

【通往外面的一堵牆的上方有一個小洞。外面是另一堵牆。

D（向E，關切地）：關你幾天了？

E（嘆氣）：兩天。

D（緊張，急促）：能出去嗎？

E（抱頭，看了後面的小洞）：不知道。

【D不作聲。四周的人都不說話。

F（向D，嘆一口氣）：什麼原因？

D（輕輕地）：日記。你呢？

（F不言）

E（代答）：一些照片，一些死人的照片。還有一封信。

（D低了頭，不作聲）

一個被抓大學生的自述

一學生

一個在紅旗下成長的第四代大學生，參加了愛國之舉，沒想到會被押進牢房。官兵的一招一舉，頃刻間電棍、木棍、槍托、皮鞋狠狠地落在身上，其他犯人打得更慘。

〔編者按：本刊於八九年十二月以「無聲的中國人民心聲」為題，刊出一批信稿摘錄，隨後收到這篇從中國大陸帶出來的文稿，是一個參加過學運的大學生的自述，寫出了他被捕後所受的非常待遇。六四後的黑色恐怖，由此可見一斑。〕

現在我常常做惡夢，每晚總是在夢中的驚恐中醒來，黑漆漆的屋子沒有一點聲響，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打出來之後我一直是在這種精神狀態下生活。父母、兄弟、姐姐非常疼愛我，也非常理解我，他們知道我在監獄裏吃了苦，精神也受了很大打擊，時常安慰我，但我無法解脫出來，因為我被關進監獄的紀錄，將像一塊烙印在臉上的印記，可能永遠也抹不掉了。

趕忙回家

我是一個在紅旗下成長的第四代大學生，我參加了這一代大學生的愛國之舉，表達了拳拳報國之心。我們是那麼想為祖國和人民做點事情。我們去做了，勇敢地執行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會被用槍押進了拘留所。那一夜的天安門廣場使我終生難忘，我和幾個同學從廣場撤出之後就急著趕回學校，想把親眼所見所聞告訴其他同學和印成傳單。我們只有把事實告訴廣大市民才能對得起良心。

回到學校，不用我們說，一切全清楚了。不時有受傷的同學被抬回來，身上和頭上纏著紗布或碎布片，到處都是那麼緊張和低沉。這是誰都不能預料到的結局。我們趕緊找來蠟紙和油印機，開始行動起來。當時我們每個人心頭都好象懸塊石頭，沉重極了。

那一夜之後，氣氛驟變，校園變得陰鬱和空蕩起來，許多同學連夜就回家躲起來了。我家不在北京，所以只能先就在學校。不兩天，父母的電報來了，催我馬上回家，一刻不能耽誤，他們害怕孩子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只好在收拾收拾，火速趕往火車站。

在車站被扣查

到了站口，我就感到氣氛不對勁。每個人必須搜查，我把包裹交給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一個口音很重的農村兵迅速打開包，另一個開始檢查我的證件。我把學生證遞給他，他一看，馬上走向一個軍官，嘀咕兩句，對我嚴厲地說：「跟我們走！我們要進一步檢查！」我一怔，但心想我不是暴徒，而且我們去軍訓時，當兵的對我們還可以，對大學生挺照顧，他們也是普通人。

他們把我帶到車站東頭的休息室，當然已是他們駐紮的營房了。我被硬推進去，一看，裏面已有幾個跟我一樣學生模樣的人，從另一個室裏不時傳出氣憤而無奈的爭吵聲：「你們帶我到這裏幹嘛？我的行李沒有什麼！」輪到我了，我被帶進另一間房子，裏面全是持槍的軍警。他們二話沒說，開始仔細搜我的身和包裹。不幸我身上還帶著兩張傳單，是兩張北大的傳單，我們在廣場上遊行和靜坐時每天都看到新的傳單。他們搜出了傳單，搜得更深入了，但一無所獲。他們的態度更嚴厲了。我被用槍押到了另一間大屋子，舉起雙手趴在牆上站著。

過了兩個小時，我的腿都站麻了，更多的兵湧進來，把我和其他人帶上銬子，拖出去弄上軍車。

我們都害怕極了，不知道要帶我們去哪？我想試探地問問，但剛一張嘴，就挨了一槍托子。我們擠在車上，蹲著低著頭。車飛快地開起來，我們劇烈地晃盪著。

車開到什麼地方，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一個接一個被押下來，進入一間大屋子，又黑又靜。接著就一個一個核對名字，然後分別帶到另幾個房間去，那些房間不時聽到打人和求饒的聲音，甚是恐怖。

皮肉之苦

我被帶進去，不許抬頭，只知屋子有許多雙翻毛皮鞋和黑色皮鞋——這我知道：穿翻毛皮鞋的是戒嚴部隊，穿黑皮鞋的是警察。當兵的把我按在一個木凳上，開始審我。

我的學生身份他們知道，也不囉嗦，就問我：「你都幹了什麼？為什麼帶傳單？」我如實說，我想坐火車回家，傳單是廣場上發的。我想馬上讓他們搞清楚，就說：「我不是暴徒！我沒有燒軍車！」「你沒燒軍車？你燒了？你以為沒燒軍車就沒事了，就能放了你！你們這些大學生，不好好在學校讀書，到廣場上起什麼哄？你們懂得什麼民主自由，就是你們把事情鬧得這麼大！你們都是吃飽了撐的！今天讓你們嘗嘗我們的厲害！」

他的話音未落，就一招手，頃刻我就被當兵的和警察包圍了，電棍、木棍、槍托、皮鞋狠狠地砸在我的身上。我活這麼大也沒挨過父母的巴掌，想不到他們會這樣的打我，我只能抱著頭在地上打滾。我一會兒被踢到這頭，滾到那頭當兵的又是一電棍。電流通過我的五臟都快炸了，眼前金星亂冒。他們仍在我身上蹭著電棍，嘴裏在罵著，似乎是我殺了多少戒嚴部隊，不對我打誰！我掙扎著喘息說：「我沒殺戒嚴部隊！」「我沒燒軍車！」那些當兵的覺得我嘴硬，又是一頓亂揍。我的臉上掛滿血，背上火辣辣地痛，再也沒有力氣掙扎了，癱倒在地上，縮成一團。

「老實了吧？這回說吧！我們對你們這些暴徒手下夠留情的了。你們殺死了我們多少戒嚴部隊？你們太猖狂了！」

我無言以對，只求不要再打我了。審訊繼續下去，我坦白交代了怎樣在廣場遊行、示威和靜坐，怎麼和同學們印刷傳單、搞宣傳。我試圖說明這都屬於過激言行，過激言行恐怕沒這麼厲害地挨打吧？以後的日子就是在監獄裏渡過的，不時被

爆滿的監所

監獄環境惡劣，幾個通道全都塞滿了。原來每個監所須多關七、八個犯人，這次一下子爆滿，每個監所硬塞進二十四、五個。本來天氣燥熱得厲害，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不大的監所裏，簡直像進了蒸籠，汗水流進傷口，傷口作痛。又不許說話，必須成列坐直，雙手放在膝蓋上不許動，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就這樣好好反省。

我們唯一的最大希望就是吃飯——窩頭，一天兩頓，一頓兩個窩頭，通黃通黃的，還有點爛白菜湯，這就是每天固定的飯食。開始兩天，我看見窩頭就噁心。到了第三天，我實在堅持不住了，就吃了個硬梆梆的窩頭。我出來之後，看見黃的食物就噁心，就是在監獄裏吃傷了。



「回到學校，不用我們說，一切全清楚了。」

北京的九月是最好的旅遊季節，「國慶」也臨近，但今年這個時候到北京總覺得不合時宜。本來已趨「穩定」的北京市民，現在又來了個檢查身份證的制度，少不免又一陣緊張起來。金秋的十月，帶給人們的並不是收穫的喜悅，而仍然是悶悶的抑鬱和離散的痛苦。

官方嚴密地封鎖了新聞，但北京私下的消息還是很靈通的，而且傳播得很快。

令中共頭痛的「變節」人物

「六四」屠城之後，民運分子紛紛逃離北京，中共駐外人員也紛紛找尋機會變節，據稱至今已近三十名外交人員在國外成功求得政治庇護。在這些變節人員中，最令中共頭痛的人物是趙復三。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是這些變節人員中官階最高的一位（副部長），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是一位神秘的特殊人物。

北京一位消息靈通的朋友對我說，趙復三公開的身份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但他的實際身份是國家安全部的副部長。這位朋友說，中共的控制手法一貫是這樣，大凡一個大的部門和機構，必派一名屬於安全系統（安全部和公安部）的幹部去出任副手，政協、文聯、作協甚至行政機構都會這樣。他舉例說，現在的全國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劉復之，出身於公安系統，與文化事業毫無淵源，但他就曾被派到文化部出任過副部長，前些年打回原形出任公安部長。



九月的北京：盡在不言中。

本刊攝

追尋外逃的「秘密管道」

趙復三是變節人員中官階最高的一位，而且是一位神秘的特殊人物。深圳的人說吾爾開希是從深圳走的，珠海的人說他是從珠海走的，大家都為吾爾開希而驕傲。劉再復、徐剛、祖慰逃到了外國，中共專門為此發了一個內部通報。由於民運分子不斷地利用廣東逃離國境，中共當局已把此種情況視為「第一敵情」。民運分子的逃亡過程除了極少數知情者外，對中共來說至今仍是一個謎。

前幾年，安全部一位處長貪真三叛逃，中共就緊張得不得了。所以這次一位副部長變節，中共高層更加頭痛。

逃亡的三個衝擊波

除了趙復三，已逃離中國並在海外露面的中共高幹，主要有陳一諮、嚴家其、蘇紹智等，還有不曾露面的劉再復。他們的逃亡過程除了極少數知情者外，對中共來說至今仍是一個謎。

民運分子逃出中國，在中共內部曾產生過三次衝擊波。第一次是六月中旬嚴家其及吾爾開希逃亡成功，第二次是香港報紙披露劉再復、徐剛、祖慰逃到了海外，第三次是最近蘇曉康逃到了巴黎。

第一次衝擊波對中共的衝擊特別厲害，使中共整個邊防系統和公安系統（特別是廣東方面）都敏感起來。第二波由於沒有透露劉再復、徐剛及祖慰三名作家是何時從何地走的，所以震撼沒那麼大。但九月中的第三次蘇曉康叛逃，又一次使中共邊防系統手忙腳亂起來。因為第一波和第三波都是從香港傳過去的，第一波之後中共對邊防已大大加強，想不到現在又冒出了蘇曉康的第三波。

北京一位知情者批評說，海外一些傳媒往往是在幫倒忙，這三個衝擊波雖然對中共有一種示威的作用，但也有負面影響，還未逃出去的民運分子將更難逃出去了。

吾爾開希逃亡兩鏡頭

此位知情者曾協助多位民運分子外逃，他說，深圳的人說吾爾開希是從深圳走的，珠海的人說吾爾開希是從珠海走的，大家都為吾爾開希而感到驕傲。

我問他，吾爾開希到底是從哪兒走的？

他笑而不答，最後告訴我兩個他「聽來的」有關吾爾開希外逃的故事。

他肯定吾爾開希是從廣東走的：吾爾開希等人南下時，離開北京不久，在列車上讓身邊幾位

旅客認出來了。一位旅客說：「我認得你，你就是吾爾開希。」吾爾開希很鎮定也很自信，他回答說：「是，我就是吾爾開希！」那幾位旅客不吭聲了，過了一會，他們遞了一條紙條給吾爾開希，上面寫道：「不要怕，我們保護你！」據說，他們一直把吾爾開希等人護送到了廣州。

六月中旬一天，珠海市有人發現吾爾開希一行五人在珠海街頭出現，當時吾爾開希正在街邊大排檔吃飯。有人把消息報到了公安局，於是當局進行了一次全市大圍捕，但見不到吾爾開希的踪影。過了兩天，香港傳媒就說吾爾開希到了香港。隨後，當局對珠海的邊防軍信不過，專門從江門市調部隊到珠海接管了防務，再往後就傳出了珠海邊防軍開槍打死多名偷渡者的消息。

劉再復、徐剛怎麼走的？

在北京，對於著名評論家劉再復及著名詩人徐剛的出走有很多議論。他們到了外國的消息，都是七月底從美國傳出的，當時蘇紹智去了一趟巴黎回到美國，就公開講了這個消息。與此同時，香港《快報》又報道了劉再復已經到了新加坡。甚至有人說，劉再復與徐剛是經過營救民運人士的「秘密通道」經香港去外國的。為此，中共發了一個內部通報，內容是轉引香港左報《文匯報》、《大公報》的消息，說劉再復、徐剛、祖慰三名作家已逃到了外國。

北京一位知情者對筆者說，劉、徐同是著名作家，各方面的人緣很好。據說劉再復年前出訪法國的護照仍在身邊，「一六·四」之前已接獲往訪新加坡的邀請，一應手續已經辦妥，並已拿到了六月四日當天的機票。

在整個五月份，劉再復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一開始就充任了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調停工作，後來又被政府毫無誠意對話的態度激怒，參加戒嚴期間的示威遊行。

六月四日，劉再復丟下一切，打算先去新加坡一趟再說，他手上有兩張機票，一張是自己的，另一張是上海青年女作家王安憶的，新加坡邀

本刊特約記者 曉 冲

請他們倆去訪問。可是，由於中共戒嚴軍展威，王安憶在公主墳那邊過不了關，劉再復沒有想到應自己先走，只好在家等著，錯過了航班。當時他仍估計不到事態會那麼嚴重。

「六·四」過後，劉再復也離京躲了起來，後來有人勸他外逃，但他認為與其外逃給抓了回來，不如就在國內給當局抓去。確實，他本來就有出國的自由，現在如果外逃給抓了，又會多一條「外逃叛國」罪，何苦呢？

至於徐剛，這位前人民日報文藝部的副主任，也是「六·四」之前就接到美國一間大學的邀請，並在「六·四」之後馬上辦了簽證。

徐剛本來是位著名詩人，但一九八五年給中共開除黨籍離開人民日報後，已不再寫詩而改寫報告文學，已有《伐木者，醒來！》及《江河並非萬古流》在全國有廣泛影響。五月中學生的絕食壯舉再次激起他的詩情，他除參加組織知識界



愛國詩人徐剛過上了流亡生活

本刊攝



柴玲、封從德夫婦行踪撲朔迷離

消息都無法證實。

一位在中共政府部門工作的幹部對我說，有一點可以肯定，直到八月中旬，柴玲仍然沒有被捕。他當時看過一份內部的三十六人通緝名單，已被捕的王丹、劉曉波等人已再沒有在名單上出現了。名單中第一、二位是方勵之及其夫人李淑嫻，柴玲、封從德夫婦也榜上有名，排得很前，蘇曉康名列六、七名。

另一位知情者告訴我，柴玲的錄音並非外界所傳的是在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內進行的，而是在中國中部一個城市完成的。隨後他們一行人走散了，一部分人帶了柴玲的錄音帶逃到了海外，柴玲、封從德是不是從另外通道到了海外隱藏了起來，還是讓中共秘密逮捕了，他並不清楚。

安全部五人小組長駐廣州

由於民運分子不斷地利用廣東逃離國境，中共當局已把此種情況視為「第一敵情」。

在電視劇《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逃離國境之前，中共除出動大批部隊在東南沿海各省的主要交通要衝截查民運分子外，國家安全部一位副部長劉文帶領一百二十多人南下廣東，親自坐鎮佈防堵截，隨後更是由廣東省安全廳長、福建省安全廳長、廣州市安全局長、深圳市安全局長及劉文本人組成一個五人指揮小組，加強緝捕堵截工作方面的聯絡與統籌，估計他們還會有一段長時間在廣州駐下去。

一位到過廣東邊防的人士透露，七月份中共如臨大敵之時，有三大炮艦佈防珠江口海面，隨時準備堵截追緝利用船隻外逃的民運分子。到了八月中旬，可能是對外影響不好，三大艦悄悄撤走了，但小炮艦還是照樣佈防，而且除下所有炮衣，據懂軍情者說，除下炮衣（帆布罩）就意味着進入戰鬥狀態，隨時都可能開炮。可見利用海路外逃是非常危險的。

究竟民運分子是從什麼渠道成功地逃了出去的呢？北京的知情者說，條條道路通羅馬，陸上、海上、空中，條條通道都有人走了出去。不過，在北京，也有人說，秘密通道已遭中共破壞（一如香港一些報紙所說）。但也有有人說，有良知的中共官兵的同情和諒解，有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秘密通道是永遠不會全部被破壞的。

平鳴月刊 1989/10

安全部在深圳設監聽站 香港無線電通訊全部遭竊聽

李豐

六四大屠殺以後，中共國家安全部對大陸、香港人民的監視已到了無孔不入地步。除派遣特工潛入香港外，數月前，安全部更在深圳建立專門機構和設備，截收全部無線電訊，包括「大哥大」電話訊號。而且有關工作已收到成效，羅海星、陳澤偉被捕，就是因為安全部人員成功截聽其流動電話談話內容而偵破的。

本刊從國安部獲悉：國安部在數月前已在深圳成功建立截收香港全部無線電話設備，目的之一是嚴密監視香港人與內地正在追捕中的民運人士之聯繫，另一目的是監視香港電子傳媒將六四事件訊息傳播入大陸。

消息透露，所有香港無線電波均在國安部監視之內，而且全部均予截收。在深圳每日負責截收香港無線電波的國安部技術人員多達十多人。被截收的電波中特別被重視的有無線電話、電報、衛星訊號、電台電視等。

一位人士指出，不少港人誤以為大哥大電話保密程度高，實際上香港所有大哥大電話訊號均在深圳站截收範圍之內。雖然大陸在民用電訊方面仍不太發達，但是國安部在技術上作這些監聽、截收完全可應付裕如。

國安部不但監視香港，還嚴密監視大陸的大哥大電訊。

消息人士指出，港人羅海星、澳人陳澤偉被捕，連同王軍濤、陳子明、鄭旭光被抓，就是因為國安部成功截聽羅海星、陳澤偉等在深圳使用流動電話時透露的內容而偵破的。

有關人士曾舉一個例子說，六四事件發生後，安全部亦十分密切注視香港電子傳媒有關報道，如香港電台曾做過一個「北高聯」學生從廣場逃出後，控訴中共殘害學生、市民的錄音特輯，安全部獲悉後，在這個特輯播放時放出強大干擾訊號，不但令內地原先可收聽到港台的不少地區完全無法聽清楚特輯內容，甚至香港和澳門、深圳部分地區亦無法接收電波，同受其害。

本刊還獲悉，在深圳、珠海、廣州等

港澳人士較多出入地區，國安部佈下大量線人，以深圳為例，五成以上的士司機都屬安全部線人，有任何情況，這些線人均必須向安全部或公安局即時報告。

而被安全部嚴密監視的場所還包括舞廳、夜總會、桑拿浴室、車站、碼頭、戲院。在深圳和廣州，任何舞廳均有線人。

安全部人員還向本刊透露一個驚人的內幕：羅海星在廣州時前往與營救王軍濤的人士接觸，他曾一連換乘了五部的士，不幸的是每部的士司機均是安全部的線人，羅海星在廣州舉動完全處在國安部監視之下。

而七月份暨南大學澳門學生陳澤偉等人在廣州被捕，亦是因為國安部早已密切注視陳澤偉等人活動，等待陳澤偉與「北高聯」領袖鄭旭光從廣州中國大酒店步出門口，準備離開廣州時，才下手在大酒店門口將其逮捕。

鄭旭光被捕，實情並非如新華社發布的消息那樣，當時消息稱鄭旭光是在珠江電影製片廠被捕的，發現他的原因是因為有香港人攜假護照在過海關時被發現。該人供出護照是供鄭旭光外逃之用。

消息人士還說，安全部對大陸和香港人民控制、監視同樣重視，如香港支聯會發起元月大遊行，就有安全部特務混入其中，收集資料。

當代周刊 98/2/3

「秘密通道」的來龍去脈

兼談民運人士外逃經過

■ 堯士

大陸公安偵悉「秘密通道」

「秘密通道」一直是人們談論的話題。一方面大批參加八九民運的志士通過這條地下通道得以逃出魔掌；而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又宣佈抓獲了涉嫌協助民運志士逃亡的香港居民。秘密通道格外惹人注目。

不善忘的人其實心中都明白，港澳由於地理上和政治上的關係，歷史上就是「秘密通道」，被毛澤東稱作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就曾借香港作爲「秘密通道」，逃過清廷魔爪的追捕。

我們從內地有關部門獲悉，內地公安部門月前已經完全偵悉了部份早期的「秘密通道」，而且派遺特務進行滲透，作瘋狂堵截，懲罰了「失職」的人員，加上港澳報章對部份細節亦作了披露，所以我們以爲對「秘密通道」作披露，已無太大影響。

從地理上看，港澳地區與中國大陸都有土地上的連接。特別是澳門的西面內港與珠海灣仔更是共同一個港灣，所以，不可避免的澳門就是「秘密通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學生領袖李海龍曾逃往法國後就向報章透露，他是經中國南方某個城市逃出大陸的。這個城市據筆者所知就是珠海。而繼之逃出生天的首都工人自治會副主席岳武、原深圳新聞工作者何頻最近都公開宣稱，他們都是經珠海逃往澳門的。（何頻訪問見本刊二〇八期）

筆者所知，實際上至少有四名重要的民運人士是經澳門逃往海外的：李海龍——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岳武——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

何頻——原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

李海龍——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

只是李海龍較少公開露面，談及逃亡事由，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李海龍等從澳門去外國

事實上，李、岳二人在學運中如明星般，故認得他們的人頗多，他們在珠海出現時，都會爲人們認出，行踪不久後即暴露，爲公安人員追蹤，危險萬分。

如李海龍曾在拱北的步步高酒店出現過，爲人認出，軍警作大規模搜索。

李海龍亦曾在珠海暴露過。

李海龍、岳武、何頻由於有通緝令頒佈，故抵澳後很快被作爲政治難民安排離開澳門，前往法國。而何頻則在澳門停留了頗長時間，以便證實身份和安排第三個地方接受。

李海龍曾經香港去法國時，還曾製作了一套錄影帶，向世人控訴中共軍隊屠殺人民暴行，並寫下字條，要射下「黑太陽」，給絕望中的國人帶出了一個訊息：民主不死，人民嚇不倒。

這四名人士的逃亡過程都充滿了傳奇和驚險，但我們可以談的是岳武的逃亡過程，因爲他自己已在最近向海外一份刊物談了逃離珠海前來澳門的詳細經歷，我們僅作補充。

岳武是在八月份才逃到澳門的。當時珠海市停泊在九洲港的「澳門遊」遊船仍開動，每天都繞澳門海面一周，安排國內遊客目睹澳門外圍的風光。

岳武正是乘搭這條遊船，當船隻由九洲港開往澳門，繞過新口岸，穿過澳門——氹仔大橋，抵達澳門西南面即媽閣廟附近海面時，縱身躍入海中，游入澳門水域。

岳武回憶當時情景是：雖然當時船上有很多人見他下水，但是無人做聲。

岳武由於人生路不熟，所以，他並不知道他下水的地點就是媽閣廟對開海面。

媽閣廟乃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名勝，已逾五百年，在澳門開埠前已存在。據傳五百年前一個刮着颶風的晚上，一艘漁船迷航，幸得廟中一盞青燈指引，令漁船安然靠岸，渡過困難。從此，媽閣廟名聲大噪。每年媽祖誕辰均籌資在這裡舉行盛大慶典，大演神功戲，成爲澳門每年最有特色、重要的民間活動之一。

當岳武經澳門逃出天際的消息傳出後，一名澳門居民就打聽對筆者說，媽閣廟不但庇護了澳門幾百年，而且還庇護了中國的民運人士。

岳武利用遊船逃出爲中方發現後，這項遊船活動已停止幾個月，至今仍未重開。九洲港公告寫道是接上級通知停開遊船的。

這些逃澳的民運人士能逃出生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澳門的民間慈善團體本着人道主義精神，慈悲爲懷，收容了他們，並爲他們作了妥善安排。澳門民間慈善團體爲數不少，而且相當部份歷史悠久，如著名的「同善堂」就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實爲中國慈善史上所僅有的能堅持行善如此悠久的團體。

中方最大宗報復事件

澳門目前保守估計，有非法入境者達三至五萬人，佔居民總人數五十萬人的半數左右，所以，不少非法居民遇困難時，多會向慈善團體求助，慈善團體從幫助非法入境者渡過難關的工作，可謂輕車熟路。

大概也是這個歷史原因，令中國政府無法找到借口，公開指責和報復澳門當局，只是暗地裡做些小動作「懲罰」澳門政府。

比如故意以追捕偷渡客爲名，從中國境內向澳門居民亂槍掃射，向巡邏的澳門水警船隻開槍等，其實，追捕偷渡客又何需開槍掃射呢？去年九月間，中國邊防軍向澳門居民開槍，擊斃珠海的黃洲區居民玻璃窗被打破，幸而未造成傷亡，這實在是一種喪心病狂的行爲。中方這種行爲，經澳門當局抗議後方停止。

中方最大一宗報復事件是去年十月間，拱北邊防巡邏隊與海關一起行動，截收澳門當局遣返的偷渡客，配合這一行動的是停開澳門至珠海的灣仔客輪。明眼人一看就知肚明是何回事。

當時澳督文禮治剛結束北京訪問，澳督在京時曾被李鵬、周南大讚了一番，讚澳督「識大體」、「顧大局」。澳督方面爲防事態惡化，當時乃技巧的稱這只是技術上的轉變引致的問題，給了中方一個下台的好機會，中方見澳督當局如此大方，自討沒趣，亦只好悄悄的結束了截收偷渡客行動。（編按：參看本期林亞文文）

民運人士避免刺激澳府

據知情人士對筆者透露，自從傳出有秘密通道後，公安部就派遺特務，冒充民運份子（特別是學生）到珠江三角洲區活動，還混入南下的北方

學生當中，到廣州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地活動，以偵破通道。有些特務甚至以偷渡方式，混到港澳活動，收集資料。

澳葡政府在六四事件以後，採取了與港英政府不同的做法。澳府竭力避免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屠殺，而葡國總統當時亦僅發表了措辭溫和的譴責中共屠殺人民的行爲的談話。

澳府爲免刺激中國政府，甚至取消原定在七月份舉行的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海報展覽計劃。

在大屠殺不久，澳門的民主派組織曾向政府要求，在澳門建立一尊永久性的「民主女神」塑像，並要求澳督在一定時間內答覆。澳府乃將這一事件淡化處理，民主派後來亦沒有再提出這一要求。據消息說，澳府曾勸喻過民主派，不要做太刺激中國政府的事情，勸喻民主派擱置這一計劃。

隨着時間的推移，澳門人逐漸淡忘六四事件，澳門民主派將工作重點轉移，轉爲關心基本法的起草。澳門基本法第一個方案即由五、六月間組成的民主組織提出的。澳門民心情緒逐漸穩定下來。

消息人士說，澳府在對待逃往澳門的民運人士問題上，亦採取避免直接接觸方法，低調處理，僅在暗中注視事態發展，盡量不刺激已陷入絕望底層中的中國領導人，從而避免了許多可能會令澳門社會出現不穩定的事件的發生，而澳府領導人亦從中得了不少實質的好處，不像港府那樣惹了滿身麻煩。

岳武（中間帶眼鏡者）便是從媽閣廟登上澳門，再到外國的。



226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美國最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以頭版顯著標題報道了大陸民運領袖陳明、王軍濤等被捕的消息，海外民運組織和團體無不震驚和惋惜。

了解一九八九年北京學潮的人士，都非常清楚他們兩人在「八九民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中共公安部幾次秘密或公開的通緝令都將陳、王二人置於榜前，勢必賴拿歸案之列。他們在成功的藏匿達五個月之後被捕，實在令人痛心。

令人生疑的是，就在陳、王二人被捕的消息公佈不久，相繼從法國、香港等地的民運團體中，不斷傳出陳子明、王軍濤等人已成功地逃離大陸的消息。某位民運聞人則口口聲聲地聲稱：他近日曾與在香港的王軍濤通過電話，王已在香港某團體處等待赴美手續。言之鑿鑿，煞有介事。同時，從民陣總部巴黎也傳出陳、王二人已由港支聯安排抵達香港，不日將赴法云云。由於說這些話者為民運重要人物，一時間疑雲密布，在美各民運組織眾說不一，對於陳、王二人的下落各有其詞。

做爲《世界日報》的消息來源的中國民聯，經再三核實消息的準確性後，力排衆議，爲挽救陳、王三人的生命，防止中共當局秘密殺人，決定以大量篇幅顯著報道陳子明、王軍濤被捕的消息和二人從政生涯。在這方面，他們有過類似的經驗，深知中共最怕抓人曝光和世界輿論。所以決定設法逼中共當局表態承認抓人。有關稿件同時被送至《世界日報》和其它中文媒介，希望將海外輿論開動起來，來挽救被捕者的生命。但令人遺憾的是，十二月的一次民運組織的電話會議，再一次造出王軍濤未被逮捕的假消息，致使除《中國之春》之外的各傳播媒介不得不撤下已商定要發的稿子。直到中共當局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新華社訊的方式承認抓獲陳、王等人 and 營救他們的港支聯會、海星等五人，並正式逮捕後，海外華人關於陳、王二人是否被捕的摸索迷離的謠傳和故事才算告一段落。

據一位民運團體負責人回憶，當時他家裡的電話不斷，經常是上午有人告訴他王軍濤正被押往北京秦城監獄，晚上就有另外的人告訴他王現在安全地方，正設法逃離大陸。每個人都聲稱消息來源可靠，每條消息又有不容忽視的背景，叫人真假難辨……。

據中共《人民日報》十二月二十六日報道，港支聯成員羅海星、黎沛成、謝振榮、李龍慶等人於去年十月十二日受指派專程到湛江，次日按港支聯給的地址，名字和聯絡暗號，企圖將藏匿在湛江市的通緝要犯陳子明等人帶離湛江。實施偷渡外逃時，被湛江市公安機關抓獲。」並指稱陳、王二人為「煽動、組織、指揮北京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

面對近十名香港支聯會救援人士和二十幾位大陸民運骨幹同時被捕的重大事件，歷來敏感的海外民運組織爲什麼變得如此遲鈍？爲什麼早在十一月三日首先發稿報道陳、王等人被捕消息的《世界日報》，却輕信謠言而撤回有關王軍濤民運生涯的稿件？爲什麼圍繞着陳、王二人是否被捕的消息產生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版本？最後一個爲什麼是：中共爲什麼能準確地破獲這次六·四以來最大的、涉及人數最多的營救行動，而且無一倖免？

去年年底所發生的一切，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衆所周知，中共一直在試圖堵截營救大陸民運人士和學生的地下通道。楊尚昆在北京放言，如讓這些人跑掉，實在是奇耻大辱。早在八九年七月中旬，中共就派出了由公安部、國家安全部、邊防總局組成的聯合調查小組，以一名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和兩名副部長帶隊進駐廣州，企圖查清秘密通道，並嚴令各邊防口岸加強把守。然而港支聯却不顧這些，冒然安排了如此大規模的救援行動，成了中共的覺中之蠅。從新華社的報道分析，羅海星等人早在七月份的行動就已被跟蹤注意，竊聽電話，而且還聽任其幫助一位對中共並不重要的北京作家逃離大陸，耐心地放長綫釣出陳、王等幾條大魚，並由此抓住了港支聯的辮子，公開指責粵建助等人。

實際上，中共情治系統早就通過他們在香港的基地派人打入港支聯臥底。爲了挽回六、四以來工作不力的被動局面，他們精心策劃和準備了這次大圍捕，並動用他們在海外的潛伏力量，製造謠言，興風作浪，企圖掩蓋秘密逮捕陳、王等人的真象。從來自中共高層的消息，李鵬多次對中共情治系統高級官員叫囂：「天安門廣場的事情，我只要三個人：陳一諮、陳

子明、王軍濤。」所以中共當局在詛實陳一諾已逃國外以後，曾內部組織檢討。爲了捕獲陳子明、王軍濤二人，不惜長期派人臥底，並階段性保持通往港澳的祕密管道暢通，隨其放走大批他們認爲並不重要的學生、作家和個體戶，張網待魚，等候着他們所通緝的要犯出現。十月底十一月初的這個大規模行動，無疑是大陸情治系統六、四之後所進行的最成功的一次逮捕。據悉，與陳王二人被捕的還有懷孕八個月的陳子明之妻王之虹、閔琦、畢宜民、鄭棟等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骨幹成員。中共政治局對這次行動的成功傳令嘉獎廣東省公安廳，首開情治基層系統被最高層直接嘉獎的先例。

凡生活在大陸的人都知道，中共統治四十年來，邊防守備歷來是其國防重點，而港澳台邊防更是其重點之重點。雖然六、四後因種種原因稍有鬆懈，但七月之後立即恢復嚴守狀態，戒備森嚴。然而去年下半

年仍有大批文人學生不斷外逃成功，這不能不引起海外各界的疑惑。

據來自中共核心的消息，中共自前年原北京日報社長范瑾之子、國家安全部北美局副局長俞某叛投中央情報局後，中共北美情治系統元氣大傷，苦心經營四十年的北美特務網絡毀於一旦。老郎一怒之下，不准其再利用外交使團，使得大陸情報首腦大傷腦筋。而六、四之後的逃亡潮正好給他們一次補充兵源的機會，於是大批情治人員以學生、民運人士、作家、逃亡企業家的身份，隨着浪浪流亡大潮流混入香港、法國、美國、加拿大。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已就這個問題分別向華盛頓提出了特別報告，美國布殊總統否決波洛西法案，兩個報告是背景材料之一。

就陳子明、王軍濤事件本身來說，去年九月美國民運組織就曾派人到國內試圖營救他們，經多方聯絡商討和實地觀察，最終放棄了當時出走的方案，以避開中共的嚴密搜捕，防止失誤，並通知了陳、王二人。在香港方面。但不知什麼原因，香港支持民運的組織（因已有人臥底），在接到通知後，誤信另一方面的人情報，依然我行我素，竟派進一批人員組織大規模偷渡，主觀地希望來最後一次行動，把要想出來的人都

弄出來。更爲不解的是；陳、王二人原藏匿地點相隔萬里（陳子明、王之虹原躲藏在內蒙古草原上，王軍濤等人則藏在川、湘、鄂交界的張家界大山裡），如果沒有中共治安機關的錢人從中周旋引誘，是不可能將爲數二十多人的民運骨幹齊聚廣東，讓中共一網打盡的。

前一段有傳說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費遠叛變與中共合作，目前尚無進一步實據。但他却有幾點疑點：六、四之後被中共高層列入為國內反動勢力黑據點的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所有主要成員，均被列為通緝要犯，大批被捕入獄，甚至連作爲該所顧問的新聞界前輩何家棟也被通緝在冊。而身爲該所主要負責人之一的費遠却自由自在，僅被傳訊過兩次（據他自己講）。在七月至十月間費某曾數次南下廣州，行踪可疑，並對人稱公安局已放縱追捕，他本人很自由等等。從現在獲得的材料証實，香港也有入曾對費遠過於自由產生懷疑，並告誡會與費遠接觸過的人小心謹慎。但爲什麼有關決策人物仍然一意孤行，派那麼多的人投進中共早已撤開的大網，個中原因，大概只有中共最清楚了。

中共情報治安兩大系統：國安部和公安部歷來在工作內容上是有所分工的，但對海外民運組織和大陸留學生的業務却是雙管齊下，通力合作，不惜財力物力和人力。前幾年中國民聯常委開會的錄音能在北京

聽到，已不再令人驚奇。面對日益強大的海外民主力量和不斷增多的反共團體，中共更是不遺餘力地設法滲透和破壞。六、四之後海外民運組織內哄事件不斷，謠言滿天飛，編假文件，互相指責的故事，鬧得到處風雨，這一系列非正常的現象都說明了一點：中共的黑手已伸到海外民主力量之中了。

近日，一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以教訓的口吻對筆者說，國外把共產黨看得太簡單了，特別是那些從大陸出去的留學生更幼稚得令人可笑。如果沒有內中原因，能有大批學生、作家、個體戶跑到香港、法國、美國和台灣？中國大陸邊防歷來銅牆鐵壁，幾十人、幾百人成批越境，好像演電影，怎麼可能？！就像方勵之，如果沒有最高層授意，從八八年底就被二十四小時監控的方氏夫婦，怎麼可能在北京情治機關鼻子底下進入美國大使館？你知道美國大使館從秘書到傭人僱了多少個中國人，而他們百分之百是國家安全部的人。就算方勵之有上帝保佑走得進使館，又怎麼能活到今天？美國佬從四十年代就讓中共耍着玩，從馬歇爾到布殊，二百年文化怎麼能鬥得過兩千年的歷史？

他又說，到八九年十二月底爲止，從閩（福建）、粵（廣東）、滇（雲南）邊境共逃出了二千多人，國安部這個月上報財政部和外匯管理局海外業務開支增加六百萬美元。這就是說，這二千人中最少有百分之五是派出去的「民運人士」。讓敵人安置自己，這才是共產黨的高招呢！所以今年元旦老頭們看台灣中央日報「社論說「八九年大陸民主大逃亡」，賈春旺笑着對王震老頭兒說：「這是民主大派遣，要抓的我們都抓了，該撞走的我們都放了。」老兄，在美國呆幾年，別把共產黨整人的手段都忘了。」也就是說，爲什麼讓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使館後才發通緝令？爲什麼抓王丹一定要抓在台灣記者手裡？爲什麼抓陳子明、王軍濤一定要和港支聯的人一起抓？這不就說明，王軍濤一定和港支聯的人一起抓？這不就說明，編造証實了關於八九民運是美台港反動勢力聯合國內反革命分子所進行的一次顛覆活動的宣傳嘛！中國老百姓就吃這一套。你們要想和共產黨鬥，還得多學幾年。

雖然這位一直同情學生的人士言語間不免偏頗，但所言所感不無道理。面對東歐共產獨裁統治一個個垮台，做為這場八九年民主自由浪潮發源地的中國人，特別是海外知識分子和留學生，似乎應該認真思考一下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再不要自投中共網局的羅網了。

深圳國防機密大曝光

沿海幹線 抵制緝捕

中共鎮壓八九民主運動後，最頭痛的就是不斷有被通緝追捕的民運分子通過浙江、福建、廣東、海南沿海地區的「秘密通道」逃往海外。這些民運份子成功地穿越中共設置的重重防線，透過不同地下渠道到達外國，儘管人數不多，但一經獲得自由，就無情地把中共殘暴地鎮壓大陸人民的真實情況揭露出來，使中共遭到國際輿論的一致譴責。逃亡的民運份子還在海外建立政治團體，形成使中共終日不得安寧的與一黨獨裁直接對立的組織，在中共眼中，這無疑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最危險的政治力量。

為此，北京當局者大為光火，對沿海省份三令五申，要堵死「秘密通道」，不惜一切代價切斷大陸民運份子與海外的聯繫，防止大陸民運份子繼續潛逃以及「海外反動勢力」對內地的滲透。

但是，由於中共當局的所作所為不得人心，沿海一帶較內地經濟活躍，信息靈通，一般的幹部和羣衆思想比較開放，或多或少都瞭解一些「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的真相，過於中共的淫威不敢吭聲，甚至有些公安幹警爲應付上級做些花架子交差了事，不願意做缺德的壞事。所以沿海地區雖然一再加強公安、武警力量，無奈雷聲大雨點小，新聞媒介仍不時傳出民運份子漏網而出逃台灣和海外的消息，使北京當局十分驚慌和惱火。

北京解嚴，廣東戒備

中共當局認爲公安部門主要由當地人員構成，不易對所在地區下手，因此加派北京幹部到各沿海省督陣，還調動大量正規軍來加強沿海地帶的佈防。例如廣東省，除由公安部副部長帶領近二百人南下親自掌管全省的公安部門外，還把從中越邊境撤換下來的第四十二集團軍全部佈防在臨近港澳地區的惠陽、深圳、東莞一帶，由正規部隊擔任切斷大陸與海外民運份子聯繫的任務。並授權軍隊可以對懷疑外逃的人開槍，格殺勿論。

李鵬宣佈解除北京地區戒嚴的同時，駐守

在廣東沿海的第四十二集團軍卻仍受命處於作戰狀態。靠近港澳的各個車站、交通要道、路口、海港，都有荷槍實彈的軍人把守，在深圳的沙頭角、鹽田、蛇口一帶海岸線，白天黑夜都有軍隊巡邏。與香港新界接壤的邊境線上佈滿隱蔽的崗哨，嚴禁羣衆接近。

深圳重建「政治邊防」

軍隊在當地公安部門的協助下力圖重新建立文化大革命時期創造出來的所謂「政治邊防」。配合陸地的防線，軍方又在海上建立了一道屏障，增設許多先進的裝備，如在深圳經濟特區東部的小梅沙附近架設了一部雷達，控制與香港鄰近的整個東部海面，所有在這個海域活動的船隻都受到這部雷達的嚴密監視，任何企圖越境的船隻一離開大陸海岸就會被雷達發現，武裝快艇立即高速出動加以攔截，企圖越境的船隻如不停駛，即使進入香港水域，武裝快艇上的軍人也會開槍射擊。這種大陸軍方快艇越境闖入香港水域的事件已經發生了不少次。

最近香港傳媒披露大陸利用竊聽「大哥大」電訊抓獲與內地民運份子聯繫外逃的五位港澳人士的消息，證實大陸對香港的民用無線電通訊已進行了全面的竊聽，並說這是去年「六四」之後安全部在深圳新增設備所爲。實際上進行無線電竊聽的不是大陸的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而是中共的軍方。

總參謀部參與竊聽港澳電話

大陸的無線電竊聽機構，是直接隸屬北京軍方總參謀部情報機關的。各省市的無線電管理委員會都設置在省軍區或武裝部、警備司令部內。民用無線電開通前必須向軍方的無線電管理委員會申請登記，必須按照軍方批准規定的頻率波段使用，否則軍方偵聽站一經發現，即屬違法行爲，馬上追究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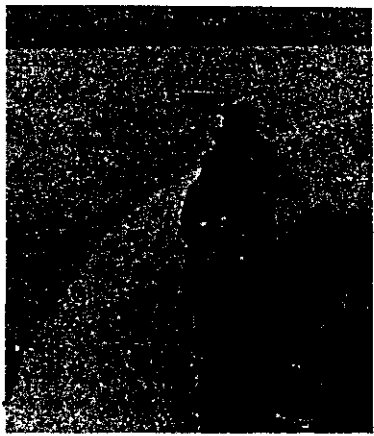
設在深圳市東北梧桐山上的一個偵聽站，是北京總參謀部原來專門用於竊聽駐香港英軍情報的，據知情者透露，這個偵聽站的設備採用的是英國最先進的電子設備和技術，竊聽效果甚佳，整個香港地區的無線電通訊，不

·阿朵

論是軍用的還是民用的，無一不在這個偵聽站的監聽範圍之內。「六四」事件後，北京當局把原作為軍事用途的這個偵聽站用來竊聽與大陸有關的民用無線電通訊。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是明話明說，哪裏知道「大哥大」飛到空中的電波早已被大陸軍方聽得一清二楚。對於其他訊號，大陸軍方偵聽站部門對竊聽到的密碼都配備有一整套進行破譯的機構，連幾句暗語知識都不具備以爲「大哥大」保險的人稍不留意當然就要「領嘍」。

中共調用正規軍隊在沿海地區從陸地、海面、空中建立的這道屏障，試圖達到阻斷國內民運人士與海外聯繫的目的，無疑已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國際社會共產黨政權接連崩潰的多米諾骨牌最終仍會推到中共這一張皇牌上。筆者相信中共依靠這樣的軍事屏障來維持其獨裁統治，到頭來依然是枉費心機。

·深圳大鵬灣的巡邏武警。



●中共由正規軍擔任切斷大陸與海外民運份子聯繫的任務，獲授權可以對任何懷疑外逃的人開槍，格殺勿論。

流亡生涯多是夢

——記六四後出逃的作家和知識份子

·老盛

這幾年，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都尋找機會離開中國，他們視拿到出國護照為一種勝利，故有「勝利大逃亡」之說。

去年「六四」以後，知識分子從死亡中醒來，改變了這種心態，「勝利大逃亡」變成了真正正正的「失敗大逃亡」。中國大陸各大城市，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自行失蹤，加入到民主運動失敗後的逃亡行列，已成為逃亡或自我放逐到海外的，已不下一千人。

柴玲、封從德仍未被捕

中共對逃亡民運分子的搜捕，並未因為外國經濟制裁、聯合國指責其侵犯人權及北京解除戒嚴而結束。

去年十一月，中共發出了第三批通緝名單，共四十五人，其中知識分子二十五人，學生十五人，其他人士十五人。在該份名單上，既有仍在大陸潛逃的柴玲、封從德等人，也有已逃出生天的北京學生領袖項小吉、程真、上海學生領袖徐朝明、北京學者王潤生及廣東作家孔捷生等。

近幾個月來，國內外都多次盛傳柴玲、封從德夫婦有難甚至已被捕。據剛逃到海外的一名著名民運分子說，他的一位公安局的朋友對他說，在二月份的通緝名單上，仍有柴玲和封從德的名字，證明柴玲夫婦尚未落網。該朋友還特別叫他告訴海外朋友，請他們放心。關於柴玲、國內民運人士間有兩種說法，一說她夫婦現在匿藏於中共一位非常有權勢的高級幹部的官邸之中，一說她已誕下小孩，已離開廣東到了北方一處城郊匿藏了起來。

一時多少英雄豪傑

逃亡仍在繼續，不只是柴玲夫婦。知識分子的逃亡潮，並沒有因為北京解嚴而結束，只要這個政權性質不改變，還會有不斷地想方設法離開祖國。

去年「六四」之後，大陸知識精英的走，逃的逃，加上「六四」之前就滯留外國的，使到在國內相當有名的知識分子，有相當部分聚集到歐美各地。有人說，先是逃亡和出國不歸的作家，就可成立一個「流亡中國作家

協會」。據知，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精英，至少就包括以下這些：

在美國的包括：學者千家駒、蘇紹智、匡國賓、阮銘、戈揚、甘陽、管惟炎（前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教授）、胡平、項小吉等；作家詩人包括劉賓雁、劉再復、張潔、張辛欣、孔捷生、戴厚英、李陀、蘇偉、石濤、盧新華、阿城、蒼建英、江河、貝嶺、戴力等；新聞工作者包括曹長青、張敬毅（兩人為原《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及責任編輯）、艾端平（名詩人艾青大公子，原《新觀察》雜誌編委）等；演藝界人士包括吳天明、陳凱歌、彭小蓮、華文瀾、詹萍萍、馬新寶、裴飛龍、艾未未等。

在法國的包括：理論界人士陳一諮、趙復三、嚴家其、王潤生、陳宜良、蔡崇國、遠志明、高舉、林希誦、于頌等；文藝界人士包括徐剛、祖慰、高行健、蘇曉康、老鬼、遇羅錦、亞丁、詩人北島、老木；新聞工作者陳安琪、胡宏偉；美術家王克平、王志平、馬德升及導演田壯壯等。

在英國的包括作家詩人劉索拉、劉西鴻、多多及導演張澤鳴等。

在加拿大的包括作家古華、王兆軍、曾敬之（中國作家、香港《文匯報》前代總編輯，「六四」後去加不歸）及新聞工作者何穎等。在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的包括學者楊小凱、作家詩人蕭正義、顧城、楊煉、張黎明等。在香港的包括學者金觀濤、劉青岑、許子東（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等。

自我放逐仍在繼續

加上早就留學在外的學者及萬潤南、曹務奇等各界人士以及學生領袖，中國精英在海外可謂人材濟濟，一時多少英雄。

推進民運的知識精英，固然流亡海外，因各種原因沒有參與八九民運的知識精英，也對中國前途失望，不斷伺機求去。

一九八五年，曾在中國作協大會為「文學的黃金時代」歡呼的遼寧女作家陳瑜慶（與丈夫馬大京共用筆名「達理」），「六四」後竟黯然離神傷，默然去國，去年底到了美國。雲南女作家嚴婷婷，也於去年十一月離職赴美「自費留學」。廣東女作家丁小莉也於同時期

赴加留學。

流亡生涯原是夢

這三位青年有為的女作家同時求去，難道不說明什麼嗎？雖然大家都因非難而拚命往外擠，但擠出來的，是不是就很快樂呢？

去年八月，當首批民運人士聚首巴黎之後，其中數位不斷寫信來向記者訴苦，女的更是在信上哭泣了，年紀大的都不願下決心學法文，覺得自己既富又強且堅，一切與世隔絕，還有生活上、感情上的痛苦，都使他們陷入了空前的窘境。

後來，許多流亡民運分子紛紛括法求美，但逃到美國就是否會比法國好呢？一位去年底逃抵美國的朋友來信說：

「我不想再重複××、×××（兩名在巴黎民運分子——編者註）來信所說的話，但確信我的感受與他們完全一樣，甚至更深。故也找不到言辭去表達……這次過埠，與上次出國全然不同心境，很麻木似的，一點新奇感和興奮感都沒有。這種麻木，連我自己也都驚訝。」

另一位女民運分子來信說：「如果人生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情願選擇留在國內。」此外，民運分子之間還有內鬥，兩派我詐，也有為了一點小錢而無可奈何出賣自己人格的，他們太窮了，太沉悶了。

中共對民運分子實行統戰

流亡出來的知識分子，生活上都很艱苦，投身「民陣」的更加辛苦，他們在國內出不來的親朋怎麼樣？中共對他們的態度怎麼樣？

據北京的消息說，中共對逃亡知識分子的批評，只限於個人，因怕激化擴大矛盾，決定不搞株連，對沒有參加「民運」組織的，還開展統戰工作，對參加了「民陣」的，打擊也適可而止。

據知情者說，嚴家其、高舉夫婦出走後，他們的子女家屬沒有事，徐剛及祖慰也是一樣，而劉再復更是連番受到中共的統戰。

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平亂報告」點劉再復的名，是因為當時「確認」劉是首都知識界聯

台會的發起人之一，後來有人認為「誤會了」。於是劉再復雖然逃亡仍獲從輕發落。加上劉逃亡後不搞政治，很少與外界接觸，中共甚為「放心」，還頻頻向劉招手，保證回國後不整他，職位不變。最近北京朋友說，劉再復的女兒不見了，有人傳是中共放她去了美國父母處，以收統戰效果。朋友說，即使是真的，以劉再復的硬骨頭，決不會被現政權所統戰，「我們也放心。」

另一知識分子蘇曉康，是社科院文學所劉再復手下的一位主任，蘇參加了「民陣」，又到處亮相，中共對他也手下留情。蘇曉康在北京時仍是單身，文學所為使其安心，特別在為準備結婚青年而建的有名的「青年公寓」（俗稱「鴛鴦樓」）給他分了一套房間。蘇出逃後，他的房間至今還安然不動，中共沒有搞文革抄家充公那一套。北京朋友說，中共目的有兩個，一是統戰蘇曉康，二是統戰蘇在民主黨派中當常委的父親。

廣東作家協會副主席孔捷生出逃後，當局對他家人也算客氣，還勸家人有機會請他回來，沒事的。

但是，朋友說，如果中共真的那樣寬大，就應該釋放被捕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並盡快進行政治民主改革，否則，一切統戰都會徒勞。

中國大逮捕報告

「亞洲觀察」供稿

有罪推論和即決審判

中國政府對八九民主運動的鎮壓和搜捕，至今仍在繼續着。據官方消息已有三十多人被公開判刑。北京的官方媒體對國際輿論的反應是：有計劃地控制有關逮捕的報導。儘管迄今有關判刑的報導，均局限於工人運份子，但很顯然，學生和知識份子同樣面臨着判刑和重罰。至七月八日始，中國當局公佈五列罪案，罪名包括「宣傳和積極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判決結果從「勞動改造」到「死刑」不等。這意味着，在中國以任何非暴力方式提倡政治改革，都可以被判為嚴重的罪行。

許多被捕人士的罪名屬非暴力的行為，諸如「散佈謠言」或「散發反革命宣傳品」等；另有一些罪行的罪名是「破壞公物」、「縱火」等。其他刑事罪，但從官方媒體的報導中，難於明確判刑所依據的尺度。當官方廣播和電視報導那些因暴力而被判罪份子時，同時有許多人士，都是因和平抗議而遭到通緝和逮捕的。

目前的判決，均是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八三年通過的決議，內安全案例可採取從速判決（SPEEDING UP ADJUDICATION）方式，即所謂的「即決程序」（SUMMARY PROCEEDING）。根據這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被告只有三天上訴時間。所有報導中，沒有提到辯護律師程序。上海的一名被判死刑者抗辯自己「無罪」，僅獲死緩兩年的寬延。

中國於一九七九年頒佈的「刑事訴訟法」中，曾接受了「無罪推論」的刑事原則，但中國社會歷來缺少這類法治傳統。反之，以恐嚇、刑求方式逼迫罪犯「坦白」，却是極為普遍的作法。而過去數週內一些囚犯被安排在電視新聞中「公開悔過」表明那存在着嚴重的體罰現象。除死刑之外，新近被捕的許多囚犯被判「勞改」、「勞教」者，不是通過即決審判判定的罪，就是根本不通過任何審判。在這些案例中，囚犯所面臨的「中國式古拉格」中埋沒一生的命運。中國擁有龐大的勞改營系統，據報導裡面的生活狀況極為苛刻。按照七八至七九年民主動期間，那些有坐監經歷者的描述，近期中被捕的學聯、工聯領袖們，將面臨長年的禁閉生活和沉重的體力勞動。

為防止民運份子的進一步逃亡，中國政府已關閉了國家的邊境線，並管制和改變了簽證方式。所有在六月二十日之前簽發的出境許可均告作廢，持有國家護照者需從公安局獲得新的許可。所有已獲外國入境簽證者，須回公安局再次審批。此外，機場、車站等交通設施均被嚴加管制。例如，許多民運份子是在北京國際機場被逮捕的，還有公安人員將可疑份子拖下飛機的報導。

被判死刑的工人及市民名單

（人名均按拼音同音譯）

七月二十九日武漢中級人民法院將余從庭、郭正華判處死刑，二人罪名是五月份在武漢聲援民運的動亂中，謀殺兩名市民、刺傷一名士兵並偷走其機槍。路透社七月三十一日報導援引「光明日報」報導，但指出報導未具明謀殺情節。據稱余氏曾有勞教前科，郭氏亦曾為犯人。同謀犯郭文斌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另有兩人被判無期徒刑，九人被判不等期徒刑。他們的罪名是襲擊警察、破壞鐵路、煽動群眾攻擊黨、政機關。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七月二十六日判處二十歲的李文寶、十八歲的梁宏斌死刑，兩人均為農民，罪名是在「六四」戒嚴後「使用暴力」。李氏來自京郊順義縣、梁氏來自瀋陽郊區，兩人的具體罪行是「偷自行車和現金」。

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七月一日公審了四川省農民王貴陽和關翔城，七月八日執行死刑。他們的罪名是六月五日在成都街頭焚燒車輛。兩人的上訴被該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另一罪犯何強被判死刑緩期兩年。

北京市六月二十一日，判處八人死刑，八人上訴均被駁回。他們是林榮榮、陳靜、朱劍軍、王漢武、羅紅軍、張文魁、班慧澤、王蘭曦（女）。

據北京廣播，林榮榮為北京回民醫院工人，曾因流氓罪被判三年強迫勞動。他於六月五日焚燒一輛軍車。羅紅軍為北京公共汽車公司售票員，罪名是搶劫軍用物資。班慧澤為河北新樂縣農民，罪名為毆打士兵，將其中一人打昏至殘。

七月二十日濟南日報報導，濟南法院將四

十五人判罪，包括死刑和終身監禁。十七人被游街示眾和公審，據北京廣播，有一萬人參加了公審大會。

上海市人民中級法院六月二十一日將工人徐國明、待業青年卞漢武、工人白學戎等三人判處死刑並進行公審，罪名是在六月六日焚燒火車，造成六死六傷，他們還阻止列車以抗議北京的屠殺。在此事件中同時被捕者有：彭家明、魏英雄、楊曉、孫繼紅、艾齊朗、袁子民、趙萬民、朱青。

學生、教師和知識份子被捕名單

（人名均按拼音同音譯）

項大勇，北京大學學生。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在校園內組織示威而被捕，這次示威有三百餘學生參加為追悼六月四日死難烈士。

馬學崗，據安徽省廣播電台報導：他是合肥自治聯合會的核心人物。馬學崗在海南海口被捕，日期不詳。

李翠萍，為北京自治聯合會秘書長來自其他省市。據河北日報報導，李翠萍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在保定被捕。

陶洋怡，北京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傳部部長，在孟崗回族自治縣被捕。這個消息也是在河北日報登出，但日期不詳。

劉京亮、崔國興、蔣竹、王雙青等在南甯、黃華、樂平、橫城等縣（均在河北省境內）的公安局自首。據河北日報報導：以上幾人參與北京或河北的非法組織。

秦衛東的被捕於七月六日之前，據河北日報報導：他是北京醫學院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

據國際特赦報導：幾位四川成都社會科學院的成員被捕。他們是：王知林，三十五歲，職責為研究員和編輯。涂秋生三十八歲、李京三十三歲，均為哲學和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員。其他還有李曉芬和江成忠，均為研究員。

「國際特赦」報告還透露，三位北京知識份子亦在最近被捕：歐陽平，北大社會研究所講師；孫立，該所研究生；呂立林，體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發展與改革」編輯。

學生自治會秘書長徐中，在南京的一家旅館被捕。江蘇省在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天中，共逮捕三、七八二人。

另一名安徽學生領袖陳明夏據同一報導在北京被捕，公安人員將逮捕理由係由於他藏藏一千美金。

陝西省「法制」週報報導，該省出版社主編李貴仁因試圖組織出版社員罷工而被捕。六月五日李貴仁召集會議，要求工人簽署抗議和進行罷工，他還被指控在五月份組織過四次遊行，責罵標語要李鵬、鄧小平下台。他的被捕日期不詳。

香港明報七月二十日報導，著名詩人軍官葉文福，因簽署了北京知識份子聯合會的「五一六聲明」，要求政府接受學生要求，而至被捕。但日期不詳。據未經證實的消息稱，葉因慘遭再打而試圖自殺。

南華早報五月二十七日報導，掛號於公安局的群眾出版社社長丁浩成，公開呼籲中共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的十二位知識份子之一。據悉已經被捕，但日期不詳。于浩成還是被中共政治局指為「反黨聯盟」的四十人之一，趙紫陽的支持者。

四十多歲的「五一六聲明」簽署者之一，作家鄭義，已於七月上旬被捕。他是山西省太原市人，他曾計劃撰寫學運的報告，收集了大量的材料。鄭義過去是「人民文學」和「小號月報」的經常撰稿人。

作家柯雲路據悉已經被捕，無更進一步消息透露。

「文藝報」編輯，詩人老木於六月十三日便被捕，他是今年二月川三人知識份子公開信的簽署者之一，該信要求鄧小平大赦政治犯。他也簽署了「五一六聲明」，支持學潮。

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張顯揚，新近已被捕，然日期不詳。他是二月二十六日聯署公開信的四十名知識份子之一。該信要求中共中央釋放政治犯。北京市長陳希同六月卅日講話指張顯揚鼓動其他知識份子支持趙紫陽反對李鵬。張亦被指為趙紫陽「反黨聯盟」的成員之一。

「紐約時報」七月十二日報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張仲禮已經被捕（或失踪）。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社會調查組組長楊冠三，與趙紫陽有關的中共政治結構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出一道被捕。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六月三十日講話中，指控他參與了五月十九日的一次會議，並呼籲召開緊急人代會，討論實施戒嚴法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武煒，據報導亦已被捕。

電視劇「河殤」作者之一遠志明，已經與該劇另外兩位作者蘇曉康、王魯湘一道被捕。「河殤」表現了中國政治的周期性沉浮，揭示了中國政治文化落伍的一面。

經濟學周刊副主編高瑜，中國青年報的李大河，楊蘭三均傳已被捕，但未經證實。

四十二歲的「四通公司」經濟學家周純，於七月十日被捕，由「亞洲觀察」來源提供的消息。「四通公司」是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周在該公司負責戰略計劃和公共關係部。在此之前，周能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共青團幹部訓練所講師等職。「四通公司」高級人員均已被捕或逃至國外。該公司的「社會發展研究所」被指控策動召集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

五月二十一日人大常委會五十一人發表信件稱「人民的意志應該由法律程序得到體現，該信亦要求撤除李鵬的總理職務。」「六四」鎮壓後第一個被捕的知識份子曹思源，是為四通公司發展研究所所長，「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亦被捕，現已身在國外。

北京鋼鐵學院二十一歲的學生李江峰，北京「學自聯」領袖，六月十五日在河北省境內被捕，送往秦皇島市公安局，李被指控在學潮期間燒毀六部軍車。

北京醫學院基礎部學生劉凡，六月中旬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被捕。河北日報六月十七日曾報導，劉因坦白被從寬處理，但具體處罰不詳。據說他亦為北京學生領袖之一。

「光明日報」專欄撰稿人，中國最著名女記者戴晴，於七月十四日被捕。合衆社和路透社報導，戴晴被捕後家裡被搜查抄檢。她被捕的原因之一，是支持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與中共上海市委對抗。在學潮期間（即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戴晴曾前往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撤離，因為她擔心學生被鎮壓。她在「光明日報」發表過大量的文學作品。今年二月布什總統訪北京時，戴曾受邀出席總統晚宴。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生物系研究生，三十三歲的楊曉，於七月十八日在上海被捕。他曾於八六年底從美國返回中國，八七年一月因參與學潮被捕。他被指控參加設在美國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該聯盟主辦的「中國之春」雜誌上寫文章，據稱這個團體是由台灣資助的。在獄中服刑兩年後，楊被釋放，刑責政治權利一年，亦不能返美繼續學業。官方新聞社七月十八日報導稱，楊被釋放後拒絕悔過，並繼續鼓動學生反對政府。

「亞洲觀察」消息來源稱，「人民日報」記者張述被捕，日期不詳。被捕的理由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上海槍決三名工人後，他寫了一篇有關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社論。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被革除總書記職務。張述的社論被指貝傳聞，但未得發表的機會。另「人民日報」有六名印刷工人，因阻擋軍車而被捕。

英文中國日報女記者陳紅，二十二歲，被捕日期不詳。亞洲觀察消息來源稱，她被捕的理由是與外國人接觸頻繁。

安徽廣播電台稱，合肥某大學工程系學生楊方，在六月上旬因「反革命活動被捕」。他在當地學校組織罷課，參加地下會議，並設法阻礙交通。合衆社稱，安徽電台指控楊方建立了一個「人民之聲」電台，並在六月四日公開在合肥市人民政府門前轉播「美國之音」的廣播，並撤播北京、軍事鎮壓」的謠言和圖片。

「亞洲觀察」消息稱，業餘作家李小華和朱小彤二人在六月中旬被捕。三十五歲的李小華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輯，一九八八年全國詩歌比賽獲冠軍。他逃離北京後，於六月十二日在廣州市被捕。朱小彤筆名「朱佳軍」，係武漢大學學生，之前在五十五軍一六四團服役，六四之後在武漢被捕。

政府通緝的二十一要犯之一王正雲，據法新社報導在七月十日前被捕，二十一歲的王正雲是中共民族學院學生，雲南人，少數民族。

從香港逃抵國外的政治學者戴家其的助手王炎、楊百發，分別在七月四、五兩日被捕。電訊社「河殤」作者之一王魯湘，據合衆社七月六日報導已經被捕。「河殤」一劇被中共高層認為否定了中國文化傳統。

「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徐曉薇，據香港新聞來源稱已被捕。（亞洲觀察尚未證實此訊）。據香港「文匯報」稱，徐的被捕，乃因他與上海「學自聯」一起活動而至。

「天津日報」七月十七日報導，學生領袖李輝在六月裡與其他四十五名「反革命集團」份子一道被捕。天津方面已於六月十五日將李輝押解進京，報導稱李為「學自聯」佔領天安門廣場時的「西線總指揮」，並親自參與了阻擋軍車的行動。他還組織宣傳隊前往濟南、武漢進行「反革命煽動」。六月九日，李與其他七名學生到天津後，遭散發傳單揭發「六四大屠殺真相」。

著名學生領袖王丹於七月三日與台灣「自

立晚報」記者黃德北一道被捕。黃事後被釋。王丹係中國大陸最著名學生領袖，吉林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黃德北是在北京飯店門前與王丹會面時被發覺。黃對新聞界稱，中共官員承認王丹已被抓獲，但無進一步消息證實。

黃德北與王丹會面時搭乘的汽車司機王陽，已證實被捕。

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六十三歲的李洪林，七月六日在福州家中被捕。據美國與李洪林家人有關的人士透露，六日中午，福建省公安局的十名武裝警察闖入李家將其帶走，公安局員拒絕向李的家人透露李目前被關在何處。李洪林曾任「理論風雲」一書，總結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理論和實踐。另有「四種主義在中國」文章亦頗知名。他是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支持者之一。之前曾任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共黨史研究所所長、中共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他於一九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期間，辭去了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今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亦簽署了四十二名知識份子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政治犯。

「杭州日報」六月二十三日報導，前浙江醫學院學生張真於六月十五日被捕。報導稱，張因偷竊被校方開除，但繼續留校園內並成為「學自聯」頭目。他前往北京，帶回大批反動宣傳材料，發表演說，指揮襲擊火車站，阻擋火車，在杭州、寧波、溫州、金華四市的十八個非法組織中，公安局逮捕了一五一一人，張真為其中之一。

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研究室副主任白南生，據合衆社消息已於七月十日被捕。他的兄弟白南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亦被捕。

「文匯報」七月三日報導，著名話劇「WM」（我們）的作者，四十五歲的劇作家王培公在貴陽被捕。「WM」一劇描寫的文革時代。王還宣佈退黨以示支持民主運動。

來自中國的消息稱，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下達密令逮捕，逮捕七名著名知識份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雜誌編輯包遵信，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河殤」作者之一蘇曉康，據悉已經被捕。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所所長陳子明，目前仍在逃亡中。前國務院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已逃往國外。前「經濟週刊」主編，北京知識界聯合會領導人王軍濤，目前仍然很安全。

北京首都鋼鐵公司學校的學生，二十一歲的楊益均，六月十五日在秦皇島市被捕，被指

控在反革命暴亂中燒毀多輛軍車。

二十二歲的孟進前在琅坊市公安局檢查站被捕，被控燒毀兩部軍車，強姦一名婦女，參與反革命暴亂。

鍾曉國、張家華與其他十四名哈爾濱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據報導於六月二十三日向哈市公安局自首。報導稱他們交出「非法組織」圖章，承認了自五月十五日來進行非法活動的事實。組織罷課、街頭示威、設法阻止工人上班等。

周恒錦、郭城儀六月二十二日在瀋陽市公安局自首。因為瀋陽教師學院學生，二十四歲，為瀋陽「學自聯」成員，瀋陽教師學院「非法組織」愛國社負責人。報導稱他在六月四日指揮一隊人設路障。在六月七日，他前往瀋陽飛機機械廠，指揮工人工作。郭為瀋陽「學自聯」的聯絡人員，瀋陽醫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非法組織的副主席。

據傳為「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要負責人的袁慈和，現年二十三歲，六月二十日向包頭市公安局自首。二十一歲的北京大學學生王潮風、錢嗣同，在同日被捕。他們都是「北高聯」核心成員。三人均被遣送回北京作進一步查辦。袁為包頭「師專」學生，被指控煽動、組織和指揮學生示威、靜坐和罷課。他在天安門廣場多次接受外國記者訪問。回包後，繼續散佈謠言，煽動示威和其他不法行為。王潮風為「北大」天安門廣場學生負責人，絕食總指揮和廣場財政部部長。他還涉嫌組織非法學生示威、靜坐及絕食。錢嗣同的情況不詳。

據報導河北省逮捕了四十四人。「北高聯」常委成員劉剛、劉建立，六月十五日被鄉鎮公安局逮捕。北京市民自治會領袖紀富南、王志明和三名不知名人士，六月十五日被徐樹縣公安局逮捕。「北高聯」糾察隊指揮之一張佳七月十六日被沙河縣公安局逮捕。

北京醫學院講師趙義強和妻子（該校研究生）在北京城西北一百五十哩的張家口市被捕，罪名是幫助絕食學生。

民運聲援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石金剛，七月十日在山東嶗山縣被捕。民運主要參與者，北京市民劉健強、高榮剛、魏輝七月十五日在德協火車站被捕。民運主要參與者，六月十七日在其老家邢台被捕。

潘祥，北京外地「學自聯」領袖，六月二十日晚在山東大學被捕。他是山東大學外語系研究生，五月十八日奉山東大學警務處前往北京，並參與了「策劃反革命暴動的陰謀」。

馬少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四川人，「北高聯」常委委員，六月十六日在湖南南天縣被捕，時身藏大批反革命宣傳品。

兩名上海科技大學學生，上海市「學自聯」領袖，六月十日在嘉定縣公安局自首。王洪明，該校機械工程系學生，二十四歲；宋迷途，該校無線電系研究生，三十歲。

北京日報六月二十七日報導九名參與「反革命抗議活動」的份子接受審判的消息。二十六歲的張建丹是其中之一，他被指控殘害解放軍士兵劉國庚的屍體，亦被指控為敢死隊成員。

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聯絡人周赤輝，因經常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而被捕。他於六月十日在長春被發現，原係長春建築學院學生。

吉林工業大學學生（名字不詳），「學自聯」組織部長，最近向公安局自首，並坦白了他在北京的「反革命活動」。

六月二十三日，公安局逮捕了十七名北京各大學學生，包括四名北京電影學院學生，一名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一名政法學院學生。尚有一些情況不詳的學生被捕。

二十七歲的劉小曲，二十九歲的魯竹茹，均為女性，六月十九日在北京機場前往巴黎的班機前被捕。據稱她們所使用的護照是從國外郵遞中國的，海關人員發現破綻。兩名婦女皆與學潮有關聯（南華早報六月二十三日報導）。

三十四歲的吳海珍，雲南教育學院外語系講師，與楊洪、王剛（見後述）一起，六月十三日在昆明被捕，罪名是向學生演說中攻擊「黨和政府領導人」。

昆明金龍飯店助理經理，二十七歲的王剛，被指控向雲南學生進行「反革命宣傳」。他並同香港和其他地區不法份子接觸。

二十二歲的陳陽，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學生，六月十五日在瀋陽被捕。他被指控為北京市民自治會負責人，他並幫助成立敢死隊，散發反革命傳單和參與反革命暴亂活動。

六月十五、十六兩日，南京達法學生、工人組織向公安局自首。他們是黃榮翔、南京「學自聯」常委，南京大學博士。吳劍林，該團副總指揮，省立商業管理幹部學院學生。

另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兩名「學自聯」學生。王洋，南京「學自聯」常委，南京機電工程學院學生，於六月十四日被捕。王浩，北京「學自聯」成員，被捕時正在建立兩地學生聯絡網，身帶大批反革命宣傳品。

蔣小東，北京科技大學學生，六月十五日在阜城縣被捕，蔣家住阜城七四五〇工廠，去年畢業於阜城第一中學，考入北京。晉文卿，北京教師學院研究生，郭路湘，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五月十九日被捕，罪名是指揮群眾在海河區燒毀三十一部軍車。

魏榮寶，西安市敢死隊成員，六月十一日晚與劉小郎、朱林等一道被捕。

張偉平、邱開城，浙江書院學生，六月八日在杭州被捕。按杭州電台報導，他同美國之音聯絡，報導杭州學生強迫浙江省政府下半旗，以哀悼北京「六四」死難學生。

張林，安徽蚌埠市「學自聯」負責人，六月八日在該市被捕。他八五年曾考入清華大學，同年退學，並沒有正當職業。五月十九日，他在蚌埠醫學院建立「學自聯」，五月二十一日發表「極端反革命的演說」，五月二十五日他組織總暴動，他並寫信給方勵之要求接受方的領導。

劉剛，二十八歲，北大物理系研究生，二十一個通報要犯之一。六月十九日在保定被捕。當地市民認出他後，報警將其逮捕。

倫敦報紙報導，只身在天安門廣場阻擋坦克的十九歲學生王偉林，王人之子，已被秘密警察逮捕（倫敦快報六月十八日訊）。

中國電台六月十三日報導，馬小芳，二十五歲，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學生領袖蔣爾爾希的助理，六月十七日在廣東自首。楊陶，十九歲，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六月十七日在蘭州被捕，兩人均是通報要犯。

六月十八日，中央電視台宣佈，被通報的要犯李平（女）、楊志偉，在保定市被捕，兩人均參加過與人民的對話。

政治學教授王新錦，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自首，他是北京市民自治會領袖。包括陳偉東、劉家明在內的四名學生領袖，六月十七、十八兩日在張家口被捕。同日六名「北高聯」學生在北京市內被捕。

二十一要犯之一，熊偉，六月十三日在其母親單位自首，他組織總暴動救護隊，從五月十三日一直在天安門前活動。

二十二歲的要犯周鋒，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六月十三日被其姐姐、姐夫報告公安局。地點在西安市郊三橋鎮。

二十五歲的熊炎，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在前往大同的火車上被捕。他是五月十八日與李鵬會見的學生之一。在會見時，正是他說：「不論政府的態度如何，歷史將承認這次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共報紙並公佈熊被捕的消息。

三十五歲的學生方克，六月十二日在武漢自首，他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北京「學自聯」成員。

「人民日報」六月十三日報導，馬洪榮，陝西省「學自聯」領袖，西安冶金學院學生，於六月七日被捕。劉曉龍、朱林、余雲剛、李剛、潘曉濤、王健雲，均是西安敢死隊隊員，六月十一日半夜被捕。

「人民日報」六月十三日報導，劉小龍、朱琳、余雲剛、李剛、潘曉濤、王健雲等西安「敢死隊」成員已被捕。這批被捕者於六月十一日晚在西安市興慶宮區開秘密會議時，被公安人員破獲。

北京電台六月十四日宣佈，上海市的周少武因串聯工人支持學潮而被捕。前安徽省工人周少武從五月十八日起活躍於北京「學自聯」，於學生領袖郭海峰來往甚密。他於六月二日離開北京前往上海，計劃組織「中國民主上海聯盟」。

據目擊者提供的消息稱，三十歲的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六月六日被一名便衣押入一白色轎車內帶走。北京當局六月二十三日宣佈劉曉波被捕的消息，電台同時並稱贊公安人員的機智行為。當局指控劉曉波與某地設在美國的「中國民聯」主席胡平來往甚密。劉曉波是吉林人，畢業於吉林大學碩士班，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作為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劉曉波發表過數部專著和大批文章。一九八九年四月，劉曉波訪問美國，在中國當代知識份子與政治、一文中，強烈批評一些中國老知識份子。他於四月下旬返回北京，參加民主運動。戒嚴法實施後，他同另外三名知識份子一道於六月二日起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開始絕食。

北京外語學院教授陳明遠於六月十日後被捕。陳又是數學家 and 詩人。他是在高血壓發病期間，在醫院就醫時被捕。陳明遠一九四一年生於四川重慶，文革期間曾入獄多時，當時他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因為他宣稱毛澤東發表的「卜」未發表的詩集」中，有一些是抄襲了他的作品。

北京大專院校聯合會總幹事郭海峰，於六月十日前後被捕。據官方電台稱，他是在與一伙暴徒一起，準備焚燒一部裝甲運兵車時被抓獲的。

一九七九年民主運動時的著名活動家之一任曉明，在今次學潮中起了重要作用。他還是「中國人權同盟」的創始人。曾經在七九年鎮壓時被捕，入獄四年，因拒絕自我批判而延長監禁時間。一九八八年，任曉明在紐約時報發表紀念民主牆的文章。任曉明據報導於六月九日早上八時被捕。拘押地點不詳。

文正明為「中國青年民主黨」負責人，於六月十日被捕。文正明為個體戶裁縫。早在八六年便建立該黨，主張反對黨必須在中國出現。今年四月爆發學潮後，文正明吸收了上海幾所大學的學生作為黨員。當局已宣佈該黨為「反革命」組織。

上海市國家安全局逮捕了一自由社，創辦人李士國。李氏主張建立「更偉大的自由王國」，他向全國各地的動亂學生發信，號召他們結束「反動政府」的統治。他還要建立一個軍事營地，設計王國的國旗、國徽、國花和錢幣。

遼寧廣播電台宣佈，瀋陽市二十二歲的待業青年朱文力，在瀋陽市和平飯店以假身份註冊時被捕。該飯店經理在朱的行囊中發現「反革命宣傳品」後，通知公安局將其抓獲。朱文力是瀋陽「學自聯」的社會份子。他來自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

姚勇戰，香港學生生活活躍分子，現年十九歲，六月十一日在上海機場被捕。他正準備乘中國民航班機返回香港。當時八名公安人員，兩名身穿制服，六名便衣將其帶走。路透社報導，香港當局詢問中方對姚氏的指控，和姚氏在何處，均無回答。後上海市廣播電台指控他曾是「上海學自聯」的領袖，觸犯了當地法律，包括「攜帶被禁止的印刷品」。姚勇戰是復旦大學經濟系一年級學生。



資深政界人士被捕名單

鮑彤、曹思源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資深顧問，根據國際大赦的消息來源，在六月三日下午便已被捕。鮑彤被捕的時間可能更早。自八八年一月，五十六歲的中共政治改革研究中心負責人、中共中央委員鮑彤，曾是趙紫陽的政改方案策劃者之一。他的思想開放但認為「西方式民主不適用於中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八八年十二月廿六日)。

台灣人士被捕名單

新華社消息，台灣商人歐忠友，於六月二十二日被捕。他被指控為幫助台灣從事間諜活動，散佈謠言，攻擊中國共產黨，搜集反革命材料，拍攝「反政府動亂」的照片。新華社稱歐氏為「台灣軍事情報局成員」，在香港接受過特務訓練。

另外十二名台灣人士也於六月二十二日被捕，有三十八歲的王常宏(散播反革命謠言)、二十五歲的張儀、二十三歲的魏繼東，分別在北京和廣州被捕。其他人士為梁啓南、錢榮、崔旅、張揚、曹觀求、劉正清、馮進、蕭小石、曲卓杰。

六月三、四日北京的死亡名單

以下是亞洲觀察收悉的死亡者名單，雖然有一部分是無法證實的。

羅偉，三十歲，北京半導體元件廠工人。好志勤，二十九歲，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鍾勤，男，清華大學學生，六月四日上午一時半，頭部中彈死於復興醫院。

王薇萍，女，北京醫學院學生，六月四日凌晨十二時死於復興醫院。

何翔平，女，五十四歲，北京電信局退休工人，她在回家的路上被流彈擊中，四日上午一時半死於醫院。

殷勤，男，三十五歲，工程師。他在家中廚房窗被子彈擊中腹部，當即死亡。

唐志強，男，四日上午一時死於復興醫院。吳湘東，男，二十一歲，北京東區電視廠工人，因背部中彈死於上午十一時。

郭春明，男，二十一歲，六十一中學生物老師，背部中彈死亡。

林可清，男，二十二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在扶持受傷同學時被子彈擊中，不久死於復興醫院。

佚名，女，六十七歲，在家中陽台上被擊中死於復興醫院。

段長龍，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

劉新，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學生。

孫慧，男，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生。

楊文，男，北京大學統計系學生。

肖波，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

黃濤，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

文丹，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

李平，北京師範大學學生。

宗勤，二十歲，清華大學光學儀器系學生。

裴建東，十七歲，北京航大第五研究所研究生。

李慧，十八歲，中國人民大學學生。

李輝，北京政法學院學生。

杜修平，女，五十五歲。

黃偉軍，二十四歲，北京醫學院學生。

郭陽春，三十二歲，北京教育學院學生。

何國，二十七歲。

杜志勤，三十歲。

郝秀萍，女，五十四歲。

齊文，十六歲，第三鐵路高中學生。

崔照征，二十一歲，吉林人，海軍第五陸戰隊二連士兵，八七年入伍。

李國瑞，武裝警察部隊士兵(被群眾打死)。

劉國庚，二十五歲，山東人，解放軍少尉，成鐵部隊某部四連排長(被群眾打死)。

王立夫，二十一歲，安徽人，成鐵部隊某部五營通訊班士兵。

李強，二十歲，陝西人，成鐵部隊某部五營二連士兵，一九八七年入伍。

杜懷清，河北人，二十二歲，成鐵部隊某部五連二營士兵，八五年入伍。

王曉霞，陝西人，二十一歲，成鐵部隊某部五營二連士兵。

李棟國，安徽人，二十歲，成鐵部隊某部五營二連四排排長，八六年入伍。

徐汝軍，安徽人，二十二歲，成鐵部隊某部五營三連通訊班班長。

馬國川，二十二歲，河南人，成鐵部隊某部六連班長，八九年入黨，八五年入伍。

王晉衛，河南人，二十七歲，成鐵部隊某部後勤部軍官。

六月四日後失蹤人士名單

劉真奇，深圳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被廣東省當局指控支持暴亂後失蹤。

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教授，被中共指控煽動學潮，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六月三十日講話中提到，溫元凱曾參與十二名著名知識份子聯名呼籲政府承認學潮「愛國民主運動」。

杜導正，國家出版總局局長，他曾參與北京新聞界聲援學潮的活動。杜導正負責「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的出版工作，在五月底這兩份報紙大量報導學潮的詳情。

編者註：原文「工人及社會各界人士被捕名單」因篇幅所限刪去，如有查詢者，請與本刊聯絡。

五、清洗・整肅



中共建國四十年，整肅異己份子從未間斷。建國之初，或以社會上封建殘餘力猶存，需經多次清洗、整頓、去掉社會「渣滓」，改造社會「壞份子」。可是經過整整四十年，壞份子竟然清之不盡。八六年胡耀邦「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下台，卻不減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對當權者而言，實難安寢。

八九學運，舉世沸騰。武力鎮壓後，中央爲這次學運定下許多罪名，全國上下都捲入清洗的漩渦。學運領袖自是首當其衝，但中央真正指向的目標是清除黨內的異己份子，收復輿論陣地，極左全面復辟。可惜，文革創傷尙是初愈，新聞界、知識界、文藝界又大難當頭。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236	大清洗來勢洶洶	亞	3/9/89	6/8
237	中共發三文件着手政治清洗（劉燕英）	鏡	9/89	27/29
238	王震要流放四千人到新疆 中共正進行「雙清」運動	百	16/12/89	3
239	中共的大清洗運動（李渝）	南	1/90	46/50
241	白色恐怖下的大清查（賀少明）	爭	10/89	12
242	清查、鎮暴工作方案請示（中共北京市委會）	中	1/90	76/77
243	中共中央文件之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	1/90	76/77



四通公司：趙紫陽改革政策的產物正受「清理」

大清洗

來勢洶洶

流言叢雜，使北京政治氣氛更趨詭譎，顯示中共自今年五月趙紫陽下台以來，一直在進行的權力改組，仍未順利完成。香港親北京的《經濟導報》最近引述可靠消息說，中共擬在十月份召開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五中全會）。距六月下旬召開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不滿兩月，中共最高層就打算召開五中全會，是極不尋常之舉，看來有許多迫不得已的原因。五中全會的主要內容，是就如何繼續執行經濟緊縮政策統一認識。但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進一步批判趙紫陽和黨內清洗，重新加強對黨員和幹部的控制。

中共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上週二在海濱避暑勝地北戴河「靜養」之中，渡過八十五歲生日。北京的報刊皆發表新編《鄧小平文選》出版的消息，並刊登他七月二日所攝照片，以澄清有關他重病在身、餘日無多的種種流言。

與這些流言糾纏在一起的，又有中共最高層中誰將接替前總書記趙紫陽出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軍委）第一副主席之職的不同猜測。國防部長秦基偉公開露面，排除了他被國家主席楊尚昆拘捕的可能。但是，軍內的權力之爭似未平息，有消息說鄧小平仍未決定將來由誰繼任軍委主席，接替他統領軍隊，甚至有可能取消軍委第一副主席之職，以遏制楊尚昆勢力過分膨脹。

中共中央日前已決定在全大陸「公開揭露和批判」趙紫陽，內容不僅涉及這位中共前總書記支持今春北京「動亂」的行為，而且還包括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的「錯誤」。本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在北京召開各省市組織部長會議，正是全面展開批趙、清黨的重要訊號。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以及主管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常委）宋平在會上的講話中，都以前所未見的嚴厲語氣一致譴責趙紫陽。在北京官方新華社的報道中，他們都直呼趙的名字，不再像以往那樣連上「同志」二字，帶有更強的否定意味。

江澤民強調，分析中共黨內狀況時，不可低估「國際敵對勢力」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造成的影響和破壞。「不可低估趙紫陽的錯誤在黨內造成的混亂和對實際工作的損失」。李鵬說：「趙紫陽不但在這次政治鬥爭中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而且在擔任黨的總書記時期，在政治上和幹部路線上搞「精英」治黨治國，主張改造黨、淡化黨的領導，實際上是取消黨的領導。」他們都強調要大力消除趙紫陽的「十分有害的影響」。

分析家說，中共全面開展批趙，意味著鄧小平迫於黨內強硬保守勢力的壓力，已改變了對不糾纏於趙紫陽以往「失誤」的初衷。不過，最終將如何處理趙紫陽，還要到十月五中全會召開後才可能有眉目。一些分析家認為，鄧小平可能只會同意將趙紫陽開除黨籍，或像他自己一九七六年那樣「留黨察看」，而不會把他一度屬

鄧小平：能否擋住強硬保守勢力？



意的接班人送上法庭。

在這次組織部長會議上，宋平認為，經過七十天的「動亂」，發現中共內部存在許多相當嚴重的問題，令人「觸目驚心」。他說：「這次動亂和暴亂的煽動者、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有的人已經入黨幾十年，有的在黨內有國家的核心部門工作，並且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有些還是頗有影響的知名人物。」因此，今後必須「堅決清除黨內的敵對分子、反黨分子、腐敗分子，消除政治隱患」。宋平的講話表明，中共高層認為黨內確已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而北京市的《北京青年報》日前在一篇文章更提出「黨內高層反對派」的概念，隱然指出中共高層支持「動亂」的並非趙紫陽一人。分析家認為，基於這想法，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高層新班子勢將在黨內從上到下進行一場全面的清洗和整肅。

事實上，「大清洗」已在展開，官方上週公布同情學運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因健康等問題」離職，由一向主張實行計劃經濟的保守經濟學家吳樹青接任，並由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林炎志出任該校黨委副書記。

中共決定全面批趙，也必然對近年來改革開放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重作評估。李鵬上週會見美國一位銀行家時說，大陸經濟改革是「適當發揮市場調節在經濟中的作用」。這一說法與趙紫陽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相比，顯然是向更多計劃經濟成份的方向倒退。沿海開放地區一些官員擔心，北京在制訂後年開始執行的第八個五年計劃時會大走回頭路。

事實上，趙紫陽的一些經濟政策和主張已遭多方面的指責，有的已見諸報刊。這些指責主要有：反對計劃經濟，導致經濟比例失調；大搞赤字財政，引發通貨膨脹和經濟失衡；推行雙重價格制，助長倒賣生產資料；片面鼓勵發展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忽視國營大中型企業；不重視農業和基礎工業；盲目宣傳「大進大出」，即大批進口原料，經加工後大批出口，造成嚴重經濟損失；宣傳發展商品經濟初期腐敗現象不可避免等。

北京高層似特別針對私營企業和工商個體戶，決定大力進行「清理」，一些經濟學者擔心它們會成為批趙的犧牲品，連帶遭受衝擊。國際

知名的大陸私營電腦公司——四通公司，因與趙的關係密切，其董事長馮潤南又因支持民運流亡海外，公司前途難卜。該公司迄今仍維持營業，但有消息說，當局已派出工作組進駐該公司進行清查，馮潤南亦已被公司「罷免」。對其他私營企業和工商個體戶的「清理」也正展開。

但「清理」的同時，中共高層一些領導人也提出不要「過火」，似欲制止「極左」勢力過度膨脹。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上週在整頓出版物的會議上說：「搞過了不好，當然不及也不好，二者相權，寧可一時不及也不要過。」



政治局常委宋平：動手擴大清洗

中共發三文件 着手政治清洗

劉燕英

宋平承認中共黨內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仍然有些部門的黨組和領導幹部，或者繼續包庇在動亂、暴亂中有嚴重問題的人和事，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儘管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層到下層，都在整肅、清洗，氣氛相當緊張，但是北京民間仍然時有與官方觀點相悖的引人發笑的政治妙語出現。

八五畢業生下放鍛煉

中共當局於六月下旬舉行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面對因「六四」事件而加劇的政治經濟等難題，主要從兩個方面治理。一方面，抓改革開放和懲治腐敗，目的是顯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並以爲政清廉挽回民心。另一方面，抓思想箝制和組織清洗，目的是要意識形態領域和各級黨政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從近兩個多月的情況來看，且不論當局追求的目的能否達到，外界普遍感到中國國內政策明顯左轉。

高幹子女不准再經商

改革開放方面，截止八月主要是在海南、天津、廣州、寶安等地向外商作出批租大幅土地的大膽開放行動，至於改革，由於八月中旬李鵬重申繼續實行「八五計劃」指摘的各種承包制，至少給人以停滯的印象。懲治腐敗方面，七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羣衆關心的事的決定》後，開始有所行動，中旬國家審計署對康華、中信、光大等五大公司的購稅套匯等違法行為處以罰款補稅五千萬元人民幣，並將追究有關人員的行政刑事責任。八月底中共中央組織部透露，截至八月二十六日，中國高層領導人在流通領域公司任職的子女及其配偶，已全部從所在公司退出。有關查處貪污受賄的大案要案，由於迄今查處的對象最高只及司局級幹部，故仍予人整下不整上、懲小不懲大、打兔不打虎的詬病。

思想箝制方面，根據七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精神，要在全黨範圍內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不管是黨組織還是行政組織都要重視，要讓社會主義思想佔領陣地，爲此，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進行到底，宣傳與理論陣地的領導權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李瑞環特別強調新聞界要嚴格遵守黨的宣傳紀律，與黨的方針保持一致，從根本上端正新聞宣傳的政治方向。這些做法顯示中共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又重新左轉，改革開放十年來曾經出現的容許不同思想交鋒的較為寬鬆的政治局面已難再現。

據悉，王震在「六四」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話提出「新聞界是重災區」，「首先整新聞界」的意見受到重視，新聞界的整頓除《人民日報》社長錢奎仁及總編輯譚文瑞被撤換，《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離職外，還將徹底清查在五月份曾參加組織示威遊行的人，所有有關記者禁止離開北京到外地採訪，每人都要在所屬單位交代過去的言論與行動，封存各報社已發及未發的稿件，審查作者的言論是否與中央保持一致；撤換直接管理版面的相當一部分中層人員。最令新聞界人士驚恐的是，根據中共中央五號文件的規定，凡是八五年以來由學校直接分配到省級以上黨政機關，尤其是到新聞單位工作的大學生、研究生，要立即帶戶口下放到基層鍛煉一至兩年，將來是否由原單位收回，要視乎其在基層鍛煉的情況而定。吊銷城市戶口這一極左絕招，本是王震建議對趙紫陽智囊團人員實行的，豈料現在已先禍及新聞界。城市戶口一吊銷，意味着可能一輩子在農村或邊區落戶，被吊銷者怎不驚恐？

中共兩個整黨的文件

關於組織清洗，八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全國組織部長會議專門作了部署。此前，中共中央先後發出的三號文件和四號文件，內容也都是整頓黨員的。

在組織部長會議開幕式上，宋平作了講話，這是中共有關黨內清洗的最全面最清晰的闡述；講話令人感到中共對黨內異己分子的清洗決不手軟，一大批中共高級幹部將丟官。

宋平重提「階級鬥爭觀念」，強調整頓的緊迫性。他承認「黨組織和黨員隊伍中存在着許多問題，有的還相當嚴重。」這種嚴重性表現在：「從動亂的醞釀、發生、升級，直到最終釀成一場反革命暴亂，問題主要出在黨內」；「動亂和暴亂的煽動者、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有的人已經入黨幾十年，有的在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工作，並且擔任重要職務，有些還是頗有影響的知名人物」；「有些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書寫、散發反對黨的聲明、傳單、信件，公開同中央對抗」；「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仍然有些部門的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或者繼續包庇在動亂、暴亂中有嚴重問題的人和事，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共

黨內從上到下這麼多黨員在緊急關頭不和中央一致，甚至支持和包庇「動亂」「暴亂」分子，公開同中央對抗，這在中共建國四十年來還是第一次，這不正是黨心背向的反映，難道不值得中共高層深思嗎？

宋平表示中共下決心「消除動亂的禍根」，爲此，要對各級領導幹部要進行一次深入的考察、評價，進而調整、撤換，「保證各級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

有關清洗的具體對象，中共中央批轉的北京市委關於平亂報告的三號文件，提出要審查懲處十種人，包括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煽動者、參與者等等，都是屬於非嚴懲不可的，頗有「斬草除根」的味道。

而中共中央批轉的中紀委關於對在動亂和暴亂中的黨員進行整頓的四號文件，則確定二十種人爲審查懲處的對象。這二十種人又分爲三類。第一類共十種人，包括通緝犯和犯有各種嚴重罪行的人，諸如領導者、組織者、攻擊軍隊者、收藏武器者、收留逃亡者、報復告發者等等。第二類共九種人，指所犯罪行比第一類人較輕者，諸如曾與可疑的外國人接觸者、需要進一步調查的可疑人物、散佈無稽謠言者、參與遊行示威者以及向遊行示威者提供金錢物質支持者等等。第三類人，即所謂「大多數」，需要「提高認識」的人。四號文件雖對審查對象分別罪行輕重予以不同的懲處，但仍強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

不過，清洗異己分子要想「除惡務盡」、「斬草除根」，談何容易。因爲經過文革等政治運動洗禮的大陸人，多已學會應付運動、保護自己的方法，不會對組織「忠心不二」；而各級領導對整人的差事也多不會做絕。

閻明復受審或有大難

據說，中共中央統戰部根據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着重整肅三種人：第一種，在動亂暴亂中有言、有行者，必須講清楚，寫清楚（寫的材料入檔案），並予處分；第二種，無言有行者，要說清楚，寫清楚（寫的也入檔案），但不予處分；第三種，有言無行者，說一說，交代一下就行了。類似這種方法進行整肅的，不只是統戰部。可見，儘管中央文件規定得很嚴格，但一到各單位就「各顯神通」了。

統戰部是屬於派工作組的單位，工作組由一名中顧委負責，共六、七人組成，一進部就調查學運期間統戰部給中央的簡報是否閻明復

部長簽發的，明顯地是想找閻氏的「罪行」，但却一無所獲。閻明復自八五年任統戰部長以來，即以其開明形象贏得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海外人士的好感。他於八六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八七年當選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後，堪稱中共新時期的統戰王牌。但在今次學潮中他却犯了私自到天安門和學生對話的「錯誤」，而統戰部一局和六局又沒有統好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結果他被免去書記處書記之職。有些知名人士遂因他的失寵而於「六四」後棄家出國，如果他們知道閻氏還在受審查，肯定更加惶惑。最新消息說，隨着批趙的升級，閻氏已被迫交代問題和遭揭發，可能有人難。

北京民間的政治妙語

儘管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層到下層，都在整肅、清洗，氣氛相當緊張，但是北京民間仍然時有與官方觀點相悖的引人發笑的政治妙語出現。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佈的中共新常委名單中沒有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人民日報社當天即接到北京「郊區農民」的電話說：中央英明決策，我們堅決擁護，遺憾的是我們市裏的兩位好領導，平亂之功居首，竟然一個也沒有進入常委，實在太不公平，我們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後來新華社也接到類似的電話，只不過打電話者自稱河南人，用的河南腔。據說接電話者都迅速將內容傳與同仁，大家聽後心照不宣，各自會心微笑！

在目前的組織清洗中，當局又要人們表態。北京人也應付自如。對「怎樣看待平亂」的問題，他們答稱：「我們緊跟中央就不會錯，中央現在平亂必要，將來平反也必要。」對「怎樣評價趙紫陽」的問題，他們答道：「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但總書記個人不偉大、不光榮、不正確。」對「怎樣評價趙的智囊團」問題，他們答曰：「黨內每次路線鬥爭查出首者及其一批人，都是正確的，後來對受路線鬥爭牽連的人都平反，也是正確的。」答話之妙，據說即使主持人有所不滿，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除政治妙語外，在北京，私下指摘當局做法自相矛盾者，也不乏其人。有的問：「現在既然肯定大多數人動機是好的，為什麼却按極少數極少數搗亂者的行為將學運定性為動亂？」

「也有問：『現在反對自由化，一切做法和文革時期的極左手法一模一樣，文革已被否定，為什麼還要用其手法來整人？』還有問：『現在，理論、文藝、新聞中的是非都不容討論，難道輿論一律，一言堂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難道共產黨執政的天下，永遠沒有言論自由？』在左調橫行的時候，這些疑問是得不到正確答案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七日

《新報月刊》1989/9

王震要流放四千人到新疆 中共正進行「雙清」運動

■本刊記者

自鄧小平宣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接替以後，北京情勢，仍然帶有火藥味，呈現外鬆內緊，特別對黨內的整肅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好像螞蟥的兩隻螯，正在伸出夾緊，將政治氣氛弄得非常低沉，且具恐怖色彩。

對民主運動一貫主張鎮壓的「國家副主席」王震，最近在北京一次黨內會議上宣稱，可以把在北京的與黨（指共產黨）懷二心的知識分子，抓四千人送到新疆去，讓他們在那裏流放改造。王震曾主持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知道那裡有好多個農場，其中一個剛好容四千人。

王震的一句話，使北京知識界人士，人人自危，不知什麼時候厄運將臨到自己頭上。著名中國畫家李可染四日在北京突然逝世，與王震製造的恐怖氣氛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雖然不可能送他到新疆，但李可染向來胆小怕事，五日上午十時半突然有中共文化部的兩位官員找上門來，恐怕大禍臨頭。而他們是去向李可染了解藝術界六·四前後情況的，李一急之下，腦血管爆裂，家人但見牙關緊閉，還來不及送醫搶救，就與世長辭了。

一代國畫大師的崩潰，更使北京知識界人士有黑雲壓城之感。

在保守派整知識分子的同時，北京對所有國家幹部發動了「雙清」運動，清思想，清言行。首先從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點名的二百五十多司局級幹部清起，規定按四個段落交代問題：第一，自胡耀邦逝世至五·一九趙紫陽下台；第二，自五·二〇頒佈戒嚴令至六·四；第三，六·四當天；第四，六·四以後迄今，最「妙」的是逼令每個人交代所謂「原始思想」，比如，六·四當你聽到第一聲槍響時，你第一個動念是什麼？



■王震

在幹部被迫交代時，還規定要把他所知道的其他人的情況一併寫出來。

截至十一月底為止，二百多司局級幹部已普遍交代了七次。其中一百五十多人受到了處理，從開除出黨，剝奪公職，降職降薪，其餘記過處分，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在勒令檢查的司局級幹部中，有七個副部長級的幹部。其中最典型的是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廣播電視部副部長謝文清，開除出黨，降兩級，監督使用。

李鵬、姚依林在倒趙的同時，就作出決定，要剷除趙紫陽在黨內的基礎，他們認為司局級幹部都是位居要職，必須來一個大清洗，才能斬除趙復辟的根。江澤民上台後，基於個人的利益，也認為李姚的決定是對的，故要求徹底乾淨地進行清理，以免「堡壘從內部攻破」，故爾把北京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但是，參加「雙清」運動的幹部，絕大多數對運動的態度是冷漠的，他們只交代自己的問題，盡量不牽扯別人。所以檢舉揭發的極少。這是與歷次運動不同的一個特點。與此同時，出現了很多自覺的「兩面派」，他們在學習會上沉痛地檢查自己，而回到家裡對着家人大罵「他媽的」！

《新報月刊》1989/12/16

中共的大清洗運動

李渝

曾經宣佈過不再搞政治運動的鄧政權，事實上從來沒有停止過政治運動。「六·四」事件本身就是中共統治中國四十年來超大型的政治運動；而「六·四」事件之後的大清洗和重新登記黨員的運動，則已持續了半年，至今仍然沒有結束的跡象。最近報紙消息：元旦之後，北京的各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各直屬機關、北京市黨政機關、全國人大機關的中共黨員們，開始了為期六十小時的「新一輪」的政治學習。預計春節前，此次學習班將告結束，「中共黨員們將全部重新登記，一批中共中層官員將被開除。」

去年十一月月上旬，中共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之前，已對各級黨、政、軍機關黨員，作過一次黨員登記。當時東歐除羅馬尼亞外，外都發生大變化，特別是中共派出姚依林去親自傳授鎮壓經驗的東德，共黨頭子昂納克已經下台。中共為預防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已經作出決定，重新組織了「清查領導小組」，把副部長級以上的領導幹部逐個審查過關，認為同情趙紫陽的、同情學運的或者「軟弱的」領導幹部作了調職或者革職，甚或抓進監獄。這次又重新進行學習審查以及重新登記，顯然與中共的心腹死黨羅西斯古被羅馬尼亞人民處決有關。人民高興的事中共自然認為是可怕的事，一條「不沉的社會主義巨輪」一夜之間就翻船沉沒，其舵手羅西斯古連連逃往中國的機會也來不及，就被羅馬尼亞工人捕獲而送往軍營，且被即時處決，這情景是多麼可怕啊！正如李鵬哀嘆的：「有些老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吃不下飯，睡不着覺。」由工人捕獲共產黨領袖，再次說明共產黨同工人階級是對立的。

中共現在重炒冷飯，即使春節前在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機關的審查能夠結束，也僅是在首都一地，而全國各地那麼多黨、政

軍機關，又要審查到何時才能「結束」？我敢斷定，中共的大清洗永遠不可能結束，而且永遠清查不完。因為即使老的「反革命」或「動搖份子」清查完之後，很快又會產生出一批新的「反革命」和「動搖份子」來，這是極權專制制度下不可抗拒的規律。但如果反轉過來，例如把鄧、李、楊和禍國殃民的「八老」打成反革命而清除，而且把極權專制制度轉變為民主制度，那麼，就不可能再產生新的反革命份子了。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反革命就是喬西斯古、昂納克、金日成和中國「八老」以及李鵬之流的人物。一切反民主潮流的都是反革命。這批人被消滅了，或者自然淘汰了，也就很少可能再有新的反革命了。

中共清查運動的來龍去脈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在中國發生的學生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羣衆運動，中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黨、政機關幹部和農民都捲進去了。中共的內部資料顯示：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北京地區參加遊行示威的單位有：北大、清大、人大、師大等高等學府五十八所；中等專科和中等技術學校三十一所；北京市一中等中小學一百三十多所；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出版單位七十多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科研機構五十多家；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機關單位六十多個；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十多個；首鋼、北京重型機器廠等工廠企業二百多家。此外，外地來京聲援的各地高等學校有八十五所。

李鵬用「國務院」的名義於五月二十日宣佈戒嚴，但北京的遊行示威一直沒有間斷。單在六月三日，參加遊行示威的單位有：

高等院校增為六十一所；新聞出版單位六十二個；中央和國家機關單位增至一百一十二個；民主黨派四個，還有外地來京的高等院校增至三百三十二所。

內部資料同時顯示：全國共有八十四個城市、六百餘所高等院校約二百八十萬學生參加了示威遊行。至於農民參與堵截軍隊入城或參與遊行的多少，中共的資料沒有統計。但所知，北京郊區縣凡是有軍車路過的地方，當地的農民都自發地參與堵截；不僅北京有，其他地方亦一樣。據事後傳聞，軍長寫的《走進血與火》的文章中（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一九八九年第九期上），記述了他的集團軍從山東調往北京途中被圍的情況：「這時，天還沒有黑，每個路口都聚滿了堵軍的人羣。」「衝過去！」我命令司機。」「一通話機裡傳出師團長的焦灼嘶啞的聲音：『我部在秦皇島受阻！』我部在山海關受阻！」「我部……」。總之，凡有軍隊出動的地方，都有當地農民、工人自發去攔截，沒有人去組織，也沒有人去指揮。而且可以肯定，農民中的共產黨員，也同城市中的共產黨員一樣，不少是自發參與這一愛國民主運動和堵截軍隊的。

正因為四、五月的愛國民主運動有大量的共產黨領導幹部在背後支持或者出面參加，因此在四中全會開過之後（十三屆四中全會，於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召開，上海的江澤民被提拔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組織部長宋平和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被提拔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緊跟中央，於二十五日即由中紀委書記喬石主持一個中紀委會會議，決定採取一系列措施清黨，嚴肅處理同情和支持「暴亂」者。自此大清洗運動即開始，首先糾捕參與民運的學生頭頭和知識界出頭露面的人物，以及在學運期間公開聲明退黨者。而後逮捕和處決戒嚴部隊不執行命令向人民開槍的軍官和士兵。繼而清查和調整各黨、政、軍部門的領導班子等等。連同捕獲民運人士和公開槍決一批燒車者等人士一起，構成了整個社會恐怖異常。

清查十九種人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頒發了批轉中紀委關於清查十九種人的四號文件，要求各級機關和國家機關以及省級機關人人過關。此文件只限於口頭傳達，印數極少，由鄧、李、楊認為靠得住的人掌握。這十九種人分為兩大類：一是打擊對象，十種；一是清理對象，九種。所謂「打擊對象」，就是要逮捕坐牢甚至槍決的；所謂「清理對象」，就是要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逮捕坐牢者當然也要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

打擊對象十種：

- 1、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主要是：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同國外、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或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參與組織、策劃反革命暴亂的人。
- 2、非法組織的頭頭和骨幹份子。
- 3、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人，包括製造政治謠言，書寫、印刷、組織、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發表反革命言論、宣傳煽動暴亂的人。
- 4、襲擊、殘害、綁架軍警人員的人，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警物資器材的人，砸、燒軍警車輛的人。
- 5、在反革命暴亂期間進行其他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活動的犯罪份子。
- 6、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枝彈藥拒不交出或擅自處理的人。
- 7、包庇、窩藏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份子的人。
- 8、聚集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聚眾堵塞交通或破壞交通秩序而造成嚴重後果的首要份子。
- 9、在反革命暴亂中犯有其他罪行的人。
- 10、對檢舉揭發上述罪行者實行報復陷害的人。

清理對象九種：

- 1、與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有聯繫的人。
- 2、動亂、暴亂期間與國外、境外可疑人員有聯繫的人。
- 3、參加非法組織的人。
- 4、支持動亂、暴亂，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
- 5、傳播大量政治謠言的人。
- 6、參與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圍堵解放軍、設置路障堵塞交通的人。
- 7、大量資助動亂、暴亂的人。
- 8、洩露國家機密的人。
- 9、有其他可疑情況需要清查的人。

強調階級鬥爭觀念

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新提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長宋平召開了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於二十一日到會發表講話，對清查工作作了加熱，他強調清查工作要「嚴」，要警惕中央高層領導幹部中的「騎牆派」，並強調「不可低估國際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和「國際敵對勢力企圖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對中共所造成的影響」；二是不可低估「資產階級自由化」對中共建設的破壞，云云。

在二十二日的閉幕會議上，中央組織部長宋平大聲疾呼說「不能沒有階級鬥爭觀念，不能丟棄階級分析方法。」並指出五、六月間的「動亂」和「暴亂」的策劃者、煽動者和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有些在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工作，並且擔任着重要領導職務。」宋平繼而指出八種現象：

- 1、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書寫、散發反對黨的聲明，公開同中央對抗。

- 2、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帶頭參加或者支持非法遊行示威。
- 3、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帶頭反對《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帶頭反對戒嚴。
- 4、有的黨員在「動亂」和「暴亂」期間製造和傳播謠言。
- 5、有些黨員在鬥爭關鍵時刻政治上動搖，提出退黨；有的還組織策劃集體退黨；有的在退黨聲明中「惡毒攻擊」中共中央。
- 6、為數不少共產黨員在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忘記了一個共產黨員，任由反革命份子煽動暴亂。
- 7、有些黨員甚至老黨員，公開發出各種呼籲書、公開信，替服刑中的反革命罪犯要求「大赦」。
- 8、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在四中全會之後和發出清查十九種人後，仍然繼續包庇在「動亂」和「暴亂」中有嚴重問題的人和事；或者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宋平繼而指出今後的組織路線，提拔幹部「要將革命化放在首位」。

廣大黨員幹部抵制清查運動

鄧、李、楊政權派兵鎮壓北京學生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已是不待人心之舉，遭到全世界華人的聲討和外國政府的經濟政治制裁，「六·四」屠城後，又毫不放鬆地緝捕民運人士，這樣首先引出的惡果是近十萬名留學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法國、西德、英國等國家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大部份不願歸國，並且為自己採取了「不歸路」的措施，紛紛組織留學生自治會或參加民主中國陣綫。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還組織了「集體退黨」（中共公派留學生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共產黨員，自費留學生中也有一半是共產黨員）。再一個惡果是駐在國外的外交人員，「六·四」事件之後的一個月之內，中共叛逃的外交人員（無疑全都是黨員幹部）共七十七名，中途返回者一人，實跑了七十六人，包括屬正式外交官員的十七名

，其中官銜最高的是駐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趙復三（副部長級）。

在國內無法擺脫鄧、李、楊中央政權的幹部，則表面上服從中央政府的領導，心底裡却與鄧、李、楊殺人政權劃清界綫。據報導：由於在北京的各大機關的中共幹部普遍參加了各種形式的聲援民運的活動，許多部門的負責人都採取了「法不責眾」的態度，保護部屬過關，以避免鬥爭擴大化。

鄧、李、楊政權要求在北京黨政機關每位幹部和大學教師檢查交代從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的活動，這段時間做了什麼事，去了哪裡，和誰接觸，都要逐日交代，並且要找證明人證明，簽字。他們便互相證明「在家」、「在辦公室」、「在圖書館」，勇敢簽上自己的名字。

八、九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及中紀委又發下特別多的「學習資料」給大家洗腦，如《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堅決擁護黨中央政策、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鄧小平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勵之的真面目》、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等等，與之配合的還有《平亂真相》、《血與火的考驗》等四部偽造的「電視紀錄片」。人們在「學習討論」時，幾乎人人都照「學習資料」唸一遍。

十月初，中共中央又發下九號、十號紅頭文件，對北京各大機關重新登記黨員作政策性的指示，如規定：凡在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參加遊行及各種聲援暴亂活動的中共黨員將不予追究；而在五月二十五日或嚴令頒佈之後仍然參加此類活動的黨員，則必須受黨紀處分。當然人們不會輕易相信中共的宣傳，而且文件仍然說「將清查工作進行到底，徹底清除隱患」。但畢竟已使廣大黨員幹部鬆了一口氣。

清查後果評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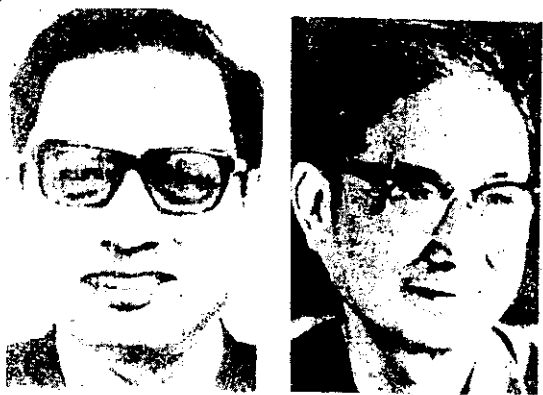
首先是影響到軍心不穩。按中共的理論，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又對軍隊大大誇耀一番，說軍隊「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

「是最可愛的人」，一面對着死亡毫不含糊，從容就義」。但不久戒嚴部隊就逐漸了解到：在六月三日、四日進軍天安門過程中不願向人民開槍而被即時處決的官兵有二十多人（被亂槍誤傷的不算在內），事後又清查出不服從命令，同情學運，或臨陣逃脫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而被槍決的官兵有五十餘名，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官兵二百數十名（其中第三十八集團軍軍長李際均被判處徒刑十年）。戒嚴部隊在駐京的日子裡也逐漸了解到北京學生和市民示威遊行的性質和演變過程，老百姓為什麼會有堵截軍車的自發行為。許多官兵逐漸覺悟到：他們屠殺的絕不是什麼「反革命暴徒」，而是愛國同胞，是愛國父母和愛國兄弟姊妹。他們無法再心安理得，有的竟造成精神分裂，有的則暗中組織力量打算掉轉槍頭「反擊一戈」。據中共一份機密文件透露，自「六·四」事件以來，在瀋陽部隊、北京部隊、南京部隊中，都發現有一「反革命組織」。其中北京部隊發現的機密組織「戰士委員會」，共有成員三十多名，其首要份子是北京裝甲部隊某營四連一位副政治指導員（已被槍決），二十三人被捕。另有海軍駐京部隊某營破獲的機密組織「軍人之魂」，涉及的成員有十多位。此外尚有未破獲的機密組織。海外的「民主中國陣綫」成立之後，立即傳遍了國內。雖然部隊進行嚴密的新聞封鎖，但仍然有不少官兵獲得此消息。現在內地暗中流傳着，原戒嚴部隊已有人組織了「人民力量陣綫」，以配合「民主中國陣綫」。

由此看，中共當權派出動人民軍隊鎮壓人民，實在為自己挖掘了墳墓。

第二是影響到黨政幹部的素質。在這十年內出現的高素質的共產黨員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蘇紹智、嚴家其、金觀濤、戴晴等等傑出人物，被中共抓的抓、開除的開除，以及逃的逃，剩下的都是低素質的黨員。

十一月中旬，一位已退休的北京中央樂團的小提琴家赴美途經香港時與我會面，說到現在「重新登記黨員」的問題時，他估



奇石(左)與宋平(右):絕不手軟!

一九九〇年一月六日

南北極月刊 98/1

計，在文藝「教育機關和科研機關，至少有三分之一或一半的黨員不願登記，政府機關也有許多人不願登記，並趁此機會退黨。因為黨早已失去民心，做黨員不再感到光榮，而是恥辱，但倘若「公開聲明退黨」則將「被抓進秦城監獄」，所以趁「重新登記黨員」而不登記是退黨的最好時機了。這位小提琴家赴美不是公幹，而是「探親」，因他的女兒在美國。他也是黨員，有登記但尚未批准。他之所以「登記」，怕由於不去登記被懷疑為「與黨疏遠」而取消他的「美國探親」的機會。

由此看，這裡產生一個問題：是正直的共產黨員開除中共多些（即不登記），抑或是中共開除正直的黨員多些？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開除共產黨」或「被共產黨開除」，結果都一樣，就是高素質的黨員大大減少，而低素質的黨員則大大增加。

但同時也可以肯定：鄧、李、楊政權企圖以「六·四」劃線來消除異己，斬草除根來達到「排除隱患」的目的，則永遠要落空。中共如果不學習何共自覺改造自己成為社會黨，則羅馬尼亞事件必然在中國翻版。喬西斯古隨時都在等待着鄧、李、楊集團及「禍國八老」在陰間會面。

白色恐怖下的大清查

本刊特約記者

賀少明

北京各級檢查機關還舉辦了所謂舉報中心。其結果是加劇了人民羣衆的矛盾，成為壞人整好人、好人整好人的中心。人們用這個舉報中心打擊報復、互相陷害。

由於法制不健全所以某某人被舉報之後，公

關於清查十九種人的

中共中央文件

（由於文件只限於口頭傳達，因此外傳的多是傳達時的筆記，這裏所載是文件的原文）

打擊對象

- 一、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主要是：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同國外、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或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參與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的人。
 - 二、非法組織的頭頭和骨幹分子。
 - 三、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人，包括製造政治謠言、書寫、印刷、組織、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發表反革命言論、宣傳煽動暴亂的人。
 - 四、襲擊、殘害、綁架軍警人員的人，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警物資器材的人，砸毀軍警用車輛的人。
 - 五、在反革命暴亂期間進行其他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活動的犯罪分子。
 - 六、持有成隊散落的槍枝彈藥拒不交出或攔阻安機關馬上先立案審查，被舉報的人無論有無事實根據，檢查機關馬上會通知所在單位保衛部門。因此，這個人立即會成為保衛部門重點注意對象。在沒有審查清楚之前，不許出國、不許出差、不許請假、不許調動工作、不許「亂說亂動」，每天必須按時出動，並到保衛部門報到。不少人由於無辜被舉報、無辜被追查，被逼瘋了。舉報中心的做法是，先撒大網，後抓魚，有多少抓多少，錯吃多少吐多少（指退賠財物），寧可錯抓十個，也不放過一個。這就叫人民專政。
 - 由此可見階級鬥爭已在中國大陸死灰復燃，而且愈演愈烈。
- 自處理的人。
- 七、包庇、窩藏反革命暴亂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人。
 - 八、聚眾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聚眾堵塞交通或破壞交通秩序而造成嚴重後果的首要分子。
 - 九、在反革命暴亂中犯有其他罪行的人。
 - 十、對檢舉揭發上述罪行實行報復陷害的人。
 - 十一、與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有聯繫的人。
 - 十二、動亂、暴亂期間與國外、境外可疑人員有聯繫的人。
 - 十三、參加非法組織的人。
 - 十四、支持動亂、暴亂、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
 - 十五、傳播大量政治謠言的人。
 - 十六、參與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圍堵解放軍、設置路障堵塞交通的人。
 - 十七、大量資助動亂、暴亂的人。
 - 十八、洩露國家機密的人。
 - 九、有其他可疑情況需要查清的人。

南北極月刊 1989/10

清查、鎮暴工作方案請示

黨中央、國務院：

北京持續一個多月的動亂發展為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動亂的嚴重性，如不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就會永無寧日。必須全黨動員，首長負責，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為此，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指導思想

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清查反革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清查他們的罪行，挖出他們的後台，依法及時從嚴懲處，做到除惡務盡，不留後患。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孤立和打擊最頑固的敵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必須下最大決心，用足夠的時間，投入很大的力量來抓，絕不手軟，絕不走過場，絕不半途而廢，否則後患無窮，將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二、目的、要求

對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非法組織頭頭的陰謀活動，要逐一查清；對反革命暴亂中發生的重大打、砸、搶、燒、殺事件，要逐一查清；對逃跑的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要全部緝拿歸案；對被搶劫和散失的槍支彈藥、軍用警用器械，要徹底收繳；對反動宣傳品的製造者、印刷者、組織傳播者，要逐一查明。通過清查、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使全體共產黨員、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鬥爭教育，提高在改革、開放形勢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自覺性。

三、打擊對象

1、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主要是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同國外、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或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參與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的人；

- 2、非法組織的頭頭和骨幹份子；
- 3、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人，包括製造政治謠言、書寫、印刷、組織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發表反革命言論宣傳煽動暴亂的人；
- 4、襲擊、殘害、綁架軍警人員的人，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警物資、器材的人，砸燒軍用警用車輛的人；
- 5、在反革命暴亂期間進行其他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活動的犯罪分子；
- 6、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藥拒不交出或擅自處理的人；
- 7、包庇、窩藏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份子的人；
- 8、聚眾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聚眾堵塞交通或破壞交通秩序而造成嚴重後果的首要份子；
- 9、在反革命暴亂中犯有其他罪行的人；
- 10、對檢舉揭發上述罪行實行報復陷害的人。

四、步驟、措施

(一)大造輿論。要有力地揭露反革命暴亂策劃、組織者的陰謀活動和罪惡目的；揭露反革命暴亂份子的醜惡面目和兇殘手段；揭露國內外境內外敵對勢力插手我國內事務的幕後活動；揭露煽動反革命暴亂的政治謠言，駁斥對黨和政府的惡毒攻擊。充分地宣傳、教育群眾，爭取絕大多數群眾包括一時不明真相或心存疑慮的群眾，與黨和政府站在一起，共同聲討反革命暴亂份子。

(二)深入發動群眾揭發檢舉。在做好艱苦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群眾覺悟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方式廣泛開展檢舉揭發。發生反革命暴亂的重點地區和參與動亂、暴亂人數較多的重點單位，要組織群眾反覆收看現場錄相，辨認暴徒和現場煽動者、指揮者。要做好知情人的工作，解除他們的顧慮。

各區縣、鄉鎮、街道、各部門、各機關、各單位，都要組成專門班子，負責舉報工作，對群眾檢舉材料逐件登記，徹底清查，該轉的要立即轉，並切實為檢舉人保密，保護可能遭到報復的檢舉人。

(三)深入調查摸底。對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四人幫」殘餘餘孽和其他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人，以及對黨和政府嚴重抵觸不滿的人，要普遍調查摸底，查清他們在動亂、暴亂期間的動向，從中發現反革命暴亂份子。

(四)大力搜捕暴亂份子，堅決打擊現行犯罪份子。公安幹警、武裝、國家安全工作人員、保衛人員、民兵、游擊治安隊、維護秩序工作隊等要和戒嚴部隊密切配合，大力搜捕反革命暴亂份子，收繳槍支、兇器，打擊現行犯罪份子。

1、對已暴露的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打、砸、搶、燒、殺的份子，在京煽動暴亂的境外人員，拒不投案自首的非法組織頭頭，公安、國家安全機關要組織專門力量搜捕，不使漏網；對已逃往外地的，立即通緝，請求外地協助緝拿歸案；要加強邊防檢查，設卡堵截，採取切實措施，嚴防暴亂份子逃往國外、境外。

2、組織軍、警、民聯合小分隊，在重點地區加強巡邏、盤查、蹲守，主動出擊。對打、砸、搶、燒、殺的暴亂份子，設置路障、破壞交通的份子，張貼散發反動傳單標語、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份子，要及時抓獲。對公然拒捕者，戒嚴部隊、警察有權依法就地強行處置。

3、對群眾舉報的、現場錄相中辨認出來的、醫院傷員中發現的以及在押犯供出的反革命暴亂份子線索，要迅速組織查證、搜捕，並通過審訊擴大戰果。

4、對旅店、浴池、車站、外地包工隊住地、農民出租房等復雜場所，組織幾次全市性的清查，對可疑人員予以收容審查，從中深挖暴亂份子。

(五)對已查獲的暴亂份子，要依法嚴懲。凡經司法機關處理的案犯，都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務必搞準，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對罪行特別嚴重、證據確鑿的暴亂份子，檢察院、法院要和公安機關密切配合，提前介入，依法快捕、快審、快判。罪該處死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並召開宣判大會，公開宣判，藉以教育、發動群眾，震懾犯罪分子。審理中要加強政治攻勢，促使暴亂份子分化瓦解，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

五、認真清理，純潔內部

大量事實證明，在一些單位內部人員中混雜有不純份子，這些人與這次動亂、暴亂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徹底清理，危害極大，必須認真加以解決。

內部清理對象，除上述打擊對象外，還應包括：與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有聯繫的人；動亂、暴亂期間與國外、境外可疑人員有聯繫的人；參加非法組織的人；支持動亂、暴亂，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傳播大批政治謠言的人；參與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圍堵解放軍、設置路障堵塞交通的人；大量資助動亂、暴亂的人；洩露國家機密的人；有其它可疑情況需要查清的人。

內部清理中，要以各級領導班子和要害部門為重點，必須確保純潔。這次內部清理，不搞人人過關。要圍繞反革命打、砸、搶、燒、殺事件和政治謠言的來源去脈，查清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經過清理不夠刑事處罰而錯誤嚴重的人員，應區別情況給予必要的黨紀、政紀處分；不適合在領導崗位或要害部門工作的，應堅決調離。

六、嚴格執行政策

要堅決執行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有關通告。對投案自首者從寬處理；對隱藏、逃跑、繼續作惡的犯罪分子要依法嚴懲；對檢舉揭發反革命暴亂份子有功者給予獎勵；對包庇、窩藏犯罪分子者依法從重處理。必須查明事實，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把受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較深、有一般自由化言論的人，與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區別開來；把一般信謠言、傳謠言、發洩不滿言論的人，與製造謠言、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人區別開來；把六月三日以前參加接援遊行、絕食和有过激言行的人，與參

中共中央文件：

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

加反革命暴亂的人區別開來；把因受蒙蔽而參與設置路障、圍堵軍車的人，與策劃、組織暴亂活動的為首份子和反革命暴徒區別開來；把受人唆使張貼、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的人，與這些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的製造者和組織傳播者區別開來。對前一種人，主要是進行正面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認識，吸取教訓；錯誤嚴重的，可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後一種人，則必須依法從重懲處。

清查、清理工作要重證據，防止別有用心的人挾嫌報復。對借機誣陷他人者，一經查實要依法懲處。

七、組織領導

市委、市政府成立清查反革命暴亂份子領導小組，由市委主要領導同志任組長，戒嚴部隊和紀委、組織、政法等有關部門的領導參加。各區縣、街道、鄉鎮、各局、總公司、工廠、企業、各機關、團體、學校和獨立事業單位，都要在黨委（黨組）領導下，層層建立清查領導小組，由主要領導同志親自主持。要抽調可靠人員，組成強有力的清查辦公室，負責具體工作。凡政治上動搖、表現不好的，不能參加清查工作。領導班子不可靠的，要立即進行調整。市委將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對這項工作進行動員部署。各級清查領導小組，要根據本地區、本系統、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制定具體工作計劃，迅速開展工作。

社會面上的清查工作由各區縣、街道、鄉鎮黨委負責領導；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的清查工作由各系統、各單位黨委負責領導；在京的中央單位的清查工作由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負責領導。高等院校的清查工作另行部署。

各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在清查中發現重要情況，要按保衛工作關係，及時報告公安機關。對在社會上發現的機關、學校、企業事業單位人員的重要情況，有關單位要積極配合當地公安機關進行查證。清查出的反革命暴亂份子，需要依法處理的，及時移送司法機關。這個方案當否，請批示。

中共北京市委員會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四日

中國之聲 98/1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人民政府，各大軍區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各人民團體：

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關於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的工作方案」的請示，現轉發給你們。一切在京單位，包括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都要認真執行，負責地做好本單位的清查工作。其他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同北京市的情況不盡相同，可參考北京市的做法，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訂自己的工作方案，並報告中央。

黨中央、國務院認為，現在北京市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各地制止動亂的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但局勢尚未完全平定，鬥爭是長期、艱巨和複雜的。一些反革命暴亂份子和製造動亂的嚴重犯罪分子尚未拿歸案，如果讓他們逍遙法外，必將後患無窮。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必須認真貫徹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三次重要講話和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下定決心，乘勝前進，把平息暴亂和制止動亂的鬥爭堅決進行到底。

北京市和所有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都必須在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由主要領導同志負責，組織專門班子，充份發動和依靠群眾，從追查當地的重點事件、重點單位和重點對象的問題入手，深入開展清查工作。要千方百計地揪出那些製造暴亂、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幕後指揮者，各種非法組織的頭頭、骨幹份子進行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徹底清查出來，及時依法從嚴懲處，以進一步穩定局勢，消除後患。從這次動亂和暴亂中看出，有些黨政領導機關、要害部門嚴重不純，這是一重大政治隱患，有必要進行一次徹底清理。這項工作一般由本單位黨政領導掌握進行，問題多的單位，可以組織專門班子，並發動群眾檢舉揭發，號召有問題的人主動檢查交代自己的問題。領導班子不純的單位

，由上級派專門小組幫助清查，並可吸收政治上強、身體較好的退下來的老同志參加。上述清查和清理工作要作為今年內的一件大事來抓，不搞徹底決不罷休。

在這場鬥爭中，既要態度堅決，毫不手軟，又要實事求是，防止擴大打擊面。要嚴格依法辦事，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決執行政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多做分化瓦解工作，既狠又準地嚴厲打擊少數嚴重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對人的處理要堅持寬嚴結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該嚴的一定要嚴，該寬的一定要寬。對於一時不明真相而參加過遊行、靜坐、絕食和聲援的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主要是教育問題，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認識，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可不予追究；錯誤嚴重的，可按黨紀、政紀、校規處理，其中主動檢查交代，認錯態度好的，也可以減輕或免予處分。在這方面，黨政機關要嚴於學校和企業事業單位，黨政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要嚴於一般機關單位。不適合在黨政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工作的人，必須堅決調離。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不論是什麼人，都要依法嚴肅處理。罪大惡極、非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必須堅決殺掉；有從輕情節、可殺可不殺的，盡量不殺。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文明執法，嚴禁逼供信。

清查工作是一場尖銳的鬥爭，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強首腦要害部位的安全保衛工作，嚴防犯罪分子報復破壞。

在清查處理各種犯罪份子中，宣傳報導要跟上，但要掌握適度，注意對內的社會效果和對外的政治影響。抓人的數字不要公開報導。判處死刑的案可選擇典型適當報導，不宜過多；報導時，要把犯罪的主要罪行說清楚，有前科的加以說明。

各地、各部門都要在幹部群眾中深入持久地開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法制教育和愛

苦奮鬥的教育，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力加強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消除各種不安定因素，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要進一步加強政法工作，從體制、編制、經費、裝備等方面加強公安機關、武裝部隊和政法隊伍的建設，強化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要繼續開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和整頓治安秩序的專項鬥爭，堅決打擊各種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大力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社會面的管理控制，切實做好對刑滿釋放、解除勞教、社會閒散人員和外來人口的管理教育工作，嚴防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要抓緊在邊遠省（區）組建一些農場，凡家在北京市的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今後一般不准返京，送農場安置勞動。已經放回而沒有正當職業、表現不好、有違法犯罪可能的，也可以再收容起來送農場勞動。要總結留場就業的已有經驗，儘快制定有關法律。北京市要研究制定流動人口管理辦法，限制外地閒散人員來京，以維護首都良好的社會秩序。

中央決定，由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負責指導清查打擊反革命暴亂份子和製造動亂的嚴重犯罪份子的工作，內部清理工作由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共同負責指導。各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和問題，隨時報告中央。

（此件發至省、軍級）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國之聲 98/1

批鬥・清黨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246	翻臉成仇！趙紫陽挑戰鄧小平	百	1/6/89	3/4
247	趙紫陽失勢說明了什麼（林衛）	九	6/89	43/45
248	撒天羅地網扳倒趙紫陽 圖清洗羽翼泡製黑名單（曾瑣）	百	16/6/89	5/6
250	主將一倒「趙系」分明離析	亞	9/7/89	13
251	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穆望）	鏡	6/89	18/25
255	中共高層權力大攤牌（齊辛）	九	6/89	19/22
257	中共的大分裂（羅冰）	爭	6/89	5/10
259	中共高層改組內情（弓文）	鏡	7/89	32/34
260	團中央挨整（賀少明）	爭	9/89	12
261	批趙公開升溫 反資成爲主調（張沐）	鏡	8/89	40/43
263	極左全面復辟（馬平川）	爭	9/89	46/47
264	今年內五中全會定新策 鄧小平正謀交接班體制（張沐）	鏡	9/89	20/23
266	鄧小平最近重提卸職全退 江與楊分黨和國家軍職（張沐）	鏡	10/89	36/39
268	鄧小平稱外交不會「一面倒」闡明復諸政要「五中」定沉浮（張沐）	鏡	11/89	46/49
270	趙紫陽智囊團成員的命運（陳文鴻）	明	11/89	30/33
272	海南省長梁湘成爲祭羊（尙小玉）	中	11/89	22
272	從梁湘看中共整人劣行（歐陽明朗）	爭	10/89	24
273	「蛇口風波」要算帳（尙彤）	九	10/89	74/75
274	海南省長梁湘罷官內幕（何頻）	九	10/89	76/77
275	梁湘被撤職的背後（王路）	南	9/89	10/11
276	中央機關整頓黑名單 258名幹部榜上有名（鄧峯）	當	2/12/89	4
277	中共加緊控制軍隊的新招（萬里行）	當	30/12/89	6/7
277	秋後算帳到武警（何伯施）	當	17/12/89	8
278	全國軍隊一級戒備（何伯施）	當	30/12/89	7/8
279	中南海大震撼（羅冰）	爭	1/90	6/8
280	老虎裝牙：中共強化武警鎮壓力量（曾慧燕）	百	16/1/90	6/7
281	公安系統的清洗（梁逸）	當	3/2/90	8
282	下一個整肅目標：國安郭（昆侖）	中	1/90	27/28
283	中共加強武方統治	當	3/90	7/8
284	鄧小平的調虎離山計	解	3/90	16/17

趙紫陽挑戰鄧小平

本刊記者

趙榮陽陷胡耀邦之覆轍，招惹下台之禍；而且由於他不服「頑抗」，掀起黨內激烈無比的鬥爭，甚至由內閣而出動到軍隊，致令北京勢危，全國都在內戰恐懼籠罩之中。

踏入五月二十五日後，每天都盛傳將宣佈趙榮陽罪行为和下台消息。可是每天一夜幕低垂之際，都證明傳言失實。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李鵬集團在羅織罪名之後，逐級傳達，以為先統一思想，好向趙狠開刀。最早回國時極其鼓厲：稱趙為反革命集團、反黨集團，誰料聽者情緒極極為低潮，有哄堂大笑者，有默然不語者，總之不甚支持，弄得保守派祇有退讓，改為犯一般重錯為低潮。直至五月二十九日，仍未能確定。趙保不住總書記之位已肯定，可是罪名有多嚴重，林達多廣未明朗，目下仍是一場持續的鬥爭。

驚心動魄的學生運動

從四月中旬至五月底，首都北京經歷著一場又一場驚心動魄的運動，其規模與其戲劇性的變化，均前所未有，一場愛國學生運動，至今已演變為中共高層你死我活的鬥爭，甚至可能是一場軍事政變。中南海內為權力私慾的冷酷內亂，與天安門廣場四周為民主自由的熱血奮鬥，成了鮮明對比。

若事態的急速發展，令大家眼花繚亂的話，且從這個分期表理出線索：

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四日：羣衆的介入，新聞界加入遊行，由學運轉爲全北京市民運。

五月二十日以後：中共高層利用學運民運，進行黨內權力鬥爭；而原來目標為改變制度的民運，亦演進為「反政府」運動，要求李鵬下台。

運動演變至第四階段，已不可避免地需以某些高層領導下台始能告終。中共黨內鬥爭是趙紫陽被擠掉；可是，全國洶湧澎湃的反李鵬狂潮，最後亦必將李鵬捲入不可翻身的深淵。

發起這場運動的是制定一切重要決策的舵手鄧小平，他攻擊的對象是他的擎天一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負責執行的是國務院總理李鵬。

假如以改革政策來觀察中共黨內分歧的話，鄧小平與趙紫陽是拴在一條線夥伴，被視為經濟改革的代表；而李鵬則與姚依林，緊隨陳雲的計劃經濟路線，主張改革緩行。現在却是鄧小平拉來另一條線的李鵬，共同對付自己的夥伴！中共黨內鬥爭之不合理性，不可思議，莫過於此。

李鵬要依附最高權力鄧小平，向趙紫陽奪權，是意

老鄧絕對否定這次學運

爭也遲早要爆發。問題是鄧小平。胡耀邦因為贊成鄧小平退休，惹得龍顏大怒，借學潮之勢讓胡倒台；趙紫陽與鄧小平的矛盾，則由今年四、五月學潮而起。

老鄧是絕對否定這次悼胡和反腐敗學潮的。有人認為他是因為北京市委李錫銘「慌報軍情」而發怒，其實並不是那麼抗拒學潮，這顯然不符合老鄧的一貫思想。八六學潮規模遠不如這次，當時鄧小平已殺氣騰騰地說：「要採取堅決措施」來處理學生鬧事這樣的「重大事件」。兩年多過去，老鄧的思想並無改變，在今年三月，鄧在聽取趙紫陽的匯報時，他指示：「總之中國要穩定，不能亂」，又說「不能隨便遊行示威，總之要加強控制」（見附錄一，第七頁），老人家不愛看到鬧鬧哄哄的心態可見。以此看，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那種強硬的態度，完全合乎老鄧的思路，不僅是某些人慌報軍情所造成的。

及至「四·二七」大遊行成功完成，鄧的權威受到空前挑戰，他那裏受得了？

可恨的趙紫陽，竟然不經鄧老子的同意，擅自於五月四日在亞銀代表之面，發表肯定學生愛國熱情，肯定學運的講話。

趙業鵬五月初自北朝鮮訪問歸來，以至五月中旬間對學生的寬鬆政策「恰似八六年底胡耀邦處理學生運動」，以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洩露了鄧小平是最終掌舵人，使學者對學生的敬若生人，可謂墮下禍根。

人，根據政治局常委喬石於五月二十五日向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員轉達李鵬講話時透露，趙對學生運動看法與鄧不一致。喬石說，該篇《人民日報》社論發表時，趙正在北朝鮮，當時有人打電話通知他的內容，他同意了。但自歸國後，却又說語氣太厲害了。五月四日講話前，

李鵬曾拿出一份稿子，內有反自由化的觀念，趙却棄置不用；中央認為趙的「五·四」講話，只代表個人，不

代表中央。及後鄧多次說過要制止動亂，趙都反對。鄧、趙矛盾正開展，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絕食，矛盾一下子擴潤成深深的裂痕。學生絕食的要求一是否定「四·二六」社論，矛頭直指鄧小平，鄧小平當然更不會同意了；而趙紫陽却對學生持和緩態度。

趙對絕食學生態度

據一份相信是出於趙系統所傳出的資料顯示，趙對解決絕食的態度如下：

「五月十三日，趙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張立即否定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被四比一多數否決。五月十五日，趙決定去天安門廣場向社會和公眾宣佈他個人意見，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違反黨紀理由阻止。五月十六日，在鄧小平出席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趙提出五條意見：（一）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二）由他本人承擔發表社論的責任；（三）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官例行爲的機構；（四）公佈全國副部級以上幹部的行爲背景；（五）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可是以上意見又以四比一被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可是以上意見又以四比一被否決。五月十七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以微弱多數同意趙下台，總書記職務由李鵬兼任。」

上述資料，比較具體地表現出趙對學運的態度，細節上則略有可疑之處，趙是於五月十八日始被正式奪權的。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趙樹理與李鵬對安門廣場看望學生，趙預計胡啓立及喬石會支持他，怎料在李鵬激烈反對下，常委會以四票反對他一票否決他。

黨」，不遵守黨紀辦事的罪名。

這時趙大概也曉得他已和鄧站在對立的兩面了。五月十六日下午，中蘇兩黨最高領導人的會面上，趙紫陽說出了一番耐人尋味的話，趙對戈爾巴喬夫說：「十三屆一中全會鄧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

葫蘆中賣什麼藥？

趙紫陽首次透露這項黨內秘密，表面上是尊重老鄧，實際上是讓鄧暴露出來負上一切責任。果然，這番話引起國人強烈反響，曾起草「五·一六」宣言的北京知識界嚴家其、包遵信等人，馬上再起草一份「五·一七宣言」（詳見附錄二、第七頁），將鄧小平形容為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聲言要打倒獨裁者，語氣遠比「五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在戒嚴令之前，抗議示威者多採溫和姿態，未有如此針對個人的聲明。此宣言給老鄧的震動可想而知。結果其後趙紫陽的罪行中，便有一條是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將矛頭指向鄧小平。

就應否撤除葉陽總書記職務一事，曾有爭持。五月十八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有人提出趙紫陽是最大的「官倒」，支持學生運動及向戈爾巴喬夫洩漏黨內情

政治局常委曾提出要去他職務，但趙堅持政治局常委沒權這樣做。

趙隨卽返回中南海退居，以養體不適。拒絕出席。月十九日晚在總後勤部的中央及北京市的黨政軍大會。趙曾提出請辭總書記職務，不爲接納。中共總書記這個位置實在不好，過去趙曾三次提出辭職。

在中南海，則設了六個警戒線；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基本上已呈癱瘓，由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代行。而前國家體改會副主任、趙紫陽秘書鮑彤於十八日凌晨被免除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秘書一職。

李鵬對學運的看法與鄧小平一致。趙紫陽對李鵬會

見學生的表現極度不滿。李鵬在會上曾表示是次「學潮」比文革還要動亂得利害」，李鵬點了王丹及齊樹枏等姓名，謂客觀事實他們要負責；並表示對新聞媒介對整件事的報道，有保留，這三點在中央電視台轉播時被刪掉。

五月十九日凌晨四時，趙紫陽執意去天安門廣場勸學生，並聲淚俱下的向學生講了一番「告別」的話，謂他「自己走了！無所謂……學生仍年青，應該珍惜生命，可看到四個現代化」等，首次公開披露自己的困頓。凌晨四時四十分李鵬聞訊趕到廣場，趙已說畢。

老鄧調軍已不是對付學運了

趙紫陽這連串舉動，顯然是不向鄧、李屈服，在鄧眼中，無疑是「負隅頑抗」。在趙紫陽到廣場之後，鄧小平馬上飛到武漢。而五月十九日黃昏，軍車已開始進城了。

大軍壓境，趙仍未見屈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新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四個份屬趙紫陽智囊的單位，於五月十九日下午發表六點緊急聲明，強烈譴責黨政失誤，不顧人民意願。五月二十日，戒嚴令頒佈後，體改所又馬上召開緊急會議，本欲再鞭撻戒嚴暴政，最後隱忍不言。即使如此，六點聲明已成了黑材料，體改所亦難逃厄運。

至此，中共黨政高層要應付的，已不是學運了。紅衛兵、造反派、外地駐軍抵京，北京群眾還為學生捏一把汗，不少人勸說學生撤離廣場，消除軍隊進京的藉口。其實，不管學生是否停止絕食、是否撤離廣場，老鄧都要以他軍委主席的權威，來調軍應付黨內鬥爭的。

李鵬在講話中說北京正發生動亂，因此要實施戒嚴。學生對此極感氣憤，認為學運怎能算是動亂？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李鵬分別會見三位人士副委員長，提及動亂真正的原因是在黨內。

終於承認了：調動軍隊、發動一場向總書記奪權的政變！

七六年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毛澤東指為「新修正主義」，被拉下馬；十三年後的今天，鄧小平却指趙紫陽是學的「黑手」，拉他下馬。中共這副陳舊的政治機器，一直有隨著歷史發展而更新，仍舊行着它那脫離時代的軌。鄧小平有無有想到，整掉趙紫陽與改革派那麼他自又何以自處？

趙紫陽失勢說明了什麼

林 衛

李鵬匯報，鄧小平指示清理，趙紫陽意圖緩和，終於撞到了虎口上。即使這次學生運動被壓下去，鄧小平和李鵬的統治也不會長久，因為他們已自絕於廣大人民。

在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中，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激化，中國局勢因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老朽勢力「掌舵」之下，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失勢，成了胡耀邦第二，甚至性質更嚴重，要定為「反黨集團」。雖然這場大變的「內幕」還不清楚，但從已有的報導，仍能勾勒出事態發展的輪廓。

趙紫陽失勢，李鵬要大幹

政局的大變化，從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開始，到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是一個階段。這階段的特点是：在人民羣衆的強大力量面前，保守派敗陣，趙紫陽的地位暫時得到穩固。

在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以後，中共高層對學生和羣衆自發的悼念活動，一直抱著非常曖昧的態度，這從中共傳媒拒不報導可以看出。而實際上，某些人對此是抱著極端仇視的心態。如果說當局對學生和知識份子的請願上書是抱冷淡態度的話，那麼後來在新華門外初試暴力，就表明了一種敵對的立場，也表明了是大規模鎮壓的前奏。但是為了四月二十二日

的追悼胡耀邦大會能夠順利進行，所以高層某些人還盡量忍耐，暫時不開殺戒。

在追悼會以後，學生雖有罷課，但未有重大的街頭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就已經忍不住而發出殺伐聲了。這個殺伐聲是鄧小平聽取了李鵬和楊尚昆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代表政治局向他匯報學生運動情況以後發出的。

中共的政治局會議在四月二十四日舉行。和中共十三大以後每次政治局開會都由新華社發表新聞稿不一樣，這次是政治局的秘書會議。趙紫陽是在四月二十三日下午離開北京去平壤的。李鵬在趙紫陽走後立刻召集和主持政治局的會議，並將政治局分為兩套班子：以李鵬、姚依林為首主持日常工作；另一套班子是以喬石、胡啟立為首，負責對付動亂。（據香港傳媒轉引北京消息稱，北京市委向中央政治局匯報了學生運動，並「主動請戰」，要求站在第一線「反擊」。）

以往中共只有在非常時期才成立特別班子，例如立三路線「革命高潮」時期成立行動委員會；四七年中共撤出延安後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兩路活動；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化革命小組等等。如今又沿用這一套，顯示政治局會議上已經有人準備和學生「大幹」了，雖然學生所採取的一直是和平請願和遊行。

這個由李鵬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將學生運動定為「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嚴重政治鬥爭」。以這個調子向鄧小平進行匯報，得來的當然是火上加油的指示了。於是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鄧小平又發明了一個「清理政治環境」。鄧小平還表示不惜出動軍隊、流血和不怕外國輿論，甚至還要修改憲法。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後來學生的大規模遊行壓倒了這些頑固派的氣焰，那麼在這場新的運動中，早就有一大批知識份子被列入「清理」的黑名單。

四二六社論：鄧決定鎮壓

《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所發表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就是政治局和鄧小平下決心鎮壓學生運動的動員令。

社論把學生運動描寫得漆黑一團。在悼胡期間是：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煽惑羣衆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喊出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還有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在悼胡活動之後是：製造種種謠言，煽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份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正是上述真相的被歪曲，中共高層才得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結論。從而認為：「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政治鬥爭。」

也在這一天，李鵬會見泰國內政部長巴曼上將時，陰陽怪氣地說：「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如果不能維持一個正常的社會秩序，不要說發展，就連生存也不可能。」這些話暗示了學生運動危害了中國的「生存」。

就在四二六當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了黨員幹部萬人大會，這是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政治鬥爭」的組織動員令了。

然而也正是這篇社論和上述的做法，把廣大學生和市民也動員起來了。廣大學生抱著視死如歸的悲壯心情，義無反顧地走上街頭。而廣大市民也以實際行動支持學生，不但贈送飲品食物，還幫助學生打開軍警的封鎖線。這個中共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羣衆遊行，充分說明了民心的向背，迫使當局做出一定的讓步，一方面是一再進行恐嚇說是「非法」，另一方面又不敢公開進行鎮壓。

四月二十七日的遊行，顯示了羣衆力量絕不可欺。李鵬不得不通過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四月二十九日的所謂「對話」會上作解釋，聲稱《人民日報》社論並非針對學生。但是袁木在「對話」和五月三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仍口口聲聲說學生運動被利用，顯然還是把它作為一場「政治鬥爭」來看待。

趙紫陽回國緩和緊張局面

趙紫陽四月三十日從北韓回到北京。五月三日，當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大會，趙紫陽發表講話，肯定了青年的「開拓進取的探索精神」：「青年人要求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自我的價值，這種積極性應當受到保護」；「青年人愛思索，勇於探索各種新知，這正是他們的可貴之處」。趙紫陽的這個講話，使《人民日報》和袁木將自己和學生擺在對抗地位的緊張局面有了緩和。

由於這個溫和講話，五月四日學生的遊行就比四月二十七日氣氛輕鬆得多，而且軍警也沒有什麼阻攔。

五月四日，趙紫陽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時，針對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他還認為，學生遊行的基本態度，「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趙紫陽還表示要和各個階層對話，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這就進一步否定了這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之說。

接著，趙紫陽在多個場合，再度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五月八日會見土耳其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時，趙紫陽說：「中國不僅將堅定不移地推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將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相互促進。」五月十日，趙紫陽在會見保加利亞共產黨訪華代表團時進一步說：「看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遇到的困難很難克服。」

為了維護特權利益，一些中共領導人一再散佈一種言論，似乎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發揚民主，就會破壞安定團結，從而影響改革和經濟的發展。但趙紫陽的提法則明顯有別於上述言論。

在這段期間，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萬人大會上宣佈派工作組接管《世界經濟導報》，並且撤了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引起大批新聞工作者的強烈不滿，並導致記者上街遊行。趙紫陽回來後，面對江澤民在上海要求中央表態支持的壓力，卻表示：這一事件是由中共上海市委引起的，如何結局，也應由中共上海市委去處理。這等於是間接批評了上海市委的做法。

從胡耀邦逝世到五四運動七十周年這二十天中，中國政局所發生的變化，雖有它的必然性，但也有很多「偶然」之處。除了胡耀邦死的正是時候，為紀念五四輸送了新的動力之外，趙紫陽訪問北韓，也使他避開了尷尬的處境，把李鵬推上了第一線。李鵬在羣衆運動的洪流面前立功不成而被迫退縮的時候，趙紫陽又正好回來收拾局面。

終於撞到了虎口上去

然後，從五月中的中蘇高峯會談起，情況進入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点是：保守勢力極為頑固，趙紫陽失勢，並且成了政治鬥爭的「祭品」。

北京高校學生在五月十三日展開絕食行動之後，陸續有迹象顯示，趙紫陽較為緩和的主張使他在黨內處於相當被動的地位。

實際上，五月十六日下午趙紫陽會見蘇共

領袖戈爾巴喬夫時，有意透露了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由鄧小平「掌舵」決定重大政策的秘密決議，這就表示了他的無能為力。最後，在另一個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提出和平解決學運的辦法被否決之後，他就只有撒手不干一條路了。

反之，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以後立刻離開北京去武漢，這就隱藏了殺機。一方面為自己留後路，可將責任推給趙紫陽或李鵬；另一方面，在武漢調兵遣將，以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

五月十九日晚，李鵬召集了中央和北京的黨政軍幹部，向學生運動發出鎮壓令，並且由國家主席兼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出面，調兵入北京。由於這個會上趙紫陽沒有出面，顯示趙紫陽已經失勢，李鵬成為鄧小平以下的「第一把手」了。這時李鵬的趾氣高揚，也使人看出了他的暴發戶嘴臉。

其後，由北京流傳來的消息，先是趙紫陽已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繼而是趙被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定為「反黨集團」，並且羅列罪狀。趙紫陽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敗陣（五月十八日），除了說明黨內高層人士不致違背鄧小平的「聖旨」以外，也還因為趙紫陽根據學生的要求，提出把自己的子女、鄧小平的子女、及副部長級以上幹部的子女系內人大常委會所設的機構審查（有學生派代表參加），當然得罪了包括鄧小平、李鵬等等，以及一些不乾淨的官僚，因此惹起反感。

一九八六年胡耀邦指揮打虎運動，受阻而失敗，不久下台。趙紫陽這次也撞到了虎口上，也下台。看來這隻大老虎就是鄧小平，下面還有一批利用改革發橫財的小老虎。要衝破這個「老虎陣」，需要強大力量，否則無法成功。雖然執筆時趙紫陽已經失勢，但是李鵬的拙劣表演，包括造謠污蔑、翻臉不認、倒打一耙等，已經引起空前強烈的公憤。而鄧小平離開北京搞陰謀詭計，推行法西斯軍事獨裁的本質，也把他最後剝下。即使這次學生運動被鎮壓下去，鄧小平和李鵬的統治也不會長久，因為他們已經自絕於廣大人民。天安門的幾百萬羣衆遊行，香港的一百萬羣衆遊行，已經完全說明了人心的向背。

後記：五月底，北京傳出消息說，中共高

層已傳達指示，將趙紫陽等定為「趙紫陽反黨集團」，並列舉罪狀。趙的罪狀包括：在最近這場「動亂」之前，中央本該積極引導，但趙卻強調克制；其二是趙在訪北韓之前企圖把「球」踢給李鵬和國務院，要恢復秩序，抓緊對話，避免流血，而在李鵬向鄧小平匯報，決定這次運動的性質是動亂後，趙的班子打出了「六點聲明」；其三是趙在「五四」講話、對亞銀理事的講話、與戈爾巴喬夫會面的言談均屬錯誤；其四是指趙為這次的「動亂」的總後台，發動學生是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等等。

與此同時，北京傳出的消息說，趙紫陽的親信已被列入「反黨集團」的名單，包括鮑彤（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主任）、田紀雲（國務院副總理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中央書記處書記）、溫家寶（書記處候補書記）、杜潤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等。此外，還有一大批知名的知識份子被列入黑名單，如蘇紹智、于浩成、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方勵之，等等。果如是，這是當權者徹底自絕於全國人民了。

九十年代 1989/6

撒天羅地網扳倒趙紫陽 圖清洗羽翼泡製黑名單

要網羅趙手下大批人

中國首都北京施行戒嚴令逾一週，局勢一天比一天嚴峻，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黨政負責人，奉召齊集北京，接受訓令及候命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情況和八七年罷免鄧小平總書記胡耀邦相若，不同的是大軍壓境，矛頭直指所謂一小撮人，制止全未發生的「動亂」。

據可靠消息透露，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於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西山，召開傳達會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首腦齊集。講述趙紫陽所犯的嚴重錯誤。

李鵬接得鄧小平令箭後，他要整的已不止是趙紫陽一人，而是網羅趙手下一大批人。近日北京到處流傳不同版本的黑名单，除趙之外，經常榜上有名的是政治局常委胡啓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兼趙紫陽秘書鮑彤、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甚至有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國防部長兼中共軍委常務委員秦基偉和中共軍委常務副秘書長洪學智上將等等。除黨政要人外，又有知識分子黑名单有四十多人，一百多人，不一而足，重點人物是嚴家其、方勵之、李淑嫻等人。

直至五月二十七日，黑名单版本還未最後敲定，反映出多方面爭持激烈。據了解，有人希望將趙及一批趙的支持者打倒「反黨集團」，在最近的傳聞中，雖無明確使用「反黨集團」之名詞，但已形容趙的錯誤為「反黨」。如此定罪的話，則比迫胡耀邦之下台嚴重得多，直似文革手法。

但亦有人主張先整趙紫陽一人，或加上一兩個羽翼，暫不採取集團連帶方式。秦基偉與洪學智是軍方，將另外處理。而閻明復的情況有點特殊，有人提出不僅不整他，而且將之升入政治局常委會，因為他形象開明，可以作為對外和解的棋子，加上他與楊尚昆關係特殊（文革期間楊尚昆被批鬥，閻明復在他的辦公室工作，曾竭力保他），可能放他一馬。問題是閻明復是否願意當這隻棋子。

被遙傳辭職的李鵬，目前則穩如泰山。二十五日，李鵬自頒佈戒嚴令後，第一次露面，他在會見三名新大使時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旗手是鄧小平，而不是別人。」

他說：「參加遊行、示威、靜坐的人不少，大多數是年輕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瞭解事情的真相，一旦瞭解了真相，他們同黨和政府在認識上的距離就會縮小。」

他又說：「戒嚴已經進入第六天，戒嚴部隊遇到阻攔，沒進入市中心區，這不是因為解放軍部隊沒有進城能力，而是因為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在人們還沒有充分理解戒嚴的意義的情況下，軍隊採取極大克制。」

宣傳軍隊入京為對付「一小撮人」

李鵬所提到的「真相」，以至他和楊尚昆在二十日凌晨宣告軍隊入城的講話，都是不斷重申軍隊入城不是對付學生市民，而是「一小撮」人。

北京政府從各地調遣部隊來京，愈來愈顯示不是要清理學生，而是作好準備，在宣告任何高層權力變更時，應付可能出現的「動亂」。

《解放軍報》連日在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兩天刊登強硬態度文章，針對部隊入城，接觸到羣衆後可能出現的鬆弛狀態。

二十三日該報報道全軍總政治部會議時指出：「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這場動亂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其目的就是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二十四日解放軍報，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以顯著篇幅刊登解放軍三個總部（總政治部、總參謀部和總後勤部）給戒嚴部隊的慰問信，明確表示解放軍執行戒嚴，是為了「制止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動亂」，而且這是一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嚴肅政治鬥爭，「這是大是大非的鬥爭。」

鄧小平點名批判以趙為首的六人「反黨集團」，趙紫陽作為黨最高領導，竟被冠以「反黨」頭銜之罪，並且在重大決策時，仍需向一個連政治局委員也不是的老人家請示，可見鄧小平身任軍委主席，抓住了軍權的實力。

作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象徵法治和最高權力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縮短訪問美加一行，提前一週於二十五日凌晨回國，却因理由留滯延遲。

萬里回上海形同受軟禁

據了解，自國務院頒布戒嚴令後，趙紫陽曾拍電報急喚萬里回國，召開人大常委會；同時，李鵬也拍電，著萬里繼續行程，毋須急於回國。

到二十六日為止，已有近六十名人大常委聯名上書，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重點包括罷免李鵬和處理目前危急問題。

然而，召開這會議機會不大，一是萬里形同「軟禁」於上海，二是據不明文規定，是類會議須由黨中央政治局批准。

據了解：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來京，是要進京接受教育工作，說服他們以大局為重，擁護中央一切決定。

另一方面，解放軍戒嚴部隊撤離北京市民居，一是為防止羣衆分化，二是明令他們再學習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及學習李鵬及楊尚昆於五月十九日晚在解放軍後勤總部，向黨政軍領導，就有關軍管北京的講話。

北京當局作出系列措施，是恐防宣佈高層人事變動，將掀起軍民情緒的抵抗。

事實上，部隊內的不一致，也是造成當局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之一。

八大軍區中與趙紫陽關係較好的北京軍區及福州軍區，遲遲未明白表態支持李鵬及楊尚昆軍管講話。

被點名批判為「反黨集團」的兩名軍人，秦基偉和洪學智上將都屬於李先念、徐向前為首的紅軍四方面軍，與楊尚昆、鄧小平為首的紅一方面軍，地位曾不相伯仲。

洪學智是五五年封的老上將，原解放軍後勤部部長，秦基偉是原北京軍區總司令，調升國防部長後，已沒實際兵權。

目前，「楊家將」「鄧家兵」仍掌握全國軍隊的重權。鄧小平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楊尚昆是中共軍委常

務副主席，楊白冰（楊尚昆弟）是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負責軍隊宣傳思想工作；遲浩田（楊尚昆女婿）是總參謀長；趙南起（楊尚昆外甥）是解放軍總後勤部主任。

老將並不贊成軍隊入京

可是鄧主任並不是全無後顧之憂。五月二十一日，軍方七位高級將領致信北京戒嚴總指揮部及中央軍委：「鑒於目前事態極為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提出下邊要求：人民軍隊屬於人民，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鎮壓人民，決不能向人民開槍。為了制止事態的進一步惡化，軍隊不能入城。」

署名的是張愛萍、蕭克、葉飛、楊得志、宋時輪、陳再道與李聚奎。後來再加上另一位將軍王平。這幾位將軍的影響力自是非同小可，張愛萍是前國防部長，楊得志是前參謀總長。王平則與鄧小平有兒女姻親關係，鄧之女兒與王之女兒為姊妹。

當然，幾位老將軍的呼籲只是針對軍隊不能鎮壓學生，可是當軍隊本就不為學生而來，他們的呼籲便成了空話。另一方面，老將軍既敢於提出與鄧主任不同的意見，亦反映出鄧小平的權威力並不是百分之百的。

再一方面，十六日中共各領導會見戈爾巴喬夫，代表全國最高統戰機構的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曾要求與鄧小平說話，鄧小平起初裝不聽見，後來則表示「有話日後說」。

據了解，李先念並不贊成出軍鎮壓學生；但過了幾天後，有關軍隊的部署已相定。

據了解：鄧小平於五月十九日赴湖北省武漢市，召開中央軍委會會議，北京、瀋陽、成都、廣州、南京、濟南、蘭州、福州八大軍區軍長奉召開會。

除北京軍區及瀋陽軍區不贊成出兵鎮壓學生外，其餘都表示支持。

搜集資料羅織趙之罪名

控制全國資訊傳達的中央電視台，更正式開動，設置在湖北省中部應城縣附近的「中國戰時應急中心」，在任何突發事情發生後，可隨時開動這中央電視台第二套中樞控制機器，掌握第一時間向全國及世界廣播。

鄧小平於二十四日在北京西山傳達了指示後，便回到湖北省武漢市，與中央軍委會遙控局面。

自軍車撤到京郊後，表面上城內已無威脅，實際上全國各地的軍隊卻仍源源不絕調往北京，軍力之強遠超乎制止動亂的需要，令人憂慮竟事變複雜到甚麼地步。據分析，由於國防部長秦基偉和北京軍區遲遲不表態，因此為防引致兵變，大量調軍團因北京以作防備。北京軍區終在五月二十六日表態，是最後一個表態的軍區。

鄧小平佈置調軍的同時，李鵬、李錫銘一夥則放了大量資料工作和輿論準備。他們不斷在召開小集團會議，為趙紫陽羅織罪名，在各省市委書記雲集北京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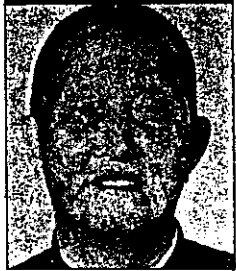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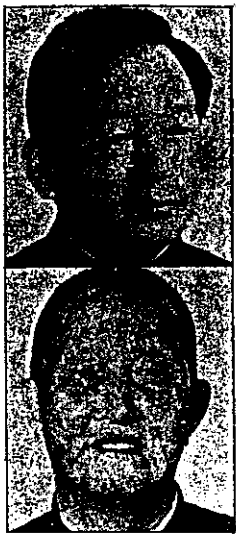
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為趙紫陽的案內定性。在此事上起鳴鑼開道作用的北京市委，於五月二十二日便向下傳達文件，將事件定性為黨內的嚴重鬥爭，政變與反政變，又提出誰反對鄧小平，誰就是反黨，並羅列趙紫陽的罪名為：從北朝鮮回國後，遲遲不對學生運動表態；不顧一切要見學生，違反黨的紀律；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將矛頭引向鄧小平。

五月二十三日，李鵬集團又總結出趙紫陽為中國最大的官倒、政治品質敗壞，策劃學潮。儘管中共對趙之「罪名」爭論得厲害，至二十四日，還是定了：他是「反黨集團」的頭領。

五月二十五日，「反黨集團」的「罪行」先於部隊間傳達，傳至第一級（相當於局級幹部），五月二十六日，更在文官間傳達至局一級。通過傳達中央這項看法，謀求在黨政軍幹部當中達成共識，減少日後正式公佈時的歧異。

新華社社長穆青、電視廣播部部長艾知青等奉召到南海，聽候匯報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首腦的會議內容，並接受新聞處理的準則。

調軍佈防、統一幹部共識、安排傳媒準備公佈；一切佈置好後，便待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正式敲定了。那管你人民天天上街，人大常委說什麼要行使人大權力，黨內的事，誰管得了？北京市委說得一針見血，「誰反對鄧小平，就是反黨」，怪不得趙紫陽堂堂一位總書記，竟成了反黨分子！



上排右：趙紫陽。下排右：秦基偉。
上排左：田紀雲。下排左：洪學智。

失勢人馬

主將一倒「趙系」分崩離析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象徵着黨內「趙系」的瓦解。其中一些核心人物隨着學生運動而離職，甚至可能被判刑，但大多數人仍能保住原職。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和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向被視為受趙紫陽提拔的人物。七十年代末，趙到四川主持省政，率先實行農村「包產到戶」的改革措施，成效突出，田、楊皆為其得力助手。趙到中央工作後，兩人的地位隨之上升。

趙紫陽因「支持」學運受鄧小平罷黜後，一度有傳言說田、楊等皆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但四中全会的結果表明，鄧似乎不想把整肅範圍擴大到與學運沒有直接牽連的趙系官員。同樣，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現任國務委員陳俊生、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等人，似也未受到趙下台的影響。田、陳、溫等人還在「六·四」慘案之後繼續露面支持鄧小平，以示同趙紫陽「決裂」。

然而，曾介入學運的趙紫陽親信，如中共中央政治局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等人，不僅要受黨紀處分，可能還將被控處刑。

鮑彤近年一直追隨趙紫陽左

右。一九八四年出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而主任一職則由時為國務院副總理、趙紫陽兼任。

次年趙出訪歐洲，鮑以「總理辦公室負責人」身分隨行。一九八七年趙轉任中共總書記後，鮑彤調職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政治秘書，繼續擔任趙的助手，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定稿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便是由鮑與現已離開大陸的學者嚴家其等人擬稿。此方案已被中共元老視為「反黨綱領」。

鮑彤更大的罪名是把最高層在學運問題上的尖銳分歧透露給學生，對學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些「洩密」涉及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務會議、四月二十五日鄧小平講話直至五月二十日北京戒嚴的決定以及戒嚴部隊番號和入城路線等。為此，鮑在五月十九日戒嚴前夕被軟禁，不久便遭逮捕。

陳一諮的情況與鮑彤相近。陳長期就經濟、政治改革政策給趙紫陽出主意，並主持體改所等重要智囊機構，頗得趙器重。在最近的學



北京學生靜坐：智囊被指「推波助瀾」

運中，體改所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智囊機構與學生組織往來密切，在支持學生的遊行中亮出了國務院的牌子。

五月十九日，在獲知趙紫陽失勢、北京即將戒嚴後，以體改所為首的上述智囊機構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緊急聲明」，要求立即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干預中

共最高層的「錯誤決策」。這份聲明後來被指為趙系人馬的又一「反黨綱領」，也成了陳一諮等人的「罪狀」。此外，在「六·四」事件當天，體改所一些人員簽署退黨聲明，以示最強烈抗議。目前，陳一諮已被正式通緝，被控「書寫反動文章，煽動動亂，煽動對抗戒嚴令，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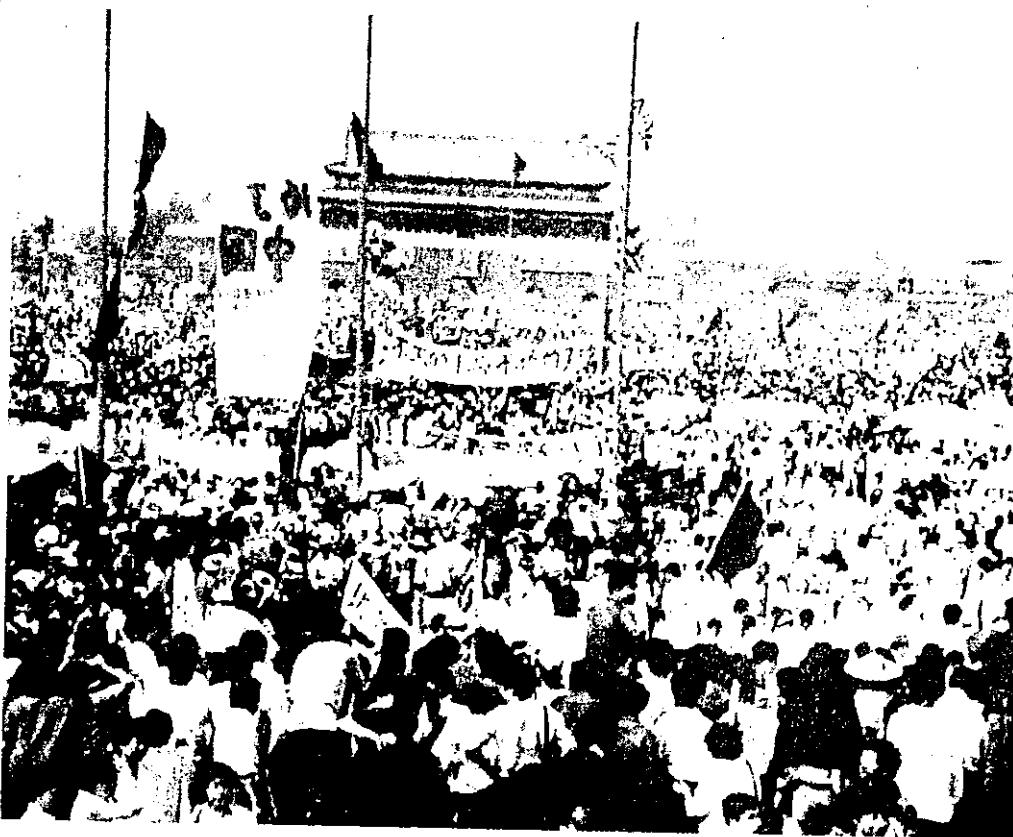
據悉，趙紫陽的主要智囊機構現已癱瘓，一些成員失踪或隱匿，部分可能已離境。知情人士對亞洲週刊說，當局除了對鮑彤等人嚴懲外，似不會將趙的智囊班子一網打盡，其中一部分將留用。

另外，趙紫陽曾在廣東省任職多年，到北京工作後，仍大力支持那裏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的建設，當地不少主要官員與趙皆有關係。新建的海南省一些領導官員與趙亦有類似的淵源。同時，趙的兒子趙大軍等一直以深圳、珠海和海南島為其經濟基地，如對趙問題的「繼續審查」涉及到他兒子的「官倒」行為，可能牽連當地一批官員。有消息說，新任政治局常務委員宋平負責廉政和人事組織工作，打算以趙大軍及其弟趙二軍「祭旗」。但是，鄧小平為了繼續開放改革，相信會對廣東的務實型官員「網開一面」。當地一位知情人士說：「如果中央要清洗全部趙系人馬，廣東就將癱瘓。」

中南海高層鬥爭真相

穆望

本文揭示了中共高層領導因在對待今次學運問題上觀點分歧而演成的黨內權力鬥爭的內幕，特別是趙紫陽與李鵬矛盾激化的重重內幕，令人驚心動魄！



黨的經驗已對付不了這次學運

一九八六年底至一九八七年初，連續半個月，波及三十多個城市，一百多所院校的遊行示威，因總書記胡耀邦被迫下台而自行結束。兩年中，大學生自悔、自責、自省，終於在胡耀邦猝然辭世的悲痛欲絕之中，像狂風突進般的爆發出來。八九年的四月中國社會態勢似乎與十三年前的四月發生了一輪迴。最初是在高校校園內的大字報上這樣寫道：「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要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後來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人民大會堂前提出的七點要求，已經能夠看出「四·一五」開始的學運與「四·一五」運動的區別。此次學運不是要打倒或擁戴某一個人，不是在贊同制度下打倒貪官，呼喚清官；她要求從改組出發，加快民主進程。這樣明確的政治目標及其廣泛羣眾基礎，已確定這次

學生運動的史無前例的偉大的歷史作用。

已經堅持一個半月的學生運動，從「四·二三」、「四·二七」、「五·四」、「五·一三」、「五·一九」學生的絕食請願，已發展成爲「五·一九」……「抗議軍管，要求取消戒嚴令」的全北京、全國各個階層援學運的愛國民主運動。將學生要求民主、推進改革的行動定爲「違反憲法」、「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四·二六社論」和「五·一九」深夜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會議」宣佈調動軍隊鎮壓動亂的決定，使得當政者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市民的良知和意願直接對立起來，導致北京市和整個國家的事態不斷在惡化，這只證明了當局處理學潮的決策是一錯再錯。

「我們已經窮到了底，我們唯有良心和血！」這是二十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張貼出的一張大字報上的頭一句話。一個把人民逼到「不畏死」的份上的政府，可怕的是它不止「一而再，再而三」。現在在中國大陸又浸淫在下一個危機之中，這個危機是「黨內殘酷鬥爭」的方式在沉寂多年之後又重新抬頭了。並且要在造成空前未有的全民的反抗之中將其社會化，以求當政者在無能、無感、無效的絕境之中的出路，這更是一個大錯特錯。其結果，將不僅使中國十年改革的前途喪失殆盡，承擔這場歷史大災難的，又將是經歷酷劫的中國人民。

李錫銘「四·二四」請戰報告

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送上了一份「請戰報告」，這份報告經過了市委書記李錫銘的親筆修改。其內容是有選擇地在學生大字報、標語口號上作文章，並且利用三月份以來跟蹤、偷拍、偷聽、誘導、編造的一些人、事、言論，說明學潮「有四種人參加，有四種目的，會有四種壞的可能」，實際是經過兩年醞釀、準備、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其中不乏這樣的判斷：「要求重新評價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嗎？」該報告提出：「只要中央給政策，我們是有辦法解決的。」

這份報告當晚拿到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討論，楊尚昆參加了會議；和常委一起討論李錫銘的報告，一致認爲學潮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會議決定由楊尚昆和常委第二天上午一起向鄧小平平匯報政治局的討論結果。

次日上午十點，鄧小平聽完匯報作了「四·二五」講話，他肯定這次學潮「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有準備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和制止動亂」。他還

五月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被圍困在北京呼家樓、東直門、德勝門、西直門、八角村、六里橋的戒嚴軍隊分頭向後撤，到指定地點集結，百萬市民在鼓掌歡送、電視台、廣播電台及時地做渲染。與此同時，被徵用的多架民航波音客機，卸掉座椅，正從廣州軍區將三個師的兵力源源運進北京，據目擊者所見，壓在北京城下的重兵，已來自不下七個軍區的十數個野戰軍。

二十四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堅持靜坐的幾萬學生，在十幾萬市民的圍觀和支持下，舉行「保衛天安門廣場」的誓師大會，與此同時，戒嚴部隊指揮部再次在報紙上聲明戒嚴部隊完全是爲了恢復正常秩序，決不是對付學生。

二十五日晚，因爲在「黨、政、軍幹部會議」上講話重新宣佈學潮是動亂的李鵬總理，在他激起知識界和百萬市民連續五天舉行支持學生的大遊行

說：「我不怕國際影響，幾十年周娘的多了。我有三百萬軍隊。」他認為這場動亂發生的原因是「清污」、「反資」不徹底，並遷怒於去世十天的胡耀邦。還說：「通貨膨脹胡耀邦也有責任，按他提出的兩位數速度，情況更壞。」他還指示要抓學生後邊「長鬍子」的。當時貴成胡啓立組織一篇社論，當天下午胡啓立召集各新聞單位進行傳達，並負責組織社論班子，由「文革」、「洪廣思」的主持人、「反自由化」寫作班子「陸仁」的主筆、北京市委副書記徐惟誠「捉刀」。

社論寫成後，電傳給正在北韓訪問的趙紫陽，趙回電贊同基本精神。當時鄧、楊等人認為中央取得了一致的立場。

當晚田紀雲代表李鵬向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傳達，並要求第二天必須向本單位傳達。

教委的何東昌勇當先鋒，連夜召集教委幹部和各大學校長，竟傳達到二十六日凌晨四點，聽者評論他對學生的攻擊，竟然超過李錫銘的請戰報告。

《人民日報》的一位副總編輯奉命到中海領取社論，回社後提出文字個別處作修改遭到拒絕。

該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二十五日下午和晚上已提前由電台、電視台播出，激起大學生連夜遊行示威。次日，北京居民中傳出這樣一個笑話：江青在秦城找典獄長大發脾氣，她說：「為什麼你們放出張春橋、姚文元，不放我？」回答：「他倆沒有放。」江青不信：「這篇社論只有他們倆寫得出，他們的文筆我認得！」

北京市委要求次日（二十七日）傳達到每一個市民。

二十七日早晨八點，北京高校學生舉行十六萬人環城大遊行，他們打出「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的大標語，以及憲法條文和鄧小平的語錄，受到一百餘萬市民的夾道歡迎。在市民聲援下，他們能衝破六道軍警封鎖線，第七道新華門防線，和第八道天安門防線，是市民推開軍警，幫助學生擠開通路，令學生隊伍在天安門前，守衛廣場的三十八軍官兵見到學生隊伍，即坐卡車從廣場撤離。遊行指揮部決定不進廣場，環城遊行之後浩浩蕩蕩返校。

二十八日，鄧小平在家人勸說下去了北戴河。據說留下的鄧辦人員批評政治局和北京市委「犯了欺君之罪」。要求立刻收回鄧的講話。得之較遲的各省市，只傳達到廳局級。

二十六日當天，北京、上海就召開黨員幹部大會，號召迅速行動，堅決制止動亂。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會上宣佈停止《世紀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並派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率工作組進駐該報整頓。

僅過一天，科委也作出發表「四·二二」紀實「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的《科技日報》總編輯林自新停職的決定。但是，二十八日下午，胡啓立就召見林自新和副總編輯孫長江，表示科委決定不算數，要照常工作。

面對學運李鵬說他是管經濟的

在李鵬向政治局打「請戰報告」的前一天，總書記趙紫陽已專列從北京啓程赴朝，因此沒有參加次日政治局的討論，也無緣去向鄧秉報受令。

鄧發話之後，政治局立刻分成兩套班子，由李鵬、姚依林主持日常工作，喬石、胡啓立、李鵬映分管制止學運和動亂，具體落實在教委主任李鵬映身上。李鵬映一個月內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對鄧大人所講的十年「最大的失誤」作了：「我們中央和國務院是實行集體領導。雖然我主持教育工作只一年，但是我願意說，在這個問題上我有責任。」

的回答，曾經引起中外記者和社會的強烈的議論。但是比較李鵬在國務院召開的部委會上連說三遍：「我認爲政府工作是我前任的責任」要負責任得多。但是即使有責任心，以李鵬映的魄力和魄力，要制止如此規模、如此聲勢的學潮，確實也是有心無力的。一位義勇黨方、最高等級的公主二十八日曾對人說：「昨天我們家吃肉丸子，我們說咱們要是去天安門，也會被學生剝成肉醬，正好做肉丸子。」

四月二十六日，在李鵬映受援之下，四常委開會討論，李說：明天學生要上街怎麼辦？胡：不能流血。喬：不能流血。姚沒講話。李說：反正我是管經濟的，如果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就是我們吃了安眠藥，也可以把我叫起來。

此時期確實忙壞了各位大員。《工人日報》登出一篇爲胡耀邦召魂，直逼大人的短文「重要是贏得民心」，一時飛街走巷。國家主席楊尚昆當天要總工會把該記者換掉，不換就停刊。一向順從聽話的倪志福竟然回答：「別整了，全總就這一份報。現在當領導的說話都沒威信，讓工作不聽，讓罷工就都聽了。」

袁木主動向李鵬請纓

「四·二二」追悼大會之後，李鵬曾要求新華社爲他發一條消息，說他因忙於公務，沒騰出時間來接見學生。已背「造謠社」黑名的新華社給他一個軟釘子：「這是北京的事，找《北京日報》吧。」

「李果真又去找《北京日報》，《北京日報》給了一個硬釘子：「我們不能登。」

「四·二七」之後，學生代表、新聞記者都紛紛要求對話，袁木主動向李鵬建議應接受對話，並

主動請纓。教委精心選擇了十六所高教四十五名學生，並於二十八日一早舉行預演。袁木在對話開始前，代表黨和國家領導同志講話，希望學生復課，特別轉告李鵬總理對「四·二六」社論的解釋。

對話會行將結束時，北京建工學院一學生拿着一本登有三幅趙紫陽打高爾夫球的彩色照片的雜誌，質問：「是不是趙紫陽總理一個星期携夫人打一次高爾夫球？」

一直表情豐富的袁木，此時作出一副有口難言的尷尬相，確是令人費解和難忘，把即將收場的一場不像樣的對話推向高潮。

總書記回京提出糾正社論

總書記趙紫陽四月廿九日結束在北韓訪問離開平壤返國。據知情人士透露，趙回到北京，他先找到李鵬，問李對學運打算怎麼辦？

自鄧的「四·二五」講話之後，李鵬有調子，有姿態，只是以管經濟爲名沒有動作。他以玩笑的方式回答：「現在學生們都在反你，抓「官倒」，要抓你兒子！」趙倒是認真回答：「可以調查」。

當時趙紫陽要到天安門去看看，但被中辦阻止。當時北京正流傳一個政治笑話：說是趙紫陽訪朝回府，被鄧召見。趙請示：學運怎麼辦？鄧答：殺人。趙問：殺多少？鄧伸出兩個手指頭。趙問：二百人？鄧搖頭。趙再問：「二千人？」鄧又搖頭。趙三問：「二萬人？」鄧曰：「不是。」趙問：「那是多少？」鄧說：「兩個，你的兒子和我的兒子。」

趙紫陽回京當天，即對兩個在外地工作的兒子表態，要接受審查。

北京同時也傳說康華總公司要解散。趙的秘書兼「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和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幾次找趙談話，要他在常委做工作，一定得出面平息學潮。趙出訪期間，他的秘書班子心焦如焚，曾找各方各面作過調查，探討解決學潮方法。

當時有一個人指責趙紫陽軟弱無能，這就是國家副主席、老將軍王震。他大吵：「共產黨就如此無能？連學生都治不了！我一個人帶兩個連就行了！」

五月三日，趙代表中央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上講話，原稿是由胡繩起草的，政治局通過。臨時讓趙加上「反資」內容，他即表示不同意，後來大會還按原稿講。

五月三日常委會上，趙紫陽提出兩個問題：一是認爲社論有問題，要糾正。但表決結果，趙以一比四敗北。二是交給中央一封信，信的內容大致是：「我當初不希望高幹子弟從政，所以讓兩個兒子

去了企業，結果企業吃虧了，建議中央派專人調查，如果有罪，依法懲處。」他要求此信能在黨內公佈，結果遭到李鵬反對，李說這樣會對黨內其他人形成壓力。

趙紫陽「五四」講話扭轉時局

五月四日上午十時，亞銀理事會二十二週年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趙紫陽沒有參加開幕式，只被安排禮節性地會見團長和高級官員。據說只安排十分鐘。但是當數億中國人當晚在電視機前，看到和聽到的是總書記滔滔不絕的演講。

北京大學校園裏，上千人圍在一起聽趙紫陽的廣播講話，講話播完，掌聲一片。

趙紫陽的講話提到貪污腐敗現象產生是因爲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和公平化不夠，透明度不夠的分析；趙紫陽還提出「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趙紫陽說：「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也會這樣。」

可以設想，如果趙紫陽的主張可以實施，天安門前學生們的激昂情緒可能緩和下來，並最終得到平息。但趙的這個講話被認爲是沒和任何人打招呼，是無組織、無紀律的作法，而且是首次把黨內的兩種不同意見公開暴露於人民面前。

傳說，趙紫陽的這個講話是鮑彤起草。自學運開始，被學生罵爲「胡說八道」的《人民日報》，以顯著版面生動而真實地連續報導趙紫陽講話引起積極反響，首都高校自「五四」起陸續復課。

五月四日下午，高校學生舉行大遊行，引起大學生和市民矚目的，是幾百名新聞工作者喊着一「不要讓我們造謠」的口號，加入學生隊伍遊行。

五月五日，李鵬提出制止學運以來的第一個具體行動：召集八所主要院校的黨委書記和校長開會，講：「趙紫陽同志的講話，只代表他個人意見，中央精神是小平同志的講話。」

同日何東昌召開教委司局長級緊急會議。何東昌說：趙紫陽同志在朝鮮就知道鄧的講話和社論，他是同意的。在「亞銀」的講話，他是在特定的環境，對特定的對象講的話，不能代表黨中央。

北京大學針對何氏講話，貼出一張大字報：「鄧小平和中央不一致」。

五月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預備會議，北京市提供七個文件，其中一個是關於要堅持「四·二六」社論精神的，逐條批駁了趙「五四」講話。

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召開，會期一天，出事的市、省長參加。當天長安街公安部門前出現「安定團結是建設四化的基本保證」的大

標語牌。

趙紫陽在會議上提出五點：一、否定「四·二六」社論；二、由他本人承擔發表社論的責任；三、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官銜行為的機構小組；四、公佈全國副部級以上幹部的行為背景；五、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擴大會議上只有萬里支持趙紫陽的意見，主張可將趙的五條意見在人大公開討論。遭到李鵬的反對，李說：「不能召開。」

十日下午，萬里只好召集委員會議，全體副委員長一致通過：①將有關清理整頓公司情況匯報；②聽取關於學生遊行和罷課問題的匯報；③審議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④聽取關於新聞法情況的匯報；⑤審議關於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時間的決定。列入下次全會議程，時間定為六月二十日。

十一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趙紫陽會見保加利亞客人的談話，內容是「政治體制改革要步子穩，中心是民主和法制建設」。

十二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下月召開人大常委會的消息。

十三日，萬里出訪加拿大、美國，《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人大常委八次會議議程深得人心。萬的努力反映雖好，但是還不能達到趙的五點的作用。

鄧小平說「我的話沒有錯」

五月十日，楊尚昆向鄧小平匯報了伊朗總統哈梅內伊要求會見鄧小平。還待在北戴河的鄧說：「你就告訴他，我的心情不好，讓他們猜去吧。」

可是這位伊朗總統堅持要見，見不到鄧就不走，而且也不準備見李鵬了。鄧小平只好從北戴河起程返京。十二日，報紙發表了鄧小平會見伊朗總統的消息，一句「和為貴」令人們從十一日晚看到電視新聞一直談論到第二天接到報紙。不過無論怎樣分析，報紙上透露鄧的這次講話也只能是國際關係問題。

至於對還在發展中的學運，鄧仍堅持「四·二六」社論，他說：「我的話沒有錯。」

趙紫陽公開了黨的機密

五月十三日，一千餘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只要求恢復兩個條件：否定「四·二六」社論，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要求和高級領導人對話。

同一天，趙紫陽同首都工人座談，表示黨和政府正抓緊研究解決學生和工人要求問題，希望公民不要做妨礙中蘇高級會晤的事。

當晚，閻明復邀請部份學生、教師座談，學生領袖王丹認為閻明復是一位好人。十四日凌晨兩點，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到廣場拿着喇叭勸學生回校，被學生用「噓」聲轟走。

當天上午，李鵬說首鋼工人要支持學生，心急火燎，立刻跑到首鋼和職工座談。

十三、十四日兩天，閻明復日以繼夜請來知名人士，請來「四·五」運動的一批老戰士與絕食學生談判；十四日晚七點，他含熱淚，宣佈勸阻學生的工作失敗。他對大家說：「如果你們一定要把黨中央分派，那你們的行動將很不利於改革派。紫陽同志的意圖將很難實施，今後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將很不利。」

十四日夜間，趙紫陽認為學生絕食無論如何不能再拖了，提出十五日清晨去看學生，車隊都已組織好了，但李鵬出來阻止說：「你如果去廣場看學生，你就是分裂黨中央。趙的車隊，只好在廣場繞了兩圈。」

十五日，絕食學生已舉倒數百，刺耳的救護車聲充斥著北京各條街道。長安街懸起彩旗，迎接蘇共領袖戈斯。成千上萬大學教授、講師、學者、記者、作家，打着知識界的大旗走上街頭，所懸的標語是「學生愛國，我愛學生」、「遊行之中，傳來十一名學生於午夜凌晨如再得不到政府回答，將自焚的消息。北京城人民的情緒快要點着了。」

晚間電視，雖然有楊尚昆將歡迎戈氏的儀式改為首都機場舉行的消息，同時也有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歡迎宴會。

可以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戈氏懷有好感，特別贊同他的「公開性」。十六日，更多的知識份子和民眾上街，公開表達對當局的情緒，以及對戈氏主張的讚揚。

十六日，鄧小平從西山趕來和戈氏會見，完成了歷史性的中蘇最高級會晤。

當天晚上，趙紫陽與戈氏進行總書記會見，趙對戈爾巴喬夫開門見山說：「七八年以來，鄧小平是國內外我們黨公認的領袖。」兩位改革派總書記如此直言不諱地談「公認的領袖」，確實令人吃驚，也令人不舒服。但是當趙向主權「公開化」的戈氏第一次公開了「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一項鄭重決定」：「在重大問題上仍然需要鄧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要問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人們不禁轉為佩服他的勇氣，趙向人民實行「公開化」，在中國這樣的政體之下，確實需要驚人的勇氣。

在趙與戈談話之後，鄧找來薄一波、李先念、楊尚昆、王震、彭真幾位老人，還通過電話找陳雲

討論對學生運動要不要在「四·二六」社論基礎上往後退，老人們一致認為不能退。他們說，退一步，學生就會進一步；退兩步，學生就會進兩步。他們最終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四項基本原則」。

李鵬指趙分裂黨中央

十六日，趙紫陽曾再次提出去廣場，保衛部門以不能保證安全為由而勸阻。

十七日，廣場絕食已達一百二十小時，送往醫院搶救的已達一千人，北京市民情鼎沸，遊行隊伍情緒更加激昂。

十七日常委會也討論社論基調不退，趙紫陽首先發言，他說：「不能因為一個人對這次學生運動定性，大家就不能改動。學生運動的主流是好的，是要推動改革和開放，打倒的是「官倒」。」

李鵬堅決反對趙紫陽的意見，他說：「黨這麼多年，成績是主要的，如果從「四·二六」社論上退下來，政府和黨就要蒙受重大損失。」

這次會上只有一個人騎牆，就是胡啓立。他談了兩種意見導致的結果，但是總的立場傾向趙紫陽。

會後，趙紫陽要求和鄧單獨談話。十七日深夜，鄧找五位常委和李先念、楊尚昆一起談話。

剛落座，李鵬就指着趙紫陽對鄧說：「他和戈的談話，就是把你推到第一線，要你承擔全部責任。」

這是分裂黨中央。」

趙紫陽又重申了下午常委會的意見，李鵬再反對。在鄧面前表決結果是五比二。趙和胡的意見被否決。

最後鄧表態：我贊成常委大多數同志的意見。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成績是主要的。

趙紫陽說：鄧小平同志，我不能和你的意見保持一致。下一步工作，我很難執行常委會決定。我身體不好，執行有困難……

鄧立刻對他進行批評：你知道少數服從多數是我們黨的原則，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趙沒有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提出去看看學生。

此時已是十八日凌晨，趙和幾個常委分頭去醫院看望正在被搶救的絕食學生。

十八日上午，常委會繼續開，研究如何實行軍管，軍隊進城。

趙紫陽提出辭職，理由是「我身體不好，無法執行常委會的決議，下一步工作我無法進行下去。」並交一封書面辭呈請楊尚昆轉鄧小平。楊尚昆當即反對。楊說：「大敵當前，要充分體現黨中央的團結一致，才能制止動亂，你的信我也不轉。」

李鵬說：「你現在在辭職，也是要分裂中央。」趙紫陽收回辭呈，提出去看學生。常委會要李鵬和趙一起去。

和學生見面時，李鵬聲色俱厲地對學生代表說：「黨和政府從來沒有說過你們學生搞動亂。但他對北大王丹單獨說：「我不想把造成不好後果的責任加給你和吾爾開希，但是客觀上已經造成這種後果了，現在全國形勢都很亂，這實際上比文化大革命還大的動亂。」還說新聞界沒起好作用。

鄧小平親赴武漢調兵遣將

十九日凌晨，趙紫陽單獨去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趙紫陽登上公共汽車，老淚縱橫，用同學的擴音喇叭發表談話。他懇切希望同學們健康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那一天。他說「你們不愛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學生被感動，決定自十九日晚九點起停止絕食，改為靜坐。

此日，鄧小平趕去武漢召開軍委擴大會議，說是組織「第二指揮中心」。

北京市當天下午召開處級以上幹部會議，再次提出按「四·二六」社論統一思想，並且提出以後講話要以李鵬講話為準。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出關於時



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正在絕食的學生。

局的六點聲明：其中有：「目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至於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這種黑暗前景是經歷過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

天安門廣場，每一個心向廣場的市民都感受到「烏雲壓城欲摧」的緊張而又壓抑的氣氛。六點鐘，市民發現了隆隆開入城內的軍車，看到荷槍實彈的機關槍、坦克、導彈部隊。人們用血肉之軀去阻擋，年邁的老婦輪到車輪下高喊：「你們不能去廣場，那裏都是孩子！」

十點鐘，傳來李鵬要鎮壓動亂的講話，接着楊尚昆宣佈軍隊要進駐北京城。

十二點鐘，電視觀察知道總書記趙紫陽沒有參加這個會。

戒嚴之中的總書記

十一點鐘，北京市長陳希同與喬石名地回到辦公室，對秘書說：「太好了，給我弄點酒，今天要睡個好覺，兩點鐘叫我，那時就到位了。」兩點鐘，秘書從各觀察點調來錄相帶，發現不對，各點找不到一個他們要等待的人，有的只是成千上萬的市民。他叫陳希同：「情況有些不對，你看吧。」

一陳希同一看，酒和睡意一起醒了。三點鐘，李鵬打電話來，把陳希同叫去。

第二天一早，電台、電視台開始向市民反覆廣播他們連夜草就的戒嚴令。中央台受眾喜愛的播音員有氣無力地把戒嚴令唸完，當晚就被換掉，但是他却收到大包大包的整潔來信。

戒嚴部隊指揮部由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彬、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和陳希同組成。

二十一日，李鵬親自主持，取消原來胡啓立任組長的中央宣傳工作領導小組，芮杏文也靠邊站，成立了以「戒嚴意識形態領導小組」，組長是王忍之，副組長是賈木，成員是何東昌、曾健徽、李志堅（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該小組駐進中南海中央警衛局的樓房。

十九日晚，軍隊高級幹部家屬都被招呼呼晚上不要上街。李鵬在紅牆之外的府邸再沒有亮過燈，據悉他全家搬到了毛澤東游泳池的三〇二樓，與楊尚昆、王震、姚依林住在一起，在中南海內設三道崗，任何人不得求見。

趙紫陽已被下嚴告知不要動作，一切聽中辦安排。趙被軟禁在自己家裏。

中央工作組已飛各省市、軍區，要求立即表態對李鵬決策的支持。

趙紫陽作了這樣的表態：「我就是不能鎮壓學生，不能做今天的罪人，哪怕我死，被打倒也不能。」

，只剩我一個人也要把這個意見堅持到底。

對經濟問題的責任，我早有思想準備，但沒有想到學生會絕食。發展成這樣，我仍然堅決反對鎮壓學生。」

對學運的定性還在升級

二十二日，李鵬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把北京學運連生和發展情況，首先在北京市，然後又在中央單位傳達。他暗示與論導向在趙的「五四」講話之後。

二十三日，北京市又單獨發一個文件，提出「反對鄧小平就是反對共產黨，要追查」。並對總書記趙紫陽進行多條指責。

鄧小平的殘疾人聯合會系統，在戒嚴之後，發了一封告全系統黨員的公開信，提出誰上街遊行就要受黨籍國法制裁。二十三日，該會將學運升級為「反革命動亂」。

鄧小平女婿賈平任總經理、楊尚昆女婿任副總經理的實力公司，對公司人員進行登記，要求交待是否上過街、遊過行。

二十三日，各省市第一書記都被分頭調到北京，連日來紛紛個別談話，人們原估計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但從各種跡象證明並沒有開會。

楊傳達軍委擴大會議精神

二十日之後是中央和軍區傳達北京市李鵬的報告。二十四日，軍隊高級以上傳達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精神，內容是楊尚昆兩個半小時的報告。二十五日已傳達到團級。但是另一版本，只縮為二十分鐘。二十六日楊的報告傳達到地方司局級。

楊的報告主要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趙紫陽在學運中所起的作用，這大概就是李鵬與新任三個外國大使所講的遊行示威、罷課、靜坐者都不明瞭的事實真相。主要內容如下：

△當趙紫陽同志在朝鮮時，曾將「四·二六」社論給他電傳去，他回電表示同意。回到北京之後三天，他又對社論提出否定。開常委會時他提出來，遭到四比一的否決。他在會上說：「這個工作我沒法做，不然我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陳雲知道後說：「不像話！」

△趙把黨內的矛盾暴露給他的親信，由他們傳到新開界，把新聞界的動靜都說出來了。

△趙與戈爾巴喬夫會見時，透露鄧小平是黨的掌舵人，這不是崇拜，也不是讚揚。

△在天安門廣場上，趙痛哭流涕講那番話，給學生簽字，是沒有經過中央同意的。

△《人民日報事件》，趙的秘書搞的假人民日報（指所謂號外）裏邊有趙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

出的五點。

△中央開會還沒開完，那邊廣場上就廣播了，是不是參與動亂，還在調查。

△趙紫陽有四個班子：中央政治體制改革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也就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遊行中打國旗的大牌子就是他們，估計他們是給遊行隊伍出謀劃策的。

△「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學生的遊行口號就變成「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更暴露了這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動亂。

△在總後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午就通知趙，李鵬作的報告本來應該趙來唸，總後部長趙南超在門口等了他半天也沒等着，急得給他打電話。大會主席喬石也給他打電話，結果他說：「我身體不好，我不參加了！」就這樣甩手不幹了！當然他也確實有病，心不齊。

△反自由化，他本來是同意的，過幾天又反對了。和胡耀邦的情況一樣，「清污」同意，後來又不同意了。

△經濟狀況混亂、失誤，「反自由化」不徹底，趙紫陽要負主要責任。

△他的兩個兒子都有問題，大兒子倒了兩千台彩电；二兒子在海南島用低價將洋浦港賣給日本人七十年。

第二部份，是對中央和軍委這一段工作的說明

△關於「四·二六」社論，我們徵求了很多老同志的意見，喬石、徐向前、彭真、鄧穎超、李先念，一致通過不能往後退，退了就垮台了。

△中央在這次制止動亂中有兩個聲音，用李先念的話說就是兩個司令部。

軍委開會有人說一個人說了算，其實我們開會洪學智、劉華清，還有秦基偉部長都參加了。

△老幹部要注意，情況不清，不要發表意見。七位老將軍就是來龍去脈不清楚，現在明瞭了，表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

△煽動動亂，報紙的錯誤導向很重要。電視廣播員播音不像話。

△戒嚴，我們辦得倉促一點，沒有給羣眾做思想解釋工作。部隊佈置也匆忙。但是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們也徵求了兩個老師、彭真、鄧穎超之後才決定的。

報紙上對老師意思有曲解。老師講的「不能發生流血事件」就沒有登。

戒嚴不能撤，不是針對學生的。

△中央領導要換人，跟大家打個招呼。

△現在各大軍區各大單位我們放心，軍以下不放心，要多做工作。

老手橋牌繼續玩下去

據說鄧小平五月二十三日左右從武漢回到北京，坐一輛舊伏爾加，換上地方牌子，還到西山指揮所去一趟。

當前北京局勢是戒嚴不進城、換人不開會，橋牌桌上形勢不斷有變，高手正在根據局勢的轉變出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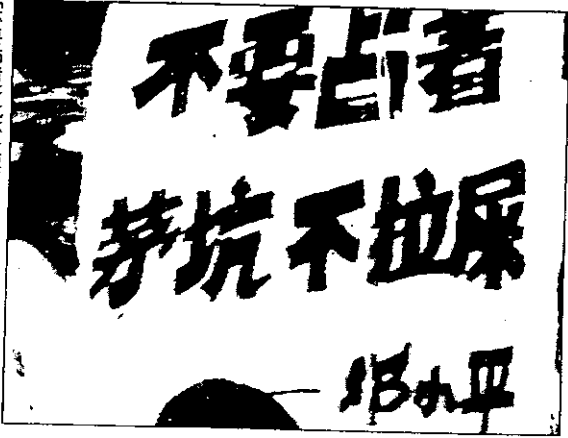
此次調動幾十萬軍隊圍困北京城，這樣大的規模是從來沒有過的。過去毛澤東時代，調一個排的兵都要他批准，此次自然完全是鄧的主張。花如此之大的力量來對付學生，對付趙系統的文官儒將，看來都大可不必。從北京軍區到最後才表態支持中央決定來看，或許反映了軍方對今次調兵遣將的微妙態度。

北京的局勢似乎越來越緊張。五月二十四日，楊尚昆在軍區以上幹部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兩個半小時的講話，如上所說歷數了趙紫陽分裂中央的錯誤。二十五、二十六日傳達到團級。二十六日，姚依林向各部傳達中央對趙紫陽事件的處理意見，要求不准記筆記。彭真召集黨外副委員長開會（開明復是隨從），稱趙紫陽幹了很多壞事，還有一個地下指揮系統。陳雲在中顧委常務會議上號召元老反對動亂。二十七日，李先念在政協主席會議上說目前的複雜局面是個別領導造成的。萬里在重慶下於上海發表書面談話支持制止動亂。李鵬、喬石、楊尚昆等二十二日在對黨副委員長的通氣會上的講話，包括姚依林的講話已被作為正式文件下達。與此同時，據說，三十八軍軍長已在北京三〇一醫院被捕；楊尚昆稱不執行命令就要以軍法論處。胡喬木、鄧力軍已被聘為中共意識形態領導小組的顧問。鮑彤、胡績偉、于光遠已被點名。教育部何東昌、北京市委和中央宣傳部上忍之等三個系統的倒趙調子唱得最高。有識之士認為種種跡象顯示在鄧李楊的倒趙鬥爭中，由於鄧順從了保守派，保守派趁機全線進攻，改革派有一個一個被撤換的危險，與趙系有牽連的人人心惶惶。如果局勢再這樣發展下去，鄧有可能在保守派的包圍下身不由己。不過，從長遠而觀，由於倒趙在中共黨政軍高層中的震撼比倒胡還大，在中下層許多人也都不理解，甚至抵制，民心、黨心不在保守派一邊，軍心也未必都在保守派一邊，因此，保守派要全面上台也非易事，而改革派因得人心，佔上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中共高層權力大攤牌

鄧小平是決策的大家長，趙紫陽、李鵬是執行的當家人。一年來李鵬已成老人的新寵。趙去北朝鮮，李鵬在背後揮一刀。趙回國處理學運有心無力，終釀成十八日的大攤牌。

齊辛



「不要佔茅坑不拉屎」

鄧小平

的學生，並含淚說出一番感人肺腑的話。趙紫陽，據傳已經辭職，儘管未獲批准，但從李、楊講話時他不在場，以及他對學生的態度與李鵬明顯不同的情形來看，他縱使沒有完全失去權力，至少也「靠邊站」了。這意味著中共處理學生運動的溫和路線受挫，而強硬路線抬頭。正如每一次自發的羣衆運動都要犧牲一個羣衆較為接受、擁護的人一樣，趙紫陽很像是七六年的鄧小平或八六年的胡耀邦，看來也會下台。

然而，與七六年及八六年不同的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幹部，都不再受騙了。李鵬的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講話，竟是學生、民衆更堅決地抗議的動員令，而且動員令及於海內外，「李鵬下台」的聲音從北京響至全國，響至全世界有中國留學生或華人的地方。

本文執筆時，李鵬仍是鄧小平支持下的第一號當家人。然而，依仗着一個年邁的獨夫的一意孤行，李鵬能撐多久呢？一個政府總理，若受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反對，就迫使執政黨作一選擇：要保住他，還是保住執政黨？趙紫陽雖被迫下台，但為了平息民憤，李鵬恐怕也要遲早被犧牲。又或許等鄧去世後再來一次「粉碎四人幫」。

趙紫陽下台，還是棄趙用李？

李鵬是在八七年十月，中共舉行十三大的時候，上升為政治局常委和代理總理的。當了幾個月代理總理之後，到八八年四月，七屆人大，就真除總理之職。在任代理總理及剛接任總理職務時，李鵬每談及他的工作，必然會提到趙紫陽總書記的領導。

但自去年夏都會談以後，李鵬的權力地位就大為加強。《九十年代》去年十月號，曾報導李鵬、喬石是老人們的新寵，相信是有根據的。

這以後，李鵬在公開談話中，已很少提及趙紫陽，更不會提到在趙的領導下了。今年四月十四日，李鵬在訪問日本時，回答記者說，

他同趙紫陽「合作得很好」，「我們經常就中國的重大問題個別地交換意見」，「當然不是說我們兩個人就完全一樣」，「我們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可能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些不同的看法」……這段話也許沒有說錯，但整個語調，與以前相比，就大有不同，顯示着至少李本人認為，兩人的權力地位已經相等。

胡耀邦去世後，中共當天沒有下半旗。舉行了高層領導舉出的追悼大會，卻沒有組成一個治喪委員會，而只是組成一個治喪辦公室，這相信是在誰列名治喪委員會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協議。至於趙紫陽在悼詞中，稱頌胡耀邦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卓越的領導人」，據說都使鄧小平及其他幾個超級老人不滿。李先念、薄一波等沒有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也顯示出元老對胡的一生，有不同的評價。

胡耀邦的追悼會是在四月廿二日舉行的。四月二十四日，趙紫陽出訪北朝鮮。二十二日之前，學運已極為澎湃，從當時的氣氛來說，中共政治局都應該及早開會來討論緊急的局勢了。然而，四月廿三日，趙紫陽仍在北朝鮮，卻沒有召開這樣的會議，而在李鵬送走了趙紫陽的當天，由李鵬主持政治局的討論。為什麼趙紫陽的出訪不能延期？即使中共需要趕在戈爾巴喬夫來訪前對金日成加以籠絡，趙紫陽的訪問也還可以押後幾天吧？而且，為什麼不能在四月二十三日開會？

答案無非是兩個因素，一是趙紫陽故意走開，由李鵬去抓這個燙手的山芋，然後他回國再來收拾殘局，這樣對他的權力地位更為有利。北京學生的順口溜已說出來了：「向李鵬請保重，我去朝鮮避下風」。另一個因素，則是鄧小平和其他超級老人，不信任由這個性格比較溫和的、反自由化不徹底的總書記去處理這次學潮，他們要一個更聽話、更能執行強硬路線的人去代替趙。於是，二十三日，很可能就是李鵬、楊尚昆去向鄧小平匯報學運的情況，

並誇大了運動中喊出反對共產黨、反對領導人的口號的部份。鄧小平藉口趙紫陽要出訪，就把處理學潮的事交給了李鵬、胡啓立、喬石負責。

鄧對學運定性、定策

二十四日的政治局會議，在李鵬主持下，將學運定性為「有預謀的動亂」，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嚴重政治鬥爭」，並決定嚴厲鎮壓。二十五日上午，李鵬、楊尚昆向鄧小平匯報，鄧表示這是一次「學生政治動亂」，其目的在於「把有希望的中國變成沒有希望的中國，使我們永遠沒有希望」，因此要嚴厲鎮壓。鄧並表示，在制止動亂時要注意避免流血，但完全不流血很難辦到，最終可能還是要抓一些人。他說，在處理事情時不要怕有人罵娘，不要怕國際輿論反應，四項基本原則很必要。鄧又強調，這次動亂有後台，有黑手。如果學生搞團結學生會，就強行宣布解散。

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及其後袁木同學生對話（二十九日），袁木的記者招待會（五月三日），李鵬與絕食學生的談話（五月十八日），李鵬在北京黨政軍大會上的講話（五月十九日），基本上均是按照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聽取匯報後的談話作統一口径。在中共當前的政治格局中，大家長對一件事定性、定調及作出了決策以後，當家人只能照着去做。即使是在事實面前碰破了頭，在大家長未改變主意之前，也只好硬着頭皮去辦。

把矛頭引向趙紫陽

不過，趙紫陽名義上仍是第一號人物，而且他原是最主要的當家人。相信在他出訪北朝鮮以前，他在對待學生運動方面，已與李鵬、楊尚昆等意見不同，而他和路線不被鄧小平接納。而在他出國期間，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他所選擇的「全國學聯與北京高校學生們」進行對話中，卻有一段非常明顯的對趙紫陽的攻擊。

一個被選去參加對話的學生說：「領導人要同甘共苦，每星期要打哥爾夫球，與同甘共苦的精神是否有很大的反差？」袁木回答說：「高爾夫球在我們國家還是很少的，但是出於從國際交往的需要打一

打不是不可以。是不是打得太多，這個實際情況我不太清楚，假如這位同學所說的是事實，我可以負責轉告給有關領導人。不過在這裏我亦順便傳達一個信息吧，中央及政府其實也知道羣衆有此反應。」

袁木的回答在邏輯上很奇怪。領導人如果把國務院管得很好，他工餘時間打球實在並不過份。一定要把這事扯上「國際交往的需要」，那麼如果出於「國際交往的需要」，是不是領導人也要打籃球、踢足球呢？

不過，這還不是要點。最重要的是袁木公然議論趙紫陽的高爾夫球「是不是打得太多」。而且當天參加座談對話的學生，是由當局選定的，電視三個小時直播，據在北京的人說，講到這件事時，學生拿出一本體育雜誌，封面正是趙紫陽戴着黑眼鏡在打高爾夫球，而且電視鏡頭停在這封面上幾秒鐘，並在其後兩天的摘要播放中，也作如此處理。

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是李鵬趁趙紫陽出國期間，利用這個對話的機會，向趙紫陽揮一刀，更想引導學生把矛頭指向趙紫陽了。

趙紫陽有心無力

四月三十日趙紫陽回國。他連續作了好幾次講話，在不違背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指示的前提下，盡量用緩和的語氣，想平息這次事件。其中五月四日在會見亞細亞理事會的成員代表團團長及高級官員時的講話，被一些學生與知識份子稱之為「紫陽宣言」。他基本上肯定學生的「合理要求」，對「有人利用」這一點不作強調。並指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他們爲民主自由，拼盡自己性命。

（本刊特約記者攝）

趙下台，還是李下台？

五月二十日凌晨電視台直播了李鵬和楊尚昆的講話，顯示了這兩個人對鄧小平的支持下，正執掌最高權力，並準備以強硬手段對待學生。而在一天前，曾到天安門看望正在絕食

在戒嚴令及封鎖新聞的情況下，對學生的鎮壓行動一觸即發。北京的局勢抓緊了中國大陸及海外華人的心，各地示威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波濤洶湧，香港更是爆發了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的大遊行。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北京傳來的消息卻不是使人愉快的。

本文執筆時，正值北京局勢最緊張的時刻：軍隊在城外被學生及民衆攔阻，天安門聚集着以十萬計的民衆，在紀念碑下，一層層地坐着約二十萬的大學生，天空盤旋着直升飛機，學生的廣播宣傳隊將在凌晨五時「鎮壓掉」二十萬學生，並已騰出監獄及準備在清晨「打掃」現場。

而學生的要求，「應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

在五月四日的和平示威結束後，加上「紫陽宣言」的發表，學生們大部份決定在五月五日復課了。事情看來已趨於平息。

然而，在與學生的對話問題上，卻一波三折。關鍵的問題在於當局是否接受與學生代表（事實上就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代表）直接對話並由電視直播，以及是否願意否定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及肯定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這兩點，與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指示大相抵觸。當局曾表示會在五月十一日以前就對話問題作答覆。然而，到五月十一日，趙紫陽仍然無法找到可以勸說鄧小平改變主意的途徑。於是，五月十二日，學生決定五月十三日起，到天安門絕食。起先，絕食的只有三百人，而他們也以為只要絕食兩天，在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事情就可以解決。但想不到事情繼續拖延，而參與絕食的人越來越多，同情學生的市民也越來越多，終釀至當局與民衆越來越對立的嚴峻局勢。

五月十七日凌晨，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肯定「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熱情是非常可貴的」，「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同時保證「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賬』」。

這可以說是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定調之下，對學生所作的最大妥協。但是，仍然不敢正面肯定這次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據了解，趙紫陽從學生開始絕食時起，即多次想到天安門親自和同學們談話，勸說他們停止絕食。但是，這涉及對這次學運的性質問題及是否承認學生自聯會這個被鄧小平稱為「非法組織」的問題。因此，在政治局常委中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他只能派閻明復前去。而閻明復與學生的對話，以及他在天安門廣場的談話，仍然是不能解決問題。而在戈爾巴喬夫訪華後，鄧小平又到武漢休養去了。因此，事情越弄越僵。五月十六日，趙紫陽在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透露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這個說法與其說是正面對鄧小平肯定，不如說是側面對當前局勢的僵持不下所作的解釋。

李持上方寶劍大攤牌

在戈爾巴喬夫訪問期間，中共強硬派被迫對天安門前的絕食行動採取容忍態度。五月十八日，戈爾巴喬夫一走，中共高層立即面臨一次就處理學運問題的大攤牌。

十八日下午，李鵬、楊尚昆已同鄧小平聯絡，並取得鄧的上方寶劍，因此到晚上，李鵬在與絕食團體代表談話時，一方面盡最後努力威懾學生停止絕食，另一方面則言辭凌厲，表現得信心十足。這次對話當然是不歡而散。

李鵬與學生絕食團體對話之後，就參加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委員加候補委員本有十八人，因萬里出國、胡耀邦去世，實得十六人。加上三位書記處書記，十九人。但這次會議卻有二十多人參加，其中包括國家副主席王震。

在政治局會議上，王震、楊尚昆、李鵬提出要讓軍隊進城，實行軍管。趙紫陽提出了幾點意見：一，他提出應承認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錯誤，而這錯誤由他本人負責；二，他反對調軍隊進城及實行軍管；三，他說，現在政府一直說政府目標與學生的要求是一致的，但這「一致」怎麼體現呢？現在學生批評得最多的是官僚，因此他願意首先把自己兩個兒子的兒子拿出來開刀，給大家審查，若真有違法情事，應依法懲處。

趙紫陽的意見共有十一人贊成，但在擴大的政治局會議上卻佔不了多數，不獲通過。於是趙紫陽提出辭職，田紀雲、鮑彤也表示要辭職。李鵬、姚依林認為應該根據他們的願望，同意他們辭職，但其他人不表示意見，於是得不到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楊尚昆、王震等元老壓陣下，通過了由李鵬負責處理這次學運的工作，由楊尚昆調解放軍進城，並決定李鵬在五月十九日晚上的講話。趙紫陽要求在開完會後，親自到天安門勸學生們放棄絕食，政治局不同意趙代表中央前去，只能以個人名義去看望學生。

政治局會議開到凌晨四時許，趙紫陽隨即到天安門，停留十分鐘，含著熱淚說了那一段自稱是「對不起同學們」的話。在場有人聽到他最後一句話是：「今天是大伙最後一次見面了。」但是，電台、電視台均沒有錄到這一句，而報上也沒有發表這一句。

趙紫陽必會復出

趙紫陽含淚去看望學生以後，學生於當天下午即表示要放棄絕食，改為靜坐。誰料幾個小時後，李鵬的殺氣騰騰的講話發表了，於是又再出現了人數更多的絕食抗議。宣佈戒嚴令後軍隊的開往北京，學生與民衆的以血肉築成長城的抗爭，使局勢持續緊張，每天都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趙紫陽暫時失去了權力。然而，軍隊仍被阻攔進城，戒嚴令成一紙空文。國內外聲援學



同學，你們沒錯。

生、反對軍管、抗議鎮壓之聲響徹雲霄。正在這時候，鄧小平回到北京。他一意孤行地支持李鵬、楊尚昆的強硬路線，三人分別以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名義，迫各軍區、各省市政府表態，一份誣趙紫陽為反黨、反革命的文件及牽連的名單亦已擬就，所謂趙紫陽反黨集團的成員包括田紀雲、鮑彤、杜潤生、國家體改所的陳一諮、王小強、李湘魯（在中信研究室工作，趙的前秘書）等人，而方勵之、嚴家其等知識份子也可能被捕。

北京的局勢極為嚴峻。如果鄧、李、楊的強硬路線得逞，中國肯定又再陷入黑暗之中。但由於李鵬已成過街老鼠，為了平息民憤，鄧小平恐怕遲早會把李撤換的。儘管如此，中國黨政軍的分裂以至引發內戰，都並非不可能。中國局勢的全面好轉，恐怕要待鄧小平下台或去世之後了。

九十年代 1989/5

中共的大分裂

北行放語之

羅冰



趙紫陽與李鵬曾經是「戰友」

在中共內部，黨政軍已處於大分裂狀態，裂縫也必將日益擴大。國務院司法部、公安部都出現標語，要求李鵬下台。而北京軍區大院也出現了「李鵬應該順從民意主動下台」的標語。解放軍三大總部離休老干部四、五百人成立了一個老干部聯盟，叫支持學生民主運動老干部聯盟。李楊集團調重兵入京，固然為了防止政敵的軍事政變，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出於方便他們攫奪黨政軍大權，即保衛他們的政變……

趙紫陽「五四」談話也是罪証

學運大爆發後，趙紫陽一直主張以溫和態度對待學生。這是鄧小平和李鵬之流十分不滿的。鄧曾當面批評趙紫陽「軟弱」。但是趙還是繼續「軟弱」下去。趙的「五四」談話，已被李鵬之流視為反黨罪証，那就是五月四日會見亞爾賓客人時的談話。趙肯定了學生行動的大方向，並主張「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是即興發言，沒有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李鵬、姚依林對此並不贊同，而且因為趙的講話受到學生歡迎，就指為利用學運達到其政治目的的一個做法。

「國內外、港台反革命勢力已勾結起來」

李鵬兇狠地發表「五·一九」講話之前，已暗中給趙紫陽等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他們，伙內部的口頭傳達中，說什麼「國內、港台、海外反革命勢力已經勾結起來」，「美國總統布什支持中國學生運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台灣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提出不僅在輿論上支持中國學生運動，還要在物質上支持」，「他們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中國不復辟資本主義」，「反革命勢力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甚至有人提出要把國民黨請出來，在中國成立兩院，台灣、大陸各一院。」

傳播趙紫陽「反革命密件」

在此之前，已經傳出趙紫陽身邊一位高級智囊團人士，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趙紫陽秘密指示工作人員起草的《政治改革總方案設想》，說這個「密件」寫的設想，其中有開放黨禁報禁、軍隊國家化、香港高度自治、海峽兩岸平等對話等內容，還規定在本世紀末之前，是討論和立法階段。顯然，這個被說成是出賣趙紫陽的人所提供的「密件」，已成為上述口頭傳達的一個根據。

在高幹中傳達趙紫陽「四大罪狀」

現在，李鵬還不敢把口頭傳達的範圍擴大到他們同伙的圈子之外。五月十二日下午，北京市委向局級以上幹部內部傳達的卻是另一內容，那就是所謂趙紫陽的「四大罪狀」：一、對北京學潮處理不當；二、在會見亞爾賓喬夫時洩露了黨內機密（指重大事情由鄧決定），嚴重違反黨紀；三、以鮑彤（趙的高參）為首的「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屬於反動組織；四、公佈趙紫陽的財產，以及其公子從事官倒的事實，說明趙是國內最大的貪污犯。不過，截至目前，這四條「罪狀」還未向黨外人士（以及黨內十三級以下幹部）公布，足見李鵬等尚有顧慮，理未必需。

趙紫陽重感冒還是被迫反省？

這時候，趙紫陽已失去踪影三天。社會上就流傳了趙紫陽在五月十九日被軟禁和被強迫反省的傳說。這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五月二十日下午，李鵬、楊尚昆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召開部級以上幹部及八級行政以上老幹部會議，會上傳達了三條指令。有的老幹部提出問題：「紫陽同志現在何處？何以在十九日晚間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沒有出現？」這時候，主持會議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組織部門官員，在交頭接耳之後，回答說：「趙紫陽現在生病，不能來。」正當眾人表示懷疑時，主持會議者又補充說：「此事不許外傳。」人們明明見到趙紫陽在十九日清晨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同學時，健康狀況良好，只是心情沉重而已。說他「生病」（其後有人說是重感冒），能讓人相信嗎？

軍委通電趙紫陽無調兵權

趙紫陽問題的最後解決，有待於中共的四中全會。相信全會在五月底、六月初舉行。據說主要議程之一就是處理趙紫陽問題。不過，趙紫陽似乎大勢已去了。他的親信和積極支持者都難免受迫害。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通電全軍，軍隊調動權只有鄧小平和楊尚昆。實際上這個通電把趙紫陽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的權利取消了。由此也可知趙的處境多麼不妙。

重重危機等待着李鵬

經過一段時間的最後較量，李鵬終於打敗了趙紫陽，和楊尚昆一起奪取了黨政軍大權。不過，他的路並不平坦。前面等待着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的，是重重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將加深。火山口是封不住的，而且，定有更大的爆發。而中共內部，黨政軍已處於大分裂狀態。裂縫也必將日益擴大。

百餘幹部上書 公安部出現反李標語

從中共在這次學運中暴露的內部分歧，就可以看到中共分裂的狀態，看到派別、同僚派和鷹派、強硬派的鬥爭。參加民主隊伍遊行示威的黨政軍機關幹部、宣傳部門工作人員，是殷實的同情派，他們有一個口號和學生的口號是相同的，就是「李鵬下台！」統戰部長閻明復對學生一直採取溫和態度，他和一百五十多名黨內幹部聯名寫信給黨中央，要求不要鎮壓學生，他們顯然也是同情派。國務院司法部、公安部都出現標語，要求李鵬下台。李鵬聞訊，十分惱火，又十分恐懼。

萬里也不同意兩個拳頭相碰

在政治局委員中，萬里的態度也是相當突出的。就在四月二十一日那次政治局會議上，萬里表示了他和鄧小平不一致的意見。他首先提出，「不能搞硬碰硬」。鄧聽力不好，問萬里：「你說什麼？我沒有聽清。」和鄧私交甚篤的委員長提高嗓門，用兩個拳頭比劃着說：「搞硬碰硬，效果恐怕不好。喬石在會上提議：『武裝警察和公安部門已經做好了防暴的準備，控制局勢是沒有問題的。』但當天，鄧小平還是親自簽署了要求中央警衛團（一八三四一部隊）全部開入京城，並進入戒備狀態的命令。害怕學生運動、民主運動是鄧小平的一個政治特徵，似乎已經成為他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中共革委會籌備組號召反李鵬

萬里從美國提前歸來，所以不能立即飛返北京，却在上海逗留，絕對不是健康問題，而是另有原因：目前激憤的學生和市民已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重要成員萬里身上，因此北京學生準備動員十萬人左右去機場歡迎萬里，並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這樣勢必使中共中央陷於被動。所以早在萬里回國之前，中共中央就電告萬里，取道上海返北京，避免加劇動盪的局勢。同時，鄧小平也對萬里作了指示，要求萬里首先在上海稍事休息。然後赴京參加政治局會議和四中全會。

李鵬抓住了倒趙時機

年來，中共的保守老人，由於反對趙紫陽的開放改革政策，不斷尋求機會和藉口，把趙從總書記的位子上拉下來。李鵬這個野心家想獲得更大的權力，就起勁地和老人黨配合，必欲除趙而後快。今年初，倒趙集團已經形成，李鵬充當了先鋒和打手角色，處處抓趙的辮子，進行反黨、反總書記的活動。四月學運興起之後，趙紫陽對學運的態度比較溫和，和李鵬、老人黨的強硬態度反差頗大，同鄧小平力主鎮壓的意見也完全相反，於是李鵬他們就利用這個時機，把趙紫陽打下台來。李鵬不愧為野心家兼陰謀家！

一方面是學運民運喚醒了國家的靈魂，一方面是李鵬政變惡化了民族的命運。歷史就是如此複雜，如此曲折！

自五月十九日午後，開始有兩個新的組織出現在北京，一個在天安門廣場，名曰「北京市自治聯合會」，另一個設在海淀区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稱「中國共產黨黨員團結革命委員會籌備組」。後者號召一切反對李鵬的中共黨員「團結起來，打倒黨內反民主的野心家」。

七路大軍圍京城的秘密

中共內部的分歧、矛盾、紛爭，在軍隊方面的表現更加突出。在李鵬「五一九」講話前，中共中央軍委就已決定調兵二十二個師（十餘萬至二十萬人）開進北京。兵分七路：一路來自北京軍區，除保定的三十八軍之外，還有二十四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六十五軍；一路來自南京軍區——十二軍；一路來自蘭州軍區——二十軍；一路來自濟南軍區——五十四軍；一路來自瀋陽軍區——三十九軍；一路來自廣州軍區——若干個師；一路是空軍——十五軍。

一些軍頭向鄧表示「想不通」

在李鵬的「五一九」講話和宣佈在京局部軍管之前，五月十六日，楊尚昆根據鄧小平關於準備全國軍管的指示，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會議在北京西郊舉行，軍委幾大要員、各總部首長，全部參加，幾大軍區的司令員也趕來赴會。會議專題討論和研究在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並決定加緊準備在京全面軍管。之後，會議就從各大軍區調兵入京問題擬出具體計劃。

二百多名高級軍官上書中央反鎮壓

據有關方面透露，在統戰部長閻明復等上書中央之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各兵軍種和北京軍區二百六十多名現役和離休軍政高幹，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呼籲中央冷靜、克制，千萬不能武裝鎮壓學生運動。二百六十多人中，三分之一是現役軍官，其中有兵團司令員、師長、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總政治部青年部長等高級幹部。這封聯名信已發給了楊尚昆。

總參謀長的不滿和後勤部抵制戒嚴令

目前軍隊內外，還出現一個令李楊集團端端不安的情況，就是許多退休離休老幹部，已紛紛組成聯盟。其中三大總部離休的老幹部大概有四、五百人，他們成立了一個老幹部聯盟，叫支持學生民主運動老幹部聯盟。這個聯盟已經被中央軍委正式取締了。

更加使李楊集團坐立不安的是遲遲出動這次調動軍隊很不滿意。因為他是總參謀長，調動部隊應事先知道，但這次調兵入京主要是楊尚昆決定的，總參謀長毫不知情，所以他認為等於被「架空」了。

陳毅舊部將領呼籲不要流血

有消息說，七名高級將領（中將以上）發表聲明，呼籲軍隊不打老百姓，並致電中央軍委，他們是前國防部長張愛萍（人稱「儒將」，擅詩畫）、蕭克（老紅軍）、陳再道（老紅軍）、宋時輪、楊得志（前總參謀長）、葉飛（前海軍司令員）、李聚奎，這些人中間有，一半是陳毅元帥麾下的功臣名將，屬於「三野」系統（鄧小平上台重用「三野」人員，壓制「二野」人員，以致軍內上層矛盾，積怨極深），在當前的三軍各兵種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徐向前元帥拍案而起：「誰敢傷害……」

有人說，在關鍵時刻徐向前元帥拍案而起怒稱：「誰敢傷害……」名學生，我親手拍斃他！這句話對奉命執行李鵬及陳希同命令的指戰員起了巨大的威懾作用。因此，五月二十二日清晨的官方廣播以及報上刊登的關於徐、兩老帥「關照」並勸說大學生回校復課的消息是難以令人相信的。有人說，如果事實的確如此，何不請兩位老帥用錄音講話或在電視屏幕上露面的方式，而採用難以證實的文字報道。北京市委控制的日報、晚報上對於天安門廣場「一直沒有停過水」的報道，就是，則典型的混淆視聽的虛假報道。徒然使抗議聲聲變為笑話。

李德生的暗中表態

有「東北王」之稱的李德生，曾傳說他情緒不穩，甚至說他失蹤。不過五月二十三日他出現在北京國防大學，對該校師生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們震驚了一場！」

調兵入京主因是防止兵變

知情者告我，鄧李楊集團防止兵變是有跡象可尋的。

跡象之一：軍隊來自四面八方，是提防軍中串聯活動。如果僅僅調動一個軍區部隊，萬一連這支部隊和準備兵變的部隊攜手舉事，豈非更加壞事？如果按目前的部署行事，就可以起多方監視、監督、平衡的作用。

矛頭指向秦基偉

防止兵變的矛頭似乎是指向北京軍區。

防止兵變亦即保護李楊政變

李楊集團調重兵入京，固然為了防止政敵的軍事政變，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出於方便他們獨攬黨政軍大權，即保護他們的政變。因此，李楊集團的政變可說是軍事政變或半軍事政變。

李鵬你動，看你橫行到幾時？

李鵬你動，看你橫行到幾時？

中共高層改組內情

□ 弓 文

趙紫陽為什麼會被革除一切職務，趙在什麼問題上激怒了鄧小平？會否被繼續清算？
胡啓立、芮杏文被免職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鄧為什麼會選江澤民出任總書記？

引起舉世震驚的中國大陸「學潮」——動亂——事件，導致了中共核心決策層的改組。可以肯定，就整個事件的發展進程來看，海內外的政治評論界至少在三個方面是未曾預料到的。

一是在「五·四」七十週年之際發生的風潮，會波及士、農、工、商各界，而且在北京、香港等地相繼出現百萬人大遊行；

二是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

三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會選出江澤民取代趙紫陽出任總書記。如果說兩年前趙紫陽接替胡耀邦是順理成章之事，那麼今次江澤民晉升，確屬異乎尋常之舉。

然而，只要平心靜氣地觀察那些深刻而又複雜的背景及由來，各種問題皆可冰釋。

高層多次地討論「退不退」

鄧小平宣稱，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國內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而且早來要比遲來好。

所謂「國際大氣候」乃是指東歐國家的改革浪潮中，帶有明顯的西方民主化傾向。鄧小平稱，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受到挑戰。而中國大陸內部，從學術探討到社會輿論，都有民主改革的要求，少數人則想建立那種西方式的民主。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認為四、五月間爆發的學潮，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也最為嚴重的一次學潮，兩次衝擊新華門，多次佔領天安門廣場，這種情況就是「文革」十年內亂時期也沒有過。上千人連續多天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這也是建國以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由絕食而引起的連續大規模遊行，甚至超過了「文革」紅衛兵大串聯的時代，使無政府主義重新泛濫。國家的一些法制遭到破壞，造成了劇烈的社會震盪。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介入。

中共高層曾就學潮中某些人激烈反對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進行多次商討。李錫銘認為，社論「被相當



趙紫陽失敗，李鵬得勝？

當局指策劃者為三種人

儘管按中央軍委的決定，於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開始實施戒嚴，但各路入城的軍隊受到了學生及市民的堵截。此際，衝突已是無可避免的了。但發展成六月四日的暴力流血事件，則是完全出乎人們意料的。中共稱「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主要是三種人：

「極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

這裏面包括的人物主要指方勵之、嚴家其、包遵信，以及在北京動亂時建立的學生、工人、市民、知識份子的非法組織頭頭和從中南海向外界泄露機密的人。

六月上旬《中國教育報》發表署名夢醒的文章，抨擊嚴家其、包遵信「公然煽動推翻合法政府」，並指出五月廿六日他們兩人在香港發表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一文，是「反革命與理論準備中的一篇綱領性文章」。已經被拘留的劉曉波，則屬於與《中國民聯》有勾結，從國外趕回煽動反共活動的人。

中共高層認為，此次「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其意義在於捍衛「社會主義共和國和黨的領導」。目前，逮捕「暴亂策劃者」與「製造暴行的社會渣滓」的行動尚未結束。

趙紫陽一直是堅持「退」的

從五月份起，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可以說已明顯呈現出危機。經過了一個月的演變，他終致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以「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大罪狀被革除黨內所有職務。

他在四月下旬，訪問朝鮮回國後，開始對「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表示不同看法，並提出「退」的主張。當他的主張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被否決後，儘管表示在組織上服從，但他在公開的談話中，仍堅持自己的看法。

在紀念「五·四」七十週年大會上，他代表中

共作了長篇發言。這篇發言原擬由中國社科院院長起草，後來他又改讓鮑彤執筆。中共高層在討論此稿時，李鵬和楊尚昆多次要他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均遭到他的拒絕。他在講話中肯定學潮為愛國運動，並許諾將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加快民主改革步伐。對於他在訪問朝鮮期間發電表示「完全同意」的「四·二六」社論所涉及的動亂問題，則隻字未提。事實上，此種態度他，一直堅持到喪失總書記職務的時候都沒有改變。

嗣後，趙紫陽在接見亞銀理事會成員時又發表了著名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講話。並再次對學生的行動表示理解，甚至表示堅信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本來，北京一些高校學生提出掀起反對三人（鄧、趙、李）的浪潮，以悼念胡耀邦。至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學生們舉行示威遊行後，已在天安門廣場宣佈復課。同時串聯各高校學生致書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具體對話要求。但是，據說有關中共決策核心出現意見分歧的傳聞相繼為學生們得知後，他們對對話的條件和要求均強硬起來，直至組織大規模的集體絕食活動。針對三人的口號亦改成集中針對鄧與李。

北京報紙影射趙泄機密

北京報紙近日發表的一篇《關於這場動亂的十個為什麼？》的評論文章，其中有幾個問題頗引人注意。「四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二十五日鄧小平同志講話，一直到五月二十日首都戒嚴、戒嚴部隊的番號、進軍路線都被非法的學生組織事先知道了，並在十九日就加以阻擋。但十九日以後泄露核心機密的這種情況為甚麼又突然不見了？」「為甚麼以『三所一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名義出現的人特別活躍。他們與北京好幾個大學的非法組織有聯繫，而且直接到天安門廣場去出謀劃策。這到底說明了什麼？」該文明確認為有人透露中央核心機密。如果是趙紫陽本人的話，那麼中共對其錯誤的定性還會升級。但也不排除另有其人參與此事。

據說，原中共中央政改研究室主任鮑彤還兼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秘書，他與「三所一會」的人有著多方面的聯繫。「十三大」以前，趙紫陽主持研

討「政改」方案，鮑彤和嚴家其是該智囊小組的正、副組長。這也是高層機密很快傳到社會上的重要原因。

據當政的權威人士稱，趙紫陽在五月十七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就鄧小平在中央的領袖地位和決策作用反復進行強調和介紹，用意在於將鄧推向前台承擔各項責任，實際上也是他分裂黨的表现。其

更深的用意在於利用學潮，逼鄧小平「認錯」並完全隱退。

當政治局常委與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一千元老們決定對動亂採取「斷然措施」時，趙紫陽曾寫信請楊尚昆代轉鄧小平，要求辭職，但為楊所批評而作罷。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與李鵬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時，實際上已流露出了去職打算，是以當晚在解放軍總後勤部舉行黨、政、軍領導幹部會議時，他遂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到會，中共高層的分歧與鬥爭，亦因之表面化。

胡啓立、芮杏文免職原因

從五月五日北京各高校趨向復課及爾後風潮再起，直至北京部份地區戒嚴，北京新聞媒介除李鵬表揚的《解放軍報》、《北京日報》、「北京電視台」、「中央電台」外，大多數發生「失控」現象，使輿論「導向」產生為風潮火上加油的作用。

據瞭解，趙紫陽曾對胡啓立說，看來新聞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擴大一點「新聞自由」風險不大。結果本來胡啓立兩週要召集一次的新聞單位負責人碰頭會，無聲無息地取消了。這也是胡啓立、芮杏文之所以被免除書記處書記職務的主要原因。

當局將繼續揭趙的問題

目前，中共還在對趙紫陽的錯誤繼續進行審查，其中顯然包括要進一步追查他與學潮和動亂的關係。另外，社會腐敗風氣「不可避免」的論點，要把政府、企業中黨員的風氣問題與黨風分開；要把政府、大企業和大中企業的「黨風問題淡化」等，均與趙紫陽有關。

至於趙在黨務工作上的失誤，消極對待「反自由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估計亦將有進一步的揭露與批判。

江澤民不能把握全局

今次，江澤民由政治局委員直接出任總書記職務，從客觀上看，自有其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就挽回民心來說，江澤民是合適的人選。他在處理上海動亂時亦有獨自的做法。不過，他首次主持中央的工作，能否把握全局，尚待觀察。人們希望中共新的領導核心，在改革開放、整治腐敗等方面作出成績，從而推動各項工作穩步前進。

新報月刊 1989/7

劉延東叛變 宋德福失勢 團中央挨整

本刊特約記者 賀少明

陳雲、李鵬保守勢力集團，決意把所謂「反革命暴亂」清查到底。

以第七工業部一名副部長帶隊的工作組，進入共青團中央之後，團中央上下一片哀聲。中央認為，這次「反革命暴亂」，團中央有重大政治責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實際上已被停止工作。團中央書記處領導成員中，只有劉延東參加中央工作組工作。團中央內部還正在開展一場「背靠背」的揭發趙紫陽的反黨罪行的活動。

宋德福過去是總政青年部部長，他既不是高幹子弟，也沒有重大社會背景。他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之後，緊跟趙紫陽，據團中央揭發出的材料表明，僅從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一年中，趙紫陽頻繁聽取團中央書記處的匯報，有案可查的高達二十七次。

宋德福早在今年三月底，曾代表團中央向黨中央報告，要求在團內出版發行趙紫陽總書記關於團的建設的重要講話、指示匯編。宋德福一面向黨中央提交了報告，一面私下先請示趙紫陽。趙批示「同意」，宋德福在三月底召開的一次團中央書記會上，聲稱出版發行趙紫陽講話、指示匯編，是一團的建設的一項重大政治工程。在四月中旬，北京天安門廣場政治局勢動蕩的情況下，宋德福仍然強調加快出版趙的講話。

據劉延東揭發的材料說，趙紫陽在去年十一月下旬曾當面向宋德福、劉延東等人封官許願，趙在四月中旬去朝鮮訪問前夕，還專門擠時間，私自接見了北京軍區三名主要負責人，然後又召見了宋德福，要宋「不要怕，天塌下來！」趙見了宋德福，要宋「不要怕，天塌下來！」趙紫陽還反問宋德福：你說，形勢是好，是壞？趙紫陽說：學生們要求民主，不是壞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青年時代也是從要求民主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趙紫陽還說：「越怕越壞事！」現在，趙紫陽的這些所謂指示都成了重要罪行。

中共中央已決定改組團中央，宋德福兩次在

實際被停職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



團中央書記會上痛哭流涕，並一再表示自己的立場：我是共產黨員，我認為趙紫陽同志有錯誤，我自己也完全擁護中央的決議，但是我不贊成全盤否定趙紫陽同志，全盤否定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不利於黨的事業。

到目前為止，中國青年報還沒有大動，原因是等團中央改組之後，才能解決中國青年報的問題。被新聞界稱之為中國青年報五虎大將的賀延光（攝影部主任）、李大同（編輯部主任）、郭家寬（記者部主任）、楊浪（星期六文藝版主任）、麥天舒（總編室副主任），處境非常艱難。五虎大將已作好了坐牢的思想準備。

賀延光曾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聞名全國的「四五英雄」。他在接受中央調查組的審問時，自嘲地說，一九七六年反對四人幫時，我是英雄，今天我是「狗熊」，你們讓寫檢查，我已經準備了五份，不讓我當記者，我馬上交出記者証；判我坐牢，我立刻進去；行了吧？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時我喊過一句話：民主萬歲！今天我還是這句話：民主萬歲！

新報月刊 1989/9

批趙公開升溫 反資成爲主調

北京政局走勢一瞥

張沐

中共決定着重批判趙紫陽支持「自由化」和支持「動亂」兩方面的問題，具體「罪狀」國慶前列出。

當局指趙紫陽使「思想上自由化、政治上多元化、經濟上私有化」的主張泛濫成災。

江澤民說，鄧小平從八〇年起年年講反自由化，但趙紫陽不聽。

趙紫陽的《我的發言》，與胡、芮的檢討不同，趙拒絕認錯。

中共決定取締黃書和黑書（自由化份子的著作），整頓新聞、文教，重新發揮政工幹部的作用，重提以「延安講話」爲文藝指針。

趙紫陽下台已一個多月，取而代之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已先後在各種會議上就統戰、教育、組織、宣傳等問題發表政見。而他根據「一國兩制」原則發表的對香港關係的「井水河水」論，頗引起傳播媒介的關注與評論。

北京市繼續「平亂」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方面仍集中主要精力從事「清查」和思想整頓工作，另一方面原先已成爲制度化的政治局例會，在最近時期也已恢復召開。最近江澤民曾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瞭解師生心態，復又趕到武漢觀察長江防汛事宜等。看來，隨著中央黨政機關的思想、組織整頓以及相應的人事調整漸次完成，今後工作的具體方針目標，會通過政治局等高層決策加以明確的界定。不過，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新近又公開宣稱，下半年的工作重點，仍是「深入清查反革命暴亂」，以保證不留後患。

民衆至今怪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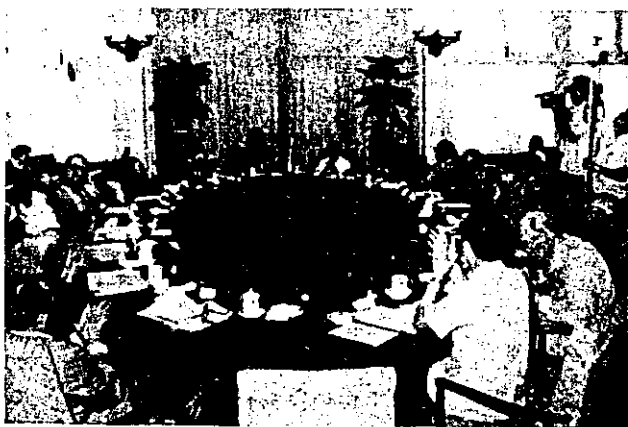
目前，在大陸民衆中，尚存有「軍隊不進城就不會出現暴亂」、「政府對學生作些退讓，也許不會導致後來的嚴重局面」一類說法。

中共認爲這些都是糊塗認識，因而一方面通過電視台播出自胡耀邦去世以來的學潮直至「六四」事件經過的電視紀錄片集《血與火的考驗》，另一方面加緊對趙紫陽的審查，以及對他所羅致的一些「智囊團」人士等「幕後策劃」動亂者的清查，漸次公佈內情，以正視聽。

雙管齊下批紫陽

中共當局認爲，早在一九七九年，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已在大陸興起。北京的「西單民主牆」，上海的「民主座談會」，乃至中共在北京召開「理論務虛座談會」時，就有人提出了否定社會主義的「自由化」主張。「六四」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嚴家其與吾爾開希在巴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則稱一九七九年春魏京生等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是大陸民主思潮的「先聲」。這兩個人現在成了公安部名列榜首的通緝要犯。

與「清污」、「反自由化」不同的是，這次波及全國許多城市的大規模「動亂」，既有方勵之及其他文化科技界名人上書中共高層要求「特赦」釋放政治犯的簽名信，又有趙紫陽的智囊團人士及一批理論「精英」提出「政治



趙紫陽（左下角）和胡啓立（右下角）出席六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此照片傳爲楊尚昆兒子楊紹明所拍。

猛烈，可以說連向以領導學運、工運、農運起家的中共當局亦感到棘手，乃至最後動用軍隊強行戒嚴。

爲了解決「思想單純」與「善良的人們」的認識，糾正前一段大陸傳媒「錯誤的輿論導向」，中共在運用各種手段開展思想教育的同时，決定公開批判趙紫陽的各種錯誤。預計到國慶四十周年前會列述其更具體的「罪狀」並形成批判高潮。據權威人士透露，將着重批判他支持「自由化」和支持「動亂」兩方面的問題。至於他在中共「十三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仍如鄧小平所說的，一字不動。

趙使「三化」成災害

批判趙紫陽支持「自由化」的文章，最近已開始見諸報端。有人公開抨擊他是一「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保護傘」。

在胡耀邦下台後不久，趙紫陽宣稱經濟改革中理論與實踐的各種探索，不能作爲「自由化」來反，是以有人發出了「只反說自由化的，不反幹自由化的」的慨嘆。著名的「馬丁事件」便是其中一例。南京大學一講師在文章中提出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已過時，應引進西方的現代經濟理論，受到美國「中報」的抨擊，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書記處書記鄧力羣將有關情況呈報趙紫陽、胡耀邦，要求批評「馬丁」，但爲趙、胡所制止。

這也正是與趙紫陽後來提出的「理論無禁區，宣傳有紀律」主張相一致的。中共高層認爲在趙的這一政治主張下，他所羅致的「智囊團」理論精英，通過各種政經改革理論研討，乃至發表各種探索性政見理論，藉口「無禁區」而大量散播西方思想，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及中共的領導等等，以致大學的教學無所適從，是非莫辨，學生思想混亂。從而使「思想上自由化、政治上多元化、經濟上私有化」的主張成爲時髦理論而泛濫成災。

日前，原國家計委副主任、現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袁寶華宣稱，在中共「十三大」會議期間，趙紫陽召開一次企業改革座談會，其「智囊團」中有「幾個搞體制改革的人，竟然提出中國爲何不可以試驗一下私有制。」更有甚者，有的人「還在有的高校中舉行了各種報告會，肆無忌憚地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而這些，都被指爲與趙紫陽的姑息縱容有關。

鄧年年反自由化

自從曲嘯、李燕傑等人在蛇口作思想教育報告受到青年聽眾的喝聲起哄後，「蛇口風波」引起了廣泛的爭論。趙紫陽主張要「改造」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新晉陞為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稱趙開口不談思想政治工作第一位是要不要的問題，實際上是肯定黨的優良傳統，取消政治思想工作。江澤民最近在《必須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講話中談到，「鄧小平同志從一九八〇年到現在幾乎年年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由於趙紫陽同志的責任，沒有得到很好貫徹，甚至還沿着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向滑下去。」

「二少」不是自由化

顯而易見，中共當局對趙紫陽的思想批判將有所升級。但是有關文化學術的「雙百」方針仍表示要繼續堅持。最近有人指責趙紫陽談到的對文藝作品要「少介入、少干預」的說話，有關權威人士認為此原則是中央集體討論確定的，不能與「自由化」等同看待。

趙紫陽《我的發言》

至於批判趙紫陽支持動亂的錯誤，據悉除了在於配合對全黨的思想組織整頓外，也是在於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時，趙紫陽仍然拒絕認錯。

外間很少有人注意一幅由楊尚昆之子楊紹明拍攝的照片，那是鄧小平在四中全會前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照片。坐在橢圓形中心會議桌鄧小平對面的，便是趙紫陽和胡啓立，儘管他倆在畫面上只有兩個後影。這是新聞傳媒對趙紫陽迄今為止的最後一次報導，而且是帶有半遮掩式的。

據權威人士稱，趙紫陽沒有參加四中全會的開幕、閉幕式，但曾參加小組討論會。他有一份書面的《我的發言》，與胡啓立及芮杏文的書面檢討有著明顯不同。他聲稱自己只想緩解矛盾，疏導學潮，並沒有支持動亂；同時聲稱在黨內發表不同意見，並非分裂黨的行為云云。正因為他沒有進行自我檢討，原擬保留他的中央委員職務亦一併撤銷。成為自華國鋒以來，中共最高領導人撤職最徹底、清算最嚴厲的人。

隨着今後對他的批判及各種內情的披露，其黨籍究竟能否保住，決定權掌握在喬石主持的中紀委手中，但最後「拍板」還須鄧小平。

取締黑、黃、文、教

中共認為，改變意識形態領域「放任自流」的現象，已成為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李瑞環在七月二十日各省市區宣傳部長會議上說，「這些年，趙紫陽同志實際上是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對待我們黨，致使黨的整個工作被嚴重地削弱了。黨的宣傳工作出現了危機，許多地方隊伍散了，陣地丟了，思想亂了。」他提出一個長遠的目標，就是「必須建設一支包括理論、新聞、文藝、出版和各級政工幹部在內的宏大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隊伍。」據悉，過往的國家機關、各重要部門取消政治部後，政工、黨務幹部大量裁員改行的現象將加以糾正，重新建立政工隊伍，並相應評定專業職稱。各級幹部的理論學習與輪訓，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系統的黨校學習，將進一步制度化，並作為任用、提拔的考核標準之一。

政工幹部又吃香

據稱，當前「有些人立場發生動搖，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成了動亂和暴亂的幕後策劃者、組織者。」因此，首先要下力量做好整頓工作。一是組織人力寫出一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文、書籍和教材書；二是明確企業黨組織的地位和作用，在實行廠長負責制的條件下發揮保證監督作用，穩定充實基層政工幹部隊伍；據稱每百名職工可配備一名專職政工幹部；三是徹底掃除反動的、黃色的出版物和音像製品。

七月中旬，國家新聞出版署接連發出兩項「緊急通知」，要求全面清查整頓並一律收繳有關「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和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刊；淫穢色情出版物；宣傳封建迷信、兇殺暴力的出版物，以及低級庸俗有害青少年的出版物。」同時，清查營業錄影廳、音像製品銷售部門、舞廳、音樂茶座等，取締色情錄影、低級庸俗的表演與賭博、迷信活動。

重提延安文藝座

中共高層再度提出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針。有人對嚴肅藝術沒有市

場、電台、電視台舉行的音樂比賽八成以上都是通俗歌曲提出批評，認為某些「莫名其妙」的音樂、美術作品令人費解，甚至在青少年跳舞中，也充斥着表現性意識的動作。「致使社會文化生活難以健康發展。最近，大陸電視上增加了不少古代傳統戲劇及革命歌曲、舞蹈、影視片，有人認為青年人對這一類藝術不會發生多大興趣，這樣做可能加深新老兩代人的「代溝」。

學校施「國情」教育

有鑒於此，中共高層人士稱，「現在一些年青人，別說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有的人連起碼的自尊心、愛國之心都沒有了。這個情況應當引起各級黨政領導和教育部門的深刻反思，採取得力措施，加強德育。」今後，學校裏將加強「國情」與道德規範教育，尤其將改變單純選拔有專長的畢業生直接進入學術科研機關、黨政領導部門的做法，而是要首先考察其政治信仰和思想品質，並讓新畢業的大學生，都先到基層單位接受鍛煉。

禁出自由化書刊

有消息稱，整頓書刊出版物將會有大刀闊斧的措施，這也符合李瑞環治理天津所採取的施政風格。城鎮街頭的書攤有相當部份要被取締，全國現有三千多家出版社肯定會削減，《經濟學周刊》、《新觀察》等一批報刊以及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已被吊銷出版號。

除了黃色書刊外，被稱為「黑色作品」的便是屬於被中共通緝的知識界中「幕後策劃動亂」者的作品。其中包括方勵之、嚴家其、包遵信、萬潤南、陳子明、戴晴等十來人的著作。同時，新聞界的整頓亦漸次推開，李瑞環強調要「端正新聞宣傳的政治方向」，同時，要解決好「黨性」與「人民性」相一致的問題。

三代領袖看政績

鄧小平起用江澤民接掌中共總書記時，曾談到中共建政以來迄今共有三代領導人。第一代是毛、劉、周、朱，「八大」後加上他自己和陳雲，後來又有一個林彪，毛澤東是領袖。第二代便是鄧小平自己，其間雖有華國鋒，但沒有甚麼政績，只有兩個「凡是」。而現在的第三代，便是江澤民。鄧要求其他政治局常委擁護、支持江澤民的工作。並希望大家要服氣

像他自己一樣，不搞宗派、小團體。

應該說，在鄧心目中，平息這次遍及中國大陸各地的「學潮——動亂——暴亂」，江澤民決非功勞最大者。但他却耐人尋味地躍升到最高位。

筆者以為其原因，一、他不會受到大規模民衆遊行斥以「打倒」、「下台」一類口號，從而仍擁有比較「完整」的改革開放形象；二是在處理上海學潮時，畢竟沒有動用武器、軍隊，因而比較易於為黨內外人士所接受；三是他最屬意《世界經濟導報》的做法，又在中共高層中，明確表現出堅定「反資」的立場；四是他個人既是大學生，又會說多種外語，又曾到蘇聯學習過。儘管他缺乏在中央統轄工作的經驗，但畢竟能夠保持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方向。

局勢何時會明朗

鄧小平宣稱，對於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把中國政局發展變化的「寶」押在他一個人的生命上，他認為的確很危險，因而提出一旦大局底定，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決策中心完全正常運轉後，自己要徹底隱退。

筆者以為，只要北京的市區仍然實行戒嚴，便表明首都的社會生活秩序，尚未完全恢復正常，而作為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也不會卸任。

也許，到「十一」國慶節或明春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時，局勢會比較明朗些。

原來擺在北京長城飯店報架上的外國報刊已被收走。



今年內五中全會定新策

鄧小平正謀交接班體制

中共將於「十一」後召開五中全會，就目前時局、經濟、黨建等問題作出新決策。

鄧小平今夏仍往北戴河休養，白天游泳，晚間讀書、看報、聊天，有意避開決策中樞，放手讓江澤民主持工作。

鄧小平的唯一一重重心事是穩定、完善江澤民的接班體制，但馬上將軍權交給江的可能性極小。

批趙繼續升級，已突破四中全會對趙的定性，暗示將重新評趙。

清查重點在黨內，不許「走過場」，黨員要寫「反思」材料，司局以上幹部要對「平暴」書面表態。

反「自由化」在深入，思想理論界批八大觀點，經濟領域內斥十大表現。

自中共建政以來，今年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文教乃至社會生活諸方面，都爆出了舉世矚目的事變。

亟待全面治理整頓的需求，投資、通貨三個膨脹，生產過速、物價居高不下……由北京而波及全國許多城市的學潮、動亂直至「六四」流血事件。相繼在拉薩、北京的武裝戒嚴。人口危機、文盲問題、犯罪增多，交通及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加以接連發生的自然災害，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大陸蛇年坎坷多。

然而，目下包括鄧小平一千中元老在內的黨內決策層，至為關注的是波蘭政治局勢的變化對社會主義國家所產生的「衝擊波」。中共高層人士認為，正是由於波蘭共產黨的步步退讓，才會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局面。作為中國大陸無可取代的最強勁的政治力量，中共認為決不能允許反對黨出現，更毋言由「團結工會」這樣的「自由化」組織的成員出面組閣。是以李鵬迄今還沒有公開發表向出掌波蘭的總理馬佐維茨基的賀電。

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高層，有鑒於波共的

上述「教訓」，更加深了對國內「自由化」思潮嚴重性的分析，除了在報刊上展開凌厲的批判「攻勢」外，還着手全面清查黨內外自「動亂」以來種種違反「四個堅持」的言行，開以肅清「捲土重來」的思想基礎。

清查不許「走過場」

在北京，許多部門、單位都有上級黨組織派駐的工作組或聯絡組。其中國家機關、高等院校、文化藝術、新聞宣傳、理論學術等單位的清查尤為嚴格。一些支持學潮、鼓動擴大事態的領導班子，已告相繼改組。共青團國家機關工委曾號召所屬國務院各部、委、辦、局的團組織上街遊行，其主要負責人現已免職。

據瞭解，清查工作將在年內結束。無論是屬於嚴厲打擊的十種人，還是需要認真清查的九種人，中共高層都要求認真清查，不允許「走過場」。

新晉陞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宋平日前說，「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仍然有些部門的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或者繼續包庇在動亂、暴亂中有嚴重問題的人和事，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不嚴肅」。政

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公開指責有些部門敷衍了事，清理「走過場」。

清查重點在黨內

種種跡象表明，除了需要交付刑事審判的人以外，這次清查的重點在中共黨內。陳希同在黨內大會上所作報告中，點名二十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有的人加入中共已好幾十年，有的在黨政核心部門工作且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有些還是頗有影響的知名人士。對於鮑彤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陳一諮主持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以及國務院農研中心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四通公司、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乃至中國社科院一些研究所的部份黨員，中共高層稱之為「上竄下跳，煽風點火，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宋平認為，「問題主要出在黨內」。作為前總書記的趙紫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次動亂和暴亂的煽動者、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有些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書寫、散發反對黨的聲明、傳單、信件，有的領導幹部帶頭參加或支持非法遊行、聲援活動，反對「四·二六」社論，

反對戒嚴。有的創造和傳播謠言，有的提出退黨，有的還組織集體退黨，有的利用出訪乘機叛逃。據悉，叛逃者中職位最高的是副部長級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趙復三。

有鑒於此，在清查中，中共要求有過激言行的黨員，都要書寫「反思」材料。司局以上黨員領導幹部，都要就「平暴」寫出書面回顧以示立場。

看來，黨組織的清理整頓，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及幹部考察，還會長期持續下去。

指趙設「反資禁區」

據說，當年趙紫陽以政府首腦身份，接替胡耀邦出掌中共黨務時，為「反自由化」設置了一些禁區，當時稱為「政策界限」。其中如經濟領域的改革探索、理論學術界的研討與各種主張見解、文藝批評與爭鳴等等。從而保護了相當一批集在他羽翼下的「智囊團」理論「精英」。

隨著批趙的升溫，北京輿論工具對趙紫陽連篇累牘的批評文章，已經突破了「四中全會」對其兩項錯誤的定性，指責他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淡化黨的領導，放棄四項基本原則，消極對待反資方針以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云云。

中共高層認為，近些年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推行改革，西方大國藉機千方百計施



鄧小平親自掛江澤民為核心

加影響，通過各種渠道進行思想、政治、經濟、文化滲透，兜售多黨政治及「議會民主」等，獲黨內一些人的共鳴，趙紫陽即稱之為「國際進步潮流」。以致不少黨員在對外交往中，只看到好友合作，只講「友誼」、「乾杯」，「讓世界充滿愛」，對西方世界的「和平演變戰略」喪失警惕。

在趙紫陽的保護下，「反自由化」受到明顯「梗阻」。一些人在報刊上、學術講壇和文學作品中，暢行無阻地發表自由化主張——公開抨擊中共的執政是「專制獨裁」；馬列、毛澤東思想是「過時的教條」、「宗教迷信」；「一切向錢看」被合理化，乃至將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內政治生活；宣稱公有制是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以實用的「生產力標準」取代選拔幹部的「德才兼備」原則等等。

據權威人士稱，趙紫陽提出的「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的口號，旨在迎合「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權」那伙人的政治胃口。以致只講「活血順氣」，不講「正骨強筋」；只講心理分析、生理分析，不講階級分析、社會分析；只講馬斯洛夫，不講馬克思。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成災。

批自由化八觀點

不久前，由王震親自關注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四十周年研討會」，就衝破趙紫陽設置的「反資」禁區，列述了思想理論界的八大「自由化」觀點：

- 一、「社會主義失敗論」，斷言「社會主義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的遺產」；
- 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混同論」；
- 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論」；
- 四、「社會主義烏托邦論」，認為廬山會議「架起了烏托邦祭壇」；
- 五、「社會主義公有制無前途論」；
- 六、「社會主義不能代替資本主義論」；
- 七、「社會主義非科學論」；
- 八、「用資本主義全面改造社會主義論」。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在談到「趨同論」時說，這個理論是一九六一年荷蘭經濟學家廷伯根提出的。他在《共產黨經濟社會與自由

經濟社會是否表現出趨同的特點？》一文及《東西方經濟制度的趨同》一書中，闡述現代經濟正在產生一種脫離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兩極對立的運動。由於每種制度都吸收另一種制度的某些要素，如共產主義國家利用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定計劃。因而導致各國形成一種在主要方面類似的社會模式。此說為大陸一些人所接納並竭力發揮。這位中共候補中委認為，兩種制度互相學習借鑒是不能抹煞的。然而，一個是公有制，一個是私有制，兩者存在根本差別是無法「趨同」的。

斥自由化十表現

在經濟領域內，最近還提出了「自由化」的十大表現：

- 一、公開宣揚對經濟現象不要搞姓社姓資的定性，只要生產發展就行；
- 二、大造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的輿論；
- 三、一方面抑制制國營企業發展，一方面鼓勵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發展；
- 四、提倡國有財產人格化，化大公為小公，化小公為私有；
- 五、把流通對生產的促進作用誇大為決定作用，為一開而上的公司叫好；
- 六、借口批判平均主義，肯定不正常、不合理的分配差距；
- 七、崇尚市場調節的作用，懷疑計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 八、忽視基本國情，要求放棄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
- 九、把經濟失誤及所造成的危機，與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相提並論；
- 十、在國際經濟對比上，忽視社會背景不同，貨幣匯率不同，消費價格構成不同，利用不可比的統計資料，吹捧亞洲「四小龍」，為自己抹黑。

暗示要重新評趙

可以預料，隨着「反自由化」的理論批判向縱深發展，不少改革理論將需要重新加以認識。八月間，原中國人大副校長、現任北大校長吳樹青，發表批判趙紫陽鼓動「私有化」的文章。他鞭撻趙紫陽以「經濟領域不反自由化」為借口，縱容支持一些人打着「思想解放

」的旗號，鼓吹私有制的魔力，宣揚以商品經濟模式重建所有制等等。他認為，趙紫陽的「改革開放觀」將兩個基本點「割裂對立」起來，實際上「篡改了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

這是否暗示着，中共四中全會的決議中，有關趙在改革開放中做過一些好事的評價，已岌岌可危，需要重新評價。

五中全會今年開

如果說，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於解決趙紫陽、胡啓立等去職後重新構築新的權力核心的問題，那麼五中全會就必須就目前的時局及社會經濟的現狀、前景，作出判斷和決策。

有消息稱，在中共主政四十週年的國慶節以後，將召開五中全會。

鄧小平近況如何

鄧小平曾經表示，一旦以江澤民為首的新領導班子穩定後，他自己將完全隱退。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是他的八十五歲生日。他稱自己八十五歲了，應該有這個自覺性，並要求中央不要再有「請教」之類的決議。今夏，他一如既往到北戴河休養。他自在中共四中全會前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至今，已有一個多月沒有公開露面了。海外傳媒傳出他身染重病的「小道消息」。其實，他在北戴河白天或到海濱浴場游泳，晚上或讀書看報，或與一些退下來的中共元老們聊天。其用意在於避開決策中樞，放手讓江澤民主持工作。

不過，隨着新出版的《鄧小平文集》的面世，中國大陸各主要報刊紛紛登載鄧的一些有關講話、文章，足見其最高領袖的權威地位依然存在。自從戈爾巴喬夫訪華實現「中蘇第二次握手」後，鄧小平現在唯一的心中大事便是穩定、完善江澤民的接班體制。

誰接掌軍委主席

就目前情況看，新的中共政治局六常委已各司其職，而且在批趙、「反自由化」及清查中，皆發表了堅定一致的強硬主張。在這方面，體現了鄧小平要求的「團結一致」。

至於鄧的全面隱退，當然必須卸去他現任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依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此職必當由江澤民接掌無疑。但是江澤民一向在科研、企業、國家機關及地方黨政

部門任職，一向沒有軍內的履歷。因此，要成為三軍的實際統帥，恐怕需要一個熟悉瞭解的過程。由此看來，鄧小平馬上交班的可能性極小。

五中全會新議題

最近宋平談到，「要堅決清除黨內的敵對份子、反黨份子、腐敗份子，消除政治隱患。妥善處理不合格黨員。」因此，整黨問題，加強黨性教育，強化、完善黨的領導，無疑是五中全會無可迴避的一項議題。中共提出清除腐敗的七項措施，儘管存在阻力，但在「反資」的強大勢頭下，正在推行貫徹之中。目前正部級以上中共幹部的親屬，已明令離開所經營公司。

經濟建設是難題

經濟建設仍是中共的一大難題，李鵬已宣佈年內的工作重點是繼續穩定物價，爭取農業好收成，緩解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三件大事。他認為，經濟改革的目的應是適當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但絕不可能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全部轉變為市場經濟。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過高的積累和超過經濟發展速度的高消費，只能帶來一時的表面繁榮，但不可能持久。

據悉，國務院正在組織起草一個包括今年在內的三年治理整頓計劃，明確各項具體實現的目標。這項計劃將提交中央五中全會討論，並交由明年春季的全國人大會議審議。

鄧小平最近重提卸職全退 江與楊分享黨和國家軍職

張沐

鄧小平最近又多次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卸任軍委主席職務，完全隱退的建議。中共政治局和中央全會已不能迴避這個問題。

據悉，鄧小平在黨與國家的最高軍職，很可能分別交付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

中共當局將停止證券市場、股份制、破產法等若干改革措施。

中共高層人士最近特別談到，要注意從優秀工人中選拔幹部，大學畢業生應到基層或勞動中鍛煉一兩年再上來。

鄧小平最近談胡耀邦與趙紫陽的功過，與海外有關「鄧小平認為他一生最大失誤是錯用胡趙二人」的傳言恰恰相反。

在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的支持下，看來江澤民為核心的新領導班子已牢牢掌握著中國政權。就時局的走勢而言，江澤民似乎更著意顯示高層的集體決策作用。最引人注意的是鄧小平的完全隱退，誰人接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從而完成中共第三代新體制的確立。

種種跡象表明，鄧小平由「半退」到「全退」已成為中共高層無可規避的重要議題。而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以及明春的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對此將如何作出決定，其關係之重大，可想而知。

清查進入尾聲

目前，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尚未了結。北京的社會治安沒有完全平靜，散失的槍支彈藥還有一部份沒收回。戒嚴部隊紛紛作越冬準備。北京的黨政機關、科研與理論學術機構、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單位、學校及企業的清查已進入尾聲，並陸續採取黨紀、政紀、法紀處分。估計將涉及到一些地位較高的中共幹部。

黨員重新登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歷史上，儘管出現過羅章龍、張國燾兩次分裂活動，以及陳獨秀與劉仁靜等組織過的「托陳取消派」，但最後

都自行化解，皈依中共的統轄，至多有個別別人脫黨而去。今次則不然，由嚴家其、陳一諮、劉賓雁、蘇紹智、萬潤南、蘇曉康一批逃到海外脫離中共的知識界「精英」，在巴黎成立了抗拒中共現政權的「反對派組織」。其中包括曾加入中共多年的資深幹部。這無疑是中共建政以來所發生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加以內地又出現少數黨員退黨，引起了中共當局的高度警惕，認為是近幾年來「自由化」泛濫、組織紀律渙散的結果，因而必須強化黨的思想建設，清除異己份子和腐化墮落份子，純潔隊伍。有消息說，在國慶四十週年活動結束後，中共將對四千八百餘萬黨員全面進行重新登記。

政治經濟並重

衆所皆知，現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兩位前任胡耀邦、趙紫陽，皆因反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儘管江澤民宣稱，「四項堅持」，注重「反資」是黨的性質所決定的，而不是為了保護書記職務，但作為中共最高領導者，理所應當吸取前任的「失敗教訓」。

鄧小平說，這次給我們上了一大課，大家多年來埋頭搞具體事務，思想動態、政治動態都不那麼關心，腐敗現象那麼嚴重，警惕不夠了，糾正的工作也不得力，這和不堅決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有關。

有鑒於此，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新領導特別注意抓經濟生產與政治路線「兩手並重」。尤其強調清理「自由化」的種種表現以及廣泛開展傳統思想教育。同時，把「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作為中共執政的基本方略重新加以明確和宣示。

調整組織路線

中共高層人士最近專門談到，要注意從優秀工人中選拔幹部，重視在第一線工人中發展黨員，增加各級人大中工人代表的比例。若干年來我們往往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知識化是對的，但是，強調知識化後就絕對化了。許多工作需要富有豐富經驗的人來做。工人出身的，再加上有一定文化，去當車間主任，就比大學生去當車間主任要好得多。一個黨委書記，非得要大學畢業的去當，未必當得好。工人當中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工人中有文化、有組織能力的，應該選拔優秀人才到管理機關、領導機構中來。現在我們的大學畢業生，應該到基層或在勞動中鍛煉一兩年，熟悉一下生產，熟悉一下群眾，有了體會再上來。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強調為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多從大學生和知識份子中吸收黨員

，並提出了「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幹部選拔標準。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沒有大專學歷者，便晉升無望，以致各地掀起了追逐「文憑熱」。

而上述的權威講話內容，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共組織幹部路線側重點顯而易見的變化。

批趙不斷深入

為了重樹黨的威信，中共政治局在提出「反腐敗」的七項措施時，通過傳播媒介嚴厲批判趙紫陽及其智囊團曾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腐敗難免論」、改革開放過程中「官倒不可避免論」。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當選總書記後，曾就高幹子女作了專題講話，認為他們也是公民，在不倚仗特權的情況下，也可以合法經商和出國留學。據稱此說頗帶縱容之嫌。

九月十六日《求是》雜誌發表一篇文章稱，趙紫陽曾說「廉政主要是七所八所的事」。讀者仔細讀後，恐怕仍很難理解其中的所指是什麼。經筆者查詢有關權威人士，才知「七所八所」指的是稅務所、儲蓄所、派出所、房管所、郵電所、糧管所、醫務所、托兒所之類。從而指責他「反下不反上」，保護「大老虎」。

今春全國人大會議前，趙紫陽視察上海，提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可以「一俊遮百醜」。可以肯定，隨着「反資」的深入開展，報端將會披露出更多的批判趙紫陽的言論。

停止若干改革

至於中共的經濟政策，首當其衝的是堅持「三年治理整頓計劃」。這無疑是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據透露，此項擬議中的計劃，提出了六項目標。其中包括：爭取物價上漲指數降到百分之兩位數以下，調整農產品和基礎工業品價格，縮小財政赤字，合理調整生產結構和基本建設結構等等。藉以緩和供需矛盾，穩定生產，保持適當的工農業增長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將調整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譬如停止設立股份上市的證券市場，暫緩在經濟效益好的大中企業推行股份制，推進「破產法」的實施等。至於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企業經營承包制、沿海發展外向型經濟、引進外資、橫向聯合企業集團以及「四大包乾

「——地方財政、外貿外匯、鐵路、煤炭四大行業包乾制度等，均繼續推行。近些年大幅度發展的鄉鎮企業與個體企業，其不利於國民經濟發展的部份，將加以清理整頓。」

廠長受黨監督

中共在批判趙紫陽削弱黨的領導的同時，提出要增強黨組織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作用。李鵬認為，廠長和黨書記不應談論誰大誰小，誰高誰低，廠長要接受黨委的監督，幹部的使用要經黨委討論，但要充分尊重廠長的意見。而在全國人代會通過的「企業法」中規定，廠長（經理）在企業中居中心地位，全面負責，兩個文明一起抓。

新擢升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在一次會上談到，這一條必須修改，否則難以保證黨對企業的領導和有效監督廠長（經理）負責制。看來，這有可能列入明春的全國人大議程。

鄧又談胡與趙

迄今為止，海外傳媒仍盛傳鄧小平說過「一生最大的失誤是錯用胡、趙二人」的傳言。但是，從鄧小平九月間一次露面的談話內容看，他的看法恰恰相反。

據稱，毛澤東第二次起用鄧小平是一九七三年。當時鄧從江西返回北京，不久出任副總理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鄧將趙紫陽調到四川擔任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表示接受鄧的「全面整頓」主張，決心三年治川見效。鄧談到，三年就誤了一年，是「四人幫」阻礙。二年見效，四川人有吃、有住、有穿。改革從農村開始是他和萬里二位帶頭，萬里在安徽他在四川帶頭。還有胡耀邦，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很好的。胡耀邦是老紅軍，選擇這兩個人我現在認為沒有選錯。

但是，他們出問題了，不講「四個堅持」。他們兩個剛剛在這個問題上栽跟頭。好多腐敗現象，有些不健康的文藝活動，胡耀邦他不反對，他的語言是賺錢錢改善一下伙食。

中共「十三大」後，趙紫陽當上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鄧小平表示，當時確實要把軍權交給他。也知道他有缺點，不知道這麼嚴重。結果他自我暴露，動亂中自我暴露，也還在別的問題上，對家裏的子弟搞腐敗現象他從來不



鄧小平否認錯選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接班人。

講，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不管怎麼樣，總是寄托在一、二個人的威望上，靠不住。一旦出事情，影響就更大、更壞。

鄧重提「全退」

作為中共最先提出建立退休制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鄧小平，最近又多次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卸任軍委主席的職務，請政治局常委負起責任，自己完全隱退的建議。應該說，此事已醞釀議論多年，今次鄧小平態度堅決，中共政治局和中央全會，已無可規避這一鄭重其事的大課題。

鄧小平說自己的身體還可以，但虛假成份多，人到了這個年齡再好也好不到哪裏去。但是突發事件隨時可以發生的，所以我現在在練習完全退休以後的生活習慣，已經有幾個月不看文件了。彭真、鄧大姐、徐帥、聶帥他們都能退，我為什麼不能退？所以我正在練習完全退，並且爭取大家同意，因為我退一定要中央委員會同意，我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特別是最近有一、二次突然在香港說我被刺了，已經病危了，所以股票市場就波動。這就說明早點退反倒好一些。

平心而論，鄧小平已是八十五歲的老人，在國際共運史上，如此高齡仍處於黨內權力高峯及鬥爭中心的，實屬罕見。今次，他希望江澤民等新一代領導班子放手全面接班，真正擔負黨、政、軍統轄重任，無疑是應當得到充分理解和接納的。

不再權集一身

很顯然，鄧小平希望自己在活著的時候實踐自己提倡的廢除「終身制」的主張，他卸任軍委主席無疑已成定局。剩下的問題如江澤民所說，是中共高層什麼時候對此作出決定，以及由誰來接掌其職務。這就牽涉到中共中央全會與全國人大會議。

由於鄧是以軍隊的最高統帥身兼黨和國家軍委主席雙重職務的，因而在探討今後的權力交接時，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中共建政四十週年以來的最高權力結構。

在第一個十年裏，毛澤東兼任中共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可以說集黨、政、軍全部最高職務於一身。一九五九年四月召開二屆一次全國人大，劉少奇接掌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這兩個職務在憲法上是一致的，因為國家主席擁有統率全國武裝力量 and 頒發「緊急狀態」、「戰爭動員令」的權力。而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宣稱在政務上「退居二線」，根據「黨指揮槍」的原則，他仍保有中央軍委主席的最高指揮權。

「文革」中，劉少奇被罷黜，中共總書記鄧小平被免職，正所謂「少小」離家。其時，強調「一元化」領導，中共書記處、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乃至各民主黨派，均銷聲匿跡。



鄧小平透露，確實曾要把軍權交給趙紫陽。

華國鋒接班後，國家主席一職仍未恢復，他身兼中共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三職，同樣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

嗣後便是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相繼出任總書記。此際黨與國家的最高職務均和軍隊的最高統帥權分離。黨章和憲法亦相應作了修改。中央軍委主席一直由鄧小平擔任，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國家主席李先念皆不兼軍職。至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才又兼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繼任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這樣安排，顯然是鄧小平為了在自己完全隱退後，向趙紫陽移交黨內最高軍事指揮權和向楊尚昆移交國家武裝力量統率權。

據此可以看出，在當今強調改革開放不變的情勢下，黨政分開已成為一項必須遵循的原則。因而，恢復那種集黨、政、軍最高職位於一身的「領袖時代」，已完全不可能了。

軍權分交江楊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新領導，九月末在北京舉行的大規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六位常委皆分別就其所主管的工作回答記者的問題，這顯然是為了表明江澤民的新班底依循的是集體領導的原則。與中共「十三大」後，趙紫陽率五常委向中外記者繞場一圈，由趙全面發表政見、獨領風騷的場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至此，人們不難看出，鄧小平在黨和國家的最高軍職，很有可能分別交付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也許這是江澤民體制也可以需要加以「理順」的權力安排。

鄧小平稱外交不會「一面倒」

閻明復諸政要「五中」定沉浮

張沐

五中全會將決定治理整頓經濟的政策，確定施政方針，決定部分高層人事更迭，對應台灣「銀彈外交」的方略。

閻明復已被架空，他主管的工作已由丁關根接替。

江澤民強調絕不能重用騎牆派的人。

中共最近發佈文件，半年內「重新登記」黨員。

全國迄今查出三十五件大案，其中省部級大案十二件，但處理的阻力很大。

治理整頓經濟的主要手段是，緊縮財政開支、抽緊銀根、減少信貸、壓縮貨幣發行量。

鄧小平最近表示，外交上不會再出現向蘇聯「一面倒」的局面。

中共在三個月內接續召開十三屆四中、五中全會，可見自六四以後整個政局所面臨的內外困難並沒有完全「排除」和「理順」。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外交乃至中共自身，都存在著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要任務是清黨

作為外部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前學界關注的是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爆出的信仰危機及相應掀起的批判斯大林體制浪潮。波蘭建立非共產黨政府、匈共改組成社會黨及不斷推進的多黨制，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關切與憂慮。某核心決策人士稱，東歐某些社會主義國家最近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已經產生了惡果，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因此，必須維護和重建黨的威信，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有鑒於此，作為執政黨的中共，首要任務便是採取強勁措施，統一黨內的思想，加強組織建設和隊伍整頓，落力清除腐敗份子，異己份子，蛻化變質份子。顯然，鄧小平親自選定的江澤民體制，非僅在於執掌權柄，而且要消除海內外一些人將其目為「短期過渡政權」的疑慮或期待。是以竭力排除前總書記趙紫陽的



江澤民：「最危險的是那些騎牆派」。

影響，批判他及智囊「精英」們非「四項堅持」的改革主張，整肅「自由化」勢力，便成為鞏固與維護新的權力架構及其政治路線的關鍵需要。

五中全會的議程

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儘管以治理整頓經濟為主要議題，但是作為對十年多來改革開放的總結與反思，歸結起來仍是一個施政方針的重大問題。更毋言會議無法迴避的黨務、清查乃至高層人事更迭等。諸如閻明復等中共政要的去留變遷，也許可以從側面檢驗江體制掌握權柄的牢固程度。

閻明復已被架空

在中共召開五中全會後，北京市與中央國家機關及各地捲入動亂的大、中城市，都必須依中共最近發佈的文件規定，對黨員進行「重新登記」。有消息稱，此舉將持續到明年上半年。

此前，曾有十餘個工作組進駐中央國家機關，着手有關六四事件的清查。其中包括進駐原由閻明復主掌的中共中央統戰部。自從閻明復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被免去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他主管的工會、青年、婦女、對台及民主黨派等工作，基本上已由新入選書記處的丁關根所接替。閻明復五月間公開在示威學生中談中共黨內「改革派處境困難」之類的話，是他難見容於新權力體制的要害所在，亦即支持趙紫陽的「明證」。

謝文清將受處分

據悉，經過清查，統計出中央國家機關參加遊行的有近萬人，在各種呼籲書上簽名或為學生捐款的各有二千餘人。其中司局級以上幹部有一百八十餘人遊行，三百五十餘人簽名，一百五十餘人捐款。不過，在這上萬人中，被公安部門收審的十五人，已叛逃國外的十四人。

對於黨員重新登記，中共有較為嚴格的九條規定。除了「革命意志衰退」或半年不交黨費、不參加支部活動者允許延緩登記，以觀後效外，凡屬清查對象，堅持「自由化」立場、聲明退黨或不填寫申請表格者，均不予登記。原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謝文清因參加遊行又拒絕檢查，已被中共高層點名，據悉將受到嚴厲處分。

江批騎牆派原因

中共權威人士最近就這次整黨談到，黨員教育是根本，支部建設是基礎，反對腐敗、保持廉潔是重點，領導幹部的表率作用是關鍵，紀律監督是保證。尤其是要加強對部級、司局級和處級黨員幹部的監督。據稱，此次動亂有相當於一成的基層黨支部處於軟弱、渙散的狀態，因此必須加以調整或整頓，改選黨支部。完全失去作用的黨支部，則要解散，予以重建。看來，這次「登記」比起胡耀邦時代的整黨要嚴格得多。所以江澤民特別強調「要防止走過場，不留後患。」「最危險的是那些騎牆派……清查出騎牆派的人絕不能重用。」

省部大案十二件

反腐敗被中共稱為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實際上也是鄧小平交給江澤民一項棘手而又務必做出成效的重要任務，是江體制能否在黨內外確立權威、全面主攻的要害所在。據透露，目前全國在清查的大案、要案中，涉及省部級幹部的一百一十件，涉及廳局級幹部的一千多件。其中三十五樁重點大案，涉及省部級的十二件。迄今中央國家機關受黨紀處分的處以上幹部近四百五十人，其中部級二十八人，司局級一百零九人。江澤民提出，「對已經成風了的腐敗現象，不管涉及是誰，都要一查到底。」防止形式主義，更要防止一陣風。

應該說，中共高層自發佈關於抓廉政七件事以來，政要們取消特供、直系親屬經商、改乘國產小轎車等，均有明顯的改變。並由溫家寶主持的中央辦公廳直接與中央及各省、市、區黨政部門聯繫，經常檢查督促貫徹落實廉政措施情況。李鵬還下令將中央領導幹部改乘國產轎車後，原先所使用的進口轎車集中為明年的亞運會服務。

全面清查大公司

在懲治腐敗、打擊經濟犯罪過程中，僅八月中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發佈關於犯罪份子投案自首退賠者，在規定期限內可從寬處理的通告後，兩個月間已有一萬三千人投案自首，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三百餘人。已退出贖款贓物合人民幣八千五百多萬元。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省已有一千二百多人自首，而包容有諸多中央機關和國家級大公司的北京市，僅有六十餘人自首。由國務院秘書長羅幹率領的清理公司領導小組，對國家級大公司已展開了全面清查，據悉將陸續公佈一些重大案例，並着手裁撤合併一批重複的經營性公司。

據稱，中央國家機關一些大案儘管涉及的數額鉅大，甚至造成國家重大損失，但由於這類案件往往牽扯到某些合法的審批程序，加以落實到個人的犯罪因素複雜，且大都數額分散，以致發生定罪困難。所以中央國家機關肅貪審結的案比率很低。據透露，一九八六年「打老虎」查出的案件，迄今尚有一部份沒有結案處理。

查處大案阻力大

原由國務院機械電子部辦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今年三月公開預約銷售松下錄影機，每台三千八百元人民幣。此商品當時非常走俏，預定者達三百四十五人，共收款一百三十一萬元。豈料提供資源的深圳張凱實際上是一個騙子，收取貨款後逃匿得無影無蹤。該公司禮堂辦公室副主任秦建之是直接責任人，受到停職審查。消費者多次與該公司有負責人及機械電子部主管人員對話，要求退款，均得不到滿足，近日已訴諸法律，等待判決。

像這種案情清楚的案件，處理起來尚且十分困難，更毋言其他涉及面深廣、情節複雜的大案、要案。

值得注意的是肅貪廉政措施在貫徹中，往往容易流於做表面的「花架子」文章。儘管中共一再嚴令禁止在國內工作交往中，用公款請客送禮，查處行賄受賄，但「人情風」並未止息。九月間，《解放軍報》發表短評稱：「人情關係過原則制度。現在辦事，大到入學、調動、提升、分房，小到要車、購物，常常得找關係，托人情，原則制度被關係、人情取而代之。老老實實按原則辦事處處碰壁。」

受賄花樣何其多

湖南邵東縣專賣局長陳壽仙，剛被報上宣傳為請吃不到，紅包不要，送禮不收的「廉潔局長」，時過一週，報上又登出他受賄被公安局收審的消息。據瞭解，有些地方和部門搞「花架子」廉潔的「套路」頗多。有的是對內「廉潔」，對外「全接」，有的是吃請不去，錢物照收。有的是易暴露目標的物品不要，紅包「豆腐塊」（或捆鈔票）即納。更有「經驗」的大貪則採取「送的數量太少不收，有第三者在場不收，送的人不可靠不收，要憑證的不收」四原則。

廣東省某市一位領導幹部，今年一至七月用單據報銷的「跳舞費」達七千多元。南海縣一風扇廠原黨支部書記馮進迪，共貪污受賄十餘萬元，某次他到鄭州，因嫖妓被公安局門拘留罰款一萬多元，回到廠裏這筆罰金照樣由公家財務報銷。這樣的事例無疑是十分惡劣的個別典型。但是，如何使權力與財分離，刷新「社會公僕」的政風，的確是中共亟待解決的課題。

否則，正如中共高層人士新近談到的，消極腐敗現象仍未被遏止住，一些人對能否真正清除腐敗，保持廉潔，還持懷疑觀望態度。久而久之，便會失去民心。

治理經濟防滑坡

從明年起，中國當局將進入內外債的還債



傅已接管閩明復的工作的丁閣根

高峯期。還本付息的支出將由幾十億元猛增至百餘億元乃至數百億元。近十年來，中國財政赤字累計達五百七十億元，相當於中共建政頭二十九年累計赤字的二倍多。再加上內外國債，數額更加龐大。就國力而言，還債不難，但對經濟發展，確實是不小的「包袱」。

財政赤字向銀行透支，經濟過熱又向銀行施加鉅大的資金需求壓力，迫使貨幣非經濟發行量劇增，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的逐步升級。中共決定進一步緊縮財政支出，抽緊銀根，減少信貸總量，壓縮貨幣過量發行，這將是今後二、三年治理整頓經濟的主要手段。

但是，壓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實際成效，與預定的目標卻有很大距離。原計劃全年壓縮投資九百億元，於今只完成一百多億，而全年的時間已所剩無幾。李鵬承認已達不到原計劃。他稱經濟發展有它的客觀規律，不是一個命令，叫它關停就能全停下來。那樣做會帶來更大的損失。所以要允許有些收尾量不大的項目建成投產，由於銀根收縮，減少投資，明年基建會下來。不過，北京繁華的王府井向北不過一公里地段，却有華僑大廈、天倫賓館等三處旅遊飯店在繼續修建，位於阜成門的四川賓館曾被列入停建項目，如今也在加緊施工。而這些都是消費性設施，可見壓縮之難。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為了抑制消費過熱，一方面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一方面大幅度提高高檔消費品如彩電、雪櫃等的銷售價，同時，還一再提高存款利率來吸收儲蓄。大量的社會資金由購物保值轉向存款保值。是以出現商品大量積壓。不少工廠越開工，賠錢越大。九月份全國工業產值的增幅達致開放改革十年來最低點。為此，有人擔心今後的生產還會進一步「滑坡」。

整頓鄉企個體戶

李鵬認為，這是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是企業提高素質的一個契機。企業要在技術革新、加強管理、增加花色品種、提高產品質量、節約能源原料、降低成本、加強配套、改進服務，加快引進設備的國產化等方面下功夫。由過去只重視速度和規模，從漲價中增加收入，轉到真正提高經濟效益上來。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也有明顯回落。中共認為其立足點應重於安排農村剩餘勞

力，改善農村經濟結構，實行以工補農，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和提供國家財政稅收等等。而趙紫陽及其智囊提出「崛起的企業新軍」、「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主力軍」等提法，則被否定了。

個體經濟目前已被視為整頓的重點，據稱有的地方偷漏稅的個體戶達七、八成。江澤民主張對違法經營的個體經濟要毫不留情地整頓，甚至令其傾家蕩產。現在中共再度宣稱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其中當然包含着剝削成份。因此，江澤民明確宣稱，「有剝削行為的不能入黨」。

五中將定外交策

目前，中共至為關注的還有一個外交問題。自六四以後，西方國家掀起了抵制與制裁浪潮。台灣當局接連與格林納達、利比里亞、百利士三國「建交」。李登輝還要人們「拭目以待」台灣新的「外交」戰績。而中共當局接連以「斷交」、「中止外交關係」而給人以「滑坡」之感。

平心而論，今年五月蘇共首腦戈爾巴喬夫訪華，結束了中蘇三十年的對峙，實現了中共的全方位外交戰略。加以原擬與印尼復交、與新加坡建交的安插，有人在年初分析今年是中共的「外交年」。豈料峯迴路轉，一夜之間發生劇變。

目前中共尚停留於口頭上譴責台灣當局利用西方大國製造的「大氣候」採取「銀彈外交」手段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云云。作為中共外事領導小組組長的李鵬，無疑要在中共五中全會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對策方略。

鄧小平近談外交

有鑒於此，中共在對內加強「四項堅持」的宣傳教育的同时，如何在外事活動中，採用靈活的外交手法，與西方大國和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融洽周旋，的確是很重要的。

最近，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決不會再出現向蘇聯「一面倒」的局面。去年，他曾就全世界愈益明顯的緩和氣氛，提出了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主張。為此，如何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也是中共重建國際形象的一大課題。

趙紫陽智囊團

成員的命運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文鴻

趙紫陽下台了，是否真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即使像田紀雲、陳俊生那樣轉過來批評趙紫陽、劃清界線以保權位，趙多年扶持的智囊團是否無可避免要遭受牽連、迫害呢？

當然，在趙紫陽反對鄧小平的行動中，在學生運動升級的過程裏，趙的一些智囊人物都有參與，趙紫陽在五月初轉變立場，直接與鄧小平對抗更與鮑彤等人的出謀獻策不無關係。但是，在處理趙紫陽政治錯誤時，是否應該對這批智囊團一分为二，從寬處理，以保存人才呢？在領導層不搞株連（此所以田紀雲、陳俊生等可以沒事），對智囊團卻大搞株連羅織，這是否合理的處理方法？

株連羅織，於法不合

假若我們相信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報告，身為政治局秘書的鮑彤，確有泄露中央機密決策的錯誤，確曾間接或直接組織趙紫陽智囊團來聲援，確曾進行「救趙」。按中共的黨紀，應該對鮑彤有所懲罰。但他起草趙紫陽改變立場的「五四」講話及泄露政治局常委會戒嚴的機密（那和魏京生「泄露國家機密給外國人」的罪名不同），都屬於黨紀範圍，沒有犯國法。至於陳希同所說，鮑彤在五月初七日晚上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密謀策劃」，是否算得上「反革命」活動，還須有更詳細的資料，來讓中國的法庭審判，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外，鮑彤不是罪犯，也不能以罪犯方法處理。

鮑彤以外，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成員，雖參加了鮑彤召開的會議，但是不應因此而把他們入罪。即使如陳希同所言，該研究室副局長高山曾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傳達「上邊」的指示，也無非是聽鮑彤指揮，可說是執行職務。而且對

小平等領導人不要忘記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在毛澤東和中央正式判決鄧小平之時，有多少幹部、知識分子和羣衆曾經冒險「救鄧」。即使我們相信八九年的趙紫陽不及七六年的鄧小平正確，即使我們相信幹部、知識分子和羣衆是受了趙紫陽蒙騙而對他寄有期望，對他們（包括趙的智囊團人物）台法的行動，是否應該理解、諒解，在處理時留有余地呢？

智囊言行，並不激進

或許，如國內一些輿論所說，趙紫陽近年的一些政策錯誤，都是聽信了這些智囊團的建議，但這樣的說法忘記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中青年智囊人物並沒有決策權，他們的提議是否會獲得接納成為政策，由中央領導層（包括趙紫陽）決定。趙紫陽的政策錯誤，在中央還有一個集體負責的問題（趙的權勢還未到獨斷獨行之階段）；就趙個人而言，也不可能把責任推在獻策的智囊團身上。

此外，在近一兩年，趙紫陽的許多錯誤政策，不會是出自體改所等智囊單位的建議。例如國際大循環的政策，建議來自國家計委的研究員，體改所、發展所及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一些被視為趙紫陽親信的智囊人物，都曾反對和勸阻，只是趙一意孤行，沒法改變他的立場。

即使國內目前受到最激烈批評的私有化主張，在這些智囊團人物中，確有部分人贊成，但也有不少反對，最明顯的是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屬下發展研究所的立場，基本上是與少數人推許的私有化主張對立。體改所的常務副所長王小強也在八八年該所的月刊（《中國：發展與改革》）上撰文，主張經濟改革、企業改革應該從非私有化的邏輯出發。發展所的研究員近年也開始對過去經濟改革的方向進行反思，對以往的建議開始有不同的想法，在思路上實際逐步接近姚依林主要智囊團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等的立場。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體改所、發展所和中信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也傾向於支持溫和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國內少數年輕學者、學生以及方勵之等要求中國政治體制全盤西化

者大相逕庭。四月初在北京豐台召開的四、五百人會議，特別是由嚴家其、曹思源、溫元凱主持的一個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小組，清楚地表現出體改所等的保守態度，他們大多數甚至不參加這樣的討論，而即使嚴家其、曹思源的立場也較年青的激進者遠為穩重、溫和。

而最重要的，是中國政治不能再回到以言論或思想入罪的封建法西斯道路！

在體改所等智囊組織中，不少人並沒有直接參加學生運動和「救趙行動」；有參加者大多是抱著滿腔熱情和誠意。中共領導層不是至今仍肯定學生的本意是愛國的嗎？身為知識分子，這批年青的智囊團成員怎能不關心、支持學生的愛國舉動呢？不過，他們在運動期也是相當謹慎小心的。即如體改所所長陳一諮，在四月初會議時摔傷了腳，一直住醫院，沒有參加學生運動，只是在五月中旬以後才因政局劇變，聽鮑彤的指示進行「救趙行動」。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李湘魯，更因過去曾任趙紫陽的秘書，很早就遵從所裏的勸告，避開學生運動。在這些人中間，真正的積極參加「救趙行動」的只是少數。

然而，據國內消息，他們似乎是一倖免地受到審查，部分更被拘捕、監禁，陳一諮更被公開追緝。體改所、發展所（包括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等據內部決定一概撤消。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打擊十分廣泛，或許這正符合中央領導層少數人士的仇恨、報復心理，也間接助長了中央領導層內反知識分子、反智的傾向。

打擊趙氏智囊團對中共不利

不分皂白、嚴厲打擊趙紫陽智囊團的做法，效果會十分惡劣。或許這種做法是北京領導人免除後患（個人的後患？）的有效措施，但對中國的政治，卻會有很大的損害。

一是這樣以政治關係、政治言論來打擊失勢者的智囊團，會進一步助長黨內領導層的派別主義、派別鬥爭。智囊團若成為某個領導人的智囊團，其成員與該領導人便榮辱與共，政治命運連在一起。智囊團的建議很容易變得越來越政治化、越來越從權力得失

來考慮，只着重那個領導人的利益，而缺乏全局觀念、國家觀念，因此，該智囊團所提意見的素質便會下降，也容易引起帶有濃厚權力鬥爭色彩的政策爭執。總的而言，只會把中國的決策素質進一步降低。而一些不願介入政治權力鬥爭的才智之士，便會傾向於明哲保身，甚至引趙紫陽智囊團的命運為鑑，不願意參加公開或內部的政策討論。領導層或決策層與研究和學術界的關係便會趨於脫節，沒有研究和理論協助的決策層也很容易走上昏庸和專制之路。

二是趙紫陽的智囊在「六四」前後，不少出了外國。事實上，早在八八年，由於形勢變化，不少趙的智囊團人物認為前途惡劣，甚至氣數已盡，為免牽連，找機會到外國進修讀書，並借機會反思改革前途。加上「六四」之後陸續為逃避審查、迫害而離開中國的人，很多是原來智囊團的人才。著名的最少有下列的一批：

體改所：所長陳一諮、常務副所長王小強、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宋國青、發展研究室主任王曉魯、綜合研究室主任程曉農、所長助理兼數量經濟研究室主任王輝，以及梁天征、張阿妹等。

發展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羅小朋、研究員周其仁等。

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華棟、李湘魯、副所長朱嘉明等。

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張學軍、華生、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楊沐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盧邁等。

這一批人都是近年來在國內經濟學界、經濟改革理論方面的領導人物，在國內外聲望甚隆，假若留在海外不回國，對中國來說，是損失了一批最優秀人才，也在海外形成了一批有聲望、有能力、有理論水平的反中國現領導層的知識分子、學者，在輿論上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和壓力。

正如文初所言，按黨紀國法，按文革以後的中國政治，實在不應對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進行株連，羅織罪名來迫害。中國要擺脫文化大革命所表現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即使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還是可以對知識分子表示寬容，特別是對這一批為

中國經濟改革盡了不少努力、作過不少貢獻的趙紫陽智囊團成員。我相信，至少就我個人認識所及，他們大多數都不反對社會主義，不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本身便多是共產黨員，所有人都很愛國。「六四」以後逃離中國，不是為了背叛中國，而是為了逃避封建法西斯主義式的株連和政治迫害。沒有這些迫害，他們還是希望在國內參與中國的建設和發展的。

希望中央領導人能考慮國家利益，慎重地按照黨章憲法，根據事實，台情台理地處理，保護這批文革後國內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

九月二十一日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後記一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單純為了朋友的道義。體改所、發展所、中信國際所、社科院等的不少成員，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我與他們對趙紫陽的政策、對改革的意見分歧是很清楚的，在國內有關圈子裏也是眾所周知的。我批評趙紫陽的經濟政策已經是多年來的事，但這並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和我對他們的敬重。即使意見不同，我始終覺得他們是中國中青年輩最優秀的人才。經過多年的政治折騰，不少人才在政治運動中給摧殘了，中國不能再因政治派系鬥爭、權力鬥爭而再失掉這批人才。只有廣泛地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共同努力，中國龐大艱巨的現代化大業才有希望。

後記二

據聞，國內批評陳一諮、李湘魯與美籍匈牙利裔資本家羅時在中國設立中國改革基金會，與美國情報組織有關，但同樣的基金會亦設在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了素羅時對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和發展的關心。此外，據國內朋友傳告，陳一諮、李湘魯等人在中國改革基金會的影響力今年已經大大減少了，該基金會的中方代表朱嘉明（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也失去了控制權，實權已落在國家安全部下的一個機構手裏。若這個消息屬實，對陳一諮、李湘魯的批評便是典型的羅織罪名，為了打擊某人而胡亂造謠，是著名的文革極左做法。

後記三

陳一諮之參加海外民主中國陣線，直接反對中共政權，這是他個人的選擇。雖然我不贊成這個組織，不相信它的積極作用，但陳一諮有他的權利來選擇政治立場、政治主張、政治活動，而他的行動也不代表體改所，或體改所留在海外的成員的政治立場。中國政府處理的方法應該一分为二。此外即使陳一諮在民主中國陣線反對中共政權，特別是反對鄧小平，他還可以是愛國的，就好像中國政府亦承認或默認台灣國民黨的反共人士還可以愛國一樣。中國應超越政黨政治。

明報月刊 1989/11

海南省長梁湘成爲祭羊

尚小玉

隨著中共整肅前總書記趙紫陽密鑰被破，趙紫陽任職期間的一系列政策相繼被取消，否定，趙紫陽派系的人馬，以及趙紫陽經濟政策的支持者，正逐一地被撤職。可以說，中國大陸十年改革的成果正在被現當道者一個個摧毀，一場大復辟在進行中。

九月中旬，趙紫陽沿海開放政策的先鋒大將梁湘被中共解除了海南省省長的職務，他是「六四」之後大清洗中，最高階層的趙派人物之一。據最近的消息證實，海南省的趙氏經濟實驗，亦面臨着徹底的取消。

梁湘是八十年代中共經濟改革中最活躍、最開放的改革領導人。在就任海南省省長之前，他曾擔任深圳市市長職務。位置接壤香港的深圳，一直是中共改革的前哨站和先行試驗點。現年七十一歲的梁湘，經濟思想接近資本主義模式，熱衷於市場需求刺激和吸引外資，而非馬克思主義條條。

中共對梁湘罪名的罪名爲，墮落腐化，「因個人利益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等。同時，爲了搞臭這位改革急先鋒，北京的政敵還攻擊他「指使妻子、兒子從事不法經濟活動，從中牟利」。爲了羅織趙紫陽的罪名，中共亦指稱梁湘與趙紫陽第二個兒子過從甚密。趙紫陽的兒子不久前被指控有「腐化的商業行為」。

中共官方「新華社」發出的消息並稱，梁湘的職位由前海南省黨委副書記，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劉健鋒接替。劉健鋒一上任便發表談話稱，海南省對外開放和重建的政策將保持不變，而且會繼續深入。但與實際情況比較，此話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

廣州市中共高層中對此一事變動的一般評論是，中共現當道的強硬路線派人物，正在借機整肅趙紫陽政策的支持者，不僅要改變趙紫陽原來的計劃，而且還要從組織上徹底清算，以防止邪惡死後，趙紫陽派人馬重新上台。

外界評論認爲，中共現掌握一脈，正在修改，準確地說，是取消南部沿海地區改革的試驗計劃和戰略部署。一位住在廣州的西方外交官稱，梁湘被撤職表明，中共強硬派正在加強自己的地位，並無情地清算敵對方面，特別是趙紫陽的一些地方上的支持者。

在海南，趙派的省委書記許世傑，在梁湘被撤職後一週，遭到「人民日報」的猛烈抨擊，但也暗示他正刻不容緩地過渡太大的政治麻煩。

「人民日報」指控他爲梁湘錯誤政策的支持者。最近近的被整肅者是文化部長王蒙，亦因他的上任受到趙紫陽的支持。王蒙辭去文化部長之職，黨內對他的指責爲「受到西方價值觀念的腐化，同情資產階級自由化。王蒙是「六四」之後，唯一拒絕出席「戒嚴部隊犧牲英雄追悼會」的部長。

另一個受到清洗的高階層人士爲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央委員劉宏儒。他已撤消職務。但在所有這些被清洗的趙派人物中，唯有梁湘被指控有「經濟腐化」的罪行。「反腐化運動」是中共「六四」後掀起的一場大規模整肅作秀，旨在重新樹立黨的形象，同時藉機打擊政敵派系。

梁湘的政績和聲譽，是在任深圳市市長時聲名雀起的。中國大陸最資本主義化的城市深圳，八十年代以來一直被視爲改革中特區政策的模範。在中國最南部省份廣東省，梁湘在省黨委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該省的許多經改政策的制定和推動，梁湘功不可沒。

中國海南省是在一九八八年從廣東省分離出來，以便開發這個中國第二大島嶼。海南全省皆被劃爲擁有許多對外特殊方便的經濟特區。梁湘被國務院任命爲第一任省長。

海南省的獨立，是趙紫陽沿海經濟特區和國際大循環的重大經濟部署。趙紫陽的計劃是將海南建設成爲台灣式的獨立發展的經濟島嶼。許多方面的措施，將模仿台灣七十年代的成功經驗。國家對海南的經濟發展政策限制，壓縮到最低的程度。市場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亦走得最遠。而這一切，將隨着梁湘的撤職而盡數取消。

梁湘目前面臨着十分危險的前途，如果僅僅是政策性錯誤和黨內的處分，撤職便是結論性處罰。但跡象顯示，北京反趙派系領導人，顯然想將梁湘徹底搞臭。他們的策略是，通過經濟方面的問題，追究梁湘的刑事責任，而要把梁湘搞成中共整肅中共高幹貪污腐化的典型。中央電視台在新聞節目中，指稱梁湘犯有重大經濟腐化的罪行，證據是指使兒子設公司進口汽車，從中牟取暴利。

目前，對梁湘的法律起訴尚未開始，根據中共官員的說法，他們正在深入調查梁湘一家從事經濟不法行為的證據。用經濟腐化整肅人從事經濟改革的政敵，是中共強硬路線領導人

發明的最新武器。梁湘正在成爲這一武器試驗場的祭羊。

這些在搞改革，決心把幾十年沉泥垢物一掃而空的改革家們，依然承襲老一輩的一個傳統——享受特權。

在香川別墅住一天，只要象徵性交一塊錢人民幣，山珍海味，大魚大肉盡管吃，吃飽為止，但不是大鍋灶，而是由名廚精烹之物。內部錄像、西方影片、琴棋書畫皆爲盡享之物。如果湖北老區的農民游香山誤入這裡，所發生的事情，絕不是曹雪芹筆下的劉姥姥了。而是痛苦和失望的心碎，他們怎麼能想到，當年他們把家中糧食布匹，甚至兒女貢獻給這些革命領袖，而今仍過着食不飽，穿不暖的艱苦生活，但革命領袖却在花天酒地恣意享樂，內心怎麼能平衡呢？

共產黨爲了享受就和歷史上的土匪一樣，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幾十年奮鬥，爲的就是享受，所以像香山別墅這樣的豪華住宅，並不是老毛、葉劍英等人的專利，從中央到地方，每個土皇帝都有自己的安樂窩，以北戴河中央辦公處招待處（歷次黨代會之後的決策會，近幾年都在此地開）爲例，興建大量的高級私人別墅，毛澤東、林彪、鄧小平等人均有之，地方上，北有省委承德別墅、山海關招待所、甘肅有寧臥山、福建有西湖賓館、山東有青島八大處、廣東有珠海石景山、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每個土皇帝都爲自己修築了無數豪華宅第，同時又大揮人民血汗去修度假別墅，以供養身修性。

中南海軍系統，本來計劃十篇，但由於作者已受到來自中共高層的威脅，生命安全不能保證，並涉及家人安危，故向讀者深表歉意，在本系列英勇就義之時，我願像無數共產黨員「英勇犧牲」前那樣，振臂高呼：「歷史將審判你們，你們等着瞧吧！」阿門。

中國之春 89/11

從梁湘看中共整人劣行

歐陽明朗

最近海南省長梁湘被撤職，惹起海外一陣新聞熱。中共加給梁湘的罪名是縱容妻子與兒子以權謀私。但是，中共從上到下，以權謀私者大有人在，爲何偏偏選中梁湘來整呢？這除了外間所說的「梁湘是趙紫陽的人」外，是大有內幕的。

梁湘成了趙家公子的替罪羊

中共「六四」屠城之舉，廣東、福建、海南這南方沿海三省一直是另有看法的，鄧李楊集團一直不放心。屠城之後，爲了取信於民，中共提出要辦七件事，其中就有肅貪和整治官倒。這就爲統治者剷除政敵提供了藉口和機會。

鄧李楊要法辦趙紫陽，終因找不到合理的藉口辦不下去，於是就打算向趙的兒子開刀。一直以來，全國人民都懷疑，趙紫陽四個兒子中，起碼大的兩個兒子趙大軍和趙二軍可能有經濟問題。筆者有兩位朋友曾與趙大軍有過往來，他們說趙大軍人品不錯，但他們也不敢否認趙大軍有經濟問題。即使趙家公子本身比較正派，但不排除他們的公司及下屬並不乾淨。有經濟問題就應查處，不過要公平公正。但如今中共爲整趙紫陽才去拿他的兒子開刀，這當然是小人所爲。好在一些有心人一見風頭不對，就把趙的兒子們弄到了海外避難，中共整人者撲了個空。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趙紫陽在京城親信部下，「六四」後幾乎被一網打盡，已毋須拿他們肅貪到官倒方面去開刀，所以鄧李楊集團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廣東及海南。廣東省長葉選平，他們不大敢動，省委書記林若，他們又找不到什麼把柄，所以選上了海南省長梁湘。學潮期間，梁湘班底的《海南日報》旗幟鮮明地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六四」期間，《海南日報》又印備了慶祝李鵬下台的號外，此舉令鄧李楊集團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梁湘一到北京就給扣了起來，以經濟上打老虎的典型給抬了出來。李鵬派系的人馬在海南則趁機奪權，而《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則被革職隔離審查。梁湘至今仍被扣京城「交待問題」。

其實梁湘有經濟問題不是自今日始，他讓兒子到香港工作也是他在深圳市長任內時的事，他兒子是出任深圳市駐港商業機構深業公司副總經理。這些事在深圳是街知巷聞的。

「蛇口風波」要算賬

引起全國爭議的「蛇口風波」，曾被認為是深圳青年向傳統思想教育的挑戰。如今氣候改變，事件重新定調，涉及報導風波者挨批挨整。

尚彤

去年，中國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兩件引起爭論的事：其一是電視片《河殤》；其二是「蛇口風波」。

風波起於小辯論

「蛇口風波」始於去年一月，北京師範學院德育教授李燕傑、中宣部教育局調查研究員曲嘯、中央歌舞團前舞蹈演員彭清一等人應邀到蛇口參觀。一天晚上，他們與蛇口七十名青年在蛇口招商局舉行座談會，雙方對蛇口發展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意見，尤其對「淘金者」的評價各持己見，發生了爭論。馬、曲、彭三人讚揚蛇口的巨變。他們說深圳的青年總體上說是很可愛的。到深圳蛇口來的人大多數是來展才能的創業者、建設者；一部份是來貪圖享受者；極少數是來在別人創造的財富中撈一把，甚至不擇手段、損人利己的「淘金者」。

彼此是有磨擦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小報告引起大風波

座談會結束，事情本也過去。因為這樣的爭論在當時的蛇口並不新鮮。但是，座談會次日，李燕傑任所長的北京師範學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寫的《蛇口座談會始末》就從深圳分送往中央有關機關的領導。文章把座談會描述為一場敵對性爭吵。蛇口青年的言論經刻意編排後也被歪曲。座談會上一名遞了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也上了這份派報。

消息傳出，蛇口人對於這種向中央打「小報告」告狀的手段頗感不滿。為了澄清事實，《蛇口通訊報》報導了座談會的始末。這篇《蛇口青年與曲嘯、李燕傑坦率對話——青年教育家遇到年青人挑戰》一文，在當時是一篇難得的、非官樣文章的報導，引起了中國新聞界的震撼。廣州《羊城晚報》很快做出回應，在報上溫和地批評曲嘯等人在口頭上稱讚蛇口青年坦率，事實上又對座談會不滿這種陰險的做法。接着，天津的報紙、北京的雜誌等都紛紛評論《蛇口風波》，刊登文章讚揚蛇口青年在青年教育權威面前勇於平等對話的精神。到了去年八月，《人民日報》終於在頭版刊登了一篇題為《蛇口風波答問錄》的報導，並在「編者按」中說：「今天向讀者介紹事情的經過及有關方面的意見，並且願意繼續為更多的同志參加議論提供一點版面，共同探索新時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問題。」《蛇口風波》就此在全國引起廣泛的爭論，一場小風波掀起了一場大風波。一個月內，數以千計的讀者來信參加討論。

「蛇口爭論」今又重提

今年五月，北京掀起舉世矚目的學運。北京的大學生們提出了與政府平等對話的要求，

蛇口青年在風波中的那種勇氣和願望似乎被延續了。北京各行業的市民紛紛加入了運動的行列；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等官方喉舌的部份員工和北京的其他一些新聞工作者也一起高呼「新聞自由」的口號，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全國各大城市相繼響應，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識雖然在全國廣泛地接受和維護。中共當局當然感覺到「蛇口風波」與這場學運之間的關連。

六、四事件之後，全國大規模清查學運份子，並且重拾政治思想教育和恢復學習制度。八月十一日，《中國教育報》編輯部舉辦了一個教育界人士座談會，談到了「蛇口風波」。參加座談會的有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校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以及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副部長、中宣部教育局局長和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滕藤等人。座談會上各人猛烈抨擊「蛇口風波」，指蛇口風波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和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吹捧資產階級思想。又說蛇口風波在教育界產生極大影響，是今年學運、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前奏，是和趙紫陽「淡化」黨的作用、「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緊密配合的。何東昌說，在蛇口風波中，有的人宣揚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這對青年是極大的腐蝕劑。堅持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最容易接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崇拜資本主義，最後必然會發展成資產階級主義。滕藤說，蛇口風波實際上是借題發揮，否定、淡化甚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幾乎批判了所有刊登過「蛇口風波」的報刊。

在全國這種清查、整頓的大氣候下，深圳蛇口的小氣候不免晴轉多雲。據來自深圳方面的消息說，中央組織部最近派遣了一個五人小組前往深圳蛇口，調查香港招商局集團副董事長、蛇口招商局負責人袁庚在經改以及學運期間的表現。袁庚曾被認為是中國經改中一面旗幟，但是隨著梁湘的下台，袁庚的命運也頗堪堪虞，而招商局屬下去年率先報導「蛇口風波」的《蛇口通訊報》，目前正面臨被關閉的危機。看來，清算這筆老賬已不用等到秋後了。

經濟問題不成問題

甚至梁湘到海南走馬上任以後的不光彩的事，也早已不是秘密。去年八月，《爭鳴》特約記者曉沖在一篇《海南颶風起翻案風》的報道中，就曾指名地揭露梁湘在建設前夕派妻子去海南島買了兩座樓房，以圖私利。當時海南幹部都議論紛紛，難道中紀委不知道？

為什麼早就知道梁湘妻兒的不正當行為，而不去及時制止及處理呢？中共不是說要愛護幹部，要治病救人嗎？說穿了，中共根本沒有那一套，一切為了整人。你聽話，你當紅，幹什麼壞事都不會有人管你。但一旦你被排擠，被定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時，雞毛蒜皮都會成為你的罪證。梁湘就是這種情形。中共指梁湘妻兒以權謀私一百多萬元，這個數目對珠江三角洲許多區鎮頭頭而言，算得什麼？

上層誰無以權謀私問題？

即使中共上層，哪個家庭沒有類似梁湘這樣的問題？

王震、楊尚昆、李先念、彭真，有哪一家是乾淨的？在中共高層中，多少人的子女親朋在國內和在外國以權謀私比梁湘家厲害！

即使鄧小平，鄧樸方的官倒不去說它，小兒子鄧質方帶同妻子去美國留學陪讀，還在美國生小孩，那些錢是怎麼來的？鄧琳的畫在香港賣六十萬元以上一幅，老頭子是知道的，為什麼不制止？是不是縱容女兒以權謀私？這不比梁湘還要嚴重嗎？

海南省長梁湘罷官內幕

何頻

趙紫陽作後台，梁湘在海南派系鬥爭中略勝一籌，保守派懷恨在心。同情學運，對中央「平暴」最遲表態，終以「官倒」下台，梁派人馬個個自危。

九月十三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會」一

致通過罷免梁湘省長一職的決議。同時，北京亦宣佈撤銷梁湘中共海南省第一副書記等一切職務。與梁一同登島建省的中共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復澄：梁的落台與趙紫陽無關。中共更開動宣傳機器，猛烈抨擊梁湘縱容貪污受賄，並揭發梁湘這樣的「大老虎」被打，表明中央反貪污反腐敗的決心。

據筆者所知，梁氏的確有些不夠檢點的地方，但使他落台的真正原因卻是：李鵬利用海南錯綜複雜的派系鬥爭，打擊趙紫陽在海南的勢力。與趙關係異常密切的梁湘，不可避免成了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最出鏡的地方官

梁湘是延安時代出身的老革命，與王震關係甚好。梁曾任廣東副地委書記、廣州市副市長，係趙紫陽的老部下。十年前，深圳成為大陸第一個特區後不久，梁即獲委任廣東省副省長兼深圳市市長，後又加上中共深圳市委書記一職，可謂紅極一時。

梁湘被中共宣稱機器視為「改革猛將」。的確，梁湘有股衝勁，深圳迅速崛起的摩天大廈，有他相當大的功勞。葉劍英、鄧小平、王震等人對他皆大加讚賞。但他是典型的地方官僚，多維護深圳本地利益，惹起中央個別人不滿。一九八六年，他在與國務院派來的李灝的權力鬥爭中敗北，被免去一切實權職務，僅任廣東省副省長兼深圳市委書記。為此，深圳人多打抱不平，對梁湘表示留戀。

黯然落台的梁湘仍居深圳市委小別墅式常委樓，卻不甘寂寞，多次向趙紫陽、王震請戰，要求發揮餘熱，終獲海南建省籌備組組長一職。海南建省後，原廣州市委書記許士杰任省委書記，梁出任省長。

隨著「海南熱」的升溫，梁湘成為全國最出鏡的地方官員，並跨下海口，二十年趕上台灣經濟水平。

捲入派系鬥爭

一位曾在海南工作多年的高層幹部稱，海南的派系鬥爭是除北京外全國最激烈的地方，本土幹部與大陸幹部向來不和，這也是導致海南成為大陸沿海最後落後地區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九八七年九月，筆者專程去海口市採訪梁湘，在海南賓館的會議室裏曾提醒他注意派系鬥爭。但梁不以為然，只表示要從深圳調一批得力幹將來，與他一同開發「海南大特區」宏圖。

後來，深圳市副市長鄭康、甄錫培當了海南省副省長，原深圳羅湖區書記程則常上了三亞市市長，原《人民日報》駐深圳記者站站長程凱被委任為《海南日報》總編輯。梁湘原來還想將深圳市公安局局長聞貴清、深圳教委主任林祖基調去海南委以重任，遭兩人謝絕。其中林祖基曾在海南當過某縣縣委書記，嘗過派系鬥爭之苦。

去年筆者又去了一趟海南，未見到梁湘。當時「海南熱」已經降溫，市面蕭條，企業大都虧損，極難見到外商的蹤影。而衙門內的權力鬥爭卻升溫。省政府一位官員說，既有本土派，也有大陸派，細分起來，還有什麼鮑克明、劉劍鋒北京派，梁湘深圳幫，許士杰溫和派……

鮑克明是常務副省長，曾留學蘇聯，背後有李鵬、李鐵映支持。劉劍鋒亦是留蘇派，與江澤民一度在電子工業部共事，與李鵬關係甚密。許士杰則是一名儒將，在派系鬥爭中往往起到平衡作用。加上梁湘、劉劍鋒、鮑克明各自的後台地位相當，所以權力傾軋一時未見分曉。

今年春節期間，趙紫陽在珠海度假，梁湘曾與之長談。三月，梁湘主動出擊，解除鮑克明常務副省長一職，將鄭康（較鮑開放，並有豐富改革經驗）當作常務副省長使用。鮑克明、劉劍鋒等人懷恨在心，尋機報復。

電報成為罪證

梁湘為人粗獷，講義氣，搞改革開放旗幟鮮明，與知識份子關係較好。今年五月，海南也有學生、知識份子上街遊行。梁湘採取非常寬容的態度，並責令部下與學生對話，令知識份子滿意。所以海南秩序並未出現混亂。

據《海口晚報》一位記者透露，五月十九日，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梁湘當時身在海南，也對民運表示支持，並拍電報給中共中央，要求盡快與學生對話。當晚，李鵬要宣佈北京戒嚴，梁湘力覺察到趙紫陽大勢已去，企圖追回已發出的電報。但為時已晚，電報已落到李鵬手中，成為梁湘支持民運的鐵證。

六月中旬，梁湘曾在中央電視台露面，與許士杰一起主持海南高層幹部會議，表明支持中央平息暴亂。海南是全國表態較晚的地區。李鵬並不寬容，即下令派出陣容龐大的專案組前往海南，一方面尋找梁湘的罪證，一方面監督梁湘行蹤，防止外逃。梁湘一子在海口機場遭到扣押。後來為了防止萬一，乾脆將梁湘押去北京審問。

當時全國性的批趙運動並不順利。李鵬、姚依林等人注意到，如果將梁湘以「支持民運」治罪，恐引起海內外反感；如果將之作爲趙紫陽同黨處置，不但對北京高層是一個衝擊，對廣東、海南的局勢也會增添更大的不穩定因素。

於是，鮑克明、劉劍鋒放出風聲，說梁湘獨斷專權，縱容貪污受賄，可能落台。香港某報便以此發了消息。

把梁湘當成貪污腐敗的「大老虎」，真是一箭三雕：一是置梁湘於死地，背上官倒之惡名，難有翻案的機會；二是社會震蕩力小，海外輿論無法為之辯護；三是可以向不明真相的人標榜中共「打虎」的決心。

梁湘人馬個個自危

儘管中共反復說明梁湘落台不會影響到其他人，但梁湘人馬無不提心吊膽。在短期內可能不會丟去烏紗帽，但權力已經喪失。一旦時機成熟，扣上個「貪污」之類的罪名是輕而易舉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共權力鬥爭的

故事，幾乎盡皆如此。

海南自成為特區之後，客商本來就十分罕見。六四屠城和梁湘下台，導致原本躍躍欲試者也裹足不前了。梁湘七月出訪東南亞五國的計劃自然未能實現，大批與梁湘有關的訂單亦喪失。據說，就是已在海南註冊的大陸企業也紛紛撤資，準備打道回府。

七十歲的梁湘垂垂老矣，被判入監的可能性極微。相比現今許多尚在高官，梁氏的「官倒」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問題是誰叫他站錯線呢？

九十年代 1989/10

梁湘被撤職的背後 王路

梁湘下台，傳說甚多，據聞他與趙紫陽第二子二軍關係密切，趙二軍在海南有一間規模甚大的地產投資公司。……

最近一直盛傳地位不保的海南省省長梁湘終於下台。在目前舉行的海南「人大」會議上，這位第一任省長不但被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而且也像趙紫陽一樣，要「繼續審查」。

雖然梁湘被革職是意料中事，但當局列舉他的罪狀都是他個人經濟方面的。「中央聯合調查組」的報告說：梁湘支持、縱容妻子和子女在海南牟取私利，利用職權違反規定送兒子去香港定居，違反規定批車，其兒子趁機勒索等，犯了以上錯誤。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特別強調，梁湘所犯的錯誤純屬經濟錯誤，他的下台與趙紫陽無關，亦不是甚麼派別鬥爭。

其實，許士杰這番「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解釋，恰恰說明親趙的梁湘，正被當局算了他的政治賬。據多個省、市傳達的內部文件透露，梁湘被指控「串通煽動反革命暴亂」，按照這個罪名上綱上線，完全可判梁湘在政治上的死刑。

支持學運官途被判死刑

梁湘在學運期間的表現十分突出，他曾簽字同意海南省致電中央，表示處理學運問題影響深遠，北京必須採取克制態度。他領導的海南省委，在五月中旬就同當地總食學生對話，正式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一些海南人士說，梁湘早就有經濟上「不乾淨」的嫌疑，但也止於「以權謀私」，還沒有到犯法的層面。當局現在才清算他，顯然是與他的靠山趙紫陽失勢有關。梁湘下台正是中共官場「樹倒猢猻散」的寫照。

從中央調查組的報告來看，有關方面為搜羅梁的非政治罪名可謂用心良苦，連他下鄉有警車開道，亦被視為「自以為經濟特區功臣，嚴重脫離羣眾」。

就在梁湘被宣佈撤職的當日，被指為「開後門」來香港的梁子明立刻作出反應。他對《星島日報》的記者說，他來香港是北京方面批准，並非靠其父運用權力。梁明辯稱，他從來沒有去海南做過生意，他現時是在外貿部屬下的中資機構工作。他又透露，梁湘罷官後會返深圳休養，而其母自八二年退休後就留在深圳，也從來沒有做過海南的生意。

雙方各執一詞，孰是孰非局外人很難判斷。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梁明定居香港可對梁湘的命運起微妙的影響。中共不少高官和其子女均有不乾不淨的記錄，逼人太甚的話，家醜揚到國際上去，大家都沒有面子。

據知情者透露，海南高層領導班子內部鬥爭一直存在，「六·四」後更為激烈。在海南省委九名常委中，廣東幫、北京幫、海南地方幫各佔三名。而梁湘、許士杰的廣東幫，在決策層一向以來佔決定性地位。有人就想趁這次的全國大清洗，排除異己，從廣東幫手中奪回海南的控制權。

早在建省之初，六十八歲的梁湘和六十九歲的許士杰已被視為「過渡人物」。而隸屬北京幫的海南省委常務副書記劉健華和常務副省長鮑克明，則被視為當然的接班人。耐人尋味的是：這兩人都已是五十年代的蘇聯留學生。

隨着批判趙紫陽的升級，梁、許的去留和劉、鮑的擢升，一度成為熱門話題。（鮑克明曾被視為梁湘的接班人。）不過，有不少人認為，海南作為大陸最大的經濟特區，建省才一年多，就面臨政治、政策、經濟和社會心態方面的危機，「六·四」屠城之後，這些危機一下子全部表面化，如何妥善解決，是令北京方面頭痛的問題。當權者如從善如流，不應在此敏感時刻調動海南高層領導班子，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在當地造成強烈震蕩。不過，現在的事實證明，中共當權者的搶班奪權鬥爭，安頓其他因素，採取了先下手為強的策略。

海南「失寵」於中央？

梁湘被革職的衝擊波是巨大的。一些在「六·四」屠城後到海南探路的外商坦言，他們是因梁湘、許士杰而來的，因為梁、許都有搞特區開發的成功經驗。一位美國商人表示，如果梁、許兩人離開，將會嚴重打擊外商對海南投資的信心。當時海南的某些政府官員亦十分擔心，認為這種將海南開放的前途與梁、許的政治前途連在一起，是十分不明智的。看來「六·四」以後梁湘政治行情下跌已是公開的秘密。較早前，梁湘、許士杰和劉健華北上晉京，人們曾寄予很高期望。一個星期前，梁湘回到海南，神色凝重。據悉，早在八月下旬，北京已撤去了他副省長書記的職務。

不少人沒有料到，梁湘的接班人真命天子竟是省委副書記劉健華。他曾是江澤民的部下，在調來海南之前，劉健華是北京電子工業部副部長，而江澤民曾任該部部長，加上兩人均留學過蘇聯，關係自然非同尋常。他這次能夠跑贏鮑克明出任省長，相信多少與江澤民這個後台有關連。

可以預言，隨着海南和廣東在中央的「失寵」，過去得到的優惠將逐步消失。外商以前在這些地區包括原材料均有優先權，以致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原料告急發電文到中央求援仍得不到解決。這種「諸侯割據」的經濟局面，早就引起高層不滿，而從劉健華的擢升來看，中共今後有可能將重點發展對象轉到上海和天津方面。人們應已注意到，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和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他們的經濟發展策略與趙紫陽時期迥然有異。最明顯的跡象是，在官方宣傳的「建國四十年經濟發展」介紹中，上海竟然名列榜首，如果「論資排輩」，上海連續幾年經濟滑入谷底，生產增長全國倒數第一，是典型的公有制犧牲品。現在把它捧出來吹噓一番，自然是江澤民的主意，亦可從中看到他對自己「發迹地」的重視。李瑞環對他的「發迹地」——天津——自也不會例外。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梁湘和許士杰的關係。據知情者透露，梁、許兩人過去工作配合得不錯，梁湘魄力大，大刀闊斧，而許士杰則儒將風度，講究無為而治。現在，梁湘下台，許士杰即掉轉槍口猛批梁湘，其實不足為奇。就如同萬里批趙紫陽一樣，都是中共官場「保身」的一種「術」。

九月十五日

南北極刊 89/9

中央機關整頓黑名單 258名幹部榜上有名

鄧峰

「六·四」之後，北京當局對異己分子的秋後算賬一直沒有停止。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經過當局的追查、下級的舉報和「人人過關」後，當局已經整理出一份中央機關局級以上幹部的整頓名單，並由七、八月起已陸續進行整頓。有關部門認為，「必須重視組織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這份名單共包括258名中央機關局級以上的幹部，他們都在學運期間曾不同程度地參與或支持過學運。據最新消息說，至目前為止，這258人中已有159人受到處理，其中又包括7人是副部級的幹部。他們已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如開除黨籍、停止公職、降級或暫停工作接受審查等。

在被整頓的副部級或以上的幹部中，較為人熟悉的包括前廣播電影電視部第一副部長謝文清和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等。

謝文清開除黨籍兼降職兩級

謝文清曾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調返北京後任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在學運之前，他已在退休的階段，但當時他沒有太多顧慮，有一次還與其他工作人員一起行動。當時，人們也為他的安全着想，把他包圍在人叢之中，還給他一頂寬邊的草帽，不讓公安人員認出。不過，他的行動還是被人拍下了照片，成了他日後被整的證據。

經過七次被逼檢討後，謝文清終於被開除黨籍，職級降兩級。

至於杜導正，他現在只有等退休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根本與「自由化」沾不上邊，更遑論參加民運；在他擔任新聞出版署署長時，執行的都是相對保守的政策，從來沒有越軌的傾向。今次他被處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點「含冤莫白」，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也談過新聞自由，而且他與趙紫陽的關係不錯。當年趙紫陽在廣東時，杜導正曾給趙不少幫忙；趙不得意時，也曾在他家居住。

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仍是當局的主要整頓對象。敏感人物王若水現時雖然沒有被捕，但他的行動都在監視之中。法學家于浩成，大概十日前的消息還說他仍在秦城監獄的招待所，雖然不算是入獄，但行動受制，經常接受查問。

《導報》阮江寧被捕

在新聞界，除了外界已經知道的情況外，最近亦有消息透露，《世界經濟導報》北京辦事處的阮江寧亦已被捕。至今，該辦事處四名經常性的員工中已有兩名被捕（另一人是該辦事處主任張偉國）。至於其餘兩人——牟軍和費曉棟暫時未有問題。牟軍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朱厚澤的女婿，而朱厚澤雖然也受到不少壓力（他於學運期間曾得到全總通過給學生撥款十萬元人民幣），但由於他在今次學運中的表現還是很分寸，所以暫時仍未有太大的問題。

北京大學是教育界的重災區。自從「六·四」和前任校長丁石孫被逼離職

後，校內即成立了清查小組。除了異己分子被處理外，一些教授還接到通知，要他們寫一些批判趙紫陽的文章，著名經濟學者厲以寧也接到這樣的指示。

「六·四」之後，有關方面曾設立舉報電話，希望能糾捕更多民運分子。但是，其效果適得其反。據有關部門事後統計，在所有的舉報電話中，有約30%是乘機洩憤，把當局大罵一頓的；他們多利用單位大院裏的或其他公眾電話，罵完之後就走，當局要追查也無從入手。另有約30%是故意舉報鄧小平、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等人的；他們一般也是採取類似上述的方法。至於另外的40%，雖然牽涉到具體的人和事，但經過調查後，發覺其中30%是借此機會公报私仇，或有意整人的，被舉報的人根本與民運無關，舉報者只是想趁這機會來弄掉自己的對頭人。所以，只有剩下來約10%才是有點參考價值的。 ■



古董

胡九道

中共加緊控制軍隊的新招

- 禁止軍人參與其他政黨
- 禁止軍人參與非核准組織
- 禁止軍人參與羣衆組織
- 禁止其他黨派在軍隊中建立組織
- 以對六四事件態度爲升遷標準

萬里行

在東歐局勢、特別是羅馬尼亞局勢急劇變化的刺激下，中共進一步強化了以武力來解決問題的信念。爲了未雨綢繆，保證軍隊能聽命於黨，避免出現東歐共產黨的窘境，所以中共在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希望通過政治思想工作，能牢牢的控制住軍隊。

會議首先傳達了中共中央就“中國會不會出現東歐式突變”這個問題的看法。據了解這是“退了休”的鄧小平在一次與政治局常委的談話中所提出的觀點。他認爲中國不會出現東歐式的突變（他所持的理由，江澤民在會見香港新聞界訪京團時已有所披露，這裏不詳。）

會議把東歐國家所出現的變化，定性爲“國際資產階級長期策劃的和平演變”。會議把東歐出現的變化，同今年“六·四事件”聯繫起來看，“高度評價”了鄧小平關於“大氣候、小氣候”的觀點，認爲當前軍隊要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軍隊的影響。他們認爲，自由化在軍隊中的表現，可以歸納爲兩點：即

——主張黨軍分家，或稱軍隊非黨化，或稱軍隊國家化、軍隊共和國化。

——主張軍隊非政治化，或稱軍不干政、軍隊不應介入政治、軍隊中立化。

中共中央軍委認爲，如果不徹底批判這些觀點，則黨就不可能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中國就有可能發生東歐式



的變化。

會議認爲，鑒於東歐發生的變化，中國面臨一個新形勢，即“國際敵對勢力正加緊對我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並把我軍作爲其滲透的重要目標，妄圖改變我軍的性質”。另一方面，北京“六·四事件”則說明，“在實現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全過程，自始至終貫穿着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對立和鬥爭。軍隊雖然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但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爲了避免出現東歐的局面，軍隊必須做到兩點：其一：政治上永遠合格；其二：接受黨的“絕對領導”。這兩條，就是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精神。

關於“政治上永遠合格”，會議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合格”的標準：“思想上合格”的標準是做到“四個忠於”（即忠於黨、國家、社會主義、人民）。

“行動上合格”的標準是做到“三個捍衛”（即捍衛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社會主義事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

關於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會議提出要：“堅決抵制和反對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黨軍分家等錯誤言論和傾向。毫不動搖地貫徹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堅持設立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的制度；堅持支部建在連上”。此外，會議還作出幾項新規定：

——未經相應政治機關批准，軍隊成員不得參加其他黨派和宗教組織；

——不得成立各種條令條例規定之外的團體和組織；

——不得擅自參加地方的群衆團體；

——絕不容許其他黨派在軍隊中建立組織和進行活動。

——今後提拔軍隊幹部，要特別注意他們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的表現。

會議還提出一個新觀點，這是過去從來未有提過的：即軍隊除了有對外防敵的功能外，還有一個“對內”的政治任務，這就是防止顛覆。會議指出：軍隊執行黨的政治任務，包括對外抵禦敵人入侵，對內防止敵人從內部顛覆。就是說，軍隊作爲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既要同明火執仗的敵人作鬥爭，還要參與防止和平演變、反對顛覆的鬥爭。“如果發生了非常事件，治安系統力量不足，或者用行政和法律手段無法解決問題時，由黨中央、國務院、中央

軍委作出動用軍隊的決策，是理所當然的”。這番話不但爲今年六·四出兵屠殺平民一事實行“合理化”，而且也明確一點，即軍隊今後不但用來對付敵人，也可以用來對付要求自由、民主的人民羣衆。這個觀點，在中共建軍將近七十年的歷史中，還是第一次提出的。它徹底打破過去“軍民魚水情”的傳統。從這個提法，人們不難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開始出現了變化——從禦敵於國門之外變爲統治者駕馭人民的工具。自從六·四出現人民的解放軍開槍鎮壓人民的事件以後，很多人都擔心解放軍的性質會出現變化。現在看來，這種變化已是成爲事實了。

會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文件。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上述原則規定下來。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共爲了防止東歐式的民主運動波及中國，正在準備採取軍事措施來解決人民對民主的要求。

附錄：《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分十部分，內容如下：（一）清醒認識軍隊建設面臨的新形勢，把保證政治上永遠合格作爲一項根本任務。

（二）必須堅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綫地位，充分發揮我軍的政治優勢。

（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大力加強各級黨組織建設。

（四）突出抓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始終保持部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五）堅定“四有”目標培養革命軍人，提高幹部戰士的思想道德素質。

（六）嚴格按照德才兼備原則選拔幹部，保證槍杆子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裏。

（七）高度重視反腐倡廉鬥爭，鞏固部隊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陣地。

（八）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保持和發展良好的內外關係。

（九）貫徹唯物辯證法思想，增強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

（十）政治工作要在加強的前提下改進，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

當代周刊 89/12/38

秋後算帳到武警

何伯施（北京）

“六·四”後對武警部隊的清洗，終於一如預料的到來了。中共在二月十四日公布，撤換了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部的司令員和政委等高級領導。

原武警司令員李連秀被免職，由北京軍區某集團軍軍長周玉書接替。原武警政委張秀夫被免職，由北京軍區的徐壽增（他的原職務不詳）接替。原副司令員範志倫由武警原參謀長王文理和左印生接替。原副政治委員張海天被免職，任命呂壽廷（原第二軍醫大學政治委員）、徐桂賢接替。這使人相信現任公安部長兼武警總部第一政委的王芳也地位不

穩。關於武警的最新人事結構見附表。

在“六·四”事件上，武警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態度，在鄧李揚集團看來是很曖昧的。再加上他們懷疑武警部隊和趙紫陽關係密切（這一點詳下文），故絕對不會放過對武警的清洗。

“六·四”後武警部隊的清洗工作從去年十月中開始，連續進行了三個月時間，終於在今年二月一日作出上述宣布。去年十月，中央軍委和公安部分別派了兩個工作組，進駐武警總部。在中國，武警是實行雙重領導的管理體制，軍委管人事與軍務，公安部負責日常的管理協調。所以，武警有問題，這兩方面都要派工作組。軍委的工作組着重在調查高級

領導等人事問題，公安部的工作組着重在調查專案（即“六·四”期間武警參與示威游行的具體情况等）。

這次清洗的另一個原因，是鄧李揚集團還擔心趙紫陽在武警裏有“自己的人”。他們認爲武警態度曖昧，與這點有關。武警原司令員李連秀是現任公安部長兼武警第一政委王芳所提拔的，而王芳得任公安部長則是趙紫陽力爭而得的（當時彭真是反對的）。所以王芳被視爲趙的人。再加上武警前副參謀長李正軍是趙紫陽的親家（其女兒是趙五軍的妻子）。這就更令人覺得趙在武警裏有勢力。所以，這次武警被清洗，是無可避免的。

當代周刊 89/12/16

羅國突變後中共最新動態 全國軍隊一級戒備

「羅馬尼亞經驗」竟是加強軍隊控制

何伯施（北京）

羅馬尼亞形勢的急劇轉變，使中共的領導層大感意外。較早時候，兩國的領導人還惺惺相惜，誓要為“捍衛社會主義”而互相扶持。誰知慷慨之言猶在耳，忽然又上演一幕兔死狐悲。

正因如此，中共為了避免重蹈羅馬尼亞的覆轍，日前在齊奧塞斯庫被逐出走之後，馬上在軍方內部下達命令，即時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級戒備，以防止有可能出現的“暴亂”。

據靈通消息說，較早時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及中央軍委曾分別舉行會議，討論了羅馬尼亞的局勢。他們沒有從齊奧塞斯庫的下場吸收到應該順應人民要求的經驗，反而從羅馬尼亞的局勢中總結出兩點：（1）今次羅馬尼亞人民起義之所以能夠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羅馬尼亞軍隊叛變，倒戈相向；否則，縱使人民有三頭六臂也不可怖；（2）由於紙難包火，這事早晚都會在中國廣泛傳開，倒不如及早疏導人民的情緒；而且早點有些較正面的反應，就不致於在國際上愈來愈孤立被動。

據知，中共在齊奧塞斯庫倒台之後作出了一項公開的行動和一項不公開的安排。所謂“公開的行動”，就是指公開間接承認羅馬尼亞新政府，說尊重羅馬尼亞人民的選擇（本期有另文分析中共在這方面的態度）。而“不公開的安排”，就是在軍隊內部下達命令，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級戒備。中共這樣的決定反映了他們的恐懼。在這種恐懼的心理之下，如果出現群情洶湧的情況，中共會不會一錯再錯，再來一次瘋狂的殺戮呢？這一點是我們極其關注的，也是需要全球華人和各國人民共同關注，引起警惕和及時制止的。

各級將領隨時奉命出動

所謂“一級戒備”，就是指“中央軍委一聲令下，全軍高級將領、中央軍委、大軍區、軍以上幹部，要思想一致地行動起來”，攻克敵人。在這個時候，軍內的保密電話要二十四小時有人值班。保密電話與一般電話、紅機電話（機關內可直接撥中央的電話）不同，通訊網絡和速度都不受外界干擾。各級將領須隨時等候上級的指示及向上級報告情況。此外，各大城市可以隨時奉命執勤的士兵不能少於一萬人，而且部分子彈已發到士兵手中。按照一級戒備的要求，發生動亂時軍隊要第一時間保衛重點機關，如政要住地、市府大樓、電台、電

視台、電報局、交通要津等。

來自軍方的消息說，“一級戒備”時必須強調司令部的應變能力，要求司令機關要有很強的“快反”能力（即快速反應能力），同時要作出後備方案，實行“平戰分開”（即和平與戰爭的時候分開），這樣就可以保證在突發事件中的指揮仍可有效實施。軍方還收到命令，要注意突發事件的“對抗性”、“蓋然性”和“緊逼性”，必要時還可以簡化決策的程序，藉以保證行動能夠靈活有效地執行。

北京是京華重地，也是曾經爆發大規模民運的地方，所以一級戒備抓得最緊。據了解情況的人士說，北京衛戍區的二萬兵已接到隨時整裝候命的通知。不過，由於上次民運的經驗，中共高層認為單靠北京衛戍區的力量難以保證北京的局面穩定，所以他們也通知了北京軍區的八個軍（包括駐在保定的三十八軍及駐在石家莊的二十七軍）隨時聽命。根據中央的要求，“關鍵時刻中南海內最少要有四千士兵”。

北京增建特種部隊

為了增強北京市的“防亂”力量，目前當權派決定在戒嚴部隊中選拔兩萬人在北京落戶，成立“特種部隊”，以增強衛戍區的力量，成為更可靠的心腹。

對於北京的形勢，有關方面強調平時的工作。自從“六·四”事件之後，北京市委總結了一點他們認為過去忽略的經驗，就是“不少人國防觀念淡薄也是今次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為人民“不懂得擁軍愛軍”，加上於“六四風波後仍有部分群眾在首都戒嚴、部隊入城等問題上認識不清”，所以，最近北京市決定成立“國防教育領導小組”，由陳希同擔任組長。這個小組除了建議立法部門對國防教育立法的可行性進行論證，以及建議財政部對國防教育經費作預算外，其重點就是教育北京人民不要與軍隊對抗。他們在“教育”群眾時，經常強調破壞軍備的刑罰，希望能起嚇阻的作用。陳希同還說：“那一個幹部的國防教育工作做得好，這些成績以後可以與選拔幹部聯繫起來。”

既然北京是主要的焦點，那麼為什麼中共又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級戒備呢？據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中共也是吸收了羅馬尼亞的經驗教訓，“暴亂”雖然是在遠離首都的地方（蒂米什瓦拉）發生，但其蔓延速度之快實在不能低估。所以，如果某地方發生“暴亂”，最好的方法就是盡快將火種撲熄，以免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如果全國一旦各地都有動亂，以現時只是為數三百萬的正規軍（其中陸軍只有二百三十萬），調動也是困難的。所以，他們決定全國軍隊進入一級戒備，那裏出事就在那裏“平亂”，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

二十七軍總部曾被衝擊

不過，中共沒有低估人民在憤怒的情況下所爆發出來的力量。據知情人士說，二十七軍在北京參加鎮壓民運後不久，它在石家莊的駐地就曾經被憤怒的群眾衝擊。此事鮮為人知。二十七軍屬三野系統，轄八十和八十一兩個師，擅長打攻堅戰和兩栖作戰，現任總參謀長的遲浩田也曾任二十七軍的政委。以二十七軍如此有名氣的部隊，而且是當時得令的楊家將的主力，竟然也有人敢於衝擊，可見人民到了不怕死的階段時的威力。

正因如此，中共也才這樣緊張，急急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級戒備。但是，根據我們的觀察和判斷，以及與身邊周圍的人們接觸，雖然人們對現政府都有一股不滿的情緒，但目前並不存在什麼動亂的根源，當局實在無需煞有介事，如臨大敵。他們必須打消再次大開殺戒的念頭。

短評

中共已錯 不能再錯

據本刊獲得的消息，中共已下令全國軍隊進入緊急戒備狀態。這樣做，顯然是害怕中國人民效法羅馬尼亞人民一樣起來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果如是，則中共將又一次犯嚴重錯誤。我們呼籲中共當權者冷靜思考自己的問題，切勿再蹈齊奧塞斯庫的覆轍。中共已錯在先，不能再錯了。

我們要強調，軍隊是屬於國家的，屬於人民的。中共把軍隊“黨化”本來就不應該，而且也違背了中共過去的主張，即軍隊應該國家化。現在更不應該利用軍隊來鎮壓人民。

軍委作出動用軍隊的決策，是理所當然的”。這番話不但為今年六·四出兵屠殺平民一事實行“合理化”，而且也明確一點，即軍隊今後不但用來對付敵人，也可以用來對付要求自由、民主的人民群眾。這個觀點，在中共建軍將近七十年的歷史中，還是第一次提出的。它徹底打破過去“軍民魚水情”的傳統。從這個提法，人們不難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開始出現了變化——從禦敵於國門之外變為統治者駕馭人民的工具。自從六·四出現人民的解放軍開槍鎮壓人民的事件以後，很多人都擔心解放軍的性質會出現變化。現在看來，這種變化已是成為事實了。

會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势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文件。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上述原則規定下來。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共為了防止東歐式的民主運動波及中國，正在準備採取軍事措施來解決人民對民主的要求。

附錄：《關於新形势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分十部分，內容如下：（一）清醒認識軍隊建設面臨的新形勢，把保證政治上永遠合格作為一項根本任務。

（二）必須堅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綫地位，充分發揮我軍的政治優勢。

（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大力加強各級黨組織建設。

（四）突出抓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始終保持部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五）堅定“四有”目標培養革命軍人，提高幹部戰士的思想道德素質。

（六）嚴格按照德才兼備原則選拔幹部，保證槍杆子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裏。

（七）高度重視反腐蝕鬥爭，鞏固部隊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陣地。

（八）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保持和發展良好的內外關係。

（九）貫徹唯物辯證法思想，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十）政治工作要在加強的前提下改進，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

當代周刊 89/12/30



羅國劇變後急防事變

中南海大震撼

東歐變化之快，羅國暴君倒台之速，使鄧小平目瞪口呆，指責有關方面報告失誤。為了提防東歐事變出現中國版，中共高層頻發機密文件……一個大清洗計劃正在全黨、全國、全軍展開，為的是排除和平演變和兵變可能性。

中共近年來不斷向東歐提「警告」

東歐大變化，中南海大地震。

鄧小平集思廣益，馬上採取預防更大「暴亂」的措施。北京和各城市呈現罕見的緊張氣氛，彷彿局勢即將爆炸。

為了提防東歐事變出現中國版，中共高層頻發機密文件。其中突出的是鄧小平關於東歐局勢的幾次「重要談話」。這裏將談話的主要內容摘錄和綜合報道如下：

「東歐向右轉了！」

「這幾年，我們不斷地向他們（按指東歐國家領導人）提出警告，可惜沒有能引起他們的注意，結果自己垮了！」

「從現在來看，我們執行了平暴的方针是非常正確的。想一想，如果當時我們不下這個決心（按：指調軍隊進北京「平暴」），局面會好嗎？」

「帝國主義和敵對勢力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和破壞活動。毛澤東同志生前就多次提到這個問題，其他同志也講過，可是黨內不少同志聽不進去，以為我們是在講空話，現在清楚了，變來的容易呀！」

鄧小平非讓戈爾巴喬夫路線

「東歐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就是這些國家的執政黨長期允許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祟。沒有預防措施，結果氣候一來，就亂了陣腳。」

「當然，東歐所處的地位與我們不同，他們受到了西方國家的重重包圍，再加上蘇聯的這個戈爾巴喬夫，他推行一條什麼路線，現在還沒有法子給他下個定義。他的路線加重了東歐國家的困難！」

「過去幾十年，東歐太依賴蘇聯了，結果老大哥一翻手，他們連條退路也沒有嘛！我們過去，現在，將來都要堅持一條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

「中國是一個大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任何經濟封鎖和制裁都不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鄧小平強調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決不能留情，打擊反革命分子決不能留情，反對黨內的腐敗決不能留情。要拉攏國際上敵對勢力在我們中國搞『和平演變』的陰謀，首要的是提高我們自己的本領！」

「東歐垮了，蘇聯也在變了，中國今後向何處走，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現實問題。有的同志提出世界革命東移論（按：王實有此提法），這個提法我不贊成。我們要老老實實，扎扎實實，結結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情。只要我們中國不垮，社會主義就有出路！」

「羅馬尼亞是不沉的社會主義巨輪」

鄧小平還說：「現在只有羅馬尼亞還在堅持。但是能堅持多久，許多同志都有這個擔心。齊奧塞斯庫同志告訴喬石同志，羅馬尼亞是一條不沉的社會主義巨輪。喬石同志回來後介紹了羅共黨大會的情況（按：指齊奧塞斯庫再當選羅共總書記），這個擔心沒有必要了。」

鄧小平還尖銳地指出，在東歐等國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就是「由動亂演變成一場反革命暴亂。」

鄧小平這些話，多半是在十一月底辭去中共軍委主席之後，在人大會堂對政治局常委和幾個老人說的。

鄧期望「戰友」齊奧塞斯庫頂住民主大潮

羅馬尼亞政權垮台後，中共政治局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員和有關部門負責人舉行聯席會議，認真討論了東歐局勢。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發生「動亂」後，曾先後三次親自和中國最高領導人通了電話，通報了羅馬尼亞的情況。中國指令駐羅馬尼亞大使館隨時和齊奧塞斯庫取得聯繫，向國內通報。

在最後一刻，齊奧塞斯庫確實想飛往中國。金日成也答應歡迎齊奧塞斯庫到平壤。但一切都晚了。羅馬尼亞這條社會主義巨輪不到一個月就徹底沉沒！這個事變，使中共最高領導人目瞪口呆。鄧小平得知羅馬尼亞的最近情況後，在人大會堂向喬石、錢其琛等中共領導人發了脾氣，指責他們報告的情況失誤。

其實這種「失誤」是情有可原的。東歐變化之快，羅馬尼亞倒台之速，恐怕全世界沒幾個人能預料到的。何況齊奧塞斯庫出走前後，還有一批武裝走狗、秘密警察為他自願頭顱。喬石他們的「失誤」，比起幾年前中共對菲律賓政變估計的錯誤就不算什麼了。當時科拉桑已經穩操勝券，馬可斯快要下台外逃，中共還表態支持馬可斯，這不是更可笑嗎？

其實鄧小平自己的「失誤」，比喬石嚴重得多。喬石到羅馬尼亞，表面上是參加羅共黨代會，實際上是傳達鄧小平對齊奧塞斯庫的祝願、期望和建議。鄧小平期望中共這位全世界最親密的戰友能頂住東歐的民主大潮，結果鄧小平不是完全錯估了形勢嗎？

「有些老同志聽到消息吃不下飯」

還有，鄧小平對東歐局勢的發展也估計錯誤。他以為讓姚依林到東德去活動，就可以防止東德「和平演變」，但是結果如何？他在一次同江澤民、李鵬的談話中慨嘆：「東歐垮得太快了！姚依林同志對昂納克同志講了決不能後退，後退沒有出路，可惜他們沒有把住，一退讓不成章，把共

北行放語 羅 冰

產黨的老本都賠光了！有些老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不是沒有道理的。」

鄧小平強調，在當前形勢下，必須穩定大局。他又一次得意地說：「我們調軍隊進北京城平息了反革命暴亂，西方國家打着人權的幌子指責我們，我們內部也有些同志有些不同的看法，現在不能爭論，有些問題就是要求之高調。」他又說：「什麼是大局，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局。」

為了穩定大局，為了預防東歐事變在中國重演，中共已經組成由江澤民、中紀委書記、中央軍委紀委書記等五名負責人組成的幹部審查領導小組，這個領導小組主要任務是逐個審查副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在整個學運中的表現。

抓緊審查幹部「和平演變」

據透露，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是根據鄧小平在五中全會前夕做出的指示決定的。中共認為，東歐變化之大，重要的一條原因是黨的領導幹部思想不堅定，缺乏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精神準備，所以動亂一來，上下一片驚慌，束手無策，要避免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必須從現在起嚴格考察、嚴格審查嚴格使用中央管轄的幹部（中共中央的組織部規定副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調配、使用、任命，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所以這批高級幹部統稱「中央管的幹部」）。儘管前一段對幹部的表現有過一段審查，但是組織部的「五中全會以後，到落實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狠抓『三嚴格』的落實。」

軍隊思想穩定成當務之急

為了保證幹部審查工作的順利進行，中共決定首先在中共中央三大部（組織、宣傳、統戰）進行，同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三大部（總政治部、總參謀部、總後勤部）及辦公廳進行，消息來源透露說，鄧小平指示：審查幹部決不能以人劃線，胡耀邦、趙紫陽倒台了，不能因此牽連一大批幹部，不然還會出現更大的問題。

中共高層確信，為了謀求局勢持續穩定，除了一九九〇、九一年要調動一切積極力量，把經濟問題解決好之外，對軍隊、對高級幹部，特別是黨員高級幹部，一定要抓得嚴，抓得緊。消息人士說，十二月中旬在北京召開的軍隊政治工作會議，是二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如何防止東歐事變在中國發生。為了保證軍隊的思想穩定，會議決定了三條：一、堅決、果斷、下大力氣首先調整好軍級單位領導班子，明年下半年調整師級領導班子；二、把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放在軍隊建設的首要地位；三、適當增加軍費開支，用於改善幹部戰士物質生活條件。

會議透露，從去年年初到今年「八一」，全軍共有一萬三千二百多人違法亂紀，其中送交軍事法庭的佔百分之六十五。

中共對黨政軍高層幹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此重視，理由很簡單，就是害怕政變、兵變、「和平演變」。中共把匈牙利利變革看作是從內部政變而演變成純粹是共產黨內高層，包括總書記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指導下產生的變遷。而另一個典型，即武裝力量介入「暴亂」的典型，則是羅馬尼亞。中共強調必須吸取這兩個典型的教訓，排除和平演變和兵變的可能性。

但是，中共這些措施，包括審查高層思想、調整領導班子等等，能夠在根本上防止中國的東歐化嗎？

從各方面的情況看來，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老虎裝牙

中共強化武警鎮壓力量

曾慧燕

中共堵截外逃部署嚴密

原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何頻，因積極參加八九中國民運，「六四事件」後被深圳公安局列為新聞界頭號通緝人物，經「地下通道」逃往澳門，成為首批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的大陸民運人士。

何頻抵加後，即加入「海外中國新聞從業者協會」，負責籌備出版《新聞自由導報》加拿大版，擬以各地留學生組織和民運團體為基礎，建立全加信息傳遞網絡。並擬與西方、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對華電台合作，將報紙內容及時傳播到中國大陸。

中共政法系統介紹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中共的政法系統。該系統包括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民政部、武裝警察總隊，還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檢察院。表面上，上述公安部部長是由國務院總理任命，最高法院、檢察院院長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但共產黨為方便統治人民，專門成立政法領導小組，目的是將上述這些部門統一控制，變相進行司法干涉。從對案件的偵查、拘捕、起訴、判罪等，政法領導小組都可橫加干涉或示意法官如何定罪，根本談不上司法獨立。

公安部本來是政法系統中最有實力的部門，名義上却低於檢察院和法院。公安部門的工作主要負責偵查國內政治案件，如異己分子活動等；另外是偵查社會治安刑事案件、緝捕、戶籍管理、消防、出入境管理和交通管理等，掌握很多實權隨時可把人抓起來。比較西方警察，大陸公安人員工作一般較輕鬆，大多數不用上街巡邏。這裡要談社會聯防隊，這支隊伍由羣眾組成，人員遍佈全社會，形成一個廣泛的網絡，「革命警惕性」非常高，是中共對付「階級敵人」強而有力的力量。

五十年代，公安人員主要來自退伍軍人。去年以來有所改變，整體素質來說非常糟糕，缺乏法律常識，教育水準低。在「六四事件」發生後，雖然有些民運人士得到公安人員保護，卻是個別情況，毒打民運分子的多是公安人員。

據我所知，目前武警增長速度很快，一般相信已有二十萬人，以後數量還會增多。「以警代軍」，是鄧小平進行百萬裁軍時的一個策略。雖然一部分正規軍被裁掉，但真正解除軍隊實力。外界對武警的力量過低估計，其實相對正規軍而言，可說「換湯不換藥」。

武警負責的工作範圍很大，包括執行邊境巡邏任務、口岸檢查、負責保衛黨政機關、看守所、收容所、勞動教養所、監獄、政要部門和重大工程設施等。目前更有跡象顯示一些中共政要的崗哨，也改由武警取代。以前通常是由正規軍執行這些任務。

關於武警隊伍，海外似乎缺乏資料，沒有對它的作用引起足夠重視。這支力量非常強大，中共高層領導人有鑑於公安力量不足，在「六四事件」中出動軍隊鎮壓民運，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憤慨，國內外輿論反應強烈，因此有意引進一批現代化的防禦設施，例如催淚瓦斯、橡膠子彈等。如果下一次再發生大規模的民運，中共為掩護世人耳目，可能不會再出動軍隊，但會利用武警這支隊伍鎮壓。不僅在鎮壓民運方面，在中共政治鬥爭和內部權力鬥爭中，武警將扮演極其重要角色。

△中共為堵截外逃，在深圳佈下六個支隊的武警相當六團兵力，加上深圳公安局五千人的編制，目前約有一萬二千人的佈防力量可用來對付外逃。

△中共武裝人員正在迅速增長，估計已達二十萬人，將成為今後鎮壓民運的主力。在今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治鬥爭中，將扮演極其重要角色，對大陸政局的影響不可忽視。

△中共有計劃進口一批現代化的防禦設施，例如催淚瓦斯、橡膠子彈等，以便對付下次民運高潮的到來。

△武裝名義上屬公安部領導，實際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領導小組組長喬石指揮。

△鄧小平當年百萬大裁軍，施行了「以警代軍」的策略，把部分正規軍調入武警隊伍，編制上實行兵役制。在武警頭目中，相當一部分人原為解放軍指戰員。

△前國家安全部長陳雲較早時，在主持國家安全會議上，曾指示要加強對港、澳、台和外國的滲透工作。目前盛傳中共派出大批特工前赴海外，估計人數不會太多，也不為僑胞恐怖，而是為了滲透。例如他們在香港的滲透活動很成功。今後在海外發展成員，將是國安部的工作重點之一。

這次國安部在民運中起的作用不大，現任國安部長賈春旺有下台的可能性。中共高層有人不滿地表示，安全部

武裝警察由喬石領導

下面我着重談談武裝警察的情況。武裝名義上屬公安部領導，但有自己獨立的指揮系統，實際是由喬石領導。在地方行政上，公安部門對武警無領導權，所以不能控制它。武警成立只有五年時間，但發展迅速，力量強大。鄧小平在百萬大裁軍時，把一部分正規軍轉入

武警隊伍，其指揮官也是原來的解放軍將領，在編制上屬兵役制，內部晉職方法與部隊也非常接近。例如解放軍用的是軍、師、團、營、連、排、班編制，武警的編制是總隊、支隊、中隊、小隊。總隊相當於一個師，支隊相當於一個團。在武器裝備方面，正規軍以重型武器為主，武警則使用輕型武器，設備先進，並以肉搏為主，已建立起一套獨特的訓練系統，經常進行一些特殊訓練，又聘請民間拳師、武術師進行訓練。

據我了解，目前武警增長速度很快，一般相信已有二十萬人，以後數量還會增多。「以警代軍」，是鄧小平進行百萬裁軍時的一個策略。雖然一部分正規軍被裁掉，但真正解除軍隊實力。外界對武警的力量過低估計，其實相對正規軍而言，可說「換湯不換藥」。

武警負責的工作範圍很大，包括執行邊境巡邏任務、口岸檢查、負責保衛黨政機關、看守所、收容所、勞動教養所、監獄、政要部門和重大工程設施等。目前更有跡象顯示一些中共政要的崗哨，也改由武警取代。以前通常是由正規軍執行這些任務。

關於武警隊伍，海外似乎缺乏資料，沒有對它的作用引起足夠重視。這支力量非常強大，中共高層領導人有鑑於公安力量不足，在「六四事件」中出動軍隊鎮壓民運，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憤慨，國內外輿論反應強烈，因此有意引進一批現代化的防禦設施，例如催淚瓦斯、橡膠子彈等。如果下一次再發生大規模的民運，中共為掩護世人耳目，可能不會再出動軍隊，但會利用武警這支隊伍鎮壓。不僅在鎮壓民運方面，在中共政治鬥爭和內部權力鬥爭中，武警將扮演極其重要角色。

這次國安部在民運中起的作用不大，現任國安部長賈春旺有下台的可能性。中共高層有人不滿地表示，安全部



武警在天安門前巡邏。

北京來鴻談「六·四」 公安系統的清洗

梁逸（北京）

XX:

學運開始不久，公安部即下通知，對其內部人員約法三章，不能遊行、聲援，不能支援（指財物方面）等。可實際上確有人去遊行、聲援、支援。“六四”事件後，首先整肅本部人員，並從于造成下手。于造成，持不同政見者，原是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六四”前退休，在學運中與其他學者等在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編寫、複印有關的材料。“六四”事件後，首當其衝地被公安部宣布予以逮捕，送交關押場所，進行審查。隨之而來的是部屬各單位的集中學習，提高認識。背靠背揭發檢舉。搞人人過關（編者按：據報于造成已釋放，改為軟禁在家）。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乃公安部屬下的院校。學運中其學生自行組織去天安門廣場聲援，慰問當時絕食的學生。他們身著警服打著橫幅標語，在天安門廣場遊行。慰問的情景在電視台播出後，即遭公安部部長的嚴厲譴責，並以黨紀、政紀、處理的大帽高壓威脅。要校方保證不能再發生此類現象。“六四”事件後，以教育無方，管理不得力等原因為由，對校方的高級要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處理，並派調查組進駐此大學。對到天安門廣場進行聲援、慰問之學生進行詳盡調查，一一做了處理。

北京市公安局屬下的公安醫院（大陸僅有兩所公安醫院：北京和天津）的部分醫務人員去天安門廣場聲援、慰問學生的報道播出後，公安部派員進行整肅。因為當時天安門廣場已被學生設立了幾道糾察綫。沒有廣場指揮部的特許，是很難進入到廣場的縱深部位。能夠進去的，肯定與學生的關係比較密切，因此“六四”後他們遭到的調查比人民公安大學的學生的調查更詳盡，處理也嚴厲得多。“六四”事件後，這些醫務人員基本上停止了工作。集中學習，書面檢查，對召集人更是詳盡審查；與「高自聯」甚麼人認識？甚麼關係？他

們目前在甚麼地方？幫助「高自聯」做了甚麼工作？是不是？「高自聯」成員？等等。北京市公安醫院一事，列為公安部“六四”事件三大專案進行處理。至於某些醫務人員的命運如何？那可想而知了。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公安局是這次“六四”事件中除軍方外的重要角色。

早在學運開始，國家安全局、公安局分別派遣便衣人員混雜在學生當中，監視主要人物。他們唯一相互識別的標誌是紅色布造成的袖章，上面是正楷的金黃色字“特警”，背後標有來自不同部門的標誌。袖章放在口袋裡平時不露出來，準備在抓人時才戴上以資識別。這樣做一是防備自相殘殺。二是可相互識別，配合行動。但這樣也避免不了厄運。當軍隊向人群開槍，抓人時，其中不少公安及安全局的人也遭同樣命運。儘管後來放出來，可仍未避免皮肉之災。筆者“六四”後曾找過公安局、安全局的人聊天。談及此事時，他們也是面露憤怒之顏，大喊當兵的混蛋，畜牲不如，「老子也是為黨工作」等。這其中有一些是老警察，在“四五”事件中曾立功的（二等功和集體二等功）。他們是心有餘悸。他們說“四五”讓我們抓人，抓了又放，又平反。這次也難講幸虧有當兵的在前面。不然又是我們打沖鋒？萬一又平反，我們都四十多歲的人了，後半輩子怎麼辦？而這些人又是目前公安局的中堅份子（指參加工作年齡和資歷）。“六四”後，公安局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採取消極的態度，走一下過場，好對上面交差。而另一種人則是視公安局工作如工具，說抓誰就抓誰。

由於“六四”事件中被市民、學生搶奪的槍枝較多（加上焚燒的軍車上也有不少槍枝），北京市隨之而來的是成立舉報中心，設立舉報電話，讓廣大市民檢舉、揭發暴徒和隱藏槍枝、彈藥、軍用物資的人。當政府部門收到舉報電話或信件後，首先通過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查是否有此人。如有此人，即通知此人所在派出所，問此人表現怎樣？“六四”那時，很混亂，誰人也不知誰怎

樣。全是憑派出所的民警主觀印象，如果是“二進宮”或有前科的（指曾因犯刑事罪被判刑，或拘留審查，勞動教養），那必抓無疑（“六四”後報刊一再強調“六四”中的“暴徒”大部分是刑滿釋放，或解除勞動教養之徒的原因在此）。而對沒有前科犯罪的人，憑印象出發，一般是在晚上由當地公安人員帶路，把所要找的人叫到門口，戒嚴部隊（一般四、五個當兵的對付一個“暴徒”）驗明正身後，一頓拳打腳踢，五花大綁，就送到關押地審訊。

北京市下轄有區，區下轄有街道委員會，街道委員會下轄居民委員會。居委會中負責治安的人被人稱為「小腳偵察隊」。當地公安人員就依靠他們去監視千家萬戶居民的生活。

“六四”事件後，舉報開始，這些“小腳偵察隊”或是開始琢磨回憶，那些人去了遊行，或看燒軍車。我聽他們講了些甚麼，然後，集中反映給公安人員，由他們去處理。這當中就有報私仇的，以前同誰吵了架，打了架等，結下恩怨的，就一口咬定有人看見某人怎樣怎樣了。真有點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的勁。你講你沒有燒，有誰能證明呢？前面提到抓到人先打後審，關些日子再說，報私仇的事例不少。筆者曾親自聽到有個公安人員講：「媽的，真解氣。以前打我弟弟的那幾個人，我同xxx派出所的哥兒們一講，嘿，抓了，先揍一頓，關幾天再說。」

“六四”事件後，北京的晚上是可怕的。一般晚上八點半以後，戒嚴部隊開始查驗任何人的居民身份證。

不管你是步行，坐公共汽車，出租車等，當兵的一招立即停下，否則鳴槍示警，不聽者開槍射擊。一般人晚上無事不出門，除非上夜班的，只好如此。

有時借口有人放冷槍，當兵的可隨意進入民宅搜查。所知已有幾起這樣的事情，先後在北京朝陽區三里屯、海澱區羊坊店和東城區台基廠等地發生。 ■

當代周刊 98/2/3

下一個整肅目標：國安部

昆倫

國安部第一副部長孫文芳曾是新華社駐倫敦首席記者，常務副部長于放也曾以新華社工作人員身份常駐美國。這兩人均是海派人物，思想比較西化，對趙紫陽的開放改革政策頗為欣賞。由於賈春旺是個外行，國安部的實際工作是由孫、于兩人主持的。

八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召開秘密會議討論解嚴問題和對趙紫陽的威懾問題。這次會議否決了解嚴的意見，主要原因是公安系統靠不住，還需借用戒嚴部隊的力量維持局面。同時這次會議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先借戒嚴部隊的力量整頓公安系統，再借整頓後的公安系統來整頓國安部系統。三者的關係恰似黃雀、螳螂和蟬。

國安部就其工作性質來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部門，其嚴密的保密系統使它不易頻繁換將。這就是為什麼中央高層遲遲未動這個「自由化重災區」的原因。投鼠忌器，四年多前發生的于甄三事件歷歷在目。

從于甄三到王錫爵

于甄三曾任國安部海外局人事處長，手中掌握著一大批海外特工人員的名單。這個位置是國安部最重要的職位之一。于甄三表面看起來沉默寡言，處世小心謹慎，所以被任命此職。一九八四年，于甄三認識了一個比他大十歲的女人。後來得知此人為替好幾家服務的國際間諜，常來往於美國、台灣、香港之間。自于甄三識她之後，一見鍾情，常常赴香港與她幽會，兩人打得火熱。最後，不知是出於愛情的誘惑還是醞釀的脅迫，于在一九八六年突然經香港出逃。于失蹤一個月後，國安部才發現，可是已經晚了。在世界各國，中國潛伏多年的間諜紛紛曝光。

在美國，自朝鮮戰爭就為中國服務，潛伏四十多年的中共間諜金無忌被美方逮捕，接著這位倫敦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神秘地在獄中自殺身亡；然後，在美國西部潛伏多年，專門

獲取硅谷情報的龍雲之子龍XX在臨登機回國前被美方FBI扣住；接著在法國男扮女裝，與另一同性戀同居六年之久的中國間諜黃XX也被法國當局逮捕，直到逮捕他之後才知道他是男人……

王錫爵是共產黨在台灣長期臥底的特工人員。在國際上一直告急之中他也坐不住了，這便在台灣已生根落地，成家立業的中年人為生命安危所迫，不得不拋棄妻子而逃了。為了策劃王錫爵的逃亡，國安部派出了海外首席間諜金XX，代號七〇一，親赴泰國。七〇一是中國頭號間諜，貌視一白面書生，但各國間諜機構都知道，首席間諜只有在有重大國際事件中才動用。所以至今很多人仍無法理解為什麼輕易動用他僅僅是為了策劃一個令台灣驚慌的「起義」。

于甄三後來到南美一個國家隱居起來了，可是他的叛逃所帶來的震動至今記憶猶新，共產黨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才穩住陣腳。

投鼠忌器先擒後剿

「六四」之後，共產黨在海內外喪盡人心。國安部在海外的特工人員的叛逃事件急劇增加，據我所知，在四個月內已有七人在美國尋求避難。（總數一定不止此數）甚至有人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當場曝光。

這一情況使中共一時不知所措，在沒有可以依賴的力量整頓國安部和沒有力量替代篩選掉的人員時，其基本策略只能採用「先擒後剿」的方針。所以對賈春旺這樣的人一直遲遲不動手，以免打草驚蛇，引起海外更大規模的叛逃風。如果再發生一個于甄三事件，那麼海外的間諜網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不過對於鄧小平、李鵬來說，國安部的自由化因素一直如梗在喉。如果公安部門的整肅能夠在今年底按計劃完成的話，那麼整頓國安部的計劃將在明年開始。那時，海外的很多工作人員將會大換班，國內一些關鍵部門的人有可能悄悄消失。

戒嚴部隊約拿耗子

中共當前的武裝鎮壓機器可以分為四個部份：軍隊、武警、公安、國安。軍隊按理是國防軍，用於抵禦外侵，武警部隊用於鎮壓內亂，公安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國安部則負責國際間諜案。

可是「六四」之後，國家機器的忠誠度出了大問題，鎮壓機器的分工已被打亂。鎮壓也好，打擊也好，清洗也好，總是要有具體的人去執行，現在李鵬政府頭痛的是：這些執行鎮壓的工具還不可靠？

從民主傾向、開明程度和思想解放程度而言，上述四個鎮壓系統中最好的是國安部。因為其工作人員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很多人出國，見過西方社會，因此對專制體制的離心力最強。

其次是公安局系統，因為它大部份工作人員為當地城市居民，在八九民主運動中，受到其家屬及好友的影響，內心頗同情學生和示威群眾。所以，這個系統也具有相當的離心力，本大大整肅中有很多重要民運人士逃出海外，若沒有公安系統內部人員的協助是不可想像的。

再其次是武裝警察部隊，即過去的地方衛戍部隊，這支部隊掌管大部份由農村兵組成，文化水平較低，但它畢竟長駐城市，眼界比駐營地的野戰軍要開闊許多。耳聞目睹民主大潮，不免也會產生離心傾向。

最保守愚昧的是野戰軍，其官兵長駐遠離城市的營地，信息不靈，思想最易控制。現在北京的戒嚴部隊，就是由野戰軍組成。北京市民普遍反映，鎮壓民運人士最兇是戒嚴部隊，而武警其次，公安局則要好得多。

按分工，野戰軍用來鎮壓「內亂」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了，更不用說用來維持社會治安了。戒嚴部隊之所以至今越俎代庖公安局的業務，顯然是因為後者已不再靠得住。事實上，公安系統內部的清洗早就開始了，北京市公安局已有約五分之一的幹部被停職或離職，甚至有人被逮捕。廣州市公安局有兩個處長，深圳市公安局局長因為協助民運份子逃亡而被隔離審查，此案涉及公安系統內部逾百人。

然而，隱患並沒完全排除，公安系統的清洗之後，下一個目標將是國安部。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在整個中共鎮壓機器中，國安部可以說是「自由化思潮」的重災區，特別是那些經常在國外活動的工作人員，很多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人非草木，焉能無情，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有思想受過教育的人，在中國的專制落後和西方的民主進步的反差中，他們豈能沒有自己獨立見解。據我所知，他們中間有人暗中對民主運動提供的幫助，遠遠超過中國民聯很多普通成員。

國安部現任部長賈春旺在中共元老派眼裡是個不可用的人，可憐是因為他是陳雲的女婿，保住這個江山的立場是不容置疑的，這也是為什麼他突然被從清華大學團委書記提升到國安部長的原因，可是賈春旺工作方面的無能也是人所共知的，且不說黨內其它派系對他的疑慮，就是他靠不靠得住也是個問題。

據外必先安內

抗戰時期，蔣介石曾有一個基本的戰略倍受共產黨抨擊：攘外必先安內。而實際上，這正是共產黨今天的處事原則。它的清洗也好，打擊也好，向來是外鬆內緊，它恨黨內異己，甚於社會異己，恨社會異己甚於海外異己，恨民聯甚於恨台灣，恨台灣甚於恨美國。

備得共產黨這條原則，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戒嚴令已下達半年之久仍遲遲不肯解嚴。說為了社會安定是解嚴不過去的，因為自六月中旬後社會上大規模群眾抗議已停止。實際上，李鵬政府把荷槍實彈的大兵留在北京街頭以其說是為鎮壓人民的反抗，還不如說為了防備國家機器內部的異己份子。所以前一段時間大整肅的重點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是在大專院校，而是在國家黨政機關。

中國當前的局勢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安定但不團結。對於共產黨來說，內憂更甚於外患。

中共加強武力統治

中共最近決定，在全國各大人口中心建立防暴隊，並要求全國的軍隊看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

何伯施(北京)

隨著蘇聯東歐局勢的急劇發展，中共對國內發生突變的擔憂與日俱增。這可以從最近中共一連串部署看得出來。例如：

首建全國性防暴體制

第一：在全國各大人口中心建立防暴隊。這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來所未有過的。中共中央最近發出關於全國組建防暴隊的文件中規定，要從省一級開始，分別建立省、地區、市、重點縣等防暴隊編制。這種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建立防暴隊的耐人尋味做法，是過去所沒有的。這反映了中共的統治越來越依靠武力來維持。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中共對蘇聯東歐發生的變化，是十分憂慮的。在這支防暴隊建立以後，中共的專政體系又多了一層鎮壓力量，即：軍隊、民兵、武警、防暴部隊。

第二：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在上星期六(二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軍區召開一個會議時下達一項命令，要“全軍保持高度警惕”。他還要求加強各野戰軍之間的團結。中共的解放軍報還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妄圖滲入軍隊，策動軍人參與動亂。這就是楊白冰號召全軍“永遠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

要求全國絕對服從黨

第三：向全黨發布了中共軍內一分文件“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若干問題”(編者按：關於這個文件的詳細內容已見本刊第六期，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本來這個文件是軍隊內部的文件，用以統一軍隊思想，以便加強中共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的文件。現在軍內文件要發全黨學習，據新華社在發表這個消息時說明，就是要全黨學習軍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這其實就是要加強中共對全國各級政府和機構的控制。

第四：要求公安部加強特工情報工作，偵查國內外反動組織，以配合鎮壓措施。最近，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還為此向全國各省市區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政府的公、檢、法系統加強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以防止出現東歐、蘇聯式的群眾運動。

本刊獲知的這個文件指出，今年中國社會治安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是在蘇聯東歐局勢發展的刺激下，中國各地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不法分子鬧事”。文件要求各級黨委，要提高“思想認識”，並採取各種有效的措施，制止“動亂”。

加強思想控制

在提高思想認識方面，文件說：“各級法院要教育廣大幹警充分認識國際敵對勢力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和長期性。充分認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充分認識穩定的政治局勢對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極端重要性”。

關於採取有效措施方面，文件提出三條：

加強情報工作

· 強化情報工作，積極預防各種突發事件。加強省、地、市、重點縣指揮中心的建設，盡快組建和加強防暴警察、武警機動隊伍，提高總體作戰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

· 突出抓好反顛覆、反滲透、反破壞的鬥爭，堅決揭露和打擊境外敵對勢力、反動組織在我們的破壞和國內各種反革命的現行破壞活動。

· 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確保公安隊伍、武警部隊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保證“刀把子”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上。

除了公安部門要做好上述思想上和措施上的準備外，各級法院也同樣要求加強審判工作的“專政作用”。文件說，人民法院作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政法工作必須置於黨的領導下。在當前的形勢下，“法院必須增強階級鬥爭觀念和專政意識”，把保衛黨的領導、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當作我們的首要職責，充分發揮“刀把子”的作用。文件還強調，對製造“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案”，一定要從嚴懲處，決不“心慈手軟”。

從文件中多次提到“刀把子”作用這點可以看出，中共除了強調“槍杆子”之餘，現在還要增加一個“刀把子”，才能鞏固

其政權。

大力補充兵員，軍費今年不減

第五，大力抓新兵源以加強兵力。中央軍委最近在發出1990年征兵命令時，在一分宣傳提綱中也提出今年征兵，各級要樹立反和平演變的觀念，同時要杜絕民運分子“混入軍隊”。這分文件說：“當前在有些地方，人們由於對國際形勢缺乏認識，國防觀念比較淡薄，青年服兵役的積極性也受到影響。應該看到，當前世界正在從對抗轉向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但是，這並不等於國際對抗已經消失，天下太平無事了。國際反

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西方資本主義妄圖對我實行和平演變和顛覆分裂的戰爭沒有改變。我們國家的安全需要以必要的國防實力作後盾”。提綱又說，“在今年征兵工作中，特別要嚴防那些支持參與北京動亂、反革命暴亂、打砸搶燒殺的不法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嚴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心懷不滿的人混入部隊”。

此外，據財政部門透露，為了增加兵力，今年三月向人大提出的財政計劃中，國防預算將不會壓縮。在財政總開支增長不多的情況下，將壓縮其他部門的開支，而國防預算將不受影響。

當代國刊 90/3/3



中共統一軍隊思想，加強控制。

鄧小平的調虎離山計

本刊記者

三月人大即將召開，這是六四事件以來，中共政權最大的一次公開會議。在東歐動盪地變化的強烈衝擊之下，人們對中國政局的關注，自然放在人事上面，看看各派勢力的消長如何？

黨軍幹部調換三部曲

記者最近從二月中「武警」高層改組，追溯到一條有關人事調動的大計劃，消息來源透露，鄧小平為了防止任何有組織的內部出事，決定採取三個重大步驟：

- 一、改組北京的防衛系統；
- 二、調換七大軍區司令員；
- 三、調換各省第一書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鑒於林彪叛逃後的震盪，為防止軍隊出事，毛澤東也採取過八軍區司令對調的措施，十六年後，故技重演，說明今天大陸內部局勢的嚴重性。

北京武警達七萬人

改組武警總部就是第一步的主要措施。同時，為清除內部隱患，在全北京進行黨員重新登記，查六四表現，有無參加示威。為此特地成立了一個「工委」，調配幹部，專職其事。

武警警察部隊總部是一九八三年四月成立的，原屬公安部領導，武警由四部分組成：內衛武警、黃金武警（工程）、交通武警（消防）、邊防武警。總部下各省共設三十個總隊，總隊為師級編制。北京也有一個總隊，編制一個加強師，兵力超過一萬人。

據悉，這次武警總部換人極為突然。武警司令員李連秀二月十三日下班時，接到楊白冰的電話，請他去總部談話，然後，只用了半小時就宣佈免職，由周玉書接任。周是駐北京的二十四集團軍司令。二十四軍在「六四」後調了三個師加入北京市武警，現北京武警共有五個師，約七萬人。

要求武警對北京治安負全責

撤換李連秀的原因，是和趙紫陽有關。據知情的內部人士說，中共高層在北京學運期間，原有一個把絕食學生從天安門強行拖走的行動計劃，由武警為主體的公安部隊執行，但

計劃被趙紫陽擱置了，說等戈巴喬夫走後再說，而戈氏走後，局面已不可收拾。「六四」之後，高層在內部檢討中，對武警壓力很大，有人說，如果武警得力，就不會動用軍隊，搞得那樣被動。內部傳達李鵬在當時就指責趙紫陽是「姑息養奸」。

現在，中共高層決定加強武警，並把武警的指揮權轉到中央軍委，要求今後北京一旦有事，武警要能負起全部責任，不再動用軍隊。

鄧小平決心削平地方山頭

鄧小平也是信奉「調虎離山」計的。他在七五年出任總參謀長時，也主張軍官和幹部的對調，以削弱地方山頭，他當時有一個連省軍區及地方幹部要調動的大計劃，認為是根治文革弊病的重要方法，可惜沒有完成，他就被四人幫趕下台了。可見阻力是很大的，那些山大王離開了他們苦心經營的窩子，自然是如淺水龍困在沙灘。

一位從天安門廣場逃出的攝影師告訴記者，他深信一位軍官的話：參與平亂的軍隊的各路部隊都是混合的雜牌軍，最大的集團不超過一個營。高層已把軍隊集體叛變的可能性考慮在內了。

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表示：調虎離山計的第二步跟著就要以「中央軍委命令」的形式執行，是否如七十年代那次那樣，只准帶一個秘書走，尚不得而知，但老鄧在世，一定要完成這個計劃，第三步的重要性，不及一、二步，具體計劃尚不清楚。據說，原則上還是一個幹部不能在一個地方呆得太久，否則會產生「地方主義」。

不准葉選平留在廣東

另外，有人透露，北京高層非常重視廣東的問題。理由有如下幾點：

- 一、廣東學運雖不厲害，但屬「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源流之地，廣東靠香港，受香港影響太大，民運份子多經廣東而外逃。
- 二、趙紫陽長期在廣東工作，要防止支持趙的勢力陽奉陰違；
- 三、廣東地方主義有淵源，林彪都有過在廣東另立中央的計劃。

葉選平調中央任副總理之議，已傳了很久，葉謝絕上調之說也盡人皆知，但最近廣東省人大突然改在全國人大之後的五月召開，葉選平也提前上京參加三月人大，是一項引人關注的異動。據消息人士推測，北京方面可能下了決心，一定要調走葉選平，否則，鄧小平的削藩計劃會遇到更大阻力。

一位廣東作家對記者笑道：「葉省長這次上北京，可能不會回廣州了，一個宴會就杯酒釋兵權了。」

鄧小平的健康可疑

關於鄧小平的健康，有一點可以報導，記者獲悉可靠方面證實，鄧小平最近確實說到「死」的事，他要求死後「一切從簡」。北京留意政情的人說：老人家一般忌諱說「死」，既然老鄧說起「死」來，說明他的自我感覺不好了，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跡象。

北京幹部答客問

三月初，承友人介紹，記者在香港一酒店咖啡座，同一位來港探親的中共幹部有過一次訪談，下面若干問答可供讀者參閱：

問：您看葉選平和李鵬的關係怎樣？

答：據我所知，他們關係不錯，都是留蘇生，葉劍英和鄧穎超關係也很好，鄧穎超在推薦李鵬上是落了力的。

問：楊尚昆會不會當國家軍委主席？

答：沒聽說。不過，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楊白冰當軍委秘書長的事，楊尚昆曾表示與論上會通不過，是鄧小平決定的，他對楊尚昆說：楊白冰工作得很好，內學不避親戚嘛！

問：江澤民軍內沒有基礎，如何指揮他？

答：你們不了解解放軍，軍隊的調動不是一個人一句話就可以指揮得動的，林彪軍內有基礎吧，他做副統帥也調不了軍隊，周總理却可以調動。中國的軍隊是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不能同別國比。

六四是鄧小平下令殺人

問：「六四」殺人，是不是鄧小平下的命令？

答：不是「殺人」，是有命令「對圖謀不軌者採取果斷措施」……

問：和殺人沒有區別。

答：命令絕對是鄧小平下的，只有他才能承擔這個責任，即使別人提出，也要他批准。

問：殺了多少人？

答：我估計和官方提的數字不會差太大。主要是在部隊進城時造成的傷亡。廣場上沒有死人。

問：我們不相信廣場沒有死人。美國之音報導還不能相信嗎？

答：我不全信。

問：你看方勵之的問題如何解決好？

答：我不知道中央有什麼政策，但方勵之在國內的影響不像你們看的那樣大。我看他躲進大使館，做得很不聰明，他要是留在家裏，一定會成為英雄。

問：那肯定會被抓，然後悄悄殺掉。

答：不一定，你還不了解共產黨。

問：世界民主潮流什麼時候可以湧到中國？

答：中國的事不能急，歷來比世界慢，我看九五年之後會有變化。

—
新聞界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287	爭取新聞自由，抗爭方興未艾（尤梓賢）	鏡	6/89	34/36
289	有人向鄧告狀導報隨之遭殃（方任野）	鏡	6/89	38/40
290	何罪之有？海外知識界談欽本立事件（莫利人）	爭	6/89	36/37
291	中共為何整欽本立（李勇）	爭	6/89	39
291	「北京日報」的內部鬥爭（李目）	爭	7/89	22
292	中國新聞界大地震（雷默）	廣	7/89	46/48
293	大陸新聞界一步一倒退（承嬰）	九	9/89	65/67
294	黑太陽籠罩下的新聞界（周廣華）	解	10/89	12/13
295	大陸新聞界的滅頂之災（何頻）	爭	10/89	18/19
296	出版界有新限制——壓縮品種選題減少	當	9/12/89	9
296	「六四事件」後中共查封「新觀察」雜誌近況（燕南飛）	百	16/1/90	8
297	為中國哀，為戴晴辯（大衛）	明	1/90	45/47
298	薛飛、杜憲調職「反思」（周廣華）	解	1/90	14
299	中共內外加強控制輿論	亞	4/2/90	8
300	中共清查「神經中樞」（京聲）	爭	3/90	18

爭取新聞自由 抗爭方興未艾

尤梓賢

科技日報記者撰文，客觀報導了北京學生的悼胡活動，首先衝破了官方的新聞封鎖。
「世界經濟導報」發表悼胡座談會專輯，總編輯欽本立被停職，導報同仁奮起抗爭。
五月四日北京新聞界首次走上街頭，高呼「新聞自由」的口號。
全國人民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正方興未艾……

傳媒歷來是中共的喉舌

四月中旬，以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為契機，在首都北京觸發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學生民主運動，震驚了全世界，也牽動了海內外所有關心中華民族命運和前途的中國人的心。而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大陸新聞界異軍突起，他們破天荒地挺身而出，或聲明抗議，或遊行示威，喊出了一「新聞自由」的響亮口號。

大陸傳媒媒介長期以來在當局的控制下，哪有什麼自由可言？報紙、電台從來就是黨的喉舌，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新聞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為共產黨在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服務，誰也不能越雷池半步。神州大地，輿論一律，從中央到地方，只有一個聲音。即使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在各個領域（包括文學藝術）都允許有了少許鬆動的情況下，新聞界仍然動彈不得，新聞媒介仍然是一個密不透風的禁區。電台、報紙不講真話，新聞媒介全無威信。極權多年的「新聞法」仍遲遲未能出爐。以致在八六年的學運中，由於報紙沒有客觀公正地報導學運的真實情況，因而激起了學生的公憤，終於引發了北京大學學生懸屍（北京日報）的壯舉。

在八九學運興起時，作為中共喉舌的新聞媒介又重施故技，不僅不如實報導學運的真相，反而影射愛國學生製造動亂，指責學生衝擊政府機關，隻字不提武裝對學生動粗，有的人還無中生有地進行栽贓，如中宣部副部長兼新華社副社長曾建徽竟在記者寫的稿子上，加上學生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等句子，企圖讓愛國學生背上「反對共產黨」的罪名。傳媒這種拙劣的行徑，又一次激怒了學生，他們在遊行中義憤填膺地呼出了「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光明日報，並不光明」、「北京日報，顛倒黑白」等口號，向新聞界提出了抗議。

「導報」是新聞改革的先鋒

其實，大陸絕大多數的新聞工作者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並不甘心扮演這種極不光彩的角色，

只是在沒有言論自由和輿論一律的禁錮下，長期以來他們不得不昧着良心講違心話、寫違心的報導。但是，在世界民主潮流澎湃澎湃的今天，任何當政者要繼續進行新聞封鎖，要繼續剝奪人民的知情權，終究是不可能的，歷史已經把新聞自由提到日程上來。而這次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進一步激發了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良心，引發了新聞工作者為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而抗爭的導火線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世界經濟導報》是一份在海內外經濟學界、學術界有巨大影響力的週刊。該刊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共同創辦於一九八〇年，由具有獨立人格的老報人欽本立擔任總編輯。由於「導報」以敢言著稱，對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廣開言路，兼容並蓄，故為廣大讀者所歡迎，但亦引起當權者的不滿，必欲去之而後快。在八七年初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導報」曾被中共高層點名批評，甚至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及去年的三中全會理論研討會中，竟禁止

「導報」的記者進行採訪。欽本立風骨棱棱，毫不妥協，仍堅持大膽敢言的報格，利用「導報」不屬任何黨委直接領導、實行總編輯負責制的有利條件，置當局出示的「黃牌警告」於不顧，繼續打其一擦邊球。

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導報」第四三九期上，刊登了該報與《新觀察》在京舉行有約四十名著名學者參加的「耀邦同志逝世在我們心中」的座談會發言專輯。當局以座談會內容中有些如公開發表、對穩定當前局勢十分不利，將會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安定團結為由，扣壓了已印好的卅萬報紙，並於二十六日由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出面，宣佈停止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並派工作組進駐，整頓「導報」。

據說，政治局一位常委曾向鄧小平告狀：《世界經濟導報》越走越遠，什麼都談。鄧對加強對新聞控制極有信心，他曾說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撤一個記者，一年可撤三百六十五個。」

面對壓力，「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及其同事們並沒有屈服，他們奮起抗爭，遭到工作組的干預，先後導至第四四二、四四三兩期脫期。五月十三日，「導報」編委會發表三項聲明，要求工作組盡快撤出導報，重申保持依法追索賠償權利。欽本立更拒作檢查，導報同人認為，他們沒有錯。欽本立更認為現在不是他一個人作檢查的問題，這涉及導報全體工作人員，及曾經在導報困難時期接援他們的人。他又說，他們希望中國社會不再發生類似導報的事情，並希望通過此事，在大陸推廣新聞自由，以一種制度來保障新聞自由。

欽本立和導報同仁受到了國內外新聞界人士的支援，慰問電文如雪片飛來。人民日報百餘位工作人員的電文說：我們對你主持的《世界經濟導報》推進民主政治的膽識深表欽佩，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不容粗暴干涉。文藝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新聞單位的編輯記者也紛紛去電慰問。中國日報職工的電文讚揚道：「威武不能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

痛心疾首！

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上書「痛心疾首」四個大字



新聞界首次走上街頭

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引發的新聞工作者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終於在五月四日爆發。這一天，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中新社、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科技日報、亞太經濟時報等約二十家首都新聞單位的五百名新聞工作者，參加了愛國學生的大遊行。他們高舉的橫額和高呼的口號是：「新聞公開」、「開放報禁」、「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講真話，我們想說真話」、「新聞自由有利於社會穩定」、「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加強新聞監督，推進政治改革」，並要求當局為導報平反。

這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來，新聞界第一次走上街頭，公開喊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它標誌着大陸新聞界的大覺醒，其意義將記入中國的新聞史冊。它對今後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的影響將是無比深遠的。學生領袖胡喬木對記者說，新聞界是被學生逼出來的。此話對了一半。無可否認，如果沒有這場愛國學生的民主運動，也就不會有這次新聞界的抗爭。同樣無可否認的是，新聞界被壓制、被禁錮得太久了。他們不能再沉默，不能等待當權者恩賜新聞自由，必須自己起來抗爭。一些參與遊行的記者表示，這次自發的行動是要向公眾表明新聞界要說真話的態度，要表明自己的新聞良心及引起公眾對新聞界的關注。新聞工作者敢於拋頭露面站出來與專制的政府抗爭，正反映了問題的嚴重和人們對新聞自由的渴望。新聞界這次創舉，得到了廣大市民和學生的歡迎和支持。當天新聞界的遊行隊伍所經之處，民眾鼓掌、歡呼，有的市民甚至高呼：「記者萬歲！」

科技日報衝破新聞封鎖

五月九日，部份新聞工作者拿了一份由首都冊

多家新聞單位一千零一十三名新聞工作者簽名的請願書，送到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要求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同他們對話。請願書列舉了三項對話內容：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被停職；近期新聞工作違反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的原則；國務院發言人袁木關於「中國新聞報導工作實行的是報社總編輯負責制」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在記者遞交請願書時，近千名大學生聚集在記協門前，高呼口號：「記者們，不要怕，爭民主，敢說話。」

據中通社報導，中國新聞社上百名編輯、記者及職工，十七日打破沉默，走上街頭，與百萬北京市聲援大軍匯合。這是中新社在這次學運以來的首次公開行動。他們打着「中新社要做中國之音」、「不打官腔，不說官話，民間通訊社，為民說話」的巨大橫幅，沿途高呼「新聞自由萬歲」、「聲援導報」等口號。

值得一提的是隸屬國防科工委的《科技日報》，早在四月廿三日首先打破以往重大事情借用新華社稿的通例，發表了該報記者集體撰寫的《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一文，客觀真實地報導了北京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動，衝破了官方媒介對連日來北京學生悼念活動的新聞封鎖；令廣大讀者耳目一新。該報副總編輯孫長江表示，他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只是一種職業道德的表現，盡了新聞傳媒應盡的職責。

科技日報的勇敢行為，極大地鼓舞了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在民運高漲的日子裏，傳媒確實到了一些新聞自由，即使在當局宣佈戒嚴、實行新聞封鎖以後，北京的主要報刊，包括官方的人民日報的頭版，仍繼續客觀報導學運，官方的新聞甚至報導了學生要求李鵬下台的消息。

戒嚴令頒佈的當天，新華社一千多名職工，再次走上街頭，聲援學生，高呼「反對獨裁」。二十二日，北京的知識份子仍舉行大遊行，來自中新社、科技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誌社、中國婦女雜誌社、廣播電台、人民日報、中國文化報、文藝報等新聞單位的編輯、記者，置戒嚴令於不顧，繼續走上街頭，高呼「取消新聞封鎖，客觀報導真相」的口號。

人民知情權不容侵犯

在封建專制的政權下，人民要求民主的運動，決不會一帆風順，而必然要經過過多的挫折，民主的誕生，決然要產生陣痛。作為民主運動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的新聞自由，也不會例外。當權者深知，要維護他們的統治，就必須實行愚民政策，而其中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實行新聞封鎖，這一招在過去極左當道時期屢奏奇效。此次北京市政

府根據國務院的戒嚴令所發佈的「第三號令」，就嚴禁中外記者進行採訪、拍照和錄相，實行嚴格的新聞封鎖，目的就是把大陸同外部世界隔絕開來，把學生運動同社會隔絕開來，以便讓當權者為所欲為。

但是，現在已不是當年閉關鎖國、民智不開的混沌年代，隨着大陸十年來的逐步現代化，逐步開放資訊已成為一個必要的現象。在資訊空前便利的國際現代化社會中，封鎖新聞、控制言論，是越來越不可能做到，也越來越引起人民不滿。此次當局封鎖新聞，可是海外記者仍可以通過各種先進的通訊設備，把北京學運的消息和畫面傳送到世界各地，並反射回大陸去，便是明證。

這次北京實施戒嚴，派軍隊接管新聞機構，把新聞界所爭取到的一點點新聞自由的權利也剝奪了。但筆者相信，歷史決不會倒退。人民已經覺醒。人民的知情權同他們的生存權一樣，是不容侵犯的。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要改革開放，必須有輿論監督制約；而只有新聞自由、開放言論，才能使輿論起到監督的作用。只有開放新聞，才能揭露和打擊貪污腐敗的行為。當權者如果繼續箝制新聞、封鎖新聞，他們終將要吞下自己種的苦果。

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方興未艾。在這次民主運動中所種下的新聞自由的種子，總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北京新聞工作者五月四日大遊行

有人向鄧告狀

導報隨之遭殃

方任野

看到各方同仁聲援導報，欽本立說：「新聞界開始覺醒了！獨立！團結了！」又說：「我個人的感覺是有風險才有愉快。」



被撤銷總編輯職務的欽本立

江澤民意欲為欽氏代作檢查

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十週年理論討論會在京舉行，由於當時中共當局在意識形態領域採取收勢，絕大多數十年前理論務虛會上和十年來思想解放的先驅以及新湧現的青年學者未被邀請，只有剛從海外訪問歸來的蘇紹智應邀。這位因「反資」而被撤職的中共著名理論家，不負衆望，十二月二十一日小組發言，語驚四座。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全文刊載，海內外輿論嘩然。中共宣傳領導小組曾下令禁止所有報刊不得轉載，導報為之再度出現「危機」。

八九年元月，由中共上海市委組織的與新聞界對話會上，導報副總編輯朱清力陳新聞報導自由，導報做了自己該做的事。當時，江澤民曾拍着欽本立的肩膀說：「老總若是不會作檢查，這次我可以替你作，替你寫嘛！」向以「四語」著稱的江氏顯得十分大度，自然引得滿堂歡笑，一時在新聞界傳為佳話。然而僅僅隔了三個多月，這位要「替人受過」的江氏，四月廿五日下午在萬人會議上，突然宣佈停止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黨組成員，並決定對導報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有人在鄧面前告導報的狀

四月十日千家駒在導報上撰文說：「走回頭路不是沒有可能的」。千氏對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頗有微詞。中共政治局的一位常委曾拿着導報到鄧小平面前，說「導報現在越走越遠，什麼都登」云云。鄧氏有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撤一個，有三百六十五天可以撤。」據消息來源說，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導報在海內外的影響，早已超乎於一張報紙之上，它是把改革開放與民主政治、知識精英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四月二十五日這一天，對這位飽經風霜的老報人來說，是一點都不輕鬆的。事先沒有任何招呼，不顧導報任何解釋，在市委召集的萬人黨員幹部會上，市委書記突然宣佈「決定」，次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大報都刊登了這個「決定」，實為建國以來新聞界所罕見。

會慶紅定下三種方案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陳至立將欽本立找去，約定將有關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導報第四三九期清樣第二天送審，導報幾經努力，次日將清樣送至市委。二十二日晚上，欽氏正在上海錦江飯店會見台灣《天下》雜誌的記者，七點四十五分，又被市委急召至「康寧」，要求欽本立停發該期報紙，儘管欽氏據理力爭，面紅耳赤，但也萬般無奈。事後談到當時情景，欽氏不無感嘆地說，大概一個總編輯最不願意的就是自己去「收報」。

主管上海市委意識形態工作的市委副書記曾慶紅，曾提出三種方案：一是掉換全文，二是部份刪節，三是發行原版。二十四日欽本立突然病倒送往醫院，導報其他領導成員在二十四日中午召開研究會，針對導報原報部份外流，權衡海內外形勢利弊，馬上給上海市委寫了一份「緊急報告」，這份報告稱：A、B版同時流傳可能激化矛盾，《中華早報》、《美國之音》等已作報導，認為官方仍在限制悼念耀邦。另外，中宣部已收回成命，《科技日報》廿四日下午已准予公開發行，導報以爲按原版發行對穩定更有利，可以不激化矛盾。該報告於當天下午六時送出，次日上午市委宣傳部來電表示不同意發行原報導報。

聲援導報顯示新聞界覺醒

欽本立病倒被停止職務期間，曾請導報同仁代爲宣佈三條：一不見官方代表，二不見外國記者，三不見有海外背景的大陸記者。筆者曾在電話對欽老板表示慰問和探詢，欽本立稱血壓已正常，身體好多了，隨時重新戰鬥。他表示他對未來所發生的「一切」都很樂觀，並請我去導報辦公室看看，說：「你會感到新聞界開始覺醒了！獨立了！團結了！導報是全體同仁苦心經營的，我個人的感覺一直是：有風險才有愉快。誰再要給我什麼冤假錯案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經欽老總指點，筆者五月二日來到座落在上海淮海路上的《世界經濟導報》編輯部，一踏進辦公室，記者立刻感同身受到了欽氏在電話裏所表示出來那種自信精神。在寬敞的辦公室兩旁牆壁上，以黑色絲絨做襯底，上面貼滿海內外讀者的慰問電、慰問信。令筆者感到驚訝的是，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竟有「〇二名記者、編輯署名聲援導報。聲援的還有《光明日報》五十三人，《工人日報》四十五人，《中國青年報》八十八人，《中國婦女報》二十六人，《中國日報》七十四人，《文藝報》十八人，等等。所有這些新聞界同仁，以他們的良知在支持着導報。如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十八名記者發自內心的呼喚：「你們的勇敢行動猶如在夜色中一顆璀璨之星給我們以慰藉，甚至支持了我們繼續做記者的信心。……」參加北京悼念耀邦座談會的發言者蘇紹智、嚴家其等人以《捍衛新聞自由》爲題，向中共上海市委發表了他們的公開信。該公開信稱：①上海市委的「決定」違反中共「黨政分開」的根本原則。②上海市委負責人說導報四三九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談會內容」，將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這是對座談會參加者的嚴重「誹謗」。在這封公開信上簽名還有吳祖光、于浩成、張順揚、蘇曉康、許良英、戴晴、郁風、錢辛波等二十五個知名人士。戴晴女士另外給欽老總發了慰問電：「正義爲本民主爲道，本立則道生，欽老板安康」。老戰上，《新觀察》主編戈揚寫下了《這邊和那邊》的詩，題名書贈欽本立先生。戈揚詩云：「一片土地分爲兩邊，中間隔着武裝的牆。這邊是冷漠的冰山，那邊是歡樂的海洋。耀邦的屍體在這邊，耀邦的靈魂在那邊。我們都是來自那邊，沒有那邊哪來這邊？爲什麼這邊怕那邊，那邊也在防着這邊？那邊是我們的明天，拆掉這邊有形和無形的牆！這邊和那邊聯成一片，中國必將大有希望。」

上海新聞界在沉默了四天以後，《青年報》、《新民晚報》、《文匯報》、《上海文化藝術報》、廣播電台紛紛聯署聲援導報。《世界經濟導報》

的姐妹報《新聞報》在五月十一日突然頭版刊出一千五百餘字的題爲《導報事件》引起海內外關注，消息報導，再度引起上海和各地新聞界的轟動。在各方表示對《新聞報》憂慮的同時，上海知識界以徐鑄成、馮英子、王若望等聯署發表四點聲明，要求江澤民與導報及上海報界同仁對話。由此可見，「導報事件」已不是一張報紙的問題，而是反映大陸新聞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整頓領導小組欲整張偉國

五月十日，整頓領導小組在滬召開導報編輯部編委會，決定調回導報「京辦」負責人張偉國，聲稱張氏在京組織遊行，散發材料，向海外發表不負責任的談話，嚴重違反紀律。不過張氏顯得十分鎮定，當晚電話告知「工作小組」，稱其受欽本立總編輯派在京工作，現在召我回滬，當由欽氏作出上述決定，「因爲作爲導報的編委，記者的我，仍認爲欽是本報的總編，而工作小組是非法的。」記者在電話採訪張氏時，他表示：「不進監獄的記者不是好記者。」雖然張氏言重了，却表現出只有三年短暫「記者生涯」的他，極富理性色彩和挑戰勇氣。三年來，他以敏銳的感受力，使見證導報的《夏公訪談錄》、《關於變革產權關係》、《嚴家其訪談錄》、《蘇紹智從布哈林說到戴卓爾》等多篇在中共決策層、知識界等各方面引起了「轟動效應」。他在接受筆者電話訪問時說：「我非常樂觀，導報事件使得中國新聞界覺醒，這就是勝利。推倒重來，中國大眾傳播媒介必定掀開歷史的新一頁。誰也不會忘記導報，同時也不會忘記江澤民。」

江澤民北上活動頻繁仍遭批

五月九日江澤民飛赴北京，據消息來源說，當天下午他到中共一位元老處求情，某元老說：「我三月份對環境說了幾個意見，以後再沒說什麼，不好說，你可以找個明復。」然而，在閻明復那裏，江澤民又碰了釘子。五月十日，趙紫陽單獨找江澤民談話，指出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對導報的處理決定是錯誤的，不要再由中央來作什麼決定了，上海市委自己去糾正。

但另據一位可靠人士透露，江澤民回滬後，仍然要求五月十五日以後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的大樣只要「工作小組」與導報編委會簽有歧見，一律由他審閱簽字，方可印刷。江澤民北上遭批，回滬又作如此行動，令人費解！

何罪之有？

——海外知識界談欽本立事件

上海市委書記根據哪一條法律撤銷欽本立的職位？
(導報)按事實報道，犯了中共的哪條法律？

本刊駐紐約特約記者 莫利人

在中共「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中，上海市委無視現任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增加透明度」的方針，仍然依毛澤東的老皇曆辦事，因《世界經濟導報》在報道胡耀邦逝世後該刊召開的社會人士追思座談會記錄上有一「越軌」言論而將該刊老總欽本立解職，並派工作組進駐《導報》，從而在大陸以學運為主的爭民主爭自由的潮流中火上加油，引發了海內外矚目的軒然大波。受《爭鳴》委託，我在美國對學者、專業人士以及導報的部分在美的編輯和記者進行了有關事件的多方訪問，綜合報道如下：

中共一直在整導報

樊毅生：一九八二年，我於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一年後調到導報任記者編輯，四年後自費來美留學，現已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畢業，與「中國企業管理學會」合辦《經濟管理》雜誌。

一九五七年欽本立是上海文匯報總支書記，反右鬥爭時被劃為右派，一直下放勞動，直到文革後被解放，擔任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支部書記。八〇年，他與幾個老報人一起創辦了導報。導報似民間報，因創辦時，同業是隨便找的。報紙出版後，報社有關人員自己上街賣報。老報人理想主義色彩重，他們都六十歲了，辦報有本事，沒多久就創出了自己的風格，令我們年輕人佩服。

幾年前去世的經濟學家、「世界經濟學會會長」錢俊瑞曾任導報的社長，因該報名義上由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合辦。導報那兩大部分——「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以搞思想解放吸引年輕人，以介紹國外新的觀念和不同流派發聲年輕人的。中國大陸管理體制不靈活，導報擔當了對中共中央應做的決策、有可走的路進行充分討論的角色。導報能讓不同意見者充分表達，使政府聽到不同聲音，避免政策失誤。

導報對中共經濟改革、對外開放起了作用，有人稱它為「快半拍」。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必讀。由於它重視地方性的改革，各地官員也非常歡迎它。毫不諱言地說，過去的九年，導報成了社會上的改革家和促進中共改革的旗幟。

上海市委江澤民藉學生運動向導報開刀，是因為中共一開始時對學生運動採取嚴厲態度。江澤民在萬人大會上宣佈撤銷欽本立的職務，是因為導報刊登了《胡耀邦活在我們心中》的座談會內容，江澤民抓這一機會下賭注的目的是為了一「殺雞儆猴」。他派工作組進駐導報，遭到導報全體工作人員的抵制。

中國大陸所有報紙都是政府控制的，宣傳什麼由政府決定。其實中共中央一直整導報，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欽本立已被撤職，後來又恢復。欽本立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在中國這樣的條件下，他能好幾次從危機中應付過來。

導報不會讓步

潘嘉平：我從小在北京唸書，六八年響應上山下鄉到東北，七四年回北京，進工廠工作四年，七七年入北大經濟系，八二年進導報，任記者兼編輯，去年起擔任導報駐華盛頓記者。

昨天我和欽本立通了越洋電話，他說他仍在上海，身體還可以，情況也可以，他沒有什麼可檢討的。他很清楚，現在已不是他本人和導報的問題。老欽的態度很堅決有三個原因：一、從他在電話中回答我的口氣判斷；二、他確實沒有犯錯；三、導報遭整，是整個新聞界的問題。

至今還看不出江澤民所派的工作組會讓步，他們留在導報，分歧存在，當然會引起衝突。這幾天因導報對《中國世界經濟學會致上海市委及江澤民的公開信》一文，被拖了三十多個小時，不許付印。今天我通越洋電話時知道，工作組和導報仍有分歧，目前還是不能付印，到星期一才有結果。其實就這封公開信，導報已作了一些讓步，但再被拖下去，導報不會讓步。這是整個新聞界的問題，中國新聞體制改革迫在眉睫，不然中國改革無從談起。國內有更多的人支持導報，導報同仁不能辜負大家的期望。其實導報能堅持，對國家前途有好處。中國新聞體制改革不僅是上面改，下面應該團結起來。

江澤民顯然犯了錯誤，學生運動起來後，政府開始時是強硬，後來有轉變，這是壓力改變了他們的看法。江澤民只有認錯才會恢復他的威信。海外人士支持導報，我表示歡迎，但我不会去鼓勵大家這樣去做。

中共不合理也不合法

項國寧：(台灣政治大學學士、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學碩士、台灣聯合報系美國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世界日報》總編輯)：我報一貫對大陸學潮和導報以及大陸新聞從業人員的情況給予及時的、客觀的、幾乎是頭版頭條的報道。我們對這些消息訂得很緊，我們和有關人士一直密切聯絡，通過報道、社論表明我們給予支持的立場。我本人不贊成上海市委接管導報，在中蘇高峯會議期間，中共不會採取太激烈手段，在戈爾巴喬夫走後，會不會算帳，很難說。只是現在學生開始絕食，如中共不答應，會成僵局。而中共向來強硬不讓步，如學生堅持下去，下一步會怎樣讓人憂慮。我希望學運朝好的方向發展。導報的發展有象徵性，中共搞了四十年，不願和西方走一條路，新聞自由由他來決定。在新聞全力被封鎖的情況下，大陸讀者能知道的新聞極有限。大陸同業堅持新聞自由，將影響海外報道的尺度，我願支持他們，包括投入美國新聞界同業起來的呼籲。然而西方新聞同業很少團結起來發表聲明，他們只會報道，或在社論中表示他們支持的看法。

丘宏達(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因為一篇報道就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撤職，此事不合法也不合理。第一、中共現在自己說要黨政分家，上海市委書記是根據哪一條法律去撤銷欽本立的職位？第二、導報按事實報道，犯了中共定的哪條法律？中共其他報刊也有如實報道的情况，為什麼不將那些報刊主編都撤職？第三、外國記者在他們的報上如實報道胡耀邦死後的情况及大陸的學潮，未見中共干涉，對中國人報道就要處罰，這種崇洋媚外的作風，本身就該受全國人民譴責。

從中共的利益看，最好盡快將此事結束，恢復欽本立的職位，否則愈鬧愈大，在國際上成為笑柄。報道一些國際上均已知悉的事實會使一個主編撤職，這是自由世界不能想像的。



聲援《世界經濟導報》

本刊記者攝

中共 為何 整欽本立

(美國) 李勇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因發表中共認為不當的新聞，遭到中共制裁處分，全體工作人員也跟著遭殃，於是，中國大陸泛泛起一片爭新聞自由之聲，其反應之強烈，出乎中共各級幹部意料之外。

在當今中共掌權人心中，中國大陸所有傳播媒介，均為「黨和人民喉舌」(即使開明如胡耀邦也這樣認為)，因此它們所作的新聞報道，必須符合「黨和人民」的利益，所作的批評言論必須與「黨和人民」一致。大陸十一億老百姓怎麼想全不重要，這樣才可使「無產階級江山」穩固。

自稱是「黨和人民」的八路共幹，四十多年來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言論已成習慣，因此一旦有人不受控制，不論他說什麼中共都不能忍受，非收拾不可，給欽本立撤職處分，已經是鄧、李政權的容忍寬大，看來欽本立還得叩頭大叫「皇恩浩蕩」。

其實欽本立對中國大陸的表現並不突出，絕非中共幹部心目中的「叛逆」。他溫和和馴良，在中共長達四十年的統治下，他早已變得謙恭忍讓，絕不敢標新立異。《世界經濟導報》的新聞、言論尺度也看不出有什麼過分，但北京城頭那批土八路硬是無法忍受，非除之而後快。

欽本立曾經在《導報》首次被整肅時來過美國，並接受美國左中右派記者的訪問，印象中覺得欽本立其人不但溫和，而且謙恭忍讓，甚至在訪問時瞻前顧後，不但不放肆，而且處處說中共好話，並以自己獲准出國去證明中共的寬大。

欽本立在美國表現曾經使我大為不滿，並以他為例撰文，希望海外的人不要輕信大陸所謂「異己人士」會盡言責，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中共那種「一相信黨二相信人民」的環境，希望他們做老百姓喉舌，簡直緣木求魚。

欽本立上次來美國，是遭到中共整肅不久，

一圖為上海大學校園出現的支持《世界經濟導報》及欽本立的標語。本刊特約記者攝



我看完華文報紙記者對他的訪問稿，曾經懷疑中共那批「黨和人民」故意放他出來，要他「現身說法」去澄清外界對中共殘民的「誤解」，因為欽本立不止一次向記者說：「中共的開放改革是絕對而全面的，並非虛應故事。」記者問他：「何以證明？」欽本立說：「你們沒有看到我來了美國嗎？」

在欽本立被停職不久，我曾曾經訪問他的華文記者談天，請他對欽本立這個人性格加以評論。這位華文記者告訴我，在他印象中，欽本立不但性格溫和，而且給他有餘樸樸的印象。他好幾次批評中共，想勾引起欽本立的話題，欽本立均欲言又止，不敢表態，甚至把話題岔開，顧左右而言他。

華文記者說，他猜想欽本立是在文革浩劫與後來來的「反資」、「清污」運動中吃過苦頭，因此不敢亂說亂動，他考慮到欽還要回去，所以不再為難他。

以欽本立這樣溫和、馴良、謙恭、容忍、恐懼、膽怯之人，能夠說出什麼令「黨和人民」憤怒的話？但中共卒之無法忍受。假如台灣、香港落入中共那批「黨和人民」掌中，新聞記者會有什麼下場，不難想像。

《北京日報》的 內部鬥爭

李目

中共北京市委黨報《北京日報》，從來就是臭名遠揚的造謠說謊報，被北京人常譽為毀譽和踐踏過幾次。六月一日該報又刊登了一篇一位外地大學生的怪調《天安門啊，我為你哭泣》的文章，污蔑在天安門廣場爭民主的廣大學生。第二天六月二日北大、科大、鋼院等三百餘名學生，到報社抗議，他們當眾燒毀了多份《北京日報》。

同別的報刊一樣被軍管

市民稱《北京日報》的總編輯劉虎山是為中共中央、北京市委貼金的主要幹將。他是曾任駐法大使、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的外甥，依仗着這點裙帶關係，常常在報館裏耀武揚威。

當二十七軍等部隊於六月四日攻佔天安門廣場、血洗廣場後，劉虎山說：「打得真好！該打！」社長滿運來(老編提升的)可趕不上他，在傳達市委在部主任會議上的精神時，竟為「六·四」慘死的人落了淚。

自北京戒嚴以來，《北京日報》為站在李鵬一邊立了不少功，但六月四日後，它和其他報刊一樣同時被軍管。日前除報社員工可以出入外，其他訪客一律不准入內。其實年輕些的員工都待在家呆着。每天該報所有稿件都由北京市委送來，一切由市委直接控制。

「指黑鍋的來了！」

北京市委能控制報紙的言論，但未必能主宰那些愛國愛民、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北京日報》一位主任編輯辦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壓着他的手書：「不能以一人制天下，豈能天下奉一

人。」另一位有良知的編輯的辦公桌玻璃板下的自勉是：「關鍵時不能說假話，要對得起自己良心。」

北京學潮開始後，《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同一單位)共五百名從業人員上街參加了北京市新聞單位支持廣場學生運動的大遊行。遊行結束後的內幕是：不少員工要求報社發一張遊行的照片——該報人員舉着一個牌，牌上寫着「指黑鍋的來了！」對這一小小的要求，劉虎山是堅決不讓，社長滿運來的話是：「市委副書記汪家驊不讓登。」「老編的話是：『不讓登就讓他開天窗。』員工們的意見是：『就是要登，不讓登就罷工。』」

讓別的報紙為我們登吧

社長滿運來認為員工沒有開天窗的權利，他和劉虎山同去市委請示。全體值班的員工等到半夜兩點，他們回來了。「怎麼說？」「市委書記李錫銘不讓登！」員工們又怎麼回答呢？「好吧！那讓別的報紙為我們登吧！但《北京日報》以住為市委造謠的事，我們全給揭出來！」

滿運來、劉虎山着慌了，只好說：「讓登！讓登！」然而第二天見報的照片上把「指黑鍋的來了！」這幾個字給剪了，只留下員工們舉着一個牌，上邊只寫着《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即使是這麼一張不是真情的照片，滿運來和劉虎山還是一早匆匆趕去市委「請罪」。

「你不能煽動工人罷工」

五月十九日李鵬為鎮壓學潮講了話，夜深時，一位主任××由家裏給報社打來電話：「不能虧對人民，不要登。」沒多久，他又從家中起來報社，強調：「不能見報，中國青年報已拒絕排印。」總編輯劉虎山說：「你無權！」××只得跟排字工人說去。劉虎山緊跟在背後阻止，並警告說：「你不能煽動工人罷工。」自此，××在報社還幹什麼呢？他只得天天上天安門廣場，和北京廣大市民一起，和他愛人一起去給學生送吃的。另一位編輯和報社其他年輕員工一樣，不上班了！

事隔沒幾天，天安門廣場廣播站多了一個大喇叭，這是《北京日報》員工親手製作的，化了兩百元。這錢可是大家捐的，每人至少捐一百元，除化了這二百元外，餘錢都送去了廣場。在支持學生爭取民主自由問題上，北京有多少新聞從業員像他們一樣貢獻了力量！

中國新聞界

新聞界要員紛紛表態

北京市長陳希同6月底在人大常委會作報告時，便公開批評趙紫陽的罪狀之一在關鍵時刻誤導新聞界。

中宣部副部長李彥說，回顧這兩個月的報刊工作，有很深刻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關鍵時刻有一部分報刊的輿論導向出現了嚴重錯誤。這些年來在新聞理論、觀點上的重大爭論，在這一歷史關鍵時期幾乎都有所表現，都經受了社會實踐的檢驗，值得深思。

《人民日報》新任總編輯邵華澤也說，今後反思的核心問題是新聞改革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經濟日報》總編輯范敬宜認為，由於放鬆或放棄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新聞隊伍發生不少我們不希望見到的變化。

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馬慶雄則強調，廣播、電視是黨的宣傳工具。他建議：新聞界要進行馬列主義新聞學的再教育。

據說，中共中央已決定由木匠出身的天津市第一把手李瑞環接替胡啟立、芮杏文、主管宣傳工作。李瑞環文化水平雖不高，但思想比較開明，作風務實。如真的由他主管，對新聞界的整肅有可能不會很嚴厲。此外，也有知情者透露，被任命的為《人民日報》新社長的高狄，在吉林省任省委書記時，就是一個思想比較開明的人，但中央起用他，恐怕也有試圖給人在新聞界保持致改革開放的形象有關。中共中央一再聲稱開放改革的政策不會改變，不會走「閉關鎖國」的老路，果真如此，為保持訊息靈通，建立快捷、真實的形象，中共新當權派對新聞界也是應該不會過於嚴厲，而應該給予相當的開拓空間的。

江澤民如何對待新聞界

6月24日，江澤民正式取代趙紫陽，出任中共總書記，雖然一如既往，在許多大問題上還是要讓鄧小平「掌舵」，但是，中國新聞界今後的命運如何，很大程度上處決於江氏的態度。

趙紫陽和主管宣傳的胡啟立、芮杏文失勢之後，李鵬成立了新的宣傳小組，據說成員包括袁木、中宣部部長王忍之以及何東昌、曾建徽、李志堅（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五人。李鵬多次嚴厲批評北京的新聞界「誤導」學運，主張要嚴肅處理新聞界的一些人。李鵬最近一再強調要重視輿論宣傳，6月13日他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就特別指出，在現代化的信息時代，輿論作用尤其明顯，強調要抓好宣傳工作。江澤民在上海工作時，就是「四個堅持」，與中央保持一致，先是於4月將《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並派出「整頓小組」進駐「導報」。接着，江氏又第一個向中央表態支持制止動亂。按此推測，江氏對整頓工作也不會手軟。

從種種迹象看來，中共對報刊、電台、電視台的政策將會收緊，並加強中央對輿論工作的影響力。②

孫巨來信

1989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登出一篇《「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報導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和小朋友共渡兒童節，這篇短文迅即引起最高當局的不滿。6月5日，該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登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來信稱：「我們是一批普通共產黨員。看了今天（6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上花邊新聞《「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十分氣憤！……這又是一篇用「春秋筆法」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頑固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繼續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孫巨在來信中還批評說：「《人民日報》是黨中央辦的報紙，不是《人民日報》的某些先生們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報紙。無論如何，不能拿黨中央的崇高形象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助長氣焰！」

這封信對《人民日報》所作的嚴厲批評，前所未有。據說，此信是中共中央某負責人下令要《人民日報》刊登的。孫巨的信實際已為《人民日報》定了性，雖然總編輯譚文瑞已住進醫院，社長錢李仁也稱病休養。但作為主要負責人，當然逃不過停職命運。

《新觀察》雜誌被勒令停刊

與此同時，北京《新觀察》雜誌受到比《人民日報》更嚴厲的對待，被勒令停刊。到了6月23日，北京又傳出《經濟學週報》被勒令停刊的消息。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發出的文件指出，鑑於《新觀察》雜誌第十期載有對「動亂」起煽動作用的文章，違犯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號及第三號戒嚴令，決定取消其刊號。據悉，第十期《新觀察》刊登了一篇《四·二七遊行目擊記》，同時還刊登了《致兩個袁木》的署名雜文，表示對袁木的發言「似須存疑」，並諷刺袁木將成為「舉世無雙」的「最佳發言人」，考慮到《新觀察》及其負責人戈陽過去已給當權者製造過不少麻煩，此刻遂一舉而將其停刊，並繼續予以追查。至於《經濟學週報》，多年來，發表過許多主張鼓吹學習西方經驗的文章，這次又積極支持學潮，主張「自由化」的罪名，恐怕跑不掉。

學運期間，首都的多家報紙，曾旗幟鮮明地表示支持學運，像《科技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均發表過不少被視為支持動亂的報導和文章，可以預料，上述報紙至少都逃不了「自我批評」的命運。日後相信會有更多的報社領導人被撤職、「辭職」或「調動」。一些在學運中鋒芒畢露的、支持「動亂」的記者、編輯，也很可能被批評，或者被「請」進公安局「說清楚」。月初有消息證實，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記者張偉國已在滬被拘捕了。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之後，重視輿論宣傳的中共當局也開始逐步整頓北京的新聞界。1989年6月13日，李鵬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各部門負責人會議的講話中，強調在現代信息社會中，輿論傳媒的重要性，他表揚了一些報紙、電台、電視台的表現，不過當中並沒有《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每次換領導，都和政治動向轉變有關

6月20日北京傳出消息，《人民日報》原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均被撤職，而任命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前吉林省委書記高狄為社長，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邵華澤為總編輯。

高狄出生於1927年，現年62歲，大學程度，1946年參加中共，他也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在過去，高狄是一位很受記者歡迎的高官，他不掩飾缺點，壓制輿論。在擔任吉林省委書記時，他曾多次公開說，歡迎新聞單位批評省委的缺點，在報章上開展批評，幫助我們解決好當前的問題，就是推動我們做好今後的工作。

新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邵華澤，出身軍方，曾任《解放軍報》副總編輯，也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縱觀中共的黨內鬥爭史，從1949年成立以來，每有重大鬥爭，《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都差不多一定被調職，第一把手的變動，也往往和中國政治動向轉變有關，歷任社長、總編輯鮮有「善終」，從鄧拓、魯瑛、胡績偉到現在的錢李仁都是這樣。

決定錢、譚去職的原因之一，是當局不滿《人民日報》在學運中的表現。學生遊行之初，該報許多編輯記者表示支持。《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並不是該報所寫，而是當局下達刊登的，刊登後，社內普遍表示不滿，在評報欄貼出許多小字報，逐字逐句地批駁這篇社論和高層要該報發表的其他文章。到了89年5月4日，該報的一些青年記者又參加了首都新聞界遊行的隊伍，5月17日，更打出了《人民日報》的牌子，數百記者編輯員工，在該報一批高級記者、編輯的帶領下，參加了首都百萬人大遊行，還喊出了「四·廿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等口號。錢、譚二人雖然事先曾極力勸阻，仍無濟於事。由於來自上面的壓力太大，譚文瑞竟在一次編委會上突然吐血，被急急送醫院救治。

《人民日報》沒有與中央口徑、行動保持一致，還表現在報紙的宣傳報導上，甚至在李鵬頒布戒嚴令之後，該報仍在一些新聞或標題上作文章，表現出對學運的同情和支持，這就使得最高當局大為惱火，加強了對該報的批評和影響。

大陸新聞界一步一倒退

承 嬰

新聞畢業生下放「鍛鍊」，記者被派出外採訪，稿件一律封存重審；「婆婆」指手劃腳，老編老記動輒吃官司，大陸新聞界又進入黑暗時期。

北京戒嚴軍用坦克和機槍，花了兩個小時收復天安門廣場這塊有形的陣地之後，中共收復另一塊更重要的陣地——新聞輿論陣地。在六四事件的兩個月之後也初告完成。幾年來大陸新聞界好容易才造成的趨於活躍的氣氛，以八月中旬黨部新聞局召開的「新聞工作者座談會」而宣告終結。在中共思想清洗和人事整肅的步步進逼之下，大陸新聞界一步一倒退，幾已潰不成軍。

先向新聞界下重錘

六四之後，中共當權者清算民運學運的第一擊就是針對新聞輿論界的。

六月中旬，在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李鵬對新聞界發出了強烈的批評，他說：「由於黨中央的少數同志在新聞工作的指導上有錯誤，離開了黨的立場，致使一些新聞單位在平息這場動亂和暴亂中作了錯誤的輿論導向。」

六月二十四日匆匆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主持宣傳的書記處書記芮杏文被免去書記職務。

由於肯定學運並默許開放新聞自由，胡啓立同時被免去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四中全會之後，被認為重災區的《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被撤職，而分別由高狄和邵仁華接任。

緊接著國務院宣佈，由宋木文為新聞出版署署長，替代杜導正的職務。

據報導，在全國性的清查清算中，不少被認為參與過民運學運的新聞工作幹部，包括記者、編輯被捕或被公安部門傳訊。新聞隊伍中的恐怖氣氛日顯嚴重。

八月十一日，北京《光明日報》的一篇署名文章《新聞工作必須理直氣壯堅持黨性原則》，指稱動亂期間，「許多人（新聞界）左顧右盼，無所適從，也有些人四處奔跑、高聲疾呼，甚至乾脆站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

八月十九日，又一重錘砸向被認為是上海動亂的重要策源地——《世界經濟導報》。《人民日報》這篇所謂揭露「事件真相」的長文典型的文革火藥味，用中共的階級鬥爭的術語來說，就是「痛打落水狗」。

限制行動 封存稿件

新華社駐香港的一位人士證實，早在中央下達今年國家幹部不得休假，以補回動亂損失的通知之前，北京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等新聞機構，就已下達了指令。指令包括：第一、所有新聞從業員必須盡快回到單位接受學習和檢查；第二、所有記者，在學習和檢查期間，不得離開北京到外地採訪；第三、每個人要書面交代學運期間的言論及行動，包括所採訪的對象；第四、各報社雜誌社對已發和未發的稿件，重審其「政治立場」。

根據中共中央的八九（五）號文件精神，新聞界又規定，凡八五年以後分配到新聞單位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均須下放一至兩年到底層鍛鍊；至於被查與民運有關的人，則可能會被調離北京市。

據浙江省某地區日報（小報）的一位編輯透露，清查運動開始之後，追查政治責任的範圍，細微到自胡耀邦去世之後每一則反映學運活動的報導和圖片。誰寫的，誰說的，採取地毯式追查。

《人民日報》：悄悄退却

錢李仁和譚文瑞被撤去《人民日報》的社長與總編輯職務，事出有因。除了在學運期間對社內參加活動的人員給予默許之外，《人民日報》的改版恐是不小的罪狀。

今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右上方登刊了一小塊不引人注意的「新春致讀者」的「安民告示」，宣佈了《人民日報》從該日開始實行改版的決定。但是，敏感的讀者並沒有被它低調處理的手法而忽視這一改版的重大意義：它打破了幾十年來中共在新聞宣傳上的「先國內，後國際」的「金科玉律」，重大國際新聞終於可以登上第一版（雖不是頭條）。更為敏感的是，這一改版觸動了中共宣傳部門的幾條神經：不刊登中央領導人雷同等的外事照片；改變黨報「句句是真理」的觀念，允許反對的聲音（儘管還很微弱）。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說這「改革是「不大不小的一步」。

但是，「六四」後大肆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觀」和「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言論，《人民日報》也就能不從原有的陣地上退卻了。筆者曾查閱中共四中全會之後部份日期的國內版的新聞報導，面目又重被塗上了紅色，成了唯黨的命令是從的喉舌角色。《人民日報》的海外版，也在中共四全會之後轉向，終於從暗中對抗的陣地上退卻下來，近兩個月來的「大平正方」式的內容及版面的處理就是明證：鄧、江等人的活動照片及消息，和一篇篇清算離心知識份子的大塊文章，都以顯要的位置處理。

官報官辦 官訂官看

目前，大陸省市級的地方報刊，又處於四面觀望進退兩難的境地。

政治空氣一降溫，地方報刊的編輯記者便成了只管鑰匙的小媳婦——有職無權，鼓吹一時的「可讀、可信、可親」的形象消失殆盡。請看大陸地方性報刊復萌的一些問題：

一、三多三少：遵命新聞多，社會新聞少；訓人文章多，道理文章少；記者文章多，讀者文章少。這三多三少可以不必再作解釋。僅舉一實例，據深圳大學一位教師作的小統計，七月頭一個星期內，比較三家省報第一版的新聞，單「會議消息」就佔了版面的一半之上，而且又多是新華社發的同一電訊，只稍作處理。

二、「三可」變「三不」：「可讀、可

信、可親」，變成了「不滿足、不滿意、不想看」，這是中國地、市報刊研究會連同《新聞戰線》舉辦的徵文調查中所得到的信息。地、市報刊圍繞地市的土皇帝、報告、會議、文件轉，圍着市長書記轉，頭版少不了是市長書記的活動。有人說：「乾脆叫市長書記報吧！」這一調查的結果尚是六四之前的事，六四之後連起碼的新聞自由都已取消，地、市報刊的狀況更可想見了。

三、新聞販子助長壞風：新聞界流傳的一句順口溜「經常去、多聯繫、莫忘帶東西」，把地、市新聞當成報社和編輯記者取利的手段。地方報紙更處處帶有「官」的色彩，有人戲稱「官報官辦，官訂官看」。

告記者熱又起

前不來港過境的幾名大陸省級報紙的記者，曾感嘆現在記者是「兩面受夾攻」。一面是六四之後的政治壓力，開會學習自我檢查已經搞得天昏地黑；另一面是不少前段時間受到記者報導挖了窟窿的幹部，現在在「政治立場堅定」的幌子下，開始向記者反攻倒算，不少記者被迫應付法律訴訟。「告記者熱」又一次在大陸掀起。現在的政治形勢，記者處在不地位，地方一些法官害怕被戴上包庇「資產階級自由化」帽子，在告記者的訴訟案中，多半不敢依法執法。

有一份小統計，就上海市黃浦區而言，去年共接到告記者案二十七件，其中二十三件是新聞報導中涉及對個人的批評而引起。據分析，其中確有一些是記者缺乏法律觀念在不實的報導中侵犯了公民的權利，但是，法律竟然也被某些不法份子、腐敗的黨官用來作為保護自己的護身符。揭發四川涼山地區一宗驚天動地車走私案的兩名記者，在發表了他們的報告之後，竟然被誣告為「誣蔑黨的領導」、「挑撥民族關係」，最後兩名記者的申辯文章竟然在壓力之下難以與讀者見面。

《上海法制報》總編輯沈沈說：當批評某個領導幹部的時候，即使事實準確，他也要和你糾纏，無理取鬧，反正他們有的是精力和公費，有的甚至寫信恐嚇。在新聞官司中如記者報社一方敗訴，則原告單位大舉慶祝。

婆婆與戒條

記者編輯難當，大陸的記者編輯更難當。眾多的婆婆都可以管起這些小媳婦來。讓我們

仍以讀者面最廣的市一級地方報紙為例，看看一幅婆婆圖——

老婆婆：市委宣傳部的副書記；
大婆婆：市委宣傳部黨組；
二婆婆：宣傳部報刊、電視組；
三婆婆：報社黨委（黨組）；
其他還有許多「小婆婆」，諸如各處局的主管思想的頭頭，以權勢與關係來左右其他的「婆婆婆」。

因此，「婆婆」一來電話，老編老記多數感到頭痛，這個婆婆說：「老×，張副主任兒子的消息就不要發了吧！老幹部嘛！」那個婆婆說：「×主任，據說你們記者寫了個報導，說對台辦有人怎麼怎麼的，是不是先壓一壓？現在兩岸的關係……」個個婆婆的口氣既客氣又溫柔，但編輯、記者聽來句句柔中帶剛；縣官不如現管，媳婦敢不聽婆婆的？這是其一。

其二、現在大陸記者都面臨同一個難題：「不知道寫什麼。」這又要怪婆婆們，他們給媳婦下達了許多禁令。

據前述的那位來港的內地記者說，現在宣傳部門向下級下達許多「不准寫」：違背四中全會公報精神的不准寫；不利於黨中央團結的不准寫；六四事件的傳言不准寫；涉及動亂份子的新聞不准寫；有關物價上漲的敏感新聞不准寫；各地學運期間動亂的「真相」不准寫。筆者記不清那麼多「不准寫」，但卻記清了幾個「大寫特寫」：黨的豐功偉績要大寫特寫；鋼鐵長城（解放軍）的歷史作用要大寫特寫；老一輩革命家的動人事迹要大寫特寫；「背後黑手」的陰謀活動要大寫特寫；清查暴亂份子中的好人好事要大寫特寫；改革開放的方向不變要大寫特寫，等等。

在條條框框的限制之下，大陸的新聞媒體又完全進入了「黨的馴服工具」的角色。報紙「千人一面」，電台「千台一聲」，電視台無止境地黨歌黨舞。單單「暴亂真相」的片子，在各省市電視台就連續播放了四次之多。六四之後，一直搶手的彩電與黑白電視機的銷量開始下跌了。

讀者、觀眾失去了知的權利，寫的權利也被限制，現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省級報刊上發表一篇要有份量的文章，作者的身份審查是第一關必須通過的。個人的投稿如果寄發之前少了單位的大紅印，即使投寄出去，恐怕也會永遠沉入大海的。

·逃亡者報導

黑太陽籠罩下的新聞界

·周廣華

五月份，中國傳播媒介史無前例地大鳴大放了三週，使得中國老人們「肺都氣炸了」，中宣部宣佈整頓新聞系統，「六四」大屠殺之後又進入了一種「鬆動」的時代，各種傳媒連篇累牘地報導軍方的消息，不斷地批判「暴亂」份子，似乎又回到「軍愛民、民擁軍」的文章時期。

李瑞環：這個木匠不簡單

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啟立、芮杏文被拉下馬，取而代之的是萬里之女李瑞環及陪都大人打橋牌而升遷的丁關根。李瑞環青年時代做過木匠，是一位值得稱頌的魯班式人物，近年治理天津亦十分成功，而且李在政治上也很有一手。八六年底天津學生運動被李瑞環的「在北京鬧我管不了，在天津不許鬧」一句話，加上他命令警察的士兵將自己身上穿的軍大衣脫給學生，如此一來弄得學生一時不知所措，那次學運尚未真正開始便結束了。

第二年即八七年三月份的大會上，這位天津市長竟罵起共產黨來，他在小組討論會上說：「共產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語驚四座，一時在市場上成為流行語言。最近，甚至傳聞他將在明年接替李鵬任總理！很多人不敢置信，但反映了「這個木匠不簡單！」

丁關根的升遷與鄧小平的關係極為直接，去年中國鐵路連連出現問題，丁關根引咎辭職，可並未辭去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職，說明他並未受「雪藏」，果然，在今年初，報紙上出現了「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丁關根」的字樣，現在又在政治局中又有了一席之地，這得歸功於他的橋牌功夫。

兩個女播音員下落不明

誰都知道，六月四日晚上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開始時，觀眾可以看到女播音員杜憲一反過去溫婉的形象，以一襲黑紗似的服裝出現在觀眾眼前，她的眼睛像是經過哭泣那樣顯得紅腫，原來，她的同學及好友中央電視台的男播音員薛飛因率領中央電視台工作人員支援天安門學生被記上黑名單，在六月四日開始從螢光幕永遠消失了，而杜憲本身亦因為對「反革命暴亂」被鎮壓而痛哭，所以中央宣傳部勒令無限期「雪藏」她。以上兩位都

是筆者的同事，更是中國內地家喻戶曉的人物，而另一位電視人，是筆者的「哥兒們」，中國知識界無人不知這位二十八歲的姑娘，僅因她公開對美國新聞代表團揚言「鄧小平老了，就該下台」，結果下台的不是「鄧總設計師」而是這位英語新聞播音員，她叫偉華，六四後她失蹤了。

楊尚昆之子曾出國避難

新聞界中的女強人，《光明日報》記者、作家戴晴，憑藉著是葉劍英養女之關係，在學運前階段十分活躍，支持學運，抒發自己的憤慨，好不威風，北京屠城後一般估計她不會出事，但終因她「跳得太高」而被捕，並受到點名批判。而另一位記者楊昭明，是新華社要聞部的攝影記者，在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時，與鄧小平到了瑞士或某個國家，北京戒嚴後，又回到北京，在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看到他背著相機，不斷穿梭於他的叔叔、伯伯們之間，也是好不威風。他以楊尚昆的公子這層關係，得到了專門拍攝中央領導人的專利，曾將一幅鄧小平的居家生活照送到荷蘭參加攝影大賽獲三等獎，這是大陸中國人首次獲此類大獎，又是好不威風。

廣州記者消極抵抗

其實，在這次運動中，最難受的莫過於廣州的記者，由於靠近香港，他們收聽收看香港的廣播電視及報刊較多，他們了解真相，廣東的人民亦了解真相，可由於要「全黨一致」他們又要做黨的喉舌，違心地採寫、轉載中央的文章。自己心裏不好受，人民也會罵他們。因此，廣東電台《青春夜話》的主持人及編導便拒絕製作節目，拒絕出外採訪，在播出節目中不斷放音樂，不斷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中共當局在鎮壓學運之後，「邀請」了一批民主黨派人士及知識份子表態，自始至終沒有出現的人物有：作家巴金、冰心，科學家、中國科協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前科學院院長盧嘉錫、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教授。也許這些響噹噹的文豪科學家都是死不悔改的「不撓鞋派」！

台灣藝人在大陸的處境

在似乎還是一片昇平的時候，亦即胡耀邦逝世之前，台灣不少演藝界的朋友湧到大陸，當然各有目的，但其共同的願望就是希望大陸擁有自己的擁護，這是以前不敢想像的。這些人如費翔、萬沙浪、華冠雄（林慧）、包娜娜、鮑立、梁二、陳彼得等等，除「二包」，外筆者均與他們有不同程度的接觸。費翔以《冬天裏的一把火》一炮而紅，而這把火將中國的大興安嶺森林化為灰燼。似乎萬沙浪在中國大陸的演唱事業頗為成功，八八年一年搞了八十八場演唱會，賺得盆滿鉢滿，春風得意便萌發留在大陸的念頭，筆者却不以為然反對他，因為他太不了解共產黨了。某次在廣州白天鵝賓館與萬沙浪午餐，侯德健與程琳走上來，席間，侯大罵共產黨，大罵文化部。侯回大陸定居，箇中甘苦只有自己知曉。你台灣回來的始終是外人，而侯德健竟還上京爭取民主，共產黨對他不會客氣了。後來，與梁二在中國大酒店共用午餐時，萬沙浪笑梁二不知共產黨的厲害，梁二想在上海搞個夜總會，萬沙浪嘲笑他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共產黨最慣用的詞語。



·鄧小平的牌友：丁關根

大陸新聞界的滅頂之災

猫的屁股說不得

● 蘇州 文 洪

而猫也对着人們叫一聲，那是在這被壓迫的處境下，人們已被逼到這地步，猫也忍不住了。人畢竟比猫聰明，說不得你就不說，也懂得猫叫，但是非說不可，也就懂得講究「藝術」了。這「藝術」指示我們可真是個怪物，可指白貓，也可指黑貓，可指雄，也可指雌，還有用「M」的，「M」總不是「貓」吧？時間一長，不覺貓看字面的貓也終於研究出這「M」與自己的形象有相似之處，於是，再也不敢沉默！

眼下，人們已被逼到這地步，猫也忍不住了。人畢竟比猫聰明，說不得你就不說，也懂得猫叫，但是非說不可，也就懂得講究「藝術」了。這「藝術」指示我們可真是個怪物，可指白貓，也可指黑貓，可指雄，也可指雌，還有用「M」的，「M」總不是「貓」吧？時間一長，不覺貓看字面的貓也終於研究出這「M」與自己的形象有相似之處，於是，再也不敢沉默！

六月十二日《蛇口通訊報》發表的《猫的屁股說不得》（這是文章其中一部分），諷刺挖苦鄧小平。據稱發此文的編輯最近已失踪。

「六四」之後，全國至少有二十名編輯記者被捕。

李瑞環頭痛：要找又懂業務又叫人放心的新聞官不易。

中共掌權以來，新聞從業員從未有過報道自由，現在又淪為愚弄人民、欺騙人民的工具。

何 頻

北京「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共高層即把新聞界、教育界、理論界和文藝界列為所謂「反革命暴亂」的「重災區」。國家副主席王震更是殺氣騰騰下達命令：「首先要整新聞界！」

二十多名記者被捕

日本時事社九月十四日發自北京的消息說，大陸傳媒有七人涉及民運被捕。實際上，「六四」之後，全國至少有二十名編輯記者被戒嚴部隊或公安當局抓走，有的甚至沒有辦理逮捕手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曾在六月四日現場播音時，報道了共產黨殺平民的暴行。有消息說他被當場處決，不過近日有人告訴我，李氏仍生存。

《經濟學週報》副主編王軍濤、女記者高瑜於六月八日左右被捕。王軍濤一九七六年因參加「四五」運動被打成反革命。他當時寫有一首詩：「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此詩被作為他的罪證之一。一九七八年他被當局捧為「英雄」，詩作亦大量印行。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一度任香港《X報》駐京記者，去年十一月寫有一篇嚴家其與溫元凱就時局對話的報道，轟動一時。

《中國青年報》被捕的是經濟部副主任楊浪和駐雲南記者楊宏。楊宏更被直接策劃和指揮了昆明的一動亂。

《科技日報》副總編孫長江亦被捕。孫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十年前他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寫作。

《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被捕是人人皆知的事。《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五月下旬曾與我見上一面，在場的還有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當時張還開玩笑說：「在中國要當一個好記者，非得坐牢不可。」想不到不久，他與同報的記者許小敏在上海金山一間工廠宿舍裏被捕，黃德北則在七月遭到中共拘留，剩下我仍在逃亡途中。

《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等宣傳機構有近十名編輯記者被捕，其中《人民日報》記者張抒被指參與出版批評戒嚴的《人民日報》（號外）。

另外，北京、上海、西安、深圳、海南、鄭州、武漢、昆明等地有一些較有名氣的記者失蹤。有的通過「秘密通道」抵達了歐洲或北美洲，有的則正申請去台灣。相信仍有一批為數不少的記者正在大陸藏匿或逃亡，有的則是被秘密逮捕。這些遭受逮捕或通緝的編輯記者，罪名多是進行了「反革命宣傳煽動」，有的直接參加了民

運的領導和策劃，有的則是向境外傳媒提供了民運消息和中共高層鬥爭的內幕，有的僅是與著名民運領袖有私人來往。

一批報刊被查封

從六月下旬開始，中共的宣傳部和政府的新聞出版管理部門便組織了大批人力，到各新聞出版單位進行調查，審閱近年來尤其是今年以來的報刊書籍，並計劃取消一成有「自由化傾向」的報紙、雜誌、出版社登記證。有些著名的報刊已被勒令停止發行。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已無復刊可能。除有部份員工被捕或失蹤外，餘下者正自謀出路。由陳奎德主編的《思想家》雜誌，亦被禁止出版。北京則有八份報刊已從報攤上消失。其中最著名的是《新觀察》、《華人社會》和《經濟學週報》。

《新觀察》創刊於五十年代初期，半月刊，在海外內外頗具影響力。四月下旬，該刊曾與《世界經濟導報》合辦研討會，要求中共給予胡耀邦客觀評價。後來該刊還有一篇雜文《兩個袁木》，以諷刺中國戈培爾式的陰險嘴臉。該刊由七十餘歲的戈揚任主編，戈氏是著名記者和活動家，與胡耀邦、鄧穎超私交甚密，她還曾送我一本她寫鄧穎超的書。但這次被陳希同點名批判，幸虧戈揚正在美國訪問。

《華人社會》雜誌創刊時間不久，由全國人大常委楚莊任社長。該刊格調較高，尤以中西文化比較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刊載甚多。而《經濟學週報》的知名度僅在《世界經濟導報》之下，多次刊文介紹西方自由經濟理論，猛烈抨擊時弊。

在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中，深圳市委即受命查封了《深圳青年報》和《特區工人報》。這次又有《蛇口通訊報》遭到整肅命運——該報以雜文見長，八八年則有一篇批評算吹牛混飯的曲嘯、李燕傑等人的文章，成為轟動全國的「蛇口風波」，今年又用大量篇幅報道了民運。令人欽佩的是，「六四」之後，該報還刊有一篇雜文《貓的屁股說不得》。

在海南省，至少有三家報刊已停刊。其中由著名作家韓少功主編的《海南紀實》，有「大陸《爭鳴》」之稱，多披露高層內幕，銷路極佳。另一本新聞周刊《新世紀》，創刊並不久，因為與趙紫陽有關聯而夭折。該刊編輯曾對我說，計劃將《新世紀》辦得類似美國的《新聞周刊》。吉林《知識分子》雜誌尚未出版，便胎死腹中。

新聞界大清洗

李瑞環掌管中共意識形態後，除決定查封一批報刊、出版社外，便是對新聞界進行大清洗行動。

首先，一批與趙紫陽關係較近或思想解放的新聞界的負責人遭到撤職。先是《人民日報》社長錢仁被高狄接任，總編輯譚文瑞被軍官邵華澤替代，其後是《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被張常海擠走，就連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也落台，由宋木文代理。新華社社長穆青雖名義還在，但離去職的時間並不長。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之子吳小鏞，任中央電視台部主任，亦被撤職。

傳《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工人日報》、《中國婦女報》、中央電視台等宣傳機構，亦將於近月進行領導層「換血」。

專業報刊和地方日報的負責人也曾撤換一批，如《海南日報》總編輯凱已被停職。

不過聽說李瑞環頭痛的是，現在要找一些又懂宣傳業務又叫人放心的新聞官，實在不易。有人曾出主意：從軍隊轉業一批宣傳幹事到各宣傳機構，李瑞環並未採納。

但李瑞環伙同中宣部長王忍之以中共中央名義就新聞界炮製了一個文件，內容主要包括：一、徹底清查在「反革命暴亂」中的組織者和參與者，輕則組織處分，重則交公安機關處理；二、各新聞單位自行清查，將所發表的文章歸類，作出詳盡報告；三、與公安司法機關、戒嚴部隊密切配合，搞好「反暴亂」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輿論導向工作；四、組織政治學習，批判以胡績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聞觀點等。

自中共掌權以來，大陸的新聞從業員從未有過真正的報道自由，而只是黨的圖解員和宣傳者而已。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稍有寬鬆，而現在又徹底淪為獨裁者愚弄人民、欺騙人民的工具。

鳴謝月刊 1989/10

出版界有新限制

壓縮品種 選題減少

何伯施（北京）

「六·四」之後，中共在意識形態的工作上毫不放鬆，除了重整新聞單位外，對出版界也死抓不放。最近，新聞出版署按照中央的精神向各出版社發出通知，要求「認真製定1990年的出版計劃」。通知的內容，地地道道是一個大倒退，把「十三大」以來逐步出現的出版自由完全否定和收回。

概括「通知」的內容，無非三句話：壓縮品種、選題要小心、出版決定權交回上級控制。

壓縮品種方面，主要是壓縮外國刊物，除了壓縮外國通俗文學作品和暢銷

書外，還包括思想性的作品。「通知」特別指出，各省、市、自治區只能有一家出版外國文學作品；出版社在創辦時如果沒有獲准出版外國作品（包括翻譯本）的話，一律不得出版外國作品。那些獲准出版外國作品的出版社，如果沒有稱職的外文編輯，則應停止出版外國作品。至於怎樣才算得上或算不上稱職的外文編輯，則難以估計了。

在選題方面，「通知」給出版社列出了六個範圍，主要是加強思想教育的書籍，如學習馬克思主義和黨的路線。根據這項精神，新華書店馬上與有關出版社重新印行了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舊書。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很好的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但也

包括了不少階段教育的書。此外，在出版社本身專業範圍以外的書籍，要堅決撤下來。

在出版決定權方面，「通知」雖然沒有明言，但實質上已否定了去年年中以來出版社有自主權的做法。「通知」指明，出版社的出版計劃要報出版社的上級主管部門審批；由中央部委領導、設在北京以外地區的出版社（包括大學出版社），除了要把出版計劃報上級部門審批外，還要報所在地的新聞出版局審核，經審核後又要報國家新聞出版署備案。

總而言之，出版界現時仍吹着冷風，春天的腳步仍遠着哩。

當代周刊 89/12/9



▲新觀察八九年第一期封面。

「六四事件」後

■燕南飛

中共查封《新觀察》雜誌近況

編輯不懼高壓 勇於承擔責任 北京知識界傳為美談

知識界津津樂道

▲新觀察大膽報道民運
一位剛從北京抵美的通運消息人士，披露了在「六四事件」後被中共官方查封的《新觀察》雜誌近況。這位人士指出，在八九民運期間，五月廿五日出版的《新觀察》雜誌（八九年第十期），因大膽報道了北

午（著名詩人又青長子）均為負責編輯工作的編委，任責忠是辦公室主任，負責行政工作。引起風波的八九年第十期雜誌，則是由又青負責發出的。由於大膽報道了學運真相，刊載有廣受讀者歡迎的《北京「四·二七」學生遊行日記》、《致兩個袁木雜文》、《平靜下來的思索》（作者著名法學家于浩成）和《送耀邦叔叔》等文章，這一期雜誌的銷量，由平时的十四萬七千份，劇增至一百二十萬份。

爭着承擔責任

「六四事件」後，編委又青端午過「地下通道」逃離大陸，獲法國政治庇護，並於去年十月抵美，與主編戈揚在紐約重逢。留在北京的新觀察全體人員，均接受清查小組審查。

消息人士指出，在審查期間，人性美好和醜陋的一面，都在新觀察內部反映出來。副主編鄭仲兵，勇於承擔責任，把所有事情都攬在自己身上。他一向體弱多病，患有肺結核，在被審查中吐血，仍不肯入院接受治療。另一位編委、辦公室主任任責忠則認為自己年紀大了，即將退休，此人在工作崗位上一向任勞任怨，被人譽為「老雷鋒」，為了保護鄭仲兵過關，他爭着承擔責任，使得清查小組頗感為難，不知誰是真正的「首惡」。此事令人感動，在北京知識界傳為美談。

據了解，鄭仲兵原職中共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處長，八八年初調遷新觀察副主編，「文革」期間，曾因反對中共領導人謝富治被關押。此人思想一向甚為開明，故在中宣部時曾受「左王」鄧力群排斥。

另一方面，現在紐約流亡的《新觀察》編委又青端午，對鄭仲兵和任責忠代他受過深感不安。他說，編委分期負責發稿，這是戈揚赴美後，鄭仲兵和他研究後決定的。而「出事」的那一期雜誌（八九年第十期），由他負責處理，故應由他承擔全部責任，這也是他逃亡的原因。他明白鄭仲兵和任責忠為什麼要主動承擔責任。他分析，這兩位同事為人正直，富有正義感，品德高尚，所以才勇於挺身而前，代人受過。他認為該是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鄭、任兩人沒有必要為他擔罪。

北京知識界在津津樂道鄭、任兩位勇於承擔責任的同時，却十分不齒另一名編委的「出賣」行為。事緣在八九民運初起期間，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合辦一個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出席者有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等二十五名知識精英和胡耀邦生前好友。《世界經濟導報》在會後出版一個「悼胡」專輯，轉述很多知名人士批評中共沒有民主的談話，結果被上海市委臨時抽版，釀成轟動海內外的「導報風波」。

「六四事件」後，中共當局追查出席這次座談會的全部人員名單、發言內容、照片等，新觀察一名編輯為了邀功，竟然交出座談會的錄音帶，不但錄有正式發言內容，連一些私人交談和發洩對中共不滿的談話都被一句不漏錄了下來。此舉遭新觀察全體人員的鄙視。

為中國哀，為戴晴辯



戴晴與李銳
前小字部副部長

大衛

其實中共這層做，可謂巧成拙。戴晴加入《光明日報》後所做的工作，所發表的系列採訪文章，其水準和影響力是有目共睹的。若戴晴不是一個優秀的記者，當年《光明日報》為什麼如此賞識她，再三延請她入行，還答應她開出的苛刻條件？——「不坐班，不採訪，不採訪式會議，不做那些只發豆腐塊新聞的記者。」《光明日報》的地位和影響力，在民間而言實居於中共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之上，這是一分較為開放的報章，也較獲知識分子接受。因此，戴晴能加入《光明日報》，本身便證明她的「才」與「識」都達到水準。鄭若谷定戴晴做記者的資格，恰好說明在中共心目中，「記者」應該是怎樣的庸才和奴才。

「參與」之罪，為何只說一半？

鄭若谷的文章說：戴晴常「異常緊迫地出於一些政治集會」、「政治沙龍」，實現她的「參與」意識。此話固然不假，但他在這裏又玩弄了一個中共「整人」文章的慣用手法，不敢正面列述真相，只揀對自己論點有利的事來寫，更不敢觸及事情的本質。

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傳播媒介享有新聞自由，記者完全用不着通過曲折的「參與」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戴晴的「參與」只是對中共獨裁政治的反響。上述因果關係，鄭若谷何以不言？

另一方面，戴晴所「參與」的，也有官方的「政治集會」，為什麼鄭文却避而不提？一九八八年九月，戴晴曾被《光明日報》的「女同胞們」（戴語）公推為代表，出席第六屆全國婦聯代表大會。以戴晴這樣一個每月只在報館露幾次面的記者，居然獲眾多女同事推舉做代表，參加全國婦女界的「政治集會」，則戴晴在報館的地位和影響已不言而喻。而戴晴這次「參與」也有「出路」的表現：她竟敢在這次婦聯的全體會議上，登台質問「主席候選人」陳慕華，對她的政績和能力表示懷疑（編者按：請參閱本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號戴晴的〈嗚呼，中國婦女代表！〉），給這部按中共程序運轉的表決機器製造了一點故障，這實在是中共難以容忍的。正因如此，中共當局對戴晴的一切「參與」，都抱有不安和防範的心態。

「採訪」之罪，何不盡錄？

戴晴自加盟《光明日報》做記者後，按照自己的意願和社會的要求，採訪過不少著名的專家學者，這些訪問記都在她的專欄《學者答問錄》中陸續發表，引起多方面的關注，社會反應甚好。鄭若谷這篇文章四次引述《明報月刊》於八九年二月發表的《戴晴談心路歷程》一文，列述了戴晴訪問過的人物姓名，並把他們統歸於「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大帽子下。但為什麼鄭若谷只列舉了方勵之、嚴家其、金觀濤三個「典型反動人物」的姓名，却遺漏了戴晴採訪過的其他知識分子？《戴晴談心路歷程》一文中所提及的梁漱溟、黎澍、馮友蘭、厲以寧、姜洪等，鄭文為什麼都不敢提及？這一方面說明中共畢竟有所顧忌，不敢株連太廣，不能把所有表現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都打為「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們為給戴晴羅織罪名而不擇手段。

中共為什麼毒恨戴晴？

《動亂》記者「戴晴」一文，完全承襲了文革時「大批判」的公式，稱戴晴的「種種表演」，「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這完全是「階級出身決定論」的翻版。為什麼中共對「根紅苗正」、「革命烈士」家庭出身的戴晴恨之入骨？最根本的原因是戴晴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對這個獨裁政權的批評入木三分，因而不能見容於當權者。

事實上，戴晴從一個「絕對的紅五類」，「中共社會的『天潢貴冑』」，《戴晴談心路歷程》一書，變成今天的「反動勢力的走卒」、「動亂」記者，「《動亂》記者」。

「戴晴」，恰好說明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不論其家庭出身及社會背景如何，終會遇上追求民主自由之路，而這又是中共絕不允許走的路。因此戴晴這類知識分子，在目前中國大陸，實難逃悲劇英雄式的命運。

鄭文對戴晴展開的所謂「批判」，其主

要事實依據是什麼？我們看到，除了她在香港和海外傳媒上發表的談話，便是她在座談會、演講會上的言論，以及她以個人身分所「參與」或「組織」的活動，而所有這些談話、演講、行動，全部是在公開場合眾目睽睽下進行的。就是海外記者的訪問，戴晴也完全明白自己的談話會披露於報刊上；但她並未因此有顧忌而說假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公開的，既沒有搞「陽謀」，更沒有搞陰謀，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個愛國知識分子所應做的。鄭若谷的文章徒令讀者更清楚地看到戴晴愛國愛民的情操，事實上是對戴晴的最

批戴者的顧忌與無知

為了拼湊這篇批戴文章，鄭若谷把香港和海外記者對戴晴的訪問拿來做了一番研究，以便挖掘「罪證」。鄭文雖然引述了戴晴不少的觀點，但一些揭露中共本質的關鍵性語句，鄭文中卻小心翼翼地繞過，未敢觸及。例如《戴晴談心路歷程》一文說：「在採訪中我發現，中國的歷史完全是歪曲，是一部愚弄人民的歷史。」戴晴這裏說的「中國歷史」，就是中共七十年的歷史。鄭若谷對戴晴這句「罪該萬死」的話大為敏感，始終不敢提及，而在這句話之前和之後的兩段文字，鄭文却分別引用了。由此可見，中共對真正講到其要害的話，是何等的害怕。

鄭若谷的文章無疑是中共的「秀才」所寫，然後用一個「化名」來見報。可惜這些「秀才」的水準實在太差，連最基本的事實也搞不清楚。《動亂》記者「戴晴」一文在敘述戴晴五月下旬的「行踪」時寫道：「五月三十日，接受香港無線、香港翡翠兩電視台採訪；接受香港商業電台採訪；接受香港無線電台採訪。」這裏，鄭若谷搞錯了兩點最基本的實事：第一，「香港無線」和「香港翡翠」並非「兩電視台」，而根本就是一個。第二，香港只有「香港電台」，那裏有

一個「香港無線電台」？連基本事實也未搞清楚的人，有什麼資格「批判」別人呢？

司馬昭之心

戴晴在今次的學運中，並不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她不但鼓勵大學生罷課、遊行、絕食，反而數次呼籲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因此，她被大學生認為是「替政府說話」的人。再加上她出身於「烈士」家庭，是葉劍英的養女，又曾在公安部門工作，她甚至被學生們懷疑是安全部的特務，以至她的朋友張郎郎要「拔刀相助」，在《九十年代》發表文章替她辯護。因此，中共對戴晴發動攻擊，更加令人清楚地看到，它不僅是在進行這次民運的「秋後算賬」，而是要把愛國知識分子一棍打死。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哀哉中國，哀哉中國知識分子！

戴晴不配稱記者嗎？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北京《光明日報》登載一篇署名「鄭若谷」的文章，題為《動亂》記者「戴晴」；兩日後九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全文轉載。

《動亂》記者「戴晴」一文，旨在「批判」要求民主的知識分子；與同類文章一樣，採取的是文革的「打棍子」手法，用煽動性語言和歪曲的事實，力圖把被批者「搞臭」。因無理可講，只能進行人身攻擊。

該文的標題在記者二字前加上引號，意即不承認戴晴是一個真正的記者，不承認她有記者的資格。當局首選《光明日報》來發表這篇文章，當是因為戴晴原為《光明日報》記者，要報社表現一下「大義滅親」，給人以一種「連她的單位都出面批判她」的印象，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在廣州某酒店，遇到北京新聞界的朋友，很自然問起現時北京中央廣播媒介的情況，想不到這位仁兄戲謔地說了一句「反思，現在都對這場反革命暴亂進行反思！」似極為輕鬆。也許這位仁兄對現已僑居國外的前中央廣播機構從業人員的筆著，多少有點戒備。然而，深談之下，他便回復以往口若懸河的特點了。

吳學謙的獨生子吳曉鏞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副主任吳曉鏞，是副總理吳學謙的獨生子，原職國際電台高級記者，屬於所謂「第二梯隊」。他與廣大北京市民一道，目睹了北京的民主運動，加上他的家庭背景，了解真相的程度自然較一般百姓多。本來他尚能以新聞工作者的冷靜眼光看待事態的發展。然而，在「六四」凌晨，國際電台英語部的一位副主任被亂槍打死，他實在按捺不住了，提起筆寫了一篇「極惡毒」的文章，要曉鏞播音員（外傳為英語播音員李丹，實是一位聲音酷似李丹的播音員）播出他「進城的解放軍向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瘋狂掃射」的文章。之後，他還留下寫有：「這份稿件你們可播可不播，但我們希望廣大聽眾能看清法西斯的暴行」的紙條，交下一班人員。早班播音員播出了。美國之音、英國BBC公司收錄後，在對中國廣播時翻譯成中文播出。北京市民都聽到了。而西安有一位青年，將北京播出的聲音錄下來，一邊在大庭廣眾之中播放，一邊給聽眾翻譯成中文。這樣，他就以「反革命煽動罪」被判了十年徒刑。

本來中央追查此事之時，國際電台的領導和工作人員想瞞着不報。一直到李瑞環找吳學謙談話之後，吳曉鏞才被公安局帶走。軍管會訂下規矩：「不准家人、單位以任何名義探監。」大家都關心吳曉鏞的境況，想辦法以保衛處立案審查為名，與公安局聯繫，結果如願以償，吳曉鏞現被關在公安局一個拘留所之中，待遇尚好，有單人房，開病號餐。公安局亦不處理他的事，因為他是吳學謙的獨生子，加上北京發生的一切誰都清楚，如中央不壓下來非處理不可，估計吳曉鏞沒有多大問題，現在讓他好好「反思」或者能過關。國際電台另有一位高級官員，看到大屠殺後，公開宣佈退黨，但現時中央明令「誰宣佈退黨均無效，堅決將其開除出黨！」這位官員現正停職審查，一切職務將會撤消，他亦在進行「反思」。

北京電視廣播員

薛飛、杜憲調職「反思」

周廣華

中央電視台播音員薛飛與杜憲

較為著名的「反思」人物是中央電視台的兩名播音員薛飛和杜憲。薛飛以固執著稱，曾強烈抵制戒嚴部隊下發的宣傳稿件播出，甚至拂袖而去。而杜憲以「哭喪」形象出現，令戒嚴指揮部大為惱火，責令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三天內調換人員，不然就對廣播電視部實行軍管。艾知生部長與前中央電視台台長、現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王楓大為焦急，連續三天睡在中央電視台內。他們不願意讓軍管，於是不得不轉達中央的指示：從今以後，薛飛、杜憲不准出鏡，不准外出採訪，不准出外主持節目。這樣，薛飛就調到經濟部，杜憲就調到社會教育部，無所事事。薛飛的「反思」方法是每天開着私家小車閑逛。

有記者在「六四」之後採訪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問及在六部口至新華門爆發的「催淚彈之戰」。張百發說：實際上當時公安局只有八枚催淚彈。當時解放軍化裝之後，想將一車武器及一車彈藥先偷運到天安門的廣場。但駕車的軍人是從未入過京城的鄉巴佬，他們到了西單之後，便想下車問路人天安門在那里，可開口便是五十年不變的稱呼：「喂，老鄉，天安門在哪裏？」一句話露了餡，招致成千市民的圍攻。公安局迫於壓力，向市民打了兩枚催淚彈。張百發說：「他媽的，你問路，說『老鄉』，還不被人家發現你是大兵？」北京的市民說：這次運動，開槍的和被打中的都是無辜的。士兵根本不知道正義與非正義，軍令如山，反正打死的都按暴徒處理。誰都明白，不久的將來，真正的劊子手會被公審。所以，如今不象「文革」時期，飛機踩倒別人似乎不太容易，中央機構的工作人員都在沉默地等待，在「反思」。

開放月刊 98/1

中共內外

加強控制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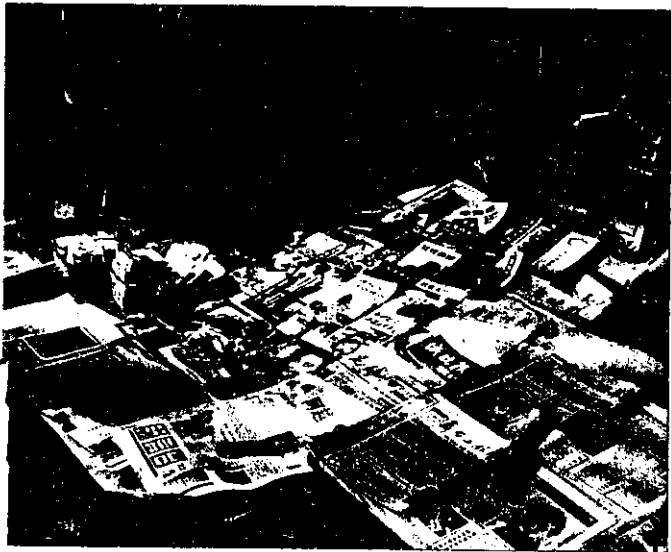
北京當局對去年底的東歐巨變，表面上「處變不驚」，實際上其緊張的程度非外人所能想像。對原本已嚴格控制的傳播媒介，更定下統一的宣傳口徑，以求減弱東歐浪潮的衝擊。

十二月底，中共中央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李瑞環及政治局候補委員丁關根主持召開「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通氣會」。主管宣傳的各單位領導人，如中央宣傳部部長王忍之、中國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朱穆之、《人民日報》社長高狄、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艾知生、新華社社長穆青、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徐惟誠、代文化部長賀敬之等參加了會議。

亞洲週刊從一份會議紀錄中獲悉，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的指示及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有關東歐局勢的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於十二月下旬召開連串會議，定下了分析東歐形勢的基調。最高領導人鄧

大陸報刊：嚴格按照中央宣傳口徑

小平在會前，制定了一「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十二字方針。此方針不久即為香港《明報》所披露，令高層大為震怒，下令追究責任。當局如此緊張，是因為其對東歐的看法對外層，以作為宣傳工作的指南。「通氣會」會上，李瑞環和丁關根要求對東歐局勢的宣傳要



攝自北京之亞洲週刊

按照「十二字方針」辦，宣傳部門要「嚴格把關」。他們還強調，宣傳工作要謹慎、客觀，對新聞處理要低調適中，注意影響，能不報道就盡量不報道，能少報道就盡量少報道，但又不能不報，以免被批評為隱瞞真相。

李瑞環還提出宣傳工作中的規條：「要掌握好『黨內黨外有別，公開內部有別』的原則」；「要加強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決不能手軟」；「全黨要統一紀律，各單位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方針辦，不能違反，重要報道要請示中央，不能搶新聞」。

在傳達江、李講話之後，高狄問：我們在齊奧塞斯庫（羅馬尼亞總統）被槍決當天，扣壓了這條新聞不發，很多人打電話來問，這種情況我們很被動。李瑞環答道：當時我們也掌握不到準確的消息。我們駐羅馬大使館人員不能上街，我們試圖與羅馬共聯絡，但聯絡不上，消息未證實前還是遲發為佳。

艾知生接着反映情況：齊奧塞斯庫被處決後，北京有教師和學生出來慶祝，並砸瓶子。李瑞環回應說：「對學生要多做勸解工作，不能讓人民知道我們心慌。」他並舉例說，他在學運期間每天在天津大街上出現，讓人民感到他胸有成竹的樣子。

李瑞環警告說：「誰不按『十二字』方針辦，不要怪我不客氣，誰出問題誰負責到底。」北京知情人士告訴亞洲週刊，江澤民曾在會議上，將東歐形勢的劇變概括為「波蘭十年，東德十星期，捷克十天」。江認為美國等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久有打算，把東歐作為

突破口，這次終於成功了。不過他要求大家對未來要有信心，多組織文章宣傳，教育人民。

在嚴格控制內部宣傳的同時，北京進一步加強對外傳播媒介的管制。亞洲週刊獲悉，北京近期曾向下傳達，不要讓外來報刊有寬闊的採訪空間；而高層亦有人注意到香港一些報刊的大陸報道，對其中一些報刊很不高



去年到北京採訪的各地記者：受限制

與，包括《當代》、《百姓》、《快報》等。為此，當局雖批准部分香港傳播媒介到廣州採訪基本法草案小組會議，但對《百姓》及《當代》則拒之門外。

中共清查「神經中樞」

吳學謙之子吳小英是國際台英語部副主任，現已查明，他是六月四日向全世界廣播中共軍隊血洗長安街這段廣播稿的作者，目前案子還沒有了結……

矗立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東西兩端的兩座大樓，一座是五十年代初由蘇聯援建的中國廣播大廈，另一座是新建的西方塔樓式的中國電視大樓，都是中共的神經中樞。它們是歷史的見證，是會說話的「天安門廣場」，在政治氣候變幻不定的時候，份外受人注意。

全力佔領電台電視台

誰也沒有料到，中央兩台做了幾十年中共最可靠的馴服工具，竟也在「六四」事件後成為「清查運動」的對象，名曰「重點災區」，其處境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還要嚴峻。這當然事出有因，據他們內部估計，人民日報的二十多名編輯、記者、員工，在五月十九日以前上街遊行示威的約佔百分之三十；新華社六千多名業務人員亦僅有百分之十八上了街；兩台萬名員工的上街人數更不到百分之十。這是根據進入該單位的清查工作組經過半年多登記的數字。因為中央有規定，在宣佈戒嚴令之前參加

遊行的人，自行登記，可免除一切查處。在長達五十天的民運高潮期間，北京的所有新聞單位實際上都已渙散，人員自由活動，幾乎沒有人去過天安門廣場的，實無法計算人次。在人過關、檢舉揭發、威迫利誘等老一套搞運動的手法施展無效後，清查工作組再次進駐這三大「重災區」，把重點落到部門黨員主管（局處級以上）和知名的編輯記者頭上，把這班人同羣衆隔離開，靠邊站，分別審查處理。

到目前爲止，軍方實際上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共的三大傳播機構。以人民日報爲首的中共黨報系統，實權已操在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手中，該部部長邵華澤（即楊白冰的左右手）早已坐鎮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兩台原直屬國務院，原領導班子形同虛設，尚未宣佈接任人選，暫由李鵬的發言人袁木在幕後操縱。軍方的宣傳人員早已紛紛調入，接管了電台電訊機房等要害部門。自從東歐風雲突變，特別是羅馬尼亞的十二月革命，給中共強硬派領導人上

了一大課，他們猛省傳播媒介對他們的命運確是生死攸關，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他們在首都內外部署的三十萬戒嚴部隊，電台和電視網的佔有，實在比天安門廣場重要得多。

新聞工作者令李鵬心有餘悸

最近在北京中央各機關處級以上黨員幹部中傳達的李鵬講話（即政治局會議發佈的三個文件之一），已赤裸裸地表明他要發難到底。聽過這個講話的某些高層人士，歸納爲李鵬的「三不政策」，即「不鬆綁，不對話，不後退」。這是李鵬在中聯部向政治局提供的一份（關於東歐局勢演變研究報告）的啟發下，振振有詞的「經驗總結」。他現在所要做的，首先就是把導致「動亂」的一切風源火點都堵塞住，靠的就是槍桿子和宣傳機器。

李鵬當然不會忘記，八九年五月風暴席捲北京時，中央廣播電視部前任首長謝文清，曾帶同該部員工到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中央廣播電台和國際廣播電台的十五個處長級以上領導人，都曾經走上街頭，匯入首都新開闢示威遊行的大洪流。中央電視台的首席播音員杜憲（全國政協委員）和薛飛在李鵬發佈戒嚴令後，即在新聞聯播節目的屏幕上表態，以至拒絕主持該節目。最令國際聽衆至今難忘的，是北京國際台英語廣播部在六月四日晨首先向世界英語聽衆報道中共軍隊血洗長安街。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報道，翻譯成中文，不過二百一十五個字，但字字血淚，擲地有聲，在中國新聞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傑作。作者便是國際台英語部副主任，三十二歲的吳小英。當天凌晨，他在奔往廣播大廈上班途中，親眼看到從軍事博物館門前至復興門立交橋頭將近一公里半長的街上軍隊瘋狂屠殺羣衆的實況，他回到辦公室後，立即寫下了他的記者實錄，開頭就籲請世界聽衆：「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接着，他用兩小段話，報道「成千上萬的羣衆，其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用坦克和機槍殺害」的實況。由於責任感，他表達了「國際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向所有聽衆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以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國際台英語部副主任之死

吳小英是英語部當班主管，他有簽發廣播稿的職權，當班播音員李丹奉命播出這條新聞，亦責無旁貸，這位年青的播音員在播完後並

未像外間傳說的那樣被衝進播音室的軍隊拉走，吳小英自己擔當了責任，他在六月五日被停職審查。因為他是政治局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的兒子，軍方請示了吳學謙之後才將他逮捕，拘留審查。吳小英認爲他所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沒有搞什麼陰謀。當時他是在槍林彈雨中堅守崗位，上級並沒有指示那些稿件不可以播發，他是按職責、事實、良心辦事的。國際台很多員工對這位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高材生的誠實精神有口皆碑。據他的同事們說，吳小英在「六四」之晨表現得如此英勇的另導因，可能是因爲他當天來上班的途中，就親眼看到他的同事好友——國際台英語部副主任，在木樨地大街上被軍隊槍殺的慘狀。這位國際台的英俊是在六月三日午夜從電台下班騎車回家的途中被一顆達姆彈擊中倒在人行道上的，經羣衆搶救送往附近的復興門醫院，因爲這間醫院的傷員越來越多，血漿告罄，延誤到第二天上午才死去，死狀極慘。當時陳屍這間醫院自行車停車棚內的慘死者，就有一百六十二具。

廣播大廈門前的示威

吳小英的案子還沒有了結，那位慘死的俄語部主管的家屬至今還不敢吭聲，雖然他父親在新華社工作，只有這個獨生子，但也啞巴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甚至不敢透露其姓名。關於被認爲是在動亂中的兩台頭號問題人物謝文清，則早已被開除黨籍，革去公職，等候進一步處理。

正因爲人心難服，兩台始終處於內外緊張狀態。去年十二月九日，廣播大廈門前發生的學生與羣衆集會示威，就是一個危險的訊號。當天下午五時，以北京航空學院學生爲先導舉起「我們爲什麼這樣窮」的橫幅，有一千多人突然擁進該大廈院內，有六位學生代表向羣衆發表演說，隨後竟能通過門衛，登堂入室，直奔樓上播音室，這才驚動了駐守在大廈後院的戒嚴部隊（已改裝成武警），調來增援士兵，把學生代表架走了，把羣衆驅散了。從此守衛廣播大廈的連隊成倍增加，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就進不了大樓，要害部門更警衛森嚴。不過，當人們看了布加勒斯特的國家電台是如何落入反齊奧塞斯庫的軍隊和市民手中，也就不望而生畏了。

中國的古聖先賢，都曾告誡過歷代的統治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希望南海裏極少數幾個仍要蠻幹到底的老朽們，不要視人命如草芥，接受血的教訓。



中共軍方的最新宣傳畫：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
知識界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303	方勵之，中共志在必得——評方勵之政治庇護事件（牧夫）	解	7/89	69/71
304	政治掛帥培育「紅色」人才	亞	6/8/89	10
305	愁城三章（承嬰）	九	8/89	22/23
306	大陸知識界分子的處境與命運（辛迪）	鏡	9/89	42/44
307	大學師生冰吟談對待洗腦——兼談中共奇書「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李玉）	爭	10/89	20/23
309	北京民衆沉默抵制知識份子成爲清查重點（阿山）	百	1/10/89	28/29
310	躲不開的政治教育——港澳學生在內地近況（盧育儀）	當	16/12/89	15
311	中共以種種手段威脅知識分子 大陸知識份子仍然有人講真話（老木）	百	16/12/89	28/29
312	六四後遺症何時方能癒（辛欣）	當	6/1/89	17/18
313	大清洗下的社會科學院（蔡詠梅）	解	2/90	14
313	謾罵只能自暴其醜——評中共最近對劉賓雁等人的批評	解	1/90	91
314	沉默中的希望——「六四」之後的北京校園（傅德賽）	明	2/90	41/42



方勵之求底面臨很大壓力。

方勵之：中共志在必得

評方勵之政治庇護事件

美國大使館。

未必會認同成仁取義的傳統

正當沙卡洛夫在蘇聯人大呼籲蘇共結束政權的關頭時，「中國的沙卡洛夫」方勵之教授卻面臨一場滅頂之災。不到五年的時間裡，方勵之至少創造了兩項中國紀錄：成為全國皆知的整肅對象之後，還能進行公開的異見活動；在一場嚴厲的大清洗之前，成功地取得外國大使館的庇護。

坦然應對，敢於承擔

在五月十九日中共的平亂動員大會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指名抨擊方勵之，我的直覺反應是，如果學運失敗，方勵之將首當其衝。因此，在五月上旬和方的一次通話中，我問他不知道被李錫銘點名？他說不知道，消息很閉塞。我立即找來資料，把李錫銘報告中有關他的部分唸給他聽，然後，我向他預約了一個訪問，請他談談與學運有關的問題，當然也希望他對當局的指控作出答覆。

當時，電話已有明顯的竊聽跡象，方對此當然完全清楚，他早對我說過，他的電話「絕對竊聽」，但他並不畏懼，他說，他不怕竊聽，他講的話都是可以公開的。

五月卅日，我得到消息說，北京同香港的某些電話將於卅一日被截斷，為了爭取最後一個機會，我找到了方勵之，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訪問（見本報六月號）。

方勵之對我的問題有問必答，除了個別問題稍感有所保留，一般都答得很坦然，不假思索，敢於承擔。六月四日的大屠殺發生後，我尋訪北京知識界人士，又找到方勵之，彼此交換了一些有關事件的信息之後，我請他作一表態。這時已是六月四日下午，長安街的槍聲尚未停息，電話上感到氣氛的凝重，方在話語中沒有往常的笑聲，且時有停頓，我不便問他如何自處，請他多保重，便匆匆收了線。六月五日，我再次同他聯絡，電話接通，但無人聽話，根據過去經驗，我預感到他家已經空無一人。六月七日，美國電視台首次報導他已避入

很快，傳來了香港、大陸甚至美國一些對方勵之困難的看法，這些至今未見報的看法對方頗有微詞，認為方勵之逃避，不夠英雄，甚至有人責難他，許多知識分子都上了街，出面支持學生，他為甚麼不出來？也有人認為方勵之進使館，給中共（共）美關係增加麻煩，憑添包袱。

方勵之在訪問中回答了何以要避嫌的問題，他說這是為了讓學生更主動。其實，從訪問中可以看出，他並沒有完全迴避學運，他見過學生，提過意見，並不隱諱妻子李淑娟和學生接觸是她的職責。方勵之被當局指責，要求他直接介入學運，顯然是不適當的。

我想，方勵之是一位觀念上比較西化的學者，他未必會認同「不成功便成仁」一類的傳統氣節，他入美國使館避難，正是一種西方式的選擇，他想必十分清楚以海森堡為首的一批德國物理學家，戰後如何解釋他們為納粹工作的原因。無謂的犧牲並不可取。

最近，方勵之的朋友，美國學者林培瑞會透露，方勵之六月五日同美國大使館商談他的安全問題時，擔心進入大使館會引起外國介入中國學運的不必要猜疑，在學生以死力勸方勵之夫婦生存在去為歷史作見證後，他們才於七日進入使館尋求庇護。

究竟方勵之面臨多大危險？是不是有其他安全的選擇呢？

被當局視為罪魁禍首

中共當局已把方勵之當作這場動亂和暴亂的罪魁禍首。這有六月之內的幾件事例可以引證：

五月三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記者會上反覆強調學生運動背後有人挑動、出主意，並指方勵之在動亂中扮演甚麼角色，「將來的事實會作出結論」。袁木還說，極少數人一直頑固堅持反黨反社會主義立場，在大學中進行了幾年錯誤的和非法的活動。

五月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動員平亂的黨政軍幹部大會上，點名指方勵之

在沙龍集會上煽風點火，北大有人在鼓吹在方勵之領導下為「民主、自由、人權而戰」。

●方勵之不會成為中國的明曾蒂，如果方在美國大使館長年避難，就無異於中共容忍一名罪魁禍首在北京某地隱居，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 牧夫

五月卅一日，官方組織北京郊區的擁護李鵬遊行，焚燒方勵之像。

與此同時，沒有另外任何人如此集中地被官方所攻擊，焚燒方像一舉，雖近近笑談，但卻是一次極象徵性地顯示了方在官方眼中的禍首地位。六月四日，中共當局正式將學運的定性，由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亂」，這五個字是共產黨政權治下，最高級別的社會罪行，在這個定性下，一切鎮壓手段皆「合理合法」，從出動坦克到大規模處決，即中共已做和正在做的一切。方勵之既被當作這場暴亂的首犯，那麼，就絕無道法外之理，天涯海角也要緝拿歸案，中共一貫的方針是「首惡必辦」，因此，當局一定要把方勵之弄到手，這是對方勵之此案的基本判斷。

接近可靠的估計是：方勵之一旦被捕，等待他的將是死刑或秘密殺害，至少也是終身監禁。

中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因此，在尚未向知識界公開下手之時，北京公安局便下了通緝令，指方勵之夫婦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暴後策劃聯絡」、「畏罪逃入美國使館」，其後輿論攻勢跟上一派志在必得的氣勢。六月十六日，袁木答美國記者問時，更透露了殺機，他說準備將方處死，後又改口為拘捕。

當局對方勵之如此恨之入骨，上次學潮的舊賬可以不提，但今年以來的新賬是不能不提的。五月學潮達到那樣震撼性的程度，應該不是孤立發生的。方勵之在訪問中說，年初的要求釋放政治犯和一些學術討論，對學生的觀念都有影響，而方勵之正是今年春季知識分子的簽名運動的帶頭羊。

絕食鬥爭為方報了一箭之仇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二月下旬布殊總統訪華期間發生的方勵之赴宴受阻事件，顯示當局和方處於勢不兩立的位置，也顯示了中美雙方對待方勵之的不同立場。人民當時無權表態，但可以肯定，知識界和學生是同情方勵之的，

只有中共當局和某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才會指責方勵之等人「求助外國勢力」和「告洋狀」。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五月中旬戈巴喬夫的到訪，竟被如火如荼的北京學運搞得十分狼狽，不僅訪問日程打亂，而且使中蘇領導人處於對中共極為尷尬的巨大反差之中，學生們視戈巴喬夫為改革英雄，鄧小平李鵬則成了眾矢之的。客觀上，這是方勵之的勝利，無異於為方勵之的宴會之辱報了一箭之仇，使整個中共領導集團在它的二十多年的對手面前，蒙受了一次空前的恥辱，鄧小平李鵬等人的惱怒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戈巴喬夫離開中國後兩日，中共就開始對學生施行報復，公開指學運為動亂，並宣佈戒嚴，派兵入城。

既然方勵之是迄今唯一一點名的「暴後策劃者」，當局的滿腹怨氣自然要發洩在方勵之身上。即使方不躲進美國使館，也一樣免不了被緝拿。

現在，「中」美雙方正以外交方式解決方勵之問題，美方顯然在謀求讓方勵之離開中國，而不可能將方交給中共當局。

中共目前採取的對策是：

●不和美國撕破臉，不否認外交特權，以官方談判要求美國交人。
●監視和包圍使館，嚴防方勵之夫婦被送出境外。
●製造針對方勵之和美國的輿論攻勢及壓力，包括對方的通緝令和新聞媒介的攻擊。

中共捉拿方勵之的幾種可能性

「中」美雙方現在雖然處於僵持狀態。中共立場如不軟化，它抓到方勵之的方式及可能性，有如下幾種：

一、強行衝入大使館捉人。可能性不大，一則公然破壞國際法，代價太大，蘇聯東歐國家都不敢侵犯使館內的治外法權；二則中共尚未表現出可以置中美關係於不顧的意向。
二、以犧牲中美關係的某些方面，甚至以

人質為交換條件，得到方勵之夫婦。可能性有，但相信美國不會接受以何條件交出方勵之的方案。

三、欺騙方案。在適當時機以某種方式使美國相信，當局會保障方勵之夫婦的生命安全。對此，美國人要加以提防。

四、煽動或組織羣衆鬧事，在使館的混亂中捉人。同第一方式相近，在當局穩定秩序聲中，亦不大可能。

五、不惜鬧到中國外交關係，在使館撤退時捉人。這是最壞的可能性。

六、方勵之的自戕犧牲。如果方本人以為維護某種利益原則（如中美關係）更為重要，他可以置生死於度外而走出使館，這種可能不大。

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明會蒂

現在，不少人估計方勵之將重獲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暴動後紅衣主教明會蒂的命運，明會蒂當時的處境很類似今天的方勵之，被囚共當局判重刑，在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達十五年之久，一九七一年才獲准出國，恢復自由。不過，我認為，在中國的條件下，方勵之不可能成為另一個明會蒂。如果方勵之在北京美國使館中長年避難，在中共眼中就等於容忍一名空前的反革命暴亂的頭號元兇在北京某地隱居，這絕對是不可思議的事，這同它的「斬草除根，不留後患」的既定政策相矛盾。在此，是無法治精神可言的，甚至那些保守分子會認為是方勵之與美國勾結在一起，繼續在他們鼻尖下面向北京政權示威，發揮他無形的「自由化」的有害影響。

死裏逃生的希望何在！

因此，我對方勵之夫婦的未來是深感悲觀的，北京清洗運動的不斷強化和深入，就不斷加深著我的憂慮，我相信，中共當局現在每天都在挖空心思，尋找一個捉拿方勵之的有效方法，這次他們絕不會放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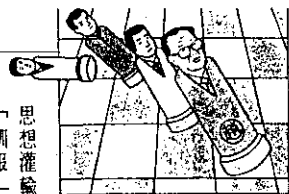
只有一線希望存在於中共高層的分歧之中，或者當熱潮過去，他們稍微冷靜和理性一點的時候，當國際制約也能產生一點效果的時候，方勵之夫婦也許有死裡逃生的可能。

而方勵之教授，我始終覺得他不是一個可怕的政治人物，更不是一個可以號召天下的政治家，他的某些判斷並不是很成熟的，他只是「一個「敢言的學者」，而這就足以造成他今天的名聲，中共當局顯然不明白這一點。

解放月刊 89/7

教育

政治掛帥培育「紅色」人才



月前學生「造反」風暴過後，北京領導層痛定思痛，認為主要原因是近年學校的思想教育太差勁。為防患於未然，大陸的學校已全面回到往日的「革命教育路線」，大大加強政治「馴服」學生的方法。一位大陸教育工作者說：「這全是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政策。但時代不同了，這政策不會收到真正效果。教育界可能再度出現「假、大、空」風氣。」

北京高層最近頻頻召開會議，就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問題確定政策。他們認為近月「動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育工作不以政治「掛帥」。國家教育委員會（教委）主任李鐵映在分析這次學生運動的根源時說，這是因為「在執行教育方針上不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更不是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是智育高於一切」。新任黨總書記江澤民引述最高領導人的話說：「鄧小平同志講這幾年我們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開始我



教委主任李鐵映：反對智育第一

們還認識不深，通過這個事件，我們進一步認識清楚了。」

基於這分析，北京制定了政治思想教育方針，就是以政治為首要目標，肯定教育的「階級性」，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教育「戰線」的指導思想，並加強黨對學校的領導。李鐵映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生命線，在高等學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旗幟鮮明地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江澤民則認為要「對青年一代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民族自尊的教育」。

上述教育方針與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其相似。當時學校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人」，即政治信仰堅定，又有專業知識。但實踐時其實只「紅」不「專」，教育質量劇降，致令大陸出現嚴重的人才荒。分析家認為，以教育進行思想控制雖然有利於穩定局面，但教育政策以政治掛帥很可能重蹈文革覆轍，學校忙於灌輸政治思想，學生以政治表現為個人前途的資本，使學科水平全面下降。新領導層堅持經濟

開放政策，就需要大批有現代思想的人才，這顯然與目前的教育政策互相矛盾。

但是，種種迹象顯示，當局擬強硬地恢復這種「土」政策。北京市七十七所高等院校三萬餘名畢業生目前正接受政治教育，表現差者可能會分配到北京以外的地區工作。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在高校畢業生分配工作會上說：「今年畢業分配，是在剛剛取得平反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時進行的，這場鬥爭是對畢業生思想政治素質最好的檢驗。」他要求「各校必須做好畢業生的資格審查和畢業鑑定」。北京市今年只打算聘用一萬二千多名高校畢業生，因此政治表現便成為競爭好工作的



大陸的學校：走向「文革」老路？

重要條件。

除北京市外，大陸其他省市的高等教育當局都嚴格檢查新生和畢業生的政治思想。中共廣東省委員會常務委員方苞上週說，該省高等學校今後在招生和畢業生分配、選拔留學生、授予學位、評定職稱時，對「僅有專業知識而思想品質不良、缺乏法紀觀念者」，應予淘

汰。

大陸另一個防範學生運動復燃的措施，是將高等學校的學生人數削減。國家教委發言人週前公布，大陸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數由原定的六十四萬人減至六十一萬人。其中，如北京大學等三十六家重點高校的招生人數減少一萬五千人。此外，一位北京大學學生說：「今年報考的學生，在政治背景 and 思想的檢查方面將較以往嚴格。」

一些教育專家指出，大陸經過十年改革開放，年青一代已不會再接受強制性政治思想教育。但是，在現實壓力下，教師和學生都可能依照政策，口頭上照搬當局要灌輸的思想，以致教育界重現文革時期的「假、大、空」風氣。

當局這種強制的思想教育，也引起了學生的抗拒。據報道，北京大學三、四百名高年級學生對上思想學習班表示不滿，並抗議當局不給一些欠缺「政治純潔性」的學生分配工作。看來，當局要完全「馴服」學生並不容易。

亞洲周刊 89/8/6

愁城三章

承 嬰

政治學習無言可發，靠抽籤排定，歌唱不好是「立場問題」，只得夜夜惡補。
北京讀書的兒子回到家鄉成了問題人物，爲表「清白」，有了物證還需人證。

北京事件之後，由於國內政治空氣的驟變，不少居港新移民懼怕中共清算，或不想給內地親友徒添麻煩，都暫不願回去。內地親友來信來電所傳來的信息，有不少新形勢下的奇聞怪事，亦反映出大陸民心及社會的一斑。

政治學習抽籤發言

「雷打不動」的說法，相信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是無人不知的。它說的是文革與四人幫時代每周數次的政治學習制度。天大的事，也不能衝擊，儘管那種形式主義的學習全無效果，「男人抽香烟，女人打毛線」，但誰也不敢反對。不過，這些年來，政治學習漸漸被人忘了。政治學習減少次數，到最後消失，連傳達文件的正式會議，也未必個個肯來；一句話，講實惠，賺錢要緊。

現在，學運一倒，一號就通令，一個個文件傳達下來，「雷打不動」不僅又成了許多單位黨委領導人掛在嘴上的口號，居然也成了制度。各單位、學校晚上時常開會，星期六下午的政治學習，更成了「雷打不動」。

是不愁沒有文件可學的。這個講話，那個講話，還有「真相」材料，還有方勵之、劉曉波的「反面材料」，還有劉賓雁的「反動言論集」，報紙的社論，內容豐富得很；學一遍不行，要反覆學，關鍵是要「結合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學，單單「什麼是國際大氣候」，「什麼是國內小氣候」就夠你討論，夠你領會的了。但是，不少地方政治學習也碰到難處。

浙江省某市一所省立中學的語文教研組，次次學習，都碰到這個難題——由誰向領導彙報學習情況？教研組長不幹，他怕「傳達」得不好，得罪了下面的手足；唯一的黨員教師不能幹，他在學運中說過「總理連講話的胆量都沒有」，也成了思想要過關的人，自己屁股沒乾淨，在那裏等着清算呢！於是大家「羣策羣力」，想了個最好的辦法——抽籤決定。抽到誰，誰寫紀錄，誰上去彙報。

這個辦法一試行，果然不錯，抽籤到誰推不掉賴不掉，做記錄向上彙報成了例行公事，羣策羣力，頭頭滿意。後來，鄧小平和李鵬的講話學習了多次，該表態的都表過了，該談的感想都談過了，再學起來索然無味，發言更是成了「無話找話」，於是，抽籤的辦法又派上了用途：誰抽到第一號的，第一個發言，按着順序排下去。態度問題也好，立場問題也好，總得應付一下。有位老教師背後發牢騷說：「再這樣下去，說不定要恢復『天天讀』呢！」

夜半歌聲

某師範教師大院的陳老師，這幾天回家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從來都不唱歌的家人，每夜請來鄰居的小兒子教她唱歌，唱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小孩唱一句，陳太太學一句，那認真的程度，好似趕去參加歌詠比賽。陳老師被那五音不齊的歌聲弄得心煩，說了句「都這個年紀了，還唱什麼歌！」想不到這句話竟引來他愛人的一頓哭訴，連陳老師聽了，自己也不免擔心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北京反革命暴亂一平息，個個都不得不開始變調子，陳太太所在的縣醫藥公司的黨委書記，也是屬於「用力過猛」的人物，過去不斷說「趙紫陽是我們黨的希望」，現在又天天在會上喊「與新的中央保持一致」。七月一日黨的生日，李鵬、江澤民在北京參加歌詠大會，大唱革命歌曲，於是這位醫藥公司的頭頭也就緊張，每次政治學習之前，規定要唱一首歌。

年過五十的陳太太文革後都沒唱歌了，哪還記得那些陳年歌詞？有的歌連調子都忘了。那天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陳太太唱了第一句之後，就只好跟着動動嘴皮，黨委書記在眼裏記在心裏，開會時即場發揮了幾句：「唱歌也是嚴肅的政治鬥爭，歌唱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不肯唱卻是立場問題。」陳太太本來胆小如鼠，書記的話猶如衝着她而來，

來，想想自己有時也東家長西家短的自由主義一番，現在清查反革命、秋後算賬人人自危，難怪陳太太如坐愁城了。她深怕風頭之上惹上麻煩，只好回家請小學生幫她「惡補」唱歌。偏偏這首歌的中間幾句那麼難唱，幾十個字擠在一起，真難為了陳太太。為了可怕的「立場問題」，教師大院陳老師的屋子裏天天傳出「夜半歌聲」。

有了物證還需人證

化學系邱老師的兒子去年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記得接到錄取通知的時候，大院裏幾十個教師和家屬都趕來祝賀，兒子在首都上大學，這比什麼都光彩，別人個個羨慕他。

現在不同了，邱老師因為兒子似乎成了問題人物（因為他的兒子是在北京，又是大學生。問題是：你的兒子學運期間參加了天安門絕食沒有？參加了暴亂沒有？）

邱老師回答不出。他的兒子從五月份之後就失了踪，既無電話報，連信都沒有。一封寄回來。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發表之後，系領導找邱老師談過幾次話，要他勸兒子不要參加學生運動，邱老師也確實寫過幾封信，信上還說，如果生活費不夠，家裏可以再寄十塊二十塊錢，但什麼遊行示威的，就不要去湊熱鬧。邱老師為了取得系裏信任，信還讓支書過目哩！

隨着北京局勢一天一個變化，邱老師夫婦提心吊膽，既擔心兒子在北京出事，又恐懼要清算到家長頭上。

北京「反革命暴亂」死了人，通緝令直貼到縣城，貼到學校的大院來了。邱老師的兒子依然沒有消息，學校領導的臉色從晴到多雲，從多雲到陰。在有些人看來，邱老師成了「準反革命家屬」了，惶惶不可終日。

忽然有一天，邱老師的兒子回來了。消息一下子傳開，有人耳語：「北京的反革命逃竄回家了。」

他兒子不經意地答道：「他們去天安門絕食，學校也沒人了，不上課空着，那幾天學生坐火車不要票，我和兩個同學去西安看兵馬俑去了——百年難逢好機會。」說得邱老師夫婦哭笑不得。

邱氏夫婦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看着兒子捲進清查運動中去了。

校黨委宣傳幹事來看望了一下，沒說什麼就走了。校保衛科科長馬上跟着來了，簡單問了幾句也走了。跟着是縣公安局二科的兩名幹警，還帶來了筆記本。事情不妙。

他們聽了大學生的解釋，不相信。

「你說你離開了北京，有什麼證據沒有？」公安幹警問。

大學生傻了一想，「有！」

他急忙從口袋裏往外掏，這是五月×日的火車代用票，這是西安交大食堂飯票，這是兵馬俑參觀門票，這是經武漢時的公共汽車票，還有，這是二兩江蘇省糧票，雜七雜八，堆成一團——不在場的證據。

兩名幹警面面相覷，眼色疑惑，還是不大相信。

「光有物證還不行，」一位幹警盯着大學生說：「還要有入證。」

「兩個同學與我在武漢分手了，他們也回家了，一個在雲南，一個在四川。」小邱回答。

小縣城裏辦事，件件是不肯馬虎的。公安局組成外調小組分兩路進發，去找「入證」去了。不過，邱老師兒子還沒有敢高興，他被告知，「證據確鑿」之前，他不得擅離縣城，必須隨時聽候公安局傳訊。

大陸知識分子的處境與命運

辛迪

「平亂」以後，北京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整肅，首當其衝的是新聞界。電視、電台、出版、文藝等領域也相繼整頓。而從作家到部長的王蒙為什麼被免去文化部黨組書記之職，尤其惹人注目……

對於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一九八九年真是多事之秋。經歷了年初的聯名上書要求實行特赦，和隨之而來的大規模學潮，乃至於後來的「動亂」、「暴亂」等風波，知識份子的處境與命運如何？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會不會變？這些，是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份子本身極為關注的。

新聞界首當其衝

「平亂」以後，北京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整肅，首當其衝的是新聞界。在學潮和動亂中一度發生「輿論導向」錯誤，起了推波助瀾作用的部份新聞傳播媒介。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等幾家報紙的總編輯易人，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新聞隊伍的清查整頓，亦正在進行之中。

中共一貫強調新聞輿論工具的喉舌作用，報刊雜誌和廣播、電視中，不能出現與中共政策相違背的聲音。但是據稱近年來圍繞新聞改革的問題，一些人按照西方的新聞觀點，要求所謂「新聞自由」，主張淡化甚至否定新聞輿論工具的喉舌作用。在前一階段的學潮和「動亂」中，也出現不少要求「新聞自由」的標語口號，並在報導中出現導向錯誤。近來，當局已要求新聞界就此進行反思。全國政協常委、新聞界資深人士吳冷西發表文章，對上述問題表明自己的看法，再次強調新聞的黨性原則和新聞輿論工具的喉舌作用。新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邵華澤在一次座談會上說，近年有關新聞改革的爭論，其實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實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他強調要依據四項基本原則進行新聞改革。

春夏之交的這場暴風雨留給新聞界的思考遠未終結。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徐慶教授據此提出大學要向新聞界輸送政治上「信得過的人才」。他的兩個弟弟，曾在一九八七年新加坡亞洲大學生辯論

會上舌戰羣儒，戰勝對手，大出風頭。但在這次動亂中，一個提出退黨，一個聲明永不加入共產黨。徐慶認為，「信得過的人才」，首先是政治素質好，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將來在工作崗位上能自覺地發揮黨的耳目喉舌作用的人。

儘管現在新聞報導又開始走上正軌，但從業人員的心裏並不平靜，尤其是那些入行不久的年輕的編輯、記者們。

目前，中共重新倡導新聞工作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方向，批判形形色色的西方新聞觀點，決定對新聞工作者加強新聞理論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培養造就一支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紀律的新聞隊伍。

整頓文化市場

「平暴」以後，當局對出版、文化等領域也在進行整頓。

就大陸的出版工作而言，在一段時間內，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渲染兇殺、暴力、色情和封建迷信的書刊充斥於市，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

現在，當局正在大力整頓書刊市場。八月二十四日，曾召開一次電話會議，佈置全國性的「掃黃」工作。被明令禁止出版的方勵之、嚴家其、戴晴、蘇曉康等人的著作在書攤上已經消失，《趙紫陽傳》也被禁止出版，但是，一些黃色出版物還在通過地下渠道不斷出籠。

取代社導正出任新聞出版署署長的宋木文最近指出，除了進行書籍報刊和音像市場的整頓，取消各種非法的、反動的、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宣傳色情、暴力和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外，同時要徹底解決污染源問題，大力整頓報刊和出版單位，並進行必要的整頓，對一些部門的領導班子進行必要的充實和調整。

展出的近兩萬種出版物，集中展示了近十年來出版改革成就。據報，《馬恩全集》、《中國美術全集》、《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等格外引人注意，與街頭書攤相比，宋木文指出，「出版事業的成績與繁榮和低級庸俗出版物泛濫成災，是不容忽視的兩個方面」。

最近，主管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瑞環指出，既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毫不含糊地掃黃，淨化社會環境，又要進一步繁榮文藝，豐富羣眾的文化生活。

這位「嚴肅」上任後，大力支持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扶植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傳統藝術。於是，電視台大播地方戲曲，電台大唱革命歌曲，開播一年多的一美國音樂一小時一節目被民族音樂所替代，令一些喜好外國電影和搖滾樂的青年大嘆「時代」。

王蒙為何被免職

與去年此時的「《河殤》」熱一截不同，今夏大陸是批《河殤》熱。北京的各大報刊相繼刊載批判文章，《中國教育報》專門召開討論會，並用幾個專版評論這部電視片。《北京晚報》自八月八日起，開闢了「《河殤》百謬」專欄，由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撰文，批判這部「崇尚西方文明，貶斥中華文化」的作品。批判的內容，不僅指出其政治上的問題，而且涉及一些歷史事實上的謬誤。批判的規模為近年所少見。

在文藝創作方面，一些作家已被指受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往往借題發揮，在文學作品中宣揚全盤西化的觀點。

目前，從作家到部長的王蒙的境況，頗令人注目。

八十年代初，這位被稱為「當代文學的叛徒，不肯循規蹈矩」的作家，用「意識流」手法創作的《春之歌》、《風箏飄帶》、《蝴蝶》等一批作品，轟動文壇，引起不少爭論。許多讀者批評這些作品「看不懂」，甚至有人認為是「文學的墮落」。

病，王后便從歷屆講演獲勝的學子中選出五名最優秀者，請他們向國王單獨發表演說。這五名講演家，一個忠於正統，一個直面人生，一個現代意識，一個勇敢開拓，一個深刻玄秘。後來國王病癒，朝野同慶，當然這五名講演家亦各自得賞。

這篇小說發表後，中共高層某些人士認為含有某種影射之意，大為不滿。而王蒙又是唯一沒有去慰問或慰問部長的部長，其政治生命如何，自是引人注意。

八月初，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老詩人賀敬之，已接替王蒙，出任文化部黨組書記之職。至於王蒙的文化部長一職，尚未聞有何變動。據說，王蒙因病目前不在北京而是在山東某地療養。

知識份子政策會不會變

知識份子今後的命運如何，眾說紛紛。有人認為「知識份子靠不住」，「過去把知識份子抬得太高」，而更多的則是擔心在知識份子問題上，可能要重複過去一些「左」的作法。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中共高層一再重申知識份子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至於真正與黨和人民為敵的，只是知識份子中的極少數人，並不代表廣大知識份子，對他們依法予以制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廣大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利益的。

從最近的一些舉措看，可以說，中共是在努力爭取知識份子，肯定知識份子在四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今年八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獲得「小羅克韋爾獎章」和「世界級科技與工程名人」，「國際理工研究所名譽成員」等榮譽稱號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李鵬會見了錢學森，並向他表示祝賀。

在中國歷史上，獲得國際性榮譽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不乏其人，但像錢學森這樣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會見的尚屬首次。李鵬在會見錢學森時說，我們在建設四化的過程中，要依靠工人階級，也要充分發揮知識份子的作用。他說，錢學森五十年代初期歸國，毅然回國，集中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光輝品質，這就是愛國、愛黨、愛人民。李鵬這番話，無疑是將錢學森作為一個榜樣，要那些至今滯留海外不歸的知識份子加以仿效。

中央電視台還播放了讚揚知識份子的大型電視系列片《共和國之戀》，這部電視片再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從中共建政初期在廢墟上創業，到六、七十年代走向世界科技前沿，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塑造了一組組現在和過去的知識份子羣像。

凡此種種，莫不體現中共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上的苦心。

大學師生冷淡對待洗腦

李玉

兼談中共奇書《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

七月中下旬，中共當局率先集中高等院校的校長、院長、黨委書記進行「洗腦」，八月下旬即將開學之際，黨員教師洗腦，時間為六天，然後是非黨員教師洗腦，也是六天。所有機關幹部、國營企業幹部都要洗腦，每位幹部由公家發給洗腦教材三本。

七月中下旬一放暑假，中共當局就率先集中高等院校的校長、院長、黨委書記進行「洗腦」，時間為半個月，其主要教材是鄧小平的《六·九講話》、《鄧小平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小冊子，《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李鵬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反動報告，陳希同的《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報告》，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印的小冊子《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該小冊子收集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北京市委、戒嚴部隊等文件和各老人講話等六十三篇。洗腦期間還配之以《暴亂真相》一類的影視教材。洗腦主要達到的目的是：「了解暴亂真相，澄清錯誤認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待八月下旬即將開學之際，則輪到黨員教師洗腦，時間為六天，然後是非黨員教師洗腦，也是六天，但黨員教師要領非黨員教師洗腦，所以黨員實際洗腦時間是十二天。與此同時，所有機關幹部、國營企業幹部都要洗腦，每星期集中一個下午時間，每位幹部由公家發給洗腦教材三本，外加公家報紙。

九月初開學了，又發下一本最新的洗腦教材，書名叫《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由國家教委社科研究室、藝術教育司、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北京高教工委合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書原頁和封底都印有「內部發行」四個黑體字，八九年八月第一次印刷，全書共二百頁，分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從動亂到反革命暴亂的真相》，第二部份為《這場風波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第三部份為《動亂和暴亂是對民主與法制的極大破壞》，第四部份為《在反思中醒悟和奮起》。學生洗腦時間為二十天，由黨員教師、班主任輔導，然後就是下鄉下廠下部隊，「與工農兵相結合」。

洗腦收效甚微

「學習班」這個名字，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創造的一種整人形式，大凡被「修理」、被專政的人都要經過「學習班」。「六·四」事件後，這個二十年前所創造的形式又被鄧李楊集團拿來廣

泛運用。每個黨政軍機關、每間學校、每個團體、每個國營企業都舉辦「學習班」，不過今天人們把它改了一個名，叫「洗腦班」。本港《文匯報》記者廣州九月七日電稱暨南大學強調「不洗腦」，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大陸人人都得洗腦，何況是思想最活躍的年輕大學生呢！

由於是強烈的意識形態專政逼迫下和恐怖氣氛籠罩下的「學習班」，人們不敢不去，也不敢用任何藉口請假，但是，不論大學校長、院長、教授們、講師們、助教們，還是高年級學生抑或是低年級學生，或者是才入學的新生，似乎都沒有相信「洗腦班」裏所學得的「真相」。

在「洗腦班」期間，一致照教材發言和表示「聲討反革命暴亂」，但在背後卻是另一種語言——斥責這些洗腦教材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謊言」。在記者面前，個個都說：「我絕對相信天安門廣場沒有開槍，沒有死一個人。」但是在私底下，又是一種議論：「如果不是血腥鎮壓，為什麼能激起全世界那麼大的悲憤和震動？為何不相關的澳洲總理也為此流淚？一年輕教師又似乎比年長教師更有「經驗」，一位助教對我說：「越是內部教材，就越多謊言，因為外邊的人看不到，就可以隨他們胡亂編造。而我們又被封鎖外界信息，無從核對。」我於是問：「這是否意味著中央封鎖新聞能夠成功？不！」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剛才說無從核對，但不見得就是他們的謊言能夠成功。新聞封鎖總不能永遠封鎖下去吧？今天信息社會，誰都無能力掩蓋「六·四」事件真相。」

補拍鏡頭偽造歷史

甚至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有關「平亂真相」的電視片，大學師生也普遍認為是偽作。一位從北京公幹回來的教師帶來消息說，有一北京居民和學生熱烈歡呼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鏡頭，原來是由偽導演演的。首都的人知道，二十七軍是負責屠城的主力，首都居民恨透了二十七軍，而對三十八軍，首都學生和居民則有很大的好感。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導演」就抓住北京居民的心理，在屠城過後，通過便衣和各種管

道放出謊言，說三十八軍要討伐二十七軍，希望首都居民、學生、工人熱烈協助正義之師、威武之師三十八軍進入市區和天安門廣場。北京居民和學生聽到這一消息，果然傾巢出動，歡迎三十八軍，戒嚴部隊宣傳部乃趁機拍下這些鏡頭，於是「熱烈歡呼」三十八軍的鏡頭便出現在電視熒幕上。「三十八軍討伐二十七軍」的消息也傳到海外記者那裏，海外報刊大登特登，自然又是中宣部被鄧李楊集團指為「造謠」。而事後得知，這支被首都群眾「熱烈歡呼」的也根本不是三十八軍，而仍然是二十七軍。

這位教師在北京聽到的另一個故事，就是「六·四」事件之後，趁北京飯店的海外住客全部撤離，住進了戒嚴部隊，六月七日、八日、九日這幾天時間的半夜和凌晨，部隊和軍車調動頻繁，原來是重演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凌晨的場面來補拍電影和電視，但卻當作是「六·四」事件的「現場紀錄」，以說明解放軍在廣場沒開一槍，沒打死一個人，坦克也沒壓死一個人。可惜黨性最強的教師，經過洗腦後仍然表示「不大相信」中共的宣傳。因此說，中共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對大學師生的洗腦，其收效實在是很微的，反而對倒退回文革那一套的做法非常不滿。

從教材看傷亡數字

中共以各種文件作為洗腦教材，但這些文件往往出入頗大，例如官兵傷亡人數和車輛損失數。現列舉如下：

- 六月四日晨六時發佈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戒嚴部隊被迫採取果斷措施，其下列出的數字是：
- A：「有數百名年輕戰士被活活燒死」；
- B：「打傷千餘名執行軍務的指戰員」；
- C：「砸毀軍用汽車上百輛，燒毀三十一輛」。
- 六月四日晨時事節目時間《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的廣播講話》，列出的數字是：
- A、B：「打死打傷一千名解放軍人員」；
- C：說到「焚毀軍車」，但無數字。

- 六月五日發佈《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列出的數字是：
- A：「殺害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
- B：「負傷的數字沒有說」；
- C：「砸毀、焚燒軍車和公用車一百多輛」。

- 六月五日發表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列出的數字是：
- A：「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死亡上百人」；
- B：「上述人員「負傷數千人」」；
- C：「被暴徒砸毀、燒毀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四百五十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八〇多輛，裝甲車四十多輛，警車九十多輛，公共汽車八十多輛，其他機動車四十多輛。」

- 六月六日下午，中南海《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反革命暴亂真相》，列出的數字是：
- A：「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初步統計數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北京各個大學死亡的大學生二十三名」，「還有四百官兵失踪」；
- B：「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地方上（包括「暴徒」、圍觀羣眾）共傷二千多人」；
- C：「燒毀車輛五六八輛。其中軍車三六四輛，公共汽車一〇二輛，其他一些車輛被推倒路上作路障」。張工補充：「僅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被燒毀的裝甲車、汽車就有一百輛，各種槍枝被搶的有幾百枝（挺）」。

- 六月十六日下午，袁木在國際俱樂部接受了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斯的電視採訪。袁木堅持他六月六日所說的數字：
- A：「死亡數字大體上三百人，包括解放軍、歹徒、圍觀羣眾」；
- B：「解放軍五千多人受傷，圍觀羣眾和歹徒受傷的有二百人」。
- 七月四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全國政協七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作《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報告》，所提供的數字又是另一版本：
- A：「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死亡數十人」，羣眾和暴徒「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
- B：「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另「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
- C：「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等車輛達二八〇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千多輛，裝甲車六十多輛，警車三十多輛，公共汽車一二〇多輛，其他機動車七十多輛。」

●八月第一次印刷出版的《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所提供的官兵傷亡數字和車輛損失數字則完全照搬陳希同的「平亂報告」。



上述八個中共文件所提供的傷亡數字和車輛損失數字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所提供的數字全部是大約數，沒有一個肯定的數字，唯一例外的是冀東提供的大學生死亡人數「二十三名」，他曾聲明這一個數字「相對來說比較準確，是經過向各個大學了解的」，但陳希同的「三十三」，又打了一下冀東的耳光。

第二、數字倒轉。如果公佈的數字逐日上升，基本上符合邏輯，因為開頭時可能有些情況沒

六月四日鄧李楊集團
下決心屠殺之前，並無「進城」打死解放軍的事。進城後，沒有戒嚴部隊，正是戒嚴部隊的血腥鎮壓，引起人民的復仇反抗。

有發現，而以後發現了；或者原先是傷者，但返魂乏術，變成死者，因此死亡數字增加也就很合理的事。但現在公佈的數字却不是這樣，如六月五日北京市委宣傳部的文件說戒嚴部隊、武警、公安戰士「死亡上百人」，事隔一個月之後的陳希同的報告卻說軍、警、公戰士「死亡數十人」——是不是原先的死者又「翻生」了呢？可見這些數字根本就是亂說的，是根據政治需要而「定出」的。陳希同為什麼要推翻北京市委宣傳部所定的「死亡上百人」的數字？原來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告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書》說過「殺害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這樣才能同李楊的口徑一致，因此陳希同寧可「踩低」自己領導下的北京市委宣傳部。

第三、上述八個中共文件所提供的數字雖然不可靠，但也不是全不可靠。比如最早發佈傷亡數字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提供的數字，筆者認為是比較可靠的，該指揮部發言人說：「有數名年輕戰士被活活燒死」。這裏只說到「數名」，以後的查對落實也是如此，那就是死在崇文門天橋的戰士崔國瑞，死在阜成門立交橋上的戰士李國瑞，死在西長安街西單路口的少尉排長劉國庚，他們都死在六月四日凌晨一、二、三時左右。部隊組織嚴密，被打死的官兵即時可以向指揮部匯報，故至晨六時指揮部發言人須舉出這「數名」死亡的戰士加上燒毀若干軍車為理由而宣佈「戒嚴部隊被迫採取果斷措施」。所謂「被迫採取」當然是假話，因三日深夜和凌晨一、二時

在上述地方以及六部口、木樨地、西單等是軍人屠殺平民和學生最多的地方。

至六月六日冀東舉行招待會之後所提供的數字突然驚人地升高起來，原先戒嚴部隊指揮部宣佈的「燒毀軍車三十一輛」，上升為「燒毀軍車五六八輛」；原先戒嚴部隊指揮部宣佈的受傷官兵「一千餘名」，上升為「五千多人」。上述數字的變化說明什麼問題呢？一是六月四日鄧李楊集團下決心屠殺之前，並無「暴徒」打死解放軍的事，只有在解放軍屠殺人民開始的時候，才被老百姓打死幾名「數名」解放軍；二是「六·四」屠城之後官兵傷亡數字突然增大和被燒毀的車輛突然增多，表示了人民羣衆的憤慨——當然，我毫不懷疑其中許多軍車是由部隊自己點火燒掉的，不少士兵特別是便衣軍警士兵是被執行屠殺任務的部隊打死的，有的士兵則是被軍官即時槍決的，有的下級軍官則是被上級軍官即時槍決的（如一位連長，眼看裝甲車被八名女學生阻擋，便報告團長不能前進，沒想到團長掏出手槍把連長槍決了，說這位連長「動搖」，並親自下令把裝甲車開過去，女學生也不閃開，就這樣壓死了好幾個）。

可以說，沒有戒嚴部隊進城，就沒有傷亡，正是戒嚴部隊的血腥鎮壓，引起人民的復仇反抗。一句話，是頑固反對政治改革的老人幫和野心勃勃的李楊陰謀家有計劃、有步驟策劃了這場暴亂而這場暴亂的唯一特點是人民軍隊向人民開槍。老人幫和李楊集團所要掀起暴亂的目的是要從中奪權，以便全數消滅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幹部和主張改革的黨朝知識分子，全數消滅社會上的民主派。

為閉鎖鎖國鋪路

大學師生們不滿現政權提供了假「真相」，不滿現政權走回頭路，運用「文革方式」來整治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僅如此，中共所提供的這些「洗腦教材」也為重新閉鎖鎖國製造輿論。自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第一次正面接觸了西方文明世界和吸取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但不論中國同西方國家交往，還是西方國家同中國交往，李楊反動集團全看作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胡說要在中國實現「和平演變」，「不戰而勝」，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變為資本主義的「附庸」。在《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中，把中西交往幾乎全盤否定了，且看：

一、從俄國十月革命「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談起，至「美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打內戰」，至美國杜勒斯的「希望寄託在掌握共產黨政權的第三代、第四代」，至卡特的「和平外

交」，至列根的「民主運動」，直至現任總統布殊的「人權外交」。據說「美國歷屆政府都秉承了「杜勒斯的「宗旨」，要把中國一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

二、猛烈抨擊「富布賴特計劃」，說根據這一計劃，由美國派到中國的教授一六二名，又美國新聞署自一九八三年以來每年派出二十名左右的巡迴學者到中國各大學講學，又美國駐華使館以及「美國之音」等等，全都是對中國進行「心理戰」的工具，要在「三年內徹底改變中國」，也即要中國「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納入資本主義軌道」。

三、留美學生，訪問學者也成了罪狀。中國派出留學生，是為了學習西方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以便回國後更好地為祖國建設服務，但李楊反動集團予以否定，認為美國以此「培養親美勢力」，吸納大量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當作是美國政府的「長期投資」，而目的是一逐步使中國向資本主義演變。

四、猛烈抨擊「索羅斯出錢出力的「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說這個基金會主要是要「拉攏」趙紫陽屬下的體改委、體改所、農村發展中心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並指基金會美方主席喬治·索羅斯所派到北京的私人代表梁重傑有一「美特嫌疑」，「基金會美方顧問委員會裏有四人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為誣指趙紫陽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製造輿論。

五、連經濟、技術交流也成了罪狀。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交流本是中國的要求，以改變中國經濟和技術落後的面貌。但現在李楊反動集團却倒打一耙，說是美國趁「中國改革開放之機」，藉「發展美中經濟技術合作關係」來「爭取影響中國政府和人民」，以便達到「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於美國、最後在政治上對美國也拱手稱臣」的目的。甚至全由美國出錢，為中國培養現代管理人才，「大連工業科技管理培訓中心」，以及設在南京、北京和廣州等地的「培訓和交流中心」，李楊反動集團統統看作是美國對中國所幹的「最嚴重的顛覆事件」。

以上種種論調表明：李楊反動、沒落、腐朽的統治集團要徹底走回頭路，以便再次在中國實現閉鎖鎖國。

拙劣教材 貽笑師生

由袁木、何東昌具體指導國家教委、北京高教工委並集中大量人員編寫的《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據「編者說明」稱：「本書力求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對最近發生的這場動亂和暴亂

作出較為系統的回顧與反思，以便為高校師生的政治學習提供一本內部專題教育材料。」也即是說，這本「內部專題教育材料」不僅是學生的「政治學習」課本，也是大學教授、講師、助教的政治學習課本。可惜，其拙劣的編排技巧使幾乎讀過這本書的人全都反感。

第一、該書引述的材料一錯再錯。陳希同的「平亂報告」中，有說到「香港《信報》發表了題為《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香港《九十年代》雜誌上一篇文章呼籲趙應成為「獨裁者」，而該刊物的老總李治早已一再為文澄清（九十年代）並無刊登趙應成為獨裁者的文章，而是在香港《經濟日報》上刊登過張五常的《假如趙紫陽成為獨裁者》的文章，但李楊反動集團的筆桿子却毫不理會。這反映他們根本就沒有讀過《九十年代》，也沒有讀過張五常的文章。

第二、明目張膽造謠。八九學運和民運，博得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和黨的幹部的支持，同情。按鄧李楊反人民集團的說法，黨總書記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的錯誤，也即是說，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也支持八九學運。但以此造謠起家的陳希同，早在六月四日的廣播講話中就造出一個謠言：「要把四千六百萬黨徒全部消滅乾淨。」逃亡西方的嚴家其、吾爾開希，在他們的宣言中，把「非暴力」看作是他們推動民主運動的根本方針和決策。可見，陳希同的「要把四千六百萬黨徒全部消滅乾淨」是明顯的造謠，是百分之百的造謠。

但陳希同造的這個謠，竟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中不斷使用，甚至也引入《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中。

第三、一條語錄四次引用。這裏所說的「語錄」不是毛語錄，也不是鄧語錄，毛語錄、鄧語錄看來還沒有這麼偉大，能在一本小冊子中被作者反覆引用。這條語錄的作者是金觀濤和戈揚。《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是這樣引用的：原文如下：

「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份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

金觀濤、戈揚這條語錄何其神奇，竟關係到「動亂的形成」，關係到「自由化思潮」，關係到「民主與法制」，關係到「清除腐敗、懲治官倒」！金觀濤、戈揚太偉大了，已超過了毛和鄧！但他們的偉大恰恰反映了這本書的編者水準實在低下、拙劣！

九、一二不准帶白花

我是九月底才離開北京的。「六·四」事件百日(即九·一二)前，北京市各單位傳達了一份官方文件，說九月十二日那天誰也不許戴白花、穿黑衣服，更不許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頭有紀念的表示。否則，戒嚴部隊將不能保障他們的安全。「十·一」前夕，天安門廣場原「民主女神」舊址豎起了工農兵知識份子羣像，被過往市民噴之以鼻。有人評論說：「他們的思維方式就像孩子一樣，水平極低。」

北京市運拔十萬人「十·一」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跳舞，主動報名的很少。一是大家心情未平，沒有興致歡樂，不想成為政府製造歌舞昇平假像的工具；二是怕挨炸彈。一個被迫去跳舞的人說：「不用真的放炸彈，只要有人喊一聲『有炸彈！』就可能嚇死幾百人。」現在人人驚慌受怕，知道政府及戒嚴部隊欠下的血債太多，仇人太多了！——總之，誰願當他們的陪葬品呢？

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舉辦亞運會的準備工作。宣傳聲勢浩大，宣武區精神文明建設綜合治理辦公室在街頭散發一份材料，上書：「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政治大局的穩定和改革開放政策，恢復我國的國際形象，團結更多的朋友，粉碎國際上少數人企圖孤立我國的陰謀。」「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更好消除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各種影響，對廣大羣眾進行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振奮民族精神，堅定人民克服困難的信心，……重振國威」等等。事實上，人們對亞運會熱情衰減，再也不會像修建長城那樣掀起捐款浪潮了。而亞運工程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六·四」事件殘酷地打擊了人們的愛國心，不少人反懷著看政府笑的心態，已不得亞運會開不成！現在人們把對國家大事關切的心情，全放在對個人前途，

或如何得更多經濟實惠上了。

全國九成人民不滿政府

不久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一個內部會議上承認，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對現政府不滿。但據許多跑了全國採訪的中央一級新聞記者分析，這個數字應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至少是百分之九十的人有看法，但整在心裏不敢公開講。現在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外鬆內緊」。即對外宣稱「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對內則實行一系列鎮壓、清查，尤其是迫害知識份子的行動。「十·一」前工作重點在搜捕「打砸燒」的「暴徒」上。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抓人、審判及槍決均秘密進行。

一位警察朋友告訴我：「槍決一直沒有停止過，還有大批人在押待審。一般十五平方米的房間關六七十人，像魚一樣一個個擠在一起。七月北京天氣炎熱時，許多人的腳都站爛了。」國務院所屬某大報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學生見習記者，向坦克扔了一磚頭，恰好被攝像機錄下，電視台一播放，馬上被老家的鄉親舉報了，據說已被判處無期徒刑。還有一位工人不滿向別人遞了一桶汽油，點火的人逃跑了，他則被抓住了判了死刑。由於他在廠裏表現極好，廠領導不斷出面求情，均未奏效。執行槍決前，僅讓他見了妻子一面，連三歲的兒子都不讓見。這兩個例子是我一朋友從內部簡報上看到的，真實可信。

江澤民不惜開除八百萬黨員

「十·一」後清查重點放在知識份子上，即從意識形態「徹底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異己份子。王震對這些年輕的新一代知識界精英恨之入骨。他說：「如果有必要，就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一個不留。」江澤民則說四千八百萬黨員「不惜開除八百萬」。儘管江對外聲稱「黨的知識份子政策不會變」，但對內連與他們所稱的「暴亂」毫無

北京民衆沉默抵制高壓 知識分子成爲清查重點

■廣場邊上有兩條警戒線。

■阿山

關係的人也不放過。現在是「翻老帳」，包括在一九七六年「四·五」民運中的骨幹份子，不向官方低頭的新潮詩人，與方勵之或其他被通緝的人認識並有過聯繫的人，參與創辦過一些思想較解放有進取精神雜誌的人，編過介紹西方民主思想叢書的人，主持過政治體制改革或文化發展戰略討論的人——總之，凡是受過高等教育，有較強思考能力和理論水平，具真知灼見觀點，年紀在廿五歲至四十五歲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均遭不同悲慘命運。他們不是被捕就是被傳訊，或逃亡外地，或被停職、調離。更多的人則在寫檢查及交待材料。

現在搞的是「人人過關」。原將界綫劃在李鵬發「五·二〇」戒嚴令後，此前聲援與遊行不足爲過。現在則提前到「四·二六」社論後，凡聲援、遊行，甚至捐了二塊錢的都不行。每個人必須詳細說明那一段時間你幹什麼了，若沒上街，證明人是誰，簡直像接受警察調查一樣。

黨報領導決心整掉自由化

知識界清查重點除社科院、經改委和體改所，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高級黨校外，還有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研究學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人民日報》可能從部主任級大換班。因爲中央新委派的領導高迪(音)說：「我黨多年來最大的教訓，就是《人民日報》在這次動亂中起了錯誤的輿論導向作用。……不把那些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全部整掉，我絕不下！」現在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認爲留在國內沒有前途，都想離開中國。許多人說，他們簡直比植物人還痛苦，因爲植物人是不能夠思考的。

我一位校友叫張魯寧，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俄語部副主任，卅多歲，曾留學過蘇聯，是台裏主務骨幹。六月卅一



■廣場邊上有兩條警戒線。



■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在街頭巡邏。

晚上十點下班回家，騎車經過軍事博物館一帶時，被進城軍隊開槍打死。我的一位朋友是某報編委，有較高的政治、經濟理論水平，每次開這類理論會，他除了採訪還即席發言，觀點不乏驚人之處。「六·四」事件後，他因「反革命煽動罪」被捕入獄。但他堅信自己是正義的，沒做過任何有損於黨和國家的事。所以，有次審訊他竟向對方慷慨陳詞達六小時之久，從法國大革命一直講到當代西方民主制度，以及當今中國社會與真正文明社會間的距離。在我離開北京的前一個晚上，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

告訴我，審訊人員覺得他骨頭太硬，對他進行了毒打。還有一位大學青年教師，「六·四」後得知公安局在通緝他，便也懷著正義之心前去自首。他以為他面對的是人。可是，他完全想錯了。他向審訊人員解釋他與學生領袖接觸是爲了勸說他們離開天安門廣場，並在政府與學生之間斡旋，使政府也適當做些讓步。但他說的這些被對方一形成材料向上匯報，就變成：據×××交待，他們在背後策動、支持學生絕食，主要是向政府施加壓力，逼政府一步步後退，最終達到他們顛覆政府的目的。

衆所周知，中國人的文化素質本來就不高，十億人裏有幾個頭腦清醒具將帥才能的？中國的未來全靠這些人，但「六·四」事件後知識份子的災難對中國前途的影響是毀滅性的。

躲不開的政治教育

港澳學生在內地近況

盧育儀

中國高等學校今年繼續向香港、澳門及台灣開放，招收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不過，經過「六·四」之後，負責有關工作的人士也擔心，招收工作將比以前更難開展。在「六·四」之後，大部分港澳學生都已返回內地。由於有部分學生曾參與遊行和絕食，再加上後來姚勇戰被捕和聲大的港澳學生被找麻煩的消息，更令這些學生惴惴不安。他們都擔心，再回國內讀書是否適合？他們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此外，他們還擔心，此時此刻國內的學習氣氛怎樣？儘管能夠回去，但能否得到理想的學習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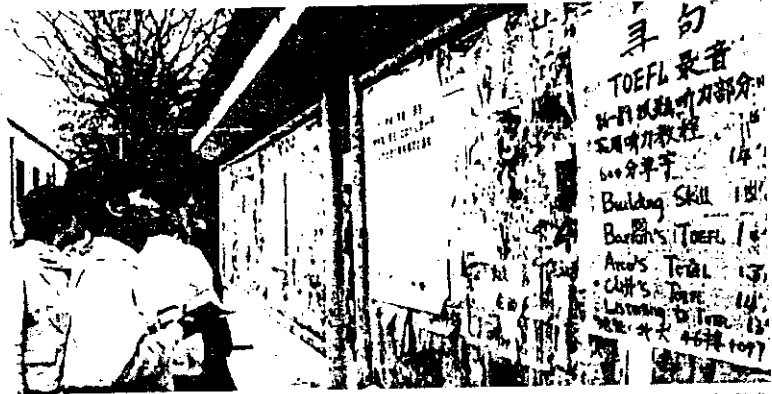
據消息說，後來前往北京繼續讀書的香港學生（均獲教委獎學金）曾於六月十六日參加由京港交流中心安排的一次座談會。他們提出復課後的憂慮，並透過京港交流中心向國家教委提出數項要求，包括：回校復課時，當局不要把他們作宣傳工具；希望能保證安全；對於未收到回校復課通知的學生，應允許他們暫時停學，或將學習形式改為函授。

無人敢保證安全

其後，一群港澳學生又於七月十四日致函國務院港澳辦，表示願意回京繼續學習，亦希望當局能保證不作任何追究。但是教委方面一直沒有回覆。

直至九月二十三日，國家教委終於有了答覆。覆函引述姬鵬飛在六月二十二日發表的講話說：「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是由學潮、動亂逐步發展起來的。在這過程中，港澳同胞以不同方式表達各種各樣的看法，由於不了解或不

完全了解整個事件的真實情況，產生了某些誤會，是可以理解的。但港澳某些人到內地做了一些國家憲法和法律不允許的事，在實際上對內地的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函件末段明確表示：「因此，對於自願回內地大學學習、並能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的香港學生，內地大學是歡迎他們返校繼續學習的。」在此期間，新華社也出面向學生解釋國內的政策。不過，對學生回去讀書的安全始終沒有直接和明確的保證。所以，有些學生要求保留學位，明年再讀。



在香港的一名中方官員說，按一般情況而言，港澳學生返回內地繼續學習，如果沒有刺激當局的行動，是不會有問題的。但老實說，任何人也不能給予明確的保證，因為戒嚴部隊和國家安全部門人員的行動，一般人怎管得了；他們是直隸中央高層指揮的。

雖然如此，大部分學生還是回內地復課了。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當港澳學生回到國內上課時，發覺氣氛已大不如前，以前教授與研究生之間的密切關係消失得無影無蹤。過去，研究生與教授有許多課外的接觸，研究生甚至經常到教授家中吃飯，討論問題。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疏離，在公開場

合甚少像過去那樣談話。港澳學生都有一種感覺，這種不正常的氣氛對學習已產生了不良的效果。

「骨幹學生」仍然活躍

此外，校園的氣氛也十分冷清，過去經常一群人聚在一起討論問題，如今，這種情景不復見了；其中北大的氣氛冷清得像還未開學似的。在校內，「骨幹學生」（國內大學中備受校方看重的學生）仍很活躍，他們經常向有關方面報告同學們的情況。但他們較少對港澳學生有甚麼行動。

港澳學生在開課前都要接受一至兩星期的政治教育，包括收看有關「六·四」實況的錄影帶，以及學習一本名為「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的資料冊。該書輯錄了「六·四」前後官方的講話。其實，這類學習都是形式主義，國內很多學校對港澳生在政治學習方面的要求

都是很鬆的，總之大家敷衍過關了事。而且，很多學生（包括不少本地生）都是互相抄襲，這樣的學習令學生們都感到不勝其煩。在上海某校的香港學生，更被勒令每天花六小時去學習官方的講話，還要交學習報告，可謂慘哉。

不過，相對於國內的學生，港澳生已是備受照顧的一群。如有任何問題，他們又有教委屬下的港澳台辦公室可以給予協助。但是，由於現時國內的氣氛很不正常，港澳學生仍然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有些港澳生還通知在港澳的朋友不要給他們寫信，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信件在國內經常被拆或被暗中檢查，已是眾所周知的事。）

當代周刊 89/12/16

中共以種種手段威脅知識分子

大陸知識分子仍然有人講真話

採用參與觀察方法調查

老木

大陸知識分子行為失貞

大陸中國正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

在這樣一個時期，要準確地描繪出大陸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人們遇上了收集真實材料的困難。記得今年七月份的某一天，我們在北京碰見了這樣一件事：那天，A先生與B小姐正在談論一件剛剛聽到的新聞，A先生對B小姐說：

戒嚴部隊對北京市民有三個想不到，一是心這麼齊，呼拉一下子全出來堵軍車了；二是心這麼狠，石塊像雨點一般朝他們砸來；三是心這麼活，說轉彎一下子全都轉過來了。

這時B小姐評論說：「槍口對準你了，你還不轉變？」A先生也同意道：「沒錯，先轉了彎再說吧！」

A先生和B小姐都是大陸年輕的知識份子，據聞他們在單位也是表態轉彎的，但是，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他們的態度是什麼，人們若只從他們在單位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中是難以知道的。

此外，九月份，我們在北京還聽見過這樣一件事：某日，某單位正在舉行開會，某東城區人大代表在會議上，向家委建議採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為了解決程序分歧，先對這兩種建議進行了舉手表決。結果是：十五人同意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廿二人同意採用舉手表決方式，二人棄權。於是，按舉手方式對罷免家委區人大代表一事進行了表決。結果是：廿二人舉手同意，罷免家委區人大代表，四人舉手棄權，一人舉手反對。可以想見，如果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將會有所不同。這再次說明：在目前的情況下，大陸知識份子的行為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失真，人們要從他們在公開場合下的言行中推斷出他們的政治態度來，的確不很容易。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要客觀地描述大陸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已經完全不可能了。如要獲得比較可信的資料，關鍵在於採用適當的方法。為了了解當前大陸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自今年六月中旬以來，我們採用了參與觀察的方法，參加了卅多次大陸知識份子的會議，並與十餘名大陸普通知識份子進行了私下交談。隨後，我們將大陸知識份子在對我們沒有防備或對大陸政府沒有防備的情況下所說的話加以記錄。而我們的文章也是根據這些講話記錄寫成的。我們認為，通過這種方法得來的資料是較為可信的，是可以作為反映大陸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的資料加以引用和分析的。在整理和分析我們所獲得的資料之後，我們發現：儘管大陸知識份子對自己的政治態度的表述各有不同，但是，如果要從政治態度方面進行分類的話，則可以把它們大致分為三種類型。需要預先說明的是，根據科學研究的倫理原則和中立原則，我們在文中將隱去所有被調查者的真實姓名而用字母代表，同時對於大陸知識份子的各類政治觀點，我們只作描述，而不作評價。

下述知識份子可能就是大陸官方所說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這類知識份子的特點是：在思想上懷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信奉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在政治上則反對一黨制和公有制，主張多黨制和私有制，同情胡耀邦支持學生和趙紫陽，認為政府開槍是無法容忍的，李鵬應該下台，中國政治制度應有一個深刻的變動。

我們接觸過一位O先生，卅來歲，中級研究人員，無黨派人士，他對中國許多政治問題的看法看來是這一類知識份子政治態度的一種集中表露。當談到對胡耀邦的看法時，他說：

我雖不是中共黨員，但是對於胡耀邦的逝世也感到極為悲痛。胡耀邦是共產黨內最後一個好人，最後一個真正的人，他通達、開放、理解知識份子，具有新思想和開拓精神。共產黨這樣一個人辭職並將其公開露面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這樣一個好人不能留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也說明中國政治體制中出現十分嚴重的問題。

當談到學生運動時，他說，這是民意表達和公眾參與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形式。針對有人指責學生的遊行等活動是違犯了程序政治和法律的議論，O先生說道：

學生遊行乃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在我們這個國家沒有民主的法律，沒有民主的程序，也沒有民主的輿論機構。人民要表達自己的願望，就只有訴諸這些極端的方式。

軍警大打出手與欺世盜名

我們接觸過一位O先生，卅來歲，中級研究人員，無黨派人士，他對中國許多政治問題的看法看來是這一類知識份子政治態度的一種集中表露。當談到對胡耀邦的看法時，他說：

我雖不是中共黨員，但是對於胡耀邦的逝世也感到極為悲痛。胡耀邦是共產黨內最後一個好人，最後一個真正的人，他通達、開放、理解知識份子，具有新思想和開拓精神。共產黨這樣一個人辭職並將其公開露面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這樣一個好人不能留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也說明中國政治體制中出現十分嚴重的問題。

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這說明，學生提出的要求已經不僅僅是學生的要求，而是社會各階層人民的要求。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不是某幾個人、某幾個當權者的國家。所有人都有權參與政治，表達他們的看法，而不管這種政治看法是對是錯。政府，如果還具有人民性的話，就應該對學生的這種呼聲作出反應，而不能拒之不理，更不能強力鎮壓。我們的政府既然那麼強大，就應該有信心有能力與學生對話，回答和解決學生提出的問題。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要辯論和對話。你為什麼不敢出來與學生進行一番辯論和對話呢？

當談到政府開槍一事時，O先生又說：

政府開槍，已將自己的面具全部撕光。這不僅是殘酷之舉，也是愚蠢之舉。它使更多的人認清了這個所謂人民國家人民政府的真面目。現在政府的宣傳機構一再宣揚什麼天安門沒有死人，但是它本身又作了許多限制。一是空間限制，即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一是時間限制，即清場時沒有死人。現在的問題是，清場以前和以後呢？天安門之外呢？政府既然敢開槍，為什麼又不承認呢？真是殘忍之極！無恥之極！

他還說：

有一篇社論稱：「胡耀邦的追悼會已開完，現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可以告一段落了」。這真是滑稽之至。難道人們悼念胡耀邦是為了走走過場嗎？還有什麼日期限制嗎？為什麼有些人這害怕人們悼念胡耀邦呢？這與當初有些人害怕悼念周總理有什麼兩樣？

學生與社會各階層要求一致

學生與社會各階層要求一致

當談到政府應如何處理學潮時，O先生說：

學生要就社會上很多不公正的問題與政府對話，向政府反映和表達他們的看法，這是完全合理的。這一做法已得到了

一位名人說過的話：「二個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中國知識份子中的這些敗類，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不幸，真是中國人的不幸。

我們還遇見過一位P女士，廿五歲，在某大學任教。在談到對目前某些中國政治問題的看法時，她說：

有些人借口民主不是萬能的而反對民主，這是極荒唐的。我們承認民主不是萬能的，但却是最好的。它比專政好。難道專政是萬能的嗎？

有人說學潮是胡來，民運是胡來，王丹執不了政，嚴家其執不了政。而有的人還說，學生運動的結果是給知名人士開路。但是，學生們靜坐、遊行乃至絕食是為了自己執政嗎？王丹是為了自己執政嗎？嚴家其是為了自己執政嗎？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又說：

小時候聽說外國制裁中國，她很憤憤。現在聽說美國、西歐、後來還聽說日本要制裁中國，卻很高興。因為這可以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那些沾滿人民鮮血的人下台。外國制裁有可能會使我們的生活艱苦一些，我們也很高興，也不在乎。

知識份子並不是從改革中得到好處最多的階層。但是我們依然主張改革。比如，雖然我們的收入不多，但我們却理解和支持物價改革，理解和支持高消費。

用種種手段威脅知識分子

當談到政府武力平息學潮之後在大陸開展的清查工作時，O先生說：

現在大陸開始了轉彎子和清查工作。你要不同意政府的做法，他就強迫你同意。用種種手段作為潛在的威脅：如降級、處分、不讓出國、不給提級、開除公職以至逮捕等。人們的思想自由沒有了，說話的自由沒有了。知識份子中的某些敗類也紛紛登場，附和和響應政府的號召，戴着整人害人。其言行與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常見的那些言論和做法別無二致。目睹這些現象，使人想起了當代

是等待這麼長的時日，代價太大，損失太大。一個民族不能總是在這種錯誤和平反的循環中前進。

我們已經看到，大陸這一類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與大陸政府現行的政策是抵觸的和不一樣的。但是，他們在公開場合還是盡力避免與政府發生衝突，他們並沒有陷入不可克服的心理危機之中，相反，他們倒是找到了一些疏解痛苦的方法。也許是由於大陸殘酷鬥爭的經歷太多吧，大陸知識份子看來已學會了怎樣生存，已知道接受他們在理智上無法接受的東西是必要的。

為了生存，當前大陸這一類知識份子中大多數人都要說假話。他們內心很少有同意政府開槍平息學潮的，但在單位或在正式場合卻沒有不表態支持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他們心裏想的是：一套，而嘴裏說的是另一套。人性雖然變形了，却有利於自保。

等待也是他們喜歡採取的一種方式。當人們面臨強大的外在環境而無能為力時，就轉而寄希望於未來，甚至寄希望於迷信。今年七月份，大陸知識份子談論「災異之說」盛行，表明他們盼望大事變從天而降，但不願自己去身體力行促成大事變的來臨。

還有一些人想逃避。或是一頭鑽進書堆裏，兩耳不聞窗外事；或是準備出國，留學或定居。

也有一些人不想等待，不想逃避，而想紮根大陸，做一點有益的事。當然對他們來說，生存和自保仍是必要的，這就是說，他們一方面要戴上假面具，算說假話自保，另一方面又只能採取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做他們想做的情。對大陸這一部份知識份子來說，採取和平的非暴力方式，既有利於生存和自保，也符合他們的價值和秉性。

幹部也不同意中共做法

我們還遇見過一位Q先生，五十來歲，「共黨員」，司局級幹部，他對中共近來的一系列做法都不滿意。當談到黨內對趙紫陽的處理時，他說：

趙紫陽是有現代化觀念的，他是真心實意想搞現代化的，他想跟隨和適應時代和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現在黨內的許多做法，包括對學潮和趙紫陽的處理都是缺乏現代意識的。有些人一天到晚說要搞現代化，而又沒有現代化意識，這怎麼搞得成現代化呢？

我們已經看到，大陸這一類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與大陸政府現行的政策是抵觸的和不一樣的。但是，他們在公開場合還是盡力避免與政府發生衝突，他們並沒有陷入不可克服的心理危機之中，相反，他們倒是找到了一些疏解痛苦的方法。也許是由於大陸殘酷鬥爭的經歷太多吧，大陸知識份子看來已學會了怎樣生存，已知道接受他們在理智上無法接受的東西是必要的。

為了生存，當前大陸這一類知識份子中大多數人都要說假話。他們內心很少有同意政府開槍平息學潮的，但在單位或在正式場合卻沒有不表態支持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他們心裏想的是：一套，而嘴裏說的是另一套。人性雖然變形了，却有利於自保。

等待也是他們喜歡採取的一種方式。當人們面臨強大的外在環境而無能為力時，就轉而寄希望於未來，甚至寄希望於迷信。今年七月份，大陸知識份子談論「災異之說」盛行，表明他們盼望大事變從天而降，但不願自己去身體力行促成大事變的來臨。

還有一些人想逃避。或是一頭鑽進書堆裏，兩耳不聞窗外事；或是準備出國，留學或定居。

也有一些人不想等待，不想逃避，而想紮根大陸，做一點有益的事。當然對他們來說，生存和自保仍是必要的，這就是說，他們一方面要戴上假面具，算說假話自保，另一方面又只能採取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做他們想做的情。對大陸這一部份知識份子來說，採取和平的非暴力方式，既有利於生存和自保，也符合他們的價值和秉性。

有一位年輕的S先生對我們說：我們用不着跑到大街上找戒嚴部隊拼了，我們可以向他們宣揚民主自由的觀念、宣揚改革開放的觀念，這樣他們就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以及他們今後應該做什麼。

又有一位年輕的T先生對我們說：

民主和自由只能靠和平的方式去爭取，如果訴諸武力，即使成功，也可能產生暴君和專制者，武力只會再一次產生一個毛澤東。

紮根大陸做有益的事

我們已經看到，大陸這一類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與大陸政府現行的政策是抵觸的和不一樣的。但是，他們在公開場合還是盡力避免與政府發生衝突，他們並沒有陷入不可克服的心理危機之中，相反，他們倒是找到了一些疏解痛苦的方法。也許是由於大陸殘酷鬥爭的經歷太多吧，大陸知識份子看來已學會了怎樣生存，已知道接受他們在理智上無法接受的東西是必要的。

為了生存，當前大陸這一類知識份子中大多數人都要說假話。他們內心很少有同意政府開槍平息學潮的，但在單位或在正式場合卻沒有不表態支持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他們心裏想的是：一套，而嘴裏說的是另一套。人性雖然變形了，却有利於自保。

等待也是他們喜歡採取的一種方式。當人們面臨強大的外在環境而無能為力時，就轉而寄希望於未來，甚至寄希望於迷信。今年七月份，大陸知識份子談論「災異之說」盛行，表明他們盼望大事變從天而降，但不願自己去身體力行促成大事變的來臨。

還有一些人想逃避。或是一頭鑽進書堆裏，兩耳不聞窗外事；或是準備出國，留學或定居。

也有一些人不想等待，不想逃避，而想紮根大陸，做一點有益的事。當然對他們來說，生存和自保仍是必要的，這就是說，他們一方面要戴上假面具，算說假話自保，另一方面又只能採取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做他們想做的情。對大陸這一部份知識份子來說，採取和平的非暴力方式，既有利於生存和自保，也符合他們的價值和秉性。

有一位年輕的S先生對我們說：我們用不着跑到大街上找戒嚴部隊拼了，我們可以向他們宣揚民主自由的觀念、宣揚改革開放的觀念，這樣他們就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以及他們今後應該做什麼。

又有一位年輕的T先生對我們說：

民主和自由只能靠和平的方式去爭取，如果訴諸武力，即使成功，也可能產生暴君和專制者，武力只會再一次產生一個毛澤東。

張欣欣家書

六四後遺症何時方能癒

大陸知識份子近況

當代人語：

張欣欣，北京知名女作家，電視節目編導、記者。曾著《北京人》引起重視，並曾以自行車遊中國後，回來以文藝作品形式介紹其遊歷、見聞，哄動一時。現在美國，仍保持與流亡民運份子及內地人士接觸。最近以報告文學形式發表《張欣欣的第X封信》連串作品介紹北京最新情況。

以下摘登她的最新作品《張欣欣的第十封信》。

欣欣：

收到你的信和接你的電話，在一片寂寞中看到、聽到的不只是句子和聲音的交流！自從「六·四」以來，在階段鬥爭的弦越繃越緊，清查逐步升級的情況下，逢人只說三分話的虛假和人與人之間戒心越來越成為公共場合中的通病，停滯的經濟活動、窒息的意識形態、高壓的政治統治，使整個社會沉悶得好像時間和空間都停止了運動。習慣了前兩年自由化的日子，現在要把已成本性的習慣改掉或收斂。比沒有得到過還難受！真憋得喘不過氣來，真想大哭大叫，想發洩，不管什麼形式，十、一前，一幫留美、留英回來的聚在一起，大唱起來，從「洪湖水浪打浪」、「大海航行靠舵手」，以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唱歌大笑，然後，只是痛哭。

“十億人和政府作對，政府能贏嗎？”

政治上的清查、經濟上的整頓公司，因上上下下都不積極，以致運動進展緩慢得奇怪。有經驗的運動份子說，這是四十年歷次運動所沒有的，既無高潮，也無巨大壓力，只有一種慢性的消耗。清查由原來三個月結束的計劃，延至半年（到年底），繼而延至一年（到明年六月），不到廿天的事情（五月中旬到六、三），一年還查不清楚。經濟上去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期間是搶購狂潮，今年八月是巨大蕭條。電視機賣一台送二百——三百元的禮品都少有人問津。甚至連原來最緊張的電力，在十月份都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有人說，這叫十億人民裝蒜子，還有人說，十億人和一個政府作對，政府能贏嗎？但悲觀的人認為，中國像一個患了癌症的病人，將在慢性消耗中死去。現在忽然重新換個角度領會那文痞郭老夫子當年寫《鳳凰涅槃》的心情，一把大火來得痛快，迅猛，短暫的痛苦後便能獲得新生。可惜那只是詩。現實是長期的痛苦中慢性的死亡。

“六四綜合症”何時能愈？會否成為中國癌變的轉折點？

借用美國曾患過「越南戰爭綜合症」，中國目前患了「六·四綜合症」。天安門槍開得痛快，但後果卻絕非究竟死了多少人的問題。一槍打掉了政府的合法性、民族的自尊心、凝聚力，使國家陷入精神、思想分裂的狀況。文革中慣用語「以XX畫線站隊」，這次則是以「六·四畫線」了，幾乎全國有文化的階層（包括工人，部分農民）都在行動上，思想上，甚至在良心上表明自己是站在哪一邊的，傾向性是什麼，政府由於感到自己統治基礎的薄弱，以至喪失，所以越發發覺恐懼，心理上不平衡，於是越發強調武力，抓住軍隊，一時萬馬齊奔。知識分子中大部分（尤其是年輕人）爭而無力，死亦不甘心，於是紛紛設法出走。我們所的年輕人已人人都成了「托派」。美國克爾「越南戰爭綜合症」花了大概十至十五年，中國還不知有無此種機制可以克服「六·四綜合症」。如果沒有，那麼六·四便成為中國癌變的轉折點。

說了那麼多，都是些不愉快的事，因為實在也找不出什麼值得愉快的事來寫。似乎把未來暫時的離開、易地工作當成一種冥冥中的期望，但這種期望又在不斷的壞消息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我們這裏對長期出國訪問的政策是基本凍結。明年二月去美國，領導已明確表示：不現實。目前在積極設法疏通。期望隨着領袖大人們心理調整的結束，能放寬尺度：人就像一個東西，附在別的東西上面，任人隨便抓撓。

我們的信總是陰錯陽差！我這裏陸續有「情報」，總是忍不住把見的寫下來，等待不知在什麼時候突然在腦中閃出一條縫，等待「正常線路」暢通的瞬間，花外國郵票，把「情報」、「販賣」給你，也許是最值得或者是最有意義的事。至少，我現在看不出還能做什麼更有意義，也更有效的事了。

“勞動人民文化宮”竟變成“露天大監獄”！

九月下旬去看XX。她的丈夫目前正在「秦城」監獄，大約九月初，有兩個剛從那裏面出來的大學生去看她，向她講述了一點裏面的情況，他們是這樣被抓進去的：六月八、九日，有幾十個北京學生跑到天津，住在小旅館裏，因此立即被天津方面「抓獲」，認定他們一定是暴徒，不然何以要逃到天津？然後押回北京，轉交北京公安局，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待了幾天，那個以前早上練拳、溜鳥的公園，現在協助「天安門」

的新形象真如它的左鄰右舍的位置，整個一座關起大門的露天大監獄！他們由「部隊」看守，全戴手銬，吃飯的時候也不能解開，而且被打得好慘，之後，就轉到了秦城，他們剛過去時聽說是這地方——中國「古拉格羣島」的頭號，心立刻死了，結果，一切都比前的日子好，大家關在一起，彼此相處很好，在一起交流種種經驗、思想，回憶六·四那天和以前，簡直比他們出來以後還感覺「解放」，大家還互相勉勵。而且那裏對「囚犯」還不錯，至少是不打，有報看，每周可以洗一次熱水澡（每人十分鐘），還可以大罵政府（在有看守的情況下），學生說在放風時他們見到過劉曉波、王魯湘、曹思源等等，似乎重要分子都在那裏，這批學生實在沒有什麼罪，因而坐牢三個月，最後全部釋放。學校接到通知後都派大轎車去接。XX認為她丈夫的情況構不成罪，充其量是犯了點「法」，因而她斷定如果「十一」不出意外，「上邊」也許會鬆點手，就有希望得自由。

劉曉波、王魯湘、曹思源因在秦城，蘇煒、甘陽變成“賣國投敵”

中國社會科學院那裏是重災區，文學所文學研究室主任蘇煒已被開除公職，他對於這邊來說，已是明確的敵對分子，他和甘陽一起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據說蘇煒純粹是「毀于成名」當時知識分子聯合會種種聯絡的事，「知識分子」們都百鍊成鋼，不是百鍊成鋼，數來數去，只有他尚無家小，也無妻子，就派了他做聯絡人，天天騎着自行車挨家通知各種事，最後一天騎車回到自己家，打開門，門下一堆紙條，手寫的：到保衛科報到，交代問題，還有手寫的，也有用報紙上的字一個字一個字剪下來貼在一起的，快跑！不知他當初究竟是該跑還是不跑？他們的命數就跟那幫北京學生似的。

劉再復、張顯揚：敵我矛盾，內部處理

劉再復的問題尚不明晰，但已確認為他是知識界聯合會的發起人之一，據說是有什麼人的供詞作証。劉再復和張顯揚被定為「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處理」。在這個文學所只有一個現實主義的文學幽默案例。那個號稱集思想、文化、考古、訓古、易經等等於一身的「怪才」何新，四年前被胡喬木硬塞在劉再復手下，從此與風波浪，六·四以前，他給中央寫一書簡，分析知識分子心理及民眾動向，頗有「白衣秀士」之風，實則給當權者出謀劃策，大清洗一來，此人便成為「社會科學院清查小組」的頭領之一，嘵嘵們竟也一呼百應，立刻紛紛寫大、小字報響應清查，篇篇大、小字報積極一致指出：何新乃

集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大成於一身的典型；從著作、言論至私人生活，社會科學院「清查小組」也照章辦事，將大、小字報內容忠實上報，數日後，社科院門口出一告示，本人自今日起辭去「清查小組」及研究員一切職務，甘做一無業遊民，何新。只此一例可以笑的故事，社科院的李慎之等人前段時間仍有抵觸情緒，引起當局明確不滿，大有要將他們打成「反清查力量」之勢，但現在又傳說這些人都做了「自我檢查」，並且通過了。看你們知識分子這個小螻蛄。

有一個重要傳說，要在戒嚴部隊中選拔兩萬人，在北京落戶，成立「特警部隊」，以此與衛戍區相對峙，成為更可靠的「心腹」，這事最後落實才能取消戒嚴——這是剛聽說的——還有一種說法：在「初亂」之前，衛戍區解散了兩個師，以補充北京的兵力。

戒嚴部隊將改編為「特警部隊」，長駐京城以牽制衛戍區

據文化部的人說，賀敬之尚未到任，因為他不願意任「代部長」，「代部長」其實來之不易。總理提的名，而人大常委會通不過半數，反對的認為他年紀太大，「上邊」怕計得更大的沒趣，就不再正式送交人大會議討論通過，而任命他為「代部長」，他還不知道。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九月份全國工業生產增長率為0.9%，這可把「上頭」嚇壞了，因為八月份還在8%，當時就等於敲響了警鐘，（我不知道你對經濟學懂到什麼程度，反正我是，它認識我，我不認識它），據說最低線是6%，（根據我國的現狀和水平低於6就出問題了），現在等於是完全停滯了。「他們」不能不急了，下令統計局不准透露（但是以往每個月似乎都要公布——以往我從來不關心，今後倒要留心了）要等「他們」商定了對策再說。

這信寫了很長時間，總也找不到合適的人，現有一可靠人自費留學，但行期是本月底。

生產停滯，統計局反而歡呼

十月份的工業增長率為2.1%，據說統計局內大家一起歡呼！這還與尼克森「談崩」了之後，計委這幾個月所做的些微努力全部付諸東流，連我這個對經濟學兩眼一抹黑的人也有懂了：經濟是注定了要走向山窮水盡了。目前吃的市場上還看不出什麼，據說今年好些地方糧食豐收，由於沒人跟咱們「外資」了，桔子、香蕉都要過剩，老百姓倒能沾點沒出就「轉內銷」的小便宜。

轉載自中國時報八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人間副刊」

當代周刊 98/1/6

大清洗下的社會科學學院

· 知識界近況

北京思想開放的社會科學家們
正面對強硬的意識形態黨官的壓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被中共列為八九民運的「重災區」，大清洗的重點單位，從院一級領導開始，層層過關，個個受審查。中共當局對社科院恨之入骨，進行了兩次清查運動認為不夠，要推倒重來，預料全部清查要到今年五月才能暫告一段落。

中共當局為了徹底清查社科院，一共派了三個清查小組：一個是國家機關黨委的清查小組，一個是中央的幹部清查小組，一個是本院自己的清查小組。

去年清查開始後，全院中青年知識份子和工作人員無不感到，被視為高高在上的官僚們——院級領導大多數都因支持八九民運而成為清查對象，有的甚至在高壓下仍不改初衷。

社科院院長胡繩被視為一個正統的馬列教條主義者，但這次民運期間也在社會科學界人士的呼籲書上簽了名。副院長李慎之在六四開槍前公開宣稱，不願在刺刀下當官，拒絕出席五月十九日李鵬宣佈北京戒嚴的黨政軍大會。當時他可以用有外事任務作藉口，但他卻毫不隱諱地表示，他不想去支持李鵬。另一副院長丁偉志曾帶頭組織簽名支持民運。「六四」大屠殺發生後，國務院各部紛紛被追表態支持，但李慎之和丁偉志仍在院黨委會上力爭，給中央的支持信上不能寫「一致同意」之詞。言外之意是，他們兩人拒絕支持中共鎮壓。據說院秘書長劉啟林等，抗拒高壓表現也很不錯。社科院的知識份子說，平時總認為這些人已當了大官，凡事只求保住自己的祿位，想不到他們這次也表現了極大的勇氣和良心。

由於鄧李楊政權對社科院十分仇恨，本來清查在去年十月已結束，但最高當局接到清查報告後，立即駁回，說社科院清查運動很不徹底，必須推倒重搞。到去年底，中共當局又說清查不如他們預期那樣狠，把工作組換人，運動再次升溫。

從院領導至一般工作人員，對社科院的清

查抵制情緒都很大，最高當局雖說要狠整，但很多人都是隨便抄報紙寫個檢討就混過去，他們說與流氓無賴不必認真。不過由於層層過關，人人過關，全院清查進度很慢，有的連被列為清查重點的所一級還未過關。

政治學所的王森因主辦《知識份子聯合會》的報紙「自由新聞學報」而被捕，關了一個月都定不了罪，當局只得釋放他，但給他留了一條「取保候審」的尾巴。據說王森在獄中所受待遇相當不錯。

但關在獄中的戴晴待遇就比一般知識份子差得多，而且被關的時間也長得多。據北京知情人士分析，中共當局搞戴晴是為了整趙紫陽。因為在「六四」之前戴晴曾與趙紫陽有過接觸，請戴晴吃飯並單獨與她談話，所以他們懷疑有一條線，是戴晴到趙明復，再到趙紫陽的「黑線」。他們說這證明中共整肅黨內異己比鎮壓知識份子更殘酷。

中共為了加強對社科院的控制，去年底調了十三名意識形態強硬的黨官到社科院當副院長。一個是現任幹部清查組組長、原中宣部副部長郁文，一個是中央黨校教務長、保守元老王震的紅人，還有一人是河北省委組織部長。估計不久整個社科院的領導層從上到下都會大換班。

在中共目前的大倒退政策下社科院許多本要出國進修或作學術訪問的研究生、學者失去了出國的機會。八五年後畢業分配到社科院的七八百人將被下放到陝西商洛改造思想，而八九屆的畢業生更要帶戶口下去，這意味他們很可能不再回到原來的單位。現在社科院已不再進人，其研究院除個別博士生外，也不招生了。知識份子正在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付出代價。

開放月刊 98/2

· 蔡詠梅

謾罵只能自暴其醜

——評中共最近對劉賓雁等人的批評

· 常宗益

北京「六·四」血腥鎮壓之後，通過各種渠道逃離大陸的作家有好幾位，但被公開開除作家會籍，以長文批判的只有兩位：劉賓雁、蘇曉康。八九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劉賓雁反動面目大暴露》（以下簡稱《大暴露》）的長文，十一月十八日北京《文藝報》在頭版頭條新聞中報導中國作家協會撤銷劉賓雁作協副主席職務、作家協會會員以及撤銷蘇曉康作協會員的消息。自此以後，報上開始刊登對劉、蘇兩人的批判文章及所謂「座談會」的記錄，較為值得注意的文章如：管揮寫的《斥賣國賊劉賓雁》、李英的《一個反面教員的啟示》、康濯的《揭去劉賓雁的偽裝》、曾克的《人民不允許你們的賣國行徑》、戚方的《從「白皮書」到「河殤」——紀念「白皮書」討論四十周年》、李希凡的《系統深入批判，澄清理論是非》、程代熙的《清除垃圾、淨化環境》、宇文化的《「河殤」呼喚一種甚麼「反省意識」》等。

在這些極左人物所寫的文章中，我們從標題便可以看出所謂批判其實只不過是謾罵，文章內容，幾乎都是按《人民日報》那篇《大暴露》為調子，再加幾句文革式的批判口號，有的甚至整段抄錄《大暴露》，只不過將句式略為變動一下而已。

我們且看一著極左文人如何挖空心思去歪曲劉的作品。康濯說：「他（劉賓雁）的報告文學過去確是受到過一些歡迎，《人妖之間》就是如此。然而這一件作品中反映的王守信的問題是誰提出來的呢？是黨，是當地黨委提出來的。提出來以後他去寫，但他卻進行了某些歪曲。其它作品也是一樣，如果說反映了一些冤假錯案，那末這些冤假錯案難道是他劉賓雁提出來的嗎？他沒有提出過一件。」

康濯是位極左老作家，任早期《文藝報》的主編，曾參與逼害胡風，因而歪曲事實是他的看家本領。

其實，《人妖之間》一問世，何止像康濯所說那樣受「一些歡迎」，簡直是大受歡迎！劉賓雁正是由於這篇小說而海內外揚名。說到有一「某些歪曲」，倒不如說康濯有「某些歪曲」。至於康濯所說《人妖之間》是黨提出來的，劉「沒有提出過一件」，如果康濯說的話是真，那麼，《劉青天》之名便應是人民「歪曲」劉賓雁了。

批蘇曉康的文章大都涉及《河殤》，《河殤》在「六四」事件之前便遭到圍攻，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奇怪的是「六四」之後，突然冒出了趙紫陽阻止批《河殤》的事來，並且有了個叫「易家言」（其實是一家言）之諧音的文章被扣發的「罪證」，於是《河殤》的問題便更加嚴重，有人便聯繫到毛澤東主持的討論「白皮書」問題上去。

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提了一份數十萬言的《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白皮書」中提到了美國對中國演變的希望。毛澤東便曾領導他的追隨者把「白皮書」批了一頓。

戚方熱心想把四十年前的批「白皮書」和趙紫陽的所謂支持《河殤》聯繫起來。文章說：「應該說《河殤》是八十年代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即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少數知識分子對「白皮書」的呼應。或者說，是一份由八十年代中國人寫成的「白皮書」的翻版，從「白皮書」呼喚「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終將再起」和呼籲組織起「突擊隊」，到《河殤》的炮製、鼓吹前宣告一個代表「中產階級」的精英文化羣體的形成；從「白皮書」中「戰勝共產主義的思想和陰謀」的公開鼓動，到《河殤》的作者和顧問們宣告社會主義的失敗以至整個中華民族的衰亡……我們不是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間一脈相承的歷史連續性嗎？」文章接著還指出，四十年前毛澤東領導人們批「白皮書」，可是四十年後的趙紫陽卻對《河殤》「採取了明確的支持態度」，「鼓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鼓噪」，並「親自出馬阻止、限制了對《河殤》的批評。」

本來，「六四」之前，那些痛罵《河殤》的人還止於學術上的「人身攻擊」，頂多也只說蘇曉康及顧問們數典忘祖，現在卻不同了，幾乎變成拍一部《河殤》便可以亡黨亡國，變成是杜勒斯「和平演變」的「突擊隊」，因此，戚方說，批《河殤》比粉碎反革命暴亂更為複雜，更為困難。

必須指出的是，在上述批劉賓雁的文章中，有幾處都指責劉賓雁將到台灣訪問，並以此證明劉賓雁之「反動」。只不過由於當時劉賓雁尚未成行，他們亦便「一點到即止」，現在劉賓雁已到了台灣訪問，蘇曉康亦到了台灣訪問，可以預料，兩人又必多了一項接受台灣津貼的罪名，我們做這樣的預測並不為過，因為有例在先。劉賓雁為《第二種忠誠》之後不久，倪育賢到了美國，結果倪育賢的所做所為都被算到劉賓雁身上。於此類推，趙紫陽勢必必多了罪名，扣帽子專家們又必有一番忙碌了。

開放月刊 98/1



一名學生在北京大學的告示板前駐足閱讀「大字」報

沉默中的希望

「六四」之後的北京校園

傅德賽

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北京大學與學生談論國內外形勢，不料學生提出的問題愈來愈尖銳，袁木狼狽敗陣。這件事似乎給中共敲響了警鐘。他們本以為通過半年的反思，學生們已經「迷途知返」，不料他們「賊心不死」，目無尊長，連紅得發紫的袁木也敢嘲弄譏諷。中共官員不得不承認：他們對學生的教育和思想控制仍未成功。

中共對學校執行「特區政策」

中共在「六四」之後，對此次民運的總評價為：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學校（尤其是大學）已經變成自由化思想泛濫之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說：「我們幾十年來的教育戰線，到頭來培養出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害蟲，只會動不動便貼大字報、遊行、上街，別的什麼本事也沒有。」

所以中共決定整肅教育戰線，突破口便是大學。

他們將「自由化泛濫」的現象歸咎於「講壇被搞自由化的一小撮所把持」，言外之意，就是教師隊伍也得整頓。難怪大學許多老教授感到反右和文革好像又來臨了。

除了北京大學，北京的大學都在九月下旬或十月中旬開學。開學前夕，學校黨委安排了教職工的輪訓和學習，力求統一思想。教委明令，一些西方政治法律或經濟人文方面的課程停止開課，一些有自由化言行的教師不得上講壇，而且每一個教師都必須寫一份思想彙報和「動亂」期間的情況彙報。對中共黨員和民主黨派成員的要求自然更為嚴格，必須人人過關、表態，澄清立場和觀點。

開學前一周（有的學校為兩周），學生中的黨員或學生幹部奉命回校先行學習各種

今朝有酒，請盡歡娛

如今，只要踏進北京任何一所校園，都可看到一羣羣面無表情的形象。半年前那種風華正茂的樣子沒有了，睿智的眼睛變得渾濁不堪。精神上沉重的負擔使許多大學生心理變態。

剛才講到大學生變得現實了，這並非指他們靜下心來刻苦學習，而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吃喝嬉玩，幾盡俱全」。

「麻派」指玩麻將成風。北京的麻將風不知始於何時，但大學生的麻將風的確起於「六四」之後。幾乎每間宿舍的夜間活動都是「推牌九」。北師大一個系的學生因終日打麻將集體罷課。有的學生夜賭日睡，曠課不計其數。

「舞派」則到處打聽舞會的消息。咖啡廳、卡拉OK歌廳是他們常到之處。一些學校開舞會，原意是把打麻將的學生吸引出來，結果舞廳人滿為患，因爭風吃醋而打鬧的現象屢有發生。

「戀愛派」互相依偎。當眾親嘴、同吃同喝的景象在北京校園隨處可見。大多數在校學生從一年級就開始戀愛。在北京大學，起碼有百分之十的女學生偷嘗禁果，甚至公然在戀人宿舍留宿，「性解放」程度令人咋舌。

當然，這種現象並非「六四」之後獨有，但「六四」影響很大。在筆者訪問的多數學生中，都認為大學時期談戀愛，原因無非是「本能需要」、「力量依靠」、「炫耀」甚至「發洩」。被訪問者並不隱諱性關係和他們的名字。但他們認為自己的愛情不在此裏。

玩風大盛之下，吊兒郎當的形象便可空見慣了。他們將父母寄來的血汗錢肆意揮霍，遊山玩水，令人擔憂。

筆者訪問了一些學生，問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

F說：再上大學沒有意思了。「六四」之後，知識分子待遇會更差。我現在是在等畢業。我的同學早就不起我了。

L說：政府無能，我拼命學習為那糟？混下去，不失業就行了。

文件，聽各種形勢報告，各自表態，然後在開學的第一周裏帶領同學繼續學習討論。

這種做法能否收效，不言而喻。它的唯一作用，大概就是讓年輕的大學生領略一下當年文革的滋味，在學生中傳為笑話。

學校當局按照中共统一部署，在學生之間劃幾道線：把普通學生與「參與動亂」的學生分開，把參加遊行靜坐的學生與「組織策劃動亂」的學生分開，把「有認識」並積極檢舉的學生與「頑固不化」的學生分開，並給不同等級的學生開不同的「小灶」，企圖分化學生。

所謂「組織策劃動亂」者，即大學學生自治會成員、廣播站成員、地下報紙成員、糾察隊隊員以及他們的領導人。這些人不僅要寫總結、學習心得，還要寫檢舉他人的材料，回憶當時所犯「罪行」的始末細節，否則不予註冊，勒令退學，甚至開除學籍。

隱忍待變

在重重高壓之下，多數學生儘管不服氣，拒絕轉彎子，但也不得不為自己前途着想。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六四」的失敗，使學生們變得現實了許多，有些甚至覺得後悔，認為當時採取的和平方式太愚蠢了。

八月分，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有第二屆高自聯活動的跡象。他們到處刷寫標語，制訂各種綱領章程，決心再戰。九月底，他們與法國的民主中國陣線聯繫呼應，貼出公告希望北京市民抵制「十一」的慶祝活動。由於北京大學這個「重災區」遭到當局

S是個活潑可愛的女孩，剛上一年級，已經急於找工作了。她說：「社會主義救不了中國，更救不了我。我要難苦奮鬥，自力更生，找到一分好工作，掙大錢。如果能出國，更好。」

也有一些大膽的男孩子拋棄課本做起生意來。他們多數是協助個體戶東倒西倒，然後掙些回扣。與此相比，前些年「當家庭教師」那一類勤工儉學方式顯得「落伍」了。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托派

如果說圖書館裏還有人埋頭讀書，那麼，十之八九是在看英文。這一派是「托派」——準備參加托福考試赴西方留學的一派。

航空大學一位姓齊的學生告訴筆者：「英文對我們永遠有吸引力。我們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美元、護照、六百分（托福）和簽證。一切與之無關的事情都不再過問。」

他的一個同學已經連續考了四次托福，均因未過六百分而痛苦萬分。

「六四」之後，托福考試報名處成為戰場，要報名必須坐守一個甚至二三個晝夜，有的學生因弄不到美金錢而走險。

出海的船還是那麼小，而希望上船的人卻增加了幾倍。在秀水東街美國使館和三里屯澳大利亞、加拿大領事館處，處處都可看到一張張焦急的面孔，那些面孔暴露了大學生們怎樣的心態呢？他們僅僅是在逃避嗎？

懷舊還是諷刺？

在北京大學許多宿舍門上，都貼着毛澤東的畫像，圖書館裏毛的著作被搶借一空。官方趁機渲染了一番「尋找毛澤東」的「喜人景象」，殊不知學生們自有他們的理由。

L曾經是學運的積極分子，目前尚未過審查關。他說：「我覺得『尋毛熱』主要反映出大學生對民運的理論要求。同官方說的一樣，我們對中國的國情太不瞭解了。毛澤東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從他身上看到了這一時期民族的精華，也看到民族的劣根性。」

L又說：「我們對鄧小平期望過高，對中國目前的改革開放形勢估計錯誤。我們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看到了一件驚人的事：鄧小平是一個不如毛澤東的第二個毛澤東。」

希望在那裏？

沒有人能夠把希望寄託在一羣無賴或消極懶散者的身上，但令人欣喜的是：學生們的思想仍然是一致的。在高壓之下，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克制，而血氣方剛的青年畢竟需要發洩心中積鬱的渠道。因此，他們不得不採取變通的辦法。也許留得思想在，就會有希望。

東歐形勢的變化，給學生很大的鼓舞。他們到處傳播來自「美國之音」(VOA)的消息，奔走相告，高呼「羅馬尼亞人民萬歲」、「獨裁必亡」等口號；有人慶祝至深夜，用象徵的手法暗喻中國的喬斯古政權。學校裏出現了「東歐問題研究會」。這組織是秘密的，但它是嚴謹的。會員倡導「客觀、全面研究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該會負責人張某說：「到合適的時候，我們會正式申請成為合法學術團體。」據說，該組織正在收集中國八九民運資料，準備寫一部歷史，在祭奠「六四」死難同胞的同時，用事實喚起人民爭取自由的決心。

一九九〇年一月北京——廣州

明報月刊 1990/2

— 文藝界 —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318	文藝界大清算開始了（璧華）	九	8/89	100/102
320	說慌文學怡頭了——讀（幾篇歌頌戒嚴部隊之作（懷冰）	爭	10/89	72/73
321	〈文藝報〉被秋後算帳（璧華）	九	12/89	96/97
322	文化領域的大整頓	亞	28/1/90	6/7
324	北京文壇——百花凋零（胡文荻）	鏡	3/90	48/51
326	六四前後的大陸作家們（太史雲）	解	3/90	32/36
328	廣東文壇的大潰散（沉鍾）	解	3/90	37/39

六月四日，坦克車在北京碾死了學生和平民，也碾碎了十幾年來開放改革的成果，包括政治、經濟與文化成果。文藝之花這幾年開放得分外燦爛，但也肯定會被摧殘得最為慘烈。今日的這幫超法西斯對具有獨立思想的文藝家的憎恨，絕不亞於毛澤東和「四人幫」。當權者已經下了向文藝界進攻的指示，極左的還鄉團回來了，文藝界大清算開始了。

又再提出文藝整風

大清算的端倪見於中宣部在七月六日、七日召開的文藝座談會。官方喉舌說北京部份文藝工作者參加，內容為在文藝界如何學習貫徹好四中全会精神和鄧小平最近的幾次講話，目的自然是統一思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據新華社北京七月七日電，會議由中宣部副部長王維澄主持，他在會上作了開場白，會上發言的有劉白羽、林默涵、馮法、李希凡、劉厚生和孟偉哉，中宣部長王忍之做了總結發言。電訊在劉、馮的名字上冠以著名作家，在林的名字前冠以著名評論家，在李名前冠以中

國藝術研究院院長、著名文藝評論家，對劉厚生冠以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而孟偉哉則冠以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頭銜，作用應是說明表態者的權威性。從有關報導所見，會上發言者除上述人等，還有吳元邁、張炯、魏巍。

繼中宣部七月六日、七日召開的座談會之後，延安文藝學會、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文藝理論與批評》和《作品與爭鳴》編輯部緊接着於十一、十二日召集北京七十餘位文藝家舉行另一座談會。這次會議不只是提出要學習四中全会精神和鄧小平的講話，而是明確打出旗號：要進行一次新的文藝整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健全文藝界各級領導班子。

從這兩次文藝座談會上發言的內容看來，就是要全面而徹底地否定「四人幫」倒台十幾年來的文藝成就。這點在兩次會議上的表現是一致的，不過後者表現得更為露骨，更為強烈而已。下面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在第一次座談會上，中宣部副部長王維澄說：「十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績。但是文藝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

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散佈了種種謬論，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文藝界是很嚴重的……」。中宣部部長王忍之的總結則說：「這幾年無產階級的文藝陣地不是壯大了，而是縮小了。」其他與會者發言中只是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各種表現，但仍未談及十幾年來的文藝功過的評價問題。

否定「少干預」的政策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座談的矛頭指向中共中央八九年三月十日公開發表的中共建國以來關於文藝的政策最具自由民主氣息的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貫串該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中共對文藝要「少干預，少介入」，允許「創作自由」。

文藝界大清算開始了

壁華

左派召集文藝座談會，明確打出旗號，要進行一次新的文藝整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鄉團回來了，矛頭針對「少干預、少介入」的政策，所謂健全文藝界各級領導班子，乃是奪權的先聲。

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提出「黨的領導機關要充分尊重文藝的特點和規律，對具體的文藝作品和學術問題要少干預、少介入。」認為文藝作品的優劣，應由廣大讀者、觀眾和文藝界自己去評判，並要經受歷史的檢驗。

「少干預、少介入」的原則是根據幾十年來慘痛的文藝歷史經驗得出來的結論，是廣大文藝家內心的迫切要求。八〇年十月去世的電影藝術家趙丹臨死前留下了一篇文藝遺囑，題目就是《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現在極左份子攻擊「少干預、少介入」的文藝政策，實際上是妄圖否定《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因為這一文藝綱領是趙紫陽提出的。為起草該文件，在去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連續召開了二十餘次座談會，參加者有文藝界人士七十餘人，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人參加了所有的座談會。六月初，多次修改的文件第六稿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其後，又幾次徵求文藝界意見，包括十一月八日召開的第五次文代會上大範圍

徵求意見。最後經過十數次修改，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二次討論正式通過。可見這是一個中共最高層一致同意的文件。

更重要的是，這一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定下的。鄧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中就說過：「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作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

王忍之、林默涵指使他的喉嚨們大肆攻擊趙紫陽，把他們聲稱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腐敗現象歸咎於趙紫陽的「保護傘」，即黨對文藝要「少干預、少介入」的方針。他們說：「趙紫陽一再強調，黨對文藝要『少干預、少介入』，這意味著取消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他們何嘗不知道「若干意見」這個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常委會通過的，除了「少干預、少介入」的政策，還對十幾年來文藝從內容到形式

作了肯定。現在左派幹將讓喉嚨去打頭陣，目的大概是要先試探鄧小平的反應。如果鄧氏點頭繼續進攻；如果反對，那是下面的人說了過頭的話，於是，那篇座談會上的發言也沒署名。

還鄉團回來了

在這兩次座談會上發言的，清一色的都是文藝思想極其保守的人士。看看第二次座談會召集機構的名稱，就可見一斑：「延安文藝學會」、「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都是為保衛正統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而成立的。

陳涌主編的《文藝理論與批評》，是為對抗抗再復主編的《文學評論》而成立的。八六年《文學評論》拒絕轉載陳涌刊於《紅旗》的《文藝學方法論問題》一文，因而要另辦新雜誌，原名《文藝理論與批評》，後因火藥味太濃才改名。至於《作品與爭鳴》，不論是八三年反對精神污染還是八七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



趙丹死前說：「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由化，都是緊緊跟着極左派。

這幾個機構一貫對創作自由抱敵視態度。《文藝理論與批評》從八六年九月創刊伊始就差不多每期都連篇累牘地刊載批判文藝改革派的理論與作品的文章（從第一期到最近一期，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沒有一期不批判劉再復，因為他是文藝改革派的旗幟）。

「延安文藝學會」更以保衛毛澤東文藝思想自居。八八年十月中旬，以該學會為首，召集了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校友會等保守文藝組織，召開了「文藝漫談會」，有百餘位文藝界人士在北京西郊聚會，名為「就文藝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對當時較蓬勃的文壇發出猛烈的抨擊。會上有人提出：「經濟領域在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文藝的秩序和環境也需要好好地整頓和治理一番。」其論調和最近那些將文藝界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何其相似乃爾。可見這些人是多麼盼望大清算的到來。

左派幹將冒頭

下面看看在座談會上發言的是什麼貨色。

他們之中，大都有頗「輝煌」的「反右」、「反自由化」的紀錄，有些人在文革前深得毛澤東賞識，對毛澤東文藝思想在近年被一班改革的弄潮兒棄若敝屣，他們懷有一腔不滿。他們絕不甘心於自己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李希凡曾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寵兒。五四年撰文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深得毛賞識，被認為文章「很有生氣」。接着又揮棍批判何其芳的關於典型的「共名說」；八〇年曾對張潔的短篇《愛，是不能忘記的》進行批判，認為小說中所描述的一個離了婚的獨身婦人和一個有婦之夫（老幹部）的愛情（儘管互相克制，終身未曾握過一次手，默默忍受內心

痛苦直至去世)是「背棄革命道德和革命情誼的」。從此這位「著名的文藝批評家」的著作無人理睬，現職卻是中國藝術學院副院長。

●林默涵這位僅次於周揚的文藝界黨官，是中共文革前的文藝理論批評界「五大戰役」(批判《武訓傳》、俞平伯、胡適、胡風、反右等)的中堅人物。文革期間，江青因林氏率先以自己語言轉達了毛澤東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以為他搶了她的頭功，對他點名批判，「十年動亂」中受到迫害。但他沒有像周揚那樣幡然悔悟。一九七八年，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長達兩萬餘言的大塊文章，堅持「文革」前「五大戰役」是正確而必要的。七九年在作協主辦的《文藝報》召開文藝理論工作者第一次大會上，林對當時的「傷痕文學」大加撻伐，貶之為「傷感文學」。

●魏巍曾把韓戰時支援北朝鮮的「志願軍」稱為「最可愛的人」。當軍隊血洗京城，解放軍被改稱為「最可憎的人」之後，這位褪了色的軍隊作家出來支持對文壇清算並不足奇。去年十月「延安文藝協會」召開的「文藝漫談會」上，他就曾以《我的回答》為題，對王蒙的反對政治功利主義、宣揚人道主義表示深惡痛絕，並譴責兩篇對毛澤東文藝思想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的文章(即《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後》和《自由與失望》)。

●劉白羽在八一、八二年批判白樺的《苦戀》時，曾經是指揮者。劉厚生在近年全國有爭議的劇種會演時，仍要禁止川劇《潘金蓮》演出。

上述這些人多年來大權旁落，現在意氣風發，彈冠相慶，大有「今日之域中，竟是『左』家天下」之概。

陰謀能得逞嗎？

極左「還鄉團」回來了，他們磨拳擦掌，準備對文藝改革派進行清算，他們的目的能夠得逞嗎？我看未必。為什麼呢？

還鄉團們的文藝綱領不得人心，他們的惡行為人們所不齒，他們始終是極少數。只要看看第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者，沒有一個是活躍於當代文壇的作家和評論家，就可證明了。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視劉再復為死對頭的陳涌，也沒報導說他在會上發言，原因耐人尋味。

再者，第一次中宣部出面召集的座談會，發言者寥寥。到第二次由絲毫權威性都沒有的「延安文藝學會」等組織召集(要是以往一定是由權威性的全國文聯和各文藝家協會組織)，想是發言者盡皆泛泛，於是連名字都沒見報。

更為關鍵的是鄧小平的態度未明朗，人們不知道他所容許的批判底線究竟在哪裏。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在其中一次會上的發言，也只是「一般地談文藝的教育作用，不能聽任資產階級自由化去侵蝕青年，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創作更多健康有益的作品，而避談未來的批判鬥爭方向」。

座談會的報導沒有指名批判一個作家，甚至連被北京市長陳希同點名為「動亂」的煽動者的劉再復、蘇曉康、戴晴等的名都未點到。至七月二十二日為止，除《河殤》之外，還沒有涉及對其他文藝作品的點名批判，而批判《河殤》，主要目的還在把趙紫陽搞臭——指控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見十九日《人民日報》易家言一文的編者按)。也許在目前的情勢下，馬上擴大鬥爭面，會引起國際抗議及國內人心浮動，故先暫時採取恐嚇政策，慢慢再秋後算賬。

像毛澤東時代那種大規模的批判鬥爭可能為鄧小平所不取。但是還鄉團回來之後，文藝政策的收縮則是不可避免的事，黨和政治一定會不斷干預文藝、介入文藝，要文藝與之同步，為它服務。創作自由將被置諸腦後。

「還鄉團」既然回來了。他們這些嗜權如命之徒，首先要奪回旁落在文藝改革派手中的權。第二次座談會上有人提出要「健全文藝界各級領導班子」，就是奪權的先聲。前些日子有消息說文化部長王蒙可能調職，最近的消息說他已一個多月沒上班了。看來極左份子是不會手軟的。總之，文藝家如難仍綿綿不絕，不知何日是盡頭。

九十年代 1989/8

說謊文學抬頭了

——讀幾篇歌頌戒嚴部隊之作

懷 冰

「六·四」大屠殺後必然引起大陸民眾更大的反抗，中共當權者迷信武力，以為用坦克和機關槍就會把民眾的反抗鎮壓下去，他們死也不相信「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真理。

當前，最使中共當權者擔心的是軍隊。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聲譽是六十年來用無數的鮮血換取來的，本來是人民的子弟兵，但在「六·四」事件中却掉轉槍口來屠殺哺育他們的父老，實在是太逆不道之至。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軍中特權階層的飛揚跋扈、倒行逆施，解放軍聲譽已經日漸下降，但對士兵，由於歷史形成的密切關係，人們始終懷有某種敬意。「六·四」事件之前，由於當權者再三保證絕不會動用軍隊對付學生，根據以往紀錄，也確實未有軍人殺戮平民之事發生。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中，也只是調動民兵和公安幹警來鎮壓。四月中旬以來，正如最近駕駛機投奔台灣的蔣文浩所說：「解放軍和人民是一條心」，軍人亦能順應民意，對風起雲湧的學潮持旁觀態度。直至六月四日之前的近兩個月間，還曾出現軍民十分融洽的場面。但是獨裁者利用軍隊血腥的鎮壓，使得「最可愛的人」的形象在數小時內變為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形象，敬愛轉為仇恨，老百姓拿有毒的水去慰勞他

們，甚至小童都利用遊戲的機會射殺他們。仇恨的種子已深深埋在人們的心中。中共當權者意識到這點，於是又是由鄧小平親自出面對戒嚴部隊表示敬意，給以至高無上的評價，又由兒子鄧小樺出面代表他慰問一番；又是下令頒發什麼「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又是舉辦什麼展覽會；更有什麼「英雄報告會」等等。當權者還動員文藝界來歌頌戒嚴部隊，於是出現了「十月」文學雙月刊今年第四期上破天荒地已編印好的雜誌的扉頁前面加上數頁歌頌戒嚴士兵的詩歌和日記之舉。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當權者們已經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

一定遺臭萬年

刊登在《十月》扉頁之前的詩有兩首。一是《沁園春——悼為平息反革命暴亂壯烈犧牲的共產主義戰士》，一為《碑文，從這裏寫起——為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英勇獻身的戰友而作》。

這兩首詩都不去接觸軍人如何運用坦克機槍對付平民的「英雄氣概」，因為既然是反革命暴亂，照大陸以往的寫法，一定要把暴徒的猖狂描寫得淋漓盡致，爾後才寫如何鎮壓他們，而在詩中，暴徒們不見了，只是用一句話「何肆虐，暴徒逞兇狂」就交待過去了，暴徒怎麼兇狂，手無寸鐵的「暴徒」，能兇狂到哪裏去呢？作者王蓮在寫《沁園春》之時，想必只是根據官方編選的傳說去寫，因此除了口號，還是口號。詞的一開始先歌頌中共一番「國政輝煌，國康永生，國瑞榮光」。然後寫：「是英雄衛士，功垂青史；堅強柱石，氣憤煙燭。血灑京都，名存千古，壯烈捐軀慨而慷，平暴亂，我人民子弟，百世流芳。」這位作者完全搞錯了。他們面對的並非什麼「煙燭」，而是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和平民，正因此，軍人血灑京都，不可能「名存千古」，他們不過是鄧李楊之一幫屠夫屠殺人民的工具而已。正因為作者完全站錯了立場，所以後半闕詩也變成顛倒黑白的夢囈：「長城豈可摧傷。何肆虐，暴徒逞兇狂。驚崇文橋下，蒼天哭泣；長安街上，大地披霜。血醒民心，火燄愛憎，裂膽撕肝痛斷腸。忠魂祭，雨瀟瀟不歇。與淚飛揚。」詞中所說的「蒼天」，應該是為千萬萬在坦克和機槍下的烈士哭泣，「大地披霜」，即「大地飛霜」，據說戰國時代，燕惠王因聽信讒言，把忠臣鄒衍囚禁起來，鄒衍入獄時仰天大哭，當時正值夏天，竟然下起霜了，後人常用「六月飛霜」比喻冤獄。「六·四」當日，有多少人被迫克輟斃，機槍射殺，「六·四」之後，又有多少人被捕槍殺，或被無辜投入鐵窗，飽受摧殘。

徐炳忠的《碑文，從這裏寫起》寫的是一個只有十八歲的士兵在「六·四」事件中死去，這首詩只是在小標題中點明「為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英勇獻身的戰友而作」並未提及是怎麼「獻身」的，只是在詩句盡情歌頌他死得勇敢：「死亡很高傲很偉大，沒有足夠的膽量，走不進去」。還歌頌他為烈士：「……記得所有的先烈，就這樣無聲地死去，你的碑文是你的血，如四月一樣芬芳」。讀這首詩時，我注意的倒是這位士兵的年紀，他才十八歲，正如詩中所寫：「橙黃的八一銅扣，鎖住了十八歲所有的不安份／折疊重心的手／不再隨風飄搖」。中共當權者讓十八歲的士兵去鎮壓學運，結果是無辜死在街頭，可以想見他們的殘忍。儘管作者把這位士兵寫得多麼偉大，可是當他死時都不知怎麼死的，因為軍隊本來應該開到前線與敵人作戰，而今却是去對付自己的人民，他實在是死得不明不白啊。

墨寫的謊言與血寫的事實

文學一旦為共產黨的政治服務，就一定會變成謊言文學，因為共產黨的本質就是「說謊」。看看四十年來中共的紀錄就清楚了。在「六·四」事件中這一本質暴露得更為明顯。「六·四」事件的整個過程，人們可以在螢光屏中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共仍然敢撒謊天大謊，硬閉着眼睛承認殺人的事實，在他們舉辦的展覽中，似乎沒有一個平民在軍人的暴行中死去，所看到的反而是軍人紛紛被他們所謂的「暴徒」打死、吊死。上文所評論的兩首詩是如此。另外一篇題為《特殊戰鬥》的日記，更可以說是其登峰造極者。

這篇日記的內容是什麼呢？編者按語中有如下文字：「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中，戒嚴部隊廣大官兵用血肉之軀為共和國築起了新的長城，捍衛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六月四日到五日，正在協和醫院進修的北京軍區總醫院皮膚科醫生楊容姬，在三十多名戰士的生命受到暴徒嚴重威脅的關鍵時刻，冒著生命危險，挺身而出，門智鬥勇。在協和醫院的全力協助下，終於使他們安全轉移，展現了我軍文職幹部的風采。」上面所說的嚴重時刻指的是六月四日七時三十分開始的羣衆包圍協和醫院要他們交出二十九名解放軍傷員，最後終於安全轉移的時刻。

這篇作品是以日記的形式寫出，照按語所說，似乎是真人真事，但我對這一真人真事持懷疑態度，有不少疑點可以證明乃作者們虛構，因為一、其作者有四個，莫非是四人日記的拼湊？不可能，因而只能是四個人一起杜撰這一故事。二、日記所記的是六月四日七時三十分至六月五日十七時十五分之事，那時解放軍已經血洗天安門，事件已經結束，當日北京電視台的新聞廣播說：「約五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開始撤離，戒嚴部隊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到五時半，整個過程

結束。」事件結束後，羣衆早已被鎮壓下去，怎麼還可能去包圍協和醫院追殺傷兵？即使有，也一定被殘酷鎮壓，怎麼可能反而是軍人躲避、秘密轉移？三、如果真有這一起事件，陳希同在「平亂」報告中怎能不提？中共御用傳播媒介又豈能不對此起「反革命事件」置若罔聞？

日記是這樣開始的：「六月四日七時三十分，嘈雜的協和醫院門口，圍滿了一些歹徒和不明真相的羣衆，質問、謾罵和惡毒煽動的聲音震人耳膜：『把大兵交出來！誰窩藏傷兵就打死誰！』這裏有大兵，揪出來燒死他！」照作者的說法，原來這些士兵是凌晨兩點鐘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被一伙「暴徒」打傷，被羣衆救出送進協和醫院的。在這些描述中，完全抹煞了軍人駕着裝甲車、坦克車不顧民衆傷亡向天安門挺進清場、民衆憤而燒車並進行反擊的事實。《特殊戰鬥》對這種情況不可能不知道，那麼，誰是暴徒？誰是代表正義？應該是了如指掌，現在將「屠夫」說成「受害者」，而將「受害者」說成「暴徒」，豈非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本來民衆遭到醫院，要求交出兇手，給予應有的懲罰，但是「六·四」之後，強權在坦克和衝鋒槍的支持下，人們根本沒有可能去包圍醫院，即使有，也一定被戒嚴部隊所射殺，受傷的屠夫並不需要躲藏，因為那是他們就勢交鋒、慶祝勝利的時候。

文藝家處境悲慘

當前，中共的民心與軍心盡失，對民心，當權者認為只要武力鎮壓就行了。他們最擔心的是軍心，因為軍心在「六·四」事件中開始動搖，一方面軍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破碎了，另一方面在此一事中軍人對中共這一獨裁政權肯定產生信心危機。蔣文浩駕駛飛機台是一個信號，所以他們要想方設法，直至用墨寫的謊言來掩蓋血寫的事實。

「四人幫」倒台之後，十幾年來，說謊文學逐漸從文壇淡出，而今中共為了政治需要，這類東西又開始沉渣泛起。

曾經是最早發表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中國陰暗社會現實之作的《十月》文學雙月刊，如七九年第三期上的揭露中共高級將領憑藉特權姦淫婦女、殘害百姓的《飛天》，八一年第一期上的宣揚階級調和與宗教哲理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現在竟然淪為嗜血成性的當權者塗脂抹粉的先驅，為了迎合當權者，竟然前所未有地將歪曲事實的歌頌戒嚴部隊之作刊登在雜誌的扉頁之前，實在令文藝界蒙羞，顯然它是在北京當權派的脅迫之下才這麼做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文藝家的悲慘處境，能不令人為之一哭？！

《文藝報》被秋後算賬

壁華

學運期間表現積極，御用文人撰文指斥，從版面處理，到見報文章，俱成爲罪狀。
《文藝報》不但挨批，還要轉載兩篇批判文章，可見處於困境，有關人員難免被清算。

最近，中共頑固派及其御用文人開始對文藝報刊、文藝界人士和文章點名批判，秋後算賬，目標之一是在今年學運期間支持學運最力的《文藝報》。

圖文並茂支持學運

《文藝報》是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全國文聯機關報，在這次學運中表現積極。五月十九日晚，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宣佈對付「動亂」，翌日對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文藝報》在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十期，以接近全版的篇幅（除右下角有關中蘇作家會見的內容以外），刊登了支持學運的聲明和圖片。其中有全國文聯、中國作家協會、巴金、夏衍、冰心、艾蕪、錢鍾書等四十一人及上千名知識份子，向中共當權者發出希望他們立即與學生對話、解決危機的緊急呼籲和聲明。此外還刊登了一則五月十七日南京作家上街遊行聲援學生的消息。最引人注意的該報破天荒地在頭版顯著位置登載了四幅民運照片，計為《文藝報》和作家出版社記者、編輯及一些單位人員為絕食學生組織義捐、數千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以及五月十五日數萬名知識文化界人士走上街頭聲援學生，還有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人海。

在學運期間，《文藝報》以如此多的篇幅，圖文並茂地報導學運，支持學運，給中國的文藝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也是文藝家的光榮。

「減溫」還是「加溫」

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日報》刊登署名「七人」的《讀〈文藝報〉第二十期有感》一文，進行聲色俱厲的批判。文中云：最近幾年，一些文藝報刊，其中有些還是中央級的文藝報刊

的輿論導向問題，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越演越烈，越來越嚴重。在不久前發生在北京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期間，一些文藝報刊的錯誤輿論導向已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它們呼風喚雨，唯恐天下不亂得不够。

在這篇批判文章中，《文藝報》被選爲典型例子，目的是「殺一儆百」。它說：「這一期的頭版共刊登了十條文字消息，其中有九條新聞，都是在爲嚴峻的現實——政治動亂進一步加溫的，也可以說是在爲六月初的那場震驚中外的反革命暴亂作輿論準備。」並列舉了《中國作家協會緊急呼籲》爲例作說明。其實誰都知道，這次學運完全是中共內部的特權肆虐、官倒貪污橫行惹起的。指稱二十日見報的《作家協會緊急呼籲》是給「政治動亂」加溫，實是欲加之罪。只要憑良心說話，就可以看出《呼籲》是「減溫」：「我們懇切地希望黨和政府傾聽人民的呼聲，勇於自我批評，高度重視和理順廣大青年學生推動改革的憂國憂民之心。我們呼籲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拋棄成見，放下架子，以平等身份，走到學生中去……」如果當時李鵬政府能「放下架子」到學生中去說幾句自我批評的話，而不是咒罵惡煞地頒布戒嚴令，矛盾絕不會激化。至於六、四出動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平民，慘劇是誰一手造成，楊尚昆、李鵬應比《有感》一文的作者明白得多。血寫的事實，豈是惡寫的謊言所能抹煞。

深文周納，是非顛倒

七人的《有感》，不但顛倒黑白，無理指摘《文藝報》在學運過程中的行動，還狠批二十期上峻東寫的文章（該文揭露保守左派刊物《文藝理論與批評》在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擔任了極不光彩的打手角色）。《有感》一文對於這篇名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終結——重讀〈新春的反思〉》，進行了反撲（按《新春的反思》刊於《文藝理論與批評》八七年第二期，爲該刊編輯部的文章）。峻東一文從學術角度，指出《新春的反思》一文僵硬的

思維方式「破壞性」極強，給「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帶來恥辱」，「造成對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巨大阻力」。這篇文章只談及對一種「思維」，即一種分析問題的觀點和方法的評價。但七人的反撲卻深文周納，說《文藝報》編輯部特意在第三版「理論與爭鳴」一欄以頭條位置推出《終結》一文，並說「《文藝報》在風聲鶴唳的時刻，把他們精心設計和組織並悉心修改的這篇討伐文章拋出來，確實令人不寒而慄。」

與七人的文章相呼應，《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在該刊今年第五期上更明顯地指斥《終結》一文是「動亂中否定反自由化的叫囂相呼應」。（該文轉載於十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第四十三期《文藝報》）。文中云：峻東文章不遲不早，不前不後，恰恰發表在動亂急劇升級的今年五月下旬，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又說，今年四月學潮剛剛興起的時候，「高自聯」一伙人在「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請願書」中就提出了要徹底否定「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平反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份子。筆者讀峻東的文章，發現裏面並沒有直接抨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覺得在「文字獄」又興起的年代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此外，峻東的文章對文棍們的「上網線」表示了不滿，這也成了一條罪名，被扣上「否定階級鬥爭」、「爲資產階級自由化提供理論根據」這些嚇人的罪名。

你死我活的思維定勢

細閱峻東的《一種思維方式的終結》，發現作者不過是出於一種義憤，以及對某些思想僵化、依附日薄西山迴光反照的老年黨御用文人的痛恨。御用文人們把新的東西一律斥爲「錯誤思潮」，是「階級鬥爭」在「文藝領域的反映」，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峻東認爲這些人具有一種難以擺脫的幾十年來陳陳相因的思維模式，其特色爲反對一切獨立

思考，對開拓創新和具有建設性思維的人就目之爲自由化的推行者。他給這些人的思維模式定名為「你死我活的思維定勢」、「不證自明的思維結構」、「唯我獨尊的思維心態」，難怪御用文人要暴跳如雷了。

中共建國以來，一向奉行因人廢言的教條。因爲五月二十日《文藝報》還發表了劉賓雁的即將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美國這個謎》一書的「序言」，而劉賓雁又因同情學運而爲當權者所憎恨，於是刊登劉文也就成爲罪過。七人說：「在北京動亂期間，劉賓雁在美國造謠……不知道爲什麼《文藝報》對於像劉賓雁這樣一個被美國迷住的持不同政見者總是不能忘記，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心態呢？」其實，北京的當權者一貫將外界的報導斥爲謠言，而將自己戈培爾式的謊言一千次一萬次重複，要人們相信。而以揭露特權爲己任的劉賓雁，人們不能忘情於他是自然的事，又何止是《文藝報》的編輯呢？御用文人對劉賓雁無理辱罵，不許他的文字與中國人見面，正說明他們的虛弱，也說明當權派的虛弱。

從七人的文章透露出《文藝報》當前已成爲當權派「秋後算賬」的主要對象，他們不但對《文藝報》學運期間所爲不滿意，還對其在「六四」大屠殺之後遲遲不肯改變立場，緊跟當權者步伐表示憤怒。七人以君臨的姿態呼喝道：「《文藝報》是一張很有影響的報紙，它的錯誤的輿論導向在文藝界造成的不好影響也是很大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已經過去三個月，《文藝報》在版面上並沒有多少實質上的、新的變化，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他還指示《文藝報》要總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訓，用實際行動向讀者表明「確有改正錯誤」的決心。從《文藝報》近期一再轉載有關的批判文章，可見《文藝報》處於困境，與之有關的人員難免被清算的命運。

九十年代 198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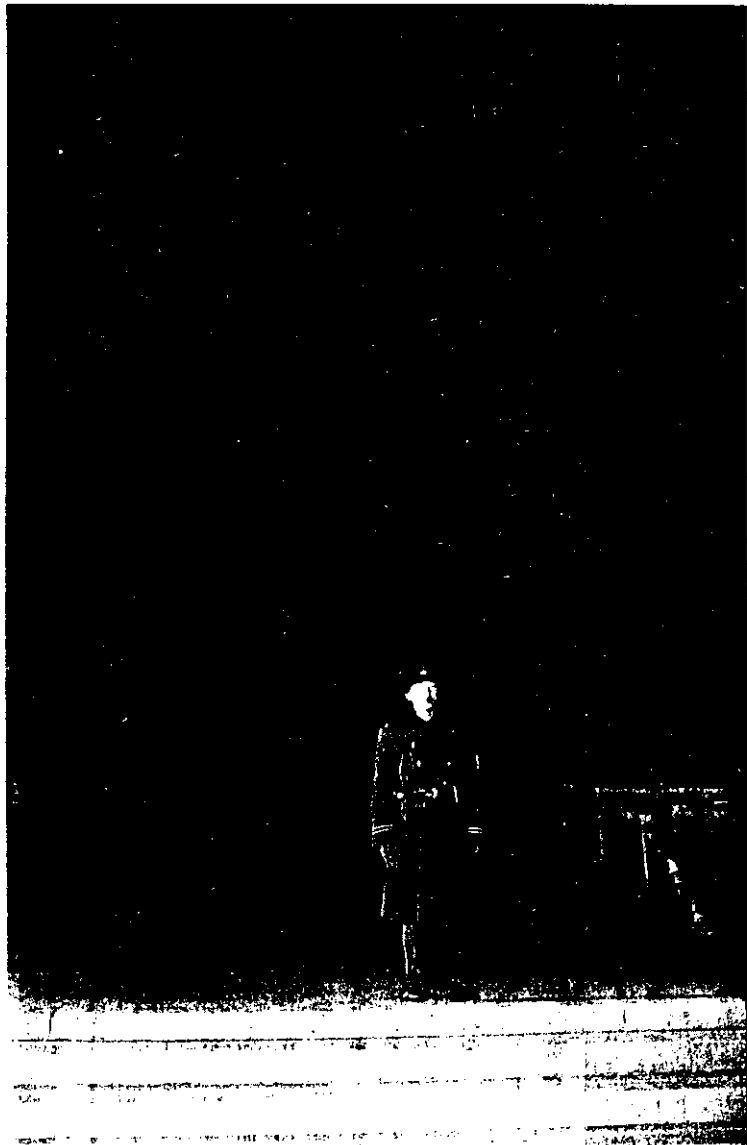
文化領域大整頓

在北京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撤銷戒嚴令的當天，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常委）李瑞環接見一批文化藝術界代表，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觀察家認為，這絕不是巧合，而是精心安排，意在表明中共

不但要解除有形的戒嚴，而且要解除無形的戒嚴，創造一個「民主、和諧、團結、奮進」的環境。不過，解嚴前後的事態發展，卻難以印證中共領導人的許諾。近期大陸報紙、文藝刊物紛紛遭受整頓，負責人員多被撤職，而文化部門及文藝界組織的領導層已全面改組，顯示北京當局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不僅未隨解嚴而放鬆，且進一步收緊。

在大陸文壇一片「吹風」中，一家以《中流》命名的文學刊物卻於本月問世，由文壇兩

解嚴後的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新聞、出版機構的「戒嚴」未解



位「左帥」林默涵和魏巍創辦。亞洲週刊得悉，這一刊物是在江澤民直接鼓勵下出版的。「六·四」事件之後，文壇一批左派作家如林默涵、劉白羽、姚雪垠、馬烽及魏巍等上書江澤民，說「目前最重要的文學雜誌都在右派手中，不在左派手中，一定要把陣地奪回來」，獲江澤民首肯。《中流》創刊號發表了林默涵批評電視片《河殤》作者蘇曉康的長文。

近月來，大陸文藝、新聞機構差不多進行了全面換班。據報，《人民日報》文藝部和《文藝報》的主管已告易人。原《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藍翎、副主任舒展已被免職，遺缺由原《求是》雜誌文藝部主任丁振海出掌，另由一名天津散文家和一名新華社記者出任副主任。而原《文藝報》主編謝永旺、副主編陳丹晨、鍾藝兵也由保守的文藝理論家陳涌及政治理論家鄭伯農所取代，實行雙主編制。另有消息說，大陸主要文學刊物《人民文學》雜誌的主編和副主編也將於本月遭撤職。

至目前為止，北京已全面收回文化大權。繼思想保守的賀敬之與林默涵分別接掌文化部及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文聯），廣播電影電視部處分原副部長謝文清之後，保守的蒙古族老作家瑪拉沁夫正式取代唐達成，出任大陸作家協會（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而作協主席則由小說家馬烽接手。由瑪拉沁夫、馬烽及鄭伯農組成的作協黨組，已成了保守派天下。一位大陸文學評論家獲悉瑪拉沁夫任此新職之後說：「他當常務書記，真要命。」作協在幹部考察工作組進駐後，又重新成立清查小組，組長為張偉，副組長為瑪拉沁夫。

文化界的另一個極為敏感領域——新聞出版部門，也颶起一片收風。亞洲週刊獲悉，國家新聞出版署決定於近期內撤銷、停辦、合併五百多份報刊和多家出版社，約佔總數的十分之

。即使獲准繼續營業或出刊的出版社和報刊，也難免

在人事組織和思想路線上遭到整頓。一位經銷大陸報刊的負責人表示：「我經手的刊物，共有三、四成已遭撤銷、整頓而命運未卜。」

去年八月開始，北京以「掃黃」為名，大舉向新聞出版業開刀。隨後，新聞出版署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的《關於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的通知》精神，對全大陸一千六百多家報紙、三千餘家期刊及五百多家出版社進行全面整頓。最近，該署再次要求所有的出版社重新登記，否則，按出版非法刊物查處，禁止營業。

學潮中的文化界人士：走回象牙塔？



亞洲周刊

至目前為止，已被迫停刊的刊物除作協屬下的《新觀察》、《散文世界》、《文學世界》、《中外文學》及《小說月刊》等五份刊物外，還有去年初推出的《思想家》、《新啟蒙》和《東方紀事》等思想開放的期刊。在被「封殺」的刊物中，影響較大的是《新觀察》。該刊因為詳盡報導去年北京學生運動而令當局不滿，成了第一批遭查處的刊物，主編戈揚剛巧在六月前出國，雜誌出事後流亡海外，現居美國。

另外，專門刊載反映社會問題文章的《報告文學》，從本月起停刊；在大陸頗為知名的《文匯月刊》也已停刊整頓。甚至官方喉舌《新華文摘》也受了批評，在停刊一期接受檢查後，才獲准復刊。一位大陸知識分子向亞洲週刊表示：「這些都是政治祭品。當局的政策很明顯，凡是能激起思想火花的刊物，都不能留。」

在遭到撤銷的出版社中，最引人注意的屬於正統地位的省級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海南人民出版社。據悉，湖南人民出版社因發行大陸知名異議分子、現任海外民運組織「民主中國陣線」主席嚴家其著作《我的思想自傳》，被指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受到處分。此外，文聯出版公司目前正遭停業檢查，其分支機構中外文化出版社已被撤銷。

銷。一位大陸出版業人士說：「領導層當初重用嚴家其，我們出版他的書卻要遭殃，這倒是誰的責任？」

文化收風也吹到對外開放的門戶廣東省。亞洲週刊獲悉，較早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南下廣東，認為該省的刊物太多，要求裁減三成。曾經被譽為「新聞改革先鋒」的《蛇口通訊報》終於難逃「劫數」，於去年底停刊。曾報導去年北京學生運動的《深圳商報》遭勒令檢查。

分析家認為，北京當局對文化領域採取控制措施，是要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再度擴散。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最近發表一篇措詞強硬的社論，強調必須從上到下清除意識形態有問題的黨員。該篇社論還揚言「對那些政治立場不堅定的人，那些政治品質不好，看風駛舵的人，不能提拔任用；仍然在領導崗位上的，要堅決撤換下來。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的，必須開除黨籍」。在北京看來，負責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是否「忠於馬克思主義」更加重要。

此外，北京國家教育委員會（教委）主任李鐵映上週在教委工作會議上說，今年教育戰線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並強調「要始終堅持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

在這低氣壓下，不少知識分子都出現消極情緒。「六·四」事件

後萌生倦怠的前文化部長王蒙說：「鄧小平和知識分子的蜜月已經過去。」另一位大陸知識分子也表示：「學術界人士已經重新回到象牙塔之中。」但《新觀察》前主編戈揚對亞洲週刊說：「儘管大多數大陸知識分子於當前政策下鴉雀無聲，但是，他們沒閉着，在認真思考，現在看的比任何時候都清楚。」

但在收緊文化「框框」的同時，北京公安部發言人上週宣布，五百七十三名曾參與去年北京學運的人士，「經教育後」已經釋放。觀察家認為，這是配合解除戒嚴的另一種姿態，希望對內對外起到緩



戈揚

作家戈揚：主編的刊物遭禁

和作用。

北京在對外關係方面更吹起「暖風」。國務委員、新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鄭家華上週訪問日本。他是「六·四」事件後訪問日本的首位北京高層官員。觀察家說，鄭此行一方面是緩和「六·四」事件後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也希望爭取日本的經濟支持，以紓解大陸的經濟困難。

北京文壇 百花凋零

324

胡文荻

去年六四風波後，中共當局對幾大「重點災區」包括中央文化部、中國文聯和中國社科院以及這些單位所屬的「事業單位」如雜誌社、出版社等，進行大清查、大整肅、大改組，造成文壇百花凋謝、一片殺氣……

去年六四以後，北京文壇呈現全面死寂，一片殺氣。北京的文藝領導機構進行着重點清查和大改組。中共當局公開明文的幾大「重點災區」(即認為是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影響最嚴重，產生大量改革派精英的地區和單位)中有中央文化部、中國文聯(其中特別是「作協」和「劇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這些單位所屬的「事業單位」，如雜誌社、出版社等等。對這些機構的清理和有關人士被整肅的情況，筆者根據可靠的消息，向讀者一一報導。

王震力保賀敬之當部長

去年春夏之交，王震被中共當局扣上兩大「罪狀」，一是此公小病大養，住在北京醫院的高幹病房裏堅決不肯去「慰問或嚴部隊」，二是他臥在病床上提起生花之筆和李鵬罵的紅人北京市的陳希同、李錫銘打官司，為文化部和一批文化人辯解，對文化部系統的幹部「支持暴亂」矢口否認，被某些僵硬派大員斥為「抗拒清查」。其實，就在去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辭世之際，王震就把部長大印交給高占祥副部長，委託他總攬全部工作，代行行政了。這原因有人認為是王震知道高占祥出身好，「根紅苗正」，上面的元老們對他印象不惡，所以，把部長大權交給這位工人出身的「散文家」，顯然相當穩妥。李瑞環上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晉京上任前曾向中南海具有權威的元老派人士推薦中年小說家、在文藝界人稱「大馮」(此人身高一米八二，是位十足的籃球運動員坯子，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天津文聯主席兼作協領導)的馮驥才接替王震出任中央文化部長。當時，也有幾位一向欣賞李瑞環才幹的「中顧委常委」之類的老人，對此加以支持。但是，李瑞環的推薦「大馮」，終究敵不過王震對賀敬之的大力保舉。最後，還是讓有連「幹部年輕化」的賀敬之再次粉墨登場，並且官升一級。據說，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等人，還曾為此事和王震大吵一番。萬里的理由之一是賀詩人目前還擔任人大常委職務，而作為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的成員，按照規定不能再兼任國家政府領導。因此，萬里曾親自通知人大常委會通過常務會議免去賀敬之的常委。可是有人說，很可能是賀敬之嫌給他的部長頭銜前面還多一個「代」字，為了抗議此事，還特意致函人大常委會請求保留其常委頭銜。自然此事理所當然地被萬里「依法」否決掉了。最令入感到啼笑皆非的是王震被免職後，法國文化部曾邀請其赴歐療養，「上面」未予考慮。根據當局的硬性規定，在清查工作尚未告一段落以前，中止幹部調動。王震只好「隨傳隨到」，跟著一批司、局級的幹部一同「學習文件」、「反思檢查」如儀。

文聯吳祖強遭貶壓

至於中國文聯，則情況更加可笑了。中國文聯是統領全國十一家文藝性協會的「文學藝術界」最高機構，「文革」浩劫前是以已故中共文學理論家周揚為主席的大機構，在去年六四以前，早已由年紀較小的吳祖強擔任黨組書記，清理了一批左派人士，執行胡、趙推行的開放改革，開明寬容的文藝政策。當文藝界的另一位「四條漢子」中的夏衍臨時主政時，當時正是左派戲劇理論家趙尋在文聯領導班子裏「孤軍奮戰」大反其「自由化」的兩派鬥爭日趨激烈之際，終於在夏、吳兩代領導人的努力下，一舉把這位當時殘存在中國文聯黨組內的左派大將趕出領導班子。但是，自從一九八七年初，吳祖強的胞兄吳祖光因犯有「自由化錯誤」，被胡喬木親自勒令退黨以後，就有左派人士向垂簾聽政的元老們告發這位作曲家出身的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包庇乃兄，不時為乃兄通風報信。而這位黨組書記本人又在關鍵時刻犯了「嚴重政治錯誤」

。據傳他在李鵬宣佈「北京部份地區戒嚴」前後，曾經親自起草一封公開信，內容相當激烈，既反對李鵬，又批判《人民日報》那篇著名的「四·二六」社論，信中歌頌「高自聯」之類的熱情語言比比皆是。這封公開信，聽說已由吳祖強徵集了三、四十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簽發聯署，終於因為戒嚴令下，各報均被管制，未能公開見報。但是，吳祖強僅為此事早已陷入「吃不了兜着走」的狼狽處境。知情人相告，不久前吳祖強的「人事關係」已轉回他原來任院長的中央音樂學院，並且成為一名無職又無權的「離休幹部」了。傳說趙尋還要給他黨紀處分云云。

新任的中國文聯領導班子則以老牌左派文藝評



圖為吳祖強(右五)、夏衍(右四)和林聯渝(右一)

論家林默涵擔任黨組書記，但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書記兼中國文聯秘書長則是那位靠歌頌朝鮮戰場上的「最可愛的人」起家的中年小說家孟偉哉。說起孟



王蒙(右)和劉賓雁都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現劉已被迫流亡海外，王亦難逃劫數。

偉哉，此人倒有一段頗不平凡的發跡史。原來他當年只不過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普通小說編輯，因為迎合思想很有新潮傾向的社長兼老總、老一輩兒童文學家嚴文井，受到嚴的器重，於是先被任命為被大陸文藝界譽為文藝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當代》主編，隨後又晉升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期刊部主任、副社長，後來又升為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讓一部份中層幹部「掛職下放」邊遠省份鍛煉，這位孟大主編主動去青海省擔任中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局局長，三年後離開西寧市。「此間駱駝」苦度一千日的收穫不小，當孟偉哉捲土重來時，竟然一躍而進入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文藝局局長，在主張「三寬」，作風開明的前部長朱厚澤垮台後，孟便成了王忍之的得力助手，在公認的八七年大陸文藝界左派代表人物大集會的「涿州會議」，孟偉哉是最賣力氣的骨幹份子之一。他成為一任短命的中宣部文藝局局長，自然也與「涿州會議」很有關係。如今此人手裏抓住中國文聯的大權，其下一步的矛頭指向及所作所為，自然不難想像了。

作協領導層大換班

作為屬於「文聯系統」，但又在行政檔次上和文聯同一級別的中國作協協會這個「重災區」，清查鬥爭尤為嚴峻，原來以唐達成為首的書記處幾乎全軍覆沒。中國「作協」的機關報，四大主編(正副)中則僅留用二人，謝永旺與陳丹晨則作為「問題未弄清楚」的人物掛在那裏，不予「解脫」。現在的中國作協黨組共五人，順序為馬烽、馬拉沁夫、鄭伯農、嚴維熙、東沛德。前二人為正副書記，因此在去年十二月正式宣佈這個新陣容時，人們戲稱「作協」的左派班子為「二馬拉車」，「馬年起用二馬」。提起老馬馬烽，文學界老資格人士都知

道，此人乃文壇著名的山西幫「山樂派」為首人物，曾與已故的趙樹理「爭風奪寵」，失利後和他的另一位「山樂派」搭檔孫謙因守太原城，長期不多露面，如今總算是時來運轉，可以在其晚年大「露鋒鏢」了。另外一匹比較年輕的馬則屬「蒙古馬」，左得相當有後勁。原來馬拉沁夫是位少數民族小說家，此人最初在呼和浩特工作，思想很正統，但也不屬於陰險奸妄之輩，後來在唐達成、王蒙掌權時，作為少數民族作家「結合」起來，漸漸看到左右兩大派之爭，大有油水好撈，這才漸漸由左右逢源，演變到向左右派人士靠攏，致有今天的高位。

至於說中國作協的兩大刊物，《文藝報》和《人民文學》則不僅屬於「犯錯誤」的「重災區」，還有歷史上的「不純」問題，因此除去將前者主編謝永旺、後者的主編劉心武罷官革職外，特意換上一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左派，採用「雙主編制」，如《文藝報》由陳涌（即與劉再復長期論戰的那位文藝思想論家）、鄭伯農（左派文藝評論家）主編，《人民文學》則由劉白羽（軍內文藝左派首腦，傳記文學家）、馬烽擔任主編，一則在編務中肅清流毒，二則也可以在「把關」的同時，組織左派佳作使二刊「面貌一新」。至於叢雜黑這位「大左派」的始作俑者沒有提，反而有升一級，由作家出版社社長而進入中國作協書記處。據說他原來和劉心武很「莫逆」，可是後來他發現劉氏在馬建問題（反映藏民生活小說的一場風波中「立場不穩」，加之在去年五月的天安門風波中劉心武和他的鄰居兼好友劉再復關係過密，早已被當權者視為異端，於是就把這位「好朋友」當作自己升官的「墊腳石」，平步青雲了。

艾青被指「支持動亂」

從目前北京被「掛起」的卅餘名知名人士中也可看出一些問題來。比如說，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在延安生活過，跟隨中共一同進入北京的國際聞名大詩人艾青也被列入「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支持動亂」的黑名单，不予「解脫」。據接近這位八旬高齡老詩人的朋友說，在八九民運中出於對民主的渴求以及對於愛國青年的愛護之情，艾青曾經向投身「民運」的大學生捐了款（可能只有一兩千元），而且親自乘坐輪船去天安門慰問過絕食學生，其中一次，艾老剛好和冰心大姐在天安門前不期而遇，那時絕食鬥爭已經進入第四天，有個別大學生因體弱不支而昏迷休克被送去醫院急救，二老心情沉重，幾句話說過後艾老放聲大哭，也引得謝冰心老人淚流滿面。這自然成為王忍之、賀敬之等強硬派領導打擊的當然對象。至於被「掛起」的名人、作家中，還有馮牧、劉心武、邵燕祥、張賢亮等人且不去談他，甚至連德高望重、黨齡極長的夏衍、張



艾青名列黑名单

光年、陳荒煤這類老幹部也列進了清查名單。顯然除去巴老（金）和冰心老人屬「中央保護對象」外，其他都不加考慮，一律用左派尺度去加以衡量了。有消息說，王震一向支持艾青，可是這次也愛莫能助了。

還有一個使人感到有些意外的傳說，就是說中宣部、文化部目前的領導準備點名批判八位（一說十名）著名作家，第一個就是王蒙，打算拿他的長篇小說、得意作品《活動變人形》以及另一篇被視為「諷刺、影射老人政治」的短篇小說來開刀。至於大揭「反右」的殘酷鬥爭，整肅老九，後來又熱衷於大搞性文學的張賢亮則更屬勢必揪出來示眾之範圍了。據說劉再復的文藝理論、馮牧的文學評論以及劉心武的小說，更是典型「靶子」了。

大批文藝刊物被查封

關於左派戲劇理論家趙尋將以「還鄉團團長」的身份重回「劇協」去「收復失地」的情況，就更加奧妙離奇了。照趙尋的思路與邏輯，目前正等待下野的中國劇協書記處有三人堪稱典型，一是劉厚生，他是上海的一名老地下黨員，一向同情「自由化」，思想上有其開明、開放的一面（如數次派應屬「影協」系統的黃宗江代表「劇協」出使美國即是一例，在文藝界左派眼裏，起碼黃教授不屬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那一種人），可以將劉列入「黑後台」之類拉下馬來。二是張穎大姐，此人原是周恩來在重慶與KMT鬥爭時期的秘書，與國統區文化人極為熟悉，後來作為章文晉駐美時期的大使夫人，在華盛頓生活過幾年。自她實際主持劇協以來，一方面重用另一位書記王正（老右派），一面「在客觀上」支持了《車站》、《WM》、《魔方》之類被胡喬木、鄧力群等視為「異端」的劇目。此種書記其「政治錯誤」已遠較劉厚生嚴重，必須拉下馬來「示眾」，以儆效尤不可，更應加以打擊懲治的自然是把一批「自由化」劇作家、評論家集於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的王正書記。別的不談，此

公雖在北大荒鍛煉有年，然而「右」習不改，他能出面糾集北京的八家話劇院、團（內含部隊文藝團體）的人馬，以「學會」進行「試驗」、「探索」的名義公開在首都公演已被「空政」、「總政」內部宣告「槍斃」的《WM（我們）》（據悉，此劇作者王培公已於去年六月間被捕，仍在北京秦城關押「待決」），並為此事向駐京外國記者「答問」一事，即可斷言其「大搞自由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有消息說，目前趙尋已經改組了機關刊物《中國戲劇》（原《戲劇報》），把原主編游默撤換，以較左的戲曲評論家都大壽取代。趙尋奪回「劇協」地盤，王正處境自然會十分狼狽，但革命資歷如張穎者，恐怕亦難保原有地位。有人說，劉厚生的「名份」可會保下來，原因是此比較軟弱，加之又是田漢時期的「老臣」，具有一定的影響。

此間不少人有議論，在六四以後處於中國文聯系統的各協會機關報刊，包括《中國音樂報》、《中國美術報》等在內，共有十餘家之多，目前都由於抓「天安門事件錯誤支持（或表態）」的小辯子，紛紛宣佈停刊撤銷，目前除下「作協」的《文藝報》徹底改組以外，只留下了一家天曉得怎麼會不登一張天安門廣場羣眾示威遊行照片的《中國攝影報》（屬於中國攝影家協會主辦）至今安然無恙。至於一向刊登揭露陰謀較多的《報告文學》，現已宣告終止正報。此則是《人民日報》的一批開明派從當年批白樺、斥《苦戀》的左派報告文學家黃鋼奪過來的，原名《時代的報告》，劉賓雁的女兒劉小雁即在這家刊物的編輯部。上海由梅朵主編（現已因年齡為予以撤換）的《文匯月刊》和北京知識界的必讀月刊《讀書》（原來由陳原、馮亦代主編），則在突然要改變其左派面貌的胡喬木說情之後，前者改為《試辦半年》，以觀後效（上海文化界稱此決定為「死緩半年」的文明判決），後者則一面改組編輯部，一面清理作者隊伍，不准其再發表宣傳伏爾泰、凱恩斯、弗洛伊德和介紹昆德拉、馬爾克斯的文章。

文壇的一片肅殺之氣

上海去年初夏上街遊行，並且走在示威隊伍前面的四位作家，以年齡順序是王若望、黃宗英、白樺、沙葉新（李小林代表乃父已金出場，此處從略），他（她）們都在胸前佩帶大書本人姓名、頭銜。目前已知，王若望七月間被公安局宣佈「監視居住」，可是不知何故，還不到兩個月就改為「拘留審查」，在一個深夜被將官裏去了。黃宗英目前在廣州住院治療其「六種疾病」，不僅在政治上備受歧視，在經濟上更是慘遭打擊。有人說這位老太太（她已六十五歲）近來過不單行，的確一點也不假

的。先是她在深圳蛇口創辦的都樂文娛有限公司宣告破產，繼而在去年九月間，周傳雄控告這位養母「宗英媽媽」侵佔其母「周駿遺產」的民事訴訟中，黃又宣告敗訴，應賠償周傳雄人民幣八萬餘元。目前只是因為黃本人不服而進行上訴。有人說，黃宗英之所以遭此慘敗，顯然有其政治因素。白樺雖被批判，但是輕描淡寫。目前他正在寫一大型歷史電影劇（由深圳、廣西製片廠等合作拍攝）《西楚霸王》，狀態逍遙自得。有人問他何以會成為一條「漏網之魚」，他則笑答曰：「恐怕是當權者，把我當作一個寬大的典型吧？」沙葉新，身為上海「人藝」劇院院長則在反省、檢討，痛哭流涕之後，未加處分，仍留原職。足見上海的黨政當局的懷柔政策遠比北京要強得多。

大陸的文藝報刊根本無佳作出現。給人以一種百花凋謝，「白茫茫大地一片白」的感覺。目前的文藝領導班子除去組織低檔的「大批判文章」以外，根本就約不到好稿。再說，稍有一點骨氣的作家都閉門「思過」，對新當政者表示「不合作」。妙的是對李瑞環這位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與指示，採取了陽奉陰違不予執行的中宣部長、文化部長甚至《人民日報》新首長高狄，竟然在一次會議上（李瑞環不在場）公然揚言：「寧肯讓文壇一片荒蕪，萬馬齊喑，也不許資產階級自由化復活！」這種口吻和語氣，人們又何等熟悉？當年「四人幫」曾經大聲高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兩者相較，又何相似乃爾！歷史的重復，不能不令人為之驚訝心悸。但，當人們想到下一次的「歷史地重復」，豈不是又能得到一次心理上的寬慰與快慰嗎？



冰心與丈夫吳文藻

專題：六四後的大陸文藝界

大陸文壇已進入了冬眠。

我們很難想像，經過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大陸文壇再會連連一場直逼文革的大災難：

幾乎所有良知沒有泯滅的文化人，都接連了八九民運；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陷入了心靈掙扎，無一可以倖免；比文革更令世人震動的，是一場歷時超過半年的大逃亡潮還在繼續……

在這場大災難中，捲入最深的是數以百計的作家們，他們在整整一年中，雖然沒有留下驚世之作，但卻寫下了文學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頁。

這個專題包括四篇文章，太史雲的《六四前後的大陸作家們》，是一篇全景式鳥瞰一九八九年大陸文壇的力作，其餘三篇，也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對大陸文學界、知識界作具體的報導分析。

全景報導與分析

六四前後的大陸作家們

·太史雲

天下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大陸作家們的筆與紙、腦袋與舌頭、生命與熱血，都深深地捲進這個大時代的漩渦裏。或許，他們靈魂的痛楚、理想的掙扎，恰恰譜寫了文學史上無字的一頁。誠是悲壯，亦為劫數。

一九八九的大陸文學，本不是一個喧嘩的年頭。十年前決堤而出的大潮，奔湧至今，已化為流量頗大而支流極多的長川。往昔先鋒人物旗幟所指，文壇新銳們蜂擁而上，踏平一個又一個禁區的激動不寧的景象，已不復見。各抱宗旨的作家潛心雕琢自己的作品，不再囂聚於某個文學旗號之下，這未嘗不是一種自信的表現。然而，流年不利，暮春時節，驚雷雷動。天下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大陸作家們的筆與紙、腦袋與舌頭、生命與熱血，都深深地捲進這個大時代的漩渦裏。或許，他們靈魂的痛楚、理想的掙扎，恰恰譜寫了文學史上無字的一頁。誠是悲壯，亦為劫數。

蘇曉康一派的入世精神

一九八九年年頭，文壇尚未湧現代表此年度特徵的力作，基本上是八八年浪潮的延續。

而去歲勢頭強勁的則是紀實性報告文學和「後現代派」小說。前者是以蘇曉康、麥天樞、趙瑜、賈魯生、錢鋼等一羣富於救世熱忱的距離離透視生活的作家為代表。尤其是蘇曉康，冒頭伊始即銳氣逼人。《神聖憂思錄》、《洪荒啟示錄》、《烏托邦祭》無一不是震聾發聵之作。直至《河殤》推出，更是舉世矚目。此後的波瀾起伏，蘇在《文匯月刊》八九年第五期撰文披露，矛頭直指王震及一小撮老人黨。最耐人尋味的是，蘇曉康在此文中追述電視片《五四運動》流產過程時，抒發了「傷懷吊古」式的感慨。他指出「五四」的思想啟蒙者們大都贊成五月四日青年走上街頭的行動。如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攔截和懇請學生勿採取遊行示威的激烈方式，而應「讀書濟世」，以科學理性去喚醒國民的精神。這和那時另一青年導師胡適的主張不謀而合。蘇曉康認為，歷史證明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果然未能完成其初衷目標。事實上，踏實地啟蒙與傳播民主科學的新思想，要比呼風喚雨地搞羣眾運動要有意義得多。

無論蘇曉康及其《河殤》派戰友是否真的深信這個結論，剛撰寫完此文，他們就面臨着和七十年前同樣嚴峻的抉擇。學運狂瀾席捲整座北京城，無疑，思想啟蒙者也包括了蘇曉康這一批勇於批判社會現實，針砭時弊的作家在

內。大時代洪濤迭起，他們打算作七十年的蔡元培嗎？富於戲劇性的歷史場面重演，令這批有志於「學者化」的作家們產生了急遽的精神變遷。

的確，起初他們如蔡元培般規勸過學生，呼籲理性與妥協，敦促政府對話，基本是充當斡旋者角色。然當局冷酷而殘暴的嘴臉，令他們幡然猛悟這個角色實屬可笑。於是義無反顧地投身民運怒潮中，與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權徹底決裂。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不再回到七十年前陳舊的起點上。

國家興亡夢，英雄勝敗心。以蘇曉康為代表的這批報告文學作家，正因其關注的焦點是社會的炎症。本着積極的入世精神，故在八九民運中大都介入頗深。「六四」後被清算打擊也至為慘重。通緝、被捕、流亡者比例最高，多種報告文學刊物被查禁停刊，《東方紀事》、《海南紀實》、《金島紀實》、《紀實文學》等均被禁。《百花洲》上長篇報告文學《烏托邦祭》的責任編輯洪某竟噤若下獄。對文壇震動最大的是全國性重量級刊物《文匯月刊》居然被勒令停刊。

顯然，曾一度繁花似錦的紀實文學園地已深埋於劫灰之下，難再復甦了。

後現代派深刻的悲觀主義

近年有一批年輕人悄然步入文壇。所謂「悄然」正因為他們的作品並非以大喊大叫的方式面世，從無「轟動效應」。他們企圖將小說蒸餾成純之又純的藝術。他們嫌時代背景、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的「淡化」還遠不夠。不是「淡」不「淡」的問題，而是根本不需要。

要的是將現代小說與傳統小說的「背景、人物、情節」三元素徹底脫鉤。這類被稱為「後現代派」的作品以及作家陣容，都在一九八八年達到鼎盛時期。以余華、葉靈、格非、劉恒、葉曙明、馬原等為代表的一羣，如同西方現代派的先行者一樣，有著憤世嫉俗的思想傾向，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讀者的多寡，藝術形式極盡奇詭冷僻，驚世駭俗，頗具形而上的氛圍。這類小說到八九年初仍未艾，及至中國篇小說《紅河》（一九八九《收穫》第二期，作者熊止其）達到了極致。這篇小說完全剝離了時代背景、故事情節及人物完整的性格，卻以工筆細緻地渲染每一個獨立的局部細節，有奇瑰斑斕的色彩感。通篇讀畢，似摸不清頭緒，卻具一種內在的整體感，即使不知所云，仍不得不承認它有攝人的力量。

這孤憤而孤傲的一羣，並不掩飾他們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冷漠。他們自稱「深刻的悲觀主義者」，深刻到了不屑於關注時事，而只把視線投射到中國文化出路及人類命運等終極問題。必須承認，他們的作品對傳統觀念及舊文化的批判，有時達到相當的深度。他們的讀者圈雖狹窄，但一入此圈，必是傳統文化的叛逆者。或許，這也是思想啟蒙的一個側翼。然而，對社會現實的漠視和「深刻的悲觀」，難免影響到他們作為「現實人」的行為準則，為純粹藝術的殉道精神通常不易轉化為對時代性大事件的救世激情。無怪乎，這一羣「後現代派」大都未曾投身八九民運大潮。他們誠然有很鮮明的愛憎，表現形式則一如其作品，乃是一種憤世嫉俗，一種超乎其上的精神自拯。或許，這會更深化他們筆端的悲劇色彩。

但是，被漠視的現實終究要找他們麻煩的。文壇肅殺如斯，還有幾多空間給這類「先鋒小說」生存發展，實屬疑問。文壇上落拓已久的一羣「青紅幫」捲土重來，先忙於以組織上一清除異己，收復失地，然後才有暇作創作思想的整肅。到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看來，這類才氣逼人的奇詭之作只能是曇花一現。

林默涵、劉白羽、魏巍、李希凡、瑪拉沁夫等公重出江湖，便「磨刀霍霍向豬羊」。只不過，這篇「豬羊」並非安全部發誓要追捕歸案的逃亡作家，而是十年間逐一失守的文壇要塞的統帥。

他們眼中「竊踞」最高位的當然是文化部長王蒙。八九年初，最高層已決定作協、文聯及各大大文藝家協會脫離中宣部，劃歸文化部統管。對「左王」們來說，這意味着文藝戰綫全面失控。作爲負隅頑抗的一尊橫炮，魏巍在《文藝報》遽然發難，猛烈批判「陽雨」（王蒙筆名）的一篇文學評論，謂通篇不提馬克思及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欲將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引向何方？對這「反自由化」以來少見的橫筆文章，王蒙無意答辯。

大陸文學圈內無論喜不喜歡王蒙的爲人，都不可否認這位縱橫文壇數十年的健將，屢經大苦大難的磨練，已對社會人生有着深刻的悟解，並表現爲他通達超脫的哲學智慧，辛辣尖刻的語言文筆，無疑是一位最具原創力的天才作家。其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對「黃醬」

鐵的中國人有着教人不忍卒讀的深刻描繪。然而，作為寫而優則仕的最高作家官宦，在激變關頭，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作家的形象與良知。民運風潮裏，衆多同行拭目以待，唯恐部長先生逆忤民意，去表態擁護戒嚴甚至鎮壓。而王蒙當其時正處於一個尷尬地位，他五月廿八日才出訪歸來，北京已然危城告急。正負雙方的壓力紛至沓來。在此關口，他那圓熟的處世機謀再次導他擺脫困境，即時染恙入院，屠城之夜在高幹病房聽得滿城槍聲，不知他作何感想？無論怎樣，王蒙是唯一的未去「慰問」戒嚴部隊的政府部長，並在「六四」後未久便「封金掛印」，辭去官爵，還其作家真身了。

王蒙這輩「右派」作家，其實劫數化解後大都「修得成果」，成了文藝官員。他們之間的思想距離已不能算很近，如鄭友梅，已滲透為官之道，樂也融融，偶而玩錢篇「京味小

說」，也有票友喝采捧場。所幸天良未泯，

「一六四」前後雖無善行，亦無劣迹。官或可保，京味小說也可玩下去。不過，若作協江山易幟，鄧府門前車馬亦會稀落的。至於「過關神童」劉紹棠，「清污」與「反自由化」都曾落力表演，蹦上前台指點江山，惜無斬獲，無功而退。眼看這回昔時的仇家紛紛落難，未始不是施展拳腳的天賜良機，然劉紹棠迄今仍保持沉默，顯見得當局縱兵行凶，殺人於市，血濺五步的殘暴行徑已超越了劉紹棠良心的底綫。

「反左鬥爭」不屈不撓的控訴者。八九年他發表的《背綫行》、《走向混沌》，其實是年前劉賓雁發起的紀念「反右」卅周年的徵文。後來形勢有變，徵文流產，戴維熙仍設法拋出這血淚篇。及至民運期間，他掌管的作家出版社頻頻舉旗上街，曝光之多，已危及他的地位。戴維熙縱有懼意，卻也無愧於心，沉默一陣也能。

毫無疑問，這一輩作家恰逢盛年，遭此變故，唯有自甘寂寞。這亦係他們創傷累累的靈魂又一次背縛苦行，走向混沌。

十年前，大陸文壇當出成批一時俊傑。他們筆耕不倦，著作甚豐，就年齡而言，已完成了由青年到中年的過渡。正好成了現今文壇的主力軍。儘管「反自由化」以來，這幫風華正茂的作家尚未回復最佳狀態，進入一九八九年，也應見到消沉之後的力作了。惜乎時值凶年，即便才情文思如大海潮生，亦難拒「高天滾滾寒流急」，於是相繼進入「冬眠」。

劉心武上回險被拿來「祭刀」，對《人民

寫一本大部頭作品，殊不知驚濤乍起，他本人與整個《人民文學》編輯部頗為投入，長安街上，他們的旗幟漫捲西風，頭頭的總是這位主編大人，他還與劉再復一道向海外傳媒發表譴責當局不仁行徑的講話。正是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然民心似鐵，終擋不住槍炮坦克。「六四」後，劉與友人匆匆離京南下，及至劉返京，作協已入駐工作組，實行「幹部審查」。劉上一次僅以身免，卻逃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此番定然無倖。看來，這位「傷痕文學之父」唯有以沉默作抗爭了。

名門閨秀王安憶，被譽為大陸最具才華的

女作家。她全憑一片天籟，小說寫得細微流暢，又全無濫情主義的脂粉味。自《小鮑莊》與《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以來，她幾乎每篇新作都力感文壇。一九八九年初，她再推出力作《崗上的世紀》（《鐘山》八九年第一期），描寫一女知青返城無計，徬徨之餘不惜以「性」這古老的

自拔。人性的迷亂與掙扎，生命本體的衝動，靈魂沉積的污穢和釋放出來的瞬間瑰麗，都構成了難以言喻的混沌之美。王安憶創作之高質高產，每每令同行困惑而欽羨。然這位才思奔湧的女作家「六四」夜如遭「電休克」，思維都迸裂成不可拾綴的碎片。王安憶其時趕到北京，將和劉再復聯袂飛新加坡，屠城夜恰在木樨地訪友，眼觀滿街血肉橫飛，實為她易感的心靈所無法承受。次日滿城槍聲，軍人光天化日追殺平民，王安憶無法亦無意前往機場，竟如難民一般輾轉通縣、天津「逃」返上海。在小說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宿。加之她曾在上海參與遊行示威，近期「掃黃」又禁了她好幾本書，故處境越加艱難困厄。她之歸於沉寂，已成定數。

八九年初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為劉再復立傳的文壇怪傑祖慰，毫不留情地直斥「文霸」姚雪垠，為劉再復仗義執言。此外，詩人徐剛亦在《人民文學》八九年第六期上推出報告文學《沉淪的國土》，筆力凝重非常，為鬱而終的胡耀邦招魂，並對四五月北京學生運動喊出如警世鐘般的鏗鏘之語：「倘若你們沉默，中國將無聲！」然而，這三位作家（包括祖慰所寫的劉再復）都因深深介入民運，在其後的恐怖浪潮裏逃亡海外。

至於另一位南方作家孔捷生，八九年剛連續推出他的中短篇小說新作。饒有深意的是，他的兩篇象徵主義筆法的短篇《北京馬拉松》與《開往大亞灣的慢車》恰恰成了八九民運非壯結局的注腳。而中篇小說《黑白之道》（《花城》雙月刊八九年第五期，十月出版）結構煞費苦心，上篇致力於對中國文化的反省批判，下篇則以直筆曲筆對大陸政權四十年對人性、人權的扭曲摧殘作出憤憤然的控訴。通

篇讀罷，頓然覺悟四十年來家國，原是一個冗長的惡夢。這或許是孔捷生在大陸文壇的「絕筆」，因小說面世時，孔已失蹤。據知，他因

及廣東，他即亡命天涯，遁去無踪。

連同流亡在外的蘇曉康、北島、老鬼、老木、多多，以及被當局追捕逮捕的劉曉波、鄭義、趙瑜、柯雲路、戴晴等。大陸文壇大批精英已星流雲散。剩下的中青年作家則三緘其口，封筆罷寫。聞說各大刊物根本無法約稿，編輯們干脆聽之任之，隨便揀初學者習作來充數。這是大陸文壇的冰河期。

大陸作家羣紛紛進入冬眠蟄伏的同時，海外卻醞釀着好幾起大動作。

劉賓雁最先提出動議，謂現時中國作家協會已有一百多個著名骨幹作家散佈海外，完全可以成立一個「海外大陸流亡作家協會」。歷數歐美各地，果然英才濟濟。計有阿城、古華、張潔、李陀、戈陽、蘇憶、小楂（查建英）、王兆軍、江河、石濤、嚴力、貝嶺等在美加；蘇曉康、北島、張辛欣、高行健、亞丁、徐剛、祖慰、老鬼、老木、多多、戴厚英、劉西鴻、劉索拉、遇羅錦在歐洲；顧城、楊煉在新西蘭。算來大都是中國作協會員及理事，其中不少是地方分會的副主席。倘由中國作協副主席劉賓雁擔綱，成立一個「體制外」的作協已足夠陣容鼎盛。

其後從歐洲及北美同時傳來訊息，蘇聯康、遠志明、老木等將創辦一份不隸屬任何政治組織的《黎明》，名爲綜合性刊物，實質文學將佔去相當多的園地。而美國方面，亦將創辦文學刊物《流亡》，並已成立了一個「中國流亡作家聯盟」。從陣容看去，《流亡》的同仁絕大多數系詩人，《黎明》的基幹人馬則是多面手。相信後者號召力及影響力會更大。

北望神州，冰封千里。板結的土壤將窒息文學藝術一切自由的萌芽。身歷慘變的作家，倘若垂下他們沉重的頭顱，那決不是屈服，而是爲了整理他們被血與火淬煉過的思想。

大陸文壇一片列寂，那是沉默的抗爭。而流落海外的倖存者則會發出更激昂的吶喊，並將成為中國文學史重要的一章。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蘇武氣節，屈原情懷，流亡者的血淚篇，在大陸萬馬齊瘠之際，極有可能成為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學主調。

被放逐的文學，到引流歸宗的一日，必然是大陸驚蟄雷動，冰河解凍之時。誰又能預料這一天何時來臨呢？

廣東文壇的大潰散

八九民運退潮後，澎湃的流沙，覆過弄潮兒光榮的足跡。當日地動山搖的吶喊已隨風飄散，化為石頭般的沉默。最為死寂的角落，是被官方指為「重災區」的單位，廣東作協正是被反覆清查的「自由化黑窩」，製造「動亂」的「禍首」。

廣東作家帶頭上街支援學生

據廣東省「工委」（主管清查工作的臨時機構）的統計：省直屬機關參與示威遊行的處級幹部有八名，其中作家身份的佔去五名。省直屬機關上街遊行的人次，作協佔百分之六十，其中黨員人次，更佔百分之七十。問題不僅於此。第一支非學生隊伍上街，就是一羣青年作家組成的「聲援團」，之後知識界數次大遊行，都是由作協帶頭發動並策劃的。無怪乎，近年表現溫和的省宣傳部也痛下決心，要徹底整肅這副「爛攤子」了。

短短幾個月，廣東文壇已人事全非，動蕩之劇烈，令人咋舌。

歐陽山與陳殘雲的權力角逐

世情翻覆，當年在「自由化」浪潮中被差額選舉選出作協領導層的老牌左王歐陽山，終於靜極思動，重出江湖，連出重拳——痛毆當年的仇家，他不斷推出政論短文，痛罵階級鬥心，論證「反革命暴亂」乃「自由化」的必然結果。並極具創意地提出「劃時代」論點，指新時期十年，前五十年以開放改革為主，後五年則走火入魔，自由化大泛濫。屈指算來，後五年恰好是他本人被黜，貽光養晦的時光。如此立論，未免打擊面太寬，致令本來已亂了陣腳的另一派系糾結起抗敵聯盟，正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歐陽山的宿敵是另一老人陳殘雲。皆因歐陽山為人太過橫蠻，連北京方面也指他為「南霸天」，於是牆倒眾人推，陳派旗下一人丁頗旺。其實陳殘雲的政治立場觀點與其對頭並無多少出入。「六四」之後，陳先斥學生「攪事」，見到歐陽山蠢蠢欲動，陳更搶先左轉，用盡超左的言辭痛罵民運，誓言捍衛紅色政權，滿嘴幾近失傳的大批判術語，連他的黨羽都覺得耳。如此積極跟進，盡管作協惹出大禍，他本人雖難記功，亦足以自保了。

老而不死的歐陽山這回佔盡天時，現任作協主席的陳殘雲卻佔地利。權力鬥爭不管誰勝誰負，都只是一場告別賽，因為「二老來日無多了」。

幾位老作家的不同晚節

五月十七日，作協青年作家拉隊上街遊行的同日，計有五位作協副主席（秦牧、黃秋耘、岑桑、黃慶雲、李士非）聯同兩位資深軍旅作家趙雲、郭光豹簽名致電黨中央，敦促「答應學生的正義要求」。他們鮮明的態度，與老而彌左的歐陽山、陳殘雲實有雲泥之別。

嶺南散文大家黃秋耘，一生書劍飄零，早年系中共高級軍事情報官，屢建奇勳，打下江山他就轉入文壇，立地成佛，成為大陸「人道主義文學」孤獨的鼓吹者。近年仍推出散文力作《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不依不饒地對「文革」派滅人性、踐踏人權的苦難史作警世式的控訴。然而，許是早年的職業特性，黃秋耘一生唯謹慎，總迴避對現實社會問題作出反應。這回不但簽名上書，「五一九」戒嚴令下，黃秋耘還在《羊城晚報》發表雜文，末尾注明這個耻辱的日期並點出「寫於淒風苦雨中」。真是時窮節乃見。

堪稱霧失樓台而自誤路向的，倒是文壇泰斗秦牧。此公律已嚴待人寬，在歷中口碑甚佳。然秦牧是一位雙重人格的老者，既有仁愛之心又忠誠於黨的教義。兩難的內心掙扎令他痛苦不堪。這次簽名的原動力，未必是支持民主理想，而是出於拯救絕食學生的垂危生命。遺憾的是，這回他未能求仁得仁，反倒被迫以精神自虐式的表忠來洗脫自己。他在《自由評論》上撰文堅決擁護鄧小平的「六九」講話，猛烈抨擊「自由化」與「暴亂」。一代文人，其靈魂扭曲至此，真是慘不忍睹。

另一位老作家岑桑卻表現得十分硬朗，他是讀書簽名者中唯一一個坐言起行，參加「五二三」省港大遊行的文壇前輩。形勢逆轉，人自危，獨岑桑不言悔，亦無交出像模像樣的檢討書，省委多次點名後，已按中央文件的律例，將其列入「從嚴」處分之列。

《花城》雜誌主編李士非，十五年前即與地下民運頗有牽連（他曾因和李一哲有涉而被囚禁），迄今猶壯心不已。該份雜誌也因屢屢

沉鐘

拋出「自由化」作品而連遭磨難。此番再觸犯天條，新賬舊賬一起算，不久前已被革職。到這些資深作家，飽經政治風雨的顛簸，到頭來終是「晚節不保」，與其說是他們的厄運，不如說是歷史的悲哀。

孔捷生神秘失踪而亡命天涯

最具爆炸性的消息可算作協一位副主席忽然遁去無踪。這並非作協機關裏的風波，成了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此事雖在意想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乃大陸恐怖浪潮的必然結果。

孔捷生是廣東作協最年輕的副主席，現年卅七歲，因出道頗早，「傷痕文學」初期，已成為國內知名的青年作家，從事專業寫作已有十年，並多次獲全國文學作品大獎。

孔捷生在派系林立的廣東文壇，始終是個獨行俠。「君子不黨」的做人宗旨使他一再拒絕入黨的邀請，迄今仍是無黨派人士。加上他太居北京，更是南來北往，行踪飄忽。從思想到行為都極端「自由化」。所謂物以類聚，據知如今好幾個流亡海外的被通緝知識分子，都與孔私交甚篤。無怪乎學運初起，他便與內地的密友南北呼應，同時捲入時代大潮。

五月十七日，他率領「作家聲援團」到廣東省政府門前，向數萬集會請願的大學生發表演講。之後知識界多次遊行都由他組織策劃，其中以「五二三」四十萬人舉行的省港大遊行達至高潮。他本人還在北北京告急之際冒險趕到香港。他本人還在北北京告急之際冒險趕到香港。他本人還在北北京告急之際冒險趕到香港。

京城大搜捕，孔曾迫回廣州避難，殊不知國家安全廳已將他及李正天列為黑名單上的頭兩名。作協黨組亦施以高壓，力逼他屈服懺悔。孔寧折不彎。據可靠消息，安全部曾派員來「談話」，卻吃了閉門羹。因孔捷生是省政協委員，欲傳訊要經特別手續批准，有關方面一時也無可奈何。

說不清從哪一天起，孔捷生從人們的視界裏消失了。孔向來如野鶴閑雲，經常出外遊方，本是慣常事，然作協正鬧「清查」，此時出行，黨組書記勃然大怒，一查問才知到海南島「寫作」去了。急電海南，答覆不知此事，

這下連孔的家人也慌了。孔捷生是海南軍農農場出身，那邊山高林密，未嘗不是遁世避禍的好去處，然至今未曾查明踪跡。後又有海外傳媒稱他已成功逃往法國。不過從巴黎傳來的確切消息，從未見過孔捷生到步。

一時之間，廣州傳得滿城風雨。據圈中知情者披露，九月間最後一次見到孔捷生，提及「六四」猶肝膽俱裂，餘恨難消。其切齒之狀，似已有某種無可回頭的抉擇。斯人不出，則永是個懸疑。

陳國凱獨善其身的去向

教人訝然的是另一位中年作家，作協副主席陳國凱，在前輩與後輩的夾縫中，居然清靜無為，獨善其身。非但未簽名上書和上街遊行，對整個民運事件始終三緘其口。這位因「反自由化」而去職的前《特區文學》主編，莫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

陳國凱是個奉行為實主義的作家，其作品對大陸了無窮期的極左運動有過尖銳的批判。從麻木到覺醒，從覺醒到批判，走過漫長而痛苦的心路歷程，然而從批判者邁前一步，就是創造者，這是決定性的。只有邁出這堅毅的一步，這個苦難的民族才有明天。

許多人都在這條起跑線前卻步不前。尤其是中年這一輩，或無心承前，而又無力啓後。據傳陳國凱將是下屆作協黨組書記的候選人。所謂「不爭而善勝」，靜待瓜熟蒂落，權力和和平移交，很有點「體制內改革」的味道。陳既如此，其同盟更是伴作不知天下事，之後空發幾句書生議論，一副洞悉先機的模樣。最終結論還是一動不如一靜。這正是中國歷史周而復始的悲劇。

更有不堪者，乃落井下石，為虎作倀之徒，沈仁康是也。此人自「反右」以來即慣於賣友求榮，「文革」年間更與「三種人」相去無幾。這回再獲表演機會，便施展獵犬故技，大整作協參與民運同事的黑材料，其品流之低劣，比諸超左文霸歐陽山還遠為不如。

諸如此類，按「漸進論」去和平接管權力，一旦成了現體制的操作者，他們又能允許民主推進到多遠呢？

幾名女作家飄洋過海走上

殘暴的鎮壓之後，是持久的精神惘惘戰戰。甚至省略了日復一日、水滴石穿式的灌輸洗腦，而採用狂暴的方式去「統一思想」。中國社會是一口大醬缸？一台絞肉機？一口散發着惡臭的活棺材？

對未來抱着憧憬的新生一代，如遭棒喝。那些行將就木的老人，即使死了也會化為石像和泥船，永久地攔住子孫的精神死死不放。這個世紀末的特征一如巴金數十年前的名著《家》。年輕的生命實在賠不起，耗不起。造反要殺頭，那麼一走了之未嘗不是無辦法之中的辦法。

廣東文壇近年惹人矚目的新星劉西鴻，寫出《你不可改變我》而獲全國大獎後，忽而自已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一輪閃電般的相識戀愛，她已遠嫁法國。深圳另一位女作家張黎明已先行一步，將終身托付給澳洲客。最為戲劇性的是女作家丁小莉的去留。她一直被一個虛偽而且惡劣的「詩人」欺騙和糾纏，去年才鬧出婚變，「詩人」近官得力而安然無恙，丁小莉反被停職，心灰意懶之餘便萌去意，「六四」之後便遠赴加國自費留學。

至於湖北作協副主席祖慰，本已辦妥調深圳的手續，房子都分配下來了。然而激蕩的大時代卻猛然改變了他的命運。祖慰先是熱血沸騰地參加了廣州「五二三」大遊行。「六四」後更悲憤莫名地宣佈退黨，終為當局所不容，不得不鋌而走險，流亡國外。

一年之間，衆多人物風流雲散。廣東文壇已是一片冷清。

這是一個紛亂年代的縮影，抑或是一個民族悲涼命運的寫照？如此運程，它或是整整一個時代的讖語。

◎

開放月刊 90/3

六、嚇唬港人



北京學運，香港百萬人大遊行響應，捐款、捐物資支援北京學生。作為在香港輿論陣地的〈文滙報〉、〈大公報〉也公開響應，中資機構員工上街遊行示威、港支聯成立……香港儼然凝聚了一股擁護民主的力量，這是令中共高層頭痛的事情。

六四屠城後，中央開始要教訓港人：李卓人被扣，港支聯正、副主席被不點名臭罵、文滙報風波、四五行動事件、楊洋政治庇護所引發之拒收偷渡客，一連串的嚇唬，使香港人信心指標降至最低點。

香港人的所謂「過激表現」是否「顛覆行爲」？留待歷史判斷。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333	姬鵬飛談話藏殺機(陳青青)	爭	7/89	82
333	錯誤時間和錯誤內容——評艾中的攻擊香港文章(林厲)	爭	8/89	92
334	「一國兩制」不容破壞(艾中)	廣	8/89	96/97
	奪回喉舌	亞	2/7/89	15
335	文匯報「造反」風波記(蔡雯)	解	8/89	65/67
336	堅持「第二種忠誠」	亞	30/7/89	13
337	香港〈文匯報〉兩個司令部之爭(楊格斯)	爭	8/89	82/83
338	李子誦與陳伯堅鬥法(謝苑貞)	百	1/8/89	20/21
339	根本問題是報紙要轉向——訪程翔談〈文匯報〉風波(方蘇)	九	8/89	46/50
341	大陸派駐機構風聲鶴唳	亞	2/7/89	14/15
342	香港中資機構的整頓問題	廣	8/89	55/57
343	中資「整頓」內幕(理明)	爭	1/90	23
344	態度橫蠻不合邏輯——評中共喉舌大罵港官(羅汝佳)	爭	9/89	82/84
345	十、一前夕香港密令(黎加路)	百	1/10/89	58
346	中方威嚇，港人畏縮？(何立)	九	9/89	44/45
347	香港民運面臨考驗(劉慧卿)	爭	9/89	84/85
	「旗手」出局？	亞	5/11/89	20
348	中共不容香港變為「反共機地」中英外交部門將有新交鋒(伍義生)	廣	8/89	24/25
349	中共為何收緊對香港政策？(盧子健)	廣	11/89	29/31
350	北京開始教訓香港人(大可)	解	10/89	60/61
351	我們不會委曲求存——訪問支聯會常委	解	11/89	66/67
352	支聯會前無去路？	亞	12/11/89	12/14
354	「冷風」南襲民主派不退	亞	6/8/89	14/16
356	「四五行動」：中港關係的祭品(黃中放)	解	11/89	64/65
357	港府為何對「四五行動」窮追猛打(何芷玲)	九	12/89	62/63
358	政治性的審判——香港「四五行動」受審記(黎紹珍)	解	1/90	84
358	不准採訪、小題大做(胡菊人)	百	16/2/90	16
359	當局禁制不利溝通——國內採訪緊張關係的成因(楊承)	當	9/12/89	47
360	外行人說荒唐話(魯紀)	九	12/89	42/43
361	有弊無利的「七項規限」(郭富)	鏡	12/89	64/65
362	中共的「港刊敏感症」(施華)	九	3/90	110
363	岑建勳：不要惹我！(鍾仕梅)	當	30/12/89	14/15
364	什麼叫推翻政府？——評羅海星等被捕	當	30/12/89	16
364	港人示威是許家屯失職？(蘇眉)	解	9/89	64
365	許家屯保護在港幹部(葦明)	當	20/1/90	4
365	秋後算帳(鄧峯)	當	13/1/90	13
366	新華社辦公室主任奉調離港(黃永)	當	13/1/90	42
366	新華社副部級官員自縊	當	13/1/90	42
367	三聯領導人接恐嚇信(陳文峯)	當	2/12/89	47
368	姚勇戰身繫上海(何芷玲)	九	3/90	50/51

姬鵬飛談話藏殺機

陳青青

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之後，港人對九七之後的信心跌到了空前的最低點。為此，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於六月二十二日對港問題發表了談話。對姬鵬飛的談話，粗心的人可能以為毫無新意——他不過是重申中共過去的一貫承諾，例如「五十年不變」之類。

姬鵬飛說：「……更不允許有人利用港問題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是什麼意思呢？這顯然不僅僅是針對港人此次對內地民主運動的全力支持而對港人的一種警告。

所謂「有人利用港問題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提出這種指控，對政治流氓般的中共來說，是易如反掌的。看看中共掌權者爲了鎮壓今次北京民主運動而強加給北京學生的罪名就清楚不過了。當局概括事態的發展時說是由學潮發展到動亂，然後由「動亂」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但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完全是當局強加給學運的。四月二十五日之前，北京學生完全是自發地悼念胡耀邦，有組織有秩序地遊行，要求懲治官倒，反對腐敗，沒有任何反常舉措。這樣的遊行和活動，用西方的標準來看，甚至連「學潮」的資格也夠不上。但是，四月二十五日之後，一夜之間，「學潮」竟然發展成「動亂」，竟一下子變成「有組織、有預謀」的敵對行爲。

這樣的卑鄙手法，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可以用香港上面。今天全港市民全力支援內地的民主運動，被中共指爲「海外敵對勢力」，不啻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只是時候未到，中共「鞭長莫及」，只好光吹鬍子瞪眼睛。但九七之後就不不同了，那時香港「回歸祖國」，隨時可以關起門來對付一番。

況且，到時即使港澳地區不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中共也可以用「陽謀」使之成爲「基地」。你看，今次大學生提出的主流口號是民主自由、打倒官倒、清除腐敗，當局也一再聲稱學生的願望與「黨和政府一致」，但是，爲了鎮壓學運，執政者除了有意激化矛盾之外，還專門挑選個別偏激的有煽動性的口號，從而指民主運動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語）。他們就是這樣以偏概全，爲鎮壓學運製造藉口的。此法也完全可以用於九七後的香港——

其「邏輯」不言自明——正如李鵬一夜之間把學運打成「動亂」，又歷經將近五十天之後一夜之間打成「反革命暴亂」，放手進行血腥的屠殺一樣，香港也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間成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予以清除。那時，坦克、裝甲車源源開過羅湖橋，甚至軍艦開進維多利亞港，軍機降落啟德機場……而事後，中共還可以煞有介事、振振有詞地發表《告全黨和全國人民書》甚至《告世界人民書》，曰：「我們黨對香港九七之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以香港不能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爲前提的。現在，香港極少數極少數長期堅持賣國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立場的人，同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使香港成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反動基地，黨和政府不得不收回『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甚至還可以說得更「理直氣壯」和「動人」一些。

退一步說，即使不以「基地」論罪，只要中共決意食「五十年不變」之言，決定來個「全國山河一片紅」、「共同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它也完全可以找個足以說明「性質完全改變」的藉口，來「變」、「變」、「變」……

姬鵬飛滿口以爲把信心全失的港人「安撫」一番，豈料却露了天機！

中共血腥鎮壓民運之後，讓港人徹底看透了其卑劣的、飢餓的政治伎倆，我不相信中共有什麼法寶可以收拾和重建港人的信心。

末了，不妨加上上筆——現在還有人寄望於寫好《基本法》。但是，中共在大難臨頭之時，連憲法也不要了，《基本法》又有什麼用！即使《基本法》寫上「九七之後絕對無條件地五十年不變」，或將《基本法》提高到憲法之上，都是難不倒不可理喻的中共的。

歸根到底，香港的不變，有賴於國內民主運動的勝利。這，也許正是我們港人何以要做「海外敵對勢力」、全力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根本原因吧？

平鳴月刊 1989/7

錯誤時間和錯誤內容

評艾文中的攻擊香港文章

林厲

北京「平亂」以後，那些曾被香港市民高呼「打倒」或抨擊的領導人，便開始通過他們所控制的傳播媒介，向香港人不斷進行「秋前算賬」。而《人民日報》在七月三十一日所發表的艾中文章《「一國兩制」不容破壞》，可謂集其大成。

運動的支援和對北京當局的抨擊叫做「種種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甚至而成為反革命「基地」。更令人恐怖的是在沒有拿出事實根據的情況下說支聯會成員「參與了策劃反革命暴亂」。

侮辱了香港市民

首先，文章的發表，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間。因爲自從鄧小平組成了以江澤民爲首的新班子以後，做了很大的努力，試圖使海外忘却天安門大屠殺的事件，並且要以實際行動來表明中共仍然推行開放政策。在西方國家更希望北京實行有局限的經濟制裁之後，江澤民更希望能夠貫徹鄧小平的意圖，因此不惜在一個星期之內兩次接見港澳人士（七月七日會見馬萬祺、唐翔千，七月十一日會見安子介、羅德丞、黃保欣），向香港人大派定心丸，表明「一國兩制」的政策不變。所謂鄧小平的意圖，也就是他在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對李鵬、姚依林所說的話，重申在中國大陸「要再造幾個香港」。

其次，七月二十一日是花園道中國地主投標約最後截止日期，這是六四大屠殺以後測量香港地產上兩項金融財政界的心象徵，各界有心人都都在營造信心，藉以達到「港人救港」的目的，連股市也在大跌後掀起連續三個星期的升市。但是《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唯恐香港不亂，連押後一天也不願意，偏偏趕在那一天出籠，藉以打擊香港人的信心。

選擇這個「錯誤的時間」並非偶然，《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喉舌，也知道自己的份量，怎麼不會掌握時機呢？另外，鄧小平有關對香港的積極評價，不是向其他人說，而是向李鵬和姚依林說的，這是因爲鄧小平知道他們兩個思想極爲保守，根本就不贊成改革開放，特別是李鵬，根本就不把香港的穩定繁榮放在眼裏，硬弄出一個大亞灣核電站。但是鄧小平和江澤民的講話，並未阻止現在控制傳媒輿論的極左文棍，才鬧出艾中的這篇文章來。

從文章的內容來看，也是錯誤的，因爲它仍然沿用「四人幫」的那一套，造謠、歪曲。例如把香港人從人道的立場及用和平手段對國內民主

文章還不點名地點名支聯會頭頭司徒華和李柱銘。爲了增加他們的罪名，除了上述的種種罪名外，還和「港英」掛鉤，說他們還是「港英的立法局議員」，意圖把他們打成英國殖民主義的鷹犬和爪牙。實際上誰都知道，司徒華和李柱銘並非港英當局委任的立法局議員，而是香港的民選立法局議員，而且是立法局內衆所周知的反對派。文章的這種說法，顯然是侮辱了香港市民。

應查查文章背後的黑手

正確地認識一國內的兩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也吃不掉誰。香港人從來沒有反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認爲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只是要求「改革」而已，在各種活動中，還大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聖歌《國際歌》，又何來反對共產黨和反對社會主義？以手無寸鐵、手無寸權的小民，又何能干預中央政府，甚至吃掉整個大陸？倒是艾中的這篇文章，粗魯地在九七前干涉了香港內政，破壞鄧小平所親手締造的一國兩制政策，進一步動搖了香港人的信心，也往北京的開放政策抹黑。主管宣傳的李瑞環，需要查查這篇文章背後的黑手。

平鳴月刊 1989/8

「一國兩制」不容破壞

□艾中

6月22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講話，指出不允許有人利用港澳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並不是什麼捕風捉影，而是有所指的。自從北京發生動亂以來，香港確是有這麼幾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與內地一些策動反革命暴亂的頭頭們遙相呼應，企圖在香港掀起一股反共、反華的高潮。君如不信，且看事實：

香港有那麼一位港英的立法局議員，平時一貫鼓吹「民主抗共」、「民主拒共」。北京發生動亂後，他立即跳出來公開號召香港人民起來推翻中央政府。不久前，他又來到美國，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作供，呼籲美國加強對中國政府的經濟制裁，「希望可以推翻北京的恐怖政權」。

也就是這位議員，一再叫嚷要改寫中英聯合聲明，主張1997年後，國防、外交大權都要歸香港所有。請問，這不是在鼓吹香港脫離中央獨立，是什麼？

他和另一位港英立法局議員雖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但是他們卻表示不承認目前北京的「偽政府」，聲稱這個政府一天不垮台，他們一天不參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由他們兩人擔任正、副主席的「全港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公開標榜他們的長期目標爲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短期目標爲推翻目前北京的「法西斯政權」。在該會發表的宣言中，竟然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掉轉槍頭推翻政府。

在這個「支聯會」組織的一些遊行集會中，喊出了「打倒共產黨」、「打倒鄧、李、楊」、「打倒老朽殘暴政府」、「與李鵬政權勢不兩立，作戰到底」等反動口號。在該會組織的一次所謂「黑色聲討大會」上，「支聯會」的代表宣佈「要與北京政府決裂，向之宣戰！」

爲將他們的綱領付諸行動，在北京動亂期間，「支聯會」還派人攜帶巨額款項和大量物資來京支援非法組織，有的「支聯會」成員還參加了非法組織，參與了策劃反革命暴亂。

更有甚者，有的「支聯會」的成員竟揚言要把香港變爲支持顛覆活動的前方，爲內地的反革命暴亂分子輸送武器彈藥！

還有人在香港建立了一個「地下通道」，專門策劃、協助內地的一些反革命通緝犯偷渡去香港，然後轉往其他國家。吾爾開希在港停留期間，在「支聯會」成員的策劃下，通過電視台發表了一篇極端惡毒的講話，號召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徹底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吾爾開希逃到法國後，同另一個也是通過香港出去的通緝犯嚴家其發表聯合宣言，宣佈成立「中國學

運民運基金會」，他們毫不諱言，該「基金會」的宗旨就是要推翻中央政府，「重建共和國」。此後不久，「支聯會」即通過決議，撥款一百萬港元支持該「基金會」的顛覆活動；另外還撥出二十萬港元作爲資助二十多名內地的反革命通緝犯逃亡海外的旅費。

以上種種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在香港這塊目前還是由英國管治的土地上，確確實實有人在港英當局的眼皮下進行着種種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嗎？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人究竟要把香港引往何處？

不允許有人利用香港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是中國政府一貫的政策，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1997年後也是這樣。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大陸解放後，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香港採取了特殊政策，容許它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就是以「不搞顛覆活動」爲前提的。1997年後，香港將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回歸祖國，而「一國兩制」首先要承認「一國」，即香港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央授權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爲此，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

「兩制」就是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謂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走你的獨木橋，河水不犯井水。中央決不會去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也決不能干預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允許有人把香港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是「一國兩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英兩國政府於1984年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及正在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破壞了這個基礎，也就是破壞了「一國兩制」，違反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誠然，香港同胞作爲中國公民都應該關心國家大事。基本法（草案）第二十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這裏的「依法」，理所當然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內地的法律。誰要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誰就要在國家憲法和內地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來進行活動，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適用於全國人民，香港也不能例外。這就是說，香港同胞可以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反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但是必須遵守憲法的規定，不能反對在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更不能允許在香港進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後者在基本法（草

案）第二十三條也有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爲。」

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治，也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一百多年來，根本無民主可言。1997年後香港變爲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民主，這是中國政府的一貫主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香港有這麼幾個人，天天高喊「民主」，其實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香港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作了充分的表演，從而暴露了他們的虛山真貌。現在看清楚了，像前面提到的那兩位議員，他們實際上是以「民主」爲幌子來達到他們「抗共」、「拒共」乃至推翻中央人民政府的目的。他們妄圖挾香港的「民意」來同中央對抗（拿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同中央「決戰」）。他們危言聳聽地叫嚷什麼「中國的今天就是香港的明天」，而實際上，他們是要把香港的今天變爲中國的明天，妄圖以資本主義來統一中國。他們所標榜的「民主」，並不是真正從香港的實際出發，從香港的穩定繁榮和六百萬香港人民的安居樂業出發，而是以此來蠱惑人心，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羣衆。

最近，據報載，這幾個人正在醞釀成立什麼政黨，一旦這些人掌了權，當了政，「一國兩制」，勢將遭到破壞，香港將永無寧日，還談得上什麼穩定繁榮？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在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樹下，才能衍生出一個繁榮的資本主義的香港；只有真正維護「一國兩制」，香港才有它的存在價值，而香港只有保持它的存在價值，才有發展的前途。香港的同胞們，你們要警惕啊，千萬不要讓任何破壞「一國兩制」的陰謀得逞！

所幸的是，最近香港有些有識之士已經站出來，反對把香港變爲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他們是真正從香港的穩定繁榮出發，爲了六百萬香港人的長遠利益着想。他們的呼聲已得到愈來愈多的香港人的響應。怎樣才能維護「一國兩制」，及其對香港的重要性，這個道理也已爲愈來愈多的人懂得。這是維繫港人信心的一個正確方向，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

（原載7月21日《人民日報》）

（原稿刊 89/0

「奪回」喉舌？

艾中

在這裏工作這麼多年，第一次看到我們的報紙與六百萬香港市民如此緊密地站在一起。——香港一位親北京報紙的編輯對亞洲週刊說。以《文匯報》、《大公報》、《南華早報》爲代表的香港幾份中共「喉舌」報，近期極其鮮明地反對北京當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但它們與中央「對着幹」，相信即將繼中央黨報《人民日報》等宣傳機器後，招來新一輪的「整肅」。

北京當局一向注重在香港的宣傳工作。有消息說，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上週召開與香港有關部門負責人的會議，指北京已喪失在香港的輿論陣地，必須盡速把陣地奪回來。知情人士說，基於這原因，北京當局在大陸完成「大整肅」後，將會「清理」香港駐北京報紙，而這比整頓其他大陸駐港機構要早一些。

《文匯報》與《大公報》的財政部分依賴北京，大部分職員是香港人，但一些高層人士乃大陸駐港的幹部。平常報社可自行處理日常的業務，但遇到重大事件，則須聽取北京駐港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指示。知情人士認爲，兩報最可能的前景是遭改組，一些位居要津的人士和編務人員被迫「退休」或辭職，由北京派員接替，將編輯方針重新納入其控制下。曾激烈反對北京做法的員工可能因而離去，但不少人仍會爲生活而留下。

一些人建議上述兩報獨立，脫離北京系統自力更生，但知情人士

說，雖然近年兩報皆有不同程度的改革，也有穩定的銷路，但仍然不具備財政獨立的條件，貿然脫離「母體」可能會倒閉。

按照過往做法，對這次學運新聞的處理，新華社香港分社應先向兩報提出明確方針，但該社並未如此做。消息人士說，這種「反常」現象，與該社一些主要官員對學運



《文匯報》聲討北京：難獨立

的看法有關。該社社長許家屯於宣佈成敗後曾應召往北京三天，被要求與中央「統一思想」。但許返港後仍未向兩報施壓。直至六月中，該社宣傳部副部長王福生召集各親北京報紙主要編輯，傳達鄧小平六月九日的強硬講話，才開始出現「收緊」的跡象。

文匯報「造反」風波記

蔡雯

在七月十四日下午，文匯報館內突然貼出一項通告，內文為「香港文匯報董事會兼社長李子誦先生決定，於七月十四日解聘陳伯堅先生文匯報副社長的職務，由即日起生效。李子誦同意照發。」

該項解聘聲明，更於當日六時三十分的電視上發表。

陳伯堅當晚九時往香港新華社開會，一小時後返回文匯報辦公，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於晚上十一時半進入文匯報。參加該報的社委擴大會議，會議直至凌晨二時才結束，李子誦並無參加該會議，而會後，新華社向全港各報社宣佈，停止對李子誦的留用。

國內股東無委託新華社

新華社的介入，令人質疑其合法性，而香港文匯報股權問題更引起公眾關注。

據港府公司註冊處提供的資料顯示，文匯報的最大股東為上海圓明路的文匯報，佔股達總數三成，而李子誦所佔股份不足一成，在二十七名香港股東中排行第十三位，但他卻是五名在港創辦人之。

香港文匯報是以「文匯報有限公司」登記，據文匯報有限公司去年十二月召開的股東大會記錄顯示，該公司註冊資本為八百萬港元，共分八十萬股，股東人數為四十八人，其中二十七人為香港股東，其餘分別在廣東、上海及昆明等地。

據載，文匯報在本港的最早資料見於一九五一年，當時在港註冊的文匯報五名創辦人分別是：梅文鼎、余洪翔、蔡肇昌、李子誦及徐鑄成。除李子誦仍在文匯報工作外，梅、蔡兩人均已逝世，余洪翔退休在港，而徐鑄成則居於上海。

文匯報有限公司香港董事共有三人，分別

為李子誦、金堯如及王家楨，而王家楨經已逝世，據悉，王逝世前已將股份委託給金堯如托管，但國內的股東則並無委託香港新華社代管國內股權的事宜，故新華社聲稱代為管理文匯報屬違法。

新華社香港分社突然宣佈「接管」文匯報，究竟本地的中資機構是否都受香港新華社管轄和支配，及香港新華社可否不受本地公司法例的限制，而凌駕於文匯報的董事而有權直接插手該報的內政之中，問題亦甚受本地中資公司關注。

新華社亦無人事權

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兼董事表示，文匯報的人事任免無須新華社處理，亦即李子誦以董事兼社長的職權，完全有權解聘副社長陳伯堅，而新華社既非該報股東，亦非董事局成員，開除李子誦實屬違法。

由此可看出，若依香港法律（公司法），李子誦若告上法庭，新華社一定要證明他們有權干預文匯報的人事任免。

李子誦在被反解僱的翌日，亦發表聲明，內容指陳伯堅擅自非法召開社委會緊急擴大會議，對他缺席抨擊，及藉口否決美國「文匯之友協會」組織，而向他誣陷，他本欲提出辭職，但他身為董事兼社長，有權依法解聘陳伯堅職務。他明知陳之背景而難以實現，但仍依法執行職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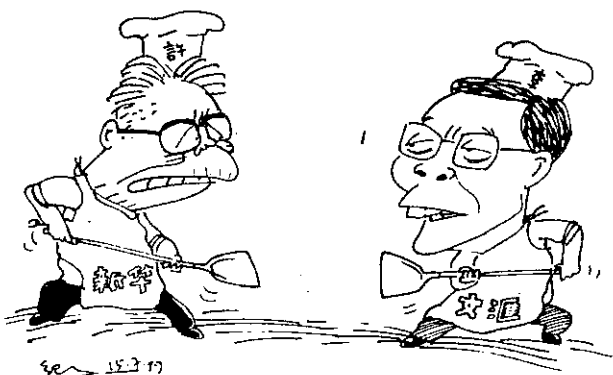
據不願透露姓名的文匯報職工表示，今次解聘事件，完全因為文匯報在學運事件中，一失觀中常態，而李子誦在學運的表現，尤為北京高層所不滿，中方更不欲失去一個香港的重要輿論基地。他們仍然希望一張這樣重要的報紙在新華社的管理之下，而非倒轉槍口揭大陸的瘡疤。

聯手迫李子誦退休

因此，若要收回文匯報這份香港輿論陣地，除去倒戈相向的舵手李子誦便是當務之急。

據悉，副社長陳伯堅在六四之後，已於報社內展開攻勢，並與親中共的一派，欲聯手迫

文匯報事件：右 李子誦



選自明報

李子誦退休，原因為李子誦已七十六歲，且已領取退休金，他們便向報社職工表示李將於今年八月退休。

他們更召開李子誦聲稱的非法會議，即七月十二日舉行的社委會緊急擴大會議。李子誦認為該會議是各委員聯合對他之批鬥大會，故並無出席。

而令李子誦解聘陳伯堅的導火線，是文匯報於七月十四日刊登「文匯之友協會」的澄清聲明。

「文匯之友協會」，是由劉賓雁、陸澄、項武義等發起組織，陳伯堅等對該「倡議書」及參考資料內容極不同意，故草擬了一份澄清稿件。但李子誦反對刊登，認為若不同意，可以書信澄清，無需刊登澄清啟事。

李子誦曾將澄清稿件上的強硬字眼有所更改，但他最後仍然認為不妥，因此最後決定不能發出。

不過，該份更改過的澄清啟事，仍於七月十四日在頭版登出，故李子誦認為他要立刻有所行動，否則會令人認為該份啟事在他同意下發出。

據悉，當時他決定立刻登報辭職，以免事隔越久，便越難澄清他對啟事的清白。可是，他當日遇到幾位律師，講及此事，律師認為，他身為董事及社長，而陳伯堅為他一手聘用，且有聘用書，他可行使應有的權力，將陳伯堅解聘。

李子誦明知陳伯堅之背景，欲除之不易，但想及反正結果都是一樣，即他遲早一定要離開文匯報，倒不如在臨走之前，反咬陳伯堅一口，且更可引出新華社之介入，讓世人看清中共之嘴臉。

欲變為反共報章？

由於報社辦事處的人不能替他辦理解聘陳之事，故他找了副總編輯程翔、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及十多名社內職工替他發佈解聘事宜。

事後，報社內親陳伯堅一派，公開指責程翔與劉銳紹等人，不知向李氏說了些甚麼，令李以「不正常」途徑罷免副社長陳伯堅，逼得新華社「不得已」出面處理，停用李氏為社長。他們還聲稱，文匯報尚未「轉軌」，並反過來指責有些人欲把該報變成反共報紙。並指解聘陳伯堅的報告未經社委同意，而發佈新聞稿亦未經報社同意，故很多同事對此都很有意見。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更指今次事件，問題是有外來資金注入，是文匯報被拉出去與反拉出去之角力鬥爭，而非報社轉軌問題。而這些外資勢力，包括台灣、外國、民運份子等，他們企圖將文匯報變為獨立反共報章。

事源於解聘事件之前一周的文匯報會議上，有人向李子誦提出，說有台商對李非常敬重，希望能與李會面，以及若李子誦有需要，可於金錢上幫助，不過，該項建議，被李子誦當場拒絕。李子誦說在這種時刻，並不適合與台商接觸，至於金錢問題，相信文匯報可財政獨立，自負盈虧，因此斷然拒絕。

另一次有關台灣介入的傳言，是六四之後，自由中國評論舉辦了一次招待到北京採訪學運的記者晚宴，當時文匯報出席者有劉銳紹、陳喜來、陳建平等，當晚劉銳紹到達時，見到門牌寫着「中華民國新聞代表團與香港新聞界聯歡晚宴」的字眼，他感到身份尷尬，故徵求其餘兩人應否進入會場的意見，結果是一同進入，不過，他們仍是在晚宴尚未開席便先行離去。但後來卻變成劉銳紹與陳喜來與台資的接觸的根據。

逼走親李派

台資介入文匯報似乎並不成立，問題焦點便在於轉軌問題上。首先，該報副總編輯程翔於解聘事件後第

●李子誦在學運的表現，尤為北京高層所不滿，中方更不欲失去文匯報，倒李早已悄悄地進行。

三日正式公開宣佈辭職，不過，在他正式辭職之前兩日，該報已有人向新聞界宣佈程已向報社辭職，但事實上，程翔根本並未辭職，故有人認為，該人此舉，目的是向外界造成一種形勢，令程翔不得不走，以便除去此眼中釘。

該人更指程翔曾與李子誦草擬解聘陳伯堅之新聞稿，之後又將李子誦收攏起來，有人更指程翔與劉銳紹迫李子誦作出不正常的決定。而程翔解釋其辭職原因，是對報社轉軌不能認同與妥協。

他指出，報社在處理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平亂報告時，他認為該報告是歪曲學運的性質，但該報一位主要領導卻說報告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故不應持否定態度。

另外，他寫了一連四篇「讀平亂報告有感」，在前三篇報告，有些字眼上曾被改過，他認為仍可接受，故並未反對，但至第四篇時，報社要求他修改其報告，要將之寫成學生不經申請而遊行是動亂，這點屬原則性問題，故他不同意，但領導說若不同意，報告便不能刊登，因此他便寧可不登。

李子誦痛罵陳伯堅

此外，李子誦曾於解聘事件後一周，寫了一封給全體社職工的信，解釋他解聘陳伯堅的原因，當時該信交給劉銳紹轉達報社員工。收信的人認為，信件並無上下款，故不宜將之貼出報社公佈，只在報社主任級擴大會議上宣讀過一次。

後來不少同事知道後，便主動向辦公室與部門負責人追問，辦公室將之讓職工傳閱，但不能抄錄，不能影印，看完後亦即場收回。不過，該信卻不知如何在一份報章上刊登出來，可是，其中有兩段卻不見刊出，一段為臭罵陳伯堅，另一段為臭罵陳伯堅親信。

理論上，該報章不會自動新聞檢查，或害怕開罪北京背景的陳伯堅。若然，該報很快便淪為共黨喉舌。至於劉銳紹，他是李子誦派，更不會刪去兩段要害處才讓報章登出，若由他放出信件，他一定會發通全行，不會獨獨謹慎於一份報紙。

氣氛凝重前路茫茫

至於文匯報的內部氣氛在解聘事件後就更見凝重，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很多員工表示他們根本不明報館發生何事，他們認為報館當時就如北京中央電視台，員工所知的都是一面倒的版本。而該報的高層在業務會議對員工進

行思想教育，例如叫員工對該報事件應多看看報紙，不要相信其他報紙的報導。

另外，該報曾積極參加在港遊行的員工及在六四屠殺後，曾在李子誦面前痛哭的報社領導人，其中一為黨員，但現已轉向相信中共官方的一套，認為黨員在黨面前必須一致，據悉，該報一位高層領導更表示，共產黨的錯誤，只能由共產黨自己糾正。

據說，當新華社香港分社宣佈停止留用李子誦時，報社內有記者發起簽名挽留李子誦，但有幾位主任級人士及記者欲阻攔，結果仍有二十五人簽名交給該報副社長陳伯堅。

解聘事件後，已有數名文匯報職工先後辭職，但行動最浩蕩的，便是十八名該報職工集體呈辭。

另外，在北京的文匯報辦事處，已接到無論甚麼事都不能聽劉銳紹指示的命令。文匯報會否轉軌，在短期內還未能立見巨變，不過，陳伯堅在事後就表示，該報會堅持愛國主義立場，「以文會友，以善報國」，貫徹「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必隱」的方針，他並強調，這方針是李子誦一貫所倡。

究竟文匯報是否轉軌，時間就是最佳證明，是非黑白，一年半載內可見真章。

文匯報是黑是白，
時間將是最佳的證明。

轉向

堅持「第二種忠誠」？

隨着大陸亂局塵埃漸落定，曾一度與北京當局「對着幹」的一些香港親北京團體和機構，正悄悄「轉向」，但在這過程中，團體內部的矛盾亦告顯現。

北京駐港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最近提出「穩住隊伍」，意指將擁有強大羣衆基礎的親北京團體納入「正軌」。經過一番「思想工作」，加上北京局勢又趨於穩定，這類團體已逐步放棄與北京當局對抗的態度。教育工作者聯合會（教聯會）退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發表聲明「堅持愛國立場」等，都反映這一轉變。

香港一些親北京人士也着意與反對現政權的團體劃清界線。當地月來支持大陸民運的培僑中學校長曾鈺成即表示反對香港支援流亡海外的北京學生領袖李海龍等，認為他們現在以推翻政府為目的，已非原來的民主運動，香港不宜支持「反北京」的活動。



親北京團體聲援大陸學運：到此為止？

上降低調子。但一些機構的內部矛盾終公開爆發。最近親北京的《文匯報》高層出現「奪權」風波，便是衝突表面化的結果（見頁三十六專文）。

據悉，工聯會最近曾召開三百多人的理事會擴大會議，確定「愛國」的涵義，即堅持愛國、批評及譴責北京政府的錯誤，促進大陸建立民主與法制。但會議上對這立場出現不同意見，有人讚成這解釋，但有人認為不應與中央「對着幹」。會齡越長的會員較不願意反對中央，反之則越傾向對北京採取批判態度。該會為了避免矛盾激化，除了加強與屬會會員溝通外，也減少就大陸政治問題表態，將注意力轉移到香港問題上，例如該會最近重新針對香港輸入外地勞工問題，發起罷工大行動。

教聯會內部也有類似情況。在今年如何慶祝中共主政四十週年的問題上，該會理事會部分成員認為不應慶祝，但老一輩的理事則堅持應繼續這個傳統。

據觀察，香港親北京團體面對的壓力主要來自內部，而不是來自北京駐港「領事館」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該等團體內一些人士認為，它們與大陸的教育、勞工團體有密切關係，如繼續與北京對抗，會切斷這些聯繫，更不利於兩地的溝通。

香港親北京團體內部還出現另一種意見，就是少理大陸事務，甚至完全不理。這心態在年青會員中較普遍，也是該等團體面對的另一個棘手問題。



楊格斯

香港《文匯報》兩個司令部之爭



陳伯堅

香港《文匯報》內「兩個司令部」之爭終於攤牌。副社長陳伯堅董事兼社長李子誦的權，而李子誦被迫解聘陳伯堅。

「兩個司令部」取材於一位《文匯報》副總編輯的說法，他在七月十五日召開的社委會擴大會議上說，《文匯報》有兩個編輯中心，一個在灣仔《文匯報》社址，另一個在李子誦家中。

「兩個中心」與「兩個司令部」

如果「兩個中心」真是存在的話，顯然是一種分裂《文匯報》的陰謀，其罪狀有如趙紫陽分裂黨的罪狀了。

那麼現在是誰在分裂《文匯報》呢？

李子誦雖退休留任，但仍然是《文匯報》的董事長和社長，也就是說，《文匯報》的鄧小平是他，《文匯報》的趙紫陽也是他。如果李子誦上班，中心就在灣仔《文匯報》社，如果李子誦在家不上班，中心就在李子誦家裏。當李子誦不上班時，《文匯報》的高層員工向在家的李子誦匯報情況是十分正常的事。正如中共高層官員隨時向鄧小平匯報情況一樣，而且得隨時奉召到鄧小平家裏。因為鄧小平和趙紫陽住在中南海，中共中央也在中南海，所以中心就在中南海。如果李子誦愛社如家，住在報社裏，就不會存在「兩個中心」之說了。

但是那位副總編輯的說法，顯然不是這個意思。他指的「兩個中心」，一個是李子誦為中心，一個是陳伯堅為中心，於是形成了兩個司令部，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

本來，報社內並不存在兩條路線，「五一九」李鵬、楊尚昆宣佈戒嚴以後，報社內同人同仇敵愾，也包括副社長陳伯堅在內。到了「六·四」大屠殺時，陳伯堅也沒有出來支持大屠殺，甚至還流出同情學生之淚。可見當時他還有良心。為什麼他後來反對李子誦，並且「爭取」了一批同志反對李子誦，從而形成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的鬥爭呢？這點只有他自己明白。據說他的中國護照八月份到期，如果不「立功贖罪」的話，

很可能被吊銷而要回到國內享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李、陳之爭是「國共鬥爭」的繼續？

看來，如果按照中共歷來的「階級分析」，現在《文匯報》社內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並非中國共產黨內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而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因為陳伯堅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李子誦則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於是，「性質」更嚴重了。鑒於中共最近大舉捕殺「國民黨特務」，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也有特務嫌疑，那麼李子誦的「特務」是更大了。很可能是潛伏了幾十年的特務，這次被鄧小平「釣」出來了。

不過相信李子誦絕不是特務，只是對中共的認識還不足。雖然是董事長兼社長，而陳伯堅是副社長，但民主黨派人士一向是「有職無權」，只能做肝膽相照的政治花瓶。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一些民主人士大叫「有職無權」，被打成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如今李子誦自以為權比陳伯堅大，不服從黨員的領導，甚至敢於解聘陳伯堅，無疑是個「漏網右派」。

新華社受誰委託管《文匯報》？

由於這場紛爭是一場政治鬥爭，所以就不是由香港法律來解決，而是出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進行「政治解決」了。這一點，李子誦也已經料到，所以他在書面談話中說：「我依法有權解聘陳伯堅職務，雖明知鑒於他的背景，此事難以實現。」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種心態，正是香港人面對中共威脅的無可奈何的心態。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在停止李子誦的社長職務時說：新華社是「受委託代為管理」的社長職務，但是從法律角度看，張浚生的話並不明確。有什麼證據說《文匯報》是中資機構？不知道新華社又是受誰的委託來管理《文匯報》的？有沒有委託書？如果鬧上法庭，這些都是必需的文件。否則新華社一句話，香港所有企業都

可以成為它管理下的企業，豈非天下大亂？現在就由新華社來插手干預香港內部的事務，豈非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既然這是一場「政治鬥爭」，那麼陳伯堅要解決的就不是李子誦一個人，而是「李子誦司令部」及支持這個司令部的人。因此一場政治大清洗勢不可免。眼下的鬥爭方式，也是二十年前「文革」式的「上揪下掃」。

陳伯堅的一個部下，利用記者招待會點名金堯如，說他經常在李子誦身邊，暗指金堯如是李子誦的支持者。金堯如是《文匯報》的前總編輯，也是《文匯報》的股東和董事。由僱員向董事和股東點名，這種「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當然是奉旨進行，是陳伯堅指使，還是新華社指使，現在還不清楚。以陳伯堅的地位，也只是新華社給予的代理社長地位，不是股東，也不是董事，當然要有新華社的支持才敢「炮打司令部」。只是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法治社會，但是誰和誰來往較多居然也成為階級鬥爭中捕風捉影和無限上綱的材料，豈非令人心寒？須知現在還不到一九九七年！

上揪李子誦下掃其勢力

在「上揪」的同時，自然也「下掃」。《文匯報》副總編輯兼主筆的曾敏之，因主五月二十日「痛心疾首」社論之筆，為顧全大局，已於早先請辭，他連《文匯報》出版社社長的職務也一併辭了。不但如此，在陳伯堅召開的社委會擴大會議上，如同北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樣，由陳指名參加「擴大」的成員，在會上批鬥副總編輯之一的程翔，理由又是他和李子誦過於秘密，執行李子誦的指示。於是他被劃為「李子誦司令部」的人了。副總編輯執行董事長和社長的指示，錯在哪裏？這種批鬥歪理，正如當前中共指責有些人任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時支持他一樣。實際上，程翔也因為《文匯報》高層的「轉軌」而不滿，因此亦在批鬥會後提出辭呈。

係密切的都是對象。當然，為免一下樹敵太多，影響正常的業務工作，因此會採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先「團結」一批，打擊一批，以後再解決「團結」的那一批，慢慢收拾殘局。

人心是剝奪不了的

《文匯報》的員工對階級鬥爭的經驗也不會完全無知，相信他們會繼續執行「沒有李子誦的李子誦路線」，繼續發揮影響，同時也逼使高層處處設防，寢食難安。大不了「博炒」，多拿一個月的人工。即使因為種種原因而要表態留下的，亦會「身在曹營心在漢」。人心是剝奪不了的。此外，陳伯堅還說，李子誦將來會因為其發表的聲明而後悔的。這種恐嚇性的言論在香港頗為罕見。只有黨才有如此論調，因此香港政府和全港人士恐怕還得關注李子誦今後的人身安全。這場「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已經引起香港社會廣泛的不安，且看作為中共在港權力機構的新華社，如何處理這件事情。否則不但引起中資機構的動盪，亦會牽動整個香港社會。

李子誦與陳伯堅鬥法

謝苑貞

陳伯堅與李子誦硬碰硬，引起「互炒」風波，張浚生親赴《文匯報》處，使新華社的角色由幕後轉到台前。

誰「迫不得已」？

香港《文匯報》對北京學運的態度與北京當權派不一致，在當權派施行強硬鎮壓後，早已註定其受整肅的命運。不過，「兵變」來得那樣快，過程又如此戲劇性，倒是令人出乎意料。

這幕充滿黑色幽默的戲劇於七月十四日正式曝光。七月十四日黃昏，《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發出一份解聘副社長陳伯堅的公開聲明，張貼於報社飯堂外，並傳真至各大傳媒，使此事即時公諸於世。接著就是陳伯堅趕赴新華社，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深夜抵達《文匯報》報社召開會議，直到翌日凌晨宣佈「迫不得已」、「停止留用」李子誦。

新華社與李子誦之間的公開決裂，在報社內部造成很大震盪，社會各界亦備極關注。李子誦「被罷」後，二十多名《文匯報》職工先後離職，採訪部人手登時損失近半；管理層遂放出聲氣，留下不走者可獲加薪。宗教界與新聞界部份人士分別以簽名廣告方式支持李子誦。該報有些廣告客戶正醞釀取消廣告。可見「停止留用」李子誦此舉，對《文匯報》的聲譽、管理和經濟，均造成很大的打擊。

後果這樣壞，或者新華社出此下策，確是「迫不得已」的？正如張浚生所說，李子誦作出了不尋常的舉動，新華社不得不這樣回應。

李子誦「炒人炒炒」，在行動之前，也是充分估計到結果的，陳伯堅是新華社派入報社的「副社長」，豈是你說「炒」就「炒」的？

按照常理，久在江湖經歷慣了李子誦，若非毫無退路，決無作此「不尋常舉動」之理。那麼李子誦又是「迫不得已」了？

軟硬兼施迫李子誦引退

事實確是如此。據了解，此事之前，《文匯報》內部的路線鬥爭已到白熱化，對手早已向人聲稱：李子誦將於八月正式退休。既然遲早都是被追走，與其默默無聞地悄然引退，不如向對手還擊一下，以表示其不滿意報社的路線漸漸改變，保存「清白」之名。

因此，表面看李子誦「炒人炒炒」，是自招損失，實在却是無論有沒有解聘陳伯堅的行動，李子誦的社長之位也是不保的。

原來自從六月九日鄧小平公開露面，大局底定之後，中央便決心要奪回在香港一度失去的輿論陣地。對李子誦，新華社出盡軟硬兼施手段。

軟的是許家屯約見李子誦，大力安撫，表示李沒有錯，是陳伯堅做得不對；新華社祇希望《文匯報》慢慢轉變，不必一下子馬上轉。

新華社甚至出動到前宣傳部長，現《大公報》社長楊奇來勸李子誦，力陳李年紀已大，不必操勞，應該掛個虛銜就算了。

硬的則是陳伯堅。陳伯堅直接向李子誦提出：（一）陳是黨員，李祇是民主黨派人士，陳是代表共產黨來管理《文匯報》的，他要求有職權；（二）陳鄭重地要求加入黨事局，陳指出原董事金堯如則離開《文匯報》很久了，應讓陳以副社長身份進入黨事局；（三）陳指稱李年紀已大，不能一錯再錯了；（四）陳認為北京學運期間《文匯報》表現得太突出，版面顯得緊張。

陳伯堅奪權招數

其實自從陳伯堅加入《文匯報》任副社長後，早已掌握審稿權。不過在北

京學運期間他卻躲起來沒有表態，報社當時完全由李子誦決定路線，大力支持學生，反對戒嚴、軍管和血腥屠殺。六四之後不久，即在港澳辦主任姬鵬飛主持的一次會議上，決議要收復《文匯報》這個輿論陣地，由香港新華社具體執行。許社長的作法是力圖緩變，以免引起太大震盪；但可惜新華社在《文匯報》內的代理人陳伯堅却太急進，以致引發表面衝突。

陳伯堅的「奪權」措施接連推出。首先他令一名心腹寫手化名古錦新寫評論北京局勢特稿，此類特稿雖未致完全中央口徑，但對北京的批評已較溫和，正是慢慢轉軌的準備。報社內對「古錦新」的出現非常敏感，不僅評報欄上有人罵他，且引得一連串員工當中冒出一個「畢春秋」，也來評論北京時局，與之抗衡。

陳伯堅繼而向編輯下令，他要審稿，並說李子誦的稿也要送給他看。李子誦知道了，主動將稿子給陳伯堅看，可是陳伯堅說太激烈，李子誦仍然堅持發稿。

陳伯堅禁不了李子誦的稿，却可以禁「畢春秋」的稿。「畢春秋」的「讀平亂報告有感」第五篇就是被陳伯堅禁了，導致副總編輯程翔於七月十七日正式呈辭。

通過陳伯堅的逐步控制言論，《文匯報》要轉軟已成定局。與此同時，報社內不斷有人吹風，謂李子誦八月便要退休，暗示了新華社已準備好於八月「停止留用」李子誦。

文匯之友協會成導火綫

李子誦自然清楚清楚如此形勢。假若他順順貼貼，一聲不吭地於八月退休，那麼這兩個月來《文匯報》的漸變，便由他負責了，而且還製造出他自然退休的假象。這又豈是李子誦甘心做的？剛好此時發生「文匯之友協會」事件，便成了雙方採取對抗行動的導火線。

一羣旅美華人發起組成「文匯之友協會」，支持《文匯報》「揭竿而起」

；陳伯堅認為一定要刊出澄清聲明，不承認該協會所說的報社宗旨。李子誦認為公開與這協會劃清界線，有傷感情，協會的發起人多屬老朋友，應先與之聯絡。

為此陳伯堅便急忙召開社務擴大會議，並在會前做好游說工作，力主發出澄清聲明。《文匯報》習慣上以社務委員會作為集體決策機構，而在委員會內，黨員數目不少，自然可以用黨的紀律來約束之。因此會議結果對陳伯堅十分有利，祇有兩票反對票，一票來自程翔，另一票是副刊科主任羊璧。

李子誦知道陳伯堅做好準備要通過決議，所以他故意不出席。他若出席了，連他在內也不過三票反對票，造成少數服從多數的局面，既是少數，便應服輸；若不出席，則大可承認這一個決議。

李子誦就是採取了後一種辦法。而他在解聘陳伯堅的簡短聲明中，也提出陳伯堅非法召開社務擴大會議，作為罪名。

當時李子誦曾警告陳伯堅，若陳伯堅決意要刊出澄清聲明，他就要在刊登的同一日刊登辭職啟事。陳伯堅則力勸李子誦等到八月始行辭職。這就是張浚生聲明中所謂對李子誦辭職「力加勸阻」，其實祇是勸阻他不要馬上辭，以免讓人感到李子誦是因不滿而離去。

不待八月馬上主動出擊

結果，七月十四日，《文匯報》刊登聲明稱「文匯之友協會」屬自發組織，語氣相當客氣，不過劃清界線的用意則十分明顯。

李子誦當然不願意等到八月，他要馬上有所表示，以示不滿。

因此，十四日上午李子誦辭職之意已甚堅，報社內已很多人知悉，誰知却峰迴路轉，當天下午李子誦與一名律師見面，律師表示根據香港公司法，李子誦是董事長，有權解僱僱員為「僱員」的陳伯堅。事實上，當日陳伯堅入《文匯報》在新華社推薦之後，再由李子誦下聘書。

既然大不了也不過是去職，何必委屈自己？於是，李子誦便運用董事長職權，馬上解僱陳伯堅了。

新華社自稱代表《文匯報》內地董事來管理《文匯報》，在它未拿出有效授權書之前，在香港法律上未必站得住

前祇有兩人，即李子誦和金堯如（王家駒臨終之前曾委託律師，將其在《文匯報》的股權轉托予金堯如），所以李子誦後來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已徵得在港董事同意，解僱陳伯堅之舉合法，即據此而言。

至於張浚生說《文匯報》的高層人員任向來須通過新華社，因此權在新華社。有《文匯報》員工指出，他說的也是過去的慣例，並無明文規定，亦無法律效力。當新華社的領導權仍然受尊重之際，通過新華社是正常程序；當其領導權在不被承認時，便不一定要這樣做了。

新華社將如何善後？

「炒人炒炒」事件發生之前，尚有不少員工希望李子誦、陳伯堅兩派和睦共處，而李子誦一日在，便可保《文匯報》不會完全變成傳聲筒；為此，對李子誦突然「發難」，使局面無法挽回，部分員工很不理解，亦懷疑有人在李子誦背後推動。李子誦因而寫了一信致報社職工，解釋他已被迫得沒有退路，局面，八月即將被炒。唯此信交報社辦公室內，多天沒有轉發，近一星期始陸續抵員工手中。

李子誦「停止留用」後，職員分為三派，一派支持李子誦，已有二十多人辭職；另一派則不贊成李子誦的「不尋常舉動」，但仍支持李子誦提出的「有喜報喜，有憂報憂」路線；一派則緊跟中央，慢慢轉軟。

《文匯報》在北京學運期間的堅定立場，翔盡報導，曾獲不少讀者支持；這次突變，不少人感惋惜。值得注意的是，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許家屯並不在香港。若許社長在，會否處理得如此笨拙呢？陳伯堅與李子誦硬碰硬引起風波，張浚生要親身進入《文匯報》作宣佈，使新華社的角色由幕後轉台前，都不符合新華社要暗中收回權力的方針。且看許家屯回港後有何辦法收拾殘局？

根本問題是報紙要轉向

訪程翔談《文匯報》風波

訪問及整理：方蘇

辭職原因，第一是報社出現「轉軌」的跡象，第二是對一組文章的處理，第三是李子誦被免職。六月九日之後，報社就面臨壓力，新華社找過李子誦，要《文匯報》慢慢轉，上面下來的訊息是要淡化、不加溫。

覺得留下去意義不大，所以更堅定了辭職的決心。

問：就是七月十日起《文匯報》二版署名畢春秋的文章？你是負責該版的嗎？

答：我在報社內負責的工作，一是電腦化計劃；二是聯繫各個對外辦事處及特約記者網；同時也兼寫一些評論、特稿，主要是關於中國的事務。

問：這是不是因為你任職六年，很自然就負責報社內有關中國這部份的工作？

答：對，包括中國新聞的整個網絡的組織，而不是具體管某個版。

問：《文匯報》「平亂報告」的問題，你說其中觀點不客觀，報社內另一位領導人，大家都知道是指副社長陳伯堅。到底這組文章的處理過程是怎樣的？

答：我寫完第一篇，先交給一位副社長看。他看了，有些批示，說有幾點內容不是修改文字可以解決的，要壓一下，談一談。我想，既然不是修改文字可以解決的，那就是觀點的問題了，於是同意扣發一天。第二天我和他談，彼此有不同看法，但我覺得不是根本性的原則問題，同意作點修改。

例如，我的一個觀點是：把胡耀邦逝世前所有國內外的輿論，包括與弗里德曼（港譯佛利民）有關的言論，全都視為促成這次「動亂」所作的準備，這種說法太難成立了。倘若這些言論也被視為顛覆現政權，這個政權就未免太脆弱了。這一點他不同意，他說革命需要輿論，反革命也需要輿論，所以這些言論是足以導致這場「動亂」的。我想，你既然這麼堅持，我就刪去這一段算了。

又例如，論及大屠殺後的白色恐怖，我說遭逮捕的人是十年開放改革中湧現的精英。但他不同意這批人是精英，還說至少戈揚（《新觀察》主編）就不是。我覺得沒什麼好爭，就把「精英」改成了「知識份子」。

人大通過了，還要對着幹？

問：文章是不是也給李子誦社長看過？



程翔：辭職明志。

「編者按：在北京「大局已定」的情況下，香港的左派團體——尤其左派報章——是否要逐步「歸隊」，極為引人注意。在山雨欲來的情况下，終於出現了《文匯報》的「大地震」。七月十五日清晨，新華社香港分社宣佈「停止留用」該報社長李子誦；七月十七日，副總編輯之一程翔辭職；之前辭職的有另一名副總編輯曾敏之；之後辭職的還有總數已超過二十名的各部門人員。在程翔辭職後，本刊對他作了一次訪談。程翔於七十年代初畢業於香港大學，在《文匯報》工作十五年，其間曾派駐北京六年。」

導火線是「平亂報告」

問：你在《文匯報》工作十五年了，為什麼現在要辭職？去年曾聽說你會轉投他報，但被挽留。這次是不是因為《文匯報》出現的情況太不正常，連李子誦社長也被新華社免職了，因此你也不得不辭職呢？

答：我辭職和李社長被停用在同一個背景下兩個不同的事件。我辭職的直接導火線是一組文章的處理方法令我非常不滿，這組文章就是《平亂報告》有感（《評論北京市長陳希同於七月六日向人大常委提出的「平亂報告」》，而不滿並非技術問題，而是原則和路向的問題。及至李社長被停止留用，我就

再演成「反革命暴亂」。我指出，戒嚴之前北京不存在「動亂」，軍隊強行開入北京之前也不存在「反革命暴亂」。但這位副社長看了，走來對我說：你不能說北京沒有動亂，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算不算動亂？遊行示威不經申請批准算不算動亂？我對他說，我們報紙曾有社論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

（將學生運動指為「動亂」），如果我們現在接受官方的說法，豈非我們在四·二六之後所做的都是錯的？我說，我們總不能退到這個地步。報社開過大大小小的會議，都強調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民主運動，譴責血腥鎮壓。如果現在接受官方解釋，當初何必「痛心疾首」？（指五月二十一日《文匯報》的「痛心疾首」）

如果官方的解釋當初能被學生、市民接受，北京的事態也不會越鬧越僵。你要我在「動亂」問題上修改，稿寧可不發。於是他說：好，不發就不發，語氣很決絕。我們當時的爭執，房間外也知道了。我出去之後說，如果退到這個地步，「痛心疾首」就毫無意義，當初一些人痛哭流涕也毫無意義。

問：你和他爭執之後就決定辭職？那時李子誦社長的處境怎樣？

答：當晚我已決定辭職，那是七月十三日。所以，我辭職本是一個獨立事件，與李社長被免職不是同一件事。當時我知道李社長的處境很困難。

問：這樣也不能說兩件事完全無關。

答：我的意思並不是完全無關。我辭職的原因，第一是眼看著有人要「轉軌」（轉變路向），而且轉得很厲害。李社長離開，則更加強了我的去意，因為他在報社內一直態度很鮮明、很堅決，要貫徹「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路線，要堅持正義，不畏權勢。「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的十六字方針也是他提出的。如果他也離開，我擔心報紙原來的立場不可能再堅持下去。

六九之後面臨壓力

問：你提到「轉軌」的問題，是否報社早就面臨這種「轉軌」的壓力？

答：應該說《文匯報》很早就面臨「轉軌」的壓力。這裏我想先談近期事件的性質。報社內有人公開說，《文匯報》最近發生一連串的事，是一場要將《文匯報》拉出去，變成「獨立報」、「起義報」以至「反共報」的鬥爭。必須指出，這不是報社一些員工的認識，

而是領導層或黨內有這種看法，然後再灌輸及影響其他人，在報社內散播了這種「陰謀理論」，使一些員工感到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非鬥爭不可。例如有些人就對新聞業同行說，《文匯報》的事不是「轉軌」與否，而是有人希望把報紙搞成「獨立起義」的報紙，要把《文匯報》拉出去，脫離黨的領導。甚至還散佈引入外力的說法，暗指來自美國、台灣等地。

問：他們說沒有「轉軌」的問題，但你卻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有什麼跡象？

答：「轉軌」的情況，始自六月九日鄧小平露面。之後又開了中共四中全会，大局已定，這就需要《文匯報》轉變。這不是我們想出來的，而是新華社領導人找過李子誦社長，說《文匯報》要慢慢轉，不要急轉，一時急轉員工接受不來，社會接受不來。許家屯較早時從北京回港，帶回來的訊息是：既往不究，不追究經費，要淡化、不加溫。但李社長表示，你說既往不究，那是我們有錯？你要淡化、不加溫，但問題不在我，你繼續搜捕，快捕快殺，又如何淡化？所以，「轉軌」的壓力已是很清楚了。

為「轉軌」作準備的氣氛

問：六月九日之後，報社內是否感覺得到這種要「轉軌」的氣氛？

答：是，在一個工作例會上，談到未來的動向，當時已經瀰漫着一股「轉軌」的氣氛。具體來說，有領導說要「顧全大局」，包括中國的大局、香港的大局、報社的大局。所謂顧全大局，就是不搞亂。就中國來說，不能喊打倒共產黨；就香港來說，要繁榮安定，不能喊不要聯合聲明，不要基本法；報社的大局就是要團結，要少數服從多數。按照這個邏輯，對李楊集團繼續持批判態度，就是等於搞亂三個大局，這是我不能同意的。會上有人說，要珍惜我們的報紙能夠進入大陸，所以既要堅持原則，又要講求策略。還有人說，我們是辦報紙，不是搞革命，等等。總之，整個會瀰漫着一種為自己轉彎作準備、找下台階的氣氛。

問：你當時有什麼反應？

答：我本來不打算發言，因為會上好幾位的發言給我的印象就是準備要轉彎。最後李社長留意到我沒發言，就對我講，於是我講了五點：（一）天安門事件是個歷史事件，歷史的真相不能為權力所左右。（二）當李鵬等仍

大陸派駐機構風聲鶴唳

北京當局在大陸展開大整肅行動，風聲鶴唳的氣氛已開始蔓延到香港，首先被這氣氛籠罩的，是曾與員工參與支持大陸學生運動的北中資機構員工支援北京學運：難逃算賬？



北中資機構代表機構駐香港分社、親到香港，首先被這氣氛籠罩的，是曾與員工參與支持大陸學生運動的北中資機構員工支援北京學運：難逃算賬？

過去一個多月來，香港中資機構的大批職工公開支持北京學運，並參加大遊行，其中包括中旅集團、中銀集團、招商局、北京對外經濟貿易部屬下的華商集團、中國保險公司、三聯書店等。以華商集團為例，參加聲援學運遊行的有三百多人，參加簽署聲明的則有近三千人。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員徐海寧更在抗議集會上慷慨陳辭，而該社一些員工則公開向「六·四」慘案的死難者致哀。不少中資機構還在門外懸掛反對軍隊鎮壓民運的巨幅標語。

中資機構人員敢於表態，受到香港市民讚賞，但也為他們及其所屬機構帶來無法預計的後果。有消息說，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上週召開會議，與僑務辦公室、外交部、對外經濟貿易部、財政部、公安部及國家安全部的負責人商討香港情況，新華社香港分社長許家屯也有出席。據悉，會議商討了如何奪回在港「背叛」北京的輿論陣地（見下頁專文），以及對香港街頭參加遊行或簽名的中共黨員從嚴處理。

知情人士對亞洲週刊表示，香港最先受到整頓的，會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接著，在輿論上公然與北京「對著幹」的《文匯報》、《大公報》等中共在港「喉舌」報，也將遭「清理」。負責「指導」上述各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放縱」屬下輿論機構，也會被追究。

此外，許家屯曾撰文闡述資本主義的優點，其「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可能受到批評。較早前有傳聞說，許將「退休」，其香港第一把手位置將由去年底南下到香港出任該社副社長的余孟孝接替。但分析家認為，接替社長一職的人選必須有相當高資歷及被香港人接受，余孟孝仍未具此份量。但余原是北京政法系統幹部，屬中共黨書記熱門人選高嵩石的入馬，故現在於新華社香港分社內舉足輕重。

目前新華社香港分社有九百多名員工，持大陸來往香港的雙程通行證，其中大部分是由大陸各單位借調到該社工作。在今次民運中，該社一些思想較開放的人員積極投入聲援活動，包括目前據聞正在醫院「休養」的徐海寧。該社部分員工除參加遊行及分別發起聯署支持學運的公開信外，在內部一封未公開的聯名信中，也有二百人簽署。曾參與上述行動的大陸人員，如今處境不明，人心惶惶。

對於派駐香港的商業機構，預料北京也將提出整肅要求，但為了顧及香港經濟穩定，以及考慮到實際進行整肅可能遭遇的人事困難，故這工作相信無法雷厲風行。據聞在姬鵬飛上週召開的會議中，有意見認為凡屬中共黨員而帶頭遊行或簽名的，要從嚴處理；但對這些機構在香港吸收的人員，則暫時仍要利用。香港的中資機構約有上萬員工持雙程通行證由大陸到香港工作，多數基層員工則是香港本地人。知情人士說，調派到香港的中資機構幹部一般與大陸當局有密切關係，或與香港中資機構的領導有淵源，故如何下手是一個頗為棘手的问题。

知情人士說，香港中資機構領導層受到整肅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對屬下員工參加支援行動，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一直只是「雙眼睜睜眼閉」，並沒有公開支持，故應可「過關」；另一方面，領導層也可向北京解釋說，懸掛「反動」標語是考慮到情緒激動的香港民衆有可能衝擊中資機構，不得不以此方式求自保。中資機構高層處變不驚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在大陸仍有「靠山」，且早已作了「交代」，表態支持鎮壓。消息人士說，中信集團在北京實施戒嚴後，曾組織部門主管往探望戒嚴部隊，並向軍人贈送禮物。訪問團更帶回軍隊食用的餅乾給集團員工，以「體驗」軍人的辛勞。該集團董事長榮毅仁稍後

更公開表示支持軍隊平暴「動亂」。香港另一家受注視的中資機構光大集團，在北京學運期間一直保持沉默；據悉，另一些中資機構亦早已表態支持中央。

北京當局整肅香港中資機構時，還不能不考慮對機構造成的經濟損失。雖然中資機構的員工在學運期間做了許多令北京不悅的舉動，但進行整肅將導致屬下員工流失，影響機構運作，也會影響香港人和外商對該等機構的信心。中國大陸目前正面對國際經濟制裁，香港公司和中資機構將對其更為重要，因此，北京可能只擺出整肅的姿態，而不至於進行「大清洗」。

香港親北京團體經過今次事件，會對最高當局採取批判態度，與過往相比，自主性亦將大大提高。以當地培僑中學為例，該校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即認同北京政府，長期以來被視作大陸在港宣傳教育系統中的重點機構。該校校長、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吳康民上週向亞洲週刊說：「培僑將來的立場是明確的：認同中國、愛中國的態度不會變，但會反對少數當權者，希望一個理性的、符合人民意願的政府出現。」他認為培僑與大陸教育機構的聯繫將發展下去。據悉該校財政可以不依靠北京，故今後應可獨立辦下去。

有十七萬會員的親北京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也積極參加了最近來港兩次歷史性的百萬人遊行，並曾公開表示支持北京學生。工聯會副理事長譚耀宗表示，該會雖反對當局鎮壓學生，但仍是「愛國團體」。亞洲週刊獲悉，工聯內部曾對是否與北京當局「決裂」有不同意見，老一輩的工會領袖對此有保留，故該會近期在支援活動方面已較低調。

雖然北京整肅香港「圈內」機構的行動還未全面展開，但已呈現「風雨前的靜寂」的氣氛，除了中資銀行等仍正常營業，不少中資機構的日常業務已放緩。員工的心情正如一位曾參加支援學運的大陸駐港人員所言：「甚麼時候輪到『整肅』我們？」



許家屯：退休傳言再起



新華社香港分社：首當其衝？

香港中資機構的 整頓問題

在北京事件之後，中國需要穩定，中共不會將國內一套搬到香港來，但穩定並不代表容忍貪污、官僚、僵化、無效率。

北京傳出的消息表明，中共中央已下決心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砍掉那些在流通領域中過多、過濫的公司，這些公司是從事商業、外貿、物資供應和金融事業的。據悉一位中央負責人，在一次內部講話中也提到了要繼續加強清理整頓香港的中資公司的問題。人們關注的是，在中國清除腐敗的政策下，香港的一些中資公司會否同樣地要進行清查整頓呢？

在港中資機構約四千家

在香港的中資機構有多少家？至今仍沒有準確的統計。新華社是中國政府派駐香港的最高機構，理應掌握中資機構的數目，但據了解，該社亦不保證有最準確的統計。據本港商界及學術團體所搜集到的資料，估計在港中資機構數目約為四千家。

這些中資機構可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傳統的大型機構，如華潤集團、招商局集團、中銀集團、中旅集團，被稱為中資機構的「老四家」。第二類是80年代初改革開放後在港崛起的大型機構，如光大、中信、粵海、華閣等。第三類代表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屬下一級的機構，這些機構從公司名稱大體可看出代表那個省市（見附表）。第四類是代表縣一級的機構。第五類是形形色色的小機構包括沒有獲批准的「地下機構」。

在香港的兩大作用

一般認為，中資機構在香港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有兩點，一是為國家賺取外匯，二是維護香港繁榮安定。

對於中國來說，香港經濟地位很重要，對中國「四化」和吸收外匯影響很大，鄧小平最近便說：「沒有香港，起碼就是訊息不靈。」每年，中國都要通過中資機構源源不斷地賺回外匯，並吸取了不少技術和訊息。以華潤為例，1988年自由轉口額為一千多億港元，進出口貿易總額約六十億美元，給中國提供利潤之巨，恐怕沒有其他公司可匹敵。正因為在香港作用巨大，有利可圖，也是中央和各省市向外開拓和吞吐的窗口，所以各地紛紛來港設機構，賺外匯，這也是香港中資機構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

中資機構在香港雖則不算舉足輕重，但對香港經濟也有一定影響。一九八五年，友聯銀行經營發生重大困難，次年九月，由招商局集團及兆亞組織的新思想公司，向其前任主席購得控制權，注入資金二億餘元，進行重組，使友聯銀行轉危為安。又如，1986年6月嘉華銀行出現財政困難，中信（中國信託投資公司）毅然注資三億五千萬港元挽救嘉華，並擔保該行的壞賬於三年內收回。至今中信已追回大部分欠款。再如中銀集團，共有十三家銀行和三百餘間分行，與匯豐、渣打銀行鼎足而立，是香港金融業裡不可缺少的支柱。

中資機構存在的問題

與此同時，多年來中資機構亦積累了不少問題。問題之一，以政代商，官商氣重。許多中資機構

表面上是在香港註冊的一家公司，實質上是在香港從事經濟工作的行政機構。一些機構甚至把國內行政機構的運作方式照搬來港，很不適應香港的環境需要。有些人說，走進這些公司，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行政機構的那一套管理方式，官商的氣氛很重。如果離開國內貨源進出口的壟斷權，這些公司很難在香港生存下去。

問題之二，領導幹部，不少外行。應該說，中資機構的負責人，有許多是勝任稱職的，如招商局集團的賁庚、華潤集團的朱友藍和中銀集團的幾位負責人，精通業務，在國際上也有較高聲譽。然而，另有許多機構的負責人，因為是由內地官派來港，有的靠裙帶，有的靠關係，有的靠歷史資歷，而業務的水平低下，來港後又不學習和變通。這些人做生意，常常虧得一塌糊塗，美其名曰交「學費」，一交就是幾十萬上百萬，甚至幾千萬和過億元。筆者認識北京來的一位中資機構的老總，業務不熟膽子大，上半年在港炒外匯，賠了數百萬美元，結果，歸罪於香港風險大，香港商人「狡猾」，但老總官照當，連個自我檢討都沒有。

問題之三，從事官倒，買空賣空。做這種事的機構一般都有硬似鐵的後台。一些人靠手中或靠山的職權，倒賣進出口許可證或配額，買空賣空。這些問題，在極個別來歷不明的「地下機構」中較常見。經過1988年以來的整頓，這些「官倒」略有收斂，也或者是賺夠了，換了個地方。然而「官倒」並沒有在這類中資機構中絕跡，這都是在業內人士中公開的秘密。

貪污撈一把並非個別現象

問題之四，貪污受賄，腐化墮落。多數中資機構的「表叔」，普遍待遇較低，月薪一般在二、三千港元上下。當然，其宿舍、水電是免費的，但在這個社會中，與同級別的香港經理級、行政人員級人物相比，畢竟是收入懸殊。本來，「港事港辦」，如果有接近港人一般的待遇，他們的活動和士氣可能會好得多。當然，這事確亦不易辦。而很不幸，十里洋場，一些人抵擋不住物質的誘惑，在經營業務中暗中受賄，慷國家之慨，而使國家蒙受損失。據悉，某中資機構的一位董事，來港不足兩年，銀行裏就已有數十萬港元存款。按他每月實領三千多港元的月薪，就是他每天不吃不喝不用，也要五年時間才能存到這筆錢，巨款何來，自然是受到追查了！

去年，某中資機構死了個年輕人，只是個一般的業務員，清理遺物時，竟發現他有二十九萬港元的存款！據一些與中資機構有業務往來的本港商人私下透露，這幾年不給好處根本做不成生意，而且一些人索賄的胃口越張越大。港商為了做生意，絕大多數都不願揭發。當然，賄賂越大，他們也賺得越多，而最後吃虧的只是國家。要說明的是，貪污受賄的人在�資機構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個別現象。

至於個別個人涉足風月場所，醜態百出，亦是確有其事。此外，拉幫結派、弄權投機、不懂裝懂、不守信用等問題，對一些中資機構的業務和公司效益也造成了危害。

鄧小平提出整頓中資

其實，香港中資機構的許多問題，北京高層是大體清楚的。從1987年起，鄧小平和一些中央領導人就多次表示要整頓中資機構。

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在同政治局幾個常委的講話中就明白提出香港的中資機構要撤掉一批。鄧說：香港那麼多公司，為什麼不撤掉一些！對這個問題要有硬性的決定，首先從鄧模方他們那個公司做起，為什麼不撤？有人說要先搞個調查，鄧說，還要搞什麼調查工作？調查不就是那麼回事。多得很，為什麼不下決心呢？這些機構和人都要花外匯啊，而且名譽不好。

鄧小平講話後，整頓中資機構的輿論也造了一陣子。廣東省行動最早也最好，一年來，全省已撤銷各種駐港公司二百多家。

應該說，中資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樣，只要經營正當，對香港的繁榮和發展有好處，都是值得歡迎的。而多數的在港中資企業，對中國的繁榮經濟、開放改革也是有利的。問題是不要太濫，不要亂來，選拔駐港人員要正派，要懂業務。在鄧小平、江澤民要求將開放改革進一步打出去之時，一些省市和國務院部委駐港的中資機構，如何能辦好？如何做出效益？如何為中國經濟打開出路？這是不容輕忽的一個問題。◎

各省、市、自治區 中資機構在港代辦處

機構名稱	來自省、市
京泰有限公司	北京
上海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
津聯貿易有限公司	天津
桂江企業有限公司	廣西
豫港企業有限公司	河南省
恒山貿易公司	山西省
燕山發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
興源公司	內蒙古自治區
香港驪山公司	陝西省
華贛企業有限公司	江西省
三湘貿易公司	湖南省
黑龍江隆豐有限公司	黑龍江省
嘉陵有限公司	四川省
西夏企業有限公司	寧夏自治區
宜豐貿易公司	湖北省
鍾山有限公司	江蘇省
華魯有限公司	山東省
江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安徽省
貴海有限公司	貴州省
海湖貿易有限公司	青海省
南珠企業有限公司	海南省
新疆開發（香港）有限公司	新疆
雲港有限公司	雲南省

中國一些城市的駐港公司

漢興發展有限公司	湛江市
渝豐國際有限公司	重慶市
金海岸企業有限公司	北海市
大連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大連市
佛山發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
廣韶發展有限公司	韶關市
粵東發展有限公司	汕頭市
華榕公司	福州市
寧興開發有限公司	寧波市
香港衛盛發展有限公司	瀋陽市
深業（集團）有限公司	深圳市
興廈有限公司	廈門市
越秀企業有限公司	廣州市
雁蕩有限公司	溫州市
和谷有限公司	武漢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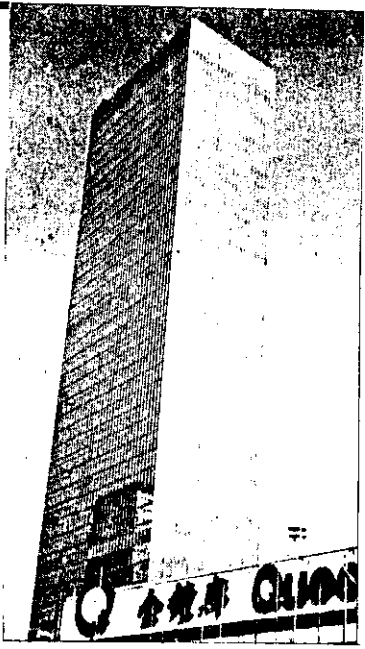
中資「整頓」內幕

據不完全统计，內地駐港人員達三萬八千多人，尚不包括內地持有港澳工作護照而自由進出的特殊人員約五千人。僅八七年底到八九年十月，中資公司就增加了五十四間，與港商「合作」名義的達九十多間。

理明

筆者在八九年八月號的《爭鳴》上發表了題為《整頓中資機構大流產》一文，對在港中資機構上層產生了震動，並引起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注意。該集團某部經理告訴筆者：該文刊發後，來港中層幹部無不稱快，而高層却在查究是誰把情況抖出去，相互猜疑並上京作解釋。

國務院、港澳辦、經貿部一再說：整頓時期，一律不批准新的公司到港。近日魯平又重「光大」的動向十分惹人注目。



申這一點。但當局的保證一再被無情事實所駁斥，破在港中資機構人員斥為「廉價的謊言」、「沒有日期的期票」。

惡性膨脹的中資公司

中資機構提供的資料表明：從八七年尾到八九年十月，僅以國務院屬下各部委及有關省在港開設貿易、投資、發展等公司達五十四間，以和「港商」合作名義開業的貿易公司達九十多間，單在華潤大廈就增添了十二間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港市民如何相信當局有關負責人的保證呢？

據筆者所知，在港現中知名人士早在四年前就紛紛向中央領導人提議，要關注在港中資機構的發展。八七年在大批國內省、市湧向香港開辦「貿易公司」時，一些知名人士就已開

始憂慮，向最高領導提出：要壓縮、整頓中資機構。這不能不說是一帖及時的「苦口良藥」，因為他們和中資機構領導層交際往來，深明中資結構、人事、運作的內情。

在港的中資機構人員（國內派來）究竟有多少？港報魯平先生十分坦白說：「不清楚。」這看來是說真話，因為官僚、浮誇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來的通病。其實要知究竟有多少人，打個電話問一下發簽證的部門，不就一清二楚了？據不完全统计，內地駐港人員達三萬八千多人，尚不包括內地持有港澳工作護照而自由進出的特殊人員約五千人。

在此想列舉些在國務院、港澳辦、經貿部發出暫停批准內地到港辦公司指令後國內在香港設立貿易公司的例子。

靠人際關係做生意

設在××大廈某機械部屬下公司斥資五十萬美元辦了間進出口公司，總經理是位已退休年齡的副局長幹部，到港一年半已周遊西歐八國，僅出差費一項達港幣十八萬元，招待國內來港同事、上級，花費了三十多萬，平均每人花費達一萬五千元。令人吃驚的是該公司一年半載竟無一單生意成交，却化了國家近二百五十萬港元。

也在同一大廈，佔了差不多某樓層，號稱中台合資開發的公司，其總經理的父親是武漢軍區參謀長，三年多前通過關係弄了一張菲律賓的護照及單程來港定居證，近兩年來利用其父關係，已結有關係人員倒賣國內、國際市場塑料、煤和生鐵，一進一出賺了兩百多萬人民幣，八百多萬港幣，後改姓為李某某，搖身一變成愛國「同胞」商人，在京受到副委員長接見。這位年僅三十多歲的總經理得意洋洋說：「和國內做生意，首先要講人際關係，其次要會通路子，資本、知識多是以後的事。」這位將軍兒子的確有兩手，從一個半文盲成了中台合資公司的總經理，並擁有千多萬財產，這實托共產黨的福。

對夜總會情有獨鍾

就在該大廈對面的某大廈，由東北某省出資二百萬港幣辦了間省港「合資」公司，七個月就化光資本，靠中資銀行貸款過日子，其董事長是位「歸國華僑」，還有一個什麼「人大」銜頭。這位董事長用銀行貸款買樓，再供層樓收租自己用，買了輛本田車，用他自己的話說：「用來接送內地來港幹部。」公司開辦兩年不到，已接待由該公司邀請來港代表九批共三十五人次。該公司總經理成了附近夜總會的貴客——內地來的幹部，對夜總會情有獨鍾。

八八年十月在上環一間商業大廈，有一間××實業有限公司開業。董事長來自北京糧食部門，總經理夫婦來自商檢局，資金是由中國設在泰國的企業中抽調到香港的，是地道中資公司，但對外部聲稱為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三位京官到港即擁有一輛奔馳（平治）、一輛本田，又配備兩位司機，一年來通過原在京人事關係，把某港商已簽訂的一單黃豆粉（飼料）合約奪過來做了，連基本商業道德也沒有。更可鄙的是該公司總經理企圖搶奪香港某集團公司已展開的一單生意，自己去成交，被揭發後，惱羞成怒，威嚇某集團公司說：「你們算什麼，我只要回大陸對上講一下，你們公司休想和大陸做成生意。」某集團公司成員却不買帳，回答說：「這在香港，請你把流氓無產者一套收起來，看你未必有多大本事，現在不是毛澤東專制時代。」聽聽這位從京派來港的總經理一副流氓加霸道的腔，使人感到噁心、痛心、擔心。

面對上述種種弊端，回頭再看中共領導和港澳負責人一再保證要整頓好在港中資機構，人們還有信心嗎？

態度橫蠻 不合邏輯

評中共喉舌大罵港官

中共最近連番對「支聯會」和港官炮轟，是因為經過「六四事件」，香港人對政治問題逐漸達成共識，對中共暴政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中共要破壞這種共識。

羅汝佳

神經過敏不斷升級

中共「六四」大屠殺之後，由於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及國內人民的抵制，太過神經過敏，往往聽到風就是雨。最近中共對港府常務司屈臣的謾罵不斷升級，就是最明顯的一例。

八月十四日，常務司屈臣在一個午餐會上發表演說，對基本法起草工作提出意見。八月十六日，中共在港喉舌《文匯報》和《大公報》都發表指責文章，《文匯報》指責屈臣的做法「違反了起碼的外交常識」。八月十八日，高一層的中共喉舌新華社發表了高一層的指責，題目叫《港府一官員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八月十九日，中共政府部門外交部更是再次升級，把屈臣對基本法提意見的「罪名」等同於西方國家對中共鎮壓民運的批評，指責為「粗暴干涉中國的內政」。

打破僵局，反被指責

「六四」北京屠城之後，香港人對所謂《基本法》及其諮詢工作完全失去信心，只有幾位熱衷於為中共擦鞋的常委、諸葛，毫無代表性地誘導港人說，「有《基本法》總比沒有《基本法》好」，並表示延長諮詢期，歡迎港人繼續對《基本法》（草案）提出意見。

但是，香港人的反應是一片沉默——連憲法都會隨意踐踏的一個政權，又有誰有興趣對其所起草的小憲法《基本法》提出意見呢！常務司屈臣的演講無疑是打破了此一僵局，却招惹了中方連番指責。那麼，屈臣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屈臣在這篇題為《收拾局面》的演講中，針對「六四」之後的形勢變化，對《基本法》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主要內容有：《基本法》頒佈的時間應該推後，解放軍平時沒有必要駐港，《基本法》某些條文背離了現有制度及沒有充分反映中英聯合聲明有關條文的規定等等。其實屈臣是講了真話，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人的心聲。況且這些意見過去都曾在英國國會公開討論過。

如果中共真心誠意諮詢港人，也會聽到這種意見。那麼，中共為何要強烈加以指責呢？他們的指責又是否合理呢？

全世界都不懂「外交常識」

《文匯報》、《大公報》的指責，都圍繞所謂「外交常識」大做文章。這兩篇明顯是由中共官方統一炮製而以不同署名發表的文章，異口同聲批評屈臣及英國政府違反「外交常識」，這把中共官員「全黨統一」、「全國統一」那一套以「外交常識」強加給自由世界，並沒有任何新鮮感。

兩年前，美國國會一些議員公開批評中共鎮壓西藏人民，即使他們以個人身份提出，中共也曾指責他們不懂「外交常識」，指責這是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

今年六月，自由世界各國政府都強烈指責中共野蠻鎮壓民運是違反人權，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出於人道庇護方勵之夫婦，中共亦指責這些國家違反「外交常識」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但是，中共跟著別人指責南非政府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中共指責以色列軍隊屠殺境內巴勒斯坦人，中共直接介入柬埔寨內戰，這算不算違反「外交常識」和干涉別國內政？中共的「外交常識」是哪一門子的「外交常識」？是不是世界各國都不懂的「外交常識」？我們也不能怪中共無知，因為中共那些老人們及那些御用文人們，他們除了扣帽子，還懂什麼？

《文匯報》文章邏輯混亂

對於屈臣八月十四日的批評，根據一九八八年四月《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公佈時港府發表的聲明「起草基本法是中國政府的責任」，《文匯報》八月十六日發表署名專論批評說：「基本法的制定、諮詢、頒佈完全是中國方面的事，屈臣作為港府高官，沒有理由公開發表意見。」

這段話，根本就不合邏輯，不負責任。制定、諮詢、頒佈「工作」，完全得不出不能「公開發表意見」的結論。

即使按照港府先前的聲明「起草基本法是中國政府的責任」字面上去解釋，也只能解釋為港府或英國政府沒有起草基本法的責任，即它們不能代替中國政府去起草基本法，並不代表它們沒有對中國政府所起草的基本法提出意見的權利。

屈臣的演講，並沒有代替中共去「制定、諮詢、頒佈」《基本法》，只是作為被諮詢對象發表一些意見而已，即使像市民一樣說基本法必須「推倒重寫」也不為過。屈臣演講時已重申基本法是中國的事，他後來也解釋說，他提出意見只是希望鼓勵市民多就基本法草案發表意見。中共的語委不是說歡迎各界人士提意見嗎，何必對港官如此敏感！

《文匯報》全面「轉軌」

曾幾何時，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張漢生副社長的策劃下，《文匯報》擁護（伯堅）倒李（子誦）成功，信誓旦旦地說《文匯報》會堅持為民喉舌，有憂國憂民、喜報喜、不喜「轉軌」。言猶在耳，面對港人對前途的憂慮，對《基本法》問題的不滿，《文匯報》却視而不見，熟視無睹，而屈臣僅僅替港人說了幾句真心話，《文匯報》就於八月十六日大打棍子，大扣帽子。這也難怪，因為《文匯報》早在七月中旬整肅李子誦社長之前，就已悄悄「轉軌」，脫離人民的軌道了。

更為明顯的是，八月十八日，新華社發表文章指責屈臣和英國政府，《文匯報》得到社方支持之後，八月十九日早上，報館門口為證明「不會轉軌」的偽裝也撕掉了。在此之前，《文匯報》為表示與香港市民站在一起，報館大門兩邊的欄窗還一直展示「討伐民賊」的照片，十九日早上，《文匯報》欄窗裏撤掉了這些照片，換上了祖國建設欣欣向榮的照片。有愛不報憂，無喜不報喜，至此，《文匯報》已全面「轉軌」。

新華社慣於斷章取義和歪曲

至於新華社，今次表演更是卑劣到了極點。屈臣當日的演講詞，中文題是《收拾局面》，但新華社在批判文章中却歪曲成《收拾殘局》。歪曲別人講話（文章）內容連標題也歪曲了，可見卑劣到何等程度！

本來，香港只有兩份喉舌報紙向屈臣的講話，新華社却拉了其他報紙來在文章中陪一殺，讓人覺得除了黨報，好像還有其他社會輿論支持他們。但是，正如八月十九日日本港《快報》

所指出的，「除了大公報和文匯報外，新華社向斷章取義引述其他報章的言論，至於一些認為屈臣的講話並非干預中國內政或基本法起草的意見，則未見引用。」而《明報》則對中共如此敏感反應發表批評，稱之為「一杯杯裏的風波」。

這也難怪新華社，因為中共的本質就是這樣。四十年來的歷史不去說它，光是「六四」之後，中共對它前黨總書記趙紫陽的指責，對方勵之的指責，對嚴家其、劉曉波、萬潤南的指責以及對香港「支聯會」的指責，哪一篇文章不是極盡歪曲和斷章取義之能事？中國大陸十一億人口，沒有一家民辦報紙，容不下一張半官方半民間的《世界經濟導報》，只准官報口出狂言，不准人民「亂說亂動」，而只有六百萬人的香港，中共官方却設置了五家左報和多家通訊社，更通過種種手法控制、影響不少傳媒，頻頻干預香港人的政治生活，反說香港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和常務司屈臣對《基本法》提出意見是「干涉中國內政」，這是哪一家邏輯，又是哪一家的「外交常識」？

中共要內外蒙騙人民

中共今次惱火港官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屈臣把香港人的心聲公開講了出來。他們說「如果確有什麼要表示的也應透過外交途徑」。這反映了中共反人民的本質。

現在的香港問題，既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也不是外交問題。現在香港仍由英國管治，而《基本法》又影響它管治下的六百萬人的前途，對此提出意見又怎能算是「干涉中國內政」呢？如硬要說英國干涉中國內政，應該是一百多年前鴉片戰爭就已開始，而不是今天。

中共硬要港英用「外交途徑」表示意見，目的是要港英當局與它同流合污，不讓香港人知道港英當局對香港問題的真實態度和意見。關起門來立法是中共的一貫做法，什麼都要在它控制之下進行，反映意見，國外的要按「外交途徑」進行，國內的要按「正常渠道」進行，一切公開到傳播媒介的意見，中共都是不願接受的。但是，四十年來，中國人民通過「正常渠道」反映的合理意見，中共接受了多少，不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嗎？中共強調「正常途徑」（包括所謂「外交途徑」），並非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蒙騙人民，不讓共和國的主人知道真相。

中共想破壞香港人的共識

在今次事件中，屈臣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他希望藉自己的講話鼓勵港人發表意見。他可能不知道，中共根本就缺乏真正諮詢港人意見的誠意。在前一輪的諮詢中，香港不少人那樣熱烈和投入，結果却弄出一個「雙重」怪胎，早就搞得香港人患上「基本法癡木症」。在「六四」之前的「趙紫陽開放時期」，中共對港人意見尚且如此視如無物，在如今的「鄧、李、楊反動時期」，港人要中共真正有誠意接受意見，不是與虎謀皮嗎？中共國內草委、諸委最近也決定在這第二輪延長的諮詢期內，不來香港直接聽取意見，却遙控着香港諮詢委員會傳聲筒傳達聖旨，他們並不是想真正諮詢港人意見，他們希望香港鴉雀無聲，好讓他們蒙混過關。但屈臣破壞了這種氣氛，中共最近連番對「支聯會」和港官炮轟，是因為經過「六四事件」，香港人對政治問題，對香港問題逐漸達成共識，對中共暴政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中共要破壞這種共識，以達到分化港人、各個擊破、以利控制的目的。

在「六四」之前，中共的甜言蜜語還蒙騙了不少人，他們跟着中共的指揮棒轉，中共知道在其控制下，香港人無法達成共識，所以當時中共表示，如果港人對政治有共識，中方可以接受。「六四」血的教訓使原本對中共寄於厚望的那部分人警覺，港人的共識迅速形成，而中共却出爾反爾，八月十八日，通過諮詢委員會北京請示，諸委秘書長梁振英回港講話了，他不無表情地說：中方以往表示接受港人共識，是基於這個共識符合草委制訂政制方案的原則。但中共以往却没有這樣說過。

梁振英還強調，國內草委指出，草委會政制小組兩年前已通過政制設計的基本原則，並向全體大會提交報告。這等於說，政制小組通過的共識，提交給了草委會，通過與否也算是草委會的共識了，而香港市民的共識如果與政制小組的共識有差異，則以政制小組的共識為準。這是什麼邏輯？人民在這些官僚眼中還有沒有位置？這根本就根本把草委會政制小組的共識與香港人的共識混為一談。草委並不代表香港人，政制小組也不代表草委會，他們完全受中共控制，毫無民意代表可言。他們要香港人的共識符合他們的原則才會被接受，這不僅正如屈臣所說「背離了現有制度」，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民意強姦，以強權破壞香港人的民主共識。

為了使香港民意被強姦，中共與此同時又設

下了另一個陷阱。梁振英回港振振有詞地說，國內草委保證將來不會派人在特區政府工作，請香港人放心。中共對香港人的共識的保證，弄成如今的結果，中共新的保證，還有人會相信嗎？況且，鄧小平未開金口，國內草委又有什麼資格胡說八道？再且，鄧小平說了又如何？鄧小平當年不是向外國人誇下海口「天塌下來有胡（耀邦）（趙（紫陽）頂着」嗎？最近他不是「反思」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重用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嗎？

一個不講法治的國家，任何保證都是多餘的，《基本法》也是一樣。

事鳴月刊 1989/9

十·二前夕香港密令

黎加路

斥兩報背離黨指示太遠

六·四事件後，中國國務院港澳辦突然邀請《文匯報》、《大公報》人員訪問北京，除了港澳辦高官鮑鵬飛、李俊傑、北京市市長、黨的新貴、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也趕來接見。

這次造訪京城，由《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及《大公報》副主編陳彬率領十一人代表團，不單一如外界公佈，兩報訪問團，傳達鮑鵬飛所言「一國兩制政策不變」，穩定人心的話，更重要的是中央要當面訓斥兩報在「北京風波」事情上，起了推波助瀾作用，沒有維護黨的利，完全失去黨喉舌的功能。

李瑞環大罵陳伯堅領《文匯報》會大罵道，而且立場比《大公報》更接近學生和知識分子。陳伯堅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他也是《文匯報》李子誦事件的主角之一。陳伯堅的真正角色是代表中央、監督《文匯報》。

李瑞環力斥兩報「迷失方向」，完全叛離中央指示，失去作為黨喉舌的作用，中央可能只取其一，又或兩者俱棄，另立一份嶄新的喉舌報，要旗幟鮮明地效忠黨，為黨服務，要像台灣在港的《香港時報》般發揮作用，代表所屬黨的利益。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也訓斥兩報背離黨的指示太遠了，港澳辦管

許家屯一反過去作風

這適用於駐港的最高中方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也急謀對策，希望能除香港的「反革命基地」這項巨幅，力圖細細打壓，穩住他苦心經營這「自由化」土地。

許家屯於日前親自約見民主派旗手司徒華，「曉以大義」，力陳過渡期香港極為敏感脆弱，若中港關係惡化，難保一國兩制的支票順利兌現。

許家屯一反以往約見民主派人士的作風，以往他多是只聽不講，又或是「純粹吃飯」，「打哈哈地談說月」，這次主動遊說，是希望被大陸視為「反革命」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解散，免中港對抗加劇。

香港支聯會是目前支持海外推動中國民主運動和支援民主分子的主要力量。根據該會最近的公佈，七月初，支聯會曾撥出一百萬元，資助流亡海外的吾

李瑞環大罵《文匯》《大公》迷失方向 許家屯力勸司徒華解散支聯會

中資出版業將「清污」

十月一日「國慶」前夕，香港的中資出版業單位，將面臨一次嚴重的清「精神污染」書籍的重壓。

自北京「六四」血腥鎮壓，全國各地翻天覆地的搜捕涉嫌分子，傳播民主訊息的書刊即被查封禁售，遠在南方一隅的香港，似乎沒有受到威迫，各大中資書局仍然公開銷售方勵之、嚴家其、劉賓雁等異己分子的書籍，以及如前後春荷的民運專書，再版多次的《河殤》。

據筆者了解：這表面「自由化」的局面，原來潛伏着暗潮洶湧，只是由有心人頂住撐過去。

據悉：早自今年七月中央《文匯報》事件前後，中央已下達命令，勒令本港所有中資出版機構不得出版及出售「反革命」書籍，定義之廣泛，任何與政治、民主治上邊界的書籍都可能算入被批之列。

十·一「國慶」前夕，中央再下達文件，明令禁止中資機構傳播「反革命」書籍，限期清架。在市場經濟導向下經營的中資出版機構，會否來一個大倒退，只出舊書？這樣的一個直接的干預，會否重蹈《文匯報》事件，震盪中資機構員工，再打擊港人信心，這都有待事態進展，才能揭盅。

寫於一九八九九月二十二日



李瑞環大罵《文匯報》《大公報》



在北京六四事件之後，香港人擔憂不能「自救」，社會性的惶恐，與六四之前支持北京民主運動的熱情，形成強烈的對照。目睹北京當權者似乎「大局已定」，對內加強鎮壓，對外惡言相向，香港人心動盪更甚。在「北大人」的陰影下，港人如何自處？會不會畏縮不前呢？

以此為題，八月十七日的「政治沙龍」請來了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全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兩位骨幹楊森及何俊仁，加上多次出席本刊沙龍的鄭宇碩和最近幾個月在美國從事研究的原任教浸會學院歷史系的楊意龍，縱論現時的香港政情。

黨報色厲內荏

話題先是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斥有人要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央的基地，即七月二十一日署名艾中的《「一國兩制」不容破壞》。黨報這種文章是否已在香港產生恐懼性的效果呢？

楊森表示，文中這類文章的確產生壓力，

中方威嚇，港人畏縮？（政治沙龍）

中方對香港惡言恐嚇，說明當權者色厲內荏，但它產生一定的威嚇效果。目前港人普遍覺得無奈，但香港今後的政制、港人組織和「救港」的工作，仍須繼續。

果，也是事實。在這種現實之下，香港人對支持民運是否要轉向低調呢？

何俊仁認為，不論有沒有文中這類言論，港人也了解到，支援民運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不必高聲疾呼，而是要深入和多元化地進行。

楊森補充說，所謂多元化，可以用各種形式支持民運，如「民主藝墟」是以表演方式表達對民運的支持，主辦者不必是支聯會。推廣之，希望海外華人及世界各地的團體也同樣支持中國民運，不必把焦點集中在香港。楊森同時指出，有人覺得港人支援民運是錯誤，說港人支援北京學生，於是學生留在天安門廣場不走，至今當局血腥鎮壓。針對這種論調，必須指出，港人支援學運是基於人權，是出於正義，錯誤完全是當局實行鎮壓，不能倒果為因，反過來歸咎於港人支援。

鄭宇碩說，一般市民的確因為官方威嚇而出現分化，對支援民運有意見分歧。他認為，港人支援民運應該分工，從政者減少支援工作及表態，關注人權者繼續監察人權狀況，協助營救的人則只看不說，正如西歐也有不少營

因為它代表當權者，針對香港「民主派」旗手司徒華、李柱銘及支聯會。文章本身完全是強詞奪理，部份香港市民可能會因此與「民主派」保持距離，但卻不至於不支持與民主。

何俊仁說，這種文章只是擺出威嚇的姿態，道理上不能服眾。它擔心的是支聯會號召力的擴大，以至勢不可擋。其實，即使沒有文中這類文章，當權者表面上穩住大局，已使香港人感受到壓力。因為港人六四之前清楚表明支持民主運動，而現在北京出言恐嚇，相信會嚇怕部份香港人。但另一方面也使人們覺得需要更加團結，支聯會就接到不少市民的電話及來信支持。

鄭宇碩說，文中這種文章說明當權者是色厲內荏，自己缺乏安全感，所以才大罵外國及香港「干預」和「顛覆」。其實香港的客觀存在就影響著內地。過去中方一直能夠接受香港各種傳媒的報導及輿論，甚至接受「美國之音」的對華廣播，但現在卻惡言指責。最近常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把香港比喻為「井水」，也算恰當，因為香港相對而言甚小，「河水」的

救東歐的人，他們只是默默地做，不要任何宣傳。何俊仁同意在支援中國民運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他說，香港人對中國民運的表現，已贏得了海外普遍的好感。一百多萬人的街，而且不是為了錢，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何俊仁和楊森等曾代表支聯會參加七月底在芝加哥舉行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大會。在芝加哥時，很多人要與他們見面，包括由法國前往赴會的幾名發起組織「民主中國陣線」的民運人士，並且表示對香港期望很高。

如何打破六四後的悶局？

楊意龍在美國得到的印象是，香港人對中國民運的表現雖然受注意，但香港人仍未受重視。例如美國有一些議員對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表示關注；他們見到個別的大陸留學生會認為他代表很多人，但對個別在香港則有不同態度。楊意龍認為，六四之後香港的一大問題是人們普遍覺得很無奈，他們想知道支持中國民運為香港帶來了什麼，香港

清濁，主要是它在內因素使然，「井水」不足以影響它。至於支聯會的組織，在香港是合法的，只要在合法範圍內活動即可。由黨報指斥，難道香港人非揣摸它的意思不可？如此一來還談什麼法治？

談到官方文章在香港引起的反應，如兩局議員李鵬飛也認為是司徒華、李柱銘的言行惹怒了中國當局而被批，楊森及何俊仁提出了反駁。兩人說，李鵬飛也許對「民主派」有意見，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必須受保障。假如有一朝一日李鵬飛的言論被中方指斥，「民主派」也絕不會沉默，即使不贊成李鵬飛的言論，也會維護他的發言權。

楊意龍認為，《人民日報》的文章可以反過來理解，就是當權者認為香港已對它構成壓力，它有不安全的感覺，所以才對香港擺出威嚇的姿態。

低調支持民運？

中方對香港的恐嚇性言論，在道理上說不過去，固然是事實，但它產生了一定的威嚇效果

本身的民主化是否淡出，港人目前還可以做什么，「民主派」能否打破悶局。何俊仁表示，支持中國民運給香港帶來的是一場政治洗禮。香港從來未有過這麼多人在街遊行，港人的民主意識也有了一個新的觸發點，人們由此了解到民主政制和政治制衡已屬天經地義。

楊森表示，因為中國民運的事，「民主派」在一段時間放下了其他工作，現在要再關注基本法、政制及人權法案等問題。還有，「民主派」要認真考慮組黨，因為再下去香港勢必產生領袖真空，而且距離九七時日無多，香港在九一年起就要開始建立民主選舉的制度。

鄭宇碩表示，組黨相信要在人們冷靜下來之後才能成事。現在港人有如驚弓之鳥，不少人要移民，組黨固然表示有人願意承擔，但也未必能挽回人們的信心。何俊仁表示，正因為六四之後，香港人心大受動搖，所以民主制度是今後必須的，而且還要更多其他的保障。因此，「港人救港」的工作仍要繼續。原來的三個重點是爭取居英

何立

權、民主政制及制訂人權法案。他們月前赴英遊說，已構成了壓力，表達了港人的焦慮，證明有助於加速香港民主政制的建立及人權法案的制訂。下一步的工作是在九月及十月英國兩大黨開年會時再去進行遊說。

今後仍受劇變衝擊

鄭宇碩則認為，從香港建制階層如港府官員及部份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表現看來，明顯是英國有意加速香港的民主化，一來是考慮光榮撤退，更大的考慮是不願意放鬆居英權。最後，楊意龍說，六四事件說明中國還會變，而且因為它的變化太難逆料，所以香港人不如乾脆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對此，其他人認為，正因為中國大陸的變化太不可知，甚至難以變到理想得無法想像，這才是港人恐懼、焦慮和人心浮動的癥結所在。於是才有一「港人救港」，爭取居英權，構思在海外建「新香港」，以至把香港租給聯合國作為亞洲總部的提議。從北京的政情看來，在未來的年月裏，香港人肯定仍要受到內地劇變帶來的震盪，而最大的一個可能就是領導層死人。



香港民運面臨考驗

在中共的威脅和恐嚇之下……

香港人在五、六月中國民運期間曾大力支持國內的民運人士，但最近在香港不斷的威脅及恐嚇下，態度已明顯趨平。很多本地活羅民運分子都不敢進入大陸，而愈來愈多人感覺到對幫助中國民運所能做的事已非常有限。代表多個愛國民主運動組織的「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今年七月被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打成「反革命」和「顛覆」組織，令「支聯會」的成員在涉足大陸時可能遭受被捕及被控的命運。為了排除「支聯會」，中國政府曾要求英國政府取締該組織，但為英國所拒絕，理由是它是合法註冊的香港團體。

另外，「支聯會」成員之一、積極支持中國學運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最近亦被新華社香港分社警告，說學聯「仍未定性」，但如果它繼續支持中國的「反革命分子」，將會面臨「支聯會」的同一命運。新華社官員更叫學聯的成員不要進入大陸。

當中國民運在五、六月間進入高潮時，超過一百萬港人曾自發地上街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一時間，香港人冒著可能觸怒北京政府的危險，在憤怒和悲痛的情緒中團結一致。但這一度被視為港人政治覺醒的示威遊行熱情，看來只是曇花一現。面對中共政權不會被推翻的殘酷事實，香港人的意志開始軟化，更不願面對因他們行動可引致的政治後果，因此，很多人都回復到以前對政治不聞不問的態度，很多人更決定盡快移民外國，暫時不打算走的人則表示香港應集中精神幫助中國人民，加強他們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認識。

對北京的強硬派領導人來說，香港人支持北京民運分子對抗中央政府的做法是證實了他們一向堅持的想法，這就是香港是對中國輸出一「精神污染」和「反共及反革命活動」的基地。因此，當局在「平定」了北京的「反革命暴亂」後，就開始把矛頭指向香港。

在「支聯會」快要被北京打成「反革命」之前，它的兩個成員組織——受中共控制的港九工會聯合會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合會，相繼宣布退出。一些左派的政治觀察家認為，工會及教聯會離開「支聯會」是北京重新對港中方機構施

（遠東經濟評論）香港區記者 劉慧卿

加控制的表示，因為在五、六月間，很多中方機構的員工都有參加支持中國民運的示威遊行。

一項接近共產黨的消息指出，當香港人指責北京「法西斯政權」的運動進入高潮時，一些中共駐港的幹部表示害怕會激發大陸及受懲罰。消息說，中共一向已設立「地下通道」，把他們認為是香港的「壞分子」帶返中國，而不須驚動香港政府。在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就曾以這個方法從香港帶走某些人員。

「支聯會」今後將扮演間接角色

中國政府強烈指責「支聯會」，用意是要恐嚇香港人和孤立一些「民主派」活羅分子。面對中共強大的壓力，「支聯會」的一些成員表示他們今後可能要在支援中國民運活動上扮演一些間接的角色，將工作集中在聯絡海外華人的事務上。「支聯會」成員、滙豐主席楊森說，「支聯會」的目的是要用「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法去幫助爭取在中國設立民主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促進共產黨與其他政黨「和平共處」，而不是提倡推翻共產黨。

楊森又反駁中共所稱「支聯會」給予叛逃離心分子經濟支援就是「干涉中國內政」的說法。他說，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的中國人可以參與中國政事，只要這些活動符合香港法律。但他承認目前形勢比人強，因此覺得香港人很難再直接支援中國的地下民主運動，這是因為香港與大陸接壤，令中國很容易向香港施加壓力。楊森說，香港將來可以做的只是透過中港經濟及文化交流去影響大陸的政治文化。目前「支聯會」正面臨進一步的考驗，就是會否加入由逃亡海外知識分子及學生領袖吾爾開希領導的「民主中國陣線」。

姚勇戰的命運未受關注

一些香港人更因參與或支持大陸民運而被扣查或被捕，其中以姚勇戰的處境較為危險。姚勇戰是香港綠印居民，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曾積極參與大陸的學運。六月中，他在上海被捕，並可能被判「反革命」罪。另一名香港人劉山青已在中國坐了七年監，罪名亦是「反革命」。劉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港府和其他香港機構亦無法營救他，幾年前他被人權組織「國際特赦協會」認定是「良心犯」。跟劉山青的命運

「旗手」出局？

北京當局指為「進行顛覆中國活動」的香港民主派「旗手」——司徒華和李柱銘，可能會遭北京停止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草案）的職務。香港一些政界人士認為，北京若這樣做，雖比將兩人「撤職」溫和些，但仍會進一步打擊香港人對《基本法》的信心。

大陸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上週舉行會議，會前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言人張虎生指司徒華與李柱銘做了許多與草案身分「極不相符」的事，並說兩人應否留在草案委員會內，需要由人大常委會議決定。

較早時香港親北京的《大公報》羅列司徒華及李柱銘在北京學運以來言行，指他們煽動大陸軍隊叛變，呼籲打倒北京政權，否定《中英聯合聲明》，到外國游說制裁大陸等。草案委員會秘書處曾就李柱銘嚴重違反草案一事表示，李與司徒華須先「公開聲明放棄原來敵視和企圖顛覆中國政府、企圖否定《中英聯合聲明》的立場」，但兩人均拒絕「認錯」，故一般相信北京會革除他們的草案職位。但消息人士對亞洲週刊說，北京可能採取較溫和做法，只予「停職」處分，不讓兩人繼續參與起草工作。

李柱銘（右）與司徒華：難逃北京處置



光看待港人問題，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一些政界人士認為兩位「反對派」若被撤職參與起草《基本法》的權利，會削弱港人對這份香港「小憲法」的支持，但也有香港人對此不以為然。草案秘書處認為，即使少了兩個人，其他香港常委可以多出一分力，在草案會內反映港人意見，故影響不大。

控，李柱銘及司徒華認為理由並不充份，並表示若被撤職，便意味北京會向支持過大陸民主運動的港人「秋後算帳」，勢將進一步打擊港人信心。司徒華說：「若人大常委會罷免我們，實際上是指對所有曾參與支援民運的本港市民。」李柱銘則表示，人大常委會當然有權撤除他們的草案職務，但必須就此向香港人交代。香港三大民主派團體之一的「匯點」主席楊森批評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將「莫須有」罪名加諸司徒華與李柱銘，是以大陸的眼

差不多，姚勇戰的遭遇在香港亦未引起很大的關注，營救他的工作正由學聯進行，包括聯絡香港新華社及尋求法律援助。「支聯會」曾表示願意協助，但被勸止，說它的介入只會幫倒忙。學聯秘書長陶君行說如果姚勇戰被起訴，學聯會派代表前往旁聽。同時，學聯正在號召各國體杯葛明年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

和「支聯會」一樣，學聯也遭受來自內部的壓力。「六·四」大屠殺之後，學聯曾發表一份聲明，號召所有國家斷絕與北京的外交關係，及向中國實施經濟制裁。陶君行說學聯的一些成

員不贊成這份聲明，所以它可能不獲正式通過。在「支聯會」所有成員之中，新聞從業員吳仲賢的反北京立場看來是最堅定的。吳仲賢是七十年代的政治及勞工活羅分子，並曾為「托派」成員。在八十年代初期，他曾因接觸大陸的民運分子而被中國當局扣留。吳仲賢說從「六·四」大屠殺事件可以清楚看到，如果中國沒有民主，香港就沒有前途。他說，既然大部分香港人都不離港，因此他們應盡力幫助中國爭取民主。他又說，北京政權殘殺人民，所以失去了合法性，應要推翻。

中共不容香港變為「反共基地」

中英外交部門將有新交鋒

□伍義生

鄧小平決不容許顛覆中共分子在香港形成氣候

中共高層最近明確表示，決不容許香港變成反共基地。

89年7月底，英國外相馬卓安和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巴黎晤談，雙方協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9月底復開，並於今年12月份再舉行一次。

在這之前，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中國外交部曾就一些人和組織策劃要使香港成為反共基地的事，向英國方面進行了交涉。

香港問題的決策人

當前主管香港工作的最高負責人是鄧小平和江澤民。中共中央外事小組組長李鵬、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外交部長錢其琛，以至許家屯、周南等人，都有一定的發言權。

英國外交部門的人事最近出現了變化，同樣地，中共的外事領導小組也有新的調整。在今後的日子裡，外交部門對香港的影響力將會越來越重要。港督衛奕信不久將有北京之行，他亦將會與中國外事部門的有關人士會談交換意見。而中英兩國就香港的政制問題、一些活動問題，將會出現新的交鋒。

鄧小平已經聲言，決不能使顛覆中國的搗亂分子在香港形成氣候。對於香港的未來，鄧小平認為關鍵是選拔好人，這些人是要愛中國、愛香港，謀求穩定繁榮的「持平」之士。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1997年之後，香港政府應該穩定，一切核心問題都要從此着眼。

最近以來，一些負責香港問題的中共官員，都正在重溫鄧小平和毛澤東、周恩來有關香港問題的指示，並以此作為製訂香港工作的基礎。

中央外事小組的分量

中共中央在對外事務方面，設有一個外事小組，現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組的組長是李鵬，副組長是吳學謙。小組成員有外交部長錢其琛、國防部長秦基偉，中聯部部長朱良，外經貿部部長鄭拓彬、《人民日報》社社長高狄等。年邁的姬鵬飛是這個小組的顧問。從這份有份量的名單中，可以見到這個小組的重要性。

中央外事小組並不是公開組織。它在中共中央內部主要是起一個諮詢性質的作用，而不是決策實體。它的基本職能是交換意見、研究問題和傳達精神，小組不決定採取什麼具體措施。以香港問題來說，最終權力是相當集中的，主要是決定於鄧小平等少數幾個人的手上。

因此，就香港問題來說，人們不能不考慮鄧小平對香港問題的看法。鄧小平有關香港問題的主要觀點是：「一國兩制」，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香港的政制民主化，只能循序漸進，而且決不能影響未來的繁榮穩定；香港人將來執政時，香港政府應該穩定，因此要選拔好人，這些人是要愛祖國、愛香港的；決不能讓搗亂、顛覆中國的分子在香港形成氣候。不要怕下預，中國要體現在港主權必須駐軍在香港，小亂頂住，大亂就要出兵。對搗亂分子要給予鎮壓。

在香港，有人認為可以不理會鄧小平的意見……

還有半年多，香港的《基本法》就要正式公佈了。中國全國人大在1990年4月通過的《基本法》肯定不會違背鄧小平上述一系列反覆重中的觀點的。鄧小平有關香港這一系列意見，已經不只是他本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整個國家的決策。在香港，如果有人認為可以不按《聯合聲明》辦事，或者在政制等問題上可以完全不理會鄧小平的意見，那肯定將來是會不被承認和招致衝突的。

廣角鏡月刊 89/8



▲中央外事小組顧問：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

348

有些人在這裏對中共抗拒是正常的事，中共只有在香港加倍努力，才能擴大其團結面，建立廣泛的社會支持，使1997年後香港回歸中國時不會出現重大震盪。中共應該注意建立基礎，避免四面出擊，以免陷入孤立的狀態。

中共應該重建人際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自「六四」以來，中共既以民主派為主要打擊對象，又指摘港英縱容反共活動，也批評中間派、工商界和左派陣營內願意與民主派或港英合作的人士。剔除了諸式人等後，有資格被中共稱為「有識之士」的人真是寥寥可數，難道這是正確政策的應有效果嗎？希望這只是中共短期內的應變措施，否則對香港安定以至對中共都是很不利的。

1997年時實現港人治港，使香港的資本主義如常運作，是對中國的最大利益。香港是一個人才濟濟的社會，現在只有極少數人可以成為中共依靠對象的「有識之士」，真的是對中共政策的一大諷刺。而港人治港如果失敗，香港人固然是直接受害者，中國也會遭受重大打擊。

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微妙而敏感，需要處事者有高度政治智慧。不過社會畢竟是人組成的，難於完全拋棄情緒，香港過去也曾經出現暴動、騷亂，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事故的社會。重要的是，有關人士能以本身的利益（注意：是本身的利益，不是他人的利益）為出發點，對這些利益的追求不致受一些短期政治行為所衝擊，做出一些損人而不利己的無聊事。

廣角鏡月刊 89/11



中共為何收緊 對香港政策？

中共強硬對待司徒華、李柱銘

1989年10月31日，《基本法》的最後一次諮詢期結束。同日，人大常委會以敵視中國政府為理由，終止司徒華及李柱銘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職務。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使中港關係再蒙上一層陰影，並進一步顯示出中共的強硬態度。

中共反覆強調， 不容香港成為顛覆基地

最近幾個月來，中共反覆提出，決不容許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反革命基地」、「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些「基地」名詞的表面意思雖然不一，其實質內容則無大分別，因為在中國，反共等同反革命，反共等如反對中國政府。中國不是抽象的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因此上述各個「基地」名詞的核心不外乎對中共的態度。為方便討論，下文將沿用「顛覆中國政府」一詞。

反對香港變成顛覆基地 並非中共新政策

中共反對香港成為「顛覆中國政府」基地，其實不是甚麼新政策。早在50年代時，中共針對國民黨當局在香港的活動，便曾經向英國提出要求。1956年，一架台灣戰鬥機曾在閩、粵上空被中共空軍追擊而飛到香港啟德機場降落，後來港英政府容許這架戰鬥機飛返台灣。中國政府極度不滿，曾向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出外交照會，照會內容提到「中國政府相信英國當局不會容許香港被利用為對中國進行軍事破壞活動的基地和逃避的場所。」

上述照會針對國民黨的軍事活動，但中國外交部1957年1月發表的一個聲明涉及的範圍就更加廣泛。1956年10月爆發了右派策劃的九龍暴動。1957年1月1日，港督葛量洪發表了《九龍及新界暴動報告書》。針對這份報告書，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和人民深切關懷港九同胞的安全，決不能容忍國民黨特務分子在港九地區進行危害中國居民生命財產的活動和把港九作為對中國大陸進行顛覆活動的基地。」

香港是一個「對外窗口」

由上述歷史狀況可見，反對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基地」是中共的一貫政策。不過，過去幾十年間，中共並沒有要求禁絕在港進行的反共活動。一方面，港英政府不會滿足這種要求；一方面，反共政治勢力在香港的存在對中國來說並非全是壞事。1949年時，中共決定保留香港地位不變，指導思想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利用價值之一就是一個對外窗口。中國在50和60年代受到西方國家封鎖和孤立，香港作為中國的對外窗口，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戰略作用。而要這個作用充分發揮，香港當然不能過分親共，甚至要容許來自台灣和國際的反共勢力在香港

□盧子建

活動，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錯綜複雜、互相利用的局面。

「沒有香港，起碼信息不靈」

70年代以後，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交流增加，但並不表示香港作為窗口的作用已經消失。相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需要大量的外來資金、技術、人才和訊息，香港的窗口更形重要。「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在內部講話中提到香港時，強調如果沒有香港，起碼便會信息不靈。這是一個正確的觀察。

因此，中共在嚴防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基地」的同時，容忍香港存在一定的反共勢力，使香港能夠發揮窗口的戰略作用。究竟「六四事件」對中共帶來了什麼衝擊，使中共大張旗鼓地攻擊有人企圖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基地」？同時，香港有些人的做法又是否過分超越了界線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應當觀察在「六四事件」前後香港政治形勢有什麼變化影響了中共的態度。這些變化大致可分為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在「民運」期間，出現了大規模的反對和攻擊中國政府的羣眾活動。過往國民黨雖然一直在港經營反共活動，但從來未能建立龐大的羣眾基礎，而活動亦不太公開。尤其是自70年代以來，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更日趨縮小。因此，在中共眼中，國民黨在港的活動不成氣候，不致造成對其統治的嚴重挑戰。

中共擔心「民主派」奪權

今年「民運」期間，香港市民三番四次大規模上街遊行，所涉及社會層面之廣可說空前。這種情況是中共以前從未遇到過的，對這類活動起了防範心態，覺得有必要對一些帶頭人警告，不可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

第二，「民運」期間，組織大規模反對中國政府的羣眾活動的並非傳統的右派或國民黨勢力，而是香港本地的政治力量，主要是近年成長的民主派。這個情況的重要性在於：民主派上生上長，在香港有羣眾基礎。如果反中國政府的活動與民主派的羣眾基礎相結合，其影響遠超過國民黨比較呆板的反共活動。

此外，民主派的一些領導人目前參與香港的建制，而民主派的總傾向是積極參政，亦顯得有野心在1997年後繼續參與建制或者甚至執政。從這個角度看，中共會感到民主派領導反對中國政府活動所帶來的後果，遠比國民黨的反共活動嚴重，因為民主派既有羣眾，又參與香港建制，對這兩個因素加起來所產生的影響，中共認為必須及早重視，防止擴大。中共對司徒華、李柱銘擺出強硬態度，是要分化民主派，削弱強硬分子在民主派中的影響。

香港與國內「民運」的互動關係， 對中共政權產生了威脅

第三，今次香港與國內「民運」的互動關係，比較過去國民黨單純在香港進行反共活動複雜。由於國內「民運」已演變成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並且導致中國

整體政治氣氛趨向保守強硬，中共新當權派對香港的反應不能不受這種氣氛影響。

現時中共對「民運」的官方定性是由「動亂」發展成為「反革命暴亂」，其中有國際大氣候的影響。為了搞臭民運的參與者和支持者，中國高層十分強調外國勢力在民運的介入。中共的官方說法是，西方國家一直企圖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五、六十年代的武力嘗試失敗後，寄希望於「和平演變」，這就是這次「動亂」產生的外在背景。

嚴格來說，中共並沒有公開證據證明西方國家對民運的參與。鄧小平公開指責美國政府介入北京風波陷得甚深，而香港成為了中共發掘證據的一個方便地。現在中共指控美國和英國利用香港、通過香港，介入民運。香港一些人確實在民運期間與學生發生過很多接觸，把英美和香港聯繫上，就可以「證明」民運的外國勢力參與。

中國對香港的政策雖然始終不脫離大體，但如果以為這種政策不受中國整體政治氣氛影響，就未免想得太簡單。

我們不應忘記，文革期間，香港爆發了一場相當嚴重的左派暴動。目前香港被描繪成「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內部的政治氣氛服務。

綜合上面的討論，中共對香港一些人支援「民運」的活動的反應強烈，事非無因。但中共現時的強烈反應也會損害其本身在香港的利益，特別會增添1997年後在香港遇到的困難。

一般香港市民今年5、6月間熱烈參與支援國內的民運活動，其實並沒有有組織的反共思想，他們受着傳媒影響，同時更是出於愛國熱情，他們很難忘記「六四」事件，但並不等如他們日後會事事針對中國政府，但中國不把事情真相說得透徹和有說服力，他們當中不少人還是會有疑慮的。

民主派在5、6月間領導羣眾活動，其着眼點也是羣眾情緒，通過這些活動與羣眾建立關係，擴大實力，並且提升羣眾傾向其政治意識。一般民主派人士也沒有一個反對中國政府的綱領。

民主派大規模介入「民運」並不明智

現在回過頭來看，民主派大規模地投入支援大陸「民運」的活動，未必是最明智的做法，但在5、6月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投入又是非常自然的。有人認為，如果沒有民主派的領導，為羣眾的情緒宣洩提供有秩序的渠道，當時香港社會秩序會變成什麼樣子也很難估計。

中共對港政策應防「過左」

至於說英美利用香港作為基地，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顛覆，實情如何，值得商榷。國際間相互影響完全是正常的事。中國政府提高警惕，防止外國勢力的顛覆，是完全正確的，但把這種考慮無限上綱，以滿足內部政治鬥爭的需要，反而會危害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以香港的情況而言，更加不必要地把香港的緊張氣氛升高，影響中國對香港的正確政策。

正如文首提及，中國對香港的戰略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對中國的利用價值不單在經濟作用，也在於政治作用。香港在政治上完全受中國控制，不單會顛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且會削弱香港作為窗口的特殊作用。而如果香港在政治上並不完全受中共控制，香港存在反共活動、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是非常正常的。過去幾十年間，中共一直容忍國民黨在香港的活動，就是從長遠的戰略利益着眼。日後，中國也要容忍本地政治勢力所進行的反共和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

隨着1997年的逐步到來，各方面都應該要吸收這次事件的教訓，認識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但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不同制度，

北京開始教訓香港人

·大可

楊洋事件是不是勝利？

有人說：楊洋事件是港英政府的一大勝利，這種看法，未免片面與過份樂觀。

楊洋是職業拳手，也是每日數以百計的特種警察，是香港的大陸人士之一，因內人還說，借機不回大陸，是楊洋申請政治庇護的主因。至於北京當局迫害之說，新華社的徐海寧，身為中共駐港內部人員，回京後尚未有遭迫害的傳聞，要講「罪行」，顯然比普通百姓的楊洋嚴重得多。人民入境處第一次就駁回他的申請，顯然是因為「迫害」之說難以成立。當然，中共的政治迫害，可以以其他難以申訴的方法進行，如「穿小鞋」，讓你不能出國。

香港政府將楊洋遣送美國，表現了港府六四之後，「寧可惹怒中共，不願得罪港人」，因而，可以不必顧及八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港府與中共達成的雙邊協議，協議內明確規定，凡雙邊通行證來港的內地人士，期滿前必須「返回原地」。這顯然是開了一個麻煩的先例，港府形同吞下一顆苦果。

讓楊洋去美國，也是港府在中、台兩面壓力之下所選擇的最佳路綫，在港人的激憤時都可以被煽動起來的情況下，「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港府不得不作了不可為而為之的選擇。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新聞媒體的大轟大喻，如果沒有輿論所造成的大眾情緒上的壓力，這件小事在中港私下交易中是極易解決的。在台灣和香港，楊洋的身價一夜之間突然改變，不僅成了新聞人物，幾乎被冠以「民主鬥士」的桂冠。但年輕而缺乏閱歷的楊洋，自他宣佈不願回國之後，他的一切行動就非他自己所能左右，而成了被面擺佈的木偶，直至抵達美國後，他也沒有能明確地表達過自己的願望，問他在美國居留嗎？「不知道」，問他去台灣嗎？「可能」，問他在美國讀書嗎？「要看」，甚至流露出令人意外的意願——想回北京。

楊洋事件是否意味著：任何特權證件來港的內地人士，只要以政治理由要求移居第三國，港府便不得不面對另一個楊洋事件？或者，中國失掉一個楊洋，手上却多了一張籌碼，能說是港府的勝利嗎？

信心：英方的新籌碼

六四之後中英關係的恩怨怨怨，在倫敦中英聯

台聯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中正面爆發。這場外交戰的起發點只有兩個字：信心。

六四事件造成對香港的打擊，無論在表面上和實質上都是顯而易見的。香港民眾抗拒共情緒的高漲，港人對九七心理壓力的加重，對中共的承諾不予理會，移民潮加劇，恒指之長期牛皮不前，在反映出北京當局的直接後果。然而，一旦顯示出英方以港人的信心籌碼作為對北京政治要脅，北京便一反常態，提出了他一貫的外交姿態，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老牌的大英帝國，是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爭取它在港的利益，在北京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英方自然不會忘記向中方勒索一筆。加快政治步伐與駐軍問題的發難是英方的一輪外交攻勢。

中共數十年執政劣績疊疊，但在外交上，卻從沒有放棄原則而退縮的先例，特別是涉及「主權」時，中共會變得尤其敏感。

英方又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難怪柯在鐸在倫敦會議上的反應如此強烈了，況且，駐軍問題是老佛爺定下的鐵案，「胡說八道」之聲尚在繞樑，中方自不會對駐軍有絲毫的讓步。不管駐軍問題有多大困難之處，憑一紙中英聯合聲明，中共是有恃無恐的，因而，英方提出「六平年」是否是否「軍」的問題，對中方來說，根本不屑一談。

政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也是中方在紛擾多年的基本法條文中所極力避免的，目的無非是防止九七之後產生一個難以駕馭的特區政府，眼看香港已是囊中之物，中方能允許它遠離於北京政治控制之外嗎？

在這種嚴重的挑戰面前，中方終於不惜重資再次得罪港人的危險，在倫敦對話中給英方一個軟釘子，其搖擺牌便是「聯合聲明」中的主權體現，對於駐軍問題，根本就是免提，對於所謂港人「信心問題」，柯在鐸更指責是英方的責任。

英國在六四之後的「借港人名義講出官方想講的話」的立場，其實是有着另一個背景。英國七月份內閣大改組，把在香港問題上持溫和及穩健的買辦換成了馬卓安，並撤換五名中英聯絡小組成員，新的班子採取了鐵娘子的強硬政策，一上陣就鋒芒畢露。然而，英方的戰略上的進攻到底會取得多大效果？在「從不信邪」的中共外交政策面前它會有多少進取？這實在是令人懷疑的。



·李柱銘欲退又進引起議論

李柱銘的失策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李柱銘重返草委會引起的風雨，是六四以來中國與港英當局關係交惡的又一死結。

有人說，事情已經過去，其實相反，事情剛剛開始，好戲還在後面。

李柱銘可以說是政制方案中激進派的總代言，也是香港反共抗共人士的大首領，被相當部份港人視為「真理化身」，否則，中共也就不會把它視為眼中釘了。

李柱銘的形象魅力和道德勇氣，確實令人敬佩。但是，在他重返草委一事上，却存在不少爭議。

有人說，他既然信誓旦旦且聲稱，只要郭李楊政府一日不下台，他就不會重返草委工作，相信具有法律頭腦和政治家風度的他，決不是在萬人大會上時衝動或頭腦發熱，因此應當把底底，以示他言而有信。

也有人說，為了在草委內有「真正代表港人的聲音」，他應當再次挺身而出，為港人爭取。

有人說，草委秘書處沒有拒絕他重新加入，只不過要李柱銘作出一點可以自圓其說的「交代」，也不無道理，否則，莊嚴的草委會成了政治俱樂部，想進就出，想入就入？

也有人說，草委秘書處根本無權過問草委成員的個人行為，權力應在人大常委會，要他作出「交代」，「改變反共立場」，是「清算」，新華社的許大人則公開說：「我也認為他要交代」。

筆者非法界人士，對草委秘書處的權限雖然多方請教，始終不得要領，但覺得李柱銘在事件中不無失策之處：

其一，在李柱銘看來，草委內部，除了他能夠反映港人「真正」的民意之外，其餘人等不是真正民意的民意，甚至是在中共權勢的壓迫下，但其他草委是否個個都喪失了道德勇氣或個個都是膿包，李

大狀過於自覺了。

其二，李柱銘在退出聲明中已把北京政府視為法西斯政府而要求它下台，但郭李楊政府通過一系列高壓和清洗，再次穩固了政權，與這樣的政府去講理性爭民主，是否比六四時有實效？如果僅僅是為了有一個反對的聲音，則以李柱銘的聲望而論，他無論在草委內外，都會達到同一效果。

其三，李柱銘在表態的記者會上，說到中方對他採取制裁的可能時，有：被拘捕、被判刑乃至有生命之虞，此說似有驚人聽聞之嫌。李柱銘應該清楚，要求「交代」與拘捕判刑之差甚遠，而且中共抓一個李柱銘，曾在香港出現甚麼局面？

筆者以為，司徒華先生沒有馬上跟進，倒是明智之舉，他一再表示，如果港人強烈要求他重返草委，他會考慮這一問題，而沒有把自己凌駕於港人之上，立場之一貫，令人敬佩。

風波難以避免

六四之後，中英、中港間的關係，都發生了急劇的微妙變化，一個孤立的事件可能觸動幾方面的神經，遠遠不是「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麼簡單，可悲的是，港人，在一般輿論不停的航船上，他們難享安定繁榮的生活。可是，從近幾個月來的拳來腳往之中，似乎可預感到一場風暴的逼近，筆者以為，對一個精神病人在一場大發作之後稍呈復原的情況下，再去挑逗或惹怒它，是極不明智之舉，一次意外，足以致命，香港的政治精英們，羣策群力，應好自為之。

本文正待擱筆之時，傳來令人震驚的新聞：中方拒絕接收七十名被港府遣返的非法入境者，想不到揮筆之間，筆者預料的風波竟真發生，港府吞下的楊洋的這顆苦果果然快就有此報應。可以斷言，這不過是中共的小試牛刀。拒收遣返人員會不會是一件連鎖反應的大事，很值得重視。導致中港關係風波迭起的根本原因，還是六四事件以來香港與北京在對待民運上的積怨。實際上，中港雙方對待六四事件的立場並未因時間淡化而有所改變，相反，北京認為，應該給香港一點顏色看看了，應該教訓一下港府和香港人，在他們看來，香港在北京學運中，已成為一個「反共基地」，現在大局已定，還不乖乖就範？

李柱銘和楊洋事件的信息就是，北京要香港知道，它是強硬的，它是「一國」之主，它不擔心香港造反。因此，中港關係很難再平靜了。



香港支聯會正副主席司徒華、李柱銘(右)。

我們不會委曲求存

訪問支聯會常委

本報記者

編者按：香港政黨政治發展緩慢，六四事件期間却誕生了一個受到廣泛支持的民主派聯合組織「支聯會」，現在却面臨被要求解散的壓力。

十月廿五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席羅康瑞公開呼籲支聯會自動解散。他認為支聯會既被中方定性為反革命組織，而現時該會支持中國民運的目標已不復存在，理應解散。此舉並非遷就中方，而是港方採取主動，以改善中港關係。此話一出，立即引起激烈爭論。支聯會正、副主席司徒華、李柱銘重申，他們從未考慮過解散支聯會；而支聯會所做的工作，都是香港法律容許的。對於支聯會是否應解散中國的反革命組織，以及該會應否解散的問題，本刊訪問了支聯會部分常委，加上司徒華、李柱銘的公開表態，組成這個專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

張文光：要解散除非破產

要求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是我們的基本願望，願望本身和願望扯不上關係。支聯會只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其所作所為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純粹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要求。要鄧李楊政權下台，是要他們負上屠殺人民的責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行為是絕無問題的，我們不是常談一國兩制嗎？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也說過人民要求下台，前日本首相竹下登也是因犯錯而被人民逼下台。我覺得要求鄧李楊政權下台不算是反革命，我們不是軍事起義，說支聯會顛覆中國是莫名其妙的。作為一間合法註冊的有限公司，我們的財政沒有見不得光的地方，除非破產，否則支聯會不會解散，市民也沒有提出解散支聯會的要求，證明支聯會的存在具有一定意義。

支聯會主席

司徒華：豈可委曲求存？

支聯會是註冊公司，若在某些壓力下，公司便要解散，此例一開，香港人便要看人家面色辦事，何來一國兩制？過渡期已如此，九七年後怎樣？至於支聯會是否解散，要看兩方面，第一是因違法被起訴，由港府宣佈取締；第二是支聯會內部認為需要解散。有些人以委曲求存為理由，認為支聯會應為香港大陸與香港關係大局着想而解散，如果支聯會委曲求存，將來中共在第二方面態度又強硬，那是否又要委曲求存，試問能委曲求存多少次？

支聯會副主席

李柱銘：港人有言論自由

香港與中國不同，這是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人有言論自由，不應禁止，如果處處依中共所言，熱衷中共「領導人」講話，便會與大陸人民無異，怎能實行「一國兩制」？中國領導人明白這就是「一國兩制」。目前一些指支聯會是顛覆組織的「證據」，其實支聯會行使言論自由而已，支聯會的存廢即使使在九七後，也只能由本港法律規定。支聯會並非搞對抗，其所做均是法律允許，只是中國不喜。但言論自由應可發表不同意見，若羅康瑞不同意一會兩局方案，其公司是否也要解散？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

劉千石：存在繫於市民支持

說我們搞顛覆，完全不通。顛覆一詞含有武力、軍事起義的意味。但支聯會過去的行動只限於言論上的發表，要求血腥鎮壓的人下台，要求更換一個政府，這是民主的一個具體的體現。支聯會從來不是顛覆中國的組織。而支聯會的存在，主要取決於有沒有市民的支持，若沒有市民的支持，存在的意義就有了問題；其次我們對自己的信念能否堅持，即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要求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若能堅持下去，支聯會也會繼續下去。

港九勞工社團聯合會秘書長

李啟明：支聯會應降低調子

支聯會是在得到充份民衆支持下成立的一個支援國內民主運動的團體，它是香港合法的組織，並不是人們所說的顛覆中國組織。不過，我認為支聯會的調子應審慎和降低一些，如打倒鄧李楊的要求，現階段不應再提，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才是支聯會的長遠目標，我們必須貫徹這個正確方向。

太平山學會會長

何俊仁：不會在壓力下放棄原則

支聯會並不是什麼反共組織，我們只是本著追求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最高目標而努力，我們不會懼怕那些執政的人，也不會阿諛奉承他們從而獲得一些政治利益。支聯會成員身處香港這個特殊的地方，部分成員是打算投身香港政壇，為建設香港而奮鬥的，但「六四」事件後，我們堅決和港府劃清界線，堅持這種立場無疑會使自己遭受攻擊，但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我們還是要堅持下去。

以我個人為例，以前「四人幫」執政時，我們一羣香港大學的學生也曾公開表示不滿，表示反對，人們指我們反華、反共、反人民，但我們深知自己幹着甚麼，我們是有自己的信仰和原則的。其實，真正反對反革命的是中共本身。

至於支聯會應否解散，我看不出支聯會解散對香港有甚麼好處，支聯會反對殖民政府，當然會被殖民政府人民的主謀所不滿，他們必然會來攻擊我們，不過支聯會只是他們攻擊的第一個目標，若支聯會不能堅持下去，除了有負國內同胞和香港市民的支持外，日後可能會有更多人受到攻擊。

滙豐主席

楊森：惡例一開，後果不堪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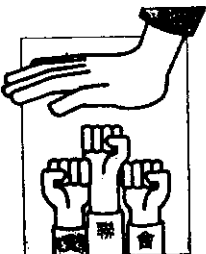
中國學生和工人用和平方式爭取民主，打倒官制，是中國憲法所容許的，本身不是反革命活動，支聯會支持國內愛國民主運動也不是甚麼企圖顛覆中國政府；況且支聯會是個合法組織，一切遵守香港法律，我們支持國內民主運動，主要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表現，這言論自由是香港所容許的，所以和甚麼顛覆中國，反對中國共產黨沒有直接關係。不過，隨着國內民主運動的起伏，支聯會日後的路向也會有一定的變化。但若中國政府用不合理的手段要支聯會解散，要求某些人改變其原有立場，如果我們輕易就範，惡例一開，後果不堪設想。支聯會是否解散是內部本身的事情，中國政府不能壓迫，港府也不能干預。

天主教社會傳播中心主任

夏其龍：解散要有足夠理由

香港仍是英國統治的殖民地，其轄下組織若做了些事情令中國政府不滿，中國大可透過外交途徑解決。我看不見支聯會所作的是甚麼反革命行動，也看不出有甚麼理由要支聯會解散，一個組織存在價值的高低是由每個人去評估，外人要求其解散，就要有足夠理由否定其存在意義。

支聯會前無去路？



被北京指為「顛覆組織」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處境正越來越困難，一方面繼續受到當地親北京與論「圍攻」；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呼籲該會解散的聲音漸高，認為這可緩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

更大的壓力來自組織內部——因失去明確目標，及受到重重壓力，支聯會成員團體逐漸消沉，並出現分化。但政界消息人士對亞洲週刊說，北京不會將壓力升級，以免激起更大反抗，故支聯會暫時可繼續存在。

北京「六·四」流血事件前後，由二百多個團體組成的支聯會曾領導百萬港人大遊行，聲援大陸民主運動，抗議北京當局「暴行」，因而遭北京點名抨擊。最近該會繼續受到「砲轟」，最新的觀點是：支聯會的組織與活動違反香港法律，依法應予取締。香港親北京的《大公報》上週刊出「來論」，指以公司名義註冊的支聯會「活動與章程宗旨不符」，違反有關條例。一般相信這類「來



論」乃由北京駐港官員撰寫。

一些與北京關係良好的香港人也作出同樣批評。當地法律界人士鄒偉雄指出，支聯會與海外大陸民運團體聯繫，可能已違反香港的公司註冊條例。親北京的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鄭耀堂也表示，既然法律界人士質疑支聯會的合法性，香港政府有責任向

公衆作出解釋。

對於這類質疑，支聯會領導層作出反駁，認為證據並不成立。該會常務委員、律師何俊仁說，該會與海外大陸民運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民陣」）等並無組織上的關係，今後也不會定期給予捐款，彼此的理事會又無共同成員，故該會並沒有違反香港法律。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支聯會只是與海外政治團體交流，若這也違法，那麼香港的親北京組織豈非都違反法例？」

知情人士向亞洲週刊透露，北京這一輪攻勢其實主要不是針對支聯會，而是間接指責港府不按法律辦事，「縱容」該會的活動。這位人士指出，北京發出的訊息是：港督會同行政局及負責公司註冊的官員有權「依法」撤銷支聯會的註冊，但沒有這樣做，顯然是縱容反對北京的活動。

但看來北京對支聯會的攻勢已「到此為止」，不打算繼續進逼，將支聯會置於死地。消息人士對亞洲週刊說，北京不會迫使該會立即解散，

只希望其逐漸淡出。據悉，北京駐港最高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並沒有要求港府取締支聯會，作為收回大陸「偷渡客」的條件。該社高層人員最近私下談起支聯會問題時，也沒有正面指其為「敵對組織」，還表示願意與其主席司徒華等會面。

香港一些分析家認為，雖然北京對支聯會感到不快，但由於該會仍得到不少羣衆支持，若施以過大壓力，可能迫使他們更堅決地與北京對抗，而港人信心亦會進一步受挫。大陸人民代表人會常務委員會上週決定停止支聯會正副主席司徒華、李柱銘的基本法起草委員（草案）職務，直至兩人放棄「敵視」北京政府和企圖否定《中英聯合聲明》的立場為止。這處理較將兩人「撤職」為輕，顯示北京仍為兩人留下「退路」。

親北京的香港工商界人士、立法局議員何世柱也對亞洲週刊說：「若支聯會解散，由一些激進組織主導支援中國民運的活動，後果可能更壞。」他又認為，只要支聯會保持低調，不再令北京認為是在搞顛覆活動，就不用解散。

雖然北京對支聯會的進攻沒有再升級，但香港內部要求支聯會「顧全大局」、自行解散的聲音卻在加強。近年活躍當地政壇的新興企業家羅康瑞公開建議支聯會解散，以緩和香港與大陸的緊張關係。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則呼籲香港人改善對北京的不信任態度，認為支聯會的領導人應明白自己的處境，再決定應否解散。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譚惠珠也提出類似意見說：「『某些團體』應考慮是否繼續一些可能損及香港利益的行動。」代表工業界的立法局議員倪少傑則認為，既然北京視支聯會為與香

港維持良好關係的障礙，解散之當然有助於改善雙方關係，但是否這樣做最終應由該會自行決定。

香港民盟聲援大陸民運：浪潮過後失去目標



香港民盟聲援大陸民運：浪潮過後失去目標

近 期大陸與香港矛盾激化

化，香港工商界的憂慮已越來越大，恐怕這局面如繼續下去，會造成政治不穩。部分工商界人士希望消除可能觸發雙方衝突的因素，而支聯會被視為箇中關鍵之一。羅康瑞等的言論，相信反映了這種心態。事實上，香港內部對應否繼續支援大陸民運已出現分歧，中上層中持反對意見的人不在少數。

面對要求支聯會解散的聲浪，該會領導層並無意後退。與支聯會主席

支聯會領袖：面對內外壓力



支聯會領袖：面對內外壓力

司徒華同被視為民主派「旗手」的支聯會副主席李柱銘對亞洲週刊說：「支聯會不能因中方的無理干預而解散。」他表示，本來支聯會的工作已難再開展，解散也不是大問題，但面對北京的強大壓力，支聯會就不能屈服。支聯會常委李啟明也認為，解散該會不能解決香港與大陸的矛盾，只能減少產生摩擦的「熱點」。他說：「支聯會已成了香港人心目中的一面旗幟，若它受壓力倒下來，對人心打擊會很大。」

香港民主派團體——

民主民生協進會主席馮檢基則認為，支聯會是否解散，應由香港人決定。若真有團體提出要求，大可進行民意調查，以了解港人是否同意解散支聯會。最近由香港市場研究社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認為香港人應繼續支持大陸民運，只有百分之十一表示「不應該」。司徒華據此認為，香港人仍然支持支援大陸民運的活動。

對於支聯會的「存亡」問題，香港政府堅持根據法律處理。港府官員已多次表示，該會是合法團體，是否解散應由該會自行決定。據悉，港府高層認為，現階段如取締支聯會，只會進一步打擊政府的威信，故當局不會在這問題上向北京讓步。當地一位政論家說：「如支聯會在北京壓力下解散，對

香港與大陸的長遠關係有不良的影響，而香港政府的權威將進一步下挫。」

但香港不少政界人士都認為，即使支聯會不解散，今後也只能保持低姿態。該會常委李啟明說，由於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後便要交回北京，為免影響香港的政治穩定，雙方不宜繼續對抗，支聯會亦須考慮到這點。觀察家指出，香港民主派正積極籌組政黨，似乎不可能有足夠的人力及資源兼顧兩條「戰線」。

據亞洲週刊所悉，香港民主派領導層內的一種想法是，支聯會與民主派的「新黨」應盡可能分流，兩個組織的領導層和活動盡量不重複。最後，支聯會將逐步淡出。當地一位民主派人士說：「我們應將重點放在香港問題上。在香港建立政治力量畢竟意義更深遠。」

支

聯會不但面對外來的壓力，還要面對成員團體陸續退出的問題。隸屬羅馬教廷的天主教香港教區，已要求屬下的團體退出支聯會。天主教社會傳播處已正式退出該會，而其他十多個天主教團體也將陸續引退。身兼支聯會常委的天主教社會傳播處主任夏其龍神父說，教區是在九月決定屬下團體退出支聯會的，但沒有公布理由。了解教會情況人士說，香港天主教會希望往大陸宣教，而教廷也欲與北京改善關係，如天主教團體繼續留在支聯會，會影響雙方關係，故作出上述決定。但夏其龍個人並沒有退出支聯會，且仍保留常委身分。他說：「教會對我留下沒有異議。」

除了天主教團體陸續引退外，支聯會一些成員團體也正考慮是否留下，其中包括一些勞工團體及公務員

工會。由獨立工會組成的港九勞工社團聯合會（勞聯），其中一個屬會已決定退出支聯會，另外一些屬會也可能步其後塵。身兼支聯會常委的勞聯秘書長李啟明表示，該會幾個屬會已召開理事會會議討論去留問題，一些人認為在現時的緊張氣氛下，支聯會已難再支援大陸民運。李說：「現時勞聯各屬會仍在觀望，但不排除稍後會退出。」

一些公務員工會也開始考慮與支聯會的關係。擁有二萬多會員的公務員總工會主席莫家榮表示，該會最近討論過這問題，部分成員認為最初加



姬鵬飛：不再進逼

入支聯會是為了支持大陸學運，現在運動已平息，應重新考慮留在支聯會的意義。但他否認公務員工會受到政府的壓力。

對於成員團體紛紛退出，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強調，個別團體退出並不影響支聯會的工作，他也看不到成員團體大規模流失的趨勢。司徒華說：「外來的壓力越大，反而越促使支聯會內部團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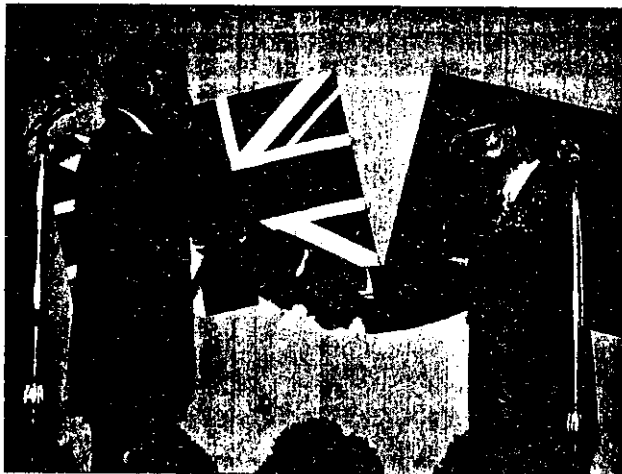
激進團體的抨擊，認為他們「退縮」，未能「正確」地領導羣衆，彼此一度針鋒相對。但到了上月中支聯會舉行會員大會時，氣氛完全改變，大部分成員團體都表示支持激進團體「四·五行動」，認為支聯會應對新華社香港分社慶祝酒會場外的警民衝突事件表明態度，並建議以實際行動支持該屬會。酒會當晚，「四·五行動」成員在場外示威，與警方發生衝突。

義上不應退出，否則對其打擊更大。雖然支聯會內部矛盾暫時緩和，但長遠而言，會內較激進組織與其他團體的分歧仍然存在。更有人擔心，一旦較溫和的團體陸續退出，激進團體在支聯會內會有更大影響。但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表示，暫時未看到有這種趨勢。分析家認為，民主派只要不放棄這個陣地，仍會在支聯會內居主導地位。

支聯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出師無名」。由於大陸民運陷於低潮，支聯會已漸失去工作目標。常委李啟明表示，該會正準備在香港推廣民主教育，並強化社區力量，以吸納羣衆。他說：「香港不適宜成為支援大陸民運的中心。低調地在香港推動長期工作更為適合。」

此外，支聯會在處理與海外大陸民運組織的關係時十分謹慎，強調要保持「獨立身分」，故與被北京指為「反革命組織」的民陣等一直保持距離。由於北京對外國勢力介入香港的問題甚為敏感，支聯會在這方面也小心翼翼。

港督(左)在新華社酒會：保住支聯會？



突，事後有六名成員先後遭拘捕，被控以非法集會及襲警等罪名（見本刊十月十五日號）。

支聯會一些人士認為，由於外在壓力重重，該會一些成員感到「唇亡齒寒」，因而更趨團結，暫時放棄成見及退會的打算。公務員總工會莫家榮表示，支聯會正面臨巨大壓力，道

但另一方面，支聯會領導層卻希望與移居外國的香港人組織加強聯繫。司徒華曾於九月往美國出席名為「海外香港華人聯會」(外港聯)的籌備大會，該組織主要是聯繫北美洲的香港移民及留學生。外港聯將於下月與其他幾個北美華人團體舉行大會，議題將包括香港的民運發展。司徒華及支聯會一些常委屆時可能出席。香港一位民主派核心成員說：「海外香港人組織將來可以成為支援香港民運的一股力量。」

亞洲周刊 89/11/12

「冷風」南襲民主派不退

共黨報《人民日報》週前給香港民主運動「旗手」司徒華和李柱銘加上「反共、反華」的「罪名」後，北京與香港「民主派」處於空前的敵對狀態，令當地政治氣氛變得更加低沉。同時，北京間接指責倫敦「縱容」在香港的「反共活動」，令雙方關係蒙上新的陰影。但在這壓力下，民主派反而因此加快組織政黨的步伐，而倫敦亦加速香港政制改革的意向亦更趨明顯。

《人民日報》週前發表署名文章，不點名地指司徒、李領導的「香

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進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而兩人和其他一些民主派人士則「以『民主』為幌子來達到他們『抗共』、『拒共』乃至推翻中央人民政府的目的」(見上期刊本報)。繼這篇文章後，又有消息說北京外交部向英國駐港的大使館施壓力，要求取締支聯會這個「反動組織」。

據亞洲週刊所悉，北京確向英方提出上述意見，但只是通過較低層次的途徑向英國大使館官員非正式表達過上述看法，還未至高層次正式照會的程度。此外，北京駐港最高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也曾向香港政府表達對支聯會活動的不滿，並要求對方不准旅美大陸人士的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香港設立分部。

對於北京指責香港政府容許有人在其「眼皮」下顛覆北京政府，以及要求取締支聯會，倫敦方面態度相當審慎。英國外交部都不予置評。但據悉英方曾向北京強調，支聯會是香港的合法團體，不可能取締，故沒有答允其要求。儘管倫



民主派領袖受北京「砲轟」：「不會害怕」

梁志勇：亞洲週刊

敦沒有與北京「對着幹」，但雙方關係的緊張氣氛已轉濃。

正當倫敦與北京關係出現陰影之際，英國保守黨政府內閣進行大換班，長期處理香港問題的「老手」外相賀維爵士調任副首相，空缺由原任財政部首席秘書的馬卓安接任。

這位「政壇新星」年僅四十六歲，從未處理過香港事務。專責

香港事務的外交部次官簡艾德勳爵士亦隨即辭職，其繼任人是年僅三十六歲的貿易工業部政務次官麥浩德。接着又有消息說，處理香港政權過渡事宜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也有變動，熟悉香港情況的英方首席代表麥若彬將他調，由賀維前私人秘書高德年接替。

香港分析家認為，英國的香港問題「班子」大換馬，雖然不會改變倫敦對香港問題的政策立場，但由於接手的官員對香港事務不熟悉，短期內可能不敢放手去做，與北京討價還價的能力將打折扣，並可能出現舉棋不定的情況。但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強調，這次英國人事更替對香港影響不大。他說：「政策到底是由內閣整體作出，並非僅關乎外相一人。」

雖然受到北京的壓力，倫敦加速香港政制民主化的意向似未改變。當地行政局與立法局（兩局）議員上週就政制發展達成新結論，同意一九九一年立法局的直接民選議席由十席加

諷刺李鵬的「政治劇」：對着幹



至二十席，增幅之大令人感到意外。這一共識多少反映倫敦的想法。

民主派方面，雖然受到北京猛烈「砲轟」，但並沒有退縮，一方面大力反擊《人民日報》的指責；另一方面則加快組織政黨。民主派其中兩個主要團體匯點及太平山學會先後發表聲明，認為有關文章以大陸的標準抨擊支聯會及港人的言論，本身就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太平山學會會長

何俊仁認為，《人民日報》的文章目的是打擊少數，以分化香港人；香港人應更清楚表明立場及意願，否則「一國兩制」難以成功。

北京的重點打擊對象——以民主派

團體為核心的支聯會，正草擬一份聲明回應《人民日報》的批評。聲明強調大陸與香港法律制度和思想不同，雙方都不應將本身的觀點強加於對方。給戴上「反共」帽子的司徒華及李柱銘，亦表明他們並非要推翻北京政府，並反指該篇文章是要恐嚇香港人，阻止其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李柱銘強調，支聯會的活動符合香港法律，北京當局是因為害怕香港民主派坐大，故加以斥責，阻止香港民衆支持民主派。李並聲言不會害怕，反而會更積極地組織政黨。

事實上，香港民主派的組織行動不僅沒有因為《人民日報》的文章而放緩，反而有加快之勢。民主派三個

主要團體——匯點、太平山學會、民主民生協進會的核心成員已基本上贊成合組政黨，現時正進行內部討論。一些核心成員估計可在八月間成事。

一位參與討論組黨計劃的核心成員向亞洲週刊透露，香港民主派政黨暫時沒有黨章，目前的重點將放在大陸與香港之間的矛盾，其他香港內部問題暫放在次要位置。此外，新政黨將以「波浪式」的組織形式出現，先有十數名核心成員，然後再發展中層的數百人，再建立數千人的外圍。

儘管香港民主派在組黨問題上不讓步，但他們在處理與北京關係方面也開始「降溫」，不希望再正面對抗，令北京與香港的「敵意」升級。支聯會一位成員說：「我們同意支援大陸民運的活動要低調，避免惹來更大壓力。」

不僅民主派反對《人民日報》的文章，香港一些親北京人士也不贊同該文的論調。親北京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副理事長、立法局議員譚耀宗說：「目前香港人心心疲弱，發表這篇文章有害無益。」他認為該文不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誇大了支聯會活動的嚴重性。親北京團體教育工作者聯會的理事長程介南也認為，北京處事不夠明智，並堵塞了與香港民主派對話的途徑。

北京雖然擺出強硬姿態，但同時亦設法籠絡香港有影響力人士，以進一步孤立民主派。《人民日報》上週刊登了另一篇評論文章，引述香港一些「有識之士」呼籲港人「留港建港」。這些人士包括兩局議員謝志偉、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羅德丞等。事實上，在北京抨擊支聯會的署名文章上，也有「有識之士」反對把香港變為「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的說話。北京在打擊香港民主派的時候，看來也在為當地一些政治人物及力量「打氣」，以加快香港的內部分化。

在北京、香港、倫敦就香港前途問題交鋒之際，香港人爭取居留英國

權利的行動提升至國際層面。由香港主要財團及專業團體組成的聯盟，正計劃進行國際性游說，爭取國際支持港人的要求。各有關團體上週舉行了聯席會議，避免行動重複。

由於英國政府高層變動，有關給予香港人居英權的計劃仍未擬就，故不可能在英國下議院七月底休會前公布。有消息說，英國政府將以個別申請的方法批准香港一批中上層人士居留英國。這與加速香港民主化同是英國對香港問題的新對策。

簡艾德(右)：英官換馬立場不改？



「四五行動」：中港關係的祭品

黃中放

是警民衝突還是政治衝突

楊洋事件在香港、台灣、以至國際，掀起軒然大波，然而，筆者認為，香港的九二九事件，其性質及其長遠影響，比楊洋事件要嚴重得多。

九月二十九日，新華社舉辦國慶酒會，「四五行動」認為六四之後，「只有國慶，沒有國慶」，便發起去新華社門前和平抗議。抗議隊伍遭警方阻截，爆發近二小時的對峙衝突，警民多人受傷，「四五行動」的三名成員劉榮錦（教師）、梅治德（雜誌編輯）、李海棠（校工）及一外籍青年（學生，不久獲罰款釋放），被當場拘捕。

事後又發生了一連串事：

①十月三日，警方持搜查令向本港兩間電視台索取九二九拍攝的新聞片段；

②十月四日至十一日，警方又再陸續拘捕四五行動成員：黎紹珍、許為洋、梁國雄、李友誼、陳樹強；

③港府政治顧問歐威廉致新華社的信公開，信件提到港府無意容許香港被用作顛覆中國的基地時舉例，第一例就是：拘捕「四五行動」成員。

歐威廉的信清楚地暗示：港府把「四五行動」九二九的集會遊行視作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四五行動」成了港府為了「中港關係」，為了「河水不犯井水」而貢獻的祭品，事涉政治交易，事關人權，這不能不引起普遍的不安。

香港政府為什麼要向「四五行動」開刀？「四五行動」究竟是「暴民組織」，還是民主社團？

「四五行動」之來由及功過

「四五行動」誕生於八九年一月，當時尚無組織，只是一羣各階層特別關注大陸民運的活躍分子聚集在一起，要做出一些行動，以響應方勵之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呼籲。其中的中堅分子有劉子濂（教師）、梁耀宗（區議員）、黎紹珍（車縫工程師）、梁國雄（工人，托派）、張為洋（教師）、唐婉青（女工）、陳昌（區議員，托派）、梅治德（雜誌編輯）等等，我們翻查一下近十年的報紙，可看到他們經常參與各項聲援大陸民運或為香港草根階層權益呼籲的活動。從他們十年來及最近十個月來的表現以及他們從事的正當行業，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們有違反香港法例的地方，只覺得他們是一羣熱心公益、滿腔愛國熱血的正人君子。

可以說，沒有八九民運，就沒有「四五行動」。

動」，而八九民運浪潮越大，「四五行動」的隊伍也越來越大，活動越來越頻多。

筆者作過深入的調查，「四五行動」原來一直是一個沒有組織形式的團體，亦即沒有誰是履行過入會手續的，大概是因為八九學運來勢凶猛，發展異常迅速，以至他們雖未組織起來，也能被捲裹着團結前進。到了大陸民運被鎮壓之後，中堅分子們考慮到「四五行動」的活力源泉已斷，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得像果實落地生根一樣，非組織化不可，至此，也就在九月初，「四五行動」開始有人會手續，並召開會議，選舉領導機構——七人常委會（不設主席），成員約六十人，可自由參加或退出。前期相當部分的積極分子或中堅（如梁耀宗、陳昌）等，都不願行入會手續而告退出「四五行動」。

不少專欄作家曾撰文指「四五行動」為托派組織，這是不確切的。

首先要指出的是，托派並不是斯大林所指稱的「叛徒、土匪、特務、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乃是斯大林毛澤東一黨專制權權、迫害的共黨中的反對派。筆者對托派信奉馬克思主義，不能苟同，却又不能不佩服他們為理想而英勇犧牲，不停奮鬥的精神。社會應該有為中產階級、為知識分子利益而行動的黨派，也應該有為勞苦大眾利益而行動的黨派。簡言之，即使「四五行動」信仰托洛茨基主義，也應該在香港有合法存在的權利。其次，「四五行動」之中，托派充其量只是極少數，多數是無黨無派，或無政府主義的人。

再其次，從「四五行動」之行動及其宗旨、立場看，我們最多只能指它偏重於為普羅大眾爭取政治權益，而不能指它為托派火中取栗。

回顧「四五行動」近一年來的表現，他們在發動草根階層、關注香港前途、支援中國民運、灌輸公民意識方面，貢獻良多，其成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們在天星碼頭為八九民運靜坐達一百日，募捐約八十萬元。後來他們再次靜坐，明示為他們自己——「四五行動」籌募活動經費，獲各界捐款約二十萬元，可見他們在香港具有羣眾支持的基礎；他們每次遊行活動幾乎都高舉反對一黨專政的標語，但從未煽動暴亂；他們認為遊行集會是公民神聖的權利而常常拒絕申請遊行集會牌照，但每次遊行集會却又知會警方；他們的未來取向，我們難以判斷，但他們過去直至現在的表現，至少是值得我們同情的。

務請幫助「四五行動」

衆所周知，「四五行動」雖是支聯會的屬下組織，但在支援大陸民運的許多活動中，「四五行動」常不滿支聯會的保守，（支聯會則不滿「四五」的偏激）客氣地說，這是多元化運作，不客氣地說，則是分庭抗禮。

民主派中的各派間有怨有恨，無傷大雅，亦很正常。但是，當「四五行動」遭到危難時，因與之有積怨而幸災樂禍，匆匆與之劃清界線，甚至落井下石，這却是非常危險有害的。

首先，我們只把民促會、滙點、太平山學會等當作民主派，這是極大之謬誤。必須看到，「四五行動」也是民主派。要加以區別，則我們可以稱「四五行動」是香港民主派的左翼。對自己的左翼告急而不加援手，這是比南韓大選中的兩金相爭更令人齒冷的事。

其次，「四五行動」如被打垮了，其他略左的或中間的民主派便將變成民主派的左翼而逼近港英政府打擊、壓制的鋒芒。唇亡齒寒的道理，不可不知。

這裡，筆者還要向各界囉嗦幾句：大陸人民的民權，絕非在一夜之間喪失殆盡。因為「胡風集團」被打擊，我們不抗爭，乃有「反右」的悲劇，廣大民衆對右派不加援手，於是才有文革十年浩劫，演變成十億人民，家家一本血淚賬。今天，我們為九七之後的人權設想，如果因不滿「四五行動」的某些作為而忽視他們的基本人權，最終我們自己也將喪失人權。我們要維護自己的言論自由，就必須捍衛我們反對、甚至痛恨的言論。同樣道理，我們要捍衛自己的人權，就必須捍衛我們反對及厭惡的人權包括捍衛「罪犯」的基本人權。

警方去電視台搜取新聞錄影之後，新聞界大感震驚，反應強烈，十月六日又有六十議員聯署聲明，質疑警權是否過大，質疑新聞自由是否被侵犯，這些反應都很正常，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些行動為什麼不連帶質疑在新聞錄影被取走之後而被捕的黎紹珍、李友誼、梁國雄的人權是否被侵犯？我們何太厚楊洋而太薄「四五行動」的被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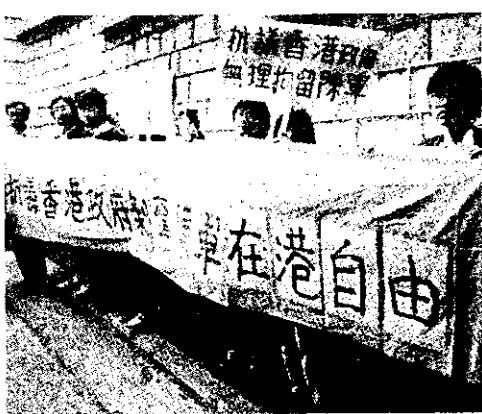
筆者還要向香港政府進一忠告：鎮壓香港的民主派以改善和中共的關係，這是飲鴆止渴。我們期望香港政府面對中共時，一定不能以港人的民主、自由、人權作交易，作談判的籌碼！否則，光榮的撤退將變成英國永遠的耻辱。

我們要睜大眼睛，注視日後政府對「四五行動」主要成員的開庭審判。

我們要呼籲國際特赦協會、國際人權協會，嚴肅注視香港的人權問題！

希望港府處理「四五行動」案時，氣度寬宏一些，高抬貴手，盡量以挽救香港及平反的信心，以免暴戾仇恨心理之萌生。

●四五行動是香港民主派的左翼，對自己的左翼告急而不加援手，這比南韓大選兩金相爭更令人齒冷的事。



• 四五行動春天曾示威支持陳軍來港。



• 四五行動是929事件的主角。

港府為何對「四五行動」窮追猛打

何芷玲

九二九拘捕四人，繼而連串追捕。港府政治顧問還以拘捕「四五」成員說明中港關係。一宗規模甚小的「警民衝突」，警方先後出動重案組、行動組、反黑組、情報科，到底是為甚麼？

十月二十六日，英文《南華早報》頭版披露港府政治顧問歐威廉在十月二十三日致新華社香港分社外事部主任紀紹祥的信件，其內容稱：「香港政府無意讓香港被用作進行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基地。新華社應已留意到，在他們的國慶酒會場外對四五行動成員的拘捕……港府將繼續對香港的特殊情況、中國政府所關注的問題和利益，予以慎重考慮。」

港府這封信件的曝光，和警方針對「四五行動」的「窮追猛打」，給人印象是：因中港關係緊張，港府意圖通過打擊「四五行動」以取悅中方，並乘勢收緊對本地羣眾運動的控制。當局在九月二十九日之後的連串追捕行動中的具體表現，更加劇了事件的複雜性。

九二九及連串追捕

在今年六四前後，香港人支援北京民主運動的浪潮湧澎湃，「四五行動」是全面投入的團體之一。六四之後，中共不斷加強壓力，企圖瓦解香港對大陸民運的支援運動。港府被指「縱容」香港的支援運動，自然感受到中方的壓力。

九月廿九日，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行中共建國四十週年的酒會，「四五行動」成員組織遊行，到酒會場外抗議六四屠殺後的「國慶」活動。這次抗議行動遭到警方阻攔，演成了「警民衝突」。根據現場拍攝的錄像帶顯示，當晚警方強行阻攔「四五行動」的隊伍，並在阻攔及拘捕示威者時使用暴力。

當日警方在現場拘捕四人：劉榮錦、David Miners、梅治德、李海棠。被捕者遭拘留四十八小時，事後有被苛待的投訴。十月二日，四人出庭，劉榮錦被控煽動、襲警、拒捕及行為不檢；其餘三人被控拒捕及行為不檢。除 David Miners 認罪被判罰三千元及留案底外，各人均否認控罪。十月六日再度提堂，控方撤銷控告行為不檢，改控非法集會。在第一次出庭時，負責指揮九二九阻攔及拘捕行動的灣仔區總警司貝利親自充任檢控官；到第二次出庭，檢控官換了人，貝利坐在他旁

邊；後來在第三次出庭時（十月十九日），貝利竟然沒有出現。

十月三日，警方採取殊不尋常的手段，持搜查令前往兩家電視台，取走「九二九事件」的新聞毛片。此舉引起新聞界嘩然，認為警方濫用警權，侵犯新聞機構的運作和獨立性。之後，警方又展開了一連串追捕。警方曾聲言沒有將檢走的錄像帶複製，但所有被捕者都是曾出席九二九遊行的「四五行動」成員。

十月十四日，黎紹珍在「四五行動」會址樓下被捕；十月六日同案提堂，控非法集會罪。十月十日，警方到許為洋任教的學校把他帶走。

十月十七日，梁國雄在家中被捕。十八日梁國雄在灣仔警署取保外出時，貝利在場，認為保釋金太低，着令由二千元加到五千元。

十一月六日，陳仕強參加港督府外一次抗議行動，遭跟蹤騷擾，其後到九龍城警署投訴被人跟蹤，被灣仔警署的人員帶走。

跟蹤、騷擾、拘捕

警方的追捕，以陳仕強的例子最為奇特。

陳仕強於十一月六日傍晚，與「四五行動」一行廿人左右赴港督府，抗議英國皇儲夫婦訪港。事後陳與另一成員劉子強緩步走向中環地鐵站，其他成員隨後。途中有四名便裝人員從前後左右四面緊迫陳仕強，其中一人衣領上扣有無線通話器，不時報告位置，另一人則掛着照相機，更有一人為緊靠陳仕強而張開劉子強，迫其讓路。「四五行動」成員見兩人被圍，上前協助；但跟蹤者一直未有表露身份及來意。「四五行動」成員為安全計，決定坐的士往九龍的《東方日報》，準備將騷擾事件向報界揭露。陳等攔得的士，坐進後排，但跟蹤者聞上前座，兩名大漢站在車前，擋住去路。「四五行動」的成員上前質問，他們則左顧右盼，嬉皮笑臉。攔約兩分鐘，幾輛私家車抵達，跟蹤者才離去。陳等在乘車往報館途中，一直被三輛私家車跟蹤。

陳等抵達報館，即向記者表示遭人跟蹤騷擾，打算舉行記者會。跟蹤的隊伍同時抵達，兩人站在報館門外佯裝讀報，其他人則分散候命。一名「四五行動」成員查閱報館門外的跟蹤者是否警務人員，為什麼要跟蹤陳君。回答是：他們不是「差佬」，沒有跟蹤，只是「普通市民」。

陳等接待記者之後，決定到九龍城警署投訴被騷擾及跟蹤，途中又被三輛私家車尾隨。抵達警署後，陳由兩名「四五行動」成員陪同入報案室投訴。未幾，兩名便裝人員到場，自稱灣仔警署高級督察及中區情報科偵緝警目，指陳仕強涉嫌九二九的行為不檢案，要拘捕他歸案，又承認一直跟蹤的是他們情報科的「伙計」，毋須查究。陳隨即被帶往警署一個房間問話。

當晚陳仕強被轉送灣仔警署落案，未告知任何控罪。直到十一月十三日，陳再往灣仔警署報到，仍未被檢控，只着令十一月二十日再次報到，暫以二千元保釋外出。負責的警員解釋，由於他們仍未收到律政署指示，故暫無法提出控罪。

為了一宗看來規模甚小的「警民衝突」，當局竟動用了龐大的警力，歷時逾月，進行拘捕，而其間還不惜被指為濫權，冒着損害新聞媒介的獨立性的重大不韙，搜檢電視台，甚至還鬧出政治顧問信件曝光的風波。這一切，都使人不得不質疑：到底是為什麼？

警方動員的警力，據執行拘捕時表露的身份及負責人員在辦案時透露，為首的是灣仔區總警司貝利，先後出動的計有灣仔警署重案組、行動組、反黑組及中區情報科人員。動用如斯龐大警力，其欲打擊「四五行動」的決心實已無庸置疑。部份執事警員甚至抱怨，認為上司將事件拖延太久，越搞越大，浪費警力，而事情發展至今，拘捕工作變得吃力不討好，但卻只能奉命行事。

此外，灣仔總警司貝利於十月十日上午，曾親赴嶺南學院找前「四五行動」成員劉健芝

動用警力，所為何事

（翻譯系講師）展示一批九二九事件的圖片，要求提供照片內人物的姓名或綽號，但遭到拒絕，無功而返。

同日下午，貝利亦對在灣仔警署內等候落案的許為洋展示九二九的照片，問及照片中人的名字和動向，但不得要領。其後，警方曾對許為洋暗示，若梁國雄（案中第七被告）自動到警署報到，保證不再拘捕其他人，事件亦告一段落。未幾，又勸諭「四五行動」成員認罪，表示判罰只會像 David Miners 一樣，罰款留案底了事，否則可能要被重判。

以上是九二九案的部份片段，但已可見事件的不尋常。一方面是警權有被肆意濫用的傾向，另一方面則是港府不易抵受中方強大的壓力。於是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收緊限制，使港人無法有效地通過集會、遊行去表達政見或爭取權益。然而，任何把港人的人權、自由規範在中英的「和諧」及「穩定統治」上的限制，最終只會犧牲港人的利益。



九二九的錄像帶：警方採取「特殊」手段。

政治性的審判

香港「四五行動」受審記

黎紹珍

「九·二九」案終於結束了。判決是「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不少市民和親友對我們表示關懷和支持之餘，往往恭賀一番，認為我們在這次事件中取得了勝利。我們當然感謝市民自「九·二九」事件之後對我們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支持；但談到「勝利」，則要看從哪個角度去判斷。

港英作出這樣的判決，原因有兩方面。首先是由於「四五行動」在「九·二九」事件之後，仍然堅持鬥爭，不斷公開播放警方當晚暴行的真相，以及揭露中英結盟壓迫和迫害香港市民的本質，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壓力，也爭取到愈來愈多的市民和團體的支持。從這點看，我們是取得勝利的。其實，從我們九·二九當晚被捕後立即進行抗議，十月一日仍然堅持舉行「沒有國慶，只有國哀」集會開始，我們已經取得了勝利，因為我們並沒有在鎮壓中倒下、退縮。

但是，港英自然有其更深遠的原因去作出這樣的判決。它是出於其政治需要，企圖維持司法公正和獨立的假象，以及要洗脫政治迫害的罪名，藉以重新拉攏民心。

港英法官的判詞中指當晚的情況，完全符合公安法所規定的非法集會條件，所以的確有非法集會存在。只是由於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被拘捕的七人有在場和鼓動隊伍向前，因而判七人無罪釋放。事實上，七人和「四五行動」成員，以及其他在場的民運團體、市民的遊行抗議和希望透過封鎖線，完全是正義和合理的和平行動。這是行使基本人權的行動，絕非「非法集會」。指「九·二九」當晚是非法集會，實際上就是宣佈全港市民的遊行、集會、示威等基本人權的死刑。

法官的判詞指出，四五行動與其他市民團體堅持遊行是錯誤的。我們絕不同意。警方當晚攔截遊行隊伍以至設置路障及整個部署，完全是為了保障一小撮「貴賓」和港府高官不致尷尬。市民的基本人權，就因此犧牲了！

我們認為，「四五行動」及任何市民採取和平前進的方式行使基本權利，遊行至「國慶酒會」門外抗議的行為完全合理。當晚事件，完全是港英壓制民權、保障少數人在人民血泊中慶祝所致。錯在港英，實在港英！

在審訊的過程中，貝理爾作供時指稱：「四五行動」成員劉榮錦於被捕後，曾向貝理爾道歉。我們要鄭重指出：「四五行動」成員當晚堅持的是正義的行動，完全無愧於心，無愧於人民，根本不必、亦不可能向站在人民對立面的統治者道歉。貝理爾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掩飾當晚自己的暴力行為，將「衝突」的責任推在「四五行動」身上；同時，亦為了給「四五行動」抹黑，打擊「四五行動」的聲譽。

不單如此，貝理爾更指稱「四五行動」成員李海雲衝入警察中，大鬧拳腳，因而被捕。貝理爾圖藉此將「四五行動」成員說成是一班暴徒，並將暴力鎮壓合理化。可是，在現場拍攝的錄影帶卻清楚顯示：李海雲是與其他人士一起靜坐時，被警察從人羣中拉出，再拖到鐵馬的另一邊，被十多名警察圍毆的。貝理爾的謊言，不攻自破。

眾所周知，「九·二九」事件的發生及拘捕「四五行動」的成員，其實就是中英勾結的犧牲品。港府的政治顧問歐康廉致新華社的信件就是證據。

明，就是港府為表達其鎮壓及接受愛國民主運動誠意的表現之一。

可是，法官却說，「九·二九」案提堂時間是先於上述信件發出的日期，否認審訊帶有政治動機，拒絕停止審訊，旨在隱瞞「九·二九」事件的政治性質，試圖以「司法獨立」的名義，洗脫港府對「四五行動」從拘捕、毆打、檢控以至審訊的一連串迫害。道理很簡單：是否政治迫害，並非依據在迫害之前或之後有甚麼信件，而在乎迫害是否為着政治利益或政治原因。

「九·二九」事件和法庭的判詞充份說明：公安法，實質上是維持殖民專制統治、保障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工具。公安法一日不撤銷，市民的遊行、集會、示威權利，就一天不會有保障。換言之，市民以基本人權來爭取民生權益和民主權利的羣眾運動，將繼續受到極大的限制。

因此，「九·二九」事件並不因七人被判「證據不足，無罪釋放」而結束；它嚴肅地告訴全體市民，必須開展爭取撤銷公安法、爭取基本人權的抗爭。

港英即將推出「人權法案」來「諮詢」。其葫蘆裡賣甚麼藥，大家都心裏有數。就在港英和它的辯護士大肆吹噓他們的「人權」的時候，所有民間力量應聯合起來，爭取撤銷公安法！

不准採訪

小題大做

胡菊人

中共有關部門第二次不准准本刊及《當代》兩份雜誌到大陸採訪基本法會議，引起本港傳媒很大的關注，記者協會亦加以聲援，都認為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當報紙、電視訪問本人對此事的反應時，我都不有一句話，就是一笑置之。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它太不合理，而且說不出理由。

我們平日做人處事，在我們這個社會，凡對對方採取某種行動，都是說得出理由的，為什麼要這樣做是可以解釋的，但當我們去信要求解釋，對方沒有回答。後來我們知道這不是香港新華社的決定，而是北京有關方面的決定，作為中央機構，就更有責任說出原因與理由，否則何以取信於天下！

第二點是如果它有理由，但又不

好說出來，那麼這種理由必定是很不得體的，說出來會給人笑的。如果說不喜歡你們的政治立場，你們的文章太尖銳，你們許多作者對中國領導人下筆太不客氣，你們的政治態度要變化，你們不能為民運說話……這就是明目張膽壓制言論自由了，當然會引起香港及海外羣情大嘩，所以不好說。亦明知這樣說也壓不倒我們。

第三點我們之所以一笑置之，乃因為在目前對港澳記者赴大陸採訪的七條規限下，這種採訪是「北京填鴨」式的，它要餵你吃什麼你就要報道什麼，完全是一個籠子那樣看管着記者們的一切活動。這已大大違背了新聞自由，對港澳記者亦是最大的不公平，顯得中共非常小氣。

「六四」以後中共對港澳記者有種種復舊情緒，因為我們近乎全面地暴露了北京屠城的真相。所以才設了這

種種限制。但這亦反映了中共的弱點。堂堂中國政府、浩浩神州大地，是不會有很多事情是不能讓人知道的呢？否則為什麼要限制人家採訪和報道？不能讓人知道的事情多半是不好的事情，這是天下間的通例。限制採訪，是有很多事情見不得人而已。

第四點是在目前的「七條」下根本就不可能採訪到什麼獨家的重要新聞。那麼你不批准別人採訪，豈不是多此一舉、小題大做嗎？而雜誌尤其需要獨家的、深入的報道，在重重限制下，根本發揮不到記者的功能。我為港澳記者鳴不平。

因此我們認為根本就要撤銷這七條限制。

第五點是在我的編輯經驗中，有許多重大消息和重要文稿，并不是要到大陸才能得到的。在中共前三十年絕對封閉的時代裡，為什麼仍有這麼

多消息傳出來呢？「四五」天安門事件為什麼我們仍能得到那些「詩抄」，為什麼有魏京生自傳、魏京生訪問錄……

再如陸鏗先生在百姓的獨家重大消息如胡耀邦下台、中美談判釋放方勵之之條件，又如本期民運秘密通道被破壞等等，也不是親到北京採訪得來的。所以這一不合理的舉動，并不能封鎖我們的消息及文稿來源。

我們發現中共自「六四」以後，做出不少無用的行動，例如抗議頒授諾貝爾獎予達賴，警告人家國王及政府高層不能出席儀式，顯然是無效的，我懷疑周思來在生會不會反過來給達賴一個賀電——這是統戰的最高技術；又如抗議羅拔甘迺迪基金會頒給方勵之人權獎，抗議法國政府容許民陣活動，抗議東德和捷克讓達賴訪問，抗議美國國會法案等等……全部無效。不過是打空槍。

凡是出招，總要有用的才是好招數。我們這小小刊物，當然不能跟上述的國際性事件相比，但出招而沒有用的結果則一。陸鏗先生和我們的記

當局禁制不利溝通

國內採訪緊張關係的成因

楊承

上月在廣州舉行的基本法對外交流會，是「六·四」及國務院「關於採訪七條注意事項」公布後的第一遭大規模採訪。過程中發生不少風風雨雨，以至會議秘書處和記者之間數度緊張。本文嘗試就緊張關係的背景、成因及各方面的責任作一分析。

「七條」生效後，香港傳媒機構不敢怠慢，在十五天前依指示向新華社報名，申明採訪目的。同樣受到「六·四」及「七條」的影響，內地各個有關部門，如新華社、海關、會議秘書處等也得格外嚴格、謹慎，本着寧緊勿鬆的態度，規定禁止的固然禁止，規定沒有明確表示的，個別部門還是禁止了。例如，根據規定，未出版的刊物不能派員採訪。結果，有兩家雜誌因此被拒；另一家雜誌則被指不是本地雜誌，不獲採訪資格。此外，有一家報紙由於沒有提前兩周報名，該報記者只在廣州待了一天，就被中止採訪，請回香港去。

一些灰色地帶也構成了小風波。一家英文報紙的記者在澳門拱北進入中國國境時，打字機被海關扣起了；澳門另一家報社申請攜帶傳真機，也被有關方面拒絕。對於打字機事件，香港記者向秘書處投訴。秘書處負責人也認真地了解雙方情況，他承認這是由於執行部門對新規定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令記者感到無所適從的是，同樣是打字機和傳真機，香港記者在廣州入境時，卻沒有受到留難，對此現象，只可解釋為個別執行部門在寧緊勿鬆的思維下的表現吧！

秘書處給記者五條規定

同樣是寧緊勿鬆的精神，在基本法會議秘書處的表現也體現出來。秘書處為大會定下了另外五條的新規定，包括：（1）除洗澡、睡覺外，記者任何時候均要配帶採訪證（上面貼有記者照片，寫上姓名單位、接待單位、採訪項

目的日期）。（2）不可以追逐年老的委員。（3）大會和首次小組會可以拍照，會後有「吹風會」，（4）面談需要兩相情願。（5）不接受電話採訪。

這幾條政策的確對記者的採訪構成影響。

秘書處五條規定生效首天，大堂保安突然嚴厲了許多。他們邊擋架邊開路，使記者無從「埋身」，即使遠遠叫出一個問題，委員也無機會停下來回答，有些草委更「運路走」，避開記者。此外，秘書處和酒店方面對委員的房間號碼又守口如瓶，令「摩（摸）門教」也無所施其技。

競爭激烈觸發事端

可是，自《信報》在十九日刊出對李後的獨家訪問，情況便扭轉過來，第二天，無線電視、英、《虎報》、《成報》又做了李後專訪。他在無線的採訪中還說，草委考慮在基本法中加進條文，明確香港不能成為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由於當時的報道和鋪陳方式令人感到中方的態度很強硬，頗有志在必行的感覺。當時部分在廣州的記者都感到十分突然，還有一種需「補鑊」的壓力。接着一天，其他記者紛紛約李後進行「獨家」採訪。於是一天內就有幾批「獨家」，另一些機構就找到外交部副部長周南的「獨家」新聞。

競爭至此，大家心中再沒有「七條」、「五條」的限制了，只是盡力發掘新聞。

二十日，秘書處開始對記者有意見了。他們說接獲委員投訴，說大多電話打進委員房間，影響休息，希望記者將心比心，不要令大家難做。

二十一日譴責更嚴厲了。原因是當天凌晨一時，有記者致電李後採訪，同一天早上六時五十分，有記者到李後房間拍門，要求採訪。秘書處發言人怒指這種採訪方式是不人道的，還擬停止某報記者的採訪資格，後來在當事人致歉，行家解釋和互相呼籲自律後才作罷。他

呼籲記者不要太早、太晚或在委員午睡時間打擾，好讓老人家們「多活幾年」。

對「報道失實」的探討

翌日，又發生令雙方關係更僵持的「報道嚴重失實事件」。

事緣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和魯平不滿兩家英文報章分別於二十及二十一日的報道，稱他們指港督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事實上，記者是看到內地的《人民日報》引述《法制日報》的評論，指港督在英國接受訪問時說九七年英國官員不會把香港的管治權交給中國官員，是違反聯合聲明，然後才就有關問題要求李、魯二人作評論的。當時二人均沒有對港督的話正面作評論，只表示那種說法是不對的。雖然二人的言外之意十分明顯，但他們始終沒有明言。

但兩家英文報紙所報道的「魯平攻擊港督講話」，李後指衛奕信違反「聯合聲明」，也實在將二人的話提升到另一層次，忽略了外交措詞的慎重。

應互相理解採訪習慣

綜觀「六·四」後首次採訪期間發生的大小風波，使人清楚看到中港兩地在採訪習慣和溝通上仍存在一定問題，雙方都有改善的必要。

秘書處發言人說，記者要珍惜採訪機會，否則沒有下次。的確，香港記者是悉力以赴的，但仍要照顧自律和準確性。

不過，內地有關方面定出的採訪規則也實在過於苛刻，加上執行部門的理解不一，時寬時緊，往往令記者無所適從。另一問題是終止採訪的規定，雖然這次沒有執行，但是否違反任何規例，無論情況輕重與否，有關部門甚至接待單位和會議的秘書處負責人就可以下令停止採訪？此外，記者強烈感到這次採訪中，被訪對象（如草委們）是樂意說話的。例如李後過去是否輕易接受獨家上房間訪問的，這次卻大大破例。按他的說法，是「知道記者儲了大堆問題」，所以願意多談。他的話正反映了中港自「六·四」後的嚴重缺乏溝通和有不少互不了解的地方。

誤解和缺乏溝通一定要透過多接觸才能消除，千方百計限制採訪的機會只會造成更大的鴻溝，對改善雙方關係沒有好處。

外行人說荒唐話

魯紀

國務院港澳辦公佈的「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應注意事項」，是從原來的開放狀態倒退，使內地再封閉於鐵幕之內。

十月廿七日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公佈了「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應注意事項」，「注意事項」共有七點。歸納起來焦點就是不允許港澳記者在中國內地進行自由採訪，自由報導。以下從幾個方面對這個「注意事項」作出評價。

違背十三大「透明度」的原則

八七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透明度」的原則，所謂「透明度」就是國家大事讓人民知道。十三大以後，以中共的「透明度」和蘇共的「公開性」比較，雖然有很大的距離，但過去比較，確實有很大的進步。

現在港澳辦公佈的「注意事項」，以種種不合理而且煩瑣的規定，實質上取消了港澳記者在內地的採訪活動，豈不是違背了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透明度」原則？這就不能不令人認為：中共仍然是口是心非的政黨，否則，就是中共認為內地的實情不能對港澳同胞透明，二者必居其一。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對新聞傳播事業顯出從未有過的重視。表現在三個方面：一、由政府負責官員再三說明六四事件沒有血腥鎮壓；二、指責、抨擊西方及港澳記者五、六月間的報導是造謠、中傷，甚至電視的實況是偽造的；三、批評內地報紙短時間出現的真實報導是「錯誤的輿論導向」。

五、六月間北京發生中國當代歷史中最驚人的羣眾運動，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都是在偶然情況下，被包括港澳記者在內的國際新聞傳播媒介捕捉到的。當時雲集北京的各國記者採訪目的是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新聞記者當時並沒有想到他們成為中國當代重要歷史事件的目擊者，並且將北京五、六月間的真相如實地、及時地向全世界傳播。國際社會知道真相之後作出了使中國政府陷於困境的反應。中國政府大概認真總結了這次的經驗，想出了杜絕上述情況出現的因素。這就是七點「注意事項」的出發點。

「注意事項」無法律依據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實行開放、改革以來，新聞傳播事業有了較大的變化。最近幾年，新聞界普遍要求制定新聞法。隨著開放、改革的深入，新聞傳播的作用得到更廣泛的認同和重視，最突出的問題是公民的權利必須包括人民的知情權，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權。在討論制定新聞法的過程中，新聞界、法律界普遍認為：中國目前的新聞傳播事業能否體現人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關鍵問題在於公民可否辦報？要辦出一個新報，必須首先回答這個問題：公民可否辦報？問題的實質是中共機關報的壟斷必須結束。因為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制定新聞法至今還是空談。

港澳辦公佈的七點「注意事項」沒有法的基礎，只是由政府部門制訂的一項政策或措施。無「法」依據對統治者來說，是有助於政策多變。

外行人說荒唐話

第一點，要求港澳記者到內地採訪須提前十五天提出申請，申請人要具體說明採訪計劃，包括採訪對象、活動地區、停留時間。

不妨作個假設：一九八九年五月初，香港某報記者根據星相學大師夜觀天象的推算，預知北京將於六月三、四日之間發生血光之災，某報記者於五月十五日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到北京採訪「血光之災」的申請，北京當局以最高效率批准了這個申請，某報記者如願於六月二日飛到北京，於是得了獨家新聞。

令人遺憾的是，別說是新聞記者，就是星相學大師也無法預見十五天以後的世事變化。可見，這條規定是荒謬的黑色幽默。

要在採訪之前制定一個不容改變的採訪計劃，對任何一個記者都是難題。新聞採訪教科書教導記者要靈活，原定要採訪某事在開始時或進行中突然遇到更重大的新聞，必須當機立斷地改變計劃。那裏有死抱着一個原定計劃不變的記者？即使有也必定是最低能的記者。

內地某個開放城市，邀請港澳記者去報導最近幾年的偉大成就，當然要定報導計劃，採訪日程。說實話，這類新聞沒有很大的價值。有重大價值的新聞往往是在無從計劃的。前年台灣華航飛機突然飛到廣州，幾年前美國航天飛機在升空時突然爆炸，誰能作出採訪計劃？再舉個唯唯諾諾的例子：李鵬總理突患急病蒙主寵召，一週後舉行國葬，這「舉國同悲」的大事如要採訪，照「注意事項」辦理，記者趕到北京，喪事已過，也許只看到薄海歡騰的景象了。

《文匯》、《大公》違反規定？

「注意事項」中的第五點規定：「港澳記者從港澳地區向內地機關、單位、個人進行電話採訪，均不予接受。」

香港報紙、電視、廣播幾種傳播媒介，通過長途電話向包括內地的世界各地進行採訪，這是一種常用的方法，多數是用來證實或補充突發事件，以達到向公眾傳播真實新聞的目的。最近山西的地震，香港的電視台就以電話採訪北京國家地震局，從而使這個報導更加詳細可信。現在中國政府既然禁止，機關、單位對電話採訪均不予接受，局外人不便置評。但是，個人也「不予接受」，情況又變得應予置評了。因為這涉及公民的通信自由。

一、住在北京的公民甲接到香港某報記者乙從香港打去的電話，乙是甲的熟人，是朋友，聽不聽？

二、乙問甲：北京今天早上地震，您府上的人安全嗎？房子受到損害嗎？這樣的問題回答不回答？算不算接受採訪？回答了算不算犯法？

三、倘一律規定不能接聽港澳記者那怕是朋友的電話，這是否違反了憲法規定的公民的通信自由？

「注意事項」的第五點規定：「港澳新聞機構不得僱用內地人員為其變相的常駐記者，不得在內地聘用特約記者和通訊員。」

現在有國內常駐記者的港澳報紙，只有香港《大公報》、香港《文匯報》及澳門《澳門日報》。他們在北京、廣州設有以常駐記者組成的辦事處，常駐記者僱用內地人員。六四事件以前，《文匯》、《大公》在北京的辦事處以香港派去的記者為主力，六四事件以後由香港派去的記者撤回香港，廣州的辦事處幾年前恢復後沒有香港派去的記者。《澳門日報》在廣州設有辦事處，也只有內地僱用人員。

港澳辦制定這條規定時，大概忘記了這三間港澳新聞機構的實情，也沒有徵詢新華社香港分社或三報的意見，倉促制定又倉促公佈，這樣的「注意事項」，定得太不注意了。看來還得為這港澳三報的實際情況另發一個「內部掌握」的附件了。

港澳辦嚴重失職

最後談幾點結論：

一、中國憲法規定，制訂任何一種法規，都不能和憲法相抵觸。不幸的是港澳辦的「注意事項」竟然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通信自由，豈不是踐踏憲法？

二、港澳辦本來不管新聞，現在為了港澳事務而兼管港澳新聞，而且要制訂「注意事項」，有關官員應該先學一點新聞學常識，只是常識而已，免得說些外行話。令人哭笑不得事小，貽誤國家事大。

三、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政府再三重申：開放、改革政策不變。港澳辦這一措施，卻使人覺得內地倒退到鐵幕低垂的關閉狀態。

四、港澳辦作為政府職能部門，其任務之一應該是幫助港澳同胞更多地瞭解內地情況。這七點「注意事項」的作用適得其反，不僅無助於港澳同胞對內地的瞭解，甚至比現在的情況更糟，將使港澳同胞對內地更加隔膜。從這個意義來評價，國務院港澳辦是失職。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望北樓

有弊無利的「七項規限」

·郭富

七項規限猶如七道壁壘，對港澳記者嚴加防範，實際上是取消了港澳記者到內地的自由採訪活動。這是大陸實行對外開放十年來新聞政策的一個大倒退。

七項規限 開放倒退

不久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發言人，公佈了有關港澳記者到內地採訪的七項注意事項。其內容包括：港澳記者要求到內地採訪，須提前十五天提出申請；港澳記者從港澳地區向內地機關、單位、個人進行電話採訪，均不予接受；在內地進行採訪的港澳記者不得進行與記者身份不符的活動，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口頭警告、收回「採訪證」或依法處理；以探親、旅遊等名義持港澳同胞回鄉證入境的港澳記者，不得進行採訪活動，等等。

七項規限猶如七道壁壘，對港澳記者嚴加防範，實際上是取消了港澳記者到內地的自由採訪活動。這是大陸實行對外開放十年來新聞政策的一個大倒退。

毋庸諱言，這次大陸加緊新聞封鎖，其誘因是北京的六四事件。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日前在廣州也表示，這些新的管理辦法的實施，與港澳記者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有關。蓋在此次事件中，本港傳媒機構紛紛派出記者前往北京、廣西而深入內地採訪了事件的全過程，並且作了實地的直擊報導。由於港澳記者大都同情學生運動，在採訪過程中又過份投入，因此，他們的報導傾向性極為明顯。有的記者還親歷其間，並且從精神上到物質上支援了學生運動；有的從主觀願望出發，偏信了某些傳言並加以報導，以致一時謠言廣為傳播……所有這些，自然引起北京當局的不安，尤其是事件平息後，在擔心香港會成為「反共基地」的情況下，中共終於下決心嚴格限制港澳記者的採訪活動。

七項規限 弊多利少

在中共仍然強調改革開放政策不變的今天，港澳辦訂出對港澳記者的七項限制，實在是弊多利少，甚至是有弊而無利。

誠然，港澳記者以同胞的身份，持「回鄉證」進入內地採訪，儘管南腔北調，仍是同文同種，採訪條件十分有利，加以他們思想無框框，又具拼搏精神，故往往能採訪到大陸的許多第一手新聞。他們的報導受到海外內讀者的歡迎，非「鬼佬」記者的隔靴搔癢式採訪所能同日而語。當然，他們的報導也有不少涉及大陸的「陰暗面」，但多數也是出於善意，存心揭發社會弊端是少數。而且廣大讀者，也是抱著關心、期待的心情來閱讀有關大陸的報導的，讀者們為大陸的每一點進步而歡欣鼓舞，也為國家存在弊端未能迅速克服而惋惜、焦慮。

同時也應看到，港澳記者過去十年來，報導了大陸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許多新事物，海外讀者透過港澳傳媒，得以全面而真實地瞭解中國、認識中國。在幫助大陸吸引海外投資方面，港澳記者也是應記一大功。

至於港澳記者過去在大陸的採訪活動中，存在的某些不合手續的現象，完全可以通過一些加強管理、相互溝通的措施加以解決。而現在規定港澳記者要提前十五天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申請，經新華社轉告國務院有關部門，獲准後才能去內地進行採訪，這就抹煞了新聞的時效性。新聞貴「新」，要求記者提前十五天申請，還要提交具體採訪計劃（包括採訪項目、採訪對象、活動地區、停留時間等），這不是採訪什麼新聞，而是泡製「舊聞」了。

由於害怕港澳記者越軌而訂出這七項規限，其實是因噎廢食，使大陸回復以前閉關鎖國的舊觀。

弄虛作假 勢所難免

七項規限，弊病多多。在這些規限下，記者大多數只能採訪到一些虛假的新聞。

有一些趣事值得一提：七十年代內地的物資相當缺乏，市場和商店的商品供不應求，市民買東西大都憑票供應，有的商品即使有購物票也要排長龍，而且還不一定能保證買到。但如果遇上外國嘉賓到訪，當局就會指令有關方面做手脚，千方百計營造「供應充足、市場繁榮」的氣氛，不能失禮於外人。有一次，某外國代表團到廣州訪問，提出要參觀幾個肉菜市場。於是有關部門馬上調動大批商品趕運到市場，經過一番緊張，該市場馬上變得蔬果充足，雞鴨齊鳴，魚蝦海鮮生龍活虎，來賓們看得目不暇給，人人交口稱讚中國經濟得了得，人民生活提高了。翌日報紙刊登出來的妙筆生花的文章，自然是把那動人的場面描寫得活靈活現。斯時也，那些琳瑯滿目的商品早已搬得一乾而淨，據說有些運去裝箱的準備讓外賓參觀的市場，有些則被特權人物「走後門」買去了。

港澳記者內地採訪 十五天前須提申請

國務院港澳辦採訪注意七事項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為加強對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的管理，特訂出七項注意事項，自即日起施行。凡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 一、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須提前十五天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申請，經批准後方可來內地採訪。
- 二、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須持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出的「採訪證」，並持「回鄉證」入境。
- 三、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須持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出的「採訪證」，並持「回鄉證」入境。
- 四、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須持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出的「採訪證」，並持「回鄉證」入境。
- 五、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須持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出的「採訪證」，並持「回鄉證」入境。
- 六、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須持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出的「採訪證」，並持「回鄉證」入境。
- 七、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須持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出的「採訪證」，並持「回鄉證」入境。

台、從中央到地方，都是一個聲音、一副面孔。

海外傳媒則強調人民的知情權，新聞記者要做有聞必錄，傳播媒介要起到監督政府的作用。所以，港澳記者與大陸記者在採訪中的作風和着眼點迥然不同，他們報導的風格、深度、層面以及所起的作用也就大不相同。現在港澳辦訂出七項規限，實際上是要港澳記者完全按照當局的意旨採訪報導，他們不肯以真面目示人，這何異於切斷了同外部世界的聯繫，同開放政策背道而馳。

有消息說，有部份港澳記者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引起北京某些人的不滿，有關部門已把他們上了「黑名單」。這些記者已成了不受大陸歡迎的人，自不待言，而對其他港澳記者，也起了一種警覺作用：要想到內地採訪嗎，就得釐定定點！

新的規限不准港澳記者持港澳同胞回鄉證以探親、旅遊名義入境進行採訪，殊不合理。設有港澳記者回鄉探親、旅遊，他們帶著眼睛看，帶著耳朵聽，帶著嘴巴問，當然法律沒規定不可以照相、做筆記，那麼，他們返港後在報上發表通訊或觀察之類文章（裏面難免有新聞），這算不算違反港澳辦的新規限呢？

所謂「不得進行與記者身份不符的活動」，不知這「記者身份」乃何所指？國家已有法律和法令，任何人只要不犯法，就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要提防今後有人以「與記者身份不符」為藉口，對記者進行人身迫害。

大陸由於實行新聞封鎖，大道消息不暢，小道消息橫行，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會謠言滿天飛，前個時期的什麼「××中槍」、「×××病亡」等假消息乃得以乘機而起。現在港澳辦訂出七項規限，進一步加緊新聞封鎖，正道消息不可得，人們只能道聽途說，或憑主觀臆測推測來報導中國問題，這就勢必助長謠言的盛行，對大陸和香港均無好處。

李後稱新的管理辦法執行一段時間之後將會檢討，不排除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修改的可能。筆者期望港澳辦在權衡得失之後，盡快徹底修改或取消為海外詬病的七項規限。

小道消息 將更盛行

根據共產黨的新聞觀，傳播媒介是黨的喉舌，和宣傳工具，新聞是為政治服務的。因此，中共從來要求記者要根據黨的方針政策去宣傳報導，要同黨中央的口徑保持一致，這就造成大陸的報紙、電

拒絕「百姓」及「當代」採訪，又下達「四不」指示，針對的港刊是……「港刊」在中共領導層中早已是專有名詞，引起敏感，最近還上網上線，提到「顛覆政府」。

基本法章委二月中在北京召開最後一次大會，再一次拒絕了香港「百姓」半月刊與「當代」週刊派人前往採訪，卻沒有給任何理由。〈百姓〉主持人胡菊人表示，中共不給理由的原因是他們的理由說不通，或見不得人。〈當代〉總編輯程翔表示，中共對外國的新聞機構與台灣的反共新聞機構，都容許去採訪，沒有道理拒絕香港這兩份刊物。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劉慧卿則認為，中共不給理由的做法，會使香港其他的新聞機構去猜測原因，從而對自己的新聞報導採取更慎重的「自我審查」。

「四不」指示，針對兩份港刊

據筆者了解的情況，中共對香港刊物採取拒絕採訪的做法，當不止上述兩份刊物。至少《九十年代》與《爭鳴》若申請前往採訪，也一定會被拒絕，只不過這兩份刊物並沒有提出申請罷了。因為，中共近日針對《九十年代》與《爭鳴》，又有新的文件下達到香港。

「不看」，於是設第三道防線，即自己看也就罷了，至少「不傳」吧。然而，若有精彩文章「傳」將起來怎麼辦呢？最後一道防線是「不談」——不要談論文章的內容，那麼即使私下買了，看了，傳了，只要「不談」，做領導的也可以當作事情沒有發生。

「港刊」爲何歸入另冊

的各中資機構負責人，對《九十年代》與《爭鳴》，要做到「不買，不看，不傳，不論」這「四不」。

「四不」下達後，一個直接的效果，就是引發駐港幹部及中資機構負責人的好奇心，買的人更多了。而且，中資機構與大陸機構本是

為什麼中共當局對香港的幾份刊物如此敏感呢？難道這幾份刊物比一些報紙、電台、電視的影響力更大？又或者如程翔所說的，既盜視台灣的、西方的有強烈反對共產主義色彩的媒介去北京採訪，為什麼單單不容許一些香港刊物去呢？

一脉相承，早已習慣了開會講一套，散會後做的又是另一套。因此，縱使「買」，也不是像像地買，而是大家公開地買，當開會的傳達「說了也白說」。

從影響力，從政治立場去看，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問題的核心是一般人無法猜到的理由，就是「港刊」這兩個字。

一九七九年三、四月間，中共達到了禁止

不但公開地買，而且在傳達的會議之後，首先就對這「四不」的文件「論」起來了。其中有的意見頗為精闢。

一種意見是：「四不」，光「不買」就夠了。「不買」，怎麼「看」得到？又哪裏會「傳」會「論」呢？

香港五份刊物進口的通知，從此「一紙開天」。中共領導層中就成了一個專有名詞。當時，被禁止進口的包括：《七十年代》、《爭鳴》、《動向》、《廣角鏡》、《鏡報》。其中後面兩份刊物的負責人是中共政協委員，而前三份在草創期間都有較強烈的親中共的色彩。也就

一種意見是：「四不」是不可少的。自己「不買」，別人買了給你看，你看不看呢？文章要求你「不看」。自己不買不看，別人看到有「精彩文章」，傳給你，你會不會不看雜誌？

是說，「港升」的含意之一，是原來是屬於靠近中共營壘的人，刊物一度能進口大陸，其報導及言論方向卻被中共當局認為是「影響安定團結」。是怎麼樣的報導及言論方向呢？據

悉，從中共的角度來說，就是內容涉及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這一內容，被認為是「港刊」的特點。

當然，其後五份刊物中的兩份，或以拙劣其他刊物的打手姿態，或以願提供宣傳圈地給中共當局作條件，又獲得中共的青睞了。不過，「港刊」已從此成了中共幹部中的專有名詞，總之就是報導中共高層動向的刊物。其中獲中共青睞的刊物，也偶因文章的敏感而導致一些小麻煩。

「港刊」的另一個影響，是它的優於地帶、收藏、傳閱。因此，不少出國的幹部會帶「港刊」到大陸。尤其是在北京的幹部與知識份子，傳閱「港刊」更是過去十年相當熱門的事情。「傳」之外還加上「論」，這就很難不造成一些耳語式的輿論壓力了。這一個特點，是港台報紙以至電台、電視所沒有的。至於外立報刊，儘管對中共的批判性比「港刊」更強，但中國大陸看不到或不會看，因此也就發揮不了這麼大的作用。

「港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海外影響。其中又以「九十年代」在歐美華人知識圈中的影響最大，許多知名的學者作家都在「港刊」上發表文章，都常常議論「港刊」文章之訊息或意見。而歐美華人的知名學者、作家獲中共高層接見的機會又比較大，因此中共層就常常聽到一些「港刊」的名字了。

最後，因為「港刊」的海外影響，使中的有關機構也覺得要從「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角度去閱讀這些刊物。其中如調查部統戰部、各機構的外事部等等，都有訂閱「港刊」。有一段時期，訂閱的範圍廣些；而後來，被准許訂閱的範圍大大縮小了。准許訂閱的範圍大小，也成了中共各級幹部與知識份子議論政治風向的一個話題。這些訂閱都集中一個書刊的進口單位，在香港大批進口，再發到有關部門的。港報、台報一來訂閱太貴二來每天出報在採購上負加重，大陸的幹部知識份子對報紙的許多內容又不那麼感興趣不像「港刊」那樣集中報導及評論他們關心

題目。此外，「港刊」的字體比較港報大，更適合老人閱讀。於是「港刊」的地位，因老人閱讀，而在中共幹部的眼中更感特殊。

「港刊」言論「顛覆政府」？

除了「四不」之外，筆者還聽到一個說法，就是新華社中人談到「港刊」時，提及不排除香港有的刊物以「顛覆中國政府」為目的。在催促他說是哪份刊物時，他繞了幾圈，終於提及《爭鳴》的名字。

從香港及海外華人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哪一份港刊，無論寫出來的是怎樣的文章，其實都只是言論，而決不涉及什麼顛覆行動。然而從中共領導層，特別是當今強硬派領導人的角度來看，報導與評論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揭露中共高幹或高幹子弟一些見不得人的行為，都是足以影響上層權力變化的言論。從李鵬政府看來，他們視「港刊」言論有害於李鵬政府的穩定性，以至上綱上線到「顛覆政府」的層次，也是他們很自然的思維方式。



岑建勳：

不要惹我！



鍾仕梅 整理

本月二十五日，中共當局點名指控支聯會，指其協助民運人士逃離中國，還映出一張有岑建勳及司徒華“簽名”的信。岑建勳本月二十七日接受本刊總編輯程翔訪問時，對中共當局的恐嚇嗤之以鼻。他認為港人也不要因此被嚇怕。

以下是訪問內容。

程：中共指你參與了營救民運分子陳子明、王軍濤等，這是否屬實？

岑：我不會就個別事件作評論。香港是講究法治的，在一個案件未審結前，任何人不得作不當的發言都會影響被告。中共不講法治，在未有審結案件前，便通過輿論工具製造不利於被告的言論。這是有違司法公正的原則。即使有人協助民運分子離開大陸，這也是很正常的事，因為中共政權倒行逆施，它以坦克車殘暴地鎮壓人民的民主要求後，還在全國掀起白色恐怖，在這種處境下，任何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伸出援手，使一些可能遭厄運的朋友脫險。這樣做完全正確，符合中國人的良心。再說，即使有人這樣做，也不等於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因為香港從來就是中國進步人士逃避政治迫害的地方。

我自五月起盡了力去做了一點事，我不相信我所做的東西對國家及人民有損害。要令到國家富強，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必須有更多人支持民主，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自己像大部分香港人一樣無愧於心。我所做的所有東西，不論大小，我一點也不後悔。唯一我會作出評論的是，我覺得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所出的電視片段很有問題，他們映的一張紙是有我及司徒華的簽名，含糊其辭說找到文件，上面有我們兩個人的簽名，文件的性質並沒有說清楚，予人一種

“砌生豬肉”的感覺，這是極之不光彩的做法。首先，這兩個名字絕非我倆的親筆簽名，但他們說是簽名，我難道不認得自己的字跡？而且岑建勳那三個字，尤其是動字是用內地的寫法，很多人都用這個寫法，唯獨我不會用這個寫法。而且在法律審訊尚未進行期間，已暗喻別人有罪的做法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行為。

程：你看他們這次不惜公開點你的名，

究竟目的何在？司徒華及李柱銘已被點過名，支聯會亦已被罵過，為何他們要逐步逐步地令到更多人被點名？

岑：他們強調“以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為目的的支聯會的領頭人岑建勳”，旨在強化支聯會進行非法活動這個印象，但其實我在支聯會雖是常委，但並非領頭人，只扮演非常細小的角色。其實在“六·四”後，“民主歌聲獻中華”之類，我參與策劃、籌錢等，百多個團體民

主選舉地選了我當常委，沒有理由不藉此盡一分力。我在港支聯會扮演的角色實在很小，他們故意強化這種關係其實是想將港支聯定性為一個反動組織，尤其在國內人民心目中，讓人民認識岑建勳這個領頭人。作為支聯會成員之一，我可以證實，支聯會根本和這些事沒有任何聯繫，因為沒有一次常委會曾經討論這些問題，大會上也從未討論過。

程：除了明日（十二月二十八日）的記者會外，你還會作出甚麼相應行動？

岑：其實我並不喜歡介入這種爭論。我是一個很實幹的人，不大喜歡討論，即使有關支聯會的大方向的討論我也沒甚興趣。他們有甚麼做不來的事就交給我做，我能力所及的一定會做。例如“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時候，我認為當時要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必須多籌錢，於是我就號召去搞，其實是否支聯會主辦也是一樣，我的做事方式就是這樣。又例如“六四百日祭”，支聯會要求演藝界的朋友幫助策劃、籌備，我們就接了來做。我們的作用永遠是支援，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尤其是政治性這樣深的討論，那並非我的專長，因為我實際上已離開政治十多年。我的政治常識不會比一個普通市民多很多。

程：那你曾否考慮採取法律行動，起碼像黃德北事件那樣作出澄清？

岑：如何澄清？全港的報章都是照登電訊，總不成起訴全港的報章，告新華社也沒有用的，我是很實際的，將自己的立場清楚說明就算。我覺得我最重要的論點是，你說我有罪或是其他甚麼，我相信自己沒有罪，可以由香港市民來說我有没有罪，實際上我做的就是任何人也會做的東西。中港關係已陷入一種緊張局面，他們還在惡化這個局面，這對誰也不好，除了一些別有用心、姿勢強

硬的人，對改革開放也不好，還在說翻一番嗎？我也不知道翻甚麼番。

程：看來他們這次這樣具體地把你的名字聯繫到這件事，定是找到了蛛絲馬迹，例如一些文件等。

岑：這我不作具體評論，但是如果他們是很清楚的，定能說得更具體，說甚麼“北京一個人”，名字也沒有，我根本無法反應及評論，我亦不會無聊到挑戰他們，叫他們拿出證據來，我乾脆不理會他們，反正他們只是找機會把港支聯打成反革命，但現時仍未提到這個名詞，只是說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程：被點名後，你害怕嗎？

岑：我不怕。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有處事原則，怎可以和他（中共）鬥？我是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任他怎樣處置也行，但一個國家要淪落到這個地步，那就十分悲哀。

程：據我們所知，香港也有秘密通道將人解回國內，你是否擔心？

岑：若果這樣，將會無休無止，如果將岑建勳或某一個人運回去，這兒有能力運走的人又將某高官外面的人運去另一個地方，這樣弄到甚麼時候才完？這是事實，若果要還原到這種恐怖分子性的手法，我相信有能力在中國以外做這些東西的不止他們，某些人可以將嚴家其、吾爾開希從重重關卡帶出來，不可以排除一種可能性，就是將某高官在海外的某子弟運到另一個地方。大家都知道，他們有很多高幹子弟在海外，有人更有齊全的地址名單，只是大家不走走這條路而已。

程：你真的很膽量。

岑：別人十多二十歲已在天安門丟了命，我三十多四十歲，多了二十多年命，即使死了也值得。若果發生這樣的事，他們外面的子女可能只有二十多歲，那就不值得了。我相信那批有膽拯救這麼多人出來的朋友，不理他們是誰，一定有相當能力，要搞這些東西，還有好長一段日子呢！在國內，自是他們人多勢眾，但到了外面，卻是人人多。我是不怕的，所以我保鏢也不要。

程：但我們知道“六·四”後確是來了不少安全部的人。

岑：大家要光明正大。我覺得，在某個意義上，拯救民運人士時被逮捕，是自己辦事不力；能拯救人出來，是他們辦事不力。但這是對事不對人，搞小陰謀就是對人，大家都開始搞對人的話，就會“一窩熟”。我相信一定有些人持十分激烈的態度，但大家都覺得要對事，

不對人，如果要挾持某某的子女來交換另一個人，這我也反對，如果我有權反對的話。

程：對於他們的恐嚇，你處之泰然？

岑：完全處之泰然，因為我深信，如果任何事發生在我身上，他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大到他無法想象。因為世上沒有人做這些事的，這些事並非只有他一個人曉得做，他的槍並非比外面多。香港這次已經證明，忠義之士多的是，他們不為名利。如果大家都要還原到這樣原始的人類關係，搞小陰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常常說，不用請人來保護我，保護也沒有用，老虎也會打瞌睡。

程：“六·四”後你回過國內沒有？

岑：沒有，因為我知道自己是不能回去的。我回去一定會被捕的。但在香港，如果他對我作出任何侵犯，他們知道將要付出很大代價。

程：今後打算如何？你有没有申請移民？

岑：沒有。假若到時他們還是這樣不講理，我發覺在香港不可以作出任何貢獻的話，我唯有走。反正要去可以去，要留也可以留，最後一班機我也可以上。程：以你的知名度，確是隨時可以走，但中國現在這樣做，移民潮將無法遏止。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人怎能不害怕？

岑：所以我常常說，要保持香港繁榮安定談何容易，如果中國這樣做事，人們會走的。

程：許家屯向來和你們保持對話關係，為甚麼一下子會變得這樣惡劣？

岑：我十月一日的帖子也有收到，況且，這是許家屯可以決定的事嗎？

程：當然這不是許家屯可以決定的事，但在這個過程中他應該可以起疏導作用。或者在事發之後，你有没有和許家屯方面恢復對話？

岑：我自己一向沒有對話這回事，我一向沒有碰這些東西，除了“六·四”以後，事後也沒有和他們談這些東西。我反而覺得，他們並非針對岑建勳這個人，而是針對支聯會。

程：此事發生後，新華社有沒有派人來和你傾談及調停，他們應該了解香港的情況。

岑：若果了解情況，他們應該向大陸那邊說，不要這樣個別地針對岑建勳，因為這是一群瘋狗，如果有機會，他們定會說這番話，因為我真的不顧一切的。

程：你說你是瘋狗？

岑：我是擺明出來的。我在天安門時，我沒有閃閃縮縮，我沒有避過，我不覺得自己做過錯事，沒有動他們去或留。我有一盒錄音帶，記錄了我和對從德及柴玲傾談如何整頓天安門，我說得很清楚，對於他們的去留，我沒有意見，如果他們要留，請他們留得好看一點。我並不覺得自己在搞甚麼陰謀，我這個人很是公開的。

程：你個人不怕，但香港很多人看來都很怕。你覺得今後港人應如何自處？

岑：港人應該增強信心，不要怕嚇。因為歸根到底我們沒有做錯事。有人說香港人不要刺激中國。我不同意這種意見。我們都是中國人，對國家表示關心，有什麼不對？明明中共自己不對，也不可以批評一下嗎？指出他們一點錯誤，就認為是刺激中國，為什麼中共會變得那麼脆弱？對中共的做法，香港人是有不同意見的。不同意見不表示我們不愛國。所以，我對港人的忠告是“不要怕”，明明不對，也不敢講，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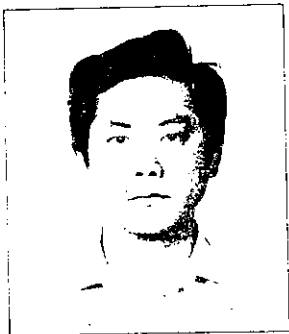
程：在羅海星這案中，中共明確地把他同支聯會聯繫起來。你認為這樣會不會增加支聯會的困難，使到香港市民視支聯會如洪水猛獸，更增加關於解散支聯會的壓力？

岑：有幾個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市民都認為不應該解散支聯會。港人參加支聯會，是完全出於自願的，沒有人是被蒙騙進來的。大家都是出於一個希望中國走開放、民主、自由的道路，所以，支聯會存在與否，不會影響香港的安定繁榮，也不會影響香港市民對前途的信心。但是中國的錯誤政策不改，則絕對會影響香港的安定繁榮，絕對會打擊港人對前途的信心。中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擊港人信心，這反而是中共要深思的問題。

當代周刊 89/12/38

什麼叫推翻政府？

——評羅海星等被捕



羅海星

若琛

羅海星等五名協助民運人士外逃的港澳同胞遭中國公安局逮捕。人民日報就此發表評論，勸香港人勿「干預」內地事務。香港市民可能會被嚇唬了，但我們不妨問一問：什麼叫推翻政府？只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才可戳破中共當局所謂「反革命」、所謂「策劃通緝要犯偷渡外逃」的錯誤立論。

對於今春發生的北京民運，北京硬要說成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合法政府」。可是迄今為止他們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頂多說他們企圖推翻「合法選出」的李鵬政府而矣。

春夏之交，全球華人响起「打倒李鵬」呼聲到底算不算要「推翻政府」？真正有識之士對此是不值一晒的。因為任誰都知，在任何民主國家裏，人民有權喊出要誰誰下台的口號，這是人民的權利。

羅海星等五位港澳人士，是因為營救

陳子明、王軍濤而被捕。陳、王的罪名是「煽動、組織、指揮北京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香港人大概對陳子明、王軍濤不大熟悉，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看今期本刊第十七頁有關的介紹）。

若果陳、王二人真的要推翻政府，羅海星等協助他們外逃當然不對，問題是按我們正常的標準，陳、王等民運人士首先推動中國民主改革，其行為屬「進步行動」，且在憲法容許人民擁有的合法權利之內，中國當權派對他們（及其他民運份子）的指控才是「非法」的，因為它才是侵犯人民的合法權利。那末，在這情況下，羅海星與岑建勳等「密謀」「營救民運人士」，則不獨正



營救民運分子的英雄不幸落難。

確，且是英雄行為。

至於說「有人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更不知應從何說起。

香港歷來是內地革命者的避難所，或外逃所經之地。無論孫中山、周恩來、廖承志、何香凝……以及解放前大批文化人，均曾南逃，避難於港澳。周恩來逃港時，就曾有工會人士予以協助藏匿其家。

請問按今天中共當權派的標準，協助

周恩來的工會人士是英雄還是「非法」份子？不問也可知他們的答案是雙重標準的。

無論當權派說什麼，我們只知道，港澳在中國新舊民主革命中，均曾扮演光榮角色。港澳同胞歷來均熱愛祖國，熱誠協助革命黨人逃避迫害，暫避災難以謀有朝一日能對中國前途有更大作為。港澳同胞今次在民運的表現，正是秉承這個優良傳統。他們出以公心，僅憑單純直率的愛國熱情，便能分辨到底誰是推動歷史潮流的革新派人士，誰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獨裁者、反動派。

對於羅海星、陳偉澤、謝振榮、李龍慶、黎沛成等人士努力營救民運份子的英勇行為，我們表示崇敬，對他們今番落難，我們唯望他們及早脫險，得到公正對待。

善良而公正的香港人，也必然明白他們五位的作為，不獨不是「非法」，且是秉承港人歷來支援國內革命人士的英勇愛國傳統。我們一定要聲援，並盡可能努力營救五位人士。

對一切為中國民主奮鬥的人士，我們謹致敬禮！

羅海星簡歷

羅海星，前《新晚報》總編輯羅承助（又名羅孚）的公子。原名羅海鮮。

羅氏在本港出生，後來回大陸唸書，來港前在廣州外語學院攻讀。八〇年來港。曾任新鴻基公司駐穗辦事處代表及新鴻基駐北京代表。八七年應貿易發展局之聘任該局北京辦事處代表，駐京港人對他都十分熟悉。

據悉，羅海星駐京期間，已開始與民運人士（即當時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密切來往，甚為友好。

六四前即今春，羅海星離開貿易發展局，轉任商人。

當代周刊 89/12/30

港人示威是許家屯失職？

蘇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二十八日召開常委會議時，點名批評八名高官鼓吹思想自由化及在學運期間失職。被點名批評八人之一，指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身為國家派駐香港最高負責人，在學運期間讓百萬名香港人多次上街，以及讓本港一些組織成立，使香港成為一個反共基地，造成一股很嚴重的反共浪潮，實在難辭其咎。

中共一方面進行迫害鎮壓，大追捕、大處決，一面進行再教育，是「六·四」屠城後對青年和學生的政策，如今又批評香港人百萬上街暨援學運，指許家屯失職，這種亂拋遮羞布的手腕，難道就能擦盡「六·四」遇難者及其家屬的血淚嗎？

香港六百萬市民中，幾乎三分之一，上街表態聲援北京學生民衆所要求的民主、自由；這種以和平方式表達義憤的壯舉，許家屯能壓制得了嗎？

中共現在一方面覺得知識分子靠不住，抓人，禁書、控制、唯恐不夠徹底，居然還要把尚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也控制在自己掌中。中共知道，大陸沒有香港的支持，四化必然無望。但是，中共所要求的是香港人默然的「奉獻」，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想着如何剝奪掉香港人的獨立人格，使之成為變相的只供役使的奴工。

香港人批評中共專政和腐敗貪污，並非「妄自菲薄」自己的國家。對於如何消除貪污、腐敗，反對濫用特權，不容許欺壓人民等等，是大陸十二億人民的權利，身為中國一份子的香港人，為什麼不能過問？特別是大陸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以振中華，香港人感於血濃於水的同胞愛，又為什麼不能聲援？

目前，天安門廣場血跡雖已被洗淨，但中共當局正面臨經濟全面紊亂情勢，無論是內部的技術官僚，或是國外的合資經營夥伴，都預測大陸的生產停滯，通貨膨脹和物資匱乏，會進一步惡化。

自「六·四」以來，不滿情緒上漲，很多人都不再努力工作，以致生產率急劇下跌。旅遊業去年為中共獲得高達二十二億美元外匯收入，學運之後估計，中共最少損失十億美元收入，直接投資和援助機構，也因中共鎮壓而紛紛推遲；使得大陸一些建設工程擱淺；銀行不願冒新風險而取消了長期貸款，和提高短期貸款利息。

另外，大陸外貿逆差今年上升至五十七億九千萬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五倍。由於現金短缺，「農民日報」說，今年收購糧食時，只能付一半現金，可能重演農民騷亂事件。

從以上種種形勢來看，中共如不鬆遼遼馬而一意孤行，收場將更不堪設想。怪罪許家屯，大罵香港人，是無濟於事的。

「秋後算帳」

學運期間，許家屯曾四見趙紫陽：
“六·四”之後，又曾會見李鵬，請他諒
解“海外情況”，李鵬也曾表示理解。
誰知，壓力仍然自北南來。許家屯曾
想補鑊，但……

鄧峰

許家屯離職的消息，本來是意料中事，因為很早之前已有消息說他將於今年三月基本法的工作結束後即會卸任。但是現時的消息卻說他在三月之前即會被調走，這樣的安排就不單是一個“功成身退”的問題，而是有秋後算帳的成份在內了。

本來，許家屯在香港工作六年多，總的來說，他的表現比以前歷任香港新華社社長都比較令港人接受。當然，必須指出，他的出發點主要是為了完成上級的指示，所以有時候也不可能照顧到港人的利益。

許家屯受到壓力，是中共內部鬥爭規律的一種表現。分析他受到壓力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去年學運初期，他的表現是比較接近趙紫陽的做法——不贊成以示威遊行的方法來表示對問題的不滿，但對學生的表現基本上是抱同情的態度。在北京還未實施戒嚴令之前，許家屯在北京曾四見趙紫陽。回港之後，許家屯又傳達過趙紫陽的指示：(1)對今次學運不要加溫；(2)淡化處理；(3)不要影響鄧小平的形象。其實，這幾項指示都很適當，而在北京與趙紫陽會面也不能算是什麼罪狀，許家屯在北京時也經常到鄧小平家中，直接聽命於鄧小平。據知情人透露，許家屯到鄧小平家中根本無需預約時間。外地官員回京向上級了解情況，是順理成章的，就比如在“六·四”之後，各省、市、自治區的頭頭返京聽命，李鵬等人也分別與他們見面。



許先生：一朝人別後，何日君再來？

那時，許家屯在京也曾與李鵬會面，並解釋海外的情況，說“由於當時海外的情況，不能不這樣做（即不能抑壓港人的民憤）”，儘管他是香港新華社社長，也是無法制止的；並表示他當時的一些做法，也是“形勢所逼”，請李鵬等人諒解。李鵬當時也的確曾表示理解。所以，許家屯儘管曾於學運期間四見趙紫陽，其性質也是正常的，就有如後來他見李鵬一樣。但是眼要算到頭上來了，見趙紫陽就成了罪，行動與趙紫陽類似也成了罪；而向李鵬解釋的情況（不管出發點如何）則不算數。這一點，可算是許家屯受到壓力的近因。

其二，許家屯在港工作期間，適逢中國也是採取開放改革的政策，所以他的工作表現自然而然地體現了趙紫陽的政策。所以，中港關係也曾出現過寬鬆的局面，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加上港人長期習慣的民主生活，對國內的政策時加批評，在發生“六·四”事件時也就更群情洶湧。本來人民不滿意政府政策而有所反應，是很正常的事，為政者應該察納雅言，但是，現時形勢反過來了，許家屯過去的一些做法都受到現時當權者的垢病。這一點，可算是他下台的遠因。

其三，據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在“六·四”之後，許家屯曾經想過“補鑊”，欲在基本法上作出補救，所以向北京表示，只要推出“一會兩局”方案，港人是可以接受的。當時，又有人虛報消息，說工商界都贊成“一會兩局”。誰知，這方案一出籠即受到很多抨擊，中共在基本法上也不能心想事成。事實上，港人普遍反對“一會兩局”，儘管許家屯欲以此“補鑊”也無能為力，但這恰恰又成了他“辦事不力”的證明。

不過，也有人認為今次許家屯受到壓力，不能算是秋後算帳。例如在民主國家中，某企業出了問題，其領導人也要引咎辭職；既然不能完成現時執政者的政策，也就很自然地受到處理。

在這裏，我們暫且不去研究許家屯的動機——他是因為錯誤判斷形勢，還是有其他原因致使他在“六·四”期間作出不合現時當權者方針的做法？但如果他真的是因為被秋後算帳而受到處理的話，那麼港人的信心就會進一步受到打擊了。

當代周刊 98/1/13

許家屯保護在港幹部



許家屯身邊的人，他能夠“保護”多少？

董明

許家屯在港工作六年多，其中功過各有毀譽，但是對絕大多數中共駐港幹部來說，他在“六·四”後竭力保護在港幹部免受內地清洗，則是令人欽佩的。所以，很多駐港幹部對許家屯這點還是十分感謝的。因此對他調回去，也感到十分可惜。據一些知情人士說，許家屯做了幾件好事：

第一，向中央承擔了責任（指大批中資機構員工上街示威遊行反對中央事）。

在香港，許家屯是無法阻止百萬港人上街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可能阻止中資機構員工參加遊行。所以，這個責任他是負不了的。但在“六·四”以後，許家屯在向中央匯報工作時，卻主動承擔了這個責任，表示這是由於自己在港工作期間，“長期沒有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所致。他對中央提交的報告指出，“在港的幹部，大多數都是好的”。在“六·四”期間，上街的職工，大多數是香港本地僱員。當地員工在那個時候受到整個社會氣氛影響，是不可避免的。而對當地僱員，黨組織是無法控制的。況且在當時的情況下，中資機構部分員工上街，客觀上有助於穩定群眾對中資機構的情緒，避免了對中資機構的衝擊，“保護了國家財產”。據悉，其後華潤集團負責人在向經貿部匯報時，就是按這個口徑。中銀集團負責人更舉“濟兌”為例，說明要不是當時部分員工上街，則難以平息群眾“向中資銀行擠兌”的風潮。由於許家屯自動承擔責任，並向中央說明港澳的特殊情況，總算保護了在港的很

多幹部。

第二，抓正面教育為主，不搞人人過關。

在“六·四”以後，中央發出文件，要各級都以“六四為界”，層層追查每一個人。在“六·四”期間的表現及言行，然後根據各人的具體情節給予不同的組織處理。當時還有人設想，駐港幹部中有參加“反中央”活動的，不論什麼形式，都要交代清楚。這個設想曾令很多幹部坐立不安。但是，許家屯決定不在香港搞這一套，而是搞“正面教育為主”。也採取的辦法是組織在港幹部輪流到深圳“學習”中央文件，每個人平均“學習”五天到一周左右。在“學習”期間，只是談認識，不搞“交代”。這個做法，對穩住廣大駐港幹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容許在港補領證件，使幹部不會人人自危。

在“六·四”後，公安部宣布各駐外人員需要補領一張新發的通行證，才能再出境。這個通知下達後，有些在內地出差的幹部因為來不及領取證件而被扣不讓回港。這就使很多幹部不敢回國，也不敢出差。中資機構在國內的很多業務陷入半停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許家屯向國內交涉，要求有關方面同意授權新華社可以就地替這些幹部辦理回港的通行證。這就解除了很多幹部的憂慮，而同時使到很多內地業務可以早日恢復。

現在，許家屯自己卻避不了被調離香港的命運。對此中資機構的很多幹部都感到惋惜。他們希望周南來港以後，也能够在同樣的認識。否則，對中資機構駐港幹部進行秋後算帳的面就肯定會擴大。

當代周刊 98/1/28

清算趙系人物無遠弗屆

新華社辦公室主任奉調離港

黃永

最近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室主任劉林，因涉嫌與趙紫陽的關係，被奉調離港接受調查。

談起劉林，相信認識他的港人並不多。原因此人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還不到三年。年紀不大，今年才四十三歲，但為人沉默，工作小心謹慎。再加

上他任辦公室主任一職是主管內務及協調的部門，因此甚少拋頭露臉，當然間中亦出席一些中資機構的大型酒會。

劉林到港工作前，曾是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室主任，是梁湘、周鼎在深圳當政時的班底。在深圳市府工作大概五年左右。自梁湘、周鼎在深圳下台，李灝走馬上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一職後，劉林曾有一段時間鬱鬱不得志。不久，周鼎被人賞識，重出政治舞台任新華社

澳門分社社長一職後，劉林亦曾欲赴港工作，但當時李灝不允，據說趙紫陽的夫人曾喚人致電，要求深圳放人。不久劉林就走馬上任，當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室正主任一職。

據傳，劉林之父親過去在廣州工作，亦只是廣東的一名普通老幹部，但與趙紫陽的關係不淺，早年曾是某位大人物的証婚人。文革時，趙受到衝擊，其父仍是趙紫陽的好友。

當代聞刊 98/1/13

六四刺激 病情惡化

新華社副部級官員自縊

本刊記者

新華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副主任蔡國喜於今年一月四日在杏花邨家中自縊身亡。蔡國喜於十五歲加入新華社工作，自縊身亡時五十五歲，在新華社工作了四十年之久。

以一個一生在新華社任職的工作人員，其職位也屬於大陸編制的副部長級，為什麼會採用自縊而終其餘生，倒是引起人們注意的。

蔡國喜自縊前，因情緒不寧，其家人曾向柴灣社署求助，探求有沒有輔助情緒不寧者的服務，而杏花邨也有不少中資機構的職員居住，因此，蔡國喜之死，是引起多方注意的。柴灣警署雖然於蔡死後，列為吊頸案處理，但，日前，於本月十日柴灣警方繼續向蔡的家人詢問口供，擬了解進一步的真相。

記者經過多方面的採訪，茲將蔡國喜生前的一些事情作一個報道，亦作為他之死的一個探索。

蔡國喜於一九八八年九月被新華社派去北京黨校學習，據說，這之前二、三年，新華社已提出派他去北京黨校學習，但蔡本人不大願意，直到八九年九月，他接受了這個遣派。學習期本來定一年，但半年後，蔡國喜終因精神不支，學習半途返港。返港後，他曾經在言談間指責有些曾去過黨校學習的同事隱瞞了一些情況，以致他沒有精神上的

準備。

據知，他們不滿意黨校的居住環境與生活，他心目中，既然是學習，應該有寧靜的環境，使學習者接受再教育及鑽研問題。豈知，他住的黨校，環境並不好，經常有人入屋偷東西，連電視機都被偷去，而安排他住的房間，又靠近廁所，晚上經常有人在廁所出出入入，影響了他的休息與睡眠。

蔡國喜是一個外表斯文的文化人，長期從事文化工作，也像很多文化人一樣，有輕微的神經衰弱，而在北京學習這段期間，他睡不好，加上北京天氣冷，他衣服不夠，又想不到黨校環境這麼不濟，心境很不佳，精神難以集中，結果他病了，他在港的家人對他這種情況，很為憂掛。他在北京不足半年，學習論文也寫不下去，而於八九年初由北京返回香港過農曆新年。

蔡國喜在北京半年的學習，加重了他的神經衰弱情況，返港後，他在新華社半休息半工作，逐漸，精神也好些了，家人對他也放下一半心了。

但，面對「六、四」事件，蔡國喜觸動很深，他的神經衰弱情況加深，左眼視網膜出現衰退，看東西模糊。醫生分析，受刺激過度會影響視網膜。而此後蔡國喜心情更加煩躁抑鬱，情緒低落，他不能接受過大的聲浪，像杏花邨上面飛過的飛機聲，還有電視機的聲響等等，家人也小心奕奕去遷就他。他的家

人也因此曾去柴灣社署求助，希望有人可以作輔導服務，但社署沒有這項服務，而他的家人也十分留意他的一舉一動。終於有一天，他留下遺書說要跳海自盡，幸好家人及時發覺，在海邊將他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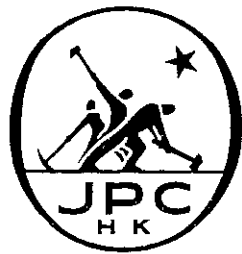
然而，蔡國喜逃離不了自殺的命運，一個終生服務於新華社的職員，落得這個下場，總是使人不無感慨的。

蔡國喜十五歲在勞校初中畢業出來，即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生前，輔助過已故新華社總編輯李沖主持的文藝領導小組工作，香港影劇文化界人士都有接觸他。接觸過他的人，認為他為人誠懇，做事負責，喜愛中國文學，詩詞歌賦，有研究精神。現，此人已故，遺體於本月十四日（星期日）出殯。新華社如何定論蔡國喜，也會引人注意的。

當代聞刊 98/1/13

三聯領導人接恐嚇信

信中文字用尺劃出，難辨字迹；先後兩封信，聲言要這個那個辭職。



陳文峰

儘管許家屯說過「六·四事件」既往不究，但是香港左派的「異己分子」可能被清洗的陰影並未完全消除。就在此時，三聯書店發生了一宗恐嚇信事件。

「六·四」之前，三聯出版了不少敏感人物的著作；「六·四」後，三聯對來自上級的指示又顯得不大起勁（本刊上期曾作介紹）。他們比較傾向港事港辦，極力避免政治問題影響正常的業務，因此也招致一些人士的不滿。

事情是這樣的：約在十月中旬，三聯的中、高級領導人分別收到一封同樣內容的怪信。這信是用三聯書店的信紙「劃」出來的——因為發信人並不是把信中的字寫出來，也不是用電腦把內容打出來，而是用筆和尺把信中的字一筆一劃地「劃」出來，所以線條很直，也無法認出字跡。各人收到的信都一模一樣，是影印本。

此信的內容大致是：我（發信人自稱）是愛護三聯書店的，但三聯的領導人却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例如出版嚴家其、蘇曉康等人的書，這是不對的，也是有意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的表現。

發信人力數三聯領導人的「罪狀」，並聲稱三聯的領導層要以行動補救，否則他會向新華社甚至北京告

發。該信還說，如果三聯領導層沒有補救的行動，他就會把他所知道的內幕「爆」給十多家刊物知道。

該信還對各收信人大肆攻擊和中傷。

來自北京的消息告訴本刊說，北京三聯書店也收到了這封信，內容也是一樣。

最少有五、六人收到這封信，包括一些主任級的人。但究竟有多少人收到，實在無人知曉。初時，收到這信的人並不在意，還以為有人在開玩笑。但後來發覺不少人也收到同樣的信，才感到事有蹊蹺。

由於收到這信的都是編輯部的人，此事後來亦愈傳愈廣，有關方面研究後，覺得應該有所表示，澄清一些誤解。所以，他們把編輯部的人員召集在一起，宣讀了一封由店務會通過的信件。該信的內容大致是：根據許家屯所說的話，中資機構的人在「六·四」期間所做的事，將不會追究。中資的出版機構和書店，也是這樣對待。三聯領導層日前收到一封信件，不知道是誰寫的，三聯方面認為這種做法值得商榷。各位員工有什麼意見，可以隨時通過正常途徑提出，而無需採取這種手法。至於書店出版什麼書，是公司領導層經過正式程序通過的，包括出版嚴家其、蘇曉康等人的書；如果有問題，書店領導人會負責，也只能透過正常的方法來解決。對於個人的行為，除非與書店有關，

否則書店是不會理會的。最後，希望今次事件也到此為止。

誰知，這次講話之兩天，一名主任級的人員再收到第二封信。今次只有他收到，發信人還要他把內容傳給其他沒有收到信的人知道。這封信的大意是：你們明知許家屯的話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實際上你們是知錯不改。如果你們還是這樣下去，我就會把這事情擴大。發信人還列出了一批刊物的名稱，聲言會寄信給各刊物。最後，該信還要這個那個辭職。

據估計，發信人很可能是三聯內部的人，因為他可以很方便地使用三聯的信紙，而且當三聯領導層宣讀店務會通過的信件後，發信人很快就了解詳情，並作出反應。此外，從信中的內容和語氣來看，發信人也很清楚三聯內部的事情。

不過，談到發信的動機，就很難猜測了。有人估計，可能是有些人出於「義憤」，跳出來「主持公道」，因為如果是上級要整人的話，實在無需採用這種方法，乾脆「公事公辦」，馬上開刀。但也有人不排除其他可能，因為現時的情況很難說，與出版毫無關係的某位工商界巨子竟然也向李鵬告出版界的狀。

此事現時已傳到新華社高層的耳中，但他們暫時不會採取什麼措施。

姚勇戰身繫上海

何芷玲

移居香港，返滬就學，去年六月在機場被拘留，官方報刊指為上海高自聯頭頭。姚勇戰以介入民運而身繫囹圄，中共當局怎樣處理，顯示它對參與民運的港人的態度。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姚勇戰在英國使館職員陪同下前赴上海虹橋機場，啟程返港，在機場內被公安人員以「抗拒市政府六月十日發出關於取締非法組織上海「高自聯」通告，拒不向公安機關登記」及「攜帶違禁品」為由拘捕。

七月廿一日，上海檢察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宣佈正式逮捕姚勇戰。自此，這位上海學潮的參與者就身繫囹圄了。

今年二月四日，上海檢察院在扣押限期屆滿之際，將姚勇戰案退回公安局調查。整整八個月，在姚的家人多方追問之下，一直拖延。

但另一方面，官方卻通過報刊抹黑姚勇戰和上海學運。官方點名攻擊姚勇戰的文章有三篇：九月二日《復旦特刊》的《動亂與反動亂的較量》；九月七日上海《解放日報》的《亂雲飛渡五十年——看「高自聯」頭目在復旦大學製造動亂》；九月廿四日《深圳特區報》的《上海動亂真相》。以下資料，主要取材自這三篇報導。

要為八六學潮平反

去年四月十五日，中央電視台播出八七年被迫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消息。當晚上海復旦大學校園內已有人貼出第一條悼念性標語，至半夜增至十多條，這些連綿不斷的標語掀開了上海民運的序幕。

由四月十六日開始，復旦學生經常在三一〇教室聚會，舉行悼胡活動。據官方報導說，姚勇戰在會上提出：「我們悼胡是為一九八六年學潮平反。」

四月十八日，學生推舉了二十人組成「悼念胡耀邦同志委員會」，策動四月十九日的全市大遊行。校方當晚宣佈此為非法組織，命其解散。官方說法是，十九日的遊行隊伍原已糾集三、四千人，在校內黨政幹部阻攔下，最後只剩二百人遊行。

在強大壓力底下，活躍學生仍繼續舉行集會，號召四月廿一日下午在上海人民廣場舉行

全市大集會

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反映了官方對學潮的定性。上海市於即日召開幹部大會，學習社論，又宣佈《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之後，上海各高校學生、教師紛紛捲入運動。

五月十日，上海高自聯策劃「上海高校學生赴京請願團」，於翌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國務院提出《世界經濟導報》錯在「裏及」總編輯責任制」等問題。

發動遊行絕食聲援北京

五月中旬，北京學生以絕食掀起學運高潮時，姚勇戰等於五月十五日連夜到單身教工宿舍和研究生宿舍發動第二天大遊行。翌日，復旦、同濟、上海工大等數千名學生、教師衝破校內黨政幹部阻攔，遊行至外灘；晚上隨即成立上海高校絕食團，姚勇戰等四十七人在市政府門前宣佈絕食。至十九日，絕食人數增至三百多人。

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戒嚴，上海聲援運動升級。官方的說法是，「北高聯南下宣傳團」到上海展開串連，五月廿四日上海「高自聯」常委姚勇戰先後安排「南下宣傳團」在上海工大、鐵道學院、復旦、交大作多次演講，會上



姚勇戰：命運未卜。

提出「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的口號。其後一連九天，上海市都出現大規模遊行示威；工人也成立「上海工人聲援團」。

《深圳特區報》的《上海動亂真相》，描繪北京屠城前後由五月廿九日至六月十日期間

的上海局勢。文章指上海「高自聯」撕毀各校張貼的恢復和維護正常教學秩序的通告，搶奪學校廣播台或私設廣播台；又衝印刷廠，強行印刷傳播反革命謠言的傳單。

同一篇文章又說，六月四日下午和晚上，上海「高自聯」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六月五日凌晨上街攔截車輛，設置路障。又說在六月四日至八日五天內，統計全市有二百多個馬路口被反覆堵塞九百多次，有六千多輛機動車被攔停用作路障，等等。

該文又指復旦大學、上海科大及華東化工學院分別貼出鼓動恐怖活動的大字報，煽動學生「拋去一切幻想，拿起武器同偽政府戰鬥到底」。又指六月十日復旦、同濟約一百多名學生在「高自聯」的張才（即姚勇戰）等人策劃下，組織「英雄敢死隊」，到市公安局門口靜坐、示威，抗議公安局逮捕上海「高自聯」成員。

身繫囹圄，命運未卜

官方的報導評論文章，自然將這場民主運動指為「動亂」，將參與者說成是「暴民」、「流氓」。在官方眼中，「高自聯」和一切民運團體都是「反革命組織」，而姚勇戰亦如其他民運人士一樣，是「反革命宣傳煽動者」。但即使從上述官方的那種片面的材料中，我們仍能大致了解到學潮的情況和期間姚勇戰的部份活動。

此外，據了解上海學運的人士告知，姚勇戰在學潮期間曾化名張才，是怕在港的父母擔心。在六月三日，他離港赴京，打算與「北高聯」接觸。北京實行開槍鎮壓時，他應在北上途中。六四之後，上海也出現堵截汽車及罷工的號召，而那段時間，他尚未回到上海。六月九日，他返回上海之後，曾出席追悼北京死難烈士的大會。六月十日，上海「高自聯」開會，決定停止一切行動，以保存力量，並議決讓姚勇戰回港。翌日，他在機場被捕。

姚勇戰以港人身份回國讀書，以中國人身份介入民主運動。以他的居港年期，他本來要回港辦理成為永久居民，但他目前身繫囹圄，命運未卜。

姚勇戰被捕之後，他的父親姚文田曾多方奔跑，但卻處處碰壁。不久前，上海當局曾表示姚案將交由法院處理，說是二月五日提審，之後又押後到三月五日。姚勇戰的命運，關乎香港人的未來。香港人將從中共當局怎樣處理姚勇戰，看到它怎樣對待參與民運的港人，也看到被專政的處境。

七、牽連海外



鎮壓學運的結果，使海外千千萬萬華僑傷心、失望。海外留學生的反應尤為激烈，各處遊行示威、聲討暴行。而外交官員，亦紛紛變節，尋求政治庇護；共產黨員，更宣佈退黨，務求劃清界限。

中央的鎮壓行動，打擊面遠涉海外。如撤換外交使節、恐嚇留學生、以扣發獎學金相要脅，更對海外民運人士組織的活動，諸多破壞，但是海外對民運的支持依然不減。

頁數	標題	資 料 來 源		
372	留美學生受監視和騷擾（聞小田）	九	8/89	86/88
373	美洲華僑日報停刊透視（楊漫克）	爭	9/89	32/33
374	威迫利誘、欲蓋彌彰（劉志俠）	百	1/9/89	32/33
375	中共駐澳使館洗腦計劃受挫（林飄）	九	10/89	94/96
376	中共擴大海外特務網（左逆）	爭	11/89	17
377	國家教委內部文件顯示：中國留學生政策大倒退（何伯施）	當	30/12/89	43
377	中共對留學生欺壓詳情：互傳消息也是反革命（王超）	當	3/2/90	14
378	中共破壞巴黎民運內幕（虎波）	解	1/90	45/46
379	中共駐法官員大逼供，中國留學生虎口拔牙	當	3/2/90	15
380	大陸留學生受使館逼害的一個實例（楠木）	百	1/2/90	33/34
	北京在英國刮起算賬風：中國留學生壓上加壓（陳志新）	當	3/2/90	15
381	國家安全部北京會議決定：加派人員赴美法澳日（何伯施）	當	17/2/90	9
	誰說秋後不算賬？中共加強對海外留學生的清算（思平）	當	30/12/89	32

留美學生受監視和騷擾

聞小田

當中國國內大肆通緝搜捕學運領袖時，海外中國留學生也遇到一隻看不見的黑手的「搜捕」。

六月十九日，柏克萊加大的博士研究生余茂春到校園內的一幢教學樓（Dwinelle Hall）去聆聽中國旅美政治學會年會的發言，在此教學大樓的大門口，他看到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兩名官員黃祖泉和宗裕豐。只見黃祖泉飛快地把兩天前貼在大門口的一張海報撕下塞入包中。海報的內容是一個會議通知：三名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的留學生所作的一場北京「六四」屠殺之目擊者報告。

身為教育組臨時負責人的黃祖泉做此事時，並未察覺已被余茂春看到。而當余茂春立刻質問黃祖泉：「你為什麼要撕這海報？」吃了一驚的黃祖泉轉過身來，喃喃答道：「哦，這些海報已經過時了。」但是，海報上三名學生的名字並未因「過時」而改變，依舊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安插人員搜集匯報

這只是中國駐美外交官搜集其本國留美學生活動情況的一個例子。當中國政府在國內大肆通緝搜捕學運領袖之時，海外那些曾多次遊行集會、示威支持國內學弟學妹的中國留學生，似乎也遇到一隻看不見的黑手的「搜捕」。

六月十日在舊金山宣佈脫離李鵬、楊尚昆政權的前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外交官張利民，曾打電話給史丹福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一名負責人，告訴他中領館肯定在史丹福大學和柏克萊加大的中國留學生中安插了情報人員。這些「職業學生」的任務是：搜集並向中領館匯報兩校中國留學生的情況。

更多的中國留學生是通過大量匿名恐嚇電話來感受到這隻無形黑手的存在。

六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左右，柏克萊加大一位吳姓學生接到一操國語男子的電話。這名拒絕透露姓名的男子說：「這裏是所謂的自由國家，但是我警告你，你沒有自由，小心你的言行。」

六月廿二日傍晚五時卅分，這名吳姓同學又接到一匿名恐嚇電話：「聽說你要到公聽會上去作證……記住你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

人。你應該站在中國人一邊，而不是美國人一邊。如果你做出任何損害中國國際形像的事，歷史將會懲罰你。」

後來這名吳姓學生決定取消到七月七日在舊金山舉行的一個聽證會上作證。

是次聽證會由美國眾院人權委員會主席湯姆·蘭托斯（Tom Lantos）和舊金山地區選出的國會議員南希·佩洛西共同主持，題目是「中國的危機及對美國採取相應行動的建議」。

上述吳姓學生接到匿名恐嚇電話一事，即由余茂春在此聽證會上作證時披露。

恐嚇、錄影、入屋滋擾

史丹福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殷鼎在同一聽證會上作證時說，他本人也接到匿名恐嚇電話，警告他不要成為美國政府的工具。

殷鼎並透露一位女學生接到恐嚇電話的事。這名學生曾為「愛華基金會」工作，該基金會的目的是幫助六四慘案中的死者家屬及受害者。六月十一日下午，她接到一「說話帶著舊金山中國總領事館人員語錄」的電話。

舊金山中國總領事館人員語錄



大陸口音的女士」的電話。對方說：「你的政府已經說了，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你們為什麼要給反革命份子募捐？為什麼要幫別人罵自己的政府，你們回去如何交待？」

柏克萊加大的博士研究生楊建立，於六月四日凌晨在長安街上曾親眼目睹「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壓死十一名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學生，這些坦克並用機槍向搶救學生的市民掃射。

由北京逃出的楊建立，在舊金山灣區曾多次作目擊者報告並到國會聽證會上作證。據殷鼎在七月七日聽證會上的證詞，楊建立住處附近曾發現一華人男子用錄影機拍攝楊的活動。當人們問這名男子姓名時，他即顧左右而言他，並立刻逃之夭夭。

六月十日晚上，柏克萊加大「愛華社」總幹事徐邦泰（五名首批訪台大陸留學生之一）家中闖入了兩名不速之客，進門大叫「徐邦泰在嗎？」受到驚嚇的徐夫人問他們是誰並請他們坐一會。兩人也不答話，在屋裏仔細看了一遍房長而去。這時徐邦泰正帶著女兒在舊金山市政廣場出席紀念北京「六四」慘案烈士的萬人燭光追悼會。自此事件之後，徐邦泰夫婦再也不敢把女兒單獨留在家中。

美方指責，中方否認

中國留學生備受騷擾恐嚇監視的事件，已引起美方的注意。佩洛西眾議員六月卅日在舊金山的一個記者會上說，她已掌握中國留學生受到中國官方監視的確鑿證據。但她當時表示，尚不便公佈這些證據。

佩洛西在一個記者會上說，中國留學生有一萬個理由感到害怕，「他們現在回國是非常危險的」。

七月初，加州選出的國會議員文倫·克蘭斯頓致函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費信斯，促請該局調查中國外交官騷擾中國留學生的行為。克蘭斯頓在信中表示：「我們無法接受這類行為。」他並要求聯邦調查局將調查結果遞交給參院外交委員會。

聯邦調查局發言人則表示，如調查所傳屬實，他們將依法採取行動。

七月七日眾院人權委員會在舊金山舉行的聽證會上，眾議員蘭托斯聽取了中國留學生的有關證詞後說，他將向貝克國務卿報告中國留學生受到騷擾恐嚇和監視的情況，希望貝克國務卿出面制止這些事件的繼續發生。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聽到（中國）學生受到監視和騷擾了。」蘭托斯說：「外交官的特權不足以使他們騷擾個人。」

面對各界的交相指責，中國駐美領事館多次斷然否認有騷擾恐嚇及監視中國留學生的舉動。據新華社華盛頓七月四日電，中國駐華府大使館是日鄭重聲明：「中國駐美各使、領館從未組織或從事過以監視、干擾和威脅本國留學生為目的的照像、錄影、談話等活動以及其他活動。」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也分別於六月十四日、六月卅日和七月七日發表聲明，否認在中國留學生中列黑名單，並進一步指責此說法的目的是挑撥總領館和中國留學生之間的關係。

有如清廷派出的學監

中國駐美外交官似乎忘了，北京當局早已把相當數量的中國留學生劃入「反動政治勢力」。

早在六月十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即刊出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文章《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文章明確指出，「他們（指參加學生民主運動的北京大學生）用海外反動政治勢力援助的資金和物資，準備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

殷鼎七月七日在國會聽證會上透露，北京學運爆發後，史丹福大學、柏克萊加大、戴維斯加大和洛杉磯加大的中國留學生，曾通過各種途徑，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送去三萬多美元及傳真機、步話機等物資。

中國大陸的駐美外交單位，對這一「反動政治勢力」的「反政府」活動，能不追蹤監視嗎？

從四月十五日以來，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在海外激起反響。中國留學生喊出的口號，隨著天安門前事態的演變而逐步升高。從「自由民主」、「打倒官倒」，到「李鵬下台，小平退休」，到「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打倒楊尚昆！」六月四日北京血腥壓鎮後，留學生們更首次喊出「打倒共產黨！」這一切，中國駐美大使和駐各地的總領事，敢不向北京報告嗎？

更重要的是，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被

坦克和機槍鎮壓下去後，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重心已暫時轉移到了海外，吾爾開希和嚴家其七月四日在法國宣佈成立「學運民運聯合委員會」，再次打起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旗。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痛定思痛，也一直在醞釀成立政治組織，準備和中共政權作長期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外交官們敢不用超過過去十倍百倍的「高明」手法，來監視海外留學生，特別是學生領袖的一舉一動嗎？

清末，清廷向歐美日等國家派遣官費學生的同時，隨之派出學監。這些學監除定期向學生們灌輸儒家禮教外，更密切注視留學生中有無反清思想和行動。清廷的這一措施既未能阻止留學生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更未能挽救瀕於滅亡的清王朝。

今天，歷史似乎正在重演。

總部設在美國紐約華埠的《美洲華僑日報》，因「經濟困難無法負擔」，於今年七月廿一日宣告「暫時停刊」。但衆所周知，該報停刊的直接原因，乃由於「六·四」前後該報忠實報道大陸學潮，過罪於北京當權一派所致。

《美洲華僑日報》小史

《美洲華僑日報》創刊於抗日戰爭年代的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是美國僑社歷史最悠久的一份報紙。該報當年由一批逃避日本侵華戰亂的旅美中國知識分子所創辦，早年支持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頗受歡迎。

四九年中共建政後，《華僑日報》一直奉行親北京的言論立場。韓戰時期，中美兩國發生軍事衝突，該報當時的社長梅參天曾以「與敵通商」的罪名而獲牢獄之災，該報亦由日報改為「三日刊」，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由社長李顯鴻恢復每天出版。

七〇年「保釣運動」發生後，一大批台灣留

美洲華僑日報停刊透視

《美洲華僑日報》「暫時停刊」，直接原因乃由於「六·四」前後，公開採取反鄧、李立場。中共的整肅是打一批、拉一批。無論復刊與否，《華僑日報》這批知識分子不會失去真正的朋友。

(美國) 楊漫克

深得大陸留美學生的關愛。到了去年夏季奧運會時，該報大張旗鼓地通力改革，擴員增張，每週重大事件皆發號外，一時生龍活虎。而《中報》自八七年四月的危機後，便大異於前，《北美日報》亦於是年十一月關門，《華僑日報》便成為僑社間最重要的親北京報紙。該報年初人員最多時達一百多人，僅次於銷路最大的美國中文報紙《世界日報》。

自今年春起，《華僑日報》的言論日見「自由化」起來，如公開呼籲中共釋放魏京生，支持北島等人的公開信。在今年四至六月的大陸學潮期間，該報一直大幅、詳盡地報道學潮，並公開採行反對鄧小平、李鵬的政治立場。「六·四」慘案發生後的六月九日，鄧小平等元老重新露面，該報發表題為《中國的老人們又亮相了！》的社論，猛烈抨擊鄧小平、王震等人，令中共無法忍受。

美的學子精英，因開罪於國府而被中共駐美機構收編，一部分進入了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另一部分進入了《華僑日報》成為骨幹。至停刊前，該報的高層人士及主要從業人員如譚華煥、王倫等，均是當年的「保釣分子」。

《華僑日報》雖創報近五十年，然除了初期的四十年代頗受歡迎外，經營一直不甚暢旺。直到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後，才略有起色，成為中共在美國僑社的言論重鎮之一，被視為北京政府在美國的代言人。

八十年代中期的美國僑社共有三份親北京的日報，另兩家是《北美日報》和《中報》。由於《華僑日報》僵硬地報道、宣解北京官方的政策，在三份同立場報紙中，僅僅中規中矩。

擁護改革，支持學潮，開罪當局

但在近兩三年間，該報與大陸進行的改革息息相通，愛憎鮮明地支持中共改革派領導人，並與許多異見人士建立密切的聯繫，銷量日增，更

，而只是提供服務和方便。《華僑日報》有時刊載的消息，連中新社人員都不知情，也不敢過問。

中共撥款方式與妙難察

儘管《華僑日報》創業四十多年，早年曾有過幾度輝煌的日子，但是由於其一向的親北京立場和老式的美僑經營方式，這份報紙曾被坊間小報稱為「老處女」報紙，財政上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唯得力於北京方面的慷慨資助，始得維持。

據某些內情人士估計，《華僑日報》獲得中共方面的資助，是通過某中間私人財團的渠道達成的。據猜測，這個中間媒介可能是香港的一家親北京財團。此一說法亦有先例佐證——於八七年十一月在紐約停刊的親北京報紙《北美日報》，便是以香港財團為中介進行的，該董事長吳隆達便在那家香港財團有股份。因此，這種說法的可信性尤大。

從現象上看，《華僑日報》亦採取了各種掩飾外耳目目的措施，儘管這些措施本無甚必要。例如，《華僑日報》的賬戶，分別存放在「中國銀行美洲分行」和美國「CHEMICAL BANK」兩處。凡同美國方面的財務交涉，均使用「CHEMICAL BANK」的支票，凡同中國大陸及僑社方面交涉，均使用「中國銀行」的支票，如作者稿費的發放，都是「中國銀行」的支票，而員工工資的發放，則因為要報稅，因而使用「CHEMICAL BANK」的支票。

在「六·四」慘案發生後，中共開始對海外輿論機構的不忠進行報復懲戒，《華僑日報》便出現了緊張狀態，裁減員工，削減頁數。但外界注意的焦點，並不在這些現象上，而是《華僑日報》社址的六層高大樓，因為該大樓才是最有價值的產業。該樓位於紐約曼哈頓華埠 MERRER 街十五號，按目前的地價，最保守的估計也值兩千萬美元。目前坊間的議論多集中在該社址樓的產權問題上。如果樓是以中共機構名義購買的，那麼《華僑日報》非屈服於中共不可，不是投降，就是關門；如果樓是以《華僑日報》的名義購買的，那它還有與中共抗衡的餘地；即使是中共出資，簽的是《華僑日報》或該報主管的名字，也無妨，打起官司來中共不會贏。

然而，該報關門以後才從內部透出的消息稱，該報社址大樓，根本沒有產權問題，而是該報租賃來的，而非買下來的，真相大白後人們著實吃驚不已。

疾風之下，蘭艾分明

《華僑日報》是中共在美國的重鎮之一。該報所屬的「華僑企業」公司，共有十一家分公司，其中除同為傳媒機構的「華里電視台」外，尚有一「珠江百貨公司」、「國風旅行社」等大小純商務機構，該報董事長譚華煥一人就身兼十一家公司中的六個單位的董事長和董事職務，因此人們並未想到《華僑日報》會這麼快就不支關門。而此次與中共反目，在《華僑日報》的高層人士中，意見比較一致，如果辦下去，靠其他分支企業的補貼，撐它個一年半載，絕無問題。

當然，「六·四」以後，中共方面不斷升高對海外財政依附的傳媒的壓力，離開工作幹得不差。如同對香港《文匯報》李子誦、陳伯堅一打一拉的伎倆一樣，中共對《華僑日報》的整肅亦是打一批、拉一批。如譚華煥、趙景倫等人，便是挨打的對象，而「蘋果電視台」負責人則因轉得快而逃過挨整的命運。蔣天龍負責的「蘋果電視台」在「六·四」前後同報紙一樣，也大播支持學潮及中共屠殺的新聞，但到了鄧小平重新露面後，迫於中共壓力，又轉向播放起「中央電視台」攝製的「暴民攻擊解放軍」的片子，遭到僑社的一陣痛罵。

近日復刊可能性甚大

據筆者了解，《華僑日報》有在近日內復刊的可能，部分員工已接獲「等待通知，不必去找出路」的指令。與該報前高層人士意見相抵的某位負責人最近四處活動，着手復刊的工作。據悉，此努力如能成功，《華僑日報》前高層的譚華煥、趙景倫等人，將被排斥在外。根據聯合國中一位前保釣人士的說法，這是中共方面復刊的硬性條件，否則將不再給予財力的資助。

由此可知，中共現當權者目前急需一海外的輿論工具，挽回在國際上失去的分數和名譽。無論復刊與否，美國僑社再也無法看到往日風格的《華僑日報》了。當年那批可敬的知識分子將不會再去經營這份報紙了。

《華僑日報》的這批知識分子，的確是可愛的、可敬的。雖然他們過去一度被稱為「親共的報人」，但知識分子的觀念、立場問題，並不是是非問題，這本身不應被指責。一個人應有其信仰的獨立和自由，關鍵之處，方看出是非的判斷、道德的勇氣和正義的良心。他們雖然在中國的大危機中，為捍衛新聞的原則而失去了一份報紙，失掉了一批讀者，但我相信，他們不會失去真正的朋友和朋友對他們的理解！

威迫利誘 欲蓋彌彰

不能忘卻的紀念

八月中旬，利用兩週假期，在歐洲跑了四五個國家，眼前是明媚的湖光山色，美不勝收的鮮花綠樹，莊嚴華貴的宮殿，到處是遊人微笑的臉孔，拂面的是薰風驕陽。可是，祇要坐下來，神思便飛往北京，惦念白色恐怖下的神州人民。

旅途之中，會見了一些朋友，又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大家圍着一杯桔子水，擺開龍門陣，不用十分鐘，自然而然便扯到運動上頭。

所有國家，不管是瑞士、德國、奧地利，或是英國，中國人在六四大屠殺後都組織了空前的大示威，雖然事過兩月，大家談起來，還十分興奮。

大示威之後，各地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華僑，紛紛組織起來，作長期活動安排。英國的最活躍，他們發起「天天抗議」活動，每天入夜，華僑便成羣結隊，來到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前，高呼口號，唱歌，來表達他們對北京屠殺的憤怒。年青人穿的襯衣，寫上「哀中國」、「華魂」、「民主自由」等字樣，不少人全家出動，直到深夜十一時才離去。

法國是海外民運中心之一，由於法國朋友提供了一「民主之家」，所以活動大都在這兒舉行。八月十一日，一個中國民運圖片展覽在「民主之家」揭幕，它是由中國地下組織「北京六四」民主鬥爭委員會海外辦事處主辦的。據說，這個組織的成員冒着生命危險，從大陸偷運了大批照片、資料到海外，其中包括北京屠殺的血淋淋鏡頭。在偷運過程中，個別成員不幸落在北京屠夫手中，現在生死未明。這次展覽是從一千多張照片中，挑出六百多張，是沾滿血淚的控訴。

現在，中國歐洲留學生和當地華僑，都毫無例外在積極準備，響應吾爾開希和嚴家其的呼籲，在九月十二日北京屠城百日祭之時，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和各種紀念活動。

黑電話手段下流

留歐學生和華僑支持北京民主運動，不是一件一帆風順的事情。北京屠夫為了生存，急需國外經濟援助，於是便開始宣傳機器，以圖欺騙國際輿論。他們曉得，說真話的海外華人是他們宣傳的最大障礙，於是他們便使出威迫利誘手段，企圖把海外華人控制在手心中。

一開頭，北京政權擺出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把「海外反動勢力」的帽子扣過來，又通過大使館人員，使用錄影、拍照、打黑電話等手段，明明白白表示要秋後算賬。

在這種黑雲壓城欲摧的形勢下，有些留學生害怕了，甚至當了逃兵。瑞士某城學生會在六四屠城之前，募捐到一筆金錢。屠城之後，這個會一位負責人嚇壞了，連夜把自己保管的幾萬瑞士法郎，拱手交給中國大使館，剩下的款項存在銀行，由於這個人是賬戶簽字人之一，結果到現在仍無法取出使用。

當然，我們很容易便會罵這個軟骨頭，但是共產黨最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來統治，也是在瑞士，留學生組織了一次大集會，全國傳播媒介都趕來採訪。領導的同學準備了一篇聲明，打算在會後宣讀。

就在集會前一天的半夜十二點，他收到一個電話，一個男人以低沉的聲音慢慢說：「你這樣做不好，對你自己不好！」這個電話，令他整晚沒有睡眼。第二天，他給另一位領導的同學打了個電話，表示他自己太累了，請他代讀聲明。

集會順利進行，那位同學也向傳播媒介宣讀了聲明。當晚十二時，輪到他家裏的電話響了，還是那副低沉的聲音：「你做得很不好，我們很清楚你的情況，你的家人在……你的妹妹是……」這位同學吃了一驚，但是他害怕，在氣憤之餘，立即向瑞士警方報了警。

瑞士是世界上最唯一一國家，警方可以根據法律合法監聽私人電話。差不多十年前，蘇聯發生過凶惡的「和平分子」的暴力示威。一次，兩次，三次，蘇聯世街頭好像成戰場。突然之間，瑞

劉志俠

士政府把兩個蘇聯人驅逐出境，沒有宣佈理由，蘇聯也一聲沒有抗議，但是示威運動卻立即鳴呼而止。後來人們才曉得，瑞士警方從電話監聽中，發現這次運動是蘇聯幕後資助和操縱，於是採取釜底抽薪方法，一舉中的。

國安局企圖滲透留學生

西德某市（為了有關人士安全起見，城市名從略）的中國留學生堅決支持民主運動，雖然他們人數不多，祇有數百人，但是活動進行得很有聲有色。六四屠城之後，同學們發現學生會會長立場動搖，便當機立斷，召開特別大會，把會長撤換下來。目前，他們正在排演活報劇，準備九月十二日，紀念屠城百日祭。

然而，他們也面臨各種威脅。不久前，一位同學來找學生會負責人，告訴他一件事。

最近抵達這兒的兩位留學生，在離開北京前，曾被國家安全局找去談話。起初，他們以為一定凶多吉少，卻沒有料到安全局的官員和顏悅色：「你們出國留學，生活一定很苦，我們可以幫忙，每月供給你們八百馬克（按：相當於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如果不夠，可以加到一千二百馬克（按：相當於德國政府的獎學金）。祇要你們向我們匯報留學生的情況……」

兩位同學當時還沒有拿到公安局的出國簽證，為了能夠離開中國，祇有硬着頭皮答應下來。一到歐洲，他們立即給北京寫信，說明自己經濟沒有問題，因此，不用接受國家津貼。這件事讓一位相識的同學知道了，他跑去告訴學生會負責人，請他們提高警惕，消息便這樣傳開了。

西德收容了世界各地的大量難民，這種外國政府企圖滲透本國僑民的情況已經發生過，西德警方早已已有經驗，西德國會最近特別通過一項法例，凡是從

事這種工作的人，將被嚴懲不貸。出國前到過公安局的同學，如果你們看錢的份上，決定為公安局服務，最好先讀一下這條法律。

紅蘿蔔攻勢

西方是自由世界，在這裏生活的人，受法律保障，精神狀態到底和國內不同。何況人不在籠中，任你大軍百萬，又能奈何。所以北京屠夫在揮舞大棒同時，又不惜工本，實行利誘政策。

在上一期《巴黎約會》中，曾經提到七月三十日，李鵬接見法國《歐洲時報》社長楊永枯，就在新華社發表這條消息前，巴黎十多位文化界人士，接到《歐洲時報》一位高級負責人打來的電話：「我們邀請你和其他一些朋友到北京訪問，所有機票，住宿，膳食，一概由我們負責。」

這些人士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教授、藝術家，他們向來是中國大使館的貴賓，也是《歐洲時報》的顧問。但是，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在六四屠城之後，在一份抗議書上簽了名。按照北京政權的算盤，這些人接到電話，一定動心，因為這樣優厚的條件，很久沒有開出過，尤其是飛機票，而且個別人在六四慘案前，就有回國訪問的打算，對他們來說，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可是，接受這個邀請的人祇有兩三個，其他人都婉言拒絕了。出乎這些拒絕者意料之外，第二天，電話又響了：「這次不去不要緊，我們的邀請仍然有效，祇要什麼時候願意，就什麼時候通知我們，我們派人陪你單獨回去。」

這種攻勢不僅面向知識分子，在商界進行得更猛烈。巴黎八月一日建軍節的酒會，文化界人士接到請帖的寥寥無幾，商界卻很多，有些人看錢份上，另一些人則受寵若驚，總共有十多個人出席了酒會。

這件事在法國華僑中引起一片譁聲，個別華僑領袖雖然沒有前往，卻被人誤會會經赴會，家中電話響個不停，打電話的人一開口便罵，僑領受了委屈，費盡唇舌解釋，才算了結。這種羣衆的壓力，十分巨大，法國僑界直到今天，不管是知識界，或是商界，都沒有按北京政權的意思，組織過任何代表團訪

北京。

是代表團或是學習班？

不過，這着數招在倫敦卻收到成效，八月中旬，幾個飯店主人打着什麼什麼會長的招牌，以一家二鍋店的一老闆為團長，組織一個「旅英僑領代表團」，到大陸去晉見北京屠夫。

消息傳出後，英國僑界嘩然，《星期日郵報》《歐洲版》刊登了很多讀者來信，一致認為這個時候到北京去，無疑甘心替屠夫擦脂抹粉，可恥之極。他們對這些人打出華僑社會職務的做法最為反感，八月十四日，十二個英國僑社聯合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聲明此團回國與各會無關。

這班人回國的條件還不如法國《歐洲時報》開出那麼優厚，他們每人要付出六百英鎊機票，祇有食宿由國內免費招待，看他們回國的活動，也是怪可憐的，飛了十多個小時，上午才到北京，下午便聽了兩個半鐘頭「平亂真相」政治報告，晚上吃過飯，已經深夜，還要看「平亂真相」錄影帶，一看又是兩個多小時。真是自找苦吃，當工具也着實不容易。

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消一色會見政府官員，沒有接觸過任何平民，更不用說學生了。可是，他們下榻的北京燕京飯店，就在大學區附近，路上來往學生很多，這些僑領卻沒有膽量跟學生談話，他們解釋說：「不能沒有官方安排，就這樣去問人。」真乖！據說，他們也要求過見學生，得到的回答是：「學校放假，沒有學生。」鬼話連篇，小孩子也不會相信，僑領卻大點其頭，連聲稱是。

這算什麼訪問團，改名「回國政治學習班」更為貼切。北京暫時還在台上的當權派，把希望寄托在這些沒有羣衆支持的僑領身上，祇能編編國內輿論，海外華僑是絕不會上當的。

這個團其中一位團員是倫敦華埠街坊會副會長，這個會最近開會，有人提議在會刊上登出中國駐英大使題字，以及會友去年赴京由李鵬接見的照片，討論後投票，提議遭到否決。公道自在人心，北京屠夫倒行逆施，殺戮愛國人民，妄圖掩飾罪行，祇能是自費心機！

中共駐澳使館洗腦計劃受挫

朴楓

參贊出馬，三秘助陣，中共駐澳使館對留學生洗腦，唯處處碰壁。
內情被揭，公衆嘩然，使館官員老羞成怒，公開威脅，引起留學生更大反感。

近兩個月來，中共駐澳大使館官員在澳洲各地四出活動，對中國留澳人員進行政治洗腦及威脅恐嚇，企圖為中共政府「收回人心」。中共使館的這些活動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抗議及澳洲公衆與新聞媒介的關注。中國留學生抗議最為激烈，致使使館計劃受挫的地區是昆士蘭州布里斯本，但整個事件及其影響卻是全國性的。澳洲外交部長為此在參議院發表講話，澳洲政府亦就中國使館官員的作為向中國使館提出警告。

洗腦計劃初次碰釘

七月十四日，昆士蘭州中國留學生及訪問學者聯誼會（以下簡稱「聯誼會」）的現任主席會長在昆士蘭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一次聚會上宣佈：中國駐澳使館將派兩位官員到布里斯本，於七月二十八日晚在當地由中國使館資助設立的「中國留學生活動中心」召開會議，談六、四天安門事件「真相」，並放映他們帶來的中共編製的所謂「真相」錄像帶，要求所有同學出席。

中國使館的這一洗腦計劃，實際上早已在堪培拉、悉尼及墨爾本山當地的使館悄悄展開。只不過由於這幾處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多，民主運動又較活躍，故使館不得不謹慎從事，只召集了少部份「信得過」的中共黨員觀看所謂「真相」錄像帶，並將錄像帶悄悄交給某些學生，希望大家「互相傳看」，因此事情未被捅到澳洲公衆耳裏。但對於其他幾個未設有使館的大城市，就不得不專門派員前往執行洗腦任務了。第一站選擇了布里斯本，大概是因為當地「聯誼會」基本上還受控於親現政權的共產黨員手中，滿可以一炮打響。

然而，事情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如意。使館的洗腦計劃引起不少人的憤慨，有人打算發起抵制及抗議。「聯誼會」將此動向報告了使館，於是使館「未雨綢繆」，由分管昆士蘭州留學生事務的三秘趙沙潮打電話給昆州「特別學生會」主席何定剛。「特別學生會」是五月間由昆州「聯誼會」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民運組織，其主席何定剛原為「聯誼會」副主席。趙沙潮在電話中軟硬兼施，企圖說服何定剛不要

組織抗議行動。趙說：「我們是吃皇糧的嘛，你們就別太過份了嘛。至於你們以前幹的，我們可以既往不咎嘛。」

何定剛立即答道：「我們平民完全正確，用不着你什麼警告不警告。六、四死難者的屍骨未寒，你們已經忙著『消毒』來了，你不覺得你們自己過份嗎？只要你們代表這個政府來，我們就一定要抗議。」

使館還給「特別學生會」的其他一些成員打了幾次電話，但也都碰了釘子。

全國電視網追蹤播報

隨後，昆大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將中國使館要派人到昆對中國學生進行洗腦的消息告訴了澳洲國家廣播電視網ABC新聞部。澳洲人對中國的六、四屠殺記憶猶新，而中共政府竟然就已通過使館把欺騙宣傳做到了澳洲國土之上，並在澳洲公衆眼皮底下對中國學生進行政治洗腦，澳洲新聞媒介及公衆對此自然相當反

「中國留學生活動中心」外的部份示威學生。

（本文作者提供）



感。ABC立即掛電話向中國使館核實。中國使館雖不得不承認此事屬實，但卻拒絕了記者採訪的要求。

ABC隨即要求澳洲外交部對此事加以置評，並就此事採訪了反對黨外交部長。前者表示，倘有確切證據顯示中國使館在澳有不妥當行為，澳洲政府將加以過問；後者則表示，中國使館監視、騷擾中國留學生人員的事件時有所聞，澳洲政府應當對此採取必要行動。

ABC又就此事對昆大三位中國學生進行了專訪，除了在全國新聞及時事節目中播出之外，還在最重要的時事述評節目「七點半報告」中播放了有關新聞及各項採訪。

由於作賊心虛，害怕中國學生的抗議以及澳洲新聞媒介的報導，中共使館在原定會期的前兩天突然通知：「使館人員不來布里斯本了，原訂的會議不定期延期」。

使館官員改變行程，前往南澳及西澳。在這兩處他們不再召集會議，而改用了「個別談話」的方式，對當地中國留學生個別施以威脅利誘，要他們「跟黨保持一致」。他們雖然做得偷偷摸摸，結果卻仍然未能逃過社會輿論的注意。中共官員到當地對中國留學生進行洗腦騷擾的報導仍然上了當地報紙的頭版及全國電視網的時事節目。

使館大員重臨布里斯本

當然，中國使館並不就此放過他們碰了一次釘子的昆士蘭。八月底，使館官員捲土重來布里斯本。這一次，剛從中國國內接受指示返澳的教育參贊解其剛親自出馬，由三秘趙沙潮作副手，隨身攜帶一部隨時隨地可與使館及中共政府保持聯絡的流動電話機，於八月三十一日動身前往布里斯本。「聯誼會」主席會長生亦早已上下打點，在留學人員中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並通知了留學人員於九月二日晚前往「活動中心」參加會議並觀看錄像。他傳達了使館旨意，要求所有的公費生都出席。

對此，昆州中國留學生的「特別學生會」立即作出反應，決定發起抗議，並將消息傳給新聞界。



解其剛：碰上了示威者。

（本文作者提供）

八月三十一日，ABC在向中國使館核實了兩位官員已啓程的消息之後，播報了這一新聞，並在時事節目中播出對兩位知悉內情的昆大研究生的專訪。當晚昆州的一家大報社《信使報》以電話向中國使館問及兩位官員的布里斯本之行，使館官員竟粗暴地答以「None of your business」（不關你的事）。並立即掛斷電話。當然，第二天一早這些消息便都見報了，同時也上了ABC的新聞廣播。

九月二日，使館洗腦會議的當天，九信使報又刊出了一篇對一位民主派學生發言人的訪談，揭出了中國使館控制中國留學生人員的一些內情。在這些電台及報紙的有關訪談中，記者都問及一個問題：「為什麼仍有許多中國學生不敢公開抗議，甚至還馴服地參加使館組織的洗腦活動？」

被訪者回答的諸項原因中，有一項是：「中國公費留學生的經濟命脈被牢牢制於中共當局手中。為完成學業，許多人不得不從甚至討好使館。而澳洲政府提供給中國學生的獎學金及學費補助（上一財政年度為兩億澳元），卻由中國政府全權決定誰應獲取，實質上等於澳洲政府無意之中幫助了中共法西斯對公費留學生的控制。澳洲政府是否應考慮修改這樣的援助方式？」這一事實的揭示，大概頗令澳洲政府感到尷尬，而作為澳洲政府的納稅人，澳洲的公衆在獲知這個一向向少有人知的內情之後，不少人表示震驚。

猙獰面目大暴露

與此同時，已經抵達布里斯本的中共使館教育參贊解其剛與三秘趙沙潮也沒閒著。他們一面帶著記者們的追蹤，一面忙於找他們認為可靠的人秘密談話、開小會，商討如何對付可能發生的中國學生抗議行動。

九月二日晚七時，解其剛事先掛電話問清

了。在預定的開會地點附近並無示威者之後，乘車來到該處。在布里斯本的大陸「公費生」約有一百三十人，而剛服地前來開會的只有二十三人。這些人其實差不多全是要求於使館而不得來的。他們有的是來領取生活費的；有的是要申請護照延期的；有的是想要求使館准其延長修業年限或轉學位的；有的是想求得許可把國內的妻兒接出來「陪讀」的……，各有苦衷，不一而足。

解其剛沒有料到的是，迎接他下車的，還有先後到達的約一百六十位抗議者和一大堆電台、電視台、報社的記者與攝影機。抗議者包括大陸學生、港台學生以及前來聲援的澳洲學生。示威者焚毀了一些鄧小平的畫像，由「特別學生會」主席何定剛宣讀了一份給中國使館的公開抗議信。接著，抗議者與解其剛就北京屠城真相展開了一個多小時的激烈辯論。

不知是否自知理屈，與解同來的使館三秘趙汝潮不像往時那麼趾高氣揚了，卻像一個泄了氣的皮球癱在牆角。解其剛強作鎮靜，強辭奪理，頗三倒四地一會兒說只死了三百多人，一會兒說軍隊根本沒殺人。一個香港學生當場出示了一大疊北京死難者屍體枕藉的照片。他理屈辭窮，竟要無賴手段說：「你是哪兒的？你不是大陸學生，我不跟你說話！」

最後，解其剛乾脆撕下偽裝，當眾恐嚇與他辯論的學生。在數家電視台、電台、報社的記者、攝影機和錄音機前，他憤憤地對示威的中國學生說：「You are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Of cause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welcome you to go back!」(你們是反政府的，當然政府不歡迎你們回去！)

此語一出，全場嘩然。誰都知道解其剛身為教育參贊，代表中國使館，且又剛從大陸中共政府領回護照，這句話的份量可想而知。它其實暴露了中共對海外留學生的真實態度。

這場辯論，終於以解其剛理屈辭窮，強迫房間關上門再也不出來而結束。

還要執行監視控制

當晚十點，澳洲國家廣播電台播放了有關新聞，並在次晨重播。連續兩天，昆州的主要報紙均以「使館官員恐嚇中國學生」之類標題進行了有關報導。澳洲最主要的幾家全國電視網，包括國家台ABC、民族台SBS，以及七號台，均在晚間黃金時間以相當篇幅在新聞或時事述評節目中予以報導，還特將解其剛恐嚇言辭的錄音以字幕標出。

中國使館官員的這些行為，引起了澳洲公眾及政府的關注。九月六日，澳洲外交部長伊文士在參議院表示，中國使館官員四出活動對中國留學生進行洗腦並恐嚇，澳洲政府極表關注，並說澳洲政府已向中國大使館提出警告。澳洲最大的日報《澳大利亞人》以及華文澳洲版《星島日報》與《新報》均報導了這一消息。

中共駐澳使館官員的布里斯本之行雖然碰了釘子，原訂在當地逗留六天的計劃也縮短為三天，但這並不意味中共使館會就此放棄他們對中國留學生加強監視、控制的計劃。據悉，解其剛在離開布里斯本前掛電話給他的一位朋友說：「還要往別處去執行任務。」而趙汝潮則向他的一位朋友透露了他「忙得很，要管全澳中國留學生新成立的這麼多非法組織」。

九十年代 1989/10

中共擴大海外特務網

擬收買外國組織 對付民運人士

本刊特約記者 左 逆

警察學校加緊訓練特務

中共高層和北京當局對目前海外民主勢力的活動十分惱火，已經決定將採取各種手段追捕通緝的「罪犯」。

北京市公安局機關日前正在位於西南郊的一所警察學校訓練三十多名特工人員和幾十名「留學生」，這批人將分別在聖誕節前後，派往法國、美國等國。同時，中國大陸警方還計劃收買西方國家的某些組織，利用第三隻手打擊、破壞海外民主運動。

國家安全部從十月十三日開始召開各地安全廳、局長會議，前安全部長梁雲也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重點討論、研究了海外民運分子、敵對勢力等問題。

向外國增購裝備器材

為了提高警察力量，中共決定加強裝備，並向外國購買高級器材。

不久前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江澤民、李鵬、楊尚昆到會，並且作了講話。他們講話的部分內容如下。

江澤民講話說：在這次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公安工作暴露出很多問題，特別是警察的裝備太差，通訊設備趕不上應變需要。警察要盡快增加裝備，向外國購買大量的「非殺傷性武器」、高壓水槍、瓦斯和橡皮子彈等。

江澤民說：「我在此要引用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一句話。邱吉爾當年針對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力量壯大的情況說，我們要把共產主義扼殺在搖籃之中。今天我借用這句話，今後我們要扼殺反革命犯罪活動扼殺在搖籃之中。不能等問題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處理。」

江李楊話含殺機

李鵬在會上也講了話。李鵬兇狠地說，為什麼在此「反革命暴亂」中，北京有那麼多的地痞、流氓參加活動，而且他們最猖狂？這與前一段公安機關工作不力有關，今後要對這些人嚴厲打擊，不能寬容。楊尚昆說，除了改善警方的裝備之外，還要努力增加警力。他講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增加更多的人員，另一方面是整頓政法和公安機關。他說，政法機關裏面也有小部分人員同情和參加了「反革命暴亂」，現在要努力清查參加的人，保持公安和政法機關的純潔性。

看來中共統治下的這個警察國家，正在竭力加強對人民特別是民主力量的箝制和鎮壓，而且還要加緊把黑手伸到海外。民運人士必須警惕！

中國留學生政策大倒退

- 三十五歲以下者不派出國
- 本科畢業生不列入考慮
- 社會科學學生基本不派
- 出國日期愈短愈好

何伯施(北京)

中國自從發生“六·四”事件之後，不僅對國內的大學生加緊箝制，對留在國外和將要派出國的學生也實行了相當嚴密的控制措施。最近，國家教委已向各地的有關部門和高等院校發出一個通知，對派學生出國留學(包括公費出國、學生交換計劃及以外國獎學金出國的學生)的工作作了新的指示。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在下達有關指示的講話中，更把“六·四”事件的部分責任歸咎到過去的留學生政策之上。

由於在“六·四”期間，在外國的中國留學生紛紛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聲援北京學生，所以在“六·四”之後，中國官方馬上通過各駐外使館收集各地的情況。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和整理材料，國家教委、國家安全部和外交部終於在九月作出了一個有關留學生於“六·四”期間在外地表現的報告。據知情人透露，這個報告雖然說“百分之九十

九的留學生都是好的”，但總體而言，報告對留學生的愛國熱情完全抹殺，認為他們上街遊行、集會和靜坐是“有失國體”，“其行動完全不符合學生的身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美、加、英、澳留學生被點名

知情人士還說，這個報告不僅措辭嚴厲，而且還寫得很具體，直接點出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等地的中國留學生表現“極差”，上述地方的中國留學生佔了中國外派留學生總數的一半，加上過去對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工作做得不好(其意是指控制不嚴)，終於出現了難以收拾的局面。

報告中又總結出一些經驗。他們認為，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絕大多數是青年學生，面對資本主義形式式的引誘，思想很容易動搖；此外，這些學生中又以攻讀社會科學的居多，更容易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這兩條經驗，很直接地影響了制定留學生新政策的過程。

經過一連串的工作後，國家教委終於製定了新的留學生政策和整體計劃，其中主要有以下的修訂：

(1) 今後將不派三十五歲以下的學生出國學習(自費的除外)。中共認為，在今次學運中，有些地方的中國留學生的表現還是不錯的(如非洲)，這除了因為當地的中國留學生較少之外，還因為這些學生一般都在四十歲以上：他們不單閱歷較深，有較豐富的生活經驗，對國情也認識較多，加上他們的家人都在國內，這就迫使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有所制約。所以，三十五歲就成了一條委派留學生的界線。

“老左”何東昌博升官

(2) 以後公派的留學生將以理工科為主，讀社會科學的基本上不再派出。國家教委的一名負責人說：“派出去學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學就信，那還得了。我們不能培養自己的掘墓人。”在一次國家教委的會議上，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亦說：“現在的青年很不行，往往以物質基礎來衡量社會制度的好壞，他們一到外國，思想就變了。我們要找的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制度，所以學社會科學的學生還是應該在國內吸收實踐的經驗，用不着到外國去了。”知情人士說，何東昌是中國官員中著名的“老左”，在教育系統中的關係也盤根錯節。在“六·四”之後，他曾一度是中央宣傳及政治思想教育小組的成員之一，本來有機會晉升，但由於他的能力有限，也欠缺權術，終於又被放棄。所以，他近來希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果能在教育事業上取得官方讚賞的“成績”

，也許仕途仍有上升機會：加上教委主任李鐵映一直沒有被現時的領導層視為“自己人”，所以何東昌就更為積極了。

(3) 以後公派留學生時，大學本科畢業生不入考慮之列；研究院畢業的則先要為國家工作五年以上。

(4) 派出外的三十五歲以上的留學人員，將以短期為主，多數是一年，以便有機會經常調換，也不致留學生在所在地有相對較深厚的根基和關係網。

(5) 以後選派學生出國，其歷年來的政治表現將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6) 學生被派出國後，他的所屬單位必須做好其家人的思想工作，所經常保持聯繫，了解學生在國外的情況。

(7) 各駐外使館應做好留學生的聯繫組織工作，藉以防患未然。

可以說，上述新措施和新精神都是一個大倒退，這不僅會影響中國與外國的交流，也會影響中國認識世界的速度和開放的速度。記得在今年初，中國曾計劃實施留學基金制，籌組基金委員會，並將於今年或明年內實行。留學基金制打破了過去名額受到學科和地區限制的弊病，並按照申請人的學術成績來統一考慮，如果真的這樣做，肯定可以更好地運用資源。誰知，現在卻來一次大翻覆。難道這又是好事多磨嗎？

當代周刊 89/12/30



李祿曾在美國眾議院作證，講述中國留學生受壓迫的事例。

行動)。但是，有些發生在留學身上的暴力事件，相信大使館是心中有數的。根據我們在外地的經驗、了解他們的運作，以及各地通訊員所反映的情況顯示，在與大使館相熟的華僑中，一部分是有黑社會背景的。他們為了要向大使館有所表示，有時會採取行動，使館官員只需略有暗示即可。流亡美國的李祿去年底在美國眾議院作證時就曾舉很多這樣的例子。上文提及的遊行車輛被破壞，就是其中一例。(不過，應該指出，相對於其他方法，使用武力是較少出現的。)

(5) 國家安全部加派人員出國。他們多以學者、學生或使館人員的身份活動。

除了上述手法外，中共對各國保護中國留學生的措施也採取強硬態度，認為人家「干涉中國內政」。例如澳洲給中國留學生自動延長留在澳洲的期限，中共馬上表示抗議。最近，美國在政治外交上與中國玩遊戲，使中國留學生的居美權不能獲得法律保障。本專題有專文詳細分析個中奧妙。

最後，必須指出，在各地大使館中也有不少願意保護留學生的人員。他們的行動，留學生是在心裏感激的；但為免給他們添不便，他們的作為只有於適當的時候才公諸於世，載入史冊。 ■

當代周刊 90/2/3

禁制 扣錢 恐嚇 黑社會

中共對留學生欺壓詳情 互傳消息也是反革命

王超(美國)

美國參議院最近以四票之差，沒有否決布希總統有關中國留學生問題的總統指令。無論怎樣，中國留學生所受到的來自中國官方的壓力是很大的，這包括了正面和側面的壓力。

以一項不完全的統計為例，由去年八月至今年一月初，已有最少二十八名較活躍的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被使館人員召去訓話，並受到種種不同程度的恐嚇。學生們互相交換消息，並記錄了談話內容。使館人員就說學生在外國也搞「串連」，還說：「別以為你們不搞組織就沒有反革命的罪名，你們搞這樣的串連，同樣可以給你們入罪。」同學們互通消息，也被視為「搞串連」，中共官員的虛弱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遊行車輛被破壞 名單不翼而飛

去年九月三十日，即中國留學生在華盛頓舉行大遊行的前一天，遊行的組織工作遭到惡意破壞。一架屬於中國學生及學者聯會的汽車被歹徒襲擊，嚴重損毀。另外幾輛準備接載波士頓學生前來參加遊行的大巴士也被破壞，車胎被刺穿和撕爛。此外，一些接載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汽車也遭到同樣的破壞，而且車內的一份參加遊行的名單不知所蹤。這是頗為典型的例子之一。

從「六四」以來，中共一直在實行白

色恐怖，儘管最近已經宣布解嚴，又聲稱釋放了一批在「六四」以後拘捕的有關人士，但實際上尚未改變白色恐怖的實質。所以，我們覺得，創造寬鬆環境是好事，人民趁機有活動的餘地，對此可以表示欣賞，但對中共實質的一面，還是要加以揭露。最近，我們從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朋友和通訊員方面收集了不少材料，讓讀者們了解個中奧秘。

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可見中共所採取的方法主要有下列幾種：

(1) 利用本身官員的身份和權力，公開地向留學生實施這樣那樣的禁制。在美國、法國和英國等地的中國留學生組織都先後受到干預，有些甚至被非法取締，另立聽命於中國大使館的新學生組織。本刊在第六期曾報道法國的情況，今期也將講述英國的情況。對於獲承認的學生組織，中國大使館也有種種監視措施，例如通過教育處向學生下令，所有公開活動都要通知教育處，主要活動並要有教育處或大使館人員在場。不少學生組織的章程都被逼進行修改，使學生組織的活動和人事權都落入大使館的控制範圍內。

(2) 使用非法手段控制不聽話的學生的經濟，例如扣發助學金或生活津貼，逼使他們就範。今期披露的一名在法國的留學生所遭遇的情況，正好說明這問題。

對不聽話的學生拒發續期護照，也可列入此項，這也是控制學生的手法之一。上文提及被訓話和恐嚇的紐約中國學生，很多就受到這樣的威脅。

(3) 採取恐懼手段，逼使學生聽話。如以學生的活動記錄作要脅(即黑材料)，這樣會影響他們回國後的工作、發展，甚至安全。據知情人透露，那些「不聽話」的學生的資料，一份將送原單位，一份則被送到國家安全部備案，那學生的將來也就完全操縱在他們手中了。最可鄙的，就是有些大使館官員竟然以留學生在國內的家人作要脅，如果留學生不聽話，其家人的工作、生活或子女的學習就可能會出現麻煩。這個專題內就有一些這樣的例子。

(4) 間接使用武力。我們估計，無論公開或暗地裏，中共官員未至於下令使用武力對付留學生(因為形勢和條件不利於他們的「全局」，暫時也不是逼切得要在人家的國土上採取這種激烈的

衆所周知，「六·四」前後，巴黎曾是海外中國民運的中心，爲舉世所矚目。然而，曾幾何時，巴黎的民運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與美國、西德等國家相比，巴黎的民運人士目前已萌「望塵莫及」、「此一時彼一時也」之歎。巴黎民運爲什麼會經歷這麼大的變化呢？筆者認爲，除了巴黎民運本身還存在一些問題外，這與中共的大肆破壞是密切相關的。筆者就這前後所了解到的一些内幕公諸於衆，一則揭露中共破壞巴黎民運的醜惡面目，二則也想提請有關民運人士今後能提高警惕，加強反間諜、反破壞工作，防患於未然。

一則是中華民主同盟（簡稱「華盟」）的一位負責人曾被中共安全部特工人員在深夜約見，只因該負責人預先有所提防，他們的陰謀才未能得逞。另一例則是民陣秘書處的一位陳姓工作人員前段時間已被國內單位開除公職。

不過，中共方面也不是不清楚，真正的民主鬥士都是鐵骨錚錚的硬漢子，不懼來自中共的直接打擊。再說，民運人士大都合法地居留於巴黎這個自由世界，享受法國政府的法律保護，在許多時候中共也就不敢隨心所欲，輕舉妄動。

手殺二：株連民運人士家屬

不過，中共方面也不是不清楚，真正的民主鬥士都是鐵骨錚錚的硬漢子，不懼來自中共的直接打擊。再說，民運人士大都合法地居留於巴黎這個自由世界，享受法國政府的法律保護，在許多時候中共也就不敢隨心所欲，輕舉妄動。

但這並不是說，中共對這些民運人士就真的一

籌莫展。其高招便是搬出中國特有的法寶來：株連民運人士家屬。這方面的例子頗多，筆者姑且舉二。其一是華盟前任主席金一中的妻子在即將辭安出國簽證之際被國內有關部門收回護照，雖望穿秋水，卻不能與久別的丈夫團聚。其二是民陣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的妹妹和年邁體衰的父母最近也都受到中共情報和公安機構的警告和威脅。中共的這種做法已給有關民運人士帶來極大的心理困擾，是缺乏起碼的人道主義的野蠻行徑。

手段三：利用左報從事罪惡勾當

中共破壞巴黎民運的另一手段便是利用《歐洲X報》從事罪惡勾當，這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利用該報中傷民運人士。就筆者所知，嚴家其、吾爾開希等著名民運領袖都曾遭到該報的口誅筆伐，被誣蔑為「國民黨走狗」、「政治流氓」等等。而由於當地的其他新聞媒體未及時地予以有力反擊，該報文章便對巴黎民運造成了一定的不良

影響，該報社長並因此而獲得現政權的賞識和會手李鴻鈞的接見。其二是，利用該左報從事間諜活

據調查，該報一名湯姓男記者便經常利用職業之便從事此類活動。每次民運團體開展活動他都不請自來，將重要民運人士拍照存檔並將活動內容整理成文字資料，然後一并交給中共駐法使館。難怪巴黎民運隊伍中每增加一位能人，便很快地上了大使館的黑名單。

手段四：不斷向法國政府施壓

中共有關方面心知肚明，法國政府的態度對巴黎中國民運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乃不斷地對法國政府施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壓力，企圖藉法國

政府之手扼殺巴黎的中國民運。筆者權且舉其具有代表性的三例。

首先談及發生在七月十四日前夕的那次施壓。按照原定計劃，將由中共政府挑選五百名中國藝術家參加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活動。但「六四」屠城發生後，此類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古德先生決定取消曾向中共發出的邀約，改由當地的兩百名大陸留學生取而代之，以示對中國人民正義鬥爭的支持。中共方面獲悉此一情報後，立即找法國政府有關部門交涉，希望取消大陸留學生的方陣，但法方最終拒絕了中共的無理要求，使中共再次地大丟「面子」。

但並不是中共的每次施壓皆以失敗告終。九月十二日是北京屠城百忌祭，巴黎的各民運團體便是日安安排了兩項重要活動，即先於上午在巴黎第十六區府舉行規模空前的「八九」民運圖片及實物展覽，然後在人權廣場舉行燭光悼念晚會。很快，消息又不脛而走，中共有關方面此次可說是使出了渾身解數，總算是贏得了一半的勝利：燭光晚會雖照樣舉行，但願展覽終因十六區區府臨時取消展覽而告吹。

中共對法國政府施壓層次最高、也最爲中共所津津樂道的一次，發生在九月二十二日之後。結果是，法國外交部長杜馬被迫公開發表聲明，重申已獲法國政府政治庇護的外國流亡份子不得從事顛覆跟法國建交國政府的政治活動。這一聲明雖未給巴黎民運的實際運作帶來太大的影響，但總算給了「六四」屠城後外交上四面楚歌、處處碰壁的中共現政權一個大大的面子。據說，中共高層因此而欣喜若狂，並曾對巴黎使館官員和外籍持工人員給予精神鼓勵和物質嘉獎。

手段五：對留學生施以政治洗腦

對留學生的政治洗腦始於「六·四」之後，也即鄧李楊集團在權力鬥爭中獲全勝之後。承擔這一工作的主要是使館教育處的外交官員們。第一批洗腦對象是全法學聯的頭頭們。全法學聯雖一直是一個爲使館所控制的官方學聯，但「八九」民運期間，它也曾做過一些應該做的事；最激進時，它甚至將寫有「全法學聯」字樣的旗幟打到過天安門廣場。北京屠殺後不久，教育處的官員們即找學聯的幾名主要負責人個別談話，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人們注意到，全法學聯很快從巴黎的民運隊伍中銷聲匿迹了；更有甚者，學聯中的個別人員已經墮落爲

地地道道的學生特務，完全站到了民運人士的對立面。

在對全法學聯恢復控制後，使館便開始了對學生的全面政治洗腦。洗腦的方式有三種。其一是舉行專門的留學生會議，通過傳達中央的文件精神，來達到洗腦的目的。另一種方式是趁同學們向教育處求助（比如鬧出生証明）時，官員們「順帶」地對學生進行洗腦。另一種方式則是官員們好拿賄賂，地光臨留學生集中居住的大學城，逐個地進行「促膝談心」。此種洗腦方式更費時間和精力，但常能收到「一誠之所至，金石為開」的良好效果。難怪五、六月份曾極為活躍的幾個留學生後來都不約而同地對民運採取了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手段六：對民運團體進行滲透

具有豐富地下鬥爭經驗的中共肯定最懂得「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道理。雖然筆者目前尚不具有備足夠的證據，指控某某人是中共間諜，但種種迹象表明，民運組織肯定已為中共所全面滲透。

「中國民主之家」的幾份內部資料和一位留學生寫給嚴家其的一封信函都相繼「不翼而飛」地到了大使館手裏，就是這種滲透的最簡單也最有說服力的例証。民陣秘書長馮潤南也曾表示：「民陣內部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是中共派來的」，可見問題已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更為危險的是，中共在進行全面滲透的同時，採用謠言戰術破壞民運。每當有人能勇敢站出來，中共便造謠說該人不是「姓共」便是「姓國」（書即共產黨或國民黨間諜）。至目前為止，巴黎幾無民運領袖未被懷疑為特務過，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這種現象已經開始產生嚴重的後果。有的留學生和華僑從內心裏支持民運，也愿為民運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但卻不敢接近民運人士，唯恐自己接觸的是中共特務。

儘管中共在利用上述手段破壞巴黎民運，但筆者深信，民主是世界性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住的。巴黎民運雖然目前遭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只要民運人士能及時地想出對策，並不斷地自我反省、自我完善，巴黎民運就一定很快度過眼下的難關，迎來一個新的高潮。

我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派來法國的留學生，於1987年11月到法國，在巴黎第六大學註冊，攻讀博士學位。在來法之前，定好由國家教委提供我的第一年資助。1988年，（大使館）教育處通知我由中科院提供我另外三年的資助，自88年11月至91年11月，並給我開了助學金證明。

教育處官員就我在法國參加民主運動，兩次找機會找我談話，我願在此將這兩次談話內容公諸於衆。

白章德和我的談話

89年10月7日上午，我從教育處白章德辦公室門口經過。他突然出來叫我，請我進了他的辦公室，並立即關上門。下面是談話的主要內容。

白：你是不是經常去民主之家？

我：我是經常參加那裏的活動，但我不擔任職務。

白：你和國內逃出來的那些人經常來往嗎？

我：是的，因為他們是有可能給中國帶來希望的。相反，那些整天叫「為人民服務」的人却是在危害國家。

白：你是我負責的學生，我不希望我負責的學生出什麼事。

我：唉，白老師，我們以往的關係還算不錯。我不希望我們為這件事影響關係。如果你今天找我談話是為我好，我謝謝你；如果是為了你自己，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將來我坐牢，殺頭，一概與你無關。你照樣坐你的辦公室。我這次來這裏（教育處），這些事我閉口不談，但是如有人先找我談，我可以和他談三天三夜。

白：不管怎麼說，你以後不得再去民主之家，不要再為民主之家宣傳，不要再與嚴家其等來往，不要再進行反政府活動。

我：鄧小平過去也在巴黎從事過反政府活動。

白：那不一樣。

我：有什麼不一樣？

白：……你是黨員。你要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是不是說如果「四人幫」上台也要和中央保持一致？

白：……，我知道你早想退黨的，你要退現在就退！看來你在民主之家還相當積極呢。

我：白老師，你也應該認清氣候，不要再說違心的話了。你們使館的人怎麼想的，我也知道。我在上中學時就反對文革的，當時的班主任就說我非常頭疼，但他現在不得不服我。

白：你在哪裏上的中學？

我：江蘇省淮陰市，你可以寫信去問。（我見白的桌上有一份江澤民的「十一」講話）噢，這位是江澤民，還有那位李鵬，你看他宣讀戒嚴令時的那一副醜態，把臉拉長了。香港雜誌把照片放大了登在封面上，這樣的人做中國的總理，真讓我慚愧。當時，天安門廣場幾百萬人要他下台，他都充耳不聞，最近還大出洋相。

白：北京市有多少人？

我：一千萬，我說有幾百萬人，還有外地人，他這個總理哪是人民選的？不就是幾個人指定的嗎？

中共駐法官員大逼供 中國留學生虎口拔牙

一名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因曾經積極參與當地的民運，被中國駐法大使館官員諸多刁難，扣發助學金。但她不畏權勢，把大使館官員與她談話的內容公諸於世，既暴露了一些官員的氣燄和嘴臉，也顯示了中國留學生敢於據理力爭的膽色。以下是她自己筆錄的談話詳情。

白：是人大常委會選的。

我：人大常委會又是什麼東西？

白：……

我：李鵬說什麼，我們國外留學生遊行，是受外國宣傳的蒙蔽，似乎我們都是無頭腦。再說許多事情有照片為証，白老師，我倒想問一問，今天你找我談是誰叫的？如果是你的上司叫的，我表示理解。但如果是你自己想起來的……

白：就不理解啦。……

我：至少我對你的看法就不一樣了。我對你說，你頂多說你們將對我如何如何，你做不到從道理上說服我。我的信仰是堅定的，停助學金，遣返回國，一切請便。但你不要指望我改變態度。

白：我們還沒想到這些呢。

我：好了，你可以把我今天在這裏說的話，都寫下來交給你的上司。

白：那當然，你最好自己把你的話寫下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像你這樣的學生呢。

我：我也保留向公眾公開的權利。

曹國興和我的談話

89年12月26日下午，我去教育處領我90年第一季度的助學金。我到劉XX的辦公室等待領支票。劉知我是來領助學金的，便叫我先去找曹國興（按：一等秘書）。我以為新一年須進行一項手續，便去敲響了曹國興的門。

曹：你叫什麼名字？

我：董平平

曹：是科學院派出的。上次是誰找你談的，你的態度很硬是嗎？

我：是白章德找我談的，並不是我先硬的。

曹：請你把上次說的話再說一遍。

我：白章德已經把我的話記下來交上去了，你想知道可以去查，我不想重覆。但你問我可以回答。

曹：你現在還經常去民主之家嗎？還參加「民陣」的那些活動嗎？

我：是的，我參加了。可是，因為要學習，我參加得太少了。

曹：11月25日「民陣」分部的會你去了沒有？

我：我去了。

曹：你參加了「民陣」沒有？他們的那

張表你填了嗎？

我：沒有，但今後的此類活動我還要繼續參加。

（曹準備紙筆，要記下我的話。）

我：對不起，你記下我的話請給我一份複印件。

曹：可以，你為什麼要參加「民陣」的活動？

我：因為他們反對鄧李楊集團。這樣好吧，我說我的話，你記你的話，最後我們交換。

曹：那不行，你記我的話好了，我給你紙。

我：我記的不承認怎辦？你是不敢這樣做（交換），那你就還是給我複印件吧。

曹：不給。

我：怎麼你剛才還答應給的，現在又不給了？

曹：不給就是不給。

我：好了，我今天來是為領助學金的。

曹：政府不會把錢給反政府的人。你如果再這樣下去，政府一定要予以追究的。

我：停給助學金，你能不能給我一個正式通知？並把你剛才這句話寫下來給我。

曹：沒有，不給就是了。

我：當然，你可以不給我助學金，但我有一點不能接受，就是這些錢不是政府的錢，而是人民的錢。我拿了人民的錢，就要為人民說話。

曹：你說誰是人民啊？你指出個人民給我看看。

我：（對於如此漠視人民的問題，拒絕回答。）你們教育處曾多次對法國新聞界聲稱，教育處的職責只是管理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從來沒有對留學生進行過監視、恫嚇和威脅，沒有停過一名公費生的助學金。可現在你們對我做是什麼？

曹：那是指對六月前後參加遊行的人講的，對之後這樣的人就不一樣了。

我：一定有關於此的書面文件，你可否給我一份，或者你把以上態度公開向法國新聞界陳述一遍？

曹：不給。至於法國新聞界，我從來就不理他們。現在大部分留學生都轉變了，就剩下你們一少撮19個，你們要繼續作孽，像楊曉明那樣，是成不了氣候的。

我：絕大多數留學生並不接受中共的那一套，而是識於他們手中的權力，有求於你們，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態度。我現在就退黨（當即寫了一張退黨聲明，交給了曹。）……

（我後來提出與曹公開辯論）

曹：我不承認你們的組織，也根本不把你們放在眼內，不願和你們分辯。

我：哈，這又是李鵬等人拒絕和廣大學生對話所慣用的那套話，一個堂堂的一秘，你是不敢和我們辯而已。

曹：我就是不願辯，這是我的自由。

我：這幾天羅馬尼亞的事你知道？我想你一定比我更清楚這意味著什麼，我們非常高興，中國人民深受鼓舞，而你却非常沮喪。

曹：我知道，我們從不下涉別國內政。我們尊重別國人民選擇，你現在和我談羅馬尼亞的事幹什麼？我並不沮喪，你也不要高興。

我：因為齊奧塞斯庫的下場就是李鵬等人的下場。你不沮喪只是嘴上說而已。我就是高興。

曹：看來你還是民主之家的骨幹分子呢。你以後還可以來找我談，但像你今天這種態度就不要來了，等你想好了再來。

我：你指望我改變態度是不可能的。好了，再見，等着你的下場吧！■

大陸留學生受使館逼害的一個實例

六、四屠城後，中共即開始對海外學子們進行「秋後算帳」，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了。但一般人認為，即使對發起、組織巴黎民運的學生領袖，中共駐法大使館也並未採取諸如停發獎學金之類的極端措施。

但筆者最近了解，一位離同情民運但並非民運人士的大陸普通公費留學生，今年元旦前夕已遭中共扣發每月賴以生存的兩千三百法郎，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在某種同情心和好奇心的驅使下，筆者走訪了受害者D君。

希望他每月能領到「六、四」前，讓大讀者朋友在加緊對中共的認識的同時，能了解到這位海外學子難能可貴的骨氣和勇氣。而倘若拙文還能引起有關團體和個人的注意，幫助他渡過目前的難關的話，那自然更是筆者的造化。

楠：D先生，在進入正題之前，請你先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威脅性兩次談話

楠：這樣看來，使館對你搞的是「突然襲擊」嗎？

D：其實也不能說是「突然襲擊」。因為使館在正式停發獎學金之前，找我談過兩次話。用現在時行的話說，就是給我洗過兩次腦。不過，腦沒有洗成，反倒碰了兩鼻子灰。

楠：能否談談這兩次談話的經過嗎？

D：好。首次談話的經過是這樣的：去年十月的一天，我在使館內偶然遇上了二秘白章德，白莫名其妙地將我「請」進了辦公室。原來他是要

找我「談談心」。白是使館鼎鼎大名的「老左」，他和我在觀點上顯然是大相逕庭，所以其結果只能是不歡而散。第二次談話是在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也即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被處決的第二天。那天我本是去使館領九〇年第一季度的獎學金的，但劉會計不給我錢，說是一秘曹國興有重要的話要跟我談。老實說，我並不認識曹。我只是聽說，他是「六、四」前後才來使館走馬上任的，典型的李鵬人物，不學無術，但自以為是。果然，他一開口便顯得盛氣凌人：「上次誰找你談話的呀？聽說你態度好生硬呀！」我自然不甘屈服，便針鋒相對地跟他頂了起來。於是，你一句我來一句去，兩人很快便爭辯得不可開交。最後，曹除宣佈停發我的獎學金外，還揚言要用中共的黨紀來處分我，理由是我參與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活動」。但他未能料及的是，我居然會當面寫給他一張退黨申請，弄得他一時措手不及，狼狽不堪！

楠：你剛才提到，使館第二次找你談話是在羅馬尼亞被處決的次日，你和曹國興一定就羅馬尼亞問題進行過辯論吧？

D：是的。我問曹是否知道羅馬尼亞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裝得滿不在乎地說知道，我便趁機諷刺了他一句：「聽到齊奧塞斯庫被處決的消息，我們心花怒放，感到鄧李楊集團的末日就要臨頭，你們的感覺一定是死灰復燃、垂頭喪氣吧？」你猜他怎麼回答：「我們不干涉他國內政。」答非所問，不著邊際，差點沒把我給笑死。

楠：堅決不向中共屈服

堅決不向中共屈服

楠：我很想聽你談談你參與巴黎民運的情況。

D：北京八九民運期間，我和其他同學一樣，參加了巴黎華人組織的一次抗議與聲援活動，尤其是六月

三日深夜，當我得知北京屠殺的消息後，我連夜趕到大使館前高呼口號，直至聲嘶力竭……後來，巴黎民運漸漸低潮，我仍一如既往地幫民運之家、民運等民運團體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就我所知，前不久民運法國分部舉行成立大會開幕式時，我是絕無僅有的一名公費生。但我並不認為自己是民運人士。事實上，至今為止，我也尚未加入任何民運組織。

坦率地說，我對政治毫無興趣。我之參與民運，純粹是出於一個中國知識份子所應有的良知和正義感。

楠：但就我所知，巴黎公費生中也有像金一中這樣的會一度是巴黎民運領袖的人物，使館為什麼只停發你的獎學金呢？

D：箇中原因不外乎兩點：首先，其他人一般屬於某個，甚或某幾個民運團體，金一中更是紅極一時的民運領袖，相對來說，他們都是比較有活動能量的人物，使館為顧及影響，對他們是不敢輕舉妄動的。我呢，可以說什麼也不是，所以曹國興對我才那麼肆意忌憚，說一不二。其次，我的態度可能比別人顯得更明朗，更堅決。這從曹國興的話中也能得到證明：「你以後還可以來找我談，但如果你還是像今天這樣執迷不悟，就不要來了。」不過，我想順便指出的是，我並無意指責其他人；相反，我很理解他們的難處——太被卡在國內的苦楚，我也是有過切身體會的。

楠：你估計使館下一步會對你怎樣？

D：獎學金停了，黨也退了，下一步肯定要找我的麻煩。株連家屬是中共慣用的伎倆。

楠：你父母對這一切將會有何反應？

D：我母親一定會很難過，很傷心。想到這點，我便覺得對不起她。我父親則另當別論。他是南下老幹部，思想極左，「六、四」以來跟中共

跟得尤其緊，我們之間毫無共同語言，他除了大發雷霆之外，估計不會有什麼別的反應。

楠：請回答我最後一個問題：經濟上失去了保障，你今後打算怎麼辦呢？

D：為了能按時完成學業，我準備向法國政府申請獎學金。如果希望落空，去中國餐館當打工仔也行！反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向中共低頭的！因為低頭便意味著對自己良心的背叛！

楠：為避免中共變本加厲地打擊報復，受害者的妻子希望筆者能隱去其夫君的真實姓名。筆者為了行文的方便，乃以「D君」代之。

百姓半月刊 1998/2/1

陳志新（英國）

北京在英國刮起算賬風 中國留學生歷上加壓

使館人員施恐嚇 以國內親人作要脅

去年五月底至六月初民運高潮期間，在歐洲的中國大使館可謂門庭若市。使館人員在中外青年的示威浪潮中渡日。然而，在「大局穩定」統一口径後，已開始向中國留學生施壓力，包括對留英學生電話恐嚇。

八成入抗議 百五人退黨

留英中國大陸學生參與及支持民運活動的人數比例極大。據英國《獨立報》採訪後估計，一千二百名中國留學生中，百分之八十曾經簽名抗議或參加在倫敦、曼城使館前的示威，超過一百五十人退黨抗議，一些人還當眾撕毀黨証，一些較小城市的示威，更是百分之百出動。在高潮時期，大使館大門緊閉，祇有一些婦女從高處窗口張望，接抗議書的工作人員也受到很大壓力，顯然是被推出前台當苦差的低級職員。

然而，大使館已在近期轉守為攻，對中國留學生秋後算帳。據一名學生領袖透露，一些使館人員致電支持民運的學生，發出如下恐嚇：「我們還在管倫敦，不要以為我們就不理倫敦的事情，也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做過什麼，和

什麼人有聯繫。」接獲恐嚇的是「留英中國學生學者聯會」的成員，這個會一直熱烈支持民運。

曾發生毆打事件

另一些留學生却收到來意不明的神秘電話，要「你們小心點，就是小心點吧。」這是善意勸告還是恐嚇，很難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已令留學生增加不安。現在，一些留學生已擔心回國後被捕，控以「叛變」或「反革命」罪名。一名最近回國的中年訪問學者離英前表示，他原意是希望延長留英簽證，暫避國內緊張，但家人來信催他回去，因為他不回國便會連累家人受迫害，連孩子也不准上學。他終於回去了，但命運如何，實難逆料。

香港留學生，雖然政治壓力的問題還未迫切（距九七尚有一段時日），但也面對另一陰影——暴力威脅。

據熟悉華人社會內情的人士透露，現時親北京政權的活躍分子中，包括有香港黑社會（如「水房」）的人物在內。據悉，一名華人青年曾因為到這些人開設的商店裡邀約員工參加支持民運示威

而遭拳擊。

香港留學生多是文質彬彬之輩，一旦與人衝突，自然吃虧，故此一些活躍學生也開始顧慮這問題。在曼城「十一」示威之前，一名組織抗議的香港留學生便對筆者表示擔心有人搗亂，因此要求英國警方加派人手保護。這次示威雖然平安渡過，但一些參加者為保障安全，還是戴面具參加。

北京向大使館下死命令

總括言之，大使館的手伸到留學生生活的每一環節，不斷監視和威嚇。據曼城一名中國學生向筆者表示，最近他們同學間搞了一個中國學生會，也遭使館查問。另一名學生表示，大使館已拍錄了歷次示威的過程，準備秋後算帳。而在一次示威中，筆者目睹一名親北京政權的活躍人士站高處拍照，他絕不是參加或支持遊行。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民陣」英國分部在倫敦成立當天，一名新華社人員亦在會場，但顯然新華

社不會熱衷於報道這類新聞，知情人士指出，他的工作是寫「內參」，向上級反映情況。諸如此類的小動作，令支持中國民運的學生防不勝防。

據大使館的一些人員透露，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上面（指北京）來的壓力很大」。北京指示，有問題的即予控制，例如停發津貼，並馬上報告。他們還要求「必須防止在我們的隊伍中再次出現失控，防止出現親者快，仇者痛的局面，浪費國家資源」。使館人員由於家人都在國內，難以突破，只有按令而行，但據知也有人在暗中作了保護學生的工夫。當然，也有一些見勢邀功的人，這些人大家都會判斷出來的。他們的做法使留學生的離心更大，擴大了緊張氣氛。

北京這類「對留學生無微不至的關懷」究竟到那一步？「訊息網絡」伸延有多廣？其目的是什麼？是否準備在英國（占士邦的故鄉）學習玩特務遊戲？外界人士無從知曉，但已令留學生大增心理負擔。

國家安全部北京會議決定 加派人員赴美法澳日

美國CIA已獲綫報並先發制人 意大利警方亦識穿四名特工

何伯施(北京) 朴力(意大利)

「六四」之後，中共對駐外的工作人員和留學生很不放心，國家安全部為此已加派了不少人員出國，對這些可能有異動的人加強了解和控制。

據本刊獲得來自北京及歐洲的消息說，較早時候國家安全部曾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增派人手到國外去，藉以了解各駐外人員、留學生，以至各種反對力量（如「民主中國陣線」）的最新情況。他們並定下了美國、法國、澳洲和日本作為他們主要的重點。

不過，雖然國家安全部的部署相當機密，但搞情報工作相當到家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亦接到了有關線報，並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方法，很「客氣地」向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非正式地打了招呼，請他們「不要亂來」。

熟悉情況的人士透露，很多人都知道各中國駐外使館內都有政務參贊之職，但或許很多人也不知道在各駐外使館中還有一個不公開的「政治處」機構。這個機構的職能並不是處理與外國的政治問題，而是專門處理內部人事的政治問題。在這類「政治處」工作的人，往往是國家安全部派出的人員。

美國中央情報局熟知這種情況，故已非正式地向中國大使館的有關人員「打招呼」，實際是向中共表明：我們已經注意到你們的動向了，請不要在我們的地方搞得太過份。他們向中共作了暗示，中共官員一聽就知道主要是針對三點：第一，不要出現武力事件；第二，不要出現引起哄動的綁架事件；第三，不要間接透過美國的華人黑社會進行活動。

中央情報局作出這樣的暗示，當然是因為前車可鑒。去年十月，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舉行大規模遊行時，就曾遭到有組織的惡意破壞，破壞的人來歷不明，但肯定與中國駐美大使館很有聯絡；他們進行破壞後還把一份參加組織遊行的名單取走，而事後不久，很多名單上的人都先後被大使館有關官員召見，這兩件事是否無獨有偶呢？

此外，在英國也曾發生過「徐海寧事件」。雖然中共當局說徐海寧是自願回國的，但徐海寧回國後到今音訊全無，而他的母親也沒有見過他一面。從種種跡象來看，這次事件是綁架回國？還是自願回國？似乎大有文章。

基於自己的利益，免得鬧出事來自己被動，美國中央情報局事先向中共表個態，也有其高明之處。不過，對於這三點，中國大使館當然認為是無理的。

國安部的外派人員，除了引起美國有關方面的注意外，在意大利亦引起麻煩。中共最近派了四名官員赴意大利，

以中國商務部門外派人員的身份，在米蘭進行一些活動，這些活動與其作為一個商務部門職員的身份並不相符，主要是調查在意大利的中國學者和學生於「六四」前後和至今的動向。此事很快被米蘭的警方得知，於是「邀請」那四位工作人員赴警察局談話；四人風聞此事，竟然逃之夭夭，米蘭警方正在追查。消息在意大利的華人、中國學者和學生之間廣泛流傳，一時傳為佳話。

意大利警方出於本國的利益，對中共國安部人員的活動當然密切注意，但同時也對比較活躍的華人開始關注。有一位入戶意大利籍，在台大畢業的香港人最近被意大利警方聘請，為其翻譯電話錄音，可見一些中國人的電話已被截聽，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針對華人非法偷渡入境的問題；至於會否有其他作用，則難以知曉了。

此外，中共最近也加派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的人員到國外學習各種偵察和監視調查的技巧。意大利《國家報》刊登了一篇有關中國與意大利警方合作的消息，題目是《佛羅倫斯警察局來了個中國的007》。文章透露，這位帶獎學金來佛羅倫斯警察局進修的瀋陽警官學校的教師警官王同志，現已開始在佛羅倫斯上班。此官專攻技術，包括科學檢驗真偽證件等一系列工作，除了每日半天的工作外，他還將在佛羅倫斯大學旁聽法律系的課程。

該位王警官於國內某大學化學系畢業，之後任教於瀋陽警官學校。這位高高瘦瘦、頗有風度，又懂英語的007在佛羅倫斯警察局的一位女警官兼翻譯的陪同下，很快就熟悉了各種技術，顯示出他對各方面的儀器瞭如指掌。據說，王警官將在佛羅倫斯進修八個月，然後赴羅馬完成最後四個月的學業。

當代周刊 98/2/17



留法中國學生參加民陣成立大會。

誰說秋後不算賬？

中共加強 對海外留學生的清算

思平

正當北大學在接受軍訓及意識形態教育，中共決意砍掉這條民運之根的當兒，對於極可能成為「反動基地」的海外中國留學生，中共也是忙不迭地收緊控制，留法中國學生已經成為一條「網中魚」。

「全法中國留學人員聯合會」還修訂章程，註明該學生組織要「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指導下展開工作」。

這個會一直以來被視為中國官方的學生組織，所有到法國公費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自動成為會員，可擁有該組織的選舉權，並可租看中國駐法大使館轄下教育處所提供的錄影帶、借閱圖書及享有活動經費補助等福利。該組織的章程第三則，一向是：「本會遵守所在國（法國）的有關法律規定。」新章程卻在此句後面加上「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指導下開展工作。」

另一處改動的地方是：過去所有公費留學生自動成為會員的資格在第十四則改成「在駐法使館教育處註冊的中國大陸留學人員具有本會當然會員資格。」此外，港、澳、台留學生以往只要經大陸會員學生推薦就可入會，現在一律被拒諸門外，新章則十四條寫明「本會不接受非大陸留學人員」，但「港、澳留學生可應邀參加本會組織的活動。」

一位大陸留學生對新章程表示憤怒，因為章程第二則寫明該組織是「非政治性、非營利性的群眾團體」，現卻要在大使館指導下開展工作，無異自相矛盾，把組織牽到政治上面。

另一位學生則表示：這跟憲法規定共

產黨領導是同一模式的，目的是更合法控制這裏的中國留學生。至於拒絕港、澳、台留學生的參予，是因為明知這些學生愛講民主、自由，不聽話。大陸留學生會否群起反對新章程？他對此表示悲觀，他認為很多學生礙於經濟來源和居留問題，多會保持緘默。

與此同時，中共已開始清洗學生組織中的民陣分子。

中共駐法大使館屬下教育處的两名官員，於十二月十四日直接包辦「馬賽分聯」的選舉事宜，事前欽定候選人，要黨員學生完成政治任務，並聲明在任的「馬賽分聯」主席楊煥明沒有選舉與被選舉權。此事不光引起「馬賽分聯」的憤怒，更普遍掀起留法的大陸學生的不滿。

楊煥明透露，八九至九零年馬賽中國學聯本已於六月十日經民主選舉產生，並上報教育處確認了選舉結果。而由大使館官員包辦的選舉，並非由學聯成員召集，他事前亦未接獲通知。當日在選舉場地，兩名中國使館官員到場並宣布現任主席楊煥明既無選舉權更無被選舉權，更指責他參加民主中國陣線。據稱在場同學曾問：這種高壓下的選舉是甚麼民主？中國使館官員稱：「這就是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在場中國同學以沉默表示抗議。他們在會場上不准同學作任何筆記，更帶走同學的錄音機。

面對上述種種欺壓，一群中國留法學生不願成為「網中魚」，掙扎着從網眼中逃出來，拒絕中國駐法大使館的保護，並決定成立他們自己的自治會。

中國留法學生、學者自治聯會的「籌委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說明中國駐巴黎大使館修改「留法學聯」的條例的細節，聲明並譴責大使館「開除」馬賽分聯主席楊煥明。

接着被「開刀」的將會是那個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他們還會忍氣吞聲，甘心落網嗎？

當代周刊 89/12/30

錦城藝術宮

118, 119

閻明復

014, 015, 029, 034, 253,
257, 258, 268, 289, 313

鮑彤

030, 177, 180, 195, 196,
204, 214, 215, 232, 246,
248, 250, 252, 256, 259,
264, 270

鮑遵信

168

十七劃

戴晴

014, 061, 130, 145, 165,
185, 187, 198, 200, 205,
219, 230, 240, 262, 289,
294, 295, 306, 313, 319

濟南

202

薛飛

294, 298, 300

謝文清

238, 268, 276, 300, 322

謝永旺

322, 324

謝永勝

187

謝飛

026

謝振榮

226, 364

鍾勁

232

鍾藝兵

187, 322

十八劃

鄭岩

297

韓少功

295

瀋陽學自聯

230

舊蘆溝橋

022

藍翎

187, 322

豐台

015, 022, 052, 101

121

魏公村

012

魏京生

170, 270

魏英雄

229

魏榮賓

231

羅征啓

209

羅紅軍

229

羅海星

224, 226, 363, 364

羅偉

232

羅綺萍

019

十九劃

譚文瑞

026, 201, 237, 292, 293,
295

譚華煥

373

關翔城

229

嚴家其

004, 014, 027, 061, 084,
092, 095, 122, 123, 142,
146, 149, 159, 180, 195,
196, 198, 199, 200, 202,
204, 205, 206, 208, 209,
213, 223, 228, 230, 240,
248, 256, 259, 262, 263,
264, 270, 289, 295, 306,
311, 323, 334, 344, 347,
363, 367, 372, 374, 378,
379

嚴婷婷

228

二十劃

蘇紹智

027, 122, 198, 200, 213,
223, 240, 248, 263, 266,
289

蘇緯

198

蘇曉康

014, 142, 152, 159, 164,
168, 188, 198, 199, 204,
211, 215, 223, 224, 230,
248, 266, 289, 306, 313,
319, 322, 326, 367

蘇煒

164, 228, 312

蘭州

115

護國寺

121

二十一劃

顧城

164

二十三劃

樂平

229

龔輝

230

農村發展中心研究所
307
達姆子彈
028, 049, 056, 080, 083,
165, 300

十四劃

熊召政
164
熊炎
231
熊偉
231
熊玠
083, 107
熊焱
196, 202
翠薇路
021, 051, 120
裴建東
232
趙喜民
229
趙復三
146, 200, 223, 240, 264
趙景倫
373
趙紫陽
004, 014, 015, 018, 029,
030, 105, 112, 123, 126,
146, 152, 158, 176, 183,
187, 214, 229, 230, 232,
236, 238, 239, 247, 255,
256, 259, 260, 261, 268,
270, 272, 276, 277, 284,
289, 290, 295, 313, 345,
373
趙瑜
092, 164, 198, 204, 326
趙義強
230
趙寰
328
遠志明
198, 211, 215, 230
齊文
232

十五劃

劉凡
230
劉千石
351
劉子濂
357
劉小曲
231
劉小郎
231
劉心武
224, 325, 327
劉正清
232
劉再復
014, 164, 198, 223, 228,
312, 319, 325
劉宏儒
272

劉京亮
229
劉林
366
劉厚生
325
劉建立
230
劉剛
129, 230, 231
劉真奇
232
劉健芝
357
劉健強
230
劉強
196, 202
劉啓林
313
劉新
232
劉源
044
劉煥文
202
劉榮錦
356, 357
劉賓雁
107, 129, 159, 164, 204,
206, 208, 212, 240, 266,
305, 313, 321, 335, 340
劉慧卿
362
劉銳紹
052, 122, 335, 336, 339
劉曉波
033, 053, 055, 059, 066,
073, 094, 095, 142, 151,
152, 161, 166, 195, 196,
198, 199, 204, 205, 212,
216, 219, 220, 224, 231,
259, 305, 312, 344
劉曉龍
231
廣安醫院
104
廣州
056, 140, 218, 223, 280
廣州中山大學
209
德勝門
021, 078, 251
歐忠友
232
歐洲時報
374
歐陽平
229
潘祥
231
潘曉濱
231
稻香湖
049
範志倫
277
蔣小東
231
蔣竹
229

蔡秀霞
106
蔡國喜
366
鄭仲兵
296
鄭宇碩
346
鄭旭光
224
鄭棣
226
鄭義
164, 198, 204, 229
鄭魯兵
058
鄭耀棠
352
鄧小平六九講話
125, 207
鄧小平六四講話
307
鄧文斌
229
鄧良平
015
鄧拓
292
魯各莊
120
魯竹茹
231
魯迅文學院
164
魯瑛
292
鴉寶路
077
黎沛成
226, 364
黎紹珍
356, 357

十六劃

橫歲
229
歷史博物館
056, 059, 063, 071, 082
084, 093, 106, 129, 153
燕京飯店
120, 130, 374
盧嘉錫
294
蕭斌
129
錢李仁
026, 201, 237, 292, 293,
295
錢辛波
289
錢嗣同
230
錢榮緬
232
錢鋼
326
錦江飯店
116
錦江賓館
118

陳紅
230
陳軍
166, 204
陳荒煤
325
陳偉東
231
陳偉澤
364
陳國凱
328
陳清華
094
陳喜來
335
陳陽北
231
陳瑜慶
228
陳
062
陳樹強
356
陳靜
229
陶洋怡
229
陶然亭
120
麥天舒
260
麥天樞
326

十二劃

拓城儀
230
彭家明
229
復旦大學
368
復興門
027, 045, 055, 062, 064,
068, 087, 092, 101, 110,
121, 169, 300
復興門醫院
062, 064, 086, 087, 090,
092, 104, 107, 179, 300
曾敏之
337, 339
朝陽門
077, 094, 120
欽本立
024, 036, 230, 247, 252,
287, 288, 289, 290, 291
港九工會聯合會
347
港九勞工社團聯合會
353
湖南
207
程明遠
198
程真
094, 095, 228
程凱
272, 295
程渝
203

程翔
335, 336, 337, 338, 339,
362
程曉農
271
童伯寧
203
絨線胡同
087
舒展
187, 322
華西醫科大學
118
賁雲海
092
賀延光
260
閔琦
226
項小吉
228
項武義
340
馮牧
325
馮英子
289
馮進
232
黃宗江
325
黃宗英
325
黃秋耘
328
黃偉軍
232
黃華
229
黃順興
027
黃榮翔
231
黃德北
197, 199, 216, 230, 295,
337
黃慶雲
328
黃濤
232

十三劃

催國興
229
新四五宣言
014
新晚報
019
新華社
027, 028, 122, 300, 337,
341, 342
新華門
005, 006, 017, 020, 023,
037, 038, 048, 058, 059,
060, 062, 064, 068, 076,
078, 087, 095, 097, 108,
113, 127, 247, 311
新華門事件
016

新聞自由導報
204
新學生組織籌備委員會
035
新觀察
018, 122, 262, 287, 292,
295, 296, 323, 339
楚莊
295
楊文
232
楊方
230
楊百揆
204, 230
楊宏
295
楊志偉
231
楊奇
338
楊冠三
229
楊建立
372
楊昭明
294
楊洋
212, 213, 350, 356
楊洪
231
楊浪
204, 260
楊益均
230
楊陶
231
楊煉
164
楊煥明
381
楊曉
229
楊巍
145, 205, 230
楊蘭
230
溫元凱
061, 197, 232, 270, 295
溫家寶
030, 058
萬潤南
142, 180, 198, 200, 213,
228, 230, 236, 262, 266,
344, 378
經濟學週報
292
葉文福
027, 142, 164, 229
董平平
379
董琪
200
解放軍報
052, 201
解放軍裝甲兵學院
241
解嚴令
161, 191, 280
賈魯生
164, 208, 326

馬洪梁
231
馬秋耘
140
馬梁崗
229
高山
204
高行健
164
高辛
061
高長生
058
高阜
095, 204, 213, 228
高新
053, 059, 092, 185, 205
高瑜
198, 204, 230, 295
高榮剛
230

十一 劃

國安部
282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271
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
253

300
崇文門
055, 092, 115, 120, 150
崔旅
232
崔照征
232
康華
237
張文光
351
張文魁
229
張仲禮
229
張光年
325

張利民
372
張抒
145
張秀夫
277
張辛欣
164, 312
張佳
230
張宗培
176
張林
231
張阿妹
271
張建丹
231
張述
230

張郎郎
297
張海天
277
張真
230
張偉平
231
張偉國
204, 230, 276, 289, 292, 295
張揚
232
張結鳳
093
張華潔
053
張銘
019
張德利
073
張潔
164
張潔華
058
張賢亮
325
張魯寧
309
張穎
325
張顯揚
229
張顯揚
122, 185, 289, 312
悼胡運動
010, 019, 045, 070, 122, 255, 247, 293, 339, 368
曹長青
204
曹思源
061, 142, 198, 199, 204, 230, 232, 270, 312
曹務奇
228
曹新源
082
曹魏求
232
梁二
094
梁天征
271
梁宏城
229
梁國雄
356, 357
梁啓南
232
梁湘
146, 272, 274, 275, 366
梅治德
356, 357
清華大學
012, 017, 035, 055, 062, 067, 077, 078, 089, 103, 220, 231
深圳
056, 208, 218, 227, 280
深圳大學
209

理工大學
088
畢宜民
226
蛇口
056
許士傑
146
許小微
204
許世傑
272
許良英
205, 289
許爲洋
356, 357
許家屯
143, 334, 338, 341, 363, 364, 365
通縣
052
郭正華
229
郭光豹
328
郭春明
232
郭玲
061
郭家寬
260
郭海峰
045, 061, 196, 231
郭陽春
232
郭瑞傑
200
郭路湘
231
陳一諮
142, 180, 198, 204, 213, 223, 226, 230, 250, 256, 264, 266, 270,
陳子明
122, 188, 199, 205, 212, 224, 226, 230, 262, 363, 364
陳小平
187
陳丹晨
187, 322, 324
陳文彬
200
陳仕強
357
陳希同平亂報告
123, 207, 209, 307, 339
陳佩斯
176
陳宗彝
094
陳明夏
229
陳明遠
231
陳勇
018
陳奎德
295
陳建平
335

九劃

侯德健
033, 045, 050, 053, 055,
059, 060, 062, 063, 066,
071, 073, 075, 077, 084,
087, 092, 094, 095, 106,
107, 115, 130, 131, 142,
185, 205, 212, 216, 220,
294
前門
049, 050, 064, 070, 084,
153
南池子
052, 053, 065, 082, 092,
108, 179
南河沿
083, 120
南長街
087
南苑
120
南開大學
088, 107
南辟
229
哈爾濱
132
哈爾濱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
230
姚勇戰
151, 216, 231, 310, 347,
368
姚錫華
237, 295
宣武門
058, 059, 064, 087, 120,
178
宣武醫院
179, 207
封從德
079, 092, 094, 195, 211,
212, 219, 224, 228,
建國門
033, 050, 055, 056, 068,
077, 081, 120
建國橋
082
政法大學
006, 016, 035, 094
政法學院
005
故宮
065
柯剛
200
柯雲路
204, 229
段長龍
232
皇子
055
科技日報
016, 205, 288, 306
紀富南
230
美洲華僑日報
373
美國之音
076, 079, 115, 116, 118,
149, 158, 159, 179, 180,

183, 206, 230, 231, 284,
307, 315, 346
胡平
205, 231
胡啓立
030, 112, 126, 168, 248,
254, 260, 293, 294
胡績偉
130, 292, 340
胡繩
252, 313
軍事博物館
049, 058, 064, 070
郁風
289
首都工人自治會
015, 076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053
首都新聞快訊社
074, 077, 078, 205
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合會
074
首都鋼鐵廠
021, 034, 253
首都醫院
104
香格里拉飯店
197
香港工會聯合會
355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161, 202, 208, 226, 333,
334, 336, 344, 345, 346,
347, 350, 352, 353, 355,
356, 363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347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合會
347

十劃

唐志強
232
唐達成
322, 324
夏其龍神父
351, 353
夏衍
321, 325
孫立
229
孫長江
205, 295
孫慧
232
孫繼紅
229
徐中
229
徐邦泰
372
徐宗懋
107
徐剛
164, 223
徐海寧
341, 350, 381

徐國明
195, 229
徐朝明
228
徐曉薇
230
徐鋼
205
徐璐
159, 197
晉文卿
231
柴玲
051, 061, 073, 075, 078,
079, 092, 094, 101, 106,
129, 195, 196, 202, 204,
206, 209, 211, 212, 219,
224, 228
殷勁
232
殷鼎
372
涂秋生
229
海外香港華人聯會
354
海澱
079, 094, 108, 112, 163
海澱路
012
海澱醫院
093
班慧澤
229
珠市口
064
珠海
208, 209, 217, 223, 225,
280
珠海特區報
130
留英中國學生學者聯會
380
祖家街
102
祖慰
164, 223, 329
秦牧
328
秦城監獄
152, 165, 166, 182, 187,
212, 219, 226, 276, 312,
325
秦衛東
229
秘密管道
208, 209, 213, 223, 225,
227, 295, 363
袁子民
229
袁慈和
230
郝秀萍
232
馬小芳
231
馬少方
094, 202
馬少華
231

李友諾
356
李文寶
229
李可染
238
李平
232
李正天
328
李江峰
230
李志國
231
李京
229
李卓人
111, 114, 206
李陀
164, 198
李南友
198
李柱銘
333, 346, 347, 348, 350,
351, 352, 353, 355
李洪林
122, 145, 152, 198, 230,
263
李海棠
356, 357
李國瑞
232
李強
064
李啓明
351, 353
李淑嫻
045, 206, 224, 303
李連秀
277, 284
李陶
231
李湘魯
256
李貴仁
145, 229
李進進
199
李慎之
312, 313
李祿
377
李路
060
李翠萍
229
李慧
232
李輝
230, 232
李銳
027
李曉芬
229
李澤厚
014, 198
李錄
092, 094
李龍慶
226, 364
李續平
231

李蘭菊
094
李璐
107
李灝
366
杜志勁
232
杜修平
232
杜潤生
248, 256
杜導正
232, 276, 293, 295
杜憲
128, 294, 298, 300
沙葉新
325
沈彤
149, 206, 213
汪成忠
229
肖波
232
車公莊路
012
車少莉
205
阮江寧
276

八劃

芮杏文
126, 168, 254, 260, 292,
293, 294
協和醫院
083, 086, 093, 107, 113,
115, 166, 320
呼家樓
015, 021, 022, 251
和平門
064
和平街
077
和平飯店
197
周少武
231
周赤峰
231
周勇軍
017
周恆錦
230
周培源
294
周舵
053, 059, 073, 092, 205,
216, 230
周鼎
366
周鋒鎖
196, 202, 231
孟進前
230
宗勁
232
屈珩
344
岷山飯店
116

岳武
225
府右街
055, 120
招商局集團
342
杭州
056, 140, 202
東四大街
033
東交民巷
051, 121
東直門
021, 033, 049, 077, 251
東單
078, 087, 092
林可清
232
林自新
205
林招榮
195
林肇榮
229
林叢均
205
武漢
202, 218, 229
武煒
229
河殤
146, 188, 224, 306, 319,
322
法制日報
018
社會科學院
271
虎坊橋
120
邵江
213
邵華強
200
邵燕祥
325
邱間城
231
金一中
378, 380
金堯如
335, 337, 338
金觀濤
122, 168, 240, 307
長安街
006, 017, 020, 050, 052,
055, 058, 059, 064, 068,
070, 077, 079, 087, 088,
091, 095, 099, 100, 106,
108, 113, 149, 178
長沙
140
長椿街
087
阜城門立交橋
012

正陽門
082
正陽樓
084
正義路
120
民主大學
053, 060, 073, 092, 120,
144, 198
民主女神像
051, 053, 059, 061, 065,
066, 068, 077, 092, 106,
107, 109, 113, 120, 128,
129, 139, 150, 163, 181,
225, 309
民主中國陣線
161, 180, 183, 205, 211,
228, 240, 314, 323, 346,
347, 352, 379, 380, 381
民自聯
202
民族文化宮
059
民族飯店
049, 062, 080, 130
永定門
055
甘陽
198, 312
田紀雲
030, 248, 256
白南生
230
白南風
204, 230
白學戎
229
白樺
325
石金剛
230

六劃

任貴忠
296
任曉町
037, 196, 212, 214, 219,
231
光明日報
024, 028, 122, 145, 166,
205, 229, 232, 289, 293
306, 321
光華之聲
118
兆龍飯店
150
全法學聯
378
全國工商聯
017
全國僑聯
164
共青團
024
同仁醫院
104
合肥
132

合肥自治聯合會
229
地下通道
145, 280, 333
地下敢死隊
150
好志勁
232
安定門
095, 120
安定醫院
173
安徽大學
132
成都
056 116 202
成都地質學院學生
119
成都軍事科技大學
118
成都高自聯
118
曲阜杰
232
朱小彤
230
朱文力
231
朱林
231
朱青
229
朱劍軍
229
汕尾
218
羊壁
338
老木
164, 229
老鬼
164, 204
自由民主女神像
061
艾中
346
艾青
027, 321, 325
艾齊朗
229
血光敢死隊
145, 152, 196
西安
140
西安敢死隊
231
西直門
021, 150, 251
西單
022, 027, 048, 052, 055,
059, 064, 070, 076, 078,
082, 087, 093, 113, 120,
153, 154
西興盛胡同
121

七劃

何家棟
226
何國
232
何強
229
何翔平
232
何達
019
何嬪
225, 280, 295
余方前
230
余茂春
372
余從庭
229
余雲剛
231
吾爾開希
014, 016, 017, 018, 020,
034, 050, 054, 061, 075,
078, 084, 092, 094, 095,
106, 108, 129, 144, 149,
166, 180, 195, 199, 202,
203, 205, 206, 208, 209,
213, 216, 223, 225, 231,
246, 253, 287, 334, 336,
347, 363, 372, 374, 378
吳小英
300
吳小鏞
295
吳仲賢
347
吳海珍
231
吳祖光
155, 289, 324
吳祖強
324
吳湘東
232
吳劍林
231
吳曉鏞
298
呂立林
229
宋迷途
231
宋德福
260
岑建勳
226, 363, 364
岑桑
328
李士非
328
李大同
205, 230, 260
李子誦
143, 335, 336, 337, 338,
339, 344, 373
李小華
230
李丹
044, 204, 295, 300

王小強
213, 256, 271
王丹
020, 075, 078, 084, 107,
129, 130, 133, 138, 151,
180, 196, 197, 199, 202,
206, 209, 211, 212, 214,
216, 219, 224, 230, 246,
253, 311
王之虹
226
王正雲
145, 230
王兆
164
王安憶
223, 327
王府井大街
055, 086, 095, 097, 108,
113, 153
王府飯店
197
王知林
229
王金年
027
王洪
231
王若水
025, 205, 276
王若望
008, 240, 289, 325
王軍濤
188, 198, 204, 205, 212,
224, 226, 230, 295, 363,
364
王剛
231
王家楨
335
王偉林
231
王健雲
231
王培公
027, 200, 218, 230, 325
王常宏
232
王智勇
017
王登躍
061
王超華
142
王陽
230
王新錦
231
王楊
197
王溯風
230
王漢武
229
王維林
166, 204
王蒙
155, 168, 212, 272, 306,
319, 324, 325, 327
王潤生
228

王輝
271
王魯湘
204, 230, 312
王曉魯
271
王燕萍
232
王雙青
229
王蘭曦
229
王焱
204, 230, 313

五 劃

世界經濟導報
016, 024, 036, 122, 204,
247, 287, 289, 290, 291,
292, 293, 339, 344, 368
包遵信
027, 122, 130, 159, 177,
180, 196, 198, 199, 200,
202, 204, 211, 230, 248,
259, 262
北大遙****
079
北大作家班
164
北京大學
005, 012, 017, 035, 078,
079, 088, 089, 107, 153
北京大學學生運動聯合會
006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045
北京工糾隊
078
北京六四民主鬥爭委員會
374
北京日報
006, 053, 054, 055, 112,
113, 158, 201, 291
北京市自治聯合工會
258
北京自治聯合會
229
北京知識界聯合會
198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253, 307
北京急救中心
087
北京紅十字會
063, 076, 078, 079, 094,
112, 130
北京重型電機廠
153
北京師範大學
006, 014, 016, 017, 018,
067, 094, 107, 153
北京航天大學
015
035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012, 014, 015, 016, 017,
020, 024, 035, 045, 051,
053, 058, 061, 062, 063,
066, 070, 071, 075, 096,

097, 120, 130, 149, 198,
202, 205, 222, 224, 230,
231, 281, 324, 368
北京高校學生第二自治聯合會
169
北京晚報
145, 153, 306
北京理工大學
017
北京第六醫院
092
北京飯店
033, 051, 058, 082, 083,
092, 093, 100, 101, 113,
114
北京魯迅文學院
142
北京總後勤學院
241
北美日報
373
北島
164, 204
古城區
022
古華
164
司徒元
019
司徒華
333, 346, 347, 348, 351,
352, 353, 355, 363
四二〇
010, 016, 035
四二七大遊行
010, 012, 016, 023, 045,
061, 180, 246, 251, 292
四二二
016, 045, 251
四二六社論
004, 008, 011, 012, 014,
017, 023, 026, 027, 028,
029, 030, 036, 038, 039,
045, 063, 065, 070, 122,
124, 130, 181, 246, 247,
249, 253, 255, 256, 257,
259, 264, 292, 307, 309,
324, 339
四川
118
四川大學
118
四川工業學院
132
四川師範學院
118
四五行動
354, 356, 357, 358
四通公司
230, 236
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
307
外地高校學生聯合會
063, 066, 097, 198
外省赴京高聯
053
外貿大學
078
未名湖哭案
162

索引

二劃

人民大會堂
082, 179
人民電影院
118
人民醫院
102
人東派出所
118
八角村
021, 251
十九種人
163, 241

三劃

三里河路
052
三環路
022
上海
037, 056, 155, 202
上海工人聲援團
368
于宏
018
于浩成
004, 014, 027, 185, 187,
198, 204, 219, 229, 248,
263, 276, 281, 289, 296
土貴陽
229
大公報
111, 113, 114, 161, 223,
334, 338, 341, 344
大北 遙
051
大連
140
工人自治聯合會
054, 061, 120, 123, 149,
195, 198, 199, 217, 222
工聯會
229, 336

四劃

中日友好醫院
087
中央民族學院
035
中央美術學院
019
中央電視台
027, 128
中央廣播電台
027
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
237, 253, 271, 307, 342
中南海
006, 019, 027, 062, 078,
082, 120
中國人民大學
314
中國之春
226, 230
中國文化知識界救援團
205

中國文聯
164, 321, 324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230, 355
中國民主聯盟
037
中國民主黨
037
中國民聯
023, 180, 205, 206, 213,
226, 231, 259
中國作家協會
025, 164, 321
中國青年報
204
中國國家安全部
219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253, 271, 307
中國學生會
380
中國警官大學
241
中關村
012, 079, 112, 153
尹敬
064
井水不犯河水
214, 261, 346
五一七宣言
205
五一九戒嚴令
020, 021, 022, 023, 024,
026, 027, 033, 061, 070,
089, 112, 150, 159, 183,
256, 288, 309, 328
五一九講話
027, 038, 045, 249, 257,
258
五一三
020, 021, 036, 045, 061,
070, 150, 247, 256
五三一農民遊行
054
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014, 016, 036, 247, 251
五棵松
005, 021, 103, 154
六二絕食
231
六八搜捕令
045
六里橋
015, 020, 021, 022, 028,
251
六部口
019, 020, 045, 049, 052,
053, 055, 058, 062, 064,
070, 074, 076, 080, 082,
086, 087, 091, 092, 103,
113, 120, 121, 165, 178,
179, 220
公主墳
021, 022, 028, 049, 051,
120, 178, 223
公務員總工會
353
化工學院
078
卞漢武
229

反共基地
348

反革命暴亂
063, 111, 112, 126, 138,
201, 214, 243, 303, 333

天安門
018, 028, 050, 055, 059,
070, 082, 088, 101, 102,
111, 256, 312

天安門廣場
005, 006, 013, 015, 017,
019, 020, 024, 025, 027,
033, 034, 035, 036, 037,
044, 048, 049, 053, 059,
060, 062, 063, 064, 065,
068, 070, 074, 076, 077,
080, 083, 091, 092, 095,
103, 104, 108, 112, 120,
128, 130, 139, 144, 150,
153, 154, 163, 166, 178,
195, 220, 222, 251, 284,
300, 307, 320, 379

天津
056

天津南開大學
005, 017, 067

天壇東側路
121

孔捷生
164, 228, 327, 328

戈揚
010, 018, 122, 198, 289,
292, 295, 296, 307, 323,
339

文丹
232

文正明
231

文匯之友協會
338, 340

文匯報
052, 111, 113, 114, 223,
230, 307,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4, 373

文藝報
024, 204, 289, 321

方克
231

方勵之
004, 045, 061, 138, 142,
146, 161, 166, 183, 197,
198, 199, 202, 204, 206,
215, 224, 226, 231, 240,
248, 256, 259, 262, 284,
304, 305, 306, 309, 344

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
140

木樨地
044, 045, 048, 049, 051,
052, 053, 055, 056, 058,
062, 064, 065, 070, 075,
076, 078, 079, 080, 084,
087, 089, 092, 093, 094,
102, 103, 107, 120, 127,
128, 130, 154, 165, 169,
178, 179, 300

毛主席紀念堂
073, 084, 119

王力
073

